

THE LEFT

左翼

第一號

四刷

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	黎建江 /1	重組左翼	劉鳴生 /4
日本春鬥與台灣秋鬥	趙金鳳 /6	逼近總統大選，312春鬥	工委會 /9
劇場國家化的社區營造	王墨林 /10	編輯報告——封底	
【台灣大震災論集】		震災的政治經濟學	陳信行 /13
安置未果！何來重建？	唐曙 /18	震災與民怨	汪立峽 /21
原住民災民	阿偉 /22	阪神大地震的經驗	江仁傑 /24
災盟「家園重建綱領」之「住民篇」		九二一受災聯盟 /25	

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

——從局勢演變談起

黎建江

一.前言

左翼社會運動發展的困難，是大家都知道的。這裡頭有社會運動本身的困境，有左翼運動的問題，包括蘇聯東歐垮台及中共經改所引發者，還有台灣具體環境下特有的問題。由於問題十分艱鉅，有些部分甚至是全球性的，令人覺得不是台灣左翼有能力可以解決的。從而讓有些朋友認為，左翼事業不可為，更滋長了部分仍然具有理想者的消極悲觀態度。

吾人固然不可抱持無知的樂觀或自欺欺人的態度，但也不必過於悲觀。左翼事業

從九十年代初期以來，誠然遭遇空前嚴苛的挑戰，但也並不必然從此陷入絕境，一無可為。事實上，全世界無數的左翼人士正從不同的角度，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進行深刻的反省與尋找出路的工作。這麼大規模而深刻的工作，我們不相信會全然毫無成效的。台灣的左翼人士，也應當加入這個雖無組織卻是龐大的反省與重建洪流，與全世界左翼人士共同迎接這個空前的挑戰。作為第一步，我們應當針對台灣的特殊性，作出左翼的分析，並且擬定現階段工作的路線與策略。

二. 台灣目前形勢的宏觀考察

台灣的工農階級或其他弱勢團體，基本上都處於自在階段。尚末能夠決定社會的走向，甚至不能影響社會的輿論。因此，在探討台灣的宏觀形勢，無可避免地，主要得分析統治階級的動向。

李登輝政權十多年來的措施，成功地將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轉化為民粹式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與前相較，政權的資產階級性格更加凸顯。這可以從金錢政治與黨營事業的急速膨脹看出。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也使資本主義的意識型態對社會的操控取代了往日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民粹主義的氾濫，更把許多社會內部的矛盾轉化到兩岸的對立，所有這些，都嚴重地阻礙了左翼社會運動的發展。

李登輝是個有使命感的人，綜觀他十多年來的作為，李登輝有計畫有步驟地把台灣帶到台獨的目標。為達此目標，對內他強化資產階級與民粹主義的力量，對外則加緊結合美、日等國的右翼力量。同時不斷地激怒中共，企圖藉由中共過激的反應，凸顯台灣受打壓的可憐處境，以此誘導台灣人民敵視中國，從而凝聚敵愾同仇的台獨意識。這些策略，在李登輝執政的前期實施得相當成功。

但最近兩三年來，由於中共的警惕。加上中美關係緊張下美國對台獨支持的保留，李登輝的台獨進度受到挫折。而李登輝的任期卻即將結束。雖然李登輝也企圖利用延任、國大延任等等方式，讓他能夠直接主導台獨這個「歷史使命」，但由於他長期的各種作為，使他這些企圖難以實現。

盡力輔導連戰讓他可以繼續「垂簾聽政」，是他目前主要的策略。但是，連戰這個「呆頭鵝」固然讓他易於駕馭，卻得不到選民的青睞。集集地震本是一個天降的機會。果然，李登輝政權利用這個大好機會，成功地隔絕了其他候選人上媒體的機會；甚至，為了凸顯「李連」的「救災成績」，更隔絕了災民的聲音。但成效似乎不彰。連戰的聲勢曾經一度上揚但不久又掉回 15% 以下，看來選上的機會不大。

李登輝是不會輕易放棄的。特別當他看到台獨的內部條件已經接近完成，他更不會讓煮熟的鴨子飛掉。面對連戰選情低迷，李登輝一定會再出怪招。最近邀請日本右翼政客

石原來台，以刺激中共來達到兩岸緊張，為其一例。其他更激烈的手法，包括挑起兩岸的軍事衝突，都有可能。值得吾人注意。

雖然如此，但是在李登輝下台以後，情勢總是會有變化。就左翼社會運動而言，這是一個比較有利的環境。畢竟，要比李登輝更有能力把民粹主義以及極右政策推行得如此出色的人，也不容易找到。我們可以有審慎的樂觀，而準備迎接這個時機的來臨。同時，我們要繼續與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政權鬥爭，為剷除李登輝建構出來的惡性資本主義與民粹主義而努力。

三. 台灣當前左翼運動的主要問題

外在的環境固然十分困難，但並不是毫無機會。即使在李登輝極右且民粹主義高漲的時期社會運動的土壤依然存在。例如，李登輝為了鞏固其政權，並且朝向台獨的目標，他強化了大資產階級與地方派系的力量，從而促成人民對黑金政治的極度反感；他企圖透過國大延任來制訂「基本法」反而導致人民對於兩黨的勾結不滿……，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啓蒙群眾，並發揮左翼在社會影響力的機會。類似的機會還會繼續發生。

這些誠然不等於左翼運動的高潮，甚至未必能連接上左翼運動，但卻是左翼能夠與社會對話的機會。從這裡，左翼可以尋求廣泛地接觸社會，教育群眾的機會，而逐漸建立左翼的社會基礎。

這樣的事情沒有發生，筆者認為，主要的因素在於台灣左翼的主觀條件不成熟。台灣的左翼在戒嚴時期徹底被鎮壓。解嚴後雖然產生了一些社會運動，但這些社會運動並未真正受到左翼思想的領導。幾次左翼組黨都因為種種困難而未成氣候。更且，台灣的左翼，彼此之間的思想交流都很欠缺；彼此的關係，主要基於具體的工作來建立。因此，台灣左翼對於台灣社會的基本分析，以及運動的政治綱領與發展策略均缺乏廣泛而系統地討論。在此情況下，台灣左翼的運動基本上是基於每個人自己的認定，缺乏集體的共識，以及在共識下的團結行動。也就是說尚未形成隊伍。

在思想共識尚未建立，政治路線有待確立之前，便認定台灣左翼難有作為，是過早的結論。台灣的左翼，在面對著台灣激烈社會變遷的機會與責任下，在面臨社會主義實踐重大挫折的挑戰下，更需要以積極的態度，結合台灣社會運動的具體條件，致力於隊伍的建設。

★

左翼的力量在台灣，飄零各處，常常不知同志在何方，因此如果我們遺漏了蟄伏在角落的你，要請您包涵與原諒。凡是左派的同志或關心左翼運動發展的朋友，我們都歡迎您來函向我們索取這份通訊。

來信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twleft@sina.com.tw

重組左翼

——一個初步的建議

劉鳴生

921大地震使許多人從迷夢中驚醒。怵目驚心的不僅是傾圮破碎的家園，還包括破敗腐朽、窘態畢露的當權體制。政府無能而傲慢，反對黨張惶而虛矯，金融財團則遊刃其間，既以淺淺捐款和形象廣告搏取樂善好施之令譽，又集結放言要脅，以減免營業稅賦為標的。變色山河的背後，原來隱藏著變質的政黨政治以及變調的房地金融產業結構。

台灣自1987年解嚴以來，長期受到壓抑的社會力乍然釋出，社會運動一度勃興亢揚，行動激發思想，思想引導行動，於是，以美、日為宗主的依賴性政經體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台灣內部因恐怖統治的壓迫而啞啞的左翼運動，一時之間，彷彿有了萌芽滋長的機會。然而，緊接著1989年的東歐變局，資本主義陣營聲稱對社會主義取得全面的勝利，歷史「終結」了，從此是資本主義市場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單極化，思想單一化，反帝、反資的左翼主張被逼到幽暗的牆角，被勝利的陣營判定為現代社會中不合時宜、不切實際的聲音。在台灣內部，隨著國、民兩大政黨的匯流以至合流，以美、日為首的資本主義更成為它們貼附、邀寵的共主。台灣的左翼依然是被警告、被看管的對象。

然而，十年過去了，資本主義的傲慢與偏見，使它變得更為極端而野蠻，台灣正是這一個陣營裡具體而微的例子：黑金政治無所不在，財力、暴力與權力三位一體，盤根錯結地壟斷了台灣社會絕大多數的資源。金融財團資本家在政治上呼風喚雨，朝野高層競相成為其代理人，厚殖利潤，分霑雨露，成為不折不扣的利益共同體。強權者越來越集中，越來越傲慢；弱勢者越來越卑微，越來越被推擠向生存的邊緣。台灣的資本主義強權結構是極端野蠻而赤裸的，就像大地震後裸露暴突的鋼筋；然而，它卻也可能因傲慢而脫離了最基本的理性，浮誇、膨脹，就像那些華而不實的樑柱，在大地震後暴露出以沙拉油桶和保麗龍填塞的醜態。

面對這樣世紀末的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堅持社會公平正義，站在反資反帝立場的左翼能夠做些什麼？

我們都知道，在台灣，有許多不滿於當前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朋友。他們有些從事勞工、農民、漁民運動，有些投身於社區基層工作，有些在研究單位或學院之中，有些進入了媒體，有些則自己組織了工作室，在各個不同的領域和崗位，為既定體制的轉變創造條件。我們也都知道，在921地震之後，有不少朋友迅速集結起來，以最高的熱忱進駐災區工作，為在震災中失去親友、失去房舍的弱勢群眾爭取合理的生存權利。

這些朋友普遍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投機、剝削和分贓過程有比較清醒的認知，因為認知，所以選擇質疑、抗爭的立場。他們對當代以武力和跨國資本橫行世界的帝國主義霸權有一定程度的嫌惡，因為嫌惡，所以決定站在對立的一方。他們的思考和行動向來傾向於政治和經濟上的弱勢者，認為公共的利益優先於私己的利益，認為公平、互助和團結仍是人類社會中值得追求的價值。他們都是我們「左翼」的朋友。

這些朋友，有的相知相惜，在工作上相互奧援；有的音訊斷絕，彼此不相聞問；有的則因為缺乏溝通的管道和機會，彼此之間產生不必要的爭執和誤解。我們認為，面對經歷過地震劫難的台灣社會，面對日益鬆動、崩解的黨國產經結構，面對新的世紀、新的時代、新的工業技術和生產模式、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局勢，有總結經驗，重組左翼，重新出發的必要。為了更有效率的抗爭，我們需要一個新的隊伍，一個思想與行動的隊伍。

隊伍的形成，需要經驗的整理和觀念的溝通，也需要對我們身處其中的世界局勢和生活模式做更深入的分析與批判。我們相信，在現階段，一個共同的刊物是有必要的。一份刊物，即是一個基地。經驗的整理與傳遞、思想的辯爭、觀念的溝通、信念的形成，共同的刊物是一個必要的起點。透過共同的刊物，我們積累經驗，凝聚力量，為改變世界、創新生活，營造更有利的條件。

這份刊物，在理想上，應以隊伍的形成和壯大做為發展的目標，旗幟鮮明地建構台灣左翼運動的正統與傳統，並以此做為與國際左翼組織或政黨接觸的陣地。這份刊物應有能力進入市場，並與現有市面上的刊物做明顯的區隔，它應有助於台灣社會新世界觀的形成與發展。這份刊物應有運動的考量，因此主要內容應包含「實踐筆記」，亦即勞工運動、社區工作、災區工作……的記錄與省思，訊息的溝通與交換。這份刊物必須是犀利的，因此要有「左翼評論」的篇章，以我們的觀點，對台灣當前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提出即時的回應與批判。這份刊物必須要能夠積累經驗，做為省思的材料，因此，應有「歷史現場」的篇章，對包括台灣、大陸與國際左翼運動的歷史做必要的回顧與整理。除此之外，它也應有「世界思潮」的篇章，譯介進步的思想與觀念；有「全球視野」，以左翼觀點分析、評論國際政治經濟問題。我們有不少朋友同時也是創作者，因此應提供文化評論與文學創作的篇幅。

我們知道，有許多朋友曾經因為孤立而困鎖愁城，有許多朋友因為沒有共同的具體目標而對前景感到無比茫然，也有許多朋友因為過去挫敗的經驗，而對凝聚隊伍抱持較為悲觀的態度。但是，有更多的朋友敏感地認為眼前是一個新的契機，是一個重新出發的起點，他們更在工作的過程中深刻感受到整合隊伍的必要。那麼，在現階段，一個可以溝通思想、凝聚想像，並共同向社會發聲的刊物，也許是一個必要的過程。 ★

日本春鬥與台灣秋鬥

趙金鳳

前言：

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台灣定期舉辦的秋鬥，是台灣勞工運動的一件大事，這項仿自日本春鬥的活動，一直吸引著許許多多台灣的工運人士、工會幹部與會員、進步知識份子及青年的參與，媒體也總以相當篇幅報導，統治當局這一天更是如臨大敵，派出大批憲警監視戒備。未料這項已經持續舉行十一年的活動，卻在今年暫時劃上休止符。雖然主辦當局工委會宣稱，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九二一震災影響，考量到許多社運人士現在都全力投入救災，因此才不得不取消。但秋鬥的停辦，顯示著台灣勞工運動目前正面臨著嚴重困難，以致連已經行之有年的傳統活動，都很難持續下去。事實上，早在去年秋鬥的場合上，一些關心工運的朋友看到出席人數的銳減，就很擔心秋鬥未來的走向。

關於秋鬥在台灣過去工運史上的意義、取得的成績、有待改進之處等問題，希望將來能有其他關心台灣勞工運動的朋友來撰文探討，使台灣工運的經驗能夠積累及傳承。本文則希望透過對日本春鬥性質、源起與發展的介紹，以檢討這種經濟鬥爭運動的成績與限制。

日本春鬥的性質：

日本的春鬥起源於一九五五年，當年元月日本最大的勞工組織「總評」（日本工會總評議會）所屬的炭勞（煤炭工會）、電產、造紙勞聯、全國金屬、化學同盟以及未加入總評的電機勞聯等八個大型工會發起春鬥，鬥爭的目標則在爭取工資的調整。第一次春鬥結束後，參與的工會一致決議組成與總評組織分離的「增加工資春季共鬥會議」，積極推動運動的進行。論者常謂春鬥開始了經濟鬥爭時代的來臨，以區別較早前強調政治鬥爭的階段。

一九五一年三月，日本總評在第二次大會上通過「和平四原則」的決議：（一）日本應全面和談，（二）日本應堅持中立，（三）反對日本軍事基地化，（四）反對重新武裝化。由總評領導的工人運動強調進行激進的政治抗爭：對外，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訂立；對內，則以強硬的態度對抗資方。不過，總評內部也有人對於這種左傾的政治鬥爭路線並不贊同，春鬥就是企圖將政治上的鬥爭轉移到經濟議題上來。

春鬥的領導人、當時擔任總評副議長太田薰不贊成總評事務局長高野實的政治抗爭路

線，他認為：日本工人運動應該以增加工資的經濟鬥爭及提高產業工會的領導力量為目標，因為「日本的工會是企業內工會，因而戰鬥性弱，即使能夠站出來也還是衝不上去。倒並不是因為工人們害怕資本家，而是因為工人有一種純樸的心理，害怕由於罷工使自己在所在企業的產品失去市場。既然工人有這種心理，不論這是利還是弊，那就按行業或者跨行業組織全體工人的總罷工，以消除這種怕失去市場的顧慮，從而使工人無後顧之憂地積極投入鬥爭」。春鬥正是這種經濟鬥爭主張路線的實現。

一九五五年的第一次春鬥，雖然罷工或怠工的時間只有一天而已，參與運動的勞工總數僅七十萬人，但卻顯示團結的勞工能夠展現的力量是非常驚人的。第二年主辦單位更是大力宣傳及動員，參與的人數高達三百萬，號稱是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罷工。同時，政府機構的工會也參與春鬥，使得春鬥的群眾基礎更為廣泛。

在春鬥發起數年後，日本的資方開始比較認真的回應勞工的訴求，日本資方的最大組織——經團聯開始與團結的工人對話；工資的調整此後也以較大的幅度調升，從五〇年代中期至六〇年代初期，大多數年份平均工資調整幾乎都接近百分之十，有些年（如一九六一、六三、六四年）還超過百分之十。甚至日本首相也出面接見工會代表，以化解勞工的不滿。

經濟鬥爭的限制：

從一九六〇年代開始，日本經濟進入到高速增長時代，資方有更多資源提供給勞工，以換取生產上勞資關係的和諧。當工人在經濟上得到一定的滿足後，他們在政治上的對抗性也就逐漸消逝。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日本勞資關係常被形容為「勞資協調路線」。扮演「協調性」角色的企業工會只關注經濟的議題，嚴重影響工會的組織與運作。現在的日本工會常被批評是與資方合作的機構，工會幹部往往是由企業的管理幹部出任，與基層工人完全脫節。

早在七〇年代對日產汽車工會的研究就發現，工會已經很難再被視為是工人利益的保護者與代言人。一九七二年日產汽車工會選舉，共有一八二個工會幹部職缺待選舉，結果候選人剛好也是一八二位，該次選舉投票率高達九九·七%，投贊成票者竟達九八·六；在一九七八年的選舉，同樣出現同額選舉的現象，且投票率更升至九九·六%，贊成票則高達九九·七%。日產工會幹部中如果有人是在會議中發言不贊成公司政策者，往往會受到其他工會幹部及公司管理階層的阻止與斥責，會後更將面對辱罵、刁難、甚至拳腳相向，迫使他必須離職或妥協。

工運政治對抗意識淡薄的另一不良影響，是導致經濟鬥爭的成果最終無法確保。如果說日本勞工過去曾透過春鬥，爭取到許多經濟利益，但近年來，春鬥事實上只具有形式意義，真正的抗爭已經很少出現了。由於政治上缺乏整合與集結，勞工力量事實上並沒

有建立在穩定的基礎上，這樣的形勢最終會影響勞工的經濟利益。因此，當日本及世界經濟局勢發生劇烈改變，日本的經濟已經不再能維持高速增長時，所謂的勞資協調路線事實上也就無法繼續存在。許多經濟利益分配模式已經改變，例如金融危機後，許多日本大型企業都已決定取消按工齡逐年調整工資的年功工資制；日本政府最近的調查還顯示，許多實施終身雇用制的大企業目前正實施「人力調整」計畫，預計調整幅高達全部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三，終身雇用制似乎也正面臨解體。顯然，如果沒有政治力量為基礎與後盾，經濟鬥爭的果實是無法長期保有的。

春鬥與秋鬥的比較：

經過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清洗及隨後戒嚴體制的長期鎮壓，今天台灣勞工運動的力量當然完全無法與日本相比，但我們還是希望透過對日本春鬥及台灣秋鬥的比較，探討雙方的異同，使得我們能夠更深入的了解台灣勞工運動面臨的問題。

首先，日本春鬥主要的目的是在爭取工資的調整，且確實為日本勞工爭得許多經濟利益。但秋鬥的訴求主要是在爭取勞工應有的一些基本權益，抗爭的對象也以政府主管機關為主，而非集中在勞資之間的對抗。這一點是較日本進步的，但因台灣勞工力量的薄弱，所以官方對於勞工的要求常常根本不予回應，往往要採取非常激烈的抗爭後，如去年秋鬥時包圍行政院，才迫使勞委會對秋鬥的某些訴求表示同意。顯然，兩地勞工的力量與組織還存在天壤的差別，有待我們所有關心台灣工運的朋友共同努力奮鬥。

其次，日本的春鬥主要是由總評及中立勞聯這兩個全國性工會聯合會推動，每年並由所屬的某一大型產業工會負責策畫工作，因此組織上能夠獲得相當充分的支援，自然也就能在動員時展示力量，迫使資方讓步，取得一定的成績。反觀台灣的秋鬥，則是由工委會及其加盟工會負責組織工作。由於目前不存在一個獨立的全國性總工會或大型的工會聯合會，因此每年舉辦秋鬥，籌劃與協調工作倍感艱困，動員成效自然也無法與日本相比。

此外，日本春鬥雖由總評主導，但其他非屬總評的工會也會積極投入，動員工會會員參與運動。但台灣工運的山頭主義似乎較盛，其他工運團體雖然也都掛名參與秋鬥，相關的幹部也會親自出席活動現場，但卻未積極動員所屬成員投入，不禁讓人心冷。簡單言之，台灣許多的工會幹部及工會會員，並不認為秋鬥的抗爭是與所有勞工有著密切關係的一件事。勞工意識的缺乏與山頭主義的盛行是台灣今後工運發展亟待克服的問題。

最後，春鬥與秋鬥基本上都屬於經濟鬥爭性質的運動，經濟鬥爭並非不重要，但如果一味重視經濟鬥爭，忽略政治意義上的鬥爭，就可能會出現運動自我消亡的情形，日本正是最好的例子。

結語：

「休息是爲了走更長的路」，我們希望今年秋鬥停辦，只是一個休止符，關心台灣工運的左翼朋友們，能夠趁此機會對過去秋鬥的經驗、乃至十餘年來台灣工運的發展，進行深刻的檢討與自我批評，然後大家一起重新出發。 ★

逼近總統大選，312春鬥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

編按：受到震災的影響，工委會決定將今年的「秋鬥」延至明年3月12日舉行，引起各界的關注。工委會特別於11月3日爲此提出說明，並與大家作了「312春鬥」總統府前見的約定。

一年一度的【1112秋鬥】日期就要來了，許多勞工朋友都在詢問：今年到底遊不遊行？秋鬥還鬥不鬥啊？鬥！工人當然還是要鬥！但是今年秋鬥要延到明年【312春鬥】。延到明年【312春鬥】是經過工委會執行委員單位兩次會議討論才決定的。原因如下：

- 一. 921地震造成台灣空前的大災難，全社會關注的焦點均是與地震相關的新聞，而且形成「國難當頭，共體時艱」的社會氣氛；如果這時我們提出工人的訴求，並且以激烈的方式（譬如蛋洗）爭取，恐怕不能獲得社會的認同，失去抗爭的正當性。
- 二. 原本今年【1112秋鬥】的兩大主題：退休金改制、國民年金，官方都因921地震影響，出現重大的變化；在抗爭的時機點上也必須作調整。
- 三. 【312春鬥】逼近總統大選日，可以使工人在總統大選中發揮「近距離」的爆破作用，以強烈施壓獲得訴求的回應。

所以，我們工人鬥陣、車拼相挺的精神不變，明年【312春鬥】大家總統府前見！
(1999年11月3日)

劇場國家化的社區營造

王墨林

這幾年，在台灣有一些詞語常常被使用，因而漸漸成爲了一種政治話語，諸如：「共同體」、「民粹主義」、「社區」……，然而，它們不只在表層上要表達的是一個想像的言語，並且，由此再繁殖出內層的一個國家構造意象。這些詞語是由國家不斷對群眾說出，而群眾也不斷說出這些詞語，一個幸福的新社會圖像儼然如同海市蜃樓好像伸手可及，尤其環顧周圍知識人對於「社區」這個詞語有如詩學般地在他們的論述中發展出了浪漫的願景，更令人覺得這個解嚴後新興的民眾運動，再打造了一個以「共同體」建構起來的社會關係之下，原本社會的上層構造與下層構造的對抗權力被消除化，卻被整編成爲一個大社會集團與小社會集團良性互動的政治策略。階級在這樣現代化的政治策略之下，是否意味著只是歷史的幽靈？那麼要問的是，被壓迫的民眾被社區化以後，對抗的對象亦隨之消失，群眾是否終究要命定地被孤獨化呢？

現代化的固有特性是複製普遍化的空間，都市肥大化以後所膨脹出來的新市鎮，佈滿了都市況味的麥當勞、卡拉OK、聲色場所……等消費符號，因此有人擔心地方特色被經濟繁榮所侵犯，殊不知經濟繁榮製造的幸福感是一種神話的話，地方特色的保持又何嘗不是另一種神話作用呢？而偏偏這個神話正在每個社區打造的規劃裡被擴大生產著，甚而與所謂「民眾文化」對等視之。地方在社區規劃之下，必須背負著都市複雜的問題，因而，固有文化就變成了對於地方的簡單概念，以致於知識人讓已經瀕臨消失的文化導入到地方上來，其實是把地方連接上了都市的鄉愁。譬如，固有文化通過近似物而產生的古蹟（即使是屢次地翻修），雖包含在歷史的認識、想像力及感情的範圍之內，但是更大的包含是班傑明說的一個「集團的夢」。

假若「共同體」是一種超現實的理想主義，譬如族群結合，那麼「社區」就是一種虛構的機能主義，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以社區產業化的經濟價值，把生產與勞動的場域變成可以觀光化的鄉愁工業，此乃國家公部門主導下的地方藝術節的壓軸戲。我們從媒體上常常看到官員與民眾在鄉土小吃的園遊會上共食的新聞畫面，這樣家族般的共食形式不只強化了封建的家族制度，更顯示了「共同體」的饗宴。

社區規劃師做的就是把具體的空間與現實的事物，以一種秩序感創設出一種希望，變成爲生活機能與這些合理性的秩序結合起來的美的形式；社區規劃的概念即是這樣把私領域（家庭成員、身份認同……）這一部份與公部門（社區規劃）疊合在一起，予以美化之後而產生一種幸福感。生活機能必須要有規劃，社區才能表現現代國家的況味。社區規劃本質上就是一個政治場域，所以國家不惜動用巨大的經費，提供社區規劃一個文

化的共產主義(民眾不受金錢的支配而形成一套自律化的道德壓抑、階級壓迫隱形化、都是平等的新台灣人的共同體…)，由此成立的其實是資本主義中市民階級認同的市民道德。因為社區是這樣糾纏著「共同體」的記憶、神話、歷史所建構共同的價值，從而也同時建構了一套排除系統；我們從這次九二一大地震，看到南投的地方災區對外勞及山地原住民差別對待的新聞，即可瞭解社區／地方的民眾原型即為所謂的新台灣人而已。

近年社區／地方常常好大喜功地舉辦什麼藝術節，其目的以為通過這樣得社區活動就可以讓我們看到一個社區的風貌，結果把藝術節弄得好像是賣開喜烏龍茶的廣告；節目好不好看不重要（烏龍茶好不好喝不重要），對社區的禮讚才重要（對新新人類的形象打造才重要）。政治實踐在這裡轉化以意象的方式呈現，不必要什麼方法論，只要「雲門舞集」下鄉演出個《薪傳》，國家政治的責任就輕而易舉地被擴散了。

美國人類學家Clifford Greertz於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十九世紀巴里島的劇場國家——尼卡拉》(NEGARA——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一書，即提到假若巴里島是一個國家的話，國王是製作人，僧侶則是導演，而農民不只是飾演跑龍套、舞台技術，更是觀眾的一分子。每一次的祭典演出，動員數千人，從極為華麗的火葬到削齒儀式，即使一般的寺廟奉獻儀式，也要動員數百人，雖不是為了某種政治的目的性，像國家祭典那樣是為鞏固國家基礎，但是因為這些集團祭典的存在，作為製作公司的國家故而永遠掌握讓祭典存在的權力，從導演到觀眾的社會內部階級的構造當然也不可能改變。所以Clifford Greertz說：「祭典不能增加權力，但是權力增加了祭典。」

解嚴後流行於學院的「社區規劃」，即是從知識人（學院）的參與，到與公部門（國家）的結合，所形成的一個小規模的政治想像場域，提供了民間社會政治秩序的具體呈現（公部門負責剪綵即為一例），就讓我們看出了由國家的軸心運作出來的社區政治，基本上是在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群」的國家裝置。即使地方的寺廟管理委員會或什麼文教基金會之類能夠利用自己土壤上孕育出來的人脈關係，而代表地方的發言人在某種程度與公部門對抗，那也不過是中央集權所強調的全體主義與地方封閉、素樸的自由主義在政治發言位置上的拉扯，換句話說，中央集權不是要在全島建立一個One touch性的國家機器，而是建立一個民粹政治所謂自律性的「社區共和國」。Clifford Greertz說：「不是國家在創造村落，而是村落在創造國家。」

《尼卡拉》一書中，提到「Negara」在巴里島的方言，不只直譯為「社區」而已，更有「國家」的意味，置於都市的上部一種賦予某政治權威體系的詞語；另外一個「Mandéas」的詞語，則是比「Negara」較具柔軟性的「村落」的意思，但是，這個詞所顯示的語意則是被統治地域的一種從屬性意味，而這些被統治者就是我們在台灣擅用的「民眾」一詞以小農為具體內容建構的民眾階級。「Negara」與「Mandéas」這樣的相互

對比，倒是讓我們省思到當今在台灣一片「社區規劃」的熱潮，能否在「社區」這個話語中找到共同體與階級之間一條區分線的存在？

更需要被識破的是打著社區之名卻行推動民粹政治之實的藝術節，一種政治實踐通過表演化轉化為以劇場的意象形塑其國家（市民）／共同體（台灣人）的圖像遂成爲一種想像而已。像巴里島瀰漫在祭典中一樣，台灣大小不斷的選舉也製造出了大小連番登場的狂熱性祭典，配合整年在各地方上出現各種藝術節／廟會，台灣被稱爲「劇場國家」並不爲過，即使其中古典政體與選舉民主有別，但台灣尙未脫離以民粹政治的儀式主義作爲推動國家政治的手段而言，仍然與巴里島的「劇場國家」論述一樣，沒有虛構的「物語」做爲意識型態的消費化，對於台灣這塊土地的神聖性就產生不出一種想像性的心理意象活動，Clifford Greertz 甚至提到，儀式上演的頻率及規模都是促使這個神聖性擴大再生產的因素。

從「雲門舞集」下鄉，《薪傳》（唐山過台灣）歷年保持上演不綴的紀錄，到各地方上紛以「社區劇場」之名進入社區活動的小劇場，取代了戒嚴時代公部門設立的文工隊宣揚其反共抗俄的國家政策，解嚴後個人藝術家的重要任務則是走入社區，發揮個人專業上的創造能力。雖然共同體是一個「集團的夢」，按照班傑明對於十九世紀的都市觀察，他看到「私人」這一部份與「物」的關係所產生的「私有制」，基本上才是強化這個「集團的夢」的物質基礎。那麼在這裡，藝術家個人只是以專業上的創造能力，就想要把地方已呈爲一片廢墟化的地層記憶，也是把民眾的歷史認識翻轉到具體的空間呈現，我們非常懷疑憑藉藝術家個人專業上的創造能力是否就足以達成？也就是說，被「私有制」異化的藝術家個人的「才華」，其對「民眾」的思考恰恰因爲對「民眾」在國家內部構造中的階級性感到陌生，而以爲依附於這個「集團的夢」就能夠予以複製台灣人的身份圖像，就難怪藝術家們拼命所生產出來的「民眾」話語，其依據的圖式只是美化→快樂而已；這跟戒嚴時代的文工隊有何不同？

公部門是製作人，藝術家是導演，而民眾是觀眾，國家動員各種資源來建構這樣一個封閉的環形系統，從外部看，除了像嘉年華一場又一場被搬演出來，而跟社區不社區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就更可以解釋我們一年之內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藝術節陸續在各地方搬演，卻看不到一個台南鹽分地帶的「烏腳病藝術節」！ ★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twleft@sina.com.tw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我們將會定期公布捐款資料，以昭公信

震災的政治經濟學

陳信行

樓塌之前

九月二十一日清晨一場七點八級的大地震造成 2333 人死亡、39 人失蹤、10002 人受傷、約三十萬人無家可歸、災區各鄉鎮的生活和生產資料毀損難以估計。即使在天災不斷的台灣，這場災變震撼之大，也是史所罕見。而且，隨著一次次的餘震，隨著兩個月來嘉義、成功兩次地震，災變的陰影普遍地籠罩在台灣社會上空。然而，人命損失的創痛可以撫平、有形物質的損失可以重建，日後在歷史上回顧九二一大地震，很有可能發現在頹頹的房屋之間再也喚不回來的，是戰後台灣社會發展歷程中，各階級人民對統治階級世界觀的心悅誠服。正如同地底的結構隨著斷層隆起暴露在太陽底下，半世紀以來台灣社會的真面目，也隨著地震之後各個面相矛盾的激化，而以前所未有的清晰程度暴露出來。

在最直觀的層面，從媒體的報導、從直接的經驗，全台人民已經熟知了救災和安置工作中民間團體的積極與整個政府體系的比較的無能。然而，一個個的組織與行動之中，我們看到了愈來愈多人的目光能夠穿透磁磚掉落的表層，看到結構中的沙拉油桶。從災盟中第一群組織起來、集體行動的大樓住戶的議題，我們就看到既深且廣的台灣發展歷史的問題。

首先，在表象的層次，我們看到了從南到北的倒塌大樓的建商，與當前掌權的各黨各派利益一體、人脈深結的現象。新莊博士的家的板橋海山派劉炳偉、太平新坪生活公園的林宏宗……等等，這些是直接當政客的；員林富貴名門那個非常阿莎力的龍邦朱炳昱，剛剛接掌了私有化的台灣人壽，是個受派系扶持的新興財團；包了機場捷運和后里月眉遊樂區、建了長生電廠，習於用公權力為自己辦事的楊天生，也是許多人熟悉的大角頭；連倒楣遠避加拿大的金巴黎建商張銘忱，也與林洋港有深厚的因緣。每一個偷工減料的建商，背後都有一個政客集團與其共生。

確實，在台灣，蓋房子包工程的沒養幾個政客不能賺暴利，政客沒運用職權培植一些包工程財團不能存活，這是長久以來稍懂事故的台灣人都熟知的事實，只是以前一般人把這些當成惱人但無大礙的台灣特色，在九二一後，尤其對災民，變成了血淋淋的壓迫事實。也由於這個共犯體制，「殺人犯法、欠債還錢」的簡單正義，這一次萬萬難以在台灣的國家體制內得到實現。

官僚資本

資本主義時代的國家為資本服務，當然決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事，國家為統治階級服務，是階級社會的通則。然而，台灣的這種大張旗鼓、鮮有掩飾的政府為資產階級中的一個比較狹隘的分層和集團控制，從而服務於這個集團——而不是「公平」地為整個資產階級的比較普遍的利益服務——卻是一個特定的時空中的產物。這種現象近似於東亞經濟危機後被西方幫閒經濟學家詬病的「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同樣的現象在危機前被稱譽為結合傳統與市場的亞洲模式)、也近似於美國十九世紀末期走向大規模壟斷時期的「強盜男爵」(robber baron)式的經濟，二十世紀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家管制、協調、扶持壟斷資本的運作方式，從一個片面來看也只是官商勾結的婉轉而建制化的型態。

在1949年以前的中國，這種現象稱為「官僚資本主義」。過去中國的理論家常把官僚資本主義同帝國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所主導的第三世界新興獨立國家中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相對起來。在這個定義中，官僚資本是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特殊現象，它不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國家壟斷資本在於後者是所謂「自然壟斷」(在競爭趨向壟斷化的資本的規律作用中產生)；而前者則是在國家不民主的狀況下，官僚得以用「超經濟」手段積累資本而產生。官僚資本又不同於新興獨立國家中以將敵產國有化、用國家力量興辦實業等手段建立起來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後者帶著與帝國主義對抗、建立民族資本的壯志；而前者則是帶著強烈的買辦性格。

在解放前的中國歷史脈絡中，官僚資本這個概念有著很具體的政治意義：把對立面集中在國民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孤立他們，從而爭取資產階級其他的成分到革命的這邊。但是抽空來看，這種提法卻有很多缺失，例如，官僚資本和民族資本之間的差異似乎僅在於一念之間，一個不反帝、一個反帝，好像資本家改邪歸正，他的社會性質就變了。而同帝國主義的差別又被化約成一個是「自然」的，另一個是「不民主」的，好像前者比較高明。後世研究者生搬硬套之下，確實出了不少問題。例如，段承璞主編的《台灣戰後經濟》中，把台灣的官僚資本同公營企業完全等同起來，而把今天我們看到在台灣政壇上呼風喚雨的財團稱為「集團企業」，認為他們只是國民黨不成材的附庸，和蔣家店之可惡天差地遠；而對「官僚資本」的批判，幾乎完全沿用自由派想當然爾的批評，說國營企業冗員過多、效率不彰等等，順著這個批評，今天的公營事業私有化豈不是革蔣家的命的大功德？而那些附庸，在蔣家已經煙消雲散的今天，反而成了貨真價實的國家主人。

我認為，要讓官僚資本這個概念有時代的意義，就必須分清楚當年對歷史局勢和戰略的分析，和由分析中抽象出來的、具有比較長遠意義的內容。在進行這樣的理論工作之前，讓我們先暫時沿用這個並不完整的概念來看看一些歷史的發展。

戰後台灣社會，尤其是1964年加工出口區設立之後，是一個新形式的半殖民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在二次大戰將歐日生產力破壞殆盡之後享受了十多年的興旺時期，然而，當生產過剩、利潤率下降的陰影再度浮現時，美、日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開始採取了生產基地外移以降低成本的措施。在這個大環境下，不同於以往出口原材料、進口工業產品的古典殖民地與新殖民地，台灣開始從事各種在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無利可圖的製造業：勞力密集的裝配業、高污染、高危險性的製程等等。在冷戰的情勢中，台灣的外銷工業得以享有穩定的市場和美國授意下國民黨政權的各種扶持，因而得以在工人階級在惡劣勞動條件下付出無數血汗、台灣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之後，終究是往各產業的上游發展，發展出一個除了研發和市場受中心國控制之外，還算完整的工業基礎。這個發展的模式現在成了國際壟斷資本推動「全球化」的重要藍本，但是歷史的因緣際會，是八十年代以來試圖學台灣的道路的第三世界國家難以重複的。

然而，在獨特性之外，台灣仍然與以往的半殖民地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有著許許多多的共通點。最重要的，是帝國主義者所扶持的政權承繼了殖民時代壟斷島內的關鍵市場。這些關鍵部門，在殖民地時代是由母國的壟斷資本控制，在形式上獨立之後，就往往轉移給新成立的國家官僚，雖然這些官僚資本常常還是維持著代理母國利益的角色。

49年後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與其之前在大陸靠著接收敵偽財產和併吞中小資本所建立起來的官僚資本體系在這點上是有著連續性的。不同的是，它從戰後紛亂期中巧取豪奪的四大家族的狹隘利益擴大了基礎，把包括土地改革後從大地主演變而來的本地舊土地資本（如辜家、陳中和家等）、一些足以控制地方選舉的新興中、大資本家（如高雄王家、三重幫等）、一些隨它逃難而來的大陸財團（如遠東紡織許家）、和承國民黨和美、日資本扶持起的新產業資本家（如大同、台塑等）也納入利益共享的集團之中。在戰後半世紀形成的這一代官僚資本集團因而在社會基礎上比較廣大。不變的是，這些官僚資本集團依然是靠著國家的權力、靠著美、日資本的扶持來壟斷國內市場。我們所熟知的石化業的例子就是一個典型：上游國營的中油違背市場規律平價供應乙烯等中間原料給中游的台塑、中美和等官僚資本，官僚資本再以壟斷價格賣聚乙烯等塑膠材料給下游基本上是競爭市場中的外銷廠商。除了石化原料之外，大宗糧食、肥料、飼料、汽車、電器……幾乎所有國內市場的關鍵部門都是官僚資本的天下。

眾人皆知，台灣的營造建築業及相關產業是官僚資本的大本營，這些同時也是利益網路牽連最廣、與國家權力最密不可分部門。在公共工程部分，鄉民代表包水溝、縣議員包學校、省議員、立委包各種從馬路到核能機組的工程，包到了再撥個幾層皮轉給二包、三包去做；在私人工程部分，民代、首長搞土地重劃炒地皮兼關說建照使用，土地炒作和營建一直是各地方派系凝聚的最堅固的水泥。這些都是現代台灣生活中的常態。而營建的上游產業——水泥、鋼鐵、玻璃、電線電纜……——除了其中的中鋼是剛剛私有化的國營企業之外，沒有一個不是以「政商關係」之暢通聞名於市場。水泥業的龍

頭老台奸專家更是百年一貫地靠著政府恩澤發財。而提供這些官僚資本家資金的銀行、投信公司、信合社、農會信用部更是官商一體的淵藪。

過去二十餘年，這個集團內部的情勢起了很大的變化。從鄉民代表到國民黨中常委這一大幫人在蔣家時代往往要巴著黨部官僚、倚仗著蔣家的各級掌櫃來過活。現在，所謂「民主化」之後「本土化」的國民黨，正是這些人。在台灣資產階級內部，這些人的命運、利益和世界觀與其他部門——尤其是外銷市場上的中小資本家——有著一定的矛盾。中小資本家面對著茫茫國際市場，官僚資本家最終有國家的稅金可以依靠；中小資本家往往忿忿不平地認為台灣的財富全靠著他們自己的辛苦鑽營，卻被占盡便宜的官僚資本壓著。過去民進黨主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綱領正是這些中小資本家的世界觀的體現。但是，在不願觸動台灣社會的剝削體制的真正源頭之下，過去的民主運動只是幫官僚資本家們鬆了綁，讓他們能夠更加自由地擴大他們的資本，將台灣社會經濟更牢固地束縛在他們的壟斷利益上。

全球化、生產過剩與房地產投機

1964年以來台灣的發展是在國際壟斷資本面對生產過剩、利潤率下降的危機中產生的。在冷戰的局勢中，台灣的外銷導向工業化獲得了十餘年的好光景。然而，在1980年代中，國際市場生產過剩的危機還是逐漸地籠罩在台灣島上。中國、東南亞、墨西哥……一個又一個經濟體順著台灣的老路湧進了台灣賴以發跡的國際市場。在工業投資的回收愈來愈不確定之下，台灣本地積累起來的資本也面臨了無處可去的困局。這十幾年來，我們看到了台灣資本走向三個方向：向中國和東南亞投資熟悉的勞力密集、低技術製造業；順著加工出口的脈絡在國家和國際壟斷資本扶持下向暴利的資本密集微電子業發展；以及各式各樣的投機活動。

在投機活動中，房地產常被認為是比較「保守」的場域。1980年代末以來，我們看到股市指數從1985年6月的700點飆漲到1990年2月的12495點，然後在四個月後跌到一半以下。許多小有儲蓄的人抱著無處可去的資金寧願相信一切據說攀得上官方關係的騙子，1990年的鴻源投資公司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國家長久以來威勢強大的台灣，追求暴利的投機往往不只是迷信渺茫的機會，而是積極攀附關係，希望進入官僚資本家之列。房地產一方面是勞動力在生產的絕對必需品，在地狹人稠的台灣都市中，在1964年至1980年代中的急遽工業化與都市化的變遷中一直是求過於供的熱門商品。另一方面，在官僚資本的派系長久以來在營建業優游的傳統之中，房屋建築——尤其是大樓、造鎮這些大型案子——成了連通大、中官僚資本與較小投機者的重要管道。高官富賈出點資本和人脈，營建財團搞案子，抱著幾百萬閒錢又不太敢全靠股市賭博的小投資者蜂擁而上買預售屋「置產保值」。炒著炒著台灣的都市房價就漲到了一般雇傭勞動者一輩

子都買不起的地步。

在1980年代末以來這波大投機狂潮中，房子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全台各城市冒了出來。對辛苦攢錢買個殼來度餘生的工人階級來說，房子是生活必需品。但是，對投資和投機者來說，房子只不過是他們權換錢、錢滾錢的一個中介，跟短線操作中的股票沒有本質的差異。房子的品質問題因而對建商來說是和撲克牌的印刷是否精美一樣沒有意義的事情。到底他們生意的來源主要不是靠消費者的口碑，而是靠名利場中是不是吃得開、混得好的名聲。花錢買個立委席位，要遠比花精神管管箍筋間距的問題要實惠得多。

但是，投機的「虛業」終究還是要靠著「實業」資本老老實實剝削勞動力、生產價值、再在市場變現所來的利潤。產業資本的利潤沒著落，投機的遊戲總有玩完的一天。1990年的股市崩盤已經是一次警訊，提示了資本家們湧向海外投資和半導體業。1997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更是嚴重地打擊了投機市場，股市、房市在危機中從雲端跌回了地面。就在房價一路跌到薪水階級也買得起那些關蚊子關了幾年的空餘屋的時候，林肯大郡事件發生了，兩年後，九二一大地震，讓我們看到了這些對一個個工人階級家庭來說天大地大的窩，原來不過是些紙糊來給高尚人玩金錢遊戲的賭具。階級的分殊和矛盾，在每日的生產勞動中或許隱晦不明，在天災觸發的人禍中，卻非常動態地展現了出來。

樓塌之後

再下來，我們會看到從南到北上百棟倒塌大樓的建商使盡渾身解數擺脫亡者的陰影、擺脫災戶的憤怒、擺脫兇手的罪名。在風頭之上，他們也許會一時低頭潛沈，等到媒體對災戶悲情厭倦了、法院的關節打通了、幾個人頭頂罪去了，這批人必然會趾高氣昂地又站出來攬生意、搶工程。到底地震所造成的破壞，是千載難逢的、只有戰爭差堪比擬的大商機。資本主義靠吸血為生，這是通則。我們會看到從水泥財團到鄉代會主席的營造廠在未來幾年吃香喝辣，而受災戶仍然為著交下一期的貸款利息在發愁。我們會看到千萬人認清了台灣所謂的民主化，是多麼空洞，我們甚至會看到一些人開始認真地思考到底資本主義有什麼問題。這些被震亮了眼睛的群眾挑戰體制的程度，當然很大部分要靠著運動者的努力。但是，在地震之前，在「快樂、希望、新台灣」裡頭，這種對體制的深刻質疑是很罕見的。對個別資本家，地震是商機，對整體台灣資產階級國家的權威而言，地震很可能是大危機。

而大樓的問題不過是九二一所震出來的問題之一……

★

安置未果！何來重建？

唐曙

一、前言

921 地震發生至今已超過一個月了，中央政府爲了擺脫輿論界「救災行政效率低落」的指責，除了制止媒體作負面報導之外，並大量地從中央拋出許多有利於受災戶的「利多」消息。這些看似「利多」其實「空頭」的大餅，除了使地震受災區的災民憤憤不平外，並沒有什麼實質效果。

10月25日，行政院長蕭萬長提出災後重建計劃，並要媒體宣傳、強調國軍在震災期間不眠不休地努力。國軍在救難時期的表現可圈可點，地震災區的人民也的確銘感五內，但當國軍在10月底撤出災區之後，災民是否能在感恩之餘就能自立自強地爬起來重建？還是在震災後滿目瘡痍的瓦礫上無所適從呢？答案的關鍵在於安置作業的進度與品質。如果連災民的安置作業都還未完成，哪來的重建工作計劃呢？如果有的話，也只不過是中央政府自我陶醉的畫餅。

二、災民安置作業的前提：全倒半倒認定

震災發生後，政府提出了許多慰助、津貼以及貸款優惠措施，但這些措施都要有一個共的前提，就是對損毀房屋鑑定的確認。但是由於鑑定作業的糾紛與分歧擴大，使得有權認定損毀的人從村里長變成內政部營建署所委託的台北市建築師公會各建築師，在這段期房屋鑑定期間，每個房子受損的震災戶至少一次(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他的房子是否被鑑定過)，至多四次以上被上述兩個單位鑑定過(還有人自費在進行鑑定)，但由於建築師公會的鑑定標準模糊、程序草率，以致弊病叢出。

1. 對受損房屋進行「先拆除後認定」的措施：

房屋受損鑑定結果所引發廣泛的爭議已如上述。在面對中央政府的期限壓力下，埔里鎮自10月中旬開始即出現了先拆除後認定的奇怪現象。許多未知鑑定結果的透天房屋被莫名其妙的拆除，在完成拆除後才被要求填寫一系列的表格，其中竟然還包括空白的房屋毀損鑑定表！這些已被拆除的房屋隨後即被「鑑定」為全倒。

2. 集合式住宅不適用全倒半倒標準

在集合式住宅(即公寓大樓)方面的鑑定更是荒謬誇張。由於集合式住宅全棟多戶的特殊性，使得房屋鑑定過程更為曲折離奇。在埔里鎮，除了南投縣議長鄭文銅的建設公司所興建的中華國宅(陽明及鮮綠兩棟)在震災之初即被鑑定為「全倒」(由於一樓樑柱偷工減料造成建築物向下擠壓，二樓變一樓)之外，其他的集合式住宅由於沒有發生中華國宅的明顯狀況，在災後鑑定之初，結果一直都不明朗。隨著中央政府期限的逼近，這些集合式住宅的鑑定結果開始出現了奇異的現象。這些集合式住宅逐漸開始被鑑定成「半倒」或「三分之一半倒」(原文如此！埔里鎮家天下社區即屬此類)。但由於「全倒」和「半倒」的標準很難用來鑑定集合式住宅(因為這些住宅都是全棟多戶式的結構，且震災後這類住宅往往出現五樓以下結構嚴重毀損，而五樓以上損壞較輕的情況)，所以引發了極大的爭議。由於爭議相持不下，加上部分集合式房屋住戶的陳情以及10月31日鑑定最後期限的壓力，相關單位自10月20日起又開始對集合式住宅進行再一次鑑定。

3. 以災戶拆除與否的意願認定「全倒」或「半倒」

這次鑑定的結果，仍然非常不明確，但有些集合式住宅竟然也出現了「先拆除後認定」的情形(如龍門天下)。住戶們被迫要求選擇簽下「拆除同意書」(簽此份同意書者視同「全倒」)或「自行拆除同意書」(簽此份同意書者視同「半倒」)，而住戶往往在生活壓力及相關優惠措施的資格限制下，不得不做出選擇，以便盡快在期限之內趕辦津貼請領、組合屋申請及「優惠」貸款事宜。但各集合式住宅最後到底是全倒還是半倒，仍然是莫衷一是。

房屋毀損鑑定的過程與結果是如此粗糙和荒謬，留下的爭議仍然非常的多，政府如何能如此草率地進入重建階段呢？

三、集合式住宅建商偷工減料的問題

埔里鎮絕大部分的集合式住宅都有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建商的偷工減料問題。集合式住宅的災戶對此都憤憤不平。例如南投縣議長鄭文銅所屬建設公司興建的五座集合式住宅(家天下、文心雕龍、中華國宅、彩虹大地以及元寶大鎮)都有嚴重偷工減料的情況。其中中華國宅(陽明、鮮綠兩棟)還是內政部為獎勵民間投資，撥款由民間建設公司興建的，竟然還會發生偷工減料的情況，令人覺得不可思議。

集合式大樓受災戶想要收集違法事實，向建商提出告訴，但一方面由於政府想要盡快認定，另一方面建商又自行找相關技師鑑定，企圖提出有利於自己的鑑定結果，以補強的手段來湮滅或掩飾其偷工減料的事實。此外，由於專業技師的鑑定費用非常龐大，這使得集合式大樓受災戶要向建商提出告訴產生困難。

四、貸款條件及土地持有問題

集合式住宅的受災戶，即使「完成」了房屋損毀的鑑定，在貸款方面也會出現極為麻煩的情形。由於銀行在貸款優惠措施方面，只承受毀損房屋的貸款問題，並不及於土地，這使得集合式住宅的災戶，根本無法處理其名下面積極小的持分土地，也增加了貸款方面的困難。

五、其他

在埔里鎮進行救災指揮的國軍，從10月25日起即先後撤出，這些撤出工作還包括將收回暫時借予災民使用的帳棚，而氣候已經入秋，鎮公所的行政效率又空前的緩慢，這使得災民秋冬的安置何去何從產生了極大的問題。埔里鎮現有災戶8351戶，但目前完成的組合屋又不及十分之一，民間興建的組合屋還要歸效率低落的鎮公所來發放與申請，否則仍將面對由於鎮公所不配合而產生的缺乏水電問題。

六、結論

我們認為，當前對集合式住宅災戶最迫切的問題應該是住宅認定與安置的問題。住宅認定的糾紛已如上述，如果沒有明確的認定結果也將影響他們隨後的安置作業，這項工作絕對不能以政府要求盡速重建為藉口，而草率解決，否則將引起更大的民怨。

埔里鎮公所遲緩的行政效率已影響災民安置甚鉅，中央政府應以緊急命令處分失職人員，並加速安置。如果安置作業未完成，所謂的重建工作計劃也不過是粉飾太平的作秀舉動而已。我們也希望全盟能繼續發揮對政府相關措施與政策的監督作用。

七、對於處理已損毀集合式住宅的建議

1. 應明確權責歸屬，不應將房屋鑑定的工作交由受災戶以拆除同意權的行使，確認全倒半倒。因為全倒半倒的標準並不適用於集合式住宅，建議政府應專案處理集合式住宅的鑑定，並以一定價格收購受損的集合式住宅，然後在市區重建計劃中做適當規劃，以達到重建工作的實質目標。若不徵購，則請政府要求由銀行概括承受所有貸款。

2. 關於建商的偷工減料情況，希望政府出面代位求償，蒐集相關不法事實對建商採取應有的法律途徑，以免這些不肖建商藉重建計劃之便，借屍還魂，重施其偷工減料的故技。

★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南方電子報》)

震災與民怨

——關於埔里災後民情的實況報導

汪立峽

921大地震迄今已二個月，在媒體上看到的報導，多半報喜不報憂，似乎災後的各項善後工作已經功德圓滿，李登輝甚至請來日本的大右派軍國主義者石原慎太郎公開誇讚台灣當局的救災工作完美成功。但實際情況怎樣呢？前不久，「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領導人李遠哲到中部災區舉辦了幾場災民座談會，聽取災民意見，結果到會的災民出奇的少，災民代表當場向李遠哲指出：「出席率低，並非災民對政府的救災工作已經滿意，而是對政府的救災措施和重建計畫已經心灰意冷」。這才是實情。

以埔里鎮而言，全鎮災戶達8351戶，而能分配到的臨時住宅（組合屋），總數只有八百間，目前完工安置災民的只有三百餘間，就是說有九成的災戶面臨無處安置，仍得繼續住帳篷或寄居親友處的困境。埔里鎮上的校園和公園，迄今無處不見帳篷；每一條街道都灰塵滿天，因為天天都在拆除危屋危樓。

近五年來，埔里鎮興建了許多集合式住宅（公寓大樓），動輒十餘層高，每棟大樓少則八、九十戶，多則百來戶。在這次大地震中，至少有十五棟大樓實際上已經「不堪居住」，人去樓空，形同廢墟。這些大樓，經幾次勘察結果，官方在「全倒」、「半倒」之間拿不定主意，於是乎，出現了將第一層第二層判為「全倒」，三層、四層以上判為「半倒」的荒謬結論，完全無視「集合住宅」的性質，底層「全倒」必須拆毀，何來較高樓層的「半倒」？因此，這些公寓大樓的災民莫不對政府的危樓判定標準怨懟不已。

這些大樓不同於透天厝和傳統低矮樓房，如何拆除？何時拆除？災民如何安置？當局到目前還拿不出辦法。拆後重建問題，難度更高，政府雖說災戶重建貸款「概括承受」，實際上八大銀行中沒有一家肯輕易貸款給受災戶，據李遠哲指出，全省八萬多災戶，目前只有一、二戶順利申領到貸款。

在埔里，公寓大樓的災戶，多半是拿薪水的勞動者（受雇於私人或公家），貸款買來的房子，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財產，而今，房子毀了，舊債未了又添新債（因為銀行縱使願意免息借貸，本金還是得償還）。

凡此，皆使埔里災民愁上加愁，怨上加怨。少數無須拆除，只需修補的大樓，情況也好不到那裡去，因為修補費至少五、六千萬到一億元，錢從那裡來？多數受災戶是不可能負擔得起的，政府並沒有允諾支付修補費，建商也以「天災」為由拒絕賠償，何況，據那些參與勘察工作的專業技師們說，房子即使修好，他們也絕不敢住，而且，災後修補的房子要賣要租恐怕都沒人敢要。

由於上述種種問題得不到合理解決，最近埔里的災民已從災變初期以校園、公園為單

位的「自救會」或以公寓大樓為單位的「管理委員會」，逐漸發展為「自救聯盟」和「管委會聯盟」之類的橫向聯合組織，準備以群眾團結的力量，採取各種手段，維護和爭取自己應得的權益。有媒體已經預測在明年春節前後，各地災民積累的不滿情緒將會總爆發，而且勢將波及三月間的總統大選，因為春節前後，無處安身的災民，會由於天氣寒冷加上節令難關，而難抑長期蘊藏的怨氣。這個預測和判斷並不離譜，實際上，在我看來，未來二、三年間，隨著災後重建問題的難以圓滿解決，災區民眾的抗爭行動會一波接一波發生，從而形成一種新型的社區直接民主運動。 ★

附言：李遠哲先生最近呼籲，各大專院校的師生到災區去「調查教學」，因為在那裡可以見到、聽到和學到什麼叫「真實」，什麼叫「生活」，因為在那裡處處是「活教材」。誠哉斯言！

原住民災民

阿 偉

十月七日晚間是在埔里鎮外、也是災民的朋友家中度過的。大家由八點聊天到早上四點。或不應說是在聊天，全是朋友在講話，沒停沒了！我揣摩這應是地震後的一種症狀？

晚間八、九時，室外強風陣陣；大家也擔心氣象預報的颱風，真希望不要來；災民已經夠慘了，大小帳篷怎再經得起強風吹、大雨淋。比較奇怪的是一陣陣的風是溫熱的。十月的埔里，日夜應有一定溫差，怎麼會晚上比白天熱？旁邊一位大陸嫁到村子的姑娘則由這種風，認為一定還會有大地震。

早上十點多，四個人開車出門不久，雨就開始下，雨勢並不大，但絕非毛毛雨。在車中望著近處、遠方每七、八或十個一組的帳篷群，心中有種無可言喻的苦楚，心比灰濛濛的天還灰。哎呀，怎麼這樣……在中部災區已跑了二天了，所看到、遇到的人也多半是灰灰的，笑聲幾乎沒聽到過。我們在一間觀音廟前留了半小時，廟前旁邊金爐的身、頂已相互錯開，不遠處一張長桌，里長、幹事在教一些居民填表。只是三、五張不同表格填來填去，連里長也不知有什麼用？

雨仍在下著，我望著廟前水圳中快速的流水發著呆。有人與朋友說附近有一群山上下來的原住民災民。

路繞了二分鐘就到了。一座似「L」形軍營式、全用塑膠布覆住的臨時自救避難處。布上掛了個「仁愛鄉法治村自救會」的牌子。我們在車中有點好奇，但又怕打擾災民。朋友說不妨先二人過去看看，免得人多造成騷擾。十幾分鐘後，朋友叫我們下車進去。

一位中年男性正在訴說著他的擔心。山上全村下來了二百多人，還有五百多老弱在山上，通訊斷，路也斷。他們只得每幾天一些人背些米、糧走五個小時上山。他們擔心山上的土石流，也擔心溪水受阻會使水位上升，淹沒村子。在這山下帳篷避難所中，我看到的多是阿婆、小孩；有三位年輕婦女在一旁備菜。我問：食物從那兒來？慈濟、一貫道的人每二天會來送些東西。他們戶籍不在埔里，也領不到什麼賑災物品。

避難所青壯年男子很少，小孩在跑來跑去。這是「靈巖禪寺」的停車場，借給他們使用。半山上的「靈巖禪寺」本身在地震中也變「危樓」，師父們都已遷往他處；但他們還是很感謝「禪寺」提供棲身之地。將來要怎麼辦？男子也不曉得，說有些團體捐埔里二百個臨時屋，他們去申請，排第三順位。但他自己知道要輪到機會很小，但又不敢與族人講明；真的沒辦法，只好再回山上。安全嗎？但還能去哪裡？！

二百多人，至少還有環保局二間臨時廁所、一個大水塔、二間浴室。廁所二、三小時內就裝滿了，但環保局一時也來不及。洗澡沒熱水，但在天氣轉涼下，總比沒水好？！下山來一個多星期，前兩天有電了。這還是跟附近人家接的。附近人家說我不認識你們，也不知你們何時離開。他們只得花了二、三天時間，東湊西湊湊出一萬元，算作用電押金，才接得上電。

談話過程中，大家心都沉重，無法展眉。但男子也沒抱怨任何人、事。他自己在台中有家、有工作，一切也還安好，只是看到族人這樣，不忍離開。

他把我們介紹給其他族人時，說我們是「善心人士」，還請我們抽煙、吃檳榔。只是我們什麼也沒做，也不知如何幫起，只能先記住他們，記得這回事，回去後再看怎麼辦？心中沉重的又沉重……

下午離開埔里，往集集方向開去，在車中談到「法治村自救會」的原住民災民。車中小A說，在現場有位老阿婆抓著她的手，問她有沒有棉被？晚上好冷。我聽了只希望車能掉頭回去，幫阿婆買張被子，只是這時我們已離埔里遠了。在鄉間的道路上，遠處近處的山宛如什麼動物的爪子抓過，連綿青青山脈上，一條條土黃色條紋……

小A由下午起就變得有些「非常態」；而我事後也清楚，在晚上走過中寮後，我有十天時間也變得「不正常」了。其中一些症狀，如：抽煙時時會把衣、褲燒個洞，講話變得急促等。至於時常覺得頭昏(或真是在地震)，這已是自九二一以來的「常態」了(而且似乎不僅我一人如此)……

★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南方電子報》)

阪神大地震的經驗

江仁傑

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後，由於日本政府搶救動作時緩，引起國內媒體與一般國民的指責譏諷。日本政府在災後三年時間裡，花了超過四萬億日元的錢，投入到馬路和碼頭等重建，可是受災的人最需要的能夠恢復原來生活基礎和保障工作的失業政策等各種措施，一直沒有施行，而且當時現行法律中並沒有補償受災者的法律（雖然日本是個天災頻繁的國家）。受災者在災後早已自行組織起來，以神戶地區受災人為中心，聯合了同情他們的市民運動團體組成「公款支援網絡」，推動一些國會議員制定有關公款的法律，以便向政府提出補償的要求。他們向政府努力爭取了將近四年的時間，國會終於在1998年通過了針對受災者的公款支援法律，阪神震災的受災者也可適用。這是受災者市民運動的成果。然而法律限制嚴苛，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受災者可以申請到最多100萬日圓的補償金。

但是，到了1998年底，受到心理創傷卻無人聞問因而默默死去的人數在臨時屋中已經高達227人，在政府建築的所謂重建公營住宅孤獨死和自殺的有31人。1998年底在神戶還有5304個家庭住在臨時住宅。失業率達5.8%，比起全國水平高於1.5%。許多勞動者在震災後失業、被資方大量解雇，全勞協在災後成立了「被災勞動者工會」，協助失業的勞動者爭取復職、失業保險等工作，到目前仍然持續著。

目前，日本受災者的市民運動繼續要求制訂更完整的法律：《支援恢復生活基礎法》。該法案要求，除了地震之外，還有大雨、海嘯等所有自然災害受害者都是對象；對於房子全壞、半壞和部分壞的受害者支付最高五百萬日元的生活基礎恢復支援金；向受害的企業支付最高五百萬日元的重建或修建住宅是向受害者貸款住宅重建資金（最高二千萬日元）或住宅修建資金（最高五百萬日元）；向受災的企業貸款最高一億五千萬日元的中小企業事業重建資金；設置《災害支援廳》，徹底公開各種有關信息；對於阪神地震受害者採取同樣的措施。市民運動批評說，國家為了救濟玩金融賭博的銀行，決定投入六十萬億日元，而大藏省竟然仍堅持「不針對個人進行補償」。

日本的受災者市民運動直到1999年，仍然向救災時動作緩慢、重建時態度高傲的日本政府持續不斷地爭取權益，勞工運動也持續地組織震災後大量出現的失業工人。看到這一個面向的「阪神經驗」，不禁讓人覺得：寧願學習阪神的人民經驗，千萬別學日本政府的經驗！

★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災盟通訊》）

九二一受災聯盟

「家園重建綱領」之「住屋篇」

資料來源 九二一受災聯盟 導言 陳信行

結成 921 受災戶聯盟的各地大樓受災戶，在 1009 動員夜宿總統府遭到強力打壓之後，回到了各自的社區開始進入鞏固組織、長期鬥爭的階段。為了凝聚力量，災盟透過各自教會聯合會密集的討論漸漸超越各個社區甚至個人分殊不一的狀況、求同存異，形成了集體的綱領，這個「住屋篇」就是第一個部分。11 月 9 日災盟幹部至行政院災後重建委員會與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談判，就是拿著這份綱領作基礎。

在綱領中，「代位求償」的主張雖然援引的是犯罪受害人保護法，經驗卻是從前幾年關廠抗爭的工人運動中而來。和關廠的案例一樣，服務於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府，遇到階級矛盾，就極力要把衝突推到私領域，自己好「事主變公親」出來明著調解、暗著幫資本家。要求代位求償正是不准政府做出這種動作。目前行政院表示「可以考慮」。如果這個看來完全合法、合理的要求無法被執行，政府就再一次暴露出它的階級屬性。

「建立社會互助體系」和「籌款堅守累進稅原則」兩條主張則是要突破親財團的媒體試圖把災民的抗爭孤立、醜化、分化災民與非災民的感情所製造的所謂「貪得無厭的討債者」的刻板印象，並尋求把災民的運動上升到這個國家、社會該往何處去的層次。民主社會的公民，就該對這些問題有主張。

一． 政府協助災民代位求償：

向加害者求償是人民應享的權利。因災害而毀損之土地與建物，凡涉及過失、不法犯行或法令疏漏，應由政府代位求償、國家賠償或制訂特別條例予以補償，以符合社會正義的原則。

【說明】

1. 從林肯大郡到九二一震災，諸多集合式建築嚴重毀損，鄰近的建物卻完好無恙。其毀損原因涉及營建業者設計與施工不當，也涉及政府的督導不周，總之，都肇因於人爲的過失或不法犯行。人爲因素擴大了自然災害的災情，也增添了眾多冤魂，此即人禍。天災因人禍而擴大，人禍比天災還可怕。

2. 建物之毀損原因若涉及人爲過失或不法犯行，應由政府代替受災戶向犯罪行爲人求償，此即「代位求償」。此一法律精神同樣見於「犯罪被害人保護法」。這是公權力對無辜被害人的權益逕行維護的舉措，由國家先行補償被害人的損失，至於因受害而得以向加害者求償之債權，亦轉移到政府身上，由政府代爲求償，免除了被害人在訴訟過程中可能遭受的二度傷害。此一法律精神寓含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它讓債權與債務的關係，由私人契約提升到社會契約的高度，藉由公權力來維護弱勢者的權益。我們希望，此一法律精神，其施行範圍，能由「犯罪被害人保護法」所規範的「侵害生命與身體」，擴及到「侵害財產」，切實保障被害人的權益。
3. 一棟建物，從申請到完成，皆須經過政府層層監督核印，建物之設計與施工不良，政府難辭其咎。建物之毀損原因若涉及政府或公務員之疏失或不法行爲，被害人之身心與財產損害應以國家賠償之。
4. 建物之毀損原因若涉及法令之疏漏，應由立法機關制訂特別條例補償被害人。正如同「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是針對過去錯誤的法令與政策執行下的被害人進行補償。同理，因既有或舊有之法規疏漏（例如耐震度的標準太低）及政策執行而造成之災害，亦應另外制訂特別條例，以補償被害人。
5. 所謂的社會互助不能是濫情，也不能是非不分，讓加害者得懲治，讓受害者得撫慰此即社會正義的原則。

二．風險共同分擔：

住者有其屋是人民應享之權利。因災害而造成的建物毀損，本於風險共同分擔的精神，宜由政府承擔。仍堪居住之建物，由政府提供修繕補助；不堪居住之建物，經重新勘驗地質，以原地重建或易地重建方式，協助災民重建家園，以符合社會互助的原則。

【說明】

1. 居住權是現代國家中不可偏廢之人民基本權利，住屋也是人民不可或缺的生活資料。長年以來，台灣的住屋政策讓人民成爲「屋奴」，一個家，一間房子，普遍代表著人們畢生的血汗結晶，家破屋毀，也象徵著畢生心血盡付流水。在國家的住屋政策仍未根本改善之前，我們呼籲，以互助來自救，匯集全社會之力，扶持受災戶渡過難關。
2. 社會互助的基本精神之一，在於風險共同分擔。鑑於災害之不可抗力與不可預期，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隨時隨地皆可能成爲下一個受災者，故而，因災害而蒙受之損失，不宜由受災者個別來承擔。
3. 社會各界熱誠的捐贈物資與金錢，固然也是社會互助的一種表現，卻遠遠不足以撫慰受災者失去家園的恐懼與哀痛，也不足以彌補災民一夕之間失去的畢生心血。災民寧

可忍一時之飢渴，卻無法承擔終身餐風露宿之苦。風險共同分擔，才是社會互助的根本性方案。

4. 政府與銀行所謂「概括承受」之議，並非良方。首先，「概括承受」將讓災民一無所有；其次，「概括承受」只適用於貸款未還者，對於那些已經繳清房貸的災民而言，非常不公。我們主張，因災害而造成之建物毀損，無分天災或人禍，不問貸款之有無，皆應由政府承擔。唯有政府承擔，才能真正落實「風險共同分擔」的精神。
5. 基於同理心，也基於未雨綢繆，今日你幫我，明日我幫你；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此即社會互助的真諦。我們衷心期盼，社會各界切勿將我們的主張曲解為自利心態、需索無度或貪得無厭。從九二一到一〇二二震災，我們更期盼，台灣社會能夠有個全盤的警覺與省思：災害的確會轉移，每一位島上的同胞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建立一個社會互助的體系，此其時也。

三．重建無利潤，提高稅制累進級距：

「重建無利潤」是降低重建經費的唯一方法。政府承擔重建工程之財源籌措，應以成本價位來衡估。無論是以公債、稅金或其他方式籌措，應一本賦稅公平的累進原則，提高稅制累進級距，避免造成受薪大眾補貼財團的惡果，以符合社會公平的原則。

【說明】

1. 爲了避免讓任何個人、企業或財團大發災難財，增加全民負擔，災後之重建應切實估算出各種重建工程的成本價格，並據以作為重建之財源籌措的標準，此即「重建無利潤」。
2. 重建經費應以累進稅制取得。對於在重建過程中攫取暴利的財團，更應課以重稅，以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避免形成加害者變受益人的不公現象。
3. 重建經費不宜由「全民」齊頭式分擔，而應是富者多稅，貧者減稅，此即社會公平的原則。

四．受災者無差別待遇，一律平等適用：

因災害而毀損之所有土地、建物及其使用者或所有權人，人無分族群，地無分城鄉，建物無分透天厝或集合式大樓、新建築或老舊房舍、自力建屋或市場買賣之商品屋，皆一體適用於本綱領，以符合社會平等的原則。

【說明】

本綱領涵括所有受災建物之類型與座落空間，也涵括不同的受災族群，特別是包括處於弱勢的原住民在內，沒有差別待遇，只要是受災者都一體適用。此即社會平等的原則。

編輯報告

這是一份為台灣左翼朋友發聲的通訊，目前我們還只將它定位在同仁內部性質的通訊。等我們準備就緒後，希望有一天它能對外公開發行。我們決定以這樣旗幟鮮明的方式出版這份刊物，是因為我們希望以此為磁石，方便結聚台灣自視為左翼的個人與團體，建立一支台灣左翼的隊伍。我們會選擇在這個時機進行整合與集結，是因為我們認為台灣歷經十年社會運動的低潮，民眾不滿的能量已經蓄積到即將爆發的地步，而現有的統治集團墮落與剝削的程度則是日益變本加厲，更因分贓不均而處於內鬩狀態，因此我們要趁此機會，舉起左翼的大旗，號召同志們一起加入我們的行列。

在這一期中，黎建江的〈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是對當前台灣政經形勢及正在發生的變化所做的宏觀考察，並對左翼運動面臨的問題與未來展望做了深入的分析。但是當新形勢真正來臨時，左派做好了準備嗎？左翼的隊伍如何才能建立成形？劉鳴生的〈重組左翼〉是對所有台灣左翼朋友發出的最誠摯呼籲，希望大家能捐棄成見，迅速集結整合，他並提出了重組的具體方案與措施，尤其是創立一份左翼刊物的重要性，提供左翼的朋友對話的空間與交流的機會，以化解彼此的歧見，建立共同奮鬥的目標與共識。

台灣的工運目前正處於嚴寒的低潮，因此當許多人聽到由工委會舉辦多年的「秋鬥」因震災因素將延至明年三月舉行的消息後，心中都不禁暗禱這項具有工運指標意義的活動不會因此畫上結束的句點。趙金鳳在〈日本春鬥與台灣秋鬥〉一文中，透過對日本春鬥及台灣秋鬥的比較，指出這種經濟鬥爭可能面臨的限制，她最後提出勞工運動政治抗爭的未來方向，是所有關心台灣工運的朋友都應深思的問題。另一方面，工委會則對秋鬥延後舉行一事做了說明。

過去幾年裏，社區運動吸引著許多進步青年投入這個領域，但熱門的社區營造基本上是建立在國家支持的基礎上，常常必須依賴國家（中央／地方政府）的財政援助，因此本應具有批判色彩的社區運動卻與國家維持一種曖昧的關係，王墨林的〈社區營造的劇場國家化〉正是對這一現象提出嚴肅的批評與檢討。我們相信，王墨林絕非否定台灣都市社區運動的意義，而是提出一些疑慮與思考供運動者反思與改進；我們希望，今後能夠針對社區運動的相關議題繼續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評論。

九二一震災以來，許多左翼的朋友與進步的青年都進入災區參加救災與重建的工作，因此我們特別轉載了幾篇來自災區的報導：九二一受災聯盟的〈家園重建綱領之住屋篇〉是跳脫資本主義的邏輯，提出社會互助精神的重建原則；唐曙的〈安置未果！何來重建？〉則是勞權會埔里工作小組對埔里災區所做的現場調查報告；阿偉的〈原住民災民〉是震災後個人在災區與原住民接觸的感想；江仁傑的〈阪神大地震的經驗〉則是以阪神地震為例，指出資本主義國家在震災重建過程的無能與不可信賴。此外，陳信行的〈震災的政治經濟學〉則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剖析震災背後所隱含的台灣政經結構的不平等與腐敗特質；汪立峽的〈震災與民怨〉，則指出了震災所累積的民怨發展成社會運動的可能性。

這是左翼的第一期，隊伍尚在集結，因此內容還有待補充與改進之處，我們期盼您的批評與加入。

左翼 第一號 L ♀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twleft@sina.com.tw

捐款郵政劃撥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出版日期：1999年11月22日

初版四刷：2000年11月30日

THE LEFT

左翼

第二號

三刷

【烽起西雅圖】	接聽西雅圖前哨戰的鉦鼓	蔡健仁 /1	
在西雅圖舉行的一次反 WTO 的人民會議		金寶瑜 /3	
WTO 與電影	徐拒耘 /6	中美世貿協議述評	狄蔭清 /8
左翼的起源	俞向南 /14	第三條路的挫敗	施威全 /17
沒有左派，哪來新中間路線？			黃瑞明 /18
【國際連結】	韓國左翼運動的政治展望	臧汝興 /20	
【左翼書評】	評《偶然生為亞裔人》	馮建三 /22	
〈亞太勞動快訊〉	為何要創刊，又為何休刊？	亞太勞動快訊社 /23	
對於黎建江〈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	的幾點意見	《連結》雜誌社 /25	
警察先生！你站哪一邊？		劉欣恆・鍾瀚慧 /28	
原住民家庭何去何從	胡德夫 /30	人禍！遠大於天災	災盟 /31

接聽西雅圖前哨戰的鉦鼓

蔡建仁

世界貿易組織(WTO)第三屆部長會議在外轟內鬩下而狼狽散場，西雅圖有著危城的景象頗使台灣人開了眼界，初知十一年來寤寐思之的「經濟聯合國」竟有這麼多的異聲。事實上，去(1998)年5月在日內瓦召開GAAT/WTO成立五十周年紀念暨第二屆部長會議時，也遭到數以萬計的群眾團團圍住，只因台灣的記者眩於滿堂冠

蓋雲集，不知外面怒潮洶洶，更不知這種對峙之勢溯自 1992 年里約環境高峰會即已形成，每逢各國高官集會，就有各國人民趕來會外會，相應提出另類主張，成為抗衡主流的全球化現象。年復一年，至西雅圖一役愈發壯盛、火爆，然對此間而言，卻似新生事物一般。

分析西雅圖會議的反對基調，可分為四種：一是保守主義份子。為維護自己的生活水準，惟恐開發中國家低價競爭而危及他們的飯碗或生活環境，所以疾呼要制訂勞動標準與環保標準，這一次由美國勞盟(AFC-CIO)所發動的人牆戰術最見突出；二是進步主義份子。他們同樣主張藍色、綠色條款納入國際貿易體制，惟動機不同，乃憫於生民與土地遭到摧殘，甚而要求豁免赤貧國的巨額債務；三是民族資本主義者，普遍見於場內的第三世界經貿官員。他們不反對市場，也願意將國內市場與國際接軌，帶給經濟更大的動力，但經驗無情，開放政策證明常常帶來滅頂式的後果，特別是烏拉圭回合的協議迄今仍頗多窒礙難行，對新一回合的啟動自是忐忑不安，復以眼見美歐強權不改密室決定的霸道作風，遂在現場就地反帝，適與場外唱和；四是社會主義者。直指市場是禍源，不能到場會師的，同時在巴黎、倫敦擎起反對資本主義的旗幟，甚且舉事呼應。當然，除開上述四種意識形態人士之外，還有各色人等，如法輪功、西藏人權、台灣獨立等等，不過是來趕人場，爭取曝光度，無關對 WTO 的臧否用捨。

可知，西雅圖會議內外的反制力量固然不容輕侮，但是力源不一，甚至彼此世界觀南轅北轍。例如代表保護主義的美國勞工即屬極右，這是我們要清醒看到的；再者，懷抱公平與正義的藍、綠色份子很可能造成事與願違的局面，此因偏舉勞動與環保標準，而不進行全球性的總體治理，徒然抑制開發中國家的成長，豈謂公義？至於在資本全球化的時代，還圖望優先扶持民族產業顯然是不可能的，拉丁美洲在六十年代走過的內向型路線乃殷鑑不遠。

然而，我們也不應該重複左派的舊調，只是簡單地否定市場，特別是 WTO 亟欲建構的世界市場。一國的資本主義既不可能，一國的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兩者都是歷史驗證過的事實，唯有把市場攤開到世界範圍，資本無所逃遁，才是資本主義存續榮枯的試金石；同樣地，社會主義必須著眼全世界，才不失為社會化的真諦，馬克思原計畫寫的六冊著作，最後一冊就是世界市場，不啻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轉關，當前有志之士宜深加體會斯旨。

尤有甚者，WTO 進行整平場地(levelling the field)的種種措施，在我們看來，頗多係消除人為扭曲，讓價值規律彰顯出來，不僅涉及關稅障礙與非關稅障礙的減讓，並且也提出所謂的新貿易議題，諸如競爭政策、政府採購、政府補貼、知識財產權以及勞動標準、環保標準等等，乃至於反貪腐規範，這一切固然充斥著強者的設定，但也有其合理的部分，需要我們細細去辨識，實不能一言而決。否則，就要掉入第三世界主義的泥沼，只有濫情，而喪失前瞻新社會的宏猷遠謀。

即以藍、綠條款為例，歐美強權大加鼓吹，顯然是一種新保護主義，卻是我們不能拒斥的，怎麼辦？就要以世界的量尺來核算，倘要開發中國家維持環保，則其產生的利益，如水土涵養、氧氣再生等等，都有權得到報償；勞動標準的核心之一係工時，要求全世界同步縮短，而不是片面要求窮國，以免表相剝奪他們的工作機會，更要緊的是，與其施惠實質工權，不如賦予程序工權，保障工人組織工會，這是目前藍色條款論者所忌諱的，因為這會觸及結構性改變，正是我們要踏前一步去主張的。而根本解是，延伸目前服務業貿易自由化的邏輯，既然服務業的人員(personnel)因而自由流動，怎麼把廣大的勞動者(labour)或工作者(worker)摒棄在外，當商品、資本與訊息的流通日益自由時，竟把人類分為兩類，只讓資本增殖的代理人得到自由，卻把大多數人禁錮在地，然後聲稱給植物人制訂勞動標準，豈不是假惺惺透頂嗎？問題是，左翼，特別是各國的左翼果真願意推動勞工流動的全球化嗎？

要之，WTO新一回合的談判雖有西雅圖之挫，終將開始，到底哪些議題是我們可以著力的，從而孰為敵孰為友，在在都等待我們的分判，總不能跟人瞎起鬨，更不能對問題全盤否定。做好WTO的功課，已成為我們開展全球連線，再啓左派運動的踏腳石。

★

在西雅圖舉行的一次 反 WTO 的人民會議

金寶瑜

在另一篇報導中我談到這次在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一些團體和他們的活動（見苦勞網）。這次能在美國本土上有五、六萬人參加反世貿組織活動和遊行當然是件好事。因為規模相當的大，主流媒體不得不報導，引起大多數從來不知WTO是何物的美國人的注意。另外可喜的是這次有很多年輕人參與，而且學生、工會工人和環保運動者能聯合起來辦這次活動。但是，除了這些正面意義外，這次反WTO的行動最大的弱點是這數百個反對團體沒有一個基本的共識，他們之間對WTO的認識和看法距離很大。因此，今後想要凝聚一股力量來反對由壟斷資本在背後操縱的WTO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裡我要報導一個同時在西雅圖舉行的，但性質相當不同的「人民會議」（People's Assembly）。「人民會議」由菲律賓的一個叫BAYAN（新愛國聯盟）組織主

辦的。我參加了他們11月28日和29日兩天的會議，和30日的遊行。BAYAN在幾年前就開始聯繫國際上的反帝力量。他們不談反「全球化」，而是要團結一股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力量。九十年代中，亞太經濟合作理事會(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的叫聲很大，吹起一股什麼“不可逆轉的”自由化的風。1996年11月底，APEC在馬尼拉開會，BAYAN組織了一個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國際會議。這個國際會議有三百多人參加，包括120個來自29個國家的代表。這些代表來自亞洲、北美、拉美、歐洲和非洲的國家。三天大會後，就舉行一次大規模反APEC的遊行。

1997年11月底，APEC在加拿大溫哥華再一次開年會，這時全亞洲都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APEC各國的領導人的氣焰已消了一大截，推不出什麼進一步自由化的方案。加拿大的反APEC的組織開了一個人民高級會議(People's Summit on APEC)。BAYAN除了參加這個會議外，並且自己辦一個會。

APEC在1998年11月底，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開會。這時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已從東亞延至俄羅斯、巴西、和其他一些拉美國家。同時，馬來西亞、印尼和南韓反美情緒高漲，美國總統柯林頓藉故沒有參加。馬來西亞的一些民間組織與BAYAN合作，聯合亞洲國家的民間組織(也請了幾個北美和歐洲的代表)開了一個與APEC相對的國際大會和幾天的小組會議。到今年西雅圖的人民會議，BAYAN已經是第四次組織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會議和示威了。

「人民會議」和在西雅圖其他民間組織的活動很不同的是，這個會議立場鮮明和堅定。許多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議題經過多次討論，愈來愈清楚。這次「人民會議」來自亞洲的有南韓、泰國、馬來西亞和日本各國的代表。當然，有很多來自菲律賓BAYAN的民間組織的代表，其中有農民代表、婦女代表、海外移民代表、和幾個保健衛生組織的代表等。BAYAN在洛杉磯、舊金山和溫哥華都成立了分部，許多年輕人來自這三地來主辦這次的活動。另外有一位來自宏都拉斯(Honduras)的代表和許多美國和加拿大各地來的民間組織的代表。

大會的開幕詞是希頌(Jose Maria Sison)寄過來的演講稿。希頌是菲律賓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the Philippine)的最高政治顧問。希頌在演講中分析了在帝國主義全球化中如何使各國人民遭受苦難，說明今日世界上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他並分析了為什麼這股不妥協的人民反帝力量必終會取得勝利。

之後，我講了「帝國主義全球化下沒有自由貿易，也沒有公平貿易」。從洛杉磯來的菲律賓社區代表孟都塞(Jay Mendoza)講了菲律賓在北美移住勞工的運動和組織。南韓代表李常根(Lee Chang-geun)來自「國際聯合政策與資訊中心」(KoPA, Polic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他發表了一篇由25個民間團體簽署的聯合聲明。這些團體包括工人團體、婦女團體、環保團體、民主團體等。

這份聲明說明他們爲什麼反對南韓政府在經濟上所採取的「市場至上」的政策，和反對南韓政府支持WTO進一步投資自由化的要求。他們提出南韓政府必須將自由化帶給南韓社會的各種災害作總結。菲律賓的農民代表馬利諾（Rafael Mariano）堅決反對WTO農業自由化的條款。日本的代表來自一個「食物與環境安全聯線」的組織也是反對WTO中農業自由的條款。29日下午一個婦女反對WTO的小組（Women Say No to WTO）作了三個報告，菲律賓婦女組織（Gabriela）代表分析爲什麼婦女要反對WTO，馬來西亞來自「亞太殺蟲劑行動聯線」（Asian Pacific Pesticide Action Network）說明爲什麼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要反對由跨國公司所控制農業生產，包括美國化學和種子公司所壟斷的殺蟲劑、化學肥料等化學品和他們控制的生物工程的人造種子（Genetically engineered seeds），泰國的代表報告他們的婦女和原住民的抗爭。除了以上的演講和報告外，還有美國越戰的榮民講他們如何從替美帝國打仗到今天如何堅決反帝國主義，最後還有一個年輕人和學生的小組作報告，29日晚上開一個慶祝晚會大家同歡。30日上午我們自己的隊伍從中國城開始遊行再與其他隊伍匯合。

從參加這次的「人民會議」，使我不得想不到台灣的社會運動。台灣受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影響深而且直接。到今天台灣的社會上任何方面的問題——工人問題、農民的問題、婦女的問題、環境污染的問題，甚至這次地震震出來的各種問題，沒有一個不是與台灣目前在世界壟斷資本全球化的處境息息相關。但是，台灣的反對運動團體卻無法提出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方向。雖然報章雜誌上不缺台灣進入WTO後（甚至還沒進入前）就得向美、歐、日大資本作出各種的讓步，卻見不到任何站在大多數台灣人民長遠利益反對台灣加入WTO的分析和論述。即使是很多進步的知識份子也都屈服於什麼「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這種無憑據的說詞之下。

《左翼》的第一期中有好幾篇都提到台灣黑金政治，其實我們要反對的不僅是這種在背後和不甚公開的資本與政治權力結合的「黑金政治」（像這次因統治階級內部矛盾而揭發出來政金結合的醜事）。我們更是要反對的是公開的，台灣國家政策中寫得很明白的台灣政治力量與大資本的結合體，或許可以稱它是「白金政治」。在這種「白金政治」下，國家用納稅者的錢替大資本作各種有利於他們資本積累的建設，其中包括給所謂高科技建設的「科學工業園區」（新竹和南科），政府建水庫以供這些廠商大量用水，建核能發電廠以便供給這些廠商大量用電，用國家稅收訓練高科技人員免費轉給這些廠商使用，更計劃建高鐵以便供這些廠商的運輸。政府用低利貸款和直接投資把這些廠商扶植起來，又用各種減稅優待來減輕他們的負擔，增加他們的資本積累。台灣政府對大資本盡量不加管制，允許他們隨意處理含毒的廢物。台灣政府更將大批國有企業拍賣出售，以便供給大資本新的資本積累的園地。

除了台灣這些年來的一些反對運動外（像反水庫運動、反核能發電運動、和早年的農運、以及地方上環保運動等）很少知識份子能對這樣的「白金政府」提出的正面

挑戰，原因是他們已經接受了「白金政治」背後一套完整的意識型態。這是統治階級教育成功的地方。這套完整的依附在國際壟斷資本之下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型態告訴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是托了國際壟斷資本的福，是受了國際壟斷資本的青睞和恩惠。台灣的一切都要靠台灣資本家在資本主義世界分工下找到台灣的利基（Niche）。這個利基不斷的在改變，台灣政府必須用各種方法來援助台灣的資本家。接受了這一套意識型態的知識份子們不遺餘力為資本家找出路，為資本家發愁如何使台灣的工業升級。我想我們有必要向這種統治階級的意識型態徹底挑戰，這樣我們才能凝結所有社會運動的力量，並與待發展的工運結合成一股很大的反對力量。這樣才能避免我前面所批評的美國式的、支離破碎的、自說自話的社會運動。

這幾年來我參加了幾次國際上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會議和抗爭，看到我們在亞洲的近鄰和遠鄰國家的反對運動，他們有的已經發展了很長的一段日子，累積了很多經驗，有的剛開始起步，我們台灣的社會運動也要迎頭趕上。 ★

WTO 與電影



徐拒耘

十二月二日，數萬外地人馬彙集美國的西雅圖，以嘉年華方式，熱鬧地挫折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劫貧濟富的如意算盤。

與此同時，行政院通過了新聞局的電影法修正案，準備使貧者更貧，假借 WTO 之名，要使已經奄奄一息的台灣電影製片業，更加難以翻身。

新聞局說，現行電影法的第十一與第四十條規定，政府得制定國片映演比例及對外片徵收國片輔導金，其「實施有違 WTO...之原則」，所以應該刪除。

問題是，電影法的這兩項規定並未強制執行，因為其實施與否，屬於新聞局的權限，而新聞局最近多年來，全以政府預算作為輔導金的來源，根本沒有執行這些法規。正因為沒有實施，這就造成電影法修法公聽會時（只有電影處與片商參加），與會人士乾脆「有志一同」，認為反正條文早已未實施，乾脆廢掉算了，電影處見狀，順水推舟，宣稱為了配合 WTO 的要求，此議甚佳，於是刪除了事。

然而，就算台灣真正執行配額與徵收輔導金的規定，難道就違反了 WTO 的要求？非也。打從一九四八年，WTO 的前身，也就是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施行以來，相關爭論就層出不窮，從未終止。晚近十多年來，先有加拿大不同意美國所請，因此北美自

由貿易協定無法納入電影作為貿易品項。稍後，一九九三年，在法國領軍下，歐盟又使美國同意文化免議，亦即有關電視、電影等產品，WTO不作規定，而是留給各國進行雙邊協商。然後是本次流產的WTO部長會議，法國總統與總理固然分屬左右不同的政黨，卻對文化有其共識，他們準備將文化免議的規定，再往前推進一步，並且已經得到歐盟各國的支持。換言之，歐盟主張，各國（其實就是針對美國）應該更尊重彼此的影視等文化政策，且這個精神不能只是停留在口頭宣示，而是必須白紙黑字，寫入相關協定。

因此，如果真有所謂的WTO要求，那也是要求把影視產品排除在自由貿易原則之外，電影處剛好把事實弄反了。就在廣電處修法的前後，臺北市電影節剛剛放映了今年七月才完成，趙宰弘導演的《抗美救韓：電影英雄譜》影片。它記錄了韓國製片界發起，並廣獲文化人士響應的遊行、剃髮與絕食等活動，片中討論者，正就是電影映演配額的問題。大約在相同時候，美國與中國也簽訂了雙邊協定，中國同意，在入會以後，准許海外進口至其國內放映的電影，由每年十部增加至二十部。假使電影如同其他製造業產品，南韓也好中國也好，還有什麼好爭好談的呢？電影處要不是故意正眼不瞧事實，就是明知故犯。

再退一步來說，即便美國竟然有能力翻轉所有國家的主張，致使影視等產品也要適用國民待遇（惟應再次強調，這不太可能發生），徵收國片輔導金的對象，也只需要修改為所有影片均須適用即可。鑑於好萊塢影片已經幾乎席捲台灣，而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個情況也難以得到改善，法律雖說是要向所有影片徵收，實際上法律的適用對象，也幾乎等同於好萊塢。

電影產業不可能只靠保護就能存在，但《抗美救韓》這部影片說，韓國人不是主張保護，而是要讓南韓觀眾還能有些選擇，是要打破電影被壟斷的局面。現行電影法的配額與輔導金辦法，固然多年來形同具文，但這是因為主其事者失職、欠缺奮進的意志。這種WTO未規定，台灣自己先繳械的作法，形同是要讓未來就這類事務談判的代表，處於更加弱勢的地位。

為未來謀，電影處最好請行政院撤回原案。如果電影處不肯為之，立法院在審議時，應當把電影處這個莫名其妙，甚至有圖利好萊塢之嫌的法條修訂，恢復原狀，以便未來主事者作風丕變，任事轉為積極，想要執行有關規定時，不致失去依據。 ★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twleft@sina.com.tw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中美世貿協議述評

狄蔭清

一、談判過程簡述

今年四月份朱鎔基總理訪美，帶著志在必得的信心和美國談判加入世貿問題。但是，就在中國方面認為已經做出了很大讓步，美方應該滿足的時候，克林頓總統卻出人意料地拒絕收下這份禮單，同時還把中方所做的讓步承諾公佈在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的網站上，意在鎖定中國的讓步，並逼迫中國進一步開放金融等關鍵領域，保護美國的紡織業不受中國進口的衝擊。這種單方面的做法終於使中國談判代表團無法下臺。朱總理當場申斥美方不夠意思，不替中國領導人考慮如何向國內老百姓解釋的問題。中國代表團乘興而去，敗興而歸。

就在這段時間，中國所做的承諾在中美兩國都激起了強烈反響。美國商界各大公司看了讓步清單喜出望外，國會議員們也一改反華調子，紛紛發言表示應該與中國簽署協議，感到錯失了簽約的好時機。同時，中國國內業界人士卻一片譁然，“二十一條”之說不脛而走，政界上層為之震動。於是，當美國助理貿易代表卡西迪應總理之約來到北京準備補簽協議時，卻發現總理已經身不由己，無法答應原來的條件了。

正在中國各界吵吵嚷嚷反對讓步清單時，美國的炸彈開花在中國駐南大使館。一時間，美國對華的戰略企圖昭然若揭。以中國軍事科學院為中心的軍事專家研究了美國投向中國使館的五枚炸彈後，一致認定，這只能是精心策劃的蓄意轟炸。無論其轟炸的真實理由是什麼，毫無疑問的是，美國根本不把中國放在眼裡，而且無法排除美國有投石問路、試探中國虛實，以便對中國實施戰略打擊的可能性。而美國卻一再申辯這只是誤炸，拋出了種種拙劣的說法來掩蓋其以中國為敵的真實意圖，這些說法甚至連美國官員都認為難以自圓其說。得寸進尺、轟炸和欺騙激起了每一個還關心著中國前途命運的有良心的中國人的憤怒。眾怒難犯，中國領導人不得不宣稱，美國不解釋清楚轟炸的原因，中國就不再和美國繼續談加入世貿問題。但是，美國怎么能解釋得清楚呢？怎么敢解釋清楚呢？於是入世談判陷入了僵局。

然而，奇怪的是，美國仍然沒有解釋清楚轟炸原因，中國卻從9月6日起又與美國恢復了入世談判。信號非常清楚，中國太急于加入世貿了，以至領導人信誓旦旦的宣言

竟然煙消雲散。剛恢復談判時，江總書記還定了一個調子，堅持權利和義務的平衡，重申發展中國家的身份。根據這一精神，外經貿部的談判代表也放出風來，美國四月份單方面公佈的中國的承諾是不準確的，至少有15點誤解。重開的談判必須在澄清15點誤解的基礎上進行。美國方面則針鋒相對地反駁說，重開談判必須在四月份公佈的承諾基礎上進行。於是談判再度放慢腳步。說話就到了10月底，眼看離11月30日西雅圖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日子不多了。中方心裡越來越急切，越來越等不住了。這種心情被美國人看在眼裡，喜在心上。於是克林頓非常配合地給江總書記打了兩次電話，給足了中國領導人以大國面子。中國方面找到了可以向老百姓交代的理由，雙方又重新坐到談判桌旁。但這時美國方面已經完全掌握了中國的底牌，知道中國說什麼也得入，於是進一步抬高價碼，要求中國加快市場開放的速度，給美國優先考慮的領域更大的開放，對美國關切的紡織業以更靈活有效的保護。同時，美國方面也體諒中國代表團的難處，在控股權是51%還是50%問題上做了靈活的退讓。於是一份新的協議，一份比四月份讓步更大、更具實質性的中美雙邊世貿協議誕生了。談判成功了，談判雙方都贏了，唯一的輸家是中國的前途和老百姓的飯碗。

二、新舊協議要點比較

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4月8日公佈的《市場准入和規則承諾》(舊)，和美中商務委員會11月15日公佈的《美中雙邊世貿協議摘要》(新)，我們可以看出究竟新協議是否比舊協議作了更大的讓步。

農產品問題新舊協議基本一致，中國對美國優先考慮的牛肉、葡萄、酒、乾酪、家禽、豬肉等農產品的關稅作了大幅度的減讓，從目前的平均31.5%降到至遲2004年1月的14.5%。同時對於玉米、棉花、小麥、大米、大麥、荳油等大宗農產品的進口建立關稅率配額制，給予美國很高的起點配額和配額年增長率，在配額內的進口只征收1-3%的象徵性關稅。為了防止國有糧食部門浪費進口配額，協議還規定中國私營部門可以獲得很高比率的進口配額，以保證美國能夠用盡中國承諾的糧食配額。取消動植物衛生檢疫，接受美國藥物管理署的安全證明，從而放棄了限制從美國進口農產品最重要的非關稅壁壘。同樣重要的還有，中國將取消對農產品的出口補貼。一方面放開進口，一方面削弱出口，這就是農產品協議的中方讓步要點。

工業產品問題有一處重要調整，調整的方向是實質上有利于美方的。我先簡述一下共同要點。中國工業關稅將從1997年的平均24.6%降到2005年的平均9.4%。對美國優先考慮的產品則降到7.1%。大多數關稅削減將在2003年底前實施。中國將參加信息技

術協議，對於諸如計算機、電信設備等高技術產品將取消全部關稅。重要調整是在汽車業上，汽車業是美國最關心的產業之一，汽車業巨頭在美國政治中的影響很大，而且過去美國曾有過被日本汽車打敗的經歷，因此這次美國希望確保其汽車業能夠先發制人，利用世貿談判的機會，贏得競爭優勢。舊協議曾規定汽車關稅從目前的100-80%的水平削減到2005年的25%，新協議同意中國的要求，將時間延長至2006年。作為交換，汽車關稅削減的最大份額將發生在加入後的第1年。不僅如此，中國同意美國非金融公司向中國購車客戶發放汽車貸款，從而實際上大幅度降低了汽車銷售價格。這樣，中國汽車業將遭受的衝擊將會更大、更直接、更迅速。

服務業的讓步也是令人吃驚的。新舊協議都承諾給予外國公司以全部的貿易和分銷權利，包括進出口、批發、零售、售後服務、維護和修理、和運輸，以及全部的分銷輔助服務的權利，包括租賃、空中快遞、貨物寄送、倉儲、廣告、技術檢測和分析、包裝。全部限制都將在3-4年內取消。新舊協議都允許外國專業性服務業，如法律、會計、稅收、管理諮詢、建築設計、工程、城市規劃、醫療等行業，可以無限制進入中國市場，並擁有多數股權。不同的主要在電信、保險、銀行、證券和視聽產品等部門。關於電信，新的協議摘要指出：“在美國同意中國的請求，把外國股份參與價值增值和尋呼業務的比例限制在50%以內的同時，中國同意既顯著加速在前2年裡外資股份參與的比例，又加速取消地理限制。”其中最有意義的是北京、上海、廣州的電信業務開放問題，這三個地區（在協議中被稱關鍵電信服務走廊）的電信業務量佔全國業務總量的75%。舊協議規定，這一走廊在加入世貿組織時開始開放，到2003年時全部開放。新協議則規定，“這一走廊將自加入之日起立即開放全部電信服務。”也就是說，自加入之日起，全國電信業利潤最豐厚的部分將立即遭到強大衝擊。此外，新協議還增加了對因特網服務商進入中國市場的保證。保險的情況與此相似，在其他條件都與舊協議一致的情況下，加速取消人壽保險的地理限制，增加外國股本的比例，但同時美國同意將比例限制在50%以內。銀行業屬舊協議未定部分，新協議明確，美國銀行可以在5年內享受完全市場准入，2年後即可向中國企業經營人民幣業務，5年後可向居民經營人民幣業務，而且中國接受金融服務協議。這雖然並不等於立即實現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自由兌換或開放資本市場，但是5年後再要實行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不可自由兌換從技術上講就很困難了。視聽產品方面，新舊協議都承諾在外國可在其視聽產品銷售業中擁有49%的股份，以及擁有並經營電影院的權利，新協議更同意自加入之日起即進口電影40部，3年內達到50部，其中20部電影將採用分賬制。舊協議中證券業尚在討論中，新協議則允許外國少數股權的證券公司享受中國證券公司的同等待遇，並建立了一個美國財政部和中國之間的資本市場對話，實際上擁有了對中國證券市場規則制定的關鍵性發言權。

在市場規則方面，新協議明確地規定了兩項制裁性規則。其一是所謂進口潮機制，也就是說，當美國認為來自中國的進口過快過多時，這一機制就可以啓動限制進口。這一機制將在中國加入世貿後12年裡有效。其二是反傾銷機制。“協議保證，美國可以在15年內當涉及中國的進口時，繼續應該目前的非市場經濟法處理反傾銷事例。當然，中國可以請求適用美國法律檢查特定部門或整個經濟體來決定，它是否屬市場導向，從而不再服從這一特定法。”有了這兩項機制，美國實際上仍然可以隨意限制來自中國的進口。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舊協議都規定，中國同意自加入之日起即實施貿易相關投資準則協議，這意味著當我們出現貿易赤字時不能限制進口，不能以允許跨國公司進入我國市場為條件要求其轉讓技術，連國產化率這一用詞都將被淘汰，還不能以進口該國商品為由要求補償貿易。這就基本上排除了引進技術的可能性——而這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主要理由之一。

此外，新協議還規定一項紡織品防衛條款，該項條款將在世貿關於紡織品和服裝的條款消失後繼續有效，直到2008年12月31日。這意味著，在紡織品貿易上美國雖然將在2005年取消配額，但卻設了三道防衛機制來限制中國向其出口，其實際效果應該不亞于配額。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從龍永圖先生的講話中我們看到，加入世貿的實際好處說來說去就是紡織品出口能增加，並能由此解決290萬人的就業。但是如果看一看這三道防衛機制製的話，我看連增加紡織品出口都要大打折扣。事實上，世界上主要貿易國都和中國互為最惠國，只有美國例外。而偏偏美國又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對象國，出口的產品又主要是紡織品，因此，獲得美國的最惠國待遇的最直接的理由就是要增加紡織品出口。如果中國加入了世貿，也得到了美國的正常貿易國待遇（即最惠國待遇），但卻仍然不能向美國增加多少紡織品出口的話，那麼我們不禁要問，我們在這場“鬥智鬥勇”的世紀談判中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

龍永圖先生在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中一再強調，在這次談判中我們堅決不讓美國掌握50%的控股權。比如關於開放電信業和保險業的問題，龍永圖說，“這是21世紀的大產業，他們一定要掌握主導權，也就是說進入中國的市場後，他們必須有管理控股權”。“我們在最後一分鐘堅決打掉了他們要求掌握管理控制權的說法。”但是，事實上，一個企業的主導權並不完全取決于股份的多少。技術掌握在誰手裡，銷售渠道掌握在誰手裡，品牌掌握在誰手裡，誰掌握經營決策大權，這些都是影響企業主導權的重大因素。正如我們在中外合資企業裡看到的那樣，有時候外方只佔了股權的一小部分，但卻掌握著事實上的主導權。因此，所謂爭得了50%的股權就是爭得了主導權的說法，似乎就只是給自己 and 給老百姓一個安慰，並沒有太大的實質性意義。美方完全懂得這一點，所以他們不堅持要50%的股權，並且得便宜賣乖，把這個也當作所謂讓步來換取中國市

場的加速開放。這的確是新舊協議的最大區別。

三、加入世貿意義何在？

雖然中國初步形成了一個完整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但是當這個體系被劃成無數個獨立核算的市場經濟主體，每個主體獨自面臨跨國公司的面對面競爭時，其結局只能是被淘汰或兼併。在強弱對比很明顯的情況下，政府決意加入以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為基本理念的世貿，最大限度地撤除保護，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單純從發展經濟的角度是解釋不通的。加入世貿後只能是跨國公司佔盡國內市場，本國企業的大批倒閉或被兼併，工人、農民大批失業，社會購買力進一步萎縮。有的人以為引入了平等的國際競爭可以激發本國企業的競爭力，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但我卻看到，跨國公司所到之處，第三世界各國的民族企業無不紛紛倒閉、破產。這些企業也許被激發起競爭性了，但實力相差過分懸殊，終于成了跨國公司嘴裡的小魚小蝦。

因此，唯一的解釋只能是政治原因。正如龍永圖接受中央電視臺採訪時說：“協議達成主要是江主席與克林頓總統從發展中美關係的戰略高度出發，排除了很多障礙，作出了重大的政治決策，使得這次談判得以成功。”這“真正體現了我們中國領導人在堅持改革開放方面的勇氣和決心”。這就暗示，是出于政治原因，特別是出于堅持改革開放的需要，我們必須在經濟上作出犧牲。也就是說，在加入世貿問題上，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成了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只能是取改革開放而舍經濟發展。龍永圖是這樣解釋入世的政治意義的：“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必須在世貿組織中取得應有的地位，因為世貿組織就是世界經濟聯合國。中國人長期被排斥在世界經濟主流之外的時代必須結束。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到來，國與國之間的經貿關係越來越緊密。中國必須在世界經濟全球化這樣一個大的浪潮中接受衝擊，接受洗禮，成長壯大，中國在21世紀才能成爲一個真正的經濟大國。”但是這個說法也並不成立。因為這個世界經濟全球化浪潮是美日歐三家跨國公司爭雄的浪潮，融入這個主流便是成爲跨國公司的打工者，便不可能成爲真正的經濟大國，而只能是經濟附庸國。舊中國曾經作為殖民地被融入過世界經濟主流的。但當1929年的大蕭條到來時，企業破產比例最高的不是美國，而正是中國。經過五十年的發展建設，中國經濟雖然有了長足進展，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這離可以與跨國公司正面較量的時候還很遠，還不能說融入世界經濟潮流就不會被吞噬。從這個意義上，與其融入經濟全球化潮流，成爲發達國家的新殖民地，還不如與這一潮流保持距離，維護中國獨立自主地發展的空間更好。一百五十多年來，中國歷經國際潮流的滄桑，應該懂得國家主權才是高于一切的。在五、六十年代的日子裡，中國面對國際反華潮流，

沉著應對，沒有爲了迎合國際潮流、進入聯合國而放棄自己的主權。相反，正是因爲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內政外交，反而贏得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廣泛支持，形成了新的國際潮流，最後在聯合國形成強大的親華力量，把中國抬進了聯合國。同樣，今天如果我們能以十三億中國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爲第一優先考慮，也沒有必要去融入這個跨国公司主導的全球化潮流，更沒有必要放棄經濟主權。

如果說這些政治理由也不成立的話，那麼究竟是什麼促使我們的領導人敢傾中華之國力、結與國之歡心呢？我輩百思不得其解。也許這正是領導人的高明所在吧。用龍永圖的話說：“這就像小平同志70年代末提出的改革開放的政策，當時大家並沒有看到它會對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產生什麼影響，但是10年、20年以後，普通老百姓、整個中國都從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政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處。”

但願如此。我並不願意相信外經貿部是在執行買辦路線，更不願意相信領導人是跨國公司的總代理。這個結論實在是太嚴酷了。 ★

（本文轉載自《中國與世界》1999年12月號，

《中國與世界》網頁地址：<http://www.chinabulletin.com>）

協助原住民重建家園

黑暗之心

當命運失去退路，我們將背山一戰

- 【系列一】 原鄉重建部落音樂會 *Live CD* 定價 200 元
【系列二】 原運再起 *VCD* 定價 200 元

出版\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製作\飛魚雲豹音樂工團 遠足影像製作社
劃撥帳號\19411536 戶名\胡德夫 E-mail\watahope@ms43.hinet.net

左翼的起源

—— 進步的替代方案

俞向南

在政治上，左右的分野首先出現於法國大革命期間。1789年7月14日，蜂起的群眾攻陷象徵王室權威的巴士底獄，這是人民從絕對王權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開端。革命迅速蔓延，不僅法國農村的封建社會結構和皇家統治機制迅速瓦解，幾乎所有歐洲的王室的專制體制都面臨革命的威脅。

在法國，國家決策的核心和政治勢力的角逐很快從王室轉移到議會之中。經過三級會議、國民議會到制憲議會的組成，代表不同利益或勢力的派系和集團逐漸成形。尤其在8月26日通過《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之後，議會爲了是否維持君主制並賦予國王否決權展開大辯論，並因此形成壁壘分明的兩大集團。其中以教士、傳統貴族和保守金融資本家爲主的保王派集聚於議長右側的席位；議長的左側則匯集了有進步思想的年輕貴族，自由業的代表以及激進的中產階級，他們傾向於與「舊體制」徹底決裂。當時議會四周的柱廊相當寬敞，開會期間容許民眾絡繹不絕地進入旁聽，甚至在默許下一般民眾也可以在討論時逕自插言，這樣的議會多少有群眾大會的性質，而每一個議員都要直接面對群眾，其主張和屬性一目了然。政治上的左、右陣營自此成形。相對於右翼既有的權力位置而言，左翼的基礎較爲單薄，因此他們特別需要以較貼近基層百姓的主張去獲取旁聽民眾的奧援，甚至在議會之外透過發行報刊和街頭演說擴大其群眾基礎。因此，左翼在本質上即有反體制和群眾化的傾向，相對於鞏固保守勢力和維護既得利益的「舊體制」，左翼要求的是一套進步的替代方案，而且這一套方案必須能夠反映社會基層的需求，消除體制化的壓迫與剝削。

在歷史的發展上，左翼的主張日益鮮明，力量逐漸壯大。譬如法國自1792年二次革命建立共和以來，君主立憲制度崩潰，王室、貴族和教會的流亡者意圖藉由歐洲其他國家保守勢力的干涉，奪回政權，恢復舊體制。原來主導革命的勢力區分出兩股主要的派系，其中右翼是以商業發達的吉倫特省代表爲主的溫和自由派，他們主要是富商和地方資產階級，被稱爲吉倫特派(Girondins)，於共和初期掌握了議會中的多數。左翼則主要是由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領導的激進革命派，因其巴黎的聚會點是在雅各賓修院，遂以「雅各賓俱樂部」(club des Jacobins)的名義向全國擴散。其入會條件是：「凡熱愛平等，珍視人權，本能地保護弱者和被壓迫者，樂於尊重他人」者皆可加入。兩大政治派系的權力鬥爭日趨激烈，主政的吉倫特派甚至調動警衛隊，對雅各賓黨人進行逮捕和鎮壓。1793年五月底，雅各賓領導法國最基層民眾

「無套褲漢」(sans-culottes) 發起暴動，於六月初迅速推翻吉倫特派，取得政權。

左翼勢力主政後，隨即通過新憲法。與1791年憲法比較，除了君主立憲政體和共和政體的差異之外，主要的是取消了「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有一定財力的公民才享有投票權)的劃分，代之以男性公民的普選權。雅各賓黨人並主張把做為憲法前言的《人權與公民權宣言》做必要的修改，其中最主要的變動是：將「平等」列為最重要的權利，其次才是「自由、安全、財產」；在自由權方面，增列了「反抗壓迫權」和「起義權」，認為「當政府侵犯人權時，對於人民來說，起義是最神聖的權利和最不可缺少的義務。」；在社會經濟方面，強調任何公民享有「勞動權」、「受救濟權」、「生存權」和「受教育權」，並規定這些權利應由國家加以保障和實現。1791年憲法強調自由和個人權利，1793年憲法則更強調平等和社會權利。而對於私有財產的態度，在修憲過程中也有過激烈的爭論，當時主導政局的羅伯斯比爾曾發表演說，指出懸殊的財富差距是罪惡的根源，主張對私有財產既要保護，也要加以限制。財產的享有和支配，必須服從於社會和公共利益。1793年憲法後來雖因政治危機和社會動盪而未能付諸實施，但是政治上「左翼」的基本主張，已可約略窺見其雛形。

進入十九世紀，由於工業化的快速發展，生產技術和機器設備都有重大的突破，於是生產規模日愈擴張，資本大量集中，金融市場活絡異常，工業資本家和金融資本家成為舊體制瓦解後，新社會中的「新興貴族」。他們不僅掌握了社會中的經濟活動，同時也是政治領域中最活躍的一股勢力。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為了獲取利潤，不擇手段，競以壓低工資、延長工時、大量增產、降低成本來提高產品在市場的競爭力，卻導致勞動世界的非人性化。僱傭勞動者被束縛在工廠生產線上，成為大老闆積累財富的工具，卻無緣分配生產所得。這種生產關係對廣大的工人而言，是新的鐐銬。舊體制瓦解後所釋放出來的自由和平等權利，對他們而言，只是空話，因為現實的生存環境並不允許他們有能力和閒暇去享用。他們變成一批「除了鎖鏈，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失去」(馬克思語)的無產階級。馬克思將這種新社會的生產關係定義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關係，相當於過去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新的階級壓迫。在《共產黨宣言》中，他說：「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鬥爭形式代替了舊的。」就如同《人權與公民權宣言》是啓蒙時代思想發展到顛峰的產物一樣，馬克思和恩格斯於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是社會主義思想發展到顛峰的產物。前者宣告「舊體制」的結束，後者則是新的生產關係中被壓迫者權利意識覺醒，並採取聯合抗爭行動的起點。

工業革命導致「工人階級」(Working Class) 意識的覺醒，早在1830年代，組織工會以及配合公會進行罷工已成為工人階級與雇主進行抗爭的主要手段。在歐洲，勞工運動與雅各賓主義有一定的繼承關係，英國知名的史學家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n)

認為雅各賓主義是指「一套由法國大革命滲透給有思想、有信心的窮人的抱負、經驗、方法和道德觀念」，勞動貧民從受難者成為歷史舞台上的行動者，「外表寒酸的公民和以前不敢出現在舉止高雅者專屬場合的人，現在都昂首和富人走在一起。他們需要尊敬、承認和平等地位。」

十九世紀前半葉，勞工運動與雅各賓傳統的結合形成歐洲左翼勢力的特質。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爆發，左翼議員和勞工代表共組臨時政府，宣佈建立第二共和。群眾湧上街頭，要求頒布勞動權法令，保障勞工生活，要求成立勞動部，消滅人剝削人的現象。同年，德意志各邦紛紛出現城市勞工結合農民的起義，奧地利發生工人聯合學生的反政府大示威，義大利繼西西里武裝起義之後，各地工人和手工業者群起示威。除此之外，捷克、匈牙利也都捲入了革命的風潮。

1848年蜂起的革命，都不約而同地要求改變既定體制，成立反封建、反剝削的替代性政權。群眾的努力和犧牲，使得許多資產階級自由派得以進入政府，參與決策。然而，在現實上，革命的成果卻也大多為資產階級所接收，並在掠奪革命果實之後，反過來將無產階級視為威脅其統治權的敵對力量。馬克思在具體分析1848年的革命經驗之後，指出真正的社會矛盾是階級矛盾，國家機器是資產階級用來鎮壓無產階級的工具。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其任務「不在於掩蓋階級矛盾，而在於消滅階級，不在於改良現存社會，而在於建立新社會。」

1848年之後的左翼運動已不可能沒有社會主義的內涵，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分析更成為左翼運動所不可或缺的資源。十九世紀上半葉，聖西門、傅利葉、歐文等社會主義先行者，對勞工運動已有一定的啟發；十九世紀下半葉則是社會主義思潮百花齊放的年代。除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還有不少實際投入到勞工運動，抗拒壓迫、剝削，並試圖改變既定體制的行動者和思想家。如布朗基、拉薩爾、蒲魯東、巴枯寧，及至稍後的伯恩斯坦、拉布里奧拉、考茨基等人，都對十九世紀中葉到晚期的勞工運動和各國左翼政黨的組成，產生重大的影響。他們之間對於社會性質的分析、組織動員的方法和終極目標容或有歧見，但是對於弱勢者的團結抗爭，對於社會公平正義的籲求，並在壓迫性的體制之外尋求進步替代方案的努力，基本上立場是一致的。左翼以這些特質而發源，而集結，而擴散，並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發展為國際性的政治、社會運動。二十世紀後，左翼進入到另一個發展的階段，我希望能另文敘述。 ★

第三條路的挫敗

施威全

近日不少文章在推崇倫敦政經學院院長 季登斯 (GIDDENS) 的「第三條路」。如果弄不清什麼叫意識形態與左右，弄不清左右之分在英國的政黨發展史上的特殊地位，那當然會以為「第三條路」真是社會趨勢，其思維真的是「新中間路線」的主軸。

應該先澄清：「統／獨」不是「意識形態」。今日台灣的統獨之爭，多用一種民族主義在打另一種民族主義，高喊台灣魂和台灣人的過程中，連曾經在黨外運動扮演過重要角色的自由主義都被丟在腦後。統獨兩者，是同一種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右派的)下的學生配對，可以說它們是兩種政策主張，兩種民族主義情懷，如此而已。

左右則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以「綠色矽島」口號為例：從左派的立場出發，會認為台灣的科學園區奠基在政府優惠補貼、污染環境、大量外勞；而右派的提法會強調這是本土資本的成功出路，是經營之神的卓越領導。當政策口號刻意避開一些基本的社會議題，例如：土地和勞工時，套句英國政圈的流行語，這是 spin doctor slogan。這類廣告術語不是新玩意，以中國為例，從奕訢、戊戌變法、袁世凱到北洋政府，都喊過「新政」、「新派」，國民黨的 C C 派也在內戰時提倡過「新中間」。從瀟灑倜儻的恭忠親王到認真堅毅的阿扁，這些口號還有個特色，都是政治人物在政治頂層上拋出的個人創作，不是來自社會運動。

英國的左右之爭，則來自群眾。先有社會運動，然後建立工會；先有工會然後有工黨。黨來自工會的這段歷史，相較其他西歐國家，甚至是非常特殊的。有運動經驗的群眾在工黨的發展歷史上，是政治議題的生產者而非政治

口號的消費者。「第三條路」和「新中間」最大的不同，是季登斯在著書時不得不觸及左右辯論的傳統及其後面的社會力量。但與他先前的著作，例如台灣流行的「批判的社會學導論」一書相比，「第三條路」的太多口號太少討論，說明了「第三條路」其實就是政宣手冊，是由上而下的創作。工黨執政愈久，其窘迫愈顯露，困境之一是教育。把企業力量引進大學的結果，作為政經學院院長的季登斯自己扼殺了以前的自己，忙於建立國內國外的政經關係。大學生得到學業貸款比以前艱難，目前六十萬的貸款人數中，不到三分之一按月拿到生活費。小學也是一樣，好學區的校長忙著應酬，壞學區學校的升學率滑落到百分之六以下。

運輸是個困境。鐵路私營化的目的是想提昇效率，結果民營化的英國鐵路脫班情形更嚴重，服務更差，最糟糕的是，今年發生了英國有史以來最慘烈的火車相撞意

外，三十人死亡。這個意外是公營事業民營化的直接結果，公營時代的「煞車瓣安全系統」裝置計畫，在民營化以後被擱置，例行的安全維護工作縮減，所以死傷慘重。道理很簡單，民營公司以追求利潤為目的，而安全系統是必須花成本的，是效益最低的投資，所以在高階薪水逐年調升、股東獲利月月增加的同時，安全計畫被一年又一年的延宕。（我通勤時，書包裡都帶著小鐵鎚，以便出事時可以逃出，以免燒死。電視節目教的。唉，這不是笑話。）全歸罪於「第三條路」？不盡然。因為這些都是工黨政府繼續推行保守黨政策的後果。口號歸口號，新工黨走的是舊保守黨路。

第三條路當然是成功的競選口號。今年年底，英相布萊爾的黨內權力受到了反對地鐵民營化的黎敏史東（倫敦市長參選人）的挑戰，他為自己捍衛說：「當我在黨內爬升時，他是在另一方的。」意思是，布萊爾的得天下早就代表了一切路線辯論的終結，民營化問題根本不用討論了。布萊爾是個政治人物，政治人物都是務實派，如何把自己送上政治位置是最優先考量，所以口號可以天天修正，也可以形左實右。政治人物不是社會改革者，改革者相對較在乎理念，成功則不必在我。

不用把第三條路當成是新的社會出路，因為它只是競選口號而已，更不是什麼左右之外的社會新趨勢。英國火車悲劇後，地鐵民營化、航空安全控制塔台的民營化、核能電廠民營化都遇到了空前阻力，幾乎同時間，福特汽車廠罷工、學生抗議學費政策……這才是社會現實。我們可以說季登斯是社會學大師，是吸引研究生的老師哥，是有影響力的學院院長，這都沒錯，但是無須把他的第三條路拱成圭臬，還引進當作討論台灣議題的經緯座標。★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中國時報》）

沒有左派，哪來新中間路線？

黃瑞明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將在今天（本月四日）應倫敦政經學院院長季登斯之邀前往英國演講「臺灣的新中間路線」。政經學院是一流學府，對一個汲汲於培養國際觀的人而言，這無疑地是一項殊榮。陳水扁到底怎麼向他的英國聽眾解釋這條路線卻是一個富饒興味的問題。

季登斯是知名的社會學家，也是當今英國首相布萊爾的首席智囊。在共產主義固然已經壽終正寢，然而資本主義卻也老態龍鍾之際，深諳馬克思學說的他開始思索人類接下來該怎麼走的問題。他的結論就是另闢一條非左非右的「第三條路」。對於遭到柴契爾主義統治十八年之後的英國而言，工黨在戰後所實施的左派政策早已無法因應經濟

成長的需求。布萊爾利用「第三條路」的構想塑造了他的「新工黨」，擺脫了前任黨魁金諾克留下的包袱，一舉榮登總理寶座。

左派的價值立場在歐洲根深蒂固；它產生自法國大革命，其後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注入而蔚然大興。西歐的左派與社會主義形影相隨，它是祛除階級鬥爭成份之後的人道主義。爲了照顧弱勢，傳統的左派建構社會福利國家，主張課徵重稅與國營化來抑制財富集中。爲了活絡市場經濟因而受限的運作空間，布萊爾的「新工黨」主張減少國家干預，將經濟政策稍微拉向中間。因此，他被輿論歸入中間偏左的政治人物是其來有自。

英國左派可以接受這種修正路線，德國左派卻無法苟同。施洛德爲了終結柯爾長達十六年的統治，也在去年選前學著布萊爾標榜所謂的「新中間路線」。他在擔任總理之後與布萊爾共同發表了新路線文件，卻引來社會民主黨內多數的左翼同志嚴厲抨擊。這在一個社會福利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三分之一的國家裡一點也不令人意外。因爲左派一直都是德國戰後知識界的主流；哲學家哈伯瑪斯是，新科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格拉斯也是。施洛德企圖以一己之力來改變大環境，自然會無功而返。在不久前由美歐「新中間路線」政府領袖於佛羅倫斯召開的「二十一世紀進步政治」會議上，施洛德不得不聲明：「我們只是想重新界定社會福利國家的內容而已，無意放棄這項原則。」表明他的左派之身，目的在向國內同志示好。

如此看來，陳水扁在解釋「臺灣的新中間路線」前，應該先回答臺灣的左派政黨到底在哪裡？與黑金糾葛不清的國民黨自然沒有資格，而腐化程度較輕的民進黨卻也左不到哪裡去。媒體不會如此稱呼民進黨，民進黨也從來沒有嘗試去突出自己的左派形象。不錯，老人年金是民進黨的創見，然而這只是零星的主張，談不上政策，爭取選票的短線操作味道太濃。事實上，民進黨內部可以爲台獨黨綱或是「大膽西進」而壁壘分明，但就是不爲社會政策進行大辯論。然而，貧富懸殊早已急劇加大，社會政策究竟應該如何因應？加入WTO後臺灣的勞工又將如何面對衝擊？這些議題攸關公平正義，關心的民進黨籍立法委員卻是屈指可數。輿論對於民進黨的認知止於台獨主張，良有以也。

民進黨不左的問題其實就是整個臺灣的問題。臺灣的左派幼苗老早就在白色恐怖中被斬草除根了。左派在過去等於「共匪的同路人」，連家裡放幾本馬克思著作都可能惹來不測之禍。影響所及，在解嚴已經十年的今天，這個社會的辭彙中至今仍然沒有「左派」兩字。事實上，知識份子對於左派依舊存著嚴重的疏離感；即使是在社會學界，立場左傾的學者也是寥寥無幾。在不患左而患太右的臺灣，談西歐國家的「新中間路線」無異緣木求魚。左派不存，社會政策自然被丟進冷宮。這就難怪正在打得火熱的總統選戰中沒人爭辯社會政策了。趕時髦的所謂超黨派趨向反映的只是政黨與政客的投機。在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帶頭下，扣上「賣臺集團」的帽子更儼然成了決戰致勝的法寶。

陳水扁在他的「臺灣之子」一書中說他的「新中間路線」指的是超越省籍、族群、政黨與統獨的矛盾以建立最大公約數的政治中間路線，這是國情使然。然而，當季登斯問起臺灣的左派時，他將何詞以對？

★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中國時報》，作者曾對個別文字作更改）

韓國左翼運動的政治展望

臧汝興

從87年韓國民眾以自己的力量爭取到總統直選之後，87年、92年、97年已經歷經了三次總統大選，韓國左翼也算是從來都沒有缺席過。雖然韓國左翼在三次大選中，因為實力的不足，從來沒有以執政為目標，但即使在他們所設定的目標－民眾的政治勢力化上，也從來沒有成功。

87年六月韓國爆發以反對軍事獨裁續繼執政為目標的全民眾的民主化鬥爭，接著七、八、九月勞動者利用民主化鬥爭勝利所爭取到的政治空間，展開全面的工運鬥爭。不難想像該年十二月的總統大選必然是進步運動陣營的絕佳機會。僅儘管其中也有不利於進步運動陣營的因素，例如：六月抗爭並非由勞動階級所主導、七、八、九月的勞動者大鬥爭更非由全國性工會組織或政治組織所領導。但導致左翼政治勢力的失敗的最重要原因還在於對情勢的分析。

當時在反對黨領袖金泳三與金大中分裂，分別參選的情形下，進步運動陣營對大選的立場也因此分成了三派。一派主張支持當選可能性較大的金泳三、一派主張支持具有相對進步性的金大中，另一派則提出「獨自候選人論」。前兩者的基本立場可以說是一致的，也就是認為韓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民主仍未完成，反獨裁鬥爭依然應該是韓國進步運動的最主要課題。如此的情勢分析在當時來說，確實有相當的說服力，因此，「獨自候選人論」方面不得不中途退出選舉。當然退出選舉的另一個重要考慮是如果金泳三、金大中輸給執政黨的盧泰愚，而票差又低於「獨自候選人論」推出的候選人的得票數，進步運動陣營必需承受相當的政治壓力，同時也可能造成內部分裂。後來，據說當時的國家情報機關對「獨自候選人」的得票預估是150萬票，約佔全國總票數的7%，這個數字是92年左翼候選人的得票率的七倍、95年的六倍。左翼錯失了這次機會後，到92年的總統大選，聲勢已經無法與87年比擬。

92年大選之前，傳統的反對黨領袖之一金泳三已經與盧泰愚聯合建立起巨大的保守大聯合。雖然金大中被排除在此保守大聯合之外，但這並不表示金大中因此具有相對進步性，其真正的原因還在於省籍分化統治。事實證明，盧泰愚在任期間貪污來的黑錢的一部份，分給了反對黨的金大中。金泳三與盧泰愚在黨內緊密聯合，再加上與金大中的另一種形式的聯合，為韓國布爾喬亞階級建立起一道穩固的保護網。由此看來韓國左翼面對大選的選擇應該是清楚的，就是結束過去軍事獨裁統治時期，民主與反民主的對立線，重新建立進步對保守的對立線。

但是，左翼陣營中的右傾化勢力，卻倒向金大中，反對獨自提出候選人。他們認為韓國社會不是新殖民地而是舊殖民地，因而主張應該承認金大中的相當進步性。也就是主張承認殖民地社會中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性。當然這裡有幾個問題。

一、韓國社會是否為舊殖民地社會？二、在現今的韓國社會小資產階級是否可

以等同於民族資本家？三、金大中是否能算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非壟斷大資本的代表？總之，右傾化勢力還是選擇了金大中，雖然他們也基於「爛蘋果論」，而與金大中展開所謂的「政策協商」，但在協商的過程，對金大中一再讓步，顯然協商只不過是一個形式，其目的在於在進步陣營內取得支持金大中的說服力。結果，左翼雖然推出自己的候選人，但在內部分裂的情況下，僅得到1%的選票，原先打算選後成立三十年來第一個左翼政黨的計劃，也因選舉挫敗而擱置。右傾化勢力也因金大中落選而期望落空。

97年的大選主要是執政黨的李會昌與反對黨的金大中的對決。這次的選舉的一個特徵是金大中經過連續兩次的選舉失敗，清楚了解自己的以省籍票源為主的得票率的侷限，於是開始拉攏朴正熙軍事政變、軍事統治的伙伴金鍾泌，又向屠殺光州市民的全斗煥、盧泰愚示好，毫不掩飾其保守性格。

儘管如此，進步陣營的右傾化勢力仍然執迷金大中的改革形象，提出所謂的「民主大聯合論」，也就是要聯合金大中的「民主勢力」對抗保守勢力。但其實金大中卻清楚知道在進步勢力無法成為一股強有力的政治勢力的韓國社會，必需取得資產階級的支持才可能當選，而資產階級所關心的絕不是執政黨繼續執政還是反對黨完成政權交替，而是那一股政治勢力更能代表總體資本家階級的利益。但是一般國民卻缺乏如此的階級觀點，只想從亂蘋果中選一個較能改善治安的、貪污腐敗程度較低的、較能穩定物價的、較重視環境、教育的政權，而放棄了自己做為階級的主體，從階級的觀點爭取階級利益的機會。當然，以少數統治多數的資產階級，膽敢以數人頭的方式讓國民選擇政權，靠的就是使人民不具有階級觀點的手段。

這既是資產階級必然的手段，左翼在選舉中就更應該堅持階級立場。但可惜的是，97年的大選，左翼陣營推出的工人出身的權永吉(全國自主工會理事長)竟放棄工人身份，而以「國民候選人」的身份參選。權永吉方面原以為如此可以擴大陣線獲得一般市民的支持。但開票結果證明，權永吉的得票率僅比92年的白基玩高了0.2%，如果考慮到92年時自主總工會尚未成立，97年時已成立，因而工人組織票提高。事實上放棄階級立場的「民國候選人」路線，反而造成知識份子支持者的流失。

97年選舉結果，金大中終於實現其近三十年來夢寐以求的最高權力，進步陣營中的右傾化勢力十年來三次總統大選中對金大中的支持也終於結了果。但是結果卻並未如右傾化勢力所期望的加速民主改革。相反地金大中在經濟上徹底執行新自由主義，在政治改革上充其量只能算是保守改革，在對進步陣營的態度上則採取一邊收編右傾化勢力，一邊加強對進步陣營的打壓，從而分化進步陣營。因為金大中知道阻止進步陣營成長為一股影響社會的勢力，以維持資產階級的穩固的統治，是嚐過97年工運全國性大罷工苦頭的資本家的共同要求。

金大中執政兩年來，右傾化勢力該投降的都已經投得差不多了。現在左翼勢力正在籌組政黨，並準備明年的國會議員選舉。目前民調顯示左翼政黨(暫稱「民主勞動黨」)的支持率高達23%，雖然大部份支持是來自民眾對既有政黨的不滿反射。左翼政黨若能記取過去的失敗教訓，堅持與既有政黨的差別性，定能保住23%的大部份。★

評《偶然生為亞裔人》

馮建三

機緣湊巧，最近看了幾本好看的書。好看，是因為題材生動，原著與譯筆流暢。但好看之外，卻有陷阱。去年 Diamond 出版了《槍砲、鋼鐵與病菌：人類社會的命運》，作者說是要探索為什麼人類會有不平等，但所提供的答案，卻又回到他聲稱要避免的地理決定論，讀者如果不去深究，輕則強化自己沒有生在歐美的感嘆，重則忘卻奮進以打破不平等的必要。十月底出版的《偶然生為亞裔人》也有相同的情況。

照講，這本書設定的讀者是美國人，作為台灣人，出版商有什麼出版它，而本地人又有什麼理由讀它呢？可能有兩個。

第一，本書談認同問題，或者，較精確地說，談認同於統治階級開明派。就這個層面來說，任何社會，包括台灣，當然都會有人關切認同問題，因此也就可從作者的心路歷程，採擷養分。

再來，對於主動選擇、親人安排或其他原因，已經或想要取得美國人身份的人，作者提供了成功融入美國主流階級的故事，他把個人的成長傳記與思維，相當有重點的、調和的，放到了美國歷史的發展背景。

作者劉柏川約略能聽講些國語，年未滿三十，多次為柯林頓撰寫演講詞，現任白宮內政委員會副主委。書中似乎沒有太多的感傷，比較明顯可見的是誠懇的心意，對於克服種族差異及刻板印象的努力，以及對於美國社會的信心，「美國不再是白色，而且永遠不會再是白色」、「最能讓我引以為榮的是中國變成自由民主的國家，像美國這樣」。作者體魄強健、性格迷人、文采可親，在中國與美國經貿外交關係日趨緊密的世紀末，華裔美人的身份亦可說是躬逢其勝，最能契合兩國交往之需要，因此，當他隨團訪問北京時，中國副外交部長單獨請他午膳，而作者雖也提及其脆弱之處，但更意識到了雙重身份的優勢，「如果你有這身份，你會不用嗎？」

但，這本書能夠讓人興起同理心嗎？答案端視我們對美國的認識。過去二十年來，無論是保守派還是開明派當家，美國都是推動金融自由化的主力，以吸金大法，形成跨國階級聯盟，移轉他國資金至美，填補美國生產少於消費的窘況（至今積累債務已達 1.9 兆美元，大約佔其國民生產毛額的五分之一）。其中，近幾年來被稱作是泡沫經濟已告破產的日本，很怪異，卻擁有一兆餘美元的債權，它的很大一部份就是投資在美國（包括股市）。台灣誇示的千億外匯，相當成數也等於是用來金援山姆大叔。

照理，舉債如此巨大，美國所有的人應該是多少「雨露均霑」，生活水平都能得到改善。實際情況卻是，就在美國債務高漲的同時，美國社會的絕對與相對貧窮人數，

卻是有增無已，這兩年來，美國政府雖然出現了預算盈餘，對於貧富差距的擴大，仍然束手無策。

對於美國如果有了這樣的認識，想要成為美國人的人，至少應該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認同這種美國，於是言談舉止之間，也就透露了優勢階級的身分。另一種是認同於另一種美國，加入改造這種美國的行列。出生在加州而「不得不」取得美國籍的宋楚瑜之子宋鎮遠，作何選擇？

★

《亞太勞動快訊》 為何要創刊，又為何休刊？

亞太勞動快訊社

頃然接到《左翼》編輯部給的這個題目，倉促提筆之餘亦覺百感交集。《亞洲勞動快訊》創刊迄今已屆一年，而相信大家亦有耳聞我們將於近日出版第六期「基因改造作物暨農企業」專號後，邁入暫時休刊沈潛的階段。一年是段不算短的時間，由於在這期間我們得到了許多同志、前輩在財力、物力以及智識上熱情的支持，且休刊消息傳出後更是接獲不少友人關切的詢問。因而，值此休刊之際，確實也有需要向大家剖白一下《快訊》當初創刊的想法以及今日休刊的緣由。

也差不多就是在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們這一群大學生與研究生在陳奕齊（政大勞研畢，現任職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邀集下成立了「快訊社」。起初的想法是，站在學生的立場上，除了參與遊行或零星的服務工作外，究竟還有什麼是可以讓我們發揮所長，對台灣的左翼事業有所貢獻的呢？成立「快訊」這樣的一份刊物是我們思考後的答案。

我們認為，站在學生求學、接觸新知的相對優勢位置，我們有責任將國際間左翼運動的訊息、學術新知引介入台灣，並以此作為我們與台灣各類左翼運動連結的基點。當然，我們最終也希望能夠藉著這份刊物將台灣與世界掛鉤，打破台灣此一封閉島國的處境。簡而言之，這樣的思惟也就是我們當初在發刊詞中所接續的「全球思惟，在地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理念。睽諸《快訊》這六期來的成果，不論是〈

生產守則>專題、<金融風暴後的東南亞諸國>專題，或是<基因改造作物暨農企業>等專題，無一不是以此理念作為我們前進時的準則。

在這一年之中，隨著刊物一期一期的出版，我們不斷地在檢討，從中也發現了不少我們基於學生身分而來的侷限性。首先，由於學識尚不充分的緣故，我們在刊物選文、翻譯上迭遇困難，幸而這在許多前輩、老師的悉心指導下尚未釀出什麼大紕漏。而雜誌的譯文或爾過於學術性，無法吸引廣大工會會員、幹部閱讀則更是困擾我們已久的問題。除此之外，刊物人力調度吃緊亦是一大困難。在我們當中，奕齊畢業後前往香港從事工運、桂美更將於近日出國前往柬普寨從事志工服務、其餘的社員則紛紛為論文所累，在新近社員尚無法迅速銜接的情況下，雖有東麒在工餘之時的全力奉獻，整個刊物在人力上仍是顯得左支右絀。

這種種的一切，暴露出我們身為學生業餘隊伍的不足之處，而這也顯現出台灣目前需要一份「專業」刊物來作為左翼力量集結點的急迫性。我們之所以決定暫時休刊，雖有以上種種原因；但進一步的沈潛以進行理論的鑽研，則更是為了我們由業餘隊伍轉型為職業隊作準備！

經營一份刊物從來都不是容易的。從文章的撰寫、翻譯，到資金募集、刊物推廣等等，莫不都是極為消耗的事。正是因為知道如此，在我們《快訊》休刊之際見到《左翼》的出現，則更為令人欣喜。與我們相較下，《左翼》當中的主事者及主筆群，更無一不是在理論上有極深刻的鑽研、並具有豐富之實地社會運動經驗者。準此，我們在這裡也要祝賀《左翼》發刊成功，希望其能夠繼續發揚壯大，更期許有朝一日我們以及社會上同志們，能夠透過《左翼》持續不斷地為台灣左翼運動貢獻心力！ ★

附註：《亞太勞動快訊》暫時休刊後，所有過期文章將刊在於

<http://www.geocities.com/aplul960> (password 1960)

亞洲勞動快訊網址中，此後亦將不定期發表文章於該網址，並集結出版之。

左翼的力量在台灣，飄零各處，常常不知同志在何方，因此如果我們遺漏了蟄伏在角落的你，要請您包涵與原諒。凡是左派的同志或關心左翼運動發展的朋友，我們都歡迎您來函向我們索取這份通訊。

來信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twleft@sina.com.tw

對於《左翼》第一期 黎建江〈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 的幾點意見

《連結》雜誌社

前 言

我們《連結》雜誌是一群具有政治、學生、勞工、環保、原住民運動經驗的學生，為了宣傳理念，並且與各地的政治、社會運動工作者對話、促進連結的刊物；在1999年11月這份刊物正式出刊了，未來將以季刊的形式持續發行。而在《連結》出刊前後，由前輩們所籌畫的《左翼》也很快地出版了。在《左翼》第一號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是黎建江先生的〈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從局勢的演變談起〉，由於這篇文章的重要地位（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我們以為它對於《左翼》這份刊物具有指標性、導論性的作用，因此格外仔細地加以閱讀。然而看完了黎建江先生的文章，我們確實產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見與疑問，想和《左翼》的前輩們認真對話；我們認為，在政治、社會運動的領域內必須把重要的問題談清楚以促進運動的發展，而不應該為了維持表面的虛假和諧而使運動的理論與實際相關的問題長期無法公開檢驗與討論。因此《連結》雜誌社決定以團體的名義寫下我們的見解，希望能夠給彼此之間、甚至更廣泛的政治、社會運動領域內帶來必要的思索與討論。我們也認為，如同《左翼》這樣的公開討論的空間，對於運動是非常必要的，公開而深入的討論必定有助於打破理論與實踐上的渾沌局面。

黎建江先生的〈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從局勢的演變談起〉（以下簡稱「黎文」），在文章的題目就談到「左翼社會運動」這個很少人使用的字眼，然而這個提法很含糊而具有誤導作用。從「黎文」的內容來看，黎先生也清楚他所說的左翼運動其實絕對不僅僅是「社會」運動，例如他在第一段所舉的例子：「蘇聯東歐（的共黨政權）垮台」、「中共經改」，以及「黎文」後來用很長篇幅討論的「李登輝政權」、「台獨」等等，都不只是「社會」問題或「社會」運動的問題，擺明了是政治問題；事實上，黎先生心目中的「全世界的左翼運動」，幾乎都不只是侷限在台灣所稱呼的社會運動這個範圍之內。「黎文」應該不至於犯這種錯誤，但這卻是一個令人疑惑的問題。

「黎文」的主題就是「左翼社會運動」或左翼運動，但是「左翼社會運動」或左翼運動是什麼？劃分左翼、右翼的最關鍵因素是什麼？（或者換個說法，劃分左右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在整篇文章中卻沒有談清楚過，黎先生似乎認為閱讀這份刊物的讀者都能夠瞭解。但是，就算是作者的老朋友、老同學都非常有可能對於左翼運動（或作者所說的「左翼事業」）有不同的想像，因為「左翼」原本就是個被人濫用或用到爛的字眼。所以，作者沒有把他心目中的「左翼社會運動」或左翼運動說明一下，很可能使這篇專門談「左翼社會運動」或左翼運動的文章，在讀者的心中成為無法對準焦點、任人猜測的「亂碼」。不過，「黎文」雖然沒有直接說明「左翼社會運動」或左翼運動是什麼，但是也可以從作者的分析方式，來看黎先生心目中的左翼式「宏觀考察」是什麼。

「黎文」的第二節標題是「台灣目前形勢的宏觀考察」，作者認為：「探討台灣的宏觀形勢，無可避免地，主要得分析統治階級的動向。」那麼，「黎文」的「統治階級動向」是如何分析的呢？作者接下來是這麼寫的：「李登輝政權十多年來的措施，成功地將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轉化為民粹式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這裡的意思是說，李登輝政權之前的蔣介石、蔣經國政權的性質是「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而李登輝政權則將之轉化為「民粹式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然而，為什麼兩蔣政權是「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李登輝政權是「民粹式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作者並未說明。

所謂「半封建半殖民政權」，是來自於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自周秦以來是一個封建社會，到了鴉片戰爭之後外國資本主義開始侵略中國，中國社會逐漸生長出資本主義因素，中國逐漸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而中國不論是國民黨統治區，或是帝國主義租界、日本侵華時的佔領區，都是封建半封建制度佔優勢的社會；整體來說，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當然，矗立在社會之上的蔣介石政權就是「半封建半殖民」政權了。1947年國共內戰爆發，在台灣不但有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呼應中國內地的共產黨口號，在當時及之後數年的中共地下黨在台活動也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所以台灣社會也理所當然地適用於這個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

現在，「黎文」認為兩蔣政權是「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只不過是沿用數十年前毛澤東等所說的中國社會性質分析，前面再加上台灣現在所流行的字眼「威權式」而已；這裡面其實包含了許多沒說清楚、沒解決的問題。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否真如毛澤東等是「半封建半殖民」，還可以爭論；但是，退一萬步來講，就算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可以適用於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社會（這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麼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所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出口外銷、嵌入國際資本主義的國際分工……

等等在兩蔣政權的時代就已經在進行的政策，都沒有改變台灣的社會性質？台灣本身都沒有自己的發展？到1980年代後期結束的兩蔣統治下的台灣，一定都和中國數十年前的社會狀況一致？——除了「威權式」這個具有台灣特色的形容詞之外；這就是作者心目中的台灣特殊性了吧——這實在是大有問題的「宏觀考察」了。作者會這樣子「宏觀考察」、這樣子界定台灣社會與兩蔣政權，其實是另有原因的，這一點將在接下來繼續分析；而「黎文」的作者還說李登輝政權將兩蔣政權轉化為「民粹式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也完全沒有解釋，只是一語帶過。

「黎文」接著花了很長的篇幅在批評李登輝政權的台獨主張與李登輝的個人心理狀況：「民粹主義的氾濫，更把許多社會內部的矛盾轉化到兩岸的對立，所有這些，都嚴重地阻礙了左翼社會運動的發展。」、「李登輝是個有使命感的人，綜觀他十多年來的作為，李登輝有計畫有步驟地把台灣帶到台獨的目標。為達此目標，對內他強化資產階級與民粹主義的力量，對外則加緊結合美、日等國的右翼力量」、「不斷地激怒中共，企圖藉由中共過激的反應，凸顯台灣受打壓的可憐處境，以此誘導台灣人民敵視中國，從而凝聚敵愾同仇的台獨意識」。從這些對於李登輝的批評中，我們終於知道，作者認為李登輝到底犯了什麼錯：不是李登輝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不是李登輝如何壓制台灣勞動者，不是李登輝堅持要蓋核能電廠，不是李登輝要加入WTO，甚至也不是李登輝處理地震的事處理得不好；李登輝最重要的罪過，是搞「民粹主義」式的「台獨」！因為李登輝搞台獨，所以才會加強資產階級與民粹主義的力量，才會搞金權政治、極力膨脹黨營事業，才會與美國日本帝國主義勾結，才會「嚴重地阻礙了左翼社會運動的發展」！

這一點從其他地方也看得出來。例如，「黎文」中說：「面對連戰選情低迷，李登輝一定會再出怪招。最近邀請日本右翼政客石原來台，以刺激中共來達到兩岸緊張，為其一例。」「黎文」在這裡所批評的重點並不是邀請日本「右翼」政客石原來台，而是邀他來台會「刺激中共」、「兩岸緊張」。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為什麼「黎文」的作者會把李登輝政權之前的兩蔣政權視為「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竟更加清楚了。在「黎文」作者的心目中，兩蔣政權的性質與「解放」前的中國相同或相去不遠（只差了一個「權威式」這個形容詞），一直到搞「民粹主義台獨」的李登輝掌權之後，台灣的社會才與中國社會性質說再見了。由此可見，「統獨」這條分界線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黎文」作者的判斷，如何影響了他的「宏觀分析」！

這也就難怪「黎文」的作者對於李登輝政權的批評還有其他令人費解的部分了。

作者用「把民粹主義以及極右政策推行得如此出色的人」來形容李登輝，還用「惡性資本主義與民粹主義」來描述李登輝政權。姑且不論作者所說的「民粹主義」是什麼意思，那是「黎文」作者的工作；但是，「惡性資本主義」又是什麼？（反過來問，「良性」的資本主義是什麼？）再者，李登輝推行的政策是「極右」政策嗎？所謂「極右」，指的是法西斯黨、納粹黨之流，這跟李登輝的政策有何相似？這些熱情洋溢的批評文字所呈現出來的，沒有任何一點點「左翼」、「宏觀分析」的影子，倒比較像是台灣選戰中常見的黑函語法。

在「黎文」的最後一節〈台灣當前左翼運動的主要問題〉，作者認為的「主要問題」是「主要的因素在於台灣左翼的主觀條件不成熟」。這一點其實近似於「常識」，我們也同意；而最後作者因此認為現在台灣左翼「在面對著台灣激烈社會變遷的機會與責任下，在面臨社會主義實踐重大挫折的挑戰下，更需要以積極的態度，結合台灣社會運動的具體條件，致力於隊伍的建設。」這也是我們同意的；誰會反對呢？

然而，正因為「主觀條件不成熟」、需要「致力於隊伍的建設」，所以我們不願意和稀泥。若對於重大的問題隨隨便便，得過且過，只會使「隊伍」沒有明確的方向，那就更加無法突破「主觀條件不成熟」的困境。我們並不認為「台灣社會性質」、「某政權性質」等重要問題的答案，已經安穩地放在我們自己的口袋裡；恰恰相反地，確實的理論研究、考察，還有討論，才有機會使我們抓住解答的方向。因此，我們熱切地提出了我們所認為的關鍵問題，向前輩請教。★

警察先生！你站在哪一邊？

劉欣恆·鍾瀚慧

透夜趕路隨著宏總新坪生活公園的朋友們，千里迢迢自台中趕至高雄，這一趟路，除了哀悼死去的親人、鄰居，更爲了向不義的建商討回一個公道。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如同「一〇〇九夜宿總統府行動」的當晚，當我們走到宏總公司的樓下時，迎接我們的又再度是拿著盾牌、警棍、隨時準備驅散我們的警察們。

「警察」是國家的公器、「警察」更是國家公權力的象徵。當我們看到成排的警察爲了所謂「維護社會秩序」這個理由站在我們的面前時，我們所痛心的不只是單單這

樣的表象，而是更深層引發的當人民發生這樣的災禍時，政府到底站在哪裡的疑惑。

在人民歷經了九二一這場慘痛的苦難後，政府做的不是去反省思索如何落實善後重建的工作，反而「竭盡所能」的打壓災民，分化災民的團結力量；政府不是去鼓勵大家不分團體、不分個人、不分受災戶與否，都要團結一致，合力重建家園，反而控訴「受災戶聯盟」被「外力」介入。請問，所謂「外力」是什麼？事實上，1009活動中真正的「外力」，不是1009當天晚上，看到災民肚子餓了沒飯吃，趕緊送上便當的中華電信工會，不是從各地趕來參與活動的各團體；而是在那天活動中，從頭到尾壓制災民進入凱達格蘭大道，以盾牌、警棍和蛇籠「對待」災民的大批鎮暴警察！這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政府啊！只會在選舉前講「人民是頭家」；只會在平時與財團勾結圖利；只會災後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支票；只會覺得自己做得還不錯，不知反省；只會濫用國家的鎮暴警察，用何等粗暴的方式對付只是想說出自己需要什麼的災民！

我們當然不擔心、也不害怕、更是無所畏懼的站出來，畢竟在這件事上我們是理性的、是受害的一方。每一張照片都充分說明了--失去我們的家園是人禍將天災擴大化、是偷工減料的結果。但是，我們也是弱勢的一群人，沒有雄厚的資產，更沒有什麼政治背景，當我們這樣的小市民，要對抗這樣的惡建商的時候，我們更是需要政府的積極協助、以及保護。而一個真正屬於人民的警察，乃至於政府，更是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一同向不義宣戰。★

後記：這篇文章完稿於十月，但是我們的行動依然沒有終止，正如同壓迫一直持續在進行中一樣。越來越覺得九二一大地震給了台灣人民一個很慘痛的教訓，清楚的告訴我們這個社會是個怎樣的社會、這個政府是站在誰的利益上在發言。政府口惠不實的政策，更是混淆了每一個非災區、非災民勞動者的視聽。房子因為偷工減料與官商勾結而倒了，失去的除了是生命中重要的生活資料，更是以一、二十年的青春、歲月、血汗換來的果實。但是除了十萬、二十萬的慰助金，災民又真的拿到了什麼？「概括承受」在銀行團的壓力下，形如空中樓閣，可望不可及。貸款展延五年的結果，是讓原本200多萬的貸款，在五年後變成300萬。九二一的震災，除了空了國庫、傷了災民、以及奪取更多受薪大眾的血汗之外(我們不可忘記，以工代賑的經費，也是來自於受薪大眾)，對於吸血的銀行團、對於不義的建商，政府又拿出什麼樣的魄力？我們不是乞討、正如同我們所受的苦難是人禍遠大於天災，我們是要求償、正是要討回失去的正義。災民正在替台灣社會受苦，面對這樣不義的政府，我們除了團結起來與它抗爭外，還能怎麼辦？

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胡德夫 致

李遠哲先生的公開信

天寒地凍背靠土石流 原住民家庭何去何從

遠哲先生：您好！

天氣轉冷，中部山區連飄了幾天細雨，中原口土石流下百餘戶原住民家庭命在夕。您是否還記得 11 月 28 日全盟連繫會報上您的發言？「我們絕對不會漠視災區原住民」。一個月快過了，我們要為土石流下的原住民同胞再度向您請命。

921 大地震後，原權會部落工作隊一行 13 人進入仁愛鄉互助村駐點設站，進行原住民災區的賑災與重建協助工作。10 月初，本隊調查發現，在互助村中原口 300 公尺高的山壁後方，地震震開了一條長達 400 公尺的大裂縫。此發現並已經國立成功大學防災中心與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三度會勘，皆判定為：基於安全考量，應立即遷村！

這樣潛藏的土石流危機有多嚴重？每一位勘驗過的專家都一致認為：只要一場豪雨，數十萬噸土石即將傾瀉而下。而山壁的正下方，住著 40 戶原住民家庭，週邊尚有 70 戶。本隊曾為這些土石流災戶四處奔走請命，甚至向連戰副總統攔路請願，但兩個月過去了，音訊全無，似乎，全台灣都在等待另一場「銅門村埋村事件」的發生。可笑的是，這些即將失去所有生命財產的原住民家庭，他們甚至不是政府法定的災民。中央政府頒布的賑災與重建的辦法中，符合災民的身份只有三種：全倒、半倒與死亡。至於即將失去生命財產的原住民，那就等發生再說了！

今天報載：「寒流來襲，副總統連戰總部提前歡度耶誕夜，妙齡女郎勁歌熱舞，氣氛熱呼呼，立法院長王金平扮演聖誕老公公，情緒 high 到最高點！」。在這樣歌舞昇平的畫面背後，台灣的主人「原住民」正用自己的身體頂住土石流，向祖靈祈求：「不要下雨！」。這是多麼諷刺的兩幅畫面！

12 月 24 日，平安夜。部落工作隊將陪同原住民災區同胞進台北城，我們要將災區的不平安傳播到全台北市，我們要告訴全世界：

台灣政府欺騙原住民！

基於對您的尊敬與信賴，我們謹邀請您，在千禧年前的平安夜，陪伴災區原住民同胞走遍台北市。

人禍！遠大於天災

災盟一二二九「百日行動」說明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至今才不到三個月，整個台灣社會已經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包括媒體、輿論、司法界與政治界，越來越把九二一當成是純粹的天災。

整個社會似已淡忘，許多災民的屋舍之所以會倒，是肇因於人禍。是人禍多於天災。

如果不是建商財團的設計與施工不良，如果不是偷工減料，我們的家園不會毀於一夕。建商財團，是我們要控訴的第一種人禍！

一棟房子，從申請建照到核發使用執照，政府官僚要蓋數百顆章，如果不是政府監督不力，如果不是官商勾結，又怎麼會讓我們誤上賊船買錯房子？至於災後應變不力、重建進度遙不可及，這更是政府的責任。政府官僚，是我們要控訴的第二種人禍！

十二月廿九日，是九二一的百日紀念，全體災民應該團結起來，讓我們一起到台北，對全國同胞發出最沉痛的怒吼！

災盟百日行動訴求

- 一・控訴人禍：建商財團與政府官僚是人禍之首惡，應該認錯，並負起完全之責任。
- 二・還我家園：因為人禍因素而失去家園的受災戶，無論半倒戶或全倒戶，我們要求「代位求償」與「國家賠償」。
- 三・社會互助：原住民與一般受災戶，政府應採風險分擔之方式，支援經費與物資，協助其重建家園。
- 四・加速重建：政府應加速擬定能夠有效施行之政策細節，協助受災戶原地重建或易地重建。

百日行動行程：十二月廿九日（周三）

06：30，自各地災區出發。

09：30，在台北中正紀念堂集合。

10：00，至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

13：30，各社區代表團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等中央政府機構請願與談判。

19：00，假中正紀念堂舉辦九二一震災「百日祭」儀式。

21：00，行動結束，返家。

編輯報告

《左翼》出刊後，立刻引起許多人的關注，因為在台灣從來沒有人敢公然地以左翼的旗幟對外示眾，我們深知我們所代表的意義與象徵。這一段時間，左翼編輯部收到了近百封的來函，其中有鼓勵的、支持的、詢問的、索閱的，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大家對《左翼》的期望。我們會繼續努力，不讓關心《左翼》的讀者失望。希望呈現在各位面前的《左翼》第二期，大家還覺得滿意。

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所遭到的挫敗是這個月的輿論焦點，為此我們特別組織了一組反WTO的文章：蔡建仁的〈接聽西雅圖前哨戰的鈺鼓〉對西雅圖會議的過程與爭論內容做了詳細的分析，他並進一步指出在WTO的挑戰下，左翼應該如何積極提出應對之策。金寶瑜親自參與了西雅圖的抗爭活動，她的〈在西雅圖舉行的一次反世界貿易組織的人民會議〉一文，對西雅圖會場的抗議運動及她所參與的「人民議會」組織都有很深入的介紹。WTO的影響是深遠的，而各國的反對聲浪也很強大，但徐拒耘的〈WTO與電影〉卻告訴我們，當各國都反對WTO將電影這樣的文化產業也納入開放行列時，我國的新聞局電影處竟然走在世界潮流之前，率先取消對本國電影的所有保護措施，放任好萊塢的電影入侵，喪權辱國莫此為甚。上(十一)月下旬，中美雙方就世貿談判達成了協議，這項協議是如何達成的？它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為此，我們特別轉載狄蔭清〈中美世貿協議述評〉，該文對這些議題都有非常深入的分析。

何謂左翼？這是《左翼》出刊後許多人都提出來的問題，我們特別委請曾經留學法國的俞向南針對這一議題，進行深入分析，他在〈左翼的起源〉中指出：左翼是進步的代表。當台灣的政治明星旋風式的前往英國大倡新中間路線時，留德歸來的黃榮明卻提出台灣〈沒有左派，哪來新中間路線？〉的質疑；正在倫敦研究的施威全更尖銳的指出〈第三條路的挫敗〉。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國外左翼運動的經驗對於我們是非常珍貴的，因此我們特開闢【國際連結】專欄，介紹國際間的左翼運動，首先就由目前旅居韓國的臧汝興為我們介紹〈韓國左翼運動的政治展望〉。

近來，我們欣見一些年輕學生主辦的進步刊物出現，其中由政大、世新學生創辦的「亞太勞動快訊社」已經成立一年了，他們所發行的刊物《亞洲勞動快訊》，也已出版了六期，但最近他們卻做出停止出刊的決定，快訊社在〈快訊為何要創刊，又為何休刊〉中，談到了他們當初創辦刊物的原因及學生創辦刊物所面臨的種種困難。與此同時，另外一份由一群具有運動經驗的學生創辦的《連結》也於近日出版了第一期，連結雜誌社針對《左翼》第一期中黎建江的文章〈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提出了「幾點意見」。黎建江的文章涉及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台灣社會運動的共同敵人是誰？二是如何看待與分析當前台灣的社會性質？我們希望在《左翼》的論壇上，能夠繼續開展這方面的討論。

台灣的文化界一直缺乏來自左翼角度的書評，馮建三為我們撰寫了第一篇左翼的書評，建立左翼自己的論述與評論，將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地震結束未滿百日，但台灣社會卻已在設法將災區忘掉，因此《左翼》將持續不斷的報導來自災區的聲音，以喚醒社會的注意，直到災民的問題得到根本的解決。《左翼》第二期共有三篇有關災區的文章：原權會部落工作隊的胡德夫發表了一封致李遠哲先生的公開信，沉痛地呼籲社會正視仁愛鄉互助村中〈天寒地凍背靠土石流，原住民家庭何去何從〉的問題。目前在災盟秘書處擔任義工的東海大學學生劉欣恆、鍾瀚慧，在協助災民進行爭取權益的活動時，發現警察總是以鎮暴者的姿態出現在災民面前，因而質問〈警察先生！你站在那一邊？〉同時，我們登載了災盟12月29日百日行動的文宣，它告訴我們：〈人禍！遠大於天災〉。

《左翼》第二期的內容要比第一期更為豐富了，因為有越來越多的同志投入為左翼發聲的行列。我們希望能有更多朋友加入我們的陣營，特別是目前尚未在《左翼》現聲的女性主義及環保運動的左翼同志。我們期盼您的加入！

左翼 第二號

出版日期：1999年12月27日

通訊地址：234永和郵政549號信箱

初版三刷：2000年12月31日

E-Mail:twleft@sina.com.tw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三號

【保衛自主工會】簡評中華電信自主工會敗選	王醒之 / 1
工會運動與民主政治發展 座談會	編輯部 / 5
張緒中談電信工會改選	黃德北 / 13
當代左翼 林深靖 / 18	全球化的世紀回顧 林孝信 / 21
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看藍色條款和綠色條款	金寶瑜 / 23
共同體內部的排除構造 王墨林 / 29	階級與婦運 成令方 / 31
【爭鳴與求是】可議的提問 梁三 / 33	左的「幻視」 官土生 / 35
【左翼書評】介紹《噤聲的河流》一書	陳秀春 / 39

簡評中華電信自主工會敗選

王醒之

千禧年前夕，中華電信自主工會的敗選震驚了全台灣工運界。大罵國民黨介入者有之、直指資方行政打壓、黑函抹黑者有之、痛陳勞方分裂者有之、憂心台灣工運將自此沈寂者亦有之。然而，電信自主工會的敗選，倘若只停留在這種選舉策略或迅速抽高談台灣工運興衰的層次上理解，勢將無法為台灣的國營事業工會乃至反私有化運動帶來一個階段性的經驗總結；即便石油工會在繼電信自主工會敗選後仍由黃清賢所代表的勞方連線取得政權，台灣的反私有化運動恐將依舊停滯在現有的格局中打轉。筆者並無能力指出反私有化運動下個階段的運動目標，僅能從基層

組織工作者（現任中華電信工會台北第三分會秘書）的實務經驗出發評析電信自主工會的敗選，或可引發更深入的批判與討論。

電信自主工會為什麼會敗選？

電信自主工會的敗選，如果要歸因到國民黨介入、事業單位行政打壓、資方派黑函抹黑或勞方無法整合等因素都不為過，但勞方恐怕得要先認真自問幾個問題才能真正走出自欺自憐：一、三年前，電信自主工會一樣也是在這些外在壓力之下讓中華電信工會變天，為何執政三年後不行？二、電信工會只要有選舉，黨、資介入與黑函抹黑就會理所當然地存在，但為什麼會有效？三、勞方執政三年後，基層電信員工到底在盤算些什麼？廣大的國營事業勞工又在想些什麼？四、勞方派系間的無法整合，反映出的究竟只是權力資源的分配問題、是工會經營的理念問題、還是反私有化的路線問題？

這是一場電信員工「贊成民營化 VS 反對民營化」的公投聖戰？

中華電信工會這一場的改選，有一個耐人尋味的基調，就是「二分法」。小從選舉辦法的變更（按：電信工會過去的改選皆採一人一票的「單記法」，但此次改為「全額連記法」。「全額連記法」在選舉過程中所造成的效果是一翻兩瞪眼的，不是全贏，就是全輸），大至對電信民營化的立場皆是如此：不是支持勞方就是支持資方、不是反對國民黨就是認同國民黨、不是反對民營化就是贊成民營化；而認同勞方就等於「工作權益的保障」、支持資方的又跟「認同事業單位經營理念」劃上等號。也因此，在勞資雙方的口中，這場工會選舉也成為電信員工「贊成民營化 VS 反對民營化」的公投聖戰。但是，基層群眾的狀態果真如此嗎？這樣的選舉策略教育或組織了多少人？勞方的勝選能代表著電信員工反民營化路線的正確而資方勝選的結果意味著大多數的電信員工「贊成民營化」嗎？恐怕不是。

就基層員工而言，對於中華電信的民營化的確是充滿著工作權喪失與勞動條件下降的疑懼。但這疑懼背後利益盤算的複雜度是遠遠超過非黑即白二分法的粗糙。電信自主工會這種選舉策略固然反映了勞方連任的企圖心與自信，但同時也迫使電信員工在工會未深入面對會員各種利害糾結前就必須在勞資雙方的對立之間做出選擇。

「工會害大家損失了一百萬？」-- 資方黑函為什麼會奏效？

以去（88）年四月下旬的抗爭為例，電信自主工會分別於二十六、二十九兩日排除萬難，動員出一萬人次，在立法院外的抗爭，以「反對賤賣國產」為訴求、並要求

交通委員會刪除「中華電信釋股預算」。這次抗爭的結果，不但被交通部長林豐正要了一記，股價預算由每股四十元調整為每股六十元（表面上是妥協於工會與立法委員「反對賤賣國產」、「圖利特定財團」的訴求，實則為國民黨補足了前一天在財政委員會遭在野黨刪除的預算差額），但相對也讓資方大作文章，聲稱：因為工會的抗爭，讓電信員工將來在「員工認股」時每股要多支出二十元的差價，合計約一百萬元！姑且不論基層電信員工其實無法真正認購五十張電信股票，也不論釋股價格不等於員工認股價格，但這些黑函的確讓工會幹部疲於奔命，也讓參與抗爭的工會會員無言以對。

而黑函之所以奏效，反映出的現象是基層員工在民營化浪潮中經驗到的不只是「反民營化、反電信釋股=工作權保衛戰=支持勞方連任」的簡單的行動邏輯，而是同時夾纏在「釋股後的差價利得」、「年資結算金」、「如何積累創造事業第二春的資本」、「如何在民營化前領取月退休俸」等幾層利害之間周旋。簡而言之，當電信自主工會無法面對這種複雜，一切「抗議資方行政打壓（工會幹部）」、「反對國民黨介入」的告急與宣傳，都不會在群眾的經驗世界裡，也將只會淪為道德性的訴求，而工會非黑即白的二分法也只會是勞方嫉惡如仇和資方或國民黨的對決中與會員利益脫節。這個問題同樣也發生在電信自主工會從「堅決反對民營化」到「有條件的反對民營化」的立場調整過程裡。員工無所適從、工會交代不夠清楚，也給了資方派分化的空間。

在集中對抗國民黨與資方的策略裡，群眾學習到了什麼？

中華電信長久以來因其為國營事業的特殊性，不論是個人利益到集體訴求，「立委迷信」大多是深植於一般電信員工心中。再以去年四月二十六、二十九日要求刪除中華電信釋股預算的抗爭為例，在二十六日的交通委員會中，在野黨並非沒有機會以人數優勢翻案，但卻同意將討論延至二十九日，並搖身一變成爲捍衛國產、反對財團的清流！如果說國民黨是主嫌，那麼民、新兩黨就是幫兇！而基層會員在工會幹部落髮明志的過程中、在集體的口號抗議聲中對三黨的認識增加了多少？如果說國民黨是爲其政黨利益不顧電信員工十萬選票的實力，那麼民、新兩黨充其量不過是爲了電信員工選票合演了一場好戲！這一點沒戳破，任何對基層會員的政治教育都是虛幻的！畢竟，對三黨立委而言，只要能演戲，資方勞方沒什麼分別。

再回到電信工會選舉，同樣的結構也在複製著。在會員的世界裡，過去幾波動員議題的正當性加上對工會領導人「勞方執政、品質保證」的深刻印象，再重之以三黨立法委員每每以公聽會或協調會的方式爲工會背書，部份電信員工對勞方的支持便成了「一張選票、一份保障」的「買保險」式的投票行爲（民營化是擋不住了，支持勞

方或許他們還能多爭點好處)。但這種支持同時會回到「資方打壓、國民黨介入=總統大選為連戰佈樁」的邏輯中，就又再次間接讓在野的政治勢力賺了電信員工的選票。未來不論誰當選，民營化的進程都不會變，員工的政治認識也沒變。賠了夫人又折兵。

工會社會化，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電信工會自勞方執政以來，其「工會社會化」的政策有其進步性且值得肯定。即使三年以來從教育改革運動、司法改革運動、社會民主運動到九二一震災的幾此重大遊行中在工會內部持續有所爭議，但工會領導幹部皆力排眾議進行動員，同時也廣受社運界好評。然而，令人覺得納悶的是，何以去年四月二十六、二十九日要求刪除中華電信釋股預算、電信工會的關鍵性戰役中，未持續引發社會輿論的討論或消費者的關注？何以在這場尖銳、短兵相接的鬥爭中除了少數工運/會團體聲援外也未見民間社運團體的回應？顯然地，作為台灣工會運動的龍頭，過去的組織動員與資源提供除了招致電信員工內部諸如「利用工會資源做公關」或「工會領導人的政治積累」等的種種批評外，並沒有換來反私有化運動力量的集結。

筆者以為，電信自主工會的「工會社會化」面對民營工人與其他社運團體、社會消費大眾這兩個團結的對象，似乎仍無法破除「既得利益者」、「民營化=企業化」等形象、也無足夠的條件解析「電信市場開放的初期競爭帶來更便利的服務」等表象；而從其他國營事業勞工的反應也更凸顯近幾年由國營事業工會所主導的反私有化運動其個別化與孤立化的格局。這在反私有化議題被抽離出由國營事業工會所催生的全國產業總工會、另行成立公營事業工會大聯盟的例子中更顯而易見。

歸根究柢，這場「所有制的戰爭」，若沒看到與民營工人的關係、若沒將國營事業勞工的短期利益過度、結合到全民、弱勢的利益，國營事業工會所有的「工會社會化」都將只是為「社運大團結」這個美好圖像記上一筆宣傳的功勞。而我們也期待，台灣下一階段的反私有化運動除了寄望石油工會之外，全國產業總工會應更深入地捲動民營工人的利益，共同挑起這份重擔。★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twleft@sina.com.tw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渡北

工會運動與民主政治發展 座談會

時 間：2000年1月11日 19:00-22:30

地 點：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

主 持 人：黃德北 政大政治系副教授

座談人士：王醒之 工委會、中華電信北三分會秘書

邱毓彬 中華電信工會總會秘書

張樹榮 台灣石油工會常務理事、主任秘書

黃長玲 政大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陳信行 世新社發所助理教授

楊偉中 全國產業總工會執行秘書

劉 庸 台北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

紀 錄：倪世傑

黃德北：

各位關心台灣勞工運動的朋友，大家好。非常歡迎大家出席由左翼編輯部舉辦的座談會。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勞工運動最近正面臨空前的低潮，執政黨與資方正全面介入各國營自主工會的選舉，電信工會在日前的選舉中，資方基本上已經取得了主導權。此舉對於我國工運的發展勢將有非常不利的影響，即使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工會運動也與民主政治發展有著密切關係，一個國家的工會運動如果受到嚴重打壓，它的政治發展也必將出現畸形的發展。因此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一些關心台灣工運的學者與工運組織者齊聚一堂，相互交換意見，並且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活動，喚起社會重視執政黨所進行的惡形。

邱毓彬：

國民黨十分細緻的介入這一次電信工會改選，單位主管不僅輔選，在投票的時候，經理甚至就站在投票箱旁監票，而之前黑函更是滿天飛，如果這次沒有國民黨強力打壓，我想勞方這一邊是會贏的。

除了國民黨打壓外，根據自己的觀察，還有兩方面是敗選的原因。第一，勞教沒有做好，沒有幹部紮實的經營選區；第二，是勞方自己分裂造成，一些打著勞方旗幟出來競選的人之前都沒有相互協調，雖然高雄分會的十席勞方全勝，但是台北和台中共二十二席一席也沒拿到，而支持勞方的總票數大約為 16500 票，較之於支持資方的 15500 票還多了一千多票。這是一場團結的資方面對分裂的勞方的選戰。

陳信行：

我們今天應該把工會運動的重要性說出來，工會運動它不只是說我們工人爭取利益這樣的運動，它是民主運動的正宗。

台灣的自主工運興起與黨外民主運動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在這過程中，許多工會的幹部也漸漸學到掌握這些黨外民主運動的頭人是靠不住的，不管是勞陣還是工委會或是其他工運的力量都對當前的政黨採取批判的態度。大家都很清楚，過去二、三十年的民主運動爭的都是資產階級的形式民主，爭法律和主導的意識形態告訴我們應有的東西，幾乎世界各國工運的發展都是這個樣子。台灣的自主工會運動一路走來，主要在爭取落實〈勞基法〉、〈工會法〉這些原來已經有的法令，工人反而處於執法者的角色，率先違法的是資方，幫助違法的是官方，直到現在並不是所有工人都能享受勞基法的保障。但歸根到底〈勞基法〉是對資方有利的法律體制，幫助資方能夠精確估算勞動力市場的成本。法律本身應該也是勞工要去挑戰的東西。

拿選舉總統來說，我們四年才有一次機會作頭家，其他的時候都是在做總統底下的草民。對選舉的質疑並不只是工運的特色，其他社會上溫和的改革的聲音也可以聽得到，譬如說社區總體營造，但若仔細去看在這些懷舊的言語底下，雖然強調社會日常生活也要民主，但是問題在於你能控制的只是下班之後的十六小時，這十六小時是公民，上班的八小時仍是老闆的奴隸。因此工運必須要將民主的價值推到最核心的部份，也就是工作場所。

我在美國的時候和紐約當地一位地鐵工會朋友聊到台灣工運的狀況，其中有趣的一點是台灣工運英雄特別多，在團體間個人之間的衝突也常常被放得很大。台灣初期起來的工運幹部，普遍是男性、小有資產、不怕被老闆開除，因為即使被開除回家還可以吃自己的，等到抗爭激烈的時候那些除薪水外一無所有的人才會跳出來。我那個美國朋友一聽就說這帶有「小資產階級性格」，他指出這些小有資產的男性工會幹部的世界觀強調自己的能力與身為工人的尊嚴，這種人對工會、對工作個人主觀性很強，在這種情況下，工人常會為了虛名而來爭是由誰當代表，我們不難發現，這和一般民主選舉運動中個人爭權位的情況很類似，都是強調個人。工會的選舉，個人的事小，集體選贏才是重點。

張樹榮：

石油工會從今天開始到十九號展開大代表的改選，剛剛得到的消息是高雄分會卅六席由勞方全拿，未來的幾天全省各分會將陸續改選。與中華電信工會相較，石油工會有十二年的歷史，勞教徹底，黃清賢(編按，石油工會理事長)經驗夠，把選期定為一週，我想這次中華電信工會的選舉失敗在於策略錯誤，你們選區範圍這麼廣，三萬五千人排在兩天之內選完，與石油工會相較，電信工會粉領普遍較多，女性員工通常服從性高，投票時經理就站在票箱旁邊，教她票怎麼投下去？另外三萬五千人排在兩天內選，也給國民黨充裕的運作空間。

石油工會的一些選區，像是加油站的部份，採取「現投現開」的方式，一個加油站不過五、六個人，資方只要派人出來，勞方就不敢出來選了。如果出來選資方要做職務調動就慘了，像在台中，本來在潭子，調你到梨山，或是在台東，南北一調一百多公里。因此工會主張「流動票箱、定點開票」，延長選舉期間，勞方有足夠的時間與人力監票，就不怕資方動手腳。假如中華電信工會這次能掌握證據的話，應該宣佈選舉無效。

王醒之：

一進來聽到石油工會第一分會大勝實在挺讓人興奮的，同時也正在想另一個問題：台灣反私有化運動一路走來究竟可以總結出什麼樣的經驗？同樣是由勞方執政的工會，為什麼改選的結果差距這麼大，反民營化運動走了這麼多年，二、三十萬國營事業員工心理在想什麼東西？。為什麼黑函會起作用？為什麼員工會相信這些黑函，或被迫向行政壓力介入妥協？就像信行之前講的，若以勞工運動為基礎，台灣未來的民主運動該怎麼走？我長久以來在第一線工作，唯有把這些問題釐清了，才有辦法再往上想台灣反私有化的運動要何去何從。

分會面對基層員工存在許多困擾。像資方放的黑函中所稱，員工在去年四月到立法院就釋股問題進行抗爭，使得中華電信股價一股由原來的四十元調為六十元，每個員工平白損失一百萬(編按：依黑函所指，一股多了二十元，員工如可認購五十張股票，將多花費一百萬元)，這使得工會地方幹部面對基層會員的質疑根本無從說起。中華電信股價調高真的員工抗議造成的嗎？當然不是，事實上是被林豐正賣了。當中的落差是為什麼勞方的幹部無法有機會向基層會員說明，而讓資方的黑函奏效。我必須說，中華電信工會這幾年勞教雖多，但不夠紮實，總會和分會都是一樣，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電信工會這幾年，議題動員雖有正當性，但對基層會員而言卻產生非常大的落差，也就是上層和基層思考的脫節，特別是去年四月的抗爭，使得當時出來抗爭的員工無法面對沒有出來的員工，尤其是被林豐正出賣的事實，沒有清楚的向員工交代，反而讓工人認為工會抗爭錯了。地方幹部為了頭銜無法整合，也是這次敗選很重要的因素。

在反私有化過程中，我們是否可以提出一個更大的訴求，能夠把更多數的人整合進來？在過去中華電信工會曾經推出一個方案是我們分會覺得好用且能與分會結合的，那就是「全民無償配股」、「員工面額認購」、「中華電信維持國營」。這是可以和員工利害繫在一起的，但是後來為何沒推了我不清楚，往後我們都發現政策不斷在轉變，但分會都不大瞭解轉變的過程。

三年前電信工會由勞方執政以來堅決反對民營化，但是朝野三黨加上行政中央從大力推動民營化，到有條件的推動民營化，這當中其實是有轉折的，會員在其中看不清楚到底基於勞方執政的立場該如何看待民營化。我覺得當路線轉換不清楚的時候，員工無所適從，幹部說不清楚，反而給予資方派打擊的機會。

工會原來說這次改選是反對或贊成民營化的公投，但是這次改選輸了，難道能說這是員工贊成民營化嗎？恐怕也不是。工會和資方在這次改選中都建構了一個模式：不是勞就是資、不是贊成就是反對民營化，不是贊成就是反對國民黨。在這過程中員工被切成兩塊，但實際上人有許多細緻複雜的盤算，員工在沒有被教育清楚而是用這種切割的方式在面對時，我不應該說輸是理所當然，應該說輸了其實並不意外，員工的狀態其實是比這個政策要複雜得多。

王醒之：

在反私有化的過程中每個實務經驗都應該被檢討，基層幹部要整合，這次改選中不管是總會還是北三分會，勞方的力量都無法整合。為何無法整合？我覺得這來自於經營路線、理念，或者講白了，資源分配不公，這都會發生問題。這些經驗應該拿出來整理，幫助石油工會勞方繼續獲勝，而不是上升到說國民黨、資方介入造成敗選，我想這樣的總結快速了一點。

黃長玲：

就歷史來看，總工會是先於或是晚於勞工政黨成立，對工會的性格或國家政治的生態都會有明顯的影響。美國組織性勞工的發展先於勞工性政黨的出現，於今立國兩百年了，甚至沒有一個勞工政黨。歐洲國家勞工或社會主義政黨出現得比總工會早，傾向實行社會民主得機會比較高。我想這扣連到台灣發展的經驗來看，是否可以進行一些猜測這個議題，這和工會民主和整個民主化議題有一些關連。

我想關心台灣工運發展的朋友，面對中華電信工會選輸的事實，都會分享到挫折的感受。西方人常講一句話：我們是輸掉一場戰役，還是失掉整場戰爭。我想戰爭還很長，這只是失掉一場戰役。資方現在掌握比較多的工會代表，在這種狀況下它的自由度不可能像以前那麼大，過去三年來電信工會所發展的議題與所作的勞教，對今天新選上親資方的代表而言不可能沒有制約效果，第一線的工作人員是否可以整理出什麼東西是資方代表不可能輕易改變的，什麼東西是它們掌握到權力之後可以一夜之間

改變的。這裡頭牽涉到說三年後勞方還要捲土重來，在這三年準備期中去推測資方的代表會做出什麼動作，會受限於過去這三年以勞方爲主的代表已經做出成績的部份是哪些東西。

九〇年代以來全球性工運退潮，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勞資政三邊談判的機制解體，很多左翼學者指出這是在全球資本主義秩序重整的過程中我們會看到的現象。在這一波全球化的風潮下，電信業所受的衝擊最大，坦白說在全球化的潮流下電信業反對民營化的困難度是高於石油業的。石油業因涉及國家整體能源政策，因此國家處理起來較爲謹慎。電信工會所對抗的可以說是世界級的財團，不要說自主的工會對抗起來不容易，就是政府對抗起來也相當困難。我並不是說全球化的浪潮是擋不住的，國家在規範市場經濟上的角色，右翼或自由派主張解除管制；左翼則認爲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不去規範經濟活動，問題不在解除管制，而是國家如何再管制。放在細部來看我想應該再思考的是說，在這一波全球性民營化的浪潮下，我們希望對政府提出什麼樣的要求，使得重新規範市場行爲的現象可以再出現。

楊偉中：

把問題擴大到工人運動層面來看，我發現在反私有化的訴求中，出現一些特別怪異的現象。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中華電信的勞教手冊，封面上的標題是「自由化優於民營化」，如果我們都知道說自由化、民營化背後是新自由主義思想，那「自由化優於民營化」是什麼意思。我當然知道公營企業員工面臨現實的危機很難提出反民營化，韓國的電信工會也不敢這樣提，他們也想到向民營化妥協的可能性。向現實妥協是一回事，但這個標題事實上對工人運動起了混淆的作用。我覺得這樣的例子並不限於電信工會，都應該拿出來檢討。

剛剛提到台灣這幾年的工人運動主要是國營工會在主導，我想這只是一個短暫的現象。拉回十幾年前來看看台灣第一波的工會幹部全都是民營企業的幹部，像是遠化工會、顏坤泉、曾茂興、以及在座的劉庸。國營工會中除了石油工會比較早，其他都是這一波反民營化出來的。有什麼結構上的限制讓民營工會今天不敢動起來？從全產總的內部生態來看，國營事業和民營事業差不多，再跨出去看國營事業員工十幾萬人，在全台灣所有工會來說也不是多數，再算到台灣九百萬勞工來看只能算少數，如果我們把焦點擺在這裡來看真的有問題。另一方面，國營企業內部派系的複雜性遠遠高於民營企業工會，電信和石油工會雖然最進步、最有戰鬥力，但還有許多國營企業工會像是台鹽、中興紙業是無力抵擋的；也有工會動員力很強但它不反對民營化，那我們要如何去看這些狀況？

今天應該看有哪些結構性的限制使民營企業工會無法動起來，站在全產總的角度，翻修〈工會法〉成爲當務之急。韓國民主勞總最近的鬥爭目標在於改變其工會

體制，以前是廠場工會，現在是要走向產業別的工會。今天台灣工會侷限在廠場中使它沒有力量去對抗其資方，去民營工會辦勞教面臨的是勞工請不到假的問題，不打破這個問題工運根本走不出去。除此之外台灣勞工尚存在「企業意識」，比如說亞泥的工人想像台泥的工人為其競爭對手，這樣被分割化的根本不是工人運動，應該在制度上打破這個東西才有辦法走下去。工會不怕有派系，就怕派系沒有意識形態。

劉庸：

電信工會真的花了很多時間作勞教，只是會員與工會之間的認知真的存在許多落差。面對外力的威脅與利誘，工會幹部該如何自處？概括說來，工會幹部猶要認清自己的力量從何而來。台灣工人一直沒有機會面對這樣的教育與反省。

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我跟他並不熟，他真的讓「工會社會化」。之前我所看到的國營工會都只在為自己的利益打拼，「工會社會化」影響了許多其他國營企業工會，這是國民黨所不能忍受的。

剛剛談到勞方的意見不能整合，我想說不只是國營工會、就是民營工會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工會幹部如何以工運為重，而不是以工會運動為重，我想台灣最糟糕的就是花太多精神去搞工會運動、組織運動，而不是工人運動。電信工會這次改選結果可能不如預期，但已經影響了其他工會去反省工會不應只關心其內部的事情。但電信工會的幹部似乎過於相信他們所作的是對會員有利的，所以會員應該可以清楚的看到是非與利益的取捨，真的要指責的應該是這個部份。

邱毓彬：

公營事業面對民營化要勝利實在很難，希望在這次鬥爭中，能藉此組織出一些有戰鬥意識的勞工，在反民營化的鬥爭中我覺得這就算勝利了。另一方面關於工運社會化的問題，基本上大家都認為這是正面的，但在幹部內部引起很大的爭議，內部還是有人會認為外面的事不要管太多。

我覺得幹部經過這一段過程是好的，未來在地方經營上會有正面的幫助，至於民營化這樣的題目在未來如何被操作，這部份我比較悲觀且很難期待說退到分會後分會能醞釀出什麼進步的論述。去年四月的鬥爭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挫折，固然是被交通部長耍了，但重點是為什麼會從四十塊到六十塊，這當然不是工會的主張，只不過工會站在一個邏輯說中華電信既然要賣，沒有經過資產重估的過程，四十塊如何訂出來？是否有賤賣國產的嫌疑？以上這段話和中華電信員工一點好處也沒有，這是站在非工人本位所打的訴求，但當交通部用提高股價打我們，這個同時我們沒有看到社會上有任何聲援，電信工會顯得孤立無援，所以在選舉時退到裡面完全針對會員的權益，這時資方又不斷開出移轉民營不裁員、終身雇用的支票，幹部心更慌了。

未來在民營化這個題目下能夠有進一步的論述，或許剛剛黃長玲所說關於管制的

問題未來可能是可以多琢磨的部份。

陳信行：

勞方談理想、談權利，容易贏；若談到錢，則一定輸。當初黨外運動在選舉時談理想有選票，但一到草根組織，像是里長，則一定選輸。這是改革派的特色，掌握了理想，而反動派則掌握了所有的關係、利益。

我不敢說這是好處，只能說這是現實的侷限。工會運動存在一些矛盾。台灣的工人看待工會並不認為那是屬於自己的組織，就像小學生看生產合作社，看成是職工福利會，是社團，工作現場的不滿通常不會集合成理想性的東西，不滿都是從具體利益開始。很難把幾塊幾毛錢的東西上升為理想的、尊嚴的、權利的問題。工運要長遠走下去空氣戰是不夠的，工會選舉選民就是自己的同事，這才是培養草根自主的環境。

王醒之：

我們第一線工作者的窘境，在於缺乏理論和論述的指導繼續往前進，尤其在私有化、自由化方面。台灣的老左派這時都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有一次和阿偉(舒詩偉)提這個問題，他也在想是否可能弄一個像〈China and World〉(中國與世界)的刊物出來。對岸現在同時也在進行國企改革，這對我們來講是什麼意義，對我們來講真的很困擾。

黃德北：

過去以國營事業為主體架起了全產總，現在國民黨與資方不斷反撲，國營企業工會一再淪陷，對全產總未來的發展有何影響？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左翼政黨的情況下就把產業總工會架起來，似乎有朝向美國當年發展的感覺，不知在座各位是否有考慮過先架起左翼政黨？

劉庸：

工人應該要有屬於工人的政黨，但現在應該先思考如何讓工人集結在一塊兒。國民黨現在有計畫的去抓各地產總的主導權，如何讓基層工會更清楚的知道工會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

國民黨無論在勞工、產業、地方黨部對操作工會都有影響力，因此我建議成立新的工會，打破目前的形態。我目前在籌組工業區的工會，未來則朝向行業制的工會，地區性的產總範圍太大，對現在的工會幹部來講是辛苦了些。

楊偉中：

國民黨現在面對各地產總的態度是讓它合法化，並努力收編，這比打壓更可怕，現在去開產總理事會黨部甚至派指導員列席。阿彬說當媒體打壓電信工會時沒有人站

出來反對，我想今天《左翼》辦這個座談會在聲援電信工會，若是一個地方小工會選輸，我想沒有一個人會在意到它。這十幾年來台灣學者變化很大，這次電信工會敗選的意義不亞於十幾年前五二〇事件對農運的意義，但是當年五二〇事件發生的時候一百多名學者聯名出來，今天呢？我認為大部分學者並沒有資格來指導運動。

黃長玲：

社會主義政黨的成立，標誌著一個與「價值」有關的鬥爭，美國工運不是關於「價值」的鬥爭，歐洲國家中，除了愛爾蘭因宗教鬥爭演變為民族矛盾外，左翼的政黨不是第一大黨，就是最大的在野黨。

我想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美國勞聯 - 產聯在 1996 年從斯威尼(Sweeny)上台後，重新走組織工作的道路。事實上，自七〇年代以來，美國工人的實質工資不升反降，這帶給勞聯 - 產聯改革的壓力。從南韓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體制外工會存在的傳統，民主勞總的成立，對大韓勞總也產生了不小的壓力，而台灣的全總中很多幹部早就已經不是工人了。

柳婉玲(國產實業工會秘書)：

台灣工人的企業意識很強，在競爭意識下工人被區隔化的情況十分嚴重，該如何解決？

王醒之：

之前在倉運聯工作，發現在倉運業逐漸衰落的情況下，貨源競爭的問題更形嚴重，當倉運業員工罷工時，請協力廠這時不要進來當「工賊」，實在很難。當勞動條件愈壓愈低之後，被擠壓出去的工人反而有可能朝向組織生產合作社，這也就是廠場工會矛盾轉化的契機。

黃長玲：

台灣部份產業具有地理上的集中性，像是林園的石化業，目前產業之間工會的聯合很有限，或許可以利用地理上的親近性作為產業工會聯合的基礎。瑞典薪資團結(wage solidarity)的政策，由勞資政三方共商全國薪資調整的幅度，一方面可保障勞動人權，另一方面迫使產業升級，並讓工人的生活保障不取決於資本的獲利能力，面對工人之間相互競爭的情況，值得借鏡。

黃德北：

今天的台灣工運存在著運動人士與知識分子的分離，《左翼》希望未來在這中間能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謝謝各位參與今天的座談。 ★

(本座談記錄承蒙王醒之先生的協助，始得順利完成，謹此致謝！)

張緒中談 電信工會改選

黃德北

編按：電信工會改選後，《左翼》編輯部特別委請黃德北教授對張緒中理事長的專訪，以下是訪談摘要：

問：請理事長先簡單介紹一下電信工會發展為「自主工會」的過程？

答：首先，我要說明一下國營工會性質上的差異，經濟部、交通部及財政部所屬的國營企業工會性質都不一樣，經濟部所屬的工會，從解嚴以來即開始自主化；再從資方方面來看，從陳履安以來的歷任部長已經年輕化，所任命的企業首長也都朝年輕與專業化方向發展，且企業開放度較高，對於工會運動也就較能接受，所以是台灣最早取得自主性地位的工會。但交通部所屬的郵電企業首長則大都是由軍方人員退役轉任，因此思考非常保守，對勞工要求成立自主工會的呼聲往往非常排斥且會進行干預與打壓，以郵務工會為例，竟然是由政風高級主管擔任工會理事長。

電信工會的轉變可以追溯至民國七十六年的選舉，當時國民黨提名的吳勇雄（電信工會理事長）及民進黨提名的王聰松與徐美英都當選了立委及國大代表，因此影響了許多人對電信工會的傳統想法，我個人就是在那時候也開始投入工會運動。許多當時與我一同參與工會的人後來都進入了民進黨，他們的加入，可能是形勢的逼迫，使得他們最後都決定加入政黨，尋求支援。從七十六年起，許多具有共同身份的員工紛紛成立各種「聯誼會」，進行抗爭，尋求工會的獨立自主性，當時張曉春教授與勞陣都曾給予我們指導與協助。不過，真正的關鍵是在八十二年，那次工會選舉，總會選舉雖然未取得勝利，但許多各地分會卻已由勞方取得，尤其是都會型分會更是全部由自主勞方這邊取得勝利。到了八十六年就一舉拿下總會的領導權。

不過，八十六年的選舉勝利，主要是因為我們敢具名批判主管官員及公司政策，會員對於這樣一批人的行為感到佩服，才投票支持我們，但嚴格說來會員離勞工意識覺醒與真正的工會自主要求還是有相當一段距離。我們必須承認，電信工會差石油工會還有一段距離，石油工會從康義益取得自主工會以來，已經超過十年了。

問：請理事長說明這次電信工會改選的過程？以及執政黨及資方曾經採取那些手段介入選舉？

答：科技在選舉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三年前我們透過傳真以具名的方式批判資方不合理的作法，當時資方並未意識到新科技的影響。但在這次選舉時，資方已經充分利用這項新的科技，甚至比我們勞方還厲害。幾個月來，資方不斷傳真不屬名、未附任何通訊資料的黑函，抹黑工會。我們的錯誤在於過於自信，我們認為電信員工都是透過國家考試進來的公務人員，受過高等的教育，應該不會相信這些黑函的內容，因此並未積極回應。但我們錯了，事實上積非可以成是，從選舉的結果可以看出來，許多員工還是相信這套抹黑的說法。

另外，這次選舉又面臨總統選舉，國民黨有財政的壓力，因此必須搞全民釋股，這就使它不惜以全力介入這次電信工會選舉，資方透過外面的網路公司日以繼夜的發黑函。各地行政主管都面臨很大的壓力，他們執行這項工作比執行業務還要認真，因為如果執行業務不力，飯碗還不會受影響，但如果輔選不力就會立刻遭到調職的命運。

同時，工會會員的勞工意識還不高，因此他們對於工會的選舉不應該被干預的意識尚未建立。某些抹黑自然就會有效。以這次選舉國民黨最具殺傷力的文宣「股價四十元變六十元」為例，許多會員都很不滿，但大家都沒想過，最後正是國民黨將股價由四十元升到六十元。

這次選舉，除了台北及台中等都會選區外，在其他選區，我們幾乎都是以壓倒性的方式贏得選舉，勞方的總得票也超過資方。如果我們之前能堅持挑戰勞委會的規定，要求直選理事長，我相信我們在理事長選舉上也會獲得勝利。

問：電信工會改選失利，對於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將會產生那些影響？

答：國營事業的工會還是很脆弱的。在現有的政治生態下，國營工會的負責人沒有時間與資源提供給他更寬廣的視野。從內部來看，國營工會的領袖每天光是面對理事會的種種要求就煩不勝煩了，有些理事只熱衷於利益的追逐，光是應付他們就要耗盡許多精力了。國營工會的外部，還有自由化與民營化的壓力，許多企業員工年齡又較大，不易引起社會的同情。在這樣的情況下，工會領袖忙於會務的推動都已困難重重，更別提投身勞工運動了。國民黨早就看到了這項發展趨勢，算準了我們有多少斤兩，所以才敢對我們動手。

因此，工會領袖應該要有膽量進行大刀廓斧的改革，改革現有的工會組織、國營企業的事業體以及各項制度，但現有的工會領袖可能都缺乏這方樣的意願。我自己過去在這方面的努力，事實上也做得還不夠。未來國營工會運動發展，就要看石油

工會是否願意扮演更積極的主導角色。如果黃清賢理事長有這個意願，就應該大量進用會務人員，並且積極走出去，執行這方面的工作。

問：過去幾年？，理事長覺得任內有那些建樹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答：六年前電信工會高雄分會曾提出「工會社會化，關心公共事務」及「產業民主化，參與經營管理」的理想，它的觀念就是強調「分享」，是一種利他而非利己的資本主義。過去三年，我們一直是朝這種方向發展。首先，過去幾年我們曾經多次參與聲援其他工會，包括其他國營企業工會及民營企業工會的抗爭活動，建立友誼，為未來的結盟建立基礎，並打破國民黨分化勞工的技倆。其次，我們一直盡量參與各項社會運動，過去這段時間我們曾經積極參與美濃反水庫運動、民間司法改革運動、白曉燕事件遊行、搶救教科文、全民廢國大等活動。在這些社會運動時，我們得到的回報，常常比我們付出的要多得多。例如我們參與美濃反水庫運動，使得這次電信工會選舉時，在美濃、旗山地區都得到大量美濃鄉親的支持，使我們在這些地區取得壓倒性的勝利。

不過，這些社會參與活動，並不一定在內部都能贏得掌聲。以剛剛談到的電信認股股價由四十元調升到六十元，資方不但抹黑我們，許多會員也因為認識的水平問題，接受這樣的說法。如果我們要欺騙會員與社會，大可以壓低股價認股價格，討好會員，但此舉卻是在犧牲全民利益。我們要求將股價公開討論後，事實上為整個社會省下六三六億元。但會員卻可能有嚴格的苛責。

問：這次選舉，為什麼有那麼多勞工會投票支持資方的代表？工會平日的勞教是否存在問題，未能提升會員的階級意識，以致選舉時易受資方說法迷惑？

答：相對於其他工會，特別是民營企業，電信工會人數高達三萬五千人，因此進行勞教比較容易。我們也非常重視勞教，最好的考核標準就是：今天願意無條件捐款給工會的員工將近一萬人，這大概可以代表我們勞教的基本成績。當然，用嚴格的標準來看，我們做的還是不夠。我們的勞教基本上還只是提高勞工的認識，改變觀念，跟德國等其他國家的勞教已經是一套系統的勞教還差得很遠。

從這次選舉可以看得出來，在農村選區勞方都取得大勝，但在都會選區則失利，都會地區的分會因為人事上的原因，過去這段時間確實勞教做得不徹底。現在檢討起來，我個人當時為了維持工會的團結，不願強力介入分會的事務，使問題一直無法真正解決。我們第一年勞教產生一些效果後，資方就開始對我們的勞教開始打壓了，緊縮勞教活動的機會，它甚至自己也辦一些勞教活動，對員工進行進行反勞教。資方的這些作法會產生一些效果，尤其電信工會有一萬五千個主管職位，因此資方極易以

這些行政職位為誘因，使部份會員轉向。

最後，我要給其他工會幹部的建議是：工會幹部應該以身作則，在工作崗位上的表現一定要成為所有員工的先鋒與表率，現在許多工會幹部還是以工會幹部的身份謀取個人的利益，這樣的作法會引起會員對工會的不滿，無法產生向心力。

問：有人認為，勞工運動如果不能在政治上集結形成力量，終究無法保障勞工權益，因為資方隨時都可能將勞工的自主工會奪下來，經過這次選舉失利，理事長是否會思考今後仿效西歐國家作法，嘗試在政治上集結勞工力量，與資方及執政黨進行政治的抗爭？

答：這樣的想法雖然會與一些勞工朋友交換過，但卻還不敢去觸及。主要是因為現在還不切實際，不論是凝聚力與共識都還不足。幹部素質是另一個因素，工會幹部的質與量都與韓國無法相比。另外，台灣的民營工會規模與資源都遠遠不如國營工會，如果有些民營工會也能發展成國營工會的規模就有更大的影響了。在台灣，工運往往是有理想的人沒有資源，有資源的人往往又沒有理想。

勞工政黨的條件比以前好了一些，這也是靠許多人與團體努力積累下來的。但離真正的組黨還有很長一段時間要走。建立一個獨立的全產總，應該是當務之急。目前正在發展的國營工會大聯盟是另一條途徑，把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團結起來，比較容易建立共識與凝聚力。如果沒有實力，縱然成立一個政黨又有何意義？但有了實力，很容易就能從這樣的基礎發展成一個政黨。

問：工會改選失利，理事長個人今後有何計畫？要站在那一個位置上繼續從事勞工運動？

答：我的家人希望我能暫時休息一段時間，把身體調養好，多讀點書。但在道義上我無法接受。選後，資方已經放出要秋後算帳的聲音，此時我絕對不可脫身。因此，除非會員說不需要張緒中了，否則我會繼續投入勞工運動。在總會的九席常務理事會中，勞方應該可以掌握四席，因此我們仍然有很多事情要做。高雄的朋友已經建議我重新回去高雄經營，我正在認真考慮。電信工會目前正面臨急速的民營化過程，許多會員今後都將面臨中年轉業的危機，包括那些資方推出的代表當選人，幾個月以後，大家會真正感受到這些危機。屆時，某些資方代表說不定會思考何去何從，轉而重新投向勞方，就像上次石油工會出現「變天」的情形也說不定。

問：過去幾年電信工會曾經大量進用年輕專業的會務人員，電信工會選舉失利後，資方勢必會強迫這些年輕成員離開工會，大家對未來有什麼規畫？

答：三年前，我們上台時，並未資遣任何國民黨的會務人員，至於主動離職的會務人員，我們也給予除依勞基法條件資遣外，另加給七個月津貼，因此我們希望國民黨也能按照同樣條件對待原有的會務人員。這些年輕的會務人員都是很優秀的人才，我希望他們之中有一些人能夠轉移到地方分會去繼續工作。不過，有些地方分會規模太小，可能無法提供專職的會務人員工作機會。另外，我希望友會也能接受一些我們的會務人員，尤其石油工會如果今後要在工運上扮演更積極角色的話，進用一些外來的會務人員可能就是當務之急。

我也希望我們這些會務人員是抱著理想來參與工運，而不是要當一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把現在的變動視為是一種磨練與挑戰。我進用這麼多會務人員就是在為將來儲備人才，國民黨過去從來不培養人才，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官員素質也不理想。未來如果真正有一個階級政黨出現，人才從那裡來？現在就應該培養了。

問：是否可以談談個人的成長經歷，如何走上工運的這條道路？

答：我不是因為認同勞工而投入工運，我當初只是認為要求公平而已。這可能是我最大的優勢也是弱勢，我沒有受過學院的訓練，也沒有階級理論的素養，但我也可能因此沒有任何包袱。我是一個外省第二代，沒有任何背景，以建教合作身分進入電信局後，一直認真工作，但我卻看到公司一大堆人平日不工作，只會拍馬屁，年底卻可順利升官。我不滿這樣的不公平現象，於是高喊我有話有說，希望能有所改變，十二年前開始逐漸投入工會運動。

我是隨著解嚴以來台灣政治發展同步成長，這段過程，我都是自己一步步摸索，我找不到任何教材教導我如何參與工運及成為工運領袖。我只有非常賣命地投入運動，希望建立一支優質的團隊。不過，這樣的工作態度可能會使某些幹部覺得壓力太大，太緊張，因此我在人和上可能就無法做得很成功了。我一直是以前很強勢的姿態參與及領導工運，我最驕傲地是，這段時間我沒有拿我的位置去交換任何不當的利益。我也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因為我認為這樣做對工會最為有利。雖然這也使我曝露在最危險的地步，國民黨打擊我的時候，在野黨都不會保護我，甚至還常批判我。我希望能以認真投入工作的態度，讓其他從事工運的人了解，我們可以不用請客、喝酒，也能得到會員的支持與肯定。★

當代左翼

—— 意義的追尋

林深靖

許多人質疑：自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逐一瓦解，而幾個碩果僅存的、還以社會主義自我標榜的國家當中，中國大陸和越南越來越熱衷於自由市場經濟，古巴和朝鮮則處於被封鎖或自閉的狀態，經濟發展滯後，日愈被推擠向國際社會的邊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思想流派自工業革命以來即處於交鋒對峙的狀態，到了二十世紀末，世界局勢的發展無疑已宣告資本主義大獲全勝，歷史終結了，社會主義註定成為歷史的遺跡，是被憑弔的對象。那麼，在當前的世局之下，以社會主義做為參考體系和價值指標的「左翼」，究竟還有什麼現實的意義？

以《歷史的終結》一書大肆為資本主義慶功的日裔美籍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9年12月初WTO部長會議結束之後，隨即在《華爾街日報》為文指責集結於西雅圖示威的左翼團體「忘恩負義」、「荒誕可笑」，是一齣「反資本主義的嘉年華鬧劇」。在文章結尾，福山呼籲「正經的左翼人士應該把到西雅圖鬧事的那些瘋子驅離」，因為「全球化是一樁嚴肅的事務，不容許有人到此一遊，以滿足抗爭的鄉愁。」他當然不忘在文中宣傳全球化的福音，並認為世界貿易組織正是全球化的極致表現，WTO促進繁榮，推動民主，使落後國家的勞動者有機會進入現代世界，「不僅保障了經濟的自由，並在大體上保障了人類的自由」。

「全球化正是對左翼的真正的挑戰」，福山指出，WTO所代表的世界資本主義，其實已解決了左翼所嚮往的集體動員的問題，因為世界貿易組織是唯一一個可能具備世界政府職能的國際性機制，他不僅制定了國與國之間貿易與投資的規則，甚至勞動、文化與環保也在其規範之內。國際左翼組織在西雅圖的動員是懷舊落伍的，只不過是為了滿足其「抗爭的鄉愁」。他的意思無非是：左翼是屬於過去的，是已被證明失敗的，合該躲在歷史的暗角幽幽啜泣，怎還不自量力，膽敢違情逆勢，出來搞怪作亂？

福山滿篇教訓口吻的文章固然充斥著右翼勝利者的傲慢與偏見，但是這種流行的論調，這種理所當然的單極化、趨同化的思考模式，卻是九〇年代以來一直被「看衰」的左翼不得不面對的！那麼，在跨國企業無遠弗屆，金融流通瞬息萬變，自由貿

易、自由市場日益成爲全球共識的當代社會，究竟左翼的存在與堅持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左翼所代表的即是反封建、反體制性的壓迫與剝削，是由下而上的、集體的力量。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展、對工業生產方式的分析更提供了左翼最有力的武器，左翼的抗爭成爲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然而，值此世紀之交，左翼竟淪爲違逆時代潮流的歷史殘餘，只不過是對舊日抗爭的眷戀與鄉愁？

集結在西雅圖部長會議外圍的示威團體少說也有五百個，其中雖然品類龐雜，但是最有活力、最有主見的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左翼組織，工人、農民、婦女、環保、反核……各種自六〇年代以來分分合合的進步力量再一次獲得具體的展現。《歷史的終結》的作者將西雅圖示威視爲左翼窮途末路的輓歌，其實以其動員的規模和最終迫使世貿組織「千年會議」敗興散場的結果來看，我們不妨將其視爲國際左翼運動的一個新的黎明，爲下一世紀左翼的重新出發拉開了序幕。

西雅圖示威，與其說是滿足左翼抗爭的鄉愁，不如說是左翼珍貴傳統的再現：弱勢者的團結、國際主義、反權威、反專斷、反剝削，反對人類世界的異化與商品化。在西雅圖街頭，有一個最醒目的標語：「世界不是商品」。這不禁讓我們想起在1968年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中對消費社會展開的批判，拒絕將人等同於單純的消費者。當然，這也讓我們不得不起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控訴：「在資產階級社會裡，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別的聯繫了……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

長期以來，絕大多數已由資本家集團掌控的媒體告訴我們：隨著科技與經濟的發展，全球化是人類的宿命，是無可抗逆的時代潮流。而自由貿易既是全球化的動力，也是全球化的目的。貿易自由是至高無上的價值，是國家民主、政治自由、社會繁榮和人民幸福的保證。以福山爲代表的右翼學者們所頌歌的正是這樣的一套邏輯。但是，他們都蓄意掩蓋一個事實：自由貿易邏輯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之間存在一道日愈擴大的鴻溝。在富者不斷積累財富的同時，是以無產者的邊緣化、赤貧化爲代價的；富國的經濟擴張是以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破壞和債台高築爲代價的。

自由貿易邏輯的延伸是將一切事務都「規格化」、「商品化」。規格化符合資本主義所講求的效率與競爭的原則；商品化則方便於計量與交易。以自由貿易邏輯爲基礎的全球化其實也就是「市場化」(marketisation)的保證。於是，包括勞務、文化、環境、自然資源都可以成爲商品，都是全球市場上談判、交易的對象。集聚在西

雅圖的左翼團體所要抗爭的正是這樣的一套邏輯，他們不一定反對全球化，但要的是另一種模式，是不同形式的世界觀。他們很清楚，WTO 內部真正的矛盾是窮人與富人之間的矛盾，是窮國與富國之間的矛盾，而不是贊成全球化與反對全球化者之間的矛盾。他們延續了左翼長期的歷史傳統：揭露經濟發展的負面，反對強者對弱者的剝削，反對人的異化和商品化，認為正義和平等的重要性至少等同於效率與競爭。

西雅圖示威讓我們看到當代左翼的圖像：有工會組織，他們要求分配的正義，要求參與生產的決策，要求減少工時、勞動場所人性化。有農民的組合，他們認為每一個國家都有權利要求糧食的自足與自主，反對傾銷，對增產至上的迷思提出質疑，反對轉基因食品，反對以荷爾蒙生長激素參養的牲口。有女性主義者，她們一方面要求平等的工作權和參政權，另一方面也要求尊重性別的差異，拒絕屈從於父權社會的單一價值觀，譬如世界貿易組織將全球單一化、同質化的企圖。有藝術文化工作者，他們要求文化主權，反對將電影、音樂等創作視為一般的商品，反對好萊塢文化挾其雄厚資本排擠本土文化的生存空間。有生態保育團體，他們反對科技官僚和經濟官僚唯利取向的思維，揭發工業大國意圖將環保條款強加於開發中國家的偽善面貌，譬如美國以全球二十五分之一的人口，卻消耗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生活上極盡奢侈浮華之能事，其跨國產業在全球到處排污散毒，卻獨獨要求窮國小國加強環保策施，涵養水土，再造氧氣，以保障地球的可居住性和生物的多樣性。北方國家盡情享受地球資源，南方國家則擔負起修補地球的工作，這難道就是全球化的現代分工？

「世界貿易組織」加上「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早已成為支撐當前世界政府機制的四大要角，但是他們幾乎都由七大工業國或富國俱樂部所操縱，其運作既不透明，也不民主，卻動不動就要制訂放諸全球而皆準的遊戲規則，輕易就可以決定一個主權國家的命運，尤其是勢單力薄的開發中國家。左翼拒絕這樣的一個機制。反 WTO 的動員一舉提高了戰鬥、組織和意識的層次，證明透過集體的力量，改變社會還是可能的。

當然，左翼的動員絕不僅止於抗爭，左翼所要尋求的是一個有別於既定體制的替代方案。左翼認為人最重要的，並不在於「有什麼」(to have)，而在於「是什麼」(to be)，生命的意義在於個性的解放，在於完成他自己。馬克思曾經有過一個夢想，他認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一個新的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西雅圖示威之前規模最龐大的一次左翼動員，是 1968 年源自法國的全球性學運，當時積極參與學生陣營的沙特曾感慨地說：「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無可超越的境界。」回顧馬克思的理想，時代的意義依然在前方向我們招手。

全球化的世紀回顧

— WTO 西雅圖會議的啓示 —

林孝信

去年12月，世貿組織（WTO）在美國西雅圖的部長會議引來近十萬人的抗議，是美國六〇年代反越戰以來最大的示威抗議行動。西雅圖市宣佈戒嚴，並首次派警方以橡皮子彈驅散抗議群眾。

WTO是什麼？爲什麼它會引起全世界數萬名抗議者不遠千里來反對？

一、WTO 細說從頭

WTO於1995年正式成立，它的前身是關貿總協（GATT）。GATT成立於1947年，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世界銀行（WB）都是戰後美、英等資本主義強權爲建立戰後世界經濟秩序的幾個主要機構。

二戰快結束前，美、英等國鑑於兩次大戰都導至社會主義力量的壯大及第三世界人民的覺醒，乃積極探討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之道。二戰實源於三〇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而後者的產生又由於國際金融的失序與國際貿易的障礙重重。於是1944年在美國Bretton Woods小鎮召集主要同盟國且非社會主義國家開會，會中議決成立三大國際金融機構，即專司國際貨幣體系的IMF，負責融資的世界銀行，及規範貿易的國際貿易組織（ITO）。

前兩者順利成立，但ITO未獲美國的贊同。遂於1947年在古巴重新開會，改設GATT。GATT只是一個多邊協定，而非一個執行機構。遇到任何貿易紛爭或新出現的貿易問題，它必須重新開會進行協商。事實上，這些協商幾乎從未間斷。從GATT成立以來，會議不停，可分成八個回合。由於效率低，不足以應付快速膨脹且複雜化的世界貿易，特別從八〇年代之後，英、美等國積極鼓吹自由化、國際化及私有化等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三大內容之後，GATT的運作方式已不足以應付資本主義全球化新階段的要求。於是在冗長的最後一個協商回合（烏拉圭回合，1986—1993）中協商成立了一個具有常設執行機構的WTO。

二、WTO 與 GATT

WTO係基於GATT已商定的協議，再加設常設的執行機構——秘書處，用於執行協

議，監督各會員國的外貿政策及執行狀況。遇有違規者，可進行禁運等等制裁行動。另外，對於貿易爭紛，它設有常設法庭，可以進行迅速而強力的仲裁。相較於 GATT 的條約性質，它更像是一個國際政府。

由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貿易或交換乃是維持人與人之間的幾乎是唯一底關係；因此，掌管貿易事務的機構，其功能已涵蓋一個資本主義政權下的大部份工作。這是許多人視 WTO 為國際政府的基本原因。

WTO 不僅有行政及審判／制裁權力，而且它包括的貿易範圍也遠大於 GATT。GATT 只包括有形的物質商品。WTO 則增加了服務性商品及智慧財產權商品。服務性商品，如金融、保險、運輸、法律、管理等等，及智慧財產權商品，如影片、卡帶、書籍、科技專利，電腦程式等等，在半世紀前是微不足道的，但到了八〇年代，這兩類商品的交易額激增。根據 GATT 的統計，1992 年（即決議設立 WTO 的前一年），在全世界五萬億美元的國際貿易總額中，這兩類商品共佔一萬三千億美元，已超過四分之一。在此背景下，WTO 這兩類商品納入規範，勢將加強這兩類商品的貿易額與獲利程度。

眾所周知，這兩類商品的出口國完全集中在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特別是美國。事實上，美國的出口有形商品不斷萎縮，只剩軍火武器，次產品及民航機等少數幾樣。美國的出口，日益仰賴服務性及智慧財產性商品。WTO 的這些增項，完全在圖利美國及其他少數資本主義先進國家。

WTO 與 GATT 的另一個差別在於它的普及率更廣。GATT 在 1994 年底時，才有 128 個會議國；而 WTO 一成立不久，便超過 130 個國家加入。由於加入國家眾多，更加使得未加入的弱小國家在國際貿易上孤立。這種多數暴力，驅使不少第三世界國家被迫加入。

三、宏觀看 WTO 的影響

WTO 的影響深遠，特別是對農業與農民，對生態環保，對貧富差距，對國家主權等等方，均有重大的不利影響。但這些方面的論述很多，在此略過不提。

資本主義的生產循環始自資本購買各種生產性商品及勞動力，中經勞動而創造價值，後經商品的流通銷售而完成所創造出來價值的實現。因此，資本、勞動與商品貿易構成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三個主要環節。在地球有限的束縛下，資本主義體制力求在資本流動、勞動力獲得及商品流動的全球化，以達到其追求最大利潤的標的。

資本流動全球化，是八〇年代國際化，自由化及私有浪潮的主要內容。這方面的成就，加上早已成形的國際金融秩序（IMF），為資本這一環節建立了全球運作的基礎。

勞動力的獲得，則需建基於勞動力的流動不能自由化與國際化。否則，勞工的自由流動將導至全球工資平均化，這將不利於資本家的剝削。因此，在全球化聲浪高漲

之際，唯獨不聞勞工流動或人口流動的自由化。美國移民局對勞工移民的防範有如面臨大敵。在全球化浪潮下主權不斷被削減的民族國家，其功能將日益淪為替全球資本主義體制看管勞工；而國家疆界存在的意義，亦將成為劃分不等生活水平區，以方便跨國公司於生活水準低落地區榨取廉價勞力。

商品貿易這個環節，其全球規模的體系建設就是 GATT—WTO 的演變過程。處在全球性生產的時代，處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產、銷極易失調而造成經濟危機的時代，WTO 成立的重要性，更要超過 IMF 及 WB。

四、西雅圖抗爭的歷史意義

1995 年 WTO 成立，1999 年中國與美國達成加入 WTO 的協議。在二十世紀結束前，資本主義全球化又要進入一個高峰！在此美好的背景下，年底的西雅圖 WTO 部長會議似乎可以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建設劃下一個美麗的句點。不料卻失敗了！

近十萬人的抗議當然是一個重要原因。《歷史的終結》作者福田（F. Fukuyama）氣急敗壞地要求「把到西雅圖鬧事的那群瘋子趕走」。但若福田讀懂自己書裡引用黑格爾的辯證法，是可理解歷史的發展總是會為自己設立對立面。

半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處心積慮地被營造出來，是以更多的貧富不均，以全球更多人的受剝削為代價。這種代價，必然會激起全世界有正義，有見解人士的反對。西雅圖的這十萬人，可能只是這些反對者的冰山一角。

資本主義炫耀的外表，不能掩蓋其剝削，不合理的實質。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世界，也許更能讓人們思考：人類的前景在哪裡？ ★

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看藍色條款和綠色條款

金寶瑜

近來台灣在有關世界貿易組織的討論中，大家都很關心如何看待藍色條款和綠色條款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是否可以利用這兩條條款來達成對我們勞工和環境的保護。因此我想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個實際的例子來對這兩條條款加以說明。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簡稱NAFTA)是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在1993年底簽訂的一個自由貿易協定。這個協定使得在北美製造的產品(在北美製造的百分比隨產品而不同)可以享有關稅的優待(六年後免稅)。這個貿易協定和WTO一樣,表面看起來是要貿易更自由,但實際上是要保護美國的壟斷資本。因為到了八十年代美國、歐洲和日本的誇國壟斷資本之間的市場競爭更加激烈,歐洲和日本的資本也開始到墨西哥生產,而目的是要銷售到美國。有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的壟斷資本就可以保護它們的市場。像汽車的北美製造率規定是百分之六十二點五,也就是說只有北美製造率在這之上才能享有關稅優待。因此,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可以將它們的汽車組件運到墨西哥加工再運回來而享有關稅優待,但日本和歐洲的汽車公司就不能(除非它們的汽車的百分之六十二點五是在墨西哥製造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使美國跨國公司可以更自由的利用加拿大的自然資源,和墨西哥的廉價勞工,並且可以不必付出環境保護的成本。

八十年代開始美國跨國資本南下

早在八十年代中時,因為市場的競爭,美國跨國公司為了降低成本就開始將資本南移到墨西哥。但那時墨西哥還沒將市場開放,只是在與美國臨界地方設置了許多出口加工區(maquiladoras)。美國的紡織業、汽車業、電子業、大量移向墨西哥邊界的加工區。這些高污染的工業造成墨西哥嚴重的污染問題。只從一個例子中,就可也看到這污染問題對人有如何大的影響。德州東部一個與墨西哥臨界的城叫布朗思維(Brownsville),這個城在1991年醫院裡重複發現了嬰兒無腦症(Anencephaly)。得了無腦症的嬰兒。生下來幾小時就死亡。嬰兒無腦症不常見,在美國每一萬嬰兒中平均有三個。但在這個城里一年半中就發現了十九個無腦兒。經過調查,發現這些嬰兒的母親的住家都在離一條大河(Rio Grande)兩英里之內。後來又發現在河對面的墨西哥的馬它摩若斯城(Matamoros)又有三十一個在同一時期出生的無腦兒,他們的母親也都住在河邊。因此調查的人認為,這麼多無腦兒在短時期內出生在一個地區不是偶然的,而是受環境污染的結果,也就是說母親在懷孕期間接觸到環境中的毒素。

可能引起無腦兒症的化學品之一是二甲苯(xylene)。1990年有個環保團體在墨西哥邊境做調查,它們發現許多美國FORTUNE 500的大公司移去墨西哥生產後,它們對工業廢水的處理與在美國國內完全不一樣,這些大公司將廢水隨意倒在河中或後院的空地上。這些環保者將排出來的污水和被污染的泥土送去美國環保局許可的一家化驗室去化驗,化驗結果證明廢水和泥土的二甲苯含量是美國合法規定的六千倍到六萬兩千倍。

這篇報導是我在ABC的一個叫Prime Time的節目上看到的。這個報導的記者去採訪美國環保局的一個官員，並用嬰兒無腦症的例子問這位官員，應該如何處理墨西哥的污染影響到美國的事。這位官員說：“你問的問題很有趣，我也不知該如何辦。”這記者跑到墨西哥的環保局，那邊的負責人說他剛上任，所以一概不知。墨西哥的環保情況跟台灣相似（可能比台灣更糟），環保法冠冕堂皇，但執行無力。

因為墨西哥加工出口區的增加，由嚴重污染而造成各種疾病，像上面說得無腦兒和毒瘤病症等，也越來越嚴重。但當時墨西哥的加工出口區協會（主要被美國跨國公司所控制）說加工區水和空氣的污染都是居民造成的，不是工業造成的。墨西哥政府也支持這樣的說法，但這個無能的政府卻不提加工區附近住了很多工人，但它卻沒有作任何污水處理和下水道的措施。政府雖然可以推說沒有經費，但它卻對外來的跨國公司免稅。除此之外，美國環保局在1992年底的一篇報告中說，美國公司每年運五萬英噸的含毒廢物到墨西哥去，墨西哥將這廢物處理後變成四千英噸無毒的東西運回美國。其實，這裡所說的例子不足說明墨西哥污染問題的嚴重，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至於墨西哥的工人的處境得不到改善，則是因為墨西哥的黃色工會(Mexican Workers Confederation, CTM)與墨西哥連續執政了七十年的政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勾結在一起，做盡了壞事，它不但幫著政府壓低工資，而且用各種辦法阻擾自主工會的建立。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1992年簽成合約

從1982年起，墨西哥和其他幾個拉美國家因為欠了太多外債，而經歷了二次大戰後最嚴重的危機，美國跨國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逼的墨西哥走頭無路。這時美國的跨國資本正希望將墨西哥的市場完全打開。又正好出現了卡羅塞林內斯(Carlos Salinas)這位政客，卡羅塞林內斯出生於墨西哥的一個政治家庭，（享有墨西哥肯乃迪家庭的盛譽）。卡羅塞林內斯受教於哈佛大學，完全接受了新古典學派市場至上的理論，打算回去將墨西哥的經濟大幅改革。他在美國的支持和幫助下，在1988年當選墨西哥總統。當選後，卡羅塞林內斯一面將墨西哥經濟大幅全面改革，他的改革包括將墨西哥企業全面開放給外資、削減關稅、取消金融管制、並將兩百多家國營企業拍賣。在此同時他極力推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因此與布希兩拍即合，1993年底美、加、墨簽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1994年正式生效。（在更早加拿大已經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藍色條款和綠色條款

這時美國工會早已因為資本外移、自動化、企業外包和瘦身幾方面的壓力，導致大量失去會員而感到憂慮。工會頭子更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而感到不安。到了1992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推出克林頓與布希相對，克林頓為了討好工會，他反對布希無條件的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並認為布希只顧到資本的利益而忽視了對勞工和環境的保護。他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應該只是為了自由貿易，他提出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應該加入對勞工和對環境的保護條款。克林頓主張成立一個環保委員會 (Environment Protection Commission)。並應給予這個環保委員會很大的權力來防止和清理環境污染。克林頓還主張成立一個勞工委員會 (Labor Commission)，給予美國工人權力，使他們可以在墨西哥違反工人權益時告墨西哥政府。他還說：“每一個條款都應該有各種程序上的保障和補救辦法，我要在談判的條約里，允許三國的國民在他們的環境和工人權益沒有受到保障時，可以通過國內的法庭來解決。”克林頓還鼓勵美國國會用立法來給美國公民權力反對加拿大或墨西哥污染環境的做法。(Orme, 101-102)

美國工會頭子和環保團體應該預料，克林頓總統不同於克林頓候選人。克林頓當選後，把他在競選時的承諾都到忘了。藍色條款和綠色條款都沒被寫在正式條約內，這兩個條款都變成附帶條款 (side agreement)。環保委員會和勞工委員會雖然都成立了，但都沒什麼大用。關於環保部份，委員會只能對某一國不遵守它本國的環保法提出質疑，但如果這案子要成立，委員會還必須證明違反環保法影響到了貿易（即因為違反環保法而降低售價）。要證明這一點是很困難的。另外，協定中的第1114條中，規定簽約國家不得用降低環保標準來吸引外資。要證明這一點也是同樣困難。何況這個委員會只有三十個全職人員。(Orme, 162) 更有甚之，這個環保委員會既沒有直接調查權，也沒有執行權。勞工委員會也有同樣的問題，它產生不了什麼影響。這兩條款與對違反智慧財產權而受到的制裁完全不一樣。如果美國公司發現墨西哥或加拿大公司違反智慧財產權，這家美國公司可以用直接上訴來抵制進口。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藍色條款和綠色條款都鬆軟無力，而且要利用這兩條條款還要靠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工人團體和環保團體的實力。但是就是因為他們的力量弱，所以在這協定中不可能有真正保護他們的條款。真正關心三國的勞工權益和環境污染的人，有了這次的經驗，進一步瞭解到藍綠條款只不過是用來敷衍他們的幌子。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對資本的保護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世界貿易組織一樣，它不只是有關貿易的協定，而是包括投資的協定。它對資本的保護就大不同於它對勞工和環境的保護。下面這個例子是在反對【多邊投資協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 MAI) 時被抖出來的。

加拿大在1997年禁止一種加在汽油中的MMT的使用，(MMT是一種化學品，中文名字不知)。據資料證明它對人體有害，所以許多國家已經禁用。在加拿大生產MMT的只有一家美國公司叫埃所(Ethyl Corporation)。埃所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對投資者國民待遇的保護為理由，控告加拿大政府。埃所說這條禁令是對它不平等待遇，使它賠錢。這個官司不在加拿大或美國法庭打，而是由一個國際小組來決定。1998年夏天，埃所官司打贏了，加拿大政府不但賠了埃所兩千兩百萬加幣而且撤回MMT的禁令。因此，美國資本受到國民待遇，加拿大的公民卻受不到他們政府對他們健康的保護。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後的墨西哥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從1994年開始生效，這一年墨西哥在政治和經濟上都經歷近年來最大的危機。大年初一，Zapatista的農民因為經濟改革後生活越來越困難，發起武裝起義。這年也是墨西哥總統大選，PRI 繼卡羅塞林內斯後的候選人，在一場競選演說中被謀殺，而謀殺的嫌犯是卡羅塞林內斯(Carlos Salinas)的哥哥若巫塞林內斯(Raul Salinas)。若巫被關入監獄，除了殺人犯的罪名外，若巫還犯了貪污的罪，經調查，他拿了大販毒集團的賄賂。若巫大筆的錢由花旗銀行洗淨後轉入他在瑞士銀行的帳戶里。卡羅塞林內斯趕快逃亡到歐洲。這場PRI 內部政治鬥爭是塞林內斯改革時分贓不均的結果，塞林內斯在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中，將國有企業廉價賣給他的親信，因而引起其他黨內有權的政客的不滿。

到了1994年，則第露(Ernesto Zedillo)當選總統，這年年底墨西哥經歷了八十以代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墨西哥的貨幣貶值，為了搶救墨西哥披索，墨西哥又借了四千億美元的外債，並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制裁，作為獲得貸款的條件。國際貨幣基金要墨西哥削減政府開支、降低工資、取消補貼和提高利率。只一年之內，墨西哥的個人平均國民所得從四千美元降至兩千六百美元。同時，中產階級的儲蓄也因通貨膨脹一掃而空。(Orme, x-xi)。

根據一篇華爾街日報的報導(Wall Street Journal, 1999年3月8日, A-1)，從表面上看來，墨西哥的經濟似乎有些起色。1998年它的經濟成長達百分之四點八。同一年，製造業就業人數增加了十萬人，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貿易從1993年的七百七十億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一千五百九十億美元，增加了一倍。但對大多

數墨西哥的人來說這些統計數字是沒有意義的。這篇報導中說自墨西哥披索貶值後，披索的購買力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九，與十年前比起來，大多數的人的生活水平都下降。根據聯合國的一個新資料，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工人（每日三美元）從兩年前的不到人口的一半，增加到今天人口的三分之二。這篇報導中還說一個美洲發展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經濟學家(Miguel Szekely) 說，即使墨西哥的經濟每年能增長百分之五，也要五年才能將貧窮人口下降到1984年的程度。在這份右派報紙上能有這樣的報導是少見的。虧得少數記者還有他們的職業道德。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行了六年，不但墨西哥的工人和農民生活每況愈下，它的環境污染問題也更嚴重 (Tokar, 130) 早在九十年代初，經濟學家就說以經濟發展來說八十年代對許多發展中的國家是失去的十年 (the lost decade)。今天看來，九十年代又是墨西哥失去的十年。

我因為台灣對藍色條款和綠色條款的討論，就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這兩條條款所產生的作用（事實上沒有產生作用）寫出來供大家參考。我認為我們不能蒙著眼睛不看事實，而假設我們可以用藍色條款和綠色條款在WTO中爭到對台灣勞工和環境的保護。而且，我們反對WTO也絕不是要閉門自守。事實上隨著資本的國際化，工人組織、環保組織和其它民間組織都早已開始跨國連線，而且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像反核能發電、像反水庫、像反對砍伐原始森林、像近三年來反對人工改變基因的食品，以及各地勞工組織的連線。但是每一種跨國連線都必須以每一個國家對當前既存的世界秩序的反對力量為基礎。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放棄靠WTO中的條款給我們保護的幻想，只有組織起來，將我們自己的力量壯大才是當前要務。 ★

參考資料

Orme, William A. Jr., UNDERSTANDING NAFT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Tokae, Brian, EARTH FOR SALE, South End Press, 1997

協助原住民重建家園

義賣原住民歌唱 CD 及原住民運動記錄影像 VCD

【系列一】 原鄉重建部落音樂會 *Live CD* 定價 200 元

【系列二】 原運再起 *VCD* 定價 200 元

出版\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製作\飛魚雲豹音樂工團 遠足影像製作社

劃撥帳號\19411536 戶名\胡德夫 E-mail\watahope@ms43.hinet.net

共同體內部的排除構造

王墨林

關於「市民」這個話語所意涵左翼政治學的意義，大概是在解嚴之後，通過「市民社會」論述引發台灣資本主義是否可能形成「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討論？所謂「市民」與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在這一場討論之中，才逐漸被建構起來。

當然那是一場用了唯心主義的方法論在討論台灣資本主義的特殊性，因而原本立足於不自由、不平等的舊階級社會上，與之相對要求其自由、平等的市民社會論，對日據時代以來的台灣，即使能說是走上現代化的資本主義，但同時有沒有發展出從封建、共同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的中產階級所構成「市民社會」的具體內容，卻是令人懷疑的。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民進黨拿到台灣政治版圖上的半壁江山時，謝長廷就先喊出了「命運共同體」這句口號，緊跟著李登輝上台，又大力促銷他的「生命共同體」，更從日本翻版了半生不熟的「社區總體營造」過來，做為他打造「新台灣人」論述的前奏；硬是把「共同體」與「社區」這兩個完全風牛馬不相干的意識形態活生生綁在一起，就變成了盤旋於台灣上空的黑色幽靈——愛台灣。

「共同體」到底是啥米碗糕呢？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它不過是歷史學上，或經濟學上的一個概念。唯物史觀認為，人類史上的共同體，從以血緣為中心的原始共同體，發展到以地緣為中心的農業共同體，就形成了舊階級社會中以奴隸制或農奴制這樣人與人關係的總和所建構起來的共同體。從民粹主義來看，就更為簡單地指涉在一個地域上使用同樣的生活與感情的人們，所形成一定的共同集團之意。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完成，是建立於共同體解體，代之而起的是以中產階級為主要內容的物質基礎上。

不管是「命運共同體」或「生命共同體」的提法，都顯示出資本主義週邊國在農業共同體解體之後，所殘存下來仍有一點尚未被資本主義現代化清掃掉的封建意識。那麼我們要回過頭來談的是，從蔣經國時代開始，隨著台灣經濟起飛而創造出來的一批新興小資產階級，到李登輝時代來臨，這批小資產階級因國家論述的需要，就被傳播媒體加上右翼學院派尷尬地把它推到想像的「中產階級」虛構化位階。他們所謂「市民」身份的打造，就是因為這樣逸脫了歷史發展的規定，這批「中產階級」尚未從封建、共同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原本具有封建、保守的小資產階級意識仍然深深地烙印在「市民」的身體上。

要說的是，當資本主義現代化催生了一個徒具形式的「市民社會」誕生，而假設台灣社會生養出了一批都市「中產階級」，被我們認定自由、平等的市民道德價值又進一步統攝了新台灣人論述的話，所謂的「偽中產階級」(也就是所謂「偽新」台灣

人)在被民粹主義戴上「共同體」的光環之後，就開始建立相對於一個異己的客體存在，才能彰顯共同體主體的自我中心意識。因此，異己的虛構自有其必要性，也只有在此中心與週邊處於一種相互暴力的狀態之中，而形成社會關係與共同體秩序的危機徵兆時，原本流動性的群體就可以立即轉化成爲固定的群體。全員強制的一致性，意味著也是權力和秩序的安全裝置，以一套披共同體意識管理化的社區活動儀式，來做爲強迫異己的出櫃，就變成了共同體中不可或缺的排除構造。

發生於九二一大地震中，位於明星災區埔里的暨南大學，因校長李家同下令全校師生遷移至台北上課，而引起埔里大部份在地人的怒火，這把火一直燒到台北立法院，更引起了民進黨立委嚴厲地批判爲背叛者，在自由時報的讀者投書版上也可以看見許多人將其「背叛行爲」與不愛台灣劃成等號。

姑且不論李家同當時做此決定的立場上有多少正當性，但是在事後引起的爭議之中，我們看到反對者幾乎都是站在一神教的絕對立場上，對暨大師生提出「社區意識不足」、「不認同社區」等批判，甚而民進黨立委亦直斥李家同爲「共產黨」。比排除異己這個行動更重要的是，它同時進行的是一個共同體神聖化的再生產過程；對於中心思想從污染到清潔的洗滌，從週邊到中心的移行，這樣的排除構造就漸漸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意識形態生產模式。因而我們似乎就沒有必要再深入地去探討，審判李家同有沒有通過民主主義最重要的討論（deliberation）過程？

八〇年代被李登輝從國外邀請回台主持「社區整體營造」推動的陳其南，亦做爲台灣搞社區運動肇始的一份子，他所訂下社區的定義即爲：「台灣社區營造運動的背景和最主要的課題乃在於市民社會理想中的社區共同體意識之建立…」（聯合報文化版、1999.11.23）。由此可知，台灣國家所要推動的「社區運動」，在某種程度上是政治意識形態錯亂下的雜種文化，又要強調「中產階級」自由、平等屬性的「市民社會」，以彰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成就；又要不放棄反動、保守的「共同體意識」，以壓抑個人中心主義的解放，那麼他的社區運動路線又怎能從中整合出一個脫國家支配化的「市民聯合社會」呢？

國家一方面在它的政治領域裡，大力撐起「社區」這面大旗，譬如行政院的災後重建計劃工作綱領，定調以社區重建爲重點，無論經建會或文建會就不約而同把口徑朝向「社區」大談重建計劃；另一方面又讓民間社會大唱其「共同體意識」的調，譬如：各大學在暨大事件之後，紛紛在媒體上表態與附近社區互動良好，連台中一所省立高中也在校慶時安排學生到社區去打掃，表示「與社區共存共榮」；中華民國舞蹈學會「基於『命運共同體』的想法」，期望以舞作發揮撫慰災民的力量；中國時報「開卷版」在《看集集小鎮新生》一文中也強調：「推動口述歷史，不但是將集集人對故鄉的感情與回憶收藏起來，而且也是可以累積成一股龐大的社區動員力量。」（徐淑卿、1999.11.18）社區→共同體→新台灣人的台灣做爲一個主權國家的符徵於焉完成。

社區的內部民主主義概念卻不見有人提到，在共同體意識之下國家公民道德所推

崇的理性秩序取代了生活樣式的多元主義。公共意見的形成，沒有經過在「紛爭」之中出現公正的「調停」或「妥協」的過程，卻立即以道德為優位的議論來判斷，就產生了啃噬背叛者 — 李家同的一條食物鏈 — 社區 → (埔里) → 共同體 (民進黨) → 新台灣人 (自由時報)。公共意見的討論 (deliberation) 也是一種權力化的溝通管道，本來可以對公部門 (譬如：政黨或媒體) 展開包圍攻擊的，但是因為我們的社區在共同體的強調之下，個人身體存在於「場」(place) 的感覺已然喪失，即使如報載在埔里也有一部份在地人並不反對暨大的遷校決定，卻因為這一部份的意見無法讓國家的符徵顯影，意指它的社會性欠缺法及政治權力的介入，故無法完成具體內容，頂多只是一個政治學上尚未融解於共同體中的「私底下看法」。

「偽新」台灣人不只是尚未從「共同體」的魔咒中清醒通來，即使今夜一覺醒來，我們真的聞到了一點自由空氣，盤旋於台灣上空的黑色幽靈，是不是像戒嚴記憶一樣，不過掉進了另一個黑洞呢？ ★

階級與婦運

成令方

921 地震後，我有機會到埔里去瞭解一下災後的情形，也和當地的一些女人聊聊她們災後的處境。當她們的家倒了，原有的生活秩序亂了，小孩的教育因學校受損要重新安排，有些不幸的連丈夫或自己賴以維生的工作都沒了，還得照顧類似處境的長輩親人。有的婦女樂觀堅忍地撐起重擔，有的愁雲滿佈不知今後去路。這情景讓我驚覺到平日我們熟習的性別論述，與鄉鎮的婦女關係相當少。從災區走一趟回來，更讓我感受到我們過去的婦女運動很多時候是侷限在首都中產階級的想像中。

當然我絕不否認，台灣的性別風貌在過去十多年來有巨大的變化，不但讓人目不暇給，的確也造成不僅量變而且質變的效果。在解嚴前後就開始推動兩性平權的婦運人士，如今回首當年，一定很慶幸自己生長在激越變動，從獨裁往民主轉型的大時代。正因為隨著時代的翻滾，二十年前的空想美夢，到本世紀結束前才有可能逐一推展落實。八十年代由婦運團體提出並推動的性別議題，到了九十年代藉著通過立法和修法，把反對家庭暴力、反對性侵害，反對維護父權的民法親屬篇等理念，寫入公共論述。彭婉如的慘死更促使教育部成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在中小學推廣尊重兩性的教育。另外，同志運動，女性性自主的思潮和公娼事件的爭辯，都多少形成挑戰傳統性別思考與行為尺度不可忽視的邊緣論述。

凡從事婦運的人都認識到，女人個人的經驗不是屬於她個人特殊的境遇或運氣，而是有集體代表性的。只有藉著集體的活動才能，一方面讓個人意識到有很多人和她一樣有類似的困境，主要是因為社會體制造成的；另一方面讓大眾認識到有一群人對現有的社會體制不滿，要求改進。因此，婦運團體扮演的是改革性別關係的重要推手

。在解嚴前後，成立的婦女社運團體，例如「婦女新知」、「晚晴協會」、「婦女救援會」等，藉著與其他社運團體的聯合，鼓吹女性意識和推動與婦女權益相關的活動。這個策略，在解嚴後民主化過程中，運用得相當成功。因此，到了九十年代，不同服務性質的民間婦女團體如雨後春筍的出現，但是大多數座落在首都台北市。

我認為造成婦女運動之所以侷限在首都中產階級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大多數的婦女團體把台北界定為她們的社區，可是又下意識地以為她們服務的對象是全國婦女。當工作人員和決策的理監事都只有台北大都會的生活經驗和視野時，她們怎能瞭解台北都會以外，特別是農村和小鄉鎮上婦女的特殊需求？

有些婦女團體（其他社運團體也是有類似的說法）自認為有充足的理由座落在首都台北：除了容易與政府各部會和民意代表往來溝通外，主要可以立即現身在媒體的鎂光燈下為「婦女」代言。早期這麼想還有些道理，但如今已進入傳訊科技發達的時代，社運團體的「身體」其實無須「親臨」也還能發聲。即使，「身體」在台北，平日溝通還不是以電話，傳真和網路為主？頂多遊行抗議時方便一些。

我也瞭解婦運工作的辛勞，也常聽到如下的感嘆：「不是我們忽略鄉鎮的婦運工作，真是沒人，推動不了！」這樣的挫折導致了運動重點的轉移。於是近年來，我們見到婦運人士（有些其他社運也類似）越來越重視民代，立委和專家的影響力。我有些擔心這樣會本末倒置。婦運團體原本樸素的關懷是為了婦女，特別是弱勢的婦女，而民代和專家以及婦女團體應只扮演代言和推動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才是女人。

近些年，另一個婦運發展的方向是在媒體上發聲。雖然，我們經常可以在報上見到一些與性別相關的消息，也時不時請一些媒體寵愛的婦運明星發表意見，但是依我的觀察，似乎婦運團體在性別議題的開發上越來越被動。為什麼？其中的原因之一，我認為是：以在媒體上發聲為重心，而減少和女人互動，就失去了從她人豐富的日常生活經驗中看到與自己（團體的幹部往往同質性高）的差異，沒有與差異者對話就沒有湧出新鮮視角的機緣。媒體曝光率是不能做為評估自己團體的活動能力，特別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妳在媒體的批判發聲頂多在觀眾 / 讀者的腦袋中停留十秒，有多少人會因為看過幾個十秒而願意加入改革的行列？果真如此，為什麼每次選舉候選人除了上媒體外，還要到市場，到各鄉鎮大街小巷去掃街拜票，與選民握手聊天合照？

下一個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婦運該怎麼走？這個大哉問，我希望婦運界人士能有機會齊聚一堂來討論。在這裡，我藉著點出有些婦運團體的首都中產階級的侷限，期望她們能重新思考運動的策略和大方向。婦運要蓬勃，我認為必須和處於多樣位置，特別是位居社會底層和邊緣的女人互動。我們可以利用網路科技協助我們：可以建立一個資源和資訊交換的互助關係網，各地婦女可以提出她們的特殊需要，動員關心的人到當地和她們聚會討論（不要每次都是大家上台北開會），再把討論結果放在網站上邀請資源和資訊的協助。這樣來來回回的討論溝通，彼此協助，不同位置的女人就可以激盪出思想的火花，行動的熱情，婦運的靈感才能源源而來，婦運的新血才可能生生不息，婦運才可能有改變社會的行動力。

★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中國時報》）

可議的提問——給《連結》的幾點意見

梁 三

《連結》雜誌社針對《左翼》創刊號文章〈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提出了許多意見，對於這些意見的回應與否也許取決於作者黎建江本人的意願，然而，做為一個長期以來對台灣左翼運動寄予熱望的讀者，我所關切的不是《連結》所提出來的那些「問題」(problem)本身（許多問題常常可以用所謂「見人見智」一語打發），而在於其「提問法」(problematic)。

英文的 problematic 源自拉丁文的 problematicus，意即提出問題的藝術和科學，早在古希臘時代，那些喜歡「鬥嘴鼓」的哲人們就相當清楚，有效的提問其實就已涵蓋了有力的意見；而不自覺的提問，則至少反映了社會價值觀的表象。

《連結》對於黎建江文章提問的方式其實是一種尋章摘句的檢查，檢查所用的濾鏡則是當前台灣社會價值體系中壟斷意識型態論域的統獨矛盾觀。

譬如，《連結》指出，黎文從標題〈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就犯了錯誤。因為文章中討論了「李登輝政權」、「台獨」，都不只是社會問題，而「擺明了是政治問題」。《連結》難道認為社會運動與政治分析是可以分割的嗎？或者認為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如同井水與河水，可以彼此互不沾連？再者，以台灣當前單薄還要掩掩藏藏的所謂「左翼」力量，難道可以不藉由社會運動推動社會進步，而大言不慚地自詡為政治運動（奪權）的主角？《連結》自稱是「一群具有政治、學生、勞工、環保、原住民運動經驗的學生」，當然不至於如此稚嫩。但是《連結》這種「破題」式的提問，至少已達到了一個目的：開門見山將論爭帶入統獨的情境。

黎文第二節，「李登輝政權十多年來的措施，成功地將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轉化為民粹式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的敘述，也遭致《連結》的強烈質疑。《連結》指出，「半封建半殖民政權」是來自「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而台灣早在兩蔣政權時代就已「嵌入國際資本主義的國際分工」，社會性質已經改變，黎文居然認為台灣社會適用於數十年前的中國社會性質分析，「由此可見，『統獨』這條分界線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黎文作者的判斷」。根據這樣的論據，《連結》認為黎文對李登輝施政風格的批評，都是基於「反台獨」的需要，認為作者用「把民粹主義以及極右政策推行的如此出色的人」來形容李登輝，「沒有一點點『左翼』、『宏觀分析』的影子，倒比較像是台灣選戰中常見的黑函語法」。

做為進步青年的團體，《連結》既然知道社會性質是一個變遷的概念，應該也知

道語意同樣是不斷變遷與發展的。有地主 / 農奴、貴族 / 賤民等剝削關係的社會固然是封建社會，一個官僚買辦大資產階級佔盡社會經濟生活優勢的社會，依然是一個充滿剝削關係的封建社會。被帝國主義以武力侵入佔領，自然資源和人民勞動力被恣意開採糟蹋的社會固然是殖民社會，一個媚外的、自甘依附於強國羽翼的社會，即使有獨立主權，依然不脫其殖民的性質。更進一步而言，女性主義者有對「父權封建社會」的反抗，文化批判者有「新殖民」、「後殖民」的提法，因此，黎文對台灣社會性質的定義容或有疑義，卻也不必急著與「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劃上等號。

此外，「極右」是政治光譜上定位的問題，納粹、法西斯固然是極右的表徵，卻不是納粹、法西斯在歷史上消亡了，「極右」就隨之消失。在2000年的今天，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都仍有極右政黨的存在（譬如法國的Front National，「國家陣線」），其特徵是仇視外來移民、仇共反共、強調民族優越感，在社會議題上極端保守。李登輝政權是否帶有極右的特質或許還有待論證，但是，以「黑函語法」來指斥黎文，卻是無端暴露了《連結》在政治論述上的輕薄與傲慢。

《連結》將黎文放在統獨濾鏡下拆解，得出了他們預設的答案：這是一篇反台獨的、統派的文章，因此，《左翼》是一個統派的刊物。

而從當權的或主流價值的位置來看，統派即是去正當性的存在。

其實，在當今的台灣社會，又有什麼東西能夠遁逃於統獨濾鏡的檢測？這種單一的、化約的思維模式不僅成爲主流價值的載體，也是當權者的護符。黎文中有「民粹主義的氾濫，更把許多社會內部的矛盾轉化到兩岸的對立」的深沉感嘆，這在《連結》的剖解下，恐怕又是夾帶統派意涵的雜音。

過去台灣的左翼陣營就是缺少對話的機制，以致不同團體或不同個體之間常常各幹各的，各說各話，有些甚至因爲長期缺乏溝通而彼此猜疑，喪失了在關鍵時刻團結的意願和契機。就這一點而言，《連結》的年輕朋友們做了一個可敬的示範。而《左翼》第二號隨即將《連結》的意見全文刊登，也顯示了其雍容大度和開放討論的誠意。然而，左翼站在反資、反帝的立場，有迥異於資本主義社會的世界觀，對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構成有一套另類的想像，對於既定體制的遊戲規則雖然習以爲常，卻要能夠敏感而不陷溺。《連結》對黎文的提問未能脫避主流社會單一思維的窠臼，某些論斷甚至帶有右翼「扣帽子」的歪風，這是令人不得不引以爲憾的。

★

左的「幻視」

——就教於《連結》諸君

官土生

一. 右細胞異常增生的左

台灣，從一九五〇年起成了國共內戰的「反共基地」以及美國在東亞的「冷戰前線」以來，整個社會就像中了風一樣，半邊癱瘓了！當然不是右邊而是左邊癱瘓了；不但癱瘓了，甚至整個左半邊都幾乎被內戰與冷戰雙結合的暴力所截除了，只剩下右半邊起著功能。這剩下的右半邊，又在美國的新殖民主義政策的影響下，進行右邊單細胞的繁殖而不斷肥大，遂轉化成世界史上罕有的，從頭到腳都由右邊的單細胞組成的有機體，一個反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這個有機體上，雖然在七〇年代由於反國民黨或受著世界反西方潮流的影響，自發地長出了一點素樸的左的細胞，但這些細胞進入了八〇年代以後又被從右的軀幹上長出來的新的右的細胞所抑制了。

因此，這個全身都是由右邊單細胞（不管是舊的或新的）增生的台灣社會中，很難長出左邊細胞來，長出來了，也常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現在，自認為左翼的，不瞞你說，可能不超過「同志社」的人數，取得的市民權可能還遠不如「同志們」呢！況且彼此之間在思想仍有許多歧異！

這就是台灣社會中的左翼的歷史和現實。是從極端嚴酷的歷史中走來和在困難的現實中生存的，這是首先要認識到的前提——這些雖與本文主題無關，但在提醒左翼的朋友們，不要忘了這前提：我們是幼嫩而弱小的。

二. 重視台灣社會性質論辯

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中，有一群朋友在倉促成軍中順利推出《左翼》，行動本身就值得喝彩，它提供了一個互相學習、爭論的園地，而這正是現階段左翼陣營成長的必經之路。從兩期的《左翼》諸文看來，我認為觸及台灣左翼陣營的根本問題而且有必要繼續論辯下去的文章，就是黎建江的〈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以下簡稱「黎文」）和針對「黎文」提出批評的《連結》雜誌社的〈幾點意見〉（以下簡稱「連結文」）這兩篇。因為它們都已意識到認識「台灣社會性質」和「政權性質」問題的重要性，而且也或多或少就此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因此我對它特別感興趣。

是的！科學地認識社會性質是改造社會的前提，一個自詡推動社會進步的人，沒有社會性質的認識是走不出去的。特別是一個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識人。任何一個左翼團體，沒有經過社會歷史的學習、社會調查、社會分析以及做為總括的「社會性質」的論辯、定性，運動是很難展開的。經過它，才能使所謂左的觀點，不再空洞教條，開始有血有肉，有具體的內容，有動人的說服力，才會產生社會動力，才談得上改造社會。因此，我對「黎文」和「連結文」很快地意識到並提出這個問題，基本上是讚賞的。不過，對於他們的看法則有一些意見，想提出來討論，也順便激發大家對這問題的重視，熱烈來討論。不管說的對不對，熱烈討論總是對的。只有熱烈的討論才有進步，才會產生「連結」！

三.「連結文」對「黎文」的質疑

《連結》諸君對「黎文」做了很快的回應值得肯定，但是對「黎文」的質疑，本人認為犯了一點毛病，所以借貴刊一角提出我的看法。

「連結文」對「黎文」的質疑，大概有兩部分；其一是質疑「黎文」把兩蔣政權性質定為「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忽略了台灣社會半世紀來的發展和特殊性；其二是質疑「黎文」的「台灣目前形勢的宏觀考察」，太著重在對李政權的台獨作為的批判，指責說：「統獨這條分界線深刻地影響了作者的判斷宏觀分析」，意為黎文作者把李政權的台獨性格擺在第一位而資產階級性格卻擺在第二位，太注重統獨問題而忽略了左右問題。

本人也深感「黎文」有一些易招人誤解之處，譬如定了兩蔣政權和李政權的性質（這是真正的問題處，需要深入討論）卻未加說明；在目前形勢的宏觀分析中也只突顯李政權台獨作為的方面，卻忽略了它快速推動資本壟斷、惡化國民生存環境、無視勞工死活等大資產階級作為的方面等等。但是，本文認為這只是屬於一般的倉促為文常患的疏漏的毛病的範圍，並無大礙。「連結文」基本上也都指出了這些疏漏之處，但是它卻不僅止於此，還進一步質疑、推演、論斷到超出「黎文」原意的地步，這就不得不提出來討論了！還好，連結諸君文章的態度基本上是誠意的，所以對諸君只是「請教」而非打「筆仗」了！

四.「社會性質」並不等於「政權性質」

連結諸君看到「黎文」把李政權之前的兩蔣政權定位為「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馬上就照字面推演，認定「黎文」所說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意義，完全和三〇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爭的相同，或和毛所「領導的」（最好不要用「為首的」好不好呢？）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一樣，並據以推斷「黎文」作者認為兩蔣統治期的台灣社會仍處於與四分之三世紀前的舊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社

會」完全相同性質，進而評斷「黎文」作者忽略了台灣社會半世紀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忽略了台灣的特殊性。這種推演、論斷是不是太過頭了呢？太簡單化了呢？

首先，我們理解到，所謂的「政權性質」雖然與「社會性質」有一致的地方，但政權性質並不一定等於社會性質，兩者有一致的地方（時候）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時候）。也就是，「黎文」所說的「半封建半殖民政權」並不一定就是指「半封建半殖民社會」，它只是指兩蔣「政權的性質」並不是講台灣「社會的性質」，也並沒有說兩蔣統治時期的台灣社會是與舊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相同。我們只能就「黎文」所指的兩蔣政權性質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政權」這問題來討論，絕不能擴大解釋到台灣社會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問題，而且也不能把「半封建半殖民」照字面就等同於舊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或許，「黎文」所說的「半封建半殖民政權」是指：失去了大陸的社會下層建築的國民黨政權，遷逃台灣後仍舊維持其在大陸時期的上層建築——「半封建半殖民」的體制性格，有這樣的意思吧。如果是這樣，他所提出的看法也並非全無道理，有必要繼續討論，不要把話說死。（在此必須先說明，本文作者並不同意「黎文」的這種看法，最好「黎文」作者能再一次說清楚他的原意，似促進大家熱烈討論。）

五. 左的「幻視」

如果說「黎文」中的「台灣目前形勢的宏觀考察」一節，其內容太偏重於對李政權的民粹式台獨作為的批判，而太忽略了對李政權表現在維護資產階級的作為（如大力培植壟斷資本、壓制勞工……等）的批判。對於這樣的指摘，本文作者也是同意的。但是，如果據此擴張解釋，說「黎文」認為：「李登輝的最重大罪過，是搞民粹主義式的台獨；因為李登輝要搞台獨，所以才會加強資產階級與民粹主義的力量……才會與美國日本帝國主義勾結……才會嚴重地阻礙了左翼社會運動的發展。」（參看「連結文」），那就誤解過頭了，十分不恰當。也就是說，「連結文」過分推斷了「黎文」作者的原意；認為「黎文」作者只在乎李政權的台獨性格；推論「黎文」的原意是認為李政權為了走台獨路線才會走資產階級的路，其台獨性格是本質，資產階級性格只是次要的衍生的；最糟的是斷定「黎文」把左翼運動發展的主要障礙歸究於李政權的台獨作為而非其資產階級性格的作為，這種說法已從根本上懷疑了「黎文」左的知識水平。上述「連結文」的所有推論，隱約有一中心觀點在起作用，那就是一開始就質疑「黎文」的「統獨」體味太濃（常常意謂著「統」而非「獨」）左的太稀，是不是這樣呢？（有些左的朋友患了「統的過敏症候群」，只要一聞到有人罵台獨就過敏起來，就劃清界線，但是對台獨的作為卻有相當免疫性，視而不見若無其事）奇怪的是，連結諸君對「黎文」的一句「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的話，獨有所鍾，作了一大串的演譯，但是對於「黎文」中稱李政權為「民粹式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的

部分卻推諉「黎文」「完全沒有解釋」，視而不見，蒙頭就認定說：「統獨這條分界線如何深刻地影響了黎文作者的判斷。」實際上，「黎文」既然已把李政權的性質定為「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並且也接著說了「政權的資產階級性格更加凸顯」這句話，「黎文」作者不是已很清楚地表明了李政權是資產階級政權的看法了嗎？怎麼會看不到李政權的主要性質是資產階級性質呢？怎麼可能認為李是唯心的想搞台獨才扶植資本家勾結美日帝國主義走資產階級路線呢？怎麼可能簡單地認為左翼運動發展的主要障礙是李政權的台獨作為，而不是其資產階級作為呢？（這些在在都表現了連結諸君對「統獨」的過敏體質。）我們只可以說，「黎文」的「宏觀考察」認為，李政權的台獨作為所挑動的兩岸戰爭危機是「台灣目前形勢」的最大危機最大的社會矛盾，這樣而已（戰爭不是人民的最大危機，是什麼？難道統獨戰爭與左翼無關嗎？），不能說他看不到經濟矛盾階級壓迫的問題，否則他不會提出來李政權是「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的說法吧！

還有，對於「黎文」批評李政權特意邀請日本的大右翼政客石原來台「刺激中共、製造兩岸緊張」的觀點，「連結文」也頗不以為然；認為「黎文」批評的重點只放在「刺激中共兩岸緊張」，而不放在批判石原的「右翼」政客；換句話說，連結認為對於石原訪台之事可以不要以統的觀點、中國民族的觀點批判他的製造兩岸緊張反華言行，而應該只用左的觀點批判他的「右翼」行徑，左派觀點應該只管左派的事，不要管統的事中國人的事。這又把前述的「統的過敏症」發揮到極至了。李政權邀石原訪台，其目的是在利用石原的「右翼」來對付「左翼」嗎？不是的，是利用石原的反華反中國的日本法西斯形象來對付「中共」的，這也是眾所皆知的。如果石原訪台的政治意義在他的「右翼」，那麼當天到飯店去抗議示威、丟雞蛋的應是「純左派」的朋友而不是統派的朋友，但事實上「純左派」的朋友一個不見，全都是統派的呢！可見得石原訪台是統獨鬥爭，怎可以只用「幻視」的左眼來看呢？

就像石原等日本的「極右翼」政客，他們的資產階級右翼性格與反華蔑視中國的法西斯性格是一體的兩面互為表裡的，李政權的資產階級性格與台獨性格也是一體的兩面互為表裡不可分割的，不但要看到他的經濟性質也要看到他的政治傾向，台灣的左翼卻自我切割，只看到他的「右」卻不情願看到他的「獨」。在台灣，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往往集中表現為，反共或台獨。不能只批判他的右而看不到他反共反華的一面，或只批判他的資產階級作為卻不願面對他的反共反民族、台獨的那一面。因此，不要把左右統獨切割來看，而是要統一的辯證地來看才對，不能迴避統獨的問題，不要認為統獨只是簡單的民族感情的問題，或認為它只是現象不是本質。對台灣的左翼來說，統獨問題也往往是階級問題的一部分，往往是階級問題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

介紹<<噤聲的河流>>一書

陳秀春

有感於金寶瑜前輩在<<左翼>>第二期，反省到台灣的社會運動沒有世界觀，往往忽略了『白金結構體』。因此，我將介紹<<噤聲的河流 - 大壩的生態學與政治學>>一書，呼應金寶瑜的看法，並將此書獻給忙碌於戰鬥中的朋友。

<<噤聲的河流 - 大壩的生態學與政治學>>的作者派屈克·馬庫里(Patrick McCully)，現服務於『世界河流組織』(International rivers network)。愛爾蘭裔的派屈克博士，曾長期協助印度納爾馬達運動，這個反大壩運動長達二十年，不但集結了印度來自各種專業的知識份子投入，更是世紀末印度人民悲壯的史詩。

在1992年的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上，在美濃舉行了第一次關於美濃水庫興建的公聽會，從此運動便展開了起來。社會運動的思考體系，是支撐行動的基礎。當時，苦於沒有理論的支持，後來終於找了一篇篇名為『一場關於大型水壩的爭辯』，作者是土木工程師出生的菲律普·威廉士博士(Philip B. Williams)。

菲律普·威廉士博士為『世界河流組織』的首任主席。他反對大壩的歷史，要從他參與興建大壩談起。他曾回憶那時每天進入工地，都會碰上抗議的印地安人，他開始反思大壩造成對文化、社會、生態、經濟、政治等面相的衝擊。之後，他放棄投入建大壩的行列，在舊金山的柏克萊附近組織了這個團體。『世界河流組織』結合各種專業人士，施壓於美國政府，停止在美國國內繼續興建大壩。他們也緊盯著世界銀行，解除對第三世界的大壩貸款計畫。

1997年，在第一屆『國際反水庫』大會上，來自二十幾個國家的代表(包括台灣)，宣讀了『庫里替巴宣言』，宣言中提到：『……水庫生產的電力、灌溉的土地不如預計。有了水庫之後，洪水變得更具毀滅性。水庫造福的是大地主、財團與投機政客，卻霸佔原本屬於小農、鄉村工人、漁民、部落、原住民與傳統社區的土地。我們的奮鬥所以一致，乃因為我們對抗類似的強勢利益集團，對抗同樣的國際債權人、同樣受多邊與雙邊援助與貸款機構、同樣的水庫施工與機械公司、同樣的工程與環境顧問，以及同樣的受高補貼政策所扶持的高耗能工業財團。我們的奮鬥所以一致，乃因為各地受水庫危害最深的人民均被排斥在政策之外。政策的擬定全操縱在技術官僚、政客及財閥手中，他們的權力與財富因建水壩而增加。我們奮鬥的一致性使我們深信，終結毀滅性水庫的時代，既必須有可能。同時我們既必須又可能實現另一種公平、永續與有效的能源供給與水資源管理方式。……』。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59年到1989年，全世界的水庫移民數量達三千萬左右。庫區反抗者被跨國公司結合本地鎮暴部隊屠殺的無以計數，最著名的例子是瓜地馬拉的里奧內格羅村的屠殺事件，僅僅在1980到1984年間，就使72000人死亡或失蹤，這些大都是馬雅人。

世界反大壩的歷史已有十二年之久。所謂『大壩』是指壩高五十公尺以上的蓄水工程體，在1900年時，英國的大壩已是全世界的總和。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壩工業從美國輸出，成為科技官僚、政治領袖、民族主義者等人士視為進步的象徵。現今，估計組合的大壩蓄水量高達10000立方千米，相當於全部河流流量的五倍。

本書可以稱之為反大壩運動的『宣言』，不同於過去社會運動的形式，反大壩運動較全面性地從文化、社會、生態、經濟、政治、性別等角度，反省資本主義發展的迷思，而且提出更為持續、公正、有效的資源技術的管理，這也說明了反大壩運動促成草根民主運動與專業人士結合的可能性。★

(本書中文譯本即將初版，意者請洽「美濃愛鄉協會」，TEL:07-6810371)

編輯報告

所謂的「千禧年」降臨，但台灣社會卻被一片烏雲籠罩著：反動派開始對台灣自主國營工會進行打壓，企圖奪取它的領導權。近年來在國營工會扮演火車頭的電信工會已被資方取得控制，在其他國營工會改選過程中，我們也可看到資方介入的種種劣行。職是，《左翼》編輯部特別主辦了一場座談會，希望能夠喚起大眾對於這一議題的重視。同時，我們也訪問了電信工會的理事長張緒中，請他談談這次選舉的過程。這些訪談資料都呈現在《左翼》第三期中。另一方面，在電信工會北三分會任職的王醒之，則從另外一個角度，省思電信工會改選失利所存在的問題。

林深靖的〈當代左翼〉探討了左翼在晚近的發展與時代意義，延續《左翼》第二期有關「何謂左翼」這一議題的討論。另外，第二期有關WTO與全球化的議題也繼續引發許多深入的討論，林孝信的〈全球化的世紀回顧〉是在探討戰後美國所建構的國際機構(包括WTO)如何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金寶瑜的〈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看藍色條款和綠色條款〉則在指出藍綠條款的虛假性，壯大左翼的力量才是真正保護我們最好的憑據。王墨林的〈共同體內部的排除構造〉，對台灣當前流行的共同體與市民社會概念做了嚴肅的檢驗與批判。成令方的〈階級與婦運〉則是從階級的角度指出當前台灣婦女運動的侷限與未來發展方向。

從《左翼》第一期黎建江發表〈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及第二期連結雜誌社所提出的質疑意見後，台灣社會性質已經成文一個熱門的討論議題，本期又有梁三的〈可議的提問〉及官土生的〈左的「幻視」〉針對雙方的看法提出個體的評論與意見。我們希望這樣建設性的對話能夠在左翼的論壇上持續出現。本期的左翼書評是由陳秀春為我們評介馬庫里的〈喋聲的河流〉，一本探討大壩生態與政治的好書。

《左翼》出刊後，我們收到了許多小額的捐款贊助，我們目前正在整理相關的資料，將在第四期時將捐款的資料公布，以昭公信。謝謝這麼多朋友對《左翼》的關心與支持，我們只有以更嚴謹負責的態度辦好這份刊物，才不辜負大家對《左翼》的期望。

左翼 第三號

出版日期：2000年1月24日

通訊地址：234永和郵政549號信箱

E-Mail:twleft@sina.com.tw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四號

二刷

【爭鳴與求是】台灣「左翼」何去何從？	《連結》編輯部 /1
【原運再起】從部落初探原運的再起	夏曼·藍波安 /8
原住民族運動再起	胡德夫 /10
三千原住民扯下一個大總統	林深靖 /14
總統大選的幾點觀察 王立民 /17 「自由主義大野狼」李敖	趙剛 /21
【國際連結】納粹幽靈再現——極右翼政黨在奧地利	俞力工 /23
空間中身體的形式與移動	黃旭 /26
善款足以濟貧解困，自殺禍在人謀不臧	彭明輝 /28
中原口土石流讓高官們現形	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30

台灣「左翼」何去何從？

—關於統獨問題和社會性質討論的幾點意見—

《連結》編輯部

前言—我們對這場討論的基本態度

近來圍繞著《左翼》第一期中黎建江先生的大作〈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以下簡稱「黎文」）有著熱烈的討論，本刊曾撰寫〈對於黎建江「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的幾點意見〉一文（以下簡稱「幾點意見」），於《左翼》第二期發表。之後《左翼》

第三期中又有梁三先生〈可議的提問—給連結的幾點意見〉(以下簡稱「梁文」)及官土生先生〈左的「幻視」—就教於連結諸君〉(以下簡稱「官文」)兩篇文章，反駁本刊所提出的疑問與意見。我們似乎看到一場關於台灣左翼運動路線及社會性質的討論即將展開，這對於長期以來缺乏嚴肅思想論辯和路線討論的台灣「泛左翼」來說，絕對是一個進步。

在正式回應梁文和官文以前，我們覺得有必要重申本刊對於這場討論的一些基本態度，而在拜讀過梁文和官文之後，我們也的確發現大家在這些基本態度上有著同樣的共識，我們願意一併在這裡提出來：

首先，討論各方都認為有必要嚴肅的展開對台灣社會性質（或政權性質）的討論，因為「科學地認識社會性質是改造社會的前提。…任何一個左翼團體，沒有經過社會歷史的學習、社會調查、社會分析以及作為總括的『社會性質』論辯、定性，運動是很難開展的。經過它，才能使所謂左的觀點，不再空洞教條，開始有血有肉，有具體的內容，有動人的說服力，才會產生社會動力，才能夠改造社會」(引文摘自官文)。是的，就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所以我們無法認同黎文將在美日帝國主義支持下，推動土地改革，企圖剷除農村中的土地租佃關係，並大力推動資本主義工業化，客觀上孕育出一支數量龐大的勞動階級隊伍的兩蔣政權界定為「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雖然我們尚未見到黎先生的進一步說明，但我們相信也希望前輩正準備詳細論證其觀點。

其次，既然我們要認真的探討台灣社會及政權性質問題，也認識到這種討論對台灣社會改造的重大意義，那麼就必須對理論有著慎重的態度，對於我們做出的任何哪怕是初步的結論，都應該注重準確和嚴謹，套句梁三先生的用語，就是要反對那種「政治論述上的輕薄與傲慢」的態度。基於這樣的立場，我們對於黎文斷然將李政權定性為「極右」的做法不能贊同。李登輝政權固然是右翼的、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但是我們能將李政權的路線等同於法西斯、納粹(不論新、舊)，或是各國的極右勢力(三K黨等等)嗎？這點不是連梁先生都認為「或許有待論證」？我們長期反對右翼台獨勢力以空洞激情的訴求號召群眾，掩蓋真實的社會矛盾，對於台灣政治文化中以抹黑對手為能事的作風不以為然(自詡超黨派的宋楚瑜被比擬為希特勒、鴨霸的陳水扁和高喊新秩序的趙少康被罵成是法西斯等等)，如果我們重蹈覆轍，那與資產階級政客玩的黑函手法又有何異呢？

更重要的是，國際工運歷史說明了這種「扣帽子」的作風會造成模糊工人階級奮鬥方向的嚴重後果，使得在真正的法西斯等極右勢力興起時，無法分辨誰是主要的敵人，誰是次要的敵人。一九三〇年代的史達林主義者更曾經痛罵可能的盟友—當時的社會民主黨為「社會法西斯」，當成是比納粹法西斯更可惡的敵人，結果造成「左翼」無法有效對抗納粹，導致人類史上的大悲劇。撫今追昔，殷鑑不遠，我們在進行「政

治論述」和實際活動時能不慎乎！

同時，我們也訝異梁文中竟然侈言「語意是不斷變遷和發展的」，所以「有地主/農奴剝削關係」的社會、「官僚買辦大資產階級佔盡社會經濟生活優勢」的社會，甚至女性主義所反抗的「父權封建社會」都可在關於社會性質的討論中被界定為封建社會！如果對於「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社會性質討論中的核心概念，我們都可以用「語意不斷變遷發展」的理由任意使用，那麼我們又如何「科學地認識社會性質」呢？討論又要如何進行下去呢？

對左翼理論及歷史有基本認識的朋友，應該都清楚關於社會及政權性質的討論是馬克思主義者在制定其社會變革路線時的重要基礎工作。要認識一個特定社會的性質，就必須探討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及特性，把握該社會中各種生產關係、社會經濟成分間的關係，並由此判斷該社會的特性。斷定某社會的性質的主要標準在於何種生產關係（不是梁文所謂「剝削關係」）佔主導地位（也絕不是有何種生產關係就是某種社會，否則存在奴隸制的南北戰爭前的美國就竟然是奴隸社會了！）。

政權性質討論的則是某一政權在特定歷史階段中究竟在捍衛何種制度，該政權與社會各階級有什麼樣的關係，在根本上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而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對「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概念都有清楚明確的定義，各流派間對這些概念的定義容或有所爭論，對於如何劃分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容或有所出入，但根本不可能任意的使用語意，把基本不相干的概念混淆在一起。我們無法強迫別人一定要相信並使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但我們希望梁先生能清楚說明您關於封建社會的定義及理論基礎。

要知道進行社會及政權性質的討論並不是基於純理論上的興趣，而是為了讓運動者對從事的運動釐清目標，幫助運動者做出敵我判斷，認清運動的主體、敵人和朋友是誰，確定運動者對現政權的態度。對社會性質的界定不同，運動的任務和策略就不同，這是一個攸關運動成敗的問題，在理論概念的運用和具體的社會歷史分析上自然不能輕忽。所以如果我們強調討論社會性質的重要意義和建設左翼隊伍的重要意義，那麼就必須在關鍵的理論問題上避免輕率，重視嚴謹！

最後，我們感受到討論各方都是以尋求「建設性的對話」為目的，都是希望藉討論澄清一些基本觀念，互相學習、爭論，以謀求共識，尋求合作的基礎。我們也對《左翼》以「結聚台灣自視為左翼的個人與團體，建立一支台灣左翼的隊伍」為目標，並期望能「在左翼的論壇上」開展「建設性的對話」，感到感佩。基於同樣的態度，所以我們不揣淺陋，草成本文，針對我們認為重要的課題提出我們初步的見解。

這場討論的三個核心問題

討論發展到這個階段，我們已經可以釐清這場討論所涉及的三個核心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對台灣社會及政權性質的討論。此問題是由黎文對兩蔣及李登輝政權性質的界定及本刊的疑問而來。由於黎先生至今未對他的界定做出更詳細的解說，本文將無法回應黎先生的見解。不過，本刊在這裡仍要強調，由於這個問題牽涉到運動的任務與策略，所以我們十分關注這個問題。具體來說，黎先生界定兩蔣政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權，不過沒有說明他對台灣社會性質的看法。如果台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話，那我們的任務應該是「反帝」和「反封建民主變革」--改造封建的土地關係、建立代議民主政治以及爲了建立一個更強大資本主義民族市場(如「大中華經濟圈」)而爭取民族統一。也就是去除妨礙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讓資本主義能更好的成長，而不是通過社會變革根本改造資本主義。究竟那一條路符合目前台灣的實際呢，讀者可以自行判斷。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從左翼的角度、階級的立場看待統獨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對當前中共政權(和中國大陸社會性質)的討論。

第二個問題的緣起是由於本刊在「幾點意見」一文中指出統獨的分界線深刻的影響黎建江先生對形勢的宏觀考察，之後引起梁文和官文的強烈反應，梁文批評我們企圖把《左翼》定性爲統派，認爲我們的提問「未能脫避主流社會單一思維的窠臼」。官文「以一般的倉促爲文常患的疏漏的毛病」來替黎文解釋，並診斷出《連結》得了「統的過敏症候群」。

其實黎文中「台灣目前形勢的宏觀考察」一節的七個段落中，除了開場白外，有四段在大力批判李登輝的台獨路線，在第三節「台灣當前左翼運動的主要問題」中又寫道：「李登輝爲了鞏固其政權，並且朝向台獨的目標，他強化了大資產階級與地方派系的力量」！在黎文的分析考察中，「統獨」很清楚的是他進行事實認定和價值判斷時的重要準則，更重要的是黎文既然是談台灣目前形勢的宏觀考察和對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文中的焦點卻在批判李登輝推動台獨，容易讓人覺得黎先生認爲主張台獨必然是右翼的立場，卻未清楚說明如何從「左翼」的觀點反對台獨，那麼主張統的是不是就必然等於左翼的立場呢？(同樣的，官文也容易讓人有這種感覺)我們對這樣的論述感到有所疑問，希望能看到黎先生進一步的說明，深化討論，這和「扣帽子」，企圖將《左翼》視爲「去正當性的存在」並無關係。我們深切的盼望黎先生(以及官、梁兩位)能提出您們對左右統獨關係的明確看法，我們也願意和黎、梁、官三位及其他朋友交換我們關於統獨問題的意見討論「左右統獨」的關係，也不可能不直接面對現階段中共政權性質的問題，我們也盼望討論各方能對此問題進行見的交換。

我們的觀點是階級的觀點，而不是民族的觀點

官文指出我們患有「左的幻視」，因為我們只用「左」的角度看問題，卻不用「統」的觀點和「中國民族」的觀點來看問題。沒錯，我們正是希望能真正從「左」的觀點、階級的立場來看統獨問題，而不是先驗地、情感地站在「統一」（或獨立）的立場，更不是站在「中國民族」（或是台灣民族、大和民族等）的角度思考統獨問題。在〈發刊詞〉中，《連結》編輯部已經清楚表明：我們認為「政治問題是社會、經濟權力的集中表現，是階級問題」，我們也會嘗試把社會經濟制度、文化現象、全球化等問題視為階級問題，並積極地尋找解決之道。

官文曾說到：「不要把左右統獨切割來看」、「統獨問題也往往是階級問題的一部份」，這和我們的觀點是接近的，我們懇請官先生進一步談談如何將左右統獨「統一的辯證來看」！如何以階級的角度思考統獨問題！

到底在統獨問題上真正「左翼」的原則是什麼呢，我們願意舉出兩點意見：第一，階級的利益是最高的準則，所謂「全民」的、民族的利益皆應服從階級的利益，我們反對假民族、全民之名，掩蓋種種社會矛盾，同時也應創造各種條件，爭取各國各民族被壓迫民眾的聯合，不讓狹隘的民族與國家的界限束縛階級的團結。第二，真正的左派是徹底的民主主義者。我們追求的是政治經濟社會各層面的民主，更和中共和部份台灣統派、「左派」不同，我們主張人民有民主自決的權利。當然，主張人民有自決的權利，並不代表我們認為可以無視主客觀條件，貿然的行使這項權利。不知道，《左翼》的朋友和官、梁兩位先生同不同意我們的見解呢？

對台獨的評價和台獨運動的性格

前面提到黎文和官文容易讓人覺得他們有一種「台獨=右翼=壞人」的邏輯，部分自許「左派」的朋友也認定台獨是美日帝國主義一手造成的。相對於某些「左派」視台獨如死敵的做法，我們認為應該要將台灣民眾長期以來反對國民黨等一切外來統治者，追求當家做主的要求與情感和依附帝國主義，企圖鞏固資本主義體制的台灣資產階級右翼台獨運動予以區分清楚。

不可否認的，數百年來台灣民眾不斷受到外來統治，加上國民黨來台後的貪污腐敗、專制獨裁以及建立在種族（針對原住民）、省籍歧視上的語言、文化等政策，民眾自然容易產生一種類似反民族壓迫的情緒。事實上連中共都承認台獨產生有複雜的社會歷史根源，台灣人民要求當家做主的願望是合乎情理的。

另一方面，雖然台灣很難說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領土，但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奪取台灣為殖民地，這是近代台灣和中國大陸分離的根源。中共在大陸取得政權後，美日帝國主義為防堵共產主義的擴張，積極在台扶植代理人，除了支撐蔣政權外，也鼓勵大地主及資產階級政客展開台獨運動，許多台獨主張的根源都可追溯

到帝國主義策士的口袋中，他們利用民眾反壓迫、爭民主的要求，將運動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台灣逐漸「民主化」、「本土化」後，主流台獨運動的對立面也逐漸從國民黨轉向中共，後來連國民黨主流派也表明「獨台」或台獨的路線，並以國家政權的力量來實踐。

我們必須強調，台獨運動反對中共，除了根源於長期反共教育下仇共怕共的情緒外，中共政權長期的官僚專制、經改後湧現的貪污腐敗、對台政策的大漢沙文主義傾向，造成台灣民眾的疏離與反感，也是極重要的原因。我們也要指出即使目前台獨運動的主導權是牢牢地掌握在資產階級手中，我們仍不能否認，有一些主張獨立的朋友們是真誠的站在被壓迫民眾的立場，希望推動台灣社會的改造，其中更有不少人自認站在「左翼」的立場。

作為運動者，我們應該善於區別廣大民眾反對外來統治、反對壓迫的素樸願望和資產階級右翼台獨勢力這兩者，應該設法使前者在思想上、組織上逐漸脫離後者的影響和控制。而不是將台獨的根源主要推給帝國主義和少數人，忘記民眾反壓迫要求的正當性，忽視中共應負的責任，一開始就站在群眾的對立面，自陷於孤立的境地。如果只是片面宣傳「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或「兩岸人民血濃於水的感情」，卻否定台灣人民有自決或獨立的權利，這種做法只會加強兩岸民眾的鴻溝，客觀上幫助了右翼的台獨運動。

關於「反共」的問題——談談當前中共政權性質

官文中批評李登輝政權或資產階級反共反華的傾向，並提醒我們注意李登輝反共反民族的那一面。資產階級出於維護私有財產的本性當然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台灣的資產階級政客、政黨，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從國民黨主流派到建國黨都是極端反共，也或多或少具有反華的傾向。

關於這些政治勢力「反華」的言行，我們當然反對，這並非表示我們懷抱著中華愛國主義的情操，而是因為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視和排外主義，因為這會產生更多的壓迫和不平等，因為這不利於被壓迫民眾的團結。

但是反「共」呢？這就需要具體分析了。從文意來看，梁文所指的「共」主要指的還是中國共產黨吧，所以我們有必要探究當前中共政權的性質。這是一個國際各左翼派別仍在爭論的大問題，台灣一些「左派」的朋友認為中共還是實行社會主義路線的工人階級政黨。也有朋友似乎不認同上述見解，卻仍認為中共是一個反帝的政權，台灣人民必須結合中共的力量才能反對帝國主義。這些朋友的主張往往使他們認為統一台灣人民反帝反資的唯一道路。（註一）

我們認為，自1978年起中共政權的路線就出現了大的轉變（註二），時至今日，

中共容許並促進私營企業的存在和發展，不但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下降，而且其營運原則也以市場、利潤為導向。至於所謂的集體企業，也有許多實際上是私人企業性質。那麼，我們怎樣看待它全部的社會經濟政策的方向呢？是背向社會主義而面向資本主義，還是如中共所自稱的堅持社會主義呢？在中共新路線下，中國出現一個新興的資產階級，中共的政策尤其便利原本的官僚統治層（包括他們的親屬）轉化為資產階級，對於這樣的現象我們又該如何認識呢？總而言之，中共政權究竟是否還是代表工人階級實行統治的力量，還是已經變為代表資產階級推行資本主義路線的政治力量？

至於中共的反帝性質，我們也要指出，急著融入世界市場並不斷擴大外資引進，最近更力求早日加入WTO的中共，究竟有多少能力與意願抗擊美日帝國主義是值得懷疑的。許多第三世界資產階級政權（如海珊、馬哈迪等等）貌似「愛國反帝」的言論，倡言反美和高舉亞洲價值，卻往往是為了鞏固其統治地位，壓制內部要求民主和社會改革的反對聲音，並讓跨國資本和「民族資本」更便利的剝削本國工人，破壞環境。作為運動者，我們能不區分清楚，小心警惕嗎？

關於中共政權的性質，自然是個很嚴肅而重大的問題，牽涉到一連串理論與實踐上的重要問題（例如，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計畫與市場的關係究竟為何？），並不是本文所能深論的。我們想強調的是，自認為「左翼」的朋友在思考統獨等問題時，應該避免以為中共必然代表社會主義、代表人民的利益，應該嚴肅的面對、認清中共在過去時代的侷限性和「改革開放」後的變化。否則或將會是與虎謀皮，在實踐上造成嚴重的錯誤。

交流對話，促進連結，共同前進

我們出版《連結》的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促進運動圈的討論對話，希望釐清基本的概念（如到底什麼是「左翼」），希望通過討論能夠產生連結、形成綱領路線，能夠推動運動的前進。雖然能力有限，但在未來我們會逐步提出對統獨問題的看法，也希望各方能夠不吝賜教，相信真理會越辯越明！

★

（本文與《連結》雜誌第二期同步刊登）

註一：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勞動黨。最近該黨「2000年總統選舉對策小組」編寫了一本小冊子其中談到：「台灣的新殖民地經濟型態只有在『一國兩制』統一後，才能擺脫美日等國的剝削，並從中國大陸得到滋補，從而維持繁榮與生活方式於不墜」。（見《兩岸和平與戰爭的最終抉擇》第61頁）

註二：中共憲法中也先後出現「社會主義有計畫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兩種提法，然而這樣的提法還有待進一步討論。

從部落初探原運的再起

夏曼·藍波安

台灣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日本帝國被解放出來，象徵結束日帝政權的統治；頓時，藍、紅、白之旗海飄揚在大街小巷、家家戶戶的門前；同時蒸騰著台灣人民「回歸祖國」的興奮，脫離異國統治的桎梏，「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吼破聲帶，高音吶喊，刺破了「天堂」的寧靜。但，台灣的原住民族在深山裡吟唱著祈求山林數神恩賜豐收的傳統歌謠，「萬萬歲」給誰聽呢？

日本人走了，另一類的漢人來了。無論是何種的人來統治台灣，台灣的原住民族在歷史文明的洪流內，在可被追溯的歷史紀錄，顯然地、注定是被征服、被統治的、被剝削的惡運。時空邁入「國民政府」的統治，在五〇年代，一群先進的原住民族知識份子提出「民族自決論」的宣言，不幸地在「白色恐怖」暴風圈外圍的肆虐下，靜悄悄地被「合理化」的「叛亂罪」犧牲寶貴的生命，同時民族意識覺醒的嫩芽被深埋在台灣鮮為人知的歷史軼事的最後一行。阿里山的日出光耀雲海表層的銀白色澤，雲海下的確定是沒有歌聲的世界。

戰後出生的原住民族躍進了漢人統治機制，宣示脫離生母的哺育、生父的教養，自此，方塊文字建構的認知思維鑲入了這一代的腦紋，一言黨的漢式教育，帶著原住民族的孩童，從最接近母親的地方，逐漸航向最最遙遠的海，航向「國民政府」圈欄的「以番制番」的「代打區」。數十年以來，孵出了上千位的老師、上百位的低級警員、數十位的國民黨鄉黨部的主任以及頭腦簡單的職業軍人，當然，還有一些三流的原住民族籍的醫生。這群人，不僅成了部落的新貴階級，也轉型成了宣揚台灣政府「德政」的播音員。從另一個角度來轉換詮釋「德政」的本質深意，即是，這群人業已定型為戳破民族團結的共犯以及無知覺地淪為政黨掩飾「滅族」政策的前哨卒。

八〇年代初期，非師範系統的一群原住民族大專生，勞工朋友，在當時的少許的具有人道關懷的漢人朋友的鼓勵下成立了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它的成立備受國民黨政權的「關照」，深受「代打區」山胞同志的「藐視」。彼時，原權會和其他社團合辦了許多街頭運動的抗爭；如反雛妓運動、刪除吳鳳的故事、原住民族正名運動、東埔挖墳事件、蘭嶼——驅除惡靈運動、反瑪家水庫……等等，於是原住民族的街頭抗爭運動，頓時蔚為風潮，原運人士浮出檯面轉譯族群的訴求，粗糙描述族群抗爭表面情感。

這群原住民族青年朋友異於「德政」光環下的山地同胞。他們探索因種族、文化的差異，基於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苦難當頭初試進行思索、發掘、認識而至於街頭

抗爭的表達，展現了那一階段原住民族知青單純的心思。

然而，八〇年代，原住民的街頭運動，在原權會的主導下，並非是一個有組織架構、有長期研擬運動策略計畫的社團。當原權會的組織成員漸趨複雜，內部的共識相對地脆弱，加之外圍豪勢族群、政黨的利用與分化，原運如曇花一現地雲消霧散，成了令人惋惜的歷史回憶。可是原住民族的苦難在「原運」人士的階段性的重挫後，繼續燃燒，苦難的輻射線蔓延到部落族人世居的地底，幼童心靈的深處。

一九九九年，九二一的大地震，震裂了台灣的地表。對於原住民族災胞而言，確是撕裂了所有的一絲絲的掙扎求生的希望。當電視媒體報導說，原住民的災胞們「頗能適應大自然的災難」時，我們發現原住民的災胞被大社會之「愛心」堆積到最邊緣的角落，災胞們無語問蒼天。少許的「原權會」的原始成員，為此孕育再度出發、啟動「退化」的「族群意識」之輪軸，我們的名字是「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原權會部落工作隊」成立的宗旨：

1. 從出生的土地出發。脫離大都會的游離戰場，脫離吶喊的悲情。在最接近母親的部落，深入匯聚族群面臨的苦難與部落族人建立情感、凝聚力量。
2. 在各族群居住的部落建立工作站，傳播原住民族相關的資訊。
3. 成立自治刊物——《原住民族》。根植於建立部落的發言天地，建構各族群論述的空間。
4. 依據以上簡易的宗旨，重新塑模原運成員之特質。

「原運再起」的「部落工作隊」，從部落啟動，從現實出發，立足現實，企圖在種種的矛盾中建構務實和永恆的奮鬥。我們深深的瞭解，「工作隊」所面臨的困境：如來自部落族人的再度質疑、源自各個數不清的「原住民族團」的否定、原住民民代、公職人員的唾棄以及優勢族群各個政黨的藐視，這些皆是我們可預期的結果。

一九八二年，土城海山煤礦災難，死亡人數近百，八成是阿美族原住民，彼時不見原住民知青關心的實際行動，僅是胡德夫君為災難的族人舉辦「為山地而歌」演唱活動。

一九八八年，蘭嶼的達悟族原住民，為抗議「世紀之毒」的核廢料貯存於該島，抗議台灣政府合理湮滅達悟人權，郭建平、施努來孤單的起義，卻不見原住民知青伸出關懷的手心。

一九九九年，九二一的南投集集大地震，驚動了台灣人的愛心，卻依然感動不了原住民知青的覺醒、原運朋友的再結合。天災、人禍大大小小的事件不斷地發生在原住民族身上，共同的苦難只有加長不會縮短。

「原權會部落工作隊」重新醞釀原住民族運動，其主要的動機乃建基於回歸到出生的部落，最貼近母親的地方，分擔最低層的族人之苦難，以行動替代浮誇無實的言

論，不倚賴任何政黨的奧援，堅持走自己的路。我們深刻體認，這是一條崎嶇難行的黑暗之路。

二十世紀，全球化的風潮凌虐地表上所有的原住民族、弱勢團體，進而一些民族靜悄悄的消失了。台灣的原住民族不是有此危機嗎？我們能逃過下個世紀全球化的肆虐嗎？「部落工作隊」不奢望鑽出雲層欣賞阿里山日出的美，但堅持有尊嚴地活在雲層下的部落。我們的再出發是拋棄過去的悲情，省思原運過去的挫敗；在部落的土地種下「自決」的幼苗，並在都會裡蒸騰弱化的族群意識；這是原運再起的機制。★

原住民族運動再起

胡德夫

1982年海山煤礦爆炸，許多原住民同胞罹難，我以「編輯作家聯誼會--少數民族委員會」召集人身份發動關懷行動，並對政府所謂的「山地政策」進行嚴厲的批判；在新公園舉辦的演唱演講會—「為山地而歌」，作歌、唱歌、募款為難胞，當時我寫作了一首災難歌「為什麼？」在現場演唱。

而政府卻派出許多的警察、便衣在現場穿梭，我太太陳主惠懷著身孕在公園裡發傳單，參與節目的原住民青年在台上放聲高歌並大聲急切地說出對當局政策的不滿，直稱政府長久以來欺騙、壓迫原住民，其政策是滅族政策，蘭嶼核能廢料保管場就是具體的官騙民的建設…等；大家並連續在黨外雜誌發表文章控訴政府，台大「高山青」的學生告訴我：調查局已派人和他們接觸，有的已被威脅而停止公開與我們見面，有的雖與我們見面但卻已被威脅、利誘，因此必須定期向調查局幹員提出我的活動報告。

同時，我的母親也被國民黨中央高級黨工（中央評議委員）--謝貴約談過，希望透過母親勸我不要再進一步進行政治團體的籌組，最後說：中央黨部可籌措500萬給我做為發展其他有名無實的社會團體的費用，而不要以「原住民」一詞為名來籌組團體；否則我可能被送到綠島等語震驚母親，但最後卻被我母親嚴厲拒絕與之合作。我所居住的花園新城住家電話被竊聽，我的行動不斷有人跟蹤，我的左右不斷有人接近來探問我們的計劃、動向。我的姐夫當時擔任家鄉的鄉長一職，常被約談，要求其成為說服我的中間人。我的住所裡面有鼓勵支助我的妻子，有我們的第二代結晶—吉拉夫，窗外有祖靈居住的中央山脈最北端，白天我看著山，晚上山看著我，我怎能背棄這些一直要我勇往直前的呼喚聲！

監視、監聽及威脅算什麼？！比起民族的淪亡，它們算什麼？！1983年10月我們這些核心份子開始籌組成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的組織工作，並訂定12月29日舉行成立大會。成立大會中有的成員提議應命名為「山地權益促進會」，「高山青」學生提議「高山族權益促進會」一名，我則提議一名稱是在此之前我常在各式演唱會上常用的開揚白：「我們是原來就住在台灣的民族」。並請人類學者王志明幫忙找一個更貼切的英文譯名，即以「INDIGINIOUS PEOPLE」來稱之，中文則譯為「台灣原住民」，結果這一名稱獲大部份開會會員的贊成而通過，最後新成立的團體正式命名為「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

原權會成立之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在1984年推派會員林文正（伊凡·尤幹）突破歷來原住民選舉的怪現象 -- 同額競選，參加了山地山胞省議員選舉。我們期待藉此機會，經由演講等選舉活動傳達我們組織的理念給同胞了解，果然，我們所到之處無不引起同胞的歡迎，但也受到了許多的阻礙，尤其公務人員被盯的很緊，被恐嚇說如果誰敢支持我們，將受到嚴重的處分或調差的人比比皆是，這是最令我們痛心的！

記得在陪同依凡·尤幹進入南投縣仁愛鄉霧社村的莫那·魯道紀念碑前致意的那個午餐，我們所喝的飲料裡竟被人摻了使人尿失禁、昏迷不醒的藥。我和依凡，跌跌爬爬地到莫那·魯道紀念碑前才倒地，最後被送往埔里基督教醫院急救。第二天我倆仍以虛弱的身體但卻益發堅定的心志，繼續前往仁愛鄉內的萬大村和梅源村拜訪泰雅族同胞。但沒想到在梅源入山哨口處卻被南投縣副警察局長率了三十名左右鎮暴警察圍成人牆把路口封死，擋住去路。眼見伊凡交涉不成，我便抽出美工刀插在腹上說：請讓路，這是進入保留地的路，保留地只有一整片，並沒有分南投縣或台東縣，這是我們原住民的地和路，再不讓路我就當場切腹！我就是流血倒地也要過去，一切後果由你們負責。說罷我就往我腹部向右劃出一條血道，警察局長大驚之餘只好讓出道路，我便大步向著中央山脈深處 -- 踏月村而去，只留下依凡和仍與他爭執不休的警察。

1983年鐘辰良會員在花蓮結婚，會員大都去參加。當天因為在嘉義中埔剛好舉行「吳鳳紀念館」落成典禮，立法院長吳延環和內政部長共同主持公祭及紀念會。我得知消息後立刻率領依凡，並阿里山的鄒族同志石明雄、汪啓聖、安淑美共五人，趕往現場舉起白布條抗議，拉出「吳鳳神話是假的！」、「吳鳳是奸商！」等標語，卻被八、九名刑警圍毆，我被制服後以五花大綁用棍子串起把我像豬一樣挑到車上，送往東埔分局製作筆錄，我拒不受訊，拒絕簽字，警察當夜就把我給放了。

就在我剛當選第二屆會長時，有天伊凡·尤幹（林文正）與夷將·拔路兒（劉文雄）突然來訪，他倆表示：希望我能夠讓出會長一職，讓夷將當會長，由伊凡當秘書長。我當時百思不解，因為原權會除了提供秘書長每月才新台幣5000元的微薄津貼外，會長根本是無給職，對他們的生活一點也沒有幫助，反而是負擔！由於當時伊凡已被

謝貴安排到商業總會上班，而劉文雄大學剛畢業也正準備接受安排，他倆為何要這二份工作？由於伊凡說他倆並不想讓謝貴安排他們的工作，希望能為同胞盡心盡力，同時不久後，郭吉仁等幾位會員也認為我南下參選，已荒廢許多會務，因此希望我能考慮讓出會長職位。

在以上諸多的考量下，包括：這二位謝貴的高山青成員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必須依附國民黨來解決所謂的就業溫飽問題，這絕非運動之福，因此我就在同年二月間召開的臨時大會上宣佈退位，並輔選夷將當選第二任會長，伊凡擔任秘書長。原權會在夷將接任會長後，一切的會務在會員、執行委員的努力下做了許多的抗爭和組訓，會務推動得有聲有色，使我覺得讓位是對的，但是卻仍常擔心國民黨積心思慮想弄垮原權會的陷阱是否就在眼前？！

果然接著而來的「導正專案」的爆發驗證著我的憂心。由民進黨立委吳淑珍(陳水扁之妻，陳水扁擔任影子立委時期)揭露的資料顯示：國民黨情治單位的資料說明已退出會長一職的我和現任的夷將、伊凡等人皆收受了國民黨的金錢收買，甚至立委朱高正也在報紙上呼籲：胡德夫在那裡？應該出來說明清楚！關心我的朋友張富忠和范巽綠夫婦急忙來我住處詢問我，我告訴他們我是被抹黑的！但夷將及伊凡他們兩人，我一直從以前就知道他們有這些軟弱的地方，但又不能直接在當時為澄清自己而提出我對他倆的質疑，來傷害剛剛起步的第二屆會務和許許多多的會員，於是我選擇保持沈默，默然接受大家的指責和批判。

期間，最生氣的當然是我的妻子，她說自原權會成立之前一直到成立原權會，乃至到我退位，我們的家庭開銷絕大部份是用在會務和學生工作上，而我們家就只有她在辛苦地做錄音工作養家並支持我和會務，可知她所受的打擊是多麼的大！她是瞭解在整個混沌不明的「導正專案」裡，我是清白而無愧的！

在戒嚴時期成立的原權會，歷經很長的一段慘澹經營的過程，但是有許多後起的所謂原權會領袖人物(尤其是教會出身的長老教會原住民事務工作者)在戒嚴時期卻都是旁觀者，解嚴後才一一走進運動當中。另外也有許多的文化工作者和學生在當時也都是採取旁觀態度的明哲保身派。他們在最危險和最困難的時候保持自身的平安，不過問民族事務，等到了「原住民」一漸為同胞及大社會所認同後才一窩峰出來「運動」，這現象是整個原住民運動失敗的地方。「民族遇大難，還得等待時候，等待最適合自己的時候才來參與解救的工作」，這是一種「認知」的悲哀，也是民族淪喪的開始。

去筆至此的今天已經是1999末而將進入公元2000年了，原權會的運作已幾近停擺，創會時的精神已經淪喪，原權會的諸位領袖們，尤其在近幾年來都忙著卡位於行政體系中新成立的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中。夷將、麥春連這二位曾經把運動帶到「民族V.S.政府」位階的領袖，一個忙著由中央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藉著民進黨的政治力量

的推介)到北市原民會卡位，進入體制內享受職位所給予他的種種利益，而不再可能回到原運的使命裡；麥春連則在一次談話中告訴我，他是多麼想進入台北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裡謀得委員一職，而不想做現在的工作（長老教會嘉蘭教會牧師）。

我聽了這一番話頓時感到：太多的原運重量級人士投入各級政府原委會機構中當委員，而進入體制內接受收編，標誌了前一階段原住民運動早已劃下了休止符。其中又以巴燕·達魯（陳金水）和夷將·拔路兒（劉文雄）爲了競爭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選舉過程，其間表現出來的惡質選舉文化，更是早已忘卻了過去運動的精神，讓關切民族問題的原住民同胞大失所望，也爲年青人立下了非常不良的示範。

原權會曾在以前完成過一些階段性的任務，但是距離最高目標「完成自治的任務」尚遠，面對這種難堪，我深深覺得，回顧起來在這整個運動之初，我的責任是何等的大，而我卻沒能好好的讓運動發揮光彩而偉大，這是我該深切檢討的地方。在運動中遇到像「導正專案」這麼大的摧毀性惡運時，我亦沒能以足夠的「智、勇、能」，來匡正許多的誤導和指控。

最後，當許許多多的過往景象變成自己心中背負不起的負擔時，發現自己的墮落遠比其他還來得深沈，這是我的悲哀，也是原運的悲哀。民族的悲境中包涵著有我們每一份子的境遇，我們雖曾有過「遲來的覺醒」，但也曾助醒不少同胞。到今天，再一次的升起是必要的，而你就是你自己的升起！再一次的覺醒是比以往的任何覺醒都還來得重要。因爲這次的覺醒要比以往的既深且遠，任務也將比以往更沈重且艱鉅。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大地震後，我寫下 Lu kah Tayen 原住民族，加油！數千年來，我們居住在台灣平原地帶，雖有天災，但沒人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部落生活安和樂利；四百年前，漢人來了！荷蘭人來了！日本人來了！族人被殺戮，土地被騙、被搶，我們退到山區，依靠山林而生存，日本人走了，中華民國來到台灣，大部分的山林被政府劃爲林務局林班，族人賴以生存的森林幾乎被林務局砍光，我們只能依傍在山坡地農作而活。砍光原始林的行爲引來大地反撲，土石流來了！與大地和平相處數千年的原住民卻首當其衝。這不公平！大地懲罰的對象不該是我們。震災發生了！我們得不到公平的重建資源。

這不公平！我們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我們理直氣壯！今天，原住民族運動再出發，我們已經沒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戰！我們不是要挑起爭端，不是要興師問罪，我們要的只是公平！

我將再起！我的民族也將再生！我的同胞也要再度尊嚴地站立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三千原住民扯下一個大總統

林深靖

2000年1月21日，厄瓜多首府基多，3000名左右印地安原住民闖進國會和緊鄰的最高法院大廈。原來負責守衛這些政府權力機構的軍隊決定加入起義的行列，衛隊指揮顧提雷茲上校（Lucio Gutierrez）隨即聯合前最高法院院長索婁札諾（Carlos Solozarno）和「原住民族聯合會」主席瓦爾加斯（Antonio Vargas）共組三人臨時執政團。隸屬基督教民主政黨的現任總統馬華德（Jamil Mahuad）聞訊之後嚇得屁滾尿流，倉皇失色地逃離了總統府。政變過程十分平和，群眾在街頭高呼：「人民勝利，無需武器」。

拉丁美洲國家向來以政變頻繁聞名，根據統計，在二十世紀的前九十年當中，拉丁美洲主要國家先後出現626位總統，其中軍人有188人，其他即使不是軍人出身，也一定要取得軍方支持，當然也難免受到槍桿子的支配。過去的政變多是軍人主導，將軍不爽總統，就幹掉他，驅逐他，自己當老大。這一次的厄瓜多政變卻是相當特殊的例子，因為真正主導示威，由示威而衍致政變的，是手無寸鐵的原住民。3000名原住民蜂起，就將一位大權在握的總統趕下台，真是讓我們心嚮往之。

然而，弱勢者抗爭的成果常脫逃不了被強權者、投機者收割的宿命。就像台灣原住民的血汗抗爭最後是滋養了少數幾位位居要津的原住民權貴一樣，就像過去幾十年艱辛漫長的黨外運動最後是成就了幾位律師、醫師、股市魔法師一樣，厄瓜多原住民起義的成果，很快就被既定的權力結構所侵吞：由美國所遙控的門多薩將軍（Carlos Mendoza，國防部長兼參謀總長），很快就以「避免流血」為名，拘捕了軍階比他低、槍桿子比他少的顧提雷茲上校，自己成為執政團的一員。第二天，大將軍又自行解散執政團，「依照民主程序，回歸合法秩序」，將政權交給了副總統諾玻亞（Gustave Noboa）。因為，美國已發出嚴正警告，如果不遵照指令，即將對厄瓜多進行全面封鎖，切斷一切物資、食糧的來源。

拉丁美洲的印地安人常怨嘆：「我們很不幸，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又太近！」其實，就權力位置而言，一貫將中南美洲視為其「後院」的美國，更像是那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上帝。無所不知，因為CIA有超強的滲透力和最先進的監控系統；無所不在，因為中南美洲的軍事將領絕大多數是在美國受訓，或是接受美國的裝備和供養。美國曾經搞掉智利左翼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曾經在玻利維亞設計捕殺縱橫美、非兩大洲的左翼游擊隊領袖切·奎瓦拉（Che Guevara）。如今，要迫使一個小國的政變流產，是輕而易舉的事。

副總統繼任總統，也繼續執行前總統原有的政策，一切回歸原點，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我們不禁想到，拉丁美洲的特產，除了政變之外，另外聞名於世的就是

激狂放蕩的嘉年華會。有時候，政變本身甚至就帶有嘉年華會的性質：窮人在嘉年華會上載歌載舞，在花燈艷彩中狂熱發洩精力，直到色蠅燈殘，曲終人散，他們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貧民窟，繼續過著灰暗的、邊緣的、被壓榨的生活。同樣的，有原住民領袖瓦爾加斯參與的執政團只維持了短短四個小時。雖然瓦爾加斯大罵門多薩將軍，痛斥他「背叛了厄瓜多人民」，一度在國會殿堂歡欣鼓舞的印地安群眾，也只能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屬於他們的山林。

美國在穩定局勢之後，隨即由白宮發言人麥克·哈姆(Mike Hammer)對外宣告，稱許厄瓜多「回歸憲政秩序」。然而，是什麼樣的憲政秩序呢？美國以老大哥的傲態，認為自己的政治制度最為完美，是其他小老弟國家的典範。於是中南美洲國家紛紛仿照美國，採用總統制，總統集大權於一身，總統的命令即具有法律的效力。這樣的制度當然也符合拉美強人的口胃，適合他們專權獨斷的脾性。拉美國家獨裁——政變——獨裁的反覆，幾乎變成一種歷史的宿命，因為在「總統制」之下，一切政治鬥爭都變成「零和」的遊戲，贏者通吃，輸者往往賠上身家性命。

其實，也不必說得太遠，我們來看看台灣例子。台灣的改行總統直選是美國讚許、首肯的（也因此，李登輝被冊封為「民主先生」），就個人而言，李登輝在總統直選前的謙恭折衝、調和鼎鼐，與直選後霸氣凌人、趕盡殺絕的作風，前後判若兩人。就權力交替的鬥爭而言，目前正如火如荼進行中的總統大選，驚心動魄，步步殺機，在絕對權力的誘餌之下，只見慘酷的、不擇手段的死纏惡鬥，人的基本尊嚴蕩然無存。所幸台灣的軍方武力還算自制（當然也因為對岸有更大的武力在虎視眈眈），不像拉丁美洲，槍桿子常會伸進投票箱，攪亂了選票。譬如墨西哥一位名叫奧勒剛的將軍，他在1919年參選總統，參選聲明如下：「我沒有政黨的承諾，也沒有政見，謹以配槍來宣告為共和國的總統候選人。我革命軍人的經歷就是人民幸福與祖國幸運的保證。凡愛護我者就跟隨我！」選舉結果，他高票當選。

對於這種美式的，以所謂民主選舉為依歸的「憲政秩序」，帶頭佔領國會大廈的原住民領袖瓦爾加斯說：「我們要向全世界展現，人民可以不經由選票而獲取政權，人民在街頭表現了他們要收回主權的意志。自從厄瓜多獨立以來的，從來就沒有因為選舉而改變政府的性質。」他指出，參與選舉已經成為豪門巨富的特權，只有他們才有能力進入電子媒體，只有他們才有辦法支應龐鉅耗繁的競選開銷。而他們一旦當選，即不斷制訂圖利於自己的法律，以權謀錢，以錢養權。這樣的政治制度，如果稱為「民主」，他們寧要另一種模式。參與執政團的前最高法院院長索婁札諾也痛罵門多薩將軍的惡毒背叛，憾恨厄瓜多喪失了「唯一可能建構真正民主政治的機會」。

「厄瓜多原住民族聯合會」中的知識分子幹部在檢討行動失敗的原因時，認為在政變前長達數週的全國性示威過程中，未重視與中間階層做較緊密的結合，以致在關鍵時刻未能取得他們的支持；至於與軍方關係的建立，則基本上不是他們所能夠掌握的。但是，他們又十分有信心地說：「經此一役，弱勢者確知他們有行動的能力；而政府方面也終於知道，他們不再能夠為所欲為。這一次，理想國只持續了12個小時，

下一次，則至少將持續 12 年。」

的確，近十年來，厄瓜多印地安人團結在「原住民族聯合會」之下，已發展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政治力量。1994年6月，聯合會發起了「為生存而動員」的全國性大示威，抗拒政府所制訂的新農業條例圖利糧食工業集團，抗拒土地商品化、水資源私有化的蠻橫政策。在「公民不服從」的大規模動員之下，造成厄瓜多有八個省份癱瘓，主要道路幾乎全部被示威群眾所封堵。政府指責聯合會煽惑原住民，抗拒現代化、工業化的潮流；聯合會則發表聲明：「我們要指出，講究市場競爭的新自由主義道路，絕不是唯一可行的方向，我們有屬於自己的，另一種不同的發展模式。」

1994年的「為生存而動員」，迫使政府修改了新農業條例共46個條文中的40條。2000年初的行動則將現任的馬華德總統硬生生地扯下來。原住民一旦團結起來，即使不能取得政權，卻也要讓不得民心的統治者膽顫心驚。原住民的動員是對貪腐無能政府的嚴重警訊：馬華德總統自一九九八年八月就職以來，經濟成長率衰退百分之七點五，在失業和赤貧人口激增的情況下，卻又大幅提高民生物價（電費和燃氣費增漲了百分之四百一十），對於人民反貪腐的集結示威，他無能疏導，祇知一味鎮壓，到今年一月六日，他已經三度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厄瓜多石油藏量豐富，每天有二十萬桶石油輸出，是拉丁美洲相對富有的一個國家，卻欠下了高達136億美元的外債。部分原因應歸咎於政商集團系統性地盜竊國家資源，高層人士貪婪成風，浮華成性，經濟危機其實是惡質政治結構的惡果。馬華德總統應付經濟危機的方法，竟然就是放棄國家貨幣，以美元全面取代厄幣（一美元換二萬五千厄幣）。這對於那些手中握有大量美元或在國外有外匯存款的政商高層，當然是大利多；對於那些生平沒摸過幾次美元的升斗小民而言，卻是落井下石。

馬華德擁有哈佛大學學位，他在1992年當選首都基多的市長，任內在貧民區設立了不少托兒所，也接通了自來水管線，因此擁有相當高的民意支持度。

1998年參與總統選舉，宣稱要「對貧窮宣戰，對貪污宣戰，也對不平等和不義宣戰」，在第一輪投票即以高票勝出。可是，他在就任總統之後，隨即有大批來自華盛頓的顧問，同時也不斷有IMF（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專家給他提供意見。基層民眾的聲音再也進不到戒備森嚴的總統府。

馬華德總統的處境其實也相當程度地反映出地三世界國家的困境：一個政治人物在擔任地方首長時容或有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也可能因此而在民間擁有高度的聲望，但是，一旦他有機會進入中央，手握大權，就難免要被整合進全球化的既定體制。經濟霸權美國老大哥的意見不能不聽，WTO、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貿機構的指導不能不尊重。於是，一個有理想的政治家變成一個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管理者。厄瓜多原住民扯下了一個馬華德，新總統諾玻亞上任後，也陷入同樣的格局，也不可能脫離既定的經濟路線。對原住民而言，真正要推翻的已不僅只是一個政權，而是那一套傲慢的、偏執的、單一的思維模式。「厄瓜多原住民聯合會」宣稱有另外一套自律、自主的發展模式，這才是我們應該尊重並期待的。★

總統大選的幾點觀察

王立民

這次總統大選不論對台灣政治結構或兩岸關係的發展都有重大影響，頗值得關注。

從政治結構來看，宋楚瑜脫黨參選造成國民黨遷台以來最大的分裂危機，一旦宋楚瑜當選，不但國民黨一黨獨大永為歷史名詞，也將促成民進黨的分崩離析，既有的政黨分界必將重組，整個台灣的政治結構丕變；若陳水扁當選，則民進黨坐大而國民黨勢衰但仍可維持一定的實力，宋楚瑜、許信良，新黨的努力則可能出現新的組合。連戰當選則變動幅度最小，國民黨仍穩坐江山，而在野勢力尤其是宋楚瑜、許信良、新黨之間也許會出現新的合作空間。

這次大選戰況之慘烈遠超上屆，資本主義民主的醜陋本質也比上次大選暴露得更為徹底。其所以致此，從制度面來說，國民黨主導的威權體制並未徹底瓦解，所謂「民主」，徒具形式，虛有其表，規範政治活動的法律與遊戲規則如：政黨法、政治獻金法、遊說法、信託法，尙多闕如，遂使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爭奪政權時所具有的形式平等也無從確立。從具體的政治鬥爭面來說，宋楚瑜主掌省政五年餘，勤走基層，累積了雄厚的民間聲望。又與李登輝反目，為反李人士所喜，形成了超黨派、跨族群的充沛人脈，對國民黨的李登輝集團與民進黨都構成了莫大的威脅，一旦宋楚瑜突圍當選，李登輝王朝與李登輝路線固將終結，從而集團的利益不保，民進黨也不免一蹶難振。於是，我們便看到國民黨利用龐大的黨產大灑金錢進行動員、綁樁，李登輝集團更不惜玉石俱焚發動興票案，運用手中掌控的國家機器，行政、監察、司法三大系統，多管而下，萬箭齊發，必欲鬥臭、鬥垮宋楚瑜而後已。民進黨也罔顧法理，不論是非，醜態畢露地從旁拳腳交加。宋楚瑜經此夾擊，原本自標清高，欲以「內聖外王」之道取天下的如意算盤，固然就此破滅。但三方相互批鬥，清算從祖宗到子女的財產黑幕，也使這次選舉幾乎成了A錢大賽，讓民眾目睹了一場活生生的資產階級政治鬥爭醜劇，上了一堂寶貴的資本主義民主課。根據一項民調顯示，六成以上的民眾認為這次大選是場骯髒的選舉，良有以也。

其實，從馬克思到孫中山都早已指出资本主義民主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分贓政治。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就指出美國兩大黨的政客：「把政治變成一種收入豐厚的生

意……兩大幫政治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用最骯髒的手段為最卑鄙的目的運用這個政權，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個大的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統治和掠奪國民的。」民進黨大吹特吹什麼政黨輪替、掃除黑金，不過是欺騙不明就裡的蚩蚩之氓。國民黨下台若有進步的意義，只在於摧陷威權體制的殘餘，清理封建餘毒，使台灣的資本主義民主更為純化，較為貫徹資本主義的形式理性罷了。至於金權政治乃資本主義民主的本質，欲加掃除只有徹底更換資本主義體系，這就有賴於左翼勢力的茁壯推動人民的普遍覺醒方克有濟。

「主權在民」論這些年來在李登輝為首的右翼勢力極力鼓吹下，已被塑造為台灣的主流價值觀，成了牢籠台灣人民的意識形態迷霧。此論源出於盧梭在「社約論」中主張的「人民主權」。盧梭認為只有通過直接選舉，形成人民契約，選出管理公共事務的公僕，才能體現人民主權，故而盧梭反對代議制，指出：「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對照這些年來，台灣的公職人員當選後，即罔顧民意，予與予求，或強修條款謀求延任，或巧立名目加薪增權，人民滿腔怨憤卻無可奈何，即可見盧梭的巨眼卓識是何等深刻！馬克思在1871年也早已指出：「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壓迫人民。」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從總統以降的各級民選行政首長、議員莫不通過選舉從人民公僕異化為社會的主人而享受榮華富貴，鬧出層出不窮的愚民自肥的醜聞。所謂三權分立、制衡監督，實則形式大於實質。不法的醜聞遭揭發後，嚴重者雖可能被迫下台。但趕下了虎又從統治階級中再遞補上狼，或遲或快重演濫權自利的把戲。歐、美、日本的投票率之所以奇低，常不過半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看膩了這些選舉把戲，又無力改變，只有以不投票來消極抵制。而台灣民眾則剛服下「主權在民」的迷幻藥不久，猶陶陶然於「頭家」的封號，誤以為投票選出騎在自己頭上的統治者就是「民主」而沾沾自喜。

資本主義民主之為虛幻，主因在於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多數受僱的勞動者必須卯足全力，兢兢業業為資本家創造剩餘價值，獲取高額利潤而飽受過度勞動之苦，筋疲力盡之餘，豈有餘力充實知識，判讀資訊，了解公共事務？於是或者易受政客煽動，蒙蔽而成為盲從者，或者無心也無力過問政治，對政治敬而遠之。這樣一來，焉能成為決定公共事務與國家政策、明智選擇並監督公僕的真正主權者？尤其企業、工廠被資本主義的法律與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理論劃歸「私領域」，資本家成為掌握企業、工廠大權的君王，工作場所中是等級分明不民主的管理組織，在日常的工作中既無民主的實踐，培養不出民主的能力，則在政治的所謂「公領域」中，又何能奢求善

於履行民主？換句話說，沒有經濟的民主化，佔人口大多數的受僱者不能擺脫對資本家的依附關係，所謂「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主權（主權在民）」也就只能是一句漂亮的空話。切望左翼的朋友們不懼長夜漫漫路迢迢，再接再厲，推進「人民主權」的落實。

這次總統大選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各組候選人都不遵循李登輝與中共正面對抗的大陸政策。連戰雖不敢明白放棄李登輝的「兩國論」，但又重提「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表示要擴大兩岸經貿交流，可調整「戒急用忍」政策。變化最大的是民進黨，在大陸國台辦主任陳雲林直斥陳水扁聲言兩岸「打拚不打仗」為欺人之談後，隨即在一月三十日提出所謂「陳七項」，走在連戰、宋楚瑜之前，主張開放大陸資金來台，並一再申言兩國論不入憲、不推動台獨公投、不變更國旗、國號，在二月十九日中國時報的訪問稿中，令人詫異地否認民進黨主張制定新憲、建立台灣共和國。在對支持群眾演講時，更一再強調「陳七項」提出後，已獲美國信任，是華府、東京與北京所能信賴與溝通的對象，並大打「安定賺大錢」的競選廣告。甚至在北京於二月二十一日發表「一個中國政策白皮書」明白表示，台灣若拖延統一談判也將武力攻台後，陳水扁仍低調回應，對北京態度之柔軟前所未見。

這些反常的變化從政治上說，是因美國主子對李登輝未經批准擅自發表「兩國論」，激怒北京，有拖美國下水與北京對抗之虞而大感不滿，遂明示台灣若公然主張法理上的獨立而召來戰禍，美國主子斷不出兵保護，眼見主子震怒，台灣的諸豪奴遂開始戒慎恐懼，大幅調整對北京的態度，陳水扁的競選總幹事邱義仁在接受「財訊」專訪時即坦白承認：「連宋扁都逃不出老美的掌握」。台灣主流勢力喊得震天價響的所謂「台灣主權獨立」，一碰即碎，於此可見其欺罔性。

從經濟上看，兩岸的經濟經過近二十年的貿易、投資，已日趨整合，尤其今年兩岸都將相繼加入WTO，必須接受國際貿易體制的規範，李登輝多年來強以政治力拖經濟力後腿的政策已走入死胡同。台灣自八〇年代末以來，主要依靠對大陸的貿易與投資才保持了大幅的貿易順差，勉強維持經濟的中度成長，從而避免經濟衰退，緩解了失業率上升的危機。在東歐、蘇聯的共黨政權自九〇年起相繼垮台而中共也大步走向市場經濟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一統全球的趨勢日益明顯，資本在全球流動的速度與幅度也隨之加強，各國當權者為了促進經濟增長，必須競相改善投資環境，創造有利的投資氣候，吸引資本留在境內，否則內資與外資都移往獲利率更高的境外地區，本地經濟成長受挫，引發社會、政治不安，政權必將不保，台灣當局當然也不例外。尤其台灣地小人稠，又屬海島型經濟，一旦遭受戰爭衝擊，必然迅速崩潰。五十年

來，台灣全靠美國的屏障才能有恃無恐地與北京對抗。如今，北京眼見近年來在李登輝主政下，分離勢力氣焰高漲，恐夜長夢多，已對美國表明不惜一戰以解決統一問題，美國在權衡利害下，不願冒與北京兵戎相見的危險，再明目張膽地支持台灣，而日漸向北京傾斜。美國主子的意向既有所變化，台灣的扈從奴才們自然也開始夾起尾巴，不敢再狐假虎威，動輒對北京擺出按劍怒目的姿態。

陳水扁深知美國主子的意志不可違逆，北京又對他極不放心，台灣民心亦復懼戰，因而在連宋扁三組實力相近的候選人中，提出最前進的大陸政策，希望對外化解華府、北京的疑慮，對內平息台灣多數民眾對民進黨執政可能引發兩岸戰爭的畏懼。但民進黨的台獨黨綱一日不除，兩國的特殊關係論一日不廢，北京就始終會認為民進黨包藏禍心，不論民進黨言辭、主張上做出多少修飾，也無法取信於北京。連戰雖有意改善兩岸關係但李登輝總統任期屆滿後，仍續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若當選很難擺脫李登輝的制約，特別是國民黨黨產在連戰當政下，不可能被清算，若仍操在李登輝之手，則李登輝對台灣政治的影響力依然不可小覷。宋楚瑜在對連宋扁三人中，最無與北京對抗之心，也最能領會美國意旨，加以極識時務，政治手腕靈活，只要美國不因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白皮書」而與北京關係惡化，宋楚瑜若當選，當最有利於改善兩岸關係。

★

(此文內容不代表本刊立場)

緊緊握你的手

《捐款名錄》

左翼一讀者	3000	施淑	3000	無名氏C	15000
左翼忠實讀者	2000	差事劇場	350	無名氏D	5000
左翼讀者	2000	韋醫師	6900	無名氏E	5000
何金山	3000	孫達人	10000	無名氏F	1000
亞太勞動快訊社	1000	翁俊發	100	無名氏G	2000
明德宮	275	陳璋璋	1000	黃旭	1000
林華洲	2000	程曜	3000	鄭為元	2000
周芬芝	5000	無名氏A	3000	鍾永豐	1800
施威全	500	無名氏B	2000	顏厥安	5000

計：新台幣 85,925 元

「自由主義大野狼」李敖

趙剛

「爲什麼我這樣智慧」、「爲什麼我這樣聰明」、「爲什麼我會寫出如此優越的書」...這是常以獅子自況的尼采踴躍於途時的喃喃自語。一百多年後，台灣也出了一位李敖，透過電視頻道，向他眼裡的柔弱、庸俗、虛矯、易信大眾(或「兔子們」)頻頻放送類似話語。類於尼采，李敖輒以先知自居，別於尼采，李敖則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且常以大野狼自況。

按理說，「自由主義大野狼」是個矛盾複合詞。大野狼連自己都不跟了，怎麼還會跟主義，況且是自由主義呢？而自由主義又怎會容忍大野狼呢？但在李敖身上，這兩種傾向的確是很獨特的糾結在一塊兒；這在歷史上可是有前例可循，那就是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的英雄主義企業家或政治人物，他們絕對地反專制反傳統，絕對地追求個人的外在利益與內在思想空間。今日去古已遠，這種人已是兩百年前的事了。然而，有趣的不就是因爲這種躊躇滿志拔劍四顧的自由派典型早已成夙昔，反而讓這個時光倒錯的李敖現象間接地指明了台灣的社會特質與歷史位置嗎？與其說李敖以其過時搶得了台灣的流行，那還不如說這個「時」可能還沒過。

掛了個自由主義在身上，這條大野狼一路走得很辛苦。按理說，大野狼之所以爲大野狼除了荒野獨行外，理應還有陰鷲、不信、自嘲、善變等特徵，但作爲一個歷史現象的李敖卻數十年如一日地舉著個啓蒙大火把，抨擊迷信、封建、傳統、專制，頌揚科學、個人、自由、法治。於他，諸價值之間的對立就像是非題，很少出現史識通深者所慣有的曖昧難決，雖然李敖的本業正是歷史。這條大野狼的「證據」與思辯都是爲了要證明某種幾何性的真理或真相。大野狼看不起台灣的庸才教育，但不也正是這個教育體制造就了一大票李敖戲迷嗎？(雖然戲迷不一定是兔子，戲子也很少是大野狼，戲迷戲子之間相生尤甚於相剋。)但話說回來，不論李敖是專吃兔子的大野狼或是戲迷掌聲中的戲子，他的獨特其實倒不在於他所立過的言或所捍衛的價值，而在於他藉由行身創造出一種典型(李敖竟也是一個阿甘嗎？)。在一個陰柔造作、殘而不暴的社會中，李敖那種不顧政治正確原則的直暴陽剛以一種隱晦的方式爲人民所需索；也許台灣的人們竟需要鞭打渴望瞥罵呢！我們不禁思考：這隻大野狼到底是在當

頭棒喝呢，還是在肉欲鞭笞呢？這個問題的悲劇性在於它可能與當事人大野狼的意願無關。

說這條大野狼也不過是一項行情看俏的商品容易，但很難驟下定論說這是個壞商品。畢竟，台灣是一個極度名實不一的地方，各種魚目混珠不辨牛馬的意見商品太多了，但這種故意蕪雜粥糊以便包裝立場進而「多元投機」的把戲，在當代自命自由派的知識圈中卻被美其名為「包容」、「多元」。那麼，在撲天蓋地的大雜會台灣世風下，如果還有一種東西保存了某種早期自由主義風格，反封建、抗傳統，讓目盲口爽的台灣民眾能重新辨味識色，那又誰曰不宜？目前看來，會說不宜的大概都是台灣的「自由派」。以包容自詡的台灣自由派看來可以包容一切——除了原味原色。以澄明自居的台灣自由派到底是眼濁，看不出李敖的大野狼外皮下是個如假包換的自由派，還是眼尖，一眼看出這條大野狼將照出台灣眾多自由派的原形——社群派、民粹派、市場派呢？相形之下，台灣的左翼比自由派還扭曲，只能對大野狼斬將擄旗或故作領首微笑狀或故作「汝未聞大道」狀，但這樣的優容卻又徒然暴露出自身之無能——迄今無人能像李敖般展地現出一種「左翼」的原色原味。

李敖的才情理應不下於魯迅，也都有尼采的系譜（試想尼采的「畜群」、李敖的「兔子」、和魯迅的「阿Q」），但魯迅終成大家，而李敖卻明時不遇，徒呼「台灣台灣，執子之手，與汝皆小」。但李敖不成其大，非戰之罪。當魯迅之時，各種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旗幟鮮明理路通暢，魯迅故而得以暫卸啓蒙熾火，秉小燭以照人心流俗之幽暗曲折。反觀這個自以為「後一切」的當代台灣社會，其實還從來沒有老老實實地面對「前」，以為後蔣就是後封建呢！而越過啓蒙鬥爭總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其實，也就正是這個連人類近代文明小學都沒唸過的「台灣台灣」，逼著大野狼李敖數十年如一日地一手執啓蒙經書，一手鞭笞封建冥頑，化民於啓蒙初階。所謂「與汝皆小」，無乃時也命也，豈戰之罪？然而在這時候，如果還有像楊照這般自稱本土左翼的好事之徒，論斷李敖不如魯迅，皆因李敖對「現代性」太肯定云云，那就可供一晒了，因為雖然這個評價左不左翼我們不知道，但它的確一丁點兒也不「本土」。

★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gcn.net.tw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納粹幽靈再現

—— 極右翼政黨在奧地利

俞力工

八十年代末東歐集團瓦解之時，國際上頓然產生一股右傾風，這期間社會福利遭到緊縮，國際支援大幅裁減，民族糾紛此起彼伏，金融擴張勢如破竹，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爲了推諉責任和轉移民眾的視線，許多政黨便把外籍勞工與難民當作代罪羔羊，肆意擴大民族間的仇恨。在此大氣候的影響之下，一向就有濃厚民粹主義色彩的奧地利「自由黨」自然應運而生，不消幾年的努力便躍升爲第二大黨。

自今年2月1日奧地利人民黨（保守黨）與自由黨（極右派）合組政府消息傳出後，歐美國家不約而同地對奧強烈譴責，並威脅將採取手段對付這個新政府。歐洲聯盟14名成員正式向奧地利宣佈：如果具有極右色彩的自由黨加入聯合政府，則其他歐盟成員將冷凍與奧地利政府的關係。歐盟自成立以來，如此直接干預成員國的內政，尙屬首次。除了歐盟的強硬反應之外，以色列政府也多次表示，一旦自由黨組閣將嚴重影響兩國邦交。

奧地利“突然”受到國際孤立，這主要是因爲：戰後奧地利極右派自由黨的主要組成部分其實就是納粹時代的民粹主義餘孽。在奧地利，每當選舉迫近，隨時便可從自由黨處聽到“我們怎能坐視一個斯裡蘭卡人（或非洲人）終日無所事事，而卻平白地領取一系列補助金……”實際上，旅居奧地利的外國人領取補助金的人數比例遠遠低於本國人。自由黨一再以煽動性言論對外國人惡意中傷，充分表現出其欺負弱小的社會達爾文觀點。

除了仇外情緒之外，許多國家之所以把自由黨視爲納粹黨，還在於海德曾經公開表示希特勒“黨衛隊（即SS）的成員多爲人品正直人士”。納粹集中營在他的眼下不是消滅了數百萬人的屠宰場，而只不過是“懲戒所”。凡此種種，早已在國內造成嚴重的排外氣氛，而受害對象又以黑人首當其衝。對外則驚動國際視聽，生怕不及時對奧地利說“不”，一來可能將出現海德當選總理的尾大不掉局面；二來擔心自由黨的成功使得各國的極右派受到鼓勵，因而導致無法收拾的惡果。

奧地利在二次大戰期間原是第三帝國的組成部分，第三帝國戰敗後，奧地利政府巧妙地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把自己打扮成“納粹主義的受害國”，因此從來就沒有對真正受害的猶太人進行過任何形式的賠償，也沒有對自己的戰爭罪行與種族滅絕罪行進行過任何檢討。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國際輿論質疑：新聯合政府的著眼點肯定

不會是整頓自由黨，而是“掩飾加否認”，就像戰後數十年不斷否認戰爭罪責的表現一樣，掩飾與否認越多，希特勒的陰魂就越加不散。

保守黨與極右派合組的政府儘管受到國際社會的嚴重譴責，仍然孤注一擲，堅持主政。2月4日正午，奧地利總統主持了新政府的宣誓典禮。對總統克列斯蒂來說，接受這樣一個裡外不討好的新政府，的確是件勉為其難的事。有鑒於此，奧地利總統事先向人民黨與自由黨提出要求，必須在宣誓之前簽署一份聲明，以保證新政府尊重民主、人道、人權原則，並支持歐洲的統計劃劃。另外，總統對外宣佈，其本人雖不贊同該組合，但別無其他選擇。雖然，理論上總統除了接受該政府之外，還有解散國會重新進行議會選舉一途，但克列斯蒂認為，在當前民粹高漲的氣氛之下，若是再次進行選舉，極右派得到的選票可能還會更多，因此不得不接受事實。最令人矚目的是，就一般情況，總統在接受新政府之前，往往有一道總統授權某政黨組織政府的手續。這次，克列斯蒂總統刻意迴避了該手續，以表示其不滿。

就外人看來，政府在宣誓主政之前要簽署一份“行為保證書”的舉止是件極為幼稚、可笑的事。1933年德國納粹黨主政也曾沿循民主選舉一途，也曾受到當時的保守黨的陪襯，同時希特勒在就職總理之前也曾對民主憲法宣過誓。果真一份誓言能夠糾正個人或政黨數十年的言行舉止，那麼，這個世界也就太過平淡乏味了。德國外長費謝爾最近即一針見血地提醒奧地利人：“不可把政府當作教改所”。

筆者認為，即便極右派能夠取得更多選票，重新選舉並非下策。因為如此一來，可讓奧地利選民更加充分了解過去的不光彩歷史，有機會反省當前的排外情緒與政策，同時也更加自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不致把部分責任推到總統的身上。

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對東歐地區（包括南斯拉夫）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內政的所有干預行動，奧地利政府幾乎均以“維護人權”為由積極支持。如今奧地利卻沉痛地感到內政受到干涉，民意不為外人所尊重。實際上，奧地利普遍存在著兩個盲點：一是奧地利早已放棄部分主權而成為歐洲聯盟的正式成員，成員之間的內政、外交界線極為模糊，因此奧地利對有色人種、外籍勞工、移民、難民的政策與態度就不能偏離歐洲聯盟的軌道太遠；其次是奧地利人一向把自己裝扮為德國納粹的犧牲者，掩蓋當年與德國納粹沆瀣一氣的歷史。也就因為奧地利人無法面對過去，因此至今也無法徹底改善不良的文化基因。

據報道，除以色列政府於2月4日正式召回駐奧大使之外，歐洲聯盟也宣佈隨著新政府的成立，將自動啟動一系列制裁措施。奧地利既然走上這麼一條不歸路，今後不只是一是要面對外交孤立、損失部分的歐盟發言權與決策權，同時，還得承擔外來投資減少、旅遊收入萎縮的風險。可預見的是，經過這次風波，人民內部對立化的問題將更趨嚴重，大規模的民間抗議示威與工會罷工事件也將層出不窮。

2月19日，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市中心即集結了25—30萬群眾，對新成立的聯

合政府提出抗議。同一天，在法國、比利時與德國若干城市也舉行了規模較小但性質相同的示威游行。雖然奧地利的第三大黨人民黨（保守派）與第二大黨自由黨（極右派）合組政府完全符合憲法規定，不違背多數決原則，具有完整的“合法性”，但抗議群眾卻對人民黨邀請極右派共同組閣的“合理性”提出質疑。

記得三十年前初到美國考駕駛執照時，考卷裡就有一道“駕駛的最高原則是什麼？”的試題。主考單位對該問題所規定的正確答案是“維護安全”而非“遵守交通規則”。數年之後到了德意志地區（德國、奧地利），卻意外地發現當地的最高原則卻是“遵守交通規則”。從這不同的答案多少反映出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價值觀與民族性。從日常生活中，也的確可以時時觀察到不同民族的不同作風。再以駕駛為例，在美國就可發現一般駕駛人較不守交通規則，但在維護安全方面，卻具有較多的靈活性與風度。至於德、奧地區，往往會遇到本地駕駛人“得理不讓”，硬把他人逼到危險境地的局面。這次奧地利新政府的態度即是如此，對國內外的再三警告與抗議行動非但視而不見，反而在強調聯合政府符合民主程序的“合法性”時振振有詞。

隨著西方社會生活方式的單一化發展，非但國內幾大階級的差異逐漸縮小，國與國之間的隔閡也逐漸消失。該趨勢對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影響是：政黨之間的區別日益模糊，同時任何一個政黨要憑借單獨的力量取得多數選票的可能性就日益減少，於是乎，幾個政黨拼湊起來合組政府的現象就愈來愈普遍。有鑒於此，歐洲聯盟爲了防止極右派與極左派通過進入聯合政府的途徑進一步影響歐盟的政策，曾經達成“極力阻止極右派、極左派進入政府”的共識。奧地利作爲成員國之一，自然就必須承擔該義務。

當去年10月3日議會選舉揭曉，出現人民黨與極右派自由黨聯合起來可構成多數的情況時，法國、比利時、德國、葡萄牙等歐盟國家政府就已明確對奧地利政府及當時擔任外長的人民黨黨魁許塞爾提出警告，並表示一旦極右派進入政府，歐盟將采取制裁措施。雖然許塞爾於就職總理前後再三向奧國人民解釋：“我對外國的制裁威脅，事前並不知情”，但法國政府隨即有針對性地揭露：“許塞爾完全了解情況，只不過他處心積慮地想當總理，因此對外國的警告置之不理”。★

921 民報

電話：04-5823258

E-mail:liwenchi@ms17.hinet.net

《921 民報》是由災區幾份社區報紙與全盟等組織合作發行的刊物，旨在讓災區民眾互通聲息、互相打氣，也向關心重建的廣大社會報告災區的狀況。我們需要您的參與與鼓勵。歡迎索閱。

空間中身體的形式與移動

黃 旭

由於身體的前後不對稱、左右之別，空間中它的展示型態和之間的遭遇，成了權力關係的不均等得以具體化的媒介和結果。

刊登在各媒體版頭九八年上海辜汪會晤雙方握手的照片，辜汪的身體，就是不均等得以具體化的神秘之處。辜汪握手時面向我們，辜在右、汪在左，辜振甫必須以右手向左方伸出，暴露在鏡頭前的右臂向左方伸出的同時幾乎要將辜身體的背面掀到鏡頭前，從鏡頭裏可以看出辜盡力抗拒這樣的結果、努力要完全呈現身體的正面，而掙扎的結果，是呈現在鏡頭前一個被自己右臂劃過、因為略為左傾而和向右望的頭部成一個奇怪角度的身體。

身體的方位和鏡頭，在共時的空間裏構成了一個沒有替代和選擇的權力階層。相較於辜的身體 - 一種內向的防衛，位於左方的汪道涵右手向右伸出、身體全面舒展於鏡頭前，顯現一種外向的開放和自信。如果可以說被自己右臂劃過、壓縮在平面影像裏的辜的身體，表徵出了誕生的維納斯掩蓋自己身體的女性羞赧氣質；全面舒展向外擴張的汪的身體，則顯現了西斯汀上創世紀天父肉體賁張的男子氣概。在這樣的身體形式裏，不僅性別差異的不對等權力關係得以被複製；借用這關係，國與國、政治實體與政治實體、或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才得以表現和具體化。

這是被刻意安排的結果？想必是如此。攝影機的位置和辜汪出場的方向，大概免不了經過精密的空間計算。既然一定有左右之別，又是主辦單位，有什麼理由要讓定義雙方關係的權力下放給不同意識型態的記者、讓其各取所好？如果你是主辦，你會這樣幹嗎？這裏的重點不在於誰該站左、誰該站右，而在於這共時空間中身體接觸的永恆不對稱、和其表現出來的權力關係的不對稱。空間中身體展佈的不對稱，讓我們得以、和逼使我們劃分彼此的權力位階，在這時間被凍結的空間裏，永恆的並不是辯論誰該左、誰該右所指涉的真理，而是這不均等的結構。

所以在國際高峰會裏，各國元首的合照總是以強權國家為中央；正式社交場合的合照，「有識之士」總儘量往中央擠。被媒體凍結了時間的空間中，左與右、前與後、中央與邊緣的方向感讓身體只能被權力的關係所驅策，而維護了一元化了的社會秩序和利益。

但身體與空間總是存在著它們的時間向度，那就是移動的身體，移動的身體讓左右可以互調、前後翻轉、邊緣可以向中央移動。在一個封閉而完整的空間中，自由移

動的身體可以擾亂被方向感賦予的社會秩序，課堂上突然起立往外走的學生破壞了師生的權力關係、電視座談會上邀請的來賓鬧場而走人攻擊的是會議的代表性或專業者的社會地位。權力關係的實踐，靠的大半是要對身體位置的控制、和藉著空間形式排除其他行爲的可能性，而自由的移動，挑戰了權力的不均等關係。

當然，這裡說的並不是要清除所有的權力關係，基本上，這只是極端個人主義的說法，而個體的行動，有時候也只是以卵擊石而已。權力關係所以成爲清除的對象，在於身體的控制已成爲一種異己的、和自己的真實利益相違背的過程和手段。

工廠生產線之間監工與經理來回巡戈的中央走道所提供的監視效果，不僅把工人的身體制式化而變成可供比較的個體，被控制的身體並也生產出違背自己利益的商品；在某些文化的住家或聚落裏，藉由空間組織對於男女活動的區劃，女性的移動被限制在整合性較高的公共空間之外，男人並發現了「廣場恐懼症」限制女人身體的移動以完成性別的壓迫；另外在十九世紀西方的幾個主要公共空間裏，例如圖書館、百貨公司、博物館等，巨大無垠、空間整合性最高的中央大廳提供了都市裏工人和資產階級互相頻繁接觸的地方，在接觸的過程裏，工人的身體成爲馴訓的對象，皮鞋、禮服、高帽和陽傘，一切向資產階級的身體看齊，也看齊他們的價值觀。

人類身體移動的能力在歷史中始終是增長著，移動的能力界定了我們空間的邊界。在一個有邊界的空間系統裏，從家庭、公共建築、社區、都市、甚至國家，各種不同空間的組織，透過提供移動的路徑，形成了一個個具有不對稱的階層性和中心性的空間系統。空間系統的不對稱，指的是各個空間所在位置的不同深度所造成的階層性；中心性指的是空間系統中整合性最高的空間向中央集中的趨勢。利用了這些階層性、或被這些階層性所迫使，我們總區分了不均等的權力關係、營造了一種社會秩序。例如辦公室的空間配置，它的入口大部分是一個開放的空間以供中低職員使用，職員們不僅互相監視、還必須隨時提防從旁邊房間走出來的長官，而長官們辦公室的配置，則大都隨著職位和權力的高低有著深淺的變化。另外例如在社區或都市中最繁華的廣場，也總是被排他性的文化符徵所壟斷，不論是帷幕大廈所表徵的商業文明、或廟前廣場舞獅所表現的社區意識，透過透明的空間技術和統一的美學意識，單一的支配性價值總能在空間的不對稱系統中找到整合性最高的空間作爲它發言的基地。人類移動的邊界性，製造了空間系統的階層，空間系統的階層不僅塑造了社會秩序，也成了權力的不均等可以著床的子宮。

身體移動的能力，當然也是不平等的，有錢有勢的大爺總是移動得快、空間的邊界總是比窮人遼闊。但空間總不可能無限的擴張，因爲地球畢竟是圓的，當空間的系統跨越國界、成爲一個彎曲的球面系統時，系統的邊界事實上已經消失了。對於工人來講，各地工作條件的不均等造成了世界工人的區隔，如何可能在資本主義跨越和拆除國界的運動裏打造一個工人可以自由移動的平台以掃除空間系統的邊界，實在關係

著我們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判斷、和掌握契機的行動。歷史所能給予我們的，應該不是它規定了未來，而是讓我們能洞察到每次再發展時所可能暴露的危機進而試圖去掌握它，否則歷史最後只能成為向內部規訓的教條而已。

坐在飛往倫敦的飛機上，想像著身體自由的移動和游牧。手上翻開一張航空公司的世界航線圖，平面展開的航線總是集中在總公司所在的大城市。能夠自由移動身體的想像，慢慢的將這張平面圖變成了球狀、並且改變了它的飛行路徑，一時之間到處流竄的血肉之軀讓東西南北上下左右朦朧了起來。 ★

善款足以濟貧解困， 自殺禍在人謀不臧

彭明輝

連續驚聞多起災民慘烈的自殺案，讓人憂心災後自殺人數直追九二一死亡人數。這些案例反映了災後社會救濟不力，以致弱勢災民無以維生。可是，大地震後國人捐款總額超過200億，若妥當運用應有機會防止悲劇之發生。因此，我們最大的疑問是：這筆可觀的賑災善款究竟在哪裡？

由於政府欠缺有效法令來管理各種捐款，因此，不僅全國善款總額成謎，其流向更錯亂紛雜，難以梳理。全盟自 921 以來雖然積極訪查，但是既缺公權力又乏人力與運作經費，以致迄今難得善款流向之全貌。內政部身為主管機關，曾主動搜尋媒體刊載之賑災專戶資料，並函請金融單位與郵局協查。

但是，民間團體與各地縣市政府所握有之善款，目前泰半皆被用於建立個人或團體之公益形象與公共關係，或者各團體主觀創造之非急迫性需求，卻沒有任何單位負責主動再深入調查災民之急迫需要，以至於供給與需求面迄今仍嚴重脫節。就技術面而言，即使欠缺直接適用的法令，內政部仍有其它非正式的黨政管道，以及清查帳冊、裁縮相關補助等工具，可以用來間接管理這些善款。我們在此呼籲內政部一秉「人命關天」的精神，至少嚴格監控金額在億元以上的單位，並責成相關單位主動建立完整災後社會救濟資源資訊網落，以便負起媒合供需的責任，以強化既有善款急難救助之功能。

民間單位如慈濟、各報社與電視媒體等掌握近百億善款，卻將善款的七、八成用

於學校重建，一成左右流向組合屋，以致可以做為急難救助的善款額度急劇縮減。一方面，這反映了民間對政府職能的嚴重不信任。不過，這也嚴重減損了善款應有之功能。學校復建為政府無可推託之責任，無須民間善款支援。因此，只要仍有災民無以維生，就絕無理由捨棄急待救濟之災民，而將社會託付之善款用於學校重建。然而，學校等硬體建設一旦完成，即使百年後社會仍將記憶捐款團體之功德，有若功德碑；遠比直接把錢撥付給災民，以回應其急難救助的需要，更吸引民間單位。因此，前述現象多少也反應了：部分民間團體只圖建立自己的公益形象，而悖負捐款者的信託與災民的期盼。

慈濟原擬募款60億，以其中42億援建25所學校。目前則擬以47億聘15位建築師，援建31所學校；並接受其他單位轉撥7億，援建另11所學校。這個決定，使慈濟基層幹部在經費上感到拮据，而畏於積極尋訪待協助之災民，實一大失策。慈濟歷來所以口碑在於急難救助，首在於其組織龐大，可以深入掌握民間貧困者之需要。對比於政府基層之官僚與被動，慈濟從事社會救濟之優勢，遠非政府部門所及。然而，學校重建必須配合未來九年一貫制教學統整之需求，絕非慈濟之專業。以致慈濟所遴聘之15位建築師，是否在專業經驗與人力上足以勝任31所學校之硬體規劃，已成疑問，更遑論後續與軟體教學計劃之配合。作為善款的民間首要掌控者，慈濟捨長就短，其動機與決策過程令人難解。

其次，「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掌握122億善款，而各地縣市政府掌控66億。當民間團體一味追逐以硬體建設表張團體公益形象之際，這些善款若能妥當利用，也應該可以解決所有災民組合屋之需求，並協助低收入戶度過艱難時期。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已確定其善款將優先用於災區社會福利體系等軟體重建，然而，該基金迄今只核定中央與地方政府單位49.4億。不僅未核定的73億未能充分發揮急難救助的功能，已核定金額尚未全數撥付，而已撥付者執行成效未明。因此，社會救濟成效不彰，掌握近半善款的「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難脫部分責任。此外，中投兩縣政府掌握自主善款26億，且已獲「九二一震災重建基金會」允諾核定20億左右的補助，因此理當先行以既有26億善款積極投入急難救助。儘管兩縣已於災後設法強化社福功能與人員編制然而，迄今急難救助之成效不彰已成事實，而其原因則有待兩縣政府痛切反省與檢討。

回顧公部門與民間部門在安置與重建階段對善款之無效運用，首先我們必須痛切指責擁有善款而未能積極回應災民需要的所有單位。其次，我們鄭重呼籲掌握善款之各界，嚴肅體認善款背後的社會託付，並積極重新省視其應負起之社會救濟責任。往者已矣，為免災後自殺人數直追九二一死亡人數，我們籲請災區地方政府及內政部，積極建立災後社會救濟資源資訊網落、主動搜尋急待社會救濟之災民，並負起媒合供需的責任，以強化既有善款急難救助之功能。★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九二一民報》試刊號)

中原口土石流讓高官們現形

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921地震後一個月，以李登輝、連戰為首的國民黨高官集團誇口「救災成績全世界第一」。地震後五個月，仁愛鄉中原口部落後方的土石流沖進部落，埋掉數十戶原住民家庭的微薄家當，也埋葬了國民黨高官的救災神話！且看五個月來，國民黨高官集團是如何對待中原口原住民：

地震總指揮連戰與副總指揮蕭萬長的承諾

- 9月21日 地震發生
- 9月28日 蕭萬長說：「救災工作做不好就換人。」
- 9月30日 連戰說：「十月底前做好災民安置工作。」
- 10月6日 連戰說：「安置災民的組合屋，限十月底前完成。」
- 10月9日 連戰說：「災民還在餐風宿露，還談什麼選舉。」

中原口部落爭取安置的過程

- 9月21日 地震發生，對外交通斷絕五天。
- 9月26日 民間團體救災物資進入部落。
- 10月上旬 中原口部落經行政院原民會委託成大三度勘驗，判定為有立即的土石流危險，需緊急遷村。
- 10月23日 連戰到中原口視察，下車向民宅借廁所解手後，連稱：「我已經瞭解了」後上車離去，留下滿臉錯愕的部落災民。
- 10月26日上午 中原口部落代表向「全盟」陳情，要求政府具體解決緊急臨時安置，並控訴「連戰到中原口，拒看土石流，撒泡尿就走。」的做秀行為。「全盟」執行長瞿海源教授回應：「連戰應檢討！」
- 10月26日傍晚 總統府召開記者會，指中原口原住民惡意抹黑連戰，並指責「全盟」執行長瞿海源教授發言不當。
- 10月27日上午 「全盟」執行長瞿海源教授說：「原住民不會騙人，看完連戰巡視中原口的全程錄影帶，事實與原住民的控訴相同。」
- 10月27日傍晚 總統府再度召開記者會，指稱連戰視察中原口當時，因發現有外

地人在場，所以才沒看土石流上車離去。記者會現場並請來一位眉原部落長老教會劉姓長老，當場以主耶穌之名做見證：連戰是關心原住民的。

- 10月28日** 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指示：原住民災區的問題，一週內擬定計劃，二週內具體解決。10月28日，行政院原民會主委華加志在飛碟電台說：中原口土石流是否危險？當地部落居民心中有數，不必外人替他們說話。並宣佈安置用組合屋已在日本裝船，數日內可運抵台灣。
- 11月20日** 仁愛鄉鄉長陳國雄與立委瓦歷斯·貝林跳過安置階段，直接向中原部落災民提出三年的家屋重建計劃，強力推銷每戶100萬的輕材料建築（鐵皮屋）。
- 12月22日** 中原口災民以公開信向李遠哲先生請願：天寒地凍背靠土石流，原住民家庭何去何從？災民們請託李遠哲先生幫忙解決緊急臨時安置問題。經李先生電請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協助，劉副院長指示原民會官員前往中原口瞭解。
- 12月24日夜** 中原口災民前往連戰蕭萬長總部陳情，連蕭總部閉門以對。
- 12月28日** 行政院原民會官員赴中原口瞭解土石流問題，當場向災民承諾：臨時安置組合屋元月20日前動工。
- 元月20日** 鄉公所在中原部落搭建二戶樣品屋，每戶要價100萬，四處招攬災民簽約訂屋。
- 元月27日** 中原口災民10人到中選會前向前往登記參選的連戰、蕭萬長請願：「先安置、再選舉」，結果連蕭陣營召來300位警察，強制拖走災民的車輛，粗暴的抬走陳情的災民。
- 2月17日** 連蕭全國競選總部成立，李登輝致詞讚頌連蕭救災滿分。
- 2月19日** 中部災區開始豪雨。
- 2月21日** 豪雨不停，中原口土石流開始落石。
- 2月22日** 中原口落石不斷，滾石隆隆聲中，居民倉惶出走。
- 2月23日清晨** 泥漿挾著巨石與樹木，第一道土石流衝進中原口部落。六十幾戶空手逃出的居民，靜靜遠望逐漸被吞噬掩埋的家園，心中告訴自己：再也不需要緊急臨時安置了！
- 2月24日** 所有電視呈現同樣的畫面：蕭萬長鎊假上班巡視災區……
連戰指示……

921地震後的二次災害，提供了國民黨高官集團再度演出騙票戲碼的舞台。一樣的戲碼，一樣的演出者，一樣的觀眾。不一樣的是：觀眾的掌聲變成靜靜的沉默。★

編輯報告

《左翼》出版以來，許多左翼的朋友就對台灣左翼運動的展望表示了他們的意見，並發展出某些論辯，《連結》編輯部的〈台灣「左翼」何去何從？〉即是對過去在《左翼》上的相關討論所作的回應，並對當前一些重大的議題提出他們的看法。《連結》編輯部提出的三個問題：左翼應該如何看待台灣社會和政權性質、統獨問題以及中共政權和中國大陸社會性質，這是今日所有關心左翼運動的朋友都應該認真思索與嚴肅面對的。我們希望，大家能夠針對這些問題繼續進行積極與正面的對話及論爭。

八〇年代以保護原住民權益為目標的原住民運動，隨著後來外在情勢的複雜與惡化而逐漸沉寂，但在九二一震災後，原住民受到一連串不平等的待遇，使得新一波原民運動有再起之勢。職是，《左翼》第四期特別組織了【原運再起】這個專題，我們安排了三篇文章：夏曼·藍波安的〈從部落初探原運的再起〉與胡德夫的〈原住民族運動再起〉分別回顧了原住民運動的歷史及原運再起的必要與急迫。林深靖的〈三千原住民扯下一個大總統〉則是探討年初厄瓜多一場原住民運動如何導致政局的丕變，但隨後卻因帝國主義的介入而使真正的變革不可能出現。

針對這次大選，王立民的〈總統大選的幾點觀察〉對當前台灣的大選及資本主義民主都提出了許多尖銳的批判及他個人的一些評論。趙剛的〈「自由主義大野狼」李敖〉則是對近年的李敖熱現象作了深刻的評論。

極右勢力日益抬頭，是近年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趨勢，我們特別在【國際連結】上，邀請旅居奧地利的俞力工撰寫〈納粹幽靈再現〉，分析今年二月奧地利極右派自由黨參加聯合政府的背景與意義。黃旭的〈空間中身體的形式與移動〉，告訴我們身體的展示形態與權力的關係。文化評論的文章一向是《左翼》較缺乏的，我們期盼將來能夠有更多類似的文章。

由於土石流的出現，使得被人遺忘的災區再度浮現在人們的眼前，彭明輝的〈善款足以濟貧解困，自殺禍在人謀不臧〉，質疑賑災的錢到那去了？原權會部落工作隊的〈中原口土石流讓高官們現形〉，進一步揭露了國民黨高官在這場救災中所扮演的欺騙角色。

《左翼》第三期登載〈工會運動與民主政治發展座談會〉發言記錄，受到篇幅限制，我們不得不將部份發言內容刪減，以致中華電信工會總會秘書邱毓彬曾就執政黨打壓工會及工會敗選原因檢討的發言未能全部刊出，使讀者可能對於這一議題無法獲得一個完整地認識，我們對於編輯處理上的疏失感到非常抱歉。邱毓彬目前還在忙於電信工會各地分會的選舉，我們希望等工會選舉結束後，邱毓彬能夠將近年投身工會運動的心得整理出來，與所有左翼的朋友分享，使我們的工運經驗能夠進一步積累、前進。

左翼 第四號

E-Mail: twleft@sina.com.tw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出版日期：2000年2月28日

初版二刷：2000年12月31日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五號

三刷

【總統選舉論集】	讓歷史整備我們的隊伍 鄒議 1 陳水扁政權性質初探 伍艾蘭 5
	2000年「總統大選」後的幾點感想 林書揚 7
	從大選看台灣社會的一些基本性質 瑟珂蕙 10
	從改革者到掘墓人——台灣觀點的俄羅斯大選 劉鳴生 14

【特稿】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一) 黃志龍 17

韓國的社會結構體論爭(一) 臧汝興 24

盜版盜版，誰盜誰的版？ 劉宇凡 26 流動的語意 謝曉陽 33

閱讀《安那其美學》的第一次筆記 魯福尼 35 浮生隨想曲 劉文超 41

談教宗保祿二世的佈道與猶太人受迫害的宗教、文化因素 俞力工 37

讓歷史整備我們的隊伍

鄒議

一、台灣獨佔資產階級政權的進一步發展

70年代到80年代中後，人們還可以把台灣資產階級分為：獨佔性·大官商資產階級和零細的中小企業資產階級。前者指依附黨政特權進行資本積累，形成集團性資本，獨佔台灣島內市場，假藉政黨恩庇進行價格、市場的獨佔。

國營企業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現代化，不能否認在法律所有權上屬於公有；其剩

餘也相當一部份向公共部門輸送，帶著一定的國家資本主義性質，不能等同於1949年以前在內地的國民黨官僚資本。

黨資本有公私雙重性。在法律上它是民間社團所有，不具有國家公有性，但內部在法律上是國民黨集體所有。國民黨強權、長期統治，使黨資本得以享盡特權以積累，在所有制方面，又有法律上集體性，與過去官僚（私人）資本又有一定差別。

60年代崛起於加工出口工業化政策的民間中小企業資本，一無特權庇護，二不能問津島內市場，三只能在美日台三角貿易中循環其資本而積累。

70年代至80年代中後，前三種資本（獨佔性·大官商資產階級、國營企業、黨資本）與最後一種資本有較大的矛盾與區別。前三種資本為統治性資本，後一種是台灣資產階級構圖中的被壓抑的一方。70年代黨外民主化運動的動力主要來自最後一種中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政治代表，一般而言，是民進黨。前三者則為國民黨。

今年三·一八選出新政權，台灣的階級結構不變，但政黨的階級內容有所移動。

三·一八之前，在80年代中後，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在國民黨「波拿巴國家」瓦解，還政於台灣資產階級之後，台灣大獨佔階級蜂湧而來，全面掌握國民黨中央和立法院等政治機關。資本的集團化、肥大化、獨佔化迅速發展。他們又要獨佔島內市場，又因資本的邏輯垂涎大陸的市場與勞動，使他們在三·一八前夕傾巢背棄李氏政權，強手介入民進黨，以陳氏為賭注，達到既能在島內獨佔市場，又能破除「戒急用忍」，使其資本暢然到大陸循環與再生產。

三·一八以後，中小資產階級的、財力單薄的民進黨，一夕之間為大獨佔資本所搶占。陳水扁在接見許文龍的記者會劈頭宣告：「政府為企業而存在」，比台灣任何台獨派蛋頭學者都明確地說明了新政權必然的本質。

三·一八之後，民進黨和陳水扁政權分別化身為台灣大獨佔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黨和政權。民進黨將如《仙履奇緣》中的小家碧玉得到大資產階級「王子」的鍾愛而飛上枝頭，大獨佔階級將對飢餓、諂笑的民進黨輸送大量的金錢，民進黨及其政府必沐猴而冠，依金主的形象全面改造它自己。

在80年代中後，獨佔化的台灣大獨佔體，勢必比過去更全面、更深入介入新政權，掌握政權機器為其資本之積累與集聚服務，從而使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奔向「國家」獨佔資本主義階級。

因此，三·一八後的新政權，為台灣大獨佔資本的政權進一步向台灣「國家」獨佔資本主義（stamocap）政權發展準備條件。台獨派長期以來以「外來政權」看國民黨統治集團，理論上幼稚，為社會科學所否定。

二、「超黨派」的官商獨佔資本體的形成

如前所論，80年代後半之前，在政治與資本的關係上，勉強可以分為傭附國民黨黨政權力的亦官亦商的大獨佔資本與規模小的中小企業資本的相對性矛盾（它們在剝削台灣工農而積累的這一點上有同一性）。80年代中後，李氏政權進一步資產階級化，國民黨黨產進一步以交易持股，化整為零，與民間特權資本形成特權互利關係。90年代，民進黨人以立委身份投資大眾傳播、創投而肥大；新政權成立，民進黨組織與個人依憑特權發展資本主義企業，與獨佔資本野合，乃大勢所趨。大獨佔資本已經超越「黨籍」，完全依資本本身的邏輯結合，以新政權為它們統治工作的共同辦公室，成為台灣的最高統治階級。民進黨不但不能解決官商資本體的擴張，不能阻止黑金結構，反而變本加厲！

三、新政權延續前朝的新殖民地性質

1950年以來，台灣一直是美帝反對中國革命、干涉中國內政、封鎖中國革命的工具。1950年到1972年，台灣軍事依附美國，是美國國防的一部份，是美國亞太冷戰戰略的基地。在政治上，美國抹殺新中國，支持蔣氏獨裁，默許反共屠殺（白色恐怖），一手炮製虛構的中華民國，此外，美國深入介入台灣農業、工業、財政、經濟，五十年來經由留學體制，大量培養親美的「協力精英」，在台灣進行思想、文化、知識、意識形態的支配。1979年後「台灣關係法」使台灣成為美國的附庸。

李氏政權延續了這個新殖民地體制。三·一八後的政權，也只能蕭規曹隨。謂「台灣主權獨立」，是欺世之言。新政權必一如既往，遵行美帝反共、反華、反統、親美、與大陸「和平分離」的台灣政策。

四、新政權及沒有改變台灣社會型態 (social formation) 的性質

台灣社會史告訴我們，1945 - 1950年的台灣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部份。1950 - 1962年，土改完成，半封建性消失，資本主義工業化有所發展，成為新殖民地（美國基地化、附庸化）半資本主義社會。一直到1963年台灣完成依附性工業化，1963 - 1980年代中，台灣是新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1980年代中至今，是新殖民地獨佔資本主義社會向新殖民地「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與展開。陳氏政權，是李氏政權開始的台灣大獨佔資產階級政權的性質之擴大與強化。台灣大獨佔資本已全面統治著台灣。資本的「超黨派」是真，「全民」、「清流」的「共治」，則是一派謊言，至為明顯。

五、台灣變革運動的課題

如果台灣社會是新殖民地，台灣就不是什麼「主權自來獨立」的社會，就存在著

反對美（日）新殖民主義，即民族解放的課題。

這課題包括：

- 反對美帝對台灣政治、外交、軍事、經濟……的支配。
- 反對「與台灣關係法」、反對TMD、反對日美安保新指針、反對日本「周邊有事」立法，反對美帝在日本、韓國、沖繩的武裝駐在，並與上述各地反帝鬥爭團結。
- 反對根深蒂固的美國意識形態、校園論述、大眾文化、知識和思想體系對文化、文學、知識的支配，批判美國化教師、教育體制、教材。
- 反對做為美帝干預中國革命、炮製「親美、反共、反華、拒統」的台灣政策代理人——一切派別、形式的「台灣獨立」。

如果台灣是獨佔（或「國家」獨佔）資本主義社會，就存在著對新的官商大獨佔資本的批判和揚棄的課題。而在歷史的現階段，課題的第一階段，主要是：

- 對於特權·官商大獨佔資本在台灣敲骨吸髓的統治之揚棄、批判與鬥爭，發展以工人（農民）、中小資產階級為同盟與指導的、使資本得以相對公平、發展，反對買辦主義、反對官商特權政治獨佔，反對黑金結構的民眾的民主主義（People's democracy）變革運動，進行民眾的民主主義的改革與變革，為進一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積蓄條件。
- 廣泛形成工人、城市民、中小資產階級、獨立民族資本廣泛的反獨佔的團結。
- 強化階級運動的基礎上，發展獨立自主的、真正進步的、不幻想寄生或依托反動派「資源」的、廣泛的中小資產階級市民進步運動。

六、實事求是·整備隊列

實事求是要求台灣左翼認真進行對台灣社會史和當前台灣社會性質的科學的認識。無頭蒼蠅式的亂闖、「唯實踐論」、寄生利用任何資源論，都應該有認真的檢討與反省。

究明力量對比、敵我限界、方針政策，據此實踐，並在實踐中使認識更客觀正確、依據具體的方針政策，規劃各戰線的隊列、目標和戰術。 ★

陳水扁政權性質初探

伍艾蘭

一、前言

在今日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選舉，候選人視自我包裝與抹黑對方為競選首要策略，候選人的真面目，包括其社會基礎與階級屬性，被無意或有意地忽略了，選舉成了形象塑造的比賽，候選人的政見往往只是聊備一格。從這種微觀的過程來看，對選舉及候選人很難進行左翼的分析。

這種分析上的窘困，或許是選後的主流議論往往集中於策略檢討，政治版圖變化等等上層建築層次，這也助長了人們對進步理念的失落感，認為左翼的分析對於現實政治似乎是不相干的。

這或許是今日左翼（特別在台灣）朋友所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之一。

本文試著在這方面拋出幾塊磚，期盼引出一些玉來。

二、陳水扁的政權基礎

陳水扁當選的支持主力，未必等同於未來的政權基礎。競選時期策略的應用與選後政策的採行，其所吸引的支持者未必是相同的。

陳水扁與民進黨諸山頭間之不和已是公開的秘密；而陳水扁也表示他往後將不過問黨務，要當「全民總統」，而不是「民進黨的總統」。雖然如此，民進黨的支持者還是會挺扁；而作為一個弱勢總統（不論是選票上或立法院的生態），民進黨還是比較可靠的支柱。

民進黨的主要社會基礎一向被認為是中小資產階級以及強烈的台灣意識者。前者由於近十年來大量投資大陸而有了鬆動，後者則在複雜的兩岸關係下亦可能生變。

更大的變局也許出在台灣的大資產階級。這個一向依附於（或相互利用於）國民黨的階級面對著台灣政權的變天將何去何從，是未來兩、三年內台灣階級政治最值得觀察的一個面向。大財閥當然不會只押一注，他們或許早已與陳水扁暗通款曲。但在「互相利用」與「死忠兼換帖」之間，還有很大拉扯的空間。此外，大資產階級會不會轉型為陳水扁或民進黨的社會基礎，也要看國民黨日後的改造（或不改造）而定。

就主觀層面來看，陳水扁早已向大財閥招手，殷琪、張榮發、許文龍等人在投票前公開挺扁，可為明證。因此，雖以掃除黑金政治為號召，陳水扁政權向大資產階級傾斜的可能性是比較大的。

三、民粹政治的變形

這次選舉，李登輝往日的光環大為遜色，李登輝光環是李登輝巧妙地搬弄民粹政治而顯露的。國民黨的敗選，為這長達十二年的民粹政治譜下休止符。

但休止符可不是曲樂的終點。陳水扁顯然承了一部份李登輝的情結光環。面對中共日益不安的反獨情結，民粹政治有可能在陳水扁政權中浴火重生。

或許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楚瑜支持者的動向。宋的支持者也會有擔當民粹的傾向，雖然他們是反對陳水扁的，是另一種民粹。

民粹政治是階級政治的絆腳石。台灣勞工階級力量之不易凝聚，和民粹政治之盛行有相當大的關係。我們宜利用李登輝情緒失落之際，加強批判民粹政治之為害，方有利於未來中下階級力量之興起。

四、台灣政權的國際資本主義性格

資本主義是個國際現象，從來便具有全球化的性質。作為資本主義批判者的左翼，不能不對國際資本主義的發展抱持密切的注意，並以此來探討本國的政權性質與本地左翼運動的策略。失去對國際資本主義發展的警惕，將使我們的認識見木不見林，使我們的實踐失去重大的焦點與方向。

台灣歷來的統治者都是附庸於國際資本主義，但仍有大同下的小異。老蔣時期仍部份地執守「節制私人資本」，這主要不是因為老蔣忠於民生主義的原則，而是著眼於鞏固初來台灣統治的基礎。此外，在國際貨幣基金會體系下亦有助於外匯管制與進口替代的工業政策。因此，老蔣時代台灣經濟之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程度還不特別高。

小蔣時代則是出口導向盛行的時期，台灣的經濟正高度嵌入資本主義國際市場中。雖然如此，十大建設的鉅型投資與積累，使得公部門（或官僚部門）的財富比重仍然居高不下。從而，私人資產階級力量尚不足以挑戰政權。

李登輝時期則大量削弱公部門的力量，厚植私有資本的政治實力，作為他政權的主要基石。在美、英等國大力推動私有化、國際化、自由化等全球三化政策下，李登輝的經濟政策正迎合了國際資產階級的要求，這是李登輝政權長期得到歐美資本主義強權支持的原因之一。

未來陳水扁政權在這方面的政策尚不清楚，很可能會繼承李登輝的路線。這方向的影響雖不直接，卻很重大，值得密切注意。

五、勞工階級的問題

台灣廣大的勞動階級，由於自為意識尚待建立，尚未集結成可觀的力量影響台灣政權的屬性，也因為如此，歷來的統治者可以恣意地忽略與打壓它。

從出任台北市長的經歷來看，陳水扁展現了他管理的特長。這個精幹的管理才能，是適應於資本主義激烈市場競爭的需求，為企業的效率服務，也為資本主義的整體效率而服務。這種資本主義效率的追逐，難以兼顧勞工階級的利益，往往以犧牲他們的利益來達成其目標。陳水扁任市長時期對弱勢者的打壓，是眾所皆知的。他往後政策底繼續犧牲勞工權益，是可以預期的。

有些左翼朋友認為，這將使勞工朋友從民進黨的迷思中覺醒過來，筆者認為缺乏大規模抗爭的前提下，這種覺醒最多只是極小的一部份，無法改變勞工階級在社會力量的比重。陳水扁政權的社會基礎中，勞工階級的份量——不論是支持或反對——都將是微不足道的。★

2000年「總統大選」後的 幾點感想

林書揚

經過數十天極其慘烈的纏戰，所謂「中華民國十屆總統選舉」，終於在三月十八日的總投票後見曉。第五號民進黨陳水扁呂秀蓮一組獲勝。這種結果，雖然也是選前各方面人士所預測的幾種可能性之一，但一旦「可能」變成「現實」，其所帶來的沖擊之大，還是有所超出想像之外。特別是，民進黨終得入主中央主持政權，所謂「變天」的意涵的確嚴重。像整個政治勢力圈的激盪；兩岸關係中必定出現的新緊張新危機；多種社會組織體的人與事的動盪；甚至社會心理、精神生活領域中也可能引發陣陣波動……等，誠然不失為五十年來的一次大變局。有關「三強」陣營的選後情況中，幾天來最凸出的事件，有國民黨黨內爆發出倒李運動、改造運動；民進黨內部出於務實派人士提議的「台獨黨綱」修改爭議；宋系團隊的組黨運動等等，都預示著選後政情的不可測性因素正在全面醞釀中。鑑乎此，本文擬將幾種具體事況或實際問題暫時捨象，僅就本屆大選所顯現出來的現階段台灣政治的基本面，和兩千多萬人民必須面對的急迫問題，略加表述於後。

首先，民進黨在其建黨十四年後的跨世紀總統選舉中獲勝，自然具有重大的時代標幟意義。按，自80年代的住民自決論、台獨宣傳合法論，四·一七決議案，到90年代的「獨立狀態既成論」、公投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等，民進黨以主權獨立的，不被包括在一個中國之內的台灣共和國的建立為其奮鬥目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黨的創立、黨運的推展，黨勢的擴張，民進黨二十年來的發展史，正是以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的上昇和政治自覺度的提高為背景。自從黨外時代起，民進黨的黨意始終環繞在資產階級市民革命的通則概念和形式民主（議會·政黨）體制化運動的周圍，而既然是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政治奪權運動，其當面的鬥爭對手是代表舊大陸系統的官僚資產階級的政經獨佔體。這中間曾經出現過相當激烈的政權攻防戰。國民黨以長期的軍事戒嚴令和多種「戡亂時期」特別法來加以壓制，使民進黨得以民主改革者的姿態在運動中培育出相當的群眾基礎。同時以分離建國作為抗拒國民黨政權的地區偏重和省籍差別的總口號。因此在70～80年代的台灣獨立運動，曾經在國際間被視為人民自主運動的一種。但因為台灣社會的新殖民地性格，台灣資產階級的屬性在本質上是反動的。是從屬於美·日獨佔資本的，後進地區型的資產階級。它的局部性的革新性格，充其量表現在對抗國民黨威權官僚的高壓政策的鬥爭過程中。至於它的反動性，則充分表現在該黨對社會整體剝削系統的無條件服務的角色上面。在國際視野方面，則自居為西方各色帝國主義的頌讚角色（如大肆贊揚美帝在海灣戰爭的正義使命、歡迎美日安保新體制）。該黨在國際事務中經常依附美日兩帝，除了殖民地資本主義的先後天特質所致以外，另外還有一個理由——台灣獨立運動的當面敵人自90年代起已經由國民黨政權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北京政府。至此，民進黨掌旗的獨立建國運動，以台灣資本主義的經濟實力及資產階級功利觀的社會意識為內部推因，以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美日安保新指針諸立法為外部條件，抗拒來自大陸的促統壓力，直至今日。

在此背景下民進黨候選人以39.1%的低支持率打敗分裂了的國民黨，取得了中央主政的大權。回顧陳水扁的選戰過程，其勝利的關鍵除了「漁翁之利」以外，在於部份選民對其解決內政腐敗，特別是黑金問題的能力的期望。以及以「新中間路線」為名降低對大陸的對抗姿態，揚言當選後「不宣佈台獨」、「不入憲兩國論」、「不公投建國」等，有效削減了一般選民對兩岸開戰的恐懼感。對大陸所堅持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則以「前題議題化」的提法消極拒絕，但再三強調「兩岸和平第一」。至於投票前兩天大陸領導人所作的措辭嚴厲的警告——不允許任何形式的台獨，必要時將武力保台，民進黨高層決定避免對抗性的發言，但在基層群眾之間則以耳語傳播美國的反應——美國國會不接受中國的武力恫嚇，太平洋美軍總司令表示美軍一旦介入也有準備流血的決心，等等。意指美國還是會插手，中國還是不會動手。像這樣的

「資訊處理」，民進黨選務人員還是相當熟練。

台獨群眾自 96 年導彈演習事件後，本來就有「急獨萎縮，緩獨擴張」的趨勢。到了陳水扁上台，以和平分裂為戰略的新緩獨派可能逐漸消化剩餘的教義派——建國黨、建國會等，且也可能進一步吸收舊國民黨系緩統派，構成相對多數的民意背景，作為他日面臨兩岸談判的基礎。有關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以非戰狀態下的永續性分離為目標的，亦即以和平手段抗拒和平統一的政治作戰，是陳水扁一班人的肩上重負。也是繼續取得美國的保護和支援的必要條件。而和平分裂的底線是台灣主權獨立論，上限即為超越國民黨設限水平的經貿交流政治對話文化互動。迴避了一個中國的前提，卻豐富了多元多彩的「國與國間」議題。陳水扁所擁有的空間究竟有多大，相當令人懷疑。蓋對岸稍早發表過一份新白皮書，以分離狀態的意圖性長期化視為非和平統一的另一個促成要件。對岸堅認，現代國際秩序的基礎，仍然在於不得任意更改人和土地的主權歸屬關係，不得任意設定逸離歷史事實的新標準等原則上面。大陸的防衛意識的基礎在此。抽象的理論爭議是灰色的。但大陸中國閱歷過多少個世代的苦難和污辱，人民深信唯有以實力為後盾的國家主權才是民族生存的最高保障。缺少主權的自衛條件而奢談人民內部的民主或人權規範，人們認為容易陷入空想甚至為霸權者的虛假邏輯所愚弄。台灣方面若企圖以「民主勝於專制」、「人權高於主權」等議題去折服大陸的「僵化主權論」或「過時民族主義」，誠屬無知。人說阿扁善機變。如果他的聰明只侷限在「一個中國議題化」的權變技巧上，終歸無濟於事。對方只緊抓著一個中國的原則命題，阿扁的空間甚至尚不及持有「國統綱領」的李連。阿扁和他的「國政顧問團」，苦思之餘把一位國民黨籍軍人推上新閣揆的位置。除了穩住軍情之外，是否還兼有預示「兩黨國防」甚至「全民防衛」的未來政策姿態，不得而知。這位現任國防部長還曾經表示過台灣可加入 TMD，其與美國關係想必也不錯。

最後，有關陳水扁政權表現出對企業界的獻媚姿態，除了暴露財經人脈方面的弱點外，似乎還有意修補該黨民粹起家的形象的意思。國政顧問團儘收財團巨頭，確有一點「秀」過頭了。政權由官僚資產階級的手轉入本土資產階級的手（雖是粗線條的說法），意味著基本的社會矛盾結構將無改色。幾種與民眾切身有關的問題，像勞動立法、景氣對策、社會安全、財稅措施等，還有如公營事業民營化的多年課題，自詡草根總統的陳水扁能翻出什麼樣的新境界呢。新執政者的階級屬性，在人民大眾的痛切的生活感受中將無所遁形。政權的一次交替，即便帶來了大量的社會衝撞，對底層的人民大眾來說，只是再度的體認：一個大階段還沒有過去，一種大情勢還在發展中！

從大選看台灣社會的一些基本性質

瑟珂蕙

一、叢林法則與神聖的一票之間

表面上看來，這次的選舉初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選舉形式，但從實際內容來看，卻難脫發展中國家的類型，因為選戰過程充滿了赤裸裸的權力惡鬥，雖然說選舉本來就是資產階級政治鬥爭的一種形式，然而台灣的選舉卻只有叢林法則，看不到一點資產階級應有的進步的那一方面。從這點來看，相對於台灣社會經濟資本主義化的進展，上層建築的法政領域卻相當程度地停留在前資本主義的階段，是落後的。這是台灣社會的特殊性之一。

在選舉過程，政府幾乎完全放棄了公共職能，蛻變為黨國的選舉機器，法院、財稅金融機關、監查院、立法院傾巢而出，成為群毆特定候選人的工具。電視媒體變身為兩大黨架設在每個國民客廳的專用擴音器，透過壟斷專線，競相造謠、說謊、抹黑、挑撥、謾罵，顛覆了人世界的基本倫常，日夜向國民「洗腦」。所謂學術界也脫下了社會清流的外衣，露出胸膛加入混戰。大財團更是走出深層大院拋頭露面，奮勇加入保衛或奪取政權的大戰。與其說是「選舉」，不妨說是一場「全民政治運動」，但主角都是台灣的各不同黨派類屬的資產階級。但是他們並不全以資產階級的面貌出現，也並不全以資產階級的口號來吸引選票，而是以挑動前近代的族群意識以及統獨意識來動員民眾。選舉中台灣的資產階級或政黨，主要並不是以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面貌出現，而是以族群意識或統獨意識的代理人出現。選後當政又是另一回事了。這是台灣社會的特殊性之二。

不可看不到，美國與中國大陸也在這次選舉中進行了民族國家利益的激烈鬥爭。美國間接地以各種方式介入了選舉，各組候選人各有不同的美國背景，當然，目前事實的真像是不可能知道的，有待日後歷史資料的考察。因為，五十年來美國一直是台灣堅強的『盟友』（從「中美協防條約」到「台灣關係法」，從軍援到軍售，從美國救星到美國夢…），在美國的「守護」下，中國大陸一直被當做台灣的「敵人」（從早期的「共匪」到今天的「中國人」…）。中國大陸為了防獨，只有透過公開談話放大音量來「昭告」大眾，即便如此，也被說成恫嚇，別無他法。因此，實際上影響選戰的力量，除了五組候選人之外（實際上只有三陣營壟斷），還有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內外互為作用，可以說共有七組。這是台灣的現實，台灣的選舉並不單純只是台

灣內部選舉。這也是台灣選舉的特殊性，與其他國家的選舉最不同的地方。這也突顯了決定台灣社會的基本性質，除了資本主義的力量外，還有無法漠然視之的極特殊的力量－美國的新殖民主義與中國的民族主義。它是台灣統獨矛盾的根源，是台灣社會特殊性之三。這也是台灣的左翼朋友，除了階級議題外必然要面對的大課題，實際上台灣的保守勢力比左派朋友更知個中三昧。

表面上看，好像每個國民完全依自由意志投下「神聖的一票」，再以一人一票積累成總國民意志的選擇。事實上，這個自由意志卻極大地受到操控著國家機器、擴音機和印刷機的主人的意志的影響。

從根源上，選舉法便已處處體現了當權者的意志，保障了兩大政黨的長期壟斷，為個人或小黨的參選者設置了重重障礙；「相對多數決」的遊戲規則造成了今日多數人必需服從少數人的結果，大多數選民在選後陷入挫敗感的奇異現象中。

很早開始便為這次選舉結果進行布局，並在選舉過程中扮演操盤者的，就是李敖所說的「白天是國民黨主席，晚上民進黨主席」的李登輝總統。回顧看便知：從間接選舉到直接選舉、從相對多數決到絕對多數決、從地方政權「和平轉移給民進黨到「廢省」、從整肅「宋幫」到國民黨分裂選舉，一直到他最親近的菁英傾巢出面「挺扁」，他從根本上成功地營造了民進黨當政國民黨下野的大形勢，達成了政權和平轉移的「宿願」。「奇美」老闆許文龍說得沒錯，「陳水扁是李路線的繼承者」，怪不得選後數晝夜國民黨中央黨部前要李登輝下台的聲勢會這麼激烈。這是這次選舉過程中最突出的現象，值得大書特書。

二、選戰的核心—族群意識、統獨意識以及市民意識

從上可知，這次的選舉，其本質我們大略可簡單描述為：主角包括政治強人的個人意志所駕馭的黨國機器、各路台灣資產階級的代表或本人，再加上美國、中國大陸各方政治勢力競相以挑動選民的政治意識獲取選票，爭奪政權。盡情挑動選民的政治意識、社會意識是選戰的核心，因此客觀地分析台灣的社會意識、政治意識是認識選舉的關鍵問題。綜觀之，影響這次選舉走向的社會意識有三：族群意識（省籍意識、閩客意識…等）、統獨意識以及市民意識（比較屬於資本主義社會意識的反黑金反腐敗反特權，或環保、性別等）。在選舉中這三種社會意識中到底那一種起了關鍵性的作用？每一個人的見解不同。如果從台灣已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起最大作用的理應是市民意識，但事實上並不盡然，從實際的選舉過程來看，影響決定投票行為的意識，除了滲雜著前近代性的反黑金反特權的市民意識之外，很大的部份卻是非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族群意識和統獨意識。從這點可以證明，台灣的社會意識很大部份仍處於前近代的或非屬於資本主義的層次，它是客觀存在，這些意識不是憑空

而降的，是有它歷史與現實基礎的，不只是觀念的而是有它的物質的基礎的，是台灣社會性質的重大部份。在這次選舉中，不要說階級意識，連自由主義的市民意識都得不到發言的空間，整個選戰都集中在挑動和吸收反黑金、統獨、族群的議題上。通過這種觀察，我們可以再次看到台灣社會的一個明顯特性，那就是，雖然下層建築的社會經濟關係已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但上層建築的社會意識大部份仍處於非資本主義的範圍。我們要怎樣看待這種乖離的現象呢？

族群意識是台灣社會歷史的特殊產物，社會歷史遺留下來的胎記，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隱而不見並不起太大的作用，只有在政治經濟不平等的條件或為爭奪利權時才會被刻意動員突顯出來。特別是當它與資產階級意識結合又染上受壓迫的悲情意識時，便上升為激情的政治意識。譬如這次被動員的福佬意識便是陳水扁勝選的關鍵因素之一。我們知道，族群意識只不過是政治經濟意識的外衣，但是通過選舉，我們可以看到它是台灣社會的政治鬥爭的原始利器，銳不可當。

統獨意識，是五十年來美國霸權主義為宰制其在東亞的利益，所促成並維持的兩岸的分離和對峙的形勢的產物。80年代以前，在兩蔣的國共內戰政權下，「反共復國」是統治意識，獨立意識受到壓制，復加台灣資產階級的力量仍相當貧弱，統獨意識沒存在的條件，80年代以後，由於經濟膨脹，台灣人資產階級勢力崛起，再加上李登輝的台灣資產階級政權上台，台灣與大陸一邊一國的分離意識急速抬頭，形成了尖銳的統獨意識。這次選舉中統獨意識表現為中國意識與反獨意識的兩邊，簡化的統一或獨立意識並未突出。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否認或無視美國與大陸對台灣社會的重大影響力。支持陳水扁當選的意識力量主要的是，資產階級意識、反中國意識和福佬意識三結合。

三、大選結果的初步評估

選舉的結果最具有歷史意義的莫過於國民黨的下台以及李登輝的去職，這不但對光復以來一直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歷史來說具重大意義，從全中國現代史的眼光來看也是重要的章節。國民黨的下台，一方面使一向在黨國機器的庇蔭下滋生的特權、黑金、腐敗等前近代的社會要素，雖不至於消退但至少不再擴張；另一方面使長期在李登輝國民黨的栽培下成長，身在國民黨的後面攬盡正當性的光環的民進黨，一夕之間失去了保護膜，開始當家作主，好壞自己承擔，已開出的巨量的美好的信誓旦旦的支票如何兌現？龐大政經利益如何均霑？當權後，可能的變化是：泛獨派的勢力很可能分裂；在市民運動、大眾運動方面，一向靠攏民進黨的市民運動中的某些部門運動（例如：反核運動）可能會與民進黨形成一定程度的對立關係，而其他大眾運動，例如工運，可能會有外形上的擴大（例如：各基層工會中非國民黨的工人掌握工會的可

能性增加、「全產總」合法化後，原本「全總」旗下工會的相繼加入等），但我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必須以真正「自主」的尺度重新檢驗所有過去習慣性地認定的自主性的大眾運動的時候了，不能再用過去的標準「親國民黨＝親資方；親民進黨＝親勞方」來區分自主工運。而且，我們擔心我們的大眾運動始終未曾真正的自主化過，因此，陳上扁上台後，我們再一次做檢視時，其實真正的「自主隊伍」反而縮小了。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又合作又鬥爭的局面將出現，下台的國民黨將尋求政權的保護殼，民進黨將再度尋求國民黨的支援，國、民共治的局面將出現。民進黨必將國民黨化，無法終止黑金。在兩岸問題上，經貿關係必然擴大，會有局部三通，但圍繞著“一個中國”原則會有激烈的鬥爭。對內透過教育文化政策，「台灣人意識」將更形膨脹。選舉的結果，與其說是歡迎民進黨當政，倒不如說是對國民黨當道的厭惡。國民黨的下台，加快了台灣社會變化進展的速度，把所有的問題快速推到了盡頭，省卻了許多過渡，就這點來說，勿寧說是進步的。壟斷資本將更壯大，直接走上社會舞台，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問題將從重重迷障中顯現出來，階級議題更容易浮現。兩岸問題已推到了面對面 無法閃躲的地步，底線已露，只有前進沒有後退的餘地。

四、怎樣看新政權？

我們認為台灣的壟斷資本已經形成。而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變化，原本發源自黨外小資產階級運動的民進黨，歷經十多年的變化，如今能在大財團公開支持的情況下取得執政權，自然是因為本身政權屬性的轉變。假設不是如此，也就是民進黨仍然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那麼這次選舉最大意義就應該是小資產階級推翻壟斷資本，但相信甚少有人會這麼認為。

不管是從選前的「棄連保扁」口號，還是從選後的「清流共治」口號、國民兩黨聯合廢國代抵制宋陣營的動作，我們都可以看到台灣政治圈內的保守大聯合已經進入了一個新而全面化的階段（這絕不表示被排除在保守大聯合之外的宋陣營就具有相對進步性），而這個保守大聯合的內部與外部，相當程度上是以省籍為區隔的，而且相信雖然宋黨不願意但民進黨卻會不斷加強宋黨的外省色彩，而這樣的形式對於保守大聯合的建立與穩固化非常重要的。因為執政黨的物質基礎在於壟斷資產階級，但它卻要靠來自勞動民眾的一張張選票建立起其政權的正當性，而這之間的乖離，必須靠一種東西來轉化，在台灣省籍剛好是最好的轉化劑。★

本刊新增 E-mail 信箱：twleft@sinamail.com.tw

歡迎多加利用

原 E-mail 信箱：twleft@sina.com.tw

仍可使用

從改革者到掘墓人

——台灣觀點的俄羅斯大選——

劉鳴生

2000年3月26日，俄羅斯代理總統普京從莫斯科的投票所出來，一大群記者堵在門口，要求他評估自己勝選的機會，普京只簡單地撂下了一句話：「我把票投給了俄羅斯的未來。」

這使我們想起，就在八天之前，台灣也經由全民直選，誕生了一位新總統。新總統陳水扁的媒體廣告中，主打一句競選口號：「歡喜看未來」。

普京和阿扁都刻意強調「未來」，當然有其言外之意。相較於美好的未來，當然就是醜惡的過去，做為政治語言，他們要說的是：「把票投給我就是投給美好的未來，否則，醜惡的過去將延續下去！」將客觀的時間以主觀意識投射做出善惡二分的區隔，大大方便了無數在生活上與電視連續劇相依為命的選民。善惡分明的角色和劇情，讓觀眾選民看得放心，睡得安心。

是的，選民觀眾化正是現代民主政治的特色之一。與此同時，政治人物的明星化也是必然的趨勢。自從演員出身的前美國總統雷根展現了「表演政治」的驚人魅力以來，政治裡的表演成分就越來越為鮮活。在台灣，陳水扁首開風氣，創新潮流，最能抓住表演政治的神髓。首先，他寧願放棄本名全名，而在絕大部分的場合，改以類似藝名的「阿扁」自稱。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他可以隨時換裝變臉，以取悅觀眾為目標的角色出現。扁帽和阿扁造型玩偶等選舉週邊產品的龐大市場，也反映了影視觀眾追星和偶像崇拜的痴狂。

這次總統選戰期間，民進黨的電視競選廣告最具創意，因為這些密集的、系統化的廣告設計最能掌握影視媒體的特質，將政治揉合於表演藝術之中，為觀眾提供了最強烈的影像記憶。而影視媒體近幾年來的「大投資、大報酬」原則（譬如從《侏儸紀公園》到《鐵達尼號》，其拍片費用與票房營收都宣稱破了影史紀錄），也具現在大手筆的選戰開銷。根據後來投入媒體工作的前民進黨文宣部主任陳文茜估計，陳水扁大型造勢活動的舞台設計，動輒在千萬元以上，而三組主要候選人的廣告製作和託播費用則至少上百億。就投資報酬率而言，沒有什麼比整個政權的奪取更為迷人的了！

有人或許會說，在第一輪投票即以 52.52 % 得票率勝出的普京並不具有「政治明星」的特質。錯了！不同的文化需要不同的明星造型。台灣久處美、日文化籠罩之下，因此一方面心儀於西部牛仔一般的英雄（本土、犀利、正直），好人掏槍，壞蛋

倒地；另一方面，又喜歡那些活躍於「會社」的企管幹才（年輕、辛勤、顧家），工作之餘還能夠營造炫麗輕鬆的情境，並偶爾提供偷情的空間與想像。斯拉夫文化的英雄造型則截然不同：桀驁、頑強、好鬥中混合著憂鬱、深沉與自虐。好讀舊俄小說的人大概可以從屠格涅夫或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的主人翁中找到其原型。尚未獨攬大權前的葉爾辛帶有上述的氣質（他高距坦克車上激情演說的鏡頭成為其英雄事業中的絕響）；普京曾經潛伏德國從事情報工作長達五年而未留下任何痕跡，他在大選投票前幾天，以總統候選人身分自己駕駛蘇-27型戰鬥機直達車臣戰場的最前線，更是十足展現了其政治明星的架勢。

「我的生命非常單純，僅僅像是手掌上的一條紋路」，有兩位記者以6天的時間，對普京做了長達24小時的訪談，訪談紀錄成書，這是普京開場的一句話。普京歷數他的生涯：小學畢業進了中學，中學畢業進了大學，大學畢業後到國家安全局KGB工作，先後又調派到聖彼得堡市政府和總統府的行政部門，KGB易名為FSB後，他成為負責國家情報工作的首長，後來是葉爾辛找他去當總理，去年年底，葉爾辛突如其然辭去總統職務，他順理成章地成為俄羅斯代理總統，成為葉爾辛的接班人。

普京以平順的語氣敘述他彷若平淡無奇的生涯，在政潮洶湧、戰事綿延、意識型態鬥爭復熾的這樣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龐然大國裡，反而更令人覺得神秘莫測，毛骨悚然。而面對葉爾辛這樣一個可以砲轟國會、換總理如棄舊衣、越到晚年越是剛愎任性獨斷的威權統治者，他居然可以不動聲色地令其自動去職，交出權柄，更是令人不可思議！就這樣，一條簡單的紋路，在他手掌上不斷延伸，突然間，拳頭收緊，普京就掌握了一個龐巨國家的生命線。

普京顯然對自己的登峰造極有高度的信心。早在去年11月，在伊斯坦堡的一次高峰會議中，普京就以開玩笑的語氣對美國總統柯林頓說：「你們已經有了北美，有了南美，也有了非洲和亞洲，那麼，至少該把歐洲留給我們！」據說，在場的人士對於這樣的一個「玩笑」，都覺得心理發毛。而那時，普京在俄羅斯的地位尚未穩固，依照慣例，葉爾辛哪天脾氣不好，喝酒不爽，隨時都可以把他撤換。

葉爾辛越到晚年越受到俄羅斯民眾的鄙夷，他的親信和家族越來越肆無忌憚地污錢洗錢，成為一個以國家機器為護符的黑金大集團。葉爾辛鐵腕執行市場化、私有化的自由經濟政策，普遍受到歐美資本主義大國的信任和支持。但是，葉爾辛執政長達九年，推行市場經濟的成果居然是導致國內生產毛額下降40%，全國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生活於貧窮的底線之下；推行私有化的成果卻是賤賣國有資產，公共產業一個個落入依附於政權與黑道的新興貴族手中。前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淪為一個「既無國家，也無經濟」的可悲狀態，無形中戳破了社會主義國家向資本主義轉型的美麗承諾！俄羅斯的經改成果，讓歐美那些無條件支持葉爾辛的國家（包括他砲轟國會，造成150人死亡的「民主」成就）也深覺汗顏，而其親信家族令人髮指的盜竊、掏空、

轉移國有資產，也不得不讓人為葉氏去職之後的下場捏一把冷汗。

情報頭子出身的普京當然深知葉爾辛的罩門所在，他也知道只要葉爾辛在位一天，他就得永遠活在這一位病夫、獨夫的陰影之下，更擺脫不掉其親信家族貪婪惡搞的包袱。總而言之：普京的崛起得力於葉爾辛的提拔，但是，葉爾辛的存在卻又是普京邁向總統之路的最大障礙。於是，普京先是在總理的位子上培植自己的人馬，逐步將他過去任職過的聖彼得堡和國家安全局的屬下調到身邊，勢力大抵穩固之後，遂直接向葉爾辛提出要求。終於，在保障葉爾辛退職後身家安全、不受法律追訴的條件之下，葉氏答應提早交出政權，並讓原定今年六月舉行的總統大選提早了三個月。

果然，在擺脫葉爾辛之後，普京的聲勢大漲，民意支持度從最早在葉氏陰影下的2%直線攀升，最後竟以超過52%的得票率，在第一輪即脫穎而出。共產黨候選人朱加諾夫雖然以30%的選票排名第二，卻已對普京構成不了任何威脅。

做為葉爾辛指定的接班人，普京卻巧妙地將自己塑造成葉爾辛的「反襯對比」(antithesis)，不僅不受葉爾辛剛愎昏庸、縱容親信的陰影所籠罩，反而透過細膩的權力操作和對籌碼瞭然於胸的談判，幫助俄羅斯民眾提早擺脫「葉爾辛路線」的夢魘，凸顯自己的獨立人格，並從而在選民中造成斬截過去，開創未來的英雄形象。

相對而言，做為李登輝指定的接班人，連戰就沒有這樣的幸運。連戰學政治出身，也是聰明人，當然早就預見李登輝系統的親信人馬和不明不白的龐大黨產，將是他邁向總統之路的最大障礙。也因此，連戰陣營大膽提出黨產信託的政見，也很早就釋出要求李登輝提早交棒的訊息。不幸的是，連戰生於豪門，養於深宮，缺乏普京的魄力和手腕，最後不僅徒然與依附於黨產的利益集團結怨，選戰過程中還不時要受到總統親信蘇志誠之流的頤指氣使，既無法擺脫李登輝的龐巨陰影，獨立自主的人格無從舒展，反而處處暴露自己極為不健康的壓抑與扭曲。最後，在選戰的關鍵時刻，李登輝親信集團的倒打一耙，竟成致命一擊，棄保效應發酵，連戰敗得淒慘無比。

比較俄羅斯和台灣相距僅僅八天的權力接班，我們發現有不少可以相互鑒照之處。其中一個看似弔詭的歷史警示是我們不得不注意的：葉爾辛和李登輝原先都恭逢時代轉折的機運而崛起，他們最初都是以改革者的角色出現，受到民眾赤誠的愛戴與支持。然而，權力的滋味難免招引分嗜的慾望，於是身邊拍馬逢迎、曲學阿世之徒紛紛聚攏，而權力的傲慢則使當權者喪失自省的能力，以致逐漸忘卻了改革的初衷。最後，改革者竟成為自己的掘墓人，他們的結局竟是被自己挖出的污泥穢土所掩埋。葉爾辛雖然及早去職，得以全身而退，但是依附其權力而滋生的親信蟲蟻，卻已成為還將不斷蛀蝕俄羅斯社會的惡疽。李登輝沒能像葉爾辛一樣及早抽身，終使接班人連戰飲恨，使國民黨瀕臨潰亡邊緣，而他自己也在民眾持續的包圍、叫罵之下，倉皇下台。十二年來，李登輝做為台灣最高權力的化身，其晚景竟落得如此淒涼！百年之後，掘墓人也將化為塵土，而歷史，將如何記載這一則權力的故事？

戰後幾個主要的 「現代資本主義論」〈一〉

黃志龍

前言

《資本論》的寫作，是馬克思以英國的經驗作為理論論述的例證，以資本主義從重商主義階段到自由主義階段的發展過程作為基礎，其中又以產業資本佔統治地位的自由主義階段作為主軸，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其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他有系統的詮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和歷史特質，從而確立其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的地位。

隨著資本的擴張和積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在矛盾的表現形式，在歷史的過程中不斷地進行階段性的進化。因此，以19世紀中葉英國一地為經驗對象所寫成的資本論，其中某些命題展現出歷史的侷限性、在資本主義後期發展的階段上喪失其時代的適用性，乃極為正常的事情。19世紀末，一方面由於較為後進的美國與德國迅速地工業化；另一方面，包括英國在內的資本主義由於構造上的變化展現出不同的樣貌。《資本論》所規定的部分命題，無法直接地用來分析現狀的問題才被暴露出來。

E. Bernstein的修正主義，就是產生在這個基礎上的謬誤，他首先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提出質疑，隨後提出從根本上修正或全盤放棄馬克思主義及其理論的主張。

相反的，R. Hilferding與列寧積極地繼承馬克思的觀點，並進一步研究壟斷資本體的形成、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之間的關係變化、景氣循環的規律、資本輸出的規模以及國家經濟政策所能扮演的角色等命題，從而架構出「金融資本論」、「帝國主義論」等全新的理論，並在這個新的架構上，重新分析並詮釋E. Bernstein所指陳的各個現象，而不是將《資本論》原有的命題直接套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上。這就是說，R. Hilferding與列寧在分析《資本論》中沒有述及也無法述及由特定的歷史條件所形成的各個現象時，是以適用時期有限卻又具有一定抽象意義的「金融資本論」、「帝國主義論」等新理論來進行詮釋。也就是說，他們以《資本論》中的一般理論為基礎，抽出針對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資本主義現象的「階段論」，再將其當作聯繫一般理論與具體分析（現狀分析）的中間橋樑，從而在不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情況下，詮釋資本主義在新的發展階段中所呈現出來的各個現象。

資本主義的構造在量變的過程中，是以階段性進化的方式來進行，所以分析資本主義的複雜運動時，必須以中介理論來聯繫一般理論及具體分析，否則具體分析就會變成單純的「歷史記述」。

所以，日本托派主要學者佐佐木力教授也說：「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馬克思主義者陷入混亂之中。這是因為針對近代資本主義提出批判性分析方法的馬克思，其生前所看到的『自由競爭之王國』在此時已經產生了新的變貌，而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還沒找到理論上和實踐上的指導方針，來面對將要揭幕的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時代，因此產生了迷亂。」

對『自由競爭之王國』時代有效的概念，簡單地說就是布爾喬亞階級和普羅階級之間的階級對立。但是，現在卻需要另一個國際主義性的分析工具，給世紀轉換期間，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迷亂，打一支清醒劑。首先是針對資本主義的新時代提出明確的歷史展望的，是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

……戰後托派的重要指導者E. Mandel，將戰後資本主義或戰後帝國主義視為資本主義體制的『第三時代』的階段。他1972年出版的主要著作《晚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德國與英國版都是用這個名稱，但法文版卻是《資本主義的第三時代》。E. mandel在德文版序言說：『有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才有意義。他的《晚期資本主義》是列寧《帝國主義論》的後續理論。』

「資本論」和「帝國主義論」的這種辯證關係，就是作為資本主義一般理論的「資本論」和作為中介理論的「帝國主義論」的辯證關係。

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就是一個典型的中介理論。「帝國主義論」著重於分析19世紀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間「古典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在這時期，重工業部門確立了以股份公司為形式的大規模生產體制。就這一點而言，資本主義似乎已經形成了到現在還存在著的新面貌；但是，如果考察這時期以資本輸出和殖民地再分割為特徵的資本積累方式，則古典帝國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就是：壟斷資本為了解決因限制生產和投資所產生的矛盾而導致金融資本相互對立、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體系。

後者與二次大戰後的資本主義有所差異。戰後資本主義成功地由外向型積累轉為內向型資本積累，並且形成了以內部成長與生產性上昇為互相促進機制，從而得以繼續其高度積累的體系。

因此，在進行對戰後經濟成長過程的理論探討時，建立在壟斷資本限制生產和投資的基礎上，主張資本主義具有經濟停滯化傾向的「古典帝國主義論」，就喪失了某些說服性。

資本主義的進化，在不同的階段呈現不同的特性。19世紀以後的資本主義，其資本與生產的結合型態以及其資本積累的方式，迄今為止已經經過了數次的變化。所以在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如果不想讓其成為單純的「歷史記述」，在不同的階段

就必須擁有不同的中介理論。

因此，本文的目的就在於介紹二次大戰後，由左翼經濟學者就資本主義的階段性發展所提出的幾個中介理論，以提供給島內的朋友參考。

一、從「全盤危機論」到「現代資本主義論」

從戰後的危機到重建的十年間，馬克思主義正統派分析現代資本主義架構的理論代表就是「全盤危機論」。全盤危機論被認為是史達林繼承了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各種看法，並在這個基礎上加以發展的理論。例如，蘇聯的《經濟學教科書》（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出版）說：「資本主義的全盤危機的特徵如下：即，世界分裂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這兩種體制之間進行著鬥爭；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體制陷入危機，市場發生嚴重問題，因此企業發生設備的慢性閒置以及慢性的大量失業」。該書又說：「資本主義的全盤危機構成帝國主義時代的一個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建國成為全盤危機的第一階段，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東歐及亞洲人民民主主義諸國脫離資本主義體制，因而產生全盤危機的第二個階段…。」

這種全盤危機論，基本上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大眾的生活水平受到壓抑，因而產生生產過剩恐慌；加之，社會主義諸國脫離世界市場，同時殖民地制度也發生危機。所以資本主義世界難於避免嚴重的市場問題和慢性經濟危機。

當然，這種主張有：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集團的安定成長來凸顯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狀態，因而藉以強調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政治意涵。

就世界經濟的動向而言，一次大戰後的資本主義，由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和社會主義集團的擴大，使其統治領域狹窄化，因而令人認為世界史已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所以在兩次大戰之間，尤其是1930年代以及二次大戰後的混亂時期，全盤危機論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說服力。

不過全盤危機論無法說明的是：雖然世界市場比從前狹窄化，但從50年代到60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透過資本積累擴大其內部市場，因而達成相對安定的成長過程這個事實。這就是說，1950年代以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持續性經濟成長，就其規模和持續性來說，無論如何是無法由全盤危機理論來說明的。因此，從1960年代開始，出現了種種現代資本主義論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用以詮釋現代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繼續成長的機制，以及國家所扮演的角色的增大。這些理論的出現，也是因應經過理論內部精密化之後，凱因斯主義成為歐美經濟政策運用的基準，並且展現出「表面」上成功的時期。

二、現代資本主義論和凱因斯政策

(1) J. Strachey:《Contemporary Capitalism》(1956) 《The End of Empire》(1959)

在歐美，較早承認凱因斯政策的有效性，因而意圖重新構築馬克思主義現代資本主義論的是J. Strachey的「當代資本主義」(Contemporary Capitalism)。J. Strachey肯定「全盤危機論」的理論基礎，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大眾的貧窮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於壟斷資本的限制而變本加厲；同時也使商品的過剩生產慢性化。

但他也主張：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由於藉助「政治民主主義」來對抗壟斷企業的經濟壓力，限制了利潤動機，推行凱因斯的景氣調整政策，致使擴大所得的再分配、公有化以及福利政策的經濟體制已然成形。因此，如果再進一步往這個方向發展，現代資本主義就很可能「民主地」改變為社會主義。

他在《帝國的終結》(The End of Empire)一書中說道：在這種變化過程中，可以消除一向由於商品的生產過剩而必然產生的資本輸出和帝國主義擴張。所以二次大戰以後，帝國主義大致上已消失，同時透過對落後國家的經濟援助，產生了擴大民主主義關係的情況。

然而，Strachey的現代資本主義論，是以大戰後在工黨執政下的英國內閣所實現的高就業率和高福利的經濟過程為基礎，然後將其抽象地推演而構成的。他只強調凱因斯政策有效的一面，而沒有指出其屬於改良主義，因而具有侷限性的資本主義本質的另外一面。所以他的主張，可以說是較接近於E. Bernstein的修正主義。

其實，就作為其理論基礎的英國政治、經濟情況而言，國有化的擴大只不過是政府對赤字企業的救濟性收購而已，而先進國家和後進國家之間的關係，實際上與實現經濟民主主義的方向漸行漸遠。

另外，由於Strachey也將「獨、寡占→抑制投資→經濟停滯化」當作現代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基本趨向，因此他也和「全盤危機論」一樣，無法解釋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在經濟上的意義，也沒有將這些事實成為他理論的一部份。

(2) P. A. Baran和P. M. Sweezy :《Monopoly Capital –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Baran和Sweezy兩人在其合著的《壟斷資本》一書中強調：巨大的產業壟斷資本雖然迴避價格競爭，卻在非價格競爭方面致力於提高生產力、減少生產費用。由於生產費用的降低，不斷擴大產業壟斷資本的經濟剩餘，卻由於為了避免其過剩產能再行

增加，導致其擴大的經濟剩餘無法在產業投資上找到充分的出路。所以，壟斷資本主義在本質上具有陷入「慢性不景氣泥沼」的內在趨勢。

雖然如此，現代資本主義體制，除了大企業爲了促進銷路浪費了大量的金錢之外，更由於政府的軍國主義性支出的增加，從而吸收其過剩的經濟剩餘，維持了就業水平，致使先進國家的勞動階級遠離革命（所以他們認爲，社會主義只有透過先進國家的獨立運動或革命戰爭，才有希望實現）。

Baran和Sweezy兩人都承認，壟斷資本所支配的戰後現代資本主義，促使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但是，他們同時也指出了反動的軍國主義性支出的擴大、城市過度密集和荒廢、道德規範的衰退等現象，進而批判現代資本主義國家所扮演角色的歷史侷限性。

Baran和Sweezy兩人雖然都批判現代資本主義的頹廢性，但卻也肯定國家支出的增加吸收了過剩的經濟剩餘，因而維持就業水平。就這一點而言，他們都無法避免肯定凱因斯財政政策在就業問題上的有效性。

這種認識，和他們的「方法論」有關，他們試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1960年代的美國資本主義特殊的歷史經驗中抽象出來，使其一般化而形成現代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

《資本論》將資本主義視爲一個歷史體系，指出其基本構造的特徵，也就是矛盾的性質、矛盾發展的方向性和歷史的侷限性等等，構成了資本主義一般理論的架構。換言之，資本主義具有萌芽期、成長期和衰退期的不同階段，而《資本論》雖然以資本主義在19世紀的成長期爲中心，卻掌握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全面發展階段的資本運動原理的體系。但Baran和Sweezy卻認爲：《資本論》不過是從19世紀英國的經濟情況抽象出來的，有關「競爭性資本主義體制」的理論而已。因此，現在需要以研究資本主義發展最先進的美國爲基礎，來建構「壟斷資本主義體制」的理論。所以他們的理論是：將戰後到60年代這一段特殊時期中，美國面對「陷入慢性不景氣的泥沼」之現實的處理方式一般化，卻將它和支持其處理方式的具體的歷史條件切斷而形成。因此不僅在主觀上推測歐洲、日本的資本主義也必定會跟著美國的軌道發展，同時也欠缺了伴隨著世界市場構造的變移，進而研究這些國家的金融資本發展的特性、互相之間的關連性等觀點。於是到了1970年代的經濟危機後，其理論和現實之間就無法整合而喪失其理論基礎。

一般以爲，二次大戰後的資本主義，由於有效地運用凱因斯的金融、財政政策而避免了恐慌，因而維持了持續性的就業安定和所得上昇。就1950年代，尤其是就60年代先進國家的持續性成長的過程而言，這種認識似乎頗符合現實情況。例如：在美國，'53~'54年、'57~'58年、'60~'61年以及'69~'70年雖有景氣的衰退，但是並沒有惡化而且在短期內就被克服。尤其是60年代，在甘迺迪、詹森兩位總統主政下，由於採行凱因斯主義政策，資本主義似乎已經形成了足以達成充分就業和經濟成長的體制。這種認識和經濟成長的事實，影響了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的「現代資本

主義論」。Baran和Sweezy的《壟斷資本》一書，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例子--他們都承認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危機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但他們卻也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徵是，國家的特殊機能可以防止或吸收恐慌的發生或生產過剩的危機。

其實，就1930年代的恐慌而言，凱因斯政策並沒有成功。美國在執行所謂「新政」(New Deal)後，1937年的失業人口仍然高達770萬，而且37年秋天到38年，也出現了嚴重的恐慌並造成失業人數的激增。這種現象的解除，是因為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爲了對抗社會主義，美國對外進行軍事、經濟援助，維持龐大常備軍的開支以及韓戰、越戰的軍事衝突的擴大，形成了以通貨膨脹爲基礎的財政膨脹政策，從而在世界範圍上的資本主義，也以通貨膨脹爲手段維持相對的安定性。這就是說，凱因斯的景氣調節政策，表現在「新政」上並沒有獲得成功，反而是在戰後爲了對抗社會主義而擴大軍事支出和推行福利政策後，成爲所謂「福特主義」效果的副產品而達到表面的成功。再具體的說，戰後美國的高就業率，並不能證明凱因斯的景氣調整理論和政策本身的正確性和成功，而是爲了對抗社會主義爲目的的軍事、福利消費和因「福特主義」而擴大的有效需求，吸收、緩和了起因於資本過剩的不景氣壓力而奏效。所以，當時的馬克思學者之所以受到凱因斯的影響，其實是起因於他們對凱因斯政策效果的誤判。

(3) 「社會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

K.Zieschang:《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1957)

今井則義：《日本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1960)

井汲卓一：《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1971)

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爲國家介入資本主義經濟，在蘇聯和東歐，繼「全盤危機論」之後出現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其中東德的K.Zieschang，爲了將之與古典的帝國主義階段區分，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規定爲：「爲了適應生產力的新發展而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一個發展階段」，因而引發激烈的討論。

Zieschang不認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盤危機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爲了適應生產力的「社會化」，生產關係也發生「社會化」的現象。這就是說，他不以政治因素而改以經濟因素來說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更具體的說，Zieschang認爲：資本主義爲了因應生產力的「社會化」，其生產關係也不得不「社會化」--從個人資本發展爲股份資本，更由於投資規模的巨大化，爲了招募資本和確保市場，形成了國家對經濟事務的介入。如此形成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雖不能創造市場使景氣繁榮永久化，但是由於國家進行所得再分配以及生產調整，產生了使生產和市場發展的新條件，因而大大的影響了景氣。

Zieschang的理論是「想」依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說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

生產關係因應生產力的發展而使「現代國家」增強其在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採用凱因斯政策在內）。

但依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生產關係因應生產力發展而產生的變化，是屬於下層構造的發展，而不是法律、政治等上層建築的變化。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國家在經濟上角色的增大，並不屬於生產關係的發展。

這就是說，Zieschang的理論混淆了上層建築和下層構造之間的區別，使生產關係的定義曖昧化，是唯物史觀的誤用或過度解釋。但是，日本學者今井則義、井汲卓一等人，不僅支持Zieschang的理論，更相對於「政治國家」或「做為上層建築的國家」，而主張「經濟國家」或「作為下層構造的國家」等理論，成為所謂的「構造改革路線」的理論基礎，在日本發揮一定的影響力。

他們不僅不正確的使用馬克思生產關係的概念，也把現代資本主義之下，國家機能的增強，單純的歸因於生產力的巨大化，缺乏正確的認識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和發展，以及經濟恐慌等具體歷史事實的影響，因而逐漸消失其影響力。

(4) 大內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1970)

大內力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是為了克服Zieschang和今井、井汲等人的理論缺點而發展出來的。

在這本書中，大內主張：以一次世界大戰的俄羅斯革命為契機，世界史已經進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而在這個過渡期的資本主義、在大恐慌的過程中，為了應付體制和危機而增強國家的職能，因而轉化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在於：他形成了在貨幣管理制度下，以通貨膨脹政策來抑制實質工資的上升，以解決和預防因資本的過度積累而產生恐慌的機制。

大內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不同於一次大戰前的古典帝國主義階段，所以國家為了迴避恐慌而採取的財政、金融政策也有所不同。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國家機能的特徵在於：一次大戰後，資本主義進入過渡期的全盤危機。更由於30年代的大恐慌，資本主義體制的危機已經成為現實化和內在化。同時由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放棄了金本位制而採用貨幣管理制度。為了迴避恐慌，這些國家採行通貨膨脹政策 -- 因為，資本的過剩積累將導致工資上昇，一旦面臨發生恐慌的臨界點（Critical Point）時，通貨膨脹不但可以抑制實質工資的上昇，而且可以使其降低。

大內的理論，和1960年代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一樣，都沒有脫離一個侷限。那就是：把從戰後重建時期到60年代的凱因斯通貨膨脹政策「外表上」的成功，當作攸關現代資本主義本質的問題，而將其誇大地一般化後，納入馬克思理論的架構內的毛病。

1970年代以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發生和進展，呈顯了凱因斯主義的侷限性。因此肯定凱因斯主義的有效性，並將其一般化而發展出來的種種現代資本主義論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本身也面臨危機。

於是經過批判和反省之後，從各種角度重新進行現代資本主義分析的工作開始活潑化。〔待續〕 ☆

韓國的社會結構體論爭(一)

臧汝興

和台灣一樣經歷過 50 年代的白色恐怖肅清，左翼遭到連根拔起的命運的韓國自 80 年代起，左翼再度興起，並相當程度的在韓國社會大眾化，韓國這一代的左翼與 50 年代的左翼傳統幾乎沒有什麼關聯，因此又稱為自生性的左翼。

1980 年的光州抗爭是韓國自生性左翼萌芽發展的決定性契機。在此之前，反對運動是以學生、在野黨、無黨籍良心人士主導的市民民主化運動為主，而這樣的運動到了 80 年的 5 月 18 日發展到最高峰，已經達到搶奪火藥庫、將戒嚴軍趕出光州市的程度，但七日後就遭到政府軍殘忍的鎮壓平息。

就外形來看，這次事件是韓國民主運動史上最大的一次挫敗。一個龐大力量的運動，就如此敗在政府的一個「武力鎮壓」的命令之下，那麼接下來的運動要如何搞？運動陣營不能不陷入很深的沉思。

後來得到兩個重要的與左翼發展有關的結論。一是過去的運動缺乏與大眾的緊密結合，尤其是勞動大眾。另一是韓國政權與美國的從屬關係必須更進一步進行分析，並反應在韓國的反對運動上（因為美國在光州抗爭中扮演了鎮壓協助者的角色）。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83 年底之後，一些在公開性運動組織從事運動的運動家之間，展開了所謂 C - N - P 論爭。該論爭中三派初步地提出了對韓國社會結構的看法，而重點仍然放在運動的路線問題上。不過它卻揭開了韓國社會結構論爭的序幕，因而被稱為社會結構論爭的前階段。

C N P 即 CDR (Civil Democratic Revolution 市民民主革命論)、NDR (National Democratic Revolution 民族民主革命論)、PDR (People Democratic Revolution 民眾民主革命論) 間的論爭。

CDR 接受中心邊陲理論對韓國社會的規定性，認為韓國社會的矛盾是，軍事獨裁、與軍事獨裁政權勾結外勢對基層民眾、小自營業者、民族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因而認為當前運動的主要課題是打倒獨裁政權建立民主政府，而在以勞動階級為中心的基層民眾力量薄弱的情況下，運動的主導勢力應該放在已覺醒的知識份子、在野民主人士、良心政客等中間階層。也就是主張當前的運動處於反法西斯階段並應進行向反帝鬥爭階段發展。

NDR 認為韓國社會屬於新殖民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因為韓國資本主義在尚未進行內在發展之前，就已經被深深地收編入世界資本主義體制之內，因而呈現極深的新殖民地從屬性，而商業資本就是在如此的情況下，發展為產業資本，並在國家權力的庇護下，完成資本高度積累、集中的壟斷資本，因而韓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以帝國主義與壟斷資本為基礎的軍事法西斯勢力與民眾間的矛盾。也就是說主要矛盾為民族矛盾與軍事法西斯矛盾。也因此變革運動的主導勢力應該在於工農大眾及貧民；而進步的青年、學生應扮演先導性的角色；小資產階級與自由主義者可為合作對象。也就是主張當前的運動階段處於反帝反法西斯鬥爭階段。

PDR 認為韓國社會屬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該立場認為韓國資本主義是在正常的階級分化下，成為社會支配性的生產方式的，因為儘管在初期具有跛行的性質，但隨著 70 年代產業資本的確立，持續進行了內在發展。從內在發展的層面來看，在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上，民族資本家的角色並不重要；革命的主體應該是基本大眾與革命性的知識份子；而主要的矛盾是以壟斷資本為物質基礎的帝國主義與軍事法西斯政權、布爾喬亞民主勢力對基層民眾、革命性的知識份子間的矛盾。就表面來看，他們也和前述的 NDR 一樣將當前的運動階段認定為反帝反法西斯鬥爭階段。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 CDR、PDR 中的 C（市民）、P（民眾）皆是對本身立場之運動主體的概念，但 NDR 中的 N（民族）卻非該立場之運動主體的概念，指的是運動性質的概念。其實若從運動主體來區分各立場的名稱，NDR 應該也要被命名為 PDR。

CNP 論爭算是一種運動論層次的社會結構分析，在理論的完成度上相當不足。但它在韓國左翼運動史上仍然具有以下幾點重要的意義。一、它是韓國變革運動的性格與方向的科學化的起點。它對社會性質、矛盾、階級關係的分析，為實踐運動中的政治路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二、論爭中 NDR 立場獲得普遍的認同，而此立場首度從理論的層次確認了民族問題的重要性。三、論爭中對韓國社會之矛盾與變革主體的分析，為後來的實踐運動中，勞動階級在民眾勢力中的主導權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契機。相反地，它的侷限性在於：NDR 在論爭中獲得了普遍的支持，但是 NDR 所提出的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做為帝國主義的一種新的支配方式的新殖民地之性格，是如何在韓國社會具體呈現，以及做為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是如何在韓國發展成為國家壟斷資本的，以及國家機器的性格、新殖民地性格、國家壟斷資本之性格，相互間的關係是什麼的問題，都有待繼續充實。〔待續〕 ☆

盜版盜版，誰盜誰的版？

劉宇凡

最近香港某大學進行有關消費者購買盜版光碟的調查，顯示在購盜版貨者中有四成具大專學歷。負責調查的那位教授驚呼這種「只講價錢不講道德」的風氣要不得。街頭訪問顯示有些消費者是買得理直氣壯的。他們質疑：「人人知道光碟製造成本很低，但他們卻賣得那麼貴，有什麼理由一定要買正版？」但也有人始終感到買盜版的確是道德上不好。「畢竟那是人家的知識產權啊！」

不過，不管你們消費者怎樣看，政府都正在大力掃蕩翻版，而且不斷盤算怎樣連購買翻版也列為刑事罪行。因為啊，政府要主持正義，捍衛「知識產權」啊……

化公為私的互聯網

微軟近年一直受到被指壟斷的官司的困擾，但這並不妨礙蓋茨(Bill Gates)在全球各地追查及控告涉嫌盜版者或使用盜版者，包括中國。

但是，如果我們了解一下關於互聯網、電腦、微軟以至知識產權本身的歷史，便不難知道，把現在的所謂「知識產權」當作是天經地義的東西，是多麼受騙。

大家知道，如果沒有互聯網，資訊科技就不會發生那麼大的革命，微軟的電腦王國即使有，也不會像今天的規模。但是，互聯網的開發本身，是自由市場下私人企業所煥發的創新精神的產物嗎？不是的。就像核能、雷達、微型電子器材等等一樣，互聯網是戰爭或軍事競賽下，由政府以公帑開發的。當蘇聯在1957年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時，美國立刻意識到有在軍事競賽中落後之虞，於是加緊科研，包括研究怎樣對通訊科技進行革新。互聯網的原意是爲了使核戰時也能確保全國通訊。在舊有的通訊設備下，一旦首都及幾個最重要城市受襲，全國通訊便可能癱瘓。美國軍方在1969年成功地建立了一個電腦網絡，讓各部門科學家相互之間傳遞最新消息。即使其中一個被毀，其餘的網絡仍可維持。到了1983年，這個網絡已聯繫了562個電腦系統。網絡雖由政府付錢開發，但其實際經營是外判給一間私營公司。名字叫高級網絡及服務公司(ANS - Advanced Network & Services)。所以那時網絡叫做ANS net。這種公私合營的方式在美國及其他國家都很普遍。這間公司是由包括IBM在內的大公司所創建。到了1995年，經過幾輪轉手之後，ANS的網絡更正式落入私人手中，變成現在的internet。這種由公帑付帳，又讓私人企業分享開發成果的公私合作，使私人企業往

往無償得到昂貴而又尖端的技術。核能技術也是這樣變成杜邦（Dupont），孟山都（Monsanto），西屋（Westing house electric），通用電器（General electric）等超級企業的「知識產權」。

互聯網在變成私人財產之後，同時也變得日益商業化。是的，它由於競爭加劇而費用日廉，甚至有些服務變成免費，但你所獲得的資訊，首先是廣告。有人在網上查詢非洲一條河流的資料，但搜尋器傳回的只是旅行社的廣告。其次，當競爭過後，市場只剩下少數企業時，他們就大可合謀把價格抬高。

IBM的崛起

電腦技術本身若無政府帶頭，也是不可能成功的。第二次大戰加劇了軍事科技的競爭。英國政府爲了破譯德國的密碼，製造了一部最早期的電腦原型叫Colossus，戰後並演變爲第一部電腦。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爲了製造核彈，也在1945年研製電腦，並在韓戰爆發後把大量製造電腦的合約批給當初不大願意自行製造電腦的IBM。電腦技術，無論是最初的開發還是在此後廿年的不斷更新，都是使用大量公帑及吸收了政府部門所發展的技術。爲了確保美國在軍備競賽中勝出，美國政府有時更直接投資到IBM。

IBM一直在電腦業獨霸天下，直到蘋果及微軟的崛起。這是因爲IBM一直想不到個人電腦會有像今天的廣大發展。這個機會被微軟及蘋果把握住了。

蓋茨無疑是天才。但無寧說，這種天才較多是商業方面，而較少在發明創造方面。個人電腦的發展同MS-DOS的開發有莫大關係。這個軟件連接了螢幕與鍵盤。但MS-DOS既非由微軟亦非由IBM開發，而是由數碼研究的Gary Kildall開發。但Gary欠缺「商業」眼光，認爲個人電腦不易爲，竟然把這個重要軟件賣給微軟。這樣，其他公司例如IBM，若要使用MS-DOS，都要付費給微軟。隨著個人電腦的銷售上升，微軟從此發大財。

蓋茨的成功有賴第二件重要軟件，即視窗。視窗使用方便是它的一大優點。但是，不論是滑鼠還是icon，以至白底黑字的畫面（早期電腦屏幕的畫面往往是黑底白字），都不是微軟發明，更不是蓋茨本人發明，而是自七十年代以來早就有人發明了。自從電腦技術在七十年代開始盛行起，蘭克施樂便擔心有一天電腦技術使辦公室棄紙不用，因爲一切都可可在電腦儲存、複製、傳播。如此一來，蘭克斯諾的影印王國就大受影響。於是它在1973年成立了研究公司來自己開發電腦以實現轉型。這家公司開發了名爲Alto的技術，包括白底黑字的屏幕、Icon、滑鼠等等。但是開發之後蘭克施樂想不出這些東西有何商業用途，竟然連申請專利也不去做，然後就置之不理。直到1979年，蘭克施樂購入蘋果100萬美金股份。合作協議包括讓蘋果老闆

Steve Jobs 參觀那間研究公司。後者驚訝蘭克施樂竟然沒有使用 Alto。事後蘋果決定仿製 Alto，命名為麥金塔 (Macintosh)。其後蘋果請微軟為其製造軟件。不久，微軟根據 Alto 及麥金塔的設計製造出視窗。蓋茨的視窗同麥金塔是那麼相似，以至蘋果要在 1988 年控訴微軟侵犯版權。1992 年法庭判蘋果敗訴。不過，早在 1983 年，蓋茨便對 Steve Jobs 說：「咱們的關係就像這樣：咱們剛好有一個富有鄰居，叫作蘭克施樂，你爬進鄰居打算偷去電視機，但一到步才發現我早在那兒。而你說：『喂，那不公道！要偷電視機的是我！』」

微軟的崛起不是因為蓋茨本人有什麼重大發明，而是因為他的買賣做得出色，再加上一連串的運氣。到了今天，這位曾被人家控告侵犯版權的超級富豪，卻在全球各處去控訴人家侵犯微軟的版權了。

賊喊捉賊

那些整天去控告別人侵犯其知識產權的資本家，本身往往才是最大的侵權者。事實上，資本主義大企業的冒起本身就是靠盜竊工人的知識產權，再加上許多其他因素，才發展起來的。由泰勒所「發明」的科學管理就是最明顯例證。在十九世紀末，雖然工人自主勞動的小生產已經為大工廠所取代，但是，即使在工廠，工人對勞動過程仍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即使當時已大量採用各種機器，生產過程中仍有無數變數，需要技術或半技術工人臨場決定怎樣做，而這些知識是從長期勞動中積累下來的、為工人擁有而老闆不懂的。就算是非技術工作，一個勞動日的最高勞動定額，也只有前線工人最清楚。所謂科學管理，就是打破工人對勞動過程的最後一點支配權，使工人純粹變為機器的一部份。辦法就是：奪取工人的知識產權。泰勒本人說得很清楚：在傳統的管理部門中，「工人們都擁有大量的傳統知識，其中大部份是經理部門所沒有的。……最有經驗的經理們乾脆把如何最出色而又最經濟地來做工作的問題交由工人決定。」但是，依靠工人的「知識，技術與好意」是危險的，這樣簡直等同把工廠變成「實際上是由工人而不是老闆和領班來管理」。科學管理就是申明，「管理人員所負的責任就是……搜集工人過去所有的一切傳統知識，然後把這些知識加以分類、列表並使它們變成規劃、法則和公式。」然後是「一切可能有的腦力工作都應該從車間裡轉移出去，集中在計劃或設計部門」，接著是把原有勞動過程再分解為更簡單、更沉悶的工作，使工人不必再多用腦，使他們能夠一刻不停勞動，從而達到產量最大化。這是一種最赤裸的盜竊，可是這卻管叫「科學管理」。

這過程並沒有隨著泰來主義、福特主義之有些過時(但從未像許多學者所說的已然消失)而停止。近年流行的什麼小組生產，精瘦生產，勞動彈性化等等「新管理方式」實際上仍是不斷迫使工人無償獻出生產知識，讓資本家可以憑此而加強工人勞動

強度。

對於腦力勞動的僱員，這種盜竊同樣普遍。許多跨國公司屬下的傳媒及研究機構都明文規定，僱員在公司的一切研究與創作的知識產權都屬公司所有。近年更有傳媒老闆連自由作家、記者、攝影師的作品版權也不放過，迫使他們放棄版權。英國記者協會一直反對，但勝負難測。

有謂知識產權法是用來鼓勵發明創造。如果大家知道，今天享有專利的人，往往不是發明者本人而是跨國公司，他就未必會那麼尊重其專利了。在1973年英國有人就專利作研究，結論是專利制度並無促進發明。許多發明都會照樣產生，不論是否有專利。

科技革命與知識產權

知識產權及專利法並不是什麼天經地義的東西。它們是人為產物。在資本主義誕生前並無所謂專利法。在這之後，各國對專利法的看法也不相同。法國1791年專利法把發明者的壟斷權視為「天然權利」。但奧地利的1794年法例卻排斥「天然權利」說，相反只視專利為公民有權得到發明知識的例外。英國十七世紀的法例至少也注意到，保護知識產權的需要與公眾獲得知識的需要必須加以平衡，不讓發明者長期壟斷知識，而把專利期定為14年。之所以是14年，是按照師傅完成訓練兩個學徒的時間來定的。過了期限，有關知識就變成公共財產。但是，資本主義越是發展，資本家日益成為技術發明的最大收購者或是對其僱員的腦力勞動的剝削者（而不一定是發明者），從那時開始，他們便不斷迫使政府修例來縮小對公眾知情權的保護，同時拼命擴大對知識的壟斷。這自然引起各種反抗。因此，各國法例亦依彼此的各種形勢不同而分別很大。所以，儘管1883年已達成了一個有關專利的國際協議，但協議也承認各國可以按自己情況訂定專利法。例如有些國家硬性規定專利擁有者必須在社會生產中實際去運用它，有些則沒有規定。有些國家的專利期限長些，有些短些。有些甚至長期有意不立專利法。荷蘭在1869年撤消其專利法後，半個世紀之後才再訂立。瑞士多次公民投票否決專利法，直到十九世紀末才立法。直到近年，德國、瑞士仍不容許就化學品發明註冊專利，法國、西班牙及意大利不許就藥物註冊專利。到了現在，自然大不相同了。各國紛紛向跨國公司低頭，日益把專利法修訂得更為嚴苛。

當初版權法是因應印刷術的興起而產生的。此前，一切文稿都是抄本，版權觀念自然不會出現。以後，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及其在工業及商業的普及應用，都使知識的傳播更容易，因此資產階級為了壟斷知識更需要控制傳播，需要對原有的版權法及專利法作修改及由法庭重新詮釋。在上一世紀五十年代，影印機、錄音機的普及，使資產階級趕忙督促其政府作必要修訂。自從電腦技術革命以來，這方面的修訂就更

多。當軟件初出現時，究竟它該列為發明還是列為文字作品就大有爭論。1980年美國版權法修訂時，把軟件列為文字作品，因為它們是對電腦的一組指令或陳述。政府之前所委任的專家對此卻大加反對，認為這種分類有違美國憲法所界定的“文字作品”。這事例一方面反映了知識產權概念的人為性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在解決新科技、新經濟部門與傳統知識產權法律的矛盾上所具有的異常重要的角色。科技革命越是發展，知識產權的界定，以至各種舊有概念的界定，便更加模糊，更加須要國家機器這個仲裁人按照資產階級的普遍利益來仲裁。比方說，儘管國家機器往往是促進壟斷的元凶，可是，當壟斷達到危害其他大資本家時，國家就需要多少壓抑一下有可能發展為獨斷的最大企業，以便維持寡頭壟斷資本之間的「自由競爭」(中小資本則盡可不管)。1988年美國法庭判決蘋果對微軟的訴訟敗訴，理由不是微軟不曾抄襲蘋果，而是“不能給予蘋果太多保護，否則會有害競爭”。這判決不利蘋果而有利於微軟，但同時也有利於電腦業技術的普及，從而促成美國在世界電腦業上的霸主地位。

現在輪到微軟被控壟斷了。不過，不管以後法院怎樣判決壟斷資本之間的爭吵，其結果都只是保障了壟斷資本的總體長遠利益，而非保障了普通消費者的利益。你付出高價買入軟件，可是嚴格來說你根本連所有權也沒有。你所獲得的只是一張使用軟件的許可證。在軟件的許可證上面往往印有一行小字，說：“這軟件及附屬手冊是由XX軟件公司擁有，並由美國及國際版權法保障所有權。一旦你違反這份許可證的任何一條，你使用本產品的權利自動停止，並須立即銷毀本產品的所有副本，或交回XX軟件公司。”這份許可證不必經你簽名就有效。你一旦打開封套，即受許可證條文限制。違反條文可以被罰巨款。這就是所謂消費者權益了。

按照傳統知識產權法，科學發現不可申請專利，只有技術發明才可以。從前二者的界線比較清楚，現在卻越來越模糊了，甚至變成連科學發現也實際可以申請專利。至少，在生物工程及訊息技術方面是如此。歐美法院在多次判例中已裁定，有關構成全部基因的基本化學物的知識是可以申請專利的。雖然有些案例附加條件，即有關知識須具潛在的商業價值。但要證明這點並不難。例如若有人發現某一基因與乳癌有關係，你就可以申請專利，因為你不難利用發現來設計測試，看看該基因的突變有否增加患癌機會。知識產權的涵蓋範圍的擴大，等於鼓勵研究人員事事守秘。人人都想，噢呀，我這個主意可以令我發大財啦！即使他的主意十劃只有半撇，他還是會閉口不言以妨洩密。“否則，不慎說了出去，同事阿炳可能會先我而申請專利，豈非見財化水？”然而，科學發展的歷史說明，科學只有在研究者之間自由交流與討論，才會有健康發展。相反，只會妨礙它的發展。

更令人震驚的事還多著呢。現在連電子商業經營方式也可以申請專利。1988年八月，美國專利局發給Priceline.com的網上買家驅動系統以專利。這個系統讓顧

客可以在網上就各種產品與服務叫價，而賣家則在網上決定是否接受。美國幸福雜誌一位記者便挖苦這個專利。他說，這個商業主意早在幸福雜誌就有人想出來了，而事實上要想出這樣的主意毫不困難。連這種東西也可以申請專利，結果只會造成無窮無盡的官司。最近，美國最大的網上書商Amazon.com就控訴Barnes & Noble侵犯其商業經營方式的專利——Amazon.com只須買家觸一下滑鼠便可以一次過登記其個人資料以備多次購貨，不必每次落訂單都重新登記一遍。結果美國法庭判Amazon.com勝訴，禁止對手在1999年十二月之後繼續使用這種“一觸”服務方式。

世貿加強保障跨國公司對知識的壟斷

但是，單靠一國的國家機器還不足以保障早已在全球生產與銷售的跨國公司的整體利益。這個責任，現在就由世貿來負擔了。世貿有關知識產權的協議包括容許跨國公司有權就生命體本身申請專利，大大方便他們通過盜竊各種生物(包括人)的基因來發展其生物工程技術。另一方面，有關協議實際容許他們合法搶掠全球勞動人民積累幾千年的各種傳統知識並申請專利。據印度的民間團體說，美國跨國公司已經盜竊了印度九成的動植物樣本作為己用。倘若跨國公司據為己有，申請專利(就像他們把泰國香米申請專利一樣)，那不啻是雙重搶劫當地人民。有朝一日，如中國人發現傳統中藥變成跨國公司的專利，並因此變得價格昂貴，不要驚訝，因為，這勾當一直在進行，只是中國政府視而不見而已。(有關世貿知識產權協議及跨國公司的盜竊行為，可參閱54期《先驅》)

現行的、由世貿強加到全球人民頭上的知識產權法，保障了跨國公司的利潤，卻危害了全球環境。

鑑於地球日益暖化，近年各國政府訂立了蒙特利爾協議，謀求盡快停止生產一種名為CFC的製冷劑(多用於冷氣機及冰箱)。協議規定發達國的期限為2000年，發展中國家為2010年，並規定發達國將在財政上幫助發展中國家開發代用品。印度有幾間公司聯合開發，且有相當進展，可是仍須外國跨國公司容許其使用名為HFC134A的技術專利。然而有關公司卻拒絕，即令印度公司願以市價付出專利費用。跨國公司開出更高條件：要印度公司讓出多數股權。如是，則印度難免進一步喪失經濟主權，而有關代用品的價格也大抵由外國跨國公司控制。如果印度人因此用不起代用品而無法落實停產CFC的協議，結果使全球繼續暖化，對不起，跨國公司是不關心的。

變本加厲，貪得無厭

最近，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簡稱WIPO(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打算把有關國際協議作出修訂，確保所有由私人及政府發出的各種

原始數據的製作都列入知識產權法的函蓋範圍，從此使用數據通通要付錢，否則要受刑事責罰。（原有的協議只保障對原始數據的應用，而不保障原始數據的製作本身）它甚至打算把十五年期限無限期延長，只要有關機構到時對數據作更新便可。國際科學會議，一個由95國的25個科學學會組成的團體，已經發表聲明反對WIPO的企圖，重申科學家之間公開交換原始數據對科學發展事關重要。一個海洋學家說：「全球氣候變化是一個關鍵問題。世界各地的人都對此至關重視。你怎麼知道氣候在變？你唯有量度全球各地的氣候，並與之同100年前相比，然後據此估量其未來。若你要知道人對氣候的影響以及全球趨勢，你尤要這樣做。而數據是科學的血液。科學家既是數據的用法，又是它們的生產者。WIPO的最適當做法是認真而公正地研究這個問題，不要有任何先入為主之見。科學及教育界也應能有份參與這個問題的決定。」

我們並不是根本反對訂立版權法與專利法。我們完全贊成社會應對發明人或創作者給予特別獎勵。可是，目前的知識產權法不僅往往沒有保障發明人或創作者本身，而且實際上使資本家對發明人或創作者的盜竊變成合法，尤其使資本家借此壟斷知識來謀取暴利。

每一個發明家，不論其多麼偉大，都不是在真空之中作出發明的，而是根據千百年的人類經驗及與同輩們交往中作出的。偉大如牛頓，也說自己不過是站在巨人肩上，才能有那樣的成就。就算是貌似與科學發明毫不相干的普通勞動人民也對科學發明作出間接的貢獻。是他們為科學家提供一切物質需要。所以，每一個發明家的發明，既是他的產物，也是社會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既須給與科學家足夠保障其從事發明工作所需的一切物質需要，保障其有舒適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必須確保有關知識不是變成跨國公司的壟斷工具，相反，甚至要保障知識真正變成促進全人類幸福的公有財產。★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香港《先驅》2000年春季號）

參考資料：

1.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in Wils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Spring 1997.
2. Capitalism and the information age, edited by Robert W. Mchesny, Ellen. M. Wood, John B. Foster, 1998, Monthly Review Press.
3. Recolonization - GATT, the Uruguay Round and the third world, by Chakravarthi Raghavan, Zed books Ltd, 1990.
4.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Harry Braverma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5. Website of Encyclopedia Britanica.
6. World Socialist Web

流動的語意

謝曉陽

本文針對貴刊上期(第四號)中,《連結》編輯部在觀看梁三先生一文中有關「語意是不斷的變遷和發展」,以「侈言」批評,並認為如此思考無法「科學地認識社會性質」,甚覺驚訝,有感而發……

「在概念和意象之間,沒有綜合的可能。」法國科學史學家加斯東·巴什拉爾(Gaston Bachelard)(1884-1962)主要研究數學和愛因斯坦物理學等領域,以科學的角度揭穿事物的本來面目。

他認為,科學史不是一種漸進的演化,反而是由一系列概念革命所產生的震撼過程所組成,這些革命,使科學史上出現了一趟又一趟的「斷裂」,反映了科學家在思考世界的方法上的種種過失。就是說,我們目前認為「真」的概念,部分是由這些變化著的科學理論的歷史產物,而這些「真」,未來同樣有「變化」的可能。愛因斯坦曾經說過:「在科學上,幻想力比知識重要得多。」

在進入語意之前,必須探討語彙的原來面目。在人類進程史中,「事物的命名」扮演著簡便溝通的角色。小孩子喊不出「椅子」,他還是會坐上去的,當然,一般來講,他們也是首先感覺到「爸爸媽媽」這兩個個體是最痛愛他們的人,爾後才被教育出把這四個字對於爸爸媽媽喊出來的。

古時結繩記事也是事實;沒有了文字語彙,並不妨得人類存活。而文中所指的「女權主義」、「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等所謂「核心概念」的政治語言。說穿了,不外是權力者的行為、發言。然後,人們被動接收而已。

「女權主義」這個概念,在中國女詩人李清照的腦子裡,也許比現代許多「女權主義者」都要清晰(當然這種清晰也是非常主觀的),可是她的再婚行為,在當時被視作「爭取女權」、「破除封建」的,相信極為稀罕。但是,我們不能說,當時社會大多數沒有這個概念,或是李清照本人也想不出這個名詞,它的意義就不存在了。當然,到了今天,「社會性質」轉變了,喊出「女權主義」的,本身已經相對擁有權力了。

法國哲學家傅柯 Foucault 在《事物的秩序》中,也談到在大部分的公共或政治語言裡,都是由學者和官僚們在界定、限制和規定事物時所使用的。而操控這些公共語言的,常常不僅是學者和官僚,總的來講,是社會上操控宣傳機器或有能力宣傳的人。

年前，台灣新黨有人提出「一中兩國」，李登輝又有「新台灣人」之說，中共在香港澳門大談「一國兩制」。看看說，誰的權力比較大，也就是說誰的影響力比較大，誰說的話就能傳播得比較廣、比較久，在歷史上的份量當然不能同日而語。相對於「一國兩制」在歷史記錄尚能留下一言半語，「一中兩國」相信不到兩年，記得這個說法的人也不多了。語言的被記錄價值，往往不在於其本身，卻是和發出該言語的權力，以及該言語的實踐能力有密係相關。

語言，常常是由權力者所「創造」或是所「說出來」；語意更是，而語意之變遷也常常伴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系統的轉變而產生不同的涵意。這也就是所謂的「社會性質」。

如「資本主義」為例，在法國，最早的歷史象徵是一七九一年，時值法國大革命的高潮，出現了和經濟有關的沙伯理法（Le Chapelier Loi）。廢除了行會制度和公會制度，以及君主制對經濟的支配，建立了商業、實業自由原則。當時，由於工人階層是被剝削的一群，資本主義基本上可以說是和社會大部分對抗。到十九世紀末，世界各國響起強大的反資本主義壓迫的聲浪，政府儘管還是一邊維持原來的市場經濟原則，但在立法方面，卻開始偏重勞工保護、建立再分配制度以及增加稅收等，可是這些西方國家還是被命為「資本主義」。到九十年代末，資本主義在東歐共產國家紛紛倒下，失去平衡目標後，其本身也隨之變形。在法國經濟學家 Michel Albert 著的《兩種資本主義之戰》（中譯版已由聯經出版社出版，莊武英譯），書中詳細分析廿世紀最後十年來，資本主義已經分裂為兩大陣營：「新美國模式」與「萊茵模式」。前者崇尚個人成功，追逐眼前金融利潤；後者主要包括德國和日本，強調集體成果，注重長遠利益。由此可見，如果僅以「資本主義」四個字，人們已經無法清楚了解其當刻涵意，必須註上是什麼時代下的資本主義。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系統的轉變，以致語意的變遷，也許是不經意，歷經長時期的人為作用，這種轉變，未至於扭曲現實。可是，如果有權力者，利用其資源，蓄意在短時間內扭曲大眾對某一概念的一般認知以達致個人利益，這種語意在同一時間不同空間有不同的解釋，更必須警覺。

如「民主」、「人權」等華麗藻詞，在不同性質的國度，權力者都有不同的詮釋。在中國，是「社會主義式的民主國家」；在美國，是「資本主義式的民主國家」；在秘魯，我們可以形容為「美式軍事主義的民主國家」等等，五花八門的民主，權力者就等於詮釋者。

在台灣，權力者利用詮釋權力更是淋漓盡致，不管是政治人物、學者、媒體擁有者；刻意或是慣性。也許，我們可以試試忘掉那一大堆由權力者所創造的言語，或是由權力者所詮釋的詞語的意涵，先去感受那一堆糾在一起，教人作嘔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閱讀《安那其美學》 的第一次筆記

魯福尼

安那其美學與近代無政府主義思想是相關的，不僅明示出安那其的反權威主義在審美經驗上的方向，而且對於左翼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也持續著一定的影響力。

安那其美學爲了進步哲學和社會科學的一般綱領，能夠適用於文學或藝術的創作上，因而採用了十九世紀或廿世紀社會學做爲美學的觀點。因爲，安那其美學乃是繼承了歷史上進步的異端運動，對於聖像破壞的顛覆欲望；此觀點乃延續了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從人的立場出發，所發展出來一種對人具有的創造力的歌頌，用來解決社會主義在藝術上並不科學的階級決定論。

安那其美學更是反映了各種多元化潮流的絕對自由思想，不僅贊揚以個人主義爲基礎，發揮個人的創造力；更讚賞以共產主義，或者一般合作生產的社會形式爲目標，對於共同體(Gemeinde) 中民衆的創造能力能夠予以開發出來。

基本上安那其美學是受浦魯東、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之影響，而進一步提出在藝術史中史無前例的反權威主義美學觀點。我們認爲藝術應該是被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復古主義的模擬。每個藝術家在自己可以做到的範圍之內，儘力完成一定的創造性，而不是像資本主義社會裡那些專業藝術家，把藝術視爲利益交換的手段。安那其美學強調的是，個人至高無上的創造力，並且主張人的創造力是具有絕對不能被壓抑的權利。

反權威主義的安那其，認爲所謂「偉大的人物」，在推動歷史發展的責任上，都是犧牲了太多人的創造力。甚至那些被稱爲什麼「大師」、「標新立異的藝術家」、「天才的創造者」都一樣是壓抑了其他藝術家的創造力。安那其並宣告經典之作已死，美術館或音樂廳也已成廢墟。安那其認爲真正的藝術應該是自發性的，並且與時間、場所都有關連性的「狀況藝術」(如：台灣左派文化人在解嚴後搞出來的「行動劇場」及「報告劇」)；創造的行動過程比作品本身更爲重要。因此安那其藝術家積極地從原本是在政治領域的行動，移轉到直接以行動破壞生活與藝術區隔的堡壘。

總之，安那其的藝術家認爲藝術不只因爲是對美學的追求，而以浪漫主義的理論建構對藝術的概念而已，同時這些都是與政治、社會有關。藝術不是教條地只爲了民

眾的，藝術應該是把民眾包含在其中。

從而，安那其對於藝術的要求是要從歷史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自由才是藝術創作唯一的條件，不能以任何的規則來限制藝術，它是絕對的自由主義。六〇年代流行的「叛逆文化」如：搖滾樂、小劇場等，即為證明了安那其前衛、自由的美學特徵。

英國無政府主義思想家 Willam Godwin (1756~1836) 在他出版的《政治的正義》(1793) 一書中提到，藝術仍存在著用真實或虛偽支配藝術觀念的問題，卻完全不管藝術家是否將其隱藏的人解放出來，讓我們可以感受到想像力的價值。他並對當時的戲劇及音樂提出，藝術家像花開一樣的創造才能，竟然被藝術權力麻痺化的警告，他憤怒地問道：「我們真的需要有音樂會這樣的東西嗎？」Godwin 在書中如此說道：演奏家大多數明白自己陷進了機械化的狀態，而竟然認為他演奏的曲子可以成為令聽眾悲傷或歡樂的原因，……我們真的需要有舞台劇這樣的東西嗎？那些老掉大牙的情節，令人懷疑編、導、演之間的協調是否出了問題；人對於生命的面對，必須去聽劇中人告訴你該怎麼活嗎？音樂家面對的也是別人創作的曲子，把別人思想的形式不斷重覆顯現，因而在演奏中，就不得不把自由的精神運動完全關閉。Godwin 認為無論音樂或者戲劇，演出者幾乎都忘了文本與政治的、社會的、及經濟的等發展狀態之聯繫。他特別指出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反映了作品中人的存在性。

法國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 (Pierre-Joseph Proudhon, 1809~1865) 在他寫的《藝術理論與社會目的》一書，其中提到：「藝術家不應該從社會中自我放逐，而是要從政府中自我放逐！」他認為藝術家若不想受到任何的支配，認定自我的價值比要搞清楚自己是錯或對更重要。國家一向喜歡利用巨大的經典作品來實施心靈改革教育，因而使經典作品轉換為一種權威誇耀的象徵，不只是讓藝術停止進步，妨礙了新形式的美的表現，更讓藝術墮落成爲權力。即使許多人頂著藝術家的光環，王爾德說：「不管怎樣的權力都是惡質的！」

只有反對藝術經典化，只有反對藝術絕對化，在沒有國家及其他強制權的干涉之下，我們才有可能思考新藝術的產生的問題，因此，安那其美學首要注意的即是追求創作自由，絕對不屈服於或服從於任何一種形式的權力。浦魯東就說過，若是新的藝術只在身體裡面尋找靈感，卻不是在身體與外面的衝突上發生，那幾乎不可能產生新的藝術。因此托爾斯泰說：真正的藝術是在法院、警察、慈善機構、工會裡實現出來的。

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創始者克魯泡特金，在他的《一位叛逆者的話》書中即寫道：「人類活在必然會產生巨大動搖的社會裡，同時又無法逃避。在這樣的時代裡，勇者不是因循著舊有的生活，而是激進地切斷與歷史連結的關係，超越因習之外，雖然走上一條新路，卻不知通往理想的方向在何處，然而對於人類而言，這是一件必要的大事。」

人們對於未知原是可怕的，即使新藝術令人期待，但是革命的未知仍然存在。傳統的經典藝術在革命的動亂之中已然崩解，讓我們逐漸忘卻舊時代的藝術，而迎接新的藝術誕生吧！未知雖然可怕，但它是一個夢，一個理想……

法國大革命創造了對於制度的信仰，崇尚的正是所謂的理性道德，因此，法國大革命勝利之後，詩人也跟著被出賣。浪漫主義被布爾喬亞社會的情調取代了。布爾喬亞反映的藝術是唯美主義，或頹廢的個人主義；而無政府主義的理想，也是革命的指標只有建立在新文化的基盤上。國家的本質是靜態的，一心想要維持現狀而已，文化的本質卻必須是無政府的、革命的，與政治上的無政府主義吹同一個調子。所以都一樣要反權威主義，重新檢討藝術與權力，也是藝術與反抗的關係。

革命的未知雖然可怕，但它是一個夢，一個理想……

★

談教宗保祿二世的佈道與 猶太人受迫害的宗教、文化因素

俞力工

今日，3月12日天主教教宗保祿二世在羅馬聖彼得教堂舉行佈道大會上公布了一份起草了11年之久的重要文書，其中，教會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歷代“教會兒女”出於宗教原因所犯下的罪行與錯誤表示歉意。據聞，該文書共有100頁篇幅，內容涉及11至13世紀教審（inquisition）與十字軍東征期間教徒所造成的一系列悲劇，基督宗教教徒先後在美洲殖民期間（美洲土著因此死亡上億人口）、歐洲宗教改革與反改革運動期間，包括販賣奴隸時期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基督宗教仇恨猶太人的文化傳統和該傳統對納粹德國所造成的影響等等。限於篇幅，以下筆者僅針對“猶太人問題”作一介紹。

近年來猶太人問題受到關注的客觀原因

近年來，有關猶太人的消息不斷傳來，諸如黃金事件，存款事件，不動產事件、藝術品事件，以及若干教會當局正式向猶太人表示道歉等等。許多亞洲人對這一系列

事件頗感費解，甚至覺得厭煩。實際上，猶太人的處境與中國境外的華人極其相近，其間唯一不同的是，猶太人對其權益一貫不懈地據理力爭，對居住地的任何排外行爲都能憑直覺預料，下一個打擊對象將會輪到自己；至於華人，在這兩方面都一向顯得較無力與遲鈍。

有關猶太人於二戰期間與戰後所受到的不合理待遇，之所以在近十年受到與日俱增的關注，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歐美社會戰後出生的一代多已成長。這批“新生代”在不受歷史包袱束縛的情況下，多能較客觀地對待歷史問題和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問題。有鑒於此，十年來諸如猶太人受迫害的宗教、文化原因，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區別，猶太人受迫害時各國政府與各教會的漠然態度，戰後大多國家對猶太人的賠償問題與財產歸還問題所繼續表現的漠然態度和不合作態度等等，先後成爲歐美社會的熱門話題。目前該討論的廣泛性，幾乎涉及所有歐洲國家，問題的根源也追溯到兩千年前的耶穌時代。

就歐洲社會的激烈反應看來，目前這場討論就像是一度受到冷戰干預而草草結束的紐倫堡大審的延續。不難預料，今後每一個國家都要輪流坐在被告席上受到嚴格的審查，同時且不論這些國家今後對絕大多數已作古的受害者提出的“補救措施”究竟有何實際意義，筆者深信，這場廣泛的討論起碼可對杜絕今後的種族歧視與狹隘的民族主義產生深刻的影響。至於亞洲人方面，只要考慮到日本對戰爭罪責與賠償的態度，以及當前許多地區華人的困境，似乎也可以意識到，即便自己人受到西方的影響不願意與猶太人“爲伍”，但這場方興未艾的討論卻頗值得華人借鑒。由於整個討論涉及的問題極爲廣泛，以下首先就從基督宗教與猶太教的關係談起。

猶太教與基督宗教的爭執

基督宗教的前身原爲猶太人的民族宗教，即猶太教。在猶太人看來，《聖經》只有一部（即基督徒所稱的《舊約》），其內容主要涉及猶太人的歷史，上帝與猶太人之間的故事與約定；《聖經》裡即便載有上帝對猶太人加以嚴厲懲罰的許多敘述，但是上帝對這批“上帝的選民”也處處表現出無限的關懷與愛心，因此猶太人深信，只要信奉上帝，遵行教義，猶太人終會有復國和獲得拯救的一天。

不難理解，堅信唯有上帝具有神性的猶太人，是不會承認他們眼下的一個猶太人傳教士，即耶穌具有任何神性；也不會承認自己的《聖經》爲《舊約》，或承認耶穌死後由基督徒編寫的一本經書爲《新約》；更不會接受《新約》裡的大量反猶太人的內容。

耶穌時代，羅馬帝國不斷擴張，受其暴政所奴役的各個群體也日衆。此時，一個宣揚平等、博愛，信奉一神教的宗教成爲受迫害諸群體促進團結的客觀需要。於是

乎，由非猶太人構成爲主體的基督徒便陸續依據《舊約》的一些情節，傳說中的耶穌事跡、語錄，並結合不同時代的具體需要，編寫了所謂的《新約》。

就《新約》中有關猶太人的內容而言，儘管四篇《福音》的敘述多有互相矛盾之處，但大體上，均著重強調“由於猶太人背叛、出賣了耶穌，使得耶穌慘遭酷刑而死，因此猶太人的後代必會受到血的報應”。

從史學的角度觀之，至今沒有發現任何與耶穌同時代的文字資料可證明《新約》所述的耶穌受難事跡是否屬實；耶穌逝世後的史料對耶穌本人的記載也僅限於隻言片語；至於究竟耶穌是否曾爲猶太人出賣，更是無據可考。然而儘管如此，這部爲廣大基督徒深信不疑的經書，卻自四世紀基督宗教成爲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給猶太人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據考証，歷代天主教教宗從四世紀到啓蒙時代，幾無例外的帶有濃厚的反猶太人思想。另外，自四世紀到六百萬猶太人遭德國納粹政權殺害之間，歷代受殘害的猶太人人數也同樣達到六百萬之多。

十六世紀，新教隨著宗教改革產生，但是傳統的反猶太情緒並沒有使這一場大運動改變猶太人的厄運。以新教運動的先驅馬丁路德爲例，他對排斥猶太人所提出的主張便足夠駭人聽聞(如焚燒猶太教堂，搗毀猶太人住房，沒收猶太經書，向其投擲豬穢，不保證猶太人的人身安全.....)。因此許多學者作出結論，納粹政權的暴行其實並沒有任何“新意”。

十九世紀，德國的浪漫主義代表人物(從黑格爾、尼采到哥德)也幾無例外地帶有濃厚反猶情緒，與傳統的反猶思想唯一不同之處在於，此時的反猶理論與殖民主義所延伸的種族主義相結合，一方面把有色人種視爲“低等人”；另一方面又把日耳曼人提高到神秘的“超人”程度。到了希特勒時代，這種把日耳曼人與神等同起來的意識形態不僅贏得了多數的選票，同時也發展成爲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國教。

二戰期間基督宗教教會的沉默態度

1933年7月20日，梵蒂岡教廷與德國簽訂了一項《帝國協議》。德國政府一方作出承諾，將維護德國天主教會的地位與利益；教廷一方則承諾，對德國政府的政策表示沉默。該協議簽訂後，希特勒並沒遵守諾言，非但天主教政黨遭政府解散，天主教官員遭解職，教會學校、教會社團勒令停止活動，許多神父甚至受到逮捕。

1938年，教宗皮吾斯十一世終於打破沉默，公開發表了“反猶太主義是個基督徒既不能苟同又必須排斥的運動...就宗教意義而言，我等均是猶太人”的著名評論。皮吾斯十一世于1939年2月10日逝世，教宗職位則由頗受爭議的皮吾斯十二世接任。

皮吾斯十二世在位的頭幾年，排猶活動不斷激化。數百萬猶太人不但財產盡失，甚至慘遭毒害。此期間，無論是天主教會或新教教會，均只對納粹政權迫害教徒與迫害已皈依基督宗教的猶太人提出了抗議，至於對絕大多數受迫害的猶太人則三緘其口。同期間，固然也有個別教徒、教士對受迫害的猶太人伸出援手，但其動機多出於朴素的慈悲心，而非教會的號召。嚴格說來，直到1944年(較早的有1943年德國烏騰堡新天主教的抗議)各大教會方開始表態，並逐步以實際的交涉行動勸籲匈牙利、斯洛伐克、羅馬尼亞等當局即刻中止迫害猶太人的行爲。

二戰結束後基督宗教與猶太人的關係

戰後，天主教與基督教教會固然對猶太人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但卻仍舊堅持要猶太人皈依基督宗教。該立場遲至1965年的梵蒂岡會議與1980年的新教教會代表會議才正式放棄。

近年來，時有人把新教與天主教於二戰期間的不同反應加以比較，並試圖得出孰優孰劣的結論。實際上，即便卡爾文派新教教徒積極參與拯救猶太人活動的人數較多，只要考慮到猶太人受害者的龐大人數與兩大教派的官方立場，便可知道這種評比是件毫無意義的事。值得順便一提的倒是波蘭天主教的獨特情況。波蘭教會儘管也隨後受到納粹佔領當局的嚴重迫害，但對參與排猶的活動卻始終是不遺餘力。戰爭結束後，波蘭境內甚至於1946年還發生過排猶風潮。1997年波蘭某主教的公開反猶立場也一度引起極大風波，而同年教廷與法國主教卻先後爲了二戰期間的沉默態度，正式向猶太人致以歉意。

根據1997年三月的消息，若干學者發現了彼吾斯十一世逝世前不久擬議發表的《教廷通告》草稿。草稿中著重對納粹政權的排猶與滅猶政策提出了譴責。耐人尋味的是，教廷當局數十年來拒絕將該文件公佈於眾，因此引起諸多猜測。有人認爲，教廷之所以如此，原因在於不願引起批判皮吾斯十二世的後果。如今，年輕一代的教徒不只是對這段歷史表示極大興趣，同時也認爲有了解真相的權利，因此不難預料，今後的有關討論無論在廣度與深度方面均會繼續擴展。★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twleft@sina.com.tw twleft@gcn.net.tw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浮生隨想曲

劉文超

塑膠王國 良有以也

多年來，在與外國人聚會的場合，也不能免俗的請他們表達些對此地的觀感，幾無例外地，眾老外對台灣人使用塑膠袋、保麗龍、寶特瓶的泛濫成災而依舊麻木不仁，感到「怵目驚心」。孰令致之？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雞與蛋的問題永遠糾葛不清。民族性的自私墮落，政府的媚俗無能，廠商的左右逢源，經濟奇蹟是起來了，而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愈趨複雜難解矣。

筆者曾有段期間在超商做過調查與了解，發覺自備購物袋者千不及一。消費者對誇大的包裝、不利生態的產品普遍沒有排斥的舉措。平常黃昏時刻去台北市信義路某名校運動時，但見男女同學人手一個塑膠袋，裡面裝滿了又不環保的飲料包裝與保麗龍便當盒。這種現象凸顯出來的問題恐怕是民族劣根性使然了，道理大部份的人都懂，道德勸說卻硬是沒有生存的空間，只要我方便、我爽快！只要垃圾掩埋場、變電所不蓋在我家旁邊，天塌下來也不關我的事。哈哈！消費者有這種心態，廠商就儘量投其所好，一次性的、用完就丟的東西充斥市場——免洗內褲穿一次就丟、刮鬍刀用三次整把就扔、果汁飲料附上了塑膠奶嘴怕不會吸吮……經濟、市面繁榮了，官員也笑呵呵了！

非常時期就要祭出非常的手段；若是不能全面禁絕，起碼也要以價制量。君不見中國大陸已下達紅頭文件，全面禁止保麗龍所製造的「白色污染」！當初衛生署鼓勵保麗龍上市，肆虐了廿多年，環保署對它至今依然「猶抱琵琶半遮面」，不敢明確表態禁絕。寶特瓶押瓶回收制度也將取消，一個腐敗的政府還就罷了，若它根本是無能的話，的確讓有心者無語問蒼天矣！

交大無帥哥 怎一個俗字了得

有女生在網站上抱怨交通大學無帥哥，激起交大男生之「同仇敵愾」，學校當局為適應勢頭，辦了個帥哥選拔，瀟灑風光了一下，皆大歡喜云云。看了這則新聞，實在是笑不出來，大學之庸俗低級至此，恐怕不是一個單一現象，而係整體台灣文化的表現使然，一言以蔽之，怎堪一個俗字了得！

筆者在台大、清大教課十二年，一直苦口婆心地配合教程闡述些人權和平、生態環保、公平正義的理念，怎奈效果不彰，學生反應之冷漠懵懂，真叫人心裡涼半截的。年輕人心裡想啥關心何事，讓我這個老社會運動者捉摸不著。

記得有一年台大校園裡由某社團辦了個名車大展，人潮洶湧，我看到此景，差點昏倒。去年六月，清大學生為了抗議學校當局為補修學分徵收費用一事，聚眾遊行校園，嗣後學生問我清大的「學運」與德國大學差異性何在？我舉1973年9月剛到Bonn大學留學的例子：在Hofgarten 校園廣場有十萬人的聚會，訴求不是為學生的福利，而係抗議美國中央情報局謀殺了智利社會主義主張者的總統Allende，而推舉了軍事獨裁者Pinochet上台。校園裡紅旗飄揚，反美聲浪高漲，而智利民歌手的演唱讓氣氛達到高潮……學生聽了猶若天方夜譚。

年輕人的媚俗，物慾飽滿滿，思想空洞洞，應該是整體社會文化的先行標，上行下效，有樣學樣，人變得愈來愈聰明狡獪，但言行舉止卻愈來愈粗鄙野蠻。這種現象無以名之，姑且稱為「後資本主義巔峰症候群」，其特色為資本自由化、國際化、壟斷化愈趨熾熱，以加入WTO為崇高職志，完全忽視貧富差距加大，對弱勢族群、人權、勞工、環境生態帶來負面的影響。

社會庸俗化的蔓延，為達目的是不擇手段的，只重現實而不談理想，政客選舉時祭出的利多政見與公然賄選無異，人所稱羨的成功企業主事實上是環境的殺手，打著以青山綠水為鄰的豪宅廣告正好是破壞生態的元凶……這真是一個價值混亂、思想顛覆的年頭。

要堅持點理想、維繫些純真、堅守些許原則的人，一定在這社會上活得寂寞落魄，他們是需要保育的稀有動物。

左、右、中芻議

奧地利自由黨黨魁Haider與人民黨聯合執政入主內閣一事，在歐盟與以色列引起軒然大波，肇因於Haider之納粹傾向與排外主張。其實Haider政見主張若移植到台灣來，一點也不顯得突出，太普通了嘛！五十年來台灣人民所接受到的、麻木不仁後成爲直覺反應的不都是這些「陳腔濫調」嗎？筆者月前在某火鍋店用餐時，見一工讀生竟穿著納粹標誌的T恤，問其所以，嘻皮笑臉的說：「爽嘛，酷斃了！」，殊不知穿這種「行頭」者若出現於歐洲的公共場合，鐵定會被揍扁了。

曾有年輕人問我投票的傾向，我答以從來不投票，更別說參與選舉了，都是爛蘋果下，我無選擇一個較不爛的義務。一則鄙視這種選舉文化，二則政客之意型態與我相去甚遠，還是省省罷！

總統選舉進入衝刺階段，反對黨候選人提出新中間路線以爲區隔，異哉所謂新中間路線，沒有左翼政黨，哪來新中間路線？依筆者的觀察，國民黨、民進黨與新黨都是一個模子出來的，「魯衛之政，兄弟也」，本質上都是右派保守且具有法西斯傾向的政黨，其唯一的差別性就是省籍矛盾所導致的統獨之爭。君不見三黨在政策上難分彼此：購買武器整軍經武，加入TMD；經貿自由化國際化，全力參加WTO；歧視外勞若奴工，給予不人道的待遇……

左翼的社會黨、社民黨、共產黨、勞動黨、工黨是歐洲老字號的招牌，百年來歷經滄桑，但其路線不外人道主義、國際主義、弱勢關懷等落實，六十年代法蘭克福學派學者如Habermas、Adorno對社會主義理論加以強化，Rudi Dutschke反越戰領導的德國社運，在在激化了七十年代綠黨的崛起。台灣在這世界大變動當中缺席久矣，反對運動最後成了爭食大餅、利益分贓的庸俗結局，實在是鬧劇一場！環保問題不是「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的樣板，它還必須以政治方式解決，綠色左翼、社會主義、新馬思想或可填補台灣意識型態上的空白。

是，今年我還是不會去投票。

★

編輯報告

2000年的總統大選落幕了，隨著陳水扁的當選以及由大資本家所組成的國政顧問團公開站在政治舞台前，我們知道，這次大選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影響是深遠的。

當主流媒體以「政黨輪替」、「全民政府」、「清流共治」等語言形容這次大選時，左翼應如何看待這次大選？因此，針對這次大選，我們特別組織了五篇文章，探討大選背後的政經意義及影響。我們希望透過《左翼》這一公共論壇，讓這些論述立場各異的文章提供左翼的朋友各種另類的思考，並期待有更多來自左翼角度的政經討論。鄒議的〈讓歷史整備我們的隊伍〉對選後政經形勢進行獨特的深入分析，還對當前一些左翼運動朋友的作法提出期許與批評；伍艾蘭的〈陳水扁政權性質初探〉除了剖析陳水扁政權的性質外，並探討大資本與勞工未來在台灣政經結構中的角色；林書揚的〈2000年總統大選後的幾點感想〉則對選後的兩岸關係與政經情勢提出另類的看法；瑟珂蕙〈從大選看台灣社會性質的一些問題〉，透過對這次大選的分析，進而揭露台灣社會所具有的某些特殊性質，特別發人深省；劉鳴生的〈從改革者到掘墓人〉，則是從台灣觀點分析這次俄羅斯大選，同時他還比較了台、俄大選的異同。

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歷經了很大的變化，早已與馬克思撰寫《資本論》時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有很大的差異。對於這些變化，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已經做出非常深刻的分析與探討，可惜台灣對於這方面的討論還是比較少的。現在，黃志龍〈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針對國外理論界有關現代資本主義變化的討論做了系統的介紹，將逐期在《左翼》上刊載。我們非常感謝黃志龍在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與貢獻。

過去一段時間，有關台灣社會性質的討論正在《左翼》展開，臧汝興的〈韓國社會結構體論爭(一)〉則是探討八〇年代南韓社運界對於韓國社會性質的論爭，顯然台灣左翼對於社會性質的討論是遠遠落後於南韓的。

香港的劉宇凡〈盜版盜版，誰盜誰的版？〉，對於當前由西方國家所建構的知識產權體制進行尖銳的批判。旅法的謝曉陽〈流動的語意〉，分析當前權力者運用權力詮釋語意的現象。

魯福尼的〈閱讀「安那其美學」的第一次筆記〉代表著一個無政府主義藝術工作者的左翼自述與美學觀。俞力工的〈談教宗保祿二世的佈道與猶太人受迫害的宗教、文化因素〉，透過天主教近來對其迫害猶太人的反省，分析西方反猶的歷史原因。劉文超的〈浮生隨想錄〉，則是左翼環保運動者對周遭環境的個人感觸隨筆。

一個右翼政黨取代了另一個右翼政黨，整個社會形勢並沒有真正的改變，甚至可能變得更為嚴峻，考驗著左翼的朋友。大家加油！

左翼 第五號

出版日期：2000年3月31日
初版三刷：2001年6月30日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tw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六號

三刷

【工運再出發】關於民進黨時代台灣工運的一些想法	陳信行 /1
面對新政權、新形勢的台灣工運	洪濤 /4
「全勞總」為何出走與臺灣工運的前景	黃瑞明 /7
反思台灣工運	汪立峽 /9
【爭鳴與求是】 向右傾斜的單一與貧乏	左思 /11
【特稿】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二)	黃志龍 /16
【精要論文轉刊】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需要檢討〈一〉	蕭喜東 /23
“實物型態”與“價值型態”的本質區分	李強 /29
我們的美國左翼朋友韓丁	金寶瑜 /33
韓丁演講活動	/35

關於民進黨時代台灣工運的一些想法

陳信行

總統大選在「咱攏是台灣人」的凱歌聲中告終。儘管有各種小尾巴待解決，台灣戰後半世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算是基本上結束了。儘管當權各黨派還會不斷祭出熟悉的口號，但是，國民黨時代本地資產階級民主派召喚廣大勞動者的效忠來對抗獨裁體制的那種能力，已經失去了它的現實基礎。

前此所有各國歷史經驗中，當權了的資產階級黨派會儘可能尋求在代議體制內解決各種爭端，而把一般大眾的政治參與縮小到幾年一次的投票——這正是目前台灣的狀況。但是，大部分重大的爭端無可避免地帶著階級鬥爭的性質，如當前我們所關心

的私有化問題、WTO問題、水庫、濱南、核四問題，無一不是大中資產階級與幾乎其他各階級台灣人之間的鬥爭。在財勢雄厚的政商集團掌握之下的代議政治，是不可能自動站到大多數人的利益這邊的。於是，在可預期的一次次挫敗與被出賣之後，台灣人民對選舉政治會從當前幾近狂熱的激情轉為犬儒冷漠，「齷屎換滲尿」會成為政黨輪替的最通行解釋，而「日頭赤炎炎，隨人顧自己」會成為個人唯一的解決之道。

這種狀況，對台灣工會運動是福音還是噩耗？

絕大多數真誠的自主工運運動者與支持者大概都會認為社會運動與當前各大黨的漸行漸遠不是什麼壞事。即使我們不相信「市民社會」、「公民社會」這些認為參政行動本身有某種道德缺陷的理論，經驗也告訴我們，迷信以選舉解決運動問題幾乎總是要失望的，不管是選「自己人」還是支持代理人，選不上固然挫傷大家的元氣，選上了，當選人也往往被框在體制內難以動彈，或者乾脆與運動說再見。環保運動對選後核四、濱南、美濃水庫案保持高度警戒，毋寧是十幾年來經驗教訓的必然結果。運動的實力，而不是任何權謀、手段、輸誠或交換，才是最可依賴的基礎。這一點，大概很少運動界的朋友會不同意。

問題是，什麼叫做運動的實力？生長在選舉政治時代的我們，最常用選票問題來理解這個問題。政客的「實力」在台灣有兩種歷史模型：國民黨型的樁腳網路，和黨外運動型的宣傳旋風，當然現在的三大政黨都結合了這兩種模型。樁腳網路是「組織戰」沒錯，可是維繫這個組織必須靠金錢、靠人情義理，而所謂「義理」這些多半也是制約利益分配的道德觀。沒有「資源」（換句話說，公職帶來的特權特惠）好綁樁，不會有紮實的網路。黨外旋風型的就不一定了，在八十年代我們都還看得到一群狂熱份子、幾台宣傳車，大街小巷衝幾個禮拜，就靠著賭爛票選上一個之前名利全無的候選人。但是，旋風也者，來得快去得也快。更重要的是，「旋風」靠的是稀薄的幾個符號動作勾引出素為謀面的人們心中自發的感動。所以，如果候選人賣的是還沒有廣大市場的符號商品，銷路必然糟糕——媚俗是必須的。

這兩種模型的政治，對自主工會運動都沒有太多的參考價值。當勞保黃牛兼國民黨樁腳的那些假工會頭子們可以拿著以前全總系統從政府黑來的稅金錢玩樁腳遊戲，自主工會運動者就是不行——要不然就墮落到那些騙子的層次了。至於「旋風」，在工運之中比環保其他運動更困難。不爭的事實是：絕大多數台灣的雇傭勞動者在絕大多數時候都是透過雇主的眼睛在看世界——感謝老闆賞一碗飯吃、自認才幹足以提高公司績效和利潤、希望台灣「投資環境」會改善……。但是工運無論再怎麼妥協，都無法掩蓋它與雇主的利益之間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再怎麼說，我們的工資福利就是老闆的成本。不管運動者再怎麼在符號設計上用心，工運的理念與訊息都不可能像道士招魂一樣一張符令就把人家勾來，只有透過說服、教育、辯論等比較細緻的過程，一般勞動者才能勇敢地衝破迷障。

更重要的是，工會幹部對會員的支持的需要，和公職候選人對選民的需要是完全不同的。雖然表面上工會也有選舉，但是，如果以為工會領導人的「實力」就是每選必上，那就完全搞錯了。工會不是政府，除了多寡少得可憐的會費之外，沒有什麼錢；除了工會法規定的一些自衛性質的保障之外，沒有什麼權力或權利。工會的實力，只有會員本身。

當代資本主義法權體系保障工人們的團結權、爭議權、罷工權，都是程序的保障，只有在這些程序真的被運用的時候，才会有實質的成果。這三種權利是有邏輯順序的，其中罷工才是真正的強制力量。團結組工會，如果不能罷工，只不過是鬧雞工會；不能罷工，就算資方願意坐下來談工資福利勞動條件，也必然是敷衍應付地談。沒有罷工作為後盾，工會運動是不可能有力量的。能不能罷工、罷工能多大、罷工能多久，就是一個工會實力大小的評判標準。工會運動中大家常喊著團結、團結，可是貨真價實的團結絕不僅僅是姊妹工會被打壓時的道德支持，而是姊妹工會罷工、怠工、集體行動時人力和財力的支援——罷工基金的募集、同情罷工或杯葛的發動、等等。我們談強化工會的組織，談擴大工會的連結等等，都不該是抽空地談，而是切實地在達成這種堅實的戰力目標之下來談。

今天台灣絕大多數的自主工會（假工會和鬧雞工會就不用說了）還是體質虛弱，不敢罷工也不太能罷工。先進一點的或許能夠在權益事項上匯聚起會員的義憤來進行集體行動，在調整事項上卻還是非常困難。這一方面反映了台灣工運還處在幼年期，還需要更多人、更長久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過去十餘年台灣自主工運的一種特殊狀況的後果。

在勞基法的規定普遍還優於一般職場的勞動條件之下，自主工會常常以自力救濟「執法者」的角色來面對雇主和官方——換句話說，援引更高的國家權威（法律）來壓蠻橫資方和顛頂官僚。因而，法庭、議場、媒體、甚至選舉等「公共」的戰場往往取代「私人領域」的職場勞資鬥爭成為工運關注的焦點。一般來說，資本主義國家法律會反應當下社會的階級力量對比，當年的勞基法有其特殊的國際背景，此處不能盡述。在未來，尤其是在為進入WTO所做的一系列鼓勵資本跨國流動的「改革」之下，台灣的法律、政策，除了在勞方和其他民主力量擋得住的一些角落之外，會愈來愈反映資本的利益。無論如何，不靠會員、只靠法條的鬥爭方式肯定會愈來愈無效。在這裡，政黨輪替後的「靛屎換滲尿」效應如果不使人失志到極端犬儒，倒是有助於工會運動者認清現實，努力紮根於會員之中。

工會運動如果要有意義地存在，除了會員的集體力量之外，一無可恃。正因為如此，所以工會運動必然要是民主的。工會領導人絕不能像選舉政客一樣騙到票之後就與選民脫節。沒有大部分會員的自覺的、心甘情願的、慎重思考過後的支持參與，幹部自己的想法再怎麼強悍，也不得不在資方的威勢下低頭。這種客觀環境規定的，不得不

然的基層民主，在資產階級的民主改革運動失去生命力之後，或許能夠成為下一波民主運動的基石。

上面提到的這些想法，沒有什麼新奇之處，許多運動界的朋友和前輩都清楚，也都常說。我在這裡談的，也還不是足以推翻資本主義、消滅雇傭勞動制度的工人運動，而僅僅是在資本主義的框框裡工人階級自衛的工會運動。可是，我相信，要在我們的社會裡培植更基進、更自覺、看得更深更遠的運動，像工會這種比較自發的、反抗的經濟鬥爭，是必要的土壤。今天，隨著國民黨下台，當年他們架設的那套荒謬怪誕的假工會組織也跟著倒了。我相信新時代的工運能夠給台灣社會帶來新的活力，這不只是運動者主觀意志的問題，資本主義的矛盾及資產階級力量的囂張必然會逼得雇傭勞動者不得不團結自保。★

面對新政權、新形勢的台灣工運

洪濤

從三月十八日晚上到今天，台灣政治社會的變化令人目不暇給。在統治集團權力重組的同時，在「社會」層面也出現了全國總工會分裂的變局。另一方面，陳水扁當選後，允諾出席全國產業總工會的成立大會，在事實上承認了全產總的地位，籌備兩年多的全產總被人形容為「未上市的潛力股」，後勢一片看好。面對一連串的變局，對自主工運來說真是「形勢一片大好」嗎，還是更嚴峻的挑戰，本文願意對這個問題提出自己初步的想法。

新政權的性格－阿扁是「咱的總統」嗎？

毫無疑問，陳水扁政權絕對是一個大資本家的政權，對這點我們不應有任何的猶疑和幻想。這幾年來所謂民進黨的轉型工程，其最重要的意義就是讓民進黨成為一個不論在兩岸關係、「執政能力」、各種社經政策上能讓大資本家放心的準執政黨。在黨外時期和建黨初期，為了發動群眾以向國民黨奪權，它們還會展現貌似激進的口號和行動。到了執政前夕，民進黨早就揚棄了讓資本家不安的群眾運動和其實並不存在的「反商情結」，確立其大資產階級的性格，所謂陳水扁繼承「李登輝路線」的意義，也必須包含這種角度的解讀。

陳水扁在選後密集地拜訪資本家，又在接見以全產總系統爲主的工會幹部時祭出國民黨慣用的「安定中求改革」，要求幹部們「耐心」等待他兌現選前的支票。在未來人事佈局中，大資本家的介入之深有目共睹，更有資本家本尊親自下海入閣，而過去長期是「自由化、民營化、國際化」政策推手的部份國民黨官僚盛傳即將入閣，繼續執行他未完成的任務。這種種都是陳政權和民進黨大資本家性格的一些表徵。在過去，國民黨長期是騎在大資本家頭上的主人，經過李登輝時期以來的政經變化，陳水扁和民進黨將以大資本家良好僕人的姿態接掌政權，忠誠勤懇的以其「效率」、「清廉」、「魄力」，掃除不利於大資本家累積資本、擴張勢力的障礙！！

所以勞工朋友們應該拋棄「咱的總統當選了」這種過於天真的幻想，誠如陳本人所說「台灣並沒有變天」，如果運動力量沒有茁壯，「自由化、民營化」政策不可能改變，勞動者在工作場所依然任人宰割，大資本家將更堂而皇之的操縱「國政」。擦亮眼睛、嚴密監督、準備鬥爭是唯一道路。另外，那種認爲民進黨的性格還在變化中，大資本家還在觀望是否支持陳政權的想法，不是太過昧於現實、太過天真，就是容易導致在實踐上對民進黨抱持幻想的後果。

出現三個全國級總工會之後.....

選後變局中直接影響未來工運發展的變化就是全總的家變、「全勞總」的出走和全產總的即將成立。到目前爲止，全勞總的出現不過是代表全總中部分最保守勢力對選舉結果的反彈，其正當性令人質疑，未來的出路大概也只有轉化爲「全國職業總工會」一途罷了！

撇開全勞總不論，值得我們關注的倒是全總和全產總的同質化問題。在家變之後，全總勢必調整腳步，多少向比較進步、自主一方傾斜，以和全產總維持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而就全產總這方來說，一方面兩大總工會的會員工會本就有一定程度的重疊性，許多工會未經自主工運的洗禮，仍習慣於過去的工會運作模式，缺乏前瞻性、進步性的思維和做法，甚至汲汲於名利的追逐，也有的工會經過幾年的運作早已蛻化變質。另一方面，選後一片看好全產總的形勢，使得那些原本心存觀望甚至抵制力量紛紛轉爲積極介入，或許一時間還無法操縱全產總，但經過幾年的運作和各種恩怨的累積，未來的質變並非危言聳聽。

在籌組過程中，一些全產總的核心幹部和工作者有著這樣的共識：全產總是在過去十多年自主工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要維持全產總的獨立自主性、組織全產總不是爲了追求合法地位，而是爲了擴大並強化團結的基礎、工會是否合法不是能否加盟全產總的考量因素、未來全產總不應只是代表產業工人利益的團體，不但要結合職業工人、邊緣性的工人，還應團結其他社會進步力量，往集結階級政治力量邁進。但是這

樣的思考要如何成爲全產總中大多數成員的共識是需要極大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在自主工運低迷、缺乏有力的工人政治力量存在、陳水扁上台之後龐大資源帶來的拉力、工人群眾中普遍存在對既有政黨的情結等諸多主客觀因素作用下，全產總是否能真正走出一條獨立自主、不依附既有政黨的進步道路，亦或是淪爲「民進黨的全總」，還在未定之天，還有待主其事者積極的奮鬥。

搶棍子還是討胡蘿蔔？

對工運發展來說，陳水扁的上台應該是「短多長空」的局面。就短期來說，在陳上台之初或許會有一段的混亂期和蜜月期，民進黨主掌的勞委會也會釋放出相當的資源餵養一些標舉自主性的工會，加上連宋扁三組候選人勞工政見中，陳的政策具有相對進步性，這都使工會的訴求或組織的發展有一定開展的空間。但是就長期來講，陳水扁政權的階級屬性和所謂新中間路線不可能放手讓工人階級的力量有真正的壯大強化，而伴隨資源輸送而來的將極可能會是原本還具自主性的工會產生對政權的依賴以及領導幹部的被吸納，這對工運的發展是真正的致命傷。民進黨的政治新貴中不乏過去社運的參與者，以他們對社運的了解，在對付運動的手法上相信會比國民黨更嫻熟、更銳利。

面對可能的局勢演變，一方面我們應該利用短暫的蜜月期，爲工運爭取接下來發展的有利條件。當然我們要爭取的不是德政式的施惠，套句一位資深工會幹部的話：「我們要的是棍子而不是胡蘿蔔」。一個重要的目標應該是追求工會體制的變革。台灣這種廠場工會的格局必須逐步打破，「工會戒嚴法」的束縛必須突破，現階段可以做的是工會聯合的自由化、工會內部運作（組織設計、財務等）自主性的確立、資方不當勞動行爲的限制與嚴懲，而罷工權收縮的企圖也必須阻擋。當然工作權的保衛、工時的縮減對工運的發展都有相當的意義。總之，我們的奮鬥是爲了強化階級團結基礎，爲了讓勞動者手中有更多可資運用的防禦性及進攻性的武器，不是要索討那些會沾黏住我們嘴巴和手腳的蜜糖。

發展體制外組織，進行工人政治教育

全產總成立之後，勢必成爲工運力量和各種資源的集中地，但是觀察各地的經驗，一個建制化的工會聯合組織難以避免「雞兔同籠」、「蛇鼠一窩」的情形，加上前述「政黨化」等變質的可能性，維繫體制外工運及工會組織的存在與發展是極其重要的任務。只有這股力量持續的發展，才能維繫自主工運香火於不墜，才能對全產總的發展形成另一股拉力，牽制其變質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進行工人的政治教育是刻不容緩的工作。資本主義代議民主這種一人

一票的制度，容易讓大眾產生自己是國家主人的幻覺，在台灣這種左翼運動低度發展的社會，群眾很難識破既有政黨、政客的階級本質，也很難看清國家究竟為哪個階級服務，容易對政府和資產階級政客產生幻想。面對民進黨上台的新局，「全民共治」的口號甚囂塵上，我們必須縝密而有系統的利用各種實戰和平時的機會，和工人討論各種政治經濟問題，展開工人的政治教育，帮助大家認清現存制度的本質，尤其不能再以各種說辭和行動模糊工人的政治認識，否則一切號稱發展工人政治力量的口號都是空談，甚至是騙人的語言。★

「全勞總」為何出走 與臺灣工運的前景

黃瑞明

在總統大選的崩盤效應之下，長久以來淪為國民黨外圍組織的「全總」也終於變天了。改革色彩濃厚的鐵路工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林惠官的人馬意外地當選理事之後，台灣省總工會所屬的各縣市總工會與台北市總工會以及加工區產業工會聯合會、全國碼頭勞工聯合會也立即宣告退出「全總」。這些工會正在積極地籌組「全國勞工總會」（「全勞總」），「全總」的分裂似乎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就這些總工會而論，其領導人之所以想要另立門戶，除了因為他們一直是國民黨的同路人之外，原因也出在總工會的組成結構上。

總工會是由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組成的聯合組織。在我國目前大約共計三千七百個工會組織（會員總數為三百萬人左右）中，職業工會與產業工會為數各約二千五百個與一千百個，前者的會員人數則為後者的四倍。其結果，各級總工會多年來被職業工會所把持也就不足為怪。

職業工會其實是個掛羊頭賣狗肉的組織。它的會員是所謂的無一定雇主的受雇人，其實就是自僱工作者。依據工會法第五條的規定，職業工會本來也有包括締結團體協約在內的種種任務必須達成。然而，多年來，職業工會的主要業務在實際上卻僅僅止於協助這些無一定雇主的受雇人取得有一定雇主的勞工所享有的勞、健保（後者自然是最近幾年才有的事）而已。充其量再辦個「自強活動」，也就是旅遊或其他康樂活動，以及提供會員子女聊勝於無的獎學金，職業工會的任務便已完成。不同於西方國家中工會是為了解勞工在處理勞資關係上壯大聲勢而存在的情況，職業工會在臺灣其實等於就是勞、健保局的代辦機構。只要職業工會認真辦好勞、健保的投保工作，會員便心滿意足，別無所求。因此，這些會員根本沒有勞工意識，加入同一職業

工會的事實也沒有使他們凝結團結的意識（solidarity）。

由於是以縣市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職業工會的規模不大。中央主管機關（過去的內政部與現在的勞委會）復依據極為細分的職業分類擴大職業工會的種類，這使得職業工會的橫向發展更形不易。舉例言之，單是性質相近的自行車業、機車業以及汽車修理業就分別成立了三個職業工會。多數職業工會的會員為數本就不多，由於健保的投保不需要非得藉助於職業工會，不少會員於是紛紛求去，只剩下捨不得放棄勞保的會員繼續加入勞保。因此，會員流失是各職業工會的普遍問題。情況嚴重時，有些甚至僅存不到一百人的會員。

這些袖珍工會麻雀雖小，卻是五臟俱全。理事、監事樣樣不缺。為了規避工會法第十七條關於理事長只能連選一任的規定，絕大部份的職業工會都不設理事長而只有「常務理事」。「常務理事」一再連選連任，成為備受詬病的「萬年常務理事」。

猶有甚者，不少職業工會的「常務理事」即是由企業的董事長兼任。這種勞資一體的現象，堪稱是臺灣職業工會的特殊奇觀。「常務理事」雖是無給職，但是形同理事長，可以主導專任秘書的雇用。在實務上，專任秘書就是自己的媳婦的情形並非少見特例；工會規模大一些時，所收會費更多，可以雇用人員增加，其他親朋好友也同沾其利。有人於是乾脆稱這種工會為「家庭工會」。

工會的組織不健全，會員繳交的會費與勞、健保費金額又為數不少（每次繳交半年費用），「常務理事」挪用侵佔公款或甚至使整個工會破產的情事便時有所聞。這些在東窗事發之後被勞委會列入「黑名單」的職業工會並未真正幫會員繳交勞、健保費，一旦遭遇理賠事故，會員便可能陷入求償無門的處境。

職業工會違反工會法的情事昭昭明甚，勞委會當然也瞭若指掌，卻一直投鼠忌器，不敢整頓。政治上的考慮當然是主要原因。

這些名實不符的職業工會把持著各級總工會，迫使部份基層產業工會與體制外工運團體（如勞工陣線）聯合起來催生「全產總」。雖然勞委會一直拿陳腐的工會法（最近一次修正在二十五年前！）第五十條的規定否認「全產總」的合法性，然而在政治大環境劇變後，連總統當選人陳水扁都承諾將在五月一日參加「全產總」的成立大會，則「全產總」在近期內鹹魚翻身的可能性也大為增加。這將意味著各縣市總工會與台北市總工會所屬的產業工會很可能大批出走，加入「全產總」。由於職業工會受困於既有結構，浴火重生不易，因此「全勞總」最後恐怕還是難免土崩瓦解的命運。

「全總」的變天推倒了臺灣工運的第一張骨牌。如果林惠官的改革成功，則「全總」憑著剩餘的直屬公營事業工會與吸收其他總工會所屬產業工會將能維持著與「全產總」分庭抗禮的局面。在多元化的社會裡，兩個體質較諸目前情況更為健全的工會龍頭的良性競爭將使得陰霾已經五十年的臺灣工運氣候綻放出一線希望。雖然前景如何尚難斷言，但這已經值得吾人樂觀其成了。

反思台灣工運

汪立峽

回憶一個人

記得多年以前，我以《春風》雜誌執行編輯的身份，訪問過一位至今讓我懷念不已的工會領導人，他叫詹憲宗，當時是味王產業工會的頭頭。此人在那個肅殺冷峻、毫無工運可言的年頭，竟然發動過一次大獲全勝的罷工。此事在我發掘報導以前，並未見諸報端，外界鮮有人知。詹憲宗是礦工之子，只唸過小學，但膽氣識見過人。整個罷工過程既無「高人指點」，也未「依法行事」，完全憑著全廠工人對勞動條件的不滿和詹憲宗的鼓動號召，就揭竿而起。其間，詹一度遭解雇處分，終因全廠工人堅持罷工到底，詹不但很快復職，而且迫使資方答應工會的全部要求。我曾問他有沒有考慮過被抓被關的問題，他回答：「從沒想過，但相信戰鬥比法律更重要。」或許正是這種信念使得詹憲宗和他的工人夥伴們奮不顧身的取得了勝利。那是1979年的事，距今已二十年。當然，在戒嚴時代，這個事件相當特殊，但意義非凡。

風雲乍現

在味王罷工事件之後，相隔約八年，即八〇年代末期，在台灣才興起了戰後第一波的大規模工潮。這次工潮之所以可以形成，基本上依托了四個條件：政治民主化運動的全面展開、勞動基準法開始實施、戒嚴令解除、工黨適時成立。長時期遭受政治壓抑和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工人群眾，此刻在「有法可據」，無懼無端被捕的形勢鼓舞下，突然群起展開「討債」性的抗爭，目標直指自己的老闆。工人兄弟姊妹們在此起彼落的浪潮中，懷著積怨和亢奮的心情勇敢挺進，要求依法改善工時工資、要求提高年終獎金分配、進而要求工會自主化，爭奪工會領導權。知識份子在一波工潮中，以勞支會和工黨為據點，開始投身工運，提供法律知識、協助組織抗爭、策劃解放工會…傳播媒體和社會大眾首次以訝異和不安的眼神「注意」到工人階級的存在。

然而，好景不常，台灣資產階級隊伍和他們的國家機器（即工人群眾口中的「資方」與「官方」），在好一陣子的驚慌失措，節節挫敗之後，開始大反撲。1989年5月前後，當全台灣把焦點緊盯著「天安門事件」的那一刻，島內也正在上演著另一場階級大對決，那就是「遠化大罷工」，資方在三千多名鎮暴警察和各種資源，包括情治、司法、行政的支援下，擊垮了全台工會的大會師，領導大罷工的十多名工會幹部和知識份子遭到法律制裁的報復。

大海迷航

「遠化大罷工」一役，標誌了戰後台灣工運的分水嶺；此後工運在一定意義上陷入一蹶不振的低潮狀態，或者說進入常規狀態。個別的勞資爭議不斷，每年的「秋鬥」（或「春鬥」）照常，勞工法令運用嫻熟，同時開始懂得以「專業」知識和技術將抗爭矛頭直指「官方」。伴隨這一系列現象的另一種現象是工運內部因為統獨、左右、黨派、路線等等的分歧而嚴重分化。更麻煩的問題是工運「專業化」的結果逐漸導致台灣工運不自覺地滑入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遊戲規則」而難以自拔，「為工運而工運」已然內化為工運「慈善事業化」的機制性危機，長此以往，台灣工運只能在資產階級資方和官方給定的「規矩」和意識型態「法則」下打轉，已是可預見的邏輯必然，說白了，就是「主動被收編」。工運「專業化」所呈現的另一層意涵是資產階級「管理文化」和「消費意識」已經成功的滲透和污染了工人運動，因而嚴重干擾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和阻撓工人運動「政治化」、「鬥爭化」。相對於當年詹憲宗的「戰鬥比法律更重要」的行動信念，今天台灣工運份子在工運「常規化」、「專業化」的自信和自豪之餘，毋寧是「江湖跑老，膽子跑小」的心態轉換？

怎麼辦？

「全產總」（全國產業總工會）誕生的意義，有其兩面性，一方面突出表現了近十年「常規工運」的積極面和進步性，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延續了過去十年台灣工運「常規化」、「專業化」的消極面和保守性。一個弔詭但不全然是嘲諷的現象擺在台灣工人群眾眼前，過去被視為（事實也如此）「官方工會」的「全國總工會」，而今隨著國民黨下台，一夕之間變成了「非官方」；而於今年「五一」剛要宣告成立的「全產總」，在被客觀「判定」的政治取向上（從「主觀」而言，「全產總」未必如此），好像隨同民進黨執政，乍然間竟成了「官方工會」！此番「位置調換」、「角色轉移」的詭異景況，不論是幻是真，肯定都需要「全產總」深自警惕。於今來看，今後「全產總」至少需要思辯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除了「政黨輪替」這個形勢意義以外，到底民進黨和國民黨在階級屬性上有沒有什麼不同？第二、今後和民進黨政權的關係怎麼定位？第三、今後「全產總」怎麼定位自己？說明白一點就是「工運常規化」還是「工運階級化」？「工運專業化」還是「工運政治化、戰鬥化」？第四、今後「全產總」怎麼面對和處理無可迴避的「統獨」問題？跟隨陳水扁走所謂「新中間路線」還是認真負責的作出合乎客觀條件和工人實際利益的自主抉擇？

對於這幾個方面的提問，有些答案已經內在的包含在本文的某些論述之中，無須多言。有些答案則需要「全產總」和我們大家（即對台灣工運仍有期許和寄望的人們）共同來思辯和論證，獲致共識。

向右傾斜的單一與貧乏

—— 從《新世代政論網》的一篇留言談起

左思

MetLim 4月20日在《新世代政論網》的留言很有意思，透露了民進黨核心支持者世界觀移轉的軌跡。或者，他的論述有一定的代表性，也反映了當前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扮演批判與反思的角色

目前「新潮流」系統已入主黨中央，但是，猶記得黨外時期的《新潮流》雜誌還時常報導第三世界南方國家的反抗運動，爲了抗議當時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新潮流」甚至還進行街頭動員，羞辱當時與台灣有邦交的南非來使。如今，「新潮流」忙於安排新增的權力位置，早已不見當年的銳氣。《新世代政論網》的出現，許多人都希望它能夠在網路時代扮演年輕的「新潮流」在黨外時期火力旺盛的，批判與反思的角色。

MetLim顯然是民進黨的核心支持者，但是他所表現出來的竟是對第三世界國家反抗運動的極端不屑與不以爲然！

MetLim 所嚴詞訾議的〈三千原住民扯下一個大總統〉(作者林深靖)一文，在網路上首見於2000年2月24日的《南方電子報》，後來《新世代政論網》正式對外發布時，也將該文納入(只是沒幾天就被拿掉了!)。該文主旨在評述爆發於今年1月21日的厄瓜多原住民起義，迫使厄瓜多總統馬華德倉皇下台，後來在美國的強力干預下，副總統諾波亞上台，繼續聽令於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來自美國的顧問，執行原總統所留下來的政策。

對於這樣的一篇文章，做爲民進黨核心支持者的MetLim 批評說：「以區區三千的少數族群政變奪權取代一千二百二十萬多數人民所選出的民主政府，其合理性首先便受人質疑，這不應與美國霸權是否蠻橫干預相混淆。再以世銀的統計爲準，厄瓜多1998年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優於亞洲的許多國家，如馬來西亞(-9.6%)、南韓(-7.4%)、泰國(-8.5%)。以該作者的政變邏輯，那些亞洲國家豈非都該揭竿起義？台灣民主人士經千辛萬苦、歷數十年才好不容易推翻一黨專制、脫離「槍桿子」政權的壓迫，正值惡夢初醒之際，竟還有人迷信、浪漫合理化少數武力暴行，實在令人費解！」

MetLim 能直接上網擷取世界銀行的數據資料，顯然是知識菁英階層，他以「科

學的」、「權威的」數據來支撐他對〈三千原住民扯下一個大總統〉一文的批評，然後將厄瓜多的原住民抗爭直截定義為「少數武力暴行」。這樣的論述過程以及針對同一事件完全對立的詮釋，事實上，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好證明了：人類歷史與國際事務很可能經由不同意識型態的詮釋系統，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這會提醒我們在閱讀歷史，在瀏覽新聞事件時，要注意背後那個「寫手」(writer)的身分和心理狀態。歷史和新聞的「寫手」在傳播倫理上被要求以客觀為守則，他們也因而常常標榜自以為是的「客觀」，掩飾了自己其實也是作者(author)或詮釋者(interpreter)的角色。

不僅是文字工作者，即使是攝影記者也可能因為對新聞事件「框取」的角度不同，而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譬如，《明日報》於4月16日透過外電訊息報導集結於華盛頓的反IMF示威，報導中提到，曾得過普立茲專題攝影獎的華盛頓郵報的攝影記者卡羅·古茲(Carol Guzy)，在群眾抗爭中被警察強制帶離現場並加以逮捕。這樣一則簡單的外電新聞，《明日報》編輯卻硬要在開頭插上一句按語：「記者的工作充滿風險，尤其是在群眾運動中更是動輒得咎，如何謹守職業上的分際，才是避免誤會的不二法門。」

做為台灣第一份網路原生報，《明日報》的成員主要來自《新新聞》週報，而主其事的台柱，如陳裕鑫、南方朔等人，都是經歷過黨外雜誌風雲的健筆。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黨外雜誌的信念無非就是反對強權(國民黨)，為弱勢者(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上的弱勢)發聲。對於國際上反抗強權體制的活動以及知識菁英的「介入」(engagement)抗爭，多採取「同情的了解」的態度。曾幾何時，對於警察逮捕知名記者的行為，不僅未提出任何質疑，還刻意提醒記者要注意風險，謹守分際，避免誤會。如此保守、畏怯的立場，還真是令人一新耳目。台灣社會全面的「向右傾斜」，當然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但是做為網路時代先鋒的《新世代政論網》和《明日報》都充斥著不自覺的右翼保守論調，就不得不讓人為台灣現代社會在精神現象上的單一與貧乏而感到憂心了！

第三世界左翼的立場

再回到〈三千原住民扯下一個大總統〉，該文作者其實開宗明義就已旗幟鮮明地標舉其第三世界左翼的立場，絲毫未掩飾其意識形態論述的文字風格。這種方式的「書寫」，簡而言之，就是把文字當成武器。因此，有其必然的「工具」性格：文字是其鬥爭的工具。MetLim未能點出這樣的局限，卻反而刻意在數據上吹毛求疵，試圖以科學的、權威的數據，瓦解〈三〉文的可信度。

殊不知，MetLim所提供的數據反而強化了〈三〉文的論證。首先，〈三〉文所

敘述的厄瓜多政變是發生在2000年初（作者在篇首就已點出時間），而不是MetLim所說的「一九九八年」，因此，作者所提出來的厄瓜多經濟成長率衰退幅度、民生物價指數、外債數額，當然都是以1999年為依據。MetLim卻莫名地丟出一大堆1997、1998年的數據資料，姑且不論MetLim數據引用的正確與否，光是在時間點上就有嚴重誤差。

其實，〈三〉文所引用的數字根本不是什麼秘密，厄瓜多政變的過程雖然撲朔迷離，全球各大媒體都有報導（台灣的大報也發了外電訊息），對事件過程即使說法不一，敘述到厄瓜多的經濟困境時，所引用的數據基本上相差無幾。〈三〉文的數字應是來自當時的國際媒體。譬如，我手上有一份2000年1月27日發行的The Guardian Weekly的相關報導，其中除了厄瓜多外債數額是140億美元，而不是〈三〉文作者所說的136億之外，其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更驚人的是，根據資料顯示，厄瓜多的年度預算中居然有40%是用於償還外債，而用於教育的卻只有13%，用於醫療保健的才3%。

厄瓜多是IMF列管的國家之一，金融財政上全面接受IMF的「療治」（therapy）。IMF開出的藥方是全力促成公共收支的平衡，於是厄瓜多政府一方面不斷縮減補助和社會福利支出，另一方面又對窮人開增賦稅項目，尤其對於俗稱地下經濟的非正式部門更是吋吋進逼，街頭小販首當其衝。在此同時，政府又在IMF的指令下，全力搶救瀕臨破產邊緣的銀行（其中還是有六家宣告倒閉），厄瓜多公民的部分存款居然在銀行優先的政策下，遭到凍結。IMF作為外來的「監護者」，它所念茲在茲的是來自北美的那些銀行集團在金融市場上的「穩定」，厄瓜多住民的死活根本不在它的思慮範圍之內！

厄瓜多：「美元化」的白老鼠

根據世界銀行自己的統計，厄瓜多有46%的居民達不到每人每天一美元的最低生活底線，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在這種情況之下，中間階層不斷流失，或因為極度脆弱、不安而成為最容易操控的一群。至於最底層的窮人則陷入全然絕望的境地，其中又以印地安人居大多數。

厄瓜多政變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的，雖然馬華德總統是被攻佔國會的三千原住民嚇跑，但是在此之前，全國性的示威和罷工已持續了一週以上。而其導火線則是馬華德於2000年1月9日，宣布厄瓜多國幣「美元化」的政策。根據《國際先鋒論壇報》於1月20日的一篇報導，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認為，「美元化」基本上是IMF的技術官僚們所想出來的一個伎倆，作為處理未來金融危機的手段。而，很不幸地，厄瓜多正好成為第一個被拿來做實驗的白老鼠。

MetLim 指責〈三〉文肯定厄瓜多政變，「浪漫合理化少數武力暴行」。應該指出：厄瓜多今年元月的事件，是以印地安原住民為主體的抗爭，不是軍人主導的軍事政變，並未流血。〈三〉文也寫道：「政變過程十分平和，群眾在街頭高呼：『人民勝利，無需武器』。」厄瓜多印地安原住民的人口比率有各種說法，從 30 % 到 45 % 不等，再怎麼說，他們的行動，既不是「少數」，也不是「武力暴行」。但是，如果厄瓜多的處境繼續惡化，權貴階層依附境外強權、壓迫國內百姓的矛盾加劇，達到了革命的條件，那麼，即使是「武力暴行」又當如何？

MetLim 引亞洲國家金融風暴後的經濟情勢來與厄瓜多的案例做比較，乍看是引喻失義，其實也不必然。這些風暴後的國家同樣列於 IMF 的看管之下，若是當權者像馬華德總統一樣，盲目聽從外來指導者，完全喪失自主性，那麼，厄瓜多就是他們的前車之鑑。

至於 MetLim 辯爭厄瓜多香蕉出口多於石油，徵引數據挑剔「相對富裕」的定義（那麼厄瓜多國民平均所得 1590 美元，相對於海地的 330，尼加拉瓜的 410，宏都拉斯的 700，算不算相對富裕呢？），根本是打混仗！〈三〉文是感慨厄瓜多有豐富的石油蘊藏，居然還有半數人口生活在貧窮底線之下，何來 MetLim 的這麼多夾纏？

預告權力交替的變局

事實上，如果要講「合理化」，那麼，厄瓜多做為 IMF 最聽話的學生，其國內經濟和社會生活居然會破敗到如此不堪的地步，正好「合理化」了那些於今年四月中旬，衝著 IMF 和世界銀行年會而集結於華盛頓的示威群眾！而厄瓜多統治階層和外來顧問將整個國家視為「莊園」，將國民視為農奴的行徑，也相互映照地「合理化」了近日爆發於非洲辛巴威的黑人老兵奪土抗爭！

MetLim 不願言明的是，〈三〉文中的一些片段，可能刺傷了民進黨核心支持者的眼睛。譬如作者寫道：「弱勢者抗爭的成果常脫逃不了被強權者、投機者收割的宿命。就像台灣原住民的血汗抗爭最後是滋養了少數幾位位居要津的原住民權貴一樣，就像過去幾十年艱辛漫長的黨外運動最後是成就了幾位律師、醫師、股市魔法師一樣，厄瓜多原住民起義的成果，很快就被既定的權力結構所侵吞……」

除此之外，這篇於今年 2 月出現於網路的文字，似乎冥冥中預告了 3 月 18 日之後台灣權力交替的變局：李登輝總統也在群眾的持續包圍下，倉皇離開權力的核心。其次，馬華德在就任總統前曾擔任過首都基多的市長，就像陳水扁擔任過台北市長一樣。而作者在文末寫道：「馬華德總統的處境其實也相當程度地反映出地三世界國家的困境：一個政治人物在擔任地方首長時容或有為人民服務的理想，也可能因此而在民間擁有高度的聲望，但是，一旦他有機會進入中央，手握大權，就難免要被整合進

全球化的既定體制。經濟霸權美國老大哥的意見不能不聽，WTO、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貿機構的指導不能不尊重。於是，一個有理想的政治家變成一個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管理者……」

當然，台灣不會承認自己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台灣當政者的眼睛永遠只會盯準美、日。今年4月12日至14日，做為第三世界象徵的「南方77國集團」首腦會議在古巴首府哈瓦那召開（其實共有122個國家與會），台灣根本置若罔聞。雖然與台灣有邦交的國家，幾乎清一色是第三世界國家。MetLim說厄瓜多是台灣的「友邦」，我很慚愧，並不清楚。如果是，那更令我訝異：「友邦」發生那麼重大的事變，台灣從政體到媒體，幾乎是不聞不問！其實，台灣的百姓又有幾個人搞得清楚我們寥寥幾個邦交國的國名？我們不願承認自己是第三世界國家，也從來不曾站在這些第三世界友邦國家的角度思考，不曾與他們聯合，共同向吃盡抹淨的經濟霸權集團（比如說G7）要求應有的權利。那麼，多一個邦交國，少一個邦交國，除了數字上的自我撫慰，又有什麼意義？

★

《左翼》第一號三刷印行通告

我們在印行《左翼》第一號時，尚不知左翼的讀者有多少，因此第一刷只印行了七百份，未料《左翼》發刊後得到的反響是如此的熱烈，以致我們立刻安排了二刷，但隨即也被索閱一空。由於不斷有讀者表示希望取得第一號，所以我們決定印行三刷，歡迎向隅的左派同志或關心台灣左翼運動的朋友來函索取。

來信請寄 234永和郵政549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我們更是歡迎與感激。我們將會定期公布捐款資料，以昭公信。 捐款郵政劃撥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藍博洲新書

共產青年李登輝

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紅岩出版社

定價 300 元

郵撥帳號：22031407 藍博洲

戰後幾個主要的 「現代資本主義論」〈二〉

黃志龍

三、現代資本主義理論的新發展

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日漸抬頭的馬克斯學派，尖銳地質疑當時主宰著歐美學界的主流經濟學派，並對作為主流經濟學的一支的凱因斯學派，進行嚴厲的批判性考察。

戰後，以P.薩繆爾森為首的主流經濟學思想(廣義的新古典綜合學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絕對化資本主義體制，並在這個狹窄的架構中，將傳統的庸俗經濟學視為是研究個量問題的微觀經濟學，把凱因斯主義當成是考察總量問題的宏觀經濟學，並認為兩種理論是相輔相成，可以納入同一個經濟體系之中。他們認為：

1. 就宏觀而論，凱因斯的財政、金融政策可以達到充分就業的目的。
2. 就微觀來說，透過市場的價格機制，可以實現資源所得的合理分配。

但是在60年代以後，一方面由於通貨膨脹不斷惡化；一方面由於馬克思主義以及新李嘉圖學派的學者的檢驗，以邊際效用論為根據的價格和資本理論的內部一貫性開始受到質疑，其思想的侷限性也遭遇批判。特別是在70年代西方世界陷入「滯膨危機」(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並存的危機)之後，凱因斯理論的地位終於一落千丈。這就是說，在戰後相對安定的時期中，支配著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布爾喬亞和諧思想的信賴感，已經開始崩潰。

歐美的馬克思學派，一方面對廣義的新古典經濟學進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根據馬克斯理論，分析近期的經濟危機。其中最值得重視的特徵是：在60年代發揮重要影響力的「現代資本主義論」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的理論體系，並沒有被繼承下來作為經濟分析的架構。取而代之的是，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的危機理論，強調：現代的資本主義無法避免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以及這種矛盾的顯現。也就是說，以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重新分析凱因斯政策產生破綻的原因和過程。例如，Sweezy也說：「在一定的歷史脈動中，資本主義對於無限制生產擴大的衝動會發作，而偶而也會出現小小的後退……但這種時期並不能永遠繼續下去。無限制生產擴大

的趨勢和限制消費之間的基本矛盾會逐漸發揮其威力。Sweezy在此重新的肯定了發生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也就是說，重新修訂了他在《壟斷資本》一書中所持的論點。

再次興起的馬克斯主義學者，大都將經濟危機的原因歸咎於利潤率下降趨勢，這是產生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內部的必然趨勢，其理論基礎是：伴隨著資本積累必然產生資本有機組成的高度化或工資上昇，將導致利潤率下降，從而成為恐慌必然性的根據。

例如，D.S.Yaffe在《The Marxian Theory of Crisis, Capital and the State》(1972)以及P. Bullock & D.S.Yaffe在《Inflation, the crisis and the post-war Boom》(1975)等書中指出：馬克斯根據資本有機組成的上昇而主張「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證明了經濟恐慌的必然性。而戰後的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對市場經濟的介入和通貨膨脹政策，不過是意圖緩和這個規律的作用而已。但是，國家的經濟政策永遠無法阻擋這個規律的彰顯，因此便出現了7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

E. Mandel的《晚期資本主義》(1972)在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危機時，也將由於資本有機組成上昇所導致的利潤率下降規律，作為主要的課題。

還有A. Glyn and B. Sutcliffe《British Capitalism, Worker and profit squeeze》(1972)也認為，最近英國的資本主義危機的主要原因，在於工會要求提高工資的壓力，使利潤分配率或剩餘價值率降低。

此外，A. Glyn和H. Horrison、P. Armstrong等人在《British Economic Disaster》(1980)和《Capitalism since 1945》(1991)等書中也主張，資本相對於人口的過剩積累與工資的上昇壓力將會降低利潤率。

由此可見，許多近期的歐美現代資本主義論，開始以馬克斯的危機理論作為基礎來分析1970年以後的經濟危機。不過這些危機理論，並沒有對「全盤危機論」、「現代資本主義論」以及「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所強調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關係、戰後資本主義充分就業等原因，如何引起資本積累的基本困難，因而引發此一時期的經濟危機等問題進行討論，而只是將70年代的經濟危機，歸因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內部矛盾及其顯現。所以，就資本主義分析而言，這些危機理論，就具有其片面性而顯得不夠充分。

因此，要理解支撐著戰後資本主義體系到60年代為止的相對安定和該時期凱因斯政策表面上成功的歷史條件，以及這些歷史條件又如何喪失等問題，必須從資本過剩的理論入手。否則，難以避免陷入將資本主義某一時期的發展固定化後，再加以一般化的缺點。因為，絕對不能單純的將戰後資本主義的高度成長以及1973年後轉變為世界性的長期蕭條，僅僅歸因於操作凱因斯政策的成功與失敗而已。

四、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論(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SSA) 和調節學派(Regulation Theory, RT.)

D.M. Goldon, R. Edwards, M. Reich:《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1982)

S. Bowles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n Competitive Economy》(1985)

S. Bowles & H. Gintic :《New Microfundation fo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1990)

M. Aglietta :《The Regulation Theory of Capitalism》(1976)

在 70 年代馬克思理論復興期的討論中，西方馬克思學派中出現了在理論和方法上擁有明確特徵的學派，也就是重視社會以及各種制度對決定積累動向的重要性，尤其是特別重視在資本主義下勞動過程的歷史特性及其變化的現代資本主義論。那就是美國的「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論」(SSA)和出現於法國然後再廣泛流傳的「調節學派」(R.T.)。

這兩派的出現，都受到 Braverman 在 1974 年出版的《勞動與壟斷資本》(Labor and Monopoly)的影響。Braverman 繼承了馬克斯在資本論中對勞動過程、分工、協作、機器大工業等命題的考察，進一步對 20 世紀在美國的資本主義下，由泰勒與福特所發展出來的「科學的勞務管理」進行分析，並據此指出勞動的去技術化和均質化是「科學的勞務管理」一貫的內容。他的研究促進日後的西方馬克斯學派對勞動過程、經營組織的擴大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而 SSA 與 R.T. 就是這些研究的一環。

(1) 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 (SSA) :

S. Bowles, H. Gintis, T. Weisskopf, D.M. Golden, R. Edwards 等人就是較為著名的 SSA 派學者，而 Golden, Edwards 和 M. Reich 共著的《美國資本主義和勞動》(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 1982.) 就是其典型著作。

Golden 等人認為，對於「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的考察，是分析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所不可或缺的。「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是由影響資本積累過程的所有制度所構成。尤其是國家透過貨幣、信用制度、財政政策、工會的合法化等措施而介入市場，以及透過工會、政黨、選舉制度等階級鬥爭的手段來干預經濟事務。資本的積累依存於各種社會制度的安定性。

從 SSA 的觀點來分析美國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歷史，可以看出三個截然不同的局面：

1/. 18世紀20年代到19世紀末的「勞動的初期無產階級化」時期：這個時期，勞動力有多種供給來源，勞動者尚能控制勞動過程，勞動作業難以標準化，資本或其代理人只能依靠個別的、恣意性的勞務管理。1880年以後，這種積累的社會構造遇到瓶頸，企業利潤減少而面臨危機。

2/.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前期的積累問題獲得解決，進入「勞動的均質化」時期。在這個時期，大型企業在採用機械性作業方式、大量啓用以監督勞工為職務的「組長」、減少對熟練勞工的依賴等情形下，形成了勞動者均質化和強制勞動體制。這就是Braverman所說的勞動均質化的時期。但其苛刻的勞動強制體制，提高了勞動者的離職率，進而在30年代大恐慌的過程中，成為勞動者抗議的焦點而不得不衰退。

3/. 二次大戰後的美國資本主義，發展了屬於第三種局面的「勞動區分化」時期：在這時期，雖然小企業仍然採用「強制勞動體制」，但是大企業則因為工會鬥爭的影響，發展出「結構性內部勞務管理體系」，有系統的區分了各種職務，並依照不同的職務使其形成不同的技術，從而擴大了主管與其下屬職務之間的差距。這種雙重區分化，有效地利用人種和性別的差異而擴大進行，因而形成資本積累的社會構造。

在各個歷史階段中，以勞工管理方式為基礎的「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產生經濟活動的長期波動。亦即，長期波動的擴張期，是在有利於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和安定下，不斷的擴大其生產投資和經濟活動，一直到面臨新的侷限為止。然後，為了因應這種侷限，產生轉換各種制度條件的需要，經濟波動開始進入不景氣期。

根據SAA學派的分析，領導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美國資本主義的特徵是：以採用「勞動區分化」的美國式勞務管理方式為基礎，以凱因斯主義的財政、金融政策為外部框架，所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體制。1970年代以後的經濟危機，便是發生在這個「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遇到瓶頸而需要重整的過程中。所以，這種美國式的勞務管理方式，受到反對人種差別、反對性別歧視的運動以及日本式的勞務管理的影響，開始進行職務區分的整理統合及其彈性運用，以便促使產業重建。

(2) 調節學派理論 (Regulation Theory, R.T.)

M. Aglietta的《資本主義的調節理論》一書出版後，經過R. Boyer, A. Lipietz, 和B. Coriat等法國馬克斯經濟學者活潑的詮釋研究後，在國際學術上逐漸受到重視。

調整(Regulation)是針對新古典學派的「一般均衡」的概念，認為：社會關係具有矛盾和對立。但是儘管矛盾有其對立和鬥爭的一面，卻也有其互為條件、互相滲透

和互相依存的另一面，因此，社會關係在一定期間內會維持安定和再生產。換言之，「調整」一辭所表現的是，社會關係中對立面和統一面的緊張關係。調整學派所要考察的命題是：「社會關係必定具有矛盾性，因此如何透過這個矛盾性來再生產社會關係的統一性。」

所以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的動態，並非只是市場現象，而是更廣泛地受到各種社會制度制約的積累體制。積累體制不僅把貨幣制度、勞資關係、競爭、國家、國際關係等各種制度收納在內，更透過個人與各個集團的特定意識和行動的媒介而形成調節方式。所以調整學派也吸收了A. Gramsci「改革資本主義體制時，要重視社會上各種制度與意識型態所扮演的角色」的主張。

調整學派從這個觀點出發，整理出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中所產生的主要積累體制的變化：即，19世紀的資本主義，依靠不以生產力持續上昇為條件的「外延性積累體制」，以延長勞動時間、增加雇佣勞動人數為手段，來增加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到了20世紀的以後，資本主義轉而依靠以持續提高生產力為條件、擴大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為主的「內生性積累體制」。不過這種「內生性的積累體制」由於缺乏大量的消費市場，生產與消費之間無法整合，因而出現了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

二次大戰以後的資本主義，以「依照生產力的上升比例來增加實質工資」為內容的協調性社會契約為基礎，形成具有「大量消費的內生性積累體制」，也就是所謂的「福特主義」（由於高生產力、高工資而擴大有效需求的積累結構）。這種積累體制雖然實現了高度的經濟成長，不過由於科技進步遇到瓶頸，以及所得分配的矛盾而出現困境，因此帶來了1970年以後的經濟危機。

由此可見，SSA學派和RT學派之間，擁有許多共同的問題意識。但是，RT學派的特徵在於：他們的關心集中在屬於宏觀經濟的有效需要的動態發展上，主張戰後資本主義高度成長的秘密，在於：從社會上、制度上保障了實質工資能夠依照生產力提高的比率來增加，也就是從資本積累的內部不斷擴大有效需求的「福特主義」的形成。

雖然，SSA學派與RT學派都將研究重點放在各種社會制度的變化上；但是，他們的理論關懷也涉及到了屬於宏觀與微觀之間的MEZZO的範疇，包括勞務管理等企業經營之內部制度的變化。也就是說，他們把從國際關係、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以致於到屬於MEZZO分野的勞務管理，都當作理論考察的對象，而有體系的詮釋了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及其調節邏輯。

不過，SSA學派與RT學派的理論，仍有一些有待商榷的地方：

首先，部分SSA與RT的理論家，因過度關心現代資本主義各種制度的作用及其調節方式，而忽視了《資本論》中有關資本主義市場的原理性考察，因而認為在經濟學上不需要「勞動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學說」，甚至質疑研究資本主義原理的一般

理論的必要性，並且認為將《資本論》視為是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的看法，其實是「19世紀和自由競爭的特權化」。例如，日本的RT代表性理論家山田銳夫就曾說過：「把資本主義的變貌，當作『原理表現形式的變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需要的是修正原理論或再構造經濟的時候了。」等等。換言之，他們意圖將他們的中介理論提高到「顯現於資本主義所有發展階段」的層次，進一步取代《資本論》的地位。

其次，一次大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方面受到世界戰爭的影響，一方面則是爲了對抗社會主義的內、外勢力，其體制的進化自然不能只從資本積累的內在邏輯來說明。但是SSA學派與RT學派，易將原理論與帝國主義論等視為「過時」的理論而予以拋棄，並且忽略或輕視二次大戰對資本主義發展的衝擊，也忽略了冷戰結構以及爲了對抗社會主義而採用的充分就業政策和福利國家化的意義。

其實，福特主義的「勞資妥協」之所以能夠制度化，乃是以下列四個因素爲條件，才成爲可能：

1. 資本主義的構造變化，將資本與勞動力集中於巨大的壟斷資本（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2. 美國實施New Deal經濟政策；
3. 由於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協力中，勞動階級的勢力顯著提升；
4. 戰後的冷戰結構也有助於福特主義的推行。

但是在RT的文獻中，卻很難發現有關冷戰的軍事對峙和越戰對此一時期資本主義持續成長的影響的研究。

再則，他們雖然重視勞務管理制度與調節方式對資本積累的作用，但是並沒有充分注意到，該時期主導性產業的性質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意義——戰後的勞動區分化和福特主義之所以能夠形成，是由於家用電器、汽車等耐久性消費品的大量生產所致。

生產關係的歷史性格與屬於上層建築的各種制度，對生產力發展的方向、內容、速度當然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但就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而言，也不應該忽視主導性產業的性質及其積累方式，對提高生產力的具體影響。也就是說，各種社會制度的作用和調節方式，對資本的積累當然有所影響，但是爲了瞭解其具體的影響，也應該考慮主導性產業的性質及其技術特性的變化。

SSA學派和RT學派，都關心資本積累的社會結構與調節方式，如何在高度成長時期以及隨後的危機與重整時期產生變化。但是，對於成爲高度成長原因的社會結構與調節方式，爲何到了70年代初期就陷入機能不足而產生經濟危機，則沒有做充分的分析。例如，當技術進步遇到瓶頸的時候，從前用勞資協調的方式來處理生產力與實質工資的調整，現在卻不再發揮作用？對於這個問題，上述兩者都沒有做過充分的分析。〔待續〕

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需要檢討

(一)

蕭喜東

一、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是失敗的

形勢的無情發展，已經迫使人們面對一個現實：我國領導人二十年來試圖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是徹底失敗的。如果這一點在有些人那裡還有疑問的話，且讓我們回顧一下有關基本事實：

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的對臺政策沒有贏得台灣島上的人心。這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事實。二十年來，不僅沒有贏得人心，而是逐漸失掉民心，中國政府在台灣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每況愈下，在今天降至最低點。十幾年前，當台灣民眾剛剛開始有機會訪問大陸或接觸來自大陸的信息時，他們或者出于對國民黨反共八股宣傳的逆反心理，對新中國社會帶著一種敬意和好奇心理，或者出于對國民黨腐敗黑暗統治的厭惡，他們希望在祖國大陸看到一個光明、溫暖、精神上清潔健康的社會——總之，一個與台灣社會完全相反的社會；在八十年代，台灣的書攤上出現了祖國大陸的學術書籍，追求進步的臺灣青年以看大陸書籍、認識簡體字為榮，台灣青年侯德建、林毅夫投奔大陸，就是一種象征。然而，隨著八十年代出現的、後來愈演愈烈的對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否定和醜化，也隨著中國大陸學習“台灣模式”的發展經驗，台灣的社會弊病也出現在大陸，並且愈演愈烈，甚至趕超台灣，祖國大陸在台灣民眾中的形象越來越差，到九十年代，發生了根本的質變：彷彿過去國民黨對祖國大陸的一切污蔑宣傳都被來自大陸的信息所證明是真實的。臺獨思潮在九十年代的膨脹，是和祖國大陸在台灣島內的感召力的喪失緊緊相聯的。

如果說“台灣民眾”的提法過于籠統的話，我們可以具體看，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的對臺政策，在台灣各個政治派別、各個社會階級、各個省籍族群中，都達到了什麼感召效果。總的來說，是一無所成，甚至適得其反。台灣主要的政黨和政客，包括被長期“寄望于”的台灣統治集團，無一認同“一國兩制”，幾乎全都將兩岸關係定位于“兩國論”或類似的表述，這已經被他們各自的立場表態所證明瞭。再看社會

各階級。被中國領導人所重視、拉攏的台灣大中資產階級，其實是台灣資產階級中最國際化、最買辦化的部份，他們對中國的內心態度，完全和國際上最反華的美日統治者站在一起。臺灣的中產階級處在自由主義和西方民主的意識形態統治下，他們把中國政府和解嚴前的國民黨的腐敗獨裁統治完全等同起來，因而不認同任何形式的“統一”。作為人數最多的下層民眾，他們在過去二十年中從未是我國領導人爭取的對象，他們中有很多人受族群法西斯主義和臺獨“民粹主義”宣傳的蒙蔽，更不理解“一國兩制”，在兩次台灣“總統大選”中，把選票投給李登輝和陳水扁。再來看不同的省籍族群。台灣的本省人被臺獨勢力宣傳為“中國外來政權”的受害者，在缺少有效的、針對性的言論回擊之下，

他們接受了這種宣傳，不認同祖國大陸，而近十年來，台灣的很多外省人也接受了這種宣傳，產生了“外來壓迫者”的罪責感，因此，為了解脫自己，在擁護臺獨時表現得比本省人更積極。

即使是在台灣認同統一的團體和派別中的右派或中間派，對我國領導人的具體對臺政策也非常不滿，他們親眼目睹這種政策在台灣的失敗。比如，具有統派觀點的《海快訊》評論到：“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一成不變表面上‘寄希望于台灣人民’實質上是更寄希望于國民黨上層與一些投機政客的對臺政策手段，即使不是完全破產，也已經是在此次台灣選舉中碰得頭破血流。”？（先後被鄧小平、江澤民接見過的李遠哲便是這樣一位投機政客）最後，台灣還有一小部分反帝、關心工農的進步團體，他們主張統一，反對台灣成為美日帝國主義圍堵中國大陸的工具。比如，台灣勞動黨的綱領這樣寫到：“有過光輝歷史的台灣人民革新運動，唯有在經由第一期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第二期追求新民主主義變革目標，到第三期國家統一、兩岸人民共同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歷史推演中，才能最終完成台灣人民革新運動長達一世紀的歷史任務。”然而，這又與我國領導人的“一國兩制”——“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相矛盾。由于二十年來從未對代表工農利益的統派予以支持，這部分勢力已經被嚴重削弱。

總之，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的兩大中心內容，即“一國兩制”的和平橄欖枝，與“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軍事威懾，對台灣島內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都沒有奏效：“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沒有得到台灣社會任何階層、任何團體的理解，沒有爭取到任何同盟和朋友，反而被國民黨統治者和臺獨勢力所看穿，被他們當成中國領導人不急于統一、沒信心、沒能力統一的證明；而“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的聲明，不但沒有威嚇住臺獨勢力，反而因此在民意戰上輸給臺獨政客，使他們的政治行情一再漲價，台灣民眾也沒有因為武力威脅而回心轉意，反而更加和祖國大陸離心離德，

使兩岸隔閡、誤解加深。

再來看二十年來為實現祖國統一創造了那些國際條件。二十多年前，祖國統一存在著極其有利的國際條件：中國在國際上是第三世界的道義領袖，我們的朋友遍天下。解放台灣、回歸社會主義祖國是“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一當時世界大潮流的題中應有之義。在當時，台灣是美國政府手中的麻煩，而不是中國政府手中的麻煩。這些，都是新中國建國以來獨立自主的革命外交政策的果實。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情況完全顛倒了過來，新中國的崇高外交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諂媚強權、嫌貧愛富、短見勢利的“實用主義”外交，在世界各地和台灣統治集團以金錢爭奪外交的結果，是到處被動挨打，隨時隨地都要擔驚受怕地提防台灣統治集團的銀彈外交、過境外交、昇旗外交，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在和西方政府的交往中，中國領導人更是處處被動挨打，台灣問題反而成了美國政府時刻敲詐中國的王牌。

最後一個基本事實是，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在統一問題上的思想、語言優勢喪失殆盡。二十多年以前，國民黨當局象害怕洪水猛獸一樣害怕台灣同胞接觸大陸的人民、書刊、思想，中國的社會變革、思想意識甚至影響到西方國家，轉而影響那裡的台灣留學生，造就了保釣、追求統一的進步一代。今天，情況也顛倒過來了：我國領導人不敢理直氣壯地為自己的社會制度作辯護，台灣政客在那裡假惺惺地聲稱“自由民主統一中國”，而我國領導人卻只能說：“只要在一箇中國原則下什麼都可以談”。其次，我國領導人對二十年來台灣社會的巨大變化茫然無知，對臺獨意識形態不去做調查研究，以想當然的方式去理解，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批判文章，隔靴搔痒，自說自話，通常批不到點子上。《海峽快訊》評論道：“（大陸）對臺單位競相出版豪華而又重覆但不知對象何在的對臺宣傳刊物，不斷接待反反覆覆都是相同的以鼓吹統一為業的政客、學者，一成不變地提出同樣的宣傳論調，以致相當多的台灣民眾感到反感。”

總之，二十年來，祖國統一的各方面工作，不是進步了，而是退步了，並且退到了一個面臨國土分裂的極其危險的地步。目前，有關對臺政策的爭論，絕大部分歸結于：是依靠“和平談判”，還是依靠“武力解決”這兩個選擇，或者說，是“主和派”與“主戰派”之爭。然而，這裡的看法是：把全部策略歸結為這兩個選擇，這件事本身，正是二十年來對臺政策失敗的高度寫照。本文的觀點，既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完全支持“主戰派”，而是從兩種觀點所都忽視了的角度看問題，從而認識到：“和”與“戰”，不過是問題的現象，而不是問題的本質，正如同解放戰爭中，北平和平解放，與天津經過戰鬥解放，一“戰”一“和”，儘管形式不同，而本質上是相同的。而二戰中蘇軍出兵東歐，與一九六八年蘇軍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儘管形式上都是戰，

而本質上則是相反的。本文所要做的，就是透過現象，研究本質。儘管對臺政策失敗的徵兆，是最近幾年才顯露出的，然而，本文下面的分析指出，失敗的深刻原因必須追究到二十年前開始的對臺政策的轉向。下面，分別就五十年來前三十年與後二十年統一台灣的策略、相關外交政策，以及思想宣傳戰略幾方面分析。

二、一國兩制：是解放人民，還是收回領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一九七八年制訂的憲法中規定：“台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僅僅四年後，在又一部新的憲法中，“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一句被刪掉了，變成了：“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變化是從一九七九年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和一九八一年葉劍英的《進一步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開始的。在這兩個文件中，“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這句有三十年曆史的口號消失了，代之以“台灣回歸祖國”、“和平統一”。

這個變化的實質是什麼？這就必須回顧一下新中國之所以要解決台灣問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出發點。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下一直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實現中國統一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現代民族國家，產生於戰爭與革命；它的邊界，更多情況下是被戰爭與革命所界定，而不完全是由自然的、歷史的、語言的和種族的因素所界定。這本是一個基本常識。因此，二十世紀中國的統一，並不是完全基於自然歷史傳承，而是和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分不開，因而也和中國革命中人民的空前解放分不開。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宣言》莊重宣告：“本軍作戰目的，迭經宣告中外，是爲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在今天，則是實現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內戰禍首蔣介石，組織民主聯合政府，借以達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總目標。”？後來，解放軍渡江南下、攻克每一省、每一片國土，都不是單純軍事意義上的攻城掠地，而是以解放那裡的人民爲主旨，其內容包括：聯合各被壓迫階級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懲辦戰犯、肅清貪官污吏、沒收官僚資本、廢除封建土地所有權、承認少數民族的平等自治權利等。這一宗旨見於解放戰爭的所有有關文件、命令之中，包括《國內和平協定》、《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等，並在全國各地執行。一個特殊的情形是：一九五一年爲了和平解放西藏，在有關協議中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

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儘管如此，新中國建國領袖的長遠目標仍然是著眼于最廣大的西藏群眾的利益，使他們能翻身解放。

對於台灣問題，新華社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就發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在後來的二十九年內，解決台灣問題，一直是以《國內和平協定》八條二十四款所規定的懲辦戰犯、廢除偽法統、沒收官僚資本、實行土地改革、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作為公開的準則的（無論是和平方式還是戰爭方式）。解放台灣，實際上和在中國大陸上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也緊密相關：必須消滅殘余敵軍、將人民公敵捉拿歸案、摧毀反動派反攻倒算的基地。要想將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解放台灣。只有在“告別革命”的情況下，才不需要以“解放台灣”，而僅僅是以領土回歸的形式統一祖國。

然而，一九七九年的《告台灣同胞書》正是這樣一種政策轉向。實現祖國統一的理由，不再是在中國全境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是訴諸于遠古的民族神話和歷史主義的民族認同：“如果我們還不儘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祖國的統一，我們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孫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願成爲民族的千古罪人？”

一九八一年葉劍英的《進一步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提出的九項條件，更闡明瞭沒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內容的“台灣回歸祖國”的圖景：

“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

台灣現行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同國外的經濟、文化關係不變。私人財產、房屋、土地、企業所有權、合法繼承權和外國投資不受侵犯。”

這兩條本身就包含著明顯的自相矛盾：首先，任何現行社會、經濟制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懂得辯証法的共產黨人更不應不了解這一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可以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可以和平演變成資本主義；一種制度會轉變到它的反面。這些變革都不是一紙協議、一道行政命令就能夠規定的。其次，頗有諷刺意味的是：葉劍英的講話，恰在台灣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發生後不久，國民黨當局的軍警憲兵剛剛殘酷鎮壓了紀念世界人權日的群眾集會。而取締、改編國民黨軍隊警察的法西斯體制，正是當時台灣黨外運動和民主運動的訴求之一。

葉劍英的九條方針不久有了一個正式的稱呼，這就是“一國兩制”。它的另一個高度概括的表述就是：“在一箇中國的前提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台灣的資本主

義制度，實行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井水不犯河水。”這個表述中的邏輯問題也不少，比如：台灣當局是否承認自己是“資本主義制度”？“中華民國憲法”和國民黨黨綱裡並沒有這一條。社會制度是由階級關係決定的，而現代民族國家就是主導階級（或階級聯盟）的最高意志的表現。那么，“一國兩制”中的“國家”，代表誰的最高意志？資本主義是一種世界體系。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裡，尚容不得與社會主義“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豈能容得在一個國家裡？

這裡，更關鍵的疑問在於：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區別，不僅僅是（甚至主要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別，而是分屬兩大國際陣營之別：中國屬於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陣營，這個陣營包括在戰後掙脫帝國主義世界統治的薄弱環節而獨立的亞非拉國家，而台灣則屬於戰後“美利堅帝國征服下的和平”秩序和新殖民主義國際冷戰體系內的一員。這才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兩制”的根本性質。在美國秩序軌道上和體系內的國家和地區，有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官僚買辦的社會，台灣更接近於後者。如果真要搞“一國兩制”，那就等於要在一箇中國內，包容下兩個互相對抗的國際體系：既包容美國所不能容忍的“共產主義制度”，又包容美國半個世紀以來爲了圍堵、絞殺“共產主義制度”而經營的反共、反民族解放的冷戰前哨，還讓它們“長期共存，共同發展，誰也不吃掉誰”！當然，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正在以迫不及待的速度“與國際接軌”，這個明顯的矛盾今後也許就不再成爲矛盾了。（不過，同在美國軌道上的中國，就不會是一個國家、也不會是兩個國家了，而是七個、八個或更多。）

容易看出，“一國兩制”並不是一個實質統一的方針，而是一個形式上一國兩制、實質上一中一臺的方針，或者說，是一個明統暗獨、隱性臺獨、實質臺獨的方針。這在台灣朝野政客眼中，是看得很清楚的。既然如此，他們就要追求貨真價實的臺獨，而爲什麼要退而求其次呢？在台灣普通民眾眼中，“一國兩制”也沒有任何吸引力，因爲如上所述，它不是一個解放人民、爲人民謀利益的綱領，而僅僅是一個維護版圖（而且僅僅是在形式上）、維護統治者面子的綱領。“一國兩制”的實施方式，明確表明是在統治者和統治者之間作交易，而沒有兩岸民眾的發言權利。

“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和“一國兩制”的本質區別，就在于：統一祖國的目的，是解放人民，還是僅僅完成領土回歸？這裡，有必要回答兩個可能的質疑：即“解放台灣”是一個極“左”的口號，會引起台灣同胞的反感，其次，台灣民眾大都過上了小康生活，根本不需要中國大陸去“解放”。回答是：“解放台灣”不是極“左”的

口號，而是一個實事求是、聯係群眾的戰略，它把統一的最終目的，落實到為人民謀利益的原則上來，解放台灣，不是要在台灣馬上推行社會主義，而是要在台灣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不僅不同于空洞的、極“左”的教條主義，更不同于那種本來已經偏離社會主義，但還要口頭上堅持“社會主義”旗號，而實際上大搞官僚資本主義、賣國主義的形“左”實右。我們繼續往下分析，就能看出：解放台灣立足于走群眾路線，而一國兩制寄希望于統治者、精英階層。而“台灣民眾不需要中國大陸去‘解放’”的觀點，顯然是和有關“台灣經濟奇跡”的大量宣傳，以及大陸八、九十年代學習台灣模式有關。這裡，且摘引一段曾參與台灣民主運動的夏潮聯誼會出版的《海峽》雜誌對“台灣奇跡”的分析：

“戰後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所謂‘經濟奇跡’，是‘（國府）國家機器—外來資本—民間企業’三方面的同盟，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吞吐系統下，經由對台灣的自然、生態、勞動者進行最肆無忌憚、最不知限制的剝削完成的。……台灣工人階級，為台灣的經濟繁榮，付出了這些重大代價：

- 一、長期僅僅足以維持工人自身和其家族最低生活所需的低工資和低生活水平。
- 二、普遍的‘無成就’、‘無前途’、‘貧困’、‘自卑’、‘社會地位卑微’意識，和急速經濟成長社會中‘成功’、‘立業’、‘幸福’、‘富裕’、‘舒適’標準，形成強烈的對比。
- 三、長期生活在人格不被尊重、人權沒有保障、勞動者缺少社會和生活保障、整個資本主義工業體系中缺乏工人福利觀念和支出的結構下。
- 四、工人階級沒有自己的文化生活，在知識和文化上無法進步，並任消費社會最低俗文化如色情、賭博、酗酒……長期摧殘。”？

由于對“四小龍”模式的吹捧和宣傳，人們忘記了：在台灣，即使在這些西方“自由世界”的宣傳櫥窗裡，也存在著一個受壓迫、受剝削、被邊緣化的廣大的下層，在資本主義蹂躪下、在全球化的衝擊下的勞苦階層、農村、婦女、少數民族，不但沒有奔小康，而是處于“發展”的“犧牲品”的地位，他們對現存體制和統治者滿懷仇恨和詛咒。其實這也是八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動力之一。只有放棄了階級分析的觀點，“解放”才成爲一個毫無意義的名詞。

一個國家對其領土行使完整的主權，意味著：將自己的治國理想、社會制度、文化精神的領導權建立在其領土之上。不提這些，就無資格談什麼統一。統一的關鍵，是需要完成一個社會革命的使命。這裡，絕不是在主張：統一祖國、解放台灣，意味著在臺灣推行社會主義。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綱領解放台灣，既不要求在大陸、也不

要求在臺灣馬上搞社會主義。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統治，這個任務，在今天的台灣，並沒有真正完成。 ☆
〔待續〕

〔《中國與世界》網頁地址：<http://www.chinabulletin.com>〕

【大陸來稿】

“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 的本質區別

李 強

近幾年，經濟學界一些人提出，賣國有企業只是由“實物形態”到“價值形態”的形態變化，不會對所有制產生影響。

但是五十年代的“贖買”政策，即把資本家的“實物形態”的工廠用貨幣或高額定息等方式的“價值形態”買下來，卻實現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說明，“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絕不僅僅只是形態變化那樣簡單。爲了更好地說明這個問題，下面，我們就談一下“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的本質區別，以及抹殺這種區別會帶來的巨大危害。

什麼是財富的“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呢？實物形態，一般是指以產品、機器(生產工具)、原料(自然資料)等物質形態爲存在形式的財富(西方經濟學認爲還包括人力資本，即勞動者、人)；價值形態，一般是指以貨幣(包括金、銀，在現代主要指紙幣)、股份爲存在形式的財富。

把價值形態看作實物形態的貨幣表現形式，兩者可以等值交換，這種認識包含著一定的真理，但停留在這個水平上，把賣國有企業說成僅僅是形態變化，就簡單化了，既膚淺又錯誤。

首先，價值形態是由實物形態創造、生產、派生出來的。不佔有實物形態。會在政治上陷於被動。

價值形態從哪裡來？大家知道，國家雖然能印貨幣(紙幣)，但不能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紙幣印多了，是要貶值的，通貨膨脹就是例子。在實際的經濟生產過程中，剩餘價值必須先通過產業資本生產出來，然後再在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中進行再分配。

因此，要佔有價值形態，必須靠實物形態生產出來。

如果由“實物形態”到“價值形態”只是形態變化，那麼，允許由“實物形態”到“價值形態”，也應該允許由“價值形態”到“實物形態”，就是說把賣國有企業得到的錢(“價值形態”)重新投入生產，即重新變成“實物形態”。但是，鼓吹由“實物形態”到“價值形態”只是形態區別的人還提出，國有經濟應從競爭性和贏利行業退出，搞所謂的“非國有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國家佔有的價值形態只能投入到利潤極低的基礎性生產領域和靠利息、買賣股票來獲利。

歷史上曾經有過“生產階級”與“非生產階級”的區分。由於剩餘價值是由產業資本生產出來的，因此，掌握了產業資本的資產階級把佔有土地(靠出租土地生活)的貴族和佔有資金(高利貸)的銀行家稱作“吸血鬼”、“寄生蟲”、“食利階級”、“對生產無用的階級”、“非生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都曾把靠紅利、剪息票生活的階級視為被排擠的過剩人口，從而斷言其必將最終被消滅。現代資產階級的一個著名人物——凱因斯在其改良主義方案中，也把坐受利息的食利者列為應予消滅的對象。因此，佔有“實物形態”的資產階級不但在道義上，而且也實際上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先進階級，那些只佔有“價值形態”的貴族、地主、高利貸者則會被掃出歷史舞台。

其次，只有佔有實物形態，才能在總量上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才能避免在經濟上處於受資產階級擺佈的依附地位。

從靜態上看，實物形態和價值形態是等價的，但在實際經濟中，它們以後的命運卻迥然不同。本來，“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都可用於投資，獲取平均利潤，使價值正常升值。但正像我們上面看到的，“非國有化”的主張，使國家佔有的價值形態只能投入到利潤極低的基礎性生產領域和靠利息、買賣股票未獲利。這樣，實物形態帶來的利潤要遠遠高於價值形態所帶來的利潤。

也許有人用現代電子、資訊等網路股的飛速發展來反駁我們，他們忘記了，人們對網路股的信心，其實只是對以網路股為代表的現代產業或未來產業有信心，更不必說，買下國有企業的私人老闆和外國老闆決不是傻瓜。

從現實賣國有企業的情況看，到底是不是等價出賣呢？賣出多少就上交國庫多少呢？賣國有企業得來的錢又用在哪裡呢？這些情況都不甚清楚，而且許多地方還是“半賣半送”、“明賣暗送”，以至於中央發出通知，嚴殺“賣國有企業風”。

其實，就算是全部等價出賣國有企業，由於鼓吹賣國有企業的人還主張，國有經濟從競爭性、盈利行業退出，國家佔有的價值形態的升值仍會遠遠低於實物形態的發展。更何況，國家掌握的很大一部分價值形態，要以工資、福利等形式用於消費性貨幣支出。長期這樣下去，國家掌握的價值形態只能轉入掌握實物形態的階級手中，公有經濟的主體地位無法保證，黨和政府就要像資產階級的黨和政府那樣，在經濟上處

於受資產階級擺佈的依附地位。

不僅如此，在實際經濟過程中，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也有很大不同。缺少價值形態，實物形態的生產雖然會受到影響，但仍然能夠維持和發展，而沒有足夠的實物形態作保證，價值形態就可能變成“泡沫”，其單獨調控市場和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極低。有人可能會問：“手中有錢，還怕買不到東西嗎？”歷史早已證明，在嚴重的政治、經濟關頭，私有經濟和外資經濟可以使手中的“實物形態”在生產、流通上全面停滯，導致市場混亂、貨幣貶值，從而威脅無產階級的執政地位。在解放初期，投機資本家利用手中掌握的實物形態，囤積居奇，企圖衝擊人民幣和市場，黨和政府之所以能夠打敗投機資本家，靠的不是價值形態，而是大米、棉花、布匹等實物形態。在當前，儘管我們出很高的價錢，美國等西方國家仍然不但嚴格限制向我國出售、轉讓軍事裝備和高技術，甚至把一些民用技術的商業性合作也同“國家安全”掛起鉤來。所謂的“考克斯報告”和“李文和案”，就很能說明問題。

目前，國際金融秩序非常混亂，各國的幣值、匯率極易受國際資本的衝擊和影響，亞洲金融危機已經給了我們深刻的警示。中國加入WTO後，金融業會更進一步開放，國際資本對中國金融的衝擊、影響會更大，在這種情況下，放棄實物形態，無異於授人以柄，自掘墳墓。

最後，是實物形態決定了實際的生產方式，從而決定了一個社會的基本制度。

一個人的階級成分、他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是由他在實際生產過程中與他人形成的生產關係、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所決定的，通俗一點講，就是在實際生產過程中，人對生產工具、原料的財產關係決定的。勞動者如果在使用生產工具、原料等進行生產時，還是生產工具和原料的主人，廠長(經理)和工人的區別只是工作性質的區別和職務不同，這種生產關係就是社會主義，工人就是主人；相反，如果勞動者只是被雇來打工的，生產工具和原料同他沒有關係，而是被廠長佔有，那麼，廠長和工人的區別就是雇傭和被雇傭、老闆和“打工仔”的關係，這種生產關係就是資本主義。

毋庸諱言，在公有制經濟中，由於腐敗和官僚現象的存在，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受到了嚴重的損害，但是只要正視這個問題，切實加以改進，那麼，工人的主人翁地位能夠保證。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無論犯了多麼嚴重的錯誤，總是有勇氣，更有能力糾正錯誤。

因此，財富從“實物形態”轉化為“價值形態”，絕不僅僅是形態變化，它還使得實物形態的生產方式發生變化。

一個社會，如果占主體地位的企業實行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這個社會就是社會主義社會。

一個社會，如果占主體地位的企業實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這個社會就是資本主

義社會。

用實物形態和價值形態互換的方式改變生產關係，進而改變社會的基本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曾經提出過設想，這一設想在新中國得以實現，這就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即“贖買”政策。

通過“贖買”政策，資本家雖然佔有了一大筆錢或拿到了很高的定息，但由於他們被排除在生產之外，工人對生產工具和原料的關係發生變化，結果，民族資本主義被和平改造，這些原來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就成了社會主義企業。

關於“贖買”政策，薄一波同志說：“陳雲同志所以主張定息辦法，他認為定息把企業生產關係推進到一個新的質點：此時的企業，嚴格說已不是公私合營企業，而是實際上的國營企業了。在這些企業裏，資本家不只是退出了生產領域，它所能夠得到的以定息形式表現出來的那一部分剩餘價值，也同原來的企業斷絕了關係，它的生產資料從此失去了作為職能資本的作用，於是，原來的企業一變而成為沒有資本家的企業了。”（《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薄一波著，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評價這一段歷史時也有定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曾經設想過的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

我們強調“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的本質區別，並不是說，任何的“實物形態”都不允許變成“價值形態”。一部分“實物形態”變成“價值形態”，和一部分“價值形態”變成“實物形態”，有利於資本運作，是一種正常的市場行爲。但是，抹殺“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的本質區別，刮“賣國有企業風”，搞什麼“賣光”、“送光”，企圖讓國有企業退出生產領域，並要求國有經濟退出競爭性和盈利行業，實行“非國有化”，那麼國家所能夠得到的“那一部分剩餘價值，也同原來的企業斷絕了關係”，國家的生產資料就會“從此失去了作為職能資本的作用”，這樣，企業的性質就起了根本變化。那種“鼓吹由‘實物形態’到‘價值形態’只是形態變化論”的性質也就起了根本變化，就在事實上把賣國有企業變成私有經濟對公有經濟的侵吞。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無論鼓吹由“實物形態”到“價值形態”只是形態變化的人，他們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如果聽任私有資本對公有經濟實行“反贖買”，結果只能是公有制經濟被私有經濟演化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去。★

（本文與大陸《當代思潮》雜誌2000年第二期同步刊載）

我們的美國左翼朋友 韓丁

金寶瑜

韓丁(William Hinton)是我認識的朋友中最有趣的一個人。他是一個知識份子，也曾經是作過工的工人和種過田的農民，他是一個農機專家，他寫過七本書和無數篇文章。你跟他聊天，他有講不完的有趣故事。但最重要的，韓丁是個革命者，在他這一生中，他跟右派堅決的、不妥協的鬥爭。

韓丁中學畢業後就靠自己在一隻船上打工周遊世界，也來到了遠東。一年後，他去哈佛讀大學。兩年後，他覺得哈佛象牙塔式的教育不適合他，就轉去康乃爾讀農機系。在韓丁成長的這段日子裡，他在尋找生命的意義。那時有好一些年輕人讀了斯諾(Edgar Snow)寫的《西遊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西遊漫記》是寫中國共產黨打解放戰爭的故事。韓丁讀了這本書感受很深，影響了他的一生。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聯合國送給中國一些農機，並招自願去中國工作的人員。韓丁應召來到中國。《鐵牛》(Iron Oxen)這本書就是寫他教中國年輕人如何使用和維修農機的故事。

韓丁從教農機到參加土地改革，就收集了他寫《翻身》(Fanshen)的材料。《翻身》是寫五十年代在中國山西省的一個叫張莊的村子中土地改革的故事。韓丁1953年回到美國時，正值麥卡錫反共的高潮，美國海關把《翻身》的筆記沒收了，韓丁上訴告美國海關，海關把他的筆記轉交給國會，韓丁又轉告美國國會。國會的參議院內部安全委員會(Senate Committee on Internal Security)叫韓丁去作證，說他叛國。最後，韓丁的官司打了八年，最後官司打勝，1958年韓丁拿回他的筆記開始寫《翻身》。

韓丁回到美國後，筆記被沒收，他沒法寫書，就到全美各地演講。他發現美國一般人很渴望知道中國革命後的情況，許多教會和民間團體都邀請他去演講。這時他被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跟蹤，但是FBI總是晚他一步，FBI跟蹤到了一個地方，他已經在前一天離開了。韓丁因為被列入黑名單，找工作很困難。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工廠，所拿工資不但要養家還要籌律師費打官司。

《翻身》於1966年出版，暢銷一時，影響很深遠。這本書被翻譯成德、法、日、義、西、中和孟加拉七種語言。是所有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必讀的書。《翻身》也被編寫成舞台劇，把中國農民參與土地改革的故事搬上舞台在美國和歐洲上演。

1971年韓丁又回到張莊，這次他作了張莊組織農村集體化過程的調查，回來後寫成《深翻》。《深翻》把一個村莊如何組織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的

經過，生動活潑的寫出來。《深翻》也把張莊的農民在集體化過程中所碰到的困難和問題，以及困難的克服和問題的解決作了報告和分析。

《深翻》是1983年出版的，那時鄧小平的改革剛開始不久，韓丁在《深翻》中提出劉少奇和鄧小平的路線是不是資本主義的路線的問題，他自己認為還不能確定。此後幾年，鄧小平的改革路線越來越清楚，韓丁在「每月評論」上連接寫了幾篇文章批評鄧小平的改革。這些文章在1990年集成《大倒退》(The Great Reversal) 出版。

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時，韓丁正在北京，他目睹一切。回到美國他各處演講和接受訪問，嚴厲批評中國政府用武力對人民的血腥鎮壓。

此後，《深翻》由張莊人翻譯成中文。1993年韓丁為中文版寫序，他對自己在《深翻》中有關路線分析的不清楚作自我批評。《深翻》的中文版還沒有能在中國出版。

韓丁今年雖然已經八十一歲，但是他從來沒有停止反右派的鬥爭。1996年他參加馬尼拉的反APEC大會和遊行，去年十一月他在西雅圖參加反WTO的大會和遊行。今年四月十六日，他還去華盛頓參加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遊行。

以下是韓丁寫的書：

- 1) Fanshen, A documentary O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published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 1966. Paperback by Random House 1967. Re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Ca. 1997
- 2) Iron Ox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 Paperback by Random House, 1970
- 3) Turning Point In China, An Essay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2 Paperbac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 4) Hundred Day Wa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singhua Universit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2. Paperback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 5) Chou Enlai: Conversations With Americans, US China Peoples Friendship Assocatio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 1973
- 6) Shenfan, 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 In China's Countryside,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82. Paperback by Random House..
- 7) The Great Reversal, The Privatization of China 1978-1989,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90. Paperback by Monthly Review Press.

韓丁來台演講活動：

日期	上午	下午	晚上
5/05 (五)	抵台、訪友		
5/06 (六)	訪友		
5/07 (日)		台北／演講：中國革命之探索：必要性、歷史成果與當代意義 台大第二活動中心地下一樓 A 演講廳 2:00—5:00 主辦：連結、左翼、苦勞網、新世代青年團、亞太勞動快訊 聯絡：洪家寧 0930759387	
5/08 (一)			
5/09 (二)	中部參訪（農業災區）		台中／演講：中國百年革命的勝利與倒退 7:00—9:00 東海大學綜合教學大樓 T525 教室 主辦：東海人間&台研、中興黑森林 聯絡：廖漢威 0922667433
5/10 (三)		台中／演講：WTO 與農業自由化（金寶瑜） 7:00—9:00 中興大學農環大樓植病系大三教室 主辦：中興黑森林 聯絡：佩君 0926229019	
5/11 (四)		台北／演講：規模生產與零碎農地——中國農業中追求生產力的鬥爭 7:00—9:30 世新大學世界大樓 W301 教室 主辦：世新大學社發所 聯絡：林正慧 0920572857	
5/12 (五)		台北／演講：規模耕作——小農的出路 3:00—5:00 中研院化學館前棟 A510 主辦：中研院生農所	
5/15 (一)	離台		

■所有活動開放自由參加！除5月7日（日）台大演講需場地費50元，其餘皆免費入場。

製表：林正慧

編輯報告

五一將屆，正值台灣「變天」之際，隨著國民黨的下台，國家對工會全面控制的時代已告結束，但面臨大資本家的躍上政治舞台以及全球化浪潮的襲捲而來，台灣的勞工運動無疑正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因此，我們決定以「工運再出發」為本期的主題，探討台灣工運今後何去何從。與這一議題有關的文章共有四篇：陳信行〈關於民進黨時代台灣工運的一些想法〉，對台灣勞工運動的特質做了宏觀的全面觀察。洪濤〈面對新政權、新形勢的台灣工運〉指出新形勢下工運所面臨的一些問題與挑戰。黃瑞明〈全勞總為何出走與台灣工運的前景〉，對台灣工會的性質做了深入的剖析，並據此探討全總分裂的原因及其對工運的影響。汪立峽〈反思台灣工運〉，是一位長期投身台灣工運的先行者對工運的回顧、檢討與展望。

左翼第四號曾刊載林深靖的〈三千原住民扯下一個大總統〉一文，探討本年年初厄瓜多原住民起義抗爭事件，未料該文卻在民進黨的〈新世代政論網〉的網站上遭到批判，於是引發左思的〈向右傾斜的單一與貧乏〉出籠，他質疑許多黨外時期具有批判與反思的運動者，已經出現向右傾斜的保守性。

上期刊出黃志龍的〈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一）〉，引起許多朋友的重視，台灣有人願意系統的介紹西方及日本左翼理論界對現代資本主義的討論，這實在是極為難得的事。這一期連載該文的第二部份。另一方面，臧汝興的〈韓國的社會結構體論爭〉連載，因為臧汝興目前正忙於五月的光州事件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籌備事宜，因此後續的文章尚未寄來。

蕭喜東〈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需要檢討〉是一位大陸旅美的左翼學者從左翼批判的角度探討中共過去對台政策所犯的錯誤。在台灣主流學術界還在高聲歌頌民營化的浪潮時，李強的〈實物形態與價值形態的本質區別〉卻指出中國大陸國營企業私有化出現種種問題。美國的左翼朋友韓丁將於五月初來訪，金寶瑜特別為文介紹韓丁的經歷，我們也將韓丁在台的各項活動公布於後，歡迎大家前來聆聽韓丁的演講。

作為台灣左翼朋友的一份同仁通訊，〈左翼〉已經以月刊的形式出刊六期了，目前〈左翼〉每期發行一千二百份，其中包括近二百份海外讀者。這樣一點小小的成績，我們是不滿意的，因為它離左翼隊伍的集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我們會繼續努力將〈左翼〉建設成交換運動經驗與理論心得的公共論壇，這需要靠所有左翼朋友的支持與參與。

左翼 第六號

出版日期：2000年4月30日

初版三刷：2001年3月20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七號

三刷



韓國光州抗爭二十週年

〈向道廳前進〉

作者:hong sung-tan

- | | | | |
|--------------------------|---------------|-----------------|---------|
| 【新政權初探】政治決策或宗教密碼？ | 林深靖 / 2 | | |
| 從一中一台到兩個中國 | 林書揚 / 6 | 馬克思也瘋狂 | 石之瑜 / 9 |
| 新政權的可能走向與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 伍艾蘭 / 12 | | |
| 破解李登輝主義 | 蔡建仁 / 14 | 從林義雄拒絕續任民進黨主席談起 | 左思 / 15 |
| 【光州抗爭二十週年】光州抗爭的啓示 | 臧汝興 / 18 | | |
| 1980年光州抗爭事件大事紀 | / 21 | 護衛良心權的鬥爭 | 鄒議 / 23 |
| 中華民國意識型態 | 孫善豪 / 26 | | |
| 尤哈尼要用「功利的箭」搶救原住民母語 | 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 29 | | |
| 【精要論文轉刊】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需要檢討〈二〉 | 蕭喜東 / 30 | | |
| 【特稿】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三〉 | 黃志龍 / 38 | | |

政治決策或宗教密碼？

—— 阿扁就職演說的另類觀察

林深靖

陳水扁520就職演說中的兩岸關係議題受到台灣媒體充分的頌揚與肯定，咸認已達到「讓美國滿意，讓中共找不到動武藉口」的目的。美國方面，國務卿阿布萊特認可阿扁的演說具有「建設性」(constructive)；波灣戰爭時期的參謀總長鮑威爾上將則認為阿扁表現了正面的(positive)方向，「兩岸關係有了新契機，或許美國可扮演更具助益的角色。」北京當局雖然不滿於演說內容充斥「美麗的空話」，卻也找不到興師問罪的理由，相對於之前的劍拔弩張，中共國台辦對於就職演說的回應讓新任陸委會主委蔡英文「感覺不壞」。蔡英文在李登輝時代是兩岸關係的幕後操刀者，如今追隨陳水扁躍上檯面。她曾窮索枯腸為李登輝的「兩國論」找尋學理依據，如今陳水扁在演說中宣示「不推動兩國論入憲」，她認為是個「好的開始」，並指出演說中提出「兩岸共同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是很好的提法，「讓大家都有一個想像空間」。

奧妙無窮，暗藏玄機

蔡英文所說的「想像空間」首先反映在台灣各媒體類似於作文比賽的解讀。光是演說中所表述的「兩岸共同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就有多種解析的版本。在中文裡，「一個中國」是否加引號即有爭議；而英文版本和日文版本似乎又隱藏了更多解讀的可能性。據說英文版本若復譯為中文，應是「共同來處理未來的『一個中國』的問題」，日文版本則是「未來共同處理『一個中國』的問題」……其中奧妙無窮，暗藏玄機。

這使我們想起，5月14日，陳水扁在參加佛誕節浴佛大會時，以「有佛法就有辦法」、「佛法是台灣派遣至北京最好的特使」等充滿「禪機」的語言來表達他對兩岸關係的期待。一時之間，台灣的大陸政策成為一系列需要語言學或宗教學去解析或悟道的「密碼」。1992年辜汪會談所達成的共識「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在2000年的今天，變成是「一個中國，隨意表述」，在這個過程中，「一個中國」，已被稀釋。

12年前，李登輝初任總統時，也曾經以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的聖經故事來暗喻自己的使命感。宗教有「出世、神秘」的特質，政治則講究「現世、務實」，兩者所管轄的是人類生活的不同領域。「政教合一」的社會因為當權者同時掌握政治決策與宗教密碼，通常是矇昧而專制的。歐洲啟蒙運動時代，「政教分離」是改革者最強烈

的訴求。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政治的「去宗教化」(laicisation)即是現代化國家的一個表徵。台灣社會有高度現代化的一面，但是求神問卜勘輿改運的迷信，卻是從巨賈到販夫，從權貴到走卒，一體風靡。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圍牆設計及其與總統府的對應關係，據說暗藏了無數的風水密碼；阿扁總統在台南的故鄉已成為最熱門的龍穴寶地；宋楚瑜總統選戰失利，因為其祖墳遭到惡意的破壞……台灣的政治人物逢廟必拜，逢轉折必算命求神通。這樣的政治生態，談不上是「政教合一」，卻多少是「人神共治」的局面。

信仰者掉下了眼淚

現代政治裡，宗教也可能以另一種方式呈現。譬如極端民族主義者即有宗教上基本教義派的特質，在其論述裡充滿將民族神化，將土地聖化的教義。政治教條以宗教信仰的方式擴散，個別的政治人物被神格化，成為萬民景從、一呼百諾的「彌賽亞」。政治語言的密碼化，有助於宗教質素的擴散。520就職演說中涉及兩岸關係的部分，固然提供了一窺陳水扁大陸政策堂奧的視點，這些文字由於戒慎而留下太多刻意雕琢的痕跡，有人從中找到善意，有人發現惡意，有人字斟句酌地探掘其言外之意。可是，更有人認為，阿扁真正的心思，其實是以密碼的形式，隱藏在四千五百字的講稿之中。

對於許多奉台灣獨立為基本教義的民進黨追隨者而言，阿扁的當選是救贖的開端，阿扁的就職演說因此具有宣示福音的性質。他們寧願相信，阿扁所表述的兩岸關係即使不符合追求台灣獨立的規格，也是權宜性的委屈求全。而從其他散落的章句中，他們找到了阿扁pass 過來的訊號。就職演說中，「兩千三百萬人民以無比堅定的意志，用愛弭平敵意、以希望克服威脅、用信心戰勝了恐懼……我們在舉世注目的焦點中，一起超越了恐懼、威脅和壓迫，勇敢的站起來！」這是對「勇敢的台灣人」的頌歌，勇敢的台灣人戰勝了蠻橫的「中國人」。緊接著，阿扁連續幾句激昂高亢的「台灣站起來」，將這一場政治彌撒帶向雲端天庭。演說結尾，阿扁高呼：「這一刻的光榮屬於全體人民，所有的恩典都要歸於台灣——我們永遠的母親。讓我們一起對土地感恩、向人民致敬。」神聖的福爾摩沙在這一時刻獲得了昇華。最後，在「台灣人民萬歲！」的口號聲中，信仰者掉下了眼淚。

就職演說中，阿扁自述行誼：「今天，阿扁以一個佃農之子、貧寒的出身，能夠在這一塊土地上奮鬥成長，歷經挫折與考驗，終於贏得人民的信賴，承擔起領導國家的重責大任。個人的成就如此卑微，但其中隱含的寓意卻彌足可貴。因為，每一位福爾摩沙的子民都和阿扁一樣，都是『台灣之子』。不論在多麼艱困的環境中，台灣都像至愛無私的母親，從不間斷的賜予我們機會，帶領我們實現美好的夢想。這種類似宗教證言與福音佈道的語言，我們就在就職演說後的電視廣告上找到立即的迴響：誠

泰銀行密集打出信用卡廣告，這種消費信用卡以「台灣之子」命名，鏡頭上是連串的貧寒家庭兒童，廣告告訴我們，只要以「台灣之子」刷卡消費，就可以支持那些窮人子弟，因為他們長大後，男的可能就是未來的總統阿扁，女的可能就是參與國政顧問團的企業女英豪殷琪。

緊接著，「最佳女主角」的塑身美容廣告打出如下口號：「阿扁實現台灣的夢想，最佳女主角完成女人的願望。」有人說，消費是當代社會最大的宗教，那麼，從總統就職演說到消費廣告，其中，究竟「隱含」了什麼樣的「寓意」？

信則有，不信則無

當然，自陳水扁當選以來，以阿扁為偶像符號的周邊產品即出現瘋狂熱賣的高潮。誠泰銀行與最佳女主角塑身企業只是搭乘總統的順風車。但是，阿扁透過語言與政治行銷所創造出來的「成功崇拜」與「偶像認同」的確讓這些廣告主抓到「賣點」。消費廣告與宗教有共通的特性：信則有，不信則無。「信上帝得永生」的宗教宣傳告訴我們：相信上帝是獲得永生的前提（而不是「議題」），同樣的，消費廣告告訴我們：購買是夢想得以實現的前提。宗教與邪教的區別是：後者更進一步告訴你：不信上帝就等著下地獄。消費廣告與強迫直銷的區別是：後者更進一步告訴你：不購買就是不義（譬如：同樣使用信用卡，為何不選擇造福貧寒子弟的「台灣之子」？）、不智（譬如：最佳女主角可以讓妳的身材向上提昇，為何妳要選擇向下沉淪？）

表現在政治行銷上，正面行銷是告訴你：選擇阿扁，我們的夢想得以實現。負面行銷則是：不投票給阿扁就是不愛台灣。

「台灣之子」是將阿扁與台灣迅速等同的有力符號。比起鄧小平生前自許為「中國的兒子」更為有力。就職演說中，阿扁強調他出身貧寒，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奮鬥成長，歷經挫折與考驗，終於成為國家領導人。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簡易邏輯：只要努力投入競爭，就是成功與邁向顛峰的保證，命運掌握在個人的手上。阿扁從佃農子弟變成國家元首，即是個人力爭上游獲得成功的典範：阿扁是台灣孕育出來的，是台灣共同的榮耀，因此，只要肯努力、爭第一，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像阿扁一樣，「實現美好的夢想」。阿扁沒有告訴我們，政治上的競爭比什麼都更為慘酷。「歷經挫折與考驗」的人難以計數，最後的成果卻集於一身。自1947年以來，反國民黨的抗爭造成多少家破人亡的慘劇，多少人在牢獄中虛度青春，這一切，阿扁讓我們忘記。就像誠泰銀行也不會告訴我們，那些讓他利用來刺激消費的貧寒子弟，有許多可能一輩子都沒有使用信用卡的機會，絕大部分的男生將在工廠裡出賣勞力養家糊口；女生都不像殷琪一樣有一個營造業大亨的老爸，也大概不會有機會到「最佳女主角」去雕塑自己的身材。

宗教充當社會控制代理人

台灣經由一次總統大選而出現了近五十年來最重大的政治變革，許多人都在質問，這樣的歷史性變局，除了統治階層換班（「換人換黨做做看！」）之外，對於被統治的從屬階級究竟有什麼深層的意義？英國學者肯尼斯·湯普森(Kenneth Thompson)在考察英國近代史時指出，英國自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這段歷史的最顯著特徵是重大的社會變革和激烈的意識型態鬥爭，但是終究沒有發展成推翻貴族統治的革命，主要是因為在這一段期間，宗教充當了社會控制的代理人。馬克思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大概就是居於這樣的觀察，宗教轉移並消除了工人階級潛在的革命衝動。宗教像是一種社會凝結劑，把不同的社會階級聯結在一套共同的信仰之上。宗教既使社會中上層階級的優越地位合法化，同時又安慰了下層社會階級（像鴉片一樣起著麻醉痛苦的作用）。

有人認為消費是新時代最深入人心的信仰（拜物教），也有人說台灣沒有什麼階級意識，只有族群意識。上述「宗教既可以為從屬階級提供不滿和抵抗的語言，也可以作為統治階級建立和維持其統治的工具」，如果將「宗教」一詞改為「消費」或「族群意識」，在現階段的台灣，同樣成立，也都同樣轉移並消除了社會變革的動力。陳水扁個人從卑賤的出身到至尊的高位，但是他的當選與窮人的翻身毫無關聯。我們看到他殷勤拜會各大財團掌門人，大力延攬企業主入閣或擔任資政、國策顧問。資本主義社會的金權政治特質（金錢即權力），從來沒有被這麼徹底執行過。新政府裡有這麼龐大的資本家集團，我們很難期待消費至上的資本主義邏輯在如是架構下能夠有絲毫反思的機會！此外，新政權的兩岸權責單位，幾乎完全接收舊政權「兩國論」操作和宣傳的班底，可見，從族群意識衍生的分裂主張，依然是政治運作和社會控制的主角。台灣解除戒嚴初期，工運曾經蓬勃一時，後來統獨議題滲入，工運即出現分裂、自我削弱，乃至消沉的困局。族群意識取代了階級意識，最大的獲利者是永遠獨占生產資料的大老闆，以及由大老闆暨其參養的政客所組成的統治集團。

台灣人民萬歲！台灣資本家萬萬歲！

★

緊緊握你的手

<第四期至第六期捐款名錄>

何彩瑛	1000	陳穎峰等	1100	楊渡	3000
邱華康	1000	曾淑靜	1000	魏貽敏	5000
陳威佑	8500	黃隆秀	1000		

計新台幣：21600元

從一中一台到兩個中國——拒統新佈局

林書揚

總統當選人陳水扁的5·20就職演說，不出多數人預料，還是以選民的心理效果為目的的一篇宣傳作品。洋洋灑灑萬言，究竟內容有多重，平日對社會上種種動態稍有留意稍有介入的人士，恐怕心裡有數。不過利用部份選民的某種歷史性的情節，和民眾生活意識中的某類渴求，以不足四成選票出線的陳水扁，從3·18當選到5·20就任的這一段期間，卻也把他的權謀長才發揮到盡致的境界，把五十年來第一次的「變天」衝擊先穩住下來。在5·20就職演講中，把萬方矚目的兩岸問題的一大焦點——一個中國原則，以四兩撥千斤的輕鬆身段擱置下來了。所謂「讓美國滿意，識國際肯定，讓大陸雖不滿意也沒有藉口」的一段文字長度不過十分之一，但因為事先多人的集體設計，對不少選民還是發生了相當的作用。根據一項民調，高達九成的民眾表示肯定云。換句話說，兩個月前支持陳氏的近四成選民之外，再吸收了當時不曾支持他的約六成民眾中的五成。這種成果委實非同小可。為什麼呢？當然不能全歸他的個人因素。在這裡我們不禁憶起了廿世紀初，資本帝國主義世紀在全球性的巨大的衝突浪潮中揭幕時，一位人民領袖說過的一句話：「歷史人物是歷史條件的公僕」。在看慣了各種名目的「秀」，不自覺地陷沒在「秀場文化」的醉人氣氛裡而不可自拔的部份民眾的心目中，阿扁不啻是「衝突的化解者」、「危機的處理者」、「台灣利益的護衛者」，甚至是「光明未來的締造者」。當然，也不乏有人在理智的思考下發現這些心理迷彩的背後有一定的社會構造性的因素，也有情報年代的技術性的操作效果。但不管怎麼說，阿扁動員了一批精英在戰略的被動中求取了戰術主動，而有了一時性的有限結果，卻是事實。

現在，讓我們來檢視它的主要內容。這一段兩岸問題的表述，顯然有意含蓄化內涵，多留下解讀者的想像空間，也預留講者的周旋空間。但用辭卻相當簡潔。所謂的五不（不宣佈獨立、不入憲兩國憲、不公投建國、不改國號、不廢除國統綱領國統會），以中共「無意」對台用武為前提。且一個中國非現在，而是有待於未來的兩岸共同「處理」的問題，不一定是共同「實現」的目標。再以感性十足的「台灣，我們永遠的母親」、「台灣人民萬歲」作為結尾，和開講的一句「台灣站起來了！」首尾相映！

以全段的基調而論，拒統不急獨，依據的是「不統便是獨」的政治現實。這種現

實，否定了逆說「不獨便是統」的可能性，正是前此數年來民進黨的主流勢力在轉型中所達成的戰略認知。在這次的演講中讓陳水扁發揮到極致。

回顧十年來，兩岸矛盾和朝野矛盾交錯互動的局勢影響下，及中美關係經六·四衝擊後的回穩，使部份民進黨人士逐漸產生了微妙的策略觀點的變化。民進黨初則擔心或有被國共妥協所出賣的可能（特別在93年兩岸新加坡會談時），繼而憂慮中美關係定著化後建國目標終歸渺茫。直到96年導彈演習事件，在日漸濃重的台海危機壓力下，早期該黨追求的一中一台，頓時變成了地雷區，而兩個中國則尚非立即的落彈地帶。陳水扁的5·20任務，只是正式地宣示從一中一台推到兩個中國的新佈局。也就是，把對岸的「反獨促統」一分為兩半，以「五不」有條件接受前半，對後半段「促統」則以原則議題化的手法迂迴過去，形式上還不算完全的拒絕。如果前述的5·20後民調的高支持率是真，那也不過藉著「五不」來釋放大量的對抗張力，大大鬆懈緊迫感的結果。同時也反映出台灣多數選民對分離問題的可慮的、漫然的認識態度。阿扁一班人，不過是群眾心理的搭便者，哪裡有真正的指導性？一時性的戰術空間究竟有多大，5·20過後這種建立在逃避心理、依賴心理、自慰心態上面的群眾的形勢觀，還能支撐有限的戰術空間到所謂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嗎？

爲了政權的順利轉移，陳氏一班人所作的努力及一定的作業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如果往深層一點去看，我們將發現除了以陳水扁爲中心的勢力圈和其他的實力派系之間在策略層次上的互動運作外，更深的意義在於一種社會規律的歷史性展現，有幸讓我們親睹究竟，大大地增加了我們對史觀·社會觀的領會，說來亦屬難得。

蓋以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自覺意識爲主要心理背景的台灣分離主義運動，在近廿年的鬥爭歷程中的確表現出核心部份的階級運動性質。也就是，戰後型殖民地資本主義在一定的地緣、歷史條件下，在內戰和冷戰的間隙中完成了定性發展後，在台灣社會突顯出來的問題是政治威權體制和功能性民間力量之間的衝突。而一段政權攻防戰，雖然也鍛鍊了民進黨的相對的革新性格，但也因爲90年代起分離運動的對抗體由國民黨移向台海彼岸的社會主義大陸，民進黨的黨性必然地轉向反動化保守化。也就是說，民進黨以兩千年的「總統」大選爲分水嶺，前段階級運動中所具備的相對進步性，很諷刺地以勝選爲轉機而變成了抵制中國未完成的反帝民族解放的阻礙力量了。

回憶89年第一次的解嚴後選舉中，民進黨獲得了廿一席立委，六席縣長；90年10月再度通過台灣主權獨立論；91年動員戡亂時期與臨時條款的結束和所謂萬年國

會全員退職；92年刑法一百條的修改等等，民進黨曾經投入甚至主導了政治體制合理化現代化的歷程。

直到這個時期，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階級運動尚具有正面的政改功能。但不可忽視的是，民進黨自詡的民主改革運動，是以起自 90 年的李登輝本土化路線為不可缺的協作要件的。到了 93 年的兩岸新加坡會議，警惕於國共新合作的民進黨，加強了民粹路線頻頻進出街頭，中正機場出現過「台灣國旗」，總統府廣場也湧現出「台灣共和國公民團」。至 95 年李登輝訪美，96 年大陸導彈演習，大陸方面日增的反獨壓力下，民進黨的急獨被迫緩獨化，和國民黨國統綱領的緩統立場日漸靠近。99 年李登輝的兩國論取得民進黨的全力奧援，誇說擁有七成民意背景。到了兩千年「總統」大選，兩黨雖然展開了熾烈的政權爭奪戰，但在兩岸問題上卻共同構成了以拒統不急獨，戒獨不急統為兩端的最大多數的「現狀維持派」民意。

根據以上的背景認識，自 3·18 到 5·20，我們看到的是共同承擔台灣資本主義經濟體的兩個政治勢力的，非以個人主觀為依歸的新組合。目的在於共同抗拒與具有社會主義基礎結構的對岸大陸的復合統一。在兩岸懸案的回應對策的成型過程中，曾經一度推動過政治現代化的階級運動，終於在其本質立場的制約下質變了。今天所剩於新政權者不過一個反動政權的欺人口號——自由、民主、人權。而如果陳水扁有意用它來構築一種精神障地，以圖抗拒現行文明法中的主權原理，即也枉然。鑑於戰後世界中類似性質的紛爭已見多起，而國際社會中的主權原則至今還是不變的共同準繩。主權原則直接關係到國家的存立，而民主則屬於國家內部體制的完善目標。層次不同不可混淆。國家無以立，哪來國民的民主權利？阿扁的用意恐怕只會帶來反效果，應予三思。對岸的最近一份白皮書，明顯的是對「拒統不急獨」、「非獨不急統」的意圖性拖延的鄭重警告。也是對美國霸權保護下的「不統即獨」的攻堅決心的表示。阿扁的「戰術空間」正承受著沖擊。

最後，一個時代的階級運動有前進性的，也有逆向性的。階級利益在一定歷史時空條件下能否昇華到合乎整體社會發展的大方向，是它的正當性的唯一標準。也是最後決定該階級的歷史性存亡命運的唯一標準。★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gcn.net.tw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馬克思也瘋狂

——全球資產階級在兩岸之間的誤解與無解

石之瑜

在陳水扁總統的宣誓就職聲中，新政權開啓了台灣政治的另一頁。從政黨政治的角度來看，反對黨不留血就能取得政權，可以說是一次光榮革命。從階級政治的角度來看，自由業與中小企業等小資產階級爲主要支持者的民進黨，戰勝了久經民間大資本家、國家資本與財團所侵蝕的國民黨。從地域政治的角度來看，受分離主義圍繞的本土政治結合，取代了與大陸中國藕斷絲連的移民政權。從世代政治的角度來看，中生代接班梯隊推開了內戰與殖民時代的一輩領導人。不管你是誰，似乎都可以找到理由讓自己覺得耳目一新。

但是，對於全球資產階級而言，台灣改朝換代最大的欣喜，恐怕不會是來自前述的任何一種理由，而在於這一次選舉並沒有對於台灣在世界上的因素、服務、消費等市場中的角色，產生任何有意義的衝擊。起碼在短期中，民進黨執政的震撼遠遠小於九二一大地震。的確，儘管民進黨不是革命黨，但卻和任何突然登台的革命黨一樣謹慎，在所有方面都表現出願意接續舊政府的政策，在經濟政策方面好像尤其如此。引起爭議的問題如核能電廠的興廢、老人津貼的發放，最多只是掀起了台灣小茶壺裡的短暫風暴，影響不到台灣商賈穿梭協調亞太地區市場，整合資本、技術、人力、銷售、產權的關係結構。外商所看中台灣的各個方方面面均能維持平穩，與前述帶有歷史顯著性的政治變化，形成雖然是沉默的，但卻也發人深省的對比。

當然，這個溫和的姿態並不見得能取信於所有人，從分離主義勢力佔領幾乎所有文化相關部門，包括文建會、青輔會、新聞局、國科會、故宮、國史館等，就可以了解，新政府有意識地要在人們思慮尚未構著的上層結構，全力使勁。選後短短數月之中，中共官方集全力向新總統施壓，寄望他的兩岸政策上能回到一個中國的立場上，無瑕顧及新政府人事布局的意義。事實上，陳總統選擇唐飛爲閣揆之舉顯示，他也是以在兩岸問題上表達穩健爲首先要著，等到局勢稍微平穩，華盛頓方面表達肯定之意後，才開始安排分離主義盟友進入體制的。不過，就從大陸各界對陳水扁的疑懼出發，也可以想到彼岸對於新閣人事與政策，遲早會產生警惕之心。故對台灣文化領域已然全面失守，難免將感到焦慮不堪。由此而鋪陳的兩岸衝突總趨勢，恰恰是全球資產階級所體會不到的。

了解亞太地區外商文化的人大概多少聽說過，政治風險評估是此間跨國資產階級最弱的一環。在兩國論發生之後，兩岸之間風雲詭譎，但當時台灣所能蒐集到有關政治風險評估的報告數目是零，唯一有提及兩國論的是一篇來自香港的風險評估，但也儘止於提及而已。新政府上台之後，來台從事理解分析的政治風險專家鳳毛稜角，少數人加入了絡繹於途的二軌團體，可是因為缺乏背景知識，仍然限於道聽途說罷了。他們或許勤記筆記，可惜沒有什麼基礎來判斷或整合紛雜的資訊。那些在台灣國際部門討生計的人，絕無可能提供台灣政治風險的負面資訊。一方面，他們基於自己心理安定的需要，篩選掉了自己都不想聽到的風險資訊；二方面，政府有意識地傳達不確實的情報，引導人們低估風險，以求維繫人心；三方面，即使感覺風險將至的人，也會設法留住外商，但求藉外商為擋箭牌，並在風險真的發生之前，儘量摳食可以剝落的資源。

外商之所以對於台灣風險評估顯得忽略，固然有風險評估界的結構問題在作祟，多少也是因為他們高度評價全球資產階級的霸權勢力所致。這個勢力的檯面人物就是白宮的首腦，在他的背後，還有因為大陸表現的文化風格迥異於自由主義與基督教，從而極度不安的帝國主義知識圈。世代以來，這個知識圈培養資產階級所需的高級管理人才，也靠著資產階級捐獻的基金維持生存。知識圈最大的困擾與辯論在於，到底中國大陸是一個能夠透過市場交流，並藉由加入世界資本主義產權體制，而進化成自由主義的正常社會，故應當給予時間，創造條件，以便即早迎接那一天來到呢？還是一個受到東方魔咒捆綁，但其國力有可能依附於資本市場，以神秘怪誕的方式蒸蒸日上的黃色禍源，故應當即早扼殺解構以免為害人間呢？這個辯論迄今制約著白宮與國會山莊在兩岸問題上的分合。

不過走出了政治，在全球資產階級中，這一類的辯論相當程度地遭到邊緣化，揆諸亞太地區的母國派出經理階層的態度，看出此輩對兩岸關係普遍樂觀，因為即使北京看輕或低估了白宮的介入與保護傾向，但他們相信，北京領導人今天已經騎虎難下，故不得不計算全球資產階級所可以提供的資源，以及必要時所可以加諸的懲處。他們的證據是，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過程中規矩有節，而台灣的新總統又表現得無意破壞局面，故自己沒有什麼好理由脫離經濟的基本面來看待問題。華盛頓的連番警告，外加白宮人物再三釋放緩和的訊息，讓他們的資本家與學者擁躉，都想不出除了瘋狂與誤會兩種原因外，台灣政局丕變會有什麼負面含義？

所謂瘋狂，就是拒絕計算成本效益，所謂誤會，就是算錯了。以台灣加入世界資本市場時間之久、獲利之深，實難想像台灣會瘋狂；以大陸改革開放帶來變化之鉅

大，人民生活改善之迅速，更難相信人們願意接受這一切可以歸零重來。所以剩下的問題，就是不要讓雙方發生誤判。在這一點上，既然台北新政府屢晤歐美訪客，都能表現卑躬屈膝，確實已經讓世界資產階級感到風險評估之沒有必要。搞定了台北，那還需要憂心北京嗎？而北京在選後多次或透過媒體，或由官員現身說法，不斷警告台北不要造次，不就是從反面證明了，北京其實不想訴諸武力，才會希望儘量把自己的底線交代清楚嗎？陳水扁對於全球資產階級在選後繼續投資台北，給予台灣投資環境極高評價，與台北資本市場與外匯市場大體穩定，多次公開表達自己極度寬心。看來，他想要證明的事情，與前任李登輝總統想要證明的事情是一樣的——安啦！穩健的、間接的分離主義不會為台海帶來戰禍。

換言之，在南轅北轍的動機中，全球資產階級竟與台灣新政府得到了相同的樂觀結論，且他們同時都受到台灣中間階級的極大信賴。只有走出資產階級的視野，才可以看到台灣新領導人的角度不全屬於資產階級的，雖然受到資本主義體制的制約殆無疑義，但又不能不看到新政府與支持者對資產階級的效忠是模稜兩可的，因為他們身上背負著封建意識的隔代遺傳，猶在台灣內部鼓吹以地域割據為核心的共同體式的思惟，這個思惟號召極廣，甚至連台灣的大資本家在跨海投資的同時，都不得不復頌這個邏輯。少數人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但感到疑惑不解，以為新政府其實是在借題發揮，以取得較好的談判地位，但他們心中並不真正執著於分離主義的訴求。這就看出資產階級的盲點不是技術性的，而是階級的。因為他們察覺不到，台灣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混淆，而其政治上的同路人更醉心於分離主義這種封建價值；反倒是在台灣繼承封建意識的隔代遺傳勢力，清清楚楚地看到全球資產階級的天真，有意識地對之討好、利用。

可見，台灣這種受封建意識制約的資本主義具有論述上的顛覆性、優越性。但也正是這種優越性欺騙了全球資產階級，使得台灣所面臨的莫大危險遭到遮蔽，而這個遮蔽又幫助台灣的新政府自我欺騙，以為台灣可以在政治大變化與生產關係不變的條件下自我維繫。結果將是，只要大陸不能接受這個政治的大變化，從而嚴重撞擊到既有的生產關係，這時，會因為台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遭到破壞，封建意識遭到揭露，以致於全球資產階級對台灣的支持，也將隨之煙消雲散。因此，關鍵將在於大陸能不能接受台灣那個分離主義意識濃烈的半資產、封建階級。眾所週知，封建意識在大陸的隔代遺傳較之台灣猶烈，全球資產階級中有多少成分會在兩岸封建階級的火拼中甘願介入呢？如果他們真的介入的話，則全球資產階級無異於自我背叛，那恐怕馬克思也要轉世觀戰。

新政權的可能走向 與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伍艾蘭

一、前言

以中產階級代理人自居的民進黨陳水扁，在當選總統後，積極地拉攏台灣大資本產階級，陳水扁政權未上任便迫不及待地傾向大資產階級，是值得台灣社運工作者，特別是左翼運動者，認真去思考。

在探討因應之道之前，有必要對陳水扁政權的可能走向作更深入的分析。

二、反核四廠事件剖析

陳水扁政權之右傾化，除了他本人從當選後即積極向許多大資本家「拜訪」、「請益」外，亦可從其主要挑選的內閣團隊的初期言行窺其一二。

最明顯的是核四廠興建的問題。陳水扁與民進黨，以及新任環保署長林俊義一向都強烈反對興建核四。但一旦當選之後，態度便馬上起了微妙變化，敏感的反核四運動者不斷地質疑，並訴諸街頭示威。但成效不大。新政權目前一再聲稱要重新進行環保評估。眾所週知，這種訴諸所謂專家評估的結果，其報告必然充滿一大堆望之儼然的統計數字與權威論述。群眾如有質疑者，必然被扣以「不專業、不科學、不理性」的大帽子。過去國民黨政權及古今中外，許多反動政權在對付人們抗議時，不都是採用這個手法嗎？

林俊義的說詞更露骨了。他說以前反核四是反獨裁。現在陳水扁政權當然不獨裁了，所以不必再反核四。當然，這只是他說漏了嘴。他的標準答案還是「重作環保評估」，以示他並未反「反核四」。

台電不斷地強調，如果不蓋核四，未來電力必然不足。這話當然不錯，但台電絕不會探討未來電力不足的原因何在。今日台灣電力並無不足，所以未來電力的巨量不足（不只是輕微的不足，因此才需蓋大功率的核四），顯然是有一些大型耗能的工廠正在興建中，包括六輕、七輕、濱南工業區的大鋼廠，等等。陳水扁政權如果對於過去反核四的立場有起碼的尊重，至少要先評估發展這些高耗能工業的必要性。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陳水扁政權絲毫不曾動念頭去重新評估高耗能工業的必要性，反過來逕行要求對核四重新進行環保評估，其潛意識的傾向非常明確，耗能工業的發展「著庸毋議」，核四勢在必行。因此工作的重點在於透過重作「專業」環境評估，向反核四的人交待。由於反核四群眾本來都是民進黨支持者，故對核四問題的處理重心已不

再是核四該不該反的問題，而是如何安撫那些仍執著於原有反核四理念的舊支持者。

從反核四到反反核四，陳水扁政權的抉擇是很清楚的，大資產階級的要求是最優先要尊重的。面對矛盾的局面，取捨已很清楚，不再是用心去堅持過去的理念，而是想法避免失去支持者。

落一葉而知秋。核四案不過是提早曝露的一個矛盾問題。我們可以預料在其他方面仍有類似的情況。如果事件不會與資產階級的利益相矛盾，陳水扁政權可以繼續大聲地支持社運者的要求，以穩住他的支持選民；但一旦矛盾發生，其抉擇將很清楚，這類問題將包括勞工工時縮短，美濃水庫興建，等等。

三、社運人士的麻木

面對陳水扁政權的這種傾向與選擇，台灣的社運人士恐怕都還不夠警覺，即便有些事件，如核四興建，已浮在檯面上。

缺乏警覺的根源，是需要仔細分析。首先是許多社運人士長期依附於民進黨。對於民進黨掌權之後的可能走向，他們不易產生如往日對國民黨政權那般的抗爭意識。他們或是壓根兒不往這方面思考，或是以「要給新政權一個機會」等等藉口來為自己微感到的不安交待，或是如前述林俊義的態度，認為社運的目的在於「奪取政權」或「台獨建國」，不宜旁生枝節擾亂了這個基本目的。

還有一個較個人但卻影響深遠的原因：許多過去社運人士現在紛紛以各種方式參加這個新政權。他們從過去在野的理念追求者轉化成在朝的準既得利益者。為了掩飾他們這種理念上的倒戈，他們會積極地倒打仍然堅持理念者一把。《左翼》第六期左思先生所作〈向右傾斜的單一與貧乏〉，正凸顯出這批新貴們倒戈之後倒打社運人士一把的情況。

由於這批新貴們過去多少沾了一點社運的邊，與社運人士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又多能搬弄一點馬克思的詞彙，具有相當的迷惑作用。特別值得社運人士的警惕。

四、左翼人士的時代使命

隱藏在社運人士缺乏警覺的背後，是社運人士缺乏對事件進行深刻分析的習慣與能力。台灣的社運長期以來過份任務取向、工作取向。對於社運的根本目的討論不足。這就讓一些志不在社運而別有個人政治企圖者以混入社運隊伍的機會。一旦政治的企圖達到了，他們就棄社運而去。尤有甚者，由於他們混過社運，深知社運的潛力與弱點，一旦他們倒戈，將更有能力來破壞社運。

以批判現存不合理體制及推動社會改造為宗旨的左翼人士，在這個新政權變遷，社運人士陷於麻木之際，應當積極進行深刻的分析與批判。這是左翼人士的時代使命。

破解李登輝主義

蔡建仁

李登輝的權位已去，但是李登輝的勢力不可小覷，因為他比蔣家父子更成功地置台灣於反共反華的最前緣，不容島國迴身。

論者輒以埃及沙達特之於納瑟來比喻李登輝的寧靜革命，這是著眼於變革的一面，也就是盯住統獨的糾葛，在外來政權與台灣人之間打轉，殊不知，蔣李深忌中共之情相繩相繼，並且李氏尤甚於兩蔣，這不只是多了一重對中國人的不屑心理，更重要的是，李氏擁抱資本主義體制遠較蔣家父子徹底而自覺，他不像老蔣回頭召喚中華文化之亡靈來對抗共匪，也拒絕小蔣愛搞禁慾苦行來彰顯己能，在李，則以身示範了個性凸顯、愛憎分明的個人主義方法論，這一點，充分桴應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渴欲，有效地拉開了台灣海峽的距離，而不僅僅是動員台灣人意識而已。正因為推出完整一套的意識型態，深植於現實性而非本土性，所以令外省人淪為無可奈何的俘虜而不叛逃，也因此，陳水扁在總統就職演說大力鋪陳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國政方針，無異是預告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主義。

質言之，這一套李登輝主義是土、右雜用，而以右為主，堅定不移地靠右走，土則不能持續走下去，此因島內總有中國結死纏活賴，不能斬斷，也不需斬斷，好作為激化台灣民族主義的活酵母，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如今台灣人統治台灣人，只怕這個全稱命題不日瓦解，階級破繭而出，更需要右的意識型態來彌縫。

問題是，這一套右派無敵、治台兼反華的設想有一個致命傷，那就是，比右，北京不遑多讓，市場之發育頗有後來居上之勢，正對台灣形成大包抄，現在台北當局，唯一自認得計的是，大陸不可能搞民主政治，所以對新、舊台灣人都沒有吸引力，這種估計未免失諸天真，勞苦大眾的相對剝奪感一旦超出臨界線，民主即成芻狗，第三世界的民主化歷來多有復辟現象，豈是偶然！

今天，沒有李登輝的李登輝主義正式登場了，其土色已呈捉襟見肘之窘態，不過是日益暴露右的本質。我們進步份子要予以迎頭痛擊，完全犯不著陷溺在兩岸關係的口水裡，那就是，把他們佯土實右的路線來個顛倒幹，真心耕耘基層，把土深深挖下去，即可會通左的地脈，在這裡，我們只問階級，不問民族與種性，只有階級的聯合與對抗，不存在國族的統一或獨立，也就是說，一個亟求解放的新台灣自然要離異反向演變的中國大陸，不受同文同種所牽制，反之，面對人民力量澎湃洶湧的菲律賓則應優先連結，非為所謂南島文化故。要之，以左兼治內外，從本土的草根做起，一以貫之，粉碎李登輝們對內蒙蔽，對外挑撥的統治伎倆，這是當前台灣左翼的時代任務。

★

從林義雄拒絕續任民進黨主席談起

向右傾斜的單一與貧乏（之二）

左思

林義雄帶領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後，堅拒續任民進黨黨主席，在眾人紛紛擾擾上台之際，他瀟灑灑灑下台，並在離職記者會上吟詩以明志：「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而我 / 我選擇了較少人跡的一條 / 使得一切多麼地不同。」（註）像美國詩人羅勃·佛洛斯特一樣，他決定做一個「孤獨的旅人」。

民進黨大老不敵新政府的老大

執政是十分風光熱鬧的，雞犬既可以因此升天，神仙也可以因此下凡。政治，在執政前可以是理想事業，執政之後就是每天都要面對的榮華與現實。或者，簡而言之：榮華使人趨於現實。林義雄做為美麗島世代的元老，做為台灣反對運動受難的圖騰，在養尊處優的後生晚輩奪取數十年抗爭成果，個個分別佔領權力戰略高位之後，他選擇做一個孤獨的旅人，「極目眺望一條路的盡頭，看它隱沒在林叢深處。」

究竟這一條「隱沒在林叢深處」的，是一條什麼樣的路？何處是它的「盡頭」？

綜觀自3月18日確定陳水扁贏得總統大選以來，林義雄即面臨民進黨執政後理想與現實交戰的兩大難題：一、台獨黨綱廢不廢？二、核能四廠蓋不蓋？

台獨主張與反對核四都明列於民進黨黨綱。民進黨的基本綱領明文主張「依照台灣主權現實獨立建國，制定新憲，使法政體系符合台灣社會現實，並依據國際法之原則重返國際社會。」關於核四案，黨綱也規定「反對新設核能發電機組，積極開發替代能源，限期關閉現有核電廠。」

民進黨經過大選取得執政地位，但是，陳水扁執政後所組織的新政府卻顯然與民進黨的基本綱領背道而馳。做為民進黨主席，林義雄的難堪可想而知。他畢生為爭取台灣主權而奮鬥犧牲，曾經為了反對興建核四而千里苦行，民進黨執政後，反而對這兩大議題抱持極端曖昧的態度。林義雄因此說了重話：「新政府裡誰不願遵守黨綱，就請誰走路！」重話引來重炮還擊，民進黨最後神主牌竟成為眾矢之的。民進黨大老不敵新政府的老大。林義雄既然無法叫人走路，只好自己走路！

有偏左的意識型態？

更讓林義雄難堪的是：在他透露倦勤的意思之後，執政黨國會黨團竟然是由立委李文忠代表出面慰留！任誰都知道，李文忠不僅主張廢除台獨和反核四這兩大綱領，更進一步主張民進黨黨綱全部廢除。根據《自由時報》5月8日的報導，李文忠

表示：「民進黨黨綱雖具高度理想性，但部分條文有偏左的意識型態，而且條文繁瑣，不合時宜」，他主張「黨綱應全部廢除。」

何謂「不合時宜」？李文忠認為反核四即是「不合時宜」的例子。他說，民進黨過去堅持反核四，「但隨著時代的演變應會有不同的作法……黨綱必須『與時俱進』。」反核四既然不合時宜，一個繼續堅持反核四的黨主席，當然就是「不合時宜」的黨主席。

至於所謂黨綱「條文繁瑣」，可能言過其實了！民進黨黨綱多是宣示性的性質，條文不多，言簡意賅，要說這樣的黨綱是「條文繁瑣」，並且成為「全部廢除」的理由之一，那麼，我們早該把《六法全書》通通丟進垃圾桶！何況民進黨內部法學人才濟濟，從總統、副總統到黨主席，全部是律師出身，要修改條文又有何難處？林義雄曾提議召開臨時大會修改黨綱，卻也被李文忠這位民進黨國會黨團的高幹一口否決了，他說：「民進黨不可能爲了黨綱這個抽象的東西而召開臨時大會！」

李文忠要全部廢除黨綱的另一個理由是「部分條文有偏左的意識型態」，這倒是一個有趣的觀點，值得好好探究！民進黨黨綱明文規定「積極創造民間投資環境，保障私有財產」，「增進企業的獲利機會，確保經濟的穩定成長」，「公營事業開放民營」……這些都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基本法則，哪來「偏左的意識型態」？翻遍黨綱，稍微具有「左」味的，不外是「建立公平安定的社會體系」和「公營事業建立生產民主制」兩個條文。

「建立公平安定的社會體系」的條文寫道：大家能公平分配社會成果，共享社會資源，不再有社會剝削，不再有違反人性的勞動條件，也都能夠在連帶的精神和有意義的勞動環境下，謀求自我發展，人與自然環境，人與人之間的自我願望和慾望，都能相互調適，不受外力壓制。

「公營事業建立生產民主制」的條文寫道：「工作」不應該僅僅滿足個人的生存需要，更應該滿足人類團結共進、實現自我潛能的需要，必須調整生產邏輯，而以「合作共享」作為生產的目的。因此，必須推行由勞、資雙方即社區代表共同參與決策的「生產民主制」，是未來實現民主社會的方向。

在民進黨黨綱裡，這是最進步的兩個條文，也最能夠與歐洲先進國家社會制度發展的方向接軌。然而，在李文忠看來，這大概就是所謂「偏左的意識型態」，是繁瑣，不合時宜。這兩個條文強調照顧經濟弱勢，爲勞動者爭取權利，唯一會覺得刺眼的，大概就是財團資本家。

與社會主義思想有共鳴？

大家都知道，318總統大選，陳水扁能夠險勝宋楚瑜，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在最後關頭跳出來挺扁是重大關鍵。然而，李遠哲在投票前接受採訪，陳述他決定支持阿

扁的原因：「在臺灣民主運動發展過程中，民進黨中的很多人，是與社會主義思想有共鳴的人，如果兩岸和談，中共與民進黨可能找到更多共同點，民進黨更適合與共產黨談判。」（見《聯合晚報》2000年3月16日頭版）

然而，李遠哲所了解的民進黨，在阿扁獲勝當權後，可能完全不存在。阿扁勝選後，我們未見他對工人、農民等經濟弱勢者的處境置一詞，卻只看見他花蝴蝶一般地穿梭於各大企業財團大老闆之間，鞠躬哈腰，伴酒陪笑，所謂社會主義思想大概只有在輕薄中共時，才會偶爾提及。如今，黨綱中唯一進步的、「偏左」的條文，又逃不過國會新貴李文忠的法眼，必欲全面拔除而後快！

李文忠是民進黨新潮流系的要角，新潮流長期以來一直被認為是民進黨中較「左」的勢力。李遠哲所說的「與社會主義思想有共鳴的人」，無非就是指新潮流的人馬。上述兩個「偏左」條文的列入黨綱，就是出於新潮流的運作。如今，新潮流的李文忠卻竟然以「偏左」的理由，主張黨綱全部廢除！難道這就是他所說的「與時俱進」？或者，在野與執政，就是這麼大的區別？李文忠究竟是以假作真的騙子裁縫，還是那個喊出國王沒有穿衣服的無辜小孩？ ★

註：林義雄引佛洛斯特的詩《沒有走的路》，如下：

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
 只可惜我不能都踏行。
 我，孤獨的旅人，佇立良久，
 極目眺望一條路的盡頭，
 看它隱沒在林叢深處。
 於是我選擇了另一條路，
 一樣平直，也許更值得，
 因為青草茵茵，還未被踩過，
 若有過往人蹤，路的狀況會相差無幾。
 那天早晨，兩條路都覆蓋在枯葉下，
 沒有踐踏的汗痕，
 啊，原先那條路留給另一天吧，
 明知一條路會引出另一條路，
 我懷疑我是否會回到原處。
 在許許多多年以後，在某處，
 我會輕輕嘆息說：
 黃樹林裡分叉兩條路，而我，
 我選擇了較少人跡的一條，
 使得一切多麼地不同。

光州抗爭的啓示

從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化運動到民衆的社會變革運動

臧汝興

從 1980 年五月十八日起到五月二十七日這段期間在光州發生的事件，在韓國經過相當久的論爭後，大致上已經確定其名稱爲「光州（5・18）民衆抗爭」。

民衆的民主化訴求的意義

光州抗爭的訴求，表面上確實是單純的政治民主化。也就是要求資產階級的程序民主，而不是民衆的民主主義。但必須注意的是，當時要求的政治民主化其實是內含著兩種意義的。一、在當時的獨裁統治下，基層民衆要求改善處境的一切試圖，皆因爲缺乏政治上的權力，而根本無從解決。因此，基層民衆的政治民主化要求，事實上是帶有一定程度的階級性格。二、不過，這樣的訴求，也反應了在長期以來，在政治、意識形態壓抑下，民衆的政治認識水平的低落。因此，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寄託在自由主義政治勢力（反對黨）上。

光州民主化抗爭的背景

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使韓國的從屬性資本主義發展面臨了嚴重的危機。當時的朴正熙政權，採取的克服危機的方法，簡單扼要地說，就是加強對基層民衆的榨取；以及爲此所需要的高壓的獨裁統治。如此的做法，自然遭到在野黨與基層民衆的強烈抵抗。

1979年10月16日，一個抵抗運動的高潮發生於反對黨領袖金泳三的政治根據地釜山，並迅速擴散到鄰近的馬山地區，稱之爲「釜馬抗爭」。這場抗爭最後逼使朴正熙政權不得不採取最強力的手段－宣佈戒嚴，鎮壓平息。

但這場抗爭，卻讓執政黨內部的非主流派感覺到一味靠鎮壓維持政權，已經是一條走不通的路。民心的向背，已經爲奪權提供了重要的條件。於是，釜馬抗爭發生十天後，當時擔任中央情報部部長的金載圭發難，將朴正熙槍殺。因此，可以說當時的反獨裁鬥爭，雖然沒有直接推翻朴正熙獨裁政權，卻也間接地催促了朴政權的滅亡。

不過，金載圭不但未能奪取到政權，反而遭到立即的逮捕。約一個月後的十二月十二日，強硬派的全斗煥、盧泰愚一黨發動軍事叛變，先掌握軍權，架空當時的代理總統崔圭夏，實際掌握政權。

抗爭的過程

從 79 年的 12・12 到光州抗爭的 5・18 的這段期間，一方面是全斗煥等精心策

劃正式掌握政權的期間，另一方面也是反獨裁鬥爭趁著政治權力的空白期，全力爭取民主化的期間。5月15日，學生在漢城火車站前的示威人潮達到了15萬人。5月17日，全斗煥等不得不宣佈全國擴大戒嚴。5月18日零點，擴大戒嚴實施之後，全國各地的民主化鬥爭一時平息，但唯獨光州繼續展開鬥爭。光州的鬥爭立即遭到戒嚴軍的慘忍鎮壓，很多人在鎮壓中犧牲。在接下來的兩三天的抗爭。被鎮壓的過程中，憤怒的民眾終於體驗到武裝抗爭的必要性，於是自發地搶奪派出所的武器、軍需產業工廠內的裝甲車等，開始與戒嚴軍展開武裝鬥爭。最後，逼使戒嚴軍採取了戰術上退出光州的策略。

光州抗爭並不是一場組織性的、計劃性的武裝起義。因此，當市民佔領光州後，所組織成的善後對策委員會中，大部份的小資階產出身的代表，主張繳回槍械投降。但這樣的主張，很快被基層民眾否決，並重新組成善後對策委員會。不過新組成的對策委員會，所提出的主張也僅止於對傷亡者進行賠償、不追究抗爭責任、承認軍隊鎮壓失當等七項。在這七項主張中，看不到原先發動抗爭時，要求的全斗煥下台、取消戒嚴、釋放金大中等。如此低層次的要求，並不代表當時的抗爭領導中心的認識水平的不足，而是，現實上抗爭的主體力量並沒有建立。這點也正好顯現了非組織性、缺乏目的意識的運動的侷限性。

70年代美國所製造出來的民主守護者的假象，更是反映了光州抗爭過程中。市民佔領光州的期間，其實正確地說，應該是被整個圍城的期間，民間一直流傳美國的艦隊已經開往釜山外海，來支持韓國的民主化運動。但結果，美國非但沒有任何支援光州抗爭的意思，後來還同意、協助戒嚴軍以武力鎮壓光州。

5月27日凌晨，戒嚴軍展開攻擊。以尹祥源為中心的市民軍，決定以死守護光州抗爭精神。在戒嚴軍強大的武力下，市民軍的誓死抵抗，只能算是一點零星的反擊。戒嚴軍「順利」平息抗爭。

光州抗爭是整體民主化運動的一部份

由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光州抗爭絕不是一個侷限於光州地方的一次抗爭，而是當時全國性的反獨裁鬥爭的一個重要部份罷了。那麼，我們又必須臨面一個問題，為什麼是發生在光州，而不是在其他地區？支持基礎薄弱的朴正熙政權，為了穩固其政權，刻意煽動了省籍情結，而其物質基礎就是經濟開發的省籍差別化。也就是包括光州市在內的整個全羅道地區，經濟開發的程度非常低。此點，使基層民眾必須承受了雙重的壓迫－支配階級對被支配階級的壓迫以及省籍的壓迫。在基層民眾意識化水平尚低的情況下，階級的壓迫以對政治的民主化要求呈現。而全羅道出身的反對黨代表人物之一的金大中，正好集合了這兩種意義於一身，因而成爲全羅道民眾的希望。這樣的人物，於光州抗爭發生前不久，被全斗煥以內亂罪逮捕，此事件直接刺激

了光州民眾的抵抗。不過，必須強調的是省籍問題，只是一過激化劑，絕不是事件的根本原因。

光州抗爭的意義

對我們來說，光州抗爭的最重要意義在於它使韓國的社會運動開始全面左傾化以及反美運動的大眾化。如果，如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觀點所說，光州抗爭只是戒嚴軍的殘忍鎮壓造成的民眾自發性的抵抗，那麼又如何能解釋光州抗爭之後韓國社會運動的全面左傾化呢？

光州抗爭遭到暴力平息後，以學運為主的韓國社會運動，不得不面臨嚴肅的思考，外形上那麼蓬勃的運動，為什麼會如此不堪一擊呢？那麼下一步我們又該怎麼做呢？

這個問題可以從光州抗爭的侷限性中找到答案。最重要的就是未能與階級力量結合的，小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的脆弱性。也就是說，主體力量的未建立。

學運本身反省道：『70年代的學運，可以說根本沒有真正掌握我們的敵人是誰，因此，自然無法有效地發揮學運整體的力量。我們沒有以實踐行動，超越程序民主的要求，因而與民眾形成了相當的乖離。也因此，光州抗爭在缺乏主體力量，也就是組織性力量的情況下，歸於失敗。』

基於這樣的認識，與運動上的需要，以學運為中心的民眾運動，開始引進左翼理論，積極與階級大眾結合。自此，韓國的社會運動與台灣的運動相較，不再是單純的量上的差別，而呈現根本上的質的差異。也就是從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化運動走向民眾的社會變革運動。

70年代韓國的反美意識，只存在於少數知識份子腦子裡，無法成為大眾化的運動。但在光州抗爭的整個過程中，韓國民眾在積極的鬥爭中，暴露了美國的真面目。在抗爭期間，光州市民曾要求美國出面仲裁，但美國此時竟以避免干涉內政為由，拒絕了要求。卡特政府下的國務院，更發表：「為了（韓國）國家的安保，決定緩和對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在5月27日，戒嚴軍武力鎮壓的當天，美國國務院又發言表示：「（光州）做為國家的主要都市，不能陷入持續的混亂狀態。」直接地表示了對武力鎮壓的支持。最重要的是，自韓戰以來，南韓的軍隊指揮調動權一直掌握在美國的手中，因此，如果沒有美國的同意，南韓政府根本不可能調派軍隊鎮壓光州民眾抗爭。

於是，為了讓美國的真面目進一步的揭露，82年，學生文富弼等人，火燒釜山美國新聞處、接著，光州美新處、漢城美新處，相繼被學生佔領，學生們並散發傳單要求美國為光州屠殺行為道歉。學生們如此自我犧牲的、震撼性的行動，喚醒了一般大眾。也證明了只有具體的實踐行動，才是揭發真相的最有效方法。 ★

1980年光州抗爭事件大事紀

1979年

- 10.26 朴正熙大統領遭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殺害。整個南韓地區宣布戒嚴（濟州島除外）
- 11.24 舊軍事獨裁雖瓦解，但全斗煥等新軍事獨裁勢力迅速計劃奪權，於是要求民主化的運動蓬勃展開。140名民主運動領導人被逮捕、刑求。
- 12.12 全斗煥將軍在軍隊內部發動兵變，逮捕陸軍參謀總長兼戒嚴司令官鄭昇和，取得最高的軍權。全斗煥等非法調動前線的部隊。全斗煥的妻弟升任戒嚴司令官。

1980年

- 4.14 全斗煥將軍擔任中央情報部部長，同時兼任保安司令官。
- 4月中旬 學運展開要求民主化的大規模示威，長期被禁止的勞資爭議開始連續爆發。
- 5月中旬 示威持續擴大，要求廢除戒嚴、全斗煥下台。
- 5.15 五萬名群眾聚集於漢城市中心展開示威，國務總理承諾加速推動民主化。
- 5.16 三萬名光州地區的學生、市民在展開和平的火炬示威。反對黨領導人金泳三、金大中要求學生停止示威。
- 5.17 宣布全國擴大戒嚴。事實上這等於是全斗煥發動第二度的政變。在此擴大戒嚴令下，禁止了所有的政治活動、國會活動、對國家元首的批判、大學被勒令停課、金大中等政治人物以及在野運動的領導人、學生等被逮捕。
- 5.18 在光州，1,500餘名學生展開示威，要求廢除戒嚴、全斗煥下台。政府派出空輸部隊展開殘酷的鎮壓，造成數十人的死亡。
- 5.19 光州駐軍開始對學生、市民展開大規模的屠殺。軍人的屠殺引起一般市民的極度憤怒，開始加入學生的示威行列，自此，示威行動轉變為民眾蜂起。

- 5.20 空輸部隊的暴行傳遍光州，10萬人以上的市民，站起來對抗軍人暴行。憤怒的市民放火燒了扭曲報導的電視台。醫院擠滿受傷的民眾。全斗煥等軍部勢力宣布解散內閣。
- 5.21 30萬名市民舉行集會，對抗軍人屠殺。示威市民徵用車輛、擄獲武器。軍隊撤離市區。通往光州市外的電話被切斷。晚上十二點許，示威群眾佔領道政府。
- 5.22 市民完全掌握光州市。金大中被以煽動罪起訴。1萬多名軍人包圍光州外圍。光州內部組成市民委員會，與軍隊展開協商。全斗煥等取得美國的同意，調動軍隊準備鎮壓光州民眾抗爭。美國從琉球調派軍機、從菲律賓調派航空母艦駛往韓國近海。（光州民眾得知此消息後，誤以為美國派兵支援韓國的民主化運動，欣喜不已）
- 5.23 金載圭被處決。
- 5.24 五萬光州市民在雨中展開示威。光州的對外道路被全完封閉。
- 5.25 三萬市民在道廳前廣場舉行集會。會中主張投降的一派與主張繼續鬥爭的一派激烈對立。
- 5.26 美國同意派軍鎮壓。
- 5.27 美國國務院發表：「無法再坐視混亂與無秩序狀態。」隨後，數千名軍人駛著坦克，攻進光州市區，進行大規模屠。軍隊掌握光州。
- 5.28 數千人被逮捕、拘禁、通緝。金大中等被判死刑。 ★

國際研討會論文（電子檔）歡迎索閱

今（2000）年5月18~20日在光州舉辦的《復活光州，韓半島統一與東亞和平》國際研討會，來自日本、台灣、琉球、韓國等地代表餘人參加，計發表論文二十餘篇。這些論文經由「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台灣秘書處」中譯完成，提供給本刊讀者參閱。

◎僅提供電子檔，請以電子郵件索取。E-mail:twleft@sinamail.com

護衛良心權的鬥爭

——從韓國「光州特別法」 與台灣「補償條例」說起

鄒議

1979年10月，南韓獨裁者朴正熙在宮庭鬥爭中遭到暗殺，一時韓國的民主化運動有巨步、蓬勃的發展。12月12日，軍人全斗煥發動政變，對全韓民主運動進行鐵腕鎮壓。1980年5月18日，全斗煥·盧泰愚軍事法西斯體制對負隅抵抗的光州市民主化國民運動，調動了正規武裝部隊，以現代化美式武器進行屠城式的殺戮，造成屠殺、拷問、投獄等重大人權侵害事件，官方稱為「光州暴動」，在短短數星期的鎮壓中，造成數百名市民、學生的慘死。

1946年，中國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引發包括台灣在內的、全國性反對內戰、主張和平建國、全國性民主化改革、地方的高度民主自治和振興經濟的國民運動和學生運動。1947年2月事件即此一全國性國民／學生運動之一環。1947年中後，內戰形勢逆轉。中國民主革命的波浪向台灣浸透，中共在台地下組織在台吸收省內外工農、知識份子、市民而成長，在47年至49年間的台灣文化、思想、知識界和高校校園中擴大。1949年4月，陳誠當局動手肅清台大和師院學生的民主運動，清洗以楊遠為首的台北進步文化界，史稱「四·六事件」。12月，國民政府全面撤台。同年底，以地下黨基隆中學支部的破壞為起點，在台國府展開了延續至1952年的、全面、徹底的反共清洗。有四、五千人遭到槍決，一萬名左右判處不等刑期的徒刑，殘暴恐怖，風聲鶴唳，秘密、非法逮捕、審訊、拷打、槍殺和投獄，成為數年間日常生活的家常。國民黨稱此制度性政權暴力事件為「叛亂」或「匪諜」事件。

迨1990年代，南韓與台灣不約而同時對這些過去國家暴力所造成懸案和歷史，展開清理和「補償」的作業。1995年12月21日，韓國訂立「關於五·一八民主化運動等特別法」（簡稱「光州特別法」）台灣在1995年訂立了有關處理二·二八事變的「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1998年6月，頒佈「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以下簡稱「叛亂案補償條例」）。

「光州特別法」和「叛亂案補償條例」，都是對於戰後東西冷戰體制下，在美國

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下韓國南北分裂、海峽東西對峙的結構中，南韓和台灣分別形成扈從美國的、以反共國家安全為藉口的獨裁政權，在美國支持下，發動了國家政權主導的、組織性恐怖暴力和大規模人權蹂躪事件所做的清理和「補償」的法律。然而，由於南韓和台灣的戰後民主運動有歷史上的、政治上的不同，呈現出不同的性質和意義。

「光州特別法」最大的特點，在於它明確規定了1979年12月全斗煥軍事政變和1980年5月光州事件鎮壓行動，都是「破毀憲法」的、「內亂」性的「軍事叛亂」罪行，而予以非法化、犯罪化定位。以此為根據，國家得以組織特別調查行動，調查並起訴元凶全斗煥和盧泰愚，最終判處徒刑，而「光州特別法」也得以依據（一）究明事件真相；（二）懲處元兇；（三）國家賠償；（四）平反，和（五）對歷史事件的紀念事業（如犧牲者墓園、事變紀念館、立悼亡紀念碑、學術研討會，等等）而立法。

反觀台灣的「叛亂案件補償條例」，從條例的名稱來看，50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在法律上仍然是非法性的、污名性的「叛亂」犯和「匪諜」。條例清理的對象，是當年「叛亂案件」及「匪諜案件」受到「不當」的「審判」——即「冤、錯、假案」為限，但「經認定為叛亂犯或匪諜確有實據者」，「不得申請補償」，而被排除在整個補償條例之外。因此，「條例」當中，沒有要求歷史真相的嚴肅究明，沒有懲治當年國家暴力執行者；沒有犧牲者平反（「條例」中雖有「名譽受損者，得申請恢復之」的規定，但沒有再審而重新宣判無罪的細則，從而與韓國的「光州特別法」大異其趣）和歷史案件紀念事業的規定。前不久在綠島立「垂淚碑」，只是個別政治犯的設想，完全沒有照顧到50年代白色恐怖歷史的詮釋應有的共識，在未曾解決50年代清共屠殺的歷史曲直的條件下，與權力苟合，使50年代政權暴行合法化了。且立碑活動成為地方性（台東縣綠島鄉）而不是全台灣的行事。台北市政府馬場町紀念公園的設想也侷限於地方性行事，因而無從發揮療傷止痛、國民／民族團結與和解的意義。

台灣的「補償條例」，是無黨籍、在野黨和若干國民黨立委所推動，而不若韓國「光州特別法」之為強大市民運動的果實。因此，「補償條例」受到意識形態、政治考量的強大限制，妥協主義和機會主義色彩濃厚。前述「排除條款」的提出，不是政府當局和執政黨立委，而是在野黨立委，自動提出，以交換立法通過。在「補償條例」中，政府仍居於代表權力正義的、「警察」的地位，而申請補償者仍居於非法的「叛亂」者和匪諜的、即「強盜」地位。而「補償」之異於「賠償」，基本上前者不承認國家政權在歷史暴力事件中的不正當性、不道德性和非法性，後者則完全、明確

承認國家政權的暴力之不義、不當和非法。「補償條例」在立法行動之初，政府開宗明義不採取修正國安法第九條第二款——即主張共產主義者之非法性——說明了「補償條例」強烈的反共主義和意識形態的侷限。

也正因為這樣，受命處理補償事宜之「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只能片面依據「政府機關提出」的「證據」「逐一審認」。而「政府機關提出」的「證據」，無非是 50 年代政治肅清過程中非法拷訊、攀誣的結果，完全沒有公正性，對申請補償者十分不利，以至「基金會」的「審認」牛步遲遲。六、七千件申請案，兩年來只能審認三百餘件。而申請人大多進入古稀之年，「補償條例」的不仁、昭然若揭。

此外，這種由權力的一方施捨——而不是經由強大的國民運動，以全體國民對於歷史懸案之不義的憤怒、以及究明歷史懸案真相的強烈的意志，迫使權力讓步，以國民的立法運動，申張了正義——使申請補償者仍然居於政治上、良心上未被解放的、囚禁的地位。他們受到高額補償金的綁架，甚至為求取「補償」，被迫做出反共轉向性表白，爭取列入「冤錯假」案，晚景失節，無法伸張犧牲者良心和政治上的正當性與合法性，無法要求對過去歷史事件重建當代的價值；無法要求究明歷史真相並起訴和懲罰歷史暴力事件的元凶，無法要求全面的物質和精神上的謝罪、賠償。「光州特別法」在人權法律的世界史的意義，相形之下，遠遠不是台灣的「補償法」所可望其項背。而這又反映了台灣戰後民主化市民運動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嚴重破綻，為今後台灣人權鬥爭的運動，留下反思和再實踐的空間。

但也必須付言，在韓國，以國家保安法為首的反共法體系，雖歷經金泳三、金大中體制，仍然有效存在，苛密如故。對共產主義者的法律和政治壓迫絕未鬆動。對堅持良心自由的「非轉向」共產主義者政治犯，施加額外的人權壓抑。對韓國共產黨人政治案件的歷史究明、平反與賠償之路，除非近日內南北高層會談有順利發展，否則韓國共產黨人政治犯的艱苦的獄中歲月，不知何時破曉了。

良心的權利，在帝國主義時代，在階級社會中，向來十分脆弱，向來受到帝國主義及其獨裁性虐從政權苛烈的壓抑，多少必欲勇敢地改造世界的鬥士，粉身碎骨、破身亡家。社會變革運動，就是實踐良心權利的運動。守護良心的權利的鬥爭，正呼喚著我們做縝密的反思、凝結與前進。

★

中華民國意識型態

從《那一夜，我們說相聲》說起

孫善豪

《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大概算得上台灣新相聲的經典之一了——雖然表演者自稱是演相聲而非講相聲。其中「記性與忘性(1925·北平)」一段裡，王地寶(李立群)自誇記性好：「打從國民政府成立這十四年以來」，北平每家戲園子裡每天每齣戲他都記得，於是舜天笑(李國修)問民國八年二月廿五日，牽出了楊小樓反串張飛唱「背轉身來自參詳...」一段。

隨便聽聽是就過去了，一聽多，就聽出了問題：那個有「成立以來」可言的「國民政府」，是民國十六年才在南京成立的。所以所謂「成立這十四年以來」，應該是指的1927到1941才是；這樣，標題的「1925」和內容的「民國八年」，顯然就是時空錯亂了：如果真要摹擬當年，那麼1925年的時候根本還沒有「國民政府成立」可言呢，遑論「以來」——王地寶的記性變成預言了！

雖然只是很小的錯誤：只要把「國民政府」改成「民國」就成了，但是出現在《那一夜》裡，卻是個很大的諷刺。因為《那一夜》的主旋律，就是用反溯的方式，來提醒「現實的短暫」和「歷史的縱深」之間的對立。指出這個對立，當然有「提醒人正視歷史」的作用在——但是這提醒去注意歷史的，本身卻正好又忘記去注意歷史了。所以就算假裝回到一個特定的歷史時空裡，卻仍然沒有逃脫掉「意識型態陰影」的籠罩。

甚麼樣的「意識型態陰影」呢？就是用了1949年之後的中華民國來理解之前的中華民國，或說是把1949往前推成1910：彷彿中華民國從一成立起，就是它1949年時的那個樣子。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的政治史裡，有兩條明顯的分界線，一是民國卅八年，一是民國十七年。前一條線，應該是大家都清楚的：從這裡起，「中華民國」的疆域明顯縮小到台澎金馬(雖然這一點是直到近幾年才被台灣人所認知、從而固定下來的，而非一開始就如陽光般清楚的)；但是後一條線卻直到如今仍然常被忽略。這條線分了甚麼呢？如果說卅八年分的是地理，那麼十七年分的就是歷史了：國旗從五色旗變成青天白日滿地紅了。

或許是因為這五色旗一捲就好，可以再也不出現，不像地理事實的難掩，於是，這「民國十七年」的分界線就很容易地被抹去了：彷彿中華民國自始就是以青天白日

滿地紅爲國旗的、自始就是「國民黨的」了。

正是在這樣的刻板印象下，《那一夜》會把「民國成立的十四年」等同於「國民政府成立的十四年」——「民國」一立，就立的是「國民政府」了。

這個錯誤並不是特例。記得曾在世界台灣同鄉會的《台灣公論報》或是歐洲台灣同鄉會的《鄉訊》上看到過一篇文章，說國民黨統治中國卅八年，共產黨也統治了卅八年云云。這就顯然是忽略了「民國十七年」這條界線了——民國十七年之前，何嘗有甚麼「國民黨統治」可言呢？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多年前黃卓漢(?)拍的《國父傳》：當孫文辭去臨時大總統、步出南京總統府時，受到揮舞小旗的群眾的歡呼。甚麼旗呢？每人左手五色旗，右手青天白日旗。但是當時的青天白日旗是海軍旗啊！群眾怎麼會沒事把海軍旗拿來揮呢？而且最近讀到一點資料，似乎當年是連海軍旗，也是把青天白日徽嵌在五色旗上的。如果是這樣，那麼當時甚至是根本沒有「青天白日旗」這個東西了！

「青天白日」的謎思也表現在它的被當作「首役旗」：一些武昌起義的畫，黃鶴樓頭升的，居然也是它。但是首役旗是甚麼呢？其實是「九角十八星旗」——代表「九州大地與內陸十八行省」，它在民國元年被參議院定作陸軍旗——。爲甚麼不是青天白日呢？因爲武昌起義根本和同盟會就沒甚麼直接關係——當然更說不上是甚麼「國父第十一次革命」了！

青天白日、「國民黨」和中華民國之間這樣緊密的關係，究竟哪裡來的呢？當然是國民黨製造出來的，亦即透過黨化教育而固定成一個既定事實的(雖然謝天謝地，我們不必再受這種黨化教育的毒害了，但是，請小心「認識台灣」的新意識型態教育——意識型態總是透過曲解歷史，來使歷史符合政治目的)。這一套統治意識型態，是由許多「意象」組成的：除了青天白日的圖騰之外，還有「秋海棠」、「中華五千年」等等。

地理的事實是最難遮掩的，所以「秋海棠」的美麗謊言首先被揭破：不僅外蒙的獨立使秋海棠變成老母雞了，而且即使是這老母雞，也已與「中華民國」無關了。

但是即使如此，卻仍然有個「中國版圖」在焉。這是《那一夜》的姐妹作《這一夜，誰來說相聲》所傳達的意象：「青島新村」是一個「袖珍型的中國版圖」，而且是大家依「本性」住(鑄)成的；掘古墓，掘到最後也掘出個中國版圖來，好像「中國版圖」是個讖言，自遠古以來就規定好了擺在那裡、變動不得似的。

這個「版圖」究竟是甚麼呢？其實也含糊得很：只是個意象，而絕不是事實。何以見得呢？在〈四郎探親〉裡，言歸(李立群)敘述他父親從廣州坐晚上的火車，第二天中午抵達洛陽，中間還「從蚌埠到徐州」——經過徐蚌會戰的戰場。

我小時候對中國的鐵路線特別有興趣，所以聽到這段也就特別覺得刺耳。其實也

不必有興趣，大概小時候在地理課上玩過那種「將來反攻大陸以後，從上海坐火車到漢口有幾種坐法」的人應該都知道：從廣州到洛陽而要經過徐州，那是多繞了個大圈了——何況是直開烏魯木齊的車，豈有不走弓弦走弓背之理？再者，即使不繞道，從廣州經武漢、鄭州直開洛陽，都不可能今天晚上發車而明天中午就到的——我曾經從杭州坐快車到北京，都還要廿個小時哩——，何況如果還要繞去徐州？

對現實地理的含糊，正是地理可以被神聖化的前提。所以雖然同齣的〈大同之家〉裡，編劇彷彿藉著一段對白批評了把地理的神聖化——當言歸說他對中國地理熟的時候，白談(金士傑)說：「你們的地理都成了歷史了」——，但是這個批評卻一點都沒有妨礙同一個批評者自己把地理變成歷史：變成遠古以來的、依本性的「中國版圖」。何以致此呢？蓋雖然秋海棠不再、地理的謎思破了一半，但是歷史的謎思卻難破、還在。具體一點說吧：「民國卅八年」的界線固然是被意識到了，但是「民國十七年」的界線卻仍然模糊。

如果掌握了「民國十七年」呢？那麼立即明顯可見的是：中華民國並不向來就是這樣的，反而曾經是別樣。而既然曾經是別樣，顯然就沒有甚麼天經地義、改動不得的東西了。由此更往前推，則一拿上手就理所當然地是五千年、是中國、是中國人，也就很無謂了——都得還原回它們的真實、還原成特定歷史的產物，不能沉瀆一氣，全醬在醬缸裡。就說「中國」這個概念吧，其實民國之前是很少見的：清朝時的中國叫「清」而不叫中國，排滿的革命黨雖然不願意用「清」，但是替代的，卻不是「中國」，而是日文的「支那」。

一切現實都是歷史的產物，而歷史卻不是現實的產物。這是歷史唯物論之教。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必須去瞭解歷史，或者必須從現實的生成史才能瞭解現實——毋寧反之：必須從對現實的瞭解才能瞭解歷史。因為所謂瞭解現實，其實就是掌握現實之所以為現實的本質所在，亦即掌握它之所以異於過去之所在(即「類差」)，而這個「異」，才是構成了歷史的東西。換言之，沒有差異、沒有各個相異的歷史階段，就沒有歷史可言。

但是難道就沒有「同」的東西嗎？當然也是有的，例如不管怎麼變來變去，政治總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統治。問題只在：不能用這個「同」來取消「異」——否則就是拜物教了，因為所謂以同來取消異，其實一定就是用現實來扭曲過去、是把現實給絕對化。馬克思的警句(MEW13, S.617)，在這裡應該是尤其要記得的：不能「只看到統一...而忘記本質的差別。而忘記這種差別，就正是諸如那些証明了現存社會關係的永恆性與和諧性的現代經濟學家們的全部智慧所在。」 ★

尤哈尼要用「功利的箭」搶救原住民母語

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台灣新政權的原住民最高行政首長尤哈尼，在接掌原民會主委前夕，為原住民母語教育指出新方向。

尤哈尼認為，母語教育要回歸家庭，父母要負起最大的責任，絕不能怪罪學校或政府沒有教。他說，過去父母對母語沒信心，且基於功利的觀點，認為學習母語沒有用，考試不會考。既然如此，尤哈尼也要用「功利的箭」去攻打原住民，「不會講母語的原住民學生，聯考別想加分。」他更認為，國家政策要配合「功利的箭」，要有能說母語就是原住民身份証的概念。

對於尤哈尼未來原住民政策的觀點，原權會部落工作隊有話要說。事實上，全世界的少數民族母語並非像尤哈尼所說「都躺在加護病房奄奄一息」，遠的不說，讓我們來看看地理距離最近的大陸少數民族。大陸少數民族採行雙語教育，但是，小孩進小學到三年級前，學校只採用母語教育，四年級才開始教漢語〔普通話〕，這樣的少數民族母語教育政策，為兒童奠定良好的母語基楚。而且，大陸早就建構完整的少數民族教育體系，從民族小學、中學、民族學院、民族大學，少數民族教育成熟且完整。在大陸，漢族以外尚有 54 個民族，民族的母語從未有奄奄一息的憂慮。

原住民的母語能力出現危機，這絕非一日之寒，豈可將責任推給原住民家庭，然後祭出「功利的箭」就解決了。今天，原住民的問題出在於制定政策的人往往「見樹不見林」，且大部份的原住民知識精英又不自覺的在心理上向外來強勢文化靠攏。搶救母語的危機，原住民的最高行政首長尤哈尼應站在台灣原住民族的立場，向掌握資源的政權索討應有的資源，儘快建構完整的原住民教育體系。否則，就算家庭裡徹底使用母語，但一走出家門即淪陷在外語世界裡，成效能有多大？

數百年來，台灣的原住民族在這塊土地上一向處於邊陲的位置。「台灣錢淹腳目」，買起飛機大炮都以百億千億計算，但是，台灣卻花不起一所原住民完全中學的經費。六、七〇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遠洋的漁工、鷹架上的建築工、礦坑裡的礦工，原住民付出了代價，為經濟起飛做出了貢獻；九〇年代，台灣富裕了，資本家為了節省成本，追求更多的利潤，引進了外勞，原住民勞工大量失業。九八年，勞委會適時開辦「勞工失業保險」，但是，卻把絕大部份屬於「無一定雇主勞工」的原住民排除在外。

這些現象一再顯示，解決原住民問題，非不能也！是不為也！這不禁讓我們懷疑：歷來政權的主流意識裡，原住民的位置在哪裡？新政權即將成立，奉勸尤哈尼主委，站穩自己原住民族的立場，看清楚新政權的主流意識裡原住民的位置在哪裡？否則，「民族平等」將仍只是口號，永遠無法落實到政策上。

★

二十年來的對臺政策需要檢討

(二)

蕭喜東

三、二十年來台灣的演變和二十年來對臺政策

二戰結束前，台灣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戰結束後，台灣又落入國民黨官僚買辦的統治之下，更被納入美國的東亞政治、軍事、經濟體系，實質上是美國的新殖民地，特別是在思想意識上，“幾乎已經沒有一個地方象台灣一樣，不論在朝在野，那樣地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缺少批判的人士，而對於美國的一切，還懷抱著跡近幼稚的幻想。”？其次，台灣在實行土地改革之後，社會上還帶著大量的、強烈的封建社會殘余，蔣家王朝繼續著獨裁專制，黑社會與官、商勾結，橫行霸道，高山族同胞、客家人等弱勢群體遭受體制性的民族壓迫和歧視，總之，這是一個反封建革命遠遠未完成的社會，是一個帝、封、官三座大山壓迫下的悲情之島。

值得探討的是：如何看待從七十年代末到今天台灣社會的巨大變遷？台灣社會的性質是什麼？毫無疑問，蔣介石死後，台灣黨外運動、社會抗議運動，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性質。但是，對這場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對它和國際體系的關係，對這場運動的政治後果，都應作詳細的階級分析。

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台灣黨外運動和其他各種政治異議分子的抗議運動迅速發展，並在全島串連。在這個龐雜的抗議運動中，既有反蔣親美、自由主義傳統的傳承（如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國》和“中國民主黨”），也有反帝的、工農大眾的愛國主義的傳承，這部分力量繼承台灣民眾黨、台灣民眾抗日鬥爭、台灣共產黨的左翼傳統，在八十年代初，成立了勞工法律支援會，一九八九年成立了勞動黨。抗議運動中，也存在著以“住民自決”為口號的一小部分人，然而，這種聲音在一開始遠遠不是主流，毋寧說，它是一種海外舶來品：“台灣人意識或台灣民族概念，最初是在海外形成，尤其以在北美中產階級臺裔移民為甚。”？抗議運動的共同訴求是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包括其反共的戒嚴令。作為黨外運動的主要刊物《美麗島》在一九七九年創刊時，它的編輯包括蘇慶黎、呂秀蓮這樣截然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代表工農進步立場的黨

外雜誌《夏潮》、《海峽》等雜誌的總編，後者後來蛻變成爲日本殖民統治涂脂抹粉的敗類。後來成爲民進黨領袖的黨外運動人士黃信介，在《美麗島》發刊詞中寫到：“我們認爲：在歷史轉捩點的今天，推動新生代政治運動，讓民主永遠成爲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在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對中華民族所能作的最大貢獻，更是我們新生代追求的方向。”這和後來一些民進黨內的臺獨言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從一九七七年台灣社會運動的興起，到一九八七年國民黨當局取消戒嚴令，是台灣社會和政治體制發生關鍵性演變的時期。這期間，各種各樣的群眾性運動，如：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運動、返鄉運動等等，在台灣發展。每當反對國民黨專制的抗議出現在街頭，經常會有國民黨的流氓打手，或者所謂右翼“民族主義”青年團體，出來大打出手，他們以所謂“反臺獨”、“反共”爲借口，鎮壓社會運動人士，維護國民黨統治。這情景，中國人民是熟悉的。這個階段，令人想起解放戰爭期間，在國統區爆發的反飢餓、反內戰的人民運動，那時，中國共產黨不但領導著武裝鬥爭，也聲援支持並直接領導著國統區第二戰場上的爭取民主的鬥爭。反觀八十年代，我國領導人沒有抓住機會，不但單方面放棄了對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武裝鬥爭，更沒有聲援和支持台灣社會的反國民黨專制的民眾運動，而是對台灣社會正在發生的迅速變化麻木不仁，無動于衷，另一方面抱著無限的幻想，對國民黨統治集團頻頻友好喊話。一九九二年，早已是一具政治殭屍的“中華民國”修改了“憲法”，使得被我國領導人寄予厚望的“台灣當局堅持一箇中國”的“共同立場”一朝傾覆，單方面對國民黨當局進行統戰的對臺政策終於顯露出危機的跡象。

台灣民主運動中代表大眾階層和愛國主義的力量，沒有得到我國領導人的任何聲援和支持，也沒有條件得到中國廣大民眾的支持，勢單力薄，喪失了台灣民主運動的領導權。另一方面，我國領導人把統戰工作的全部希望寄託于和國民黨當局談判，這對正在和國民黨當局鬥爭的台灣民主運動和一般台灣民眾，產生了巨大的異化、疏離作用。如同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時運用粗暴手段，將很多學生及其同情者推向自由化陣營，錯誤的對臺政策也把大量的台灣民眾推向反感和對立的立場。臺獨勢力和李登輝在這方面，技高一籌，他們借機把台灣民眾對歷史上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仇恨，轉化爲本省人對外省人的省籍仇恨，再把省籍仇恨轉化爲“台灣人”對“中國人”的仇恨。因此，可以說，台灣民主運動的領導權，最終落入了台灣資產階級內的買辦階層，他們把台灣民主運動加以閹割和誤導，注入族群狂熱和族群仇恨，最終蛻變爲附庸帝國主義的民族分裂運動。

毛澤東說過：“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到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同樣，沒有人民

群眾的統一運動，達到祖國統一也是不可能的，正如同：沒有解放區的土改運動，沒有國統區的人民運動，建立新中國也是不可能的。八十年代台灣的民主運動，實際上是台灣民眾自己解放自己的努力，是“二·二八”台灣人民起義的繼承者，它具有發展出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人民運動那樣的潛力。缺少了必要的支持和配合，這個潛力就不能發揮出來。然而，當時我國領導人的對臺政策，不但不是去支持和配合，而是在往相反的方嚮用力：去支持和配合國民黨當局，將國民黨當局當作唯一的談判對象，並把反對臺獨的希望寄託在國民黨當局身上。然而，國民黨當局恰恰是臺獨思想的祖師爺：反攻大陸失去希望後的最佳選擇，難道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嗎？一個依賴美日支持的買辦當局，難道會真心回歸中華民族大家庭嗎？臺獨的種種反共、反華言論，難道不是繼承蔣家王朝的一貫宣傳嗎？

二十年來對臺政策的錯誤的實質是：沒有走群眾路線，而是一廂情願地走了一條單方面聯合統治者、聯合少數精英政客的狹隘路線，這條狹隘路線越走越窄：最開始寄希望于蔣經國，而忽視了台灣民主運動中的各種力量，然後是寄希望于李登輝，卻被李登輝大加玩弄了一番，接著又寄希望于宋楚瑜、連戰，現在也落了空，最後只好淪落到寄希望于陳水扁的可憐地步，然而，這條路線走下去，在未來等待著的，是更多的被玩弄、被欺騙，直至最後徹底破產。

四、外交政策

也許，和對台灣島內政策的失敗相比，外交政策錯誤的影響要更大。具體說，就是對美外交存在著根本性的問題。由于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一點，這裡僅扼要舉例點明幾個問題。

有關中美關係和台灣問題，存在著一些流行說法。一曰：李登輝是“國際社會的‘麻煩製造者’”和“中美關係發展的絆腳石”。在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之後，外交部長唐家璇和駐美大使李肇星分別對美方表白這一點。九月十六日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再次稱李登輝為“國際社會的‘麻煩製造者’”，不久前中國政府發表的台灣問題白皮書又重複了這個說法。這個說法，包括兩個潛臺詞：（一）李登輝又來搗亂了，我們不得已只好加劇兩岸緊張關係，一下子造成了國際問題，讓西方友邦驚詫，給“國際社會”的貴族院老爺們惹了麻煩。（二）李登輝給我們中國帶來麻煩不要緊，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影響了我們“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就影響到了您們美國，妨礙了美國的利益，這事情就鬧大了！

如果不是按這樣的潛臺詞去理解，就很難理解了。白皮書裡不是提到：公然允許李登輝訪美、炮製《加強台灣安全法》，還企圖將台灣納入戰區導彈防禦系統，這些不是分明說明美國是臺獨、李登輝的總後台，怎么一下子它又成了臺獨、李登輝的受害者呢？這種說法的荒謬，就如同說：在美國內戰中，南方叛軍是美英關係發展的絆腳石；就如同在抗日戰爭年代說：滿洲國的溥儀皇帝是中日關係發展的絆腳石，南京偽政府的汪精衛是中日關係發展的絆腳石。

是優先反對民族分裂、實現中國統一，還是優先發展和一個以支持民族分裂、阻礙中國統一為法律的國家的外交關係？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這裡，我們不妨重溫一下新中國在建國之初的外交方針。一九四九年初，毛澤東在西柏坡用生動的語言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髒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虫、虱子什麼都有。解放後，我們必須認真地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把那些髒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乾淨，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中國共產黨在一四九年一月十九日作出的關於外交問題的決定中認為：“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政府，是幫助國民黨反動政府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的。因此，我們不能承認這些國家現在派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實為理所當然。我們採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于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因為帝國主義國家“決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關於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不但現在不應急于去解決，而且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解決”。？

如果對今天形勢有個比較清醒的估計，那麼，應該認識到：外來勢力支持煽動下的民族分裂主義，又把中國搞得比較髒了。這個外來勢力，正是美國政府。一方面要反對臺獨，另一方面，又要和為臺獨撐腰的美國政府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這如何可能呢？

第二種流行說法曰：希望美國政府切實履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關於台灣問題的各項原則和自己作出的堅持一箇中國政策的莊嚴承諾。然而，這類聲明，不知是政治家們保面子、下台階的手段，還是真心實意的對外交涉。任何人都知道，美國政府一九七九年通過、簽署的《台灣關係法》，才是美國對臺政策的基石，是美國承擔“保衛台灣安全”義務的根據，是阻撓中國統一的最根本障礙。“三個聯合公報”在美國政府眼裡其實根本一錢不值，美國總統裡根在“八·一七公報”簽字後不久，就告訴國會議員們，這一公報並無約束力，只是一紙可以修改的美國政策聲明。現在美國國會裡的很多議員壓根不知道“三個聯合公報”的存在。台灣問題的白皮書說：“美國一

再違反自己在‘八·一七公報’中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不斷向台灣出售先進的武器和軍事裝備。”這從美國政治體制的角度看，實在是非常可笑的本末倒置：假如任何一個美國總統不去違反“對中國作出的莊嚴承諾”，那就違反了對美國法律——《台灣關係法》的莊嚴承諾，就會遭到國會的彈劾，就會下臺、甚至遭到起訴。

台灣問題，無論是它的歷史淵源，還是目前危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美帝國主義的插手干涉。特別是戰後以來，美國政府從五十年代起一手製造“台灣地位未定論”、簽署《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到後來推出的《與台灣關係法》，其政策實質就是將台灣納入其軍事防禦線之內，半個世紀來始終如一。解決台灣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反對美帝侵略的問題，無論是和平解決，還是戰爭解決，都繞不開直接和美國政府對抗：美國政府現在侵犯著我們的主權，我們要么在談判中迫使它放棄對中國主權的侵犯，要么以戰爭手段擊敗它的軍事干涉，二者必居其一，別無他途。

五、語言、輿論與宣傳

在今天西方國家越來越依靠其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的軟力量實行統治的時代，輿論和宣傳等工作變得愈加重要。然而，我國領導人爲解決台灣問題而展開的輿論宣傳工作，從各方面衡量，都是災難性的失敗。

“一國兩制”的統一方針，包含著幾個明說的或不便明說的前提：它的出發點是維持台灣社會現有狀況不變，因爲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成功的，是優于祖國大陸社會主義的制度，因而無需加以改造，最好“保持不變”。其次，我國領導人對即使是僅有形式上的、缺乏實質的統一，也沒有自信心和緊迫感，實際上是處于一種安于不統不獨現狀、得過且過、但求無事的心態，只有國土分裂的危險逼到面前時，才被迫採取緊急措施。這樣，國土統一缺乏了社會變革的最根本目標，缺乏了對台灣社會、對國民黨當局的合法性的批判立場，使得對臺政策的寶最後全部壓在一件事之上，這就是所謂“對臺動武”。

且來看“對臺動武”這種提法的致命缺陷。這裡，“對臺”仿佛意味著戰爭是針對著整個台灣社會、整個台灣民眾的，對統治者和台灣民眾完全不作區分，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當成“台灣地方政府”，當成整個台灣社會的代表。這種語言，從台灣民眾的角度看，是頗具諷刺意味的：在很長時間內，台灣民眾自己從未把國民黨統治集團當成自己的代言人和代表，而是把它當成戰後來到台灣大搞貪污腐敗、榨取民脂民膏、和台灣民眾對立的強盜集團。而中國大陸方面的“對臺動武”言論，倒是把台灣

統治者和民眾綁在一起，使台灣民眾在心理上和統治當局走得更近。

二十年前的“解放台灣”的方針，是把戰爭的矛頭對准國民黨統治集團一小撮，而把廣大的受國民黨當局壓迫的台灣民眾，當作解放戰爭的同盟軍。正如同在解放戰爭中，國統區的人民運動，是英勇作戰的人民解放軍的同盟。台灣民眾的鬥爭配合，是“解放台灣”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一旦人民解放軍登上祖國寶島，就會出現大軍南下江南時所同樣出現的情景：人民群眾箪食壺漿，夾道歡迎，踴躍參軍，歡慶解放的到來。而在今天“對臺動武”的場景中，台灣民眾只是一個被動的、承擔戰爭損失和犧牲的角色。我國領導人在講話、社論中，以戰爭的災難警告台灣民眾，強烈暗示統一戰爭會給他們帶來災難痛苦，請他們運用他們的“政治智慧”，來防止統一戰爭的到來，而不是要他們盼望祖國正義之師的早日到來！這樣，武力威攝的對象，變成了台灣民眾，而不是臺獨政客，而臺獨政客在兩次“總統大選”中，反而都從我國領導人的“武力威攝”中獲得漁利。

自從國共內戰于一九四六年全面爆發以來，共產黨政權和國民黨政權之間的關係，就是法統與叛亂的關係，而不是什麼“中央政府”與“地方當局”的關係。無論從國共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是如此。然而，二十年來，我國領導人不再把台灣國民黨統治集團當作叛亂的匪幫，而是所謂“地方當局”。然而，一個政府堅持對一個地區不放棄使用武力，卻又不強調該地區統治者的叛亂性質，這在國際政治、國內政治的慣例上都是難以解釋的。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宣佈台灣當局是叛亂集團，會人為地加劇兩岸的緊張局勢、引起台灣民眾的反感心理。乍看上去是這樣，其實，只要進行充分的輿論工作，其效果應恰恰相反：這裡面的關鍵就是要把台灣當局和台灣的老百姓作嚴格的區分，一方面充分尊重台灣民眾當家作主、管理台灣的願望，另一方面指出：台灣當局死心塌地充當外國勢力的附庸和走卒，從而無法真正滿足台灣民眾的這種願望。一般來說，主權政府必須儘快平定叛亂集團，其首要原因就是，叛亂集團塗炭當地民眾，主權政府有責任解脫他們的苦難，因而，國家統一的一個主要內容應是為當地民眾擔當起主權政府的義務，為他們謀利益。

中國領導人說，他們“既寄望于台灣人民，也寄望于台灣當局。”然而，他們不了解，這兩者只能取其一，因為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寄望于台灣當局”，就意味著忽視台灣人民的權利和聲音，只和統治集團和精英政客打交道。“寄望于台灣人民”，則意味著把壓迫台灣人民的台灣當局當作叛亂集團對待，真正以主權政府的姿

態，區別對待台灣統治集團和台灣民眾，否認台灣當局對台灣民眾的統治的合法性——只有這樣做，才有可能爭取到台灣民眾對主權政府的認同。

簡單片面的“對臺動武”的提法，產生了惡劣的宣傳效果。語言和輿論的力量是驚人的，有時能起到比殺人武器還利害的作用。我國領導人的“使用武力”的說法，到了港臺和海外中文媒體，就變成了“對臺動武”，顯然，中國話裡“動武”一詞，讓人聯想到“動粗”、“撒野”等惡棍的形象，在這裡，我國領導人所作的“決不是針對台灣同胞的”解釋，就被根本忽略了。試舉一例：由海外“民運”人士主辦的“多維網”轉載《溫哥華太陽報》二月二十九日報導中國台灣問題白皮書時，中國政府的立場被描述成：“如果它認為關於兩岸統一的談判進展不夠快或者缺乏誠意，北京有權攻擊台灣及其二千三百萬人民。”

為什麼我國政府看上去合情合理的立場，仁至義盡的條件，到了西方媒體那裡，就變成了青面獠牙、窮兵黷武的形象呢？這裡面，當然有西方媒體的有意歪曲，但是我國領導人自己輿論技巧的欠缺是內因。這裡可以比較一下北約國家是怎么做的。在北約開始轟炸南聯盟的前夕，西方主流媒體充斥著這樣的宣傳：米洛舍維奇正在實行種族滅絕暴行，人道主義危機中的科索沃仰望著西方的拯救，軍事干涉一刻也不能等了，只有北約的人道主義行動才能挽救巴爾干的和平。我們可曾看到“北約對南聯盟動武”的詞句？沒有。人道主義干涉、穩定巴爾干幾乎成了北約對南聯盟動武的眾口一致的代用語。看來，僅僅懂得使用武力，而不懂得為使用武力必須創造出相應的政治條件和輿論條件，仍是成事不足的。這就是《孫子兵法》所說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結 語

台灣問題正在走向危機。危機的到來，也同時能夠帶來轉機，它迫使人們去思考有關問題，檢討過去的政策，它將迫使領導層不得不開放有關公共政策的辯論，使社會各界長期以來被壓抑、被排斥的聲音，能夠發表出來，而不再是由領導人及其少數官方智囊和學者來控制政策議程。這個過程，已經開始了，也必定隨著危機的成熟，而逐漸展開、擴大。

目前，公共輿論中流行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思維定式，所提出的關鍵問題，即：“和平解決，還是動武解決？”或“早打還是晚打？”，都無法成為真正解決台灣問題的框架，因為它們恰恰是二十年來對臺政策遭到挫敗的生動見證，是被錯誤的戰略思想

所誤導進的兩難式選擇陷阱。一旦政策辯論能夠充分展開，人們就會遲早認識到這一點。

本文所提出的將“解放台灣”與“一國兩制”進行對比的分析框架，就是爲了超越“和、戰”兩個選擇的思維方式，以攷察二十年來台灣問題發展到今天危機邊緣的地步的真正原因。只有如此，才能認識到：“和、戰”兩個軍事上的選擇，必須統一在一個正確的政治立場和工作方法之下，不然，無論是“和”還是“戰”，都會繼續碰壁：“和”很可能是“和”了闖進家門的強盜，而喪失了自己的同胞和盟友，“戰”也搞不清爲何而戰、與誰作戰，難免滑入單純軍事觀點和對先進武器的崇拜，在貌似強大的敵人的面前，必然會中途妥協、失敗。

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搞清楚爲何打仗，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所關注的首要問題，也是武裝鬥爭取得勝利的關鍵。明確我方的正義，敵人的不正義，區分統治者和被統治的人民，這決不僅僅是一些空洞的、無法操作的抽象原則，而是在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實踐中得到各種生動體現的克敵制勝的法寶：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優待俘虜政策、改造戰犯政策、人民戰爭、人民大眾爲主力軍的統一戰線、敵佔區的人民運動、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這些中國革命的傳家寶，一定能夠發揮出比先進武器還重要的作用。

當一個革命政黨還執著于最初的革命理想、保留著革命精神和革命傳統時，它的一切政策方針的出發點是群眾利益和人民的解放。這也是爲什麼新民主主義革命在祖國大陸取得全面勝利後很長一個時期，共產黨堅持“解放台灣”的口號。當一個革命政黨不注意克服它的官僚化傾向、喪失革命理想和朝氣蓬勃的精神時，就會走上脫離群眾、“告別革命”的道路，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解放，乃至人類的解放的理想，就會顯得和執政者的官僚主義和“務實”態度那麼格格不入。無疑，對臺政策的失敗是和二十年來其他各方面政策和總體路線的失誤乃至失敗緊密相關的。反省對臺政策的同時，也必然要求我們去思考總體上的問題。〔全文完〕 ★

點燃原住民族救亡運動的烽火

歡迎索閱

《原住民族》月刊 5月20日創刊

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電話：02-22250514

E-mail:watahope@ms43.hinet.net

戰後幾個主要的 「現代資本主義論」〈三〉

黃志龍

五、北原勇：「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

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1977)

經濟原論(1980)

現代資本主義的所有和決定(1984)

20世紀末的資本主義(1994)

如何看待現代資本主義(合著, 1995)

(1) 三層理論體系的特徵

「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壟斷資本主義論」、「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這三種具有不同的研究對象、理論層次和性格的理論，必須經過整合與重組之後，才能成爲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武器。

1/ 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

現代資本主義既然是屬於資本主義的範疇，「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所掌握的一般法則，仍然貫徹在現代資本主義的整個體系中，而「資本論」，基本上就是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

「資本論」將資本主義視爲一個歷史的經濟體系，指出其基本結構的特徵，也就是其矛盾的性質、矛盾發展的規律以及其歷史的侷限性，從而形成資本主義一般理論的架構。但是資本論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自然會受到時代的制約，因而作爲目前還在發展的現代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尚有不足之處。所以，應該以「資本論」爲基礎，將其研究的對象擴大到現代，進一步形成「現代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

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必須透過「競爭的全面性支配」的媒介和保證，才能夠貫徹並發揮作用。所以在構築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時，必須重視經濟規律的貫徹與競爭之間的關係。因此，如後所述，必須從壟斷資本的成立、國家對經濟事務的介入來掌握資本主義的階段性變貌。

2/. 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

從 19 世紀末起，資本主義就進入壟斷階段而一直持續到現在。在這個階段中，「競爭的全面性支配」的結構性作用喪失。但是，「競爭」既作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基本屬性，在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之後也不會改變，只是在經濟的中樞部分，由於少數的大型壟斷資本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限制而已。

所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結構特徵在於：「壟斷的支配以及壟斷和競爭之間的糾纏」。在這個階段中，部分「資本主義的一般規律」因為受制於這個結構而無法貫徹，從而產生新的變貌。這就是說，壟斷價格的形成致使利潤率在壟斷資本之間平準化，投資行動嚴重地受到市場情況的影響，造成生產力的擴大和投資行動，忽而積極、忽而慎重…等現象。因此，資本的運動產生了與競爭階段不同的特徵，帶來了以壟斷資本為頂點的「支配→剝削」的支配制度，其結構性特徵在於：資本與勞動各自進行階層分化，階級鬥爭的核心轉變為壟斷資本的聯合體與大型產業勞動者組織之間的對抗等等。在動態方面，則發生產業循環的變貌和經濟停滯（龐大而且慢性的過剩資本與過剩勞動力並存）。

但在另一方面則有：以新興產業的開發和對外擴張為基礎的間歇性、飛躍性的發展（也就是停滯和發展的循環交替）；經濟矛盾以大恐慌和大戰爭的型態出現，不斷的爆發和暫時性解決，在此一過程中，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國家矛盾的變化、發展與深化等等。這就是說，「壟斷資本主義論」就是有體系的詮釋，貫徹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所固有的結構和動態之中的規律性。

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固有的結構和動態，也就是其矛盾和矛盾的表現形式規定了國家介入的方式，同時也進行一定程度的變貌而貫徹到現在。例如，壟斷資本主義固有的「停滯化」基調，雖然有國家的大規模介入，卻還是會頑強的出現；而為了打破「停滯化基調」，促進飛躍性發展的兩大手段：開發新興產業和對外擴張市場，迄今為止還是為發展經濟所需。因此，「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必須建立在「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的基礎上。

3/.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

二次大戰以後的資本主義，是以國家大規模並且經常性地介入經濟過程為特徵的壟斷資本主義，也就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早在 1930 年代，國家為了對應大蕭條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危機，就已經開始介入經濟過程，並且在二次大戰期間，國家更以戰時統制經濟的型態全面性的介入經濟事務，但是上述兩者都是屬於暫時性的措施，或者其作用僅限於一國的範圍內。國家大規模並且經常性的介入經濟過程，開始於二次大戰後的資本主義。一般來說，國家介入經濟過程的方式及影響，有以下幾種特徵：

(a). 爲了避免激化壟斷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而產生危機，必須對勞動者組織進行讓步。因此，達成高水平就業與整備社會保障制度，就成爲國家政策的中心目標。對資本家而言，相對過剩人口（產業後備軍）的存在，是獲取利潤的不可或缺的條件，所以高水平就業顯然違反其利益；同時，保障國民生存權（高福利）的政策也代表著資本主義「自我負責」的原則的大轉變。資本家的這些讓步，證明了危機的嚴重性，但也因此，資產階級經常保持著反撲的念頭與行動。

(b). 爲了達成高水平就業與景氣的上揚的目標，國家以各種金融、財政政策來創造市場並擴大整個經濟活動的規模。例如，國家藉由操作利率和貨幣發行額，來維持物價的穩定和刺激投資；以累進稅率和福利制度來進行所得的再分配，以便擴大消費市場；以大型公共工程與軍費支出來創造市場等等。

這種創造市場需求的經濟政策，爲深受不景氣和停滯所困擾的資本家帶來了獲取利潤與積累的機會，而頗受歡迎。尤其是以軍費支出來創造市場的手段，使壟斷企業可以避免與中小企業競爭而容易被採用。

(c). 追求持續性經濟成長是最終的政策。因爲，一方面爲了因應勞動者的要求，必須維持高水平的就業，並在高就業率的條件下提高生活水平和完善的社會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要滿足資本家獲取利潤和資本積累的欲求。所以，只有維持經濟的持續成長，才能使勞資雙方都得到滿意。因此不僅要持續採用前項所述的各種手段，也要在安定的國際匯兌、貨幣和貿易秩序的基礎上，擴大貿易、提高生產力、振興技術發展和創造新興產業。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持續性經濟成長，容易引發並加速通貨膨脹，也可能發生景氣過熱、成長趨緩甚至負成長的現象。因此，政策執行者必須經常留意可能導致經濟成長不安定化的各種情況發生，諸如：通貨膨脹等。（所以，北原氏反對大內力氏，在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中所說的：「以恢復景氣、提高通貨膨脹率和降低實質工資」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政策核心的主張。）

壟斷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由於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所採行的各種政策，而獲得緩和或抑制。但是，在另一方面卻也會使矛盾深化或多樣化，甚至出現新的矛盾而產生摩擦。因此，總合性地掌握上述各種政策與制度的特徵，以及在那種條件下各個矛盾的運動方式並將其理論化，就是新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掌握由於國家介入的經常化所規定的時代特徵，並進一步建構新的理論論述，是可行而且必要的。

(2) 冷戰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以美、蘇兩個超級軍事大國

為首的「冷戰體制」的形成，才確立下來。因此，其內容也由冷戰的變遷所規定。

二次大戰後的資本主義並非單純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是基本上由冷戰所規定的，可以說是「冷戰下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考慮冷戰這個條件及其規定性，就無法分析現代資本主義。

「冷戰體制」和其主要的規定如下：

1/.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聯盟」的形成：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主義世界以擁有巨大生產力和軍事力的美國為中心進行對蘇聯集團冷戰。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則或多或少在從屬於美國的意志之下，施行本國的國內政策。這種情形在性質上，有別於戰前各個自主主權的國族國家(Nation State)，以列強的身份所形成的帝國主義對立。因此，雖然同樣稱之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卻完全不同於二次大戰之前以獨立的主權國家介入本國經濟的情形。

以美國為盟主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聯盟」，為了進行冷戰，為了協調和調整資本主義陣營的各種利害關係，構築了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和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以進行對開發中國家的支配和援助。

2/.提高軍事角色的比重：

在世界規模的冷戰時期，為了體制的存亡必須保持龐大的軍事力量。因此，與軍事相關的部門，通常在財政和生產方面佔有相當的比率；先進的軍事技術開發政策，對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美國龐大的對外軍事支出、對外援助以及在「熱戰」(韓戰、越戰)時期的巨大開支等。

3/.在國內，不得不致力於推行「讓步政策」：

在冷戰的壓力下，為了鞏固資本主義體制，將勞工階級納入體制內並削弱社會主義勢力，必須強化其高就業率政策以及整備和擴充社會保障制度。

4/.必須維持「持續性成長政策」：

為了避免內部矛盾激化而產生危機，必須對勞工階級做出讓步，同時為了龐大的軍事支出以及對外援助，必須動員所有的政策，強力推行持續性經濟成長。就二次大戰後的持續性經濟成長而言，由於：

- ◎美國所主導的國際協調體制(IMF、GATT)的形成；
- ◎各國政府在國際協調體制的基礎上的成長政策(包括技術政策、產業政策和預防經濟過熱的政策等等)；
- ◎以美國為主的技術革新(新的生產方法、新產品和新產業)和美國生活方式(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世界性普及；
- ◎巨大的壟斷資本(尤其是美國的跨國公司)的資本輸出和先進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的飛躍性擴大；
- ◎由於美國的對外軍事支出和對外援助，導致美元的世界性擴散。

上述因素的作用，擴大了投資、生產、就業、工資和消費的相互依存性，而這種依存性便是以「持續性經濟成長」的型態現實化。亦即，持續性經濟成長是這些因素總合作用的結果。

因此，持續性經濟成長的破綻及隨之而來的嚴重停滯，也可由此觀點來進行分析：

(a). 支撐持續性經濟成長的國際架構的崩潰和美國地位的下降：

由於進行耗費頗大的冷戰體系，加上日本、德國的迅速發展，降低了美國國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71年以後，美國的國際貿易收支出現赤字)，因此美國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片面終止黃金／美元的兌換，導致戰後IMF體制的崩潰。此後由於美國產業衰退的深化，產生經常帳赤字和財政赤字的常態化和龐大化，逼使美國減少對世界的美元擴散。

(b). 支持成長的技術革新及其普及化告一段落，而劃時代的新技術和新產品也開始枯竭。因此由於新興產業所帶來擴大市場的作用也日漸趨緩。

(c). 先進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不再擴大；

(d). 由於上述原因，以工資上昇作為契機而發生經濟成長的破綻。因此，壟斷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經濟停滯，就以比國家壟斷資本體制確立之前，更加嚴重、更具持續性的方式顯現出來。也就是說，壟斷企業所無法處理的資本過剩和產能過剩的特質，由於國家實行經濟恐慌的預防政策而更加惡化。

(e). 針對停滯基調的出現而實施的各種應變措施，不僅無效而且產生新的矛盾。例如，停止黃金／美元的兌換之後，由美國開始實施的刺激景氣政策，加速了通貨膨脹並波及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美國因此改採抑制總需求的政策，卻導致景氣低迷並造成中東產油國家，爲了因應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而提高油價，因而出現石油危機；由於先進國家的再生產機制受到攪亂，而引發'74~'75年的不景氣，出現了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現象，也就是出現了Stagflation(停滯stagnation + 通貨膨脹inflation)。

80年代雷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就因應著這種情況而出現，那就是：一方面，高唱「強大的美國」的復活，挑起和蘇聯之間的核子、飛彈軍備競賽，引誘蘇聯消耗國力使其陷入崩潰局面；另一方面，以強勢鎮壓來削弱勞工組織的力量，削減冷戰期間所擴大的資本負擔(即，高就業、社會保障、對大型壟斷資本的規制和稅賦、對高所得者的累進稅和財政赤字等)。

雖然雷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抑制了通貨膨脹並且帶來了暫時性的經濟復甦，但也帶來了不正常的利率上昇和美元升值，導致美國的經常帳赤字和財政赤字更加龐大化。

不僅如此，由於新自由主義政策放鬆經濟管制和推行金融自由化，引發在經濟停滯下的投機性交易的龐大化、國際貨幣和證券市場的混亂化。影響所及，不僅是美

國的國內經濟，也把整個世界經濟拖入停滯和混亂的深淵裡。

(3) 「後冷戰」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重新整編

在「後冷戰」的新形勢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進入重新整編、重新建構的過程。

1/. 在「後冷戰」的新形勢下，資本主義各國之間需要強化和維持協調體制，因而要求建構一個安定的世界秩序。也就是說，爲了克服經濟停滯和失業問題，也爲了重現持續性的經濟成長，需要再建構一個安定的世界秩序——如，國際貨幣管理制度、國際不均衡調整機構、抑制國際投機的機構等等。同時，更由於下列的原因，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必須強化協調機制：

(a). 以資訊革新(Multimedia和internet等)爲中心的，資本、資訊、技術、勞務的國際性流動，也就是所謂的資本全球化(Globalization)，正在加強世界的統一性以及進行世界範圍上的勞動社會化；

(b). 推進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集團的資本主義化。

2/. 冷戰的結束，可以減少美國龐大的對外軍事支出和對外援助，但是由於產／軍複合體的反對和擔心失業率的上昇，不易大幅度的削減軍力。再者，爲了調整以及壓抑在「後冷戰」下頻繁發生的地區間、民族間、宗教間的紛爭，美國需要各國的協力性軍事介入以及分攤軍事費用。因此，就整個世界而言，軍事支出似乎暫時不可能有大幅度的縮減。

3/. 由於冷戰的結束，減少了「國內讓步」的必要性。勞工組織在持續性經濟成長的過程中被體制統合後，又在雷根主義、佘契爾主義的強勢鎮壓下被弱化。所以，社會福利預算的削減以及因爲企業重建而解雇勞工，就成爲必然的趨勢。

4/. 爲重視持續性成長，各國之間互相協調，準備根據「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中所提到的兩個方向，以財政、金融政策促進成長。

(a). 依據新技術、新產業的經濟開發，如美國政府的資訊革命促進政策；

(b). 依據對外擴張的發展——促進以亞洲爲中心的非資本主義地區的資本主義化，來發展本國經濟。

朝向這兩個方向的經濟政策，能否獲得成功還有待觀察。說不定反而會引發先進國家內部的產業空洞化，導致停滯和失業問題的解決更加困難；也有可能會引發先進國家之間或是先進國家與新興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對立；更有可能由於地球的溫室效應以及對環境生態的破壞而受阻。

就整體而言，上述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重建方向和內容，是希望以建構非經濟性的公權力並以其介入經濟爲手段，所以基本上還是呈顯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特徵。〔待續〕

編輯報告

五·二〇新政權正式登場，這一政權的性質、政策走向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這是大家都很關心的議題，因此我們特別以【新政權初探】為本期的主題，相關的文章包括：林深靖〈政治決策或宗教密碼？〉，從阿扁就職演說內容分析未來政權不脫族群意識及為資本家服務的特質。林書揚的〈從一中一台到兩個中國〉，指出了新政權採取的拒統不急獨佈局，戰術空間正在日益受到壓縮。石之瑜〈馬克思也瘋狂〉，逐層分析全球資產階級對兩岸關係出現的樂觀評估及其誤解的原因與可能結果。伍艾蘭〈新政權的可能走向與對台灣社運的影響〉，以新政權的核四政策為例，說明已經取得政權的民進黨正在快速的變質，他並提出警語：為了掩飾他們理念上的轉向，可能會對仍然堅持理念的社運人士倒打一耙。

李登輝已經下台了，在他當權的十二年裡，究竟對台灣產生了那些影響？我們應該如何破解後李登輝時代的李登輝主義？蔡建仁的〈破解李登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思考的途徑。左思〈從林義雄拒絕續任民進黨主席談起〉，透過林義雄辭去黨主席一事，探討民進黨近年來種種退步的作法與傾向。

今年是光州抗爭二十周年，臧汝興的〈光州事件的啓示〉探討光州事件的經過及其對韓國社會運動的影響。同時，我們特別為讀者準備了一份光州抗爭的大事記，讓年輕的讀者對於光州事件有一全貌的認識。鄒議的〈護衛良心權的鬥爭〉，透過比較韓國今日在平反光州事件及國民黨針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不當審判補償案上處理的差異，揭露了台灣民主化市民運動的侷限性。

孫善豪的〈中華民國意識形態〉，剖析國民黨過去在中華民國意識形態上所進行的塑造工程及其影響。新上任的原民會主委尤哈尼打算對於不會說母語的原住民子女採取某些懲罰性措施，對此，原權會部落工作隊的〈尤哈尼要用功利的箭搶救原住民母語〉有不同的意見。本文轉載自《原住民族》雜誌，這是一份由原權會部落工作隊成立的新刊物，他們正積極地進行「原鄉重建」與「原運再起」的艱難工作。

本期的連載共有兩篇，蕭喜東的〈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需要檢討〉，本文第一部份刊出後引起許多讀者回響，因此我們決定一口氣將該文全部轉載完畢，希望左翼的朋友能夠針對兩岸關係及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這兩個敏感的議題，繼續進行深入的討論與交流。黃志龍的力作〈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本期主要是探討戰後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理論發展。

讀者們一定注意到《左翼》封面上的變化。《左翼》出版之初，我們即決定要以最素樸的形式發行，因為我們深知：如果要與這一惡質的體制進行長期對抗，勢必要擺脫資本主義一般文化工業運作的邏輯，不受資本的制約，才足以支撐下去。在《左翼》出版六期後，我們決定在不增加生產成本的情況下，每期在封面附上一幅象徵左翼力量的版畫，一方面增加刊物的視覺效果，同時也讓讀者欣賞到勞動人民在藝術上的成就。希望您會喜歡《左翼》這一小小的變化。

左翼 第七號

出版日期：2000年5月31日

初版三刷：2001年4月30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八號

三刷



〈朝鮮半島南北交接圖〉 作者：박 건

【朝鮮半島的民族分斷與和解】	韓戰的內部與外部因素	黎建江 / 2	
冷戰中的恐怖結構	劉鳴生 / 6	韓戰經驗的克服	洪根洙 / 11
南北高峰會談的評價與未來南北關係應該走的方向		姜禎求 / 16	
【爭鳴與求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台灣問題初探	汪立峽 / 19	
多佛港的大陸偷渡客慘案	施威全 / 28	談中國大陸的人口走私問題	俞力工 / 29
簡論當前電視改造方向	馮建三 / 32	全產總的危機	柳如慧 / 36
全民政府即是權民政府？	蘇活 / 37		
【特稿】	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四) 續完	黃志龍 / 38	

韓戰的內部與外部因素

黎建江

一、前言

韓戰是二次大戰後的分水嶺。在二戰中，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的蘇聯為抵抗納粹所建立的反法西斯國際統一戰線因韓戰而徹底瓦解，開啓了爾後四十年的冷戰對峙。

美國在亞洲的布局也因韓戰的爆發而產生鉅大的轉向。一九四九年中共完成革命之後，美國政府主張承認新中國政府的主張一度占了上風；由於韓戰，這派主張遂被打入冷宮，美國因而失去及早與新中國建交的時機。美國政府並展開長期對新中國全面的圍堵與封鎖。

對於台灣，韓戰更改變了台灣的命運。由於韓戰，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阻止中共的渡海，造成兩岸長期分割的現狀。近半世紀來，台灣內部政局的形成，包括戒嚴、白色恐怖反共清洗、經濟與思想文化的高度依賴美國，等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受韓戰的影響。

可以說，韓戰是二十世紀的重大轉折點。

對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性事件，有必要從歷史性的脈絡著手，才能真正了解它。

二、韓戰成因的演變史

早期西方主流媒體與政客們，對於韓戰成因的說法，幾乎眾口一辭地認為，韓戰是蘇聯赤化世界的一個步驟。在史達林的運作下，北韓「侵略」了南韓，因而爆發了韓戰。

例如，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在他於1956年出版的回憶錄第二冊，便毫不猶疑地認為，「共產主義在韓國的作法，就如同過去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日本人的作法一樣。」當時美國國務卿艾奇森在1951年美國國會作證時也聲稱：「莫斯科射來一根利箭於牆上，帶來這個警告信：『投降，否則就被征服！』。當然，亦有冷靜的見解，如美國的外交家柯南（George Kennan）便認為韓國只是韓國內部的衝突，原非國際戰爭；「而所謂北韓的『侵略』，完全誤用『侵略』的正常字義」。

柯南的見解在當時美國政界是空谷足音。然而，日後西方學界的研究，卻發現他的說法最接近真實。90年代末，美國政府辦了一個回顧韓戰的研討會。第一場：「歷

史舞台的形成：韓戰的起源」，唯一的論文發表人馬特雷（James I. Matray）便指出，韓戰成因的解釋四十年來出現戲劇性的變化。他引述 1980 年代出的幾本研究韓戰的書，認為韓戰原來只是一個內戰，所謂「北韓的侵略」，其實乃是內戰末期北方最後一次攻擊，猶如在國共內戰中，在三大會戰之後中共最後的渡江戰役。垂死的李承晚軍隊就如當年退守江南的國民黨軍隊一樣，面臨被朝鮮人民軍徹底消滅的命運。或許這齣戲才於一、兩年前在中國演過，美國政府在記憶猶新之下便迅速地介入韓戰，並極力宣稱這是北韓在蘇聯操控下對南韓的侵略，以正當化其行徑。當然，當時美國政府充滿了恐共、反共的情緒，「真心」地相信韓戰是蘇聯赤化世界的一部份，因此其宣稱更顯得理不直而氣壯，迷惑了西方一代人的想法。

三、韓戰是韓國內部矛盾的產物

馬特雷認為，對韓戰成因解釋的戲劇性變化，主要是康明士（Bruce Cumings）的貢獻。康明士於 1981 年出版了極具影響力的力作：「韓戰的起因（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搜集了大量美國與韓國方面的資料，認為要了解韓戰的原因，首先要了解 1945 到 1950 年韓國的歷史，甚至要從日本殖民時代的韓國史來考察，質言之，從日本殖民統治起，韓國內部便發展出一股抗日力量，他們追求民族的解放與國家的獨立。當然，這股抗日力量由於其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是一股主張社會主義的左翼力量，並深受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及當時蘇聯反帝反殖民主張的鼓舞。這股力量成為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國際反法西斯運動的一部份。

日本投降後，他們繼續進行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的工作。但這時由於美國的扶植李承晚，遂爆發了韓國的內戰。由於李承晚軍隊並不是根植於韓國社會（特別不是發展自韓國原來的抗日力量），全靠外力（美國）的支持，在內戰中便不敵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軍。在這個情況下，李承晚只有請求美國出兵參戰。

這情形當時在亞洲是相當普遍。在二次大戰期間（有些地方還可追溯到戰前），日本在亞洲的侵略激起亞洲各國人民的抵抗。這些抵抗力量多數都由左翼份子來領導。十月革命給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人民的反帝反殖運動很大的啓示，左翼運動便在亞洲遍地開花。在日本侵略來臨時，各國的殖民及封建統治者都無力抗爭，甚至投降而成爲日本侵略者的幫凶，置廣大老百姓於侵略者的鐵蹄下呻吟。於是各國最堅決的抗日運動便只有由深具反帝理念的左翼人士來領導。當日本戰敗後，這些長期抗日的左翼力量由於深受人民的擁戴，便成了戰後各國的主要政治力量。

四、美國的介入

亞洲各國這股由左翼人士領導的政治力量引起美國高度的不安。美國在戰後想獨佔亞洲勢力範圍，這是美國政府認為他們打敗了日本軍國主義後應享的果實(美國當然不會把中國抗日的貢獻考慮在內)，這更是十九世紀末美國轉型成帝國主義後積極尋求亞洲市場的邏輯結論並且在雅爾達會議中英、蘇兩強的認可。雅爾達會議三強共議戰後的勢力範圍，美國並說服蘇聯出兵對日宣戰。在勢力範圍的爭執上，主要集中於歐陸。出乎美國意料之外，史達林對戰後亞洲的勢力範圍並不太在乎，甚至包括答應對日開戰，亦未要求與美國共同佔領日本(如歐洲三強戰後共佔德國那般)。史大林要的，只是一個貧瘠的外蒙古，以及朝鮮半島的暫時分佔，其他地區，包括廣大的中國市場，全都劃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因此，美國之簽定雅爾達會議，在歐洲部份雖然曾經引起美國國內一些人的批評，認為對蘇聯讓步太大；但在亞洲部份則未聽到不滿的批評。

在得到雅爾達體制的認可下，美國從十九世紀末起便想獨佔亞洲勢力範圍的夢想終於露出實現的曙光。但這個半個多世紀的夢想卻毀在中共革命的手中。中共在基本上沒有外援(蘇聯因在雅爾達會議的承諾，在國共內戰中基本上是中立的)下，打敗了受美國大量援助的國民黨軍隊，從而破壞了美國獨佔亞洲勢力範圍的企圖。這是美國帝國主義在戰後稱霸世界企圖中最大的挫折。

韓國的內戰，正是中國國、共內戰的翻版。有了「失去中國」這種刻骨銘心的教訓，美國不能再聽任李承晚軍隊的覆敗。僅靠援助是不夠的。正如在中國國共內戰末期，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曾說：挽救中國的戰局只有靠他直接帶兵投入戰場。這次在朝鮮半島的戰役他便毫不猶疑了。

五、中共的介入

中共的介入韓戰，完全是客觀形勢逼迫出來的。這一點目前已受到多數研究韓戰學者的公認。

韓戰爆發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剛過半年。對於剛經歷了八年抗日加上四年內戰，再加上貨幣、經濟的崩潰以及國民黨內殘存力量的清理，就已足夠令中共領導人忙不過來。在新國家剛誕生而未站穩腳步之際，維持和平而友好的國際環境是施政的首要考慮。

基於這種考慮，中共明知從調停國共糾紛起美國便不會安好心，明知美國已介入朝鮮的內戰，中共並無任何跡象打算介入韓戰。中共看待朝鮮內戰，就如中國國共內戰一樣，金日成領導的朝鮮人民軍終究能夠打敗李承晚，即使有雅爾達會議的限制。雅爾達也是把中國劃入美國的勢力範圍，但中共的革命成功推翻了這個國際強權的安排，在中共(及北朝鮮)的心目中，雅爾達對朝鮮半島三十八度線的設置亦可透過朝

鮮人民的革命而推翻掉。正由於這種考量，中共與蘇聯更加不會介入朝鮮半島的內戰。

因此，中共的投入韓戰，完全是後來形勢逼迫出來的。

中共投入韓戰的代價是非常高昂的。除了上述對新國家建設的分心以及戰場上直接的傷亡之外，還因為與美軍的對峙而受到美國日後在軍事上的圍堵，在經濟上的封鎖，在外交上的孤立以及台灣問題的長期化。

但是，中共的投入韓戰也有豐富的果實。打敗了美國這個不曾敗過戰的超級強國，不僅對中國的民心有極大鼓舞，也感染了全世界反帝民族解放運動。「帝國主義是紙老虎」這個說詞成了50年代至70年代第三世界反帝運動的信條，對於世界左翼運動的影響甚大。至於鞏固中國的國防，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等等，更不在話下。

因此，中國之投入韓戰雖是被動的，中國也因此承受鉅大的損失；但中共也不是無奈地接受強權的擺佈。中共從被動的參戰中得到鍛鍊，得到成長。

六、蘇聯的態度

和當時美國的說詞相反，蘇聯不僅不是北韓「南侵」的策動者，甚至對介入韓戰採取極端謹慎的態度。

當美軍在仁川登陸成功，北韓的局勢開始惡化之際，金日成迅速向中共尋求援助。中共領導人在激烈爭論後作成派遣志願軍赴朝的決定。為此，毛澤東派周恩來專程赴莫斯科向史達林說明。毛澤東知道史達林的顧慮，深恐因此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史達林不願此時便與美國攤牌。因此，中共並不要蘇聯參戰，僅在外交上表示支持，並提供武器即可。史達林原本答應了，但第二天當周恩來剛離開後便反悔了。為此，周恩來十分生氣，要史達林遵守協議。最後的協議是，蘇聯在外交上支持，但卻不提供武器及後勤補助。於是中共打韓戰，不僅出人還要出錢。

史達林的保守態度和他對中共一貫的態度是一脈相承的。史達林不相信中共的革命會成功，也不太樂意看到中共革命的成功。另外，從雅爾達體制的安排中，可以看到史達林關心的是蘇聯這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定。他對東歐國家劃入戰後蘇聯勢力範圍的要求，主要是出於這層考慮，即劃出蘇聯與西方資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緩衝地帶；而不是為了支援東歐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要求，易言之，史達林對所謂「赤化世界」的企圖心，遠沒有西化反共人士所形容的那麼強烈。

相對地，毛澤東的國際主義色彩要比史達林高多了。派兵入朝，對毛澤東來說，國際主義的考慮與國內需要的考量是同等份量的。

★

冷戰中的恐怖結構

從麥卡錫主義到紅色獵殺

劉鳴生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距今50週年；1975年4月30日，越戰結束，今年是25週年紀念。二次大戰之後，西、東兩大陣營對峙的局面在亞洲的韓、越兩國同時以國家分裂，南北對立的型式展開。這兩場戰爭是「冷戰」期間的「熱戰」，是代表「自由世界」的美國對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世界」執行「圍堵」(containment)政策的歷史見證。

和平不成，戰爭不像

韓戰爆發，台灣隨即被劃入美國第七艦隊巡防保護的範圍，是圍堵共產主義的一個重要環節。在美國的保護傘之下，台灣當權者在政治上以「反共堡壘」自居，在軍事上則奉行美國軍令，以做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而自豪。「不沉的航空母艦」是美軍韓戰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的用語，他認為美國必須控制台灣，以便美國「用空軍控制自海參威到新加坡的每一亞洲海港」。越戰爆發，台灣則為美軍提供了最佳的補給、休閒服務。叢林戰場上飽受驚嚇的美國大兵，在台北中山北路的酒吧裡得到溫香軟玉的回報。海峽兩岸的分裂局面因韓戰而確立；越戰期間的酒吧文化則擴衍為意識型態上的親美（從臉頰直親到老二）、媚美（施政者以取悅老美為職志）習性，即使換了政府，阿扁還是以「讓美國滿意」為施政最高準則。美國永遠是必須巴結、依附的主子。從這個角度來看，台灣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韓戰與越戰。

台灣參與韓戰與越戰的另一個例證是：從50年代到70年代，除了烽火戰場上的血腥殺戮之外，從美國本土到由美軍所操控的南韓、南越領土之內，都進行著十分慘厲的「大清洗」運動：以肅清境內的「共產敵人」為口實，展開對所有左翼人士的檢查與清剿。任何人只要與社會主義沾上了邊，都可能被控以「通敵」的罪名，輕者飽受騷擾威嚇，重者屍骨不存。前線的戰爭狀態延伸為後方的全面整肅，情治單位不斷坐大，成為製造「白色恐怖」的大怪獸。而這一切，在台灣內部，被準確地複製。

關於二次大戰之後的全球冷戰結構，法國社會學家阿宏(Raymond Aron)曾經以「和平不成，戰爭不像」(Paix impossible, guerre improbable.)來形容其詭異的狀態，一種窮兵黷武的和平狀態。「冷戰」的用語首先出現在美國，由先後擔任羅斯福總統和杜魯門總統經濟顧問的巴魯克(Bernard Baruch)所提出，後來資深記者利

普曼(Walter Lippmann)廣泛使用而成爲套語，利普曼還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冷戰》。1947年左右，與冷戰一詞同時出現的還有「共產世界」和「自由世界」的對立命題。前者有時候也被「極權世界」或「鐵幕」(邱吉爾和杜魯門首先使用)等名詞所替代。當時美、蘇兩極化的衝突，除了軍事上的武備競賽之外，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型態，都在鬥爭糾纏之列。而在語言學方面，美國即使不是大獲全勝，至少也是占了上風。然而，這種不假思索的道德化語言，卻也在「自由世界」內部產生極端緊張的社會關係！

回到宗教法庭的時代

反映在美國本土的是麥卡錫主義所煽起的「獵巫」運動。1950年2月9日，威斯康辛州選出的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在一個紀念林肯誕辰的聚會上發表演說，聲稱他手上握有一份205人的名單，這些人在政府部門組織了一個共產黨的間諜網絡，他們是侵害美國的叛徒，目的在擴大共產勢力，讓「自由世界」逐日退縮。一時之間，美國社會彷彿回到中世紀宗教法庭的時代，異教徒常被以巫師、巫婆的罪名投入火堆。麥卡錫並沒有創造麥卡錫主義，他只是以最粗暴的語言激發潛藏在美國社會內部的不安。其實，早在1946年，杜魯門總統就成立了一個特種委員會，專門調查聯邦公務員的「忠誠度」，凡有「安全顧慮」(security risks)者動輒被解職(最近的「李文和案」，彷彿又看到這個委員會的影子)。司法部門列出「顛覆組織」的名單，這些組織的成員及其友人都被預設爲「嫌犯」，同時也是聯邦調查局(FBI)監控的對象。麥卡錫的數字就是來自情治單位的調查資料。

從1947年到1954年，共有1054位公務員遭到解僱的命運。即使在好萊塢電影圈也是人人自危，賈利·古柏(Gary Cooper)、華特·迪斯耐(Walt Disney)，乃至當時擔任演員工會主席後來幹上美國總統的雷根(Ronald Reagan)都曾被迫做清白的表態。有多位引用《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論自由保障而拒絕做交代的演員，後來被送進了監獄。即使像卓別林這樣的喜劇大師，也被迫離開居住了41年的美國。

「自由世界」與「極權世界」之分形成一種語言的污染，那些自許爲「自由派」(liberal)的人士，那些公開要求社會改革的異議分子，那些鼓吹種族平等的街頭運動者，往往就被視爲「同路人」，而「同路人」即是共產黨，共產黨就是蘇聯的間諜，就是美國的叛徒。作家的文字受到嚴苛的分析和檢查，不合規格者往往就被沒收護照，撤銷美國公民資格。寫有《一個推銷員之死》的名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就曾經因爲被放逐而潦倒異國。「愛國專家」胡佛(J. Edgar Hoover)所主導的聯邦調查局成爲一個龐大的、對內開打的戰爭機器。

1950年麥卡錫的危言指控之後，各州即有大大小小的調查委員會成立，形形色色

的「黑名單」和「灰名單」到處流傳。凡是名列黑名單的人，即使是教師或工人，也很快就面臨被解僱的厄運，而且黑名單如影隨形，他們幾乎再也找不到工作。灰名單上則是有嫌疑的分子，一旦列名其上，別人也就敬而遠之。有些人爲了自保，揭露同學、同事、親友；有些人甚至以捏造、誣告來了結個人私仇。這種風聲鶴唳的氣氛，連駐外單位也不能避免：1953年，麥卡錫調查委員會的成員科恩（Roy Cohn）和席尼（David Schine）展開美國駐外文化機構的調查。一回到國內，他們就主張各大城市美國文化中心的圖書館都應迅速進行清理，因爲書架上堆滿了「共產黨的書籍」，理應全部燒毀！

集體性的恐共、仇共情結

二次大戰的結局讓舉世都見識了原子彈的威力，美國也因此興起依其面貌重塑世界秩序的雄心壯志。但是，1949年，蘇聯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同年，毛澤東在中國大獲全勝。翌年，韓戰爆發，美國從二戰勝利的狂歡中驚醒過來，發現世界正在逐漸脫離其掌握。爲了展現其領導世界的努力與決心，美國介入了韓戰。

美國本土「獵巫運動」的全面開展及宣傳，塑造成集體性的「恐共」、「仇共」情結。美軍是帶著這樣的情結進入韓國戰場的。韓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翌日，美國即緊急調派駐日部隊開往朝鮮半島。6月27日正午，杜魯門總統公開聲明，對朝鮮戰事進行武裝干涉，艦隊並隨即開入台灣海峽。當晚，在蘇聯代表缺席的情況下，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追認出兵朝鮮的既成事實。集體性的恐共、仇共意識在戰場上發酵，變成對「疑匪」，對可能的「附敵者」無情的獵殺。麥卡錫主義渲染下的「萬惡共產黨」激發了美軍的嗜血慾望，並在戰場上通過機槍和炸彈獲得最大的滿足。

美軍一進入南韓境內，即進行堅壁清野，肅清潛藏的人民軍。許許多多逃離戰亂的難民，卻因此死於非命。上級的指令是：可疑的避難者，無條件射殺。美軍屠殺良民的事件，近幾年來才逐漸被揭露。「老根里事件」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1950年7月26日，第一機甲師團所屬的美軍在忠清北道永同郡老根里的鐵道旁，活生生射殺了300名避難平民，只因爲他們的身分被懷疑。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戮，在戰爭過程中層出不窮。根據南韓民間團體「良民屠殺對策委員會」的調查，光是國防部紀錄有案的，就有37件之多。北韓當局的統計資料當然更爲龐大：僅僅在戰爭初始的1950年7月一個月內，美軍即在南韓13個市道，共屠殺了42008人。

1950年10月，美軍開始往北韓推進，在「焦土化計劃」的指令之下，被無辜殺害的平民更是難以計數。據統計，僅僅到1950年底，即有17萬以上的平民死於美軍的屠戮。其中，在信川郡被美軍殺害的即有35383人，占當時該郡總人口數的四分之

一。

美軍在韓戰期間對平民的大量屠戮，除了因集體化恐共、仇共而衍生「獵殺紅匪」的亢奮情緒之外，種族歧視也是原因之一。手無寸鐵、黃皮膚、矮個子的韓國百姓，在手中握有精密武器的美國大兵看來，是劣等民族，其生命低賤如土。恐共、仇共情結加上民族優越感，塑造出一批又一批冷血的殺人機器。這些殺人機器在越戰中造成更驚駭聽聞的人間慘劇。

以殺人為樂事的「終結者」

1965年3月，詹森總統派遣兩營海軍陸戰隊登陸越南峴港，美軍正式捲入越戰。到1975年4月30日自西貢撤退為止，十年之間共有二百多萬美軍在越南服役。25年之後，這些越戰老兵如何看待這一場戰爭呢？今年有一部集體拍攝的紀錄片發表，名為《冬日戰士》(Winter Solider)，由越戰老兵敘述他們自己對戰爭的記憶。從他們的敘述中，可以了解國家機器是如何抑制他們的道德意識，如何激發他們攻擊、侵略的動物天性。他們提到教戰手冊中的句子：「一個活著的越南人，就是有越共嫌疑的人；一個死去的越南人，就是真正的越共。」「如果一個農人在你接近時逃跑，那麼他是越共；如果他不逃跑，那麼他是聰明的越共。在兩種情況之下，都必須將他射殺。」

這樣的戰爭邏輯，將每一個美國兵士都變成以殺人為樂事的「終結者」。老兵們還談到，當時的「獎勵制度」是：以越南人的耳朵(不管死的、活的)換取罐裝啤酒，耳朵數目越多，喝得越是過癮。至於焚毀村落、強暴、刑求、以小孩為槍靶……更幾乎是每天的例行故事。美軍當然也拘捕了不少戰俘，由直昇機運送到集中營。但是，老兵說：「我們被教導，要算戰俘的人數一定要等到直昇機降落之後，因為，有一部分，早就在飛翔途中丟了下去……」

美軍最後是屈辱地離開了。但是，美軍在越南使用了1500萬噸爆炸物，4200萬公升落葉劑。戰後25年來，依然有38248個越南民眾死於未爆彈，有1000萬人受到落葉劑的毒害，落葉劑污染地區的畸形兒比例特高，越戰的傷痕將延續好幾個世代。

韓戰作戰人員的死亡數目，南韓30萬，北韓52萬，中國90萬，美國14萬2千，一般估計全韓因戰爭而喪生的人數高達300萬。越戰中，美國有5萬8千人喪生，越南因戰火而死亡的人數超過300萬，而且，戰爭遺毒蔓延，即使時隔25年，數目還在不斷累增當中。

進入「後冷戰」的時代

一般人定義「冷戰」，或強調其懸而未決的對峙狀態（譬如阿宏「和平不成，戰爭不像」的說法）；或從核子彈頭「恐怖平衡」而強調其不得不然的冷靜與自制。這都是偏重其「冷」，而忽略其「戰」。韓戰和越戰正是「冷戰」期間的兩場「熱戰」，對朝鮮半島和中南半島的居民來說，都是極端狂熱、酷厲，難以抹滅的血腥記憶。何「冷」之有？

美軍所到之地，更留下了一個恐共、仇共的恐怖結構：威權政府利用軍方武力和龐大情治系統，對異議分子全面的網羅和刑戮，南韓和台灣尤其是最鮮明的例子。早在1948年4月3日，在美國軍政統治下的濟州島發生民眾抗爭事件，美軍協同南韓軍警展開武裝鎮壓，以討伐共匪為名，在濟州全島進行搜捕、屠殺，受難者多達3萬人。直到1980年的光州事件，美國支持全斗煥政權派兵鎮壓，有250名示威者慘死街頭。

此外，根據1950年6月27日《紐約郵報》的報導，美國在決定參與韓戰的同時，聯合參謀部所擬定的遠東政策中，即決定「採取防止台灣陷入共產黨之手的任何措施」。這些措施當然包括支持蔣介石政權以「反共」之名進行清除異己的工作。蔣介石在美軍第七艦隊的協防翼護之下，展開一場對台灣島的全面大掃蕩。白色恐怖從50年代持續到80年代，無數知識分子、農民、工人因「匪諜」之名而被捕入獄、失蹤、死亡。直到1984年12月，被關押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終於在入獄34年又7個月之後獲得假釋，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台灣才真正從白色恐怖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在台灣，我們習於依循美國的說法，將冷戰定義為「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對峙，相對於「邪惡」的共產世界，自由世界提供了美好的夢想。然而，血腥的歷史告訴我們，所謂「自由世界」其實有它恐怖的一面，而且不是單一的恐怖事件，而是一整個恐怖的結構。這一結構曾經侵吞了無數的性命，曾經使無數人的身體遭收摧殘，無數人的精神遭受難以想像的折磨。兩韓高峰會之後，我們算是真正進入「後冷戰」的時代。這個時候，回顧前塵，我們需要更多的冷眼去觀察世局，卻也需要一副熱心腸去改變那些被扭曲的現象，改變不合理的歷史構造。 ★

韓戰經驗的克服

(南韓) 洪根洙
臧汝興 譯

一、前言：留為 21 世紀的課題的韓半島統一

限制著現今韓國人的生活與歷史的民族分斷，迫使住在南韓與北韓的所有人過著畸型的生活。雖然我民族的分斷是外勢所逼，但我們民族仍應該以自己的智慧與力量以及團結，來克服分斷。但很遺憾地，我民族自 1945 年分斷，更準確地說是從 1948 年 2 月 7 日分斷（註 1）以來，已歷經 20 世紀而進入 21 世紀，仍未來完成統一。民族統一不得不再度成爲 21 世紀的課題。

這塊土地上的民眾，在外勢的從屬結構、結構性的不義、壓抑性的體制下，遭到雙重的壓迫與榨取。我們民族也因而生活於不斷的分裂、對立、價值觀的消失與扭曲中。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民族分斷。

只有克服分斷，才能使一千萬離散家族團員重逢，才能使他們生活幸福、有意義；只有克服分斷才能使這塊土地上的勞動者、農民、貧民等過一個像人樣的生活，才能使被扣上左傾、親共、匪諜等的罪名，入獄坐牢的無數良心犯，重獲自由，解決韓國社會所有的問題與矛盾。

曾經一度，南韓內的部份極右保守份子，「興奮」於併吞北韓，完成統一。但，後來，國際上已經證實，北韓政權崩潰的可能性極微，因而，他們似乎已經放棄原先的想法。不過，他們很快又轉而期待周邊的四大強國或六大強國推動南北韓的統一。

也有些人提出全球化邏輯，主張我們民族應該放棄克服民族分斷的義務。事實上，全球化只不過意味著經濟的全球化，其實是美國對其全球主導權的再度「誓言」。美國與韓國的現政權所高唱的國際化或「全球化」，儘管帶著無數美麗的修飾詞，但實際情況已經證實其不過是一個塗了糖衣的陰謀。我們必須說，沒有真正的民族主義，地球共同體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我們堅決反對以地球村爲藉口的拒絕民族統一的主張。

在地球村化的趨勢下，韓國的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部份都在不斷從屬於美國。結果，韓國社會已經成爲一個人權與社會正義以及民主、平等、和平、統一等的價值，都逐漸地消失的畸形社會。當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民族分斷的長期化、穩固

化。

到底民族分斷是如何開始？爲什麼能夠如此持久？雖然很多人爲這個問題提出解釋，但所有的解釋，對美國的韓半島分斷政策的認識，都稍嫌不夠徹底，因此，本文希望再度強調此點。克服民族分斷，完成祖國統一是我們至上的課題，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並對應美軍的駐韓問題呢？目前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多不同的見解，大致可分爲主張美軍駐屯是必要的一方，和堅決反對的一方。筆者當然是站在堅決反對的一方。

我堅決主張美軍必須撤離是因爲：掌握世界霸權的美國，是製造、販賣高科技新型武器的世界最大的武器販賣「公司」，而美軍的駐屯使韓國成爲它的重要顧客；另外一點就是爲了保障東北亞以及世界的和平。

二、支配韓半島的分斷的美國

現今，美國對韓國人來說，到底具有什麼樣的意義？這是每個人想要真摯地思考民族自主、民族統一、和平等問題的人，都必須面對的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可以從韓半島的歷史中輕易獲得答案。首先，我們可以 1945 年以後的韓美關係中找到答案。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純樸的韓國人把入駐韓半島的美軍當做是解放軍，熱烈歡迎，但美軍其實是以佔領軍的身份入駐韓半島的。更令韓國人失望的是美軍的進駐 38 線以南，在美軍的眼裡是「佔領敵區」（註 2）。「以軍事佔領的姿態出現的美國，其在南韓的支配的首要目標，自然是迅速以新的殖民地秩序進行重編。」於是，「38 線成爲劃割資本主義體制與社會主義體制的冷戰體制的政治警戒線（註 3）。」美國的韓半島侵略政策並非僅侷限於西方帝國主義膨脹的十九世紀，在二次大戰之後，依然持續進行。

佔領 38 度線以南的美軍，將共同生活了一千年以上的單一民族，分割爲二。並在南韓實施了三年的軍政統治。1948 年 8 月，才將政權交給了自己的爪牙李承晚，讓李承晚在南韓建立單獨政府（譯註：非南北韓的統一政府），對南韓進行間接統治。南韓成立單獨政府在先，一個月後的九月，北韓以南韓先成立單獨成立爲由，也宣布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於是，韓半島的分斷終告「完成」。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韓國人了解到 6·25 韓戰只不過是美國的戰爭，韓國人只是在進行一場代理戰爭。在三年的戰爭中，共有 14 萬名美軍、1 萬 6 千名聯合國軍隊死傷，而南韓軍、北韓軍、中共軍的犧牲更分別高達 22 萬、60 餘萬、100 餘萬。民間百姓的死亡，南韓達 50 萬人、北韓更高達 300 萬人。另外，還有 300 餘萬從北韓

南下避戰禍的民間百姓，因而造成一千萬人的離散家族。

但是，韓戰的問題並未因三年的戰事結束而結束。『6·25韓戰於7月27日簽定休戰協定而終結。很多人以為這場帶來數百萬人的傷亡與同族相殘的悲劇的戰爭，就此結束了。但事實上休戰協定之後，南北韓隔著休戰線仍然展開「暗中的戰爭」，而且再度造成無數人的犧牲…（註4）。』

據最近一家周刊的報導，從1950年韓戰到1972年止，南韓派到北韓的情報人員中，共有7,726名死亡或失蹤。這個官方的統計，只會比實際數目低，斷無可能故意提高人數。如果說南北韓雙方都派了這麼多人員潛入對方地區，那麼某周刊所言的「到1972南北韓共同發表“7·4南北共同聲明”」為止，南北韓可以說是一直處於游擊戰狀態」，是極為恰當的形容。

自1950年韓戰期間，當時的李承晚大統領將南韓軍隊的作戰指揮權交給美國以來，至今南韓的作戰指揮權仍然掌握在美國手中。此點正可以看出南韓的民族的非自主化。美國對韓國的支配，是有韓美相互防衛條約、韓美行政協定、戰時國土徵用權等對美從屬性條約為後盾的。美國透過這些法律，得以完全實現其對韓國的支配。

另外，最近引起大家注意的老根里良民屠殺事件、坡州基地居民躲避事件、韓半島核武戰爭計劃、5027-98作戰計劃等，又意味著什麼呢？自從韓國版的梅萊村(My Lai)事件曝光之後，南韓其他地區的美軍屠殺事件，開始接連揭發，目前已有三十多個地區被揭發。

美軍的問題並不僅止於韓戰中的良民屠殺。今年初，駐屯在坡州的美軍第二師團愛德華軍營，發生了鄰近居民躲避事件，這說明了什麼呢？今年一月初，該軍營收到華盛頓的美國陸軍作戰中心(AOC)的通報說，“營內被設置了爆炸物，一旦爆炸，半徑一公里內將會完全被摧毀。該軍營收到情報後，立即將基地附近的所有美軍、軍眷，以及軍事設備、裝備，緊急疏散或搬移。但美軍當局卻在七個小時之後，才將此消息通報韓國當局。韓國當局開始疏散附近4,000多名居民，引起一片騷亂。這一事例說明了駐屯在韓國的美軍，不但不重視這塊土地的主人的生命與安全，而且，還給予非人的待遇。

前美國國防部長的一番話，實是令我們毛骨悚然。六年前的1994年六月，美國已經做好對北韓核武攻擊的所有準備，此時幸好到北韓訪問的美國前總統卡特，與金日成及時達成積極的協議，才使得核武攻擊命令於發出一小時前緊急撤回，韓半島得以倖免於戰禍。韓國人沒有人知道一小時後就將發生戰爭，我們能想像一旦戰爭爆發會有何等的後果嗎？大概不單是北韓，連整個韓半島都會被毀炸毀。

非但如此，一場足以令南北韓所有民眾毀於一旦的核武戰爭，美國竟能片面地、

稀疏平常地發表。雖說我們是一個喪失軍事主權的國家，美國怎能不與我政府、國民做任何的協商，就如此隨意發表呢？

去年11月李查基德·賀羅蘭(Richard Helloran)揭發的「5027-98作戰計劃」又是什麼呢？根據此項計劃，一旦有狀況發生時，美國將從距離休戰線155英哩處，展開對北韓的全面攻擊，一直打到北韓最北端邊境鴨綠江、圖們江，迅速佔領整個北韓國土，摧毀北韓政權。但是，決定此場戰爭的發動與否的不是南韓的大統領也不是北韓的主席，而是美國的總統。

我們韓國人懼害未來的戰爭的真正理由在於，它在性格上將完全不同於過去的韓戰，會是一場核武戰爭。美國已經公開表明，一旦韓半島發生戰爭，美國將發動核武攻擊。當然這樣的決定是從未與韓國政府商量過的。

美國對韓半島的攻擊計劃，與美國的新指針的法制化有著直接的關聯。美日間已經在「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的美名下，達成新指針的協商，並透過日本國會予以法制化。新指針的配套法案包羅的部份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謂的「周邊有事法」，而「周邊有事法」指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韓半島。美國已經將北韓規定為「新的威脅」、「威脅區域安定的焦點」，並對北韓展開「包圍」以及軍事-外交-經濟壓迫。如今又更直接地利用日本，加重對北韓的壓迫。於是，美、日加強了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同盟，並透過法律、制度，將之合法化。而美日如此的舉動，實際上已經威脅到亞洲甚至世界的和平。

規定駐韓美軍的法律地位等的SOFA(又稱韓美行政協定)，是人類史上最不平等的協定。這個協定已經使南韓成為美軍的犯罪天國，南韓國民已受不到應有的保護。儘管戰爭已經結束半個世紀之久，問題依然無法解決。

目前，美國派了四萬名美軍駐屯在韓國，而且，在其建立的基地內，韓國是無法行使主權的。尤其是從臨津閣自由之橋到板門店之間的地帶，美國已把它當成是自己的領土。一般韓國人要經過臨津閣到板門店參觀，不是要向韓國政府申請許可，而是需要向美八軍申請許可。這清楚地表示了韓國的問題已經不只是沒有軍事主權那麼簡單。而且，每年韓國政府還須向美軍當局支付20億美元以上的美軍駐屯支援費。

在韓半島的和平問題上，北韓不斷提出將停戰協定改為和平協定的提議，但美國一直以各種藉口搪塞至今，而且在另一方面又不斷擬定、修正對北韓的戰爭劇本。因而，現在我們處於一種非常緊張的狀態，根本無法知道美國什麼時候會展開一場致命的戰爭。

一般韓國人總是以為美國是韓國的解放者、救援者、友邦國、血盟軍。但是，最近美國的真面目越來越清楚。因為很明顯地美軍的駐屯是為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

在經濟方面，IMF 救濟性貸款亦不過是爲了對韓國進行信託統治。

韓國人對美國的認識的一個轉換點，正是 20 年前的光州民眾抗爭。光州抗爭當時，因爲要求民主化而遭到自國軍隊慘烈鎮壓的民眾勢力，曾要求美國的支援；而另一方面，軍部勢力也爲了「討伐」民眾，而要求美國同意派遣軍隊，結果，美國拒絕了民眾的要求，選擇了支持軍部勢力。

針對這個問題，美國國務院記者曾在記者招待會中質問國務院發言人，標榜人權的美國爲什麼拒絕光州民眾的要求。結果，國務院發言人的答覆是：「這已經不是人權的問題，而是重大的國家利益的問題。」

當時的光州民眾親身體驗了此一事件，光州抗爭也因此而失敗。我們單從此嚴然的事實，就可以認清美國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我們親眼見到在軍事獨裁集團與民眾勢力間的對立中，美國選擇支持了誰。

除了這些事實以外，從過去 50 年間美國對我們的所做所爲來看，我們應該清楚認識絕不能再讓美國繼續駐屯在韓國。如果我們還想要建立一個自主獨立的國家；如果我們還想要追求民族的統一與和解；如果我們還想要維護亞洲與世界的和平，我們就絕不可以容許美軍的繼續駐屯。因此，我們以民族自主之名，以亞洲和平之名，要求美軍撤離韓半島。 ★

(註 1) 姜禎求，現代韓國社會的理解與展望，74 頁

(註 2) 鮮于學院：韓美關係 50 年史（日月書閣，1997）9～10 頁。

(註 3) 韓國史講義，356 頁

(註 4) 曹成昆，「北韓指派的情報人員 7,726 名消失了」“韓民族 21” 1999 年 8 月 5 日，32 頁。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南北高峰會談的評價 與未來南北關係應該走的方向

(南韓) 姜禎求

分斷 55 年以來首度舉行的高峰會談，出乎意料之外地，從金大中總統一抵達（平壤）機場的那一瞬間開始，立刻變成了民族的慶典。過去的南北會談不同於這次的高峰會談，只能在設定好的基本方向與範圍內，談些行政的實務工作；但這次的高峰會談則超越了實務的、官僚的性格，能夠直接做出政治性的、戰略性的決定，此點可以說具有相當的歷史性意義。更重要的是，本次會談充份地發揮了會談的特徵，為冷戰結構下固著化的南北關係，打開了一道缺口。

平壤一百萬民眾的熱烈歡迎與鼓勵，以及兩位領導人親熱的場面，讓南、北之間的民族情感再度縫合，讓我們流下激動的眼淚。那一剎那，我們的民族愛似乎重新恢復，分斷造成的民族異質感似乎完全克服了。在此情景下，讓我們確信本次高峰會談將成為南北雙方正式解決問題的重要轉機。本文將先對本次的「共同協議文」進行評價，接著再提出未來的課題，最後將言及南韓的市民社會與民眾社會面對如此的高峰會談的新局勢，應該負起的歷史任務。

共同協議文中採納了南韓提出的「南北聯合」統一案與北韓提出的低階段「聯邦制」統一方案，這等於南韓放棄了過去的併吞式統一、北韓放棄了赤化統一方針，因此可以說為正式推動南北韓的統一建立了重要的基礎。這次會談除了為長期性的民族史上的核心課題－統一，建立了里程碑之外，在屬於短期性的問題－散離家族的重逢問題、推動民族經濟的問題上也達成了協議，因而可以說這次會談可以說是面面俱到了。過去北韓一直將焦點放在根本性的問題－統一與和平上；而南韓一直將焦點放在眼前的交流與合作上，但這次透過共同協文書的發表，表現了雙方成熟的包容性。

南韓有部份人士對北韓提出的低階段的聯邦制統一方案提出質疑，進而主張必須對高峰會談提高警戒，甚至蠢蠢欲動地想要抵制會談，說穿了這些人根本就是反統一論者，他們基本上沒有想要解決南北問題的意願的。在南北韓各自採取不同的經濟體制的現實條件下，拒絕接受聯邦制（在此指的並非一定是北韓提出的「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統一方案），實際上就是拒絕統一。提不出現實性的統一方案，卻一味反

對聯邦制統一方案的政客與媒論等，事實上是想要繼續維持目前的分斷體制，以繼續維護其既得利益。這些人理應受到批判。另外，連北韓的「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統一方案都沒讀過，就一味反對該方案的南韓內無數的盲目反對論者，現在也必須反省，以尋求意識的轉變。

南韓能夠接受如此的統一方案，我們應該將之評為民族史上的偉大決定。同時，北韓能夠甘受體制的威脅，接受離散家族相互訪問，是統一事業上的突破性的決斷。對此，我們期望南韓政府應該對訪問北韓的團體成員進行徹底的事前教育，以防任何有損於北韓體制的事情發生。

不過，令我們惋惜的是本次會談並未能達成「韓半島和平宣言」或組成「防止戰爭特別機關」等的協議，只有這樣的協議才能向全民族、全人類宣布任何情況下韓半島都不容許發生戰爭。我們鄭重要求未來的高峰會談中，能夠討論有關清算韓半島冷戰體制與建立和平體制的問題。有人主張靠過去雙方簽定的「基本協議書」中的「互不侵犯」條款，就足以防止韓半島內的戰爭，但事實上，這只能防止內部因素引發的戰爭。我們必須注意到韓半島戰爭的危機，是外部因素大於內部因素的。例如94年永邊核危機、99年的金倉里危機，都是外勢所引發的。未來我們應該在統一、和平、和解、合作的領域中，延續平壤會談的民族熱情，發揚金大中總統的「忍冬草政治」與金正日委員長的「胸襟寬闊的政治」的精神，逐步獲得具體的成果。

實現這樣的任務絕非僅是金總統與金委員長的責任，而應該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我們的市民社會與民眾社會必須為這次會談的成果做「後盾」，並「監視」共同協議文的履行。具體地，我們必須針對美國為主的外勢對高峰會談的警戒與干涉，做出對應。

我政府一發布即將舉行南北高峰會談的消息後，美國國防部長立刻召開特別記者會，聲明即使是在南北韓統一之後，美軍仍然繼續駐屯韓半島。美國企圖透過該聲明阻止南北韓在高峰會談中將駐韓美軍撤離的問題列入討論議題。應不應該讓美軍繼續駐屯的問題，理應是由我民族自己決定的事項，美國沒有權利干涉我們。除此之外，美國在核武問題、飛彈問題以及(南北)經濟合作上，也一直對我們進行著不當的干涉。

對於美國如此的霸權介入，國內的媒體主導群中的部份親美保守主義者，不時表示「應該對反美思想採取警戒態度」、「不能傷害韓美兩國的感情」等，一味迎合美

國。除了他們之外，國內政治圈與保守媒體以及夢想挑戰總統寶座的人士，預料他們會對高峰會談採取警戒、抵諛的態度。尤其一部份因為高峰會談的舉行而聲望減弱的政客，他們為了維持其政治影響力，必會煽動省籍情感，抵諛高峰會談。事實上這些垃圾政客不但對我民族的長期性課題毫不關心，也根本沒有能力解決。他們的能力僅表現在將民族史上的重要課題利用於自己的政治利益上。

對於外勢、國內傾向分斷的保守政客、言論人、事大主義知識份子、省籍分裂主義者等的抵諛、扯後腿的行爲，我們市民社會、民眾社會應該提高警覺，積極對應，以縮小他們的影響範圍。另外，除了如此的防衛性對應之外，我們還應該積極地展開監視共同協議書的履行的活動。

甚至有保守派把這次會談的促成，說成是金大中爲了爭取諾貝爾和平獎而演出的政治秀，我們應該積極對應他們如此卑劣的行爲，同時，這也是積極成爲高峰會談的主體的方法。透過高峰會談如果能建立韓半島的永久和平，這不但對韓半島，更對東北亞的和平也是非常重大的貢獻。屆時，金大中總統與金日成國防委員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是水到渠成之事，正如同越戰中巴黎和平會談代表季辛吉與越南代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般。諾貝爾得獎不單是個人的榮譽問題，此獎所具有的象徵性意義，可以相當程度地阻擋妨礙韓半島和平的外勢的陰謀。我個人真心期待他們兩位能夠獲得諾貝爾獎，因爲它將可促進韓半島的和平與統一，並帶來東北亞的和平。

這意味我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要成爲會談的主體。沉陷於55年來的冷戰分斷體制下的我們，自己來克服外勢所強逼的分斷的過程，正是我們突破現實的過程。北韓目前已經成立了350多個常設性市場，北韓居民的90%以上經驗過市場經濟，這顯現北韓已經對現實進行了巨大的改變。我們可以看到平壤已經出現了重大的改變，現在應該是南韓進行變化的時候了。突破現實，以求變化，是必須要有對既有思考框架的突破的。

這樣的過程必然會伴隨著陣痛。所謂陣痛是痛苦的過渡期。未來，統一的過程就會是一個陣痛期。在此過程中，反統一勢力將有激烈的抵抗，不過，我們也不必將此陣痛期視爲混亂期，我們應該成熟地將之視爲邁向統一與和平的踏腳石。現在我們必須快點踏上邁向統一的踏腳石，加速統一的完成。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與台灣問題初探

——閱蕭喜東《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需要檢討》一文有感

汪立峽

《左翼》第六號和第七號刊出蕭喜東先生的《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需要檢討》大文，引發了不少關注和未公開的議論。我的這篇拙文算是率先呼應《左翼》編者“希望左翼朋友能夠針對兩岸關係及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這兩個敏感的議題，繼續進行深入的討論與交流”的號召，針對蕭文提出初步的意見，但願能收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首先，有必要指出，蕭文雖然不算短，但全篇的要旨僅僅在於：“二十年來對台政策是錯誤的”，而且錯誤的實質是：“沒有走群眾路線，而是一廂情願地走了一條單方面聯合統治者，聯合少數菁英的狹隘路線。”儘管很明顯，這是一篇以大陸留美學生或學人的立場，對中共對台政策作出批判的文章，但是全文的基調卻和台灣島內部份“統派”及“左派”的論調近似。即指責中共不該眼中只有國民黨和檯面權勢人物而忽略了廣大台灣同胞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蕭文立論的基本支點更傾向“左”而更少推卸責任的味道。

毛澤東“一綱四目”與“一國兩制”

蕭文斷言，中共對台政策有一個斷層，“變化是從1979年居表的《告台灣同胞書》和1981年的《葉九條（略）》開始的“，從此以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取代了“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兩者的區別，據蕭文指出，是“告別革命”，放棄“解放台灣”，“而僅僅是以領土回歸的形式統一祖國”。亦即，不再是“解放人民”，而只是“收回領土”。這個指控和蕭文批判中共在對台政策上放棄“群眾路線”是有著內在聯繫的。

其實，早在1960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已經提出“一綱四目”對台工作總方針。“一綱”是台灣必須統一於祖國，“四目”包括台灣回歸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所有軍政大權、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蔣

介石。所有軍政及建設經費不足之數，悉由中央撥付。尤其重要的是：“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並徵得蔣介石同意後進行”。毛澤東提出的這個“一綱四目”和鄧小平及中共中央後來主張的“一國兩制”對台方針嚴格說來，只有詳略之分而無原則之不同。蕭喜東先生硬要把中共對台政策從1979年加以二分，不知是疏于對此段歷史的考查，還是因為執著于對“改革開放”路線的不敢苟同？據我看來，是後者的成分居多。蕭文標題“廿年來”就已向讀者暗示了這層意思，特別是文末不忘提示：“無疑，對台政策的失敗是和廿年來其他各方面的政策和總體路線失誤乃至失敗緊密相關的。反省對台政策的同時，也必然要求我們去思考總體上的問題”。全文至此，戛然而止，但其意旨直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概每個讀者都了然於心。關於這一大問題，本文也想談一談，不過是放在後半段，這裡還是回到前面的話題。

蕭文顯然不希望別人對他的“解放台灣”的說法產生誤解，幾次強調：“本文的觀點，既不支持“主和派”，也不完全支持“主戰派”，又說：“解放台灣不是「極右」的口號，而是一個實事求是、聯繫群眾的戰略”，“解放台灣，不是要在台灣馬上推行社會主義，而是要在台灣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為此，蕭文還特別舉出1951年中共“和平解放西藏”為例，指出當時中共和藏方的協議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這個“協議”和毛澤東“一綱四目”中的“台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並徵得蔣介石同意後進行”，其實是異曲同工，和“一國兩制”的精神也沒有本質的差別（因為“一國兩制”並不反對台灣內部自求變革的願望）。至于後來西藏由于喇嘛反動集團採取對抗態度，導致“協商”受挫，解放軍入藏的結局，或許正是中共對台採取“和平統一”政策的同時，保留不放棄使用武力“兩手策略的歷史殷鑑？

台灣群眾運動的階級性質

足見，蕭文在理路上最大的矛盾，並不在於他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的質疑，而在于他偏執地認為中共對台政策沒有搞“群眾路線”。因為蕭文一再指稱，中共在台灣內部的反國民黨“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中，沒有站在廣大勞動群眾的一邊，及時給予聲援和實質支持。蕭文說：“這期間，各種各樣的群眾性運動，如勞工運動、學生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消費者運動、返鄉運動等等（是否遺漏了“原住民運動”？）在台灣發展，…令人想起解放戰爭期間，在國統區爆發的反飢餓、反內戰的人民運動…反觀八十年代，我國（中共）領導人沒有抓住機會，不但單

方面放棄了對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武裝鬥爭，更沒有聲援和支持台灣社會的反國民黨專制的民眾運動，而是對台灣社會正在發生的迅速變化麻木不仁，無動于衷！“蕭文的這個指控如果正確的話，那麼問題就十分嚴重，等于說中共這廿年來不但不革命而且反動透頂。然而，不得不指出問題的實質是：或許中共對台灣的“迅速變化”掌握的不夠準確，但並未離譜；反而是蕭喜東先生對形勢卻犯了自以為是的嚴重誤判和誤讀。首先，蕭先生忽略了台灣真正的“左翼群眾勢力”及其運動，早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就已被國民黨和美帝聯手根除了！後來在80年代一度出現且被蕭先生驚嘆的台灣知青“以看大陸書籍、認識簡體字為榮”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熱，都不過是趕時髦的曇花一現而已，而且多半是形左實右，其目的主要是在“自我炫耀”和“打著紅旗反紅旗”，以示“馬列毛沒什麼了不起，我都(?)讀過了！”時至今日，台灣知識圈，購閱(或購而不閱)大陸書籍的人越來越多，購買量越來越大，但反共拒統立場也越見強烈，個中道理並不是蕭先生所理解的中共未搞“群眾路線”，而是台灣民主化運動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所謂“反國民黨專制統治”只不過是方便動員的口號和手段，實質目標是最終完成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

正是這個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化運動”在其發展和茁壯過程中，催生了“台灣人意識”(區別于“中國人意識”)和“台灣意識”。台灣的社會大眾和勞動人民是不可能自外于這個“民主化運動”浪潮的，儘管它的性質和本階級的根本利益相對立。只有讓這個“民主化運動”走到它的頂點(完全實現)，運動的階級性質才會無所遮掩的暴露在大眾的眼前。這也就是國民黨下台，民進黨上台，短短幾個月來呈現在世人面前的“台灣民主化運動”過程中，其實根本無“邊”可選，因為不僅國民黨、民進黨參預其中，台灣整個社會(或說“全民”)也都參預其中，它本身就是“群眾運動”。

後現代的迷思

再說，蕭先生所推崇的80年代台灣“各種各樣的群眾性運動”，究其實，並不同于解放戰爭期間國統區的各種“人民運動”，而是一種類似于(80年代)同時期西方國家內部盛行的所謂“新社會運動”，這種性質的“群眾運動”的哲學和理論基礎是“去階級”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將社會結構中的統治階級和非統治階級不加區分的混同起來，跟政治國家相對立，即將政治國家視為絕對獨立主體而非相對獨立主體。同時，這種理論力圖“去中心”，“去權力”，其結果是自我解消社會力量，而既存的資產階級政治國家則依然屹立不搖。歷史已無情的證明，“新社會運動”的反動性

不僅表現在它“革命的非革命化”、“左翼的非左翼化”，而且赤裸裸地表現在其“反共”、“反中國”的兩岸分裂意識上，這是這種群眾運動的核心思維即“去階級”、“去中心”、“去權力”必然導致的結果，也就是這種群眾運動最終會被資產階級政治取向擄獲的根本原因，（因為他們很輕易以“去掉”大陸那個“中心”來維持眼前這個“去不掉的中心”）。

如果說台灣會有什麼階級對抗性質的“群眾運動”或“社會運動”出現，那也只可能是在台灣完成所謂“政黨輪替”即完成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在和經濟自由化的今天才剛剛開始而已，而且其“明顯化”也只有在兩岸“一國兩制”統一之後才會展開，這是因為台灣資產階級政治“國家”還在利用福佬民族主義“對抗”中華民族主義。這條路不走到盡頭，台灣社會結構中的階級矛盾就不可能成為主要矛盾。換言之，今天兩岸之間的統獨矛盾已經成為優先于兩岸制度矛盾和島內階級矛盾而急須加以解決的“敵我矛盾”－即尚未完成的民族解放鬥爭－理所當然包括對美帝和日帝的鬥爭在內。

什麼是社會主義？

爲了搞清楚所有這些問題，特別是蕭喜東先生所詬病的“一國兩制”統一政策問題，就有必要在以下的段落中，探討一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路線。其實這是我近年來一直想撰文討論的問題，很感謝蕭文提供了這個機會。

中共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至少包括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很多人，不止是左派陣營，還包括更多的右派和自由派陣營，都以嘲諷或竊喜的口吻一口咬定中共“走資”了。右派和自由派這麼論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主觀願望和意識形態偏見，即以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不可戰勝的，不談“發展”則已，要談“發展”就只有資本主義一條路，資本主義制度就是歷史的終結，蘇聯的解體“證明”了這一點，而中共不過是以另一種形式走向同一個“結局”罷了。

然而，對於全世界的左派來說，問題當然不會這麼簡單，首先，關於“中國道路”（包括1949年以迄于今）是否偏離了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各種質疑（或肯定）從未間斷過，這就意味著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說起來這好像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不過有人卻把它忘記了，有人對它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刻或者不準確，有的人認爲這個問題根本“搞不清楚”，還有不少人乾脆把它當作已經“過時

了”的東西加以拋棄。

但是，迴避不了的問題終究還是要面對，爭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深思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能有什麼實質意義的結論嗎？況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涵意並不是1979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路線所專有，而是“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整體”內涵，包括“毛思想”主導的所有時期在內－儘管有時叫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不管怎麼說，至少要分辨兩個大問題：第一、什麼是社會主義？第二、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關於第一個問題不外兩種答案：（1）社會主義概念是用來描述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狀況，即“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2）社會主義概念是用來描述在理論上爲了達到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而力圖變成爲的那種狀況。至于第二個問題毋寧更爲重要，因爲它牽涉到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究竟是“歷史目的論”還是“歷史發展論”？如果是“目的論”，那麼同資本主義堅持自身不是可逾越的歷史結局、是不可更易的永恆真理，有何區別？如何證明歷史的發展不會停留在資本主義階級？這不僅是一個理論難題，也是一個攸關實踐路線的大難題。反之，如果承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說到底是「歷史發展論」，那麼一切自設的“疑難”將迎刃而解。

根據以上的初步思辯，我想針對蕭文所內在（不言自明）涉及的幾個大問題，略抒己見：

1· 群眾運動的階級鬥爭

有人曾說：“群眾運動天然合理”。毛澤東本人對群眾運動不僅是信賴，而且可以說是依賴。因此，群眾運動不僅在新中國成立前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主要思路，而且在建政後依然是毛澤東思路中的重要因素。可以這麼說：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村從互助組到合作社的組建，是側重生產關係變革上的群眾運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側重生產力發展上的群眾運動。但正如毛自己指出的，歷史是群眾創造的，群眾運動的局限還在群眾本身。以農民爲主要成份的群眾，雖然社會大變革的洗禮，會在思想覺悟上有很大提高，但小農意識並不是一下子可以消除的，加上“官文化”封建意識殘餘的干擾，以民主爲號召的群眾運動必然會脫離常軌。同時，以“大躍進”和“一大二公”爲特徵的發展生產力的群眾運動也並沒有取得預期成果，從而造成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更尖銳的矛盾，這不能不說是中共于80年代以後，重又回到建國初期（50年代初）毛澤東曾力主的“新民主主義”思路的主要背景。

群眾運動的理論基礎無疑是階級鬥爭，所以毛澤東才說“階級鬥爭是綱”。問題在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關係（生產關係）全面變革以後的新社會，縱使資產階級殘餘勢力仍有復辟的可能，但畢竟已非社會結構中的主要矛盾，或者說矛盾雖然仍然存在，但是矛盾的“同一性”已大過“鬥爭性”。關於矛盾的二重性問題，在60年代初期，中共黨內曾有過一次大辯論。對於這個涉及到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問題，主張當時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同一性”大過“鬥爭性”，因而反對繼續搞階級鬥爭的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遭到嚴厲批判，辯論就此告終。於今看來，這是一個大遺憾。列寧說過“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活靈魂”，這話是有道理的，因為唯物主義從來都有，但唯獨馬克思主義將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有機的結合起來，才使得歷史唯物主義具有無堅不摧的科學生命力。很明顯，這是中國，也是人類所面臨的重大問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從經驗和教訓兩個方面都證明了這一點。當然，新中國建立以來所發動的群眾運動，特別是文革，雖然從主要結果上看是“失誤”了，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它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的信念和貢獻。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分析歷史事應有之義。我常想到一個問題：“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巨大啓示和意義，十分雷同于法國大革命過程中以羅伯斯庇爾為代表的“雅可賓主義”路線，在1793年所實踐的革命群眾運動時對法國歷史和世界歷史所起到的巨大啓示和意義，儘管後者是發生于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而前者是發生于無產階級革命時期。實際上，從大歷史的視角來看，兩者有著精神上的內在聯繫。二者都持續受到主流思潮的批判，但誰也不能否認它們對人類解放事業和無時無處不在的“人的解放衝動”所提供的不熄火炬和反復鼓舞，它們對“沖擊人們靈魂深處”的作用將持久不衰！

2．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新民主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80年代以後的實踐，概括言之叫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這種提法有不少人不以為然，認為是“掛羊頭賣狗肉”。依我之見，或許把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質疑改為：現存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進一步把自己與資本主義的援助結合起來以後，將如何回到社會主義的發展進程中去？比較切合實際而少一點“傷感情”的成份。

中共並不是不知道改革開放新路線面臨的兩難局面和外界對他們的質疑甚至嘲諷，不過，中共堅持認為與資本主義的折衷，僅僅代表了社會主義內部的革新，最多不過是暫時的迂迴，其目的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並將它帶上更高的成就。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有一段時期越過了資本主義而把社會主義建立在一個不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上。當時那種“高級社會主義”形式和落後的經濟基礎之間的巨大落差（矛盾），是

中國社會主義所遇到的深刻問題的根源。這些問題如不解決，很有可能永遠阻礙著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可以說，中國社會有必要走“回頭路”，來完成社會主義必須具備的“經濟先決條件”，以便能夠“再次”向著共產主義前進。

中共的這個自我辯解，是否為向資本主義“妥協”提供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理論上的合法性呢？我認為這恐怕需要把問題丟回到馬克思主義哲學所強調的“應然”與“實然”二個命題來分辨。即，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怎麼實踐共產主義是一回事，“實際”上必須如何向共產主義過渡又是一回事。對“應然”和“實然”不加區分，不是犯了“左派幼稚病”就是犯了“右派幼稚病”。前者狂熱過頭且有道德潔癖，等不及要看到理想“成果”；後者習于將“應然”視為超歷史的普遍法則。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回想到共產黨在1949年的勝利並沒有被黨看作是共產主義的勝利，或者甚至是社會主義的勝利，而是“新民主主義”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勝利（蕭喜東先生在文章中共實也並沒否認這一點）。什麼是“新民主主義”呢？其核心思想不外是：新民主主義重新確立了社會主義作為歷史發展的目標，而同時它又把社會主義“暫時”描述為從資本主義吸取經濟活力的發展過程的保護者。“保護者”的概念異常重要，如果拿“新民主主義”同“三民主義”作比較（很多人將兩者併論），後者是以社會主義來“補充”資本主義，為資本主義的目標服務；前者則相反，是以資本主義來“補充”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的目標服務。社會主義在前進目標的過程中，擔負著確保方向不變的“保護者”的角色。

以我們大家所熟悉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發展進程來看，一般表現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當它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後（即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之後），則被表述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半封建（或半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幾個社會形態。“新民主主義”作為一種力圖尋找資本主義發展的“同等物”，使其不僅能滿足社會主義的要求，還同樣能符合本國自主發展（富國強兵的民族解放）的需要，有什麼必然站得住的理由認為它已偏離社會主義而不是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實踐呢？根據什麼社會主義定義和尺度，能讓人信服地咬定它已“走資”呢？根據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腐敗傾向嗎？還是根據不斷增加的“待業”人口？或是各地的不平衡發展和貧富落差？不能不看到中共並沒有幻想市場經濟成熟起來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其實，世界上從來沒有過“純粹”的市場經濟，今後也不會有。在搞活市場的同時，中共已在社會安全保障體系和貧困地區的建設與開發上用了大力氣；最近更著手全面開發大西部（即內陸各省）；國有企業的社會化改

造也已有眉目（國營企業的重點地區如東北的遼寧，去年開始已能創收十六億人民幣）；此外，形形色色的“集體化”企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例日趨龐大，能說這一類的企業是“私有制”嗎？

迄到目前，“富裕的社會主義”不但在中國還沒有，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從來沒有過。沒有相應的政策和一套制度性、法制化的機制來調節資源和財富的分配與再分配，再富有的國家也無法消滅貧窮。這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面對的真正挑戰。從這一點出發，中國政府和人民在社會主義旗幟下，反貧窮促平等的事業，的確有著偉大的世界意義。

3 · 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

在蕭喜東先生的大作中，很有一種指控中共捨社會主義而就民族主義的傾向，認定“實現祖國統一的理由，不再是在中國全境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而是訴諸于遠古的民族神話和歷史主義的民族認同”，就是證明。不客氣的說，這種論調在島內並不陌生，包括獨派／統派，右派／左派中的多數人，以及更多的自由派和後現代派，都在辱罵中共的民族主義，一致高喊“民族主義過時論”。奇怪的是，兩韓（南北朝鮮）以民族認同為基礎的“統一談判”，又很讓他們企羨不已，這矛盾嗎？在這裡，我首先要質疑的是，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有什麼理由認為一個國家的統一非得是社會主義的而不能是民族主義的？或者非得同時是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難道不能辯證地處理兩者 and 統一問題的關係嗎？其次，關於“民族主義過時論”這種西方時髦思潮販賣的意識形態，如同“全球化”觀念的流行一樣，總有那麼一些頭腦不清醒但卻自以為“先進”的人物，甘願充當“全球資本主義化”的報馬仔，以先知的口吻宣布“地球村”的即將到臨，並預示一切主權和民族統一的主張都將“自動消失”。但我認為，正是這一類的高談闊論在為“和平分裂”式的台獨提供必要的意識形態催眠劑。這只要看看在島內有越來越多的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就不難知道兩岸統一的真正障礙從來是出在台灣島內而非源自中共的對台政策“失誤”。

在中國，社會主義中的民族因素始終很明顯，這是眾所周知的事。然而，很多人忽略了一個歷史現象，即民族主義在“總體”上反映了中國對資本主義的不安，這種“不安”不管怎樣已與中國革命的歷史一樣長久，且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之一。換言之，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已然在“中國道路”中發展成為緊密的辯證關係：民族主義增強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持久力，而社會主義提供了最為可行的方式來滿足民族主

義避免國家消失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願望。我以為，“文化大革命”始終有一個隱而不顯的作用，那就是“文革”對社會主義平等理想的追求已經內化為中國社會和人民心理的組成部分，在關鍵時刻必然會產生對抗資本主義的“免疫力”。這不僅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是人的解放事業所必不可少，而且因為在許多中國人眼中這一制度對於維護民族獨立，防止國家被融入資本主義世界也必不可少。

4 · 改革開放與一國兩制

改革開放政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新民主主義”分不開，既然如此，那麼對台政策也勢必要作一定程度的調整。試想，台灣社會在資產階級民主化的全民運動影響下，已然發展到連“一國兩制”都幾乎一致反對，又有多大可能接受“新民主主義”的“一國一制”？這是不待等到李登輝執政就已經可以判斷的事。硬說“一國兩制”是錯誤的，就等于說“和平統一”自始無望，因為就中共來說，對台改採“一國兩制”而非“一國一制”政策，正是為了以和平手段完成兩岸的統一。台灣在兩蔣以後的領導人（從李登輝到陳水扁）口口聲聲要“和平”，卻千方百計地誤導台灣民眾抗拒“統一”，這不過是在玩弄“二律背反”的現代版危險賭局，把台灣前途置于要麼“和平分裂”（台獨），要麼“武力解放”或“以武逼統”的不利地位。因為，理性一點的人都會承認，台灣要想與大陸“和平分裂”，現實上機會等于零。剩下的路數只有在“和平統一”和“武力統一”之間二選一，反正結局必然是“統一”。台灣統治階級還在等什麼呢？民心（主流民意）已經掌握在他們的手中——就是“拒統”，解鈴還須繫鈴人，除非台灣領導階層主動放棄“拒統暗獨”的心態和作為，“民意”才會跟著改變。顯然台灣的領導集團在盤算著美國和日本的支持，特別是美國持續不絕的軍事和政治奧援。但是，現在的趨勢已逐漸顯示，由於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明顯擴大，一向把台灣視為對付中國崛起的“不沉的航空母艦”與和平演變的“橋頭堡”的美國，隨著大形態的改變，對台灣的影響力和支撐力已日感“心餘力絀”，這只要看一看美國國內正在興起的“要不要為台灣而和中國一戰？”的焦慮症，就思過半矣！

蕭喜東先生傾向以“文革”時代的“反帝”標尺來譴責中共近年的對美外交政策，認為失之“軟弱”。平心而論，比之“文革”時期或更早的冷戰時期，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的對美外交，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相形之下，的確予人“軟弱”之感，但若說中共“屈就”了或“讓步”了，顯而易見不是事實。目前和今後三、兩年內的形勢變化，將更會證明蕭先生冤枉了中國共產黨。★

多佛港的大陸偷渡客慘案

施威全

週日深夜，英格蘭多佛港海關，五十八位中國非法移民悶死在貨車的冷凍貨櫃，慘烈的景象震撼歐洲，斗大黑體的標題佔據了昨(廿)日各大英國報紙的頭版，記者引述調查單位的說法，推論死者是如何地掙扎窒息、絕望地走向地獄。

同為英國人眼中的「華人」留英學生們在網路上私下地交換看法：怎麼會有如此命運乖舛、長得跟我們一樣黃皮膚黑頭髮的窮人。面對英國朋友，有的解釋說，台灣人不等於中國人。長期的反共教育，讓台灣學生可以理直氣壯地譴責中國政府，對貧窮落後的共產中國表示不屑。有的學生人道心腸地有點尷尬面對英國人的關心。就好像電視上播出台灣國會打架時，英國人會問說：「到底怎麼了？」台灣學生總有點手足無措。

何須尷尬？國會打架總比英國常常打仗侵略好多了。多佛慘劇也是，以紡織為主的英國資本，非法雇用移民勞工，騙他們英國黃金遍地是PROMISED LAND，然後拉下鐵門，給予奴隸般的工作條件，膳宿像集中營。是誰創造了非法移民的市場？誰該羞恥？

撇開道德譴責，看看一些數字與事實。慘死的移民恰好不是窮人。為了偷渡，他們必須籌資至少一萬英鎊，付給中國與歐洲的人蛇集團，這個數字代表他們的信用能力。也就是說，他們過去生活的儲蓄加上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借貸能力，再加上他們未來的工作能力，他們每人至少有一萬英鎊的身價，而這個數字是被偷渡集團決定的，也就是一個經過科學計算的市場價值。而在英國，百分之七的失業人口加上百分之六信用有問題的人，是連貸款資格都沒有。按照市場規則，信貸能力愈高的人愈富有，因此實際上，這些偷渡客比百分之十三的英國人還有錢。別忘了，英國是個近兩萬美元的高平均所得國家，所以，放在世界市場尺度上，這些死者並不窮，在英華人無須為了有這些「窮」同胞而覺尷尬。

另個事實也該澄清。廿日台灣眾媒體報導，說什麼英國的福利制度好，所以吸引非法勞工。恰相反，英國的福利制度鮮少及於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尋求庇護者，家人夫妻常被分離在不同城市限制居所；沒有現金，只有食物點券，生活情況只會比他們在自己國家還糟糕。所以，不是因為窮而偷渡，他們更不是為了享受福利而來。

那幹嘛偷渡來英？『被騙』或許是原因。但是為何這種現象在中國的改革開放之

前不曾發生，而在九〇年代全球化的熱潮下頻頻出現？合理的解釋是這個移民勞工市場的確存在，由『推』『拉』兩個因素形成。改革開放造就了中國驚動世界的經濟奇蹟，成為開發中國家欽羨的典範，但這個成就是奠基在農村的破產上：農村青年或到珠海、東莞陪台商睡覺，或者冒險遠渡重洋，他們匯回農村的錢讓老家得以繼續生存，基礎建設得以維持。所以，評議多佛慘案的台灣學生不應不屑中國的窮，應該佩服中國政府此種致富的手段。

全球化熱潮則是另個因素。跨國資本全球四處流竄，理想的情況下，資本會跑到每個有勞工的地方。很抱歉，資本主義此惡魔的全球化從來就不是這樣，資本不會跑到窮鄉僻壤先造橋鋪路通水電。因此，資本流動，勞工也不得不流動，資本更刻意地徵召這種人流。資本流動靠電匯，人流靠腳、船、車。『全球化』『自由化』對資本也是有差別待遇的，中小企業的紡織、成衣資本無法像大資本企業那麼自由地、有條件地前往印度、菲律賓、香港，他們選擇英國。沒有便宜的勞工怎麼辦？人蛇集團就當起外勞仲介公司了。移民勞工們，不幸的死在路途，未死的，手工製起台北街頭四處可見，「MADE IN ENGLAND」的英格蘭西裝毛料。多佛慘案和你我身上西裝屬於同一條生產線，差別只在，他們是瑕疵原料。

談英國多佛慘劇，其實是在評論台灣自己。只從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看待此案，只會更僵化我們既有對中國「貧窮」「落後」的刻板印象。更重要的是，台灣沒有多佛慘案嗎？當初的閩南平漁船慘案，大陸非法勞工也是被悶慘死，不同的是，前者是入境，後者是遣返；前者悶死人的是貨運司機，後者是代表台灣國家的軍隊。英國媒體一片譴責歐洲人蛇集團的暴利，那台灣呢？不管是引介大陸妹的人蛇，或是合法的外勞仲介業者，他們的暴利呢？勞工主管機關或許該頒給他們匾額一面，仿古諺，只是把「嫖能倒貼，天下營生無雙」，改為「仲佣抽成，天下利潤無雙」。 ★

談中國大陸的人口走私問題

俞力工

自6月17日58名非法偷渡的華人在英國多佛港喪生後，西方媒體即不斷對該事件以及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法移民活動大肆報道。無可諱言，該事件對中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嚴重的打擊，對海外華人的處境也帶來極其不利的影響。

八十年代，隨著中國國家政策的改變，人口走私活動也益趨頻繁，浙江省與福建

省沿海地區的大規模向外非法移民活動非但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偷渡過程中造成死亡事件也層出不窮，如今此事件造成全球轟動，當然與一次死亡的高額人數有關，至於死亡的悲慘過程更是添加了媒體的渲染素材。

持平而論，雖然筆者對西方許多媒體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指責(即政府當局鼓勵非法偷渡)不敢苟同，但以各地人蛇集團公開“招兵買馬”的活動看來，不加以認真打擊、取締，起碼上述兩省的有關當局難咎其責。非法移民問題所涉及的問題既多且廣，以下，首先提出討論的是其利與弊。

出國未必是利

就目前大多數西方國家的“外國人政策”而言，對少數民族尤其是華人的比例多有嚴格規定。有些國家甚至對華人餐館的數字都有一定的限制。當大多數地區的華人名額以及餐館數字已達飽和之時，突然出現大量非法移民，結果不外是惡性競爭，互相爭食。如果再經過排外主義及右派媒體的惡意渲染，則非但現有華人餐飲界無以為生，長期處於非法地位的偷渡客最終也難免迫於急需走上犯罪的道路。另外，就國家利益考慮，大筆外匯讓國內外人蛇集團賺取，畢竟非明智之舉，一般說來，只有地方官僚才會貪圖人蛇集團的賄賂，無視國家的國際形象和整體利益。至於偷渡客本身，如果願意冒生命危險進行偷渡和在國外長期過著擔心害怕的非法居留生活，留在國內以更少的風險與消耗，利用國家近二十年蓬勃發展所提供的一切機會，似乎可以取得更加傲人的結果。這方面，臺灣的經驗大可作為參考。六、七十年代臺灣的精英陸續出國深造，由是錯過了島內的發展機會，十多年後，當這批海外學子再度踏上家鄉的土地，卻發現留在島內朋友的排場反而更加闊綽。

移民屬特殊群體

處境不利的群體向條件優越地區移居原屬人之常情，該情況不只是百萬年前向世界各地擴散的東非智人如此，十六、七世紀以歐洲白人為首前往美洲、澳洲的移民亦是如此。然而當這批所謂的歐洲移民抵達上述地區之後不僅是把原住民趕盡殺絕，取得統治地位後甚至採取了一系列嚴格的、帶有濃厚種族主義色彩的移民政策。本來，自由移民是個最有效與最自然的消除各地區經濟落差的手段，自從條件優越地區採取歧視性移民政策後，必然會造成白人社會通過自由移民而提高落後地區的生活水平的結果；另一方面也使得落後的第三世界永遠成為廉價勞工的供應地。至於移民本身，無論是古今中外均屬各個社會的最特殊、最活躍、最具冒險精神(pioneer spirit)的群體，只要條件許可，這批以改善生活為目的的群體多能夠在僑居地發揮作用與作出

貢獻，因此就其動機與行為表現觀之根本與犯罪絲毫無關。如今即使若干人士受到犯罪集團的矇騙踏上偷渡與觸犯移民法規之途也不能簡單地視為刑事罪犯加以對待。然而，如前所述，如果這批非法移民的非法地位長期不得改善，則極有鋌而走險，蓄意走上罪犯道路的可能。

始作俑者

近二十年來，西方全球化與一體化的發展大大削弱了地方勢力的既得利益，因此各地區先後產生了極右與排外的民粹主義思潮，其結果難免是逼使政府採取更加嚴格的移民政策。往往，這些移民政策甚至不顧基本人道主義原則，嚴格限制直系親屬的團聚。許多人迫於無奈便採取偷渡入境的辦法。

另外，出于反共意識，西方國家尤其自 89 年六、四事件之後對來自中國的非法移民大開“政治庇護”的方便之門，因此間接地鼓勵許多人採取偷渡和申請政治庇護的辦法達到移民目的。

過去，在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對來自東歐共產國家的難民，不論其動機為何，均立刻給予政治難民地位；如今，冷戰結束後，即便某些國家仍發生迫害吉普賽少數民族事件，但西方國家卻一概不承認吉普賽人的政治難民地位，相反的，卻強調那些國家均屬“民主國家”，“不可能發生政治迫害事件”。

如何解決

當前的情況是，幾乎所有中、西歐國家均聚集了大量的非法中國移民。一旦這些非法移民受到逮捕，均傾向于不透露自己的身份。在此情況下，各地當局與中國駐外使館既無法確定他們是否來自中國，更無法將其遞解至中國；另一方面，押解出境既費人力、又毫無資源，許多國家（包括中國）根本就沒有為非法移民購買大量機票的經費預算。有鑒於此，各地當局至多能夠把逮捕的非法移民監禁若干個月後又釋放出去；而同時隨著移民條款的嚴格化，西方國家所受理的政治難民申請又越來越多，由是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和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以筆者之見，當務之急在於中國政府正視非法移民的嚴重性，並採取果斷措施進行取締；至於西方國家，也得盡早改變對中國的敵對態度，收回“政治庇護”這只害人害己的“澳洲回鏢”，並適當地放寬移民條例。除此之外，在西方國家明確看到中國杜絕今後的非法移民活動的情況下，似宜考慮通過特赦使所有非法移民取得合法居留權，或許只有如此才能夠緩和各個當局與當事人所面臨的困境。



簡論當前電視改造方向

馮建三

西方左翼對 1997 年以降，英國第三路線與德國新中間之說，大致（或早就）已經蓋棺論定，認為比起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修正路線，都還要來得保守。

在台灣，怎麼看待這個認定？加入嘲笑或抨擊第三與新中間，還是可以另有他圖？筆者準備選擇後者，並且用來分析電視改造的方向。

大選次日，輿論即稱「歷次選舉立場不公飽受批評，黨政軍退出三台呼聲高」。隨後並有李慶安等 32 位立委於 4 月 22 日提案，準備通過修法，徹底私有化臺視與華視（政府迄今仍是這兩台最大股東）。三退運動並不新穎。一九九五年澄社等團體就曾發起，但爲了釋放官股於私人，是否就是改善電視體質的最佳方法，當年的見解就有了分歧。

就台灣情況來說，政黨與政府不應該直接經營電視，是正確的目標，若是僅就這個部份判斷，三退並沒有錯誤。但是，這個目標只是台灣電視民主化要求的一部份，不是全部，電視民主化的另二大目標，卻很可能在三退釋放臺視華視的政府股份於私人之後，無法達成或背道而馳。

其中一個目標是要解決很多電視觀眾感受到的電視節目惡質化現象，以及改善電視從業人員的「蛋白質」（笨蛋、白癡與神經質）境遇（中視董事長鄭淑敏去年十二月初在各大報刊登廣告，指在收視率調查公司的調查及公佈資料手法不恰當之下，造成了這個窘態）。鄭淑敏說收視率是病因，卻還沒有同時反省電視追求利潤的極大化，也沒有反省此利潤歸於私人手中的問題，是有不足，但她的感嘆與發言，可以用來作爲改革的局部踏腳石。

第三個電視民主化的目標，是要屏障台灣電視的經濟利益，從而讓台灣電視，甚至電影工作人員，能夠有合理的資源，作爲他們以音像視聽技術，爲台灣民眾提供優質的娛樂節目、記錄生活與表達意見。在電視經濟利益得到確保之後，更能有效地引進新的技術（如數位電視），並據此進入國際，展開與各國優質電視文化的交流。據陳信宏、辛炳隆整理自海關進出口的資料，1996 年台灣語音影視媒體產品進出口額，分別是 57.57 與 66.56 億，入超 8.99 億。1996 這一年也是政府以多項法令，配合合媒體中心之議，開始協助影視業的第一年。但 1997 與 1998 年的入超卻不降反昇，躍增至 35.2 與 56.77 億，至今情況並無改善。

因此，即便只縮小到經濟層面，三台（若包括民視則是四台）怎麼改革才是正確

方向？電視改革不能自外於其他媒體乃至整個社會的改造，但在所有媒體當中，三台，尤其是台、華視的變革，可能性最大。這是因為，2000年3月台灣總統的競選期間，唯一對此問題提出政見的陳水扁業已當選，過去因政黨未有輪替，以致三台官控商營宿疾的不動如山，首次出現變化的契機。反過來說，假使未來四年，三台營運率由舊章，則往後由政治社會力主導的改變，可能性將大幅降低。

就此看來，三(或四)台的興革，也就不能不是更具有時代意義的課題。放言推動興革的人，是要將阿扁的新中間口號，當作笑話，將其藍圖已表明要執行的臺視華視公共化，以及徵收電波費的政策，當作亂開支票，還是要集結力量，盡最大能耐利用這種歷史偶然，通過立法院來促其實現？筆者選擇後者，是以繼續進行以下分析。

若是依照電波費是否要徵收，無線電視產權是要公有或私有，那麼，三台加民視的改革情況，將有上百種組合，可以歸納為六種模式。

- (1) 四台全部公共化；
- (2) 三台全部公共化，對民視徵收電波費，並使這筆收入投入電視節目的製作；
- (3) 中央政府擁有最大股權的臺視與華視公共化，對中視與民視徵收電波費，並使這筆收入投入電視節目的製作；
- (4) 中央政府擁有最大股權的臺視與華視公共化，對中視與民視是否徵收電波費，依據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決議而定；
- (5) 三台徹底私有化，但對三台與民視等四家無線電視台徵收電波費，並使這筆收入投入電視節目的製作；
- (6) 三台徹底私有化，並且對三台與民視均不徵收電波費。

實現這六種模式的政治阻力，第一、二種最大，其次是第三種。主要原因是國民黨仍為立法院多數，有可能不肯同意黨股完全從中視撤出或繳交電波費，而民進黨已有中常委蔡同榮任民視董事長，並任立法委員，可能動員各種力量反對電波費。第四種則符合陳水扁宣示的方向，亦有社會力量支持，並有可能以台華視公共化，作為是否對中視與民視徵收電波費的決議依據之一。第五種的政治難度可能與第四三或第三種接近，第六種亦有社會力量支持，亦符合歷來部份在野政治人物的主張。

有關這些電視台私有化或公有化，比較能夠清除政治人物對經營管理的不當干涉、比較能夠提供從業人員專業的運作空間，以及其在市場競爭中運作，其節目表現究竟是否將與過往型態，有所差別，都是重要問題。由於這篇文章是經濟分析，對於這些問題，這裡只能說，在這三方面的表現，無論是海外或台灣(內湖公視)的例子都能顯示，公營不比私營弱，甚至表現還會更好。有關市場社會主義的研究證據，也都顯示公產權公司在專業經營手法之下，於市場運作的成績，優於私產權公司，它同

時能夠兼顧社會正義與經濟效益的要求。

以上六種模式可再歸納為三類，第一、二種模式接近於中國大陸的作法。第三、四種可以使台灣貼近於歐洲聯盟國家的模式，第五、六種則是走向美國與香港的電視實況。以下集中其經濟面向，續作記錄、分析與申論。

美國貿易在1981年起出現赤字，平均年逾千億，至1998年入超仍達1680億美元，與此相反，美國的視聽產品卻是迭有出超，重要原因之一在於許多國家在1980年代之後，引進了更多私有電視頻道，形同為美國視聽產品開拓市場。比如，歐聯當中，電視出口值最大的英國，從1990年起出現了赤字，擴大至1997年，出口是3.2億英鎊，進口達6億。台灣推動亞太媒體中心的企劃，正想學習美國或取代香港，在較小的範圍內，使台灣音像視聽產業在亞太地區，具有美港的表現。但亞太媒體中心之議，至今沒有產生可喜作用，反倒是台灣成為美日影視節目的傾銷地的程度，不減反增。三台（特別是台華視）徹底私有化只能強化這個趨勢，不是減輕，因為私有營運所取得之利潤，回流至本地節目製作的比率，必被壓制最低可接受的程度。這個情況或許會因收取電波費，並使之返回節目製播，或以法規強制私有電臺製作本地節目而得到改善，卻因指導私有媒體的律令，也就是它將利潤分配至私人手中，不是重新投資於本產業的原則，終究不能被違反，因此，私有化之後，再以法律規範所獲得之改善廣度與深度，比較有限。

事實上，面對美國視聽節目以低廉成本行銷全球的走勢下，能夠相對有效地平衡，確保本地電視節目產值的實例，雖然也包括了電視產權的徹底私有化，如香港的情況，但它比較沒有可能在台灣重複。這是因為過去四十年來，無論是有線、衛星或無線台，香港電視均受嚴格規範（如全港只特許一個有線系統、衛視最初數年不能使用粵語以屏障無線台等），以故至今無線電視公司（TVB）的市場佔有率，超過了70%，足以主導市場走向（一般認為，當特定廠商的水平市場佔有率達45%-59%之時，該廠商即能主導此產業各廠商的市場行為）。三台徹底私有化的模式，固然是1995至2000年大選後，時隱時現的「黨政軍三退」的主要訴求，並非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即便達成，它終究還是與香港有很大差距，這還不只是因為如此改造之後，據此訴求，則它是各自分立的，且股權將極為分散，有別於TVB的股權結構與其下轄數個頻道（含衛星）的情況。更重要的是，即便前舉分散股權的設計，最後為資本動力所突破，也就是有朝一日，某些論者的期待業已實現，但類如TVB的市場佔有率，即便台灣各無線電視總加起來，亦無法享有，這又是因為台灣有線與衛星電視的發展，百家林立而雜亂無章，至今方朝統合方向前進，與港府授與獨家壟斷的規劃，迥然有別。

第一、二種是中國的模式，要求所有媒體（電視）回歸國有產權，在台灣推行的

可能性並不很高，不待贅述。第三、四種是歐聯各國，公私產權的電視頻道形成雙元結構，並且二者大抵勢均力敵。除荷蘭與葡萄牙的資料不清楚之外，其餘13個會員國的公營廣電機構，均名列歐洲百大媒體集團（不只是廣電）之內，其中德英義更在前十名之內。再就各國之內作比較，除法瑞是該國第三大媒體集團，其餘各國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從公私電視的收視比值來看，英奧丹瑞芬挪愛荷等八國的公視佔上風，其餘七國相反，但差距不大。朝向非營利公視集團發展的歐聯模式，特別是台、華視，由於政府仍佔最大股份，其他私人股份長年來依特權取得，改變的可能性是似乎比較大的。這就是說，在徵收或購回私人股份後，台、華視是有條件往歐聯電視的公產權方向發展，而此二台1999年的稅後結餘，若與中視水平（7.15億）相去不遠，則應當在14億左右。其次，再假設台灣政黨輪替後，已可望讓此二台的經營回歸常態，亦即政治力通過對其營運的非專業干涉，致而二台為此所支付的政治租金（聽命黨政要求所損失的新聞等節目之收視率，需以其總體盈餘支付）大為降低，則此結餘仍有可能升高。如果這筆收益不像往常那般流入國庫或股東之手，而是投資於電視節目的製作（如若干地方及雙語節目等等），則收效將較高，似可確定。

通過以上分析，結論應已清楚展現。就經濟層面來說，台灣學步歐聯模式的電視改革，成本較低而經濟收效較佳。

然而，歐聯會員國15個，其公營電視在財源及與政治力的關係，又各異其趣。如收入方面，英日與瑞典絕大部分仰賴收視執照費。英國第四頻道公有，節目大多外製，經費取自廣告，但立法使其與私營頻道，不完全競爭。德國公視有廣告，惟集中播出，且執照費仍佔多數。法義荷比奧丹愛兼取執照費與廣告。芬蘭執照費加政府預算。西葡幾乎全賴廣告。希臘三種都有。這些公視與政府的關係，從獨立性較高的英國，至政黨影響力較直接的義大利（但與台灣政黨直接擁有電視不同），通通都有，著有《有權無責》這本廣受佳評、再版近十次的媒體歷史社會學作品的James Curran近日發表觀察，指出公視與政治關係接近於英國者，前景看好，接近於義大利者則會陷入苦戰。台灣的台華視改造如果能夠採取歐聯模式，並不是問題的結束，而是另一個問題的開始，此即它在收入及與政府的關係，究竟將如何演變。這個問題若是得以出現，表示台灣的媒體生態，已經算是上升至新的階段，它將得到什麼樣的回答，事關緊要，但本文已無法明確處理。 ★

後記：大選後，台灣記者協會、傳播學生門陣及部份學界人士已就此集會討論數次，準備以一年半以上的時間，推動『反對徹底私有化、臺視華視公共化、中視民視專業化、落實電視民主化』的工作。

全產總的危機

柳如慧

自主性與大眾性是工會組織的生命。但是以這兩個標準來檢驗全產總時，就可以發現全產總自籌組的過程中，就已經出現了令人堪憂的現象。最明顯的就是親執政黨的勢力包圍了全產總，並推出執政黨籍的國大代表做為首任理事長，以及全產總從籌組、運作過程中，缺乏大眾性基礎。

6月中旬，全產總成立以來，面對第一場重要工人議題，即立法院審理陳水扁競選政見之一的縮減每周44小時工時案時，前述的全產總的問題就毫不留餘地地展現了出來。

整個立法進行之前的協商過程，當然必有一段複雜、迂迴的過程。但很清楚地，最終全產總代表簽署同意立法草案之前，只剩下了兩種選擇，即行政院版本(民進黨版本)：每周工時44小時且附帶有利資方的四周變形條款；以及國民黨版本：兩周工時84小時，但每周最高工時不得超過44小時。很明顯地，不管是從總工時來看，還是從變形的幅度來看，國民黨的版本皆優於民進黨的版本。而且，連全產總的決策幹部也承認國民黨版本優於民進黨版本。但結果，全產總的理事長卻硬是簽署支持了民進黨的版本。從全總產中民進黨系人士的政治利益上，或許可以解理，但站在工人的立場卻是絕對無法理解的。全產總既是一個工人的大眾組織而不是一個民進黨的外圍組織，那麼這就顯示全產總在運動上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民進黨版本中的附帶四周變形條款，明顯損害了勞動者的權益，但民進黨籍的全產總理事長黃清賢，護黨心切，毅然不顧整體勞動者的權益，忘卻自己的代表性是自來基層勞動大眾的，竟然代表著勞動者出賣勞動者的權利！黃清賢等人做些如此「忠黨」行爲之後，立即獲得陳水扁總統的召見，可想而知必定受陳水扁總統的嘉許。

過去幾年，只有全總而沒有全產總，而全總又明顯無法代表全體勞動階級，因此，政府在制定有關勞工法令的時候，雖然急需形式上取得社會同意，但又不敢以取得全總同意，替代社會同意。但如今全產總成立了，而且全產總是一個十幾年來工人運動的產物，因此，表面上具有足夠的代表性與象徵性。也因此，民進黨大力介入了全產總的籌組、運用，希望掌握全產總並給予高度的協商地位，從而順利取得全產總的同意(=社會同意)，以推動其反勞動者的政策。雖然，這一次有關降低工時的修法過程中，因國民黨的積極運用，讓民進黨版本未能過關，但民進黨政府在與全產總的從屬關係的建立上，顯然是成功了。

雖然，結果是全產總的代表所簽署的民進黨版本未能通，但我們認為全產總的領導中心，如果不能徹底反省這次協商的過程，不對自己的忠黨叛工的行為，做一個交代，全產總將必迅速失去基層大眾的支持。我們相信全產總這次的背叛行為，不可能是經過全體領導幹部民主地決定的、也更不可能出自基層會員大眾的意見。因而，在此呼籲十多年來為全產總的誕生付出無限心血的所有進步工人，必需共同努力，排除民進黨勢力對全產總的介入，還自主工運本來的面目。 ★

全民政府即是權民政府？

蘇 活

在台灣一片歌頌政權和平轉移的背景音樂中，我們在日益清晰的視野範圍逐漸看出，總統府與行政院上演的戲碼內容似乎愈來愈似曾相識。原來除了演員的面貌與戲服外，匆促上演的劇本還來不及新編。新政府與原來的政府的差別也不過是一個新字，拿掉那個「新」字，兩個政府是極其相像的。

在中國國民黨號稱自己是全民政黨的時候，挑戰她的民主進步黨號稱自己是受壓迫人民的喉舌，全社會的反抗運動也慷慨的將政治資源匯集灌溉這個「咱ㄟ黨」。曾幾何時，在因標舉反對向主流價值靠攏路線（許信良路線）而當選的黨主席林義雄任內，民主進步黨的總統候選人當選後宣佈他組織的新政府是全民政府，即將繼任的黨主席謝長廷也隨之標榜，他所領導的新執政黨將是一個全民政黨。在台灣受壓迫人民歡欣鼓舞，陶醉在「咱ㄟ黨」勝利之後，台灣多了一個標舉自己是全民政黨的黨，卻少了一個號稱自己是受壓迫人民的喉舌的黨！

拿兩個小例子來說。在絕大多數選民是勞工身份的條件下，新政府對降低工時所提出的配套措施是調降工資基準和增加低價勞工。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不調整工資基準實質上就是調降工資基準；在不調整每年縮減低價勞工數額的條件下，新政府想出來的是以提高幫傭看護工縮減額度替換降低製造業勞工縮減額度。簡單的說，新政府以減少工資和工作機會作為減少工時的代價。有權的人民（企業界）的利益不降低；無權的人民（勞工）的利益不增加。全民政府豈非權民政府！

陳水扁總統到了災區，期勉南投災民的是「用自己的力量」站起來。他似乎忘了，災區民眾之所以選擇放棄中國國民黨，就是因為前政府讓災民「用自己的力量」活下來！如果新政府仍不改前政府只濟富不救貧的政策，可以用全民稅捐對企業獎勵投資，卻讓災民靠「信心」重建，不願調撥總體資源活化災區經濟活動，全民政府依舊將成權民政府！ ★

戰後幾個主要的 「現代資本主義論」〈四〉

黃志龍

六、伊藤誠：「資本主義逆流假設」

現代的馬克思經濟學(1988)

資本主義經濟的理論(1989)

資本主義的逆流(1990)

馬克思的逆襲(合著 1996)

進化中的資本主義(合著 1999)

現代資本主義的 Dynamism(合著 1999)

(1).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和高度成長的崩潰

A.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的侷限性

一般地說，在 1973 年以前，作為馬克思學派的主流論述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事實上是承認凱因斯干預政策的有效性，並將其作為戰後高成長期的特徵而予以理論化。也就是說，承認國家為了經濟成長所採取的財政、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因而緩和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經濟停滯的趨勢，形成了持續性經濟成長的資本主義體制。

但是這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對於資本主義在此一時期之所以能夠進行持續性成長的歷史條件和契機，大都沒有進行具體的考察，因此也就無法洞察該體制必將遇到瓶頸的必然性。

其實，戰後的高度成長，是在「戰時動員體制」打破了壟斷資本主義因限制投資所導致的經濟停滯趨勢，然後，再從「戰時動員體制」轉變為戰後的「冷戰體制」的歷史契機和架構下，才得以發展。

從美國鉅額的軍事支出可以得知，國家的財政、金融政策並非單純的景氣政策，

而是在冷戰架構下，因應著情勢的變化而隨時發動的。

但是，我們也不可以忽視，導致戰後資本主義在 60 年代之所以能夠繼續其高度成長的基本條件：

1. 美國藉由其先進的產業技術和國際競爭力成為經濟霸權，進而保證黃金／美元的兌換比率（1 盎司黃金等於 35 美元）以及在他的支持下所確立的布列登森林（Bretton Woods）國際貨幣體制（規定國際貨幣的固定匯率）。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維持，抑制了各國通貨膨脹的惡化。只要美國的農、工業能夠維持其強大的國際競爭力，龐大的政治性、軍事性美元擴散就能夠促進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經濟復甦和成長，而且反過來又可以促進美國經濟和外銷的成長。

2. 美國所主導的產業技術的開發和利用（包括在冷戰下加速發展軍事技術的派生效應），相繼帶來了各種耐久性消費財的大量生產，並波及到其它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實現了一連串的產業昇級。

以耐久性消費財（家用電器、汽車等）為中心，領導戰後高度成長的資本密集型設備投資，必須以先進國家勞動者購買力的增加、產生對耐久性消費財的有效需求為前提，才得以繼續成長。所以透過「冷戰體制」下勞資關係的調整，調節學派（RT）所強調的：透過「福特主義」向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擴散，耐久性消費財國內市場的擴大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3. 在高度成長的過程中，第三世界以石油為主的原料產品有彈性的繼續供給（尤其是由於中東油田的大量開發，1 barral [42 gallon] = 1 USD 的廉價石油供給），對於重耗能產業及其消費結構的形成，提供極為重要的基礎。

4. 由於軍人退役、農村的過剩勞動力、勞動力的國際流動、以及女性的勞動力化等因素，使企業享有充足的廉價勞力，因此先進國家的工業積累得以順利進行。

B、國家對經濟的介入和福特主義

在上述基礎條件存在的前提下，資本主義世界的貨幣管理制度，一方面可以彈性的運用通貨膨脹政策來刺激成長（如，抑制實質利率的提高，對公路、港口等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等）；另一方面，則在 Bretton Woods 國際貨幣體制之下，將先進國家的通貨膨脹抑制在溫和的水平。

總之，此一時期的高度成長，是從「冷戰體制」下，以美國為中心的國家對復興的援助、軍事支出對有效需求的效應，以及包括這些在內的，由上發動的凱因斯主義式

的景氣、就業管理」，逐漸轉變為「主要依靠勞資分配關係的調整而從下擴大有效需求的『自律性資本積累體制』」而形成的。

由此可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和福特主義論（如 RT 派）都只是主張導致成長的片面因素，而忽略了其它的因素的作用，而且也沒有注意到各種因素的重要性，因不同時期而有所變化的情形。因此，在分析現代資本主義時，應該注意到資本主義發展的各個階段的主導性產業和產業技術的特性，以及其成長的具體條件。如此，方能更準確的掌握這段時期資本主義高度成長的歷史特性及其變化。

C. 高度成長的瓶頸

這個時期，在進行資本積累的過程中，高度成長的基礎條件逐漸趨於消失。

首先，由於先進國家之的不均衡發展，美國逐漸喪失其經濟霸權的地位。在1970年，美國的貿易收支從黑字轉為赤字，其國際收支也因為龐大的軍事支出以及跨國資本的對外輸出，出現大幅度的逆轉，導致 Bretton Woods 國際貨幣體制崩潰。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在國際上由於通貨和信用膨脹，激化了通貨膨脹。加之，在現有產業的內部，技術革新的速度開始減退，相對於一次產業產品和勞動力的供給餘力而言，資本積累已經過剩化。因此，原料價格與實質工資的提高超過了生產力的提升，造成利潤率下降（根據，A.Glyn的分析，1973年，七大主要工業國家的利潤率已經下降20%）。

(2). 現代資本主義危機和歷史發展趨勢的逆流

A. 危機的特徵

從1973年以後持續至今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造成物價走向、一次產業產品的相對價格、金融資本的角色、經濟政策的基本方針等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也有過幾次景氣復甦的局面，但就整體而言，諸如：高失業率、經濟停滯、經濟活動不安定以及企業破產的增加等危機性困局，至今都還存在。

這種情形似乎可以稱為，繼19世紀末的大蕭條、1930年代的大恐慌以來，資本主義歷史上的第三次大蕭條。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局（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ILO）的報告指出：在1994年初，全世界不充分就業人口就大約有8億2千萬人，佔所有勞動人口的30%。

這個大蕭條是以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持續進行，表現在：因1973年的通貨膨脹危機而引起的再生產萎縮；隨後因資訊技術提高勞動生產力，而造成對過剩固定資本

的壓力；由於實質工資的停滯而減少消費需求；因內外競爭壓力使利潤率難以上昇；國家財政出現破綻、匯兌市場的不安定、產業空洞化趨勢；投機性泡沫經濟和其崩潰的打擊…等現象。

在這個過程中，由金融資本所操控的壟斷組織，並沒有像過去一樣出現爲了維持價格政策，而抑制或收縮生產規模因而深化經濟困境的情況。這一點，明顯與1930年代的大恐慌有所不同。因此，所謂「壟斷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停滯趨勢」的說法是否恰當，似乎值得懷疑。

其實，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由於資本主義動態的變化而產生的。即，針對蕭條的經濟重編，是以資本主義世界ME(Microelectronics)技術相繼高度發展與普及爲基礎。因此，現代資本主義出現了很顯著的再強化個人主義性、競爭性市場原理的傾向。那就是：

1. 投資變成輕薄短小化、自動化，企業能夠以較少的投資來提高生產力，擴大了母公司、工廠、各地營業部門的場地的選擇範圍；
2. 耐久性消費財的大量生產體制，也由於電腦管理而進行多樣化、彈性化生產。同樣的趨勢，也在商業和服務業發生。因此在消費生活和市場經濟上，強化了個人主義色彩。
3. 隨著工廠自動化（FA）、辦公室自動化（OA）的普及，增加了不熟練勞動者的雇佣量（如，計時勞動者）。因此，企業可以彈性的調整雇佣人數和工資成本。也因爲如此，過去以具有經驗和技術熟練度的成年男性的正式員工爲主所組織起來的工會，其組織率日漸降低，從而降低了對企業及政府進行交涉的能力及其社會地位。於是在勞動力市場也貫徹了個人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原理。
4. 由於資訊技術的發展而被迫進一步進行跨國化的企業，不斷增加其跨國境的活動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B. 新自由主義的現實基礎

在1973年的蕭條的過程中，凱因斯主義經濟政策由於深化了國家財政危機和通貨膨脹而失勢。因此，以1979年上台的余契爾政權作爲開端，各個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潮流相繼轉向爲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縮小國家在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減輕富裕階級的稅務負擔；放寬各種經濟規制；進行公營企業民營化等等。打擊了在公營事業擁有戰鬥傳

統的勞工運動，廣泛的促進了以個人主義市場原理為基礎的經濟再活化。也就是說，由於資本主義經濟高度的採用資訊科技，引發競爭性市場經濟的再活化，這就形成了站在個人主義立場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潮流的物質基礎。因此，新自由主義政策可以說是符合現實基礎而不能簡單的稱之為 Anachronism（時代錯誤）的政策。

由此可見，以資本主義經濟的現實變化為基礎而轉變為新自由主義的趨向，並非只是對在高度成長時期具有高度聲望的凱因斯主義的挫折而產生的反動而已。回顧19世紀末大蕭條之後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

1. 重化工業成為主導性產業並使設備投資成為「重厚長大」化，形成並且擴大了金融資本的壟斷組織。
2. 這種情況，帶來了以大量受雇於大規模工廠、具有技術熟練度和經驗的成年男性勞工為中心的工會運動的成長。
3. 國家增大其調節或緩和勞資對立的角色。

由於這些原因，強化了社會制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原理」的發展趨勢。俄羅斯革命之後，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要對抗國內、外社會主義勢力的成長，紛紛採取軍國主義政策、勞資同權化、福利國家化、冷戰體制和凱因斯主義雇佣政策等措施，更加促進了這個趨勢。所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論」，就是針對這種發展形勢的理論表現。

C. 資本主義的逆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原理」的重現

20世紀末所發生的經濟不景氣尚在持續中。資本主義經濟因採用高度的資訊技術而產生競爭機制的再活化，使得自19世紀末以降近百年來的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產生了新的「逆流」——投資單位的輕薄短小化、工會的弱化、縮減國家在經濟上的角色等等，因而強化了資本主義經濟原理依附在競爭性市場機制，才能顯現出來的本來面貌。

所謂「資本主義逆流假設」，就是用於分析資本主義在1973年以後所呈現的新的面貌的「中介理論」。

除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市場經濟重新活化其競爭機制之外，蘇聯式社會主義的危機和崩潰、以及隨後在東歐與前蘇聯各國進行的市場經濟轉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

革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加上亞洲各國的經濟成長等等，使建立在競爭性市場經濟上的資本主義，擴大其發展空間。因此在資本主義各國的內部，也正在削減爲了對抗社會主義而支付的負擔，以及對勞工的讓步。所以，資本主義各國由於競爭性市場經濟的作用，正在顯著的擴大人民在經濟、社會生活上的不公平和不公正。

站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以私人資本追求利益的自由爲第一優先的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其競爭性活力的再生路線，是朝向對人類和對自然破壞性荒廢作用的方向前進。現代資本主義所顯現出來的，對人類和自然的荒廢作用，是把近代資本主義從其萌芽、發展的全部過程中一直存在的基本侷限，以現代的型態展現出來而已，並不是屬於資本主義最近的特性。

因此，我們是似乎需要回到馬克思的原點，從現代的觀點來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原理、作用及其侷限性，再進行一次有深度的批判性考察，使其能夠用在現狀分析上。這就是說，「資本論」的靈活運用，是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基準。如此，一方面，我們可以避免因爲過度強調資本主義發展的一般性規律，而犯了教條主義的毛病；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爲一昧的著眼於一時、一地的特殊性規律，而犯了機會主義或修正主義的錯誤。（全文完） ★

原權會部落工作隊 **黑暗之心** 系列三

生命之歌

收錄二首影像 VCD
及五首音樂 CD

飛魚與雲豹音樂工團 國際演出

定價：NT 200 元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47 號 11 樓 劃撥：19448760 戶名：林廣財
<http://www.watahope.idv.tw> 電話：02-22250514

編輯報告

最近最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朝鮮半島上的戲劇性發展，兩韓領導人在韓戰爆發五十年後，竟然克服種種困難，進行歷史性的高峰會。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韓戰及其後半世紀以來的變化與影響？本期的《左翼》特別製作了【朝鮮半島的民族分斷與和解】專題，提供讀者一個左翼的思考視野。我們同時以「朝鮮半島南北交接圖」作為本期的封面。黎建江〈韓戰的內部與外部因素〉，指出韓戰基本上是一場民族解放的內戰，但在美帝國主義的干涉下，使得朝鮮半島的民族統一遲未能實現。劉鳴聲〈冷戰中的恐怖結構〉，分析了韓戰最重要的影響：全球冷戰體系的形成及其所建構的恐怖結構，他並深入的探討冷戰體系對台灣所產生的種種惡質影響。兩位南韓籍的左翼朋友也提供了他們的論文：洪根洙〈韓戰經驗的克服〉，對於美國在朝鮮半島上的宰制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姜禎求〈南北高峰會談的評價與未來南北關係應該走的方向〉，深入分析當前阻礙朝鮮半島和解的內外因素。

《左翼》自刊出蕭喜東〈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需要檢討〉一文後，引起各界許多反響。汪立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台灣問題初探〉，即是對該文的回應。汪立峽不贊成蕭喜東將一九七九年視為中共對台政策的轉折點，他同時對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提出了一些另類的看法，值得所有左翼的朋友細細思索。

六月的多佛海灘是一個令人難過的地方，58位大陸偷渡客被悶死在偷渡的冷凍車櫃內，在倫敦的施威全〈多佛港的大陸偷渡客慘案〉，對這一事件有最深訴的報導與評論；維也納的俞力工〈談中國大陸人口走私問題〉，則分析了大陸勞工大規模偷渡出境的政治與社經因素。

每周工時縮短為八十四小時的議題近日引起許多人的關注，尤其新成立的全產總理事長黃清賢在這一問題上的曖昧態度引起柳如慧的不滿，她在〈全產總的危機〉一文中，對於這一問題有深入的報導與批評。馮建三〈簡論當前電視改造方向〉，就當前無線電視擺脫黨政干涉提出他的看法，他反對目前主流的主張：全面私有化，而主張採取歐聯式的公有化道路。馮建三目前還與一些傳播學界的朋友實際投入反對電視私有化的運動。蘇活〈全民政府即權民政府？〉，將新政權與舊政權做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黃志龍〈戰後幾個主要的現代資本主義論〉，這一期是轉載最後的一部份，介紹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伊藤誠的理論。

暑假到了，一定有許多年輕的學子又要為住的問題而更動地址。搬家之後，記得將您的新住址通知〈左翼〉編輯部，我們會據此修正通訊資料，使《左翼》能繼續準時地寄到您的手上。

左翼 第八號

出版日期：2000年6月30日

初版三刷：2001年3月20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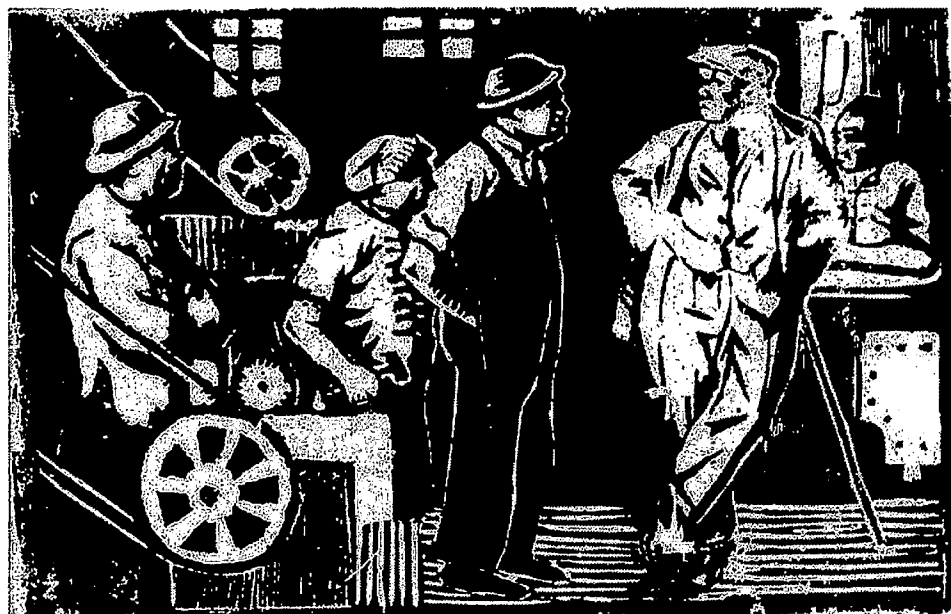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九號

三刷



〈交涉〉

作者：蕭傳玖

【摸索新時期的工運之路】

談勞資政協商體制

臧汝興 / 2

縮短工時與「缺工」的背後

陳光甫 / 4

社會安全與區域合作：從國際勞工議題談起

黃長玲 / 7

從杜正勝的「上下抉擇」談起 左思 / 18 新自由主義出現的背景 李殷淑 / 21

【爭鳴與求是】 回覆汪立峽，兼談“中國特色”

蕭喜東 / 23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蘇杰 / 32

寫在第四國際邊上

孫善豪 / 41

談勞資政協商體制

臧汝興

六月十六日立法院通過國民黨提出的兩周工時 84 小時案。而在這之前的修法過程中，全產總以及全總曾透過協商的模式簽署了行政院也是就民進黨提出的每周工時 44 小時版本。對於這樣的協商模式，現在已經有「勞工陣線」及部份工運界人士表示高度的興趣，認為協商模式應該更為實質化、體制化。

但我認為站在勞動階級的立場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協商模式的建立。以下將從幾個方面來談反對的理由。

從國外的經驗來看，最典型的勞資政協商體制就屬阿廷根在 50~60 年代法西斯統治時代實施的勞資政協商體制，該模式說穿了就是在勞方與資、政兩方的力量懸殊對比的情況下，勞資政協商委員會淪為政府下設的一個花瓶部門，且不斷為資方、政府的反勞動者政策背書。再來就是德國的情況，1960 年代後半，德國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因此政府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乃建立所謂的勞資政協商機制，並透過此抑制工資，以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結果，通貨膨脹的問題雖然解決了，實質工資的下降所帶來的生活負擔，卻必須由勞動者完全背負。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英國，1960 年代初，英國政府為了解決慢性的國際收支惡化帶來的資本積累的危機，乃組成「國家經濟開發委員會」，並誘導總工會（TUC）參與其內，不過，該組織組成後一直未能達成協議，一直到 1974 後才達成所謂的「社會協約」。但此協約生效後的四年間，工人的實際工資縮減了一半，最後逼使總工會不得不片面宣布協約無效。

最近的例子就是韓國的「勞資政委員會」。新自由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對工運、工人的主動攻擊，其具體的呈現方式就是勞動法律的改惡。於是，在韓國 96 年金泳三執政時代有「勞資關係改革委員會」的設立、98 年金大中時代有「勞資政委員會」的設立。以韓國的自主總工會「民主勞總」參與的「勞資政委員會」為例，其成立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為了通過「資遣法案」與「派遣制勞動」，金大中政權清楚知道金泳三時代的蠻幹，引起的全國性大罷工的後果，因此，他需要「社會性的同意」的外型，於是提議組成「勞資政委員會」。同時，政府擔心「民主勞總」拒絕參加，遂發動所有的保守媒體，發動輿論攻勢，逼迫「民主勞總」上談判桌。除了輿論攻勢之外，當時正值經濟危機期間，社會大眾對「民主勞總」的堅持鬥爭的路線，普遍憂心，才是最後逼使「民主勞總」不得不上談判桌的最重要原因。也就是說，民主

勞總是在經濟危機與輿論攻勢的雙重不利條件，被逼上談判桌的。上了談判桌的結果，竟是同意了「資遣法案」、「派遣制勞動」，換來的卻大部份是「民主勞總」的合法化、保障工會的政治參與權利等，與「民主勞總」本身的利益較相關的東西。而且，至今資方要到的東西皆立即實施了，但勞方要到的東西卻一再背信，未見實施。從民主勞總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的談判本身就具有相當的官僚化的危險。不過，所幸，該案在「民主勞總代議員大會」中遭到全體一致的否決，簽署代表不得不辭掉一切在「民主勞總」內的職位，引咎下台。

由以上國外的例子來看，所謂的勞資政協商機制，沒有一個不是政府、資方爲了完成他們的目標而找勞方背書的產物。因而當然也看不到勞動階級在任何勞資政協商中獲益的例子。

另外，就目前台灣工運界的情況來看，我們更有理由必須反對勞資政協商機制的建立。

一、這次工時協商過程中，全產總的反勞動階級行為。6月中旬的協商中，全產總捨國民黨的兩周84小時（平均每周42小時）版本，硬是簽署民進黨的44小時加限制性的四周變形條款。試問，全產總如此的協商前科，又如何讓我們同意代表勞動階級進行協商呢？

二、政策能力的不足。政策能力的不足絕對不是全產總的錯，這應該是每一個關心工運的人的責任。但不管怎麼樣，這是現實。協商往往是雙方各自在某方面取得；在某方面讓步。但目前，政府、資方與勞方在政策開發能力、評估能力上，實力相差懸殊，因此在政策的提出上，勞方只能居於守勢；在進退之間，勞方更是因爲缺乏評估能力，而無法拿捏。

三、工會組織的代表性不足。目前四個總工會體制加起來，工會組織率也不過10%上下。以10%的組織性工人，代表包括另外90%的工人在內的所有工人，顯然是有很大的問題的。況且，事實上，以大企業爲主的台灣工會組織現況，是更無法代表無工會的大部份小工廠工人的。因爲眾所周知，兩者的勞動條件相距甚遠。

四、工會體制架構的不健全。目前全產總的組織架構仍然只是一個鬆散的協議體。上層既無法強力領導基層；基層的意見也無法充分反映到上層。這表示全產總無法以強力的鬥爭力爲後盾進行協商（事實上從這次的工時協商中，可以看出全產總也不願以鬥爭力爲後盾）。這次全產總簽下四周變形條款，傷害到部份工人的權益，正反映了基層意見的被忽視。

五、勞、資雙方都缺乏意見的整合。目前不但代表資產階級的民進黨與國民黨，在政策上出現相互的不一致，連總工會都分成了四塊。四個總工會目前在立場在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代表勞動階級的團體，無法形成一致的意思，又如何聯合一致對

資方團體進行協商呢？而且這也將會是非常危險的方式，因為所謂的勞方代表，既分成四個組織，其中有些組織如果被政府、資方收買，那麼不難想像協商的結果會是如何。

其實，以上就目前工運界的情況提出的五種反對理由，只是為了加強我反對勞資政協商機制的理由。我不希望因而模糊了最根本的問題：勞動階級與資產階級是不可能妥協的兩個對立的階級，沒有鬥爭力為後盾，勞動階級是不可能獲得任何東西的。只有黃色工會才一天到晚想著在談判桌上協商，因為他們認為勞資需要和諧，以爭取「雙贏」。

★

縮短工時與「缺工」的背後

——從厚木公司的例子談起

陳光甫

2000年6月26日，經濟部就縮短工時為兩週84小時這項修法結果，公佈了兩項統計。一是縮短工時後，未來製造業的缺工率可能升至7.9%(台灣近五年來的平均缺工率為4%，缺工人數為九萬八千餘人；若上升至7.9%，則缺工人數將升為21萬人)，一是在上述前提下，2001年的勞動生產力必須升至22%。經濟部長林信義提出這樣的數字其實是要佐證：工時縮短將促使企業因成本負荷過高而外移，如果再縮減卅萬外勞配額，台灣將面臨「產業空洞化」的危機。

經濟部這樣的統計看似有理，但卻是似是而非的。而提出這種似是而非的統計，目的是在模糊焦點。

縮短工時一定造成缺工嗎？在缺工的情況下一定要將勞動生產力擴大到極限，資本家才能存活嗎？在回答這一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研究一個實例。

厚木機械公司是1978年在桃園成立的，1989年員工人數最多達到411人，後來由於產量過剩，取消了一些效益不好生產線，並資遣了一些員工，到了90年代，員工人數一直維持在340人。1997年亞洲經濟危機爆發，台灣從1998年起也開始遭到直接的衝擊，厚木公司開始推動優惠資遣的方案，並且遇缺不補。1999年，厚木公司進一步推動機械設備自動化及生產流程合理化的措施，經過這些措施後，厚木公司的員工再度減少到217人。但這樣的情況之下，厚木公司生產線勞工的每日平均工時

仍然維持在8.67小時(8小時40分20秒)，很少加班，而產量卻與自動化及合理化措施前一樣。

從上面這個實例，我們發現到，實施優惠資遣、遇缺不補及自動化、合理化等措施後，厚木公司的缺工率是36.1%，而由於工人總數減少、每日平均工時不變，所以厚木公司每日總工作時數縮短了1066.4小時，而實際的勞動生產力提高了53%，厚木工人的平均勞動強度增加了1.57倍。

從上述計算的結果看來，厚木公司經過刻意「缺工化」的計劃後，總工時縮短但勞動生產力卻增加了，與經濟部「縮短工時後，將造成缺工並有必須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壓力」的三段式推論相反。但在這個結論相反的情況下，卻包含著相同的內涵。關鍵在於「缺工」。

政府的缺工率計算公式是：

$$(\text{缺工人數} / \text{缺工人數} + \text{受僱員工人數}) \times 100$$

上面這個公式，受僱員工數是具體的，但缺工人數的認定可就很模糊了。舉厚木公司為例，它的缺工率已超過了法定標準，早就可以申請移工配額了，但它卻收縮生產線、遇缺不補，也沒有申請移工，卻還可以大大提高勞動生產力，維持了產量，所以，我們初步得出一個結論：缺工的企業不一定就要補足名額。也就是說名義缺工率並不等於實際缺工率。這個結論還可以從反面得到證實。新竹縣新埔鎮的遠東化纖廠(本勞2500人)以「在職訓練」為名義，自菲律賓引進450名菲勞(核配率為18%)在台進行訓練，培訓完成後再送回菲律賓遠化廠。這些菲勞在台其實就是作為工人來使用，並非是在職訓練計劃的學員。遠化的例子證明了遠化名義上雖不缺工，但實際上卻補進了450菲勞加入生產線工作。另外一個特殊的例子是桃園中興化纖公司。這個公司原有染整和紡織兩場，已分別引進移工使用，後來這兩場關閉，原有移工並未遣返，全數集中到化纖廠運用，這使得移工的核配率變成37.5%(已超出法定核配率)，中興化纖近幾年又可以重大工程專案引進大量移工(核配率可達50%，勞委會計劃降低到30%)，這種分散申請、集中使用的做法早已打破了法定的限制，連名義上的缺工率計算都變成多餘。所以說，如果移工與本勞的比例等於缺工率的話，實際上缺工的，名義上不一定缺工(如厚木)；實際上根本沒有缺工問題的，結果卻造成了名義上的嚴重缺工(如遠化、中興化纖)。「缺工」說是充滿陷阱和欺騙的。

厚木公司在實施兩年的「合理化」運作後，目前該工廠只有6名移工(即俗稱的外勞)，佔員工總數的2.76%，比例極低，這是因為厚木公司的汽車精密裝配技術不

是短期間就能養成的，所以目前引進的移工只擔任非常基本的勞務工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厚木公司本地勞工的平均年資已達 15 年，根據過去施行的優惠資遣專案，五年後厚木公司將面臨大量技術工退休的嚴重情況，如果再遇缺不補，工廠就要唱空城計了！最近厚木公司的日本資方在廠區外興建了一幢嶄新的宿舍，說是要作為「根留台灣」的明證，員工可以藉這個宿舍休閒娛樂，但所有的厚木本地勞工都是在地人，休閒娛樂自有去處，何須利用公司的宿舍？顯然公司新建宿舍是另有打算，其實是為移工的大量引進作準備。厚木公司如果再恢復原過去縮編的生產規模，達到二億以上重大投資的目標，則移工的核配率又可以提高，如此則替代性就大大加強了。

厚木公司的例子證明了經濟部的三段式推論其實是站不住腳的，這種提法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一種策略。但這種策略卻向資方暗示了許多可能性。上述的推論只代表其中的一種。

經過亞洲經濟危機而還在台灣繼續進行生產的產業，大都已经做了許多避險的措施，這些避險的措施不僅只在金融商品方面，在生產流程上在做了許多調整，這些調整大多對勞工不利。今年以來高科技產業的橫向和縱向合併也可以看做是這種避險措施的延伸，結果造成了資產重整後勞工債權的損害以及年資計算上的損失。經過重整和合併後的企業當然不需要原來所有的勞工，在完成重整及合併後的企業，可以再透過投資額取得更大的移工配額，這就是經濟部所說的「缺工」秘密。

縮短工時案通過後所引發的種種資方反彈和官方措施才是資本家的企圖。資本家團體如工業總會、商業總會以及「全國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所共同引用的「縮短工時後將增加 1776 億人事成本」的提法，如果搭配上他們要求的四週或八週彈性工時，則資本家實際上可以因此從工人身上賺到超過九千億以上的暴利！就算不實施變形工時，根據勞委會的統計，人事成本也只是增加不到九百億（有半數以上的企業表示他們不會用增加加班費來因應），如果再加上第三產業的收益，全社會的經濟收入還是增加的（這話勞委會現在盡量不提）。資本家藉機要脅的企圖已非常明顯。

縮短工時之後

縮短勞動者的工時其實是一種歷史趨勢，不管資本家多麼不願意，他們終究都要面對。台灣資本家和官方現在所有的反彈和憂慮其實都只是聲東擊西罷了。工時就算在無條件及無配套的前提下達到了縮短，也不意味著勞工今後就高枕無憂，資本家及親資本家的政府剝削勞工的方式會更隱晦、更殘暴。所以所有關心勞工階級的朋友們現階段要做的應該是具體收集勞工的工時實況，與勞工共同討論因應之道，作為對抗資本家的依據。



社會安全與區域合作： 從國際勞工議題談起

黃長玲

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在討論到安全議題時，多半著重軍事方面的考量，國際安全和避免軍事衝突可說是一體兩面。但是過度強調軍事的重要性，不但使得國際安全的複雜性無法呈現，而且造成國家中心主義式的思考，使得對於國家安全 (national security) 的重視凌駕國際安全 (international security) 之上。(1) 於是，近年來國際關係理論在國際安全議題上，逐漸朝向綜合性安全的概念發展 (the 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security)。除了傳統受到重視的軍事安全外，環境、經濟、社會與政治安全，都是綜合性安全的一部份。(2) 本文的目的是在此一概念下，以國際勞工議題為例，討論社會安全的意義，並指出亞太地區的國際安全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勢必要將勞動人權納入考慮，而我國參與區域合作的策略之一，可以從促進亞太地區的勞動人權著手。全文分成五個部份，第一部份討論兩種不同的社會安全概念，第二部份討論社會安全制度與國際勞動基準的關係，第三部份討論社會認同與國際勞工流動的關係，第四部份討論區域合作與社會安全的關係，第五部份提出政策建議。(編按：因篇幅所限，第五部分未刊出)

一、兩種社會安全的概念

綜合性安全的概念中所討論的社會安全，和一般所謂的社會安全頗為不同。一般所謂的社會安全 (social security) 是指一種社會安全制度，它透過社會福利政策，或社會保險的方式，來提供個別勞工就業安全及生活保障。這種社會安全通常是以國家為範圍，以個人為對象，而且側重經濟面向，亦即國家政策決定了個人在經濟生活上所能得到的保障。

對社會安全制度的威脅，來自國家政策的改變或社會價值的變化。譬如當一個社會將社會福利視為一種權利時，國家在財政支出上就願意增加社會福利的比重。相反的，當一個社會將社會福利視為一種富人給予窮人的禮物時，國家對社會福利的支出就會降低，或至少面臨降低的壓力。(3)

綜合性安全概念中所討論的社會安全(societal security)，則指的是一種社會認同，它的核心概念是，如果某一個社會的認同出現變動，它將會對區域或國際安全造成影響。這裡“社會”的範圍並不同於國家，它可能是一個國家中某一個特定群體的自我認同，譬如非裔美人(African American)或亞裔美人(Asian American)，它也有可能是跨越國家界限的一種認同，譬如回教徒或阿拉伯人。

奠基於認同的社會安全可能遭遇三種威脅(4)：第一種是移民，當一個社會遭遇大量外來人口的移入時，既有的社會成員可能會出現認同危機，因為他們的社會面貌已有劇烈的改變。中國將大量的漢人移入西藏，以及俄國將大量的俄羅斯人移入愛沙尼亞是這種情形的例子。第二種情形是水平的競爭，對某一個社會而言，如果受到鄰近社會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價值的重大影響，則這個社會也面臨認同安全上的威脅，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法語居民，就面臨週圍各省英語居民強勢文化的影響。第三種情形是垂直的競爭，人們的認同會因為社會的統合或分裂而改變，譬如南斯拉夫或蘇聯的分裂或歐洲共同體的形成。

個別國家的社會安全制度和國際上所存在的不同形態的社會認同，兩者雖然是不同的概念，但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兩者都和區域的穩定與安全關係密切。

全球化對社會安全制度或社會認同所造成的影響，具體的表現在國際經濟秩序的變動中。當代關於資本主義國際經濟秩序重整的討論，受法國規範學派(French Regulation School)和美國結構學派(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影響甚深。(5) 兩者雖有所差異，但重疊性頗高。(6) 他們的基本觀點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資本積累的方式，每一種資本積累的方式，都和一套特定的規範彼此呼應。以一九三〇年代以來的世界經濟而言，資本積累的方式是建立在雇用非技術勞工製造標準化產品的大量生產模式上。因此，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重要的兩種規範就是凱因思的經濟政策及社會福利政策。前者確保社會對大量勞動力的需求，造成就業穩定，後者則確保社會所生產的物品一般人皆有能力購買。如此則等於透過國家的經濟及社會政策，同時穩定產品及勞動市場的需求，亦即同時滿足了資本家及勞工的利益。雖然，在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間，採用凱因思政策的程度或社會福利的水準有所差別，但是，幾乎每一個國家，在戰後都或多或少經驗了政府部門擴大及社會安全制度建立的過程。這種解決勞資大規模衝突以確保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政策，就構成了所謂的戰後和解(the post-war settlement)。

全球經濟的持續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被整合進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裏，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日益激烈，並且隨著技術的變革，逐漸出現產能過剩的問題(over-

capacity)。資本家爲了不斷尋求產品的出路，開始重視不以購買標準化產品爲滿足的消費者的品味，以掌握市場間隙 (market niches)。爲了迎合消費者對品質及個別性的需求，越來越多的資本家開始脫離大量生產的方式，而著重生產的靈活與專業性。在這樣的情形下，原來奠基於大量生產模式的種種規範，也就面臨需要改變的壓力。八〇年代以來先進資本主義各國關於社會福利制度的改革，以及資本家希望重塑勞動控制的企圖，都和這個全球性的經濟轉型密切相關。全球化加速了資本與勞工在國際間的流動，前者使得個別國家的社會安全制度受到威脅，後者對既有的社會認同形成挑戰，就勞工議題而言，前者涉及國際勞動基準(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是否建立的問題，而後者則受到國際勞工流動(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的影響。

二、社會安全制度與國際勞動基準

就個別國家而言，勞動基準的建立是社會安全制度的一部份，國家對勞工的工資與工作條件予以規範，對勞工而言，符合勞動人權的要求，對政府而言，具有穩定生產秩序和持續資本積累的效果，對雇主而言，則因爲產業性質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影響。對勞力密集產業的雇主來說，因爲勞動基準所帶動的勞動成本，可能使得這些產業被迫出走或升級，但是對資本或技術密集產業的雇主來說，勞動基準的實施，固然增加勞動成本，卻也使他們能夠吸引或保有產業所需的技術工 (skilled labor)。

國際勞動基準的建立，則是一個較爲複雜的問題，因爲大多數的國家必須在保障勞動人權和貿易利益之間取得平衡。由於各國經濟發展的程度有別，其中雇主和勞工的利益也不一致，因此，如同表一所呈現的，國際間對建立國際勞動基準的態度甚爲分歧。對已開發國家的勞工來說，國際勞動基準的建立，不但具有保障勞動人權的效果，也可以降低產業外移的可能，並且創造較爲公平的貿易競爭環境。加拿大勞工聯盟的主席就認爲北美自由貿易區 (NAFTA) 建立後，加拿大製造業每十二個工作機會中，就有一個工作機會轉移到墨西哥，正是因爲企業在墨西哥較不受到勞動規範的約束，因此可以壓低勞動成本。(7) 但是，對這些國家的雇主而言，國際勞動基準的建立會增加他們海外投資的成本，所以在態度上較爲反對。這個立場和開發中國家的政府或雇主一致，對他們而言，國際勞動基準的建立不但會使勞動成本增加，讓外資卻步，甚至可能是先進國家阻礙開發中國家發展的手段。馬來西亞的總理就曾經表示：西方政府公開提議，消除東亞國家的競爭力。最近他們倡議的全球最低工資 (world-wide minimum wage)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西方人知道這是開發中國家唯一的比較優勢。其他的優勢... 都屬於已開發國家。很明顯的，他們所宣稱的對勞工福利的關

心，其實是奠基於他們自己的利益。(8)

表一：對建立國際勞動基準的態度

	支持	反對
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	公平的貿易競爭 保障勞動人權 降低產業外移的可能	海外投資的勞動成本增加
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	保障勞動人權	勞動成本增加 無法吸引外資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事實上，鼓吹制定國際勞動基準的學者和工會領袖傾向於將勞動基準分成兩種，第一種是和勞動人權直接相關的，譬如勞動三權（團結權，罷工權，和談判權）和禁止使用童工及奴工，第二種是和勞動結果相關的，譬如薪資水準和勞動條件。一般的共識是前者應該是所有國家都應該制定遵循的，無論其經濟發展程度為何，亦即所謂核心基準(core standards)的概念。後者則應視各國的發展程度而定，尤其在全球最低工資這個議題上，許多學者都持保留或反對的態度。(9)

開發中國家如果不遵循國際勞動基準，不僅使得該國的勞動人權缺乏保障，社會安全制度無由建立，也對已開發國家的社會安全制度造成影響，因為那會衝擊已開發國家勞動市場的薪資結構。當一個先進國家面臨開發中國家的競爭壓力時，它可以用提昇生產力和產品品質的方式來面對競爭，或者是採取降低薪資水準的方式來面對競爭。過去十數年當中，大部份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採取前一種方式，但是美國卻並非如此。(10) 結果是美國高中畢業後即就業的男性的實質工資在1979和1991年間下滑了26.5%。(11)對於採取增加生產力來面對競爭的國家而言，如同我們在上一節所討論的，全球化的趨勢也使得維繫既有社會安全體制的努力日益艱難。因此，在激烈的全球競爭下，建立國際勞動基準，代表的是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最低規範，也是對開發中國家勞動人權的最低保障。

三、社會認同與國際勞工流動

對於國際勞工流動的原因，自 1970 年代以來即有學者指出傳統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無法解釋國際勞工流動的許多現象。依據經濟學的觀點，國際勞工流動是國際勞工市場變動的反映。落後國家的勞動力過剩，已開發國家的勞動力缺乏，因此勞工由落後國家移入已開發國家。然而，這樣的觀點無法解釋為什麼 1960 年代以後，大量湧進美國的第三世界移民並非來自最貧窮的國家，而是來自經濟快速成長的拉丁美洲或亞洲國家，包括台灣和南韓在內。同時，這些移民也並非都是因為在母國欠缺工作機會才移民，相反的，很多新移民是原來社會中具有專業能力的中產階級。(12)

和國際勞動基準一樣，國際勞工的流動也因為各國發展程度的差異，而引起不同的看法。如同表二所呈現的，支持國際間勞工流動的觀點是，它可以解決輸入國勞動力不足以及輸出國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到海外工作的勞動者，他們在海外的所得，對其母國的經濟可以有顯著的貢獻。以埃及為例，1990 年埃及工人由海外透過正式管道匯入埃及的所得總額將近美金 43 億，同年埃及的出口總值只有大約美金 36 億。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多明尼加，1990 年多明尼加工人由海外匯入的所得約美金 7 億 3500 萬，而其出口總額為 3 億 1400 萬。(13)

對勞工流動持反對或保留態度的人則指出，對輸入勞工的國家而言，引進外勞的代價至少有二：一是產業升級的速度減緩，因為企業可以繼續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同時，外勞的功能有可能從彌補本國勞動力的不足，轉變為取代本國勞工，以致影響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二是引進外勞時，所引進的是勞工 (labor)，而不只是這些勞工所具備的勞動力 (labor power) 而已，換言之，勞動力雖然像其他的商品一樣，在市場上進行交換，但是它並不能被視為一般的商品，因為勞動者和他所具備的勞動力是不可分割的。引進外勞，就牽涉到外籍勞工的安置，是整個社會要面臨的長期性的問題。

對於輸出勞工的國家來說，持反對意見的人認為，輸出勞工並無助於解決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以菲律賓為例，90% 以上到海外工作的工人在出國之前就有工作，菲律賓每年到海外工作的工人高達 50 萬，但是菲律賓的失業率從 1970 年代末期到 1980 年代中期，持續上升。(14) 輸出勞工使得本國的人力資源配置也遭到扭曲，因為到海外工作的工人，通常在當地擔任的是無需技術的工作，非但無法透過到海外工作學習新技術，反而有可能因為缺乏運用的機會，而逐漸喪失他本來具備的某些技能，就業不足 (under-employment) 是許多工人的經驗。(15)

表二：對國際間勞工流動的態度

	支持	反對
輸入勞工的國家	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降低產業升級的可能 外勞所造成的社會成本
輸出勞工的國家	解決國內的失業問題 賺取外匯	無法真正解決失業問題 本國勞工在海外無法學習新技術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國際勞工的流動，直接影響一個社會的組成方式 (social constitution)，也連帶影響社會認同。引進外勞的國家，多半在政策的初期，堅持外勞只是“遷移性勞工 (migrant workers)”，而非“移民勞工 (immigrant workers)”。但是，隨著外勞人數的增加和居留時間的延長，由外勞成為移民的情形會逐漸成為常態。移民和當地社會在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上的互動，無可避免的會重構 (re-constitute) 一個社會的自我認同。在已開發國家中，德國境內的土耳其移民，法國境內的北非和中南半島移民，英國境內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移民，以及以移民為主的美國，都經歷了這個過程。對外勞身份的規定，是移民政策的一部分，也是認同政治的一部份，直接牽涉到一個社會如何自我定義。(16) 在認同重構的個過程中，不同的族群之間由於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所引發的衝突與摩擦，對前述奠基於認同的社會安全而言，往往是很大的挑戰。

有些國家為了降低外勞所帶來的衝擊，在引進外勞時，對外勞的身份有很嚴格的規定，或者是拒絕賦予已是當地居民的外國人完整的公民權。譬如日本的外勞政策，就以引進各國的日裔工人為主，而為數眾多的在日本居留的韓國人，即使在日本工作居住了幾十年，有的甚至已是第二代，都還無法取得日本公民的身份。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德國，德國在1960年代大量自土耳其引進勞工，到了1990年代，大部份在德國定居的土耳其人及他們在德國出生的孩子，在德國的身份仍然是外國人。(17) 波斯灣地區的國家因為嚴重的勞動力短缺，需要大量引進外勞，為了避免外勞所帶來的衝擊，採用非常嚴苛的外勞政策。根據估計，科威特，吉達，巴林，阿拉伯大公國，以及安曼等國，外勞約佔全國勞動力的三分之二，沙烏地阿拉伯的外勞約為全國勞動力的二分之一。(18) 在這些國家工作的外勞，幾乎絕無可能歸化成為這些國家的公

民，他們在教育，醫療，和居住上也不能和這些國家的公民享有同等的地位。(19)

許多引進外勞的國家，都讓外勞適用該國的勞工福利，以此來降低本國雇主以外勞代替本國工人的可能。我國目前的外勞政策也是如此。根據『就業服務法』的規定，外勞所享有的權利和社會福利，和本國工人一樣，受到勞基法的保障。(20) 有些國家不只是提供外勞和本國工人一樣的社會福利，還賦予他們政治上的權利。瑞典自1975年以後，凡是在瑞典居留超過三年以上的外國人，都享有瑞典地方選舉的選舉與被選舉權。芬蘭，丹麥，挪威和荷蘭境內的外國人也擁有選舉權。德國，法國，和瑞士雖然沒有給予外勞參政權，卻保障他們的公民自由，譬如言論自由與集會結社權。(21) 這一類的做法，使得外勞和本國公民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也使得一個社會的自我認同處於持續的變動中。

認同性的社會安全也和許多國家邊境的勞動市場相關。泰緬邊界的勞動市場存在了數百年，當地的居民早已習慣在不同的國境內來來去去，泰國南部從事深海漁撈的工人，有將近半數是緬甸人。(22) 同樣的情形存在於中南半島其他國家之間。在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較大的國家之間，譬如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勞動市場的存在和兩國之間的許多議題，包括犯罪、地下經濟、社會福利等等，密切相關。

四、區域合作與社會安全

國際勞動基準和國際勞工流動的問題，超越了傳統民族國家的界限，他們對社會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影響，顯示了個別國家的社會安全和區域的社會穩定，都有必需依賴國際合作的部份。事實上，針對這兩個議題，國際間已不乏合作的例子。最明顯的例子是歐盟，歐盟會員國之間有針對勞工基本權力所制定的憲章，會員國內的人民也可以在歐盟境內自由遷徙及工作。(23) 歐盟會員國之間所簽署的憲章，性質類似歐洲勞動公約，勞動公約中所規範的多半是前述核心勞動基準的部份。

事實上，一個國家是否簽署國際勞動公約和它是否遵行勞動基準，並沒有絕對的關係。舉例來說，墨西哥簽署了73個勞動公約，但是美國和加拿大分別只簽署了11個和27個，(24) 但是墨西哥遵守勞動規範的程度，遠不及美國和加拿大。這種情形使得有些學者認為，已開發國家應該運用貿易的力量，要求開發中國家制定勞動基準或遵守勞動公約。我國1984年通過勞動基準法的原因，就和對美貿易的數量龐大有關。當時全美勞工聯盟(AFL-CIO)對國會議員進行遊說，指稱美國企業無法和開發中國家進行公平的競爭，因為像台灣這樣的國家沒有足夠的勞動規範。美國政府在勞

工團體和國會議員的施壓下，表示台灣如果在勞動規範上沒有改進，美國將終止對台灣的貿易最惠國待遇。(25) 我國在美國的壓力下通過勞基法，其實是美國自1980年代以來逐漸在貿易法案中納入保障勞工權益條款的結果。這些法案中明列美國的貿易夥伴如果要取得或保有美國政府所給予的貿易優惠，就必須“賦予該國工人國際公認的勞工權利”。(26)

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開發中國家，不願意制定或遵守勞動基準的原因，是害怕喪失競爭力或無法吸引外資，但是晚近的研究顯示，前者並不影響後者。換言之，實施勞動基準的國家，其企業的競爭力或吸引外資的能力，並不低於沒有實施勞動基準的國家。(27) 了解勞動基準對國家整體的競爭力並不一定造成負面的影響，會給予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更多彼此合作的空間。

就國際勞工的流動而言，由於涉及的層面很廣，經由國際合作來促進社會安全的可能很多。當全球化的趨勢使勞動市場的特性逐漸由在地 (local) 轉為區域 (regional)，甚或國際勞動市場時，勞動人權的保障，無可避免的成為國際議題。近年來在歐盟討論的很熱烈的一個議題是，社會安全制度是可以不受地域限制，由工人“攜帶”到他的工作地點的，也就是所謂的“可攜帶的社會福利 (portable welfare)”。如果社會福利可以由工人“攜帶”至國外的工作地點，可想而知，它的實施必然需要更多的國際合作。

移民勞工的經驗不只牽動了當地國家社會形貌的改變，也對其母國造成影響。要使移民勞工適應當地的生活，平順的工作以及返鄉後能重新融入母國的社會，需要的是國際間多層次的合作，包括涉入國際勞工移動過程中的各種組織，譬如政府、跨國公司、人力仲介公司、以及個別企業等等。勞工在決定是否赴海外工作時，他們和這些組織的關係非常具有決定性，這些組織的運作和彼此互動的方式，也影響勞工在海外工作的經驗。(28) 這些組織是否互動良好取決於國際合作的情形。 ★

註釋：

(1) Barry Buzan, "I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ssible?" In Ken Booth, ed., *New Thinking About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Harper Collins Academic, 1991), pp. 35-36.

(2)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in*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綜合性安全的概念並非沒有爭議, Richardson 就用 "令人費解" (mysterious) 來形容此一概念。Richardson, James L. "The Asia-Pacific: Geopolitical Cauldron or Regional Community." In Gary Klintworth, ed. *Asia-Pacific Security: Less Uncertainty, New Opportuniti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6), p. 17.

- (3) 關於社會安全制度在概念上被視為一種權利或禮物的討論,可參見 Hartley Dean,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1991), pp. 37-38.
- (4)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121.
- (5) David M. Kotz., Terrence McDonough, and Michael Reich, eds.,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1987). Michael Piore and Charles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 (6) Hirst and Zeitlin 以及Kotz 對這些理論間的異同有很清楚的討論。Paul Hirst and Jonathan Zeitlin,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versus Post-Fordism: 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 No. 1 (1991), pp. 1-56. David M. Kotz, "The 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Approach" In David M. Kotz, Terrence McDonough, and Michael Reich eds.,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and Cri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5-97.
- (7) Shirley Carr, "Canadian Labor Strategies For A Global Economy," in Steven Hecker and Margaret Hallock eds. *Labor in A Global Economy: Perspectives from the US and Canada* (Eugene: University of Oregon Books, 1991), pp. 26-27.
- (8) 轉引自Gary Fields, *Trade and Labour Standards: A Review of the Issu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5), p.14.
- (9) Richard B. Freeman, "A Hard-Headed Look at Labour Standards," In Werner Sengenberger and Duncan Campbell eds.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Genev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ur Studies, 1994), p. 89. Ray Marshall,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in A More Competitive Global Economy," *ibid.*, p. 71.

- (10) Ray Marshall,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Standards in A More Competitive Global Economy," *op. cit.*, p. 67.
- (11) Lawrence Mishel and Jay Bernstein, *Declining Wages f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Graduate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1992) 轉引自 Ray Marshall, *ibid.*
- (12) Alejandro Portes, "Migr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Politics and Society* 8, no. 1 (1978), pp. 1-48. Saskia Sassen,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6. 這並不是說國際勞工流動的方向不受國與國之間經濟發展程度差距的影響,而是國際勞工流動的情形,也受到其他因素,譬如移民之間的社會網絡的影響。
- (13) Leah Haus, "Integrated Issues: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In Max J. Castro ed. *Free Markets, Open Societies, Closed Borders?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 Policy the Americas* (Miami: North-South Center P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1999), p. 87.
- (14) J. E. Smart, "Skills and Earnings: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al Impact on the Philippines of Labor Export to the Middle East," In F. Arnold and N. M. Shah eds. *Asian Labor Migration: Pipeline to the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N. D. Vasquez, *Mobilizing Surplus Labour through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hilippine EPZs, Overseas Employment and Labour Subcontracting* (Manila: Brotherhood of Trade Unionist and Ateneo Center of Social Policy, 1987). 轉引自 Jon D. Goss and Bruce Lindquist, "Conceptualizing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 Structuratio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XXIX, no. 2 (1995), pp. 317-51.
- (15) Agostinelli, G, *Migration-Development Interrelationships: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New York: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1991).
- (16) 身份和認同可說是一體兩面,兩者在英文裡是同一個字 (identity)。
- (17) 德國的情形和日本並不一樣,德國雖然不輕易讓外勞歸化為德國公民,但是卻提供外勞社會福利,並保障他們的公民自由,見下文。
- (18) Myron Weiner, "Immigration: Perspectives from Receiving Countries," *Third World Quarterly* 12, no. 1 (1990), p. 144.
- (19) *Ibid.*, pp. 145-146.
- (20) 我國的勞基法雖然適用於外勞,但是由於政府缺乏對僱主的有效監督,使得僱主不依據勞基法對待外勞的情形十分普遍。Pei-Chia Lan, *Bounded Commodity in A Global Market: Labor Trade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Taiwan*

(Manuscript, 2000), p.20.

- (21) Myron Weiner, "Immigration: Perspectives from Receiving Countries," *Op. Cit.*, p.147.
- (22) Manolo I. Abella, "Asian Labour Migration,"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12, no. 2 (1995), p. 132.
- (23) Neill Nugent,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36.
- (24) Marie-Ange Moreau, Patrick Staelens, and Gilles Trudeau. "Nouveaux espaces économiques et disorsions sociales (New Economic Spaces and Social Distortions)." *Droit Social*, no. July-August (1993), p. 691. 轉引自 Andre Raynauld, and Jean-Pierre Vidal. *Labour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p. 9.
- (25) Su-Fen Chiu, "Politics of Protective Labor Policy Making: A Case Study of the Labor Standards Law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93), pp. 152-156. 美國在台灣勞動基準法制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某一個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麼勞動基準法1984年通過時，只適用於製造業勞工，沒有包括服務業勞工。服務業勞工直到1998年才納入勞動基準法適用範圍。
- (26) 1984年美國通過對於廣泛優惠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的修正案，引號中的文字是修正案中的用語，轉引自Portes (1994: 161)。我國媒體常報導的貿易法案301條款，也有和勞工權益相關的規範。
- (27) Andre Raynauld and Jean-Pierre Vidal, *Labour Standar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pp. 58-61.
Jon D. Goss and Bruce Lindquist, "Conceptualizing International Labor
- (28) Migration: A Structuration Perspective," *Op. Cit.*, pp. 336-340.

從杜正勝的「上下抉擇」談起

向右傾斜的單一與貧乏（三）

左思

「國家走向不必限於或左或右的平面選擇，上下的走向更為重要。往上提升，還是墮落沉淪，毋寧更關係全體人民的福祉。此一新思維應該是未來國家發展的關鍵……」這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的用語。杜正勝的文章發表於今年3月14日的《聯合報》，題目是〈國家走向，左右的思維？上下的抉擇？〉。3月18日總統大選結果揭曉，民進黨獲勝，杜正勝被發佈為「故宮博物院」院長，取代《宋氏王朝》作者席格瑞夫稱之為「蔣家政權最後一個太監」的秦孝儀。

「上下抉擇」取代「左右思維」

政權交替，機構易手，最具象徵意義的莫過於「故宮博物院」。位於外雙溪的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最豐富的中國文化傳承文物，也是人類歷史的珍貴遺產，誰入主故宮博物院，誰就擁有最權威的歷史詮釋權。杜正勝於1997年主持國民中學教科書《認識台灣》系列的編撰工作，他配合李登輝政權而架構的「新台灣人」史觀曾經掀起一場統獨爭議的風波。杜正勝接掌故宮博物院，是李登輝與陳水扁權力交替之際搭建意識型態橋樑的重要象徵。

但是，杜正勝做為權威的歷史學者，卻公然主張以「上下抉擇」來取代「左右思維」，意即以民萃式的道德訴求取代科學的歷史辯證，如此上行下效，台灣的史學研究恐怕將往十八層地獄沉淪！

杜正勝主張「兩千年的總統大選應該定位在國家上升或沉淪的抉擇」，這當然是呼應中研院院長李遠哲出面挺扁的佈局。李遠哲在3月5日發表一篇題為《跨越斷層——掌握台灣未來關鍵的五年》的演說，提到他心中有強烈的迫切感，「迫切地擔憂台灣到底會『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這種上下緊繃拉扯的顯著狀況，在學術、政治和經濟都到處可見。」

其實，李遠哲的「跨越斷層」無非是呼應美國右翼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一本新書的用語，書名是《大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民進黨迅即配合李遠哲的提法，將「向上提升」與「向下沉淪」做為競選文宣的主軸，並將兩者以最簡易化約的二分法處理：支持陳水扁就是「向上提升」，否則就是選擇「向下沉淪」。陳水扁也在選戰的最後關頭，組織了以李遠哲為首的「國政顧問團」，在媒體

上密集打出李遠哲、張榮發、許文龍、殷琪等學界泰斗和企業界大亨的人頭，以標示「向上提升」的力量。一時之間，李遠哲的危言警語「台灣正走在往上提升或向下沉淪的抉擇點上」掃遍大街小巷，政治上的權位競逐被轉化為道德的選項。

小語氾濫，道德橫行

阿扁在李遠哲道德光環的映照之下取得政權，「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的提法成為宰制性的主流語言。在5月20日的就職演說中，阿扁說：「全民政府、清流共治」是「台灣社會未來要跨越斷層、向上提升的重要關鍵。」他承諾要「讓台灣社會徹底擺脫向下沈淪的力量，讓清流共治向上提升，還給人民一個清明的政治環境。」6月18日，謝長廷發表競選黨主席的演講，也聲稱要「讓民進黨向下扎根的果實，成為台灣向上提升的泉源。」

整個台灣社會的主流價值就這樣浸淫在「上下抉擇」的民萃式道德訴求之中，而模糊了政治經濟學上「左」、「右」折衝的歷史辯證。於是，我們訝然地發現，類似「全民政府、清流共治」這樣空洞的道德性語詞居然當者披靡，充塞我們的耳目。道德的宣示教化取代了對政治、經濟、社會現實的分析條理，統治者自我陶醉在一種「向上提升」的超然境界之中，以致竟然可以無視於憲政架構政黨政治的基本法則，而形成一種「懸空治理」的狀態：決策不可預見，立法無從掌握，執行漫無標的。統治者高距雲端怡然自得，任由道德迷霧遮住他的雙眼。

譬如，關於縣市政府統籌分配款的爭議，新政府未積極尋求制度化的妥協以建立可長可久的體制，卻只聽到阿扁話中有話的道德勸說。在參觀畜牧農場時，阿扁說，「政府就像母豬，將母愛平均分給仔豬。23縣市就是仔豬，每一隻仔豬都很重要，沒有大小之分，顯示母豬照顧得很公平，也很偉大。」在果園品嚐荔枝時，他又說，「荔枝果核如同中央，果肉就是縣市政府的統籌分配款，核小則肉多，大家應少些私心，共同為民眾謀福利。」

阿扁偏好這種隨機賣弄的，帶有道德宣示意義的「有感而發」，幾乎已到了「每日一說」的地步。拍馬屁的媒體說是「養豬哲學」或「荔枝定理」。在法文裡，這種政治人物自以為是的「哲言」，則通常稱之為 "petit mot"，即「小語」的意思。為了因應電子媒體搶鮮聚焦的特質，這類短小、俏皮的政治性「小語」日益氾濫，不僅形成公共領域言說 (discours) 空洞化的危機，而且對電視機前的公民造成「道德性騷擾」。小語氾濫，道德橫行，這就是我們今日的處境。

堂堂院士，玩忽左右

阿扁極力標榜「新中間路線」，是語言空洞化危機的另一種展現。他在選前刻意前往英國面見學者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似乎要透過西方取經的方式顯

露其「新中間路線」理論的淵源。但是，吉登斯大力鼓吹「第三條道路」或「新中間」，至少是一種「超越左右」的思維，對於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大思潮的折衝互動做過歷史性的觀照。阿扁卻在完全沒有左右座標，沒有歷史軸線的準備之下，貿然拋出「新中間路線」的政治訴求。也難怪「新中間路線」到了台灣，竟完全喪失了左、右辯證的內涵，而被荒腔走板地解讀為介於「統、獨」的中間。

更荒唐的是，竟然可以將統、獨的對立等同於左、右的思維。我們偉大的中研院院士杜正勝就犯了這一偉大的錯誤。在上述的那篇文章中，杜院士寫道：「過去十年大家習慣於把『國家走向』和『統獨爭議』等同起來，這不但消耗國力，製造族群隔閡，也蘊育社會的不安。我們很少冷靜思考，國家走向不必限於或左或右的平面選擇，上下的走向更為重要。堂堂院士都可以這樣玩忽左、右，更別說是一般報社的記者了！」

今年6月3日，《中國時報》小社論的題目是〈寧右勿左〉，評論中共中央駐港辦公室對香港言論的干預，文中寫道：「中共中央駐港辦公室的官員常像克制不用左手的左撇子，一不留神就用左手對香港指東指西。」在這裡，左、右之分又變成是官僚與民主的對比。另一位中研院院士余英時的認知與這位記者的水平相當。7月7日，余英時在時報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大師講座」發表演講，余大師批評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有關「亞洲價值」的提法，指出新加坡人犯有海耶克所說的「致命的狂妄」：「以為可以操縱人，發展到最後就是共產黨的理論。」他也指出中國大陸缺乏法治基礎，未來唯一的希望就是「轉型為真正負責任的資本主義社會」。在余英時眼中，共產主義是萬惡之源，資本主義是人間的終極理想，這已超越了左、右的對立，而是地獄與天堂的分野了！前者「向下沉淪」，後者「往上提升」，反共大師余英時和諾貝爾得主李遠哲在這裡取得對話的基礎。

何謂全民政府？何來清流共治？

其實，民主、自由幾時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大概只有像余英時和杜正勝這種以歷史為專業卻又完全昧於歷史辯證法則的資本主義應聲蟲才編造得出來這種彌天大謊。馬克思畢生與剝削人、壓迫人的體制做鬥爭，他控訴資產階級社會將「自由」化約為自由貿易和自由買賣，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把人際關係變成純粹的金錢關係，這難道不是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馬克思主張階級鬥爭，正是因為他清楚地認知，自由不會從天而降，也不能等待別人主動施捨，而是必須透過弱勢者的覺醒與團結，才能經由集體力量而獲得。只有經過抗爭，改變壓迫性、壓榨性的生產關係，人的自主與自由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實現。

社會主義又何嘗不要民主？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寧就已清楚指出：「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列寧對於官僚主義也有高度的警惕，1923年，在一篇題為〈寧

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中，對於那些「過於輕率地侈談什麼無產階級文化的人」，他即提出如下的諍言：「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能夠拋掉資產階級制度以前的糟糕至極的文化，即官僚或農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錯了。在文化問題上，急躁冒進是最有害的。」他已敏感地意識到官僚主義將是共產黨最大的「毒瘤」，並提出警告：「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麼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就像「民主」、「自由」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一樣，「官僚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必然。最近發生在台灣의八掌溪事件，四位工人在眾目睽睽下「等待死亡」的慄慄鏡頭，正是「官僚殺人」的原始面貌。我們看到的是：四位雇傭勞動者心手相連，那麼卑微，那麼無助，卻又那麼堅忍地求取生存；而從施工單位的雇主到資產階級政權的層層官僚結構，卻是令人痛惡憤恨的麻木、顛預、推諉、作態。台灣還有多少勞動者必需這樣以生命換取生存，何謂「全民政府」？放眼所及，到處是危害人命的土石濁流，到處是毒害人體的污泥廢液，何來「清流共治」？侈言唯心的「上下扶擇」，不論物質基礎兩極化的「左右矛盾」，台灣社會將只能在虛矯、媚俗的民萃語言中浮沉！

★

新自由主義出現的背景

李殷淑

1980年代，以美國的雷根與英國的柴契爾為代表的所謂新保守主義政權上台，從此開始了對二次大戰之後建立的凱因斯主義福利國家模式的全面批判，並提出新的政策。而這樣的新的政策的內容，包括：在經濟上強調市場競爭原理－小而強力的政府、社會保障基金的縮小、以及民營化等；軍備的擴張；對勞動階級的攻擊。當時，如此的新保守主義政策一定程度上來是限於一國內的，但自進入90年代之後，在全球資本間的競爭激化的條件下，形成全球性的經濟統合趨勢，於是世界各國開始了加強競爭力的競爭。一般稱之為新保守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1990年代以後的潮流，在本文中將以「新自由主義」稱之。

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出現的背景，與1980年代以來的新保守主義的出現，是出自同一脈絡的。二次大戰之後，資本主義經歷了一般「黃金期」，同時，凱因斯主義福利國家模式，也長期間實行於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凱因斯主義透過政府（或國家）對市場的介入，對經濟成長與失業問題做出貢獻。此時期，「公共部門」大為擴張，且在差不多的時期，在生產現場建立大量生產體制。凱因斯主義與英國的貝佛里奇的社會保障政策結合，並被概念化為「凱因斯主義福利國家模式」。所謂貝佛里奇主義指的是，1942年英國的戰時聯合內閣中提出的貝佛里奇報告書的內容。屬於自由主

義者的貝佛里奇指出戰後文明世界的五大惡：貧窮、懶墮、不衛生、疾病、無知。因此，主張針對五大惡做出社會性的對應。針對貧窮實施國民保險制度；針對懶墮實施完全雇用政策；針對不衛生實施衛生法；針對疾病實施國民保健服務；針對無知實施教育法。結果，英國當時的工黨內閣接受他的提案，從此他的提案成爲國家政策。

但是，到了1970年代，主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凱因斯福利國家模式，陷入破產狀態（成長的侷限－美國單極獨霸支配體制的瓦解、慢性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其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還是凱因斯主義的貨幣－通貨制度（即管理通貨制）。它使得通貨膨脹制度化了。管理通貨制度是以通貨量的供給是可以管理的爲前題的。黃金與美元間的固定關係斷節之後，通貨發行的權限集中於國家，只有中央銀行可以發行通貨，並透過此來管理物價與通貨量，但實際上，一旦如此，必將缺乏一個顯現的通貨管理基準。如此一來，通貨膨脹就必然發生。在金本位制下，是沒有通貨膨脹的，物價反而有下降的傾向。1933年，美國採取停止金兌換措施之前，1926年到1927年間，美國的批發物價指數以100爲計時，1933年的批發物價指數只有60。1933年的金兌換停止措施，是爲了阻止大恐慌下物價的暴跌的。因此，後來IMF體制下的管理通貨制度的建立，必然帶來通貨膨脹的制度化，同時，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貨膨脹其實也是早已註定的。在停滯性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資本的過剩積累（所謂資本的過剩積累是指，資本需要透過循環獲得一定的利潤率，雖然這並不能明確地標示出是投入資本的百分之多少，但利潤率下降到已經無法持續且正常地進行的資本循環的程度。而此概念並非適用於個別的資本，而是適用於社會總資本），造成現象上的收益性下降，進而帶來投資的停滯不前與失業率的上升等。如此的凱因斯主義的破產，不但造成實施凱因斯主義創造長期繁榮的國家的衰弱，同時更擴大了深深納編入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尤其是南美諸國）的經濟危機。

在如此情況下，就出現了資本的所謂的新戰略－所謂的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標榜「小的政府」，強調「放寬管制」，但其實這絕不意味著全面廢除國家對資本主義再生產過程的介入。它與過去不同的僅是，國家或政府介入經濟的方式。在經濟理論方面是以「重視供給經濟學」與「通貨主義」爲基礎，因此在理念上雖然看起來是強調「市場競爭原理」、排除國家的介入，但如果我們仔細觀察它所謂的爲貫徹市場競爭原理而採取的諸般政策，就可以發現國家（政府）的介入反而更爲強烈。舉例來說，在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下推動的「民營化」（或說是再私有化），如果沒有國家（或政府）的介入其實是很難進行的。另外，政府說國公營民營化的目的在於「提高效率」，但其實際目的則是使國公營企業及其利潤讓渡給壟斷資本。另外一個事例就是，對勞動階級與基層民眾的攻擊。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縮水，其實就是對間接工資（＝社會福利）的縮水。另外，新自由主義又會對工會進行直接的攻擊。例如，英國廢除了基本工資制度，同時還加強了各種對工會活動的法律限制。在韓國則有「勞資關係改革委員會」的設立與勞動市場的柔軟化的法制化。

回覆汪立峽，兼談“中國特色”

蕭喜東

感謝汪立峽先生對我的文章詳盡展開式的批評分析。下面擇要回覆並討論有關問題。

從汪文提到的毛澤東時代對台政策與「一國兩制」的起始日期的歷史問題談起吧。這的確是拙文過於忽略並可能造成一定漏洞的地方。首先，這又要從中共歷史上的統一戰線的戰略戰術、特別是和國民黨既聯合、又鬥爭的歷史實踐談起。和國民黨相比，中共在建黨後的相當時期內是忠於其初衷理想和綱領的，唯其手法特別靈活。所謂統一戰線策略，就是不同情況、不同階段時，認清主要矛盾、認清最大壓迫的來源，團結基本力量，爭取中間力量和動搖派別，分化、孤立敵對勢力，以打擊最主要的敵人。當外國帝國主義是主要威脅時，民族資產階級，甚至大資產階級集團也可以是爭取的對象。當帝國主義威脅下降，國內階級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大資產階級統治集團又會成為主要的打擊對象。這個策略貫穿中國革命的始終。這個策略的根據，並不是像有些人所解釋的那樣，「共產黨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階級利益放在第二位」，而是因為共產黨認為：像中國這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或說不發達的東方國家），首先要有受壓迫民族的解放，才能夠有受壓迫階級的解放。

毛澤東在世時，新中國的對台政策的確有過反覆：自解放台灣的議程被朝鮮戰爭和美國侵台所打斷之後，一九五四年中共於日內瓦會議期間再次提出「解放台灣」的口號，這時美蔣正加緊進行《共同防禦條約》的談判，加強軍事和政治聯合。這是所謂「第一次台海危機」的背景；一九五五年，美國國會批准美蔣《共同防禦條約》，該條約把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排除在條約適用範圍之外。而且，美國開始加緊製造「兩個中國」的輿論，並顯露出換掉蔣介石、另立傀儡的意圖，以配合兩岸正式分裂。這就是說，五〇年代末期起，中共認為：帝國主義分裂中國、將台灣「託管」直至變台灣為殖民地的危險上升為主要矛盾，而反動派內部發生裂痕，即美蔣之間的矛盾。而台灣類似滿州國那樣脫離中國的前景，在中共心目中是一個比台灣不脫離中國、在蔣介石的統治下維持冷內戰局面要壞得多的前景（同樣來自對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關係的認識）。按照中共的統戰歷史經驗，蔣介石集團此刻相當於一個與帝國主義發生矛盾的大資產階級集團，因而開始具備了爭取的可能性。這就是五〇年代末至

六〇年代初，中共的對蔣策略發生了從打擊到統戰的轉變，這即是汪文所談及的「四目」；至六〇年代中期，因美國加緊侵越戰爭更加重視台灣島這個「不沈的航空母艦」，美蔣關係緩和，中共又開始抨擊蔣介石在台灣的反動統治，因為此時分化美蔣已經成爲不可能。

值得強調的是：毛時代的對台政策和鄧江時代的對台政策是有本質區別的。一個重要事實是：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將台灣島內反對美蔣的民族資產階級、工農階級的力量全部鎮壓，使得美蔣矛盾成爲唯一可以利用的槓桿。很難想像：假如在五〇年代，台灣島上出現風起雲湧的黨外民主運動、反對國民黨專制的群眾浪潮，當時的中共竟會視而不見，背過臉去和蔣實行統戰。而八〇年代的中共恰恰是這樣做的。五〇年代中共的策略，如果說能算作爭取大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統戰的話，八〇年代中共的策略，能算作什麼呢？雖然也是爭取國民黨統治集團，但卻不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在美帝繼續干涉台灣的屈辱條件下和美建交。一個是民族解放、階級解放曲折過程中的統戰策略，一個是民族投降、階級投降的政策序曲，這就是兩種對台政策的本質區別。今天大陸官方媒體刻意宣傳「一國兩制」是在毛周時代就制定好的，其用意在於替今天的政策失敗遮羞。當然，毛時代的對台戰略恐怕也有不足和失誤的地方，這需要相關材料充分披露之後才能做出準確的評價。

汪文中有關「台灣群眾運動的階級性質」與「後現代的迷思」的討論是最有意思的部分。這兩部分定會引起台灣讀者們的熱烈爭論，因此我期待他們把問題引向深入，這裏只簡要指出兩點：汪先生首先指出：台灣八〇年代的群眾運動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實質目標是最終完成資產階級的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然後又馬上說：這些群眾運動，究其實，是「去階級」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將「統治階級和非統治階級不加區分的混同起來」。我倒不認爲這是汪先生的自相矛盾，也許兩種說法都是真實的，但是，我不能同意，在這樣經典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中，其領導者會愚蠢到（或真誠到）將「統治階級和非統治階級不加區分的混同起來」，也不同意說，從八〇年代到九〇年代，台灣還沒有什麼階級對抗性質的群眾運動或社會運動出現。

第二點，無論是社會運動的主體在主觀上接受多少後現代主義，還是多大程度依賴新社會運動的理論框架，我都懷疑所謂「新社會運動」是否真的「新」？正如同汪先生所指出的，「去階級」去不掉「資產階級政治國家」，「去中心」去不掉「眼前這個中心」。一些西方學者已經批評了「新社會運動」的概念，我推薦卡爾洪(Craig Calhoun)的文章《十九世紀早期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3, Fall 1993)，該

文發現「新社會運動」所號稱的「新」特點，全部都早已體現在十九世紀早期的勞工運動、民主運動中！我同意汪先生所說的，我們必須有能力鑒別西方時髦思潮所販賣的一些觀念，如「地球村」、「後現代」以及「新社會運動」等等。

汪文有關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的巨大啓示和意義，是我最為認同的地方。看到這一段激揚文字，我不由爲這樣反潮流、反主流的勇敢言論而感到欽佩。「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的動力」，這是左翼最根本的出發點。

站在這個出發點上，再來考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特主義）問題，就不容易因一些表象而迷失了。有關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及「中特主義」的聯繫及其有關爭論，很難在這裏展開敘述。這裏權且以汪文中的表述爲例說明問題，即：新民主主義確立社會主義作爲歷史發展的目標，而暫時以資本主義來「補充」社會主義，爲社會主義的目標服務。很好，這基本上也是「初階論」和「中特主義」的大致表述，就是：藉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還能夠容納生產力的發展的範圍內，就允許乃至鼓勵它的存在和發展。那麼，我下面將列舉出幾則新聞和幾組數位，來感性地說明：今年中國大陸的現實，是多麼地和上述表述正好顛倒：

先來看，中國特色的經濟蕭條：

●中國出現「危害型通貨緊縮」

中國在1997年就已經出現了通縮，到1998年底，除部分服務專案價格之外，幾乎所有的物價指數不僅持續下跌，而且變爲負增長。不僅全國各類物價指數負增長，而且全國各省區和城市也普遍出現負增長。這表明，中國已出現全面性的嚴重的通縮。另，據國貿局對全國610種主要商品2000年上半年市場供求情況進行的排隊分析顯示，78.4%的商品供大於求。

再來看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過度競爭造成的生產過剩的慘狀吧：

●全國各個生產領域過度競爭、重復建設造成產能過剩十分嚴重

中國由於重覆建設造成的工業能力過剩有多嚴重呢？《經濟日報》一月二十一日的一篇文章透露：九百多種主要工業產品有一半左右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只有10%。目前我國鋼鐵生產能力已達到1.5億噸，1995年生產能力利用率只有56%。1995年彩電生產能力已達4467萬台，當年產量只有2058萬台，利用率

僅 46%。

通貨緊縮的原因：貧富兩極分化，廣大群眾沒有購買力：

●中國貧富差距：5%富人占總存款 50%

中國官方的調查表明，城鎮居民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百分之五的富人佔有全國居民總存款量的五成，共約三萬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個富人存款約十五萬元。

●收入差距基尼指數：超過美國，直逼拉丁美洲

改革開放 20 年，收入差距不斷拉大。1978 年以來，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由 0.180 上升到 0.467。

一些學者的評論：

●中國改革：吃建國以後至七〇年代中的老本

七〇年代末至九〇年代初中國經濟改革的「黃金時代」，基本得利於建國以後至七〇年代中的發展積累，包括各種基本建設和政府財力。可以說，中國大部分人口都能在七、八〇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分到一杯羹，很大程度是靠「吃老本」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如備受談論的可持續發展的中心論點所指出，「發展同時是破壞」，所有工業生產同時也就是對自然生態和人類健康的破壞，增長得愈快，破壞便愈大，恢復的可能性也愈低，因此七、八〇年代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也是透過侵害未來幾代人和自然的資源來完成的。（原載《蘋果日報》一九九九年十月四日）

●從科技成就看文革和改革

在千禧之年，中科院做了關於中國科技千年主要成就、中國科技百年主要成就、世界科技百年主要成就的幾篇總結報導（均見《科學報》），我驚訝於其中我國重大科技成果或對世界有影響的科技成果竟大多為毛澤東時代的短短二十多年所取得（不要忘記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切百廢待興，醫治戰爭創傷，內憂外患），而更令我驚訝的是，即使文革十年浩劫時期，我們也取得了比如人造衛星、雜交水稻、氫彈製造、胰島素合成、哥德巴赫猜想等等的成果，而改革開放這二十幾年，我們更無一項名列其中！？像套話一樣，在談到這二十幾年科技發展時，中科院的科學家們說，改革開放以後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科學技術得到前所未有的迅猛發展。但搜索枯腸，中科院科學家竟未能列舉一、二成就來。

●如果將環境和資源成本計算進去，我們每年的經濟增長入不敷出

中國二十年來的經濟發展是以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以及資源消耗為代價換來的。到今天，全國70%的河流污染嚴重，50%的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淮河流域的污染企業首先遭到了關閉，繼之是太湖地區的污染企業。長江的年排污水量為130多億立方米，水質已嚴重惡化。《中國經濟時報》曾報導過河北邯鄲市的例子，1993年邯鄲市國民生產總值約360億元，而當地滏陽河流域污染對工農業造成的損失是7.5億元，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損失為9億元，對環境質量造成的損失為15.4億元，損失總額高達32億元，約占當年GDP的9%。這就是說，如果將環境和資源成本計算進去，我們每年的經濟增長入不敷出。

環境被糟蹋了，人的命運如何呢？

●從幾個統計數位看打工者的悲慘處境

陝西省咸陽市婦聯成秀琴做過一項統計，一九九八年一月至九月，大陸各大報刊報導有關打工妹因反抗凌辱而跳樓的事件就有十三起，總計二十三人之多，其中有四人死亡，十三人因此傷殘。

另據大陸全國總工會經濟部在一九九六年的調查指出，福建省福州、泉州及莆田三市的二千四百八十三家製鞋企業中，大多數存在苯、甲苯及二甲苯等有毒氣體的危害。這些企業工作場地狹小，人員密集，缺乏安全保護措施，人員清一色都是未婚打工妹。

江西省一所醫院血液科於一九九七年收容的血液病患中，打工者占百分之三十，他們都是從事有毒化學物、藥物、強磁場等特殊工作的打工者。僅一九九八年二月份，就有三名打工妹相繼在該院死亡。

四川省婦聯婦女研究所副所長繆珍南指出，一些在地下工廠及餐飲、加工業工作的打工妹，無償加班加點是常有的事，有時連續工作長達二十小時以上，但應該得到的報酬卻一再遭扣壓或拖欠不給。

最後，再看一個觸目驚心的報導：

●翻身農奴曾經當家做主的西藏正在「變天」！

隨著鄧小平解散人民公社，當年在「平叛」、「民主改革」、鬥爭領主、砸寺廟

過程中事事衝在前面的藏人「積極分子」對中共已經沒有用處，成為過時人物。他們當年大多是「人民公社」的生產隊幹部，公社解散使他們失去了原來的職位和地位（包括特權），成為普通農牧民，其中不少人落入貧困和年老無靠的狀況。根據西藏中共黨委組織部的調查，當年的「積極分子」現在大多淪為最貧困階層。除此之外，他們在藏民族重新一體化的今天，還承擔著被同族人視為叛徒的重負。他們遭到中共遺忘和冷落，不但不會得到同情，反而成為鄉親們的笑柄。他們淒涼的下場成為對藏人的告誡——這就是跟著中共的下場。

鄧小平推行農村經濟改革，基本方法是以化公為私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把原本屬於公社的土地和牲畜以「大包乾」形式分給農牧民。但是這副靈丹妙藥也帶來貧富分化。一九八一年，公社劃定的生活標準和牲畜的平均分配，縮小了這個地區舊社會巨大的經濟不平等。但是，過去的七年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導致了牲畜逐漸集中到一小部分新富起來的家庭，再次出現了一個幾乎沒有牲畜的家庭階層。

這些「新窮人」靠給富有的牧民幹活維持基本生活。一些新富人現在像舊社會一樣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有規律地雇用牧民、擠奶工、以及僕人……也有短期的零活。如紡羊毛，梳理山羊絨，屠宰牲畜，修剪草坪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新的經濟政策尤其使從前較富的階層受益，比如，那些在文革中財產被沒收或是遭到嚴重歧視的人。過去的富人重新富起來，而過去的窮人重新窮下去，不管是出於什麼具體的原因，這種現象產生的心理影響，肯定會讓具有強烈宿命感的藏人感到其中暗含的天意。

在當年緊跟中共的下層「積極分子」遭拋棄的同時，當年被「打倒」的「剝削階級」上層人士，又重新被中共待為上賓。放棄階級路線，就只能把西藏當作一個民族整體對待。而在這種面對民族而非階級的治理方式中，上層的作用顯然就遠大於下層，原本被打倒的上層就必然重新成為中共的「統戰」對象。為了重新拉攏西藏上層，中共歸還了原來沒收他們的房產，或是進行贖買或給予賠償。當年的貴族、頭人和活佛被請進人大、政協等機關任職，出席各種儀式慶典，參加社會活動，領取政府發的工資或津貼。

雖然中共的理論沒有變，做主人的姿態沒有變，然而通過現實生活，西藏普通老百姓已經清楚地感覺中共再不如過去那般強大，舊時代正在悄悄地以某種方式返回。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按照這種變化調整行為方式。丁青縣一位在西藏基層呆了二十多年的幹部給我講了一個小變化：文化大革命時期，當年的領主在路上與翻身農奴相

遇時，領主遠遠就要側立路旁，一隻袖子搭在肩上，彎腰吐舌——那是舊時代下等人對上等人的禮節——等翻身農奴過去後才敢繼續走自己的路。現在則變了，又變成當年的農奴在路邊彎腰吐舌，給當年的領主讓路，而老爺們的腰桿又像過去一樣挺直了。這種變化發生得非常微妙，並非有人強迫，也未曾有人明說，完全是自覺的。雖然舊時代並沒有真地回來，但是社會氛圍已經變化，農奴們敏感地意識到還是早點縮頭為好，那也是為他們曾經有過的挺胸抬頭表示悔過。從這個小動作的變化，折射出時代的大變遷。

之所以要大量引用以上新聞報導，就是希望以事實說明：限制了今天中國大陸生產力發展的，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平等，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經濟危機，是兩極分化所造成的普遍貧困化、大眾購買力不足。總之，本來說要借助資本主義發展生產，今天倒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抑制了消費，限制了發展。總之，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東西比今天中國的現實更能構成對「初階論」、「資本主義補課論」的絕妙諷刺呢？

澄清一下有關民族主義的問題。汪文說，我有指責中共的民族主義的傾向，而另外又說，我以「文革」時代的「反帝」尺規來譴責中共近年的對美外交政策，認為失之軟弱，冤枉了中共。雖然看上去自相矛盾，但我理解汪先生的意思。其實，這反映了人們對「民族主義」的理解，都存在著許多模糊和含混。我的理解是：「民族主義」並不是和「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相平行或相對立的一種主義，也不是和「普世主義」相反的主義——民族主義是一種流動性很大的情緒，它必須是附著在其他的理念和社會構成之上、處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中，而不能單獨存在：民族主義和資本主義下的競爭、暴力相結合，就是種族主義、排外主義、沙文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結合，是反帝反殖、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思想；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民主、自主的資本主義發展結合，就是西方福利國家；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全球化時代的第三世界統治精英結合，就是買辦主義。其實這最後一種看似矛盾，其實並不陌生，從汪精衛、陳水扁、到今天中國大陸的一些領導人身上，都有這種影子。因此，反帝反殖的民族主義，並不排斥國際主義，反而恰恰要求聯合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而全球化、買辦化的民族主義，也根本不會反帝，而是軟弱賣國。

那麼，中國大陸政府是不是民族主義、是哪種民族主義呢？不錯，中共的民族主義是被一些人罵得狗血淋頭，但這不能說明問題。因為中國大陸的政權和社會仍處在一個深刻的演變過程中，制度、政權代理人和階級關係都處在深刻的相互矛盾之中，這裏，必須區分作為政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政客的大陸領導人，和作為階級關

係總和的社會性質。

由毛澤東和老一輩革命家締造的新中國政體依然存在，這包括它的憲法、政治體制、各種內外政策遺產、意識形態符號等等。由於這些因素，勞動人民還掌握著一定的權力的殘餘，革命意識形態還享有官方地位。由於新中國的革命外交遺產，中國大陸在國際上還擔任一定的反帝角色，儘管這是很不自覺的。

至於它的領導人，也就是現在中共領導集團，說他們早已背離共產黨的初衷、背離社會主義，這基本無太大爭議。爭議在於：他們是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還是一群掠奪性的官僚買辦代表？這是在中國左派內部的一個仍在繼續的爭論。由於局勢仍在複雜的發展變化當中，結論不是很確定。當我們看到中共領導支援學生進行反美示威時，我們就以爲中共領導是退去了共產主義色彩的民族主義者，其實這種看法離現實很遠。中共領導人的內政外交，全部建立在屈服美帝世界秩序、和美帝搞好關係的基礎之上。中共領導人對民間反美的情緒和活動，從未鼓勵或加以利用，而是積極壓制。「五八」事件是一個極爲特殊情況下的例外。中共領導人的對美思維方式，更接近蘇聯解體前幾年的戈巴契夫。從中國大陸領導人在入世貿、全球化等問題上的言論看，他們的思想又非常接近那些推行美國欽定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拉丁美洲國家領導人。而在人權、民主、言論自由方面，他們的看法酷似蔣介石、朴正熙和蘇哈托。

如果說，戈巴契夫是美帝在蘇聯內部所可能找到的最理想的代理，那麼，同樣是蛻化變質了的執政共產黨的今天的中共領導人，正是同樣的性質。不能按照某些機械的公式，認爲蛻化變質了的共產黨就一定是民族主義，或一定是社會民主主義。歷史事實證明：蛻化變質的共產黨恰恰可以成爲最右翼、最反動、最媚外的集團。那麼怎樣理解人們所指控的「中國大陸領導人經常所表現出的『民族主義』」呢？打個比方，新中國的政體是勞動人民當家做主、以反帝反殖爲己任的國家，但是這條船現在被今天的中共領導集團所劫持了，這些領導人的內心怎麼想我們不知道，但是從他們的所作所爲看，他們總是爲美帝瓦解新中國政體的戰略服務，他們的每個對美稍有不從的舉動，都是在民眾的極大壓力下被迫做出的，每次被迫做出對美不利的舉動之後，都要再以相反的舉動和姿態對美賠禮道歉，彌補「過失」。因爲他們駕駛的船基本上還是新中國的遺留物，從某種角度說，這些劫持者自己，也是中國人民的「人質」，借用一個很恰當的比喻，那就是他們「身在曹營心在漢」，經常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是愛莫能助，身不由己。這就是尚存的新中國政體和買辦化的領導人之間強烈矛盾的表現。不錯，中國領導人經常訴諸一些「強國」、「大中華文明」等舊統治階

級的民族主義符號，但這其實掩蓋不了他們投降、媚外的本質。

那麼，今天中國大陸社會又是什麼性質呢？這裏值得介紹美國學者科茨(David M. Kotz, "Is Russia Becoming Capitalist?")的觀點，他認為今天的中國比俄國更接近一個「正常」的資本主義社會：今天中國具有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主要特徵：市場經濟、較大的私營部門、發展完善的工資勞動，以及一個獲取剩餘價值的新生資產階級。中國的資本主義是被原來的社會主義經濟環境（農業部門、原料、市場）在「漸進改革」中養育壯大的；而俄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拆毀了國有經濟，因此資本主義市場缺少賴以發展起來的基礎，俄國今天所演變成的制度，是一個由黑社會所控制的強盜性、寄生性的體制，科茨稱為「掠奪／榨取體制」。科茨的看法，自有其獨到和深刻之處，但是，這裏不妨指出，中國和俄國的區別，也許沒有那麼大，也不是質的區別，兩國的改革其實是同一個變遷過程，不過速度不太一樣、進展程度不太一樣而已。仔細研究一下中國大陸目前的官員貪污腐敗、國家資產被非法瓜分、資本非法外流的情況，就會發現：中國大陸也在迅速地走向一個「掠奪／榨取體制」。

最後，總結以上，那就是：二十年來的中國資本主義復辟，不僅取消了社會主義革命成果，也部分地取消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果。中國大陸社會不是新民主主義，而是正在滑向半蒙昧、半殖民地的官僚買辦、依附性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意味著勞動人民掌握政治權力、限制資本主義的惡性發展、逐漸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這不是當今的現實；再次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打倒官僚買辦、驅逐帝國主義勢力，是下一步中國進步的方向，是中國左派應該重新論證、重新提出並重新付諸革命實踐的綱領。

希望以此進一步和台灣朋友們展開討論。

★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

——回應汪立峽一文

蘇杰

從朋友那邊轉過來《左翼》第八號，使我有機會讀到汪立峽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台灣問題初探〉一文（以下簡稱汪文）。下面是我對汪先生文章後半部份的回應，因此不直接討論中國對台政策的部份。我對汪文的回應可分下面兩點：這兩點都關連到今天中國是否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問題，我想這個問題不僅對中國和台灣的左翼重要，而且對世界的左翼也有一定的重要性。

1. 對汪文中“補課論”提出不同的看法

汪文把中國在 1979 年三中全會後的鄧小平改革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八〇年代的實踐，汪同意中共官方對鄧小平改革必要性的解釋，也就是說：「中共堅持認為與資本主義的折衷，僅僅代表了社會主義內部的革新，最多不過是暫時的迂迴，其目的是為了鞏固社會主義並將它帶上更高的成就。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有一段時期越過了資本主義而把社會建立在一個不發達的經濟基礎之上。當時那種『高級社會主義形式』和落後的經濟基礎之間的巨大落差（矛盾），是中國社會所遇到的深刻問題的根源。這些問題如不解決，很有可能永遠阻礙著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可以說，中國社會必要走“回頭路”，來完成社會主義必須具備的“經濟先決條件”，以便“再次”向共產主義前進。」（24-25 頁）

汪文中的這一段是中共官方用來解釋 1979 年改革的合理性，它也就是一再被重複的「補課論」。汪對這「補課論」沒有提出任何質疑。但是這個補課論若能成立，它必須要建立在兩點上。一點是要否定 1949 到 1979 三十年間，中國經濟建設的成績，特別要強調生產關係太“前進”所以生產力不能發展。另一點是要肯定 1979 年的改革可以「完成社會主義必須具備的“經濟先決條件”」。如果這兩點中任何一點不能成立，則補課論就失去了任何根據。

到底中國解放後的三十年中，經濟建設有沒有成績？中國在新的生產關係下生產

力有沒有發展？

根據1984年《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中國社會總產值從1949年的557億元人民幣，增加到1979年的7,642億元人民幣（是1949年的13.7倍）。全民所有制企業固定資產從1952年的240.6億元人民幣增加到1978年的4488.2億元人民幣（是1952年的18.7倍）。在中國統計數字沒有公佈前，西方對中國經濟成長的估計與這些數字相吻合。總的說來，中國在這三十年中的經濟發展比起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同一階段（18世紀末到20世紀）中的三十年的發展毫不遜色，比起同三十年中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更是超過很多。（見埃克斯坦 Eckstein 所作的比較）1977年世界銀行委託若斯克(Rawski)作一份有關中國經濟成長和就業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在1979年以書的形式出版。

若斯克在書的序言中這樣說：「中國在供給它全人口（包括最低收入的人在內）的食、住、醫藥和其他基本生活資料上邁進了極大的一步。它掌握了現代的技術，並將它普及到各製造業部門和各不同的科學領域中。中國在1957年前連拖拉機、發電廠和手錶都不會作，現在中國可以製造電腦、地球衛星、口服避孕藥和核子武器。而且，工業發展的技術不是只限於幾個城市，農村的電氣化，地方的工業，技術訓練，和印刷業的發達，使得科學和技術可以傳播到中國兩千萬人家的每一戶。小學教育的全面普及和中學教育的迅速擴展可以保證將來知識會更深和更廣的傳播開來。」（Rawski, 6, 作者譯）

埃克斯坦和若斯克，以及一些其他研究中國經濟的作者都特別強調中國過去在人民公社下農業發展上的成就。他們說中國的農業是著重長期發展的，所以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農田基本建設上。農田基本建設是農民利用農閒時間作平整土地、修建灌溉系統、防止土壤流失、修路、植樹、用有機肥改良土地等等的建設。這也就是有名的大寨農業發展的模式。根據若斯克的估計，中國農民因為從事農田基本建設，每年平均工作日數從五〇年代初的119天增加到七〇年代中的250天，增加了40%（Rawski, 8）。除了人民公社在平整土地和水利建設的成就外，解放後國家每年也投下大筆的資金在河川整頓和大規模灌溉系統的建設上。在一篇1976年在美國國會作證的文章裡，格仁(Groen)等人說，到了七十年代中，中國的灌溉農田已經佔了可耕地的一半（美國和蘇聯以及大多數歐洲國家灌溉農田只佔可耕地的百分之十）。高產和穩產田也已佔可耕地的三分之一（Groen, 619）。

在機械化方面的成就，若斯克說，到了六〇年代初，國營工業和集體工業都開始

供給農業現代的生產資料，使農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到了七〇年代中，中國的農業機械化的程度已經趕上了六〇年代初日本的水平（Rawski, 12）。在同一次美國國會作證中，奎格(Craig)等人對中國發電設備和農業拖拉機在1965年到1976年間的發展作了估計，這兩項機械化的年成長率分別為21.4%和19.6% (Craig, 293)。偉恩斯(Wiens)則認為中國在人民公社成立後，在優良品種上獲得非常大的成就。偉恩斯說一般種子優良化的過程從雜交到普遍使用要經過八年到十年的時間，在人民公社時期的四層（縣、公社、大隊、生產隊）的研究結構下，雜交後的種子可以在不同氣候地區的實驗田裡同時培養，因此將種子優良的過程縮短很多。他說特別是從1966年開始，農村研究工作加強的結果，使得中國在優良種子的工作上獲的更大的成績（Wiens, 675-680）。農田基本建設、機械化、和優良品種的成就使得中國的糧食生產從解放後到1977年（1959-61三年困難時期除外）每年以3%成長率持續成長（Groen, 630-631）。

中國勞動人民在解放後前三十年經濟發展的成就，今天都被中共當局用「一大二公」為特徵的發展生產力（引用汪先生的話，23頁）給否定了。其實中國前一段的發展是「一大二公」也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有利於發展大型工業，但農村的發展卻是既小也又不那麼公，這完全要看具體條件來決定生產規模的大小和所有制的高低，也就是毛澤東所講的經濟發展要靠兩條腿走路。中國到了六〇年代中以後，農村的人民公社已經穩定，中國的工業也已經有了初步的基礎，從這時到1979年改革前是中國經濟起飛的時期，也是生產力在生產關係不斷改革下突飛猛進的時期。卻被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說成因文革變亂而喪失了十年的建設。

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是有計畫和按比例的發展。毛澤東在他寫的《十大關係》中強調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發展之間要有一個適當比例。他說中國的發展要避免蘇聯發展所犯的錯誤，蘇聯過份重視重工業而忽略了農業和輕工業，而結果反而拖慢了整個的發展。在計畫經濟下，中央的財政收入大部份是靠國有企業的上繳利潤，中央再按照計畫，來決定各種產業的投資，因此能在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發展之間保持一個適當的比例。

中國解放後前三十年這種均衡的發展，和第三世界國家以及今天中國的畸形發展出口加工業是不同的發展道路。主要的差別是中國以前的發展著重的是使用價值，以滿足人民需要為優先，要讓所有人生活都好起來的發展政策（今天被笑為均貧）。因此，使得中國人民的基本生活可以在短短的三十年內得到保障。根據世界銀行1979的報導，僅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的嬰兒死亡率和預期壽命都接近已發展國家（見

Ruth Sidel and Victor W. Sidel)。

有關中國解放後前三十年的發展資料還有太多，這裡有限於篇幅只能舉一些例子而已。解放之後，中國是一個經歷了百年戰亂後的一窮二白的國家，而這三十年的發展是在帝國主義的各面封鎖下完成的，所有的技術和所有的資金都靠自己自立更生。不但如此，解放後中國並不能平平安安的發展自己的經濟建設，剛剛解放，中國就必須為保衛自己去參加帝國主義發動的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的勝利抵擋住帝國主義武力直接侵華的野心，但也耗費了當時急需用來建設的人力和物力。此後，中國還是要不斷的花費資源在國防建設上。六〇年代美國在越南發動史無前例的侵略戰爭，背後要攻擊的還是中國。

如果中國前一段的發展真像今天中共當局講的那麼糟，帝國主義就不會那麼攻擊中國了。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給第三世界受壓迫的人民帶來希望，他們看到中國人民站起來為自己的命運奮鬥得到初步的成就，這就給他們極大的鼓舞。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也把中國人民未來的命運同第三世界人民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相信只有所有受壓迫的民族聯合起來將帝國主義打倒，世界人民才能得解放。這是民族的驕傲，這和右派的民族主義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觀。

中國解放後三十年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現今中共當局的宣傳只不過是為它在1979年後將以前所建立起來的人民的事業全盤解體找藉口而已，是無法服人的。因此，補課論的第一點是不能成立的。那麼從1979年改革到今天和今後的發展果真能「完成社會主義必須具備的“經濟先決條件”」嗎？對這問題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為什麼呢？

鄧小平在1979年的經濟改革，放棄了中國革命後的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經濟發展道路。鄧小平改革派認為中國可以仰賴外國的資本和技術來發展中國的經濟。他們相信壟斷資本國際分工的邏輯，一方面用加強對中國勞工的剝削來死命爭取勞動密集產業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用外來資本和技術發展幾個尖端的企業，想要和美、歐、日跨國公司競爭。在農業上，改革派將集體農業解體後，想把土地向種田能手中集中以便發展大型農場。

我們先姑且不論這樣發展路線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汪先生說的「與資本主義的折衷」或是他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80年代以後的實踐」這問題將在本文的第二點中將詳細討論。我們先看這樣的發展道路是否能成功呢？，是否能發展生產

力？，是否能如中共官方所說「完成社會主義必須具備的“經濟先決條件”」？

先從農業說起，我們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中國革命前農業不能發展的原因。根據郝克斯(Howe)所說，在解放前，中國和西方的農業專家都同意，中國的農業不能發展原因在於土地太過分散、缺乏現代的農業技術、和缺少政府在水利各方面的投資(Howe, XXI)。換句話來說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到了十九世紀時，因為土地一再被分割，所以農業無法能具有規模的耕作。同時封建地主拿了地租卻不肯投資在土地上，又缺少現代化的科學技術，這些都是封建制度下農業不能發展的原因。

中國解放後完成了土地改革，結束了長久的封建制度，但是在農業生產上如果還是維持小農經濟，農業還是不能發展。我們看到上面所說，人民公社的成立就是要擴大農業生產的規模，聚積零星的人力和物力來作農田和灌溉方面長久的投資，以及有系統的發展現代的農業科學技術。人民公社建設的成功，加上國家在農業建設上的大量投資，基本改變了中國農村落後的面貌。雖然因為集體所有制的限制使得農村的發展並不平衡，到七〇年代末，發展好的公社和發展不好的公社之間差距還是很大。但是，人民公社對中國和其他農業不發展國家所共有的問題找到了解決的辦法。改革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農村的土地並沒有能向種田能手中集中，中國的農業又重新回到支離破碎的小農經濟。中央財政的拮据使得中央對農業的投資大量減少，人民公社時代在三級所有制下推行的農田基本建設也全部停止，甚至連以前建起來的灌溉系統的維修都成問題，人民公社時代的農業科研體系也跟著失散。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和破產了的小農湧進了城市，變成了城市中幾千萬（甚至上億）毫無保障的移動勞工。

不論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沒有現代化的農業的支持，經濟發展是無法持續的。農業發展落後就不能供給工業發展的原材料，農村收入的低落使工業產品缺少一個廣大的市場。另外，中國的小農經濟是不可能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業競爭的。我們因此可以預見，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逐步開放農產品進口的結果，會對農業產生更大的打擊，導致農村進一步破產。

那麼改革開放後工業的發展又如何呢？從一方面來說，中國工業產品的出口是大量的增加了，但是靠勞動密集產品的出口，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就業問題。而且中國對美國和其它國家貿易上的順差，一定會進一步受到它們要打開國內市場的壓力。而且不只是開放國內市場的問題，美歐同意中國參加國際貿易組織，就是要借了它進一步來掌握中國的經濟。中共當局自改革開放以來，對國際壟斷資本常有一種一廂情願地

希望，他們認為與壟斷資本合作，可以彼此互利。他們認為可以利用外國的資本和外國的技術來發展中國的工業，等中國的工業發展起來，再與列強的跨國資本競爭。如果政策決定人以前存在這樣的迷失，現在應該醒了。就像在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之前，很多人認為南朝鮮已經很成功走向這條發展的道路，它利用外資和外國的技術發展了自己的汽車、電子等工業。它的發展得到先進資本國家的青睞，南朝鮮被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接納成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中的會員，一班經濟學家認為它可以成為第二個日本。但是在危機後三年後的整頓中，南朝鮮的外債逼上眉頭，不得不把它過去曾經投下大量資金的、發展最好的工業企業廉價的一個個出讓給外資收買。這只是這條路不能成功的例子之一而已。

中共當局與國際資本的合作傷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他們把中國的礦山和油田的開採權以技術合作為理由讓給了國際壟斷資本。中國的官員喪失了前一階段中國領導人真正愛國的胸懷，周恩來曾說過，中國的自然資源我們目前如果還沒有技術能開採，沒有關係，我們把它留給子孫後代讓他們再去開採。中共當局這樣的作法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以及今天的俄羅斯有什麼差別？等到我們自己要用時，我們的能源和礦山還會剩下多少？

中國目前著條道路發展下去，不僅不能「完成社會主義必須具備的“經濟先決條件”」，而且將會把前一階段發展的成果喪失殆盡。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必須同意一步步將中國的經濟私有化和自由化，把中國市場一步步開放。等到中國到了外債償還數額升高期間，中國更要受到外資各方面的壓力。

2. 對汪文中的「不可知論」提出不同的看法

汪文對社會主義的定義和尺度提出這樣的問題：「根據什麼社會主義的定義和尺度，能讓人信服地咬定它已“走資”呢？根據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腐敗傾向嗎？還是根據不斷增加的“待業”人口？或是各地的不平衡發展和貧富落差？」（25 頁）

汪先生這樣的問題是合理的，因為腐敗、失業、不平衡發展、和貧富不均的各種現象每一個社會都或多或少存在。那麼多到什麼程度我們就可以確定一個社會有了本質上的改變呢？因此，這些現象雖然可以作參考，但是沒有一個決定性的尺度可以作衡量的標準。

那麼我們如何確認中國已經在走資本主義了呢？爲什麼我認爲目前實行的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而不是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呢？

我認爲這個確認的根據是統治者(集團)的階級性。而這個統治集團的階級性不是憑空決定的，也不是由統治集團自己宣佈的。這個統治集團的階級性必須由它所推行的具體經濟和政治政策，以及它的意識形態來決定的。中國的統治集團是中國共產黨，從這個黨在1979年後所推行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和它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來看，中國共產黨已經不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了。雖然它口頭上還叫著(事實上已經越來越少叫了)四個堅持，這種做法除了爲要掩蓋它階級的實質，勉強維持它統治的合法性外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以鄧小平爲主的這個統治集團在1979年後的改革是全盤的、有計畫的、逐步的將前三十年所建立的一切解體。在經濟和政治上，它首先在農村用家庭承包土地的方式將集體農業解體，並用個人承包集體所有的農副業和工業的方法把這些企業私有化。中國共產黨在鄧派改革下把農村經濟改變成小農經濟。政治上在人民公社解散後，恢復了村和鄉的政治單位。在這個改革中，農民在政治上失去了以前在人民公社時期他們對社隊領導的監督權。近十幾年來，農村的「幹部」可以任意的強加於農民身上的各種負擔，可以利用他們的職權壓迫農民，就是農民喪去政治權力的結果。農村集體經濟的解體和農民政治權力的喪失，也就打破了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從解放中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最重要的工農聯盟的階級策略。打破工農聯盟是鄧派政治鬥爭的勝利，是無產階級在這場鬥爭中的失敗。

在工業上，以鄧小平爲主的統治集團有計畫的逐步將原有的全民企業解體，將工人三十年來獲得的權益一步一步的剝奪。他們把全民企業改爲每個企業單位獨立核算後，使得每個企業必須要利潤掛帥，也就使得經濟計畫變得有名無實，直到後來終於把計畫廢除，改用凱恩斯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從工業體制改革一開始，他們就攻擊工人的「鐵飯碗」。「鐵飯碗」是對工人工作權、工資、福利的保障，是解放後工人得到的權益。任何站在工人立場的政黨都不會認爲這種對工人的保障是件壞事。而當權者在八〇年代的改革就是要打破工人的「鐵飯碗」。他們把永久工變成合同工，變成臨時工，並且用立法授予企業解雇工人的權力。他們認爲工人在失去生活上的保障後才會好好幹活，企業只有在能解雇多餘的工人才能提高效益和利潤。把工人變成只是爲增加剩餘價值的雇傭工人，把「多餘」的工人變成失業後備軍。這樣的做法和資產階級有什麼差別？要有一個有彈性的勞動市場，這是多麼熟悉的資產階級的說法！

工業體制改革相當徹底地改變了工人在工廠中的地位。雖然在改革前，中國的工人還不能達到完全自己管理工廠，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工人治廠是一個努力的目標。毛澤東認為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像蘇聯那樣照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廠管理制度。六〇年代從鞍鋼憲法到文化大革命都在有意識地改革工人和管理者之間的關係，使工人有機會參加管理，使管理者有機會直接參加勞動。並且鼓勵工人參與技術改革，和取消工廠內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這樣有系統的和持續的大規模的改革，提高了工人在工廠內的地位，也提高了工人的積極性，和他們對工廠的關心和愛護。

在工業體制改革十幾年之後的今天，中國工人已經變成了雇傭工人，他們為保住飯碗在工廠內除了乖乖地作工外，對工廠的管理還能提出什麼要求？這樣的改革能說是從工人立場出發的嗎？如果中國共產黨是個工人階級的政黨，它能做出這樣對工人不利的改革嗎？

1975年修改憲法時，中國人民獲得對四大自由——大鳴、大放、大辯論、和大字報，以及工人的罷工權在憲法中的保障。當鄧派得權後，1979年就馬上修改憲法，取消了人民享有的四大自由和工人所享有的罷工權。雖然中國在社會主義時代尚不能說已經有了很完善的民主，但因共產黨多年實行群眾路線和領導發動群眾運動，加上工廠內工人在管理權上的進一部增強，到了七〇年代，中國已經初步找到無產階級民主的實行方式。這種方式現今看來是對當權者最好的一種監督。1975年修憲時，能把這些人民的基本權利放入憲法中，受到最高法律的保障，這是無產階級的一個勝利。不幸的是，這個勝利是短暫的，在四年之後，人民的這些基本權利又被從憲法中刪除。1989年，改革開始十年後，中國人民尚沒有認識到當權者的真貌，他們還是用他們熟悉方式來表示他們心中的不滿，提出他們的訴求，但當權者回敬給他們的卻是武力的鎮壓。

在教育上，鄧派集團把過去普及教育的政策改變為今天培養菁英的教育政策。在人民公社成立後，公社開始設立自己的初中，縣裡也開始辦高中。當時農村的教育經費一大部份由中央負擔。國家撥款建學校和支付教師的工資，所以貧窮公社的孩子也不會因公社缺錢而無法上學。中國過去對教育普及的重視提高了所有勞動人民的知識水平，從而減小了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差別。而現在呢？富有的農村當然可以辦起一流的學校，窮的農村不但付不出老師的工資，而且以前建起來的校舍也是塌的塌，倒的倒。不僅如此，對一般農民來說，孩子的學費成了極大的負擔。再加上在分田後，年輕人的勞動力（不像在集體農業時）對一個農家來說極為重要，很多農村的孩子（尤其是女孩）不得不放棄學業而加入生產，有的更要遠離家鄉出外求職，這是都

市裡流動勞工的來源。在都市裡的學校，每學期要收幾百或上千的學雜費，使低收入和失業的工人無法負擔。這樣的教育政策剝奪了勞動人民獲得知識的權利。而國家的教育經費卻大筆用來培養重點學校中的菁英，但卻眼看這些菁英一批一批的出國，一去不返。這跟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腦力流失沒有差別，珍貴的教育資源被用來為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培養人才去了。

在意識形態上，中國共產黨在1979年後的轉變是極為明顯的。鄧派集團利用國家的宣傳機器傳播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想把中國三十年來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從中國這塊土地上消滅。他們把工人宣傳成只有靠物質刺激才會努力工作的金錢奴隸，把農民宣傳成了靠吃大鍋飯不做活的懶漢。他們一方面把過去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合作及支援說成是落後無效率，另一方面他們推崇資本主義的競爭文化。他們把普遍提高人民生活說成是均貧，提倡要少數人先富起來。並極力推崇西方的消費文化。但是我們認真的看一看，其實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並沒有自己的文化，他們不是借用過時的封建文化，就是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因此，不管是洋的還是土的，都是腐朽的。

1979年後的中國把前一階段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的結構粉碎了，但還沒有能建立起來一套完整的資本主義系統。在今天中國的社會裡，不同與發展完善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上的特權是靠政治上的特權得來的。因此，中國雖然走的是資本主義的道路，但在政治上還必須背著「共產黨」這個包袱。所以說它是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應該是很合適的。

因此，不管是中國官員當今的貪污腐敗（不只是汪先生很客氣說的腐敗傾向），還是社會上有大量失業、和不平衡發展、以及貧富不均的各種現象，這些現象都是鄧派二十年資本主義改革政策實行的結果。雖然我們不能訂下衡量這些現象的尺度，但是我們不能因此推說我們無法作判斷。我們必須把這些現象追回到它們的起因，否則我們會把「不可知論」變成對目前中國的政權的辯護，因而蒙蔽了自己和別人。

上面是我看了汪先生的文章後，趕在《左翼》第九號截稿前匆忙寫的。如果要真正對中國的過去和現在作評價，還需要更多的材料和更深的探討，這是一項重要工作，需要大家一起努力來完成。 ★

寫在第四國際邊上

孫善豪

這是一篇寫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五日的舊稿，刊登在當時和散居各地的朋友所共辦的小刊物《月報》上。雖然文章很老，以致沒有什麼現實性，但作為紀錄看，可能仍有些趣味。特誌於此，供《左翼》和所有以左自許的朋友們一晒。內文略有修改。

我的住處沒有浴室。昨天去公共澡堂痛痛快快沖了個澡，覺得自己都白了一層。點了根百樂門(Parliament)，輕飄飄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在路上看到一牆的托洛斯基(Leo Trotzki)海報，近前一看，標題曰：「除了史達林主義還有別的社會主義嗎？」再一看，乖乖，竟是「第四國際」在柏林微酊區(Wedding)辦活動，慶祝「左派反對派」開山立派七十周年。身為「左派」兼「區民」，這個場焉可不捧？於是今天，拼著冷風，又犧牲了一場餃子會，湊熱鬧去了。

對托洛斯基和第四國際，我其實只有些零星星的概念，完全沒有任何「感性認識」。勉強算，也只在慕尼黑和朋友聽過第四國際總書記孟戴爾(Ernest Mandel)一場演講：不過那是與第四國際沒甚麼直接關係的。到了會場(朗克中學)，門口有個賣《斯巴達克主義者報》的，花五十分尼(約合台幣十元)買了，順便問今天的節目是甚麼。我的打算是，最好是演講會，這樣我可以聽聽「托派」到底在想甚麼；若是酒會茶會之類，要與人聊天、要主動去「挖」東西，那就比較累了；而如果是歌舞表演，我掉頭就走(之所以擔心是歌舞表演者，倒不是「杞天之憂」：八七年德共(DKP)在曼罕姆(Mannheim)慶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就是蘇聯民俗歌舞表演)。但是這位賣報的老兄支吾其辭，我有點納悶了：難道你們自己人都搞不清楚今天有甚麼節目嗎？

會場是學校的大禮堂，一看就安心了：果然是純演講的態勢。舞台上是一大幅托洛斯基檔案照，上方一塊大紅布，寫著「左派反對派立派七十年」。照片下也是紅布，上書「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四十年」。舞台上擺了張長桌，桌前當然也掛了紅布，寫著「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德國支部」(當然都是德文)。桌旁是講台，正面又是一張托洛斯基。會場邊有書攤，那些書，你只要一看封面就知道：都是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出的。我花了五馬克(約合台幣九十元)買了入場券，時間還有一些，逛了逛書攤，買了幾本，訂價都不怎麼低。付了賬，突然發現好像沒有看到孟戴爾的書。

笑人家沒甚麼勢力，但聽眾也有八、九十位，比起敝黨—中國民主社會黨—，大概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大部分是二、三十歲的德國(或至少是歐洲)男子，女的大約只

有十來位，此外十幾位中亞人(不知是斯里蘭卡人—那裡有著名的托派鬥士—還是庫德族人，庫德族的解放組織「庫德勞動黨(PKK)」剛被德國和法國政府禁止)、一位非洲黑人，至於黃臉孔的，就區區在下一人了。主持人先作開場白，一開口，竟是「同志們」(Genossen)，嚇了我一跳。講沒幾分鐘，還請全體起立，為世界各地的托派烈士默哀。

演講很合理地分三段，一是第四國際的過去，二是現況，三是未來。演講者到底甚麼來頭，我也沒搞清楚，反正如果你不知道他們的組織架構，那麼任何官銜都是沒有意義的。比較特別的是第二位講者：是英國支部(即「國際共產黨」，ICP)來的一位「女同志」。

演講者都是照本宣科，真是比無趣的。不過也有清楚的好處。大略說，托派是繼承列寧-盧笙葆-托洛斯基一系的傳統：強調國際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必須、而且只能在全世界範圍裡實現(例如俄國的原料和德國的技術可以納入統一的生產計畫之中，而這只有當俄國和德國是同一個工人國家的時候，才是可能的)。所以一九一七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必須繼續在全世界推動革命，直到全世界成爲一個工人國家爲止。但是史達林卻出賣了革命，而只在蘇聯搞「一國社會主義」—這毋寧是倒退回民族主義，而背叛了國際主義。(托與史的爭執，在中國也是有其效應的：寧漢分裂後的「大革命」[南昌起義等]就是托派的策略；而後來的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則是史達林「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策略。)托派除了左邊反對史達林的民族主義之外，也右邊反對社會民主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成立威瑪共和國，由社民黨執政。但是一九一八德國十一月革命，卻就正是被這個昔日戰友的社民黨所鎮壓的；而推動繼續革命的領袖人物盧笙葆和李布克內希，也是在社民黨的執政之下，於一九一九年被暗殺的。這場冤仇結得可深，深到現在也沒化解。

歸根結底，托派是「左派」，所以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向資本主義投降的社民黨；但它又是「反對派」，也就是反對史達林主義。它本身的立場，簡單可以叫「國際主義」，那麼它所反對的，其實也就是一切形式的民族主義了：無論是右邊的或左邊的民族主義。不過國際主義也並不是非得要搞個正經八百的甚麼世界革命總司令部之類的東西，反而只是：各工人運動必須把自己看待成全世界工人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以這種「全局」的視野來提出主張、採取策略。這種主張，我是無異議贊同的，甚至當演講者講到這裡的時候，我都要自認是個托派，而大有相見恨晚、孤魂野鬼終於找到歸宿之感了。不過托派們似乎還是躲在恩格斯的陰影下面：還在談著要服從歷史客觀法則、要準備迎接即將必然來臨的世界革命....等等。這在我看來，不過是證明自己是弱者罷了，就像人只有在徬徨無靠的時候才會相信命運一樣。由於對教條反感，我於是想趁二、三場之間的休息時間溜之大吉。但是又想起孟戴爾：豈但是不見他的書，剛才兩個演講者連提也沒提他一下。難道第四國際除了托洛斯基就不相

信任何權威了嗎？我可不大相信。於是又去逛書，但還是不見。正準備帶著狐疑離去，一位神經兮兮的女同志過來搭訕，我順勢一問，登時大澈大悟：原來第四國際在一九五三年分裂了，孟戴爾是另一派，而且場外賣報的就是他那一派的，莫怪他老兄不知道場內是甚麼節目了；而所謂「國際委員會四十年」，這「四十年」就是分裂四十年了。我突然有種上當的感覺：原來撞上了一個分裂派。

跟這位神經兮兮的女同志一扯淡，下場演講也就不好走開了，何況女同志說：這場講他們對現實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想想也對：剛才聽的都是些陳年濫調（濫調者，不在內容，而在表達方式也），看看他們怎麼看待現實問題，也不錯。不過，大概所有死硬派的社會主義者都有這個毛病：無論講甚麼問題，都要先長篇大論自己的理論基礎、再來個歷史回顧，然後才會進入正題。當我耐心等這第三位老兄終於要進入「前瞻未來」的主題的時候，卻很氣餒地發現他已經講完了：所謂未來，也不過就是「我們要用廿一世紀的眼光代替廿世紀的」。

怎麼樣是廿一世紀的眼光呢？還是國際主義、還是要準備迎接即將來臨的世界革命。但是用國際主義的眼光來看現實，到底看到甚麼呢？迎接革命，到底要準備甚麼呢？不知道，至少他沒說。我於是感到：這個「國際委員會」大概已經是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了，它已經沒有生命力、沒有未來了，反而，它只能靠不斷咀嚼自己的過去，來維持現在的生存了、只能在過去的天才創見中感到自己現在的榮耀了。

掌聲過後，主持人上台，把我這種氣餒的失望感一掃而空：明年起，這個國際委員會將在全歐洲建立黨組織，配合各地情況（例如法航工人罷工、德國礦工抗議等等）發展工運：國際主義的未來一片革命形勢大好。但是這種突來的振奮卻又立刻被一種「好笑」的感覺取代了：爲了發展組織，現在請各位捐獻！於是四角立刻站起機警的工作人員（當然那位神經兮兮的女同志也在內）遊走全場，先收紙鈔支票（言明「一百、五十隨意」—那意思是：小於一百五十的就免了—），然後拿鐵罐子收硬幣。我起初很不好意思地低下頭，避開工作人員期待的目光，後來偶一抬頭，差點沒笑出來：最後演講的那位老兄正在位子上數鈔票。數啊數的，數完，當場宣布：我們募到一千九百五十多，有沒有誰願意再捐五十，湊足兩千？熱心人士當然還是有的，當場開了張一百馬克的支票，於是募到兩千多了一演講，成功！我不自禁地想起小時候上教堂的情景：也是這麼些虔誠的死硬派、也是不斷覆述過去、也是對現在和未來提一些空洞的訓誨、也是要靜默（禱告）、也是會後要奉獻...。於是又期待著：是不是也像教會裡奉獻之後要唱《哈里路亞》一樣，這場演講要以一曲慷慨激奮的《國際歌》畫下完美的句點呢？等著等著，只是等到那數錢的老兄把鈔票銅板都收起來之後，主持人道了聲謝，...就散了。

★

編輯報告

縮短工時是近月廣受勞工朋友關心的議題，新政府、資方與工會幹部在這一議題上所進行的角力、妥協與權謀，引起許多人的關心與不安。部份工會幹部宣稱，勞資之間建立正式的協商管道是當務之急，為達此目的，勞方對資方做出一些讓步是必要的。臧汝興〈談勞資政協商體制〉對於這樣的立場是持反對態度的，他指出由於台灣勞工力量的微弱，因此當前勞資政協商結果總是對勞工做出不利的安排。關於勞工應該如何看待勞資政協商問題，我們希望能在左翼內部繼續開展深入的討論。另外，陳光甫〈縮短工時與「缺工」的背後〉則是以實証資料戳破新政府與資方最近大肆宣傳縮短工時會導致缺工的謊言。黃長玲〈社會安全與區域合作：從國際勞工議題談起〉，是在探討全球化下國際勞工流動所引發的問題與因應之道，黃長玲的文後附有很長的附註，我們認為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所以保留了這些資料供讀者參考檢索。這些文章顯示新時期的工運何去何從，還有待我們繼續探討與摸索。針對這些勞工問題的論述，所以我們特別選擇了蕭傳玖的版畫〈交涉〉作為本期的封面。

本期的《左翼》刊出左思〈向右傾斜的單一與貧乏(三)——從杜正勝的上下抉擇談起〉，他對目前台灣主流學界只談上下抉擇不談左右的漠視人類歷史發展的論述提出強烈的批判。李殷淑〈新自由主義出現的背景〉，對於過去二十年來橫行國際的新右派思潮產生的背景及基本主張有著精辟簡要的評介。

自從《左翼》第六、七號登載了蕭喜東的〈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需要檢討〉後，在左翼朋友間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汪立峽在上期即做出了回應，但汪文對於當前中國大陸變化的論述卻引發了另外的爭議，蕭喜東的〈回覆汪立峽，兼談中國特色〉與蘇杰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都是對於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嚴厲的批判，在他們看來，中共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使中國大陸正在快速的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蕭、蘇兩人的立場顯然與汪立峽不同，但我們欣見直至目前為止，不論各方的觀點如何，參與論戰的作者都能以激烈但坦誠的態度進行建設性的對話，而非做人身攻擊式的漫罵。希望這種討論的方式能成為左翼朋友今後互動的模式。

我們一向認為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的變化是當前左翼人士所要面對的嚴肅課題，如果左翼朋友在這兩個關卡上無法透過討論達成共識或相互理解，則台灣左翼力量的整合將會一直存在著困難。因此《左翼》今後將繼續就這些議題進行建設性的討論與爭辯，我們也誠摯地邀請所有關心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變化的左翼朋友能熱烈地參與論辯。《左翼》於每月月底出刊，因此當期的截稿日期在每月二十五日。

孫善豪的〈寫在第四國際邊上〉，雖是描述他九三年參與一項國際托派活動的感想，但他對某些國際左翼人士緊抱前輩遺訓，堅持立場，無法擴大群眾基礎的冷嘲與批評，實值所有左翼朋友深思。不過，孫善豪對於托派的敘述，是否會引發另一場的論爭，就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了！

左翼 第九號

出版日期：2000年7月31日

初版三刷：2001年8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號

二刷



〈修鐵路的女工〉

作者：賽拉·哈賽

【第三世界與反帝】 第三世界的歷史發展與時代意義	伍艾蘭 /2
台灣與第三世界—— 阿扁出訪的幾點思考	俞向南 /6
左派反對 WTO 的意義何在？——從拉丁美洲反帝經驗談起	金寶瑜 /9
【爭鳴與求是】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上）	李崇仁 /21
關於八大工業國沖繩高峰會	林書揚 /33
逆取順守？—— 俄國私有化研究簡述	崔之元 /39
【讀者與作者】 臧汝興、柳如慧對張樹榮來函的回覆	/37

第三世界的歷史發展與 時代意義

伍艾蘭

一.

陳水扁就任總統不久，便展開外交之旅，訪問了中美洲及非洲幾個第三世界國家，針對多年來台灣金援外交之譏，陳水扁表示富有的台灣應當幫助貧困的國家。陳水扁這個答覆，巧妙地把過去台灣民意代表（多數為民進黨立委）對國民黨政權賄賂式外交變成具有高尚情操的道德行為。同一個事實，不同的用詞可以得出全然不同的效果。語言之魅力於此可見一斑。

這裡暫不討論語言的吊詭性。我們姑且承認陳水扁政權講的都是真心語，真誠地想幫忙第三世界貧困國家，而未具有其他政治目的。如果這樣，我們得了解什麼是第三世界？為什麼我們提及第三世界總聯想到貧困？台灣過去對第三世界的態度是什麼？等等問題。

更且，從左翼的角度，第三世界的意義何在？對左翼運動會有什麼影響？

二.

第三世界這個用詞的出現，大約始於1960年代中期。但第三世界這個概念所意指的對象，則要早得很多，至少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

1960年代中，法國、中國（中共）都有人指出，冷戰中的美、蘇兩大陣營的對抗，直接衝突的可能性都不高。因為美、蘇兩強都認識到，在這個總體戰的時代，控制更多的世界資源與市場，因而提升國力，是最終打敗對手的根本基礎。因此，美、蘇兩大集團之外的廣大地區，包括亞洲大部份地區、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的國家便成為美、蘇兩強極力爭奪的對象。

另一方面，1950、1960年代，這些地區的許多殖民地紛紛獨立，大量的新獨立國家，又多具有被殖民的類似歷史背景以及繼續受資本主義強國在經濟及其他政治上不平等待遇的現況，這些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很容易聯合起來，在國際政治上發揮作用，特別在聯合國大會中（聯合國大會不分國家大小強弱，一國一票，是較民主的機制。數量上佔優勢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便能發生較大的影響力。相對地，以五強為基石的聯合國安理會，以及以股權多寡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與世界銀行（WB），還有以進出口能力為基準的世貿組織（WTO），其決策便不民主，操縱在少數強權手中）。

兩大集團之外的亞、非、拉美國家具有共同地受兩強爭取與控制的特點，又能在

國際政治上發揮作用，由這些地區所構成的第三世界便成了國際社會上舉足輕重的一股力量，在 60、70 年代成了美、蘇兩強之外的另一國際因素。

三.

第三世界國家因戰後冷戰及國際總體競爭的背景下而形成一個具體的政治概念。值得注意的是，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本來就客觀地存在，並非到了 50、60 年代才突然冒出來。但是地區過去在世界政治上產生的作用極小而消極，未曾引起強權、政治人物與學者的特別注意。

因此，「第三世界」名詞的創造與流行。代表一種全新的形勢及思維，即過去被認為卑微、貧困、無足輕重的地區或人民，是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從來，歷史都是被強權宰制；這種強者的邏輯，隨著第三世界的出現而受到空前的挑戰。

這種弱者力量的出現亦非 1950、60 年代才有。例如，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是如此，只因歷來史家均將這些弱者的反抗污名為「流寇」，使她們在歷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被矮化或忽略了。

更直接的例子來自 1920 年代初期，列寧對當時國際局勢的分析。列寧認為，除了正統馬克斯所強調勞、資之間的對立之外，在十月革命之後的世界總局勢中，還有帝國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之間，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以及帝國主義與廣大殖民地人民之間的三大矛盾。在這三個矛盾中，前兩者的重要性是很顯然的。歐、美帝國主義國家對初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仇視與恐懼之深是眾所周知的；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引爆了兩次世界大戰。這兩大矛盾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重大性實足以和馬克斯對資本主義最根本的勞資矛盾相提並論。

然而，列寧的第四個全世界基本矛盾－殖民地人民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當時則缺乏有力的佐例。有些論者甚至評說，第四個世界基本矛盾只是一種主觀期待與策略的考慮。這些論者認為，列寧出於期待殖民地人民起來反帝，以舒解帝國主義對新生社會主義蘇聯的壓力的策略考慮，而提出第四矛盾。因此，主觀的期待超過客觀的事實。換言之，第四個矛盾的提法反帝策略的考慮重於客觀規律的描述，第四矛盾的重要性不可能與前三個矛盾相提並論的。

這個批評到了 1960 年代便站不住腳了。第三世界力量的展現為半世紀前列寧的論點提供強有力的實證基礎。正如伽利略的科學先知受到教會的攻擊一樣，列寧的洞見也遭到庸俗實證主義者的批評。以庸俗實證主義的觀點來看，當時殖民地人民都在殖民主義的枷鎖下呻吟，連存活下去都有困難，哪有可能與龐大的帝國主義對抗而組成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一個基本矛盾？然而列寧以辯證的方法與革命者的氣魄，預見這些卑微人民鉅大的歷史作用，將第三世界（當時的殖民地地區）人民反抗的潛力充份地預估出來，而將之與其他三個矛盾相提並論。

四.

列寧對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潛力的預估，以及第三國際據此制定的支援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策略成爲兩次大戰間國際局勢演變的一個重大因素。特別中共的革命，不僅是抵抗日本軍國主義擴張侵略的一個重要力量。而且她發展出來農村革命的道路，成爲日後第三世界反帝運動的範本。因爲第三世界人民所處的情境與社會制度，與過去中國人民所處者較相似，中共能夠在這種非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地區產生了反封建反帝革命，爲第三世界日後的反帝運動提供一個可能性。列寧對第三世界人民反帝的期待，經由中共的革命而充分發展出來。這是 50、60 年代第三世界興起的一個關鍵因素。

第三世界受中共革命成功的啓發而壯大，回過頭來也幫助了中共。1971 年，中共突破了美國二十多年的封鎖進入聯合國，便是第三世界國家努力的結果。當然，中共在當時極力支持第三世界的反帝鬥爭，包括了她本身在韓戰、越戰及其他外交事務上堅決反帝，並處處爲第三世界國家仗義直言的立場與作法，鼓舞了第三世界人民敢於反帝的決心與士氣。並且，除了政治外交領域之外，中共嚐試走出一條有別於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也較符合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條件。一個成長或許較慢但卻較公正、較平等、較有尊嚴的經濟發展可能性的主張也在第三世界流傳開來。到了 70 年代，第三世界的鬥爭已經從 50、60 年代爭取政治獨立擴大到經濟自足上。

資本主義的基本前提是獲取最大利潤。爲此，她必須不斷擴大市場，掌握更多的資源，雇用更廉價的勞力。這是資本主義國家要不斷對外擴充，成爲帝國主義及戰爭的必然原因。二戰後，雖然舊式殖民主義難以持續，但資本主義國家卻另闢蹊徑，繼續掌握全世界的市場、資源及勞動力。這是資本主義生存的根本基礎。

因此，60、70 年代第三世界將其鬥爭的焦點從形式上政治的獨立轉化成維護本國市場、資源的獨立，並試著走出另一條經濟發展的道路時，資本主義國家受到了最鉅大的潛在挑戰。如果這條新道路發展出來了，資本主義體系將無法掌控世界的市場、資源與勞動力，資本主義世界的利潤、成長與繁榮都將日益凋萎。這將是走向資本主義終結的道路。第三世界在 70 年代呈現的挑戰，是具有如此宏大的歷史性作用底潛力。

五.

可惜這個潛力到了 80 年代卻在人們的期待或提問中消失了。

消失的原因很複雜。且分析幾個較重要的。首先，第三世界雖然有類似的歷史背景與不利的國際處境，但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差異性亦不小。類似性促成她們的團結，因而發揮了 60、70 年代的重大作用；但差異性則會妨礙其團結。一旦差異性被激化、被分化，團結將很難維繫。而團結是第三世界發揮作用的前提。任何第三世界

國家，都不足以和美國甚或許多其他資本主義相抗衡或競爭。唯有團結才能展現力量。

其次，第三世界多數國家極度貧困，與資本主義國家差距太大。在迫切追求擺脫貧困的前提下，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是莫大的誘惑。雖然自60、70年代開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嚐試走一條有別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但這條人類從未曾有的道路許多人仍然信心不足。兼之，一條新的發展道路，其成效不是短期內容易展現出來，更會影響一些人的決心。到了中國鄧小平路線開展，這個最早提倡走新道路的國家自己都放棄了初衷，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便紛紛從這個全新的嚐試中退卻下來。當經濟的鬥爭潰退之後，政治的團結與反帝鬥爭便很難維持。

再次，資本主義也調整了步伐，從80年代大力推動自由化、私有化及全球化。這些變化逐漸腐蝕了第三世界國家的主權、強化了對世界市場，資源及勞動力的掌控與整合，使得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團結更加困難。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分別各自與國際資本主義掛鉤，變得孤立無援而在國際政治上被邊緣化，甚至在經濟上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也日益擴大。

最後，資本主義體系的意識型態宣傳也重現威力，一掃越戰之後那種失敗者，侵略者的窘困局面。從80年代開始，配合英、美等國開展的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變遷，國際媒體充斥了對自由市場的謳歌，對集體化與國營企業的詛咒，對全球化的禮讚。

到了90年代，由於中共發生天安門事件以及蘇聯及東歐國家的變色，國際媒體更大肆宣染歷史的終結。資本主義的優越性與不可取代性。資本主義不僅是效率高、競爭力強，甚至是較重人權，富有人道的道德優越者。

以上分析了80年代後，第三世界力量衰退的主要因素。

理解了這個歷史性的大轉折，讀者或許要問：第三世界的歷史性作用是否一去不復回了？還有，第三世界今日的處境不僅政治影響力大不如前，即經濟的地位亦更加邊緣化，那麼第三世界的出路何在？

這是一個不易有共識的難題，短期難有樂觀的答案，永遠的悲觀也沒必要。

也許，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種新的洞見，就如當年列寧的洞見一樣。作一個左翼，不能被現狀所罩住。從第三世界被壓迫，而且愈來愈嚴重此一基本事實出發，我們相信反抗總會從某些角落冒出來的。我們沒有理由過份的悲觀，而應致力於「反抗從我處冒出」的準備。

最後，從第三世界形成的背景，動力與理念來說，陳水扁政權的政治理念是與之完全背道而馳的。陳水扁對這些第三世界部分國家的外交之旅，充其量也只能是收買式的外交，而與第三世界的演變脈絡是搭不上線的。★

台灣與第三世界

—— 阿扁出訪的幾點思考

俞向南

阿扁出訪六國，拉美三國：多明尼加、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西非三國：甘比亞、布吉納法索、查德。這些「友邦國家」的共同特性是：它們都經歷過殖民統治，在當代地緣政治上，都屬於第三世界國家。然而，從8月13日到8月25日，匆匆12天的所謂「環球苦行」、「民主外交」當中，透過陣容龐大的跟班媒體，我們只看到浩浩蕩蕩的送往迎來，看到儀式耗繁的禮尚往來，看到雙方權貴階層的觥籌交錯，衣香鬢影，華燈美酒。龐大台灣媒體首度有機會深入拉丁美洲和非洲大陸，卻只帶給我們走馬燈一般的宮廷光影，讓我們留下豪華極侈的記憶，卻看不到人民的生活，也絲毫看不到第三世界的真實圖像。

粗暴介入的「他者」

受訪國當中的中美洲加勒比海三國，早於19世紀中葉以前就已獲得獨立，卻由於心理環境離上帝太遠，而地理環境又離美國太近，一個半世紀以來，始終在星條旗龐大而無所不在的政經勢力籠罩之下。阿扁過境洛杉磯，經由美國窗口而進入美國的「後院」，山姆大叔掌控了其一舉一動，阿扁的言行難免較為拘謹、凝重。相對而言，長榮總統專機於8月20日抵達非洲，黑色大陸三個受訪友邦都是在1960年代的獨立風潮中才脫離殖民統治，在野味道依然濃厚的新生領袖到了半生不熟的新興國家，「阿扁風格」終於得以展露無遺。

於是，一進入非洲首站甘比亞，迎接台灣訪問團的就是一群「年輕有活力」的黑色女學生，她們手中高舉「阿扁我愛你」的中文標語牌，口中高喊「扁啊，扁啊，選就選給扁啊」的台語口號，活脫脫是台灣扁迷學生「小扁帽軍團」的翻版。突兀的場景，生澀的腔調，一群天真少女的熱情難免變得尷尬而造作。阿扁一方面在異國重享當選總統的榮耀，另一方面也很快發揮其因時制宜「巧言妙喻」的獨特愛好。在參觀班竹町蔬菜園時，阿扁以乾(甘)扁四季豆就是「甘比亞加陳水扁」，比喻兩國情誼，贏得在場記者再一次對其機智小語的紀錄與讚揚。

熟悉阿扁風格的台灣觀眾對於這樣的畫面可能早已司空見慣而習以為常，但是，如此場景發生在有數百年殖民地痛苦經驗的第三世界國家，卻是令人驚憾！這些國家在民族解放之前，與外來統治者之間長期存在著「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外來統治者的膚色、長相、文化、習俗都迥異於在地原住民，他們以武力和經濟力粗暴介入原住民社會，任意榨取資源和勞力。在原住民族眼中，他們傲慢、自以為是，以外

來的文明破壞原生秩序、倫理，是永遠不可能融入的「他者」。

甘比亞少女被安排手舉陌生的標語牌，口中喊著不知所云的口號，正好凸顯出阿扁龐巨的訪問團是粗暴插入的「他者」，再度撕裂了殖民地的傷痕。台灣當然沒有開拓殖民地的能耐，卻如此自大自滿地擺出「上國」的姿態。出國前就刻意標榜是如何不得了的「苦行」，又要宣揚台灣了不得的「民主」經驗；到了當地國，既要擁有施捨者的光環，又要友邦人民陪笑賣乖。台灣訪客做為「他者」，鮮明地喚醒了非洲國家被殖民、被強暴的歷史記憶。

阿扁以「乾（甘）扁四季豆」形容甘比亞和中華民國的邦誼，這種將國際外交私誼化、私有化的作風，也相當能彰顯新政權的特質。台灣數十年在外交戰場上的折衝樽俎，彷彿就為了營造阿扁這光輝榮耀的一刻。台灣數十年的反對運動，其目標彷彿也只是將阿扁推向權力的顛峰。至於反對運動的先行者，如流亡海外的許信良，如落難黑牢的施明德，一旦與阿扁交鋒，就只能遭致被踐踏、被侮辱的命運。

西方強權深入第三世界國家，吸納榨取當地資源而後繁榮自我，並進一步滋養、擴大其征戰的版圖。阿扁進入反對陣營，也在快速吸納資源後成就其個人的政治版圖。然而，就像殖民母國永遠是殖民地的「他者」一樣，阿扁也在取得政權後快速靠向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成為與被壓迫階級對立的「他者」。

被忽略、剝削、輕蔑的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的用語最早出現於1952年，法國人口學家索維（Alfred Sauvy）在一篇文章中以法國大革命前的「第三等級」來比擬世界上那些「被忽略、剝削、輕蔑」的地域。就像舊體制下的第三等級必須團結起來對抗僧侶、貴族一樣，第三世界的人民也必須聯合起來抗拒強權勢力的掠奪和宰制。

1955年，第一屆「不結盟國家會議」於印尼的萬丹（Bandung）舉行，在美、蘇兩大強權對峙的全球冷戰結構之下，「第三世界」首度被賦予了具體的政治意涵。在60年代，「第三世界」已普遍被用來指涉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貧窮、國民教育低落、人口成長快速，而經濟又無法自主的國家。當時，第三世界國家首腦當中，如埃及的納塞（Nasser）、印度的尼赫魯（Nehru）、迦納的恩克儒馬（Nkrumah）、古巴的卡斯楚（Castro）……都是眼界開闊，具有高度領袖魅力的政治人物。而中共在與蘇聯的關係鬧僵之後，也積極介入不結盟國家集團的運作，儼然成為第三世界的龍頭。

政治意義上的「第三世界」，在經濟意義上則一般被稱為「發展中國家」或「南方」（對比於北半球的工業化富國）。到了80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由於境遇和發展的差異，大致上可區隔出四種型態：一、富裕的南方，譬如波斯灣沿岸的產油國；二、起飛的南方，如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墨西哥、阿根廷；三、停滯的南方，巴西和印度

這兩個大國都是；四、衰退的南方，譬如伊索匹亞、索馬利亞、高棉等深陷於內亂和飢荒的國度。

台灣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友邦」多是置處於「停滯」和「衰退」之間的國家，但是台灣與這些國家關係的維繫，向來不是從第三世界的共同處境出發，而是打散彈式的金援和對個別政客的押寶與賄賂。其中有些國家甚至是在兩岸外交戰的隙縫中左右逢源。譬如，阿扁出訪的最後一站查德，其首都規模宏偉的綜合運動場、「自由醫院」、「元月十五日人民宮」（國家議會所在地）都是中共大手筆的工程。1997年8月，查德與中共斷交，與台灣建交，台灣付出的代價是1億2500萬美元的金援，其中不知有多少進入了當權者的口袋。如此龐大的交易數額，來自台灣的財神總統能不風光？

與權貴結交，與人民結怨

長期以來，台灣的金援外交已成為這些國家的亂源之一，台灣以「金援」介入當地國的政爭，不同的政治勢力之間也為了爭取「金援」而彼此開打、相互屠戮。一旦政權鞏固，台灣的金援則成為當權者繼續施行高壓統治的物質基礎。如此外交模式，其結果常常是「與權貴結交，與人民結怨」。

第三世界國家其實面臨許多共同的問題，譬如，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之下，北方工業國與南方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交易」不斷擴大；譬如，北方富國掌握了昂貴的醫藥衛生資源，南方國家因為普遍缺乏購買能力而導致包括愛滋病之內的傳染病迅速蔓延，有些國家甚至因此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機。然而，這些重大而急迫的問題，卻從來不在台灣外交體制的思慮之中，也從來沒有透過對這些問題的表態與探討，與飽受威脅的友邦人民建立休戚與共的情感，卻一味迷信於金援外交的短線操作。於是，在國際外交上，台灣所贏得的不是邦交國人民的友誼，而是野心政客的覬覦。

今年10月，中共將在非洲舉辦「中非合作論壇」。中共是當年不結盟國家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其外交運作基本上仍不脫團結第三世界的思維脈絡。阿扁在返國記者會上刻意將「中非合作論壇」解讀為中共挖台灣外交牆角的陰謀，完全忽略中共意圖透過國際會議將非洲第三世界國家「集團化」、「組織化」的傾向。阿扁以非洲「友邦」答應不出席「中非合作論壇」而沾沾自喜，卻忽略了友邦在非洲大陸第三世界所可能面臨的「同儕壓力」，以及因此而被孤立的危機。台灣當權者從其狹淺的世界觀出發，永遠只能看到一對一的關係，或者將國際外交化約為雙方權貴之間的私誼。然而，當今世局的發展，集團化的傾向越來越為鮮明，台灣若是只會盯緊個別棋子，只會斤斤計較於「邦交國」的數目，卻無視於世界歷史的軌跡，無視於地緣政治學上的發展趨勢和全盤謀略，那麼，哪天驀然回首，可能就是外交戰場上的全盤皆墨……

左派反對WTO的意義何在？

——從拉丁美洲反帝經驗談起

金寶瑜

自從去年年底在西雅圖的反WTO的集會後，在台灣和美國都陸續有關這方面的討論。今年美國的《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出了七、八月合併的專刊，也以「西雅圖之後——新的國際主義？」(After Seattle: A New Internationalism?)為題。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即將加入WTO之際，《左翼》再對這個議題進一步討論是有意義的。在這篇短文裡，我希望能將這個議題放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這半世紀中，拉丁美洲反帝經驗的歷史來看，再整理出左派當今反對WTO的意義。

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發展方向的問題

要談左派當今反對WTO的意義，還要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要走什麼路的問題談起。從戰爭結束到七〇年代末的三十多年中，無論是剛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還是在十九世紀就已經獨立的國家，如何能在政治上獨立後，取得經濟上獨立和發展，不再依靠前殖民國家，是那幾十年里最重要的問題。對這些國家中的左派來說，更是一個急迫的問題。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些落後國家（中國、越南、朝鮮、古巴等國）已經繼蘇聯之後，選擇了社會主義的革命的道路。這些革命成功的國家雖然在所有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中是少數（在人數上則佔了三分之一），但是他們革命成功，對所有落後國家內的左派都有很大的震撼和影響。

馬克斯主義者對依賴理論的批判

最近讀了幾篇討論和批判發展理論中的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ies)的文章，在這一類的文章中，馬克斯主義者對依賴理論學派提出很多的批判（這裡有必要說明，依賴理論學派也自認為馬克斯主義者）。這些文章中的討論和批判就是圍繞著拉丁美洲的發展方向問題。因為有關這一學派的討論和批判不是抽象的，而是跟拉丁美洲的實際鬥爭有密切的關連，所以可以從拉美左派在思想上的鬥爭中，看出他們所提出的不同的發展方向。其中有幾點，對我們目前要討論的問題有關連，下面提出來作進一步的討論。在這裡對依賴理論的批判提出討論不是要將問題扯遠了，而是要聯繫著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如何獨立發展經濟來討論。

在討論之前，先要說明依賴理論中又分了好多支派，所以並沒有一個可以代表所

有支派的完整理論。但是依賴發展理論中，還是有它們之間的一些共同特性。另外一個說明是下面的分析不是完整的，有關於這派理論是發展了和補充了馬克斯和列寧對資本主義的分析，還是違反了馬列的分析，這裡不作詳細的討論。

依賴發展理論主要是要研究落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問題，換個角度來說，它是要找出落後國家經濟不發展的原因。這個學派的重要代表有：巴蘭(Paul Baran)、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阿敏(Amin Samir)和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等人。這學派的代表人彼此之間有他們的差異，但他們共同認為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與發展落後國家之間存在著一種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發展(development)與落後國家的不發展(Under-development)乃是一體的兩面，都是資本主義在世界上發展的結果。依賴發展理論從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與未發展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交換來解釋前者對後者的剝削。從交換中，發達國家從落後國家吸取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從落後國家轉到先進國家促進他們的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失去剩餘價值而不能發展。

對依賴發展理論的批評也有不同的著重點，但是一個共同的批評是，依賴發展理論只在流通領域談剩餘價值的分配，從對剩餘價值的分配(轉移)來談國與國之間的剝削關係，但是剩餘價值的產生和分配應該是階級之間的關係。依賴發展理論不講剩餘價值在生產領域中如何產生，只講剩餘價值在交換領域中如何分配，因此這樣的分析是違反馬克斯主義的。我認為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列寧延續馬克斯的理論來提出對帝國主義批判，列寧認為到了十九世紀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從競爭階段到了壟斷階段，壟斷資本改變了它在世界範圍內資本積累的方式，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從以商品為主要的輸出轉變為以資本為主要輸出。列寧再從這樣的轉變來分析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國家之間的關係和它們與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所以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不是從交換關係中來看資本主義發展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之間的關係，列寧是從資本積累來分析在競爭階段和在壟斷階段之間的差異。從這一點看來，我認為我們認識帝國主義不能只從大國對小國或強國對弱國的剝削和壓迫來了解。否則，我們就不能分析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有什麼不同。因為殖民國家掠奪殖民地的資源和奴役殖民地人民不僅是剝削和壓迫，也是將殖民地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拿走，掠奪可以看成是一種無償的交換。

對依賴理論這一點批評，在實際應用上很重要。因為如果落後國家不發展的原因是這些國家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交換關係上被剝削了，那麼解決的辦法就應該集中在改變它們與列強的交換關係上，而不必去分析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內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換句話說，按照這樣的分析所得的結論會是，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如果可以排除資本主義列強的干預和影響，就能順利的發展獨立的資本主義。不管這些依賴理論學派理論家的原意是什麼，這樣的分析所得的結論就適合了資本主義發展

落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內資產階級的意願，成了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實行進口替代發展政策的理論基礎。因為如果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依賴是不發展的原因，那麼取消依賴就應該可以順利發展。

多爾和爲克斯(Dore and Weeks)對依賴發展理論提出嚴厲的批評，他們也對祕魯的社會作分析。他們把祕魯的資產階級中不同成份作區別。他們說到了七十年代後半，祕魯以資本主義爲主要生產模式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在這幾十年中，資產階級內的不同派系都想根據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來掌握國家的政權。多爾和爲克斯說可以依照唯物主義者的分析來對資產階級的內部作區分，這個區分是要根據他們在生產中的物質基礎和他們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資產階級中的買辦資產階級是國內的大商業資本家，他們是作爲外國資本和本地市場間的中間媒介。資產階級的這一個階層的活動是屬於流通領域，因爲他們不在生產領域內，所以他們和外資之間沒有矛盾，事實上他們就是因爲有外資才存在的。而祕魯資產階級中的民族資產階級則是在本國境內從事生產活動，這些資本家包括大型的壟斷資本也包括小型比較弱的資本。他們有的在製造業和礦業，也有在魚產加工、金屬加工和製糖等業。

多爾和爲克斯認爲民族資產階級跟外資之間在市場競爭上有利益上的矛盾，因此他們可能有反帝的進步性。但是因爲他們在很多方面有無法獨立於國際資本，所以他們反帝的一面常常是軟弱的和動搖的，因此左派反帝的鬥爭不能由它們來領導。在另一篇對祕魯社會的分析中，唯拉努雅(Villanueva)分析了二十世紀拉丁美洲政治運動中一個很重要的政黨，它叫美洲民眾革命聯合黨(Alliance Popular Revolucionaria Americana, APRA)。他從這個政黨的資產階級的階級性來分析它在反帝上的動搖性，以及這個政黨如何利用“反帝”的幌子來加強對工人階級和農民加強控制，以便削減工農的力量。這三個作者都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反帝不可能徹底，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不是要解決階級之間的剝削。我是同意這樣的分析的，也就是說，在二次世界大戰後，拉丁美洲的反帝運動是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在反帝運動中，工人階級和農民不可能得到解放。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丁美洲國家中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很強的意願想要獨立發展資本主義。1948年，在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下所設的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Economic Commission on Latin America, ECLA)就是由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推動的，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發展拉丁美洲國家和這個區域的資本主義。但是到了八〇年代中期後，拉丁美洲完全放棄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意願。原因在哪裡？這一點下面要談到。

拉丁美洲國家內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競爭

左派應該如何看待落後國家內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矛盾和他們之間的

競爭？我們還是可借二次世界大戰後到七〇年代末，拉丁美洲的經驗來瞭解這個問題。在戰爭結束之後，國際壟斷資本擁有龐大的資本和最先進的技術，在這兩方面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是不能和他們競爭的。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要想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在他們與外資的競爭中，他們可能掌握的就是用政治的力量來對外資加以限制，以便保護本國內它們資本積累的範圍。因此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用國家的名義來管制外匯和跨國資本的流通，它們也在一定限度內保護本國的市場。但是，到了七〇年代底，我們看到這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利用國家的力量，對國際壟斷資本所能做到的抵制是完全失敗了。左派應該如何分析這段歷史？

發展落後的拉丁美洲國家內的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競爭可以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戰後這半世紀中壟斷資本的力量不斷的增強，另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發展落後的拉丁美洲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力量的軟弱。下面將這兩方面加以說明：

第一方面：在列寧寫帝國主義這篇重要著作時，他已經分析了從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如何從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並說明生產資本如何在工業發展中，因生產技術的進步而擴大生產的規模，大規模的生產使資本進一步集中。列寧也說明金融資本如何在這發展中與生產資本結合而形成壟斷。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壟斷資本再繼續經過各種形式的兼併，使得每一個產業只由少數幾個寡頭企業控制。這幾個少數寡頭企業不但掌握了龐大的資本和最先進的技術，還佔據了大部分的市場。而且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經過再進一步結合而更龐大。不但如此，近二十年來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內的壟斷資本更加速了它們國與國之間的聯合和兼併。

更有甚之，自從七〇年代以來，國際壟斷資本除了它們在資本和技術上有利條件之外，更通過它們國家的力量來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來擴充它們的發展範圍。像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和從關稅貿易總協(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到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等組織。這些國際金融貿易組織都是由資本主義列強用國家力量大力支持的，這些組織的最終目的是要達成壟斷資本能在全世界範圍內不受國界的約束進行資本積累。

第二方面：在落後國家內資本主義不發達和資產階級弱小乃是同樣一件事。所以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要與國際壟斷資本對抗只有借用國家的力量。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拉丁美洲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選擇了資本主義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在這發展策略下，本地資產階級將許多外資企業收歸國有，並用國家資本成立了大型的國有企業，用國有企業來扶植私有資本。國有的能源、電信、交通等企業通常都是以低價供給其他私有企業，虧損部份由國家來補貼，私人資本則因享有低價的能源和交通運輸有助於它們資本積累。拉丁美洲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在對抗國際壟斷資本時，也用關稅來限制進口來保護本國的市場。另外，它們也對外資在國內的發展加以限制，

包括對外資在一個企業中股份比例的限制，和外資利潤匯出的限制。

拉丁美洲國家的資產階級對國際壟斷資本從依賴到投降

拉丁美洲國家的資產階級即使藉助於國家的力量，它們還是沒有辦法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從戰後這一段歷史來看，他們與國際壟斷資本比較是太弱小無力了，因此造成它們對後者的依賴。其中包括：

- ◎拉丁美洲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在資本上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依賴
- ◎拉丁美洲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在技術上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依賴
- ◎拉丁美洲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在市場上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依賴

就是因為拉丁美洲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對國際壟斷資本在各方面的依賴，國際壟斷資本就必然對它們施加壓力，使它們不得不逐漸取消對本國市場的保護和對外資的限制。事實上，對外資的依賴和取消對外資的限制是互為因果的。更重要的是從經濟上的依賴必然會發展到政治上的依賴，以致於軍事上的依賴。

在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時，拉丁美洲國家要用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但是它們缺少資本，因此就向國際壟斷資本所控制的銀行借款。這些銀行用低利率將款子貸出去，但是它們持有隨時將利率提高的權力。八〇年代初，美國因通貨膨脹嚴重而縮緊銀根，造成利率大幅度提高。到 1982 年夏就開始了第三世界國家（大部份是拉丁美洲國家）的外債危機。在此後十年中，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用逼債作為手段，迫使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放棄一切對本國資本的保護核對外資的限制。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必須得讓出本國的市場，這就包括了取消對進口的限制和對關稅的減免，同時也一定要取消對外資的限制，包括對外資在一個企業中股份比例的限制，和對外資利潤匯出的限制。爲了要削減落後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力量，國際壟斷資本藉助國際貨幣基金等組織迫使國內資產階級同意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再將私有化後的企業由外資收買。

國際貨幣基金在整個過程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它用“拯救”第三世界負債國家來貸款給它們，使得負債國可以用借來的錢還給跨國銀行，免去了跨國銀行的損失。但是，向國際貨幣基金借款的國家必須接受「結構性調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SAP)。這個措施包括對負債國的國內經濟政策各方面加以干涉，「結構性調整措施」的內容一般包括下面幾項：

- ◎將負債國的貨幣貶值以便增加出口，減少進口，以便賺取外匯還債
- ◎降低政府開支，特別是社會福利開支，像食物、公共交通和水電的補貼、公共健保、公立學校等項開支，以便抑制物價上升
- ◎提高國營企業的價格來獲取盈餘

- ◎壓低工資，縮緊銀根，提高利率，控制通貨膨脹，以便吸引外資
- ◎開放外國投資（允許外資擁有100%的股份），並取消一切對外資的管制
- ◎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以便供外資收買，包括外資可以用債券換股權
- ◎取消外匯管制和進口管制，使商品和資本可以自由進出

從這些條款都是針對本國資產階級的，它們的目的在解除國內資產階級制定經濟和政治政策的主權，也因此使國內資產階級不能利用國家的力量來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在解決拉丁美洲國家外債危機中，美國當時的聯邦儲備銀行的主席吳克(Paul A. Volcker)出了很大的力，吳克認為在這次危機中取得很大的勝利。在他1993年出版的書中他這樣說：「這些國家的治國哲學，它們的經濟政策，甚至它們的政治體系都經歷了徹底的改變，而從過去幾十年來腐朽和無效方式中轉變過來，它們不再用高的壁壘來保護它們的壟斷企業和國有企業，和抵制外資企業……在一定程度上，所有這些政策都被拋棄了。它們大幅度降低了甚至免除了關稅和其他進口限制，它們將以前神聖不可侵犯的國有企業私有化了，其中包括航空公司、電話公司、甚至銀行。……現在外國投資者和公司與當地資本合作變得容易多了，外資甚至可以參加屬於敏感的石油探採和石化工業。」(Volcker and Gyohten, 187-188)

在這個過程中，拉丁美洲的資產階級認識到它們無法用國家主權來保護自己，它們也在這個過程中，認識到它們這個階級的利益最終必然是與國際壟斷資本結合在一起，因此它們向國際壟斷資本投降了。雖然這並不表示它們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沒有任何矛盾，但是矛盾是次要的，因此，到了本世紀末的今天我們可以說它們已經沒有任何反帝進步性的可能。

落後國家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從拉丁美洲資產階級要獨立發展資本主義，到這個階級向國際壟斷資本全面投降的過程中可以學到什麼？是不是工農勞動人民可以說反正這是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鬥爭，國內資產階級被打敗了投降了，和他們沒有什麼關係？我認為絕對不能。因為在資產階級被打敗後，國際壟斷資本藉著國際金融貿易機構一步步緊跟著用自由化和取消管制，以及私有化來對工農勞動人民進一步加強剝削。因此，左派對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的反對不是要站在本地資產階級立場，為它們受了國際壟斷資本的欺服而叫不平，恰好相反，左派正是要揭露這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它們對國際壟斷資本在經濟上的依賴。正是因為它們靠攏了國際壟斷資本，因此由這個階級主掌的國家不可能保護本國的勞動人民。

以上對拉丁美洲的分析是過於簡單化了，拉丁美洲有許多國家，每一個國家有它自己的歷史，每一個國家都有它的特殊性，因此這樣的分析是完全不足的，有待對它們每一個國家這一段歷史作進一步分析。但是這些國家也有它們的一般性，它們在戰後這半世紀中都由本國資產階級領導進行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策略，這發展策略也在每一個國家全面徹底失敗。這些國家的另一個一般性是它們在西班牙和英國勢力

從拉丁美洲撤退後，美國的勢力入侵，美國勢力擴張到拉丁美洲每一個國家。

八〇年代末拉丁美洲內的的資產階級全面向國際壟斷資本投降後，這些國家工人階級和農民經歷了更深的苦難，下面用智利和墨西哥被迫開放後的情況作為例子供我們參考。

門戶開放後的拉丁美洲－智利和墨西哥兩個例子

下面用智利和墨西哥兩個例子來說明在國際壟斷資本在打開智利和墨西哥國界後，如何擴張了它們的資本積累範圍，而將這兩個國家整合到世界資本主義的範圍之內，和對這兩個國家之內勞動人民的影響。這裡的分析也是過於簡單的用一些表面的資料加以說明，事實上在這一段壓迫加深的過程中被壓迫人民一直都在反抗的。

智利

因為政治上的原因，在拉丁美洲中，智利是最早被迫開放的國家。智利有豐富自然資源，它是世界主要產銅國家之一，智利有廣大的森林和肥沃農田，還有兩千哩長海岸。智利的左派有長遠的鬥爭歷史。1972年智利的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以社會主義為號召而當選為總統，1973年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就將他謀殺後，由美國一手安插了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 Ugarte) 這個大獨裁者組軍事政府。皮諾契特是個地道的美國傀儡，他當政後，大筆美國的軍援和經援相繼來。皮諾契特一上台，除了馬上用軍事獨裁改變了智利比較長的民主傳統外，也完全改變智利的經濟政策。他在1974到1978年間，他先把阿葉德當選後收歸國有的兩百五十個企業發還給原有的和其他的私人企業主，這些企業中包括很多家銀行。皮諾契特將這些企業以至少低於他們價值的百分之三十出賣給這些資本家。這一批私有化的企業中有許多家在1982-8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蕭條時破產，有的又被國家收買回來。在八〇年代中，智利又開始將另一批國有企業私有化。在這一回合的私有化中，根據一個估計，智利政府所出售的十二個最大企業的價格低於這些企業價值的百分之三十六到百分之五十。皮諾契特也將智利的經濟自由化，放棄了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他取消對本國市場的保護，並將貨幣貶值，同時取消政府補貼和價格管制，在他的政策下，智利完全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沒有多久，許多民生工業因為與進口商品競爭不過而倒閉，大批工人失業。(Coote, 140-145)

皮諾契特的軍事獨裁政府對智利的進步力量作最殘酷的鎮壓，軍事政府鎮壓所有工會活動。(最近智利的最高法院公佈皮諾契特不再受法律的保護，因此有可能他將為他的暴行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皮諾契特當權之前，智利是拉丁美洲所得分配最平均國家，在皮諾契特當權之後財富開始集中，貧富距離越來越大，智利的貧富懸殊僅次於巴西。在這一段日子裡，工人工資下降，使得平均工資在1989年比1970年還

低百分之八。在同一時期內，貧窮人口佔全人口比例從百分之二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最富有人口的消費佔總消費比例從 1969 年百分之四十五增加到 1989 年百分之六十。在皮諾契特當權日子裡，平均社會福利支出削減五分之一。(Green, 57)

在智利的出口導向的新經濟政策下，政府極力推進海產、水果、和木材的出口。智利西臨海岸有豐富的海產，長年來一般人都靠從魚蝦攝取蛋白質。到了經濟發展政策改變後，海產的出口從 1973 年的兩千兩百萬美元增加到 1989 年的九億美元，增加了四十倍。因為海產的百分之九十七都出口，所以從 1973 到 1986 年之間，智利每人每年平均魚類海產消費量從 6.3 公斤下降到 4.4 公斤。在同一時期內，每人平均蛋白質消耗量減少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五。卡羅里熱能的消耗量每人平減少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二。(根據 Oxfam 在智利的研究，見 Coote, 144) 不但如此，因為水果大量的輸出，使得在水果園工作的工人因為大量使用殺蟲劑而受到很大的傷害。在智利南部的一家區域醫院里，1993 年出生的嬰兒中有九十個有中樞神經系統發育不全疾病，而這九十個嬰兒的母親每一個都是水果園的臨時工，在這個水果產區內，這種因母親懷孕時期受到殺蟲劑傷害而引起的嬰兒疾病是全國平均的三倍。(Green, 60)

墨西哥

墨西哥在八〇年代外債危機開始後被迫自由化和私有化改革的。到八〇年代底加速華盛頓的寵兒卡羅塞林內斯(Carlos Salinas) 受教於哈佛大學，完全接受了新古典學派市場至上的理論，打算回去將墨西哥的經濟大幅改革。他在美國的支持和幫助下，在 1988 年當選墨西哥總統。當選後，卡羅塞林內斯一面將墨西哥經濟大幅全面改革，他的改革包括將墨西哥企業全面開放給外資、削減關稅、取消金融管制、並將國營企業拍賣。到了 1992 年，墨西哥進行大規模國有企業私有化的結果，國有企業在十年內內，從一千兩百家降到兩百六十家。私有化的企業包括航空公司、旅館、海港、礦產公司、鋼鐵公司、農業企業、飛機場、公路、橋樑、商業銀行、保險公司、電話電信企業、收音機和電視廣播、和肥料、咖啡、煙草專賣等(Leon, 167-68)。到了九十年代初，危機才剛比較平息下來，1993 年底墨西趕在哥卡羅塞林內斯任內與美國和加拿大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這協定從 1994 年開始生效，這一年墨西哥在政治和經濟上都經歷近年來最大的危機。1994 年大年初一，Zapatista 的農民因為經濟改革後生活越來越困難，發起武裝起義。到了 1994 年底墨西哥又經歷了五十年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墨西哥的貨幣貶值，為了搶救墨西哥披索，它又借了四千億美元的外債，並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的制裁，作為獲得貸款的條件。國際貨幣基金要墨西哥削減政府開支、降低工資、取消補貼和提高利率。只在一年之內，墨西哥的個人平均國民所得從四千美元降

至兩千六百美元。同時，中產階級的儲蓄也因通貨膨脹一掃而空。(Orme, x-xi)。

根據一篇華爾街報的報導，從表面上來，墨西哥進兩年來經濟上似乎有些起色。1998年它的經濟成長率達百分之四點八。同一年，製造業就業人數增加了十萬人，墨西哥與美國之間的貿易從1993年的七百七十億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一千五百九十億美元，增加了一倍。但對大多數墨西哥的人來說這些統計數字是沒有意義的。這篇報導中說自墨西哥披索貶值後，披索的購買力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九，比起十年前來，大多數的人的生活水平都下降。根據聯合國的一個新資料，生活在貧窮線下的工人(每日三元美元)在危機前佔不到人口的一半，增加到今天人口的三分之二。這篇報導中還說一個美洲發展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的一個經濟學家(Miguel Szekely)說，即使墨西哥今後的經濟每年能增長百分之五，也要到五年後才能將貧窮人口下降到1984年的程度。(Wall Street Journal, 1999.3.8, A-1)

雖然我們還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但是我們不難從智利和墨西哥兩個例子看出，國際壟斷資本在八十年代初後進入拉丁美洲後，使得這兩個國家勞動人民的日子從壞變得更壞。這裡特別要提出有關私有化的問題，當初拉丁美洲國家實施進口替代政策時將企業國有化雖然是為了幫助私人資本積累，並不是要實行社會主義，但是一般國有企業都經過立法過程，因此在規章制度上都有比較嚴格的規定。國有企業本身不以謀取最大利潤為目的，它的僱員是給國家工作的，因此在工資和福利像工作權、健康保險和退休等都有一定的保障。當國有企業私有化後，它和其他謀利的私人企業沒有差別，它的僱員也就失去原有的保障。這一點在台灣一波波私有化的過程中，我們是看得很清楚的。

國際壟斷資本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的協助下，基本上完成打破拉丁美洲國家對它們的限制而取得勝利後，就將目標轉向亞洲。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是在1989年成立的，APEC以推進亞太經濟自由化私有化為目標。1994年關稅貿易總協(GATT)也趕忙結束了它第八回合的談判成立了WTO，WTO在1995年初生效。WTO將GATT(工業)商品貿易的自由化範圍推廣到農業和勞務貿易的自由化之外，更擴充到對外國投資和智慧財產權保護等範圍。

左派反對 WTO 的意義何在？

到了今天，我們可以說拉丁美洲國家的資產階級想要發展獨立資本主義，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而徹底失敗。左派可以從這一段歷史學到什麼？左派在今天反對WTO(IMF和APEC等國際貿易金融組織)的意義何在？

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想要發展獨立資本主義的這一段歷史，我們應該可以看清楚拉美國家因為國內資產階級的軟弱，因此它們必須藉助於國家的力量來保護它們資本積累的範圍。我們也應該可以看清楚國際壟斷資本要擴充

它們的資本積累範圍，就必須打破拉美國家對它們所設的限制。從這一段歷史中，我們也應該看清楚拉美國內資產階級如何從它們對國際壟斷資本的依賴到投降。國際壟斷資本在這個擴充資本積累範圍的過程中，除了靠它們龐大的資本和先進的技術外，還仰仗著它們國家的力量來打破拉美國家對它們所設的限制。因此，由資本主義大國所控制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就成了協助國際壟斷資本擴張資本積累的工具。

如果我們對 WTO (IMF 和 APEC 等國際貿易金融組織) 的實質能有上面這樣共同的認識，我們應該可以找到反對策略上的共同點。在當今反對 WTO 和 IMF 的運動中，各個不同團體在策略上出現相當大的差異，從不同的反對策略中可以看出反對組織和反對者不同的立場。在西雅圖反 WTO 的集會中，公眾公民(Public Citizen) 出了很大的力^(註一)。在西雅圖集會之後，公眾公民又召集了許多團體的代表開會，在代表會的討論中，提出了改革或廢除(fix it or nix it) WTO 議題的討論。也就是說來開會的代表中(包括公眾公民的代表)有很多是主張要改革這些國際金融貿易組織，他們主張改革的原因主要是認為這些組織當前都是由跨國公司所控制的，沒有民間代表，因此沒有民主可言。這就不難想像改革的內容就是這些國際組織應該允許民間組織參加。另外有的代表則贊成將 WTO 廢除，但卻沒有能提出如何廢除。

在西雅圖之後，美國的總工會組織(AFL-CIO)也開始討論它們往後的策略。美國總工會不久就提出反對中國加入WTO，並且在美國國會討論中國加入時，在華盛頓示威遊行。但是美國總工會反對中國參加不是站在中國工人的立場，而是站在美國跨國公司的立場，認為中國的低工資的產品進口會佔據美國的國內市場。而且，一些美國工會頭子還擺出五〇年代過了時的反共的姿態來反對中國進入WTO，這樣的立場和美國保守派頭子布侃南(Pat Buchanan) 站在國家主義的保護主義沒有什麼區別。

我們也看到在1997年開始的這次危機中，南韓群眾的一些反應。南韓的經濟在危機中受到非常大的衝擊，1998年秋天時，每個月有三十萬工人被解雇(McNally, 1)。南韓的資本家也受到國際壟斷資本重大的打擊，許多南韓的企業被國際資本收買，南韓政府利用一般人的愛國心發起募捐運動，有不少工人居然也響應這個募捐運動。這樣的發展使我們看到即使像工運高度發展的南韓，有些工人也還會受到資產階級的蒙蔽，使他們不去責怪資產階級政權把人民帶入今天困境，反而被資產階級利用，而站在它們的立場來打抱不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討論是贊成參加或是反對參加WTO時，贊成參加的人會提出我們可以利用藍色條款或綠色條款來保護我們的勞工和環境。我想這樣的論點是出於對國際金融貿易組織的實質的誤解。這些由國際壟斷資本支持和由資本主義大國控制的金融貿易機構不是要制定一些保護地球生存空間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的規則，正好相反，這些金融貿易組織就是要取消所有不利於資本積累的障礙，包括因為對人和對環境的保護而造成的障礙。與這個問題相關連的就是我們必須要決定，我們對

WTO (IMF和APEC等國際貿易金融組織)是要徹底反對，還是要對它們寄予某種期望，我們不可能一邊反對同時又寄予期望。

舉個例子來說明，譬如，當IMF貸款給南韓時，南韓必須接受IMF的「結構性調整措施」(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SAP)在SAP中有一條規定是南韓政府必須要將南韓的勞動市場彈性化。勞動市場彈性化的意義包括加強企業對工人的解雇權，和反對工會對工人的保護，也可能包括削減工資和福利。從左派立場我們能接受和贊同IMF對南韓內政這樣的干涉嗎？如果我們認為不能，是什麼原因？基本原因是我們反對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對一個國家內政的干涉。這樣的反對是要在反對過程中揭露資產階級政權的軟弱，揭露它們不能抗拒外來的壓力。果真如此，我們又怎能轉過來藉助WTO的壓力來迫使本國政府屈服？對政府提出勞工和環境保護的要求是公民基本的權力，是左派短期政治運動的內容。我們提出這樣的要求應該是理直氣壯的，左派難道一定要看到WTO裡的兩條條款才有信心？才能承認自己要求的合法性？

我們不能誤認WTO是一個中性的國際仲裁機構，WTO和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一樣都是由資本主義大國控制的。在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成立之初，它們是隸屬於聯合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 United Nations)之下的。經濟社會理事會是協調國家之間的經濟社會事宜，它與安全理事會平行，安全理事會則是協調國與國之間的政治與軍事事宜。但是在聯合國不論國家大小，每一個國家都可以投一票的制度下，資本主義大國無法在聯合國這個組織內取得控制權。所以在過去幾十年中，資本主義大國就將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在政策制定和實際運行上從聯合國脫離出來。到今天不但聯合國無權過問任何有關這兩個機構的政策和決定，在這兩個機構每年開年會時，聯合國的總秘書長都不准致詞。目前G-7國家在IMF和WB的股份中佔一半以上，這七個國家也就掌握了一半以上的投票權(David, 15)。WTO雖然沒有股權的問題，但是它在對付發展落後國家時，是與國際金融組織結合在一起的。WTO藉著落後國家對IMF和WB資本上的依賴和落後國家必須要履行的SAP來迫使這些國家對貿易和對外資的開放。

到底左派反對WTO的意義何在？左派反對WTO不是站在本地資產階級的立場為它們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的鬥爭叫不平，恰好相反，左派反對WTO是要站在工人階級立場在與資產階級鬥爭中揭露它們的軟弱，揭露資產階級對國際壟斷資本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依賴，以及本國資產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站在同一個立場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只有在認清國際壟斷資本的實質和它們與本國統治階級的關係，左派在政治鬥爭中才能對當前統治階級在保護本國的勞動人民的利益上，在保護一個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人民賴以生存的生活環境上來提出徹底的挑戰。

以上是我對左派反對WTO意義的看法，希望能在這個問題上在台灣展開進一步的討論。



註一：公眾公民(Public Citizen) 是消費者運動者若夫內德 (Ralph Nader) 的一個組織，若夫內德在這次美國大選中以綠黨候選人名義參加競選。

參考資料

- Amin, Samir,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6
- Baran, Pau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 Coote, Belinda with Caroline LeQuesne, The Trade Trap, new edition, An Oxfam Publication, UK and Ireland, 1992 and 1996
- David, Wilfred L., The IMF Policy Paradigm: The Macroeconomics of Stabilization,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raeger. 1985
- Dore, Elizabeth and John Weeks, Class Alliances and Class Struggle in Peru: Bourgeois Revolution and Class Struggl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Issue 14, Vol. IV, No. 3, Summer 1977, pp. 2 - 17.
- Frank, Andre G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1966
-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 Green, Duncan, Flexibility and Repression: The Chilean Model Explained, in Fred Rosen and Deidre McFadyen edited Free Trade 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Latin America, Monthly Review, 1995
- Leon, Robert Salinas, Mexico, Markets and Multilateral Aid in Perpetuating Poverty, The World Bank, the IMF, and the Developing World, edited by Doug Bandow and Ian Vasquez, GATO Institute, Washington, D. C. 1994
- McNally, David, The Liberalization on Trial: Crisis and Class Struggle in East Asia, Monthly Review, September 1998, pp.1-14
- Orme, William A. Jr., Understanding NAFT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 Volcker, Paul A. and Toyoo Gyohten, Changing Fortunes, The World of Money and the Threat to American Leadership, Times Books, 1993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上)

李崇仁

台灣的左翼力量多年來之所以處於渙散狀態，無法凝聚，原因固有多端，但關鍵之一就在於對客觀形勢的認知不同，對台灣的統獨走向爭議尤大。實際上，「台灣往何處去？」的問題若不得解，「台灣左翼往何處去？」的問題，也就沒有著落。若說統獨問題是當前台灣社會無可迴避的主要矛盾，當不為過。自《左翼》創刊以來，圍繞著統獨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爭論，是理有固然的。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一、階級與民族的關係；二、對中共的評價與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性質。本文將探討這兩大問題，供各方左翼的朋友參考，期望對釐清一些糾纏的觀念有所助益。

階級與民族是絕對對立的嗎？

在左翼的陣營中，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階級與民族是兩個絕對互斥的對立概念，似乎無產階級只能有超越民族、國家的國際主義，而主張建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則純屬資產階級的觀點，為左翼所不當取。這個論點的主要根據是《共產黨宣言》中的：「工人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許多批判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論述。這樣的觀點是不是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呢？抽象地或形而上地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然而，從辯證的、具體的、歷史的觀點來看，卻又不然。

且看以下這段話：「全德國宣布為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這段話語出《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於1848年2月發表《共產黨宣言》後，同年3月底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所寫的德國革命的政治綱領第一條（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3，以下簡稱《全集》），綱領之首就印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恩格斯在1882年2月7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說：「一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民族獨立，歷史地，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範圍內才有可能，……民族獨立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427-428，以下簡稱《選集》）再看一段1893年6月27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的話：「德文『Reich』一詞則側重在體現著**民族統一**（按：黑體字為原文所有）的中央政權這一概念；而這種統一**是**德國社會主義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條件，他們將誓死為之戰鬥。我們決不

(按：黑體字爲原文所有)想把德國推回到1866年以前那種四分五裂和軟弱無力的狀態。」(《全集》，第39卷：88)。

這樣看來，在馬克思主義中，階級與民族並不是簡單地截然二分與對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建立獨立而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要求也不必然是衝突的。怎麼解釋這種看似矛盾的立場？

在進一步闡釋之前，先引述恩格斯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的一段論述：

「從中世紀末期以來，歷史就在促使歐洲形成爲各個大的民族國家。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是歐洲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正常的政治組織，同時也是建立各民族協調的國際合作的必要先決條件，沒有這種合作，無產階級的統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國際和平，首先就必須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個民族都必須獲得獨立，在自己的家裡當家做主。這樣，隨著商業、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從而隨著資產階級社會勢力的增長，民族意識也就到處發揚，被分割、被壓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統一和獨立。」(《全集》，第21卷：463-464)

恩格斯的這段話，很扼要地概括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民族國家與國際主義的關係的看法。

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在封建制度下分崩離析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力圖統一成一個完整的大國，英、法、俄、奧等大帝國時而相互勾結，時而兵戎相見，不斷重劃歐洲疆界，上演瓜分、併吞弱勢國家的醜劇，而遭受欺凌、壓榨的弱小民族則爲爭取民族獨立奮鬥不懈。整個歐洲陷於複雜的民族糾紛中，民族主義也成了歐洲的主要意識形態。面對這樣的形勢，鼓吹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當然必須妥加處理階級與民族的問題，以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民族問題的看法主要可歸納爲以下三點：

一、根據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認爲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資本主義社會相對於封建社會是進步的，也是社會主義得以滋長成形的母胎。因此，從促進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說，擺脫地方割劇，廢除封建特權，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而強大的民族國家，有利於形成一個具有統一的貨幣、法律、度量衡、關稅、交通運輸的大市場，從而促進工商業、貿易的發展，壯大資產階級，加速資本主義的成熟。而與資產階級構成對立統一體的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隨資產階級的茁壯而茁壯，社會矛盾也日益加劇，這才爲社會革命準備了客觀的物質條件。換句話說，大的民族國家符合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集中的歷史趨勢，因而在一定的階段與範圍內，有

其進步意義。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爲什麼馬克思與恩格斯會在1850年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說：「民主派革命活動只有在集中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目前在德國，實行最嚴格的中央集權制是真正革命黨的任務。」（《選集》，第一卷：390），以及爲什麼馬克思在1871年爲巴黎公社的革命而寫的〈法蘭西內戰〉一文中要特別澄清說：「公社制度被誤認爲是企圖用孟德斯鳩和吉倫特派所夢想的那種許多小邦的聯盟，去代替在各個巨大民族那裡雖然最初是用政治強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經成爲社會生產強大因素的統一。」（《選集》，第二卷：376-377）

正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馬克思與恩格斯贊同具有明確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生命力因而掌握了歷史主動權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波蘭、匈牙利等建立強大的民族國家，卻不主張民族不分大小、不論歷史、地理、政治和工業等客觀條件卻可追求獨立。故而，反對法國皇帝路易·拿破崙所支持的每個民族(nationality)都應當是自己命運的主宰的「民族原則」。恩格斯指責所謂「民族原則」不顧歐洲各國皆由核心民族與少數民族組成多民族國家的事實，不考慮小民族在歐洲的重要性與在國際上生存的生命力，是荒謬絕頂的；究其實際，這個口號不過是法、俄爲了併吞波蘭等國領土而泡製出來的騙人把戲（見恩格斯：〈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麼關係？〉，《全集》，第十六卷：170-183）。

民族獨立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

二、只要有民族壓迫存在，則被壓迫民族的社會革命即難以進行，因爲工人階級必須先在本國內組成一個階級，以本國爲鬥爭的戰場。馬克思在1875年1月23日的波蘭起義十二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歐洲的工人政黨同波蘭的解放是休戚相關的，國際工人協會的第一個綱領就說恢復波蘭是工人政策的目的之一。恩格斯在同日發表的演說〈支持波蘭〉中，進一步闡釋工人政黨同情波蘭的命運的原因時說：「首先，當然是由於對一個被奴役民族的同情，這個民族對奴役他們的人進行了不斷的英勇鬥爭，從而證明了它具有民族獨立和民族自決的歷史權利。國際的工人政黨力求實現波蘭民族的恢復，這根本沒有絲毫矛盾。相反地：只有在波蘭重新爭得了自己的獨立以後，只有當它作爲一個獨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時候，它的內部發展過程才會重新開始，它才能夠作爲一種獨立的力量來促進歐洲的社會改造。當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國侵略者壓迫的時候，它就必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來反對外來的敵人；當它的內部生活因此陷于癱瘓的時候，它是不能爲爭取社會解放而鬥爭的。」（《選集》，第二卷：632）1882年2月7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中也說：「……國際合作只有在**平等者**（按：黑體字爲原文所有）之間才有可能。……只要波蘭還被分割，還受壓迫。那末不論是國內的強大的社會主義

政黨的發展，還是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蘭人的真正的國際交往的發展，都不可能。每一個波蘭的農民和工人，一旦從自己的閉塞狀態中覺醒起來參加為共同利益進行的鬥爭，首先就會碰到存在民族壓迫的事實，它到處都是他們前進的第一個障礙。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歐洲有兩個民族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在成為國際的民族以前成為國家的民族，這就是愛爾蘭人和波蘭人。他們只有真正成為國家的民族時，才更能成為國際的民族」（《選集》，第4卷：428-429）《共產黨宣言》「在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這句話之後，緊接著是：「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領導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雖然這裡所說的“民族的”一詞和資產階級所理解的完全不同。」這句話的確切涵義曾引起許多爭議，但由上述的脈絡即可得到真解。馬克思寫於1875年的〈哥達綱領批判〉的這段話可為明證：「為了能夠進行鬥爭，工人階級必須在國內組成一個階級，而且它的直接鬥爭舞台就是本國，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階級鬥爭不是就內容來說，而是像《共產黨宣言》所指出“就形式來說”是本國範圍內的鬥爭。」（《選集》，第3卷：15）

從是否有利世界革命區別民族獨立運動

三、對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必須從民族獨立客觀上是否有利於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來決定對民族獨立運動的態度。這裡我們根據與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泛斯拉夫民族主義、波蘭與愛爾蘭民族獨立問題的意見來加以說明。

1815年之後，在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境內的斯拉夫人鼓吹泛斯拉夫主義，主張分散在俄、奧、德、土等國的斯拉夫人形成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民族，建立起統一的斯拉夫國家。於是作為19世紀歐洲封建專制的支柱的俄國成了團結斯拉夫民族的核心。當1848年的民主革命（逢虫虫）起於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等國之際，泛斯拉夫主義者積極為俄皇與其庇護下的奧地利王朝效勞，充當壓迫革命民族的反革命的主要工具，鎮壓了歐洲各地的民主革命。恩格斯為此嚴厲譴責泛斯拉夫主義者為了虛幻的“民族獨立”的前途而把民主與革命出賣給了反革命勢力。恩格斯認為，散居在德、奧、匈境內的斯拉夫人由於語言不通、歷史斷裂、經濟落後、政治無力，要想獨立無異痴人說夢，但只要他們能投入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則獨立建國或可有望。（參見：《全集》，第6卷，〈匈牙利的鬥爭〉、〈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第11卷，〈德國和泛斯拉夫主義〉等文）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導下的第一國際始堅決支持慘遭多次瓜分的波蘭民族恢復獨

立。這除了前述第二點中所提到的原因外，還有從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立場出發的三項理由：

1. 波蘭人一直以全世界革命戰士的身份在美國獨立、法國革命、1848年匈牙利、德國和意大利的革命、以及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中，無役不與，驍勇善戰，立下了輝煌的汗馬功勞；
2. 1815年俄國主導的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三個神聖同盟聯合瓜分了波蘭，普魯士、奧地利也因而陷於依附俄國的地位，只有促成波蘭的獨立，打斷這三個反動的軍事專制國家結成的鏈條，德、奧才能徹底擺脫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從而掃除各民族解放的最大障礙；
3. 波蘭之所以能被瓜分是因波蘭大封建貴族與俄、普、奧勾結。波蘭的小貴族、城市市民與一部分農民因而結成獨立革命的聯盟，同時要求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實行土地民主革命，波蘭的獨立有利於解放農奴制或勞役制的農民變為自由的農民。（見《全集》，第5卷，〈法蘭克福關於波蘭問題的辯論〉；《選集》，第1卷，〈論波蘭問題〉；第2卷〈支持波蘭〉）

對愛爾蘭的問題，馬克思有一段長時期認為可能借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高漲來推翻統治愛爾蘭的制度，但經過更深入的研究後，得出了相反的信念：不是在英國，而是只有在愛爾蘭才能給英國統治階級致命的一擊；英國工人階級若不能與統治階級的愛爾蘭政策一刀兩斷，就還得續受英國統治階級的支配；英國工人階級必須支持愛爾蘭的民族獨立，這不是出於對愛爾蘭人的同情，也無關乎抽象的正義或博愛，而是基於英國無產階級本身的利益，因為這是英國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並且由於英國統治了世界市場，是國際資本的大本營，同時英國也是唯一具備社會革命所必需的物質條件的國家，因而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就成了全世界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目標，而加速這一革命的唯一辦法就是使愛爾蘭獨立。（參見《全集》，第32卷：389，625，654-657）。

馬克思在1870年的〈總委員會致瑞士羅曼語區聯合委員會〉的通告信中闡釋了愛爾蘭的民族鬥爭和工人階級解放的關係，其要點如下：

1. 愛爾蘭是英國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愛爾蘭崩潰了，它在英國也必定要崩潰，這有利於英國的無產階級推動社會革命。愛爾蘭的土地問題攸關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死存亡，故經濟鬥爭都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由於英國土地貴族也就是愛爾蘭的大地主，因此土地問題同時也是民族問題。
2. 由於租地日益集中，愛爾蘭的貧民日增，被迫移民英國，造成英國工人的工資

與生活水平下降，英國工人因而憎恨愛爾蘭工人。再者，英國工人自居為統治民族的一份子，加上宗教信仰不同，於是就像美國白種貧民看待黑奴那樣厭惡愛爾蘭工人，愛爾蘭人也同樣地憎惡英國與英國工人。英國資產階級遂刻意煽動無產階級間的這種對立，分裂無產階級，削弱無產階級的力量，從而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而在愛爾蘭人大量移民美國後，雙方的對立還越過大西洋，成為美國與英國之間衝突的隱蔽基礎，也使大西洋兩岸的工人無法真誠地聯合，謀求共同的解放。

3. 愛爾蘭是英國政府維持龐大的常備軍的唯一藉口，一有需要，這支軍隊就被用來對付英國工人。（《全集》，第16卷：439-440）

綜而言之，馬克思與恩格斯承認工人階級的民族特性，主張工人階級應先成為本民族領導階級，再在平等的基礎上形成國際的合作。同時，由於資本主義已發展出世界市場，各國的生產、交換是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各國的資產階級也聯合起來對付無產階級，他們不斷呼籲無產階級應剷除民族偏見，警惕民族沙文主義，秉持國際主義的精神，共謀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因此，他們不是根據“自由”、“平等”、“人道”、“博愛”、“正義”等道德字眼（事實上，他們經常嘲笑巴枯寧、普魯東等人唯心地濫用這些道德詞彙），而是從歷史唯物論與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把民族問題放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判斷其所具有的進步或反動作用，從而決定採取支持或反對的立場。

列寧對階級與民族問題的觀點

列寧在階級與民族問題上和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基本上是同條共貫的。下面幾段話代表了列寧的主要論點：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的建立。第二個趨向是民族之間各種聯系的發展和日益頻繁，民族壁壘的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的國際統一的形成。……民族原則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有歷史的必然性，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完全承認民族運動的歷史合理性。……打倒一切封建壓迫，打倒一切民族壓迫，打倒某一民族或某一語言的一切特權，這是無產階級這個民主力量的絕對職責，是受民族紛爭蒙蔽和阻礙的無產階級鬥爭的絕對利益。然而，超出這些嚴格限制在一定歷史範圍的界限去協助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是背叛無產階級，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

「無產階級不能贊同任何鞏固民族主義的作法，相反地，它贊同一切幫助消除民

族差別，打破民族壁壘的東西，贊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東西。採用其他的作法就是站到反動的民族主義市僧方面去。」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聯邦制和分權制的，原因很簡單，資本主義為了自己的發展總是要求有一個盡可能大盡可能集中的國家。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覺悟的無產階級總是堅持建立更大的國家。它總是反對中世紀的部落制，總是歡迎各個大地域在經濟上盡可能達到緊密的團結，因為只有在這樣的地域上，無產階級才能廣泛地展開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廣泛而迅速的發展，要求有廣闊的、聯合為國家的統一地域，只有在這樣的地域，資產階級——和它在一起的還有它的死對頭——無產階級才能分別團結起來，消滅一切老舊的、中世紀的、等級的，狹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界限。」（以上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0卷，〈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可以看出列寧的上述觀點與馬克思、恩格斯並無二致。由于列寧處於列強在全世界瓜分殖民地、各劃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時代，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紛紛掀起民族獨立的革命怒潮。爲了聯合殖民地與半殖民的被壓迫民族共同對抗帝國主義，推動世界革命，也由于俄羅斯長期實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壓迫俄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列寧比馬克思、恩格斯更強調弱小民族脫離壓迫民族獨立建國的民族自決權。但他只是原則上贊成，卻並不鼓勵實際行使民族自決權。他在〈論民族自決權〉中說：「無產階級……承認各民族平等，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把各民族無產者之間的聯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從工人的階級鬥爭著眼來估計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離。（《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卷：523）在〈關於自決問題的總結〉中，他又說：「民主運動的個別要求，包括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義（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小部分。在個別的具體情況下，部分可能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分。某一個國家的共和運動可能只是其他國家教權派或財閥君主派進行陰謀的工具，那時我們就不應當支持這個具體的運動，但是，如果根據這點就從國際社會民主黨綱領中拋棄共和國的口號，那就可笑了。」（《列寧選集》，第2卷：863）

很清楚，列寧雖然側重提出了民族自決權，但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是從歷史唯物論與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觀點，用唯物辯證的方法，把階級與民族的關係放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處理，絕不抽象、片面地談論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

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與民族觀點看台灣的統獨左右之爭

在探討完馬克思主義對階級民族問題的觀點後，現在我們可以根據上面的論述來

評析台灣的統獨左右之爭。

目前對台灣前途的看法，大概可分為五種。除了主張統一的左、右派與主張台獨的左、右派外，還有一種不願把自己歸類為前四種的「未定論」派。這裡所謂的「未定論」不是指右派台獨拾美國主子牙慧所泡製而現在已經過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而是說，對統獨問題不抱明確的立場，端看時局形勢發展而定。這種「未定論」派也可分為標舉「階級優先」的左翼與尊崇自由主義的右翼。台灣的統獨問題是遲早要解決的事，這種「未定論」當然也不可能長期存在，最終還是要滑向統獨兩個立場。

「未定論」派的出現，主要根源有二：一是對「階級」與「民族」的辯證關係認識不清，二是對中國大陸的發展趨勢存有疑慮。

《連結》編輯部的文章集中地表達了左翼的未定論派，也就是「階級優先」論者的觀點。《連結》的〈台灣「左翼」何去何從？〉對統獨問題提出以下的看法：一、階級的利益是最高的準則，所謂「全民」的、民族的利益皆應服從階級的利益，不應讓狹隘的民族與國家的界限束縛階級的團結；二、基於民主主義主張人民(?)有民主自決的權利；三、數百年來台灣民眾不斷受到外來統治，加上國民黨專制獨裁的高壓統治，台灣民眾容易產生類似反民族壓迫的情緒，因而台灣人民有自決或獨立的權利。

以上第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僅就抽象層面來說，左翼陣營中人應該不會有人反對。《連結》文章主要是針對統一的左派而來，其意若曰統派沒有超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牢籠，因而未能從純正的左派的階級觀點來看統獨問題。《連結》也表示他們並不贊成台灣民族主義，並指出了台獨運動實質上是美日帝國主義操縱下的產物，但對台獨，尤其是所謂「左翼」的台獨仍抱持一定程度的同情，並支持台獨的「自決論」，其理由是上述的第二、三點。

所謂自決(self-determination)論是19世紀民族主義勃興後，為解決民族紛爭與國土歸屬而產生的理論。其基本前提是先有民族的存在，才有民族自決問題的產生。《連結》不用「民族」自決而改用模糊的「人民」自決字眼，是迴避了問題的核心。試問此處「人民」意何所指？是指統治階級之外的各種被統治階級，還是也包含了統治階級的所有社會成員？若說「人民」是people的中文翻譯，那麼people的另一涵義即是「民族」。更重要的是，存在「台灣民族」嗎？台獨不論是右派或所謂「左派」，數十年來，想方設法，生搬硬套，老想憑空製造出一個「台灣民族」，所可嘆者，迄今猶未竟其功。在台獨陣營中，對台灣民族是否已經成立？是否需要鼓吹台灣

民族？都還爭議不決。而「台灣民族」的內涵，即「台灣人」是什麼？哪些人構成「台灣民族」？從50年代至今，說法迭經數變，連台灣民族論者自己也還沒有搞清楚，令卯足了勁鼓吹多年的台獨領導者如黃昭堂之流亦感慨不已。（以上所述，可參見黃昭堂的〈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收於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1994）。然則，「民族自決」又從何說起呢？其實，「台灣民族論」不過是台獨爲了抹除台灣民眾傳統的漢民族思想並煽動反中國的情緒以建立對台獨的認同而搞出來的粗製濫造的工具，其呈現矛盾混亂的狀態是理有固然的。

由於無論從人種、語言、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面，台灣都缺乏成爲一個民族的客觀條件，台獨論者便著力於製造歷史神話，企圖以反中國的台獨史觀，建立主觀上的民族認同。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n）所說的：「所有捏造出來的傳統，只要可能，就利用歷史做爲行動的合理根據與凝聚群體的黏合劑。」（Eric Hobsbawn ed.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1983, p13）台獨史觀右派的代表作是王育德的《苦悶的台灣》，「左派」的代表作是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兩派對台灣民族形成過程的解釋雖不盡相同，但本質上都是主觀唯心論的產物，都是先有獨立的念頭再回過頭去從史料堆中剪裁拼湊，再加以曲解，建構出符合台獨立場的歷史敘述。換句話說，他們不是用「以漢還漢，以唐還唐」的尊重歷史本身的方法，不是從事件據以產生的歷史條件，而是從現今的實際需要來歪曲歷史事實。正如考茨基批判某些政客出於政治動機玩弄歷史時所說的：「第一、他們也許會企圖完全依照現在的模樣以鑄造“已往”；第二，他們也許會力求依照他們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觀察“已往”。」由於兩人都拿台灣史做爲政治鬥爭的工具，重以學殖淺陋，缺乏高明的史學與社會科學造詣，書中充斥著荒唐之言與謬悠之論。這裡沒有必要對書中史料諸多的謬誤解釋與自相矛盾之處細加批判，那需要另文專論。只須指出其基本觀點與方法的錯誤即可。

台獨史觀的主軸是：台灣是中國的棄地，台灣人是中國的棄民，四百年來，台灣人爲了追求自由、幸福的新天地渡海移民來台開拓，而自荷蘭、明鄭、清朝、日本到國民黨都是外來政權，可憐的台灣人慘遭其嚴酷的殖民統治，一部台灣史就是台灣人從不斷反抗外來殖民政權的鬥爭中逐步形成台灣民族的過程，台獨運動也就是台灣人繼承先民的歷史使命爲擺脫台灣的殖民地地位而奮鬥的民族解放運動。聽起來其氣甚爲悲壯，但事實上是這樣的嗎？這種論調是典型的以今釋古，也就是上引考茨基所說的「依照他們的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觀察“已往”。」台獨史觀缺乏的就是史學研究中最基本的「歷史發展」觀點。也就是今天的事物都是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產物的觀點。今天台灣漢人的祖先並不是在四百年前台灣島荒榛未闢、瘴癘滿佈之際同時由

中國大陸移民過來的，而是由荷蘭、明鄭、清朝三個時期分階段、分批移民而至。王育德、史明的書中，自己就已提到至荷蘭撤走時，台灣人口不過十萬左右，鄭成功率十幾萬軍民來台，台灣人口才劇增至二十餘萬，且為生聚教訓，恢復中原，又極力墾殖、教化，開發之地遠過於荷蘭時期。說明鄭是外來的殖民政權，對原住民來說可以成立，對漢人尤其是隨明鄭而來的漢人來說，他們本身就是外來的殖民者，而不是被殖民者。漢人大量自大陸移民至台的高潮是在清朝領有台灣版圖之後，至清末割台之時，台灣人口已達二百多萬人，若非台灣屬中國所有豈能讓漢人在二百多年間大批湧入台灣？對於明鄭時期在台灣漢人來說，清朝分批而至的漢人就是外來者，就像今天台灣的外省人相對於台籍人士是外來者一樣。這些清朝時期的外來者，有的是游民、罪犯，有的是經官府批准由豪族大戶招來的佃戶，有的是宗親鄉鄰相互牽引而至的拓墾者，有的是搞貿易、商業的商人。請問在清朝時期誰是殖民者？誰又是被殖民者？

史明喜歡拿清朝時期「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這句話來證明台灣人「反唐山」、反中國的傾向。這只足以證明他缺乏歷史分析的能力，連基本的社會科學知識卻不具備。以清朝時期，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發動數十萬民眾的三次大起義來說，無不把矛頭對準代表地主階級的貪官污吏，起義群眾也以貧農、游民為主，舉的政治旗號則是“大明重興”、“遵明制”等反清復明的宗旨。而林爽文和戴潮春與大陸的天地會有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戴潮春的起義更是直接受大陸的太平天國革命影響。清朝時期大多數台灣人民的起義所反的一是封建的階級壓迫，一是異族統治，非但不是「反唐山」、更不是反中國，其重要動力正是台獨忙了半天老清除不了，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大漢族主義。而且，朱一貴起義在康熙六十一年（1721年）距離台灣歸清設府的康熙二十三（1684）不過37年，朱一貴的供詞中，寫的籍貫是福建省長泰縣，林爽文到台灣的時間更短，他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17歲左右隨父母至台，乾隆五十一年（1786）就起義了。以前台獨（當然也包括史明）連到台灣三、四十年的外省人都不承認他們是台灣人而排除在「台灣民族」之外，（近年來，因為台灣島內外的政治形勢出現重大的變化，為了便於推動獨立，台獨開始把所謂認同台灣〔應說是認同台獨〕的外省人稱為「新住民」，「新台灣」讓他們光榮列入「台灣民族」了），可是寫起歷史來，卻把到台灣沒有多少年又充滿著大漢族思想的朱一貴、林爽文等人奉為台灣人「反唐山」、反中國的先賢先烈了。這只能說明在台獨意識形態的籠罩下，曲解史料，睜眼說瞎話，可以荒唐到什麼程度。

至於「棄民」、「棄地」之論更是荒誕不稽。王育德與史明筆下的「棄民」論，主要依據是明、清兩朝所下的禁海令。明期時，台灣常為盜賊、倭寇的逋逃藪，清初

則是鄭氏父子的反清復明根據地，試問古今中外哪個政權不對敵對勢力實施堵截？國民黨的政權直到80年代中期不准台灣居民與大陸有任何接觸，否則以「通匪」論處，自有大刑伺候，照他們二人的邏輯，那就是國民黨視大陸人民為「棄民」，可是國民黨正是以中國正朔自居，企圖重新君臨中國呀！「棄地」論主要指兩件事：一是清康熙帝因為台灣孤懸海外，鞭長難及，原不欲收歸版圖，經施琅勸阻才改變心意。可是，史明與王育德都不知道，日本奪取台灣之初，遭到台灣人民激烈抵抗，鎮壓抗日行動所需的軍費劇增。為了維持在台的軍事統治，每年需一千萬圓，其中七百萬須靠國庫撥款補助。日本國內深感台灣偏遠難治，且管理開發台灣所費不貲，財政困窘的日本有不勝負荷之苦。資本主義仍不甚發達的日本出現「可以一億圓拿台灣賣給外國或中國之議。經擔任台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力爭，此議遂寢。王育德對日本促成台灣的近代化感恩戴德，卻不知道台灣也差點成了日本的「棄地」；「棄地」說的另一根據是說清廷棄台灣如敝屣，毫不在乎地割給了日本。這更是連基本史料都不讀的胡說八道。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屢受帝國主義侵凌，台灣作為東南半壁的海防要地，戰略地位日形重要，於是有1887年的升格建省，清廷更派出洋務運動的大將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在台灣鋪鐵路、架電線、開礦務、清丈田畝，勵精圖治，使台灣成為全中國推動洋務最先進的省份。台灣地位如此重要，清廷投注心力如此之大，依照常識也可判斷，清廷再昏聩無能，也不可能輕易拱手讓出台灣。對台灣割讓之事，清廷重臣張之洞等人費盡心機想利用列強矛盾也援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之例，以德、法等國制約日本，圖免割台，由於歐洲列強對台灣興趣不如遼東半島之大，不願出面，清廷迫於無奈才忍痛放棄台灣。而台灣被割，舉國震動，才激發了戊戌變法，變法不成，乃有辛亥革命。王育德不從中國積弱不振方遭喪權割地之恥來看割台一事，更無知於清廷力謀保住台灣的外交努力，便率爾斷言割台之舉為「一口氣就答應」、「毫不在乎」足見其淺陋（見《苦悶的台灣》第98頁，台北：自由時代）。

無知雖然不是論據，但也算不上罪過。最可鄙的是，指鹿為馬，刻意曲解史料。1915年由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是台灣武裝抗日本期，人數最多也最壯烈的起義。余清芳的檄文上分明寫著：「古今中華主國，四夷臣卿，…豈意日本小邦委賊…不遵王法藐視中原，侵犯疆土…今我中國南陵，天生明聖之君，英賢之臣…我朝大明，國運初興，本帥奉天，舉義討賊，興兵罰罪，大會四海英雄，攻滅倭賊，…。這清清楚楚是以中國正朔自居，為討伐小日本而發動的反日起義。然而，王育德刻意掩蓋余清芳的中國意識，略而不提。史明則更令人齒冷，竟然指稱余清芳「志在推翻日本統治並建設台灣國」（見《台灣人四百年史》，442頁，台北：自由時代）所謂「台獨史觀」就是這樣靠知知與曲解堆砌起來的。台獨史觀的其他諸多可議之處，包括：什麼叫「殖民地」、「殖民政權」之類的概念，因篇幅已過長，不再評論。台獨史觀成

爲台獨的煽動工具，謬種流傳多年，本以爲所誤導者僅爲一部分不具嚴謹的社會科學素養的輕信盲從之徒，未料卻很遺憾地看到矢志追求真理與社會解放的《連結》諸君，竟爾援以爲據，而有同情之語，遂不憚詞費做了稍嫌過長的評析。

《連結》文中提到要顧及「廣大民眾反對外來統治、反對壓迫的素樸願望」和「民眾反壓迫要求的正當性」。這明顯指的是受台獨影響的群眾。然而，第一，反國民黨的專制壓迫爲什麼就一定要走台獨路線呢？台灣的民主運動正是受到台獨毒害，而步入了歧途，至今連民進黨自己也深受其苦，弄個台獨黨綱的包袱扛在背上，既不敢廢，又實踐不了，可謂「統一無心，獨立無膽」，徒然造成兩岸關係緊張。坦白說，民進黨的政客們，若不是因目光短淺、急功近利而自己吃下台獨類固醇，又給群眾猛灌台獨迷幻藥的話，老老實實走反專制的民主道路，早些年就該取得多數支持而順利執政了，陳水扁今天也絕不會弄到不論在內政或兩岸關係上都左支右絀、進退維谷；第二，這些受台獨誤導的群眾有多「廣大」呢？按照這十多年的選票估算，大概充其量不會超過三成，再者，既然台獨史觀是站不住腳的，那麼爲什麼我們不該加以批判、糾正，再盡量宣揚，讓群眾迷途知返，而要追隨在那並不十分「廣大」的民眾之後，屈從他們的要求呢？而「民主」、「當家作主」與獨立建國又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呢？這些都是我們不能同意於《連結》諸君的。

台灣的統獨之爭涉及的當然不單是台灣內部的政治經濟問題，也還關涉到對岸的大陸。對「爲什麼要統一？」與「台灣獨立有可能嗎？」的問題，若不深入探討大陸的過去與未來發展趨勢顯然不可能有恰當的答案。以下將接著討論大陸的情況。

（待續）

☆

緊緊握你的手

<第七期至第九期捐款名錄>

左中鋒	500	汪文豪	1000	黃隆予	1000
左翼友人	10000	翁志宗	2000	張裕成	1000
石聰金	1000	黃長玲	3000	謝家宏	500
何學政	300				

計新台幣：20300元

關於八大工業國沖繩高峰會

林書揚

一、先進工業國高峰會議：

占世界先進地位的工業大國在冷戰時期中的經濟戰略的協調機構。1975年由法國總統季斯卡和德國總理舒密特發起，以討論西方工業大國的經濟政策，能源問題等方面的協調合作為目標。第一屆在法國蘭威城舉行。以G6（美、英、法、德、日、義）開始，翌年再邀加拿大，變G7。每年召開一次。97年丹佛高峰會有俄羅斯的加入，成G8。今年在日本沖繩舉行，稱G8沖繩高峰會。

二、Summit 已變成固有名詞其本質為何：

冷戰持續到70年代，國際社會的主軸仍然是「東西對抗」。但也逐漸顯露出「南北矛盾」。前者是「社資對抗」的代號，而後者則表示「貧富」矛盾。前後兩類矛盾的展現形式有所不同，前者偏重政略軍略戰，後者則以富國窮國債權債務的財貿政策衝突為主。70年代已有「世界經濟」一辭，但尚無今天「全球化經濟」的多項內化紐帶關係。雖然如此，以世界主要工業國家跨國跨區的實力條件，且相互之間時有不盡一致的處境或立場，因而非有競爭中的協商協調不可。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問題。於此創出了具有一定機制的國際機構，名為高峰會。

簡言之，在東西對抗和南北矛盾的交錯關係中，經過協商・協調・協力的策略趨同過程。加強「西方」的共同立場，維持「抗東壓南」的戰略優勢，這就是1975年以來延續25年的高峰會的存在意義。也就是說，各成員國在共同的外壓條件下經過互相調節來同步化內部的政策指導的歷程。

三、兩屆高峰會議的例示

(1) 1975年首屆蘭威城高峰會。當時的背景因素中首先有通貨問題。71年出現了美元危機，73年二月進入變動匯率制。那年代因美元貶值，產油國採行減產政策，一時間全球經濟陷入大混亂。如何穩定通貨，從而穩定經濟，成爲緊急萬分的爭議。當時美國主張只有全面採行變動匯率制才有助於通貨穩定。然而法國卻堅持回復固定匯率制才是正途。雙方衝突得很激烈。但終於在變動匯率的基準方面達成了協定。據當時的報導，會聚在蘭威古城的G6首腦不帶隨從關在一個房間裏長時間密議，其間一步都未曾走出房間。西方先進工業國集團與中東產油國組織之間的緊張關係經過蘭威高峰會而得到了疏解，避開了美元危機加石油危機的進一步相乘惡果。但執行浮動制

後西方國家還是吃掉了不少產油國家的權益。且在共同安全的名義下正式或非正式地操控了一些產油國的政治局面。這些都隱藏在 70 年代黑暗史的背後。所謂蘭威高峰會的典範，亦即「安定視角論」大事被宣揚的另一方面，不少中等產油國雖然石油收入有所提高，卻變成了西方的債務國，至今仍未見改善。

(2) 1990 年休斯頓高峰會議。該屆會議顯示出日本的特殊角色，和經濟基礎的不穩和政治結構的脆弱性。前一年(89 年)中國發生了天安門事件，遭到美、英、法等國家的譴責，經濟方面的抵制，政治杯葛等。但經改經建十年的成果已經預示出在未來世界市場中所占的巨大份量。日本素以經濟眼光評量中國，且 90 年前半年日本的國內景氣特別活潑，在 7G 之間足以睥睨同儕。因而在高峰會中挾其聲勢要求停止對中國的排斥政策。強調不能繼續孤立中國，必須將其重新納入國際社會。高峰會成員多數贊成，促成了世界銀行的對中貸放政策重新開始。各國政府的對中雙邊貸款協定也回復了。但諷刺的是，日本代表團意氣風發地回國不及一個月，竟然爆發出美、伊海灣戰爭。中東的石油是日本經濟的生命線。該區爆發戰爭、且發動者是美國，讓日本有苦說不出。且屢受美國強索，分擔戰費 90 億美元。日本自民黨長期政權終於崩壞，從此走入政局混亂期。輿論自嘲地說「流失的 90 年代」，且以「制度疲勞」來作政局驟變的註腳。其實更深沈的理由是日本對單極超霸的美國的附從地位，不得已接下日美安保新指標的桎梏，喪失了自主判斷自訂對策的立場。

四、沖繩 G8 高峰會議突顯了什麼問題：

(1) 日本認為，75 年日本的加盟，是因為當年的日本是屬於「變革型」的經濟，而當前的中國，其變革型推力尤勝於當年的日本。日本加盟後 25 年來的演變，證明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情勢下有必要納入新興變革力量的中國。對此意見美、英表示反對，德國傾向贊成，但中國本身拒絕參加。

(2) 日本還主張 G8 高峰會和聯合國的關係必須趁機加以理清。這也是日本邀請中國參與的另一個理由。除非對聯合國的平等和平的基本宗旨有更積極的表態，G8 的強權集團色彩將加速引發多數開發中國家的更大反彈。按 90 年代初冷戰終止，卻代之出現美國獨霸以歐盟為主要工具，經常越過聯合國規章單方面採行軍事行動。去年克倫高峰會外長會議的論調已經引來不少開發中國家的側目。

(3) 有關開發中國家的債務處理問題。今年四月間開發中國家 77 國的哈瓦那會議中，南方窮國針對富國全面主宰國際經濟的一切規範，致使窮國愈窮，富國愈富，發出了嚴厲的指責。在「一百年也還不清」的外債重壓下，不少債務國家的年間支出中一半是償還本息，而國家公務員的薪資卻經常被拖欠。占全球總人口近八成的南方世界有可能變成 21 世紀具最大爆炸力的不定時炸彈。按即使是剝削集團本身，當其目睹落後國因舉債而造成的窘狀慘狀時，也懼怕被剝削者無以為繼的困境可能最後拖垮

剝者。因而認為有限度的鬆綁，適度地緩解其爆炸邊緣的危境，還是必要。自1988年多倫多高峰會首度討論貧富世界的結構問題後，出現了HIPICS（最貧國債務解消論）。在聯合國大會上也幾次成了議題。只是針對「解消債務」，先進大國極不情願。因為「施捨」並非資本主義倫理。對此日本的作法是，(a)把舉債欠債的責任完全歸於窮國。(b)以新的「救濟案」取代沖消債務辦法。這種「救濟計劃」是暗藏玄機的。以日本產品的有條件贈與協助債務國政府償還負債的一部份。真正的涵義是，無法由債務國政府收回本息，改由負債國的消費者收奪利潤。這是G8剝削集團對南北矛盾的偽善和虛應的作法，日本政府是凸顯的典型。

(4)如何面對有時與G8立場相左的區域主義。如EUC（歐盟）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等等機構。今後如ASEAN + 3（東南亞十國加中日韓論壇），或屬雙邊關係的日本新加坡，日本韓國自由貿易協定等，有逐漸擴大的趨勢。這一類區域主義的盛行，雖然目前與G8還不算是處處針鋒相對，但總是表示國家或區域的經濟特殊條件在大國主導下的全球化趨勢中確有不易解決的困境。隨著資本、技術領域的落差的擴大，弱小國群對強權集團的自衛和反制，也正在積累中。G8（有的抗爭團體將俄羅斯除外）集團在其慣行的操控模式下必將面對日漸增多的地區本位的衝突。

(5)軍事准軍事同盟問題。依主辦國日本的立場，當現階段日美安保協定的「兩國主義」形式面對新形勢如南北韓首腦會議等可能帶動出多角結構的發展趨勢的情況時如何應對，是關係到區域安全，甚至全球和平的重大問題。現今已有所謂「21世紀新樞要國家論」的出現。世界新權力地圖似已越出了從來的「既開發」、「未開發」、「結盟」、「不結盟」的傳統框架，而顯示出新時代的地緣因素。G7的共同戰略，如何在少數傳統強權國家的軍事利益和日漸多角化的新興挑戰勢力之間，尋找出比較有利的暫時性平衡點，將日漸困難。

(6)對抗G8的新要素還有網路和NGO（非政府組織）運動。99年底的西雅圖WTO；今年四月間的華盛頓IMF（世界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會議；五月間泰國清邁的ADB（亞洲開發銀行）總會等，都受到NGO反新自由主義、反全球化、反G8的聲浪衝擊。當前的聯合國，雖然選擇性地允許NGO參加大會旁聽，但尚未同意將其主張列入議題。G8高峰會因是八大國最高首腦會聚一堂，容易變成世界NGO動運集中抗爭的目標。本屆會議除了從來的新聞中心外，還成立了一個NGO中心。表示會議當局對NGO攻勢的疏解、化解的策略用心。

按有關現行NGO運動的本質規定和現象面的多樣性，不論在理論或實踐領域中都還處在遞變或演進過程中。階級、階級鬥爭，尤其是革命內戰等已被多數NGO所否定，多自居為民主總體制下的意見壓力團體（即使在意見表達方式上時而有邊緣性的激烈作法）。從新生產力條件下由階級矛盾溢射出來的社會局部衝突論，到政·經新

一元化時期的階級鬥爭變型論，恐怕都還在探索過程中。不過觀十年來的活動軌跡，NGO的存在基礎或前提，應該是社會分層分工的定型化成熟化包括公權力的運作系統和資產階級程式民主的有限保護作用。策略上的單項目標、搞小範圍的聯合固然靈活，對大範圍的整合攻堅，常常顯得分歧多途、力不從心。據報導去年西雅圖WTO反制運動中，世界NGO團體間的問題暴露了不少。不過還是有人視為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量變積累中的一種現象，仍有待用心觀察。

(7)如何面對 IT (資訊科技) 管制世紀的來臨：

本屆高峰會另外號稱 IT 高峰會，不論其策略性用意如何，的確反映出 21 世紀將要進入 IT 管制時代，其意義之重大不容置疑。按「情報時代」的來臨，在人類技術史上帶來了極大的震撼，在經濟史、政治史、甚至軍事史上，也提供了劃時代的新要素。在經濟方面，IT 業成長快速，那巨大的創價力是空前的。在傳統產業日益斜陽化，金融市場逐漸投機短線化，亦即「泡沫化」的當前階段，資訊產業在產、銷方面的發展空間，是過去任何一部門新興產業抱括核能產業、基因工程等都難與比較的。因為後者(核能、基因)是人類對宇宙玄奧的探秘所衍生出來的，技術消化力還很有限。但前者卻一開始就面向著廣大的實用領域。人類交通行?的基本課題是如何更有效地突破物理時空的限制。IT 以電子符號的瞬間移動，代替人體物體的慢速移動，快慢之間幾乎超絕人們的想象。其效果已經擴及到政治領域的行為模式或準則了。評論家認為 IT 在 21 世紀將扮演歷史上「最高效率的，最符合民主原則的平准化要素」。IT 時代人人能突破種族、性別及其它一切身份上的差別，能收、發、聚任何一種資訊，作為行為依據，包括設定目標，訂出方法，執行作業。如此的平等性確已超出了歷史上任何規範或制度的保障。

但如此的特性在理論上卻有兩種相反的發展可能性。一、無孔不入、無遠弗及的 IT，因成員個人的行?能力和可及範圍的繼續擴大，而導致社會失控，使社會產生無政府趨向。二、與此相反，具有如此契機的 IT，其收聚力掌握在政府手中，致使人民的安全生活權、隱私權失去保障，社會變成嚴緊無比的監控社會。當前的 IT 產業主要掌握在企業和個人手裏，而上述的兩種趨勢都非人類之福。因而 IT 必須加以管理，而有效的 IT 管理必須由政府與民間共同合作始能做到。這種論點，便是本屆高峰會作為化解 NGO 攻勢的另一項策略，而附給沖繩高峰會「IT Summit」的別稱的由來。

五：作為生產力新要素的資訊科技——代結語

資訊也好，基因也好，當其在一定歷史階段的生產關係或所有方式的社會基礎上成了新生產力要素時，不論新要素本身具有如何的顯在或潛在的作用力，是無法直接改變生產關係或所有方式的基本性質的。它本身的工具性還是擺脫不了。如，再進步

的 IT，其結構不外硬體軟體兩部份。兩者都是人類勞動的結果，勞動的社會性格還是決定產品的社會性格的最大因素。其次資訊科技產品進入流通過程後，使用者對產品的取得方式，像是硬體的購買，軟體的學習，都要由使用者付出代價。至於使用的效果，也要看使用者的社會身分。看他是雇用者，還是受雇者，還是自立的經濟主權者。一堆資訊的有用性，還是因人而異的。

總之，生產力範疇必須轉入生產關係範疇，技術因素必須被吸進社會因素的特定網路中，才能轉變成具體現實的歷史變數。因此，當全面掌握著社會網路的優越階級的代理人，刻意突顯某一種新生產力要素的「劃時代」作用時，人們應該警惕，那是一種障眼法。新事物其實還是被置於舊關係中。技術的救濟還是解決不了社會惡的。

我們在分析沖繩 Summit 的運轉過程中遇到了這類問題，讓我們注意到世紀之交全球獨佔資本家集團的階級戰略的一斑。 ★

【讀者與作者】

臧汝興、柳如慧對張樹榮來函的回覆

張樹榮來函

「左翼月刊」編輯部鈞鑒：

貴刊第八號「全產總危機」及第九號「談勞資政協商體制」二文，本會均曾詳加拜讀。文中敘及本會黃清賢理事長在推動縮短工時案時，「捨國民黨的兩週 84 小時版本，硬是簽署民進黨的 44 小時加限制性的四週變形條款」。不但與事實頗有出入，且藉此案對黃清賢理事長大加撻伐，實欠公允，有澄清的必要。

縮短工時案，「一次立法兩階段實施」之策略（即 2001 年元月 1 日每週 44 小時工時，2002 年每週工時 40 小時），為本會一貫主張，六月十三日上午，本會與全產總、全總所屬會員會在行政院與游錫副院長協商，並未獲政院同意「每週工時 44 小時」之版本；到了下午國民黨立院黨團通過「每兩週 84 小時工時案」；消息傳來才緊急促成行政院同意勞方所提之 44 小時工時案，並於當晚 10 時簽署。簽署代表勞方中有林惠官理事長（全總工會），及黃清賢理事長（全產總）。

至於國民黨所提每兩週 84 小時案，是六月十六日才經立院以 113 票同意，1 票反對通過的。黃清賢理事長不但全程旁聽，且強烈表達「促成政院版，歡迎國民黨版」的立場，何來反對國民黨版之說。

貴刊前後兩期昧於事實對此質疑，顯係誤會，且有扭曲事實之嫌。本會特提嚴正抗議。

此

奉達 並請刊出。

臺灣石油工會主任秘書兼發言人 張樹榮敬上

臧汝興的回覆

我在「談勞資政協商體制」一文中，主要是談勞資政協商體制，內容中雖有涉及全產總的部份，但完全沒有提到黃清賢理事長，當然更不可能在文中出現張樹榮主任秘書所說的「藉此案對黃清賢理事長大加撻伐」。建議張主任秘書先弄清楚兩文所談的內容及兩文的作者。

柳如慧的回覆

對於臺灣石油工會主任秘書兼發言人張樹榮的抗議書函，謹作以下的簡單答覆。

一、張樹榮針對我對黃清賢理事長的指責，提出「嚴正抗議」。但張樹榮引用的「捨國黨的兩周 84 小時版本，硬是簽署民進黨的 44 小時加限制性的四周變形條款」，並非出自我的文章，顯然是張冠李戴了。不過，儘管張樹榮犯了張冠李戴的犯誤，但我既與張樹榮對縮短工時案的意見不一致，還是可以作一點回應。

二、我在左翼第八期「全產總的危機」一文中，也提到國民黨的版本優於民進黨的版本，但全產總的理事長偏偏選擇了支持民進黨的版本。並由此指出黃清賢選擇政黨利益的不當性。也因此遭到張樹榮的「實欠公允」、「有澄清的必要」的反駁，同時張樹榮也對修法過程做了詳細敘述。但是仔細拜讀張文後，令我驚訝的是，張樹榮對修法過程的敘述剛好呼應了我的說法。張樹榮的敘述作一整理如下：

6月13日上午：（全產總）與行政院協商 44 小時制，未達成協議。

同日下午：國民黨黨團通過「每兩周 84 小時工時案」，消息並傳到正在行政院（民進黨政府）協商 44 小時案的全產總。

同日晚上十點：全產總的黃清賢理事長與全總的林惠官理事長等「緊急促成行政院（民進黨政府）同意勞方所提之 44 小時工時案」。

從以上的時序來看，整個事情經過是非常清楚的，毋須再做說明。有一點可以指出的是前段整理中張樹榮提到的「緊急促成」的字眼。到底「緊急」是爲了什麼？說穿了不就是爲了搶先與民進黨達成協議，以免讓國民黨的 42 小時版本實現嗎？！

三、張的來函中表示『黃清賢理事...強烈表達「促成政院版，歡迎國民黨版」的立場。』顯然張樹榮想用這句話來表示黃清賢也並沒有反對對工人較有利的國民黨版本。但是，這句話說白話一點兒就是“促成「較不利於工人的 44 小時版本」；歡迎「較有利於工人的 42 小時版本」”。如此充滿政治性的語言，恐怕不是一般人的常識所能理解的，但卻被黃理事長拿來向工人大眾交代的說詞，這難道不是對工人大眾的欺瞞嗎？！

四、張的來函中提到『「一次立法兩階段實施」之策略（即 2001 年元月日每週 44 小時工時，2002 年每週工時 40 小時），爲本會一貫主張。』在此不知「本會」指的是石油工會還是全產總，從張樹榮信函署名「台灣石油工會主任秘書兼發言人」來看，指的應該是石油工會，但若從整個文脈來看又似乎是指全總產。如果指的是全產總的話，全產總與民進黨達成協議的版本，雖有 2001 年元月實施 44 小時工時條文，但根本沒有提到 2002 年實施每週工時 40 小時，非但如此，還附帶了損害工人利益的四周變形條款。因此可以清楚看出，黃清賢理事長簽署的版本根本就違背了張樹榮所言的「本會一貫主張」，顯然「本會一貫主張」根本就不是一貫的主張，而是可以隨時改變的主張。

逆取順守？

—— 俄國私有化研究簡述

崔之元

最近，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了一本引人注目的書：前蘇聯著名改革理論家，現俄國自由派政黨領袖葉林斯基(Grigory Yavlinsky)的新著《激勵與制度：俄國向市場經濟的過渡》(與Serguey Braguinsky合著)¹。葉林斯基1990年代初提出邁向市場經濟的「500天計劃」，聲名大噪。該計劃對500天中的每一天的任務均有詳細規定，真可謂意氣風發，躊躇滿志。但是，十年之後，葉林斯基卻在其這部新著中明確表示，以「休克療法」和大規模私有化為標誌的俄國經濟改革，徹底失敗了。他開宗名義，認為如下三個指標不容辯駁地揭示了俄羅斯今天深重的災難：

- 第一， 俄國已經“非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不僅現在的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及1989年水平的50%，而且機械工業萎縮了一半，整個經濟全靠向國際市場出售石油和天然氣維持。
- 第二， 俄國經濟已經“非貨幣化”，實物交換(如許多工廠不發工資發產品)竟占全部交易的70%。這是對“向市場經濟過渡”說法的絕大諷刺，因為現代市場經濟起碼應是貨幣化的經濟。
- 第三， 十年“過渡”，俄國人均壽命下降了近十歲！根據世界銀行研究，44%的俄羅斯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儘管莫斯科等少數大城市還有浮面上的繁華。

葉林斯基並不是觀點180度大轉彎的唯一一人。同樣令人矚目的，是哈佛大學薩克斯教授(“休克療法”首倡者)的轉變。他於1999年11月7日在“華爾街日報”寫到，“我過去對於大眾私有化是過度樂觀了。1991年捷克和1993年俄國的證券私有化，很快就變成了腐敗性的資?掠奪。管理者侵吞資產，而證券持有人到頭來往往一無所有”。他甚至主張有選擇地重新國有化，將一些嚴重腐敗的私有化交易推翻重來。

無論葉林斯基和薩克斯動機如何(是否又一場學術投機?)，他們最近的觀點變化至少反映了一個動向，即西方學術界再也不能回避俄羅斯真相了。事實上，許多著名學者一貫對俄國的證券私有化持批判態度。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

(Kenneth Arrow)早就指出，俄國的私有化是“一場可預見的經濟災難”("a predictable economic disaster")²。又如，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認為，俄國私有化操之過急，是“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是另一種形式的“史達林主義”³。

不過，我認為，阿羅和科爾奈的批評還不是很到位。最近，俄國“休克療法”之父，前總理蓋達爾(Yegor Gaidar)在美國出版了他的回憶錄。他寫到，“我很懷疑證券私有化。它帶來的大規模投機的風險是顯而易見的。”⁴可見，蓋達爾並不如阿羅所批評，完全沒有“預見”到私有化的風險。他之所以挺而走險，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爲了“搶時間”，避免政治反復。這似乎中了科爾奈的“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批評。但是，蓋達爾和他的戰友，私有化部長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也並非全然“不算經濟賬”。關鍵在於，我們必須理解他們的經濟賬的演算法。

本文認為，俄國私有化主持者爲私有化提供的最深刻的理由，可用我國一句古語來概括：“逆取順守”。且聽丘拜斯本人對“逆取順守”的精彩說明：“他們絕對正在盜竊一切財富。不可能阻滯他們的。但就讓他們盜竊並擁有財吧。他們將變成盜竊來的財產的所有者和體面的管理者”("They are stealing absolutely everything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stop them. But let them steal and take their property. They will then become owners and decent administrators of this property.")⁵。丘拜斯的潛臺詞是，新的“所有者”將有動力改善自己的企業，發展生產。這對廣大人民來說，又焉知非福呢。

相應地，我認為，對俄國私有化的最深刻的批評，是講清逆取不順守的道理。這有相當的理論難度。因爲“逆取不順守”，相當於新的“所有者”不發展生產，繼續盜竊，這回可是“自己盜竊自己”了。這又如何可能呢？

下面，我就來介紹三種最近提出來的解釋“逆取不順守”的理論。它們是關於俄國私有化的學術研究中最令人興奮的成果。

第一個理論，是兩位曾任俄國私有化法律顧問的美國法學家提出的。他們是斯坦福法學院的布萊克(Bernard Black)教授和哈佛法學院的克拉克曼(Reinier Kraakman)教授。在“俄國私有化與公司治理：錯在何處？”⁶一文中，他們認為，私有化以後的企業的新所有者(有控制權的股東)面臨一個選擇：是創造企業價值還是掠奪(build value or loot)? 如果新所有者選擇改善生爲，他在新增企業價值中可以得到與他的股份相應的份額。但是，這個份額可能小於他選擇掠奪的所得。在此，“掠奪”是

指有控制權的股東盜竊企業的“自由現金流”(free cash flow),把原本應歸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資金(如工資,少數股東的分紅,應償債務和稅收)據為己有。布萊克和克拉克曼以大量材料證明,在未來高度不確定的宏觀經濟背景下,以掠奪起家的新所有者將繼續盜竊自己控制的企業,將資產轉移到海外,而不是改善發展生產。

布萊克和克拉克曼認為,新所有者至少有27種繼續盜竊的方法,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運用“金字塔控股結構”(stock pyramids)。例如,別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i)1997年控制了石油控股公司“西伯利亞石油公司”(Sibneft),該公司又擁有其子公司Noyabrskneftegaz(石油生產基地)的61%股份。在別列佐夫斯基接管前,子公司1996年盈利6億美元,但別氏接管後,子公司1997年盈利為零!別氏不顧子公司其他小股東和職工的反對,將子公司盈利全部轉移到“西伯利亞石油公司”。別氏的做法在俄國金融大亨中帶有普遍性。曾出任第一副總理的俄羅斯首富波塔甯(Vladimir Potanin)也是通過另一家石油控股公司Sidanko來掠奪其生產性子公司的資產的。當掠奪完畢後,波塔甯不惜使子公司破產以逃稅和脫欠工資,反正不論根據俄國還是西方的公司法,母公司對子公司僅負“有限責任”。

我在拙著《看不見的手範式的悖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年)一書中曾指出,通過企業集團來濫用“有限責任”,是現代西方經濟中“軟預算約束”的一個突出表現。俄國金融大亨用“金字塔控股結構”來掠奪子公司資產,也是同樣的邏輯。為對“金字塔控股結構”有更多的感性理解,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宋錦海和遠方寫的《新權貴:俄羅斯金融工業集團的崛起》一書(新華出版社,1998年)。

我將介紹的“逆取不順守”的第二個理論,是前面提到的葉林斯基在其合著的新書中提出的“期權”解釋。期權(option)原是金融理論中的重要概念,主要包括“看漲期權”(call option)和“看跌期權”(put option)兩大類及其各種組合變形。近年來,許多經濟學家將期權理論和期權定價方法用於生產性投資選擇的研究,形成了研究投資決策的期權方法。該方法的代表作是Dixit和Pindyck的“不確定條件下的投資”一書⁷。葉林斯基及其合著者就是直接移用Dixit和Pindyck的公式來研究俄國新所有者為何不進行新的生產投資的。其要義是,在不確定條件進行一項不可逆的新投資,相當於放棄了“看漲期權”,即放棄了等待更好時機的選擇權。因此,如果新投資淨收益僅僅大於零,還不足以激勵出新的生產投資。只有當新投資淨收益相當大(高於某臨界值)時,投資者才會進行新的投資。葉林斯基認為,“休克療法”和掠奪式私有化所造成的宏觀衰退和“半罪犯經濟”,大大提高了新所有者面臨的不確定性,他們寧願保持“看漲期權”,繼續盜竊,而不進行改善生產的新投資。這可從俄

國工業設備的平均壽命中得到驗證。1970年代，俄國工業設備的平均壽命是7.3年，而1996年，平均壽命竟延長到了14.6年。

最後，我來介紹解釋“逆取不順守”的第三個理論，即加州伯克萊大學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和羅墨(Paul Romer)1993年所提出的所有者掠奪的一般模型。阿克洛夫和羅墨是兩位世界一流經濟學家，前者與斯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並稱“不完全資訊經濟學之父”，後者是內生增長理論的創使人。他們的關於所有者掠奪的一般模型是針對美國1980年代末的“儲蓄與貸款協會”(一種以經營房地產為主的銀行)破產而提出的。在他們的論文“掠奪：?獲利而破?的經濟地下世界”⁸發表前，經濟學家們一般用政府提供存款保險導致銀行投資不謹慎來解釋“儲蓄與貸款協會”的破產危機。但是，在阿克洛夫和羅墨看來，不謹慎(即投資於風險過大的專案)並非破產主因，因?許多投資是在明知專案不可行的情況下作出的。真正的原因是所有者通過破產而掠奪本企業資產。他們認為，資深調查記者所寫的“盜竊通行證”⁹和“空前的銀行搶劫”¹⁰比許多經濟學家想當然的“不謹慎投資”解釋更接近現實。那麼，所有者如何掠奪本企業資產呢？阿克洛夫和羅墨提醒我們回到企業資產的會計恒等式：

$$\text{資產} = \text{所有者權益} + \text{負債} = \text{淨資產} + \text{負債}$$

據此，阿克洛夫和羅墨建立了所有者掠奪本企業資?的一般模型。其要義是，只要所有者(包括個人和母公司)只負“有限責任”(這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常態)，並且投資要經過若干個會計期才能完成，所有者就可以人為膨脹前期會計淨資產值，從而增加所有者權益分紅，儘管後期會計將會顯示整個企業的虧損。這就是阿克洛夫和羅墨所謂“為獲利而破產”。

如果說雷根主政時期造成美國“儲蓄與貸款協會”會計監管鬆弛的話，那麼，在近日“半罪犯經濟”的俄國，所有者掠奪本企業資產將更容易百倍。有趣的是，在阿克洛夫和羅墨1993年宣讀論文的會議上，另一位加州伯克萊大學的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艾亨格林(Barry Eichengreen)就明確指出，阿克洛夫和羅墨的模型很好地刻劃了俄國的掠奪式私有化。讓我們來看看俄國新所有者人為膨脹前期會計淨資產值的方法之一：低利率從國際金融市場貸進，高利率在國內貸出。

假定盧布貸款的利率是50%(這大致相當“休克療法”所要求的高利率政策)。又假定前述俄國金融大亨波塔甯控制的歐內科斯母銀行以15%的利率從國際金融市場貸

進美元(這大致相當於LIBOR，即倫敦銀行間貸款利率)。這時，波塔寧可輕易地以15%和50%間的利率(如30%)對俄國企業(包括歐內科斯母銀行的下屬企業)進行美元貸款，即使他明知一旦盧布貶值，許多企業根本不能償還美元貸款。爲什麼呢？因?這樣一來，波塔甯膨脹了歐內科斯母銀行前期會計(貶值前)淨資產，從而增加所有者權益分紅。事實上，當盧布1998年8月17日被迫貶值34%後，歐內科斯母銀行的下屬企業紛紛破產，但波塔甯和其他所有者已經在前期賺夠了。真可謂：“我身後哪怕洪水滔天”！

至此，我介紹了解釋俄國新私有者“逆取不順守”的三種理論。本文未討論俄國私有化對中國改革的含義。但顯然，探索既不同于官僚國有化，又不同於掠奪式私有化的道路---經濟民主的道路，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註釋：

- 1 S.Braguinsky and G.Yavlinsky, " Incentives and Institutions: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Russ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 引自 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 " Without a Map: Political Tact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MIT Press, 2000, p.34.
- 3 Janos Kornai, " The Years After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The Author's Self-Evaluation", p.24, paper for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April 18-20, 2000
- 4 Yegor Gaidar, " Days of Defeat and Victory", p.7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 5 Financial Times (London) , May 27, 2000
- 6 即將發表于 Stanford Law Review
- 7 A.Dixit and R.Pindyck, " Investment under Uncertain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8 G.Akerlof and P.Romer, " Looting:The Economic Underworld of Bankruptcy for Profit",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vol.2, 1993.
- 9 Benjamin Stein, ' A License to Steal: The Untold Story of Michael Milken and the Conspiracy to Bilk the Nation",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92
- 10 Martin Mayer, " The Greatest-Ever Bank Robbery: The Collapse of the Savings and Loan Industr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90.

編輯報告

隨著陳水扁總統近日前往拉美與非洲地區訪問，延續舊政權的金錢外交路線，引發台灣內部許多討論。但多數的焦點都未能從第三世界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這是長期以來台灣視野上的盲點。因此，本期《左翼》特別以【第三世界與反帝】為主題，希望能夠提供讀者從左翼的角度思考台灣與第三世界的關係。伍艾蘭〈第三世界的歷史發展與時代意義〉，對於第三世界的性質、發展與當前的意義有著全面的分析與評介。俞向南〈台灣與第三世界〉，透過對於這次阿扁外交之旅的檢討，批判了台灣自外於第三世界的不當作法。金寶瑜〈左派反對WTO的意義何在？〉，以拉美國家與WTO的關係為例，強調必須採取徹底的反帝路線，否則最終將完全為帝國主義所宰制，不可能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針對《左翼》目前正在進行的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社會性質的論戰，本期刊出了李崇仁〈統獨左右問題上下求索(上)〉，李崇仁文章的這一部份內容主要是透過對於馬克思主義有關民族與階級問題的分析，進而提出他對統獨的看法。

林書揚〈關於八大工業國沖繩高峰會〉，對於最近在琉球舉行的八大工業國高峰會之歷史源起與影響有著深入的分析。《左翼》第八、九兩期曾經刊出柳如慧與臧汝興討論工運發展的文章，其中柳如慧的文章對於全產總理事長黃清賢作出了一些批評，最近我們接到石油工會發言人張樹榮的來函，為黃清賢（同時亦是現任石油工會理事長）進行辯解，我們特別在【讀者與作者】中刊出張樹榮的來函及柳如慧與臧汝興的回應，讓關心台灣工運的讀者能據此對問題有更深入的判讀。

過去十年，主流經濟學對於俄國私有化的研究曾經出現極大的變化，從早期一面倒地主張快速全面的私有化，至近日則有愈來愈多的學者對於全面私有化採取較為保留的態度，崔之元〈逆取順守？——俄國私有化研究簡述〉，對近來有關俄國私有化研究的三種論述有著精辟的評介。

《左翼》出刊已經進入第十期了，這十個月來，由於廣大左翼朋友的支持，使得《左翼》一直能夠按時出刊，在此我們要特別向那些為《左翼》撰稿及提供經濟支援的朋友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同時，面對許多讀者殷殷期盼左翼電子報的儘早出刊，在經過長期的蘊釀與準備後，我們終於決定將《左翼》電子報的發行提到我們的行動議程上了：希望在《左翼》出刊一周年時，能將我們的電子報呈現在讀者面前。為了使《左翼》電子報能夠成為一份與眾不同的電子報，我們誠摯地邀請所有對於電子報製作與發行有經驗的左翼朋友能夠透過E-Mail與我們聯絡，提供您寶貴的意見與經驗，讓我們在未來的網路世界中也能建立一個堅強的左翼基地。

左翼 第十號

出版日期：2000年8月31日

出版二刷：2001年3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一號



〈災後餘生〉

作者：段幹青

【被延續的災難】 九二一與災難政治學

新政府舊絕症——「愛「資」病」

真不如明末清初！

劉鳴生 / 2

災盟 / 4

李文吉 / 6

【對抗全球化】 卡斯楚在聯合國千年峰會上的演說

馬克斯的幽靈在墨爾本徘徊——墨爾本反世界經濟論壇會議運動紀實

資本全球化下的三機關——世銀·世界貨幣基金會·世界貿易組織簡評

/ 8

雪梨 / 9

林涯 / 16

石油紛爭之原由

俞力工 / 20

台灣意識型態

孫善豪 / 21

使古無死者

劉文超 / 23

【爭鳴與求是】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中)

再論“中國道路”和兩岸關係

他譏笑什麼？——對〈寫在第四國際邊上〉的回應

李崇人 / 25

汪立峽 / 35

南產 / 41

九二一與災難政治學

劉鳴生

一年了，921 從剎那間爆發的自然災難變成無限期綿延的人間悲劇。一場大地震，不僅改變了地貌，也改變了台灣社會的面貌。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從信任、期待、依賴逐漸轉變成質疑、挫折和對立。同時，地震也為社會運動者和社會工作者開啓了一個新的經驗世界，過去被細膩掩藏的社會矛盾從地底被掀了出來，而且這些矛盾還在不斷蘊積當中，有一天，可能爆發出比地震更大的能量。

大自然揭露罪惡之鏈

很多人都知道，歐洲的啓蒙運動為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蘊蓄了豐厚的能量。很少人知道，啓蒙運動的動因之一，其實就是一場大地震。1755 年，葡萄牙里斯本天搖地動，至少造成 4 萬人的死亡。啓蒙哲學家伏爾泰目睹了這一場災難，而且以文字做了報導：「看看這些恐怖的廢墟，這些殘簷碎瓦，這些灰燼，這些一個一個堆疊在一起的兒童和婦女……」，緊接著，他質疑這樣的災厄難道只能歸咎於「宿命」或「天意」嗎？如果人民的苦難是盲目的大自然所造成的，那麼就無所謂全能的上帝；如果地震竟然是上帝的旨意，那麼上帝如此粗暴殘酷，人民也就沒有盲目崇拜、信仰的道理。

啓蒙思想家普遍反對教會組織的勢力和宗教的教義，針貶無知和迷信，抨擊貴族與教會串謀以維繫其封建特權。里斯本大地震的震撼加上伏爾泰所發出的質疑，無形中也動搖了教會的威權。《民約論》的作者盧騷後來給伏爾泰寫了一封信，他說，如果說有悲劇發生的話，那絕不是大自然的錯，因為，並不是大自然「把兩萬棟六、七層高的房子，密密麻麻地集中在一起。」盧騷把地震的災難拉回到社會經濟的層面，當然，也從此出發，追究政治決策的責任。

事實上，在今日的台灣，我們也很難用「宿命」的觀點來看待 921 大地震。根據教育部統計，921 及其餘震共造成 18 個縣市、1546 所各級學校不同程度的損害。其中以南投縣最為嚴重。南投縣的國中、小學共 182 所，有 140 所全倒、40 所震損局部拆除，幾乎可以說是無一倖免。學校建築一般都不會太高，卻在大地震中彷彿順從聽話的小學生一樣，集體應聲而倒，這當然不會是大自然的錯！熟悉台灣地方政治運作的人，都不難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派系豪門、官僚角頭、道上兄弟長期坐地分贓，大小通吃，居然連作為「國家未來主人翁」培養場所的公共工程都不放過。一群人渣

將學校建築搞成豆腐渣，如此強取豪奪，偷工減料，草菅人命，大自然不僅是無辜，而且正是大自然協助我們揭露了罪惡之鏈！

粗疏、傲慢、不尊重生命

921地震發生時，總統選戰正是如火如荼之際，百年老店的國民黨還在開張，候選人連戰的民意支持度卻始終跌在谷底。地震使執政者找到施展的舞台，國民黨慶幸連戰自此從谷底翻身。「變天」的警訊，竟成為國民黨選戰的籌碼。但是，國民黨黨營事業早已和房地、金融等大資產集團結為利益共同體，震災發生之後，災民向建商求償無著落，向銀行求貸無門路。921所暴露出來的事實是：房地產業者偷工減料、草菅人命，正是官商勾串牟利，政府縱容包庇的結果。而金融機構勇於向政府爭取大幅調降營業稅（從 5 % 降為 2 %）來沖銷因管理不善所造成的呆帳、壞帳，卻對災戶雨天收傘，以嚴苛的借貸條件將他們堵死在銀行的門口。災民在飽經挫折後終於發現：原來執政黨與房地、金融財團資本家根本就是哥兒們關係的共犯結構。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所負責的「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在災區做民意調查，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災後重建工作整體表現的滿意度只有 58 分，不及格。整個政權就這樣被「當」掉了。

李登輝還在位時，為自己的救災成績打了 95 分，顯然「自我感覺良好」。然而，有一個不小心被記者捕捉到的映像，如今已成為經典：李總統搭乘直昇機到災區巡視，轉動的螺旋槳葉不慎掃到一位小女孩，造成致命的重傷。小女孩的祖母追上正要登機的總統，要求解釋，李登輝猛然回頭，對老祖母惡言相向……

一個令人錯愕的畫面其實已記錄了國民黨政權處理災難的態度：粗疏、傲慢、不尊重生命。這樣的一個政權，人民很快用選票予以嚴厲的懲處。

政權舊換新，問題新如舊

新政權誕生了，災區彷彿在新舊更替中找到了一絲希望，一線曙光。然而，921 地震屆滿一週年了，政權舊換新，問題新如舊。「全盟」在週年前夕又做了一個民調，民眾對新政權重建工作的評價是 59 分。新舊政權，一分之差。新總統陳水扁參與 921 週年活動，指出：比起日本政府處理阪神地震的重建，台灣政府毫不遜色。其自我感覺與李登輝相較，顯然也毫不遜色。

陳水扁政權救股市急如星火（國安基金殺進殺出），救房市出手豪闊（3200 億優惠房貸一舉拋出），就連同屬民進黨的「新世紀國會辦公室」也揭露新政府對財團緊急紓困，僅長億集團就是動輒 260 多億元的貸款優惠，災民的家園重建卻迄今申貸無門。921 週年所帶給我們的訊息是：掌權者改變，政權性質卻是一成不變。

1789 年法國大革命後，發表了人權宣言。其前言指出：「對人權的無知、遺忘和

忽視是造成公眾災難和政治腐敗的唯一原因。」目前921災區人民的狀況是：居住權、工作權、財產權、受教育權……都受到程度不等的遺忘和忽視，在土石流、邊坡落石嚴重的山區，居民甚至已喪失「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們認為，對這些基本人權的持續忽視，將會造成更大的災難和腐敗。

其實，如果根據盧騷的說法，根本沒有什麼「自然天災」，一切災難都有人為的因素。災難通常是由意外和脆弱性所構成的。以921來說，自然的意外固然存在，卻是由於官方管理和建商道德的脆弱，才會釀成死亡2千多人，10萬房舍損毀的重大災難。而不同的政權屬性，不同的社會性質，也會決定災難擴散的幅度和蔓延的時間。在一個以自由市場、以開放競爭為基礎的社會裡，災民因受災而在社會經濟基礎上更為弱勢，更缺乏競爭力，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忽視。一個以金融、建商、企業集團的利益為第一優先的政權，弱勢者的問題永遠是在「不得不處理」時，才會進入施政者的工作排程。

弱勢者、受災者應該積極思考的是：要如何擴大行動、製造問題，讓當權者陷入「不得不處理」的境地。★

新政府舊絕症——「愛『資』病」

災 盟

災區重建已經走了一年，在這屆滿一年的日子前後，政府迫於媒體的消費、嗜血性格，勉強配合著媒體的需要，勤於下災區走秀，彼此心照不宣的共同演出一場「九二一週年祭」。於是，大小政府官員在鏡頭面前開始「體恤」起災民，並開始痛陳一年來災區重建的「牛步化進度」；同時，媒體也開始扮演起「第四權」的角色，隔靴搔癢的到處揭露一年來災民處境的不堪，用以指陳新政府對災區重建的不力與對災民的忽略。

然而，庸俗低能的台灣媒體對於災區問題的攝取，往往採用廉價的「道德性」批判或訴諸「溫情式」的報導與揭露，因此，災款濫用並使得災款無法有效到位，遂成為震災一年後的最大重建弊案；重建行政效率推拖拉更成為重建過程中向下沉淪的力量。是故，不管是災款濫用或者是行政效率等等，災區重建的問題核心就輕易被嫁接轉化成「行政官僚」的問題，最後，阿扁出面痛斥新政府裡頭所充斥的舊僚氣並為新政府中的舊官僚心態道歉時，新政府的對於災區重建的責任，相當程度就被轉嫁至舊政府身上。混淆視聽的手法，再次讓災區重建問題的本質被模糊化。

事實上，災區重建遲遲無法有效「啟動」，當然有其結構性制約，尤其以改革號稱的新政府，在本質上與舊政府無異，這才是目前災區重建遲遲沒有進展的主要原因。

從新政府對於社會資源的分配看來，可以發現其對於社會資源的分配邏輯與舊政府無異，皆是厚「此」(資本家)薄「彼」(普羅大眾)。當地震發生後，政府所規劃的災區重建貸款的利息補貼為1,000億，但是上個月阿扁為了拯救低迷不振的房市，一下子就喊出3,200億的優惠房貸。從民國82年至88年，國民黨總共提出了3,250億的優惠房貸措施，到了阿扁上台之後，一次就提出3,200億，可見新舊政府對於營建財團都相當在意。對比起重建貸款的補貼即可見政府的盤算。新舊政府這種幫明目張膽的幫建商套利的做法，3200億的優惠房貸措施，並不能真正讓台灣的房地產合理化、讓需要的民眾享有住宅空間。相反的，「優惠房貸」是短期地幫建商解套，長期地為不合理的「高房價」背書。根據，台電以用電不及底度的方式所做的空屋統計(用電表燈不及底度的戶數)發現，早在民國八十年代，台灣的空屋就已經達63萬戶，至八十四年底的空屋數更一舉攀升至九十萬戶的歷史新高；到了八十七年底的空屋量更逼近百萬。因此，房市目前是供過於求，但是房價卻高居不下，3200億成為新政府維繫「高房價」，間接圖利建商的舉動。

更何況，民代向銀行施壓，將銀行的優惠配額釋放給建商的人頭戶的情形，早就相當普遍。事實上，央行為了撐起高房價而致的低迷房市，早就從民國八十二年、八十四年、八十五年、八十七年、八十八年陸續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各行庫辦理優惠房貸，總計高達3250億元。但是，卻對房市的拯救並沒有幫助。可見，「新舊政府」都是「舊政權」！！

再者，自從台灣八零年代中末期，土地炒作以及營建業作為民間游資投機急先鋒的一支，進入到九零年代中末期因過度炒作而呈疲態，再加上九八年歲末亞洲金融風暴的重創，已有搖搖欲墜之勢，因此，若對於營建財團的鬆手，無異是挫斷本土金融業與營建業的共生臍帶，這將對於政權的產生重大衝擊。因此，拯救建商財團是政權維繫的必然做法，小心翼翼地呵護牽一髮動全身的房市和股市，會成為新政府念茲在茲之所在。

是故，最好的「一兼兩顧」的重建策略，即是讓災民用一千億的利息補貼，來重新置屋，一方面解決災民的「家居問題」，更可以順勢不無小補的解決乏人間津的房市低迷。的確，從九二一大地震發生以來，1000億的家園重建優惠貸款只貸出了280億左右，並且裡頭高達7~8成都是「重購貸款」-亦即，鼓勵災民購買第二間房子，直接幫助建商消化掉手頭上多餘的空屋。因此，在第一棟房子的舊貸款壓力下，購買得起第二棟房子(或者身價夠-即有足額擔保品或擔保人，讓銀行覺得安心可回收)的災民，往往只是少數，所以走進災區，災民最大的抱怨通常是貸款貸不到的問題。

因此，缺乏社會正義考量的重建政策，是這些因地震而成爲弱勢的災民最難以跨越的斷層。面對長久以來，地價高飆、房屋仲介業炒作、銀行超額貸款、建商以案養案等，土地、營建與金融資本不當勾結，所造成的房地產結構不合理、投機歪風高揚、經濟體質虛化的問題，號稱「改革」的新政府，不但未從根整頓，尋求合理與治本的措施，反而逢迎昧俗、變本加厲。這兩個月來，我們看到阿扁政府對解救股市、銀行與土地等炒作資本的大手筆投入，從調動勞保、勞退、郵儲、退撫等四大基金3349億元進入股市護盤，搶救財團被套牢的股票，到3200億元的「建商解套基金」，再回頭看看災區重建貸款的重重障礙，可知新政權的舊絕症 - 「愛『資』病」，並沒有因爲新舊政府的替換而有絲毫的差異。這是一年來，災區重建遲遲無動靜的本質性矛盾。 ★

真不如明末清初！

李文吉

【一】

清朝初期的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4年），黃河潰堤氾濫，毀屋死傷慘重，百萬饑民四處乞討。康熙命四王爺胤禛（也就是二十年後繼位的雍正皇帝）南下修補堤防與賑濟災民。胤禛清點之下，庫銀只剩二百多萬兩銀子，極爲困窘，無以救急。

胤禛到揚州向巡撫以下官員與富商募款，遭到百般刁難。胤禛抓住皇室、官員與富商之間勾結的把柄，威脅恫嚇之下，弄到幾百萬兩銀子，逼富商施粥發糧，修了堤防，更預防一場可能爆發的民變：「老百姓沒房子住，沒有田可種，明年沒收成，都還忍得住不會造反，要是讓他們餓到啃樹皮、易子而食，四處流竄，大清皇朝可就不保了。」康熙說。

到了五千年來空前富裕的寶島台灣，官府財政赤字高達三千多億元，921地震發生，來自民間的善心捐款高達三百多億元，一年下來，賑災、重建的結果呢？幾萬災民告貸無門，重建無望，而偷工減料的建商——倒塌的民房、學校、衙門、橋樑、道路的製造者——逍遙法外，驗收的營建官員沒聽說誰有責任，更無送法辦的。連官辦的學校校舍還好意思讓慈善團體動用善款幫忙蓋，這也罷了，爲了促銷呆滯的房地產業，官府推出幾千億元的「優惠貸款」，幫財閥賣房子繼續吸金。

唉，官府搞到這個地步，要是康熙、胤禛再世，目睹這些怪事，會怎麼說呢？是不是說：「還不如明末清初啊！」

【二】

話說康熙的四皇子胤禛南下揚州募集修堤與賑災款項，各級朝廷命官貪贓枉法、江南鹽商富可敵國，卻都一毛不拔。胤禛用什麼巧計逼他們幾十萬兩、幾十萬兩的拿出來？原來，他們都是八皇子的「門人」，八皇子幫他們遮蔽搜刮民膏民脂、逃漏稅賦的罪行，門人則幾十萬兩幾十萬兩的供養八王爺。因而他們恃寵而驕，盛勢凌人。

八王爺在朝掌管戶部國庫，國庫稅賦不足，朝廷文武百官又騰挪借支數百萬兩銀子，抵死不還，號稱康熙盛世，而腐敗窮窘至此地步，八王爺得擔負大部分的「政治責任」，故渾不願東窗事發。胤禛料到八王爺會以密函警示門人搗亂，早早派兵把守揚州進城各條通道，而將密函攔截下來，並藉以要脅官商慷慨解囊。

山東、河北百萬災民饑民聽說揚州官府施粥，不遠千里蜂擁而至。胤禛令親信到富商門前懸掛「樂善好施」燈籠，並放出流言：只要不偷不搶不殺人放火，放心吃喝，還派兵維持秩序。

康熙與胤禛明瞭帝國病灶，決心澄清吏治，適逢邊疆異族造亂，國庫卻是空虛依舊，百萬雄軍竟無糧草軍餉出關清剿。胤禛再度清查國庫，發現上至皇太子、國師，下至巡撫、游擊文武百官都藉餉未還，薪俸微薄不足以應付京城開銷而借支的固然有，也有拿來購置毫邸巨宅、放高利貸的。康熙下詔限期一個月內追繳完畢，胤禛得罪大部分弟兄與權貴，逼的他們變賣家當，還是只追回半數。連康熙都拿出一百多萬兩大內庫銀（皇帝自己的家用），為開國重臣還債，也替借錢編修《古今圖書集成》的三皇子還了二十幾萬兩。

胤禛原本要求十三皇子一起追繳欠銀，康熙要他一人承擔大事：「朕就是要你成為真正的孤臣。」只有才德兼俱的孤臣不會因循苟且，做爛好人，才足以繼承皇位，因為要當個盡責的皇帝實在是艱辛痛苦。雍正繼位後日夜操勞憂心國是，在位即十四年積勞成疾、死於案前。雍正勵精圖治，為後繼的乾隆皇帝奠下基礎，乾隆在位的六十幾年，大清帝國才真正成為世界大國。

立委、省縣市議員、各級民代在各行庫貸款呆帳，恐怕不下數千億元，財團的融資借貸，明的暗的也數不清多少億兆元。追討？從中央到地方的預算案，鐵會被刁難、擱置。派誰去追繳？監察院的現代御史大夫？新政府的央行總裁？還是阿扁親自出馬？海軍買軍艦的回扣高達數億元，公共工程的層層回扣高達六成。橋斷、路崩、校舍、衙門應聲全倒，誰能相信災後重建的品質？再震一次，會不會應聲全倒？答案好像很清楚了。

不知萬里長城、洛陽橋、紫禁城千百年來，是否全倒過？雍正地下有知，也要大嘆：「真不如明末清初！」。請托夢給阿扁如何當個盡職的好皇帝吧。★

註：本文史料參照大陸中央電視台製作的四十四集連續劇《雍正王朝》。

卡斯楚 在聯合國千年峰會上的演說

（杭新、安東、墨石 譯）

我們這個世界充滿著混亂，無論是在各國內部還是在國與國之間。一些盲目的法則被奉若神明，向我們許諾可以帶來我們這個星球所急需的和平、秩序、福利和安全。這就是他們要我們相信的。

三十來個發達而富裕的國家壟斷著經濟、政治和技術權力。它們和我們一起參加這個聚會，並向我們兜售更多的這類處方。這些處方只能使我們更窮，更受剝削，更受制於人。

聯合國誕生在半個世紀以前，那時世界上只有不多的幾個獨立的國家。這個舊機構需要根本的變革，以成為地球上各民族利益的真正的代表——那裏，沒有人可以擁有氣人的、反民主的否決權；那裏，可以有一個透明的過程來擴大安理會成員並使其更具代表性；那裏，安理會將是一個從屬於聯合國大會的執行機構，只有大會可以在諸如干涉或使用武力這樣的關鍵問題上做出決定。然而，這樣的討論幾乎沒有。

有一點是必須明確說明的，那就是，我們不能犧牲主權的原則去容忍這樣一個被濫用的和不公正的秩序：由具有霸權性質的一個超級大國憑藉其權勢和力量來支配，從而由它自己來決定所有事務。這種秩序，古巴絕對不會接受！

絕大多數國家普遍的貧困和不發達，以及在世界範圍內財富和知識分配的不平等是當前各種衝突的根本原因。有一點是不能被忽視的，即：目前的不發達和貧困是由殖民強權對這個地球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征服、殖民化、奴役以及掠奪，再加上帝國主義的出現及其對世界的重新瓜分激發的血腥戰爭所造成的。今天，他們有道義責任對幾個世紀以來給我們這些國家造成的損害作出賠償。

人類應該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到今天為止是什麼狀況，以及我們不能繼續這種狀況。目前，我們人類已經擁有足夠的長期積累起來的知識、倫理價值以及科學資源來向一個真正公正和人道的新的歷史階段前進了。

現存的經濟和政治秩序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真正服務於人類的利益的。因而，它是不能長久下去的，必須加以改變。僅需指出：世界人口已經達六十億，其中百分之八十生活在平困之中。在第三世界，一些古老的疾病如瘧疾、肺結核等致命性疾病還沒

有根除，而新的瘟疫如愛滋病，正使得一些國家的整個人口面臨滅絕的危險。另一方面，富裕國家卻在不停地投資於軍事和奢侈品，以及投入貪婪的、瘟疫一般的貨幣、股票和其他各種實物和虛擬的的投機，每天價值上萬億美元。

自然環境正在遭到毀滅。氣候的惡化就在我們眼前發生著。食用水越來越遭到污染，而且越來越緊缺。人類的海產食品面臨枯竭，重要的非再生性資源被浪費於奢侈和無關緊要的事情上。

任何人都懂得：聯合國在緊迫的新世紀的基本角色，不但是使世界免於戰爭威脅，而且是使世界免於停滯、饑餓、疾病、貧困以及人類不可缺的自然資源的毀滅的威脅。世界需要及早挽救，不然就來不及了！

對許多人來說，有一個真正公平的、合理的規則來指導人類的前途，簡直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然而，我們相信，明知希望渺茫，仍然堅持鬥爭，這應該是今天讓我們來到一起的聯合國的座右銘！

謝謝！

★

(轉載自《中國與世界》：www.chinabulletin.com)

馬克思的幽靈在墨爾本徘徊

——墨爾本反世界經濟論壇會議運動紀實

雪梨

去年十月，美國西雅圖的反世界貿易組織集會，猶如春雷巨響，驚醒了世界各地反資本主義陣營。之後，這支隊伍猶如紅軍般隨處征討，緊追著世界百大鉅富的集會不放。緊接著，今年四月在華盛頓發動反世貿組織與世界銀行示威，以及九月二場反世界經濟論壇示威，一場是澳洲，另一場在葡萄亞。這股力量雖教派林立，各不妥協，但也能異中求同，化約成最大能量的統一戰線，集體炮打全球大鱷所壟斷的資本主義。

在澳洲，繼百萬人上街，抗議阿華德政府不願向原住民和解的運動後。由進步組織聯手策劃的反世界經濟論壇會議運動，在今年九月南半球的春天，於墨爾本世界經濟論壇——亞太高峰會議場外大展身手。

本文將就世界經濟論壇的形成與內容，介紹給台灣的讀者，希望對台灣的左翼運動有所啓示。

背景介紹——新自由主義的崛起

世界經濟論壇會議(WEF)被形容為商業界的奧林匹克競賽。從9月11日到13日在墨市賭城舉辦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共有800到1000名全球跨國公司的總裁到場,著名的有Microsoft、Nike、BHP、Boral、Coca-Cola、IBM、McDonald's North Ltd、Rio Tinto、Shell、Westpac、Telstra等,這些企業也是贊助雪梨奧運的超級廠商。此次討論的議題,有澳洲與世貿組織關係(澳元下跌是重點)、台灣與中國市場的關係、世界貿易規則的設定與實施、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市場、區域市場保護問題、電信與網路產業、亞洲經濟現狀等問題。環境保護與反全球化議題,也納入議會的討論議題,像立論"全球化就是新殖民主義"的印度學者Vandana.Shiva到場報告全球化造成世界的災難所付出的代價。澳洲ACTU(澳洲全國總工會(主席Sharan.Burrow)亦出席會場,警告當場參與世界論壇的老板們要有道德良心。沒想到事後,帶有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的澳洲媒體竟然把這二名勇敢的女性說成歇斯底里。

世界經濟論壇形成於1987年在瑞士多叻舉行的年度歐洲經營論壇,此次會議由歐洲商會出資,爲了達到全球性資本擴張的目標,會後積極拉攏其他地區跨國公司加盟會員,組成了一千個全球壟斷資產階級聯盟,定期在世界不同的城市開會。此外,此聯盟衍生多種政經合爲一體的俱樂部,如:"全球成長公司"、"三百工業巨頭"、"三百未來全球領袖"、"世界經濟領袖"、"世界媒體大亨"、"全球文化首領",還有由學術團體和各國經濟研究組織組成的論壇榮譽會員。

右翼學者認爲1971年的"世界國家論壇"戲劇性的增進企業的聯合,1980年代加入新興發展國家,OECD國等成員,成功打造了新自由主義時代。新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組織起來推翻社會主義的藥方。古巴總統卡斯楚在《新自由全球化與第三世界》一書中分析新自由主義的論述,包括透過資產階級法律與軍事暴力,主張撤除所有國家的國營企業,並瓦解其工會實力。其二是發達國家慣用貿易的多邊協議等手段,讓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但是卻限制第三世界國家進入其市場。具體而言,發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策略,就是聯合服務、資訊科技、生物科技和電信科技等發達科技,強迫解除第三世界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管制,享受高額利益。相對地,發展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其農業和紡織品部分的談判卻無法解除管制,因爲對發達國家而言利潤太小了。

新自由主義並非單純的經濟行爲,它是整套的意識型態與政經勢力合盟的產物。著名的右翼歷史學者福山,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打手,他膽大妄爲的向世人宣告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可笑的是,他在西雅圖事件期間,像瘋狗般的向社會主義者叫囂,無非表示他的學術信譽遭到破產。另一種新自由主義的企業家典型;國際貨幣炒家索羅斯透過其基金會,藉由溫情主義干預東歐共產國家政策,並滲透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價值,無奈的是當他碰到馬來西亞的國有企業維護者馬哈地、代表中資利益的香港太子幫集

團,也大嘆新自由主義並非萬能丹。還有,壟斷資產階級的國家代理人如賒齊爾主義、雷根主義的私有化政策,將公有資源轉化私有資本,是執行新自由主義運行的龍頭老大,但是,其私有化政策遭到其國內政敵的大力抨擊,也是世人皆知的事實。左翼在前幾期刊登過幾篇關於中國姓資或姓社的辯論,毫無疑問的是,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與國際壟斷階級千絲萬縷的臍帶關係,是我們重新做功課的前提,這個龐大複雜的社會關係,並非民族主義所能理解的。世界經濟論壇從1970年代至今,資本的積累,殖生出壟斷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其階級利益左右著世界的政治議程,世界經濟論壇就是在此脈落下形成的產物。

全球化課題

全球化意謂著壟斷資產階級對世界市場的爭奪。這並非是學院派高深的頭腦體操,馬克思早在1847年在<共產黨宣言>中便提出:"世界市場引起了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工具的大規模發展。這種發展又反轉過來促進了工業範圍的擴大,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發展,資產階級也發展了。它越發增加自己的資本,越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都排擠到後面去了。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生產和交換方式多次變革的產物。"若要描述當前全球化現狀,我們只要將飛機,衛星,電信網路的發展填充上述馬克思分析的架構中,就能清晰地認識到當前階級剝削的關係。

回顧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階級鬥爭的歷史,列寧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一書中提到,"半世紀以前(指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寫資本論,當時多數的經濟學家都提出自由競爭是自然法則,官方社會科學及其共謀的學科,極力撲滅馬克思從理論與歷史角度分析資本主義證實了自由競爭提高生產的集中,以及緊接著的發展階段就是壟斷。"列寧繼續指出,壟斷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歷經三個階段;(一):1860年到70年自由競爭發展的高峰,可清楚看到壟斷的雛形;(二):1873年經濟危機後,企業聯合發展了一段時間,暫時還看不出所以然,可是資產階級蠢蠢欲動;(三):一九世紀末的經濟繁華和1900年到1903年的經濟危機,企業聯合已經成爲整個經濟體的基礎之一,因此資本主義被轉化成帝國主義。列寧的這套分析,對於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有著歷史性的指導意義,各地風起雲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反殖民主義運動和反資本主義運動,多多少少和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有關聯。同樣地,這套理論也適用於這個時期的資本積累所造成的壟斷。

或許讀者會提出疑問,難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二十世紀戰勝社會主義,不就說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革命的後果只不過是破壞生產力。然而事與願違,壟斷資產階級爲了要搶奪新的世界市場,大量破壞了舊的市場,他們才是破壞大量的生產力的元兇。Van der Piji 認爲現在的資本型態才是"真的國際壟斷資本",Hans Peter Martin

和HeraldSchuman等人認為新自由全球主義就是獨裁性質的市場，。自1995年1月世界貿易組織(WTO)設立以來，透過136個(即將包括中國(國內資產階級委員會(民族國家，為資產階級關稅，物流與跨國資本投資服務，其功能便是控制與保護全球資產階級在分配領域的利益。

具體而言，全球市場的壟斷已經呈現著人類生存的危機。以農業部門為例，前面提到印度學者Vandana.Shiva，她認為全球化對多數世界人口沒有好處，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盜用保護(Protection)與自由(Free)的措辭手段，為其經濟利益服務，枉顧蒼生百姓的存活。她以1966年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綠色革命"與現在的蒙那塔種子公司所發展的"基因食物"為例，她認為這是一場全球的竊盜案，擁有資本的白人跨國公司(科學家是共謀)，強奪了窮國的最後資源，並且祭出資產階級的法律暴力GATT(關貿總協定)，完全壟斷第三世界的食物生產。

全球化造成第三世界債務增加，使得窮國無能償還債務，國內社會與生態安全網路瓦解，每年死於可癒治疾病的兒童有1700萬人，遭受愛滋病侵襲的人數有3600萬人。依據聯合國估計，每年只需花四百億美元，就能改善人類飲水，基本營養需求，教育和其他的需要。但是這些國際霸權卻用來打戰(例如北約打南斯拉夫、美國對付中東國家、聯合國部隊聯合澳洲軍隊干預東帝文、英帝國干預非洲辛巴威)。在歐洲和美國高達20%的兒童是在貧窮線以下。比爾蓋茲的個人財產有850億美元，等於美國40%人口的財富。總而言之，資產階級的全球化就是40000個人控制80%的世界貿易，20%的發達國家人口，享受全世界勞心勞力者所生產的成果。

在澳洲，自認自己是像澳洲樹熊一般幸福無慮的澳洲人，不得不警覺到全球化已威脅到其生存的權利。以澳洲工人階級為例，Pat.Brewer分析私有化實行近13年以來，對澳洲工人發生的影響是：(一)實際利益的減少：國家總收入從74%降至63.3%，短少了4000億澳元。(二)社會工資的降低：所謂"社會工資"影響的部門包含醫療，教育，住房，老人與兒童照顧，這些社會福利系統逐漸瀕臨危機。(三)稅制：公司稅與關稅降低，但大眾所負擔的稅卻增加了。(四)失業率：多年維持8.5%不下。(五)工會權：反工會法的制定，讓實際工會人數下降，工人的團結權受到威脅。

運動的形成與對西雅圖的反思

澳洲戰後社會運動的高峰是在反越戰期間，社會主義者所發動的原住民運動，反種族運動，女性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致使社會主義陣營曾經有過非常強大的結盟。不幸的是，由於國際左翼的分歧，遂分出支持史達林的澳洲共產黨、反史達林的托派、支持中國的毛派、以及維護安格魯薩克斯社會福利正統的工黨。八十年代，澳洲左翼的低迷，與當時世界的反革命氛圍息息相關，但是經過十幾年私有化政策的衝擊，再度團結了這些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工黨擁有較高的支持者，但是越來越多的左派與工人

已經不耐煩澳洲工黨的妥協路線。比方說,工黨的國會議員,在工會法案的修訂過程中出賣工人。

墨爾本反世界經濟論壇的組成,有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青年反抗組織、共產黨、國際馬克思主義者、托洛斯基派、安那其無政府主義派、女權主義組織、左翼同性戀團體、世界救援團體、綠黨、地球之友、進步教會、工會組織、各大學進步社團組織、教授團、律師團、文化團體、還有墨爾本的中學生反抗組織等成員發動。這些團體在"關閉世界經濟論壇"的號召下,運用了各種網路工具,成功動員近二萬人參與(註)。

以往新左翼運動者與傳統左翼運動者決裂的理由之一,是新左翼運動認為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不尊重內部差異,不應只看重以工運為主軸的革命領導路線。在這場運動中,我觀察到這個運動充分尊重各個團體的主體性,亦不存在壓抑性別、個性與藝術表現,將左翼文化的創造力發揮的淋漓盡致。我曾參加雪梨的宣示集會,當晚參加的人數近千人,其中從老到少,各種性別立場與政治宗派,熱中討論如何戰鬥,會場存在不同的運動策略與立場,在眾聲喧嘩之中,舞台前方斗大的"勇於鬥爭,勇於勝利"的口號,襯托出當晚革命的氣息。

在三天的示威活動之前,這些組織早在半年前,已在墨爾本、伯斯、阿德雷、雪梨、布理斯本、達爾文、坎培拉等各大城市舉行了各種集會與訓練。集會的內容主要是討論全球化問題,而訓練的內容則是社會主義基本概念和西雅圖式的戰鬥要領。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操,以往在台灣的經驗,不是那麼全面,因此台灣革命青年的世界觀之養成教育過程較為片面,以下是以澳洲一個社會主義團體的課程設計為例,僅供參考。

第一天:

◎革命刊物的歷史◎俄國革命歷史的教訓◎工會與學生會操作規則◎今日該如何幹革命◎團結世界革命與如何在澳洲進行革命◎安那其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策略的辯論◎婦女的原始壓迫◎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分離◎婦女與革命:為何阿華德(澳洲總理)害怕女同性戀與單親媽媽;

第二天:

◎印尼的革命運動◎羅莎盧森堡學說◎革命政黨的辯論:改良主義與革命的辯論◎難民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是什麼?◎如何成為基進的活動家?◎社會主義與原住民解放。

以上這些課程都是以工作坊的民主討論進行的,沒有上對下的權威填鴨式演說。接著是西雅圖式的戰鬥要領傳授,我想在西方社會生活過的人都能感受到他們對技術

方法(knowhow)的講究,比方說每個城市的地圖手冊,每條街頭小巷標號標得清清楚楚,以這次雪梨奧運為例,雪梨工黨政府動員大量的社團、義工與遊客的關鍵也是將操作手則搞得一絲不苟,或許這跟他們工業化的規訓有關,但是住久了,反而懷念前現代社會的社會關係,那種靠心靈體會的意境。有趣的是,這次墨爾本之役對knowhow的掌握竟然與工業生產的方法也不相上下。舉例而言,墨爾本總部爲了要安頓來自各地方的學生的住宿與交通問題,特別印製地圖與各種墨爾本的住宿聯繫方式,有些窮學生負擔不起住宿費,就安排在工人接待家庭,我就是住在此類的工人家庭,他們除了熱情招待外,還以同志(comrade)尊稱。

介紹墨爾本事件之前,有件重要的總結工作,那就是對西雅圖戰役的反省。西雅圖鬥爭的主幹,轟轟烈烈的幹完後,便在全世界傳授秘訣,他們也早在半年前來到澳洲,比方說美國安其那主義的大師,同時也是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喬姆斯基就來此地佈達無政府主義的教義。其他如環保組織、工會組織、社會主義政黨那就不用說了。值得提出的是印度經驗,印度參與西雅圖戰役的運動者,在戰役後,便在印度邀集農民團體、工會團體、婦權團體、環境團體,舉行反資本主義團結大會。

西雅圖戰役的成功,是跨議題、跨組織部門、跨各種邊界的一場小革命。Vandana.Shiva分析到,過去五十年的運動者都以議題爲導向,工人只管工人、女權主義者不會跨界、環境主義者只關心環境議題,他們分開進行談判,因爲沒有協同合力的觀念,更不可能提升到對政治的挑戰,所以越搞越狹隘,但是,在西雅圖事件中,縱使從第三世界來的農民與婦女代表只有一點點,但是大家團結在一起,顯露出運動的希望。

澳洲的進步團體對西雅圖戰役較爲深刻的反省有兩點。一是對"三天改變全世界的運動觀"路線的反省;二是對"民族保護主義"的批判。"三天改變全世界的運動觀"路線,主要是由黑色青年無政府主義者(安那其)領導,他們相信使用暴力可以改變世界,具體的做法是造成流血,或每到不同的目標物(例如麥當勞)進行破壞,他們不相信組織化,更不可能遵守非暴力運動路線是蓄積運動能量的根本。"民族保護主義"阻礙世界工人的團結,在西雅圖戰役中便出倪端,美國工會頭仔對中國工人的敵意,他們並非透過尋求第三世界的的團結改變現狀,而是利用資產階級的法條暴力,保護既得利益。

團體結盟和事件經過

前面已經提到了澳洲進步團體籌備墨爾本反世界經濟論壇的經過,接下來大致介紹這三天的活動點滴。上述提到發動這次運動的團體,總結出西雅圖的三大盲點:"三天改變全世界的運動觀"和"民族保護主義"。因此,孤立無政府主義,淡化澳洲總工會的所提出的"民族保護主義",成爲這次運動的總目標。另外反叛街頭表演秀與樂團演唱,亦圍繞在反資本主義主題。

"關閉世界經濟論壇"的實際做法,是封閉世界經濟論壇的五個出路口,這些出路口都由社會主義反抗青年團領軍,進行三天的人牆封鎖。其他團體如環保、工人、學生會、文化、女權、同性戀等組織則負責三天在墨爾本城的街頭示威與遊行。另外教授團和法律人士則進行意識型態的工作,在媒體和右派打筆戰。

"解放"與"紀律"是我在這三天感受到的運動氣氛,這場運動的特色是講究團體的紀律,但個性解放的傳統亦發揮出來,有些人渾身解術的將他們的身體用各種裝飾表達出來,比方說環境運動人士插滿了花草草和各種運動造型,有些人乾脆脫光衣服在街上讓警察追。

由此次反世界經濟論壇的集結,帶出一些問題的思考,例如:(一)公平貿易是解決失業的良藥嗎?(二)社會徵稅制能否幫助第三世界工人?(三)如何保有工資和職業?(四)失業了怎麼辦?(五)環境與社會正義(六)原住民問題(七)性別與階級,我想待以後提出看法。

結語

未參與澳洲的左翼活動之前,我的精神長期陷入一種萎靡的狀態,盡管自身警覺到這非個人主義的精神病態,但是置身於新興發展中國家經濟理性的統攝下,社會主義理想與實踐顛波曲折,我幾乎找不到人生的出路。但是,這段期間參與澳洲左翼社群的各種討論與示威,讓我的精神狀態復活了起來。

我想,引入以下的一段話,說明我對本世紀初澳洲左翼團體的表現。德國哲學家瓦特·班杰明(Walter Benjamin)在〈圍繞在歷史哲學的課題〉一文中提到,歷史唯物主義者應該意識到"快樂的概念,不容置疑與實踐的概念是密切聯繫起來的,而且,聯繫著歷史的是過去的視野,過去獲得支持歸於實踐;但也是暫時的標記,這是先人與這個世代的秘密協議。我們的前途在人世間,就像每個走在前面的世代,我們被賦於解救被壓迫者微弱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過去的所有權,這個所有權非憑空得到的。"行筆至此,也許有人會質疑我對革命抱著太樂觀的看法,事實上,從2000年拉丁美洲左翼人士大聚集所形成的國際運動至今,當然存在著內部的差異與矛盾,而且困難重重,但是他們對革命的積極性,是希望之所在。我所擔心的是,過去台海兩岸強大的傳統民族主義的大金罩,不容易讓台海左翼人士面對當前國際的現實。

台灣左翼運動一路走來,隨著爭吵,栽贓,分裂,消失的過程,逐漸原子化與邊緣化,如果重新開始,重新團結未晚,我們過去也有過光榮的歷史。

勇於鬥爭!勇於勝利!



資本全球化下的三機關

世銀・世界貨幣基金會・世界貿易組織簡評

林 涯

廿世紀前半，二次大戰之前，世界權力結構中的主要矛盾是不足十個的資本帝國主義間的利益衝突。但二戰結束後，因為美國政、經、科技實力的一枝獨秀，膨脹迅速，加上被稱為「最後武器」原子彈的獨佔（雖然不久便被蘇聯趕上），戰後世界資本主義勢力的中心化體制很快地建立起來了。而作為它的國際政略工具的聯合國，也被賦與比其前身的國際聯盟更有力的運作條件。一元支配的資本主義安全體制（最盛時涵蓋著數十個政權）的對抗體，是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反資帝圈。該集團以高度的戰力組織率彌補次高的生產總值，雙方佯抗僵持展開冷戰一個年代後，東西對抗之外的南北問題逐漸形成。60年代開始，聯合國的議題上漸有貧富結構的分析和改善的聲浪出現。而美國為首的工業化先進國家，也逐漸視南北懸案的適度處理為東西對抗的必要條件。於是在聯合國大會上貧富國家間的激烈爭辯中，產生了以「開發援助」為方針的國際經濟合作總體系的形成。而世人熟知的三機構－世界銀行、世界貨幣基金會、及WTO前身的GATT國際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便成為世界經濟結構體中的核心動力了。

資本主義經濟原理之優於封建年代的直接掠奪方式，表現為Give and take的形式「對等性」，且經常被刻意突顯其前半部。如61年第十六屆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第一屆聯合國開發十年案」，64年的「聯合國貿易開發會議」UNCTAD，70年代的「第二屆聯合國開發十年案」等，都是強調「通過國際合作糾正日益顯著的南北經濟差距」為宗旨。但因為整體結構中所內包的資本主義基本性格，亦即，先進國（主要的支援國）的基本立場還是自我增殖第一，致使幾個政策階段下來實質效果非常有限。倒是受援國方面因為各自的基礎條件，傳統要素，及國際處境的不同，約在70年代起，在南方世界中出現了分化現象。有新興工業國，準新興工業國，最貧後進國等，所謂的「南南格差問題」廣泛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面對著這一類複雜化趨勢，上提的三機關功能不彰，業績乏善可陳，甚至時而搞出錯誤政策，逆向措施（如70年代以降幾次區域性金融風暴，通貨危機），頻頻引發爭議，迄今不曾間斷。

按聯合國架構下的兩次「開發十年」企劃案，在其立案和執行過程中必須面對三種不同層次的問題。一為具體開發項目的策定；其次是有關制度和結構的改善配合問

題。這兩方面基本上屬於技術性質，行政性質者多。至於另一更高層次的，如國民經濟的體制論，發展戰略，或整個發展援助計劃的主導理念等，在受援國和援助國(機關)之間，更是時有爭議。但後來的裁決，還是不可能違背當前世界經濟的主流立場——現代化便是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的發展應以自由化國際化的開放型建構為主要內容。

經歷了半個世紀「開發援助」的大課題，有關世銀、IMF、WTO三機構的功過評價，在國際財經專家，政府民間研究人士，聯合國官員等方面，可以說爭議紛紛。兩年來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各種會議，不論是世界性的、區域性的、官方的、民辦的、窮國集團的、富國俱樂部的，所暴露出來的共同問題表示著(不論表面措詞如何)由少數富國以長年剝奪的成果的一部分意圖修補受剝奪者的困境是如何的艱難。而從另一角度看，那也是一種極富反諷意義的「資本全球化」百態之一吧。

90年代後半起，在開發援助的工作領域中，漸有設計及執行上的「先進國模式化」的主張。前面已提，開發援助企劃一向有三種構成部分。第一是具體項目，第二是制度配套，最後是指導原則。而執行機關如世銀、IMF等，常以「受援國在制度及政策方面的缺憾」為執行失敗的最大理由。大事主張在這方面先行改善、而改善的內容卻是先進國方式的合理化。他們認為只要在歐美型經營系統、國(公)有企業民營化、對外貿易自由化等三方面能達政改善目標，其他屬於第一部分的如：產業選擇、技術導入、基本建設等便可水到渠成，自然完成。

80年代的開發政策，一般都以宏觀經濟安定化，和重點式的結構調整為主。但90年以降，出現了所謂「開發理論柔軟化」的口號。正是重點轉移的信號。95年6月間，新任世銀總裁瓦勞遜指出過去偏重宏觀經濟是一種失誤。代之推出「綜合性開發機構」CDF制度。依據規定，該機構應包括：(a)受援國政府代表(b)民間社會代表(c)NGO(非政府組織)(d)民間中心設施(e)援助國(機關)代表。據報導現時已經有玻利維亞等十二國家接受CDF制度。99年9月召開的世銀、IMF年度大會，以重債務貧國HIPC的支援為中心議題。要求申請國提出「貧困削減計劃書」PRSP，後來且擴大範圍到非貧困國的其他性質的申請案。世銀計劃至兩千年年底有二十國接受，至2001年擴大到四十國。

以上概況中值得注意的是援助計劃中非政府部門參與的擴大，及推廣速度之快。不得不指出，具有一種越過受援國政府直接和該國民間勢力掛勾的，說得上「內政干涉」的典型方式。據云玻利維亞提出的一份PRSP，內容空疏、缺少一個內陸國家應有的殖產戰略，運輸基建的具體藍圖，令觀察家不解。CDF、PRSP的製作需要高度的專門知識和大量資料。有的貧困國家不得不雇請外國專家執筆來應付規定。除了配合

宣傳新制度外究竟有多少實際意義，令人懷疑。不過資本全球化除了必須跨越國家疆域外還要壓服國家主權的傳統權限，至此可見一斑。所謂的國際合作開發體系，其實也是先進國對落後國的操控環節之一，其所呈現出來的是全球強勢資本的循環圖的一個側面，倒不無啓示意義。

在WTO方面，有關貿易自由化的原則，一向使得先進國落後國之間的矛盾對立愈來愈突顯。現已參加的開發中國家，在烏拉圭回合初階段的自由化推動時期本來還抱有一定的期望心理。但幾個年代下來大家都有受騙的感覺。因而在入會前的新舊會員多邊交涉中，顯得防衛意識特別強。使得尚未入會的準會員國遭到很大的壓力。

現時 WTO 加盟國共有一百三十七國，承擔著世界貿易的九成以上。未加盟的國家或地區，除了大陸、台灣是因為政治性理由外，還有被列為：(1)最貧國；(2)經濟規模特小國；(3)九〇年代轉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向國」等。

參加後的有利點，一般認為有：(1)能防止對手國的不當差別待遇；(2)誘發國內改革；(3)容易處理貿易糾紛。

不利點則有：(1)準備不足冒然參加，將使部分產業陷進危機，失業增加；(2)可能面臨外來的經濟支配。

未參加國對WTO的實情一般都認識不足。往往出於焦急感而在入會前的交涉過程中接受不當的要求。現時申請國的不利甚於既往，如：

(1)加盟手續愈來愈複雜、冗長，有時超過未開發申請國的官方處理能力。首先要製作一份本國經濟體制的說明書，要按照規定的格式；

(2)要受理來自加盟國的大量質疑事項。件數通常數百，有時上千；

(3)要派遣人員常駐 WTO本部（日內瓦）、派遣海外交涉團、參加交涉對手國的作業部會，開銷可觀，使窮國財政不勝負荷；

(4)WTO加盟條件沒有明文化，近來已加盟國提高入會前的開放要求項目，甚至與WTO協定無關的項目也以「WTO + n」的形式提出。如：價格自由化、國企民營化、降低輸出稅等等，其他像礦工業品關稅稅率、項目連結率、削減期間等，常常被要求接受更嚴厲的條件。有時也被要求參加特定品目的，先進國水平的相互撤消關稅的協定。更有如，有關輸出補助金、服務貿易、貿易關連投資措施協定（TRIMS）、貿易關連知識所有權協定（TRIPS）、關稅評估協定、檢疫衛生協定、貿易技術障害協定等等。連加盟國都沒有普遍實施的種種規定，都會紛紛出籠，往申請國身上推；

(5)WTO本來有優待開發中國家的幾項規定和慣例，但幾乎不適用於新加盟國。以開發中國家身分加盟，在規定上應可享受：a)為了培育國內產業改善國際收支，有自

主規定特別關稅和輸入限制的權利（GATT 十八條）。b)先進國市場應開放給開發中國家的主要輸出品（GATT 第四部）。c)開發中國家輸出品之最惠國待遇（GSP）。但在現實上加盟前交涉過程中幾乎得不到這方面的承諾。部分已參加國在中國的加盟交涉中揚言不承認中國是開發中國家。美國更經常以國內法為理由破壞 WTO 的平等立場，對一些國家拒絕適用最惠國待遇（如賈克遜·巴尼克條例，對不承認移民自由的非市場經濟國家禁止給與最惠國待遇）；

(6)現階段的情勢是，入會愈晚，入會前的要求事項愈苛刻。逼得申請國常常在忍痛接受眼前的要求，或者，在談判上拖時間到最後還是接受更不利的條件，兩惡之間擇一。

總之，現時的WTO的加盟交涉中，已參加者的立場強，未參加者的立場弱。利用這種形勢，已加盟國尤其美國，常常為了本國商業利益，針對最貧國或體制轉移國提出嚴苛的事先開放要求。因而近來漸有聲音，為了使WTO加盟交涉更公平，應該做到(1)加盟條件明確化。(2)禁止提出「WTO + n」的要求。(3)恢復開發中國家的特別優惠。(4)已加盟國與準加盟國權利義務平等化。以上這些訴求，不過出於後進國落後地區的消極防守意識，尙未達積極反制的以弱抗強立場。然鑑於美國挾其數年經濟好景的氣勢，在政治上又常常擺出冷戰終結者的高姿態，開發中國家的微弱的抗議聲，一時間鐵定難有回應。

最後，後冷戰期的90年代以降，由先進核心國所推動的國際統合壓力，的確愈來愈加速。直到現在，從世界經濟的大趨勢疏離出來的貧困國家，或新型轉軌國，當其意圖參加全球化行列時，必須承擔的代價一年比一年繁重，道路愈來愈難走，現在的世銀，顯然比較關心形式和結構的統一性，而不再真正重視經濟開發的具體內容。

IMF對防範危機和處理危局、回穩化政策等三方面都失敗了。WTO無法在新舊加盟國之間訂立公平競爭的條件。這三種機關企圖把自由主義和對外開放的歐美式系統移植到開發中的落後世界。企圖以政經強勢剝奪落後國家的經濟自衛權。

但正因為當前的全球化推力，內包著資本主義的侵略本質和利己本性，剝奪者縱然一時仍以弱者的血肉繼續自肥，但跨國界的壓榨只能帶來國際級鬥爭的激化。以資本主義為支配性生產關係的現階段人類社會，因為資本主義的動力不平衡性，將導致不斷重構化的階級社會生活圖。則「多面向多次元的剝削關係」的全球化，必將導致多面向的全球性社會衝突 - 包括民族的、種族的、階級的、階層的，錯縱交叉的大小鬥爭能量的積蓄，恐怕正準備著廿一世紀的一場新史劇。而即使所謂「和平·發展」的時代基調未受全面挑戰，但資本全球化的吊詭機制下的和平與發展，究能承受多大的扭曲和變型壓力，也必定在多數關心世事的人們的深沉注意中！

石油糾紛之原由

俞力工

幾星期前，為反對汽油、燃料價格上漲而展開的抗議示威活動，由法國開始席捲了半個歐洲。如今，不但比利時、荷蘭、英國、德國的運輸界利益團體相繼響應，甚至也有經波蘭向東歐國家擴張之勢。

一年半之前，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長期低迷不振，最低時甚至達到一桶9美元的谷底價格，其結果不但導致石油輸出國家的財政困難，同時也阻礙對新油礦的發掘、勘探以及對其他能源、替代品及相關工業的研究與發展的投資。美國政府考慮到以上因素，並為了維持與波斯灣石油出口國家的良好關係，同時又擔心本國逐年下降的石油儲存量，於是在一年半之前對石油市場進行了協調和干預，結果促使石油輸出國家組織達成減少出口量，提高市場油價的協議。

協議達成後，市場油價不斷攀升，最高時甚至達到每桶 37 美元左右。儘管自今年7月以來又在美國的干預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同意增加供應量，使得目前的供應量已達到 40 年來的最高點，但國際市場的油價非但居高不下，甚至還發生搶購和進一步提高的趨勢。

在此背景下，中西歐的運輸界首先發難向其政府施壓，除了要求政府出面干預、控制油價之外，並要求政府降低燃料稅。

這次歐洲國家首當其衝，主要原因在於國際市場油價以美元計算和支付，在歐元匯率不斷下跌（已相對貶值28%）的情況下，油價上漲自然會使歐洲國家承擔雙重壓力。還有就是大石油公司均預估油價下降，不肯儲備太多庫存，因此當油價繼續高漲，冬天又即將來臨時，就不約而同地參與搶購。此外，最重要的是，近年來歐洲國家政府每每以促進環保、控制燃料消費為由，不斷提高燃料稅（平均提高達 50% 左右），使得運輸界大為光火。

就國際石油價格而言，在低迷不振的情況下，最大的受益者實際上是一滴油不生產、卻可從這種“特殊商品”身上大幅增加財政收入的國家。以歐洲國家為例，市面上每公升一美元的汽油裡就包含了 50 - 80% 的“特殊商品稅”。如果在此重稅之外扣除提煉加工費用，儲存費、運輸費、開採、設備開支等等，實際上輸出國家所得到的利潤極其有限。這說明為何許多歐洲政府在受到抗議壓力而要求輸出國家進一步增加供應時，遭到輸出國家要求歐洲政府降低稅額的反唇相譏。

石油，的確是種極其特殊的商品，不只是能夠起著阿拉伯神燈故事中巨人的作

用，為工業發達國家提供廉價服務，同時其控制權落於誰人之手，誰就主宰整個世界。歷史上對石油資源的爭奪從未間斷，這不只是可以解釋希特勒當年為何為了控制蘇聯的石油資源，而甘冒風險開闢第二個戰場；也說明蘇聯、東歐集團瓦解後，美國為何立即發動波斯灣戰爭和鼓勵前蘇聯中亞地區石油資源豐富的加盟國從蘇聯獨立出去；此外當然又說明美國如何為了長遠戰略利益，限制伊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的石油出口。

儘管，此次石油漲價不可能影響國際社會的穩定，其主要原因在於美國的遙控一時失靈，歐洲的運輸界則趁機興風作浪，以表達對政府的能源政策的長期不滿。但是，在全球範圍內，石油儲備在5至10年後逐年減少將是無可避免的事實。如何利用有限的時間，擬訂能源安全政策將是所有有遠見的國家必須面臨的課題。 ★

台灣意識型態

孫善豪

李登輝近日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訪問時表示：如果台海三通，台灣就變成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了，所以絕不可三通！原文曰：

「大陸是大陸，臺灣是臺灣，如果直接通航，臺灣就成為大陸的一部分了。我們是不同的地區，臺灣必須要有主權。」因此，李登輝認為臺灣與大陸必須維持國際關係，「你必須設置一些關卡，否則你就會變成中共的一部分了。」（《中央日報》八十九年八月八日）。

這個邏輯很有趣：台灣和誰直接通航，就會變成它的一部分。所以台灣也不應該和美國直接通航、不應該和日本直接通航，否則台灣就成成了美國、日本的一部分了！

不過請注意：不直接通航的意思，只能是間接通航。但是間接通航，憑藉的就是和第三地的直接通航。例如要和大陸間接通航，那麼就要和香港直接通航。但是根據「和誰直接通航，就會變成它的一部分」的邏輯，台灣和香港的直航可也危險得很哩：台灣會變成香港的一部分呢！

爲了不讓台灣成爲任何「別人」的一部份，最好的辦法，看來，就只好是「鎖

國」：封閉國際機場、取消所有國際航班、誰也別出國、誰也別入境，這樣，台灣主權，就真是完美無瑕了哩！

李登輝的「妙論」是多麼不合實情，從兩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第一，任何一位老百姓搭機到香港(或澳門)轉機進大陸，他／她在香港(或澳門)機場轉搭的，一定是「國際線」而非「國內線」。也就是說：即使香港(或澳門)名義上回歸中國了，但是它們與內地的實際關係，仍然維持國際關係而非國內關係。「名義」和「實際」間的落差，就是「一國兩制」的實際表現。這個事實，是所有平常人都意識得到的，偏就只有深宮大院裡的遜帝渾然不知。

第二，換個角度想想：設若今天全世界的海關全都取消了，你想去哪裡，買張票就去了，不必辦簽證、不必出示任何證明；你從台北去洛杉磯、去倫敦、去巴黎，就像從台北到花蓮、到高雄、到台南一樣，這可有多好？這種簡便的旅遊和來往方式，豈不是真正大多數人的利益所在嗎？豈不是「天涯若比鄰」、「四海之內皆兄弟」之類理想的實際體現嗎？但是，我們的遜帝偏就不這麼想，反而還是主張要設關卡、要讓旅行和來往儘可能變成一件麻煩事兒，他才爽，因為，「否則你就會變成中共的一部分了」。

但是，第一，既然香港(和澳門都)在「一國兩制」下成了中國的一部分，卻並沒有撤掉它們的「關卡」——所以即使台灣以「一國兩制」模式統一了，它顯然也仍然會有它的「關卡」——。所有擔心「台灣和大陸三通後會喪失某種主體性」的想法，都是一廂情願、毫無根據的幻想；第二，所有的「關卡」，其實都不符合一般百姓的利益。一個真正以百姓利益出發的政府，它的政策毋寧應該擺脫任何脫離百姓利益之外的所謂「國家利益」的考量，而以百姓的真正利益為歸結。這樣，如果臺海兩岸能夠建立某種不需證照的直通關係——就像歐洲聯盟申根條約所達成的那樣——，那麼對於全體人類之間自由平等的交往，是會有一定貢獻的。

中共方面對此遠遠沒有做好準備——所以港澳和內地間的航線仍是國際航線、內地人要進港澳仍需簽證——，但是台灣方面，則甚至對於這種「一國之內的國際航線」和「一國之內的簽證關係」猶不滿意，必欲退後到「國與國的國際航線」和「國與國的簽證關係」方後甘心。視乎「全球化」、「地球村」的趨勢，中共固然已經落後現實很遠了，但是台灣政府——無論新舊——，儘管有著那樣自誇自擂的民主成就，落後的，其實更遠得多。

★

使古無死者

劉文超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列子力命篇

古往今來，人類為享高壽、期登耄耋之齡，求偏方搞煉丹，再不然童男童女乘桴浮於海，其手段是不一而足，其特性是貪生怕死，尤其帝王將相、顯赫權貴之輩在生老病死的自然界規律下妄圖逆勢操作者不乏其人。夸何雖有遲速，相去曾幾何時，七十是古來稀，百歲算沒了頂，到頭來，一坯黃土還是最後的歸宿！

產業革命以來，促成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資本主義的興起，尤其廿世紀對人類及地球上其它生物族群而言，是一個震盪而又可怕的夢魘：毀滅性軍火的投入二次世界大戰讓人類慘遭荼毒，登峰造極的科技發展並未普遍給人們帶來裨益，反而加遽了貧富間的對立；一個世紀走來，對地球生態環境肆虐之慘烈遠超過地球數十億年歷史之總合，匪夷所思，瘋狂至極，溫室效應、臭氧層破洞、雨林消失、淡水匱乏、核武核電借屍還魂、廢棄垃圾無處傾卸、物種消失滅絕……這些「末世紀」的表象皆肇因於人類的貪婪與狂妄，篤信「人定勝天」與「科技萬能」，憑著奇技淫巧的小聰明，終究闖下了聖經「巴比倫混亂」寓言式的大禍，而無法善後矣！

進入千禧年，六月底「人類基因圖譜」初步繪製完成，可謂生物科技界的盛事。繼複製「桃莉」小羊成功後，英國政府即將同意科學家可以複製人類胚胎，將培植皮膚、腦組織、生長四肢，但複製完整人類仍不許可。事態的發展，是否意味著赫胥黎(Huxley)的小說《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最終攤牌？！科學家與生物科技新貴咸都躍躍欲試，呼籲政府放寬管制，好讓他們大幹一票，相關股票的飆漲即是著列；渾渾噩噩的一般人也陶然起來，「活到一千二百歲，好死不如賴活著，賺翻了！」筆者憂心忡忡的認為，基因密碼的破解是人類向下沈淪的崩盤，「自作孽，不可活」，其理如下：

其一、人口數字呈天文式的爆炸——人類係三百萬年前出現於地球的後生小子，公元前6000年才只1000萬，公元初年1億5000萬，1850年10億，1930年20億，1960年30億，1970年40億，現今已超過65億矣。假若人成了老不修，數百年之後650億不是夢，屆時一個家庭「五世其昌，族繁不及備載」成了小兒科的笑話，上海、東京、紐約、里約等城市超過一億人，人是地球最大的污染源，吃喝拉撒的原始慾望根本無法得到基本滿足。

其二、地球生態的大浩劫——筆者於《環耕》雜誌民國86年9月“伊于胡底之瘋狂消費”一文中曾言：『資本主義鼓勵縱容瘋狂消費的罪惡，恐怕也是新馬主義者所無法解決的難題，當生產不是由人們的需要所決定，而是由資本家的利益來掌握，

資本家寵壞了消費者，美其名曰照顧消費者的利益，事實上，二者都是生態殺手的“共同正犯”，而政府則是在一旁鼓譟撮合的“大媒人”。無法控制的大量人口必然耗盡自然資源，依賴工業科技所產生的廢棄物污染了整個地球，為生存空間所迫，勢必要再「蕁路藍縷」，以啓山林」，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都成了歷史名辭，棲息地既遭破壞，動、植物種的相繼滅絕也就無法避免。

其三、有錢人的奢侈玩意兒——在海峽兩岸競相加入WTO而渾然忘我的時候，反諷的是WTO及IMF（國際貨幣基金會）卻成為第三世界、南半球窮國原住民團體、環保團體、人權團體、勞工團體及婦運團體交相撻伐的目標，指其為富不仁、助紂為虐。資本無國界，貿易自由化國際化的終極惡果是窮人註定翻不了身，而環境生態是最大的輸家。君不見一個炒家索羅斯讓東南亞飽受金融風暴之苦，非洲數十國家加起來的資產還不及微軟小子比爾蓋茲，這是什麼世道！！

從歷史的軌跡來看，科技愈發達，受惠者侷限於富者，多數的窮人依然還在生存的基本水平線辛苦奮鬥。非洲若干國家若莫三比克、盧安達全國人口有三分之一係愛滋病帶原者，因無法負擔龐大的醫療費用而坐以待斃；台灣人到大陸的醫院換死刑犯的腎臟，富有的西歐人透過不肖醫師的仲介在東歐、南亞尋求「志願」捐腎者，器官有價，生命的尊嚴在窮人身上是找不到的。

基因科技的高度發展，徹底顛覆了生物界生命的倫理，本尊與分身孰為正朔，唯有錢者能之！複製品猶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裡被炒作的商品一樣，無論是批發或者零售，皆所費不貲。有錢人壟斷了各種資源，還可瓜瓞綿綿，真是好不快活！

其四、科技獨裁是條不歸路——人類的文明演變至今，是否應停下腳步來思索，這一切的發展所為何來？！當青山綠水不在，森林變沙漠，土壤有劇毒，鳥獸魚蟲氣息奄奄的時候，人類的稱霸也未免形單影隻了些！美國克羅拉多州胡佛水壩、前蘇聯車諾堡核電廠、中國大陸三峽大壩的存在，是俱有指標意義的。凡違反自然界的法則，迷信人定勝天，妄圖以科技超越一切的，都會付出沈重的代價。

1935年納粹通過「保持日耳曼血統法」(Gesetz zur Reinerhaltung des deutschen Blutes)就是基因控制的先頭部隊，設想透過基因圖譜的繪製，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毛澤東、波布、皮諾契特的陰魂永遠不散，這就是人類的向下沈淪。當超商架上堆滿了基因食品、滿街的複製人孑孓晃盪的時候，想讓上帝不瘋狂也難！

生老病死，是自然界的定律，貴生愛身以蘄久生甚或不死，都是些小格局的動作。楊朱「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以放於盡」（列子楊朱篇），其生死聽其自然的態度就顯得瀟灑的多。至於莊子一死百了的態度，「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至樂篇），則是達更高的意境。

基因圖譜，還是省省罷！！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中)

李崇仁

在台灣的統獨之爭中，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發展趨勢一直是個受到關注的焦點，至今也仍是個聚訟未決的問題。李登輝與台獨右派經常拿反共八股的教條來恐嚇台灣民眾，胡說什麼大陸猶為共產體制，若與大陸統一，台灣人民的財產將遭共產，陷於“共慘”的悲運，以此煽動反對統一的恐懼情緒。懷有中國民族情感的右翼眼見中共的經濟改革走向市場經濟，私有經濟也蓬勃發展，愈來愈與台灣模式趨同，已逐漸減輕對統一的疑慮。在左翼陣營中，對「中共是否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大陸還是社會主義體制嗎？」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從而造成“統”與“左”的分裂。認為中共未背離社會主義路線的，主張“統”“左”並舉；斷定中共正變質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則力言“左”優先於“統”，不必與強調中華民族主義卻日益偏離社會主義路線的中共同聲相應。《左翼》第四號的《連結》文章代表了後一種觀點，而第八號中汪立峽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台灣問題初探〉則代表了前一種立場。

汪立峽支持中共鄧小平路線的論點遭到大陸左派朋友蕭喜東、蘇杰在《左翼》第九號的反駁。雙方的爭議主要是：何謂社會主義？根據何種標準判斷中國大陸的社會性質？中共的“補課論”能不能成立？

蕭喜東在《左翼》第六號與第七號的〈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需要檢討〉及第九號的〈回覆汪立峽，兼談“中國特色”〉諸文中，一再提到要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做為大陸與統一台灣的政策綱領，汪立峽則將新民主主義等同於鄧小平路線所標舉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足見新民主主義是雙方爭論的核心概念。可惜，蕭喜東對“新民主主義”語焉不詳，而汪立峽則誤解“新民主主義”，混淆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

何謂“新民主主義”

根據毛澤東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新民主主義論》，自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後，中國逐漸變成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分為性質不同的兩個階段。即：第一步，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反帝反封建，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由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

上與政治上異常軟弱，又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與農村的封建地租剝削也有密切聯繫，這就註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無法由資產階級領導，只能靠無產階級聯合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等各革命階級來完成新式的、做爲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爲首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第二步，經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爲什麼必須以新民主主義作爲過渡階段？那是因爲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欺壓，內受封建主義的束縛，國民黨的官僚資本又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密切結合，導致中國經濟難以發展，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生產力極爲落後，不像歐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具備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話說就是：「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因此，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下，打破束縛中國經濟發展的枷鎖，解放生產力，創造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其經濟方針即是孫中山所提的“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在具體做法上，(1)沒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使農民成爲私有者；(2)沒收國民黨的壟斷資本，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3)保護民族工商業，促進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總目標則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參見〈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253-1256頁)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私人資本主義的態度。先引兩段毛澤東的話：「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爲什麼不但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目前發展。」(〈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60-1061頁)

「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

時期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氾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範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於資本主義採取恰如其份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孫中山的節制資本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爲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爲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絕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太大太死，必須容許他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畫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31-1432頁）

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爲，在私人資本主義仍有助於中國經濟發展時，一要保護、利用，二要限制，以避免其過於壯大，具備操縱國民生計的能力。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內涵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新民主社會只是個過渡階段，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仍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運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包含了：1. 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2. 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3. 私人資本主義，4. 個體經濟，5. 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如果任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這五種經濟成分顯然都將發生變化，例如：在農民中再出現兩極分化，而私人資本主義也可能由中小資本茁壯爲雄厚的大資本，如此等等。因此，如果運用政治、經濟、法律等各種手段，善加引導，則新民主主義經濟可以改造、轉化爲社會主義經濟；反之，若政策上失誤也可能倒退爲資本主義經濟。

新民主主義經濟正如列寧晚年所實行的“新經濟”政策，都是社會主義經濟因素與資本主義經濟因素並存，兩者處於既聯合又鬥爭的狀態。毛澤東很清醒地看到：「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32頁）因此，毛澤東還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這個國家在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同上，第1433頁）。

欲使新民主主義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政治上，要有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經濟上，國家要掌握經濟命脈，在工業、商業、金融、交通各個方面佔據制高點，並取得農民支持，鞏固工農聯盟，否則資產階級不可能輕易就範。中共在五〇年代能快速推動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短短七年內基本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理由在此。

討論過“新民主主義”的內涵後，我們回過頭來看汪立峽對“新民主主義”的認知：「什麼是“新民主主義”呢？其核心思想不外是：新民主主義重新確立了社會主義作為歷史發展的目標，而同時它又把社會主義“暫時”描述為從資本主義吸取經濟活力的發展過程的保護者。…是以資本主義來“補充”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的目標服務。」汪立峽接著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進程表述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半封建(或半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並說：「“新民主主義”作為一種力圖尋找資本主義發展的“同等物”，使其不僅能滿足社會主義的要求，還同樣能符合本國自主發展(富國強兵的民族解放)的需求，有什麼必然站得住的理由認為它已偏離社會主義而不是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實踐呢？」

從上面的論述可知，汪立峽先是錯把“新民主主義”當成“社會主義”，再把“新民主主義”等同於中共所稱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完全是誤解“新民主主義”所致。

毛澤東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

在中共黨內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共過早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毛澤東本人多次表示，由於中國的經濟文化還相當落後，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長時期內(或相當長的時期內)，還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發揮其積極性。甚至在1953年制定“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也還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要完成這個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畫，就是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從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基本完成，加上經濟恢復時期的三年，則為十八年，這十八年已過去了四年)，那時中國就可以基本上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第405-40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

版社，1990年)孰料，中共的革命氣勢如虹，使億萬勞動人民獲得翻身解放，深獲民心，各項政策的推動，勢如破竹，至1956年底即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改造，速度之快，連毛澤東也不太能置信，擔心是否過急過快。不過，毛澤東眼見大批幹部、群眾幹勁十足，認為民氣可鼓不可泄，還是接著在1958年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發動“大躍進”與“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於是引發了中共黨內多次的路線鬥爭，逐步升級至“文化大革命”而達於頂點。

1958年以後的路線鬥爭有複雜的國內與國際因素，此處無法詳論。但核心的問題是：「怎樣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一窮二白”，又受到強大的帝國主義包圍、封鎖的農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邁向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沒有現成的答案，蘇聯模式也不可照抄照搬，實踐的經驗可謂極其貧乏，一切只能通過自身的摸索、實踐。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的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300-302頁，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確立社會主義在中國的不拔之基，為了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而發動的一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宏大實踐。雖然最終遭到了挫折，但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為人類邁向社會解放的偉業留下了彌足珍貴的遺產。今天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是：“文化大革命”何以未竟其功？其失敗的國際因素與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是什麼？

中共黨內的計劃與市場之爭

中共的鄧小平路線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礎上產生的。他們認為，毛澤東晚年脫離了中國的客觀實際狀況，強調保持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急於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因而主張公有制規模愈大愈好，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愈快愈好，並在這樣的思維下，極力限制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否定農村中的“三自一包”，希望早日割掉“資本主義尾巴”，結果造成經濟缺乏活力與階級鬥爭擴大化，阻礙了中國的發展。鄧小平路線主張，由於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的階段，商品經濟本不夠發達，故不宜跨過商品經濟這個不可逾越的階段，過早杜絕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因而應該像列

寧晚年採取新經濟政策一樣，實行戰略上的退卻，允許多種經濟成份並存，尊重價值規律，充分運用商品生產與市場的功能來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

不過，在反對文革的陣營內部，對於計畫與市場的關係、商品生產與流通的範圍該有多大的問題卻存在著分歧。以陳雲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搞活市場，市場調節，這些只能在計畫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開計畫的指導。」（《陳雲文選》1956-1985，第28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這就是把計畫比喻為籠子，市場比喻為鳥的“鳥籠經濟論”。換句話說，陳雲派仍堅持計畫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市場只能作為補充，即所謂“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商品經濟”。這個提法在中共十四大以前佔居主流地位。但中共黨內的右派並不滿足於這種小腳放大式的改革，處心積慮擴大市場作用的範圍，力圖打破計畫經濟的框框。計畫與市場的主從之爭，經過多年鏖戰，在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之後，市場派躍居上風。1992年10月的中共的十四大就明確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調節作用。」，從而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本來，在1988年中共闖價格改革關失敗，造成物價飛漲、人民搶購商品的惡性通貨膨脹後，中共即厲行經濟的治理整頓，加以1989年又發生「六四」事件，中共黨內即興起一股強烈質疑經濟改革走偏了方向的聲浪，認為再不有所警惕，明確改革是姓“資”還是姓“社”，中國的社會主義將遭和平演變，導致江山變色，走上資本主義的邪路，其批判的鋒芒即指向鄧小平。鄧小平在深圳、上海等地發表南方講話，提出：「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的論調，正是針對以北京為中心的計畫經濟派的反戈一擊。此論一出，計畫經濟派為之氣悶，自由經濟派則感激涕零，如大旱之逢甘霖（此話絕無誇大，曾任人民大學經濟系主任的著名自由化學者魏杰在自己書中的序言就坦白描述他當時激動落淚的心情）。在鄧小平表示不要搞姓“資”姓“社”的爭論，要解放思想，敢冒風險，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鼓勵之下，大陸隨即掀起一陣大炒股票、房地產的投機熱潮，挪用公款、貪污受賄之風大起，導致1993、1994年的經濟過熱，幸賴朱鎔基採納了左派經濟學家的意見，刹住了惡性通貨膨脹，才免於經濟崩潰。

鄧小平對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本質認識不清

鄧小平所謂「計劃和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的說法，混同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計劃”與社會主義經濟的計劃的涵義，無論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資產階級經濟學來說，都是不通之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畫只是對經濟增長、貨幣供給、財政收支等提出總量規劃以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並不直接支配生產、交換與消費，生產要素的流動也交由市場機制決定，資本家仍是經濟活動的主角，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來組合生產要素以獲取剩餘價值。這種經濟計畫既無法消滅剝削，也不能免除經濟震盪，豈可與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相提並論？一旦以市場作為經濟的運行機制，勞動力也勢必商品化，而勞動力的成為商品，成為創造剩餘價值的源泉，正是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所謂“公有制”經濟，所謂國有企業也就不足以做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特徵。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早已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愈來愈社會化後，股份公司大量興起，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開辦規模龐大且需要大量資本的鐵路、郵政、電報等企業，「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現代國家…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恩格斯還譴責說：「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接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麼拿破崙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馬恩選集》，第三卷：317-318）

因此，我們可以確鑿無疑地說，中共自十四大確立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機制後，基本上已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沒什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別。所謂國家的宏觀調控，所謂的公有經濟為主體（且不說“集體經濟”相當多數實質上已是私有經濟，而國有經濟也正大量被侵蝕、稀釋中）都不足以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這些話決不是什麼從“本本”出發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論點或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而是實事求是，揭示問題本質的論斷。要證明上述論斷的正確性，只要以台灣為例證就夠了。五〇年代中期之前，台灣公營經濟的工業產值都過私人企業，而石油、水、電、鐵路、公路、鋼鐵、郵政、電信、銀行、肥料、糖、鹽等各種攸關國民生計的企業直到九〇年代初都由官方壟斷，國民黨一手掌握了台灣的經濟命脈，按照鄧小平派的邏輯，台灣戰後數十年來所實行的也跟大陸一樣都是社會主義了。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照這個邏輯再推下去，那麼國民黨今天的下場，也可能就是中共未來的寫照。

鄧小平之所以混淆資本主義的“計劃”與社會主義的“計畫”的區別，又只把計

劃與市場當成經濟手段，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自己所承認的：「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82）他所謂的實事求是，其實是實用主義、經驗主義。就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鄧小平也就是他那個“貓論”。鄧小平敏於治事，辦事幹練，但終非有深遠洞見之輩。他所謂的計劃與市場並非制度的本質特徵之說，其實是聽信了大陸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胡說，因無力判斷而遭到了糊弄。毛澤東生前曾感歎：「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並多次號召幹部要多讀馬列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正是看出了值得憂慮的問題。

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語帶情緒地指責那些認為外資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的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那我們來看推行新經濟政策的列寧怎麼說吧：「新經濟政策就是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轉而恢復資本主義。……同外國資本家簽訂租讓合同，把企業租給私人資本家，這些都是直接恢復資本主義，是從新經濟政策的根上萌發出來的。……這是經濟學初級讀本教給我們的最基本的經濟常識」（《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184-185，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看吧！是誰沒有基本常識？

經濟改革的根本問題——誰戰勝誰？

列寧之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是因俄國原是個經濟文化落後、小農佔人口多數的國家，在蘇維埃政權初建之際，更遭到俄國資產級聯合帝國主義列強以武力反撲，三年內戰期間被迫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由國家直接組織生產與分配，結果，戰後經濟凋敝，政治不穩，列寧見正面強攻，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方法不可行，遂實行戰略退卻，改採迂迴包圍，決定推動新經濟政策，希望憑藉國家資本主義作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手段。列寧很清醒地看到，開放了國內貿易市場，引進了外資，就是給資本主義鋪設了溫床，因此，一再告誡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提出「誰戰勝誰——是資本家還是蘇維埃政權？」的問題，明白指出：「全部問題就在於誰跑在誰的前面？資本家如果先組織起來，他們就會把共產黨趕走」。但鄧小平則反是，不惜曲解馬克思主義，不願也不敢承認搞了資本主義，一再強調主要是防止“左”，說什麼：「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5）列寧之所以是列寧，而鄧小平只是鄧小平，差別就在這裡！

中共經改的戰略構想相當程度上借鑒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但比列寧走得更遠。中共黨內對要退卻到什麼程度，曾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退回到新民主主義，有的認為中國既然缺乏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就算退到資本主義補一堂資本主義的課也

無妨。但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在中國大陸仍無法撼動，守住社會主義制度這道防線成爲黨內最大共識。於是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明確表示：「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6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但中共從八〇年代初的計劃經濟爲主，市場調節爲輔，退到1987年十三大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再退到十四大的市場經濟體制，一步一步滑向資本主義，已是「久假而不歸」了。新民主主義還對私人資本主義加以限制，並逐步引導向社會主義，中共目前則是強調建立所謂公平競爭的市場，讓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優勝劣汰，已遠離了新民主主義不可道理計。經濟運行機制雖已發生質變，鄧小平派一怕坐實了“走資派”的罪名，二怕引起人心不滿，政治動盪，卻始終不敢拿下“社會主義”的招牌，美其名曰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其實，依中共目前實行的政策若硬要說是社會主義的，那只能說與歐洲社會黨式的社會主義差堪近之，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不甚相干。

中國大陸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中共十四大後，很沈痛地慨歎：「沒想到資本主義在中國這麼快就復辟了。」確實，曾經震撼了世界，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的中國革命竟然在毛澤東過世後十多年就變了樣。何以致此，很值得總結經驗，深加探究。這當然會是個浩大而費時費力的工程，追究起來，因素也必然複雜多端，但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的一段話是個啓人深思的角度：「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1794年時就是這樣。所以，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像魔法術一樣把全部封建遺跡從法國地面上一掃而光。這樣的事情是怯懦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犧牲只是給資產階級掃清了道路。」（《馬恩選集》，第一卷：171）

中共在鄧小平領軍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蛻化變質，腐敗成風，當然爲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額手稱慶，喜出望外，爲宿怨大敵竟自行繳械不戰而降而雀躍不已，全世界的左翼則或憂心忡忡或憤慨怒責，氣未能平。台灣的左翼，在統一問題上出現爭論，毋寧說是正常的。

鄧小平路線的主調是：振興中華、強國富民以實現中華民族的雄心壯志。中共方

面由社會主義向後退卻，一方面則高舉民族主義大旗，這與毛澤東時代合民族獨立與階級解放為一體相較，自然會讓左翼陣營中人產生不滿，甚至質疑中共以發展經濟為名，急於溶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勢必依附於帝國主義，淪為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這種看法在蕭喜東與蘇杰的文章中都有所反映。從主觀上說，鄧小平派欲增強國力，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用心，大概無庸懷疑，而藉著致富圖強的號召，中共也確實凝聚了一股民氣。比較關鍵的問題是：中共的發展戰略與中國的經濟實力是否能使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殺戮戰場中斬將奪旗，躋身自主的經濟大國之列。

經濟的理論與實踐卻表明：曾為殖民地或半殖民的國家，由於外受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控制，內有買辦資產封建勢力，若不驅逐帝國主義，變革社會經濟結構，絕對無法進行自主的資本積累，建立獨立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很難得地完成了上述任務，成就了第三世界國家所無的偉業。鄧小平路線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經濟的改革開放。也因此，中國大陸具備了幾項第三世界國家所缺乏的有利條件：1、有一個強大而組織深入遍佈全國的黨與國家機器。2、有一個第一部類、第二部類乃至國防，部門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能穩定提供糧食、工業原料的農業。3、有一批素質優良的科技隊伍，基礎科學紮實且具備了一部分世界先進水平的科技成果。因此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的競爭力明顯優於許多外圍與半外圍國家，很難以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戰後的發展經驗直接類比。

（待續）

☆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再論“中國道路”和兩岸關係

汪立峽

我在《左翼》第八號上發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台灣問題初探〉，到《左翼》第十號為止，已引發了三篇文章接續討論（論戰的源頭是《左翼》第六、七號刊出的蕭喜東的〈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需要檢討〉）。現在，圍繞著“中國道路”和“兩岸關係”的討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已擴大，這是好現象。

本文分爲二段，前半段是針對蕭喜東和蘇杰二位先生的大作，提出簡要的答辯；後半段是對李崇仁先生高見的共鳴和補充。

首先，我必須指出，蕭、蘇二文所提到的資本主義“補課”和“折衷”二詞，都不是拙文的用詞，因爲我根本反對以這樣的用詞來描述“社會主義初階論”。其次，蕭、蘇二人不約而同（還有其他人）似乎認定拙文的見解是反映甚或照搬中共官方的說法，對於這一點，我想表明的是，我在前文中所表述的幾個主要論點，基本上是我多年來獨立思考的產物，並非取材自中共官方或非官方的文獻。有人說我的見解比北京還要北京，倒是比較接近事實。

關於“台灣群眾運動的階段性質”問題

蕭文提到，我對後現代主義思潮“去階級”的批判，同我對台灣群眾運動將“統治階級和非統治階級不加區分的混同起來”的批判，好像自相矛盾。其實，了解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的人大概都不應不知道，這個思潮的階級理論，多半是從反斯大林主義到反馬列主義的結果，也就是說，他們的“去階級”實即“告別無產階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的意思。這個理論被移植到台灣來運用的結果，很難避免不同已內化爲社會集體思維的反共意識摻雜到一塊，演變成只“去”無產階級而不“去”資產階級，以致將群眾運動搞成“統治階級和非統治階級不加區分的混同起來”。同時，後現代思潮所強調的“多樣化”、“多元化”群眾運動觀，也很容易使“去階級”的理論變成不分階級的大鍋炒群眾運動。所有這些，反映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台灣群眾運動中，都不只是理論而是事實。

此外，我的這些批判觀點，並非後知之明，而是早在1989 - 92年間，就已以一連串的文章予以揭露批判了，其中包括《形左實右的“民間社會論”》（見《前方》雜誌）《工人運動與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與階級》《歷史終結了嗎？ - 兼論“蘇東波”》（三文均見《中國論壇》）《歷史》一文很可能是台灣第一篇批判福山思想的東西。也有一些論戰性的短文發表在《自立早報》《自立晚報》《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上。

還有，關於民進黨和台獨運動的階級性質，以及“新潮流”政團和陳水扁、謝長廷這類律師出身者的階級屬性問題，我都曾一再爲文在80年代的所謂黨外雜誌上指出他們的資產階級屬性（可翻查當時各家黨外雜誌）。眾所周知，黨外運動及民進黨的活動是同80年代-90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和群眾運動分不開的。所有曾經發生的現象和事實都表明80年代到90年代，台灣的確還沒有什麼階級對抗性質的群眾運動或社會運動出現。充其量，我們也只能從馬克思的理論分析上說，“客觀的”存在著不自覺的階級對抗，如此而已，但絕非運動領導者和參與者主觀意志的表現和主觀意識的結果。（當然，類似“勞動黨”那樣的組織和其他極少數人例外，但畢竟不是主流領導勢力）。在此，爲了提醒蕭、蘇二位先生對這一問題的重視，有必要立即補充指明一點，請翻閱當時（80年代中90年代初）台灣的各類報紙雜誌、學術期刊、校園刊物…等等，莫不充斥著什麼“後”、“去”、“顛覆”、“解構”、“文本”、“論述”、“集體記憶”、“階級代約”、“新x x 主義”…等字眼，幾乎泛濫成災，成爲人云亦云令人費解的神秘語詞，可見後現代主義思潮對台灣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負面的影響之深。

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問題

蕭、蘇二人文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都明顯的抱持否定的態度，一致認定今日中共搞的是“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他們舉證了許多現象、事實和數據，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特別是爲海外（大陸之外）媒體和所謂“民運人士”以及西方傳媒所不厭其詳，反覆報導的事，同時，它也是無可反駁的事實（並非每一樁）。但是，蕭、蘇二位應明白，我同樣可以大量舉證相反的現象、事實和數據，如果我那樣做，只會變成各說各話，各據立場各持己見而已。何況，相反相異的事證不勝窮舉，除了使我們掉進經驗主義的泥坑之外，不可能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具任何實質助益。因此，我不打算在二位所“舉證”的那些問題上糾纏不休，我只想就以下幾點提出簡要回應，剩下的一些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問題，留待下半段再談：

1、“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問題——蕭文硬是咬定“一國兩制”被大陸官方刻意宣傳爲毛周時代就制定好的，其用意在於替今天的對台政策失敗遮羞。在此，我要提出一個比我在前文所說的“毛四目”更早的證據來證明“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確是毛澤東所首議。早在“八二三砲戰”那一年的“十一”前後，《人民日報》連續以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三篇《告台灣同胞書》（實際撰稿人是毛澤東本人），反覆表示願以“和平統一”方式解決兩岸問題，並且明言關於台灣內部的社會制度改變問題，願意“尊重”蔣介石的意見，改變與否，何時改變，均可“商量”。這三個文告的精神離“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有多遠？回顧歷史，社會主義解放台灣（在當時即

武力解放)的必然性,被韓戰及美帝干預台海防務而中挫了,“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的構想實是形勢所迫,不得不爾。不過,目前的形勢又不一樣了,“和平統一”恐怕已不是中共的“唯一選項”。

2、關於民族主義問題——蕭文指稱“中國領導人經常訴諸一些舊統治階級的民族主義符號,但其實掩蓋不了他們投降、媚外的本質”照這麼說,那我們該怎麼理解西方勢力動輒吼叫中國民族主義日益高漲,已經“威脅”到他們呢?又怎麼理解普遍存在於大陸老百姓和知識分子中的民族主義情感呢?蕭喜東先生是否該警覺自己在這個問題的看法上有點情緒化傾向了!

3、關於“六四性質”問題——蘇杰的文章提到“六四事件”,顯然認為“武力鎮壓”很不適當。然而,當蘇先生願意正視風波持續五十多天,廣場依然被“佔領”,海外勢力惟恐天下不亂,而柴玲之流高喊“不惜流血”之際,還會認為不該鎮壓嗎?正如李敖所言,有哪一個國家和政權在這種情勢下會不採取斷然措施呢?記得就在六四風波過後不久,美國一家左派報紙在頭版刊出一張坦克部隊鎮壓群眾的照片,下面文字說明這麼寫著:“這是北京嗎?不!這是我們美國”。蘇先生還應該知道當年(1968年5月)法國政府是怎麼派出坦克和武裝傘兵在巴黎街頭鎮壓學生和工人群眾的,難道不是因為他們要造資本主義的反嗎?可是,美國和法國在六四問題上卻領頭裝出一副衛道之士的偽善面孔。

4、關於所謂“不可知論問題——蘇文指稱我是以“不可知論”在為中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辯護,並說我因而“蒙蔽了自己和別人”。但我不解蘇先生所說的“不可知論”何所指?以我的了解,“不可知論”是指康德哲學認為人的理性只能認識事物的現象,而不能認識其本質,本質是屬於“彼岸”的事,只有通過宗教才能領悟,人只能認知屬於“此岸”的現象界。不解為何蘇先生用這個術語來批評我對“中國道路”的見解?難道關於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和實踐問題也屬於宗教領域的“彼岸”?依我之見,說我對“中國道路”的見解是“走資”或“走社”未定論,倒比較恰當。然而,對“中國道路”持未定論看法的不止我一人,在中國大陸和在國際上持這種看法的左派知識分子,大有人在。以中國大陸而論,前不久“左派”(在大陸加括號的左派,意指黨內或黨外的傳統左派)人士撰文將矛頭指向自由派知識分子,呼籲大家“要睜大眼睛看,清醒地看,識破他們的真面目,迎接將來的戰鬥,準備和他們進行不可避免的鬥爭”因為“不少報刊的文章是離開黨中央路線,離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最近,據說在北京知識界正流傳一份新的“萬言書”,著力批判為“自由化”、“私有化”搖旗吶喊的學者專家。“萬言書”說:令

人擔心的是，在中國思想理論界和政界中也存在砍旗的問題（意指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紅旗），並且未指名但道姓的批了“曹破產”（指曹思源）和“吳市場”（指吳敬璉）。這裡我要指出的是，設若“中國道路”已成定論，哪會不斷有這樣的爭論？那些被批的自由派學者專家不正是要千方百計的要中國從“走社”邁向“走資”嗎？

* * * * *

《左翼》第十號李崇仁先生的大作〈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上）〉論及“工人無祖國”概念與民族主義之間關係的問題，鞭辟入裡，深有同感。由於本人在台灣長期接觸知識青年和工人群眾，深知他們對這一重大問題的誤解和迷惘，為此，想針對他們就“工人無祖國”的真確意涵和民族主義問題。多說幾句話。

“工人無祖國”不是民族虛無主義

列寧曾說過：“祖國是個歷史的概念”（《列寧全集》35卷，238頁），意思是說人類從原始社會發展到“國家”的形威，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從古代的“國家”發展到現代的“民族國家”，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祖國”的概念是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後才有的，因此當然也和人類歷史或世界歷史發展的產物。將來，“祖國”的概念會在歷史的進一步發展中隨同“國家”概念的消亡而消亡，那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中就是共產主義的實現，而不是現在，也不會是李遠哲和陳水扁等人所幻想的三十年或五十年後。

就目前所謂“全球化”這個時代而言，各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國家”被資產階級所把持（台灣的情況類似於此），“國家的”、“祖國的”利益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名詞，就這個意義上說，“祖國”已不屬於工人的，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說：“工人無祖國”。

可見，《共產黨宣言》所說的“工人無祖國”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二句話，必須聯繫起來理解，即所謂“無祖國”是指跨越國界，以便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因為“全球化”下的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敵人，面臨著同樣的鬥爭。很清楚，“跨越國界”並非“不要祖國”，那些有意或不自覺曲解，濫用“工人無祖國”這一提法的人，其實是工人階級的公敵。

國際主義不是世界主義

從以上的略解析，可以知道“工人無祖國”這一概念，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裡，其實就是指的“國際主義”。什麼是“國際主義”？我們知道，“國家”這個概念可以有三層指涉：鄉土國家(country)、政治國家(state)和民族國家(National)。“國

際主義”在英文叫作“Internationalism”指的正是“民族國家與民族國家之間”，“際”和“Inter”是“之間”的意思，有“國”才有“際”，何來被曲解的“工人無祖國”之說？那麼，什麼又是“世界主義”呢？前面已經指出，目前在台灣以政治菁英和知識菁英領頭，流行掛在嘴邊高喊什麼“地球村”以及民族國家主權論已經或即將過時等等自欺欺人的妄論，幻想兩岸關係只要在“現狀”下拖下去，有朝一日“台獨”就會水到渠成。但是，恩格斯老早就揭露了“國際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水火不相容”，他說：“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正在各地提倡各民族的兄弟友愛，用以對抗舊的赤裸裸的民族利己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偽善的自私自利的世界主義”（《馬恩全集》第二卷，662頁）這句話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馬恩的社會主義理論中，明顯的區分了資產階級的舊民族主義和勞動階級的新民族主義，並且呼籲全世界工人階級必須以新民族主義對抗“赤裸裸的利己主義”的舊民族主義，同時指明了這種舊民族主義和偽善的世界主義根本是同一回事。恩格斯所說的“各民族的兄弟友愛”指的正是立足於社會主義民族國家這種新民族主義之上的國際主義，由此也證明了濫用“工人無祖國”和民族主義過時論、主權國家過時論的荒謬和訛詐！

李遠哲的奇談怪論

以上所談這些問題，對於台灣知識分子和勞動大眾而言，在他們的思維和關懷中，還是會糾纏到兩岸關係（或謂統獨問題）及中國大陸是否已放棄社會主義二大要害問題。李遠哲最近在接受到台灣媒體訪問時曾說到：「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很多台灣人希望大陸推翻台灣政府，走社會主義，建立公平社會。可是後來發現事情沒那麼簡單，大陸自己談的階級矛盾也發生變化，先是趕走腐敗的國民黨，後來卻還要與國民黨打交道，年輕人就認為大陸變了，原來認同大陸社會主義的人，一個一個不認同了」（《聯合報》89年8月25日）要是李遠哲這個說法是正確的話，只怕台灣“很多人”都會大吃一惊，他們什麼時候竟然指望過“大陸推翻台灣政府，走社會主義”的路？如果說40年代末有那麼一批中共的地下黨人曾這麼想，那是正確的；如果說在那個混亂時期，有不少民眾曾期望“大陸推翻台灣政府”，也可以說是正確的；但是，無論在那個時候和以後的台灣同胞中說有“很多人”指望中共推翻台灣政府“走社會主義，建立公平社會”，那就不能不說是李遠哲在胡言亂語了！至於說到“年輕人認為大陸變了，原來認同大陸社會主義的人，一個一個不認同了”，也只不過是像李遠哲這一類的當年受保釣運動啓蒙的“左傾”留學生的心路歷程而已。

可是從李遠哲的話乍看會讓人以為所有台灣的年輕人都像他一樣是這種所謂的“原來認同大陸社會主義的人”。其實，戰後以迄於今的台灣知識青年連同他們的老師，滿腦子都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情緒，這根本是不必求證的常識，就算有極少數所謂的“左派”知青吧，他們對馬克思主義也只有自以為是的了解而已，完全談

不上對大陸的“變化”有多大能耐品頭論足，遑論什麼原來認同大陸社會主義的人，一個一個不認同了”。李遠哲的這種奇談怪論不能不讓人相信他是在為台獨的形成過程製造歷史合理性，然而，也不能不叫人問一問李遠哲，大陸是不是社會主義和兩岸要不要統一有什麼必然關係？難道大陸如果真的全面資本主義化，台灣就有正當理由搞分裂？李遠哲不是有時候也呼應台灣當局拒統的藉口說什麼兩岸制度不同所以不能統一嗎？何其自相矛盾？

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問題

如果真而評斷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是否完全放棄了社會主義道路，也絕不能像李遠哲或蕭喜東、蘇杰那一類的人那樣以文革的社會主義實踐來反對“社會主義初階論”的社會主義實踐，因為這種觀點等於認定社會主義的實踐道路只許有一條，等於否定馬克思所一再強調的“有條件創造論”的歷史發展觀（馬克思關於這方面的最著名理論概括請查閱〈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一文的起頭一段文字），任何社會主義者要創造歷史都不得不在既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而不是隨心所欲，中國共產黨當然也不例外。馬克思晚年最焦思苦慮的一個理論問題就是生產方式落後的國家，例如東方社會，有沒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卡夫丁峽谷”原指古羅馬和迦太基的布匿戰爭中一場著名戰役）。馬克思1881年在函覆俄國著名女革命家查蘇利奇關於俄國農村公社能否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問題時，態度十分謹慎，認為當時的俄國傳統農村公社制度無論朝社會主義發展還是朝資本主義發展，“對於其中任何一種，顯然都必需有完全不同的歷史環境”（《馬恩全集》19卷，435頁）。

根據馬克思完整的社會形態理論，“社會形態”包括了所有制形態（私有、公有）、技術形態（石器、青銅、鐵、內燃機、計算機…）和經濟形態（自然經濟、商品經濟、計劃經濟）三方面。東方社會（當時馬克思關注焦點是俄國和印度）在所有制上跨越了資本主義這個歷史階段（指農村公社的公有制及其社會關係），但它的技術形態和經濟形態仍然停留在落後的前資本主義階段上，並沒有隨著所有制的變更而“跨越”資本主義所處的技術形態和經濟形態。這表明，社會的技術形態和經濟形態的發展形式只能是依次更替的，而不能採取“跳躍”的形式。或許正是這個見解，使得馬克思在那時就反覆強調，俄國要想跨越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前提是盡可能廣泛地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成就。事實上，馬克思早先在《資本論》中就已經提出告誡：“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它至多只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馬恩全集》，23卷，11頁）。

總而言之，我堅決認為，對於中共所抉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初階論”的理論與實踐路線，也應該而且必須採取上述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卡夫

丁峽谷”問題的研究與論證態度去嚴肅對待。

本文原來還想就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整體理論”（或“總體理論”）、“一國兩制”及其同人民內部矛盾的解決以及統獨之爭的本質乃是敵我矛盾等三個方面，進一步探討中國道路和兩岸關係的相關論題，惜乎考慮到篇幅問題和讀者一次閱讀的承受度問題，只好留待以後再申論了。★

他譏笑什麼？

——對〈寫在第四國際邊上〉的回應

南 產

《左翼》在第九號刊登孫善豪的《寫在第四國際邊上》後，盛意邀香港的先驅社作出回應。先驅社感謝這個邀請，但認為沒有正式回應的需要，不過不反對個別社員作回應。我在此表示一點個人的看法。

孫善豪早已對托派第四國際「有零星星的概念」，而且聽過第四國際一位重要的領導人孟戴爾（Ernest Mandel）一場演講，七年前又在柏林參加了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慶祝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七十年和國際委員會四十年的會議，隨後寫了《寫在第四國際邊上》這篇文章，當時已經發表過。現在他略為修改後，把這文章交給《左翼》作第二次的發表。根據作者和這篇文章的歷史，我相信任何讀者都會抱著不小的期望，想從這文章得到對托派第四國際相當的認識。可惜，我相信，他們讀後難免相當失望。至於從中感受到多少「趣味」就難以估計了。

讀者很容易看出那文章對第四國際所作的判決：「社會主義的死硬派」，「還是在恩格斯的陰影下面……相信命運」，「不過證明自己是弱者罷了」，「教條」得令人反感，「大概已經是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了，它已經沒有生命力，沒有未來了，反而，它只能靠不斷咀嚼自己的過去，來維持現在的生存了」，「不斷覆述過去，……對現在和未來提一些空洞的訓誨」。

必須承認，這樣的判決不算太壞，起碼比從前蘇聯法院、第三國際、中共等的判決，「工人階級的叛徒」、「反革命」、「兩面派」、「暗害者」、「帝國主義的走狗」、「漢奸」等等好許多。不過，那些更嚴重的判決，雖然後來連官方都不得不正式徹底推翻，在判決的當時是提出了許多「證據」的，至少形式上是有根有據的。現

在讀者能夠在孫先生這篇文章裡找到的證據恐怕很少，至少魯鈍如我的只能找到很少，而且是很無力的。

「社會主義的死硬派」或「虔誠」派，這個判決或者稱號，我作為一個托派甘心接受，而且不要求孫先生提出什麼證據。在我看來，對自己的信仰虔誠或死硬，不是羞恥或壞事，倒是光榮。雖然我自己是無神論者，但是對於真正虔誠的宗教信仰者是尊敬的。我相信這不是我特有的「弱點」。我懂得（大概懂得吧）「虔誠」和「死硬」兩個形容詞的含義雖然本質上是相同的，但前者是褒義詞，後者是貶義詞。所以，說人家是「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大概暗含著社會主義不是好東西，至少早已不值得堅持了的意思。倘若這想法不是錯誤，就可以推想到孫先生大概不是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大概他已經不相信社會主義，或者認為：甚麼社會主義不社會主義，根本無所謂，隨時可以要，也可以不要。當然，這不過是我的推想而已，並沒有充份根據作出確定的判斷。而且這點根本是順便提到的，無關主旨。

讀到「信仰」和「虔誠」，自然會聯想到世界革命是否必然來臨，馬克思（或恩格斯）主義的歷史觀是否宿命論這些問題。孫先生在七年前那次會議上看見托派「還在談著要服從歷史客觀法則，要準備迎接即將必然來臨的世界革命……等等」，就認為這「就像人……在彷徨無依靠的時候……相信命運一樣」，「不過是證明自己是弱者罷了」。在孫先生自己看來，大概這樣的論斷已經堅強有力、很足夠了。但在魯鈍的我看來，這裡面還大有問題。

首先，相信命運的人不一定是彷徨無靠的弱者。例如中國歷史上（外國大概也差不多）每一個皇朝的開國君主都自信是「奉天承運」，許多梟雄豪傑都以為自己是命運註定的成功者，不會失敗，有的因此結果在愚蠢的冒險中失敗。所以，根據相信命運就判斷一個人或者團體是弱者，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大前提錯誤。為甚麼孫先生那麼容易判斷人家是弱者，而忽略了其實也很常見的強者方面的同類表現呢？也許是因為孫先生對弱者的心理太熟悉，而對並非弱者的心理太不熟悉吧。當然，這點也不過是一種猜想而已，並非確定的判斷。

至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觀，據我了解，決不是宿命論的。馬克思主義裡面所說的歷史客觀法則，並不是宿命論，只是說人的行為和思想並不是完全自由的，要受到某些客觀法則的限制。社會制度的形成和改變，更逃不脫某些客觀法則的限制，不能盡隨人意。注意：是說受限制，不是說命定到某時某刻一定出現某種具體的情況。所以這不是宿命論。至於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來臨和成功，更沒有任何馬克思主義的大師有過宿命論式的宣告。相反，在許多場合，尤其是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他們再警告：人類的前途不是社會主義就是文明毀滅。托派更特別強調這點。這正是「死硬的」社會主義者的特色。這同宿命論恰恰相反。他們有時說「迎接必然來臨的

世界革命」甚至是革命勝利，那不是宿命論，只是一種決心和信心的表示而已，好比球隊出發比賽前有時高呼我們必勝一樣。反過來，那些登上了統治者地位的共產黨，在倒台以前，確實以為他們所相信的那種社會（共產主義制度）是宿命地永遠必勝的。

孫先生根據七年前那次會議的印象，就判斷第四國際一味不斷回顧歷史，對現在和未來只提一些空洞的訓誨，「迎接革命，到底要準備甚麼呢？不知道，至少沒有說」。很抱歉！我不能不說，他這指責倒是很「空洞的」。他並沒有具體說出，他認為當今世界最重大、最迫切的問題是甚麼，而第四國際完全不談，或者談得很空洞。況且，我倒在孫先生那文章裡找到一點相反的證據，就是：「明年起，這個國際委員會將在全歐洲建立黨組織，配合各地情況（例如法航工人罷工、德國工人抗議等等）發展工運」。在我看來，這證明就在那次會議上人家也談了當前怎麼辦和怎樣準備迎接革命。也許孫先生認為，這談得很不夠，或者根本錯誤，可是他的文章並沒有這樣說明，只空洞地責備人家不談現在。

從那次孫先生參加國際委員會的會議到現在快七年了，照理孫先生能夠對托派得到較多的了解，至少孫先生應該看過他那次在會場上買的書，可能進一步了解國際委員會實際幹些甚麼或者不幹甚麼，由此提供證據來證明他對托派的判斷。可是他並沒有這樣做，仍舊只是把那篇相當空洞的老文章拿出來。這樣，在那些只要有人罵托派就高興的人也許覺得「有些」甚至很有「趣味」，一般左派讀者恐怕就未必了。在這種情形下，甚至人家想同孫先生嚴肅地討論一下都很難。因為他一味譏笑、指責，卻沒有拿出甚麼像樣的理據。

此外，他還「笑人家沒甚麼勢力」，笑人家會後向出席者募捐。這有甚麼道理、甚麼意思，就留待讀者自己判斷吧。

最後，關於一些無可爭辯的事實，我還想說幾句話。

孫先生說孟戴爾是第四國際總書記，又說他是「斯巴達克主義者」一派的，這兩點都不是事實。第四國際從來沒有總書記這個職位，而孟戴爾從來都不屬於斯巴達克主義者那一派。孟對斯派有許多強烈的批評，有些文獻連中文版都有。孟屬於統一書記局那一派的第四國際，而國際委員會的第四國際是另一派。各種自認的托派多得很，彼此的差別也很大。誰也不能代表全體的托派，更不能為全體托派負責。我個人認為統一書記局那一派是最正統的組織。但這並不表示我認為統一書記局一貫完全正確。我們根本不相信一貫絕對正確的神話。

至於孫先生對另一些歷史事實的說法，例如「寧漢分裂後的大革命、南昌起義等就是托派的策略」，實在令我嘆為觀止。國共合作抗日，可說是共同保衛中華民國或中華民族，沒有聽見別人說過這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那時「社會主義祖國」還沒有在中華大地上誕生呢。

編輯報告

九二一震災已經一年了，這段時間台灣歷經驚人的「變天」巨變，但災區人民的生活卻沒有任何改變，因此我們特別以【被延續的災難】作為本期的主題。劉鳴生〈921與災難政治學〉指出地震揭露了台灣的罪惡之鏈，以及新政權的性質與財團的關係，以致「政權舊換新，問題新如舊」，因此與其期待施政者的善意，弱勢者如何組織起來、擴大行動才是根本自救之道。災盟〈新政府舊絕症〉同樣一針見血地批評新政府與資本的關係，使新舊政府在災區的作法都是相似的，災區重建也就遲遲無法有真正的進展。李文吉〈真不如清末民初！〉比較清初的救災措施，反諷台灣在處理震災上的無能。

全球化的逆流雖然一波波不斷襲捲而來，但對抗全球化的力量也正在集結，雪梨〈馬克思的幽靈在墨爾本徘徊〉報導了近日在澳洲墨爾本舉行「世界經濟論壇會議」(W E F)時，世界反資本主義力量如何異中求同，化約成最大能量的統一戰線及其抗爭的過程。台灣的左翼朋友一向偏好同中求異，而不願異中求同，以致左翼力量一直四分五裂，無法形成一支強大的力量，這是我們亟待克服的課題。另一方面，林涯〈資本全球化的三機關〉，分析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如何透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及世貿組織等國際建制，協助其建立全球經濟宰制的格局。同時，我們轉載了古巴總統卡斯楚在聯合國千年高峰會上的演說稿，向他力抗西方帝國主義強權的勇氣致敬。

過去兩年來，油價曾經出現非常戲劇性地漲跌起伏，俞力工〈石油糾紛之原由〉分析近來油價攀升的原因，以及美國在其中所扮演的操控角色。孫善豪〈台灣意識形態〉，透過李登輝反對兩岸三通的論述，來檢視台灣當前的封閉性。基因科技研究近來出現突破性的發展，人類基因圖解已經初步繪製完成，劉文超〈使古無死者〉卻指出基因密碼的破解乃是地球生態的大浩劫。

《左翼》過去幾期對於兩岸關係與中國大陸社會性質的討論，到《左翼》第十號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高潮，繼上期對兩岸關係及民族與階級關係進行深入分析後，李崇人〈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中)〉接著探討了當前中國大陸社會性質的變化，他並對過去這段期間在《左翼》中有關兩岸關係與中國社會性質討論眾作者的論述進行了一番解讀。此外，汪立峽〈再論“中國道路”和兩岸關係〉則是對稍早蕭喜東及蘇杰等人的評論作了回應。

香港「先驅社」成員南產〈他饑笑什麼？〉是對《左翼》第九號孫善豪〈寫在第四國際邊上〉的回應，南產對於孫善豪有關第四國際及托派的論述是不滿的，並且提出批駁。自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於一九二〇、三〇年代分裂以來，托洛斯基領導的左派反對派一直吸引著大批左派知識份子的投入，而使托派一直有著豐富的理論產出，可惜長期以來受到政治勢力的打壓及托派內部的分裂，以致托派的主張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我們希望今後能夠透過「先驅社」及其他托派朋友的介紹，讓《左翼》讀者對托派的主張與理論，有更多的認識。

《左翼》的園地近來接獲愈來愈多來自海外的高水平具理論性及實踐性文章，我們對此感到雀躍，並期盼所有左翼朋友的共同參與及努力，使《左翼》成為一份廣納各種左翼論述的刊物。

左翼 第十一號

出版日期：2000年9月30日

L ♀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二號



〈爸爸沒有工作久了〉

作者：新波

【政治核變】核四風暴與社運發展

鮮血與硝煙——關於反核

冷眼看右派互鬥胡搞！

史威齊 / 2

卓仁 / 5

羅莎 / 6

歐洲激進左翼一瞥

資本輸出不應該是剝削輸出！

林致良 / 8

蔡志杰 / 12

CHE



從革命基地到美洲自由貿易區——拉丁美洲的世紀抉擇？

關於史詩劇《切·格瓦拉》創作及演出的一些情況

評《切·格瓦拉》

林深靖 / 13

黃紀蘇 / 17

亞子 / 24

【爭鳴與求是】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下）

李崇人 / 27

【特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

黃志龍 / 33

核四風暴與社運發展

史威齊

一、

核四的存廢問題，是陳水扁政權上任以來，最大的政治事件。這其中有許多是政治黨派角力的結果，長期而言，只是一種茶杯裡的風波。但是，從事件中，也可分析出幾件有意思的問題。

廢核四是民進黨長期與國民黨政權抗爭的一個主要議題。這些抗爭，為民進黨吸引了一些深具環保意識選民的支持，並博得一些「正義、進步」的令名。在陳水扁政權聲望不斷下降之際，陳水扁及民進黨都必須儘量保住這些支持群眾。這是陳水扁政權在因廢核四主張而引發政治風異，並透過股市連續下挫在經濟層面反應出來，仍然堅持廢核四主場的一個主要考慮。

然而，「廢核四」即使得以貫徹，民進黨及陳水扁本人亦必為此付出沉重代價。這個教訓將對日益務實化的陳水扁政權及許多民進黨政客們產生刻骨銘心的影響。可以預料，未來若再遇到這類重大政策，民進黨將更難維持抗爭時期的理念，甚至，如果再發生一波股市下滑，民意對陳水扁政府滿意再次大幅度下瀉時，「廢核四」轉成「順從民意要求」的政策大轉彎，亦不無可能。

民進黨中當然也有人真誠地從理念上反核四，而非基於選票的考量，但從陳水扁／民進黨處理「廢核四」事件的過程來看，理念型反核四的民進黨員不可能受到真誠的重視。一旦「廢核四」立場又因現實考慮而再度搖擺，這批理念型民進黨員將再一次受到感情上與認同上的挫傷。民進黨原有的一些理想主義色彩，將在這樣磨損中日漸褪色。

陳政權／民進黨雖然提出發核四後短期內不會缺電及一些替代方案，卻未觸及問題的核心，而且其說詞也說服力不足。支持核四人士，有一深潛的假設，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基本上要沿襲往日「高耗能、輕環保、低工資、重利潤」的路線。且不說這種路線是屬於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資本家自私、傲慢且不懂得自我包裝的產物；即使台灣人民更加溫馴而不懂得抗爭，這種發展路線也不是台灣的天然條件及社會環境長期支撐的，一個非空想型（更加是非政客型）的「廢核」政策，不能迴避全盤反省既有的經濟發展路線。

但這個廢核四最基本的問題，卻從未在陳水扁政權的任何論證中出現。這顯示陳政權／民進黨的「廢核四」政策，選票的考慮還高於理念的堅持。

二、

「廢核四」只是民進黨新政權面臨一系列重大衝突之一。「美濃水庫存續」，兩岸「三通及會談」等等，都將考驗新政權。這系列衝突的背後，有一根本的因素，乃是民進黨殘碎而空想的社會主義理念與台灣資本主義性格的根本矛盾。台灣資產階級看到民進黨竟然在某些地方「玩真的」，必然會在產業出走，股票下降等等地方表達他們對新政權的不安與反抗的壓力。

民進黨或許在初期還能堅持他們一些初衷，但由於缺乏深刻的思想基礎以及全盤政策，民進黨的這些理想不僅無法成為台灣社會改革的動力，反而會成為局勢不安的因素。長此以往，民進黨必有更多人「學會」與現實政治妥協。

民進黨本來就不是一個左翼的政黨。她的某些進步色彩，主要在過去反國民黨的鬥爭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力量」策略下的產物。當然，這裡頭也吸引了一些真誠的進步份子，已如前述。但民進黨的主流思想與左翼理念是十萬八千里的。民進黨的執政，將是促使民進黨內容左右兼容的現狀逐漸分解的契機。

讓民進黨回歸她真實的面貌，這個過程將在未來陳水扁政策面對這類重大案例下逐步開展出來，這個歷史的必然發展，也是台灣左翼力量的能夠有力地興起的先決條件。如眾周知，台灣過去的社會運動與民進黨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這個關係，雖然在一些抗爭的場合，也發揮了一些正面的影響力；但總的來說，並未為台灣的社會改造運動打下一個鞏固的基礎，更未把社會運動帶往具有左翼思想深度的方向。許多人常感嘆近幾年來，台灣的社運低潮，可為明證。歸根究底，民進黨長期介入社運，卻不是真誠地為社運目標而投入（更別說提升運動思想及路線的進步），而主要是為了奪取政權作外圍。這在客觀上，阻礙了台灣左翼運動的成長。

因此，讓民進黨回復她應有的階級性格，使得社運人士及左翼人士不再受其迷惑，得將是台灣左翼運動真正能夠興起的條件。以此觀之，左翼人士應當力圖在廢核四及其他重大公共議題上，提供真正進步的觀點，並以此號召左翼及社運人士，終而往左翼隊伍的建設前進。

三、

陳水扁政權廢核四引起的大風暴，對於左翼朋友還有一個重大的啓示：社會運動必須深化。

從各種民意調查來看，贊成廢核四的人口比率不斷地在提升中。過去民眾之多數傾向反對「廢核四」，主因長期在國民黨執政時期輿論宣傳所致（特別將「廢核四」與台灣經濟將會不振結合在一起）。從許多跡象來看，民眾經過開放而理性的討論，是有可能接受台灣廢核能的主張。

然而，由於台灣長期的民粹政治，致使理性的討論空間並未建立起來。再加上陳水扁政權並未致力於這種開放而理性的討論，遂使官方本來可以較理性處理的公共政策，演變成一個政治大風暴。

許多人把陳水扁政權未能開展這種溫和討論歸咎於陳水扁本人的領導能力之不足以及個性的缺陷。這只是表相之見。根本的原因在於民進黨想要同時討好台灣的資產階級及大量的民間反核力量。這兩者本質上不可兼顧，民進黨卻想兩面討好。民進黨想成爲「全民政黨」，扁政權想成爲「全民政府」，這種企圖兩面討好的做法，反而造成了今日陳水扁團隊的困境。

但姑且讓我們假設扁政權全然地站在反核能的立場。張俊雄院長廢核四政策的宣佈，以及隨之而來民進黨的廢核四說帖，如果我們不事先了解民進黨的階級性格，也可以解釋爲是一種純然進步的政策，是站在反對台灣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事實上，當在野黨聯合起來要罷免陳水扁總統時，不少社運人士站出來挺扁，便可能帶有這種認識。

這些社運人士站出來挺扁，誠然有部份原因是不願意看到更保守、更赤裸裸地站在大資產階級立場的國民黨力量重新獲得政權。更多的原因，在於他們仍然相信民進黨廢核四的真誠與理想性。他們爲張院長廢核四的感性訴求所感動。他們甚至認爲，僅僅是技術性的失誤，竟然使泛國民黨力量獲得輿論如此熱烈的贊揚。進步的反而被指責，這是令人何等慷慨的不公啊！

這些憤慨的真誠之士應該張開眼看看近年來民進黨的蛻變（或暴露其真面目），特別是陳水扁上任以來，種種拉攏大資產階級的作法，不錯，相較於泛國民黨系，民進黨或許有些微較進步之處——但也最多只是「些微」吧了！在整個政治的光譜中，民進黨偏右的本質，早已是包括主流媒體在內多數人的共識了。如果僅僅只是相對於泛國民黨系有「些微」的進步性便值得大力護駕，那麼社運人士的進步性也未免太廉價了。

我們當然不希望台灣的政治滑向更保守的方向。但目前民進黨的位置也決不能令人滿意。社運人士不能只在兩害相權中取其輕，而必須更進一步提出真正進步而深刻的見解，如此，社運才不會成爲政治力量的尾巴！

鮮血與硝煙——關於反核

卓仁

反核或不反核，除了安全性、環保性、及核廢料處理等問題可供考量之外，其實還有其他的面向可供思考。

- 一、核電的發展是軍火工業底下的產物，亦即，當年在美國是以原子武器的研究發展為濫觴。由美國的壟斷資本集團（奇異公司只是其中之一）一手承攬的軍火工業一向有這樣的特性，就是把軍火工業（有時美其名為國防工業）的邊際效益予以擴大，發展出各種商品，推展到各種民生領域，以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 二、這種產軍（產業與軍事）複合的性質，是類似美國這種帝國主義國家普遍的現象。正如同軍國主義的日本當年之所以發動對中國的侵略、對台灣的殖民，與三井、三菱等財閥企圖瓜分世界市場有著絕對的關係。這些帝國主義國家，企業主宰國策，有時藉著船堅砲利的帝國淫威，有時藉著經濟援助或軍事顧問的美名，將一些本國淘汰的垃圾產品或垃圾產業轉移到類似像台灣這樣的弱勢地區或國家。核電，即是其中的一種垃圾產業。
- 三、故而，我們不該忘記，核電這項產業打從娘胎（軍火工業）出生的那一刻起，即沾染了多少鮮血與硝煙——硝煙從帝國主義國家的槍砲冒出來，鮮血從被侵略與被殖民國家的人民胸膛流出來！
- 四、反核，值得喝彩。但是民進黨政權的反核卻是一貫的投機與買辦！所謂投機，是因為他的反核只談環保、安全，卻不談反帝、不敢談反美！所謂買辦，是因為反了核電的同時，還得努力緊抱山姆叔叔的大腿，更大宗的軍火交易，例如飛彈防禦系統（TMD），正秘密或公開的進行。
- 五、民進黨的性質跟國民黨沒什麼兩樣，它們都需要美國的支持，它們都忘了台灣人民在帝國主義鐵蹄之下流過的鮮血，而如今，民進黨正準備用我們的鮮血去澆灌、去滋養美帝的軍火工業，好讓硝煙更為絢爛、更為壯大、更為貪婪的回過頭來再度吸吮我們的鮮血。
- 六、核電可怕，軍火交易更可怕，因為軍火工業正是核電的搖籃與母體。核電遷離我們家後院，不見得會讓我們活得更安全，因為嗜血、嗜戰的軍火工業就矗立在我們家前門。而民進黨，正在開後門趕走核電，開前門迎接軍火工業！ ★

冷眼看右派互鬥胡搞

羅 莎

右派之間的政黨輪替

三月大選「變天」以後，台灣的政治天空發生很大的變化，但變中也有其不變之處，變的是政黨輪替終于出現以及因此產生的政治效應，不變的則是變天之後仍是右派統治的局面事實上並未改變。

如果國民黨、親民黨、新黨代表著台灣右翼政治勢力中較保守主義的一方，相當于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保守黨；民進黨則只是具有較濃厚自由主義色彩的右翼政黨，它的政治主張，扣除民粹主義的部份，事實上與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葉引領風潮的歐洲自由黨有許多相似之處，只不過歐洲的自由黨在一次大戰後都已式微，由左翼的社會民主政黨取代它的地位，但民進黨如日中天的地位似乎暫時還不會動搖。所以三月變天，事實上只是右派之間的政黨輪替，對勞動人民而言，實在沒有太大的意義。

我們把包括民進黨在內的朝野政黨都視為右翼政黨，不是憑空捏造，只要看看三月變天以後，新政權與國政顧問團的大資本家間眉來眼去的醜態，以及在勞工議題上，新政權對縮減工時等攸關勞工權益的政策所持的保守立場，讓人仿佛以為勞委會還是由國民黨在執政。這些議題《左翼》過去幾期都曾有多篇文章論及，因此我們對此就不須再贅述了。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在過去追求資本主義民主化過程的這段期間，民進黨曾經扮演著一定的推動角色，甚至直至目前為止，民進黨內也仍然有一些比較有理想的政治人物，但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的日益成熟與資產階級民主的完成，這些堅持理念與理想性的民進黨人物卻愈來愈邊緣化，甚至有些人還被迫退出了這個他們參與創建的政黨。民進黨的主流正是台灣社會主流的縮影，對於任何改變資本主義體制的主張都是抱持敵視與打壓的態度。

不守遊戲規則的台灣右派

為了維持資本擴大再生產與經濟成長，勢必要有一套配套的穩定政經秩序，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百餘年來早就發展出一套嚴格的遊戲規則，要求參與政治的政黨必須遵守依循。但台灣自蔣經國去世後，才得以還政於資產階級，資本主義民主實施的時間既短，經驗亦極缺乏，加以國家掌握大量資源分配，因此從政者為了盤占位置，爭奪資源，極盡耍賴胡鬧之本事。因為大家都不肯遵守遊戲規則，因此變天後的台灣

並沒有出現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政黨輪替後的秩序與穩定，各黨派都是機關算盡，但所思所為卻不是為黎民百姓著想，一心只是要穩固自己的權力。以國民黨為例，國民黨在國會中仍是第一大黨，但在民間的支持度則已經落居第三位，國民黨自然不願改選，陳水扁看準了這一點，因此膽敢整碗捧來吃，將整個中央政權全部囊括手中，對於國民黨所提的朝野協商及聯合政府的主張完全置之不理，國民黨除了徒呼負負，完全一籌莫展。

但陳水扁不顧民進黨明明在議會中只擁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席次，硬要壟斷政治資源的作法，是很難實現目標的。在弱政府的統治下，台灣經濟已經很難再維持昔日高度成長的局面，這種情勢正如一九九三年日本自民黨下台後的狀況，經濟可能將出現長期的慢性衰退。但權力的傲慢使得陳水扁不但不以更戒慎恐懼的態度面對當前的政經情勢，反而是在與國會第一大黨黨主席連戰會面之際，同時並由行政院院長張俊雄宣布停建核四，這種粗暴的處理方式終於促使在野各政黨組成罷免總統聯盟，構成新政權執政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由於惡搞，民主進步黨的政權維繫竟然要靠李登輝或羅福助兩人中的一位來解決，這真是對新政府及台灣資本主義民主的最大諷刺。

爲了讓核四風暴引發的罷免總統案解套，目前某些支持民進黨的人士主張由立法院提出對行政院的不信任案，以替代在野聯盟的罷免總統案。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如果立法院真能通過不信任案，恰賦予總統解散立法院的機會，新的立院選舉將會導致政治重新洗牌，政局或許能爲之氣象一新。不過，立法院如果真的改選，選後政治生態事實上也無法真正改變，這主要是因爲台灣目前所採取的「複選區單記非讓渡投票制」(SNTV)是一種最有利金權介入、派系運作與個人魅力發揮的選舉制度，因此選來選去，立法院永遠是由金牛、派系、黑道與個人風格驍悍的代表所組成。許多政治學者早就指出，如果台灣的選舉制度不變更，政局向下沈淪的趨勢將會持續下去。近年來，某些民進黨籍的民意代表也需要靠買票才能當選，正是最好的一葉知秋。但台灣所有的政黨與政治人物都不敢去更改這套對於左翼政治勢力發展最不利的選舉制度。

一套不符合資本主義民主政治運作的遊戲規則在台灣實施著，它不但不利於台灣左翼政治力量的發展，也構成整個台灣社會向上提升的嚴重障礙。

左派還要旁觀到幾時？

當右派正因政經危機而陷入焦頭爛額的困境時，台灣的左派又在那裏？在幹什麼？爲什麼一直緘默無言又未能採取任何行動？這種政治缺席的情形究竟還要持續多久？還要以什麼理由來面對社會的質疑？在右派正在互鬥胡搞之際，左翼的朋友除了冷眼旁觀外，是否應該拋棄成見，大家坐下來好好交換一下對形勢的看法，談談對未來的展望，並據此作爲建立左翼隊伍及重新進行社會實踐的基礎。 ★

歐洲激進左翼一瞥

林致良

歐洲的激進左翼運動近年頗有發展，值得向兩岸三地的左派讀者作一簡單介紹。

法國的群眾鬥爭和第四國際的近況

歐洲的工人群眾經歷了右派政府十多年的統治，紛紛起來反抗現狀。95年法國工人的大罷工是明顯的轉捩點。右派總理朱佩政府爲了能得到加入歐洲單一貨幣聯盟，就需要盡快把近六十億美元的財政赤字削減一半。因此朱佩宣佈要「改革」社會保障制度，限制工人領取退休金的資格。公營部門和運輸工人不能接受這個方案，於是發起罷工。堅持了近一個月的罷工得到公眾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但是法國共產黨領導的總工會卻處處束縛住工人的手腳（例如有意爲了分散群眾而把示威分散在巴黎各地舉行，不是集中一地舉行），而且拒絕正式號召總罷工。即使如此，罷工也展現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同時迫使右派總理朱佩下台，拖慢了資產階級的歐洲一體化計劃，也令工人階級恢復一定的自信。大眾開始唾棄右派政黨，選擇投票支持不那麼壞的改良主義政黨，例如社會黨和工黨。現在15個歐洲聯盟國家有13個是社會黨執政。共產黨和綠黨也加入了聯合政府。有人稱這種現象爲「社會民主主義的神奇回歸」。可是，執政的社會黨卻連當初改良主義的承諾也拋棄了。它們繼續執行右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公營部門民營化、解除資本管制，加速資本（特別是金融投機的資本）流動、削減社會福利、收緊保障勞工、婦女和新移民權利的法例。上年它們更支持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扮演新的歐洲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可恥角色。社會黨已背叛了支持它的選民這個事實，迫使群眾尋找新的出路：在議會外，各種各樣的反失業、反全球化行動此起彼落，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例如反失業運動「歐洲進軍」（European Marches）曾於97年和99年兩次發起4、5萬人的遊行，抗議嚴重的失業，工作不穩定和排斥弱勢群體。去年八大國首腦會議期間，倫敦更爆發反全球化示威，而且吸引很多青年參加；在議會內，一些比社會黨更左一點的政黨，包括意大利的「重建共產黨」（Rifondazione），西班牙的「聯合左翼」（United Left），德國的「民主社會主義黨」（PDS），葡萄牙的「左翼聯盟」（Left Block），丹麥的「紅綠聯盟」（Red/Green alliance），希臘的「反資本主義左翼」（Anti-Capitalist Left），挪威的「紅色選舉聯盟」（Red Electoral Block）和蘇格蘭的「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近年都有較大的發展。這些現象都顯示歐洲群眾逐漸趨於激進，

給沈寂了一段時間的激進左翼藉機發展的空間。例如歐洲第四國際的成員都積極參與這些進步群眾運動和政治重組過程。在丹麥和葡萄牙都有第四國際成員能夠以激進左翼政綱成功當選國會議員。

這裡需要簡單介紹第四國際。第四國際(托洛茨基派)是個世界性的革命社會主義派別，而且已有 70 多年歷史。而統一書記局則是各個稱為第四國際的團體中人數最多的一派。今天，第四國際(統一書記局)在全世界大約 40 個國家和地區都有支部或同情組織。在亞洲地區的日本、斯里蘭卡、印度和香港，都有托派團體活動。最近菲律賓新成立的「革命共產黨」(RPMP，有 4,000 成員，包括農村游擊力量)和巴基斯坦的「工人黨」(Pakistan Labour Party，有 2,000 成員)也申請加入國際。在美國，托派運動在 60 年代一度頗有發展，近年卻顯得有點停滯。目前第四國際在美國沒有支部，只有兩個同情組織「社會主義行動」(Socialist Action)和「勞工標準」(Labor Standard)以及參加了「團結」(Solidarity)這個社會主義組織的第四國際支持者。明年年底將舉行第四國際的世界大會，會議將討論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的展望、帝國主義國家狀況、原工人國家的資本主義復辟、同性戀運動和重建社會主義運動等問題。

去年 6 月，第四國際的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和另一個托派組織「工人鬥爭」(Lutte Ouvrier)組成競選聯盟參加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得到 91 萬票(得票率 5.18%)支持，5 位候選人成功當選，包括革共盟的發言人、68 年法國 5 月學運領袖克里文(Alain Krivine)和工人鬥爭的發言人拉吉勒(Arlette Laguiller)。這是托派自二戰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參加選舉取得的又一次好成績。(另一次是 95 年拉吉勒參加法國總統選舉得到 160 萬票，得票率 5.3%)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傳統支持法共的地區，例如巴黎和里昂，今次托派取得的票數比法共的還要多。選舉結果顯示托派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得到愈來愈多的群眾接受和支持，也說明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改良主義路線愈來愈不得人心。托派競選聯盟的政綱核心內容是「為工人和失業者提供緊急計劃」，這個政綱不是抽象地空喊革命，也不是巨細無遺的羅列各種良好意願，而是站在激進左翼的立場提出保衛工人大眾的利益，反對損害工人利益的「社會主義」政府。政綱包括要求在全歐洲實行 35 小時工作制而工資不減、把賺大錢卻仍然裁減工人的企業收歸人民公營。聯盟同時提出爭取一個工人的民主的歐洲，反對財團的不民主的歐洲。

雖然兩個組織仍然存在一些策略上的分歧，但這並不妨礙彼此在選舉上合作。它們也在反對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爭取真正落實 35 小時工作制和保衛非法移民居留權

利等議題上緊密合作。至於彼此的分歧，兩個組織的公開出版物都有專頁繼續討論。

倫敦社會主義陣線反映了新發展

英國的情況也令人注目。今年5月英國舉行倫敦市議會選舉，首相布萊爾屬意的工黨候選人杜森（Dobson）慘敗，而被迫退黨參選的工黨左派代表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卻高票當選市議會主席。新工黨碰了一鼻子灰。利文斯通的當選清楚反映了布萊爾領導下的新工黨的危機。三年前，就是因為群眾對保守黨18年的反動統治受夠了，才支持工黨把保守黨拉下馬。新工黨上台後卻執行沒有保守黨的保守黨路線，繼續推動郵政、鐵路、地下鐵民營化、出售公營房屋、削減醫療等福利開支。名為新的「第三條路線」，其實是進一步遷就大財閥。今次，群眾也借倫敦選舉的機會對新工黨表示受夠了。因此，雖然利文斯通不屬於激進左翼，也無意建立新黨與工黨競爭，但他的當選也饒有意義：顯示群眾不滿新工黨繼續保守黨的新自由化政策，尤其反對政府計劃把倫敦地下鐵民營化。

和利文斯通當選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倫敦社會主義陣線」（London Socialist Alliance）的參選。陣線是由英國6個激進左翼組織組成的。它們是「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前身為工黨戰鬥派）、「工人解放同盟」（AWL）、「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SG，第四國際的英國支部）、「工人力量」（Worker Power）和「英國共產黨」（CPGB，屬原英共非斯大林化的一翼）。是什麼原因促使它們走在一起呢？首先，法國和蘇格蘭的激進左翼近年參選都取得不錯的成績。蘇格蘭近年成立的社會主義黨（SSP）短短一年成員由400人增加至2,000人（須知道全蘇格蘭只有600萬人口），領袖之一的Tommy Sheridan（自稱托派，但不屬於第四國際）成功當選蘇格蘭國會議員。英國左派自然見賢思齊；其次，近期各種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行動吸引到不少青年參加，但是這些青年較受半無政府主義組織或一般非政府組織的影響，與馬克思主義左派的關係較小，這給激進左翼不少的挑戰。左派意識到需要盡量集結力量，才能有效介入運動從而影響運動的發展方向。陣線提出的參選政綱包括要求停止倫敦地鐵民營化計劃和把鐵路重新國有化；政府全面資助全民保健計劃（NHS），反對任何削減和私營化；反對出售國民住宅，保障露宿者的居住權利；爭取削減工時但不減工資；全面改善倫敦市的空氣和水污染；停止警察種族主義和貪污；提供全民的高質量的教育。除了競選宣傳外，陣線也參與各種社會運動，例如協助被削減資源而遭解僱的市政工人組織起來，以及支援非法入境者和要求政治庇護人士的抗爭。

陣線的參選雖然未能贏得議席，但也取得近5萬票支持（得票率3.1%）。對於一

個新成立的激進左翼聯盟來說，這個成績可以算是不錯了。更有價值的是陣線藉著競選散發了幾百萬張傳單和舉辦近 300 次公開集會，向倫敦市民正面宣傳社會主義政綱。陣線舉辦的兩次大型集會，每次都有近千人參加，而且很多都是普通群眾。其次，陣線的組成爲英國激進左翼的聯合邁出第一步，多少消除大眾對激進左派是自我孤立的宗派的表面印象。正如陣線支持者之一、英國著名導演堅盧治(Ken Loach)在一次公開集會上說：「你看，當您們真的聯合起來，是多麼強大！」

目前，陣線正在醞釀成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聯盟，同時積極考慮提出激進左翼自己的政綱和候選人，準備參加下屆英國大選。雖然各左翼團體對下一步要建立的新聯合組織的期望並不完全一致，但是大家都同意新組織應該是多元的、民主的和真正堅持左翼立場的。

以上介紹歐洲激進左翼團體的活動，對兩岸三地的勞動人民和左派人士有什麼意義呢？十年前柏林圍牆的崩潰好像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徹底勝利，甚而永葆青春。有人更說歷史已經終結，人類除了接受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外，不可能也不應該爭取更好的出路。可是三年前亞洲經濟危機的爆發及近年歐美各地的反對全球化的群眾鬥爭，以至第三世界人民的驚人的貧困及社會之瀕於解體，在在說明資本主義的種種固有矛盾（週期性危機、戰爭、對勞動人民及自然生態的野蠻剝削），不僅不曾真正解決，反而日漸加劇。以一個較爲平等的、和平合作的社會代替資本主義，這種需要已經日漸爲更多群眾包括歐洲群眾所痛切感到。

無可否認，歐洲有長久的工運和左翼運動的傳統，工人較有戰鬥性和組織性，一部份工人更有明確的反資本主義意識，能夠成爲激進左翼的支持基礎。這些條件都是我們一般而言較欠缺的。所以，任何外國經驗都不能照搬過來。但是，既然今天大家和歐洲人民同樣面對資產階級政權推行經濟一體化政策（兩岸加入世貿組織只會令這個趨勢加快）的挑戰，那麼三地人民就更迫切需要連結起來、協同戰鬥。台灣的民營化、香港的所謂「改革」以至中國大陸的所謂「重組兼併」，不都是爲了滿足資產階級追逐無限利潤而向工人大眾發動的進攻嗎？如果三地人民不趕快團結起來，恐怕難以抵抗資本的進攻。因此，我以爲，歐洲激進左翼多年主催和爲之努力的國際主義和建立革命社會主義組織等經驗，應該對三地人民探索自我解放的道路有所助益。

★

資本輸出不應該是剝削輸出！

——從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的投資談起

蔡志杰

陳水扁總統在他的中美洲之旅時提到，台灣現在富有了，應當幫助貧困的國家。想必很多台灣人也是這麼想：我們的商人到第三世界去開工廠，或我們開放外籍勞工來台工作，都是在幫貧困的國家製造就業機會，是在「幫助」他們人民的生活。台灣或許是製造了一些就業機會，但台灣的資本家有提供良好的勞動條件嗎？

台灣的勞工可能還會這麼想：台灣的工廠搬到外國，或外勞來台灣工作，是外國的工人搶走了本地工人的工作。表面上是這樣沒有錯，但資本家為什麼要把工廠搬到國外、要用外勞呢？還不是廉價勞動力的關係，因為有些國家的工資比台灣更便宜。

以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的投資為例，經尼國成衣、紡織、皮革與製鞋工會聯盟的調查，有以下欺壓工人與違反當地勞動法的劣行：鎮壓合法工會、開除工會幹部；超長工時、每週工時七十小時；超低工資、每小時不超過新台幣 15 元；禁止使用醫療保健設施；開除懷孕期女工及解僱黑名單等等。這些事，甚至致使五個美國國會議員寫信給阿扁，希望阿扁影響年興改善勞動條件。

在全球化經濟的時代，資本的外移或引進外勞當然是對勞工權益的重大威脅，只要資本家能找到更廉價的勞動力，資本家就可以利用不同國勞工間的差別待遇對勞工各個擊破，破壞全世界工人的團結；反過來說，如果全世界的工資和勞動條件都是一樣的，即使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它也不一定會走，因為走到哪裡都是一樣，除非資本家能抓到大猩猩或外星人做工，否則資本不再能威脅工人。

更重要的是，這種勞動條件的國際化必須是「向上提昇」而不是「向下沉淪」，也就是說，全世界的勞動條件必須向勞工權益高的國家看齊，而不是向勞動條件差的國家看齊，而且勞動條件相對好的工人必須「幫助」條件相對差的工人。只要世界上還有比台灣的勞動條件更差的地方，資本家就可以威脅台灣工人，台灣的勞動條件就有被往下拉的可能，這也就是勞工團體要提倡本勞與外勞同工同酬，以及支援外國工運的重要原因。

被年興開除的尼加拉工工人已發動抗爭行動，針對年興案，敬仁、亞太勞動快訊社及苦勞網等本地團體及個人也組成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將持續關注此項議題，並配合尼國工人適時發動相關聲援活動。有興趣的人，可密切注意苦勞網 (<http://coolloud.org>) 上的消息，並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本文與《敬仁勞工安全衛生雜誌》第 26 期同步刊載)



從革命基地到美洲自由貿易區

——拉丁美洲的世紀抉擇？

林深靖

1967年10月18日，古巴人民聚集在哈瓦那的革命廣場，追悼在游擊戰中犧牲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當時擔任革命政府總理的卡斯楚發表了一篇情深義重的悼文，將他的革命伙伴“切”與19世紀帶領古巴獨立運動的詩人英雄何塞·馬蒂（Jose Marti，1853-1895）相比擬。當年馬蒂看到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雖已獲得獨立主權的地位，人民卻並沒有從殖民經濟的壓迫下解放出來，他提出一個鮮明的主張：“政治自由只有伴之以經濟獨立才是可能的。”

以革命解決飢餓和痛苦

然而，拉丁美洲國家做為美國的後院，經濟自主即意味著脫離山姆大叔所主導的區域秩序，美國決不願意看到“後院”中賞心悅目的花草變成刺眼的荊棘。早在1881年，當古巴還是西班牙殖民地的時候，美國駐古巴領事即在一份述職報告書中說：“古巴雖然在政治上仍歸屬於西班牙，在商業上卻已是美國的附屬國。”1899年，古巴人民趕走西班牙部隊，美國隨即對古巴進行軍事占領，由美軍將領擔任古巴總督，並宣布解散領導古巴獨立運動的民族解放軍。直到1902年，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權穩固之後，美軍才撤離古巴。

從1902年到1958年卡斯特及格瓦拉等人所帶領的游擊武力推翻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1901-1973）親美獨裁政權，古巴一直是處於半殖民地的狀態。透過“美國蔗糖提煉公司”的糖業托拉斯，美國大量榨取蔗糖產業的剩餘價值，迅速累積資本，進而控制了古巴的鐵路、採礦、造船、銀行等基礎部門。在政治、軍事上，美國的控管也從未放鬆。古巴總統基本上是美國利益代理人的角色，美國所提出的必備條件是：“要徹底了解美國的願望……順從美方可能向他提出的建議和忠告。”美國駐古巴大使韋爾斯曾經露骨地表示：“古巴總統有關政府一切日常事務的決策，都要徵求我的意見，這些決策事項包括？政改革、軍隊訓練，乃至所有政府部門人事的任命。”古巴人民對獨裁傀儡政權的武裝鬥爭也屢屢遭到美國軍隊的鎮壓，其中最慘烈的一次是1912年對黑人起義者的大屠殺，死亡人數超過3000人。

因此，卡斯楚在取得勝利，並於1961年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場反帝的“社會主義

革命"之後，很快就激怒了美國。在組織僱傭軍武裝入侵古巴失敗之後，美國於1962年2月脅迫"美洲國家組織"做出開除古巴的決議，同年10月，又爆發加勒比海導彈危機，戰爭衝突一觸即發。從此，美國與古巴始終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美國運用其政經影響力，對古巴施行無限期禁運與封鎖的經濟制裁，並將其列為"流氓國家"黑名單的首位。

古巴經歷了400餘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壓榨剝削，人民長期陷於飢餓與痛苦，其民族解放、經濟自主的強烈意願可以想見。卡斯楚很清楚地認識到："在不發達國家中，唯一能夠解決飢餓和痛苦問題的是革命，那種真正改變社會結構，徹底消滅社會桎梏，終止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和無謂開銷的革命，那種使人民可以專心致志於有計劃的和平勞動的革命。"然而，美國對古巴全力封鎖和孤立的政策，更促使許多人認識到一國社會主義的艱困：古巴的解放並不意味著革命的成功，如果革命無法在更廣大的拉丁美洲大陸上開展，那麼，古巴即使僥倖勝利，其基礎也是十分脆弱的。

以鐵鏈串起拉丁美洲

於是，阿根廷醫生出身的切·格瓦拉，在參與古巴革命推翻舊政權之後，他放棄了部長的職位，於1966年11月7日帶領一群革命夥伴潛入玻利維亞，建立游擊隊的"國際基地"。以此作為"大陸革命指揮部"，訓練拉美各國游擊隊骨幹，輸送武裝力量，建立新的游擊中心。根據格瓦拉的"游擊中心論"，每建立一個游擊中心，就如同安置一個鐵環，鐵環一旦串連起來就是長長的鐵鏈，鐵鏈不斷延伸，直到漫佈整個拉美大陸。

然而，這位在游擊戰過程中常要以醫生身份救治受傷戰俘的革命家，卻在1967年10月8日受傷被俘，次日遭美國中央情報局派駐玻利維亞的特工下令殺害。諷刺的是，格瓦拉以鐵環連成鐵鏈，以鐵鏈串起拉丁美洲的構想，卻是被美國以另一種方式付諸實行："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 簡稱 FTAA)的組建。

"美洲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在1990年由美國共和黨的布希總統首先提出，民主黨柯林頓1992年贏得大選，繼續推動，因此，在國會中獲得兩大黨的共同支持，可謂已是箭在弦上，勢在必行。1994年，美洲高峰會議在邁阿密舉行，除了古巴之外，美洲34個國家的元首或政府首長全部到齊，有關美洲自由貿易區協議事項的談判正式拉開序幕。1998年，在智利的聖地牙哥又舉辦了一次高峰會議，基本上確定於2005年完成多邊協議，"美洲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屆時，美洲南北兩半大陸在歷史上首度以自由貿易區的形式串結在一起，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共同市場，超越



歐洲聯盟，同時，美國在眾多小老弟的簇擁下，更將穩居全球霸主的地位。

其實，拉丁美洲過去並不是沒有自主性的區域結盟，譬如"安第斯山國家共同體"（簡稱 CAN，由哥倫比亞、厄瓜多、委內瑞拉、秘魯等圍繞著安第斯山脈的國家組成），譬如"南方共同市場"（簡稱 Mercosur，組成國家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烏拉圭以及夥伴關係的玻利維亞和智利）。美洲自由貿易區一旦形成，這些既有的結盟關係將形同虛設。

巴西作為拉丁美洲領土最大、最具經貿實力的國家，也不無主導拉美國家結盟的野心。2000年9月1日，巴西總統安利格·卡多索（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還在里約熱內盧召集"安第斯山國家共同體"和"南方共同市場"兩大聯盟的高峰會議，試圖說服大家在2002年以前共同組成一個拉美集團。巴西的目的是希望以集團龍頭的地位與北美洲的老大進行自由貿易區的談判。然而，由於美國也對巴拉圭、烏拉圭等小國採取個別拉攏、擊破的手法，巴西的構想在自己的陣營中就受到掣肘與抵制。

新世代 WTO 的面貌

此外，美國也利用既有的，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所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擴大其對拉美國家的吸引力。譬如，阿根廷就曾經積極爭取加入此一自由貿易協定，甚至主張美洲全面採取美元做為共同貨幣，以避免金融動盪的危機。今年年初，厄瓜多首先試行"美元化"政策，結果引起原住民的集體抗爭，攻佔國會，並導致總統馬華德（Jamil Mahuad）倉皇下台。

"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形成對於新世紀的世界體系將有重大的影響，美國的意志和價值觀將透過這一鏈結全美洲的組合而得以貫徹。事實上，自從1999年底"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西雅圖會議挫敗之後，美國意識到要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經貿自由化的改造有其困難與阻礙，因此，"美洲自由貿易區"成為戰略性的替代工具，允許美國在區域範圍內實現全球範圍難以達成的目標：也就是經貿管制的全面鬆綁、擴大私有化的範疇，將貿易自由化的原則推廣到通訊、勞務、環境、文化、自然資源等"商品"。2000年8月，美國國務卿阿爾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訪問阿根廷，主要目的就是要說服阿根廷政府儘快解除對通訊產品的限制，為美國的跨國企業開啓進入拉美市場的門路。同樣的，美國貿易部長芭兒切夫斯基（Charlene Barchevsky）也公然在墨西哥放話要求墨國不得再保護其國營通訊公司，即刻開放市場，"停止損害美國的利益"。

拉美國家由於有被殖民的經驗，憲法上通常對國有企業和私有產業有明顯的區隔，傾向於國有企業優先的立論。美國則一概將這些保護性的主張視為 " 歧視條款 "，要求逐條廢止。美洲自由貿易區一旦形成，等於是自由化和私有化的保障，禁制了拉美國家有朝一日向保護國有企業和民族產業的方向回歸。美國就此將 " 美洲自由貿易區 " 作為摧毀拉美國家既有貿易壁壘的利器，建構一套適合其跨國公司活動的遊戲規則。這些規模越來越宏偉，胃口也越來越大的跨國產業，將是美國擴大其影響力的灘頭堡。美國的意志一旦得以在美洲的區域性經貿組織貫徹，那麼，也就意味著，未來新世代的 WTO 也將依此面貌打造。

典範的力量

然而，美國的世紀新願景不見得會那麼順心如意。切·格瓦拉雖然已死，拉丁美洲反帝的力量並未從此消亡。格瓦拉多次面臨生死邊緣，卡斯楚曾說，" 切 " 的犧牲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他在那麼多次冒著生命危險的戰鬥中沒有陣亡，才是奇怪！格瓦拉大概也知道他的生死隨時繫於一線之間，因此，他曾說過：只要還有一個耳朵能聽進他的戰鬥號召，只要還有一隻手能伸過來接過他的槍，那麼不管在任何地方他突然喪命，都可以死而瞑目。

" 聽進他戰鬥號召的，不只是一個耳朵，而將是千百萬個耳朵；伸出來接過武器的，不只是一隻手，而將是千百萬隻手。 " 這是卡斯楚的悼詞，他稱頌格瓦拉是 " 革命戰爭藝術的巨匠 "，是一種 " 典範的力量 "，肉體可以被消滅，典範的力量卻是不可戰勝的。的確，拉美各國反抗獨裁、反對資本帝國壓迫的游擊力量，從格瓦拉縱橫拉美的60年代，歷經烽火蔓延的70年代，到80年代以後雖然大為消沉，卻像是一個個埋藏的鐵環，隨時都可能從隱身的地方冒出。

譬如，在墨西哥的查巴斯 (Chiapas) 地區，一股以印第安人為主力的 " 札巴塔主義民族解放軍 " (EZLN，札巴塔取自 20 世紀初農民革命家 Emiliano Zapata 的名字)，依然十分活躍。領導解放軍的是一個迷樣的人物，人稱 " 馬克士少校 " (Sous-commandant Marcos)。這位少校神出鬼沒，至今沒有幾個人見過他的真面目。他文筆一流，雄辯滔滔，有幾度蒙面荷槍，秘密召集國際媒體舉行 " 游擊記者會 "。他在今年 7 月發表了一篇題為〈知識分子右翼與自由派法西斯主義〉的長文，隨即被譯為多種語文在國際媒體上刊登。這篇文章的最後一句話是：" 諸位，別忘了，觀念同樣可以作為武器。 "

格瓦拉的戰鬥號召被聽見了，他的武器被接過去了，他堅韌、浪漫而又充滿智慧的靈魂甚至也將在每一個世代重現！





今年四月到五月，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小劇場上演了一齣名為《切·格瓦拉》的現代史詩劇，該劇的演出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僅是因為演出場場爆滿，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從校園、平面媒體到網絡上，各種不同立場、觀點的激辯圍繞著這部戲展開。辯論有對該劇的藝術表現的褒貶，但最主要的是針對該戲的主題——格瓦拉的精神，以及由此引申出的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等問題的辯論，這場討論為大陸文藝界、思想界激起了一波不算小的風浪。

本刊特別選載了兩篇關於這部戲的文章。第一篇〈關於史詩劇《切·格瓦拉》創作及演出的一些情況〉是這部戲的編劇黃紀蘇先生在演出後對該戲的創作、演出情況以及各種討論所作的回應與總結；另一篇〈評《切·格瓦拉》〉是文藝理論研究者亞子對該劇的現實意義及其不足之處所作的評論。

關於史詩劇《切·格瓦拉》 創作及演出的一些情況

黃紀蘇

《切·格瓦拉》演出期間，常常散場後有觀眾和我們在劇場門口，在街燈下，在周圍的小飯館裡，在深夜的電話中繼續劇中話題的討論，戲劇小舞台無形中伸展到人間大舞台。格瓦拉這位人類正義事業的使徒和殉道者所具有的永恆現實性，本是我們創作的起點，但《切》劇所引起的反響之強烈，卻為我們始料所不及。以下就本劇創作的初衷、演出情況、社會反響三個方面做一簡要回顧。

一、為什麼要創作這部戲

這個問題經常分解為三小問：(1)你們為什麼要搞戲？(2)為什麼選擇格瓦拉？(3)你們有什麼“特別”背景沒有？

《切》劇屬集體創作，這個集體的幾個主要成員無一從事專業戲劇創作。沈林的本職是西方戲劇理論研究，張廣天從事的是工業化時代民間音樂的研究與實踐，我本

人則是社會科學工作者。應該說，我們參與文藝特別是戲劇創作活動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為知識分子，作為認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偉大傳統的當代讀書人，思考天人古今、關心國計民生是我們生不能辭、死而後已的義務。至于以什麼樣的形式擔當起這種責任，則並不重要。去年雜文，今年戲劇，明年數來寶也說不定。但有一點，只要我們從事藝術，那就肯定是有感而發的藝術、載道的藝術、為人生的藝術；只要我們從事戲劇，那就肯定不是為了戲劇的戲劇、醉生夢死的戲劇、脫離人民的戲劇。

為什麼選擇格瓦拉？直截了當地說，格瓦拉對於我們只是一個載體，當然是最合適的載體。其承載的，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命運的思考和感受。引一段我們在創作之前寫的《創作思想大綱》：

我們將要在舞台上塑造一個怎樣的格瓦拉呢？通過這位格瓦拉我們將要向觀眾傳達些什麼呢？

本世紀以來，世界大戰、經濟危機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矛盾衝突，將人類帶入空前的浩劫，使人民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而對貫穿整個人類文明史的生活原則——剝削壓迫——發生了深刻的懷疑。民族解放運動一時波瀾壯闊，社會主義思想一時深入人心。格瓦拉正是在這樣背景下產生的時代英雄。他不是那種禮花式的政治明星，而是真正地體現了對舊世界的徹底否定，對正義理想社會不屈不撓的追求。

歷史並沒有隨革命的血與火飛流直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經歷一番風雨飄搖之後終於穩住了陣腳。舊世界的新一代統治者痛定思痛，在各個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以緩和社會矛盾，使人民在花花綠綠的小恩小惠面前忘記或默認了被剝奪的事實。他們還把全世界的財富巧取豪奪到幾個資本主義“窗口”國家，然後鑼鼓喧天地向全人類舉辦“資本主義成就展”。八、九十年代保守主義張牙舞爪、新自由主義風行一時，“全球化”、“市場化”之說甚囂塵上。資本主義儼然“長宜子孫”了。與此同時，處在舊社會滔天汪洋包圍滲透下的新社會，倒是險象環生，終於一朝傾潰。昔日的革命者爭先恐後地浪子回頭，到各處的憶苦思甜會上哭訴革命的“暴政”，摩挲資本家的紅包。為換取剝削社會的良民証，他們公開放棄了對正義的追求、理想的探索，當眾宣布與格瓦拉們的事業一刀兩斷——就像我們局長處長們在去美國的簽證表上紛紛脫黨那樣。如此看來，我們舞台上的格瓦拉就不僅僅要立於五六十年代的風雲前了，他還要立於八九十年代的反思前，更要立於對反思的反思、也就是世紀末的回想前。

我們從格瓦拉的一生中選取了幾個片斷，讓它們和我們的現實生活發生意義的聯繫。比如第一幕“格拉瑪號起航”，我們把格拉瑪號從社會主義革命如日中天的五六十年代，放到社會主義在全球失敗的世紀末，重新思考人類追求平等大同的事業究竟能還是不能，該還是不該。又比如第二幕“人間長街”，通過格瓦拉學生時代漫游南



美大陸，從中產階級走向底層人民，從街北走向街南，我們在舞台上就貧富這一最具社會本質意義的問題展開了一場辯論。再如第三幕“建設新社會”，我們對社會主義這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走出社會叢林的偉大嘗試及其艱難歷程做了沉痛的回顧。總之，格瓦拉可以說是一面鏡，給現實一個打量自己的機會；也可以說是一條船，裝著對過去現在的思考，駛向未來。

關於“特殊背景”問題，曾輾轉聽到一些議論，說《切·格瓦拉》必定有“來頭”。不過某觀眾曾援引某名流的話：這是幾個“無門無宗”的人搞的一齣標新立異的戲。我們知道，名流從入門混到掌門，對各家各派的譜系無不爛熟於心，他們的見解應該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我們這些人的確都是再普通不過的平民百姓，甚至黨員也沒有一個。做這齣戲，根據的是獨立思考，進行的是獨立表達。比起拋出共產股吃進資本股、整日在外國基金會左近熟悉地形的所謂“自由”精英，我們真要純粹出不少百分點。“談藝不入文社，論世不緣政黨”之類的佳話暫時還輪不到他們。

二、關於演出的一些情況

包括加演的三場，（為貧困大學生）義演的一場，《切》劇一共上演了三十七場，平均上座率達120%，共接待了一萬多次的觀眾，有時過道都坐滿了人，遲到觀眾站著看的情況並不少見，筆者就從家裡帶去幾個折疊凳以備不時之需。演出真正達到了媒體所說的“火爆”程度，票房自是“不俗”。有些城市和大學還邀請我們去他們那兒演出。

關於演出的效果，媒體使用了“震撼人心”之類的描述，與我們了解到的情況相核對，大體屬實。當然“震撼”並不就意味著認同，有觀眾看了戲“整個找不著東南西北了”，有觀眾看了戲“對生活開始迷惑”了，又有觀眾“出了一頭冷汗”，還有觀眾聽了某段台詞“想落荒而逃”，這些都在證明該劇的效果以及效果的多向性。連看兩遍的觀眾大有人在，不少人看了五六場，最多的一位竟達十二場。這不免使人想到《泰坦尼克號》上演時的情況，並進一步思索爭奪青年、爭奪心靈的文化戰爭。難怪自由主義學者認為《切》劇在搞“精神吸毒”，難怪自由主義作家嘆息，“這是人們，尤其是生活在21世紀之初的北京人和中國人的悲哀之所在”。

這次演出最有意思的一點，是它以突出的思想內容和明確的社會功能改變了現有話劇觀眾的結構。大約前十場，來的還是傳統的小劇場觀眾，即實驗、先鋒藝術的愛好者。在那之後，就有大學生絡繹不絕地到來，約占去了觀眾總數的40%，印象中以清華、北航的同學最多。再就是不少老同志。天津趕來的一位女觀眾，用她的話說，是“普通退休職員”，在聽了電台播放的實況錄音後，十幾個朋友在電話上進行了長久熱烈的討論。她在演出後的座談中作了動情的發言。看著老人拄著雙拐走出劇場



的樣子，我們整個演出集體受到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一些單位還專門組織黨員來看戲，有同志開玩笑說，這裡快成“三講”基地了。

我們平日聽到不少藝術“規律”如何、藝術市場怎樣的教條，意思不外乎把文藝定做三陪，將觀眾視為嫖客，讓老鴇也似的文化商人撈得腦滿腸肥。這種教條大行其道的結果，文藝領域風雷息而風情煽，風月長而風雲暫，充耳的是淫聲，累牘的是肉色。我們這次演出，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他們的花花規律，証明了文藝絕不是“下半身”的一統江山，正氣一樣會搖蕩人心，高尚一樣能贏得市場。亞子說這次演出“是文藝界的平型關戰役，打破了二十年來右派不可戰勝的神話”，這當然是過譽，不過我們總算在“歷史終結”“告別革命”的水潭裡丟了一塊石頭，給逍遙其中或正寬衣解帶的人煞了回風景。

三、社會反響

有媒體在《切》劇演出不久便指出，這不僅僅是“一次戲劇行動，也是一次社會行動”。為人生的藝術理應如此，我們所極力追慕的興觀群怨、文以載道的屈杜傳統歷來如此。戲劇小舞台如果不能通向世界大舞台，滿台的活色生香都只不過行屍走肉。應該說，《切》劇的特點在於它觸及了重大現實歷史問題，它的意義在於觸發了大家對這些問題的思緒。“亞子”寫到：

在這裡，切·格瓦拉本人構成了一個偉大論壇，因他的缺席而形成的戲劇空間極大地擴展了該史詩劇的思想容量。緊緊圍繞貧富問題、壓迫與反抗、歷史與人性、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重大問題，在正反人物之間，藝術化地展開了短兵相接的激辯。

對《切》劇的反應見仁見智，毀譽勢同水火。一位從鄭州專程趕來的觀眾，說這是他“二十年來最痛快的一天”；而網上的一篇文章，則說這是“二十年中國話劇的奇恥大辱”。處於中間狀態的則游移徘徊，矛盾重重。有位中年女記者對我說：“結尾的時候我也流著淚唱《國際歌》，但一邊唱我一邊對自己說，不行不行，社會主義就是沒救了，中國就是沒戲了。”每天演出後我們都和觀眾座談，一問一答不免演成不同觀點、價值、立場的激烈交鋒。例如一次有位老者厲聲喝問：“那你們如何看待輸出革命！”我們也不禁火起：“那是因為帝國主義在輸出反革命！”有時辯論就在觀眾之間展開。一位中年男觀眾在歷數社會主義累累“罪行”、認定只有美國才真正代表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時，被一位大學生打斷：眼光應該放遠點，社會主義畢竟剛剛幾十年，一時失敗不等於永遠失敗。一位中年婦女忿忿道：你憑什麼不讓人把話說完，還有沒有民主？！學生身後的老師：正因為我們的大學生敢於打斷你們的話，我



認為中國才有希望！辯論還從劇場擴散開去。有位留美學生約我改日繼續探討。後來我們就前東歐解體後的命運、就民主自由問題、專制問題、知識分子問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平等、人性等等交換了意見。有位記者告訴我，他到西安去，也聽人家議論這齣戲，“什麼意見都有”。另一位記者最近來電話說，他一篇評論文章競寫了幾個星期還是覺得思緒不清，以往寫劇評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以下將這些反應分為正、反、中三種，並稍作分析。

持肯定意見的觀眾幾乎都為該劇所宣揚的正氣所打動，很多人能夠認同格瓦拉身上所體現的價值觀和生活原則。幾位從事新聞外交工作的老同志在演後座談中熱淚盈眶，說目前社會上自私自利歪風邪氣盛行，正需要一聲春雷。一位青年觀眾說，“這個戲反映了正義與邪惡的較量，它讓我看到不平等、壓迫永遠也無法阻擋正義的聲音出現 -- 這是一種啓示，而且將永遠存在下去。”一位大學生說，“我覺得大學生現在都處在一種迷茫中，憂患意識慢慢地被掩蓋、被埋沒了。這部戲重新點燃了它，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路該怎麼走。”另一位大學生說，“我們對現實已熟視無睹。這齣戲重新觸動我去分析、去思考，辨別善惡是非”。一位中年觀眾說，“謝謝你們告訴我，世界沒有變 -- 真善美沒有變，正義沒有變！”一位母親說，“在當今賺錢為上、做官為上的時代，我們的理想和信念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上？這部戲直指人心。現在的孩子們都是以我為上，我想這部戲也是對年輕人的最好教育。”有位上了年紀的觀眾說，“在忙著崇拜西方的年代，能有這樣的戲，我為現代青年的精神自豪。”一位研究勞工問題的教授說，“我沒想到年輕人在考慮這麼深刻的事情。中國社會的主導思想現在是老板文化，而你們卻為工人、窮人說了話，我非常高興。今天我們系的全體教師都來了，明天我們要組織全體學生來”。

有些觀眾還能從政治的角度去考慮。有一次來了十幾位老部長，最大的已經 87 歲了，其中一位代表他們發言：“當今有人在‘告別革命’，而你們卻在宣揚革命，堅持革命，有很多新思想、新論斷。”有一位觀眾說，“整個世界瀰漫著資產階級的傾向，但無產階級總有一天要重新登上歷史舞台，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早晚要垮台”有位從事新聞工作的中年同志講到“父輩們開創的革命”時不勝感慨，聲淚俱下。

清華有位博士生在給張廣天的長信中反省了自己的經歷，講得樸素真切，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從懂事的時候起，我就看不慣很多不公平的事。看不慣當官的欺侮窮人，搞不懂為什麼父母拼命幹活而收入卻遠遠低於那些什麼也不幹的人，更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高考報志願時我報清華，那時我想我一定好好學習，將來回到家鄉當個市長，好好治一治這些貪官。上了大學以後，感覺眼界一下子開闊多了，竟有些不知所措……

對於國家，勞動人民我卻關心的少了，感覺是漸漸地被這個環境同化了，整天想的是小資產階級情調，還經常無緣無故地感傷（無病呻吟），這就是一年以前的狀態。去年的5月8日，美國的幾顆炸彈炸醒了很多人，也炸醒了我，雖然那時有許多東西還看不清楚，但已經足夠使我產生很大的變化。到今年的三月台灣大選，我的政治熱情（找不到什麼合適的詞）被激發起來了。《切·格瓦拉》則給了這一切劃上了一個完滿的句號，我告別了過去的生活，走上了“革命”的第一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回歸。（這封信在網上發表後，點擊率非常高）

反對的觀點除了在演後座談會上以及私下交談中聽到，還在網上和報刊上讀到不少。這讀到的，因為不存在真人對真面的問題，頗有幾篇直呼我們為“這些傢伙”求求切齒之聲宛如聽到。反對的意見相當成“體系”，而且情與理達到了高度的統一，僅三年五載的社會化絕達不到不了這番境地。例如，覺得格瓦拉是瘋子的人，多半也認為“兩彈一星”無聊，不過“加強了共產黨的暴政”；聽見“革命”二字便反感的人少不了要在藝術上對“活報劇”“廣場劇”嘲諷一番。他們對《切》劇的“質疑”可以歸結為以下三點：1)格瓦拉們的社會理想純屬虛妄；2)格瓦拉們的政治道路通向法西斯；3)資本主義才能拯救人類。總之，是對社會主義全盤否定（而且還要株連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以及庚子年間的義和團），視由美國領銜新羅馬帝國為人間坦途。有位觀眾的發言很有代表性：

所有的革命者都說要帶領人民走向天堂，結果卻把他們引進了地獄，包括格瓦拉、馬克思等人。文化大革命也犯了很多錯誤，兒女反對父母，母親出賣孩子，這是人性的墮落。我覺得改造社會應該用改良的辦法而不是革命。美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強、最發達的國家，誰都願意去美國，不想往窮國家跑。比如，我聽說中國的外交官就不願意去阿爾巴尼亞。

有位作家在評論文章中以跟美國鏖戰了多年的越南為例，進行奚落：“時隔半個世紀，越南人自己戲言，戰爭時期，我們的口號是，趕走了美國佬，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現在，人們說，美國佬回來了，一切問題就會解決。”

其實，持右翼觀點的人不乏和我們一樣疾惡如仇、居心善良的方正之士。大家如今的針鋒相對，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個民族經歷的曲折、求索的艱難。記得有回演後座談會結束了，還有些觀眾還在那裡辯論，一位中年女性異常激越：“這麼多年輕人跟著激動，我覺得太恐怖了！難道四九年那次搶劫還不夠麼！”後來他們邀我到附近的小鋪繼續辯論，大家比較平心靜氣地談了幾個小時。分歧當然不可能消除，但都同意應對一些似乎已不是問題的問題做重新思考。我有時在想，知識分子具有兩重性，他們的屁股既分別坐在他們所代言的階級一邊，但兩腳也插在同一大堆中西書本裡。



他們的分野既是立場的，也是認識的。有時辯來辯去辯出一句“窮人活該”或“人渣就配吃藥渣”，辯論只好結束，因為接下來的是立場或社會存在了。但也不排除有人昨天讀了馬克思於是左傾，今天讀了哈耶克便右轉，來日很可能取中間立場，因為枕邊正放著本《正義論》。立場與認識之間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我們演出集體中一個家道頗殷實的演員，初來時覺得這齣戲是針對她的，聽了台詞直臉紅。後來通過學習思考比較認同了《切》劇的立場，經常在組裡做好人好事。

中間的觀點很值得玩味。有個觀眾說，“《國際歌》響起的時候，我熱淚盈眶，可是走出劇場又回到了現實。這個戲在多大程度上，能像台詞裡說的‘將人心點燃’？”某文學雜誌的負責人說，“看你們的戲流淚激動，但回家以後再一琢磨，不對啊，格瓦拉是行不通的。這個社會有腦無心，可你們的戲是用心無腦。”另有一個年輕觀眾說，“我非常非常願意停留在這齣戲的氣氛中，因為人跟人應該是這個樣子，但問題是戲總要散場，我還要回家”。一位做網絡的青年人在海報上給我寫了一番話，“看了這齣戲，我很受震撼。我不會改變我的生活，但我對自己的生活一定會重新思考。”還有一位觀眾說，“我是一個從文革中過來的人，已經50多了。以前看過格瓦拉的日記，當時我的戰友中有很多人受了他的影響去越南參加抗美援朝，不少都犧牲在越南。撫今追昔，思緒萬千……沒想到你們把格瓦拉和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了。這樣做，很有意義。但轉而一想，又覺得這些問題恐怕永遠解決不了，人類只能得到相對的公平。”這些人大都認同正義理想，但他們所面對的是社會主義新敗、資本主義中興的事實以及各類“歷史終結”的叫囂。

還有些觀眾希望把格瓦拉對於“正義”價值的一般追求，從他對道路的具體選擇中剝離出來，使他成爲一個純粹的大俠：資本主義有罪惡他固然要弔民伐罪，社會主義出了問題他也應一視同仁，斷然倒戈。一位在世行工作的觀眾說“我同意格拉瑪號‘前往前南母親默默流淚的地方，前往戰斧導彈滿天飛舞的地方’，但爲什麼不能前往北朝鮮大飢荒的地方，前往紅色高棉大屠殺的地方，前往斯大林大清洗的地方？”應該說，這種見解具有深刻的合理性，但它在似乎直面現實的同時，卻未能正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南方有位學者對我說，左派具有道德上的優勢和經驗上的劣勢。這話有幾分道理。要想追求一種更人道的生活，就不免要背離四千年虎狼之道的“經驗”，常常落入無所依傍的尷尬境地。理想的正義與路途的艱難既造成了現實政治的分野，也構成了《切》劇的悲劇底色和孤絕姿態。我們戲中有首歌是這樣唱的：“陸地淹沒了/你就在海上飛翔/海洋乾涸了/你就在天上飛翔/天雷滾動了/你就在火裡飛翔/火焰熄滅了/你就在苦難中飛翔 過去倒下了/你就在未來飛翔/未來退卻了/你就在



現在飛翔 / 現在遲疑了 / 你就在心中飛翔 / 心靈敗壞了 / 你就在創造中飛翔”。以人道為終極目的的社會主義探索，是人類在價值上告別動物世界的一次最悲壯的出走，是一段百折千迴歷程，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史詩。有位觀眾講得非常好：

我是40多歲的人了，一直覺得社會要達到公平和正義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一直在這種矛盾中徘徊。這個戲我已經看了第五場，每次看都受到更深的感染，喚回我內心對正義和理想的渴望和追求，讓我知道自己以後加倍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麼結果。

演出結束後我們在《真理的追求》編輯部召開過一次座談會，在京以及外地甚至海外的學術思想界朋友一共來了幾十位，大家進行了十分坦誠熱烈的交流。亞子在他的文章末尾期待著這齣戲的“理論續篇”。如今社會主義處於低谷，這未嘗不是我們文化思想工作退而結網、檢討過去思索未來的最好季節。這個季節的勞動，將會直接關係到社會主義能否重新出發，格拉瑪號能否再次起航。★

評《切·格瓦拉》

亞子

【一】

史詩劇《切·格瓦拉》在舞台上留下了一個明確的空白：它的第一主人公（就是切本人）處於徹底的隱身狀態，自始至終沒有出現。你看不到格瓦拉本人，他的血肉之軀被完全超越了，昇華為一種精神。在整場戲中，這種精神在舞台和環繞它的觀眾席之間彌散開來，無所不在。有時候，它又凝縮為一個沉穩的男中音，迴盪在劇場上空，在觀眾頭頂，通過揚聲器娓娓敘述自己的事業和理想，平靜而又堅定。

橫空出世，缺少必要的鋪墊、準備和過渡，風暴般的激情和斬釘截鐵般的宣言仿佛從天而降，史詩劇《切·格瓦拉》就這樣出乎意外地登場了，在人藝小劇場，在人間大舞台。儘管如此，史詩劇奪目的光彩卻照亮了它問世的背景。這背景是引人深思的。

九十年代初，冷戰提前結束，兩極對峙所維繫的全球戰略平衡被打破，西方壟斷資本主義大步跨越柏林牆，挾資本、技術和信息之優勢長驅直入，分割世界市場和資源。冷戰結束全面啓動了資本主義全球化。通過不平等的市場競爭，借助權力、陰謀和戰爭，財富和利潤在世界範圍內魔術般地重新分配。歷史仿佛退回十九世紀。戰亂頻仍，金融動蕩，兩極分化，腐敗橫行，億萬人的基本生活瀕於崩潰，普通勞動者的尊嚴成為記憶。人吃人的舊世相就這樣在世紀末的年輕一代面前，重又赤裸裸地、淋漓盡致地展開了。



資本主義在每時每刻再生產其超額利潤的同時，再生產這一體制本身的同時，不可避免地也再生產著它自身的掘墓人。罪行積累著，終有宣判的一天；危機醞釀著，終有爆發的一天。相反相成的是，作為資本主義體制的死敵，馬克思主義的命運同它的學說本身，同它所揭示的真相和規律本身，更準確地說，同它敵人的命運，深刻地糾結在一起。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依照危機、蕭條、復蘇、高漲的程序完成其再生產的周期；當資本主義表面繁榮的時候，馬克思主義曾一次又一次被它的敵人宣判為“過時”；而只有在危機時代，馬克思主義才作為拯救的學說再次降臨世界，重新深入人心，成為人民解放的福音和行動的指南。這就是真理的退隱與復出。

【二】

在其短暫的戰鬥的一生裡，切·格瓦拉從故國阿根廷出發，漫游拉美大陸，投身革命後，參與締造了古巴新政權。爾後，在其事業的巔峰，格瓦拉放棄了其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以自身為火種，前往剛果，前往玻利維亞，以尋求人民解放的燎原之勢。切·格瓦拉集理想主義和俠義剛烈於一身，將之提升為一種訴諸行動的戰鬥的馬列主義，並感動了世紀之交的中國青年。三十二年前，切·格瓦拉仆倒于黑暗的玻利維亞尤羅山峽谷。三十二年後，他的精神通過同名史詩劇重返人間。

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左翼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以後，左翼傳統迅速走向行動，經歷大革命、土地革命、全民抗戰……，直到文化大革命，激烈的左翼傳統在抵達巔峰的同時也面臨深淵。以文革失敗和毛澤東逝世為標誌，七十年代以後，中國左翼傳統和世界範圍的革命遭遇根本性的挫折和逆轉。八十年代，雷根、柴契爾夫人的美英新自由主義經濟出台，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政經路線紛紛易幟，第三世界的武裝鬥爭則煙消火熄。在中國，八十年代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理念在知識界步步為營的時代，與此同時，左翼傳統包括左翼文藝傳統則陷入思想困境，面臨轉型與復興的歷史重任。九十年代，傳統社會主義陣營裂解，資產階級御用文人拋出“歷史終結論”，為資本主義單極獨霸的世界體制提供理論支持，同時宣判了一切反體制運動的死刑。這一輕狂之論，在作為資本主義外圍地區的中國，博得了一片“告別革命”和“躲避崇高”的鼓噪與應和，絕非偶然。

史詩劇《切·格瓦拉》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登場的。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鐵壁合圍，《切·格瓦拉》高聲讚頌革命，讚頌大同理想，讚頌被壓迫者反抗資本主義暴政的權利。在這裡，切·格瓦拉本人構成了一個偉大論壇，因他的缺席而形成的戲劇空間極大地擴展了該史詩劇的思想容量。緊緊圍繞貧富問題、壓迫與反抗、歷史與人性、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重大問題，在正反人物之間，藝術化地展開了短兵相接的激辯。歷史的本質和久違的正義洶涌而來。砰然心動，愴然涕下，流落在舊世界的戰士仿佛從中聽到了革命的鄉音。

正義蘇醒了，革命的精神和意志重返民間，中國文藝的左翼傳統通過年輕的手筆、聲音和形象絕處逢生。在兩個千年交匯的時刻，這就是《切·格瓦拉》問世的歷史意義。

【三】

在這篇短文的最後一段，我們想指出這部史詩劇的一點不足。

正義的實現，資本主義的最終解體和被一種新社會所取代，需要切·格瓦拉式的戰鬥意志。但是，歷史的滄桑巨變又不僅僅是一種主觀戰鬥意志單方面所能勝任的。如果以苛求的眼光衡量，可以說，正是在“正義的實現”問題上，《切·格瓦拉》暴露了其脆弱和缺憾的另一面。左翼傳統的文藝以感性的力量援助了為革命立論的學說，同樣，它也需要出自同一傳統的理論的支援。

史詩劇以“這是一次還沒看到地平線的遠航，力量懸殊的競爭，不合比例的對抗。／是愚公移山／是精衛填海／是孤島對汪洋／是新生兒對四千年／……是風中飄蕩的種子對大漠荒灘”來形容革命，這些動人的詩句在對孤絕的戰鬥意志頌揚的同時，是對成熟的革命條件的忽略。僅僅有道義的讚頌或譴責是不夠的，道義應當與科學的論證和預見挽臂攜手而行，這一點毋庸置疑。

資本主義體制注定覆滅的命運，不僅是由於它的不義，而且是源於該體制內在的、無法避免的矛盾和危機。生產與消費，即生產能力的無限擴大與社會購買力的相對縮小，構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的積累和深化終將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流通、消費、投資、再生產之間的循環發生致命的中斷，從而導致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的爆發。資本主義通過全球化將其剩餘產品和資本投向全球範圍，在特定時期內，固然緩解了其單個社會內部的矛盾；但全球化的結果也使資本主義體制的基本矛盾在全球範圍內積累和展開，並終將導致世界性的總危機。這個總危機的到來，就是下一波世界革命的前提。

人只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創造歷史。在這一問題上，重溫毛澤東主席在井岡山時期有關中國革命的國內外客觀條件的論述，仍然是必要的。實際上，切·格瓦拉本人在其著名的《游擊戰法》中也諄諄指出：“革命，在歷史的洪流中，就像一位協助新生命誕生的醫生：除非必要，他不會使用鉗子，但當需要的時候，他會毫不猶豫地使用它。”行文中同樣強調了“客觀條件”的成熟。在今天，迫切需要一種從被壓迫者立場出發的、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當前進程和未來危機進行細致說明和展望的理論，這將是一門以政治經濟學為軸心的綜合的“社會科學”。

以四千年的歷史縱深感，《切·格瓦拉》提出了“正義”問題並呼喚著“正義”的實現。可以說，正是圍繞這一基本問題的解答，史詩劇期待著它的理論續篇。 ★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下)

李崇人

中國大陸完全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會不會喪失自主權淪為屈從於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依附型資本主義國家呢？這是左翼陣營中許多人關心甚至憂心的問題。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或半外圍國家能否在世界體系的層級結構中，經過慘烈的國際競爭，由下而上逐步躍升為中心國家，在左翼的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中有不同的看法。阿明(Samir Amin)抱持較悲觀的看法，而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則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參考：Amin 1976、1990；Wallerstein 1979)

「脫鉤」(delinking)的真正涵義

阿明對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推崇備至。多年來，他積極鼓吹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periphery)的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生產體系與中心國家脫鉤(delink)，以免受制於中心國家的壟斷資本擴張的運動邏輯，這樣才可望進行以本國為中心的(auto-centric)發展，建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否則無以擺脫被帝國主義殖民造成的經濟各部門支離(disarticulation)、生產率不平衡從而依附於中心國家的悲運。阿明的“脫鉤論”(delinking)，正是以毛澤東的路線做為典範的。不過，「自力更生」並不意味閉關自守，斷絕對外貿易。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世界近乎隔絕的狀態，主要是美國帝國主義企圖扼殺中國社會主義勢力於襁褓之中而實行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初非毛澤東所願。阿明也極力澄清，絕不能把他的“脫鉤論”混同於閉關自守的“自給自足”(autarky)。他指出，外圍國家由於自然資源不足，技術落後，也難以製造精密的資本品，不能不從事出口貿易換取外匯，進口短缺的物資與技術，這是迫於無奈的“必要之惡”，只能力求減少負擔而無法避免。阿明再三強調，“所謂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意指國家的發展戰略立足於本國的社會生產關係與價值規律，而不根據中心國家所主導的“比較優勢”、國際分工、“世界價格”行事。換句話說，對外交換應服從於本國發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讓國家發展受制於中心國家資本擴張的要求(以上參見：Amin 1990a：18-19 62-83, 132-133)。

中國大陸正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號召億萬勞動人民發揮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實行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的發展戰略才創造出前述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無的優越條

件。使中國在飽經百年的帝國主義掠奪與兵連禍結後，從衰病交侵中，淬鍊成精壯結實。因此，中國大陸在鄧小平路線下，重新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便具有比一般第三世界國家更強的競爭力。

民族資產階級國家的要件

眾所周知，形式上取得政治獨立的國家，實質上仍可能遭到帝國主義的中心國家以新殖民主義的方式控制其經濟乃至軍事、文化。阿明指出，外圍國家的資產階級就算掌握國家機器，只要還不能控制本地的資本積累過程，就稱不上是真正的民族資本主義國家，其資產階級也就不夠資格稱為民族資產階級。

阿明進一步闡釋說，所謂“積累的控制”是指本地的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控制了積累過程的五個必要條件：

- 一、勞動力的再生產。這意味：第一步，國家的政策要確保農業發展能生產足夠多的餘糧，且在價格上能讓資本獲利，第二步，工資消費品的生產量須能同時跟上資本與工資總量的擴張；
- 二、剩餘的集中。這意味：不僅要有國家的金融機構，而且這些金融機構對跨國資本的流動有相對的自主性。這樣才能確保本國引導投資方向的能力；
- 三、為本國產品保留大部分的國內市場，甚至在沒有高關稅或其他保護措施下，也能做到這一點；並且在世界市場上也有競爭力，至少是特別選定的產品要有競爭力；
- 四、自然資源。這意味：除了有形式上的所有權，國家要有能力開發或留為貯存。就這點來說，第三世界的產油國並不真正控制了本國的油源，因為，就算它們寧可讓石油保存在地下而不願持有隨時可被剝奪的金融資源，也無法自行“關掉龍頭”；
- 五、由本國控制技術。這是指，技術不論是本國發明或是進口的，都可以很快地再行複製，不用不斷進口生產設備、製程技術等必要的投入品；

阿明認為，只有控制了這五個社會再生產要件的國家與資產階級才可當民族資產階級與國家之名而無愧，而民族資產階級國家的建立也就等於是「以本國為中心的民族經濟」的形式（Amin 1990a：10 - 11）。

照阿明的標準，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大體上符合民族資產階級國家的要件，雖不中亦不遠。阿明近年來認為，中國已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構成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

極，且成爲亞洲經濟的支柱（參見 Amin 1997）。

中國會不會喪失自主性？

當然，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加入WTO之後，工業、農業、金融業等各領域會否受到重大衝擊，因而改變了現有的經濟格局，引發社會、政治的動盪，從而削弱其政治、經濟的自主性？這涉及到對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評估問題。大陸的科技部部長朱麗蘭今年在接受台灣《天下雜誌》專訪時表示：「想後來居上，不靠科技，沒門！」對於大陸集中兩百多個專家在清華大學搞的CIMS（計算機集成製造系統）示範工程在95年得到美國大學領先獎，朱麗蘭頗爲自得地說：「這就說明我們從空白開始，靠自己的力量，同樣可以走到世界的前頭。所以我們整個發展高科技的思想，就是叫頂天立地。你得有自己的創新，不是盲目自大說頂整個的天，這不可能，但是在有些方面是可以完全自主，可以從沒有走到前頭去的。」對於加入WTO，朱麗蘭更神氣十足地說：「我們一點都不害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更大的一種推動力，因爲我們不想侵犯人家的智產權，同時更大的開放，對保護我們自己的知識產權是有好處，激勵科技人員更突出創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推動力。」（《天下雜誌》，第231期，2000年8月1日）。

從朱麗蘭的思維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經過前三十年的艱苦奮鬥已打下從無到有的深厚根基，累積了一些家底，在高科技領域有本錢也有膽子，敢在世界市場上與經濟大國一爭長短。至於實際較量的結果如何，目前還言之過早。「頂天立地」的豪情壯志，若因戰略失當，也可能落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可悲下場。我們特別重視高科技領域的情況是因爲技術的壟斷控制已是帝國主義國家駕馭、榨取發展中國家的主要手段，技術租金成爲壟斷利潤的主要來源。正如阿明所指出的：「有理由認爲，技術的依附將逐漸取代直接的佔有來進行支配。只要壟斷了特定型態的設備的供給，售後服務、零部件的供給、專利，加上所有各式各樣的“善意”，就越來越有可能榨取一家企業的大量剩餘價值，而根本不需要擁有該企業的法定所有權。今天已經可以設想一種工業雖然是本國所有，甚至是公有的完全依附型經濟。」（Amin，1976：251）換句話說，經濟的所有制已不是關鍵所在。只要你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參與國際分工，照中心國家根據其勞動生產率規定的社會勞動必要時間而決定的世界市場價格，遵循中心國家運用政治、經濟實力規定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在世界體系內進行競爭，那麼不管你掛的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招牌，企業是公有或私有，都會受制於同樣的經濟規律，接受同樣殘酷的考驗。

二十多年來，中共的鄧小平派熱衷於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忙著所謂「與國際

接軌」，有心在世界市場上奮力拼搏，冀望榮登為中心大國。這是場世紀大賭注，對全中國（包括香港、台灣）都會有關鍵性的影響。勝負如何？目前尚難論斷。這主要取決於幾項因素：農業的經營體制與生產效果、離農以及（或者）離鄉的農民如何安頓？工業結構的調整及民族工業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失業工人的數量與處置方式、金融業的經營體制與效率、經濟結構轉型後的收入分配方式以及政權的穩定性等等。

可以預見，中國大陸走資的勢頭不到走不下去是不會回頭的。這一方面是中共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了徹底否定文革，連帶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不少正確的成份，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大開方便之門，另一方面，國際上自八〇年代後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九〇年代初，東歐、蘇聯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所謂“沒有其他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TINA症候群更成了右派振振有詞的藉口。

中國大陸的資產階級學者與中共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假借改革之名，正在磨刀霍霍合謀將國有資產或凌遲、肢解，或待機與內外資本鯨吞國有企業。中共十五大給股份制開了綠燈後，資產階級學者笑逐顏開，喜孜孜地相互致賀：「私有化的閘門已經啟動了！」加入WTO後，大陸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將與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同心協力聯手加速推動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深化，足無可置疑的。面對資本主義的狂瀾滔天而至，中國的左翼在道德的義憤填膺之餘，還應當通過全面的調查研究，做出深刻的政治經濟分析，準確掌握局勢的變動，與受損害的人民同呼吸、共命運，防止中國大陸出現土崩瓦解的危局，更重要的是，結合理論與實踐找出一條可行的社會主義新模式以因應新時期客觀現實的變化。這是一個艱苦繁難的過程，但若不披荆斬棘以啓以山林，則中國的社會主義不會有前途，全世界的社會主義也不會有出路，中國的左翼實責無旁貸。

統一的中國經濟圈是大勢所趨

近二十年來，在中共開放大陸市場，港、台資金大量湧入大陸下，港、台、大陸已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國經濟圈。這個趨勢在兩岸加入WTO後，會更加快速的進行。由於兩岸在八〇年代之前的發展戰略不同，兩岸在經濟結構上有高度的互補性。大陸在毛澤東時期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不以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為指導原則，主要著力於重工業、國防工業與高科技，走的是重積累輕消費的路子。台灣則是加入世界體系的國際分工，按照比較優勢論，充當跨國資本的加工出口基地，發展勞力密集的輕工業，急功近利的結果是，重工業的基礎薄弱，基礎科學與高科技都難望大陸項背。因而大大限制了台灣產業結構升級的潛力。八〇年代後，大陸與東南亞也紛紛

效法東亞的加工出口模式，其土地、勞動力成本本來就低於台灣，加上台灣內部勞工與環保運動風起雲湧，更加重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做為台灣加工出口經濟主幹的中小企業除了大量外移大陸與東南亞之外，別無生路。九〇年代後，大陸加速了經濟增長，內部市場擴大，高科技產業也開始茁長，而台灣的生產成本有增無已，政治鬥爭在民主化後更形劇烈，整個投資生產環境日形惡化，催化了台灣企業加速外移至積極招商引資的大陸。而且，此際外移的已不僅是中小型的勞動密集產業，大型企業與電子、信息產業也趨之若鶩地往大陸投資設廠。過去，民進黨一再以危及國家安全的理由堅決反對兩岸三通。近來，從總統陳水扁到大批民進黨立委卻大談三通為台灣經濟發展所必須，李登輝限制台商投資大陸的「戒急用忍」政策已不合時宜，應早日鬆綁。以前聲嘶力竭地高喊的所謂國家安全忽焉置諸腦後，不以為意了。這很鮮明地顯示了客觀現實的發展趨勢。綜而言之，統一的中國大市場的形成是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產生結構性變化的必然結果。

二戰後，中國的分裂是美國利用台灣做為遏制中共的工具所致。八〇年代前，台灣在美國卵翼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中國大陸隔絕，依附在美、日帝國主義下，成為美日經濟圈的附庸，獲得高速的經濟增長。但台灣的依附型經濟並不具備自主發展的能力。八〇年代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丕變，美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支援轉弱，大陸實行經濟的改革開放，台灣的產業結構轉型發生困難，迫使台灣重回中國經濟圈。這些因素使台灣的分離勢力陷於愈來愈不利的處境。

台獨已是日暮途窮

眾所周知，台灣要從中國徹底分離出去，沒有美國的鼎力支持絕無可能。台獨運動從來不具備獨立自主的能力，過去如此，未來也必然如此。面對中國大陸強勁的民族主義，美國若公然支持台獨，就必須冒與北京開戰的危險，這非但將危及美國本土，也破壞了美國推動資本全球化與和平演變中國的大戰略，無論如何是得不償失之舉。在美國看來，台灣進入中國經濟圈，可與全球資本共同戮力演變中國大陸，有利於使中國早日與美國親善，並可降低兩岸的緊張關係，避免美國捲入戰端，這遠比支持台獨符合美國利益。台灣在美國這樣的戰略構想下也只能俯首聽命。主張台獨的陳水扁從總統大選前到僥倖當選後，一再申言，他的兩岸政策會讓美國滿意，即可窺見此中消息。

台灣的漢人無論是血統、語言、宗教無不源自中國，而台灣與大陸近百年的兩度分離又無不為帝國主義所造成。台獨在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大肆煽動反中國的情緒，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這無疑只能製造兩岸人民的仇視對立，尤其為深

懷反帝民族意識的大陸人民所無法容忍。台灣要搞獨立，兩岸只有戰爭一途，絕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這是無可迴避的現實。台獨人士經常自說自話什麼兩岸是遠親近鄰，台灣獨立之後，兩岸可以親善友好，成爲兄弟之邦，這些純屬自欺欺人的痴人說夢。其實台獨要能成功，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敦請美國主子出兵打敗中國。不過，付出的代價卻是，美國從華盛頂到洛杉磯都可能遭到中國核彈攻擊而死傷慘重，台灣也落得個一片斷壁殘垣。姑不論要美國爲台灣建國流血只是天方夜譚，果然成真，請問又對誰有利？從這點來說，台獨只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沒什麼獨立自主可言，從而台獨也沒有什麼左右派之別，思維上都是主觀唯心，實踐上都是帝國主義的奴僕。

最後，我們願再重申本文開首論述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與民族觀點的要旨：根據歷史唯物論，由大的民族國家形成統一的國內大市場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加速社會矛盾的深化，而統一的民族國家是社會主義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條件。明乎此，我們才能理解何以馬克思與恩格斯原本鼓吹以由下而上的人民革命促成德國統一，反對普魯士王朝實行由上而下的統一模式，但在俾斯麥完成德國統一後，依然堅決支持德國的統一，絕不同意德國重回分裂、軟弱的狀態。事實上，階級並非存在真空中，而是具體形成於民族與國家之內。抽離了民族與國家來談論階級是沒有意義的。期望台灣的左翼能認清這個事實，正視兩岸統一的趨勢，爲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盡一份推進之功，那麼世界的社會主義前途也就會多一分希望。



參考書目

- Amin Samir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Y. :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90a)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London : Zed Books.
- (1990b) *Maldevelopment :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Books
- (1992) *Empire of Chaos*.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97)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Zed Book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體制 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 〈一〉

黃志龍

前言

一般來說，開發中國家在發展近代工業時，通常以價格機制、社會壓力和政策誘導等手段來剝奪農業剩餘，造成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之間的二重經濟以及農村與城市之間的雙重構造。

中國大陸當然也不例外——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國大陸在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輕工業部門尚未發達的情況下，以轉移農民的農業剩餘為主要手段，強力推行重工業建設。這種以農業部門為剝取對象，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進行的「強力積累」，在蘇聯「工業化論爭」時期曾引起廣泛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就是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Preobrajensky)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中國大陸正是以建立「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系為手段，轉移農業剩餘來建設重工業體系。

有鑑於此，A.W.路易斯提出「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開發中國家經濟論」，試圖打破這種農村與城市之間、農業與工業之間的「雙重構造」。他的觀點不僅受到美、日以及開發中國家經濟研究者的高度評價，也受到中國農村工業化研究者杜海燕的重視。

日本學者渡邊·利夫以路易斯的方法論為基礎，進一步說明如下：「在人口過剩的低所得農業國家，其經濟發展的途徑應該是將有限的資源優先用於開發農業，以『多期化』*、『多毛化』**提高產能，開發高產量品種，進行與農業相關的基礎建設藉以提高農業生產力。如此，一方面農業生產力的上昇將創造出從事於非農部門的勞動力；一方面，因為農村收入增加，農民所得提高，創造出對工業產品的需求並擴大工業用生產資源的供給，從而促進了農村工業化。農村工業的主要項目是以生產區域性市場所需的成衣、食品加工、雜貨、肥料、農業機械、建築材料等勞力密集工業為

主，這些在各地分散存在的農村工業，逐漸連結而形成一個有機的市場網絡，從而產生對於農村工業資本財（生產財）的市場需求，創造出「後方關連」的產業體系，增大重工業部門在一國工業中的比重。如此，以農業生產力提升為起點所展開的工業化，自然而然的產生「農業／農村工業／重工業」部門之間的互相依存、互為條件的有機聯繫，以阻止雙重構造的發生。」

依照這個邏輯，渡邊·利夫肯定中國鄉鎮企業在工業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他認為中國大陸的農、工部門由於鄉鎮企業的形成而產生了有機聯繫，產生了新的積累和循環機制。

其實，早在A.W.路易斯和渡邊·利夫之前，布哈林就曾針對社會主義建設提出類似的路線。

最近在國際社會主義研討會上，經常出現「替代物」(Alternative)的概念，此一概念意味著：替代「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另類選擇。其實，社會主義體制經濟改革，並非在史達林去世後，為解決1960年前後的經濟停滯而產生的構想。早在1920年代，代表蘇聯「新經濟政策」(NEP)的理論家布哈林，就曾經提出反對「史達林模式」的替代方案，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另一個建設模式。

布哈林的這種見解，為W.Brus、M.Levin、S.Cohen等人所繼承，並在1980年夏天，在「布哈林再評價國際研討會」(由羅馬的葛蘭西(Gramsci)研究所主辦)上被重新認識並成為大會共同的見解。W.Brus在大會中進一步指出，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具有重大意義，是布哈林理論能夠「繼續適用」的證明。

1921年，列寧決定終止「戰時共產主義」，轉而推行「新經濟政策」(NEP)。NEP的就是以「多種所有制並存、重視市場原理、考慮農民利益的漸進性工業化以及從流通過程開始的合作化」等等為主要內容。顯而易見，NEP的這些主張無疑是當前經濟改革的原型。更重要的是，NEP被視為是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所不能跳躍而且必須長期存在的戰略性階段，而不是僅僅為了糾正過火的「戰時共產主義」而出現的暫時性策略。

布哈林繼承並發展了列寧「新經濟政策」，反對由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E. Preobrajensky)所提出並隨後在史達林「重工業優先發展方針」的名義下得到實現的，以「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為手段來進行工業化建設的策略。布哈林主張：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路線，應該重視共產黨與農民的聯盟，以農村經濟富裕化而增大的積累為

基礎，進行漸進的、平衡的工業化。他認為，將農村和城市連結起來的市場關係，在工業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工業的發展必須依靠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農民的購買力越大，工業化的速度就越快。

布哈林的這種觀點，也許是「蘇聯式社會主義」之外的另一個社會主義建設模型，可將它視為是結合社會主義利益、個人利益和個人積極性的一種值得嘗試的實驗。

在先進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隨著城市工業化的進展，大量的從農村吸收其所需要的勞動力，同時也促進農業生產力的提高。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過程通常無法順利進行——城市的工業部門很難發展到足以充分的吸收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規模。因此，大量從農村湧入都市的勞動人口，因為無法取得就業機會而成為都市貧民階層，形成所謂的「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有鑑於此，改革開放後，特別是80年代初期以後，在中國農村迅速成長的「鄉鎮企業」採取「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方針，直接在農村內部將勞動力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非農業部門。

「鄉鎮企業」就是在農村地區經營的、國營企業以外的所有非農業企業的總稱。在人民公社時期，由公社或生產大隊經營的工業或其他小型企業被稱為「社隊企業」。人民公社解體後，社隊企業改制為由鄉、鎮管理的集體所有制企業，成為農村地區企業的主要組成部分。此後陸續又出現從村營到個體經營的各種企業形式。因此在1984年3月以後，「鄉鎮企業」就成為上述各種農村企業的總稱。

社隊企業不過是人民公社的附屬品而已，不可能擁有自主的市場經濟發展性。反之，鄉鎮企業可以說是農村市場經濟的產物，不受政府投資計畫、生產計畫的制約，依靠銀行融資、集體或個人資金而自由創立。由於規模小，可利用老舊設備、低水平技術和當地資源等等，因而可以發揮其有利條件而取得發展。尤其鄉鎮企業可以在農村內部吸收剩餘勞動力，解決普遍存在於發展中國家的雙重結構，成為擁有龐大剩餘勞動力的開發中國家工業化的一個「新模式」。

雖說如此，鄉鎮企業也有下列的缺點：

1. 鄉鎮企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宏觀調控難以推行；
2. 鄉鎮企業與城市大企業爭奪資金、原料、能源，使這些重要物資流入生產效率較低的鄉鎮企業，造成資源的浪費；
3. 政府無法做充分的管理，因而產生環境污染、勞動條件惡劣等負面，呈顯出種種與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相雷同的惡劣現象。

由於，在國際條件上，勞動密集產業有從新興工業化國家(NIC's)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去的趨勢；同時，在國內條件上，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鄉鎮企業已經達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因此，1988年1月趙紫陽發表新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也就是「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或「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在以東亞為中心的經濟圈「可能」達成迅速發展的條件下，中國要積極參與這個發展並發揮重要角色的戰略。

在這個經濟戰略中，鄉鎮企業、尤其是沿海地區的鄉鎮企業，可能發揮相當重要的角色。當然，這種新戰略不一定能夠順利的達成，但重要的是，新戰略是以鄉鎮企業這種勞力密集企業的發展為基礎的「出口導向」戰略。因為根據NIC's的經驗，如不經過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和出口導向戰略相結合的階段，包括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吸收和移動在內的雙重構造，是不容易解決的。就中國的實際情況來說，利用外國資金、技術來建設資本密集產業(如上海寶山鋼鐵廠)固然有其必要，但如果僅僅推行這類建設，並不能真正解決雙重構造的問題。

壹、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前提是，一方面存在著與生產資料、生活資料相分離的僱傭勞動者，他們除了出售勞動力便一無所有；另一方面是，在資本家的手中積累著一定量可充當資本的貨幣。創造這兩個條件的歷史過程，就是資本的原始積累。

「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這一個在落後的農業國家用來確立社會主義重工業體系的概念，其理論的根源是從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點的「原始積累」類推而來的。所以，將這個概念使用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形成時期，理論上當然是錯誤的。雖說如此，當我們討論蘇聯社會主義草創階段的歷史時，這個概念卻非常重要；特別是繼蘇聯之後成立的社會主義諸國，由於經濟落後或多或少都執行過相同的積累方式。尤其是中國這個落後的農業大國，幾乎是自立更生的推動快速工業化，因此大致上採用蘇聯走過的老路子，所以不得不重視這個問題。

馬克思說，所謂「原始積累」就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的歷史過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便是以這樣一個歷史過程為前提，讓僱傭工人在形式上以及實質上從屬於資本，從而限制了社會生產的全面發展以及人的全面發展。因此，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首先應該要揚棄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同時，馬克思也指出：「勞

動的解放」就是社會主義的第一個課題。

從這個觀點來看，以蘇聯為首的「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在內戰、反革命力量的殘存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封鎖和策反等大氣候和小氣候之下，不得不暫時擱置這個最本質性的問題是能夠理解的。但是，貿然的使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個從資本原始積累所類推過來的概念，還是很不恰當。

不過，在俄羅斯的革命家之間似乎都缺乏這種認識。日後反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最力的布哈林，事實上就比葉·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更早使用這個概念。布哈林在「過渡時期經濟論」中說，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生產性本質」是「布爾喬亞的政治權力……強奪住民，使他們轉化為無產階級，從他們身上創造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生產力…」。反之，「從廢墟中成長的社會主義，也要開始動員有生命的生產力。這種勞動的動員就是否定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基本契機。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階級本質，並非創造出剝削過程的前提條件，而是依據廢除剝削的經濟復甦…」。

從布哈林提出這種將勞動者緊急動員體制正當化的主張的背景情況，就可以預測出蘇維埃體制最終走向官僚化國家體制的背景。

反映著「戰時共產主義」的時代背景，托洛斯基也使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個概念，並訴求「勞動者的自我積累」。他在1922年10月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大會上說，「我們繼承了破產的國家。我們不能以使用1914年以前的生產設備就感到滿足。那些設備已經破壞，我們必須依靠勞動者的努力，一步一步的重建起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強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必要性。

布哈林和托洛斯基都認為，國家和勞動者的一體化是應該的。所以說，「我是向勞動者要求，為了勞動者本身的利益而出力。我所說的意思如被惡意的解釋為要求勞動者『自我剝削』而受到攻擊，也是沒辦法的事」。

他們的這種想法受到革命後的狂熱氣氛所支持。而在中國，這種熱情則實際上被用來做為「積累」的手段。

雖然主要由於整個國際的大氣候使然，但無論如何，在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國家」自己扮演推動經濟建設的主體，而沒有走向像巴黎公社那種「實現解放勞動

的政治型態」的過渡性存在，卻是歷史的事實。

就蘇聯社會主義體制而言，其根本問題在於：將「國家」固定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

二、蘇聯的「工業化論爭」

蘇聯從「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轉換為「新經濟政策」(NEP)時代之後，開始摸索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向。「戰時共產主義」可以說是「純粹」的計畫經濟的時代，是在內戰和外國的軍事干預下全面控制國民經濟的時代。

新經濟政策允許市場經濟的復活而產生混合經濟的面貌。在這種情況之下，引發1920年代中期的「工業化論爭」，其論爭的焦點在於：

第一、落後農業國家的工業化路線應該是從重工業開始？或是輕工業開始？

第二個問題是，在工業和農業之間，應該是以哪一個部門為優先？

第三是，是否應該等待歐美革命成功後，依照國際分工而開始建設？或是追求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

革命前的俄羅斯是一個農業國家，因此和歐洲各國形成經濟上的互補，但是由於革命，這種互補關係被切斷，經濟上被封鎖。所以如何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就成為迫切的問題。

快速的工業化並非只考慮到國民經濟的發展，重工業更是軍事生產所必需，雖然這種選擇帶來了工業結構的畸形化，但仍將其做為優先目標來發展。當然，就結果而論，迅速的重工業化並非唯一的選擇，假如對輕工業或農業更加重視，也許可以使後來的情況有所改變。但是重工業優先的政策決定了此後的歷史。這種選擇更因為將「一國社會主義」正當化從而使國內經濟陷入緊張狀態，問題的核心就在於剝削農民、農業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以「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成名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主張：在「混合經濟」中應該確立並強化屬於社會主義要素的國營經濟。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它的主要著作「新經濟」中，將蘇聯的過渡時期視為是「價值規律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相鬥爭」的狀態，認為這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因此，為了推動迅速的重工業化，其所

需的資金不可避免地必須依靠非社會主義要素的農業部門。

重工業建設並非只是建設幾個工廠就可完成。要將為數眾多的相關部門一併完工，必須長期地支付龐大的資金，而且在建設期間必須持續的投入資金而無法得到產品。其所需的資金因無法得到外國的援助，唯一的途徑就是轉移國內主要產業的農業部門的剩餘。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並非將農民視為敵人。他認為在商品經濟具有較大力量的情況下，作為社會主義「產婆」的國家(state)，如何籌措龐大的資金是一場激烈的鬥爭。因此，農民(小商品生產者)的發展就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條件。他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課題，並非比資本主義更少的向小布爾喬亞生產者徵收，而是以國家的工業化和農業的集約化(細耕化)為基礎，使包括小商品生產者在內的國民經濟合理化，從而從小商品生產者手中更多的所得之中徵收更多的東西」。

在進行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以國家為媒介進行從農業到工業的價值轉移並非沒有前例。在日本的近代化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積累構造」。但是其中的差異在於：在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中，為了確立其工業部門，「勞動者國家」的社會主義部門成為剝削以農業為首的非社會主義部門的「主體」。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本來意圖以市場為前提，透過農作物和工業產品之間的交換來轉移價值。但是當時的蘇聯政府由於工業生產力很低，無法提供足以和農產品相交換的工業產品，因而無法透過「不等價交換」來進行積累。

站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對立面的是布哈林的「富農育成論」，這種對立使得原本貧弱的工業基礎和農民日漸積累的不滿之間的矛盾激烈化。這個矛盾，因為史達林搞「從上而下」的農業集體化而被「解消」，但並非得到解決。因此產生了農民的生產意願降低的新問題。

1925年前後的「工業化論爭」，主要是托派經濟學者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和布哈林之間的對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主張以剝削農民為手段進行迅速工業化。在當時，史達林採取中立，一直要到1928年後才實質上贊成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方針」。1928年，史達林公然承認以不等價交換剝削農民的剩餘，他辯稱說：「這是為了發展農業而向農民課徵的追加稅金」。

反之，布哈林的工業化路線則重視與農民的同盟，主張以農村經濟富裕化所增加的積累為基礎，進行漸進的、平衡的工業化。布哈林說：「與農民處於戰爭狀態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維持穩固」、「工業的發展依靠農村消費市場的擴大」、「農民的購買力越大，工業的發展速度就越快」。也就是說，布哈林認為將農村和城市連結起來的市場關係，在工業化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農業集體化促使國家完成全面性的經濟統制，但是這種經濟統制並未減少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成本，反而在過程中付出了血腥的代價，更導致國家集權體制形成官僚化的經濟管理機構。

在中國的經濟建設過程中，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也遭遇到許多困難，卻一直被推行。當然，由於歷史背景和客觀條件的差異，中國的積累過程並非完全和蘇聯一樣，但其基本上的同一性，使其後來不得不採取改革、開放的路線。

蘇聯共產黨在廣大農民中並沒有深厚的群眾基礎，因此，終於因為糧食問題而與農民之間陷入戰爭狀態。反之，以農民為基礎進行革命戰爭的中國共產黨，經過土地改革在全國農村奠定了深厚的權力基礎。因此，在農民的壓倒性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所推行的快速重工業化並沒有引發嚴重的矛盾。但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生產力比蘇聯低落許多，也不得不以農民的直接動員來強化農業基礎（也就是所謂的「勞動積累」）。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種隱蔽的積累構造，本來應該將它視為是過渡狀態而加以克服，但是因為作為積累基礎的工業部門，基於軍事優先的經濟構造而無法扮演提高人民社會生活水平的角色，因此，社會主義的原始積累構造不得不自我崩潰。

三、價格剪刀差 (shear) 問題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論」，在當時並沒有被當作經濟學問題來討論，而是在政治政策的論爭中，被認定為破壞「工農聯盟」而未被採用——雖然後來由於史達林採用更嚴厲的原始積累過程而實施。

有些學者強烈主張：中國的工業化資金並非來自於農業部門。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日本學者中兼・和津次。他認為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主張有兩個部分：

1. 有關剩餘來源的問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是來自於農村或農民的問題；
2. 有關積累方法的問題——透過所謂「價格剪刀差」或不利於農業的條件，將積累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或從農民轉移到國家的問題。

對於前者，中兼氏認為，在蘇聯因為農業集體化並沒有增加農業剩餘，因此所謂資金的剝削並不存在。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並沒有像蘇聯那樣具有強制的性質，而且在工、農產品之間的交換條件一直在改善，所以農業不可能是資金的來源。

其實，如前所述，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就是落後的農業國家建立重工業體系的過程，也就是有關為建立其工業體系所需資金的來源問題。在中國，工業基礎大致上可以說是從第一個五年計畫開始，經過大躍進後到1960年前半段的完成「調整期」的這一段期間內確立下來，其後便開始有意識的消除「價格剪刀差」的積累構造。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實際上造成了政府與農民的對立，因此生產的降低是必然的結果。中國一方面是比蘇聯更落後的農業國；一方面又不可能從外國取得工業化所需的資金。因此不能不求之於農村、農民。有些人認為，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上，農業和農民只提供了廉價的原料和糧食，因此農業對工業化的貢獻並不大。但是，正是這種廉價的原料和糧食的供應，才使得輕工業部門能夠獲取龐大的利潤並維持勞動者的低工資，其貢獻不能輕視。

而且，國家以低價集中農產品，對工業化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為在1979年以前，中國的貿易結構是以農產品、農產加工品的對外輸出來交換生產財的進口。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從蘇聯引進的156項計畫，是以煤、石油（27項）、電力工業（25項）、鋼鐵及非鐵金屬工業（18項）、化學工業（7項）、機械工業（24項）等基本產業為主，而中國就是以農產品以及農產加工品來償還債務。1979年以前，中國的重工業產品和工礦原料佔對外輸出總額不及三成。可見中國的工業化主要是依賴農業來完成——透過對外貿易，將農業產品轉換為國內無法或難以製造的工業產品，當然是「積累」的一種，是用於建立工業體系的積累——因為如果農民擁有直接貿易權，大部分的資金一定被用來進口消費財而不是生產財。

另外，在建設農業基礎上所謂的「勞動積累」，就是農民貢獻於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另一個重要形態。農業的基礎建設（如水利等），主要是依靠農民本身的勞動來進行，工業發展對農業的回饋並不多。

再者，就「價格剪刀差」或不等價交換的問題來說，中國的價格政策，一貫是以

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取消工農產品剪刀差為方向，因此看起來似乎是實現「等價交換」。但如果仔細考察，中國是以政治權力來控制市場，但是卻沒有相應地建立分配勞動力的機構，因此是否存在著所謂的「合理價格」，是頗有疑問的。因為在這種情況之下，無法透過市場交換來確立「社會必要勞動」，所以價格和價值偏離的情況也不甚清楚，因此難以肯定「等價交換」的存在。

所謂「價格剪刀差」的一般定義是：「具有壟斷性的產業部門和非壟斷性的產業部門之間，由於其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在市場上實現其價值的能力有所差異，因此在一定的時間內，兩者的商品價格指數出現差距的情況。」

首先將「價格剪刀差」當作政治經濟學概念，用來說明工、農產品之間的價格差異的是托洛斯基。他在1923年4月蘇共第12次代表大會中指出：由於蘇聯與歐洲的市場被切斷，產生工業產品的價格飛騰與農業產品的價格下降的嚴重情況。

此後，這個概念也被用於描述資本主義各國在農業恐慌時期的工、農產品的價格差。工業產品以其壟斷力量，擁有「產量彈性化和價格強制性」的優勢。反之，農產品一方面受制於自然條件，難於在短期間內調整產量，對於總產量和市場價格缺乏影響力；另一方面，由於貧困，農民被迫必須出賣手頭上的農產品，加上中間剝削的存在，在恐慌時期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降幅很大。

本來價格剪刀差的概念是用來描述短期現象，如要用於長期分析，必須考慮到「工、農部門在提高勞動生產力時，兩個部門之間價格下降率的差異以及壟斷性超額利潤因競爭而消滅的問題」。

一般認為，中國在過去一直採行縮小價格剪刀差的政策。因此，以戰前(1930~1936年)為基準的價格剪刀差在1958年已被消除。但是，事實上如需考慮到在這段期間內工、農部門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所謂工、農產品的「等價交換」是有疑問的。而且新生產的工業產品的價格是否合理，也有問題。

從價格指標來說，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一直有提高，而工業產品也一直在下降。但就勞動生產率的上昇而言，工業當然比農業高。因此，如以價值為基準，「價格剪刀差」依然不利於農產品——農業的勞動生產力並沒有顯著的提高，而工業的勞動生產力則有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在價格面，政府雖不斷的改善交易條件，但實際上交換條件是逐漸的在惡化當中——價格剪刀差的解決，來就不該以調整價格為手段，而是以提

高農業的勞動生產力來解決。

價格剪刀差之所以成爲問題，是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爲契機，在那一次會議中提出，農產品的收購價格長期固定而生產成本不斷提高，因而在各地「增產不增收」或成爲赤字的狀況。因此在會議中決定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同時降低工業產品售價的政策。

在中國，價格剪刀差的產生，也就是從農業到工業的價值轉移，主要並非透過商品交換來進行，而是透過強制收購糧食和原料來完成。因此，工業勞動者並沒有分配到工業部門的利潤，而是國家透過抑制國民經濟的消費來進行最大的積累。

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當然不僅僅來自於勞動要素，資本財的形成大都來自於農民的貢獻。要消除「價格剪刀差」，必須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力，因此需要農業生產財的適度供給。但是中國一直抑制農業生產財的價格，導致工業部門基於盈虧的考慮，並不積極生產農業部門所需要的生產資料。顯示出政府缺乏發展農業的整體政策，也沒有考慮到農業和工業生產之間的協作關係。

(待續)

☆

* 在一年內將同一作物種植兩次以上(如「水稻—水稻»)稱爲「多期作」。

** 在一年內將不同作物輪流種植(如「水稻—小麥»)稱爲「多毛作」。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編輯報告

因廢核四而引發的政治風暴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勢，面對當前政經困境，新政府是窘態畢露，核四事件引發的罷免總統案更是對新政權致命的打擊，左翼究竟應該如何看待核四引發的政治風暴？我們特別製作了【政治核變】這一專題，提供讀者一些另類的思考：史威齊〈核四風暴與社運發展〉，藉廢核四事件探討沒有左翼基礎的民進黨對台灣社會運動的影響及社運未來的展望。當輿論焦點都放在核四存廢上時，卓仁〈鮮血與硝煙〉卻提供我們另一種分析的角度，核電的發展乃是美國帝國主義國家軍火工業底下的產物，沾染了鮮血與硝煙，因此我們在反核四的同時，更要反對軍火交易繼續輸入台灣。羅莎〈冷眼看右派互鬥胡搞〉強調目前的政治風暴只是右派之間的互鬥，當務之急反而是左翼如何化解歧見，建立隊伍。

香港的林致良〈歐洲激進左翼一瞥〉，介紹以第四國際為首的歐洲激進左翼運動近年的發展，他並疾呼兩岸三地的勞動人民和左派人士應連結起來、協同戰鬥。隨著台灣經濟的發展，台灣的資本也開始輸出，「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成員蔡志杰〈資本輸出不應該是剝削輸出〉，報導台灣資本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投資後對當地勞工殘酷剝削迫害的狀況。

本月九日是格瓦拉被美國及玻利維亞反動政權謀殺三十三周年紀念日，我們特別推出了【CHE】專欄，林深靖〈從革命基地到美洲自由貿易區〉分析目前在拉丁美洲兩種力量對決如何影響該地未來的發展：一種是以美國為首組建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國際建制，與之相抗衡的則是格瓦拉所代表的革命力量典範。此外，北京最近因為一齣《切·格瓦拉》話劇的演出而引起當地熱烈的迴響，我們特別刊載了兩篇討論格瓦拉話劇在北京引起熱潮的文章，該劇編輯黃紀蘇〈關於史詩劇《切·格瓦拉》創作及演出的一些情況〉，介紹了格瓦拉一劇創作的動機、演出與反應。亞子〈評《切·格瓦拉》〉則是從文藝理論的角度對該劇所作的評論。切·格瓦拉已經成為二十世紀青年革命運動的代表與精神象徵，【CHE】專欄的開立，希望能在第三世界及青年革命運動的議題上多所著力。

李崇人〈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下）〉，在這篇連載的最後部份，作者雖然同意中共的改革正在走資（這是他與汪立峽觀點上的主要差異），但他同時也強調由於中國大陸過去特殊的發展經驗，使得中國大陸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資本主義大國，而非受依賴西方並受其宰制的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論點又使他與蕭喜東及蘇杰等人看法不同）。顯然，李崇人代表著另一種對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的看法，我們希望左翼的朋友能夠針對這個議題繼續進行討論與對話。

黃志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一）〉是繼他對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研究的系譜論述後，轉而對於社會主義發展所作的長篇研究，這是一篇值得細讀的連載。

左翼 第十二號

出版日期：2000年10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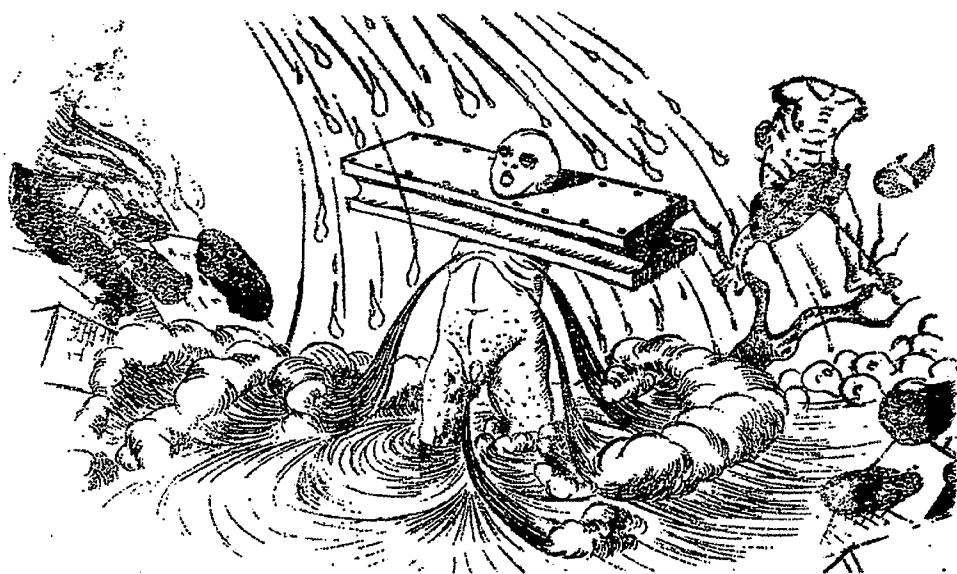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三號



〈頑強的存在〉

作者：陳界仁

【工運最前線】 [八四工時] 不容翻案！	臧汝興 / 2
挽救全產總	Maggie / 10
王秀蓮 / 9	
秋鬥有感	
從 APEC 看 WTO	林深靖 / 14
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和兩岸問題	林書揚 / 19
與其挺扁，不如試著形成「第三連線」	高文進 / 24
【我看《左翼》】 寒而不酸，窮而不濫—— 我看《左翼》	俞向南 / 28
為《左翼》慶祝一週年	金寶瑜 / 30
清理工運敗類：我對《左翼》的期許	趙金鳳 / 31
瑞典皇家學院開玩笑？	呂正惠 / 32
【特稿】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二)	黃志龍 / 34

【八四工時】不容翻案！

臧汝興

拆穿勞委會以捏造提高外國工時的手法，掩蔽台灣長工時的惡行！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台灣一向以高工時而聞名於世界。但是，從勞委會的說帖中的主要國家工時比較表中，台灣製造業的平均周工時不但低於同屬亞洲四小龍的韓國與新加坡，與美、日、法等先進國家相差也不是太大。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果？問題當然出在勞委會的統計數字。

目前台灣製造業的總工時是周46.0小時，換算成年度總工時，則是2398小時。這與大部份在1,400～1,900小時之間的先進國家相比，高出了71%～26%。

但是，根據勞委會提出的數據，台灣比英國（41.8）只高了10%，比法國（38.6）也只高出了19%。原因何在？因為，勞委會所提出的數據中，台灣是採取實際工作的時數計算，但新加坡、美國、加拿大、法國、德國、英國都是採取「實際工時＋沒有工作但支領工薪的時數（即，有給休假也以正常工時計算）」計算。如果，這些國家也採取和台灣一樣的標準計算，則英國是32.6小時（1998）、德國是29.3（1998）法國是29.1小時（1997）、美國是37.5（1998）、加拿大是34.1（1997），新加坡也必然比台灣少。

另外，台灣企業不遵守勞基法的問題非常嚴重，很多企業每日工作時數超過法定上限12小時、或超過每月加班時數46小時以上，這類企業在接受政府的工時調查時，必將謊報工時，也就是說，台灣的工時統計中，已經「自動」刪掉了工時最多的部份。

與新加坡比較：根據ILO yearbook of labour statistics(1999)的最新統計，新加坡的工時1998年已降到48.4小時，如果，再考慮到新加坡的計算方式是採「支薪工時」，不難想見，新加坡實際工時，也比台灣要少。

韓國與台灣採用同樣的計算方式，因此，確實工時要比台灣長，但我們不要忘了，韓國強大的工運力量，此刻正全力地展開縮短工時到每周40小時的鬥爭。

勞委會以各國的法定工時做比較，在現實完全不具意義！

在周工時的決定上，有兩道關卡，一是政府以法律手段，設定一個最高限制，然後再由勞方根據實力與資方達成最終的工時協商。以德國為例，德國雖然每周法定工時仍然維持在每周48小時，但因為德國有強力的工會力量，因此，1985年金屬工會以罷工爭取到每周38.5小時；87年爭取到37.5小時、90年爭取到36小時、95年爭取到35小時。也因此，德國工人可以不重視第一道關卡。但反觀台灣，工會組織力低落，力量微弱，工會又是採工廠工會組織體系，根本無力與個別的資方談判，結果，政府這一關，實際上已是唯一的一道關卡。

再拿勞委會所舉的韓國44小時、新加坡44小時、馬來西亞48小時、泰國48小時、菲律賓48小時來說，雖然表面上台灣將法定工時降低到44小時，就比這些國家都要短了，但我們工人一年工作多少小時，要是看年實際工時的統計，而不是由「法定工時」來決定的。從實際工時來看，台灣即使降低工時到44小時，也會比泰國、菲律賓等國家要長。

現在我們再來談談實際工時是如何決定的。決定實際工時的因素包括：

- 一、法定工時。
- 二、以法定工時為上限，由工會與資方進一步協商訂定出來的工時。
- 三、年假日數（包括國定假日）、產假日數
- 四、病假、事假的日數以及是否取得容易
- 五、加班時數

了解了上述影響實際工時的原因，我們才能了解這次修改「法定工時」與實際工時時間的關係，並進一步清楚如何才能真正解決台灣的長工時問題。

其中第一項與第二項，最終應該是由第二項來決定。但像台灣這樣工會力量薄弱的情況，第一項－法定工時，就幾乎成為最終決定。相反地，德國的情況，法定工時雖然仍然維持每周48小時，但在具體的勞資協商中，已經爭取到每周36小時工時（95年，金屬產業）。總之，台灣工會力量薄弱的事實，使第二項因素失去現實的意義。這也使我們不得不全力展開要求縮短工時的鬥爭。

反駁勞委會一年增加薪資成本1776億之說：

勞委會一年增加1776億的算術，是用一種單純的方式計算出來的。而它的前題是降低法定工時、實際工時保持不變。但事實證明，法定工時的降低有提高生產力的

效果，從而帶來實際工時的減少。而且，提高生產力的百分率幾乎可以完全抵銷降低工時的百分率。根據1991年日本勞動省委託「日本能率協會」針對降低工時後的企業所做的調查，80%的企業表示生產力的提高完全抵消了降低工時的成本負擔；13%的企業認為生產力提高了，不過無法完全抵消降低工時的成本負擔；只有7%的企業認為完全沒有提高生產力的效果。如果以日本為例來看，只有7%的企業，會將法定工時的縮短時數，完全反映到加班時數的增加上。

同樣的情況，從韓國1989到1991年縮短法定工時中也可以得到驗證。該期間因為韓國將法定工時從周48小時降到周44小時，使實際工時降低了3.3小時，但總產值持續成長。也就是降低法定工時，會直接反映到了實際工時的縮短，而不是勞委會所說的實際工時不變→法定工時縮減→加班時數增加。試問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曾經降低法定工時後，不是帶來實際工時的減少，而是全部反映到加班費的增加上？

另外，即便有極低比率的企業，因為產業類型的關係，降低工時並不能提高生產力，因此，降低的6個小時的工時，完全反映到加班時數的增加上，試問，若每周增加6小時的加班；一個月（平均4.34周）多出26.0（4.34周×6）小時的加班，有多少目前每月已經加班在20小時以上的企業，將因為超過46小時的加班上限，而不得不增加雇用？

如果這些企業增加雇用，不是既可大大降低每人的工時，又可紓解台灣的失業問題嗎？

總之，勞委會的1776億之說，純屬惡意誇張，明顯暴露其公然袒護資方的立場。粗略估計，勞委會的說法，至少誇大了十倍。

反駁勞委會增加之成本集中由傳統產業承擔之說

傳統產業一詞含蓋面非常廣，嚴格地說，除了資訊產業、生物科學產業等高科技產業之外的所有產業都屬於傳統產業。如果，勞委會指的傳統產業是嚴格意義的傳統產業，那麼因為範圍太廣，也就無所謂集中承擔的問題了。如果，勞委會所說的傳統產業，主要指失去競爭力、獲利率低落的產業，那麼在此就需要做一點反駁了。

獲利率低落的產業的最大問題是接不到訂單，生產出來的產品銷不出去。因此，它的設備閒置率就會升高，工人想加班都沒有班可以加，甚至被逼迫休假，也就是說，這類企業工時已經自然縮短了，通常根本沒有加班費支出增加的問題。

駁勞委會縮減工時到周 42 小時會使 44.7% 的產業薪資成本上升 18.25% 之說

前面也曾提到，勞委會將 7% 的企業（以日本的實際情況為參考）的情況，誇大成所有企業。同樣道理，勞委會又把 3.13%（ $44.7\% \times 7\%$ ）的問題，誇大為 44.7% 的企業的問題了。宣稱降低工時到 42 小時時，將使原 48 小時之企業，薪資成本上升 18.25%，更屬無稽之談。18.25% 之說，顯然是與前面的增加 1776 億之說，採同樣的基礎計算出來的。關於此部份前面已經反駁過，勞委會在加班時數上嚴重說謊，在此就不必多說了。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可以看到勞委會用了「薪資成本」一詞。既然談到成本就應該看看影響成本的因素有那些？薪資成本在整個成本中所佔的比率？薪資成本提高對整個成本的影響？我們知道，生產成本除了薪資，還包括土地成本、金融成本、原料成本、設備成本等。而目前台灣的製造業的生產成本中，薪資成本僅佔 6.5%，也就是說即使薪資成本提高 5%，整個生產成本也僅提高 0.325%。如果，政府硬要說零點幾個百分點的成本上升，仍然會對競爭力造成致命的打擊，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我們想跟誰比低價格？越南、泰國、還是中國大陸？牛肉麵做得不好吃，難道靠一碗麵降價五毛錢，就會生意興隆嗎？

駁縮短工時造成大量失業之說

1998 年法國在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大增的情況下，斷然通過「每周工作 35 小時」的法案，其最終目的不在於縮減實際的工時，而在於透過縮減工個，以達分享工作機會，紓解失業問題。2000 年，韓國的自主總工會認識到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於是，為了解決失業問題，展開要求降低工時到周 40 小時的鬥爭。1993 年的德國的 Volkswagen 汽車廠，因為持續的滯銷（庫存達 100 萬輛以上），而陷入虧損狀態。第二年公司與工人達成協商，將每周工時從 38.8 小時降低到 28.4 小時，降幅達 26%（附帶降薪 10%），因而得以在兩年內使三萬人免於遭到資遣。

從以上的例子來看，外國都是以降低工時做為解決失業問題的重要手段，而且，現實上，沒有一個國家過去因為降低工時而加重失業問題的例子。但，唯獨台灣的政府、資本家，大唱謬論，說降低工時會造成失業問題。就政府官員的說法，問題在於低獲益率的企業會因為生產成本的增加而倒閉，從而造成失業問題。我們先來看看獲益率在平均值或平均值以上的企業，這些企業中的有些企業會因為工時縮減而增加雇用，或減少資遣（現實上很多資遣員工的企業，屬於獲利率尚好或良好，而非損虧的企業）。至於低獲益率的企業，必然出現設備閒置率上升，停工率上升、工時自動縮短的問題，因而與此次的降低工時，不見得有直接關聯。另外，如同前述德國 Volkswagen

汽車的例子，問題並不在於生產成本而在於銷路，因此，Volkswagon 廠在虧損中，仍然願意加重薪資成本的負擔，以縮短工時，紓解資遣的問題，這才叫為「共體時艱」。德國世界第一流的企業，願意在經營困難的過程中，清楚掌握問題的徵結在於品質與銷路上，從而對此尋找出路，拒絕將經營困難的責任完全轉嫁給工人，才是真正的「共體時艱」，值得我們的企業仿效。當然，政府與資本家可以反駁說，我們的企業即使願意仿效 Volkswagon 廠的例子，但卻不見得會和該公司一樣起死回生。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類的企業難道繼續壓低工資成本，就會有活路嗎？另外，特別要強調的是，面對獲益率良好而企圖資遣的企業，縮短工時，可以很有效地抑制資遣，甚至增加雇用。

除此之外，我們都知道國民的休閒時間的增加，將可以刺激休閒產業的消費，從而創造就業機會。

駁勞委會排班困難之說

勞委會說：降低工時到 42 小時或 44 小時，會出現 2 小時或 4 小時的零碎工時，從而造成排班不易。此言簡直就是不知所云。一、不管是目前通過的兩周 84 小時案，還是新政府還想倒退修法的每周 44 小時案，都不是出現 2 小時的零碎工時（因為兩周 84 小時案中，已附帶整合 2 小時零碎工時的條款）。至於 4 小時的「零碎工時」，即使是採取新政府倒退修法的每周 44 小時案，仍然會出現，難道行政院還想既退倒修改工時，又附加傷害工人的八週變形制？況且，4 小時的工時的整合，需要用八周才能完全整合嗎？勞委會八週變形的要求，分明就是想要擴大變形工時，以縮減資方的加班費支出！

在有關縮短工時的討論中，硬是以排班為藉口企圖阻擋，純屬荒唐。因為，各種企業的工作時間樣式非常多，排班方式各不相同，因此，只要將工時確定下來，各企業必然可以找出一套對自己最有利的排班方式。不可能用工時來牽就排班。

駁以需要緩充時間的說法

法國自 1936 年實施周 40 小時之後，一直到 1982 年才再度縮短到 39 小時，耗時 46 年，是否我們仿照法國的前例，用 46 年的時間，縮短一個小時的工時？

另外，就以政府喜歡舉的日本的例子來看。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本一向以長工時而聞名。於是日本為了洗掉此污名，於 1987 年（年實際工時 2190 小時）開始展開了一個龐大的、以縮減實際工時至 1800 小時（每周 35 小時）為目的的計劃。這

個計劃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部份：一、將法定周工時降低為 40 小時。二、制定縮短工時臨時措置法並設立縮短工時委員會。三、提高加班費、假日加班費的給付金額。四、促進工人將年假全部用完(不要以假日加班以換取加班費，當然那裡包括一個前題，不能讓工人因為低工資而不得不加班)。五、學校改為周休二日制。其結果終於在 1994 年降實際工時降到每周 37.6 小時。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進行的只是縮短實際工時之措施中的一項——縮短法定工時，而日本花費那麼長時間進行的卻是整套縮短實際工時的大計劃，豈可相提並論。打個比方來說，日本進行的是蓋房子、房子內部的水電工程、裝潢、路線安裝等，共歷時七年，而我們只是做水電工程，就要求比照日本，實屬不當。

降低產業災害率，保障勞動人權！

台灣產業災害率一直維持世界最高，因此，陳水扁政府也以降低產業災害率為其重要的勞工政見。但如今陳水扁政府竟然反對已經立法通過的周 42 小時案，顯然是繼工時政見後又再一次對自己勞工政見的跳票。

國外的各種實證資料都顯示，過長的勞動時間，與產業災害的發生率有著密切的關係。尤其，產業災害的發生，大多集中在體力衰退、注意力降低的工作時間中的後半段時段，因此，降低工時對降低產業災害率就更形重要了。就目前如此高工時的台灣來說，降低工時是各種降低產業災害率的方法中，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方法。如果，陳水扁政府企圖在工時案上倒退修法，我們只能視陳水扁政府毫無誠意降低產業災害率，這是就任半年來，第二次對勞工政見的跳票，陳水扁政府信用已經破產。

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們的生活確實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工人也開始逐漸享受到一些過去象徵富裕的消費品(雖然，這仍然是靠我們高工時、每月十幾個小時的加班換取來的)，不過，這只是量上的成長，我們現在要求質的改善，也就是降低實際的勞動時間！

台灣一直是一個相較於GNP而言，工資水平非常低的國家，GNP：工資=1：1.2，反觀韓國卻是 1：1.8。低工資會迫使勞工不得不加班，甚至不得不犧牲假日換取加班費，這是台灣實際工時超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製造業平均每月加班時數為 16.6 小時(包括假日加班)。造成工人不得不加班的理由有資方強迫或半強迫加班，以及低於標準生活費的低工資，使工人從找工

作時，就已經把加班費列入收入考慮之內，也就是低工資造成的強迫性加班。因此，減少加班的方法，應該包括要求提高加班費的加成率，以杜絕資方不斷的加班要求（迴避增加雇用）。不過，如此做可能會影響相當部份因低工資而不得不加班的工人的加班費收入，因此，此方案必需配合由政府設立基金，以彌補工人加班費損失的政策。最完整的方法應該是將工資提高到標準生活費（符合台灣目前經濟水平的標準生活所需的生活費用，以韓國為例，四人家庭每月約7萬元台幣。）、一定程度提高加班費加成率，以誘導企業以增加雇用取代加班、加強工會力量並由政府嚴格監督，杜絕強迫、半強迫加班。

如果依照政府的周44小時案，估計台灣的平均周工時只會下降1.8小時左右，也就是維持在44.2小時，這與先進國家的27~36小時，有著驚人的差距。即使，台灣將法定工時降低到40小時，估計也只能降低周工時4.5小時，仍然維持在周41.5小時（目前29個OECD會員國中，除了韓國以外，其他國家都低於周40小時）。況且，我們僅是要求下降到42小時，更準確地說，是要求政府不要將已通過的42小時案，退倒到44小時。估計降低到42小時，僅可產生降低周平均實際工時2.9小時的效果。

目前，比台灣的工時還長的國家只有約旦、埃及、蘇丹、斯里藍卡、土耳其、韓國、哥倫比亞、緬甸、印度、墨西哥、孟加拉。我們要求降低法定工時至42小時，以便讓實際工時降低2.9小時，只是要求我們的工時能比泰國、菲律賓、哥斯達利加、玻里維亞、多明尼加等國家短，根本不敢奢望與波多黎各、阿延根、烏克蘭或中國大陸相比，至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就更不用提了。

如果，政府硬要拿日本為時七年的縮短工時計劃做為延緩實施的藉口，那麼我們要求政府真正比照日本，拿出整套的縮減工時至每年1,800小時（共降低600小時）的大計劃來－包括縮短法定工時至周40小時、加班費調高、增加年假等計劃來。但必需先從2000年一月一日起先實施周42小時制，以縮短年實際工時150小時，然後，逐漸縮短其餘450小時。 ★

挽救全產總

王秀蓮

台灣的左翼分子，不管大家目前在從事那一個領域的運動，十幾年來，都曾親身投入過工運，或從旁協助過工運，為工運盡了一份心力。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今年五月一日，期待已久的一個標榜自主的全國總工會——全產總終於宣佈成立了。

但，很不像是一個在獨裁體制下開始萌芽發生的工會運動組織，全產總從一成立開始，就走了樣，正在朝向御用化的方向大步邁進。正確地說，全產總在是以「勞陣」為中心的少數人，為了個人的政治利益，壟斷決策核心，以非民主的運作方式，計劃性地、意識性地為執政黨護航。

全產總已經是台灣最大的群眾組織，同時它繼承了十多年來自主工會運動的正當性，囊括了台灣最大的運動能量。但它開始御用了。因而，對於試圖改造台灣社會的進步份子來說，這是一個必需嚴肅面對的形勢。

就以目前現在進行的工運鬥爭最「古典」的工時鬥爭來說，6月全產總放水，支持民進黨政府的44小時案，現在又企圖將工時鬥爭的鬥爭焦點，從民進黨轉移到國民黨身上，也就是將鬥爭焦點從行政院轉移到立法院。而且，做為與民進黨有著密切關聯的「勞陣」勢力，知道即使焦點對準立法院，在新政府執政期間大規模的群眾動員，仍然會對民進黨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因此，不斷以各種藉口，迴避對工人群眾動員。這種形勢就像是工廠內沒有工會，情況固然糟，如果有一個御用的工會，情況更糟一樣。

不過，我們也必需清楚區分，御用工會的會員並不能被界定為御用會員；全產總以「勞陣」為中心的領導核心的御用性質，也不能擴大解釋到整個全產總。現實上，因為「勞陣」的親民進黨性格而堅持反對「勞陣」的劉庸，就被「勞陣」勢力以卑劣的手段，停止常務理事的職權。

為了全產總的發展；更為了台灣工運的發展，我們必需應該認清「勞陣」這股民進黨勢力，是如何在自主工運中扮演牽制工運朝向反執政黨的方向發展。我們不能再

容許「勞陣」以自主工運的身份，繼續在工運勢力中繼續攪亂陣線、誤導方向。

十二月十日，各工會團體、工運團體、學生、進步份子，將展開全面的反政府大鬥爭。但勞陣以及以勞陣為中心的全產總領導核心，為了怕民進黨政府受到傷害，正有計劃地在全產總理事會主導意見，企圖將抗爭延後，並將鬥爭焦點轉向非執政的國民黨。

因此，我們熱烈期望所有的學生、進步份子，以及全產總的各加盟工會，能夠在十二月十日，與我們一起行動！抗議民進黨政府倒退修法！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鬥爭，一、爭取勞工的權利。二、加強進步份子與工運間的紐帶關係。三、加強真正的自主工運的力量。同時，我們也希望透過這次所有進步份子與工運的團結鬥爭，孤立全產總內「勞陣」為中心的御用化勢力，進而推動全產總成為一個真正的工人的自主性組織。

★

秋鬥有感

Maggie

日前在苦勞網上看見「兩岸三通與勞工權益公聽會」的報導，工委會提出了貫徹戒急用忍的論述，僅就一種道德性的訴求而言，其立論基礎已充滿危機。又工人版戒急用忍的四點條列訴求，主要打點集中在資本外移大陸必須付出的成本，姑且先不論操作層次可行與否，這種本位而失去準頭的論述將可能觸發或深化台灣工人對中國大陸工人的競爭與敵視意識，實令人憂慮。以下是筆者的看法：

1. 「吳永毅在最後修正全面限制資本外移的說法，他說，互補的產業可以大幅開放，替代性產業則從嚴。」【見苦勞網報導】，這種邏輯可以明白地歸納為兩點(1)從一個普遍的層次來說，為保障台灣工人機會，因此主張戒急用忍，使企業根留台灣。(2)又不同產業性質應區別對待，因為互補性產業對台灣工人就業衝擊小，所以可以不在「資本限制」的行列，但替代性產業則否，應列入限制外移的黑名單(這裡亦先不論吳是如何區分互補性與替代性)。十餘年來台商到大陸投資的一大誘因正

是建基於極其低廉的勞動成本，這樣的低廉工資及低劣勞動條件的背景形成，主要根植於中國改革在放權讓利的發展策略下，各地政府有了更多涉入經濟活動的空間，加上1980年代以來的財政改革，使各地政府為保留更多當地的財政收入，因此莫不大顯神通來推動當地經濟發展，創造了在經濟發展的基本取向下，以地方利益為導向的「發展型地方主義」(developmental localism)在中國興起。

在這樣的過程裡，各地為充飽荷囊，相互競爭，官商利益共生的結構益發穩固，這表現在各地政府積極採取各種「彈性」方法吸引資金的同時，同樣地彈性操縱著各種勞動標準及規範的執行，工人順勢成了此等「彈性靈活」代價的承載者。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各種法制建設(表現在法規條文上)花樣雖然不斷翻新，但是工人權益卻仍舊惡化，畢竟法制作為特定階級關係下的制度性安排，在以獲取私人利潤為目的的市場經濟下，出賣勞動力的階級遭受非人對待也是制度性使然。再者，在中國勞動關係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的今天，工會系統並無發生相應的變化，過去黨透過工會執行政府的政策來建設國家，今天工會扮演的角色是「教育職工愛護企業財產，遵守勞動紀律，發動和組織職工努力完成生產任務」(見工會法)。這樣的角色設定又如何能有效地節制資本需索無度，進而維護職工權益呢？這也無怪乎出現工會著眼於生產秩序的考量，進而反對工人以罷工作為抗爭手段的情況。

一天15小時的工時在南中國是家常便飯；過勞猝死的新聞常常見諸報端；在空氣渾濁噪亂不堪的車間裡，生產線上的童工揮汗如雨埋頭苦幹；在宿舍倉庫廠房合一的作業(居住)環境，伴著熊熊大火的是成捆焦屍蜷曲；斷臂斷指早已堆積如山，反正隨時都有新鮮好用的在門口準備進廠。據報載，深圳1999年發生因拖欠工資、工傷賠償等工人上訪事件達一萬三千起，因勞資糾紛引起的罷工、示威抗議不斷，並引發多起暴力事件(中央社2000.10.21)，然上訪、抗議示威不斷正意味著缺乏一個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組織，示威罷工因而成了僅能有的表達方式。這些正是彼岸工人生存寫照的冰山一角，然「中國工人」不在其運動思維中，今日提出的方向卻是相對狹隘——為保障本地工人免於失業之苦，所以主張限制資本外移，除非是不影響台灣工人就業機會的產業才不在此列。從這樣的論述中，不難衍生出如下的一段話，「你們(吳所謂的互補性產業)的出走，無損台灣就業空間，因此你有權外移大陸，享有低廉勞動力的優惠」，這樣的衍生在其論述邏輯中有著如此的貼合性及一貫性，不是嗎？

2. 工人版的具體訴求集中於要求台灣政府，擬定增加資本外移成本的方式來實踐戒急用忍。具體訴求反應的是可行性的評估。根據工委會的新聞稿，今日台灣工人

失業的主要原因在於非自願性失業的關廠歇業所造成，因此工人版戒急用忍提出了禁止關廠歇業的台商前往大陸投資。就抵制資本家用過即丟的橫行進攻來說，訴求立意雖佳，終究必須面臨這樣的一個事實：就算本地政府限制了資本的流動，但對方大門敞開依舊，如何使限制成爲可能？早年台灣還不允許至大陸投資時，台商卻已悄然登陸，包括在港投資設辦公室再以港資名義等各種方式進入，今天他同樣可以用不同的花招來偷渡，又先不論大陸方面的態度，因爲基本前提並未具備——大陸方面如何能得知這個工廠在台是惡性關廠潛遁至此呢？這樣的推論反應的是，在兩岸信息一致化的前提未能形成之際，亦即兩岸談判沒有取得一定的突破時，又如何要求相應的配合或說公權力行使的貫徹？

3. 資本外移和引進外勞可以看作一體兩面，都是面對市場競爭資本可能的出路，而廉價勞工則是共同的標的物。然這回工委會在面對資本外移中國大陸的整體思路表現在這樣的號召上——「根留台灣反出走，台灣工人要工作」，卻「無可避免」地在階級利益前加入了「本地的」形容詞，爲了保護「台灣工人」就業機會從而減少失業率，因此限制資本外移。這背後是分享了這麼一個邏輯——因爲就業資源有限，所以中國大陸工人和台灣工人是處於競爭的位置，是故「台灣」的資本應優先保障台灣工人的就業。相對當年工委會面對外勞政策時，能夠在勞動—資本的分析層次上提出反外勞政策，從而釐清並避免了反外勞和反外勞政策可能造成的混淆來說，這樣的立論訴求不免有開倒車之虞。就以苦勞網上另一個聲援尼國工人文宣中的一段話，作爲註腳吧！

「資本家可以把台灣的工廠關掉，再自由選擇世界上勞工最最廉價的地方去開工廠，我們要抵抗他們的作法，就要聯合世界上所有的工人，把全世界的勞動條件都提升，讓這些動不動就威脅要『外移』的資本家，沒有這樣的機會。」

理念宣揚的道德訴求也須站得住腳，又只停留在道德義憤的層次，無法對實際情況做出分析判斷進而提出對策，則有流於空想的危機。

上文原張貼於苦勞網討論區，然數日後，工委會宣佈取消原預計的國內秋鬥活動，改以前進香港的國際秋鬥爲主要行動。而此行主要目的之一是前往中聯辦（原香港新華社）遞交一份「台灣工人致兩岸政府的公開信」，主張「兩岸復談，就業先談」。在公開信中是這麼說的「我們認爲在兩岸政府沒有達成願意就『就業議題』協商的共識前，從勞工的角度來看，無法復談未必不好，因爲一旦復談，兩岸關係進一步緩和，資金將加速流向大陸，造成更多台灣工人的失業。」，但如果說所謂站在勞

工的角度是以「保障就業」為最高指導原則，我們仍不得不正視發展中的客觀情勢——行政院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以「螳螂奮臂擋車」來形容大陸投資熱潮的難以抑制，他表示部分傳統產業在台灣營運已無利可圖，外移是必然的選擇，政府應該要協助這類產業外移，「不需要把它們留在國內倒閉吧！」（聯合新聞網，2000.11.18）。就連台灣引以為傲的高科技產業，面對中國大陸已漸形成跨國公司全球佈局的營運重鎮，若不早日搶登此一國際舞台，日後成為乏人問津的野台戲也絕非天方夜譚。倒閉等於原有的就業機會隨之消逝，產業邊緣化意味著就業機會的萎縮，更何況亦有論者提出三通對台中港、高雄港等地的經濟發展會起到一定的作用，進而帶動周邊產業的發展，這同時表示將創造一定的就業機會。以上都是對就業機會的可能評估，但究竟什麼是從「勞工的角度」出發？

再回頭來談行之有年的秋鬥。此趟前進香港的秋鬥行動，論及媒體效果實則相當微弱。再者遞交這封公開信，也不必然非得組團親赴香港不可。而數十萬元的旅費支出（筆者估計），拿來針對台灣產業外移的原委作個細緻的調查研究，其實是綽綽有餘。

對現狀作出具體深入的分析，在當下台灣的運動圈更顯其迫切性，一個較長期的策略方向也才得以應運而生，就以近日內喧騰的工時案為例，與方向的擬定都具有一定的內在關聯性。畢竟所謂的進入工會經營基層並不能視之為路線的區別，以精準的語言來說，這描繪的是一種工作的方式，而路線的擬定必須依據對現實的掌握與判斷，進而以相應的工作方式來實踐理念。戒急用忍三通與否的出現，正考驗著台灣的運動界能否有這樣的視野，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或許是個審視未來台灣工運何去何從的契機。★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從 APEC 看 WTO

林深靖

第八屆亞太經合會 (APEC) 於 2000年11月16日閉幕，主辦國汶萊蘇丹宣讀APEC領袖會議宣言，其中特別提及：「我們樂見中國加速完成入會雙邊會談，並迅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時，我們也支持中華台北儘速入會。」參加亞太經合會的共有21個國家或經濟體，其中包括對台灣未來發展影響至鉅的美國和中國大陸。這一次的領袖會議宣言已透露出明確的訊息：中國大陸於明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 大致已成定局。而如果沒有太大的意外，台灣應該也會在明年成為WTO的一員。兩岸日愈捲入經濟全球化的機制，於今看來，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在此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史無前例的擴張當中，我們除了保持密切的關注與必要的批判之外，對於影響台灣政經發展的新生因素，以及兩岸關係在國際建制新基礎上的互動，也需要集思廣益，在分析中預見未來的動向。

兩條路線的相互牽引與牽制

亞太經合會於1989年在澳洲坎培拉成立。1991年的漢城會議同時將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納為正式成員。明年的領袖年會將在上海召開，核心議題也已確定為「經濟技術合作」(Ecotech)。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亞太經合會首度在中國境內召開，而且，在這邁入21世紀的第一個年會裡，台灣與中國大陸很可能都已具有WTO會員體的資格，兩岸首度在國際社會裡以這麼繁複多重的身份交遇。

此外，在APEC發展的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兩條路線的爭議：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主張以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為目標，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則強調以經濟技術合作為主軸。1993年，APEC年會在西雅圖召開，美國作為主辦國，首度將會議層級提升為首腦會議，並提出將原先經濟論壇性質的亞太經合會發展為自由貿易區的構想，亦即將APEC當中的“C”從“Cooperation”變成“Community”，「合作」變成「共同體」。當年美國總統柯林頓宣讀會議宣言，特別強調：「開放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開放的多邊貿易體系是APEC存在和發展的基石。」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則在會場上提出「相互尊重，平等互惠，彼此開放，共同繁榮」四項原則作為因應，認為APEC應是「磋商機構」而不是「建制化的經濟集團」。緊接著1994年的印尼會

議通過《茂物宣言》，美國的主張得到進一步落實，提出了實現亞太地區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時間表，亦即發達國家成員不晚於 2010 年，發展中國家成員不晚於 2020 年。中國在 1995 年的大阪會議扳回了一城，通過的大阪《行動議程》重新強調「平等夥伴，共負責任，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 APEC 精神，並刻意凸顯開展「經濟技術合作」的重要性。

明年的上海會議，議題訂為「經濟技術合作」，顯然兩條路線之爭多少會向中國方向傾斜。可以預見的是，新千年兩岸關係的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將是一個重要的試點。美、中兩個陣營在 APEC 的發展進程中，一直處於上述既彼此牽引，又相互牽制的關係。台灣夾處兩大陣營之中，究竟要如何自處，恐怕需要更高的折衝樽俎的智慧。

一切跟過去再也不一樣！

其實，早在 1991 年 APEC 的《漢城宣言》中，即出現「參照關稅貿易總協定的原則來促進自由化」的提法。眾所皆知，「關稅貿易總協定」(GATT) 是「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前身。可見 APEC 的發展邏輯與 WTO 有一定的姻親關係，兩者都是市場經濟全球化與貿易投資自由化的載體。APEC 同時也是作為經濟霸權的美國將其政經控管範圍從美洲伸入亞洲的橋樑。1989 年，美國聯合加拿大與墨西哥組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如今，美、加、墨三國同時是 APEC 的成員。除此之外，美國又正在積極推動「美洲自由貿易區」(Free-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 簡稱 FTAA)，幾乎囊括了所有北美與中南美的國家（排除古巴）。總體來看，美國的全球化策略是多層次的，是盤根錯結的，任何國家一旦踏入這一放任自由化 (laissez-faire) 的羅網，就再也不可能向計劃經濟或保護集體產業的方向回歸。

「世界貿易組織」從其前身的發展到現在，雖然已有 138 個會員體，小國在組織內的發言權其實是非常有限的。過去幾個回合的談判，幾度全球經貿規章的議定和修改，無非是幾個大國在較量、妥協下利益交換的結果，其中又以所謂「七大工業國」(G7) 最具決策影響力。被邊緣化的小國、窮國只能選擇依附的對象，被動地接受大國協商的結果。這是台灣在加入時不得不認知的國際現實。1999 年 11 月底到 12 月初在美國西雅圖召開的 WTO 部長級會議上，雖然有熱熱鬧鬧的一百多個國家代表與會，大家卻都知道，真正的決策機制並不在全體大會上，而是以美國為首的少數幾個國家代表，在一個被稱為「綠色房間」(Green Room) 的小會議室裡閉門密商。

這種寡頭決策的現象不僅對眾多貧弱的發展中國家不公平，WTO 機制中消費至上、以商品價值涵蓋一切的單一思維，也在各國內部引起進步人士的批判。這些長期積累的壓抑和不滿，終於在西雅圖的會場爆發：場外遭到全球進步團體的示威，場內引發第三世界國家代表的集體抗議，WTO 千年會議最後竟在喧鬧中草草收場。

千年會議的意外流會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未來發展投下重大的變數，過去的寡頭決策模式將受到更大的質疑和挑戰。去年圍聚西雅圖的進步團體在取得抗爭成果後，編了一首凱旋歌曲，在街頭不斷迴蕩的旋律中，他們宣告：「一切跟過去再也不一樣！」

量變產生質變

WTO 即將遭逢的另外一個重大變數是中國的加入。

中國的「入世」在大陸產官學界有相當大的爭議，固然主流意見認為這是中國走改革開放路線的必由之路，是中國全面現代化並與西方先進國家接軌的契機；卻也不乏有人將其視為西方國家意圖「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陰謀，認為中國在入世談判中與美國所簽署的《市場開放暨規則承諾》是「喪權辱國的新二十一條」，一旦簽訂承諾並實施，「中國的經濟主權將被操縱在美國的國際壟斷資本手中；中國的銀行、電信、農業、工業、科技、文化事業等，都將成為西方跨國公司與跨國銀行的囊中物；中國每一個老百姓家庭的生存都將面臨來自西方的直接威脅。」類似的意見在網路上廣為流傳。事實上，這些憂慮不僅在中國大陸內部存在，對台灣本土而言，恐怕也是我們必須面臨的挑戰。

的確，「關稅貿易總協定」在 1947 年由 23 個國家簽署成立時，全球經濟大蕭條以及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仍未散去，為了活絡全球經濟、消除國際間因競奪市場而再度爆發戰爭的危機，其目標很鮮明地訂為降低國際貿易的關稅壁壘，以契約的形式在國際關係中建立自由市場制度的規範。1994 年，在美、歐等經濟強權的長期拉鋸下終於取得妥協，完成「烏拉圭回合」談判，「關稅貿易總協定」於次年轉為「世界貿易組織」。這時，會員體也已累積到上百位。因此，「世界貿易組織」有一個漫長的歷史形成過程，其遊戲規則則是會員體在實力原則下談判、妥協、利益交換的結果，不像其他國際組織有明確的既定章程可循。事實上，1999 年底西雅圖會議中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集結反彈，已顯現出 WTO 有「因量變而產生質變」的可能性。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此際加入，固然有一些基本的准入條件或入門費是無可迴避的，也必須有接

受既定國際貿易規範束縛的心理準備；然而，這麼龐大的一個中華經濟圈進入 WTO 內部，要說對 WTO 本身不產生任何的衝擊，也是不切實際的。

台灣由於既定的外交困境，朝野普遍將加入 WTO 視為進入國際社會的重大突破，在加入前的協商談判中不免因急切毛躁而棄守長遠利益，流失了許多於台灣本土有利的籌碼。其中尤以弱勢的農業和文化部門，在未來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反觀中國大陸，在一開始即堅持要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爭取更長的過渡期和更優惠的貿易條件，總理朱鎔基雖然被視為積極主張「入世」者，卻也不時對美國的要價過高提出批評，去年他到美國進行雙邊談判時，很明確地告訴美國人：「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做出的讓步已經足夠了。要我們完全達到 WTO 的標準，需要給我們一個時間表，給我們一個過渡期嘛！你要的過多，要的過快，最後可能什麼也得不到了！」

自主決策空間大為縮減

中國堅持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進入 WTO，並爭取更長的過渡期，其實是有一套戰略思維在引導的。2000年4月，作為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象徵的「南方77國集團」在古巴召開（其實共有122個國家與會），中國在其中扮演十分積極的角色。同年10月，「中非合作論壇」在北京召開，有45個非洲國家參加，非洲統一組織的秘書長也親自到場。顯然，只要有足夠的過渡期作為緩衝，未來在 WTO 內部，一旦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採取一致立場，要翻轉世界貿易組織的既有決策模式是不無可能的！去年12月2日中國外經貿部長石廣生在西雅圖會議上的發言，就被許多第三世界國家認為道出了他們的心聲。石廣生強調：WTO 應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漸進的市場開放模式；發達國家應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准入環境（亦即不再濫用反傾銷、反補貼等手段阻撓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其市場）；往後制定新的投資貿易規則，必須有發展中國家的充分參與。

中國極力拉攏第三世界國家的作為與美國的態度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過去 GATT 時期，曾給予發展中國家一些例外優惠，譬如第 18 條就允許發展中國家對國內的幼稚工業進行一定的保護。美國卻一再要求對 GATT 第 18 條重新解釋，並對引用這些條款加以嚴苛的限制。在歷次談判的過程中，隨時可見美國利用其資本和技術上的優勢，透過多邊貿易體制，使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劣勢固定化、合法化。

WTO 作為經濟全球化的載體，必然會大幅提高世界各國的相互連結與依賴關係，

這也就意味著各國政府利用政策手段實現本國目標的能力將受到侷限，執政者自主的決策空間將大為縮減。事實上，我們在台灣討論加入 WTO 之後的問題，最常提出的是如何因應並自我調整。這其實已預見到某些範疇的主權和決策將處於被動的狀態。中國大陸當然也面臨同樣的問題。不過，前不久我有機會在北京參加一個國際政治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是《中國與國際組織》，其中當然討論到 WTO。令我訝異的是，中國學者所爭議的焦點不是在加入後如何適應 WTO 的既定規範，而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第一大國，如何在加入後運用大國影響力，去改變 WTO 的遊戲規則。顯見新中國對於自己往後在世界體系中的份量，有相當強烈的自信。

依附性格與經濟發展趨勢的矛盾

以中國參與 APEC 的經驗來看，中國雖然不是創始會員國，卻是在加入之後，即積極改善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透過細膩的外交運作與東南亞國家協調出共通的觀點與共同的利益，目前中國在 APEC 的份量，已達到足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地位。2001年首腦會議移師上海舉行，這一趨勢很可能會更進一步向中國方向傾斜。最近在汶萊舉行的 APEC 領袖會議，許多歐美媒體都已注意到美、中兩國暗中角力的事實。譬如，柯林頓於會議結束後到越南訪問，是越戰後第一位踏入越南國土的美國總統；江澤民則選擇與越南關係交錯複雜的老撾和柬埔寨，而 11 月底，總理朱鎔基還將到新加坡參加擴大後的「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ASEAN 當然沒有美國的份。

台灣的經濟與政治長期以來對美國有相當鮮明的依附性格，台灣加入 WTO 很可能也不自主地就被整合進以美國為首的陣營，惟美國馬首是瞻。然而，這些年來，台灣企業在中國大陸的投資以倍數成長，根據央行的統計，近 10 年來台灣資金流往大陸累計已超過 715.4 億美元，逼近外匯存底的數字。今年 1 至 10 月核准廠商赴大陸投資與去年同期相較，增加了 98%，其中又以電力電子產品製造業居冠。廣東省東莞市電腦資訊產品企業近 3000 家，正在成為全球最大的資訊產業製造基地，預計今年東莞的電腦產量可達 1 千萬台，出口創匯超過 170 億美元，這其中台灣的投資佔了相當可觀的份額。

兩岸關係即使依然緊繃，一個「經濟圈」的形式卻已隱然成形，這是我們無法否認的現實。如今兩岸都即將進入 WTO，大陸的西部大開發戰略也勢將進一步增加其市場的吸引力，外資投入的範疇與力度也將隨之擴張。因此，長遠來看，台灣對美國的依附關係與台灣的經濟發展趨勢很可能會出現巨大落差，這是我們在思考兩岸關係與台灣經濟發展戰略時，不能不特別關注的一個矛盾。 ★

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 和兩岸問題

林書揚

前言：

本文還不是台灣社會階級結構的全面分析。論範圍、周延度、深度，都還不算。只不過以兩岸問題的直接視野和角度，做了一番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反影響存在的，摘要式的過程論述而已。像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等，都暫予割略了。重點鎖定50年代、60年代台灣工業化的雙胞——台灣本土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由於集體記憶中的某一特定因去的糾纏，致使有關兩岸關係的問題意識裡，經常出現過度的防衛性反應或感性淺層的推測。長年以來造成了阻隔兩岸關係良性展開的一道無形的牆。變成了當前社會的心理構造中急需檢討和處理的問題。於此略抒淺見，有待於諸方導正。

一、

陳水扁當選近半年後的兩岸關係，是明顯的膠著狀態。從台灣民間統運的角度來看，有“急獨不再促統也難”的感受。陳水扁以台灣資本主義實體的最高護衛者的身分，正以十分慎審的態度堅守著和平分離的大原則。爲了維持和平，宣佈五不。爲了堅持分離，強調台灣的主權是獨立的。我們不必諱言，在當前階段和平分離是資本主義階級社會的多數意識。和平統一，是少數意識。

二、

台灣本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一百零五年前，因爲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清廷戰敗，而被強奪。五十五年前在另一場戰爭中，日本戰敗，按國際法、國際慣例、中國收回失土。台灣復歸中國。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符合國際法的一件事。台灣和大陸，同一民族同質文化，爲什麼社會多數不願接受統一？因爲台灣的資本主義意識型態，資產階級的功利價值觀，現時超過歷史的傳承意識，超過民族的大義和感情。

三、

一個社會的性質，由它的經濟結構體的性質來決定。在這基礎結構上面，有適合於基礎結構、具有保護及促進作用的上層政治結構。由基礎結構中的支配階級的積極分子所構成。或由認同這種社會結構原理的，其他階級出身的精英分子所組成。在資

本主義議會民主的體制下組織政黨，再經過程序民主的選舉制度，由多數選民授權，取得政權。以政府的名義執行一切國家行爲。於此，經濟的支配關係，轉變爲政治的統治關係。

四、

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在經濟上是私有資本的保護和增值。而在政治上，是建立並推進有利於階級的基本需求的政策或施政方針。凡任何一種靜態的制度規範，動態的演進變化，都要經過政府根據階級基本利益的判斷加以操控處理。兩岸關係應往哪一個方向推，這樣的大問題更是如此。上面所提，台灣的當權派堅守兩岸和平分離的立場，基本上是台灣資本主義抵制大陸社會主義的必然現象。應該屬於中國現代史中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條件下的特殊型態的階級鬥爭。

五、

歷史的看，台灣有過兩種資產階級。一種是國民黨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另一種是50年代、60年代之間逐漸興起的本土資產階級。爲民進黨所代表。兩種資產階級爲了政治權力的分配問題經過了一段激烈的鬥爭。國民黨雖然也推行過由威權式政黨轉型爲功能性政黨，但長年積習難改，舊包袱太大，轉型難以收效。卻給了民進黨以完成資產階級市民革命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的機會，民進黨以民主改革的口號對抗國民黨的高壓專制，以分離建國的主張抗爭國民黨的省籍地區歧視。使得民進黨獲取兩種立場的群眾支持，也局部地取得了國際的同情。

六、

不過台灣的資本主義，本質上屬於「新殖民地資本主義」。即使其產業結構產值規模、技術水平等，在世界經濟中被列入「新興工業經濟區」NIES，但本身的真正主體性仍然低於對外的依附性。新殖民地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在於其資本循環運動中，數個關鍵性的環節，無法擺脫，甚至被吸進境外經濟強權的更大的資本環流中，不得不接受結構性的不等價交換，或不公正競爭。經濟的依附性、反映爲政治的附庸性。這就是民進黨、國民黨在其對外關係上常以「西方民主陣營」的一員自傲，謹守從無「反帝」意涵的對外政策的理由。

七、

台灣新興資產階級的階級意識，經過與舊執政黨之間的爭權運動，且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後，更形高漲。本土民間經濟的實力，於60 - 70年代以3倍於官僚資本（公有、黨有、名義上的私有）的速度成長。其產值，49年佔28%，85年佔84%。80

年代初，五百零一大企業中，本土新起的企業與舊官僚資本系統之間，比率是3：2。大約40年之間，台灣的人均收入自不足100美元到超過一萬美元。90年代的台灣公共基建的現代化，已經接近歐陸國家的水平。就整體的經濟規模而言，在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圈裡大約位在前20名之內。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地資產階級的集體記憶中，有二二八事變、白色恐怖政治帶來的嚴重挫傷，更有70年代後，大陸在世界政治中的崛起和台灣地位的相對衰退現象所導致的不安全感。從此角度，似可窺出台灣資產階級的非中、脫中傾向的部分理由。

八、

穩定度達到一定水平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上的主宰階級將其經濟力轉換為政治力的主要途徑，是利用巨型傳播媒體工具，經營一種「主流理論」。也就是，統治階級馴服人民大眾的「精神勢力」。經由媒體的壟斷，長年累月經營出正當化剝削與統治總體制的「民意」內容，形成一時一地的「輿論指針」，實際影響各項選舉。在兩岸問題或統獨爭議中，諸如：86年民進黨的成立，88年該黨四·一七決議案；89年該黨在立法院，縣市長選舉中的躍進；90年該黨「台灣主權獨立」決議案；91年首屆國代、立監委全體退職；92年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改，等等被認為兩千年政權交替的先行運動，都是在一定的民意背景下以「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通則觀念，或者所謂的「民主普世價值」的宣揚運動中一一完成。由此觀之，台灣的分離建國運動，其核心部分無疑是現時由民進黨主控的台灣資產階級的階級運動，應無疑義。

九、

這裡所提的「階級運動」，不是泛指一般階級形成論的過程。而是指一個階級的成熟度已進入到政權攻堅戰的準備期，在運動的組織結構上有司令部，有多條戰線，有戰略性的指導理論，有具體的作業規定。有總目標、階段目標。這樣的結構體的全面運作，便是2000年陳氏上台的基本要件。表示台獨運動的規模和水平，已經達到了一定的廣度和集中度。回顧70年代，時值台灣經濟的起飛期。經濟政策以重化工業及資訊產業的建設為中心。大量的工、理、商志向的台灣留學生趕赴美、歐、日等先進地區，卻為當地的台獨種子組織所吸收，逐漸形成專職或半專職的政團隊伍。87年解嚴，經海外新血輪補強的分離運動，受到中美新關係和國民黨本土化的轉型路線的刺激，漸由島外而島內，由基點而社團而社區，從幼稚園到老人大學，台灣心、台灣情的全面宣傳蔚為風氣。經過95、96年導彈演習風波，97年的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終於把全島人口的絕對多數置於該黨的地方政權治理之下。階級的自覺隊伍為核心，一層一層的群眾組織，一條一條的戰線活動，從核心的高度緻密的政治運籌，到外圍的民粹主義反智情結，在一次最高階的大選舉中，匯合而成的社會動能，是十分

驚人的。以十萬上下的登記黨員，取得四百九十萬選票，一舉而攻堅成功，陳水扁登上了大位。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終於打敗了官僚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

十、

台灣勞工階級的比數增長（99年佔就業總人口約70%），及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比重加大（99年約佔10%），同屬50年代以降逐年突顯的現象。50年代的輸入取代，60年代的輸出取向產業政策，使同一時段的農地農作改良所帶動出來的農村剩餘勞力，一波波地聚在勞力密集產業的周圍。這種趨勢在第二、第三次「經建四年計劃」開始特別顯著。如68年（第四屆）一年之間，流進加工出口區等工廠地帶的農村人口達一百萬，使得該年勞力市場上出現了空前的「完全僱用」現象。且隨著九年國民教育制度，勞工智力水平也逐漸提高。但政府的勞工政策，卻仍然以維護資本效益，及資本積累為先，在軍事戒嚴令與「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或「非常時期農礦工商管理辦法」等等嚴苛的法令束縛下，低工資、長工時的基本情勢難有改善。60年代中期進入高成長期，65年成立亞洲第一個加工出口區，輸出指向產業進入黃金時代。但基本上勞動條件惡劣，基本工資偏低，缺乏勞動三權的自我防衛。不熟練工多，多數工人離農不久，離職率高，反而形成了一種逆行性的安全瓣。但高利潤率下，由於勞工大眾的低消費和不安定就業，進入了70年代重化工業時代後，低素質勞動不勝技術條件要求的問題普遍產生。為了適度改善勞工生活提高勞動生產性，83年始有勞動基準法草案進入立法院。但時值由重化工業到科技新產業的萌芽初期，資本家急需擴大投資，且一方面也要防止傳統工業部門的競爭力低下，該草案一直被擱置著。在此階段，新起的台灣勞工階級顯然尚未進入成熟期。

十一、

在數量上迅速膨脹的勞工，之所以停留在被動消極的，稱得上是沒有聲音的多數，有下面幾點因素：1·台灣工運自30年代以來遭到兩次斷層。A)日帝時期的帝國主義戰爭期（1931—1945）。B)長達38年（1949—1987）的軍事戒嚴令統治。中間短暫的四年又是國共鬥爭和內戰的高度緊張時期，更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準備期。2·白色恐怖（1949—1960）的主要對象是所謂「親共左翼」分子。而工運易被認為「階級鬥爭論」的實踐。3·御用工會利用行政資源進行籠絡。4·經濟基本面的上昇中勞工生活大致跨過溫飽線。在這種歷史包袱下，勞力密集產業的勞工大軍，只有等待資本家的資本積累到了一個自然躍進的新階段，出現了對勞動生產性的新需求，而在勞動市場中產生汰舊換新的一番調適過程。如73年的十大建設，80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勞工中的技術工比率急增。智力水平的提高，戒嚴體制的制度疲勞，官僚系統的僵化腐敗等都是背景，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自發性衝突逐漸增多。台灣的產

業結構帶著缺陷甚至潛在性危機而演進，但整個社會操控裝置卻逐漸出現細膩化、柔性化的自然轉機。到了84年，立法院通過了擱置十年的勞動基準法。一時間積壓下來的勞資對抗逐年升高。出現短期的工潮，也出現第一個工運團體(84年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86年民進黨成立。本土資產階級爲了開闢進攻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集團的聯合戰線，有時候有限地扮演勞工同情者的角色。但該黨社會基礎的相當比例，是佔97%的中小企業。因此這項策略早早失效。87年戒嚴令解除，自主工會運動升起。經過幾件大、中型罷工風潮，88年、89年出現了台灣史上首見的，號稱代表勞工利益的政黨，工黨、勞動黨。工黨偏向社會改良主義的勞工服務，而勞動黨則以社會主義和國家再統一爲兩大綱領。但因前面所提的歷史因素，勞工大眾的組織化迄今仍然屬於低度階段。現實上脫不了“三低”特性－組織率低、凝結力低、運動目標低。因此，作爲一個整體，尙未成熟到「即自且對自」的階段。所能發揮的社會能量以其七百萬人口，仍遠不及60年代工業化的雙胞之一的本土資產階級。

十二、

台灣的勞工階級，無疑具有客觀的階級屬性——資本主義結構體中的唯一的發展契機。但因運動歷史短，視野範圍窄，自覺水平低，除了經濟性的權利意識外，工人作爲公民，國民的責任感相當缺落。資本主義的庸俗價值觀的影響下，世界觀小資產階級化，歷史感稀薄。多數基層工人還是囿於反國民黨情結，甚至因反國民黨而反中國變成了民進黨的精神俘虜。對於當前台灣社會所面對的現實——統獨矛盾是主要矛盾，勞資對抗是基本矛盾，一般尙未具備應有的思想條件予以接受。如此則，分離運動以台灣資產階級的“階級運動”爲核心，而統運方面則至今尙無勞工階級的自覺投入，只是不同階層人士的理念運動，較少群眾生活的結構性連帶基礎。因此意識內涵多有分歧，凝結力不高，擴散力小。在高度資本主義化了的意識型態諸領域中，處處可見分離主義者的身影，而認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統一運動是階級解放必經階段的，民族民主運動大環節的台灣勞工，現時還是勢單力孤的一小群先行者。分離運動與統一運動，是一個社會的內部運動，卻因兩大階級的成熟度的懸殊差距，的確出現了嚴重的偏跛現象。這一種偏跛，顯然有大陸的政治壓力和經建成果維繫著一定的補正作用。這作用當然是正面的。只是在策略上應該是中長程而不是短程的。它必須同時發揮雙方面的影響－勸阻善導台灣資產階級的離心，鼓舞勉勵台灣勞工群眾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前途建立信心！

結語：

把台灣島內日愈深刻化的統獨爭議放進階級結構下的內部對立，意不在主張統獨矛盾應經由勞資階級鬥爭的規律予以解決。因爲突破帝國主義加在中國身上的最後一

道枷鎖，雖然客觀上可望由勞工階級承擔主要的牽引手，但仍然是全民的共同責任。更何況台灣勞工階級在階級的基本立場，階級的世界觀、歷史觀方面仍處於幼弱期。只是，鑒於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取向有一定的特質，在社會意識底流裡，還是可以發現階級立場在生活心理的深層反映。像台灣這種有過經濟起飛，已具備上「新興工業地區」條件的社會，不論蘊藏著多少內部批判，精神反叛，多數人的意識裡隱現的是：經濟生活中的私有價值，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價值。當這種價值觀和他們主觀中的統一的價值觀不相符時，寧取前者背離後者。這便是作為社會存在的資本主義——影響成員心理的一般過程。統獨問題在道德判斷之前應有科學的定性分析，才可避免誤讀誤判，在複雜的曲折過程中清醒地思考正當的政策和方向。 ★

與其挺扁， 不如試著形成「第三連線」

高文進

捲起你的袖子吧！聖戰就要開場？政治對抗演變為「民意大對決」，公婆都有理，數人頭來出政權……社運部門也沸騰了，一場熱鬧烘烘的台灣劇碼就要上演。但是，到底是要反核？要擁扁？而最後會不會變成反民主？

核四引發的政治風暴，已經蔓延到民間部門，於是，社運團體也動員了起來。十一月十二日反核遊行，台灣南北兩地都熱鬧演出。

但是，這場「人民的大行動」，恐怕與政治上擁扁的行動，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甚至於，它的客觀效果，就是為阿扁政權抬轎。只要看看媒體上天天「開講」的民意調查的題目，看看上禮拜包圍立法院的群眾，就可以確定這點。連國民黨相對「進步」地說，罷免案不與核四案畫上等號（當然那是出於策略），卻都根本撇不清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公共論域的低度發展與「去智性民意」

原本社會部門的發聲，是件好事。但是台灣的「民主」型態是，政治部門包抄一切，於是所有民間的力量，被吸納入政治黨派的邏輯裡。反核／擁核的民間訴求，馬上貼上政治標籤，成為挺扁／反扁的一部份。

這是台灣民間社會的悲哀，政治黨派凌駕於所有社會力量之上，黨派的政治標籤成為所有訴求最後的符號，最簡單的符號。是符號，而不是說理與討論，在製造緊張，在製造對立，在創造民意調查（贊成或反對，其餘閉嘴），在形塑媒體的收視率與政治人物的得票數，社運力量成為跑龍套的。

然而，民間社會隨著政治黨派起舞，「貼標籤」只不過是問題的一環。底層的問題是，民間部門也複製了黨派的邏輯，操作簡單的認同與對立關係，擺脫不掉「前現代社會」的血緣與宗派主義。進一步地，這個前現代社會的「認同政治」，接合上最現代的「媒體政治」炒作手法，認同的符號被攝影鏡頭放大，黏貼在政治黨派的旗幟之上，完成了台灣政治認同邏輯的循環鏈。然而，犧牲掉的是，公共領域的多元性與對話情境，並藉由此一公共性所可能提升的社會性智能——它仍然被深鎖在「民意大對決」的黑牢中。

台灣民間力量的危機在此。解嚴至今十四年的社會歷程，其實民間的力量有可觀的成長，縱觀勞工、婦女、族群、環保、媒體、教育、社區、音樂、影像、住宅權益、消費權益、司法改造的議題與團體，多不勝數。然而，他們的聲音一旦被排除在上述的政治媒體循環鏈，就成為了邊緣；如果進入了這個循環鏈來發聲，又複製了政治黨派的簡單化、標籤化邏輯，最終被化約為民意調查統計中的一個數據。於是，民間部門對於政治參與和媒體發聲，聰明的，不是保持距離，就是投機炒短線，而無知的，一頭栽下卻自我埋葬。

莫讓阿扁成為反核的神主牌

且看看這次民間反核的聲音。我們相信，許多民間團體有自己的自主性，對他們而言，反核不必然等同於挺扁。有些團體向來深耕基層的社會工作，他們為各種社會議題奔走，費盡唇舌，默默耕耘，對於核四議案，也自有見解，並非人云亦云之流。也有些人士，秉持「專業知識」之心智，只不過眼見「核爆」亂局之不可，卻苦無發聲之管道，欲獨攬狂瀾，盡一份知識份子的良心。然而，現實的政治環境是，對台灣

標籤政治無知的團體，他們花了多少心思與熱情書寫著自己的理念，卻不知道大眾根本不認識字，只懂得分辨旗幟的顏色。而很多認得懂字的人又不敢出來聲張了，因為他們知道，首先這些字是寫在有顏色的旗幟上頭。另外一些民間部門的「投機客」，打的如意算盤則是，乘機出來搖旗吶喊，因為只有寫在有顏色的旗幟上，才有人稍微會去看看上頭有些什麼內容。

這是一個完全不健康、墮落的政治生態。它扼殺了民間社會與公共領域的發展，也反過頭來讓政治部門自身的格局窄化。台灣的政治向來不是站在民間力量這邊的，向來不是透過公共論域的發展，去支持民間力量的勃興與成熟化。在反核的議題上，媒體說，「反核是民進黨的神主牌」。但是，綜觀台灣的政治邏輯，站在公共領域之民主立場上，站在「公民社會」的立場上（據說，這是許多民間團體的立基點），我們恐怕得提醒反核的民間同志，要小心阿扁被建構為反核的神主牌了。

民間團體串連為「第三連線」

這不意味著，社運部門的發聲不應該介入「政治」，或者說，不可以和政治黨派的力量「策略聯盟」。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公共領域的衰竭，與權威的組織化力量之運作密切相關，包括財團、權威媒體，還有政黨。在這種壓制「公民社會」的政治生態下，與權威的組織化力量「策略聯盟」時，如果不著眼於更大的格局，試圖突破這個循環鏈的共生結構，以培育剛剛冒芽的自主性社會力量為戰略高點，則可能落得「挺進一步，全盤皆輸」的局面。拿反核的議題來看，張俊雄說台灣七年不缺電，再加上阿扁向連戰道歉，廢核的民調就可以攀升十多個百分點，這種「策略聯盟」的效果對於社運的自主性是健康的嗎？而反核沒有更深刻的社會主張嗎？它將隨著廢核四而終結嗎？

我主張，既然要集結社運部門的力量，為什麼不形成自身的集體性與政治符號，要去與既有的政治分贓體系瞎攪和呢？社運團體應該串連為「第三連線」，在政治上發聲。「第三連線」意味著，具批判性格之民間力量的集結，在政治上，不靠攏執政或在野的黨派，拒絕被貼上他們的標籤，甚至，我們壓根兒否定他們二元對立的政治格局和沒有社會內涵的民主觀。「第三連線」，是一種政治行動，藉此，社會力量不再消極迴避政治黨派的包抄，而是打算在政治上，建構一個社會部門得以發聲與施力的戰略高點。

政黨輪替是新的政治縫隙

這樣的提法不是創見，向來社運界都抱持著這樣的期望。只不過，當下的局勢恐怕提供了新的條件，讓我們得以在既有的政治生態中尋得縫隙，在最脆弱的環節上，突破既有的循環鏈（一個不太配襯的類比是，尋求結構性的弱點予以突破，民進黨的前輩已經提供了許多「典範」，從地方到中央，民進黨的執政都有賴於國民黨的分裂）。這個新的結構性條件，就是台灣在總統大選結束後，政治權力變化最重要的兩件事：政黨輪替，三國鼎立。

首先，就像人本基金會為反核遊行所宣告的文案上說的，「自政黨輪替以來，我們的期望升到了最高點」。只不過，我們該期望的並不是新政府，而是看破既有政黨政治的社會力量。政黨輪替，就算樂觀的人也抱著潛在的擔憂，這股潛在的憂慮隨著新政府政策的搖擺不定加深了：縮短工時案的跳樑演出，電視台公共化政策的妥協，921 重建只是空畫大餅，失業問題束手無策，財經政策跟著股市漲跌，兩岸關係成爲作文比賽，到核四議題的全民對立，社會大眾的問號越來越積累了。而三國鼎立的政治不均，只會強化並內爆各種醜態。況且這齣戲碼必然延伸下去，並伴隨著選舉每逢必漲，大盤殺盡。再加上，全球化的壓力與，在全球化的壓力下兩岸不得不面對的新格局，外在環境會逼使茶杯裡的風暴更加自亂陣腳。

我們看到，逐步地，在最近這波亂局中，除了伴隨著媒體政客炒作的搖旗吶喊動作之外，已經有了批判性的進步聲音出現。包括在學界，也有了超越「針砭新政府」之格局的觀點提出。這些不同的聲音，著實應該與更多的社會進步力量結盟，尤其是社運團體的力量，去建構新的政治發言權。

我們得承認，過去十多年，台灣社會力量的勃興與政治反對力量的壯大有密切關係。然而，這樣的歷史進程是到了該重新盤點的時刻了。下一波的社會改革，需要有更宏觀的視野、更開闊的格局；而批判的進步力量得重新整隊，去面對新的歷史處境。放大格局來看歷史進程，新政府已經折舊了，不在於它上台了多久，也不在於它到底幹了些什麼好事或壞事。邁入下一個階段，勃興的社會力量才要登場，而且更加意識到，自己本身也是政治的一環。 ★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南方電子報》）

寒而不酸，窮而不濫

—— 我看《左翼》

俞向南

《左翼》這一份單薄的期刊，與台灣當前單薄的左翼勢力，是十分相稱的。從1999年11月底到2000年10月底為止，已整整出了十二期，不上市、不宣傳，也從不脫期、不延滯，就這樣默默地、堅定地，走過了一個年頭，跨越了一個世紀。《左翼》創刊號開宗明義即以集結隊伍作為努力的方向，如今也許隊伍尚未成形，但是我們很清楚地知道，《左翼》的訂戶每個月都在持續累增，寄發的地域也不斷擴大，這一份通訊的讀者也許稱不上是一個可以集結的隊伍，卻至少已是一個資訊與知識的社群。左翼的朋友也許還沒有形成共事的準備，但是透過一年來的辯爭和訊息交換，大家的面目越來越為開闊明朗，立場越來越為鮮明堅定。左翼的勢力依然單薄，但是左翼的朋友不再孤單。

比起從日據時代到五〇年代台灣左翼前輩在危機四伏處境下的堅忍抗爭，短短一年的《左翼》通訊誠然微不足道。要延續台灣左翼傳統，要與當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接軌，《左翼》若是最終未能凝聚成可以行動的隊伍，那麼，它畢竟是愧對前輩先行者，畢竟是無以在世界立足，也就是說，它畢竟還是失敗的。一份刊物，可以是改變世界的出發點，也可以是自溺自慰的陷阱，《左翼》的出刊，如果無法將運動推前一步，而是陷入每月輪迴的例行公事，那麼，往後回頭來看，它也許只是把左翼朋友的熱情拿來做了錯誤的燃燒！

在第七號的編輯報告，主編告訴我們：「《左翼》出版之初，我們即決定要以最素樸的形式發行，因為我們深知：如果要與這一惡質的體制進行長期對抗，勢必要擺脫資本主義一般文化工業運作的邏輯，不受資本的制約，才足以支撐下去。這種強悍的認知，或許正是《左翼》得以支撐下去的秘訣。就我們所知，《左翼》每一期從約稿、定稿、編輯，乃至印刷、裝訂到跑郵局寄發，都是幾位朋友奉獻工餘、課餘時間而得以完成的。他們無私無怨而又刻苦儉約的工作方式，使得每一份《左翼》的成本得以壓到最低極限，不僅保證了每一期都能夠按時寄發，而且能夠讓這樣一份知識性、運動性的刊物持續以贈閱的形式存活下去。左翼的朋友絕大部分是所得有限的工薪階層或是身無長物的青年學生，然而竟是靠著他們的慷慨解囊和奉獻時間，點點滴滴匯聚成台灣進步力量的長流。

《左翼》走過一年，也正好見證了台灣政權的易手。《左翼》預言了國民黨政權衰朽瓦解的命運，2000年3月18日，國民黨拱手讓出政權。《左翼》從第五號（3月底出刊）起對民進黨政權性質的分析，提早揭開當權新貴民萃的畫皮，後來事件的發展也的確讓我們見識到，這批在選舉時齊唱勇敢台灣人高調的政客是如何在金融財團資本家面前暴露其奴顏媚骨的本色。關於兩岸問題，目前朝野陣營陷入「各表一中，一中各表」之類的無聊文字遊戲，《左翼》卻是連續幾期，開展了一場相當深刻的論戰，內容涉及歷史、哲學、政治、經濟、社會的多個層面，多篇文章對於中共政權性質的轉變及其定位，也不曾假以辭色。這一年來，《左翼》獨立的、開放的批判性格，成就了它自主而犀利的風格。

民進黨上台後，許多政治明星和民粹口號的魅力在半年內幾乎全盤消退，台灣人民從來沒有這麼清醒過。在台灣社會，「左」、「右」的分野也從來沒有這麼明晰過。「除魅」的效果導致理性的抬頭，也就是講批判、重辯證的科學社會主義機會的來臨。《左翼》的形式也許素樸，它的內容卻是豐富而多元的；台灣左翼的勢力也許還十分單薄，它的社會基礎卻可以是無比深厚的。一年前，《左翼》在極端貧寒的基礎上創刊。一年後，《左翼》貧寒依舊。但是，寒而不酸，窮而不濫，《左翼》至少抬頭挺胸地，展現了勞動階級的風骨。 ★

緊緊握你的手

<第十期至第十二期捐款名錄>

小鹿	500	吳松霖	100	許金玉	3000
古添洪	1000	金寶瑜	US\$100	許國隆	500
石文傑	1000	春水出版社	2000	曾健民	1000
石聰金	2000	施叔青	5000	黎明華	2000
有志	1000	陳明忠	3000	戴證家	600

計：NT\$22700 + US\$100

由於本刊郵寄費用統一由捐款支付，匯款註明補貼郵資者，恕併作捐款處理。

為《左翼》慶祝一週年

金寶瑜

從《左翼》第一號出版到今天已經整整一年了，在這一年中，《左翼》本著接納左翼中各種不同看法的原則，給台灣（也包括一些大陸）的朋友發表他們對許多議題的分析和看法，提供了一塊園地。在這一年中，在左翼編輯同仁辛苦經營和許多年輕人大力協助下，這份雜誌每月按時出版，《左翼》能達成它所期望的目的，和有這樣的成績是很難能可貴的。

我認為左派在目前是整頓隊伍重新出發的時刻，但也是多少年來對未來的前途和方向最不清楚的時刻。從五十年代的冷戰開始，右派的宣傳機器就發起了在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隨著客觀形勢的發展，右派在意識形態的領域內可以說取得全面勝利。在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左派朋友受了右派宣傳的影響，接受了右派對歷史發展的詮釋，也就因此陷入了極端的困擾、迷失、悲觀和無奈。我認為如果左派不能對過去一段歷史重新作評價，在意識形態的領域中向右派展開激烈的鬥爭，我們就無法在運動中取得勝利。而且，也只有與右派的鬥爭中，我們才能進一步對自己的思想和意識形態重新作檢討，

為重新出發作準備，這是一項很艱難的但卻必須要作的工作。從《左翼》雜誌的文章中，反應出當前左派對許多問題看法的分歧，也因此可見日後工作的艱鉅。但是比起一年前，不同的看法只能在私下討論而無法公開議論的確是向前走了一步，這是要歸功於《左翼》這一年努力的成績。 ★

**感謝我們的朋友陳界仁在《左翼》週年之際，送我們的一份厚禮
本期封面——複寫版油印畫〈頑強的存在〉**

陳界仁 台灣當代藝術家 1960年生

八〇年代初，首創台灣街頭行動劇場表演，為嗣後台灣小劇場風潮之濫觴

近年來畫作屢獲國際邀展

1998年，台北雙年展、巴西聖保羅雙年展

1999年，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

2000年，韓國光州雙年展、法國里昂雙年展，獲光州雙年展特別獎

2001年法國國家畫廊將為其舉辦個展

清理工會敗類： 我對《左翼》的期許

趙金鳳

勞工運動是左翼運動的核心，因此工運如果不振，左翼運動自然也無法有所進展。台灣工運及左翼運動長期處於衰微的狀態，原因很多：白色恐怖對左翼與工運人士的全面撲殺與鎮壓，使運動傳承出現斷層；冷戰體制所建立的反共意識形態，造成美式右翼自由主義橫行；五〇年代土改塑造的小農社會獨特階級階構，使工人並未全面無產化；這些因素都深深的影響著台灣勞工運動的發展。

除此之外，工會幹部素質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台灣工會幹部普遍缺乏階級意識，不願為真正的左翼運動獻身，上焉者頂多只是以改善勞工福利為追求目標，等而下之的絕大多數工會幹部往往以工會幹部的地位來謀取其私人的政經利益，這種「目標的替換」(displacement of goal)使得台灣的工會一直無法發展成真正獨立自主的工會，十餘年來的所謂自主工會運動，只不過是由國民黨掌控轉移到民進黨懷抱而已。工會幹部以權謀私，「這樣的作法會引起會員對工會的不滿，無法產生向心力」(《左翼》第三期前電信工會理事長張緒中訪問語)，以致台灣的工會普遍缺乏群眾性與團結性，自然無法形成一股與資方相對抗的力量。

《左翼》雜誌既以建立左翼隊伍為己任，則其首要工作就應該以清理工會中的政治垃圾為第一要務。遺憾地是，一年來，除了《左翼》第八期與第十期曾偶爾揭露全產總少數領導幹部在工時縮減案上違背工人利益的作法外，幾乎未曾有任何批判工會幹部的文章。台灣的主流媒體是不會關心工會幹部的惡行惡狀，《左翼》如果也放棄這項監督的職責，則工會幹部與右翼政黨勾搭及暗通款曲的情形就會繼續不斷的出現，所謂工運或左翼運動發展之類的話就只不過是空中樓閣罷了！

我希望《左翼》今後能花更多篇幅在工運的報導上。此外，近年來有許多進步的學運青年投入工會運動，出任錢少事多的工會秘書工作，也盼他們都能發揮道德勇氣與良知，將少數工會敗類揪舉出來，為台灣的工運發展做點實事。 ★

瑞典皇家學院開玩笑？

呂正惠

諾貝爾文學獎終於頒給中國人了一一不，是入籍法國的「華裔」作家高行健——真是讓人目瞪口呆。近年來，每逢諾貝爾文學獎即將公布時，總有傳言說，另一「華裔」詩人北島有望入選，我總是認為不可能——如果連他都有資格，那麼我們可以輕易的選出至少十位以上比他優秀的當代大陸作家——可是，怎麼也想不到瑞典皇家學院「獨持己見」，即使捨棄北島，也要選另一位「流亡」作家，真是讓人大開眼界。

這就讓我想起，皇家學院如何對待俄羅斯文學了。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俄國文學的獨特地位在西歐已無人懷疑。當一九〇〇年諾貝爾文學獎即將第一次頒發時，不知有多少人希望這個獎選擇當時還健在、並且還在創作的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活到一九一〇年，皇家學院有九次機會可以選他，可是學院卻獨具「慧眼」，連續頒給普呂多姆（法）、蒙森（德）、般生（挪威）、米斯特納（法）、埃切加賴（西班牙，以上兩人合得）、顯克維支（波蘭）、卡杜西（意大利）、吉卜林（英）、倭鏗（德）、拉格洛夫（瑞典）。現在再來看這一批名字，並在旁邊擺上托爾斯泰（以及譬如當時還在世的易卜生、左拉），不知你會作何感想。

一九一七年，蘇共奪取政權，一九二三年，諾貝爾獎第一次頒給俄國作家，流亡海外的布寧（而不是支持蘇共，聲名更顯赫的高爾基）。一九五八年，第二次頒給蘇聯名詩人巴斯特納克，爲了他於兩年前「偷運」到意大利出版的小說《齊瓦哥醫生》，而不是爲了他的更精美的詩作。當時正值冷戰高潮，瑞典皇家學院的「義舉」引發軒然大波，並害得巴斯特納在蘇聯慘遭鬥爭（有趣的對照是，長期支持古巴卡斯楚的馬奎茲，在出版《百年孤寂》的十五年後才獲獎。）學院爲了表示「公正」，七年後把獎金頒給支持蘇聯的蕭洛霍夫。不過，再過五年，又頒給「異議」分子索忍尼辛，導至四年後索忍尼辛被蘇聯政府驅逐出國。一九八七年，學院選擇了前蘇聯詩人，被遣送出國已十五年，並入籍美國的布羅茨基。諾貝爾文學獎似乎變成了皇家學院和蘇聯政權的角力，非常的「政治」。

再回到中國罷！據說，在三十年代時，法國方面有人想推薦魯迅，魯迅認爲，這會助長中國人不知天高地厚的驕氣，婉謝了。改革開放以後，似乎很有些西方人覺得，再不頒給中國人未免說不過去，於是有一年就有法國作家聯合推薦巴金之舉。要論「名頭」與長壽，艾青、丁玲、沈從文、巴金都夠格。但前兩位雖被中共長期鬥爭與流放，仍然「忠黨之心不改初衷」，因此好像不太被提及。沈從文「熬」到一九八

八才死，終於沒有給他（據說當年要給，可惜早死幾個月）。沈從文的價值在西方是被高估，正如他在大陸被低估一般。但他的影響在八十年代的大陸日漸明顯，他又是「老好人」，長期受委屈，頒給他中共應該也不致於不高興，但是學院卻慢了半拍。現在只剩「拖老命」的巴金了。說實在的，老舍（誰叫他要早了的自殺）、艾青、甚至沈從文都比巴金好，但由巴金來代表多災多難的中國現代作家，我想大家也可以「認」了——當然，現在都明白了，原來瑞典皇家學院一直在等待一位夠份量的、明白表現出不與中共政權「妥協」的作家。實在等不下去了，於是，就高行健罷！真是，夫復何言哉。不給難道不行嗎？中國人又沒有說，無論如何非在兩千年以前「要」到不可。

西方人真有意思，兩千年奧運中國人想辦，「抵死不從」，誰說西方人不要「面子」？現在，皇家學院來「贊成厥業」了，兩千年的文學獎非給中國人不可！是要表現他們的泱泱大度嗎？於是就抓了一個離開大陸十多年，幾乎已被大陸文壇遺忘，而在台灣，幾乎沒有幾個人知道的高行健。誰說西方人不阿Q？

諾貝爾文學獎還有一件事跟中國有關。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當中國人民如火如荼抵抗日本的侵略時，學院爲了「支持」中國，於是就把文學獎頒給「中國之友」、美國女作家賽珍珠。賽珍珠對中國確實夠友好，但不能不承認，在得獎者之中，她的文學價值可以排在最後幾名——不過，那時候中國作家英譯極少，似乎是可以「諒解」的，至少，比起這一次來，不會更可笑、更荒唐。

其實，皇家學院的「特異行爲」，有識者早已心知肚明。當一九八二年，獎金落到馬奎茲身上時，很多人說，是馬奎茲「救」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的成就是如此卓著，要不是他的左翼立場，早該得獎了。智利詩人聶魯達也是如此，拖到不能再拖，只好給了（一九七一）。不過，學院恰似光明正大、其實好走「夜路」，也不是沒有「鬼」來給他敲一敲頭。一九六四年頒給沙特，沙特不但不領情，還寫公開信批評說：這個獎太政治化，他不想被利用。學院一向獨厚法國，連沙特在內，共給了十一個，居各國之冠。學院怕再丟臉，隔了二十一年，才再度獎落法國。如果再多幾個沙特，這個獎大概就撐不住了。遺憾的是，連聶魯達和馬奎茲都願表現「和氣」。最奇怪的，一九六五年蘇聯政府爲什麼不命令蕭洛霍夫乾脆不要去領獎呢？（這一項得獎，不知是否接受沙特的「忠告」）以政治對抗政治，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不亦宜乎？不過，北島和高行健是八十年大陸先鋒文學的「領航人」，認同兩方價值，先後流亡，皇家學院盯住他們，也不能說「沒眼光」。不過這一次表演得太過熱情，有一點露了本相，有詩爲證：

千秋論文學，政治插一腳；二者本難分，聖殿開玩笑。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 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 〈二〉

黃志龍

貳、中國經濟建設的基礎條件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

一、 人民政府從舊社會繼承下來的經濟資產非常有限。全國大約有一半的紡織、食品加工和雜貨工業集中在上海，其餘則分佈在天津和青島等地。化學工業只有火柴、肥皂和鞭炮，勉強可以稱得上是近代工業的，只有在南京對岸製造碳酸鈉（曹達）的永利寧化學工廠。

在重工業方面，日本在「滿州重工業五年計畫」中所建設的鞍鋼製鐵所（原大昭和制鐵所）、大連化工廠（原滿州化學）、豐滿水庫等等，大部分在戰後被蘇聯搬走（大約 50%~70%）。根據杜魯門總統所派遣的「波列調查團」（日本殘存資產調查團）的推估，蘇聯從中國東北搬走的工業資產以當時的價格來計算，大約是 20 億美元。該調查團也說，如果東北的生產力要恢復到日本戰敗時的水平，則需耗費日本對全滿州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而蘇聯對中國卻完全沒有支付任何代價。假如，東北的重工業設備沒有被搬走，中國農民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遭受的痛苦必會緩和不少。

另外，從勞動者的教育水平來說，當時的中國人民有 90% 是文盲（相較於 80 年前的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男性的識字率是 20%，女性為 10%），而新中國卻要依靠這些文盲來進行工業化；在生活水平方面，根據部分地區的調查，城市居民的平均壽命是三十多歲，而佔全國人口總數 90% 的農民，卻有 60% 生活在飢餓線下。由此可見，解放後的新中國的確缺乏現代化建設的條件，中國必須進行工業化積累。

二、 在經濟發展初期所遇到的諸多難題之中，以資金不足、商品化糧食不足和外匯不足等三項最為嚴重。因此，如果能夠獲得外國借款，就可以疏緩資金和外匯不足的問題。但是，相較於其他開發中國家，新中國所獲得外國援助非常之少。例如，印度在獨立後的第一個五年計畫（1951-55 年）期間，所借到的外國借款是國家財政

的四分之一，而中國卻只有3%。其次，美國爲了利用台灣作爲反共基地，自1952年起，每年以「美援相對基金」的形式提供台灣1億美援的經濟援助（到1965年美援停止爲止，美國總共提供台灣4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14.8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但是，擁有6億人口的新中國，從蘇聯取得的借款非但少得可憐，而且在1956年後還必須以美元形式來還債。因此，中國被迫對外輸出農產、成衣和雜貨等民生物資來換取外匯和償債。

再者，由於新中國採行重工業優先政策，其所需要的資金本來就遠大於從輕工業入手的工業化。加上因爲美國的威脅和封鎖，中國的工業建設的地點選擇在內陸地區，從第一次到第三次五年計畫期間，工業化建設的重點地區爲東北，其次才是華北和內蒙；第三次五年計畫以後才將建設重點轉移到華中地區。問題是，在內陸地區興建大型工廠，除了要籌措公路、鐵路、工業用水和通信等基礎建設資金之外，還要負擔職工住宅、商店、學校等建設基金。這些都成爲重工業建設的不利因素。

最後，在「商品化糧食」不足方面。所謂「商品化糧食」就是從農家以商品形式出售給都市的糧食。工業化必定會帶來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城市人口就是依靠這些商品化糧食來生活。因此，商品化糧食的供給就成爲決定城市勞動者數量的重要因素。由於土地改革廢除了剝削制度，解放後的中國農村大部分的農民都成爲自耕農，生活水平取得大幅度的改善。更由於沒有戰亂，死亡率開始遽減，年均人口以2.0~2.5%的比率遽增，也就是每年增加1200萬~1300萬的人口。加上，在解放前農民經常餓著肚子，解放後農民爲了自用和防災不願意出售糧食。假如人民政府有足夠的外匯，就可以進口糧食來解決城市糧食不足的問題。但是新中國爲了建設重工業，不得不將爲數不多的外匯集中來進口機械設備，無法用來進口糧食。

三、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

新中國經過三年的復興期後，採取重工業優先政策，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畫。新中國採取這種路線的理由有二：

1. 蘇聯的成功經驗的影響：蘇聯在1930年以後，因爲採行重工業優先政策而成功的阻止了納粹德國的進攻。蘇聯成功的歷史經驗，影響了二次大戰以後獨立的民族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各國以蘇聯經驗爲模範，紛紛採行重工業化優先的政策。

2. 國際對峙的影響：重工業優先政策，換一個說法就是「資本財進口替代」政策，也就是原料、中間材料和機械設備的自給化政策。新中國當時所面臨的國際形勢，一方面是淵源於國共內戰的「中美對峙」；一方面是由於1956年蘇共代表大會

的史達林批判而突顯出來的「中蘇對立」。面對與世界兩大超極強國之間嚴厲的政治、軍事緊張，中國領導人認為，唯有經由重工業化的途徑將中國建設為一個現代化強國，才能夠保住革命的成果。

但是，在農業生產仍然佔國民經濟壓倒性比重的初期條件下，新中國想要迅速並且大規模的進行重工業化建設，其所需的資源還是不得不依靠勞動生產率低落的農業部門。

A. 農業產品的統制

為了進行重工業建設，中國政府於1953年開始推行糧食「統一收購、統一販賣」的政策。隨後，在1954年更進一步將經濟作物也納入政府的統制之下。在這個制度之下，禁止農民將糧食出售給私營商人，而是將扣除口糧、種籽、飼料、儲備糧食和農業稅之外的糧食，以國家規定的統一價格出售給國營商店，國營商店再以統一價格出售給城市居民。也就是說，國家透過閉鎖糧食市場將糧食剩餘轉化為「工資基金」。

其次，是以經濟作物為中心建立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體系。國營商業部門以國家規定的價格向農民低價收購棉花、油料作物（油菜籽）、糖作物（甜菜）等經濟作物，然後再出售給國營輕工業部門進行加工。輕工業部門將加工產品（如成衣、糖和食用油等）以較高的指定價格出售給農民、城市勞動者和居民。最後，國營的工商部門再將所享有的利潤上繳國庫，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轉化為國家基本建設（設備投資）基金。這就是重工業部門的積累來源。也就是說，重工業部門擴大再生產的積累來源，是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體系為手段，從農民身上轉移來的農業剩餘。

根據日本學者山本恆人在「中國工業化的歷史——近、現代工業發展的歷史和現實」一書中的研究指出，中國農民在「出售農作物時少得的部分」和「購買工業產品多付的部分」以及繳交的農業稅等三個部分的總和，在1952年、1959年和1977年，分別佔國家財政收入的44.7~55.9%、59.5~72.2%和41.6~55.2%。

1953年所實施的農業統制，意味著政府以「流通部門」控制農產品，因而出現手工工業倒產的結果——紡紗、織布等手工業者、以黃豆為原料的肥皂業、以甜菜為原料的製糖業以及使用油菜籽來煉油的食用油工業等都受到重大的影響。根據1954年的工業調查，主要城市有一半左右（甚至是90%）的手工業者都因為原料不足而倒產。這就是說，在土地改革解放了農民的消費之後，為了重工業化而再一次的將其抑制。

到了1956年，爲了進一步鞏固這個政策，更進一步將自耕農納入合作社。在此之前，人民政府只從「流通部門」來進行農產統制，而1956年的合作社化意味著政府的統制涉直接及到「生產過程」——政府向合作社發出生產指令。合作社收成之後，先扣除上繳給國家的份額，再扣除合作社所需的部分，最後再將剩餘的產品依照農民的「工分」（勞動份額）進行分配。這就是說，由於政府控制了直接生產過程，從而取消了農民對農產品的支配權。

毛澤東在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舊民主主義的時代。舊民主主義是新興的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地主的封建制度的革命。但是在中國，由於國內的封建階級從19世紀開始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支配，限制了內發性的新興資產階級的成長，也因此不具有推翻封建主義的力量。所以不得不由「以勞動者、農民和知識份子爲主體的革命勢力」來執行這個歷史使命。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而由此成立的社會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

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是由五個不同的成分所構成，即革命後沒收帝國主義列強和買辦官僚資產階級財產而組成的「國營經濟」、合作經濟、私人企業、個人企業以及政府官員進入私人企業的公私合營企業（國家資本主義）。

新中國成立後，經過三年的復興期，毛澤東又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主張「含有資本主義市場要素的新民主主義，就是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新中國準備從1953年開始實施五年經濟計畫，並透過三個五年計畫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並對農業、手工業以及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一化三改），使中國於1967年成爲社會主義社會。

但是，由於農業合作化的順利完成，手工業者和私人企業也被編入手工業合作社和公私合營企業。因此，原來預定要用十五年來完成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四年內就順利完成。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下允許存在的私營企業和個人營業者已經消滅，新中國的經濟結構就從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五種經濟成分轉變爲「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合營經濟」三種成分所組成的三元經濟。

B. 人民公社化

農業集體化的最後型態就是人民公社——將建設和擴大重工業生產所需要的原始資金求之於農業剩餘，並且促使農業剩餘極大化的手段就是農業的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所追求的目標，就是將土地、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交由人民公社集中、管理從而取得「規模經濟」的效果。但要確保規模經濟，不僅需要生產過程的集體化，也要改

善中國農業的生產基礎。中國農業生產向來以「季節兩種稻」為特徵，傳統上一直受到水利條件的制約。所以，擴充水利設施就是擴大農業生產和改善農業生產力所不可或缺的課題。本來，諸如水利建設等大規模農業資本的形成應該是交由國家財政來負擔，但是，如此一來將會排擠掉擴大重工業生產的資源。為了解決這個矛盾，人民政府決定由農民本身來進行水利建設，也就是將農民的勞動轉化為物質資本的所謂的「勞動積累」。這就是說，以勞動積累來建設並擴充農業的生產基礎，並將藉由規模經濟而極大化的農業剩餘用來作為擴大重工業部門的基金。如此，人民公社「形成」了將農業剩餘轉移到城市重工業部門並促使農業剩餘本身持續擴大化的體系。

但是要完備這個體系，還需要另一個條件。在中國，農業人口相對於農地面積明顯過剩，如果允許勞動力的自由移動，將會有大量的人口湧向城市。一旦城市的勞動力激增，就必須擴大「工資基金」。但是以農業部門有限的農業剩餘，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解決這個問題，還迨有疑問。因此，為了抑制城市勞動力規模過度膨脹，為了防止超過城市社會間接資本的負擔能力之「過剩城市化」的進展，必須阻止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必須形成禁止勞動力自由移動、使農村和城市相互隔離的機制，如此才能夠持續的將農業剩餘吸引到城市重工業部門，進行「強力積累」。

這個條件的形成，首先是以戶籍制度阻止勞動力的移動，再以糧食配給制度和勞動就業制度來補充。

中國居民依據其出生地區，分為農民戶籍和城市戶籍，這是一種類似於與生俱來的「身份制度」，因為除了少數例外，戶籍變更通常不被承認。農民在沒有得到許可之前不得移住城市，既使擅自移住也得不到糧食配給——中國的糧食配給制度只適用於擁有城市戶籍的居民，農民的糧食必須自給自足。在人民公社時期，城市不存在糧食市場，所以從農村移住在城市的人口，實際上不可能在城市中生活下來。城市居民不僅擁有糧食配給權，包含醫療、住宅等福利也由國家保障，所以戶籍制度被稱為一種身份制度。其次，由於城市的就業完全由國家的勞動人事部門所掌握，個別的事業單位不擁有僱傭權限，因此擅自移住到城市的農民，不可能在城市取得就業機會。在這種勞動力處於在城市和鄉村之間被隔離的狀況，農民不得不停留在農村。

勞動力的隔離政策面對著相對過剩的農村勞動人口的壓力，為了吸收農村勞動力，不得不形成農業以外的生產主體，於是「地方工業化」就成為中國經濟政策的重要課題。也就是說，農村工業化是因為勞動力的隔離政策，限制了農村\城市之間的勞動力移動而不得不採取的替代性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培養農村「五小工業」（鋼鐵、農業機械、水泥、化肥和水力發電）的政策，就是代表性的例子。而在1970

年代後半期大量出現的，由生產大隊負責的「社隊工業」就成為農村工業的核心。「社隊工業」在鄰近大都市的農村地區蓬勃的發展，吸收相當數量的就業人口，並且在1980年以後，成為改變農村面貌的「鄉鎮企業」。

總的來說，從第一次五年計畫開始，一直到1978年為止的中國社會主義積累機制以及支持這個機制的制度架構，基本上可以簡述如下：

全民所有制的重工業部門是支撐著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幹，但是在以後進農業國為條件出發的新中國，建設並擴大重工業部門所需的資金，不得不依靠占國民經濟主要部分的農業部門。首先，為了確保城市勞動力人口的糧食供給、閉鎖糧食市場，必須確立國家向農民強制「統一收購、統一販售」的糧食制度。其次，為了確保重工業部門的擴大再生產，要進一步閉鎖經濟作物市場，以較低的價格向農民收購，再透過國營商業單位出售給輕工業部門，然後再以較高的價格將輕工業部門所生產的消費資料出售給消費者。也就是透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由國庫將所獲得的農業剩餘轉移到重工業部門，完成重工業化的目的。

再者，國家為了完全掌握並且極大化農業剩餘，必須直接支配生產過程，創造出生產手段公有制和以集體勞動為中心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同時也是組織農民、以勞動積累來建設水利設施，藉以擴充農業生產基礎所不可或缺的機制。最後，為使農業剩餘擴大戰略成功的另一個手段，就是禁止農村\城市間的勞動力移動，藉以抑制城市勞動者的工資基金。同時，為了解決這種勞動力隔離政策所帶來的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就必須在政策上推行以農民為生產主體的農村工業化。

要落實上述一連串的政策，就必須以集權的政治機構的存在為前提，而這個集權政治機構就是人民公社的另一個面貌。人民公社就是支撐中國威權主義開發體制最重要的政治基礎，而「政社合一」就是其所提出的口號。作為經濟組織的人民公社，同時也是構成國家權力的末端機構。

從政府支配農村的角​​度來看人民公社時，似乎可以做如下的描述：
土地改革剝奪了地主的土地和農業產品支配權並將之歸屬於農民；

1956年的合作社化是從農民的手中取得農業生產的決定權和農業產品的分配權，並使其歸屬於合作社。

人民公社化是從農民的手中取得對家庭的勞動力支配權，使其歸屬於人民公社的指揮下——在甚麼地方、做甚麼工作是由公社幹部決定的。（待續） ☆

編輯報告

近來新政府計畫將工時由兩週八四小時修改倒退至每周四十四小時，此舉已在國內引起激烈的抗議不滿聲。爲此，我們特別製作了【工運最前線】專題：臧汝興〈〔八四工時〕不容翻案！〉，對於新政府修改工時的說帖進行全面的批駁，讓我們對工時問題有一全面的正確認識。王秀蓮〈挽救全產總〉，批判目前少數不肖工會幹部爲新政府充當打手的惡行，呼籲所有左翼朋友共同捍衛多年來工運的成果——全產總，勿使它淪爲執政者的御用工具。此外，Maggie〈秋鬥有感〉，是對工委會這次前往香港進行秋鬥的訴求提出質疑。

林深靖〈從APEC看WTO〉，針對剛落幕的APEC年會及兩岸即將進入WTO兩大事件，分析這些國際建制對兩岸的影響及兩岸面對變局所採策略的差異。林書揚〈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和兩岸問題〉，探討台灣本土資產階級和勞工階級力量的消長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高文進〈與其挺扁，不如試著形成第三連線〉，以反核四爲例，說明民進黨一貫吸納民間社運力量的作風，並呼籲民間團體串連爲「第三連線」，勿再爲政治力量所利用。

《左翼》出刊已經一年了，讀者們是如何看待《左翼》？對於《左翼》有何批評與期望？因此我們特別開闢了【我看左翼】這一專欄，請左翼朋友就《左翼》及台灣左翼運動展望提出他們的寶貴意見。本期共刊出三篇文章：俞向南〈寒而不酸，窮而不濫〉，對《左翼》過去十二期的內容做了簡單的回顧。金寶瑜〈爲左翼慶祝一週年〉是爲《左翼》一週年寫的賀詞，並指出一份左翼刊物在台灣當前的重要性。趙金鳳〈清理工會垃圾〉，期許《左翼》應將工會中的敗類揪出批判，使台灣工運能真正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

呂正惠〈瑞典皇家學院開玩笑？〉，透過對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名單的分析，凸顯瑞典皇家學院在決定諾貝爾文學獎時的幕後政治動機，讀來特別發人省思。

黃志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二)〉，本期探討中共建國初期的經濟基礎條件及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

去(一九九九)年十月，一群左翼朋友不滿意由國、民兩黨掌控的中央與地方政治體制竟然對於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的救災行動毫無應變能力，更感於台灣左翼力量的薄弱而無法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因此如何整合台灣進步勢力，建立一支左翼隊伍就成爲大家關心的話題。但長期以來台灣進步的力量卻因種種原因陷於分割與互不往來的局面，左翼應該進行更積極的互動以化解歧見成爲大家的共識，而創辦一份內部同仁刊物讓左翼朋友能夠進行對話與溝通就立即搬上行動的時程上。於是，《左翼》就在同年十一月底開始發刊了！一年來，《左翼》一直能夠定期的出刊，目前印行的份數已達到一千三百餘份，這一份小小的成績是屬於所有台灣左翼同志的，我們要向許許多多提供〈左翼〉支援的朋友致上最高的謝意與敬意，包括爲本期封面特別創作〈頑強的存在〉版畫的左翼畫家陳界仁。

左翼 第十三號

出版日期：2000年11月30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四號



〈聲援〉

作者：佚名

【工運探索】 有關工時鬥爭

林書揚 / 2

民進黨的左派聲音在哪裡？ 黃瑞明 / 4 三駁產總

夜讀五車書 / 5

【爭鳴與求是】 民族問題：台灣左翼的阿堵物

何六九 / 16

台獨派・皇民遺老和日本右派的構圖

石家駒 / 20

大陸知識界的大論(混)戰及其現實意義

劉宇凡 / 24

貧困與左翼

左 思 / 36 可憐的高行健

呂正惠 / 39

【特稿】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三)

黃志龍 / 41

有關工時鬥爭

林書揚

「法定工時鬥爭」最能展現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也最能暴露出資本家的剝削機制——價值創造過程中的「合法剝奪」的真相。

因為社會總生產中的總工時，不僅和總分配直接有關，進而和總消費有關，更和收奪者資本家的再投資比率有關。因此，在景氣循環中，圍繞在工時問題周邊的各種經濟性或政治性的爭議必然相當繁雜。有時候甚至引發規模不等的工潮政爭，並不罕見。

一個工運團體當其與資本家，及為資本家籌謀護航的政府機關進行各種鬥爭時，除了力爭主動，鬥智鬥力外，對有關鬥爭主題的一些原則性觀念，也要適時理清，妥加把握。否則難免產生一時間的認識混淆和運動步驟上的混亂。

一般而言，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法定工時鬥爭中，勞方應該堅守下面幾點認識。

一、這是屬於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基本性矛盾」之一。但是否該社會在任何時空背景下的「主要矛盾」，需要按照社會整體的總形勢來加以考察。

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擁有生產手段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力的勞工之間，對於工資與工時的具體規定，總是往相反方向拉鋸——資本家往低工資長工時方向，勞工則往昇工資縮工時方向。但這不是單純的、物理的作用反作用現象。而是兩個對抗性階級之間，事關歷史發展規律的角力現象。資本家的貪婪將導致社會生產力的枯萎，但勞工的自衛，反而具有維護勞動生產性的客觀意義，及保持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前提的意義。

三、在經濟嚴重衰退的時期，經常會出現勞資協調論、共生體論等階級休戰的聲音。其實，在市場機制下資本家的「費用結構」愈來愈複雜。除了成本要素中的一些基本項目，像工資、原材料費、機械折舊，能源費、販賣費、利息、稅負等外，還有研發費用、市場化費用、技術報酬、供需變化、經營管理等都會直接影響到資本家的利潤收入。而這些有關因素中，的確有多種項目不在資本家能逕自決定的範圍內。只有屬於勞動條件的工資、工時等，原來就在資本家的階級優勢下所訂。這部分可透過政治領域的立法操控，把一切不利因素全數轉嫁在勞工身上，以提高剝削度來彌補所有的利空因素。這是資本家常用的策略。特別在不景氣時期，雇主更可以利用一般消費大眾的不安心理，提出共體時艱的論調。因此勞工必須平時留意，對有關經濟大環境的重點理解和個別企業的經營實況，都要經過工會勞教有所掌握。這樣才不致於受資本家的偽善歪論所混淆，堅持鬥爭主題的合理性的信心。

四、法定工時鬥爭雖然是現行資本主義體制的內在矛盾的表面化，但還不是一切社會衝突中最重大的關鍵要素。一項工時規定對勞工的現實生活有多方的影響，固然不言可喻，且對經濟總形勢的決定性作用，也不難理解。但即便如此，如果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出現一種外在因素，甚至非經濟或超經濟因素所引發的另一類問題或情況，當它的嚴重性、迫切性和涵蓋範圍超過了恆常性、結構性的基本矛盾時，顯然該項問題已經形成了一時的社會主要矛盾而凌駕於基本矛盾之上。生產關係中的階級衝突——這是基本矛盾，此時必須爲了涵蓋面更廣大的一時性的主要矛盾，讓出它的運動場域。舉例說，像戰爭或持續性全土性的自然災害等，一旦來襲，則全面的抗戰或抗災將頓時變成全社會的首要共同任務。那些經濟生活中的內部衝突，也只得暫時擱置，除非一種基本矛盾彼時已經提昇到主要矛盾的位置。

五、台灣的工會向有「三低」特性——組織率低、凝結力低、運動目標低。面對著形勢複雜的當前工時鬥爭，不僅要抗拒政府和資方的政治性、經濟性壓力，同時還要承擔來自部份群眾、市民、小經營者出於本位立場的指責。在這樣的運動條件下要期待所謂原則的堅定性、方法的靈活性，委實相當困難。要把呈現在眼前的多種問題，從執政與在野之間的政策對抗、官商複合體與工運聯盟在宣傳造勢上的交手，從會議室內的爭理到街頭上的爭勢，其中衍生的實際問題有多少，不難想像。而針對著每一個問題，按其性質作出輕重先後的判斷且取得多數的共識，更需要一種戰略性的衡量視野。這樣才能避免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微妙關係上建立起來的工時大聯盟發生離心分裂，才能在艱困的共同戰線上維繫著有效的攻防進退。

六、最後，目前台灣的勞資雙方共同面對的，其實不止於是一種慣有的景氣危機，也不止於是一種習見的政情危機。而是政治的異常脫軌和經濟的衰退慌亂互相轉化、互相激盪，說得上是形態怪異的總危機。以全球經濟的嚴峻衰退爲大背景，台灣NIES體制的先天弱質，兩岸關係中的自閉和自戕立場等，台灣的社會沉淪恐怕還未到谷底。而層層困境中的勞資對立，此時激射出一場法定工時鬥爭，自有其迴避不了的客觀因素。

在這樣的巨輻動盪中，勞工們雖然也積極應戰了，但受限於基礎條件的薄弱，即使上千上萬飆上街頭，甚至趁著朝野黨爭，守住了兩週八十四小時制，仍然未能佔到策略的制高點。面對著政企連合的後續反制，此刻工運聯盟如何強化實質的組織紐帶，應該是不容置疑的急務。總之，羅馬非一日之成，只要滿街的勞動者經過工廠外的火熱推擠和吶喊，而領會出使他們的勞動「異化」的社會體系確然存在，從而奮發鬥志、加強團結，那種意義絕對是無可抹消的。不論一時間的戰果大小如何！



民進黨的左派聲音在哪裡？

黃瑞明

新政府在堅持變更最高工時案的立場上展現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意志。九人小組作成決議之後，各方立刻上下一心，口徑一致。行政院與勞委會全力推動，立法院黨團賣命衝刺，在其他政策上往往雜音不斷的民進黨黨部鴉雀無聲，總統則是表示願在翻案之後向在野聯盟「正面回應」。即使闖關一再失敗，翻案的努力也從不中止，屢敗屢戰。儘管昔日並肩作戰的工運人士因此憤而分道揚鑣，民進黨人的決心依舊堅若磐石。

兩週八十四小時的工時究竟應不應該調降為每週四十四小時不是一道簡答題。經濟寒冬已經降臨臺灣，勞方團體堅持不調的說辭當然不是每個正在掛慮裁員失業的人所能理解的。然而，延長工時之後臺灣的經濟是否就能得救，恐怕也是一堆問號。資方口口聲聲說每週多出兩小時之後一年成本將增加多少億，最近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卻指出台北人的每年工時比上海人還多出二百小時。在這種勞資雙方難以兼顧的情況下，一個黨內濟濟多士、長久以來指責國民黨政府玩弄政商勾結的民進黨中本來就應該有人質疑調降的政策是否合宜，不僅爭辯與工會翻臉的策略是否明智，同時也憂心社會正義是否因而向下沈淪。換句話說，就是要有左派的聲音。

多元社會中的執政黨當然不必事事討好勞工，然而完全欠缺關懷勞方的左派聲音之後，過分右傾的危機也將隨之而至。雖然英國首相布萊爾選擇了「第三條路」，李文斯頓所代表的工黨左翼並不因而消音；德國總理施洛德採取了「新中間路線」，擁護前財政部長拉方田的左翼社會民主黨員也是繼續堅持立場。由於左翼的存在與抗衡，這些先進國家得以保有引以自傲的社會福利制度與延續對於社會弱勢的人道關懷。

幾個月前，兩位美國社會學者發表了頗受好評的「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S. M. Lipset & G. Marks: It Didn't Happen Here -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一書，試圖解釋為什麼在西歐各國都有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黨獨獨不見於美國。這當然只是比較之後的問題。即使美國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除了規模與深度不如西歐之外，社會主義的香火也始終不斷。歷來受到工會支持的民主黨多少帶有左派的色彩，最近代表綠黨參選總統的納德(Ralph Nader)更是凝聚了方興未艾的左派運動。

臺灣恐怕才是真正沒有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黨的國家。政治上全是右派，過去的國民黨是極端的走資派，標榜親勞工與社會弱勢的民進黨也在執政之後亦步亦趨。新政府的財經政策與舊政權如出一轍(核四案除外)，社會福利政策則只能用支離破碎來形容。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民進黨內派系林立，就是沒有真正的左派；台獨理論大師不缺，就是不聞社會主義思想家。因此，民進黨在工時案上的口徑一致，其實是因為欠缺左派意識的思想貧乏。

民進黨的左派聲音在哪裡？為翻案而摩拳擦掌的民進黨立法委員諸公或許應該捫心自問：為什麼在工時案上每個人的心都是向右偏？

★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中國時報》)

三駁產總

夜讀五車書

以下這篇文章是在1999年剛開始時寫成的，當時卻找不到地方可以將它印成鉛字。幾乎整整兩年後(2000.12.30)，特別是聽說了八四工時相關的運動過程，筆者沒有資格說這篇文章曾經準確地預測了什麼事件；但是如果對於一個組織的批評不只要著眼於其幾個主事者的心態，而是要了解能夠讓這些主事者得以在其中如魚得水的整個組織的性質，筆者希望這篇過時的文章仍然有參考的作用。除了語意相當不明的地方外，基本上沒有做任何修改。

在兩年之間，據說有一些產總新成立了，包括桃園縣產總也已正式進入籌備的過程，筆者對於這些發展當然是樂觀其成的。無論如何，我們也不應該因為有這樣的現象出現而感到驚訝：「已經有十幾家加入產總，等到縣總的選舉過後，可能還會有更多家加入。」(某桃縣工會幹部對桃縣產總籌備進度的報導)只要桃縣產總的成立對於台灣自主工運能起到積極正面的作用，有上述的現象是一點點也沒有關係的。然而我們也要留意，上述現象背後的同一個理由，也有可能會使得某些已經加入產總的工會在縣總的選舉過後脫離了產總。

至於全產總，兩年之間總算正式成立了，在這篇文章寫成之時它還只是個籌備推動的委員會。我們願意相信並且繼續期待，全產總至今仍然是和「全台灣自主工運力量的聯合」這個目標最接近的一個團體(但兩年來是更近了或更遠了?)。

八四工時運動後再讀的感想，覺得這篇文章實在是太天真了，它一廂情願地期待著一個美好的夢想，並且指責任何背離這個理想的企圖，卻不知道主其事者根本不同道，或者是知道也罷，當時卻不願意明說出來，總希望事情還有餘地，所以某些言詞是相當保留的；兩年以來，這些團體已經用實踐說出了當時被保留起來的現實。如果要作為「全台灣自主工運力量的聯合」，全產總也許正如這篇文章所說的沒有發展的可能，但是如果作為別的樣子，全產總倒是正在穩穩當當、平平順順地走著平坦的大道呢。

本來文章要以真姓名發表才好負責任，尤其聽說涉及全產總的文章(特別是帶著批評意見的)特別要附上真實姓名。無奈筆者雖然在以前有願意要投身於戰鬥工人的隊伍中，現在卻不願意地變成一個戰鬥工兵了，而且在未來113天內還無法擺脫這個身份，而這個身份又是不能談論政治的。

以下就回到兩年前：

批評一個運動不是削弱或取消一個運動，而是促進；取消對一個運動的批評不是促進一個運動，而是削弱。

承認批評之後，人們往往再度提出「必須是善意的批評」這樣的標準，好像一個運動能否壯大就看批評者的動機而論；實際上，一個運動能否壯大的關鍵在於它能否面對來自自身或外部的批評，藉以促進自身的改善與發展。

駁桃園縣需成立產總

讓我們開門見山吧。一般在其他縣市或全島範圍內，認為應該要成立產總的主要理由，在桃園縣都不存在。所謂「成立產總的主要理由」作為理由，當然是有道理的，即在台灣特殊的工會體制中，職業工會往往傾向保守、被一些老闆級或國民黨所掌握，觀諸十多年來大部分的工運都是由產業工會所發動可證；而且今天我們所看到的「自主」工會，絕大部份也都是產業工會。然而由於職業工會在家數上、會員數上都遠大於產業工會——不論在全島的範圍或大部分縣市皆是如此——，以致於大部分的地方或全國總工會都受控於職業工會，也就是被保守勢力所掌握，造成總工會長期以來在工運上的缺席。而較容易傾向自主的產業工會，如果要有效地進一步集結，就必須擺脫掉傾向保守的職業工會，另行成立產業工會的總工會。其次，這樣的產總還要必須得到政府的認可，例如獲頒證書，以便在處理勞資事務時能夠有個正當而方便的位置。上述理由的最佳實踐典範之一，無疑是成立歷史最久的台北縣產業總工會。

然而，上述的理由有時是無法面對大多數「不夠自主」的工會的，較保守的產業工會不太具有「自主」的概念，往往將之等同於「激烈」、「抗爭」、「非理性」，因此成立產總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就要發展出另一套「簡便」說詞，才容易讓人接受：產職業工會結構不同、利益需求不同，而既然職業工會總是在選舉中獲勝（不論他們是否常將席位禮讓若干給產總），總工會的大部分資源與經費（其中大部分來自政府補助）都用在職業工會上或浪費掉了，所以產業工會要自己成立自己的總工會，辦自己真正需要的活動與勞教，並且，當然，向政府甚至民意代表爭取經費，自己運用。（這種「產職分家」的簡便說詞儘管有問題，至少本來還只是宣傳用的，但後來卻有工會幹部因為講太多次，自己信以為真了——兩年後的註）

但是，上述的理由在桃園縣卻是不存在的。桃園縣產業工會的數量非常多（近兩百家，近全島的七分之一）還在其次（這往往是桃縣被認為應該並且可以成立產總的理由，而且自主工會極多），最重要的是桃園縣總工會本身就相當自主，和其他的總工會大不相同，光看其無黨籍的理事長就可略知一二；而桃園縣的許多活動力強的自主產業工會幹部，和職業工會、總工會的關係又極為融洽。每年固定發文要求會員工會參加工運遊行、甚至撥款捐助的桃園縣總工會，其自主性到底有多高、其積極性是

否基於「真正的」（是什麼？）勞工理念，當然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桃縣總在工運上所表現的自主性與活動力，卻是現在一些體質貧弱、自主性基礎不堅的產總或產業工會所遙不可及的（這個特點我們等一下還要再提到）。

在桃園縣成立產總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正好讓我們反省，桃縣是否有成立產總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其他地方產總的成立除了工運團體的協助外，本身要靠當地積極的自主工會來起頭。但在桃園縣這些被認為應該起帶頭作用的工會儘管十分支持產總（如果成立的話），本身卻大多不願領頭發動成立的工作，有些是顧及和縣總的良好關係，成立產總容易給人要和縣總敵對的印象，壞了情面；有些據說是害怕失去了自己已經或即將得到的縣總理監事席位。如果有人要以「私心自用」來指責這樣的工會幹部（如果有的話），本文是第一個反對的。因為這樣的情況正是現實而且豈不是反映了更深一層的現實：桃園縣不需成立產總。

駁產職業工會的區別

人們要產生一個疑問：如果桃園縣不成立產總，那麼這些自主工會（不但數量多，而且在台灣解嚴前後以來的工運史上極具地位），要如何加入目前最主要的、最大的自主工運的力量——全國產業總工會推動籌備委員會、以及未來的全產總呢？這個問題本身就必須回答問題本身的問題：為什麼不能讓桃園縣總工會直接整個加入全產總——桃縣總本身願不願意加入是一回事，現在擺在面前的是全產總的態度問題——如果問題的回答是因為它是叫做全「產」總，那麼就很抱歉，請它把名字改掉。如果是因為桃縣總在自主性和積極性還不夠，那麼就更抱歉了，比起現在全產總的各籌備單位會員工會來（當時有十五家產總或國公營、大型企業工會或聯合會——兩年後的註），如前所述，桃縣總即使排不上前五名，至少也不會排到後五名！

這時候一個很方便的說詞就會跑出來了：你說的立意甚佳，但「現階段」，還是先把產業工會團結起來云云。但是為什麼要「先」把產業工會團結起來呢？職業工會並不是作為職業工會，就一定是被老闆級掌握、或被國民黨控制、從而就一定保守的，除了桃園縣以外，我們還可以找出好幾個反例來。現在大部分的職業工會傾向保守、無實質運作、只是勞健保工會等等都是事實，但這其中有一定的因素在，並且是有可能加以改變的。即使促使職業工會自主化的任務將會較為艱鉅，也沒有理由作為一個自主工會集結的組織（如果全產總這麼自我期許的話），就要「先」將已自主化或可能將會自主化的職業工會排除在外。難道南韓的民主勞總（KCTU）有限制其會員工會必須是產業工會或企業工會嗎？——除台灣以外，其他的產業工會（industrial/industry-based trade union）都是近似於台灣的職業工會，這點我們後面還要提到。

當然，台灣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如果說，先單純地以產總為號召，這樣各地的產

總比較容易成立並鞏固起來。但是現在還未成立或未鞏固(到何種程度?)的產總，都是原來自主工會的力量就不強的地方；如果自主性不強，成立產總有何意義？說穿了就是要拿到一紙證書和經費補助而已。但是如果自主性不夠的話，就算得到了政府認可或得到了些錢，對工運的作用也不會大的，僅有的一點自主力量只會全部消耗在體制程序運作上。試想，假如地方政府好意讓你承辦年度勞工運動大會，那會如何？你要放棄而讓縣總繼續擔任「地方勞工龍頭」或勞工「代言人」的角色，還是要傾全力投入這一個現在沒有多少產總有能力承辦的工作？

這種說法還有一個更大的危險，一旦自主性不夠強，我們在宣傳上就會採用前述的「簡便」說法，就是所謂產職業結構不同、利益需求不同云云，說服工人接受(而且已經有不少工人、包括職業工會接受)產職分家是必然的趨勢(好像官僚們談民營化、自由化一樣)，這樣，我們就是在說服工人接受並鞏固國民黨所規定下來的工會體制——而這個體制正如其結果「大部分的工會屬職業工會而大部分的職業工會均保守」一樣，是有利於官方與資方的統治的。當我們在說服工人「產職業結構不同…」云云時，我們就是在強調差異，而差異就有變成對立的可能，只要主客觀條件成熟；而我們所做的正是在促使主觀條件成熟。我們避免但總是在鼓勵產業工會對職業工會的敵視，同時也引起或被渲染來引起職業工會對產業工會的敵視——這樣的敵意被保守的職業工會幹部們利用產總風潮宣傳到一般會員，就像國民黨在眷村宣傳本省人要把外省人趕到海裡一樣。如果本省人真有那樣的想法，當然是千不該，那麼我們更是萬不該去進行容易引起產業工會對職業工會(會員)產生敵意的宣傳。當產職業工會的對立造成時，誰會得利而誰會受損害是很明顯的。我們眼下就可以找到一個拚命推動「簡便」說法的例子：勞權會所屬的桃竹苗勞工服務中心，在竹縣產總成立的過程中，不是三年來到今天都還在各產業工會間使用這種說詞嗎？

駁全產總有繼續發展的可能

說到底，如果現在已成立的產總其起頭是因該地的自主工會的動機的話，那麼要求桃縣及其他縣市成立產總，則主要是全產總及推動全產總的各工運團體的期望了。全產總要能繼續發展下去、越來越大、和官資一鼎三足並取全總而代之，靠的就是這三個期望：一、有越來越多的產總成立；二、有越來越多的產業工會加入已成立或將成立的產總；三、有越來越多的事業單位員工成立產業工會。但是這三個期望沒有一個能夠實現。第一，很難再有新的產總成立了，現有據說正在籌備(應說是有可能進行籌備)的幾個，即使克服目前的困難強行成立，如前所述，因為自主力量弱，也很難發揮很大的作用；當然，桃縣產總(如果的話)可以被期待是例外。第二，要有更多的產業工會加入產總，但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帶病投保」——通常是關廠)，現有未自主化的產業工會要光復是有希望而且是有必要的，但不見得比光復一家職業工

會容易到那裡去（這句話講來暫時沒有根據，但反面的講法也沒根據）；而如果未自主化的產業工會都加入產總，那個結果絕不會是全產總所樂見的！而那個令人齒冷的結果不但曾經「碰巧」發生，而且完全是有意識發生的，因為就全台灣來說，在一千兩百家的產業工會裡面，自主工會可能還不到十分之一。例如一九九七年五一的工運反司法迫害連署中，大約簽了一百家出頭，有些自主工會因連繫問題未能及時簽署，應該在計算時加入，但其中也有些不屬（基層產業）工會的組織應該扣除，所以可以用一百家來估算——以聯署該文來計算，對「自主」的認定已經是很寬鬆的標準了，在1200家產業工會中竟然只有100家自主工會，可見即使在產業工會中，自主的比例還是少得可憐，更見以「產業=自主」的謬誤。

至於第三點，也是最重要而最基本的，就是台灣的產業工會已經很難再增加了，因為台灣的工廠在過去十年來愈來愈少，在未來十年也只會再少。這是因為整個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台灣過去的既有優勢不再的結果，原有的產業不是外移就是死亡，少數被認為是「台灣希望」（如科學園區）還有幾年好光景也是眾說紛云。而工廠是產業工會的基礎，關掉一間有工會的工廠就等於解散一家產業工會（廢話！）。唯一可以增加工會數目的希望是在所謂第三部門，服務業，或是在一些還能繼續生存下去的行業。但是服務業的基本性格與其結構都和工廠大不相同，或說和製造業、運輸業等等大不相同，例如零售業或小貿易公司等等，這樣的情況下是否適合比照過去成立產業工會，或者，在過去意義下的產業工會，是非常令人懷疑的。現在台灣的工會會員大約佔全體勞保人數的一半，而產業工會會員又只佔其中約三分之一，全產總如果要把自己的基礎建立在已經是少數、而且還會再少的人數上，怎麼會有前途呢？更何況工運在客觀上被認為和其他社運不同的其中一點，就是因為它代表了全社會大多數人的意志與利益，從而能夠代表全社會的長遠利益。

現在我們就可以看看外國的例子了。外國幾乎沒什麼以單一廠場為基本組織區域的工會，它們的企業工會就是一企業所有各廠的工會，產業工會就是同一產業所有各企業各廠工人的工會，而且甚至後者（也就是類似於台灣的職業工會）還比較有戰鬥性。這是基於一個最基本的道理：工人的組織是愈大愈強。我們可以想像，一條生產線上如果只有一個人抗爭，那資方是不怕的；而一個工廠如果只有一條線或一個部門抗爭，資方也不必害怕什麼；甚至像遠東這樣全島有十幾個廠，或像雀巢這樣全球有將近五百個廠，那麼只有一個廠抗爭，對資方的威脅也是不會大的。所以難怪勞權會刊物《勞動前線》在1997年底所譯載的韓國工運者的文章中，要提出將企業工會轉化為產業工會了。如果連被認為強大的韓國工運都要提出這樣的任務，那弱小的台灣工運怎能不針對這一點嚴肅思考呢？

我們不能照搬韓國經驗，不管他們的工運有多強，當然，我們還是要考慮一下台

灣的特殊性。在台灣產業工會的戰鬥性要高於職業工會的特殊性已如前所述，也在解嚴前後以來的台灣工運史（我們暫不考慮日據時代以來的工運史，但應該是要考慮的）中得到證明。但十多年後這樣的特殊現實是否不能改變或不必改變？況且如果我們考慮到台灣的另一個更根本的特殊性，就會得到完全相反的看法，那就是台灣的就業結構本來就特別零碎，所謂卅人甚至廿人以上的事業單位只佔了少數，這個情況下產業工會的會員數及家數要佔少數是很當然的事情，而且這個情況在未來廿、卅年內我們還看不到改變的可能（至少筆者目前看不到）。所以有希望有前途的台灣工運是沒有理由把自己侷限在產業工會的，而且如前所述，也沒有「先」侷限在產業工會的理由。

現在的職業工會大多數傾向保守，主要是其會員太零散而不易組織連繫，所以容易淪為少數人把持。而在韓戰與冷戰開始以來（加以國共內戰的因素）由美國所支持的國民黨政權所發動長期的白色恐怖，以及特別是1950-1953年間對台灣既有工運/社運力量的全面撲殺、逮捕、監禁、拷問，而在1960年代後深受美國影響的、迎合島內外資本利益的政策執行下，大多數的勞動者缺乏（也不敢有、不能有）權利意識，也不知工會為何物（只是辦勞保或發禮品慰問金），更沒有參與（勞工的）公眾事務的意願，也被媒體、政府、學校教育了害怕、仇恨共產黨（而搞工運或搞工會又被認為就是共產黨），所以大多數職業工會的會員不想（在過去也不能）參與工會的運作，而其零散甚至無一定雇主的特性，也不像大一點的工廠中的工人容易產生勞工意識。這些都是使大部份職業工會被少數老闆級、國民黨甚至小家庭控制的因素，但是時至今日，這些因素並非不能改變，而且有些已經改變了，光復職業工會、把工運擴展到大多數職業工會的任務，可行性已經比以前高了，而其重要性如果不是比把工運擴展到大多數產業工會更重要，至少也是一樣重要。

正視台灣產業結構零碎化（或就業結構零碎化，總之就是小公司行號在家數上、人數上佔絕大多數就對了），對台灣工運有理論上和實踐上的重要意義。（而大一點的公司工廠則相反在全島總產值、產能、耗能量等等具重要地位，這個重要地位當然可能使大一點的事業單位其工會可能發揮極正面的角色，也也有同樣大的可能性使其能發揮負面的角色）。在理論上這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對待台灣的勞資關係。一個半世紀以來我們對勞資關係的理解，主要是以單一工廠為範圍來進行的，（再不然就是上升到探討國家機器的範圍），例如要了解工人被剝削的程度，可以計算一間工廠的剩餘價值率，看看扣掉了原料、機器折舊等費用後，工人為老闆新創造出了多少商品價值（至於「風險」云云，那是被創造出來的價值能不能實現的問題），而工人自己又拿回了多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價值（以工資的形式）。但是這樣的理解在台灣是（不可或缺但）不夠的。台灣工廠工人不會感受到自己實際上在廠內被剝削得很嚴

重，是因為他們的生活消費基本上不會太貴，反過來說就是一個打鑰匙的、修機車或理髮店的勞動者，特別是基層店員或學徒，其工作辛苦但收入不高，部分是因為收費無法提高的結果，而收費不能提高是因為工廠或公司的員工薪資低。所以工廠外的工人，甚至一些小的老闆，等於是和工廠內的工人一樣，工作辛苦但一起被工廠老闆以及特別是一些大老闆剝削，一起分享了被剝削。而在另外一些作為消費者的面向(例如去年年初北部差點看不到第四台)，或是作為股票短期投資者被套牢等等，產職業工人及無工會工人更是一視同仁地被大財團剝削。所以要正確地理解對待台灣的勞資關係，就必須從全社會而不只是從單一廠場的範圍來進行。

附註：即使這樣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探討台灣被島外資本剝削了多少，而台灣又剝削了其他地區多少，不論是個別的或集體的，在貿易、投資、生產、採購等等途徑。這也是台灣工運要和國際連結的理由。特別是當我們知道例如飛利浦荷蘭母廠員工待遇極好、是以其他地區的員工辛苦為代價時，又怎知我們今天一些員工的待遇還不錯，不是以其他台灣工人甚至其他地區工人為代價、即分享了老闆剝削其他地區的果實？不過這已經是本文以外的問題了，雖然很重要並且有待更細緻而完整的討論。(兩年後的註：兩年後回頭讀到打鑰匙的一段，真是胡言亂語。鑰匙是多少錢就是多少錢，其價格也不能偏離社會平均勞動量的計算。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工廠內的薪資低，工廠外的生意就不會好，生意不好，自營作業者自身的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就不能高出勞動力再生產的價宜太多，這個說法用在鑰匙上有點難以明瞭，但是用在水果行或水果攤就很明顯；一句話，生意不好就意謂著工廠內外的勞動者勞動力再生產費用的降低，也就是社會生活水準的一起下降。)

至於這個現實在實踐上的意義，則是有大多數職業工會的會員或無工會的勞動者，其勞動條件可能比有產業工會的工廠工人更辛苦、收入更低更沒保障。而一般來說，勞動條件愈差的工人愈有工運的潛力，因為(據蔡教授語)人不是吃飽了才有力氣，而是越餓才越有力氣，才有力氣造反。在台灣工會組織率這麼低的情況下，極少數有工會的已經算是比較健全的了，雖然其中大部分的工會沒有實質的功能，但至少顯示這個企業較有制度、對員工稍稍較有保障，至少對於現在較為自主化的工會會員來說是如此。同樣的情況來衡量職業工會或無工會者，就可憐了，他們甚至連失業都領不到失業保險，因其失業「難以認定」，可能只表現在「生意很不好」，而一位打鑰匙的如果一個星期內打了一支20元的鑰匙就不算失業！

基於以上，全產總如果是基於上述的三個期望，(而它作為「全產總」目前正把自己按照這個樣子來打造)，是不可能前途的。全產總要有前途，就必須把自己變成不是產業工會的集結，而是台灣所有自主工會、工運力量的集結，並且讓自己面向

著這種集結——如果這個集結一時無法完成的話。我們知道在全產總內部也有這樣的意見，但是相反的意見更大，明白持這種意見的可說主要只有工委會及其發起單位。對大多數會員工會來說，他們除了基於工運的理念外，忙於自身事務都來不及了，更遑論思考這樣的問題；對全產總他們希望能讓自己獲認可、得經費的地位能更穩固，或者希望在自己出事時（如民營化，或其他）能有個強大的團體來幫忙。全產總目前似乎是很強大沒有錯，它在去年五一動員了破記錄的兩萬五千人，但誰都知道這主要是三、四家公營事業工會的成果，而我們不知道那些因素會影響到使得這個成果能（或不能）持續到民營化（私有化）底定之前或之後。至於其他的工運團體或派系，像勞工陣線，它根本不必擔心這個問題，因為作為較溫和、較接近體制的一支路線（就像他們常常批評勞動黨太激進一樣），現在全產總的方向根本就符合他們的期望，因為他們本來就很容易順著現有的官方體制來思考，而他們的目的也不是要促使工運成為根本改造社會的基本力量，而是要變成一個很強大的利益團體（來為工人說話）；但是現在全產總的方向卻不能說是勞陣主導的結果，而是工運本身的「順勢而為」——順著資本主義 / 官方 / 財團的既有潮流，而作為工人「自發的」而不是「自覺的」反抗，當然是順著壓迫的體制去原向反彈（這是不可或缺的，但也是不夠的）。至於紅燈左轉為何會支持現行方向（紅燈左轉是否還記得《紅燈左轉》上面所談的東西？），據筆者「感覺」，是因為他們簡單地「不想」，他們不去思考有關這個發展方向的問題，而且他們也很有條件不去想，因為他們已經進入了全產總最重要的籌備單位中的兩家工會，因此主導了全產總的許多事務（也是因為他們有能力和人力），已經夠忙了，或者說已經夠有得玩、有得發揮了，所以他們不需要想問題。一般情況下，人只是在低潮時、挫折時才會思考，像毛澤東那種在三大戰役處理數百萬人的龐雜軍務時，還寫文章考慮到會不會像李自成那樣、打進花花綠綠的北京城之後就腐化了，這種人是很少的。至於工委會，雖然有著和本文相同的意見，但在全產總的場合，他們的說法似乎並不能促使大家認真對待他們的意見；他們的說法有時只是規範性的、道德性表態，例如「應該讓所有的自主工運都加入」等等，而非對現實的討論；有時給人一種完全「自由化」（就字面上的意義，而非資產階級的意義）的印象，例如「什麼工人團體都可加入，女工工會亦可」（而儘管外國確有女工工會，我們卻不知道多少台灣工會幹部能接受這一點）；有時甚至給人一種「後現代」的味道（雖然持這種批評者不見得了解實際的 post-modernism 指的是什麼）。但是我們必須不止於表面上的形象，而去洞悉到其內容本身的真正價值，列子提到某人早晨著白衣，在其所養的狗歡送下出門，在外因故換了緇衣（黑衣），回到家就不認得了，一直對著他狂吠；誰要是光根據外在的形象去恣意評斷一個意見，就像是被踩到尾巴、汪汪狂吠的笨狗一樣。（至於勞權會的立場為何、理由何在，筆者實在是搞不清楚）

關於全產總發展方向的這兩種意見，我們當然可以各邊不得罪地說，這兩種意見都是對的，只是一個談的是未來的任務，一個談的是當前的、所謂「照顧到現實的」、也就是「現階段」的任務。但是即使採用這種說法，如果不講清楚「現階段」要到何時才進入「下階段」，就不是負責任的說法。如果不能說出一個明白的時間表（等到千禧年危機爆發、台灣及全世界很多地方社會大亂時？），至少也要談清楚進不進入下階段的主客觀條件在那裡。一般籠統的說法，現階段大約是最近若干年內云云，但是本文以為，從事後來看，這個階段到去年（1998年——兩年後的註）五一也就該結束了。作為幾家公營事業工會（聯合會）與產總、大型跨區域工會的聯合，五一的兩萬五千人已經是個漂亮的頂點，正好藉此氣勢來凝聚台灣所有工運的自主力量（假如在這之前還未能凝聚，因為「階段未到」的話），這是去年五一所能得到的最佳成果，我們馬上要再談到這一點。最晚到了六月也該結束了這個階段，官方已經很清楚地表明，它完全有辦法來對付這個在行政院前集結了兩萬五千人、以「勞委會主委正驅車趕來與代表對談」作結的遊行，這使得工運後來在民營化、工會法、產總、工會幹部解雇甚至高學費等問題上，很少能利用到遊行的「勝利」來取得成果；而官方不僅懂得如何應付、還懂得利用全產總，這時我們就該知道（至遲到去年九月初），「新社會之夢」所能取得的成果，其最大的方面應該是在面向工人的，而非面向官方。何況在六月間，全產總的一個籌備單位還發生了嚴重的危機，而這危機反映了全台灣所謂「自主工會」在產業工會中的薄弱，而且，這個危機還是發生於唯一在五一剛結束後兩萬五千人的聲勢中成立的、最喜歡簡便地談「產職業結構不同…」云云的新竹縣產總。事實已經迫使我們認識到，以「產業＝自主」為自主工運的基礎，是多麼危險的事情。（當時竹縣產總剛要成立時，一堆「不自主」的工會臨時加入，造成其會員代表數恰恰過半，於是成立後自主工會在理監事與理事長的選舉中失敗——兩年後的註）

附帶說明：

一、 勞動人權協會所出版的《勞動前線》似乎是當前工運界最能容納最多文字的刊物，故筆者首先將本文投書該刊，但本文仍慘遭該刊退稿，該編輯部的理由為「讀者投書不宜過長」（這等於是根據事物的概念來決定事物本身，而不是最終由事物本身產對事物的概念，這樣的人必然以為，改變了事物的名詞與概念就可以改變事物本身，於是他們雖然不是德國人，也沒有歌德那麼偉大，卻還是要拖著一根庸人的辮子）、「該文如同對幼稚園學生談高中課程」（這樣如果不是本文有過於艱澀的論理或詞句的話，該刊編輯部必然是認為凡是關於工運路線的討論，就脫離了一般工運與工會幹部理解的範圍，這樣所有的路線討論都將不能進行，我們只能聽任工運自發地發展）、「現在情勢仍不明顯，應等到情勢明朗了再發表」（這樣任何一篇文字就不

是爲了在各個層面上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情勢的發展，而只能等到「情勢明朗」—假如真有明朗的一天，那還得靠大家沒有近視眼才行—後，再瞠目結舌地以文字發牢騷（現在夠明朗了！——兩年後的註）。既然如此，筆者決定將本文投書至（或投稿至，假如這樣說它的長度就比較能令人忍受的話）台灣勞工陣線的《勞動者》、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的《台灣工運》（還繼續出刊中？）以及中華電信工會的會刊，並再次投書《勞動前線》，請貴刊全文照登或不登。（結果一個都不登——兩年後的註）

二、文中對於勞工陣線的看法，勞工陣線是有異見的。恐怕在工運界沒有一個團體會同意其他團體或其他人對自己的看法。

三、勞動人權協會在拒登本文後，卻在今年五月該會出版的《1997-1998台灣勞動人權報告》中的〈台灣地區工運形勢分析〉（以下簡稱「台」文）（pp.2-10）中提到了有關產總的看法，直接地反駁了本文中的觀點。這是很令人遺憾的。勞權會拒絕刊登與自己意見相反的文章，還要在同一份刊物中對被拒發表的意見加以反駁，這實在不是民主而有益於工人運動的作法。當然發行單位有絕對的權利決定自己要登什麼不登什麼，對於惡意的、荒謬而浪費紙張的稿件也儘可不加理會——或者這就是勞權會對本文的意見？在本文投書其他工運團體後，勞工陣線表示在該組織報紙型的刊物上，若本文能濃縮並以作者真實姓名發表，就願意刊登，並且勞陣也表示了與本文的不同觀點；與自己意見相左的意見仍願意刊登以付諸公眾討論，這種態度無疑高明許多。

四、在「台」文的反駁中，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說法不能不提。「台」文表示，「（籌組地方產總或全產總）的原初動機有二：其一是……，其二是……。由這二個動機可以看出，運動的出發點是想擺脫工運的結構性侷限，爲工運走出長期的低潮局面。」這一段基本上沒有問題。接下來就是（跳過中間談論自主工聯的部份）：「從運動的觀點來看（在這裡還有什麼其他的觀點？——引者），…這個過程本身就是新時期的工運。這個運動標誌了各基層自主產業工會在長期的無力感之後，極思突破…。很明顯，他是從九十年代工會和工人的實際狀況和現實條件出發的，而且也只有從實際和現實著手，才可能促成這個運動。……任何試圖拖延時日或改變組織性質或擴大組織對象的意見，都是無視這個運動的原初動機和脫離現實的不切實際主張。」後面一堆話則是一般性原則的發揮，認爲違反「它自身的內在發展規律」就會「對運動的發展只會產生負面作用，不是削弱運動的積極性，就是造成運動力量分散，組織鬆散」（pp.4-5）。

「台」文這樣的談法是很不幸、而且很災難性的。說什麼什麼是一個運動的動機是一回事，說什麼什麼是現實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不可截然二分，但也不可直接等同。如果現象和本質是相同的，那也不需要科學了；認識一個人不是要根據他給自己

取了什麼響亮的名字、穿了什麼漂亮的衣服，而是要看看他實際上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認識台灣工運的「現實」也不能根據台灣工運自己的期待，而是要看看反映著這樣的期待的，其背後的基礎在那裡。否則，當年德國啤酒館事變後大部份工人運動之支持希特勒，也是「現實」的了，而且還是不得「拖延」、「改變」、「削弱」的現實。

「台」文後面還提到了左派和右派的問題，「更嚴格的社會主義和左派的定義，指的是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必須提昇到哲學的高度（這裡又錯了，「更嚴格的定義」絕不會是，或絕不會只是「哲學的高度」，而是「實踐的低度」——引者）及歷史和世界觀的高度，以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來區分左派和右派。」(p.8)如果上面所提到的認識台灣工運現實的方式，就是這裡的「哲學的高度」、「唯物史觀」的話，那麼筆者實在不懂馬克思主義在說些什麼。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台」文談論左派右派的時候。「『左派』一詞按其本來意義而言，指的就是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p.7)「左派」的本來意義並不是指社會主義，不過這裡問題不大；問題在於「台」文在開頭這麼說，後來就只談思想而不談運動。例如「同時，西方在『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產生的什麼『新左派』、『新社會運動』、『新中間路線』等等，在台灣工運、社運和政治角逐中也可以找到亦步亦趨的學舌者。」(p.8)如果講和西方同樣的話就叫「亦步亦趨的學舌者」，那麼該文前面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豈不也是學舌者？重點在於說西方的話有沒有和台灣的現實結合在一起，並且在實踐上與理論上表現這種結合，否則，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也不過是同一堆貨色。該文還提到體制問題，把行政法定建制和資本主義體制區分開來，這也是很好的區分，雖然重要的不只是這兩者的區分，還在於這兩者之間的關聯。然後該文又說：「如果要評論全產總是左派還是右派，並不是以它是否合法化進入既存法定體制作衡量標準。同理，一個集團或組織的成員參選或從政，在涉及到是左派還是右派問題時，其評價標準也是要視其所屬團體是否真正主張社會主義而定。」(p.9)這就是最不幸的所在，左右派的評價標準絕不會只是他們自己的主張問題，還要看這個團體實際上做了什麼事、怎麼做事。該文開頭還把「思想」和「運動」並稱，到這裡談標準卻只剩下主張，就和該文之前談台灣工運者的主觀期望就是現實一樣。照這樣說來，一個人只要口口聲聲馬克思、左派，卻整天身體不好或心情不好，白吃白喝，四處叱呼，自居有高度，也可以是左派了。那麼，筆者實在不懂馬克思主義，也不懂哲學。

兩年後的註：對於文中打鑰匙那樣的胡言亂語，左派青年導師、理論大師批評了半天竟沒有批評到那一點，使得劣者失去了受教的機會，委實遺憾。★

民族問題：台灣左翼的阿堵物

何六九

中國晉代士人崇尚清談，講究脫俗出塵。故事說，有一名士忌諱提及錢字，在情非得已的時候，以阿堵物來代稱。當時口語的阿堵物，就是"這東西"的意思。阿堵物的故事，其實說明了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當人們的世界觀對於某些外在事物不知所措的時候，往往會有選擇性自閉症的癥狀。人們可以因為種種原因而有種種禁忌，可是現實是很頑強的。人們可以自閉，在自己的方寸小天地裏把現實改頭換面，可是現實並不會因此而有所改變，相反的，它可能因此更加肆無忌憚地戲弄凌虐那些自閉者。

當前有不少台灣左翼人士，對於若干問題寧願選擇自閉。換句話說，在理念上有好幾個阿堵物。民族問題是其中之一。實例之一，蔡建仁在"破解李登輝主義"（《左翼》第七號）一文中說，"我們只問階級，不問民族與種性，只有階級的聯合與對抗，不存在國族的統一或獨立"。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現在就讓我們來討論一下這一個阿堵物。

民族問題的確是個極其麻煩的大問題。百多年來，各國左翼人士經常為這個問題所困擾，很多還因此栽過大跟斗，才華橫溢如羅莎盧森堡也馬失前蹄。這筆歷史賬若要認真算起來，可長得很。其他不說，先讓我們來算一算馬恩的一筆小賬。

馬恩兩人雖然一度反對愛爾蘭民族獨立運動，不過後來改變初衷，一路支持到底。對於波蘭民族獨立運動，他們則自始至終都是支持的。現在仔細研讀他們當時對於愛爾蘭和波蘭問題的論著，固然可以發現很多精闢見解，不過也不乏失之粗陋之處。這也許是因為我們對不少他們當時還無法知道的事，有了後見之明。問題是，每當他們談論到波蘭以外的其他斯拉夫人民族獨立運動（如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捷克等）的時候，一律持全盤否定的態度。他們甚至於以"非歷史民族"的理由，來否定捷克的民族運動。有論者評論這是出自於馬恩二人持有十九世紀一般日爾曼人對斯拉夫人的典型偏見。是否偏見，尚在其次。可以看得出來的是，以他們二人的博學多聞，在政治經濟、法學、哲學、美學、歷史等各方面的斐然成就來看，有關民族問題的論著應該是他們理論體系中最為不足的一環。

馬恩生活在十九世紀的歷史環境，在許多地方也具有當代人們的特徵。在所有十九世紀的大思想家當中，絕少有人認真地把民族運動當做一個十分重要的政治問題來看待。他們都以為民族運動只不過是大政治運動下的一個小小支流，分析討論也都不

夠深入。他們完全沒有預見，二十世紀一開始就展現了民族運動排山倒海的規模和氣勢。在這時候，馬克思主義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理論不足，已經越來越明顯，左翼運動中的分歧越來越嚴重。在此歷史背景下，列寧在民族問題大加發揮，促成二十世紀上半葉左翼運動的大浪潮。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來看，這一切似乎已經是很久以前的歷史往事了。可是，十世時馬恩在民族問題上一些略嫌粗糙的見解，不但沒有成為過去，而且陰魂不散，為不少左翼或者以左翼自居者一再引用。應該澄清的是，每當這些見解被引用的時候，往往經過進一步的簡略化、口號化，變得十分狹隘僵硬。原來馬恩那些見解的前後文，許多顧及當地和當時歷史條件和階級關係的解說和權變補充，牽涉的諸多廣泛理論涵蓋面等，大多被忽略了。原來馬恩全力支持若干民族獨立運動的許多可貴的理論建樹，甚至於較為晚近的列寧論著，也一概被拋棄。剩下來的，無非是諸如民族運動=資產階級運動，民族立場違背階級立場等等的理論公式。於是，"只問階級，不問民族"，"民族利益必須服從於階級利益"，"民族要求是資產階級的問題，跟無產階級無關"等等，很容易被不少人當做標榜自己左翼立場的旗幟，或者檢驗他人左翼立場的準繩。

其實，馬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對於愛爾蘭民族運動見解的改變以及他們對於這個改變的解釋，正足以反映民族問題的處理絕對不是僵硬理論公式所能夠應付得來的。他們解釋得很清楚，否定愛爾蘭民族運動，就沒有辦法掌握愛爾蘭的無產階級運動，因為，愛爾蘭工人不但要反抗英國資產階級的剝削，也要對抗英國工人階級的民族歧視和壓迫。而英國工人由於對愛爾蘭工人的強烈民族偏見，竟然忘記或者看淡自己身上的階級壓迫鎖鏈。可惜，他們的解釋往往不被那些急於套用階級分析或者階級鬥爭公式的左翼人士所重視。

既然馬恩的古典論著可以很容易找到，我們也不必在此贅言。還是讓我們從另外的角度來看台灣左翼的這個阿堵物。

首先，無產階級當然應該有自己的階級立場。然而，這個階級立場的涵蓋面可以和應該包括些什麼呢？例如，對於自己社會裏的民族矛盾所採取的某種立場，是不是算是階級立場的一部份呢？無產階級是否應該從自己階級定位出發，進而決定自己對於民族問題的立場？換句話說，無產階級是否應該有自己的民族立場？有了這個民族立場，是否就違背了階級立場？

在一個民族問題不存在或者根本不重要的社會，無產階級的確沒有必要大談民族問題。但是，在當今世界上民族矛盾不嚴重的社會，簡直找不到幾個。在中國、西班牙、印度、塞爾維亞等各地，都有十分嚴重的民族矛盾。既然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日

常生活和政治活動中無法迴避的天大問題，怎麼可能"不問"呢？難道對於有關民族的所有問題一概視而不見，把民族問題當做阿堵物，才是無產階級應有的階級立場嗎？

無產階級運動並不存在於真空狀態，從來都跟其他階級脫離不了關係。歷史上從來不曾有一個無產階級運動，可以不把其他階級的因素考慮在內。當工人們僅僅爲了顧及自己的經濟利益而奮鬥的時候，必定走上階級孤立的道路。若是要打破階級孤立，聯合其他的進步力量，就不能不去過問其他階級所關注的問題。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所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之一，甚至於有可能是某一個時期最主要的共同課題。左翼人士一方面要維護工人階級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又要打破階級孤立，領導整個社會向前邁進。其中權衡取捨的分寸，反映一個左翼運動的政治智慧和成熟程度。越左越好的自我標榜，不足爲法。

在大多數的社會裏，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千絲萬縷而且犬牙交錯。在處理上不可能如同化學分解一樣，把民族的部份過濾掉。要問階級而不問民族，在方法論上是有漏洞的。

我們甚至可以說，在絕大部份的情況下，若是不能對於自己社會所面對的民族矛盾問題有相當的探討、見解，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就不能夠說是完整的。

世界上各地的左翼人都相信，無產階級世界觀足以領導人類社會走進一個嶄新的思想領域。左翼革命家更相信，無產階級是最具有革命行動性、最具有政治遠見的階級，要在行動上和思想上領導其他階級。如果無產階級對於其他階級所關心的種種現實問題-----也是自己所不可能逃避的現實問題，公然聲明"不問"，到底要如何走在整個社會的前端？如果無產階級"不問"，而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卻勤於過問，整個社會上下都因爲民族矛盾而沸騰起來，那如何是好？難道要設法掩蓋所有工人的耳目？"不問"是逃避的作爲。左翼人若是無意跟整個社會的脈動脫節，不應該如此消極。

左翼並不會僅僅滿足於跟上時代而已。要在政治思想上建立領導地位，就必須針對社會上下所關注的重要課題，提出遠比其他階級代表人物或者政治組織更卓越的見解。無產階級世界觀絕對有這個能耐。不能夠做到這一點，台灣工人階級就不配領導整個台灣社會。

我們瞭解，有人可能在某些問題上因爲偏失而喪失自己的階級立場。可是我們實在不能瞭解，只因爲在某些問題上持有見解，就必定會喪失階級立場，好像無產階級一旦對於民族問題有了看法，就必然會變成爲資產階級的俘虜似的。難道左翼世界觀竟然會是那麼狹隘，一旦踏出某一條界線，就會自己崩潰瓦解嗎？這樣的世界觀未免太不中用，這樣的左翼也未免太缺乏自信，這樣的無產階級純潔性未免太嬌嫩。

台灣有很多左翼人士經常爲文說，資產階級老是要談民族問題，用意是要欺騙無產階級；因此，無產階級就應該大談階級而不談民族，以免被誤導。這樣的說法其實反映一個現實，那就是當前台灣左翼在民族問題上大大落後於其他階級人士，因此畏懼表示意見。

台灣社會沒有嚴重的民族矛盾嗎？如果有人以爲提出這樣的問題就會激起族群對立，那是因爲對民族問題本身有很大的誤解，以爲台灣的民族問題只是族群對立而已。不幸的是，當前若干台灣左翼人士似乎有這個誤解，往往民族、族群、種族、國族混淆不清。蔡建仁主張"不問民族與種性"。把民族和種族相提並論，甚至於等同起來看待，若不是一個蓄意誤導的計謀，就是一個很不幸的誤解。過去國民黨人都是這麼說的，也是百年來漢族民族主義者無法克服超逾的思想盲點。這樣的謬誤，是當前海峽兩岸霸權文化體系的共同支柱，嚴重阻礙人民的政治視野。這是設計，也是思想貧乏的表現。可是，馬恩從來都不是這麼說的。諷刺的是，台灣右派的主流反而已經不再受制於這種謬誤。就在這方面，台灣左翼恐怕需要好好自我檢討。

因此，每當討論到台灣的民族矛盾和相關問題的時候，很多台灣左翼人士都表現不佳。我們經常看到，在右派人士咄咄逼人的追問之下，不少左翼人士招架得十分吃力，絲毫表現不出較爲先進的世界觀應有的自信和敏銳。或許有人以爲只要集中強調階級分析的重要性，就足以扳回劣勢。事實不然。左翼方面逃避問題，結果是把這個緊要問題（以及若干密切關連的問題）討論方向的主導權全盤放棄，間接也讓出了大部份的思想主導權，讓工人群眾無助地暴露在右派的思想影響之下。如此一來，以台灣社會的情況來看，左翼等於是把自己逼到牆角，恐怕不但無法使得工人群眾把全部心思放在階級立場上，甚至於可能被工人群眾所拋棄。

資產階級論及民族問題的時候，當然刻意要依照它自己的階級需要來發揮。無產階級依照自己的階級需要，當然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於有絕大不同的看法。左翼若要在此問題上戰勝右翼，帶領台灣工人以及整個社會在此議題上更進一層樓，就不應該掩耳逃離戰場。從較爲優越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出發，台灣左翼絕對有戰勝的能力。工人階級若要生龍活虎地壯大起來，一定不能安於孤立自閉，一定要勇於跟其他階級共同在台灣的大地上呼吸，在思想和行動上爲共同的課題而奮鬥，進而短兵相接，從鬥爭中表現出階級的獨立性和主導能力。短缺了這個過程，台灣工人階級的階級立場就不可能具有旺盛生命力。正面去迎戰台灣的民族問題，就是這個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

台獨派·皇民遺老 和日本右派的構圖

石家駒

中國時報十二月二十五日的特別報導，披露了日本極右派漫畫家小林吉則在日本大暢銷的漫畫政論《台灣論》的有關內容。從中，我們知道了「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在任中任後曾先後三度接見了年僅四十多歲，一般日本正派的文化界、言論界和政界都不會加以理睬的，右翼偏執的漫畫家小林吉則，而且談話長達三小時，推心置腹，若見心腹晚輩。從中，我們也知道外交部、新聞局、國防部都出人接待小林吉則的出入和參訪，台灣駐日代表羅福全出面宴請，現任總統陳水扁也予以接見，在日本大媒體鼓吹台灣獨立的金美齡（現任總統府資政）、台獨派財界名流蔡焜燦、許文龍和李登輝親信何曉明，都親切、隆重地接待了小林吉則。

小林吉則的書，是以漫畫為形式的政論書，和一般愚蠢、淫亂、淺薄的日本漫畫書不同。他的「漫畫」密密麻麻都是文字，無忌諱地宣傳日本極右派意識形態。這些極右意識型態，歸結起來，不外這幾條：肯定天皇神論，堅持天皇國體；認為日本十五年對外擴張的戰爭是正當、有益的，日本的殖民統治是有良心、有建樹的殖民統治（以台灣為例證）；而所謂「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活體實驗、慰安婦制度等等都是謊言和反日宣傳；不承認日本的戰爭犯罪責任。此外，日本右派歌頌侵略戰爭期間宣傳的「日本精神」，歌頌大和民族的光榮，崇尚「玉碎」、「切腹」的武士道精神。對過去和現在的中國懷抱深刻的憎惡與蔑視，至今猶以「支那」、「支那人」稱中國與中國人。面對戰後日本，日本右派斥責「日本精神」的淪喪，斥責日本自由派和左派思想，悲憤日本在戰後從屬於美國，等等。

小林的漫畫所宣傳的，也無非是這些日本軍國主義夢囈。不同的是，他來台灣訪問了一批被日本皇民主義同化了的老一代台灣名人，藉這些皇民遺老之口，宣傳日本殖民台灣之美好，宣傳日本歷史之光榮，宣傳日本話仍然活在台灣，宣傳戰時日本軍歌、皇國神話在台灣深植人心，用以印證日本右派意識形態與史觀的正確性。台灣的皇民遺老被用來以偏概全地宣傳台灣人親日、對日本在台殖民統治充滿了鄉愁和感念，對「日本精神」充滿孺慕之情，對今日日本不再尊敬皇國歷史及精神，表示惋惜！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親日媚日的思想，突出了與中國人認同相對的「台灣認同」；突出了與中國民族主義相對立的「台灣民族主義」；突出了和祖國中國相對立的「台灣國家」的誕生！而這一切之根源，就在於日本對台統治的現代性。日本的殖

民地統治的「良心」性、無私及進步，使台灣現代化而脫出了「中華秩序」。這是在深愛日本文化、日本精神薰陶的「偉大的總統李登輝」帶領下，台灣全面民主化而與「中華秩序」剝離的根源所在！在小林的書中，到處是這種荒唐的邏輯。

然而這又絕不僅僅止於言說的邏輯，小林吉則所採訪的台灣人，從北到南，是一些年紀在七十以上的「日本語世代」，看到日本人會像看到親人一樣高興，「操流利的日本語，渾然忘記了自己是台灣人」的人們。他們唱今天的日本人都不能唱的日本軍歌給小林聽，講神國日本開國的神話給小林聽，在他面前滿懷鄉愁地哼唱古老的日本童謠。當然，來頭很大的日本皇民餘孽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金美齡都出現在小林的書中，講了許多叫人驚心動魄的諂媚日本、醜詆中國和在「中華秩序」下的台灣的話。對於小林，台灣人的親日，是和反華獨立分不開的。在陳水扁總統接見小林的時分，小林百般要陳水扁在統獨問題上表態。政治外交處境艱難的陳水扁卻不肯明確表台獨的態。為此小林還在書中表示扼腕。小林的傲慢與猖狂竟一至於此。而今日台灣獨立論和日本右翼的新自由主義史觀的互為奧援，狼狽勾結因台灣的新老親日皇民派的抬頭而益為猖獗了。

台灣皇民餘孽的抬頭，和冷戰歷史的展開是分不開的。韓戰爆發之後，美國為了反共戰略的需要，改變瓦解日本戰爭勢力，對日本進行民主改革的政策，轉而扶持日本的反共戰爭右派，打擊日本民主勢力，使日本戰時的戰爭勢力不但得以延命，而且得以長期在日本執政，與美國在遠東冷戰戰略相配合。在台灣，日本右派為了反對社會主義新中國，在美國封鎖中國的戰略中與蔣氏國民黨政權相勾結，從「白團」的結成，一直到與國民政府親日系長期勾聯，台灣自日據以來的反日、抗日勢力遭到長期迫害和鎮壓，而日據時代的漢奸皇民一派中的精英，在反共的共同點上與國民黨權力相溫存，至今榮華富貴。及李登輝篡政，台灣的皇民餘孽的發達到了頂點。於是蔡焜燦、張榮發、何曉明、許文龍、金美齡一代人扶搖直上，至今日為李、陳政權核心的紅人。李登輝政權以後的台灣權力中心，已經成為台灣皇民精英和日本反動極右派肆意苟合的眠床，而日本對台殖民有功、台灣和台灣人脫離「中華秩序」而獨立之論，配合美日安保新指針、周邊有事立法、和TMD戰爭體系，生動地說明了這一嚴峻的現實：五〇年代以降，在美日帝國主義共同制霸下，亞洲人民遭受白色恐怖、美國經濟和文化侵略、受裹脅於戰爭機器，民族分裂、同族相仇、自主的民主與進步力量被壓抑的總的構造，至於今日而猶統治著美日勢力範圍下遼闊的亞洲。

冷戰尚未過去。美日帝國主義在亞洲的統治至今仍然是尖銳的問題。反對美日帝國主義，於自主、民主和民族統一的鬥爭，依然是當務之急。然而今日在台灣進步圈中，卻明顯地缺乏反對和批判美國與日本帝國主義的思想認識。他們對於反帝、民族解放的課題表現得漠不關心，他們說民族主義狹隘、保守，他們吝於討論反對台灣

獨立，他們憚於主張民族的民主與自主統一。這是七〇年代《夏潮》運動以來在「左派」的離奇而嚴重的傾向。他們對於小林吉則《台灣論》的冷淡，便是這一傾向的現實的例證。

小林吉則的《台灣論》將在不久之後漢譯，堂堂在台灣公開刊行。號稱在日本狂銷六十萬冊的《台灣論》將在台灣青少年、學生等「漫畫人口」中起什麼樣的影響，很值得關注。而「台灣左派」對於《台灣論》的批判意識和他們的思想責任感，更加引起人們的關切。★

讀者來函

黃德北老師你好

我是台灣勞工陣線的代理秘書長張烽益，關於左翼第十三號當中所刊登由王秀蓮撰寫的「搶救全產總」一文，其中諸多有關勞陣的不實形容，本人深感遺憾。

如果台灣的左翼力量是在如此相互叫囂貼標籤而缺乏理性對政策與理念的辯論，那麼十年以後台灣的從事工運的人還是跟現在一樣，那將是台灣左翼陣營的損失。我想全產總既然產生就有其組織自己的生命與自主性，勞陣無意也無法影響全產總的運作。有關全產總的會務，都是以民主公開的方式及全產總自己的規定辦理，這可以在全產總自己的會議記錄當中得悉。說到勞陣的介入實在是言重了，難道全產總的理監事全部（甚至多數）都是勞陣所能掌握的嗎？這種論述同時也是對全產總理監事的羞辱。

社運團體本來就必須接受社會的公評不過我認為，如果還是以情緒性的字眼的話，這樣對於「左翼」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刊物辯論深度，以及作為一個台灣左翼思路匯集的交叉點，有所損及。

黃老師，勞陣的工作人員每次一收到左翼之後，都是交相傳閱，對於黃老師在台灣如此艱困的左派文化沙漠中，埋首於建構屬於台灣的左翼思考，深感佩服，不過如此珍貴的資產，如果淪為左翼勢力內部匿名交相指責，誰出賣勞工，誰才是工運正統，誰才是真正進步力量的批鬥戰場的話，那麼不如到網路上弄個討論版即可，黃老師也不必如此辛苦經營。

最後本人由衷寄望左翼能成為台灣所有從事工運者，在精神上與思考上的活力泉源。

編輯部敬覆

勞工陣線代理秘書長張烽益先生於日前寫給《左翼》編輯部同仁黃德北一封來函，《左翼》編輯部經討論後，決定以編輯部名義提出如下答覆：

自《左翼》雜誌創刊以來，我們就希望《左翼》能成為台灣左翼朋友對話與辯論的公共論壇，使台灣的左翼運動界在理論上得以提升，實踐上能夠受到大家的檢視與評判。這一年多來，《左翼》編輯部的工作同仁一直以此自許，並努力讓各種左翼的聲音都能在《左翼》發聲。這樣的編輯方針相信所有《左翼》上（十三）期刊登的王秀蓮〈挽救全產總〉一文（以下簡稱「王文」），主要是認為曾經是十多年來台灣自主工運代表的全產總，「目前正在朝向御用化的方向大步邁進」，她並舉全產總領導幹部在處理工時案的曖昧立場以及全產總常務理事劉庸遭到停權等問題，作為其論證的實例，這些議題目前在工運內部正引起許多批評與討論，因此《左翼》編輯部在經過討論後，決定刊登「王文」。

至於「王文」認為全產總的種種問題主要是與勞陣有著密切關係，我們認為是屬於社會公評事項，我們歡迎各方對此繼續進行公開的對話與辯論。

大陸知識界的大論（混）戰 及其現實意義

劉宇凡

前言

1997年開始的有關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發展到今天，不僅越來越熱烈，而且其現實意義也日益重大。香港報刊上曾經有過介紹。但是這些介紹的缺點是不僅語焉不詳和有時過於學術性，而且評述爭論的基本性質過於偏頗。本文的目的是比較多面地介紹爭論雙方的主要論點，希望讀者看完之後多少了解這場爭論及其現實意義。至於對各派的評論，則有待另文分析。

稱這場爭論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間的爭論，並不恰當。因為許多被列為「新左」的人，並不願意接受這個名稱，而且若是循名責實，許多人都事實上算不上「新左」。甘陽自稱為「自由主義左派」，並且把爭論描述為「自由主義右派與自由主義左派」之間的爭論。這比較符合多數情況，但也嫌過於簡單化。而且他這樣說似乎主要是為了洗脫自己的「新左」嫌疑，為了與像韓毓海之類的「新左」區別開來。我們身處大陸以外，了解這場爭論自然難免有失當之處（歡迎糾謬）。但是，即就已經看到的材料，就知道局面混雜得多。如果勉強要給這場爭論一個名稱，不如說是各種右派與各種各樣反右派的爭論。無論是哪一邊，都很雜亂。有時雜亂程度叫人懷疑是兩陣對圓還是各派混戰。就右翼而言，似乎既包括了主張「新權威主義」的吳稼祥、蕭功秦，即主張那種加強國家機器以便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派，又包括了奉海耶克為宗師，即貶抑國家而獨崇市場的新自由主義一派。自然，這兩派也並非根本對立，而且已經有人指出兩種思想在共同敵人前（新左）合流——畢竟，新自由主義也不是不要國家機器，而只是要一個對各種資本家而言要足夠小、對勞動人民而言則足夠大的國家機器而已。至於同右翼思潮對壘的一邊，就更加混雜得多，談不上一個統一的派別，其中有左翼自由主義者、「新左」、老左、毛派；但更多的是無法歸類的模糊派。這一面的陣勢將來更難免會發生進一步分化。

自由主義本是一個龐雜的思想體系。這兒不打算就其本身作探討。為了方便了解這場爭論，這裡只略嫌簡單地指出；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今天右翼自由主義可說是主張一種赤裸的、少受國家限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左翼自由主義則主張一種改良的、其資本對人民與生態的剝削自由多少受國家限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爭論已經溢出自由主義的左右翼範疇，但它畢竟在爭論中起著一種座標作用。

老左、「新左」、毛派等等則以不同方式走得比自由左派遠。「新左」之所以被稱為「新」，是相對於以中流雜誌為代表的老左而言。老左一開口便不分青紅皂白地罵「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就既痛罵了走官僚資本主義道路的各級官員，但也痛罵了任何爭取正當的個人自由與民主制度的知識分子。「新左派」不會這樣。他們同樣批判「市場經濟拜物教」，但是至少目前還不致於像老左那樣根本否定個人自由。當然，「新左」本身也是同樣雜亂，當中就有不少人同時又具有某種毛派傾向。雖然他們還不致於像某些正統毛派那樣實際主張回到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去，但是他們對毛的過份頌揚本身也使人們看不出他們與正統毛派的分別。在這個意義上，「新左」就不那麼新了。

不過，不論當前的思想分化多麼混雜，還是多少可以看到一條界線的。這條界線，最終來說不是奉誰人為宗師，而是關乎怎樣評價 20 年的「改革開放」，怎樣看待中共官僚的歷史規模的化公為私，怎樣看中國社會及國家性質，尤其怎樣看待勞動人民。即使表面上是純粹抽象的學術爭論，最後都可以還原為現實問題。

在 90 年代中之前，知識份子中的這種分化尚不明顯。廿年來，不少知識份子都成了自由主義信徒，有些甚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是非常右翼的一派的信徒。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明顯分化要等到 90 年代最後幾年，隨著中共的改革日益變為官僚化公為私，貧富懸殊及社會風氣敗壞，才開始出現。首先值得注意的爭論，是怎樣看待各級官員化公為私的腐敗。

腐敗有利論

右翼經濟學家乾脆認為，經濟學不談道德，不必去管什麼腐敗不腐敗。樊綱說：「經濟學本身不談道德！第一，它不對一種（任何一種）價值觀的好壞作出評價；……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是十分謙虛的：它不打算改變『人性』，而只滿足把現存的『人性』接受下來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市場經濟之所以是經濟學家普遍推崇的一種經濟制度，說到底不是由於它是多麼的『高尚』或『高級』，相反，是因為它的『低級』，……是一種使雞鳴狗盜之徒相互交易的制度；」（《「不道德」的經濟學》）

另一位經濟學家張維迎則說「如果腐敗不能從體制上根治，那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所以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適當，如果力度把握得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有些腐敗的存在，不是最好也屬次優》）

寫了《告別革命》的哲學家李澤厚或多或少也參加了這場論爭，他早在該書強

調，中國發展道路要嚴格按照四個程序：（一）經濟發展；（二）個人自由；（三）社會正義；（四）政治民主。目前的階段只能爭取經濟發展，其他三個目標都得靠後。所以，他爲文表示很欣賞中共的「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任何人想把「社會正義」放在「經濟發展」之前，都只會引起革命，弄巧反拙。

吳稼祥則說：

通向天堂的道路，都是用追求自由的磚塊鋪成的；通向奴役和地獄的道路，是用追求平等的鴉片鋪成的。中國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一切災難，不都是對平等的瘋狂追求造成的嗎？造成中國目前的不平等狀況，是基本政治制度的不自由。在沒有自由政治制度的條件下，對經濟平等的過份強調，只能導致罪惡的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復關。……任何一個世界強國，都是長期堅持自由市場制度的國家。……讓新左派某君滿意的文革時期平等的中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是官方語言）；讓新左派激憤的有了一點經濟自由的今天的中國，成了世界第四大經濟強國。

持有這種立場的人，自然不會對當前的化公爲私、貧富懸殊加以嚴厲批評了。

但是，凡是稍有社會良知的知識份子都不可能採取這種麻木不仁的立場。何清漣的主要功績即在於批判官員化公爲私，呼喚經濟學家要有「人類關懷」。她在《經濟學與人類關懷》一書中說——：

從1978年至今，中國的經濟改革已在各種陣痛中行進了整整20年，目前正經歷著『邊際效益遞減』的痛苦歷程。……

反思我國改革的全部問題，就會發現我們的結果不公正，其實就源於起點的不公正與過程的不公正。一個在銀行掌握貸款權的銀行職員或在國有土地部門掌握土地資源分配大權的公務員，在致富的競爭起跑線上已遠比一般平民百姓遙遙領先。可以拿到各種批條的特權階層或與特權階層有瓜葛的人，其致富的能量更遠非普通公眾可以相比。……

可以說，在我國現階段，先得解決起點不公正的問題，讓權力從經濟領域中退位，否則，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存在所謂『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這類問題，正確的選擇可能是，也只能是：公正至上，效率自在其中。

大概沒有幾個人會把何清漣目爲新左派。甚至「自由主義左派」也大概談不上。但她又事實上在批評腐敗及揭露改革的黑暗面，認爲一個公正的市場經濟現在就要確立，不能等到經濟充分發展之後。

腐敗根源何在？

不是每一個右翼自由主義者都那麼公然地爲腐敗塗脂抹粉。但是，右翼與「左

翼」之間的顯著界線，是對腐敗根源的分析。右翼認為，腐敗根源不在市場經濟；恰恰相反，市場經濟本是好的，壞就壞在國家對市場的干涉，尤其壞在國家經營許多民生事業；國有企業本身正正是腐敗源頭。樊綱說：

所謂腐敗，可以有一個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利用公權謀私利”……我們這個經濟所面臨的一個問題，恰恰在於“有條件搞腐敗”的人數太多了一點。在我們的經濟社會中，有太多的經濟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加以生產、供給與分配，“公共財產”在社會總資產中所佔的比例太大，“公款支出”的事情、“政府決定”的事情，“計劃分配”的事情太多，進而言之，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政府的規模太大，政府官員的人數太多。……因此，要想把我們經濟社會中的“以公權謀私利”這種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種體制改革，還是在於“減少公權的數目”，縮小政府的規模，減少花公家錢、“玩”國有資產的機會，把更多的事交還給個人與市場去做。《腐敗的經濟學原理》

朱學勤（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說得更形象化：

在為市場機制辯護時，似應分清什麼是市場機制能夠負責的，什麼是它不能負責的。這一混亂一開始由新左派朋友帶入。當他們在義憤填膺地批判中國市場經濟造成多少人間不公，並由此還遷怒于跨國資本入侵以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時，他們忘了這裏的市場經濟並不是那裏的市場經濟，它還更多地受權力機制牽制，經常是“看得見的腳”踩住了“看不見的手”。它若骯髒，還稱不上馬克思當年批判的那種“每一個毛孔里都滴著資本的骯髒”，而是“每一個毛孔里都滴著權力的血腥”，表面上是市場經濟骯髒罪惡，其實是後面的權力機制在作祟。因此，那些被新左派譴責的人間不公，包括被他們譴責的資本與權力合謀，在中國的現實環境里，更多地是應歸咎于那只蠻橫的“腳”，而不是歸咎于那只骯髒的“手”。……《1998年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

何清漣在這點上其實與右派沒有分別。她甚至認為，從腐敗到生產過剩，都不是市場經濟的錯，而是「國家繼續作為投資主體」的錯，是公權太大，因而起著「反市場作用」。

被稱為「新左」的韓毓海、汪暉等人則同右派相反，他們認為腐敗根源在於市場經濟本身。他們反對右派的市場觀。右派把市場經濟視為能天然達到經濟均衡及使所有人受益的機制，把市場當作不具有像國家那樣的強制性的機制、相反是最自由最維護個人意願的「看不見的手」。韓毓海（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的批評最值得注意。他是比較像樣的左派。只有他最公然地大量引述馬克思的文章及評擊資本主義。右派不僅大大誇大市場的優點，而且認為它能夠慢慢促進專制的瓦解。韓毓海這樣批評：

他們一般地說，市場經濟可以代替和摧垮一個全能的政治社會。但實際情況可能恰恰相反，在前蘇聯、東亞和拉美這些迅速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地區，市場社會助長了一個權錢交易的社會，這項交易——權錢交易，被歷史證明是市場交易中最符合交易原則的大買賣。在那些地方，市場摧毀的從來不是全能的政治社會，它摧毀的只是人民參與政治活動的能力、方式和“公民道德”。留下的是一種類似于“發誓三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之式的知識分子和無數奉行明哲保身主義的冷漠大眾。……“自由主義者”在贊揚市場時一般聲稱，市場規定了人人賺錢平等的原則，規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因而，只有市場才能把我們帶到民主、公正的世界里去。但是，他們很少去指出名義上的機會均等與現實不平等的關係，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在現實中是怎樣運用的以及遭遇了什麼樣的問題。由於他們根本沒有思考僅僅是在名義上、形式上獨立公正的國家在面對強勢的經濟和弱勢的群體時所扮演的真正角色，所以，正如魯迅所指出的，這樣美麗的空話還不如不說。馬克思說，不是契約里規定的平等，也不是法律條文上規定的平等，而是現實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佔有量，決定了我們實際上的不平等和根本不可能平等。在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看來，市場經濟保證的自由就是賺錢的自由，但是，根據這樣的“自由”，這樣的社會自然就有讓孩子輟學的自由，就有讓女人賣身的自由，就有允許官僚腐敗的自由——只要這些行為“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只要這些行為看起來是“自願的”就行。所以，一切肯動腦子，肯思考的人，理解現實都只能從馬克思所說的現實出發，從而毫不費力地明白一個起碼的常識：在這樣的“市場”勝利的地方，站起來的從來就不是“民主”，而是一種畸形的“資本主義”。……

今天，某些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人玩弄的“保護私有產權”的字眼，不過讓人想起那些在“化公為私”的“自發私有化”過程中發了財的人，轉過身來要求以某種“天經地義”的“學理”保護他們的“私有產權”，……還有，當他們在走向世界的口號聲中擁抱全球化慷慨激昂地反對“民族主義”時，完全不了解跨國資本一方面加強了民族國家壓迫的一面，另一方面則迫使民族國家修改法律，杜絕罷工來維護他們的投資安全，更以反對“保護主義”為由不准民族國家建立自己金融和銀行系統的安全體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擁抱的全球化不過是擁抱大資本，他們反對的“民族主義”也就是民族國家內含的民主力量。當代世界居然有這樣的“自由主義者”，這難道不是一種“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嗎？……

如果市場的權力運作與特權階層靠得太近直至被他們壟斷，或者干脆是由他們“發動”和決定的，那麼所謂保護私有產權，就很容易變成是秦暉教授所說的保護特權階層的“化公為私”和壟斷財富，這樣的市場改革造成的社會究竟是什麼，當年的德國和意大利、今天的拉丁美洲已經提供了歷史樣板。而如果作為權力和權力分配場所的市場向更廣泛的社會階層開放，那麼保護私有產權就是指保護中小企業，保護一般

勞動階層和工人階級有能力參與市場競爭。——而在這個意義上，經濟民主問題離不開整個社會的民主問題；當然反過來也一樣。（《在「自由主義」的姿態背後》）

楊帆（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未必會像韓毓海那樣走得那麼遠，但是他也說：

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必然對經濟自由有所警惕，有所保留，而不會聽任弱肉強食規則漫無邊際地起作用。如果說經濟自由趨向于兩極分化，趨向于蔑視弱者的生命和尊嚴，那麼政治自由則給了每一個人以反抗的權力，以呼喊出自己聲音的權力，給了弱者聯合起來反抗強者的權力。……新左派之新，正新在其政治自由的主張上，或者說正新在自由主義上。至于說左，我想無非是代表廣大的普通勞動者，代表一切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右派根本就是維護競爭中的強者的利益，維護新興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說到底，這些人的自由主義是經濟自由主義，是強者自由吞噬、壓制弱者的自由，而不是真正的、在歷史上激動過無數志士仁人的自由主義。有人說我是新左派，我不勝榮幸。

對資本主義的評價

另一位稱得上是「新左派」的人物是汪暉（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他同韓毓海一樣不僅對右派那種歌頌市場經濟為自由樂園的觀點表示不滿，而且對西方以至全球資本主義持批判態度，不同意右派那種把資本主義現代化看成為全球各國的共同前途及唯一歷史歸趨。汪暉說：

這些人把全球化看成是歷史的最終目標，認為人類過去三百年——說白了就是啟蒙運動以來——走過了一條共同道路，現在正在向全球化的歷史邁進。但是，過去三百年中的殖民主義的歷史呢？過去三百年來的戰爭和掠奪、壟斷和強制呢？過去三百年中的販奴呢？三百年來，由于殖民主義、不平等貿易和科技發展，人類確實處于一個日益接近的關係之中，但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在非洲和美國之間、在中國與列強之間，這樣的共同道路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虛構的共同歷史。

右派之所以嚮往西方，是因為西方已經解決了它們的「現代性」的問題，即代議民主與市場經濟已然確立。反過來，社會主義之所以應被揚棄，是因為社會主義是一種「反現代性」運動，即它不僅是反西方的，而且是反民主自由與反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運動代表的是一種後退而非進步。但汪暉指出，當今西方之所以具有一定民主，並非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特性，相反，是來自各種社會運動的挑戰，包括工人社會主義運動的挑戰的結果。

沒有這些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婦女運動、少數民族爭取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的運動等等）就沒有歐洲的民主制度的成就。這也是一種例證，說明現代性內部包含了

一些自我改進的機制，或者說，現代性的沖突結構恰恰是現代性迄今仍然具有某種活力的原因，但是，這種內在活力恰恰來自對現代性的批判和沖擊本身。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能把美國、歐洲和澳州的制度簡單地看成是資本主義制度。恰恰相反，其中包含了許多社會主義因素。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對於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持久批判和反抗，就沒有當代的、為我們這里許多人所向往的那些制度改革和發展；如果沒有為爭取下層階級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利的社會斗爭，就不會有現代民主的成就；如果沒有民族解放運動，當代世界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關於現代性答問》）

韓毓海則提醒人們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亞洲危機正是這種矛盾的最尖銳反映：那些在1989年搗毀了社會主義世界的東西，今天正在搗毀資本主義世界。

眾所周知，由於世界金融危機，這種破壞性的力量被稱為是似是而非的『全球化』帶來的，但是，馬克思在150年前的預言還是容易被記起的，他認為，資本主義邏輯中蘊含著破壞性和自我毀滅的力量，搗毀資本主義的將是資本主義自己。

接著，他指出這個固有矛盾，正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家的盈利動機在資本主義邏輯中的首要地位：不擇手段的獲得剩餘價值和控制資金，並迅速的轉向新產品的開發和市場爭奪，以維護自身的競爭地位。……

全球化是指資本主義的邏輯對社會的全面滲透。……溫良資本主義不過是個美麗而破碎的舊夢。（《全球化，還是資本主義？》廿一世紀，1999年4月）

嚴格來說，汪暉等人並沒有根本反對市場。他認為有必要區分市場機制與資本主義，就象Karl Polanyi把市場與市場社會區分開來一樣：

按照布羅代爾對於歷史資本主義的研究，資本主義是一種壟斷的形式，具有長遠的歷史。市場機制也有長遠的歷史，它不能等同于資本主義。如果我們相信市場機制，就不應該擁抱壟斷的資本主義，而是反對這種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是自由市場，也不是市場規則，而是反市場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權力的市場化和市場的權力化是一種典型的資本主義現象，即使它不是一種現代現象。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須重新定義社會主義，因為迄今為止以國家形式出現的社會主義也是一種壟斷形式，一種反市場的力量。

許多人在反對國家干涉的同時，完全不了解對干涉的需求恰恰是從市場活動內部產生的。還有人根據哈耶克在累進稅問題上的觀點，反對在現實條件下實行必要的福利保障制度。的確，在當代中國的條件下，照搬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是不現實的，更何況福利制度本身也已經產生了深刻的危機。但是，如果我們把這種反對福利制度的觀點還原到實際的生活中將是怎樣的情形呢？在大量工人下崗而社會保障制度嚴重不完善的情況下，拒絕進行稅制改革、建立適當的社會保障制度，只能造成嚴重的社會

不平等和不可避免的社會動蕩。里根—撒切爾主義對西方社會造成的破壞值得我們警醒。如果有人——事實上確有其人——用自由市場理論論證金融投機的合法性或合理性，在我看來，至多表示他是一位庸俗的“自由主義者”，因為他擁護的不是市場的自由，而是市場的壟斷。……如果一個人真正徹底地堅持自由主義的原則，例如市場的原則，他或她就應該批判資本主義及其支配下的市場關係，而不是做資本主義的辯護士。（《關於現代性問題答問》，天涯，1999年第1期）

中國是否資本主義社會？

反對「新左」的人，未必個個都否認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有些人亦未必那麼完全不顧事實地歌頌資本主義，但是他們也反對「新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評，因為他們認為「新左」根本是無的放矢：中國還算不上資本主義，它還是處於專制主義的歷史階段。至於這種專制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還是「東方專制」的歷史模式，統統無關宏旨。有關宏旨的只是：中國既然不是資本主義，既然資本主義還未來到，大批資本主義豈不是幫助了專制主義力拒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陰謀？

汪暉並不同意上述論點。他說：

首先是當代社會的文化危機和道德危機已經不能簡單地視為中國傳統的腐敗（因有人反過來說這些問題是傳統的失落的結果），因為許多問題恰恰產生于現代化的過程之中；其次是在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導致市場社會的基本形成和國有企業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時候，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的問題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再次是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體系瓦解之後，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已經成為當代世界的最為重要的世界性現象，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已經將中國的經濟和文化生產過程納入到全球市場之中。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社會文化問題，包括政府行為本身，都已經不能在單一的中國語境中加以分析。……

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要口號是“反封建”，並因此而熱烈歡迎資本主義。到今天，資本主義已經來臨了，可是他們卻日益失落：

中國的啟蒙主義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化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已經把中國帶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啟蒙知識分子……不能不承認自己已經處於曾經作為目標的現代化進程之中。中國的現代化或資本主義的市場化是以啟蒙主義作為它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文化先鋒的。正由于此，啟蒙主義的抽象的主體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題在批判毛的社會主義嘗試時曾經顯示出巨大的歷史能動性，但是面對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化過程本身的社會危機卻顯

得如此蒼白無力。一些堅持啟蒙主義姿態的人文學者把現實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歸結為抽象的“人文精神的失落”。(《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徐友漁(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強烈反對汪暉上述見解：

我們與汪暉的分歧，同樣涉及到對中國國情的認識。汪暉..... 著力證明，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之後，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是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政府的職能變了，知識份子的功能、與政府的關係變了，知識份子的批判對象也應當變。..... 爭論的焦點和問題的實質十分清楚：第一，中國社會是否已經變成一個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第二，由於中國政府的職能與行為發生了轉變，因此針對政治專制的批判必須及時地變成對於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分析？

我曾經指出，對於一個社會的性質和形態作出斷言，是不能信口開河的。說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需要一系列指標和事實來證明的。汪暉在文章中除了“三資企業佔據國民生產總值一半以上”這句文理不通的話之外，沒有提供任何論據來支持他的判斷。我引證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中國統治年鑒》關於1997年的以下數據：關於投資，國有經濟佔總投資的52.5%，聯營經濟佔0.5%，外商投資佔7.8%，港澳台投資3.8%；關於就業人數，國有經濟佔總數的15.9%，聯營經濟佔0.1%，外資佔0.4%，港澳台投資佔0.4%，農民佔從業人數的71%。我還指出，時至今日，憲法條文中只說到對社會主義公有財產的保護，私有財產不可侵犯尚未在憲法中得到確認。根據以上這些情況，我不知道汪暉有甚麼理由讓人相信中國社會已經是市場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

其實，汪暉的思想遠不止於下列主張：在九十年代，知識份子的批判矛頭應及時轉向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他實際上把九十年代的自由主義，八十年代的啟蒙思潮，甚至近一百年來的啟蒙思潮，以及一切反封建、反專制，提倡學習西方，走現代化之路的主張都叫做“現代化的意識形態”，“現代化的目的論世界觀”

在中國的歷史語境中，現代性主流話語，即對個人自由、私人財產、市場經濟、憲政體制(法治、權力制衡)的肯定，屬於資本主義，而各種牌號的社會主義是範圍和程度不等地對之持反對態度。而愈是激進、正統的社會主義，反對得愈全面、愈徹底。但事實證明，正是那種斯大林、毛澤東牌號的社會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評中國九十年代的新左派〉

民主與自由是矛盾還是相容？

隨著市場化改革及官員化公為私日烈，知識分子對民主的態度日益分化。右派秉承海耶克之流那種為捍衛「經濟自由」而敵視民主的論調，恐怕多數「暴民」會借民

主侵犯「經濟自由」。

劉軍寧說：

自由與民主，儘管是同為世人所追求的兩個目標，但卻有著各自的內在邏輯。一旦這兩種邏輯互不相容，兩者就會發生沖突。這是我讀罷法國自由主義思想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的最大感想。因為，純粹民主的核心特征是建立在平等主義的多數決定的原則基礎之上的。可是，多數一旦擁有絕對的權力，輕則滋生弊端，重則導致恐怖，最終混滅了自由。與多數決定相一致的原則是平等的原則。該原則認為，眾人的力量應該凌駕于個人的力量之上。多數人的智慧優于個人的智慧，立法者的人數比產生立法者的方式更為重要。一旦多數人的權力成為決定一切的權力，這時雖有民主，但卻沒有自由。然而，在這種沒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公民”們充其量不過是心滿意足的奴隸，因為民主中孕育著新專制主義，其形式是中央集權的、全能的以及人民作為一個整體直接參與的多數專制的政治權力。這種民主不足以防止、反而加劇了自由在社會中的逐步失落。這套排斥自由的民主理論源自盧梭。

在當代，對民主的威脅，不再是來自公開的敵視，而是來自對民主的過分熱衷和頌揚。這種熱衷與頌揚，不是給民主以恰當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與自由並駕齊驅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義變相地妨礙、抵消自由。（〈當民主妨礙自由的時候〉）

韓毓海揭露右派之所以反對民主，是因為他們要維護特權分子及敵視勞動人民：

今天，中國知識界撇開許多緊要問題：諸如民主、資本、腐敗、利益分化等問題，獨獨高揚起“自由主義”的大旗，這種立場的選擇並非偶然。因為，今天具有特殊利益者的確要求更多的“自由”，而廣大人群卻要求有發言的場所和表達自己聲音的方式——“民主”。兩廂比較，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站在哪一頭，應該說是清楚的。

保守的“自由主義”……不是限制集權性，而是限制人民，限制人民對公共事物的參與，限制政治領域的公共性和人民主權的政治原則。他們認為，人民主權的原則實行到底只能是摧毀所有差異性，拉平社會差別，而且，人民參與和人民民主也只能降低政治效率，甚至造成社會動蕩。正是因此，他們才認為“消極自由”和“消極參與的大眾”比積極的參與要好得多。與此同時，他們並不認為各種形式的集中權力和“少數人”專制是危險的，而認為直接民主才是“萬惡之源”。而這就是近二十年來我們耳熟能詳的高貴的“自由主義”的聲音，是當代中國主流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意識形態。……

現代社會的總體趨向卻是：隨著現代國家的興起，隨著市場的壟斷，越來越多的人被排斥到社會的邊緣。他們參與市場競爭和公共事物的能力深刻地受到其所具有的

物質和文化資源的限制。一方面是他們既“不懂政治”又“不懂市場”，另一方面，是政治和市場越來越神秘莫測，越來越沒有公開性和公共性。〈在“自由主義”姿態的背後〉

依靠什麼階級？

不過，那種敵視勞動人民的偏見，並不限於右派。事實上，在一些同樣反對腐敗、反對權貴私有化、嚮往民主的知識分子當中，即較為同情工農處境的自由主義者當中，不少仍存在著對勞動人民的偏見。經歷過毛澤東假社會主義與工農階級之名所犯過的一切暴行後，這些知識分子已經不願意真正親近勞動人民，更不願視之為民主旗手。若能不把他們當作暴民，已是萬幸了。

其實，對民主的態度反映一個更深層次的爭論：知識分子應當依靠什麼階級來達至他們所理想的那種社會。矛盾的是，一方面一般自由主義者不願意認真討論階級；他們寧願討論公民、市民社會、人的權利等等。另一方面，許多自由主義者卻力捧中產階級，視之為中國希望所在。他們嚮往的是一個中產階級能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發展。等到一個中產階級成長起來了，就是這個理想社會出現之日了。只是，這個如意算盤並沒有打響。出現在中國的不是強大的中產階級，而是官僚資本。在這個情況下，知識分子也日益分化為兩大類，一類是為官僚資本面上貼金之流，而另一類則混亂得多，共通點只是都多少反對官僚資本，但正面立場卻非常混雜。像何清漣之類，可說是繼續保持對勞動人民的嫌忌（最多不過是保留一點同情心），同時繼續堅持其對中產階級的渴望。在殘酷現實下，她卻不得不發出這樣的哀鳴：

改革之初，中國大多知識精英設想中國將進入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因為中產階級佔主流的社會，對穩定社會有極大好處。……私有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瓜分國有資產的過程，以及九十年代以來的股份制改造過程，都使人們懷有這樣的期望，部分知識精英認為中國腐敗有利于消除舊體制就是基于這種認識。

然而事實卻令人失望。由于中國以權力市場化為改革的起點，出現了嚴重的利益分化。現在的實際情況表明，中國現在不但沒有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菱形結構社會，其社會結構反而與南美國家、東南亞的泰國菲律賓等國相似，成了兩極分化社會。

本節的分析可看出，各個階層的人數表明中國社會是一個金字塔結構：上等階層少，下等階層、社會邊緣階層相當龐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民眾屬於社會下層與邊緣階層。〈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

上引的楊帆及汪暉的文章則明顯表現出另一部份知識分子日漸靠近勞動人民。像汪暉那樣公開贊揚工人運動對促進近代社會進步的作用，近年已算少見。韓毓海更大

肆諷刺那種把中產階級無限拔高的天真想法，認為近年的西方中產階級已經不再承擔著消費、生產與技術創新的舊有角色，而是在資本及商品邏輯全面支配社會下，變成一個「股票市場的龐大後備軍，把追求利潤看作理所當然。這樣的中產階級連改良那種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的能力也消失了。」（《全球化、還是資本主義？》，廿一世紀，1999年4月）

但最尖銳批評何清漣的卻是毛派。韓德強批評何清漣把下層民眾看成暴民，及因此貶低文革：

誰是社會的真正大敵？在《現代化的陷阱》中，何清漣有這樣一句話：“對於社會來說，‘流氓無產者意識’或曰‘暴民意識’才是改革真正的大敵。”……何女士偏偏把既無權又無勢的流氓無產者當成社會的大敵。這是為什麼呢？在《陷阱》一書中，我沒有找到答案，但《歷史的吊詭——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再思考》一文給我提供了線索。該文第三部分專談貧民政治，文章說：“所謂‘貧民政治’道路，主要依靠暴力搶掠資源並佔有資源，只有破壞性而缺乏建設性。實施‘貧民政治’並不代表貧民整體上都能得到長期好處。”……何女士對文革顯然有刻骨仇恨，……但是，文革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其發動恰恰是為了永久性地避免暴力的發生，永久性地讓人們免于血腥和恐怖，使人間成為天堂。不錯，文革是一場災難，但它是在尋求理想征途上的災難。……如果只是簡單地否定文革，而不是仔細地解剖其殘片，那麼人類社會仍然會在以暴易暴的循環中難以自拔，甚至有可能會毀于一旦。（《我與何清漣分歧何在？》）

另一個有強烈毛派傾向的「國采」則說：

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不為無產階級服務，就為剝削階級服務。在私有制社會里，知識分子更願意為剝削階級服務。何清漣女士也不例外。

何清漣女士……是在為私有制吶喊，是在為私有制服務，她的階級立場是站在剝削階級立場之上的。但是，她是站在大的剝削階級即大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立場上嗎？又不是。《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等都是反對當前中國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是為中國新生的中小資產階級服務的，所以遭到了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現政權的打擊。我們必須看到，她在分析當前中國的階級狀況時是十分客觀的，是比較符合中國的實際狀況的。但是她所開出的解決問題的藥方是沒有用的。反對大資產階級當然會遭到被反對者的打擊，而不為工農服務就不能得到工人和農民的支持和響應。企圖同大資產階級討價還價，創造一個新生的中小資產階級，來緩沖中國的無產階級和整個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徒勞的。只要人或階級代表資本，這個人或階級就會不斷表現出資本貪婪的屬性，所以中小資產階級並不能緩解無產階級和整個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正是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的

“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現在的當權派就是毛澤東所說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喪失了警惕，喪失了鬥爭精神，喪失了毛澤東思想，所以修正主義在中國奪取政權，資本主義在中國就出現復辟。那麼這個復辟資本主義就自然引起……階級鬥爭。……這樣的真理，何女士是看到不的。（《評何清漣女士的觀點》）

在許多被稱為「新左」的人當中，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對毛澤東的正面評價。韓毓海，崔之元等人未嘗走到像韓德強那樣遠，但是他們都不同程度地褒揚毛澤東。崔之元更多次為文贊揚毛澤東的鞍鋼憲法以至文革。但是，在反對當前那種官僚資本主義及右派論述的時候，主要援引毛澤東的遺產實在是幫勞動人民的倒忙，因為，儘管右派完全抹煞毛時代的中國的成績是錯的，但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也說明那個時代的中國也有太多太多反面經驗。不加批評地將毛視為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正面根據，很容易給右派反擊成功。吳稼祥的下面的話不只有煽動性，而且不能說完全沒有事實根據：

左”是什麼？左就是極端，左就是自戀狂，就是惟我獨革，惟我獨善，天下的真理都在我的肚臍眼上，左就是無情無信無恥，中共統治的殘忍、虛偽和厚顏，就是左傾思潮帶來的。在極左的文革時期，中學生打死老師，子女揭發父母，妻子出賣丈夫……那時期的中國人難道不是人類的異種嗎？

真正站在勞動人民立場上的左翼知識分子，固然要獨立於官僚資本階級以至一切中外有產階級，但也要獨立於過去那種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官僚社會主義；須要在這兩種極端之間兀自摸索出路，尤其須要堅決保衛一切人--不論左派右派---的思想與言論自由，堅決抵制一切要向權力找尋論爭支點去打擊異己的企圖。否則他們在今天很難贏得這場發展中的大爭論。而輸掉這場論戰，也就是在爭取知識分子重新站到勞動人民的解放事業上面再輸掉一次仗。 ★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自《先驅》第58期）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貧困與左翼

左思

1. 「使人憂，使人悲」的左派？

左右翼的劃分，在西方是工業革命後的產物，那麼，在中國文化的脈絡裡，如何做區隔？素書樓主人錢穆在他的《國學概論》做了一個大膽的比附：「墨家之學，蓋本孔子批評貴族階級之精神，而為更進一步之主張耳……其思想激進，於先秦諸子中可稱左派，而儒家一脈則右派也。」

錢穆所持的理由是：「墨家斥禮樂而尚勞作，其生活近於於刑徒役夫。」他引《莊子·天下篇》對墨子的描述：「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艱，使人憂，使人悲……」意思是說，墨翟這老傢伙，活著的時候不歌唱，死後不服喪，三寸棺板入土為安，以枯槁貧瘠為尚，教人憂愁，教人哀傷。

錢穆基本上將「左派」理解為禁欲主義和苦行主義的實踐者，是一套「使人憂，使人悲」的思想系統，以勤奮操勞、刻薄自己作為安身立命的根本。當然，禁欲主義和苦行主義並不等於墨家的哲學，然而，錢穆特別抽繹出上述的片斷，並從而定義墨、儒的「左、右」分野，卻是十分耐人尋味。

根據錢穆自敘，《國學概論》於1926年開始編撰，1928年完稿。可見，早在那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西方思潮剛剛引進中國的年代，「左派」就已普遍被理解為仇富親貧的一種信念。以致鄧小平晚年在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政策時，要不時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要消滅貧窮。」

不管怎樣，「社會主義」與「貧窮」，似乎總有一種難分難捨的關係。也許，對這種關係的判斷，本身就蘊含分辨左、右的指標：左派認為是因為有「貧窮」存在，所以需要社會主義來解決貧窮的問題；右派則普遍認為，因為有社會主義，所以貧窮存在。

在當今的中國知識界，我們不乏看到，某些以自由派自許的人士，對於消滅社會主義，比消滅貧窮更為積極。錢穆的弟子余英時就是代表性的人物。而在當前的台灣和大陸，也不難找到以余英時為師的「自由派」信徒。此之所以，右派不必然是自由派，自由派卻絕大部分是右派。

2. 二度暗殺聞一多

1988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學25週年的紀念講座上，余英時指出：liberal 是介於 conservative 和 radical 之間的commonground —— 自由派是保守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共土」。在談到聞一多時，余英時說：「他最初很尊重西方啓蒙運動中所強調的基本價值，如自由、知識、個性之類。這更是他早期主要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在思想左傾之後，他也否定了這一切。」這是余英時非常一貫的思維邏輯：只要牽涉到「左」，牽涉到「社會主義」，就必然是與自由、知識、個性（還可以加上民主、人權、富裕等一系列美好的語詞）為敵。聞一多出身於五四運動，作為一位活躍的思想家與撰述不輟的文學研究者，聞一多究竟如何否定自由、知識、個性，卻未見余英時進一步申論。余英時唯一舉出的理由是：聞一多否定了美國的教育。

否定美國，即是否定自由、知識與個性？這也難怪，2000年7月，余英時在時報基金會舉辦的「大師講座」上，斬釘截鐵地說：中國大陸唯一的希望，就是「轉型為真正負責任的資本主義社會」。不必懷疑！余英時心目中那個「真正負責任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以他所居住的美國為典範。

年僅 47 歲即遭國民黨右翼暗殺的聞一多，寫過一首題為〈死水〉的詩：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漣。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這些文字是民國早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寫照，受壓抑的文人只能在呆滯、腐臭的大環境下尋找頹廢的美感：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鐵罐上鏽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最後，這位憤懣而又無力的詩人只能自嘲地宣告：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這裡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聞一多在絕望下要「讓給醜惡來開墾」，結果醜惡的勢力奪走他的性命。死後，又遭到余英時第二度的暗殺。「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聞一多為反抗他視之為醜惡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死於非命，余英時則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社會是終極的、唯一可能的世界。

3. 貧窮與左傾的宿命

余英時的老師錢穆，青年時期與聞一多相從甚密。後來，聞一多目睹國民黨軍隊血腥鎮壓學潮，看到年輕壯丁被披鐐帶銬押去從軍，在義憤填膺之下為文痛斥當權者行徑，又直言批評國民黨投靠美國成為中國政治團結的障礙。因錢穆採取親美態度，

又拒絕指責國民黨鎮壓學潮，聞一多罵他喪失靈魂，兩人自此恩斷義絕。聞一多生前大概難以想像，錢穆弟子親美、親國民黨的態度，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

錢穆少年時期就讀常州府中學堂時，還有一位左傾的同學，那就是比他兩級的瞿秋白。錢穆在他的《師友雜憶》中說，瞿秋白因「髮頂有兩結」，故名瞿雙，後來「雙」易為「霜」，再衍為「秋白」。他寫道：「瞿雙以家貧，未在府中學堂畢業。民國後進北平俄文專修館，可免費，乃留學俄國，後為共產黨黨魁。」

這一段記載很有意思，短短幾句，似乎就彰顯了貧窮與左傾的宿命。如果瞿秋白不是家境貧困，可能就不需要中途從錢穆所在的中學校輟學，不會跑去念免費的俄文，當然也就不會有爾後留俄並從而成為共產黨領導人的發展。

瞿秋白的生命歷程與聞一多有些相近，兩人同年出生（都是1899年），同樣從浪漫文學走向革命文學，同樣英年遭國民黨右翼殺害，瞿秋白死時只有36歲。1933年，當胡適為國民黨鎮壓學潮辯護，而倡議「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時，瞿秋白寫了一首詩嘲諷道：

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卻說王權，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
 人權王道兩翻新，為感君恩奏聖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殺人如草不聞聲。
 先生熟讀聖賢書，君子由來道不孤，千古同心有孟軻，也教肉食遠庖廚。
 能言鸚鵡毒於蛇，滴水微功漫自誇，好向侯門賣廉恥，五千一擲未為奢。

4. 歷史的作弄

1949年巨變之後，胡適成為自由派的代表人物，被蔣介石延攬回台北，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錢穆在香港創立新亞書院，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代表，後來也被延攬回台北，長駐外雙溪「素書樓」傳道授業，被視為國民黨「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典範。元代詩人王士熙在〈送華山歸隱西湖〉一詩中有云：「青牛谷口迎紫氣，白鶴洞中傳素書」，錢穆將居所取名「素書樓」，當有隱遁之意。

在《中國歷史精神》一書中，錢穆寫道：「今天以後的世界，將是一個解放的世界，不要爭論資本主義抑或共產主義是將來文化的正統。這雙方的對立，便是近代西方文化發展出來的病症，而且表現出兩種相反的病態。今天並不是說西方文化一定沒落，它應有它將來的生命。但這並不便是我們的生命呀！我們要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該回頭來先認識自己。」錢穆一心要避離意識型態的糾結，這跟他攸長的記憶中有那麼多師友在左右鬥爭中反目或喪命的遺憾，不無關聯。他當然也知道這不是主觀意志所能夠掌控，因此，只好隱遁於故紙堆中，追尋傳統，「認識自己」。

即使如此，錢穆大概很難預料到，他自己的風燭殘年，竟是在另一種形式的意識型態鬥爭下抑鬱而終。做為中國傳統文化傳承的典範，他很不幸地被台獨勢力盯住，視為「敵營」中國的代表人物，最後，在當時仍是民意代表身份的陳水扁的咄咄逼嚇

下，黯然遷離「素書樓」。既不得安身，又何從立命？國學大師自此辭世。

然則，錢穆尚且將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等同視為西方文化發展出來的病症，他的弟子余英時卻是對資本主義情有獨鍾，視之為唯一的依歸。余英時做為新時代的「文化班頭博士銜」，是國民黨末年李登輝榮登大位的重要推手，是「為感君恩奏聖明」的首要人物。1988年，蔣經國剛過世不久，副總統李登輝獲得扶正。但是，李氏是否接任國民黨主席，卻有嚴重爭議。余英時適時在報上發表〈國民黨的新機運〉一文，強力主張李登輝以元首兼任國民黨主席是「最適當的選擇」，他明明知道民主政治中黨政分離的必要，卻還是為李登輝編造了一個戴上傳統光圈的理由：「一元化領導體制在國民黨執政史上，已有五十年以上的傳統，一個傳統既經形成之後，絕不是一夜之間就能改變的，在客觀條件不成熟的情形下遽廢傳統，尤足以招亂。」1996年，李登輝贏得首度總統直選，余英時更是隨即在兩大報連續發表多篇頌讚長文，以罕見的亢奮表示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為之歡欣鼓舞的破天荒的大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余英時絕對料不到歷史的進程竟是如此作弄。不到四年，權傾一時、以摩西自許的李登輝竟在民眾的噓聲與憤怒聲中倉皇下台。而曾經將錢穆的老骨頭驅離素書樓的陳水扁，則以約書亞的姿態續任總統寶座。

在阿扁的時代，當然也很快就出現另外一批「為感君恩奏聖明」，頂著博士頭銜的文化班頭。他們當然都同樣自稱自由派。不過，阿扁才執政半年，台灣資產丟掉近半，百業蕭條，人心渙散，始承恩澤的幫閒文人不免忐忑難堪。他最應該擔心的是：貧困人口驟增，左翼的勢力是否會因此水漲船高？台灣是否會進入另一波意識型態鬥爭的高潮？屆時，幫閒文人是否還能安坐在自由派的舒適位置上，而不暴顯出其反動、右傾的本來面目？

★

可憐的高行健

呂正惠

《左翼》的「無償勞工」小林有一天打電話給我，氣急敗壞的問我，有沒有看過高行健的得獎感言。我既不知道報刊已發表了這篇感言，也沒有興趣去找來看。但小林熱心的把文章傳給我，囑我務必為文回應。為了回報他長期以來為《左翼》承盡的勞務，我勉強自己去讀高行健的文章，並準備寫一篇感言的「感言」。

我先講老實話，高行健這篇〈文學的理由〉實在寫得太長了，讀了一半，我就失去了耐性，不得不強迫自己一句一句、一段一段的去讀。它的後半幾乎都在重覆前半所說的，而他的前半也都在重覆前人所說的。最糟糕的是，前人說過的話，經過他一重組、轉述，就變得沖淡了許多，變得沒味道起來。

譬如，高行健說，作家被「革命」所迫害、監禁、流放、罰作苦役，爲了逃避自殺與封殺，不得不逃亡。「正是在文學做不得的時候我才充分認識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學讓人還保持人的意識。」就某些歷史現象而言，我不反對這些「陳述」。但索忍尼辛在自傳《橡樹頂牛棚》說過類似的意思，說得比高行健的語言讓人動心得多。

每一個作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經歷、自己的信念，重要的不是他的信念是「什麼」，重要的是：當他述說他的信念時，能不能表現出一種「逼人的力量」，讓不同信念的人也爲之動心。這一類的文章我讀過一些，譬如托爾斯泰的《什麼是藝術》，並爲此感動良久，不是爲了他所表述的見解，而是爲了他表述這些見解時所呈現的作家的真誠與勇氣。當然，我們並不希冀高行健是托爾斯泰級的作家，但老實講，在諾貝爾文學獎眾多得獎感言之中，高行健這一篇實在太過囉嗦而蒼白了——再說一遍，是爲了他的表述方式，不是爲了他的見解。說得再坦白點，我沒想到高行健這一篇會寫得那麼差，作爲「華人」，我都有一點感到不好意思。

現在可以談到高行健的「信念」了。一般地說，十九世紀以來，作家的處境很特殊。像十九世紀的俄國、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作家捨身忘己的「爲民請命」，我們不能說他錯。像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西歐，作家極端藐視資本主義社會，一心逃避，或一心建立一種無人了解的「藝術天堂」，我們也不能說他錯。像史達林時代、希特勒時代、文革時代，作家被殺害、被監禁、被迫逃亡，他們說「正是文學做不得的時候我才充分認識到其所以必要」，我們也不能說他錯。高行健所講的那些信念之所以顯得沒有力量，也許是因爲他離開大陸太久了，他已感覺不到那種「時代」與「社會」所賦予作家的「緊迫感」，所以顯得蒼白。馬克思曾經說過，「歷史」第一次上演時是「悲劇」，過了一段時間，如果還重演一次，就只能說是「喜劇」、「鬧劇」了。文革結束那麼久，中國改變那麼大，高行健還要述說二十年前所說的話，怎麼可能說得好呢！高行健在西方「邏輯」的運作下被推上諾貝爾獎的大舞台，不得不在這個「時機」講一些別人知道 he 會講、而他已經不能講得更好、只能重講一遍的話，讓我不不能不爲他感到難過。

我本來想再多說一些「感想」，但突然不想講了，就此打住罷！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 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 〈三〉

黃志龍

三、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自我崩潰和鄉鎮企業的興起

1. 增產不增收

根據「中國農業年鑒」〔1981年版〕，由國家物價總局等七個單位，分別於1965、1976及1978年三次就全國3600多個生產隊所進行的調查結果，以及，1976年以全國1296個生產隊為對象的調查結果〔人民日報1978年10月25日〕顯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帶給農村的客觀效果是「增產不增收」。

勞動力的過多投入是造成「增產不增收」現象嚴重化的原因之一。

70年代末以前，中國因禁止農村、城市間的人口移動導致農村的勞動力過剩，而農村工業化所吸收的過剩勞動力非常有限，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過多的農業勞動量，加上為了養活龐大人口，中國政府長期採取「糧食生產第一主義」政策，農業生產並沒有朝向多角化方向發展，抑制了勞動力投向收益性較高的「現金作物」，從而制約了農民的所得上升。

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土地生產率確實有所提高，但是土地生產率的提高卻被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所抵銷，始終無法脫離勞動生產率過低的處境——從1965年到1978年之間，糧食生產的絕對數量自1億9453萬噸的年產量增加到3億477萬噸，但國家的餘糧收購量的增長卻相當緩慢。其原因就在於中國的農業生產藉以達到糧食產量的極大化的手段，是在稀少的土地上投入過剩的勞動力，其成果卻由於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面積的減少所抵銷。藉由勞動力的投入而增加的糧食產量，同時被農村所增加的人口所消費，使得國家的糧食收購量無法迅速提高。

糧食商品化的比率決定了城市勞動力的扶養量，成為制約工業擴大速度的重要因素。由國家收購量所表示出來的糧食商品化比率的低迷，具體的影響到工業發展。因此，中國雖然建立了通過人民公社吸收農業剩餘，藉以達成工業化目的的體制，但是在增加可供商品化的農業剩餘這個關鍵問題上，卻沒有完全的成功。

2. 重工業化的成就

以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為手段，將農業剩餘轉移到重工業建設的結果，中國所實現的重工業化在產量方面確實獲得可觀的成績。

如以機械、金屬、化學等部門的生產額在工業生產總額中所佔的比率為「重工業化率」，在發展中國家中，以顯著的速度提高「重工業化率」的典型國家是南韓。但是，值得重視的是，在1980年以前中國的「重工業化率」卻遠高於南韓。在1980年南韓的人均所得是1630美元，中國只有300美元，兩者之間的發展階段有巨大的差距，而中國的「重工業化率」卻比南韓高許多，可見中國的重工業化成績是極為可觀的。

大躍進時期，中國標榜要在15年內趕上英國的工業化水平，而在1978年的經濟發展十年計畫中，也宣布在本世紀（20世紀）內達到先進國的工業水平。由此可知，中國的集權性計畫經濟經常推行提高重工業投資規模的目標。

在中國，國家部門在向企業下達生產目標的同時，也完全供給完成這個目標所需的原料、能源、機械設備和資金等等。由於這種投產資源的「無償供給制度」，使企業不受支付利息的壓力，因而企業為了達成計畫指標，通常採取擴大生產規模和新設工廠的途徑。同時，投產資源的無償供給制度容易造成企業不顧投資效率，並且對既有設備的保養和更新也失去關心——因為企業規模的擴大或新設，比提高經營效率或充實設備使用率更易於達成目標。就企業而言，他們所關心的只是達成上級所指令的目標，因而只有被動心態，不必具有主觀能動性。

更為重要的是，擴大重工業所需資本，是來自農業剩餘的移轉而不是產生於企業內部的利潤，因而喪失「擴大自我維持」的動機。於是，擴大重工業部門的背後存在著嚴重的無效率。

擴大國營重工業所需的資本既然是來自低價糧食和價格剪刀差制度，從而必須將農民和城市勞動者的消費維持在低水平，於是輕工業部門也無法取得充分的發展——由於價格剪刀差，輕工業部門獲得龐大的利潤，但其所得的利潤大都上繳成為擴大重工業資本的核心部分。根據中兼和津次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其機制」一書中的考察，輕工業部門上繳的利潤在1952、1965和1975年分別佔國家財政收入的68.1%、40.0%和46.5%，但輕工業在基本建設投資中所佔比率僅為17.6%、7.9%和10.1%。由此可知，輕工業部門雖然生產了不少利潤，但再投資卻不多，其所得利潤大都移轉給無效率的重工業部門。

丸山侑郎在「中國經濟的矛盾」一書中也指出，在1980年前後，中國所生產的鋼鐵有72.8%用於重工業，而供給輕工業和農業（包括農業機械修理工廠）的鋼鐵只佔總產量的11.7%和15.5%。就機械工業而言，所生產的產品有80~85%適用於重工業部門，而用於耐用消費財的部分只佔15~20%。能源方面也呈顯同樣的情況（重工業部門消費了77.9%，輕工業、農業以及民生部分各只佔6.0%、4.8%和11.5%）。

這就是說，鋼鐵、機械、能源等重工業部門所生產的產品大都用於重工業部門，因而形成重工業部門的「自我循環機制」，而不是藉由重工業部門的擴大，在一段期間後以豐富的消費財回饋農民和城市勞動者。依照重工業化優先的理論，對重工業部門（生產財部門）的優先投資，在其初期可能抑制消費水平，但就長期而言，比優先輕工業更會帶來更高的消費水平。但是在中國，由於重工業的非效率性和自我循環機制並沒有提高勞動大眾消費水平。因此，自從建國以後一直到1980年，工業部門的勞動者和全民所有制單位勞動者的實質工資並沒有提高多少。

3. 經濟體制的改革和鄉鎮企業

以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為手段將農業剩餘轉移而建設重工業的政策，經過20多年的執行後並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農民的生活水平長期沒得到顯著的改善。國營重工業部門雖然達成顯著的擴大，卻由於嚴重缺乏效率，因此其再生產尚須依靠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始終無法形成自我維持的擴大機制，而勞動者的實質工資也無法提高。於是結束文革的混亂之後所召開的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捨棄由國家吸收農業剩餘的體制，使農業剩餘保留在農村，也就是從根本改革舊政策。其要點是：

a. 提高國家收購農產物的價格，降低農業生產財的價格，也就是以改善農村交易條件，使農業剩餘保留在農村。

由於三中全會的決定，1979年夏季以後糧食的統一收購價格提高20%，而超過收購部分則提高50%，而且經濟作物、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也逐漸提高。同時，於1979～80年，農業機械、化學肥料、農業等的價格降下了10～15%。農村交易條件的改善究竟縮少了多少價格剪刀差，並沒有確切的統計，但收購價格的提高和生產及經營承包制度的普及，強烈的刺激了農民的增產意願，再加上人民公社時期的水利建設和肥料生產的增加，使得1978年以後的農民所得提高到建國以來的最高水平。

b. 不僅在三中全會中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更在1985年由國務院公佈新價格、流通政策，以政府的契約收購制度替代統一收購制度，逐漸地減少收購項目和數量。這就是說，農民增加了在自由市場中以較高價格的出售農產品的種類和數量，而蔬菜、肉類等副食品則完全採取自由流通制度。

c. 1982年12月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批准了新憲法，規定人民公社「政社分離」的政策，也就是廢除人民公社的政治機能而使其成為集體所有制組織；1983年全國農家的93%採用「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承包制度，而到了1984年末，全國98%的人民公社解體，最後於1985年，所剩下的西藏自治區的公社也解體。

上述三個要點，不僅使農業剩餘留存在農村，誘發農民的增產意願，從而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並擴大了農業剩餘，使農民擁有可投資於非農部門的剩餘。（待續） ☆

編輯報告

在二十世紀結束的前夕，台灣的勞動階級利用資產階級政黨之間處於分裂與內鬨的時機，順利地阻擋了民進黨政府企圖將勞働工時由二周八十四工時（每周四十二小時）延長為每周四十四小時。不過，我們也要理解，這次台灣工運的勝利，主要是巧妙地藉著資產階級內鬥而取得的成果，並非是勞工憑據強大力量贏得的勝利。因此，發展勞工組織力量仍將是今後最重要與最嚴峻的課題。

工時鬥爭是本期的焦點話題，林書揚〈有關工時鬥爭〉，對於工時鬥爭的性質與意義有著深入的分析。黃瑞明〈民進黨的左派聲音在那裡？〉，質疑為什麼民進黨內部對於這次工時案都沒有出現反對的聲音。夜讀五車書的〈三駁產總〉，是一位年輕工運組織者對產總存在提出的質疑，雖係兩年前的舊作，卻仍有參考的意義。

何六九〈民族問題：台灣左翼的阿堵物〉，強調台灣的左翼朋友不應該逃避民族問題的辯論，否則將會淪為社會的邊緣。石家駒〈台獨派·皇民遺老和日本右派的構圖〉，對於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吉則最近出版的政論漫畫《台灣論》背後所代表的政治意含進行分析與批判。

劉宇凡〈大陸知識界的大論（混）戰及其現實意義〉，對於當前大陸理論界右派、自由派、新右派及毛派的論戰進行全面的分析，使讀者能了解當前大陸知識界的思想狀態。左思〈貧困與左翼〉，則是對當代台灣自由主義的一些理論大師如錢穆及其弟子余英時等人的言行進行尖銳的檢視與批判。呂正惠〈可憐的高行健〉，指出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在頒獎典禮上所發表的感言是如何的貧乏與過時。

黃志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三）〉，本期主要是分析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自我崩潰過程及鄉鎮企業的興起。

《左翼》上期（十三號）刊出王秀蓮〈挽救全產總〉一文後，我們接到勞工陣線的來函，表達勞陣的不同意見，《左翼》編輯部對此特別做了回應說明。

新世紀、新希望，迎接二十一世紀的來臨，我們期望台灣的左翼運動能夠開始進入一個全面開展的新階段。

左翼 第十四號

出版日期：2000年12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五號

二刷



〈在美軍基地中〉

作者：儀間比呂志

【野風與星火】當幽靈徘徊不去的時候

何六九 / 2

青春睿智卡維波？

林深靖 / 1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上〉

鄭國棟 / 18

反輻射混蛋和伊拉克禁運

陳真 / 26

【工運探索】台灣工運在轉捩點上

鄭孟文 / 29

年興紡織事件記事本末

倪世傑 / 34

本期稿擠，原連載之【特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順延一期

當幽靈徘徊不去的時候

何六九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葉說，有一個幽靈在歐洲徘徊。百多年後的今日，台灣的工人們抬頭仰望，可以發現，島嶼上空的確盤旋著幽靈。可是，這個獨領風騷的幽靈，並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共產主義幽靈，而是相當不同的異類幽靈，民族主義幽靈。

(1)

早在二、三十年以前已經有人指稱，右派的台獨分子在帝國主義野心家唆使之下，平空捏造台灣民族的說法，欺騙台灣工人階級。近在四、五年前民進黨彭明敏競選總統失敗後不久，右派的民進黨內部也有人開始指責"台獨基本教義派"不知道跟著時代進步，只知道從族群看待問題。如果這些說法值得相信的話，這也許就是那個異類幽靈的來由。這個幽靈常年盤旋不去，每每咻咻作響，狀似要掀起一場漫天的腥風血雨，吞噬台灣大地。這是一樁何等令人心焦的嚴重事！

可想而知，不少左翼人士不斷地呼籲工人們，只應該注意階級問題，不應該過問"民族和種性"問題。其實不但這些左翼人士如此，舉凡台灣主要的電子媒體，平面媒體，政黨，以及官產學各界各派人士，都不斷呼籲人們切勿執著於族群情懷。每逢大小選舉或者政爭，同樣的呼籲聲都要響徹雲霄。認真加以考察，台灣社會上下似乎沒有任何組織團體干冒大不韙，明目張膽地訴諸族群意識。即使那些被扣上"台獨基本教義派"帽子的人們，也並沒有叫嚷要仇視或者驅逐非我族類。在台灣普遍都有此看來十分開明的共識之下，有些左翼人士加入吶喊，共襄盛舉，反而顯得俗套。

然而儘管如此，這個民族主義幽靈仍然徘徊不去，甚至於看起來好像陰氣鬱積越發嚴重的模樣。如果情況並非如此，何以各方人士都如同面臨大敵，緊張地一再提出呼籲呢？這事必定另有蹊蹺。

跟這個呼籲聲互相呼應，形成絕配雙簧的，則是另一個呼籲聲：要放下意識形態。各地左翼人士應該對於後者相當熟悉，那麼就讓我們從這裏開始討論。

大凡在上層建築領域居於優勢壟斷地位的階級，最喜歡用"放下意識形態"這個方法來欺詐弱勢階級。他們以為自己的意識形態是獨一無二的真理，因此不是意識形態，而與之相左的不同看法意圖製造分歧，叫做意識形態，屬人間至惡，人神共憤。這好比極端的宗教狂熱者，往往以為自己所信仰的不是宗教的一種，而是唯一的至理。在資本主義社會，右派自由主義者經常如此哄騙工人階級，經常宣稱意識形態時

代已經結束。如果大家都放下意識形態，結果必定是接受某一種被強勢階級尊奉為不二真理的意識形態。不必耗費力氣做任何論述，不必冒險暴露自己的理論弱點，只要呼籲對方放下意識形態，就能夠達成在思想上征服對方的目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有力者真會算計人。

其實，喜歡使用同一手法的，也不僅僅限於自由主義者而已。舉一些新近的實例。核四續建爭端一起，贊成方面就會要求反對方面放下意識形態。對於中國的若干談判要求，主張李登輝和陳水扁應該答允者，也一再要求李陳不要執著於意識形態。當拼音爭議一出，贊成採用漢語拼音方面也指責對方意識形態作祟。工人們對於工時的主張，被批判為意識形態僵硬不化。殊不知，責罵對方囿於意識形態的行為本身，其實是自己意識形態唯我獨尊的傲慢堅持，蠻橫霸道要求對方棄械投降。

放下意識形態，是不是就能夠客觀而公正看待問題呢？當然不能夠。因為，客觀和公正的標準，必定涉及一定的意識形態因素。除非干願在思想上無保留地屈服於優勢地位的霸權文化，否則左翼人士以及弱勢階級和團體沒有理由放棄自己的意識形態。左翼人士若是呼應右派自由主義者終結意識形態的主張，也跟著倡導"不問"意識形態，好像"不預設立場"是一種心胸開闊的好風度，那才是不折不扣的投降路線。

除了拋棄意識形態的呼聲之外，當然也不會聽不到放下族群意識或者民族意識的呼聲。這又代表什麼意義呢？

百年來各個時期的中國漢人政治運動，包括無產階級的運動，都帶有十分濃厚的民族運動色彩。幾乎所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包括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內，也都混身帶有漢族民族主義者的氣味。雖然原來的民族解放目的早已達成，漢族民族主義卻毫無退出歷史舞台的跡象。這大概就是意識落後於存在的普遍性。不但如此，它雖然表面上仍然保存抗拒外侮的口號，主要用意已經以對內為主。它已經成為海峽兩岸統治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今的中共和過去的國民黨，都利用它來用以建立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正統地位，打擊異己，以及控制人民的思想。在馬克思主義影響力迅速萎縮的中國，漢族民族主義所扮演的角色卻很明顯的越來越重要，一升一降，二者恰成鮮明對比。

問題是，漢族民族主義其實是一種以種族認同為主軸的血緣民族主義。它為什麼成其為一個問題呢？

現代任何一個文明的民間社會，即使已經具備相當深厚的政治文化、文明傳統，和許多既互相制衡而又能夠互相補充的種種穩健體制，也萬萬不會容忍血緣民族主義者四處興風作浪。他們長期以來的社會共識是，寧可干冒侵犯公民權利之險，也要制

訂嚴格法律來加以防止。因為，凡是以血緣為主的民族主義，從來都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不肯容忍境內人民多元的民族和族群認同、多元的歷史經驗和認知，一再引起嚴重問題，甚至於血淋淋的大屠殺。它嚴重威脅到民主社會的正常運作。當前大部分民主社會，過去都曾經有過慘痛的經驗，是以知道需要努力防止。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這個趨勢是相當顯著的。甚至於可以說，要在文明社會裏肆無忌憚地公然宣傳血緣民族主義，而不招致輿論嘩然以及司法執法方面的立即干預，是不可想像的。可是，有些社會則反其道而行，而且大張旗鼓，自以為是。

數十年來，海峽兩岸各級學校、媒體和學術界，無休止地宣揚一種帶有濃厚歷史復仇主義的血緣民族主義，摻雜著領土貪婪、對外擴充渴望和數不清的歷史迷思。依照這些說法，漢族好像是人類歷史上唯一曾經遭受重大屈辱和傷害的不幸民族，是以理當享有許多不容剝奪的對內與對外的特殊歷史權利；可以為了民族尊嚴，不必理會文明世界的常規。細加分析當前漢族民族主義理念的內涵，我們可以發現，它不但在過去數十年間沒有一絲一毫的長進，而且每況愈下，在許多方面越發暴露文明退化、思想閉塞、道德破產的精神狀況。無論是海峽的此岸或者彼岸，凡是直接或者間接有關漢族民族主義（或者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著，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濫情、粗糙和理路錯亂，無異於乩童的無知迷信和誇張矯做。

"炎黃子孫"和"中華民族"的觀念，互相抵觸，漏洞百出，貽笑大方。官方廣加宣傳如此狂妄幼稚的觀念，居然連漢人知識分子也興奮地群起附合。在立論上膚淺而且在精神上相當不理智的血緣論民族主義理念，一旦通過國家機器之手，執意在一個多民族或者多族群的國家內部雷厲風行下去，必定招致強力反彈。果不期然，這是過去和眼前真確發生在海峽兩岸的事。

在中國，濫情的"愛國"論著居然越來越多，近來已經到了泛濫的地步。同時，回族、維吾爾族、藏族等民族主義普遍高漲的事實，也已經是無可掩飾了。二者之間，是有一定因果關係的。我們不敢說，漢族民族主義已經成為中國官方唯我獨尊的意識形態，但是，在這個一度熱衷學習唯物史觀的國度裏，愛國主義教育已經實質取代了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教育，民族意識的提升課題優先於階級意識，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當然也拋到九霄雲外。血緣民族主義是一種不需要政治智慧，不需要理性檢驗的理念，談不上有什麼值得深思的理論基礎，連鄉愚也能夠輕而易舉地無師自通。以之掩飾思想貧乏，是最便當不過了。思想貧乏愈是嚴重，愈需要血緣民族主義來遮羞。愛國主義愈是盛行，愈不需要理性思考。既然已經掌握了最高政治原則，一切盡在方寸之間，何必再枉費時間去反覆論證思考？

在台灣，由於國民黨過去數十年的長期厚植，漢族民族主義者掌握了極為豐富的

資源，在媒體、文化界和學術界方面所占據的據點極為眾多。成群結隊的文化打手廣佈各方，互通聲氣，隨時可以翻雲覆雨，憑空掀起滔天大浪。選票和政黨輪替，根本撼動不了他們在上層領域的獨霸地位。他們無時無地不運用所掌握的優越壟斷地位，以從事漢族民族主義理念的強力宣傳，完全不因為台灣已經步入多元的民主時代而有絲毫鬆懈。他們有繼續壟斷台灣上層建築的旺盛企圖心。他們以為漢族民族主義神聖不可侵犯，理當支配台灣人民的靈魂，決定台灣社會去向，連公共行政事務都不放過。他們是當今台灣社會上發言最多、音量最大、姿態最高的一群，牢牢掌握了台灣的文化霸權。他們的聲音淹沒了台灣的學校課堂和大街小巷，連國會議堂也不可免。向來都是這群人最熱衷於宣傳自己的理念，最勤於傳播漢族民族主義，卻又動輒搶先指責他人不肯放下意識形態，指責他人懷有地域觀念和省籍情結，指責他人意圖挑起族群衝突。當前正是這群人一心一意要通過媒體的新聞炒作、誇張渲染，不惜把整個台灣社會攪得人心惶惶，以脅迫台灣人民服從於他們的民族主義理念。

在台灣，過去國民黨高姿態奉漢族民族主義為正朔，來合理化和正統化自己的白色恐怖，結果激起民族形式的反抗。當前掌握文化霸權的漢族民族主義者，在輿論和文化領域裏的所作所為，絲毫沒有改變當年白色恐怖時期的粗暴手段：漢族民族主義理念的宣傳機構無所不在，宣傳聲音無孔不入，十分傲慢，當然無助於緩和緊張情勢。在中國境內，不同民族主義間的衝突與日俱增而且日益嚴重。連中國與台灣人民之間的緊張局面，也開始出現民族意識對立的跡象；因為中國無端堅持要求台灣人民全盤接受他們的漢族民族主義要求，不得抗拒。偏偏大部分台灣人民不肯就範。這當然使得海峽兩岸之間政治關係長期陷入僵局。

現實如此，我們如何能夠說，當前海峽兩岸的政治現實裏不存在有嚴重的漢族民族主義問題，或者不存在有許多因為漢族民族主義而引起的種種嚴重問題嗎？我們能夠說，這些都跟台灣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無關嗎？

(2)

讓我們進一步討論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

二十世紀初，國際左翼為了民族問題而爭執不下。列寧寫下許多有關民族的論著，從事幾次民族問題的論戰，但是主要涉及政治策略的討論，絕少理論方面的探討。他把這項理論研究的工作交給斯大林，這就是斯大林〈民族問題與馬克思主義〉論文的來由。就理論而言，這部書有許多嚴重缺陷，但是至少澄清了血緣因素在民族形成過程中的角色。他毫不含糊地說，民族不是種族。而這是後來國際左翼所普遍接受的。事實上，後來有很多資產階級杰出學者也持同樣看法。就歷史事實而言，最早出現的不列顛民族以及首度完成民主革命的美利堅民族，都不是建立在血緣論之上的。

然而，我們看到一些以左派自居的人，卻一直把民族與種族（種性？）混為一談。有一個有趣的例子。許多年前，海內外有很多反抗國民黨壓迫的台灣人主張台灣人自決，要求由台灣居民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擺脫獨裁體制。不用說，這種主張當然觸怒了不少人。說來奇怪，當時一般只不過提到自決而已，還很少有人提到民族自決，就已經有人承受不住了。過後不久，海外釣魚台運動開始熱鬧起來的時候，釣運當中果然有人站出來批評台灣人自決說法。這位先生說，在台灣遭受民族壓迫的是原住民，而壓迫民族是漢族；壓迫民族沒有自決的權利，既然台灣人是漢族的一部分，所以台灣人自決是不允許的。一路走來，人民、民族和種族幾個不同概念糾纏得甚是辛苦，所為不外是急著要搶先邀功，想要從理論上"打倒反動的台獨路線"。對他來說，人民自決也好，民族自決也好，任何沾有台獨嫌疑的都必須悉數徹底打倒；至於此舉是否有利於法西斯獨裁政權，是否不利於民主運動的發展，大概是無關緊要了。可見，血緣情結是多麼的容易令人感情衝動，到了令人是非不分的程度。有趣的是，這位先生從此開始以台灣民族問題專家自居，二、三十年來仍然民族與種族不分，仍然不改"打倒"初衷。

當斯大林斬釘截鐵地說民族不同於種族的時候，他其實只說對了一半。二十世紀的民族運動，在起源上固然不同於種族運動，但是可能在某些歷史條件下墮落為種族運動。當這種墮落發生的時候，必定會帶來大浩劫。於是，象徵著被壓迫人民革命進步的民族解放運動，竟然給族裔對決和野蠻殺戮的瘋狂浪潮打開閘門。非洲若干國家和巴爾干半島慘事頻繁發生，就是一個例子。而民族運動墮落為種族運動的不幸情事，卻經常發生。二十世紀末所發生的此類災禍，似乎比世紀初還要多，而且傷害程度更大。這可以說是斯大林有失先見之明的地方。

那麼，如果能夠超越民族運動的階段，根本"不問民族"，直接進入階級運動的階段，不是更好嗎？這在歷史發展上恐怕還沒有這個可能，因為如同馬克思所說的，階級鬥爭發生在民族的環境下。這個問題固然很有探討的價值，但是不幸的是，漢人的民族主義早已經墮落成爲漢族種族主義，而這正是我們必須立刻要面對、無論如何也逃避不了的頑強現實。這正是在台灣上空遮蓋天日、不停咻咻怪叫的大幽魂。我們怎麼可以不先來面對這個當頭的迫切問題呢？

在中國民族運動濫觴的十九世紀末，梁啟超所論述的民族主義，已經具有超越種族藩籬的遠見，與章炳麟、孫文等人赤裸裸的血緣漢族民族主義恰成強烈對比。梁所提出的主張，反映了在現代文明社會所常見的，以公民意識爲依歸的民族主義，有人稱之爲公民民族主義，有別於血緣民族主義。對於漢人的民族解放運動而言，他的主張應該是極富正面歷史意義的。但是由於當時中國政治文化程度的限制，反而是較爲

低層次的章、孫種族主張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換言之，中國的民族運動，從很早就開始走上墮落為種族運動的道路。以中國多元種族的環境而言，這是一系列悲劇的開端。

民初五族共和的口號（以及後來中共的民族政策），可以說是對於血緣漢族民族主義的笨拙掩飾和補救，絲毫無法改變漢族民族主義的血緣論本質，無論如何也欺騙不了中國境內的異族。難怪大清朝一瓦解，蒙古等族紛紛獨立求去。將近百年後的今日，他們仍然要獨立求去。今日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即使僑居異國多年，對於國民黨所設置的蒙藏委員會咬牙切齒、深惡痛絕，對於目前直接統治他們的中國更不用說了。在新疆，武裝民族反抗已經進行有年了。若要怪罪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和"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恐怕應該先反省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的不是。不幸的是，天下間的種族主義者都是先天性缺乏反省能力，因為種族主義是不受理性約束的，甚至於是反理性的。

漢族民族運動的理論基礎縱有百般嚴重缺陷，但是這個運動曾經是世界性民族解放運動大浪潮的一個重要環節，具有民族解放運動在上升時期的活力和銳氣，在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中表現優越。而此項光輝的成就，恰足以使得漢人忽略了漢族民族主義早已開始滑向種族主義的墮落傾向，甚至於反而把墮落當做康健進步而沾沾自喜。過去的民族苦難和屈辱，並沒有使得這個民族普遍學會謙沖剛毅，反而成為當今眾多漢族種族主義者趾高氣揚、霸道自大的冠冕堂皇理由。得來不易的民族解放運動大勝利，反而剝奪了這個民族的理智自省能力，無寧是一大諷刺。在這整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看不到具有憂世先見之明的漢人政治思想家，敢於提出警告。不但如此，大部分漢人知識分子竟然成了相當狂熱的漢族種族主義者，跟著愚夫愚婦把炎黃當做自己的血親祖宗膜拜，自以為正義凜然，還要相當粗暴地強迫他人膜拜如儀。

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在許多情況下其實根本等同於仇外的漢族種族主義）使得中國境內民族問題越來越嚴重。這本身固然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它首先從許多方面扭曲了漢族人民的精神面貌，腐蝕了漢族人民的道義勇氣和政治識辨思考能力，模糊了漢族工人階級的階級觀念和階級使命感。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多元認知和寬容尊重精神，立受重創。一個文明民族之所以偉大的條件，因之凋零；民族靈魂庸俗不堪，甚至於變得嗜血暴戾，把戰爭殺戮當做兒戲，輕率地要動用飛機大炮"教訓"鄰國，以為自己有本領擺出武力威脅的姿態是一件很體面的事。

無論在世界的那一個角落，心智被這種民族主義所挾持和窒息的人們，不會明白公民意識和民間社會為何物，因此很容易成為政治威權下的順民、血緣論激情煽動下的暴民。種族主義一旦泛濫成災，往往導致一個社會的思想貧血、理智短缺。接受種

族主義精神洗禮的工人們，當然更不容易培養出寬闊胸襟和容忍雅量，學會以尊重的態度平等對待不同民族認同的階級兄弟，從而贏得他們的信賴。擺脫不了種族主義束縛，表示工人階級沒有指望擺脫愚昧偏見，當然也沒有能力掌握自己獨立的世界觀。

在台灣上空盤旋不去、不停地呼風喚雨的最強勢幽靈，正是漢族民族主義幽靈。在台灣工人階級當中造成最大思想誤導，嚴重麻痺工人的階級意識，給整個台灣社會帶來最大精神污染的，也是漢族民族主義的教條理念。是這個大幽靈在矇蔽著海峽兩岸工人階級的心智，在製造不同民族和族群的工人階級間的分歧。它不但是台灣工人階級的敵人，也是中國各民族工人階級的共同敵人。

有些以左翼自居的人士，似乎不願意睜開眼睛正面對待這個事實。他們寧願袖手旁觀，聽任漢族民族主義者繼續猖狂囂張、胡作非為，從來不曾想到工人們(以及他們自己)應該抗拒和拋棄那些在內涵上藏污納垢的狹隘漢族民族主義思想。他們不但不以為自己有責任站起來批判時代錯誤的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而且先急於要求台灣的工人們"不問民族"。這種作法無異於默許和迎合強勢者的霸道，聽任工人階級認命地繼續成為漢族民族主義的精神俘虜。看起來，這不像是左翼的工人階級思想建設方案，反倒像是漢族民族主義者放置在工人階級陣營裡的木馬計。

左翼人士既然有意除去民族意識的不良影響、提升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不是更應該告誡(而不是故意隱瞞)工人們有關狹隘漢族民族主義是如何墮落和如何誤導工人階級的事實嗎？這不是最好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教育嗎？怎麼可以"不問民族"呢？

(3)

漢族民族主義既然如此不堪，難道台灣民族主義就值得倡導嗎？難道台灣左派應該容忍台灣資產階級濫用台灣民族主義來欺騙台灣工人階級嗎？

如果能夠把問題提得這麼簡單，答案當然得來全不費工夫。只是，如此的問法脫離現實太遠了，唾手可得的答案也毫無意義可言。因為，半個世紀以來的台灣民族認同問題，不可能孤立於漢族民族主義現象來看待。不能夠先行客觀看待漢族民族主義問題，當然不可能客觀看待台灣民族認同的問題。這恰是當前若干台灣左翼人士一個致命的思想盲點。這個盲點隱藏著蠢蠢欲動的血緣民族情結，隨時可以把一個左翼人轉變成為一個民族主義者。若是有意稍微拉近與現實的距離，我們或許可以來思考一下這樣的問題：當漢族民族認同與台灣民族認同之間的矛盾對立越來越嚴重的時候，台灣的左翼如何是好？

真會有這樣的矛盾對立嗎？也許有些左翼人士會問。事實上，左翼陣營裏的確有人以為民族主義全是資產階級的玩意，資產階級內部若有無比嚴重的矛盾對立，工人

階級大可置身度外。若是單純地要把民族運動當做是反動資產階級的專利品看待，把民族認同觀念等同於資產階級理念，當然大有可議。這樣的簡略化約，一再衍生不少誤解，很容易給那些後進的左翼運動帶來相當大的困擾。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過，迫切的問題是，既然"不問民族"，工人階級就不可能夠在民族議題上有自己的立場。若是自己沒有立場，工人群眾當然不可能在此議題上團結一致，拒絕聽任其他階級各派的使喚。結果，缺乏定見的工人們，必定依違在不同民族認同之間，各自去爲自己所認同的民族效命，不由自主地淪爲他人的政爭籌碼或者戰爭炮灰。雖然很有可能發生的是，漢族民族主義霸權文化的影響至少短期內保持優勢地位。也許這是某些人"不問民族"的內心冀望。但是，工人階級內部的分裂和進一步分裂，因此無可避免。如果以上所說的矛盾對立越是尖銳嚴重起來，工人階級的內部分裂也會越加尖銳嚴重起來。個中道理應該是很清楚的。如此說來，要求工人們不過問民族問題，能夠說是明智之舉嗎？

有些左翼人士聲明不問民族，本身就沒有民族立場嗎？其實不然。

他們之中(並非全部，但也絕對不是少數)主張不要過問民族問題的人們，其實是用一種相當露骨的偏袒態度在對待以上提到的這兩種民族認同。一方面，他們幾乎從來不曾真正以批評性態度公開揭露漢族民族主義的墮落陰暗面。不但如此，喜歡公然倡導和謳歌"民族大義"、"炎黃子孫"、"父祖之國"或者"階級祖國"的，大有人在。他們總是把漢族民族認同當做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物看待，絲毫沒有值得懷疑之處，甚至於是神聖不可侵犯。"不問民族"，往往是不肯直接或者間接批判漢族民族主義的護短遁詞。另一方面，他們則是用一種極端痛恨的態度，苛責那個從反抗國民黨壓迫的運動中產生出來的台灣民族認同，仍然習慣性援用國民黨的咒罵言詞，而且也添加了不少頗有創意的刻薄言詞，好像越是刻薄越足以突顯左翼的色彩似的。他們口頭上說是要"不問民族"，實際上卻從來不放過任何可以指桑罵槐的機會，重手撻伐漢族民族主義的對立體 -- 台灣民族認同概念。他們其實是通過苛責和蔑視台灣民族概念，來間接達到爲漢族民族主義立場護航的目的。諸如此類的實例不斷發生在我們眼前，很多左翼人習以爲常，安之若素。在倡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國際左翼環境下，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套用一句俄羅斯人的諺語：刮一刮這批左翼人的皮，發現一群漢族民族主義者。

這說明，連有些左翼人士也不易逃避霸權文化的薰陶，以自己附庸於強勢霸權文化而自命高人一等。心靈受制於血緣論的民族主義者，若要從濃不可化的血緣情結跳出來平實地研討民族問題，幾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他們可以二、三十年不改其志，萬變不離其宗。他們不停地要求工人階級不要過問民族問題，可是自己卻口是心非，

無論如何也割捨不斷自己身上漢族血緣民族認同的尾巴。階級詞彙和嚴厲口氣，成爲他們的護身符。不過，無論如何巧言詭辯，他們靈魂深處的血緣情結，經常激昂沸騰，終究是壓抑不住和掩飾不了的。

顯而易見，台灣左翼須要徹底去除漢族種族主義者的偽裝、偽善，以及強勢霸權文化的詐騙，把左翼人的民族討論回歸到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展望。若是不能夠首先具體做到“去漢族種族主義化”，“不問民族”的主張就不能夠說是適當的，甚至於可以說是極不適當的。

(4)

批評了漢族民族主義，豈不是縱任右派的台灣民族運動氣焰高漲？驅走一個民族主義幽靈，喚出另一個民族主義幽靈，這不是徒勞無功嗎？

以台灣左翼當前的境況而言，問題總是會這樣提出來的。如此提法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一丘之貉。不過，現實世界並非如此。

漢族民族認同和台灣民族認同之間有極大的差異，不宜視爲同類事物。至少，台灣民族運動從開始就相當成功地擺脫了血緣論色彩，在內容上比較接近一般常見於現代文明社會的民族認同。也許是由於其非血緣論色彩的緣故，使得那些常年吸食血緣論上癮的人們無論如何都拒絕理解，也十分惱怒。這兩種民族認同，雖然都產生在壓迫與反抗的歷史環境下，可是發展到後來，在政治思考方向截然不同，對於台灣社會未來的影響也不可同日而語。其中涉及民間社會在民主紀元裡得以興盛的具體條件。左翼運動者若是有意適當評估數十年來台灣的政治發展經過，有志於向舊社會以及舊政治體制挑戰，著眼於建構嶄新社會的上層建築，應該可以覺查出其中的天大差異。

所有的漢族民族主義者（包括有些台灣左翼人士）都喜歡說，台灣民族運動是美日帝國主義的傀儡，是反華勢力的前鋒。因爲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夠明白，他們所篤信的漢族民族主義，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已經演變成爲獨裁政權反民主的思想道具，一個足以引起強烈反抗的醜惡事物。國民黨過去的劣行不說，連近年來中國一再的文攻武嚇，不都是奉漢族民族主義之名嗎？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正是這種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這個運動是一個政治反抗運動，一個民主運動，具有新興事物的若干特質。而更具有深遠意義的是，這個運動是漢族民族主義培植自己掘墓人的一個歷史辯證發展，象徵著漢人對於漢族民族主義批判和重新評估的歷史性機會。迄今爲止，最有可能顛覆漢族民族主義理念的，竟然是血緣同樣屬於廣義漢族卻又不肯認同於漢族血緣民族主義的台灣人！漢族民族主義的罪行，需要漢人自己揭露。這才是這個運動最重要的性質。它的生命力的泉源，也盡在於此。對於台灣社會（以及中國社會）未來的走向，這個因素的頑強影響力非同小可。怎麼可以閉眼“不問”！把那些自己所不了

解的，或者自己感情（漢族種族主義血緣情結？）所無法接受的事物，全都歸咎於帝國主義，就以爲事情自會平息消失，這不是太過於疏懶了嗎？

不過現在沒有必要詳細討論這個問題，也沒有必要在此論證何者較爲優越。因爲，台灣左翼並不是要二者取一。儘管如此，來日這不無可能成爲一個熱烈討論的議題。因爲，這個議題很可能會成爲檢驗台灣左翼人士是否藏有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尾巴的試金石。要知道，這個思想尾巴，是當前許多左翼人士最大的思想包袱，也是台灣左翼運動最大的政治包袱。在很多方面而言，台灣左翼運動是不是會有出息，端看是否能夠擯棄這個令天下馬克思主義者都會搖頭嘆息的血緣民族觀了。不過，這或許還不是當前要務。

台灣左派雖然有百般的理由要正面對待民族問題，甚至於有雄心要在此問題上領導台灣社會從事新思考，但是沒有理由要成爲民族主義者，無論是血緣民族主義者或者公民民族主義者。左翼人的眼界，應該遠遠超越這兩個民族認同所涵蓋的範圍，因爲台灣工人階級應該擔負起一項重要的歷史性任務。那就是幫助台灣人民，以及中國的漢族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人民，真正擺脫狹隘民族主義的精神束縛，走進政治文化的一個新領域。（政治文化領域的議題涉及範圍甚廣，不是本文篇幅所允許，當另外討論。本文未詳加討論，並不表示這個議題不重要。相反的，這個議題的重要性一向被忽略，正足以反映台灣左翼思想視野的嚴重缺陷。希望左翼朋友能夠正視這個議題。）

要達成這項任務，除了上面所述的"不問民族"的主張之外，也有些台灣左翼人士以爲應該從徹底批判台灣民族認同觀念著手。這都是不可行的。

"不問民族"，其實不是置身度外，其實等同於認可和縱容那些數十年來一向都是飛揚跋扈的漢族民族主義者。這當然不足取，上文已經論及。左翼有意批判台灣民族認同觀念，若幸而引起熱烈反響，勢必成爲另一場以漢族民族主義者爲主體的狂歌亂舞、亢奮發飆，左翼的真正聲音勢必淹沒在這狂熱之中，而那些喜歡以"炎黃子孫"自居的左翼人士，恐怕也要成爲狂熱漢族民族主義者的精神附庸了。二十多年前開始，有些左翼人十分熱衷吹捧那個往日國民黨反共理論家兼漢族民族主義宣傳家的失意政客胡秋原，所成何事？可曾在任何意義上打擊到"反動的台獨路線"了嗎？促成"祖國統一"事業了嗎？看來，情況全然不是如此。喜歡公然去跟那些右派人士勾肩搭背，好像找到了什麼值得推心置腹、心心相印之處，也難怪被人笑話。這個滑稽的相見歡，是有一定思想基礎的。如此這般的漢族民族主義思想基礎，如此這般的民族統一戰線，還是不要的好。要點是，只要漢族民族主義者繼續發飆，台灣民族運動的生命力不但可能枯竭，而且可能越發旺盛。結果，台灣社會不但不會超越民族情

結，而且會愈來愈陷入民族認同的尖銳對立。若想使得台灣工人階級超越民族思考，這當然也是不可行。

凡事還是要回到最根本的地方。

長期以來不斷製造民族矛盾對立的，不是台灣民族運動，而是漢族民族主義。對於台灣工人階級（以及中國的工人階級）階級意識的提升進步，產生最大麻痺作用的，不是台灣民族主義，而是漢族民族主義。在往日的台灣與當前中國，一向都為獨裁威權體制提供最得力掩飾和辯護的，也是漢族民族主義。當前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最是格格不入的，也是漢族民族主義。在在阻礙著台灣社會（以及中國社會）在政治思考上拋開過時舊傳統舊偏見、邁步向前的最大精神束縛，也是漢族民族主義。這是我們不應該視而不見的現實，切莫讓漢族民族主義者提出來的藉口轉移我們的注意。

"去漢族種族主義化"是達成這個任務的開始第一步，關鍵的一步。揭露和徹底批判漢族民族主義的所有負面性質，並且把它當做一個思想運動來努力從事，首先可以幫助不少左翼朋友痛痛快快捐棄血緣論成見，不必成天忙於遮掩身上的漢族種族主義尾巴，坦坦蕩蕩地站出來做一個堂堂正正的左翼人。而最重要的是，只要這個剖析批判的工作不半途而廢，只要做得夠徹底，也一定能夠對於漢族民族主義的對立體--台灣民族主義--產生莫大的衝激。因為，對於漢族民族主義的深刻批判，其實是對於所有民族主義的深刻批判。經過深度十足的思想鬥爭，台灣民族主義能夠不脫胎換骨嗎？這是超越民族思考的先決條件，台灣左派的當前任務。

我們寧願看到，發起和達成這項任務的是台灣左派，而不是台灣右派。在此批判漢族民族主義過程中，台灣左派應該爭取各階級人士積極參與，尤其不可缺少台灣民族主義者。當批判工作成功告一段落的時候，被拋棄的將是所有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結。

左派朋友們，膽敢做此文化大革命的梦想嗎？



青春睿智卡維波？

林深靖

塑身美容業龍頭大老闆黃河南最近密集強打的一則「最佳女主角」廣告，引起了若干風波（豐波？）。14歲小少女王瞳的軀體，在電視裡被爭睹，在報紙上被爭議。

「做身體」就是「做自己」？

針對《中國時報》上一篇題為〈還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的批判文章，文化評論名家卡維波做了文章批判，標題是針鋒相對的：〈老化的媒體批評·弱智的女性主義〉（見《南方》電子報2000年12月22日）。

卡維波指責他的批判對象是「以成人老化的立場來看待青少年的新興現象」，這種老化的立場，以保護兒童、強調格調高雅低俗為名，形成媒體監督的言論霸權。至於那些控訴剝削女體，覆誦物化、偷窺等咒語式修辭來解釋性開放的，則是「女性主義思想的弱智化」。

於是，不能不期待於卡維波展示給我們青春的媒體批評以及睿智的女性主義。

卡維波是這樣說的：

透過塑身減肥美容、表現性感等來「做身體」，其實就是「做自己」的一部份，而「做自己」則是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化（individualization）趨勢。這個不可阻擋的趨勢並不來自塑身廣告的洗腦，而是現代性的大趨勢使然，使得人越來越早在自己的生涯史中開始做自己，而越來越早出現的自主性已變成社會生存的一種必要。故而，國中生甚至國小生開始性感身體的自覺也就不足為奇了；風潮所至，連男性也不能再自外於身體性感的開發。

進入塑身減肥美容中心去「做身體」，也就是「做自己」，並從而找到社會生存所必要的「自主性」。這就是卡維波的青春論述？不禁讓人想起2000年總統大選甫結束之際，「最佳女主角」主打的一個廣告口號：「阿扁實現台灣夢想，最佳女主角完成女人的願望」。什麼是台灣的夢想？在民進黨的經典語言裡，無非就是「當家做主」！廣告與政治有一個共同的特質，那就是訴諸「認同」（identity），因此，也都需要塑造「偶像」，以方便消費者或選民的認同有一個具體的投射對象，透過偶像的移情作用，對商品、候選人產生購買或投票的慾望與衝動。

台灣土產的日本偶像明星

然而，偶像的塑造永遠是一個非常昂貴而複雜的過程。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最佳女主角」老闆黃河南準備要花5億元「打造王瞳」，目標是將王瞳開發成「台灣的深田恭子」。王瞳經過大老闆的大手筆投資，報上的說法是：「塑身後的她，腿細、皮白、更有波」。不過，少女王瞳經過最專業、最細膩的「做身體」，目標似乎並不是像卡維波所說的要「做自己」，而是變成一個台灣土產的日本偶像明星。

黃河南可以用金脂銀粉堆砌出一個「天真無邪」的美體少女；同樣的，航業大亨張榮發也可以花5億元打造出一個以「清寒貧苦」為形象的政治明星。「人」既然可以是投資的對象，最後當然是以創造利潤為目標。張榮發成功地將阿扁送進總統府之後，雖然「當家做主」的台灣選民依然沒有在長榮集團裡組織工會的權力，張大老闆的人馬卻很快就從國安會、外交部、交通部等重要部會都佔到了位置。王瞳才14歲，開發利潤的週期甚長，精打細算的黃大老闆已與這個向前走的小女生訂下「七年發展計劃」，塑身打造完成，很快可以投產營收。

卡維波說，「為什麼今日的青少年會比過去更要求身體與性的自主？這是因為消費文化召喚青少年成為消費主體，個人化的商品也鼓勵青少年『做自己』，這大大強化了青少年的自主慾望。」青少年追求自主，要「做自己」，是消費文化的召喚？是透過個人化商品的鼓勵？在卡維波看來，似乎消費文化就像空氣與水一樣，大化流行，滋養了青少年的青春活力。然而，為了購買一個布娃娃 Kitty 貓，一長龍子青少年在麥當勞門口漏夜排隊，這是自主的慾望？為了擁有一個「個性化」手機，到24小時便利商店出賣廉價時間和勞力，這是「做自己」？個性化商品一定讓人更有「個性」？

卡維波又說，今日的青少年，「在全球化的傳播網絡內，從新宿或倫敦取得更多做自己和做身體的慾望與符碼，編出一個個和父母與教育制度的規訓相衝突的身體，並且透過這個衝突與爭戰來取得自主。」為什麼青少年爭取「自主」，不是透過個人與生活環境的對話，不是透過生命經驗和生存實踐形成主體的歷史感（historicite），而必須透過「全球化的傳播網絡」，變成放眼新宿的「哈日族」，或是遙望倫敦的「skin-head」？

富貴閒人的專利

好了，現在卡維波又告訴我們，青少年跟王瞳一樣到塑身減肥美容中心「做身體」，是追求「做自己」的一種表徵。卡維波似乎認為，到黃河南的豪華名店，就跟青少年到麥當勞買個漢堡，喝杯可樂一樣稀鬆平常！塑身減肥美容中心也許不完全是富貴閒人的專利，卻也不是一般人輕易踏得進去！要是依據卡維波的說法，青少年當

中，公子哥兒和富家公主肯定是能「做」更多的身體，因此，也能「做」更多的自己。至於一般靠打工賺零用的小伙子小姑娘，要跟王瞳美眉一樣嘗上一次「做身體」的機會，恐怕得在7-11站上好幾個兩週84小時，站壞了身體，站到忘記了自己……

在台灣，的確有活力旺盛的青少年文化，比起青少年文化更厲害的是：討好青少年的文化。豈不見，每逢節慶大典，從政治人物到學校校長、老師，使盡渾身解數，變身作怪，變性作態。一切一切，只為博得青少年的一句「哇塞！」從中學到大學，「愛憲一族」和「小扁帽兵團」可以是同一票人馬！吳宗憲的鳥籠和阿扁的超人裝成爲青少年成長過程中的深沉記憶。

如今，進步知識分子卡維波在文化評論裡扮演了青春歌手，爲消費文化和青少年文化請命，爲青少年的自主和自由揮筆戰鬥。然而，在卡維波的青春論述中，他一再強調的「自主」，似乎是「自戀」的同義詞，在性解放的主張中，liberty 與 libertine，似乎也很難分得清楚。

有時候，是不是也該告訴青少年，王瞳的美麗，背後有大老闆黃河南的算計。可愛的Kitty貓，也許沾有亞洲許多國家童工的血跡。上帝不再創造女人，但是資本家可以。Kitty貓沒有嘴巴，因爲童工們在血汗工廠裡規定不能說話……

情慾論述作為一種運動策略

關於女性主義方面，卡維波指出：「女人不能直視自己身體，或少女以身體發育爲恥，正是過去女性被壓抑的狀態。近年來的女性情慾解放與身體風潮終於使一部份女人改變了自己與身體的壓抑關係，美容塑身事業不過是這個風潮的一部份。」他說，「被美容塑身業所召喚的女人，她們所慾求的身體並不是什麼青春的身體，而是情慾與性感的身體。」

相對於那些被卡維波批評爲動輒以物化、偷窺等「覆誦咒語式的女性主義修辭」來談性開放問題的「弱智化」的女性主義思想，卡維波的智慧表現爲將有關美容塑身業廣告的討論迅速以「情慾論述」的盔甲武裝起來。卡維波及其愛人何春蕤曾經以《豪爽女人》一書衝決禁忌，不僅在影視文化娛樂圈掀起討論女性情慾的風潮，也讓許久不曾亢奮過的知識界因此達到了高潮。

正因爲何春蕤一再強調她的情慾論述是運動策略的一部分，認定「情慾自主」等於「性解放」，「情慾革命」也就是「社會革命」，因此對於來自左翼的質疑特別敏感。何春蕤在論戰結集的序文中說：「西方婦運在起步時，曾經被階級化約論的左派所打壓，故而婦運應當更能體認化約論的僵化，應當更容易體認性（和性別一樣）是一個有自主邏輯運作的領域。可惜的是，有階級化約論傾向的左派人士至今仍缺乏這些起碼的認識……以左派自居的人對豪爽女人的質疑，歸根究底就是想要問：情慾解放的物質基礎是什麼？從何證明情慾解放可以造成更根本的社會生產關係革命？」在

結論時，這位卡維波的愛人同志又說：「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情慾批判至少要展現一些歷史的眼界，而不是偷懶的用最簡化的教條來做無歷史眼界的籠統批判。」

卡維波將以《豪爽女人》為基地的情慾論述突兀地架接到有關一則消費廣告的爭議，無非是冀望藉此取得弱勢者抗爭的政治正確性，同時，以此為盔甲，防堵來自同屬左翼陣營的質問（上述「化約論」或「教條」的指控，既是絆倒左翼的陷阱，也是消解馬克思主義論述的利器。）

然而，何春蕤的《豪爽女人》尙且作為一種「運動策略」而展開，卡維波對一則文化工業消費廣告的護衛，又是出於什麼樣的策略呢？黃河南老闆的塑身美容產業，以美少女軀體為賣點的鏡頭，究竟有什麼進步的意義？

「追求平等」與「尊重差異」

女權運動的發展，迄今大致可劃分為兩個主要的面向：「追求平等」與「尊重差異」。「追求平等」意味著將女性從傳統秩序中作為「物體」（只在男人的眼中存在，也就是男人的「本質」決定女人的「存在」）的地位解放出來，成為「主體」（可以自主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決定自己的婚姻、工作、信仰、政治傾向……，也就是女性的「存在」足以決定人類社會關係的「本質」。）

「尊重差異」則是意識到「性別」並不是天生的，而是文化建構的結果，不突破既定的文化建構，就無從解除父權體制的壓迫和宰制。「女人」（feminine）是相對於男人的生物差異，是不變的；「女性」（femininity）則是一種文化建構，是可以調整，可以改變，可以創造的。因此，女性主義的發展，不僅在於追求與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權利，更在於建構女性自主的身分認同，凸顯女性特質，甚至顛覆既有的人類文化（男性文化！），開發女性觀點的歷史、哲學，創造女性主體的世界（有別於男人上帝的創世紀！）

黃河南老闆透過文化工業強勢推銷的塑身美容產業，放在當今台灣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脈絡中，當然不足為奇。然而，資本家可以如此推「波」，自許為進步的知識分子卻不宜如此助「焚」。女權運動的發展，從批判以男女性別差異為基礎的勞力分工，到檢索、剔除女人意識形成過程中父權與男性資本家介入的軌跡，都是一個非常艱辛而漫長的過程。卡維波若是自認為站在弱勢者、被壓迫者的一方，就不應該輕易將女性主義者「追求平等」與「尊重差異」的努力，輕易遺忘在現代消費文化的頌歌裡。

在1968年的解放風潮中，美國女性主義者曾經為一隻母綿羊戴上后冠，以嘲諷「美國小姐」的選舉。法國女性主義者曾在凱旋門下的無名英雄紀念碑旁，隆重地將花束獻給「無名英雄的妻子」。2000年，台灣女性主義者何春蕤的愛人同志卡維波將一篇文章獻給了塑身美容業者。

選美比賽之所以受到進步女性的批判，正因為其中有太多父權和男性資本家運作的軌跡，女人的軀體在比賽中（在男人眼中）被三圍化、被規格化，異化為如同生產線上可以被篩檢的商品。依據卡維波的用詞，也就是擇優去劣，塑造「情慾與性感的身體」。法國的女性主義者則在提醒我們，暴力無形，英雄無名，在英雄的背後，埋葬著更多被犧牲又被遺忘的女性。而在當今的台灣社會，文化工業的暴力與暴利，導致「腿細、皮白、更有波」成爲男性讚許、女性自我期許的價值觀。女性在惹人垂涎或垂憐的慾望中，遺忘了自己。

誘惑與慾望的力量

我不否認，誘惑和慾望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力量。早在19世紀末，發展女性觀點報導，創造女性新聞王國，爭取女權不遺餘力的法國女性主義者瑪格麗特·杜杭（Marguerite Durand）就說過：「沒有人知道，女性主義該多麼感謝我的金髮！」然而，我們應該分辨，這種誘惑和慾望，有多少是出於女性的自主與自覺。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承認「性」是社會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那麼，我們應該分辨率「性」與任「性」的區別。所謂率「性」者，是以自我爲主體，率領、導引進入「性」的領域。所謂任「性」者，就是以「性」掛帥，以「性」爲主導，隨「性」所至，也就是laissez-faire，相當於經濟學上的自由放任主義，資本橫行，弱肉強食，在此原則下，性暴力、性交易、性壓迫、性騷擾、性產業……都可以找到合理化的基礎。

卡維波一再強調在塑身減肥美容的風潮下，「做身體」也就是「做自己」；強調女性透過塑身產業塑造「情慾與性感的身體」是「實現自我」的途徑。卻完全忽略了這種將人的軀體「規格化」的塑身文化，這麼龐大的消費需求，究竟有多少是出於女性的自主，有多少是出自父權文化的建構，是男性資本家因追求利潤而介入操縱？過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透過裹小腳而創造「情慾與性感的身體」的文化，在北非某些部落，迄今仍有割除女性陰核以創造符合父權標準的軀體的文化。這些可憐的女性，她們同樣被要求「做身體」，卻何嘗做得了自己？

卡維波的情慾論述雖然一再強調青少年與女性的「自主」欲求，大部分的時候，卻是把任「性」當作率「性」。任「性」者所發展出來的是「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自戀與自大，完全剝除了社會關係的脈絡。這樣的人格最符合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資本主義市場邏輯，一切以追求利潤爲中心：利潤之所在，也就是道德之所在。

這是我的左翼觀點。我等待卡維波「化約論」與「教條」的指控。

★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上〉

鄭國棟

「以有限的知識做籠統的表達，是長期存在於台灣知識份子中的惡習。…最基本的黑格爾、馬克思經典，他也不甚了然。」——陳芳明，《書評不是這樣寫的》（1992年5月）

「近兩三年來，許多大學生、文學家和其他沒落的青年資產者紛紛湧入黨內。…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倣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卻是跳蚤。”——恩格斯：致保·拉法格（1890年8月27日）

馬克思主義探討了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廣義的歷史科學，幾乎涵蓋了所有與人有關的知識。用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阿圖塞(L. Althusser)的話來說，馬克思繼希臘人開拓數學大陸、伽利略開拓物理學大陸之後，「以驚人的發現為科學知識和人的自覺實踐開闢了一個新大陸，歷史的大陸(the Continent of History)」(Althusser 1971: 99)。自馬克思開闢了這個歷史的新大陸之後，馬克思主義成了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無可迴避的理論體系，而歷史研究亦然。著名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福科(M. Foucault)的這段話可為佐證：「如今，撰寫歷史而不使用直接或間接與馬克思的思想相聯系的一整套概念並且置身於馬克思所界定與描述的思想領域內那是不可能的事。人們甚至可以自問，做一個歷史學者與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究竟有什麼區別。」(Foucault 1980: 53)

不過，自馬克思主義問世，一百多年來，即不斷遭到誤解、曲解與誤用、濫用。由於馬克思主義最深刻徹底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罪惡，揭示了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的必然性，並號召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結束人類社會的私有制，資產階級及其御用學者在驚恐不安之餘，或出於淺陋無知或出於刻意淆亂，曲解馬克思主義不遺餘力，固不待言。就連諸多傾心於馬克主義的深邃宏旨與崇高的道德正義感，而自命為

馬克思主義者的知識份子也常不免於誤解、誤用馬克思主義。這除了階級根源的因素外，還由於馬克思主義的體大思精，包含了複雜深奧的哲學與社會種學理論，非經艱苦的鑽研探索，無法掌握其精義要旨。雖然馬克思曾明白告誡：「在歷史科學中，專靠一些公式是辦不了什麼事的。」恩格斯也一再警告，歷史唯物主義是研究工作與行動的指南，而不是教條、公式，切忌把唯物史觀當作標籤貼到各種事物上去。然而，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論斷當成套語，一知半解地胡亂套用的現象始終存在，因而浮現了一大批庸俗的、冒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這類被恩格斯痛斥為跳蚤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生前即已有之，不過於今為烈。這明顯地表現在史明及其徒弟徒孫的所謂台獨“左派”身上。

在台灣，要檢驗一個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台灣史知識的水平，一個很好的判準就是看他有沒有能力洞悉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在一堆馬克思主義術語包裝下的主觀唯心論本質，批判其雜湊、曲解台灣歷史材料，絲毫禁不起嚴格史學檢證所編造出來的所謂左派台獨史觀的神話。史明這部理論貧乏、錯誤與矛盾百出的台灣史神話，可以用恩格斯的一段話給予最恰當的論斷：「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末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四卷：472）唯物論的方法要求，根據客觀的證據、材料，運用嚴謹的批判性思考，修正主觀成見中的錯誤認識，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論斷，而不是相反，把材料、證據五花大綁捆在根據主觀的立場、成見製成的刑床上，以電鋸、斧頭動用酷刑，大加砍削，必欲其符合刑床的尺寸而後已。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二版跋中說：「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資本論》，中文版，第一卷：23）。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三卷：74）所謂台獨史觀，不論“左派”或右派，其實都是為台獨的政治目的服務的，沒什麼歷史客觀性可言。西方史學家Tillinghast曾說：「過去遭到每一位歷史學者的強姦，即使那些懷著最高貴的意圖的歷史學者也一樣強暴了過去。」此話雖不無過當之處，但用在史明、王育德身上卻是恰如其分，頗為貼切。台獨史觀正是史明、王育德粗暴地強姦台灣史料後虛構出來的怪胎。

史明的忠實信徒陳芳明十餘年來匍匐在史明虛構的台獨史觀的框框裡，汲汲於塑造所謂台灣左翼史觀，極力抨擊中國學者的研究，全然不符史實，並且也非常違背

學術的紀律。」還大言不慚地宣稱：「要維護台灣史實的正確性，要保存台灣學術的自尊，左翼史的重建顯然無可拖延。」（陳芳明，1998：17）其氣也甚壯，其志也可嘉，只可惜有其志而無其才。台灣歷史在陳芳明這個江湖庸醫手執台獨手術刀肆意切割整形下，變形為一副嘴歪眼斜橫鼻豎眉、面目全非、慘不忍睹的尊容。而不論是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或後殖民主義，任何理論一經過陳芳明那毫無理論思考能力的漿糊財袋的攪和，也無不扭曲走樣，成為荒誕可笑、失去實質內容的空話、廢話。與陳芳明自我標榜的完全相反，在陳芳明筆下台灣歷史的正確性非但沒有得到維護，反而橫遭踐踏，台灣學術的自尊不僅沒有獲得保存，簡直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這樣的批評是否過當？沒有！以下我們先展示陳芳明如何誤解、曲解並且誤用、濫用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概念，再揭穿陳芳明的台灣歷史論述在史實與解釋上的錯謬，以證明上述論斷的確鑿無誤。

1999年8月，陳芳明在《聯合文學》178期上發表了他正在撰寫的《台灣文新學史》第一章〈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這篇文章概述了他的理論觀點與全書要旨。文中自稱根據台灣社會的性質，把台灣新文學史的發展劃分為日據的殖民時期（1921 - 1945）、戰後國民政府再殖民時期（1945 - 1987）與解嚴後的後殖民時期（1987 - ）。這明顯是把視國民政府為殖民政權的台獨教條與為趕時髦而硬搬來的後殖民理論，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一點也不具備嚴謹的知識內涵。台獨為了便於脫離中國長期高唱台灣民族自決論，乞求美、日帝國主義在聯合國為其撐腰。於是便炮製出台灣是殖民地而國民政府是「失去母國的殖民政權」這類騰笑世界的荒誕不經的論調。陳芳明辯稱「一個社會是不是屬於殖民統治，可以從國語政策的有否實施得到驗證」（陳芳明2000a：161）因為國民政府實施國語政策，於是得出國民政府是殖民政權的幼稚可笑的結論。吃了過多台獨迷幻藥而神智不清的陳芳明忘了，在國語政策下不准說家鄉話（或曰母語）的不只台籍學生，除了極少數的北京人，所有從大陸來台的三十餘省外省學生（包括新疆、蒙古的少數民族）都不准不說北京國語，如有犯禁者照樣處分、罰款。照陳芳明的邏輯，在台灣的非北京籍外省人子弟，包括浙江籍的蔣介石家族的子弟都被迫不得在學校說母語，因而也都被國民政府殖民了？！事實上，實行國語政策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一個要件，除了少數特殊的例外，這已是國際常態，差別只在實施的手段有異而已。這裡先引一段話供陳芳明欣賞：「語言的問題，是會規定民族與其成員的思考形式和世界觀，並關連到民族發展的基本問題。所以，儘早實現能合乎獨自的生活與文化之統一語言，可說是台灣人今後的重要任務之一。」說這話的是誰？不是別人，就是陳芳明的啓蒙導師史明（引文見黃昭堂〈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收於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210頁，台北：前衛，1994）看吧！偉大的台獨左派導師史明也要求台灣要有「統一語言」，

照陳芳明的邏輯，史明顯然也想殖民台灣了。陳芳明還舉了壟斷式金融資本、監視型的戶籍制度、強制性的民族教育做爲國民政府是殖民政權的依據，徒見其淺陋。我們只要問德、意、日法西斯政權以及其他國家的獨裁政權，只要力所能及，那個不實施類似的制度？準此以論，它們也都對本國人民“殖民”了？這種論調根本把有著明確內容的社會科學概念，搞成了毫無意義的廢話！

正因陳芳明的文章中充斥著諸多違背社會科學知識甚至常識的荒唐觀點，遂引起陳映真的批判，雙方交戰了數個回合，從論戰的內容來看，雖則戰火熾烈，硝煙四起，卻缺乏實際的交集。主要的原因是，陳芳明雖然自稱：「接觸左翼思想後，我不再迷信史料高於一切，而漸漸注意到史料背後所暗示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結構。我開始警覺到，歷史上的政治事件往往可以聯繫到經濟性質與階級因素。這樣的思考，爲我的知識訓練帶來新的紀律。」（陳芳明，1998a：7），但正如本文起首所引錄的陳芳明自己的話：「最基本的黑格爾、馬克思經典，他也不甚了然」。從他的思維方式上看，他是既不唯物，也不辯証的。對唯物論與辯証法他連最起碼的知識也沒有，因而對歷史唯物論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對此下文會進一步詳論）。於是，當陳映真指責他不從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也就是不從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著眼，依據台灣社會形態的性質做爲台灣新文學史分期的標準，並據以分析台灣文學的內涵時，陳芳明竟然不知陳映真意何所指，可笑地批評陳映真只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而不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轉而胡攪瞎纏在「何謂殖民地社會」的問題上。這種對話頗類陳映真提出微積分的演算問題，而陳芳明卻拿加減乘除的算術以對，根本不是同一個層次的爭論。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誰不知道什麼叫殖民地？又有誰不知道台灣在日據時期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社會？關鍵是：這個殖民地社會的「生產方式」是什麼？它的社會生產關係是什麼？也就是它的經濟與階級結構是什麼？在這樣的社會經濟結構中，他的政治鬥爭與意識形態（包括文學的表現）呈現出什麼樣的形式？問題的核心在這裏。然而，陳芳明根本慮不及此，任憑陳映真狠敲猛打，他那冥頑不靈、愚鈍不堪的漿糊腦袋依舊昏昏然、懵懵然，非唯未稍見清醒，仍強不知以爲知，耍弄輕佻的痞子腔，曲意迴護他那主觀唯心的台獨史觀，還幼稚地反問：「我正在撰寫的《台灣新文學史》，並不是在探討台灣社會性質的演變史，也不是在追問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史。爲什麼進行文學史的回顧，必須字字句句唯“馬”首是瞻？」（陳芳明，2000a：158）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阿圖塞批評五、六十年代法國學院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話：「在學院裏，特別是歷史學者、經濟學者，以及大批各式各樣學科的意識形態家（眾所周知，今天的人文科學界每個人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然而，這些知識份子腦袋裏的馬克思主義觀念十有九成都是錯誤的。」（Althusser, 1971：79）

在遭到陳映真連番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痛加批判後，理屈詞窮之餘，陳芳明拋出了〈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聯合文學》，192期）抨擊陳映真依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名言：「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來討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是「死死抱住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甚至指稱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是經濟決定論、機械反映論，早經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進行革命性的修整與擴充」，而陳映真猶奉為信條，是遠遠落後於時代的「歷史的孤兒」、「歷史的棄兒」。然後自鳴得意地說，「人們的意識也能決定社會的存在」。陳芳明對馬克思主義（不論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或是新馬克思主義）的淺薄無知與主觀唯心論的本質，在這篇文章中徹底暴露無遺。他對陳映真的指控實在太“精彩”了，爲了和大家「疑義相與析，奇文共欣賞」，以下大幅引用陳芳明的原文以令其自暴其醜：

當年，我也迷信過陳映真在現階段所奉為神明的陳腔濫調語言：「不同的生產方式，因其相應的、不同的社會生產關係，形成不同的經濟基礎，從而有相應的、不同的上層建築，也就是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意識形態體系。」這種教條的、僵化的思考方式，早已偏離了唯物的軌道，而帶有濃厚的唯心傾向。陳映真照搬這些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無怪乎他回到中國去演講時，被他筆下形容的「我國」的大學生譏諷為「比老幹部還老幹部」。

……………這裏可能是有一些不禮貌，但又不能不提的一個問題，試問陳映真的意識形態是由怎樣的「社會存在」來決定？又是由怎樣的「生產方式」來形成？他的馬克思主義思考，究竟是由現階段的中國生產方式來決定，還是由台灣的生產方式來決定？如果是由前者決定，為什麼中國大學生會說他是「老幹部」；如果是由後者決定，為什麼台灣大學生會稱他是「黃昏老人」？

台灣統派語言的疲態，極其精確而典型地由陳映真表現出來。他的思考方式，不僅悖離了當今的中國社會，同時也與當前的台灣社會全然脫節。陳映真的左派語言，恰恰與他引用的馬克思「社會存在論」與「生產方式論」，發生了可笑的矛盾衝突。他雖然是自稱為唯物論者，他的思想內容在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卻是找不到相應的經濟基礎。包括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在內，北京城裏已經找不到真正的、唯物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他們不僅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而且還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恬然向台灣的資本家招手討好。陳映真口口聲聲的「我國社會科學界」，早已整編到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之中。他們的思考才是真正唯物的，真正由中國社會的存在所決定。這樣看來，在北京的整個中國社會科學院裏，恐怕只剩下陳映真是一個不折不扣

的歷史孤兒，一個徹底唯心的偽唯物論者。對於他的尷尬處境，我不能不寄以「一種令人同情的哀痛」。

為什麼說他是一位歷史的孤兒？理由至為明顯，正統馬克思主義已經是一個歷史名詞。那樣規規矩矩地背誦馬克思主義的信條，在中國社會，甚至放言世界的左派思考中，已經不再存在陳映真式的模範信徒。不要說陳映真文中提到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即使是稍早的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及其法蘭克福學派，以及更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對庸俗的、機械反映論的老馬進行了革命性的修正與擴充。人類歷史已經跨越了二十世紀末，陳映真的思考卻仍選擇停留在十九世紀末。珍惜這種世紀末的世紀末思維的陳映真，可能不只是歷史的孤兒，恐怕還是歷史的棄兒。

.....

他死死抱住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只不過為了證明他的左派精神之不滅。這裏不厭其煩地說明陳映真之變成歷史孤兒，乃是為了指出他再三強調「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並不是甚麼科學知識態度。他頑強的拒絕面對客觀現實，而自囚於他馬克思主義的空中閣樓之中，恰恰證明了人們的意識是可以決定社會存在的。這裏揭露他的思考與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發生嚴重的脫節，並非是在拆穿他的洋相；恰恰相反，通過這樣的說明，乃在於協助陳映真釐清他自己的思考方式。我樂於協助他，只不過是要提醒陳映真，馬克思的名言並沒有那麼神聖而偉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不同的生產方式會形成相應的、不同的上層建築。但是，也有許多具體的證據足以說明，人們的意識也能決定社會的存在。陳映真的思考方式，便是極其科學的證明這個命題是可以成立的。我與陳映真之間的對話，在思考方式上足足相差了一百年。不過，遙望著十九世紀末期的陳映真，我仍然願意耐心地與他討論台灣文學的問題。這位可敬可畏的馬克思老爺，誠然需要一些協助。

.....在他的經濟決定論裏，並沒有看到人的主體之存在，並沒有看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滲透的事實，更看不到人的心理結構，以及人本身就是自己的歷史之創造者。

看完陳芳明這一大段洋洋自得、自命先進、意氣高昂的妙文，只要稍微認真研讀過歷史唯物論的人鮮有不忍不住噴飯的。是誰的思考還停留在十九世紀末呢？恰恰就是陳芳明自己。陳芳明根本不知道他所謂的馬克思是經濟決定論與機械反映論，把經濟看成唯一的決定性因素，沒有注意到包括意識形態因素在內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些論調非但了無新意，而且通通是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早已出爐的陳舊不

堪的破爛貨。陳芳明恬不知恥地表示樂於「協助陳映真釐清他自己的思考方式」，我看，還是讓我們來幫助他清理清理他那雜草叢生、堆滿陳年垃圾的腦袋瓜子吧！

十九世紀的九〇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勢力茁壯，馬克思主義也日益風行，成了時髦的理論。大批大學生、文學家加入社會民主黨，把歷史唯物論當成公式、套語，庸俗化為唯經濟決定論，自我標榜為“馬克思主義者”，在報紙、雜誌上大唱革命的高調，因而引起恩格斯的不滿，本文起首引錄的恩格斯話語，即起因於此。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學者也歪曲唯物史觀，硬說馬克思主張經濟是歷史發展中唯一的決定因素。例如：1890年，德國資產階級哲學家保爾·巴爾特(Ernest Emile Paul Barth 1858-1922)在他為申請萊比錫大學的教授職位而寫的《黑格爾和包括馬克思及哈特曼在內的黑格爾派的歷史哲學》中，就用了二十頁的篇幅駁斥唯物史觀。巴爾特曲解馬克思的理論為唯經濟決定論，他雖然承認經濟在個別情況下起決定作用，但思想、政治等因素在其他情況下也同樣決定社會的發展，而政治、法律、宗教、哲學有其本身的發展規律，並不完全遵循經濟基礎決定的法則，陳芳明的論調與此類似，但還沒有巴爾特全面。

針對黨內外對唯物史觀的曲解與濫用，恩格斯對歷史唯物論做了一系列深刻的闡述。釐清了諸多混亂的觀點。對於黨內亂套唯物史觀公式的“青年派”，恩格斯指責說：「對德國的許多青年作家來說，“唯物主義的“這個詞只是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籤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就以爲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們的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方法。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黑體字為筆者所標示），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在依附於黨的青年文學家中間，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鑽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黑體字為作者所標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75 - 76）對於歪曲歷史唯物論為唯經濟決定論的調論，恩格斯駁斥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裡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

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物，它們的內部聯繫是如此疏遠或者是如此難於確定，以致我們可以忘掉這種聯繫，認為這種聯繫並不存在)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77)對於巴爾特的觀點，恩格斯反駁說：「如果巴爾特認為我們否認經濟運動的政治等等反映對這個運動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簡直是跟風車作鬥爭了…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麼我們又為什麼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鬥爭呢？暴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種經濟力量！……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裡看到原因，在那裡看到結果。……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經濟運動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決定性的)，這裡沒有任何絕對的東西，一切都是相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86 - 87)

以上引述的歷史唯物論要旨其實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然而，陳芳明硬是連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都不具備，停留在十九世末，撿拾早已過時的陳腔爛調，強把“經濟決定論”的帽子栽到馬克思頭上。陳芳明嘲諷陳映真只讀了《馬恩選集》，可是他連《馬恩選集》都沒好好讀，或說沒有讀懂，還大言不慚要「協助陳映真釐清思考方式」呢！恩格斯譴責巴爾特的話，可以原封不動，非常準確地用在陳芳明身上：

「巴爾特對馬克思的批評，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臆造一種歷史發展的唯物主義理論，說什麼這應當是馬克思的理論，繼而發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但他並未由此得出結論：他，巴爾特，把某些不正確的東西強加給了馬克思，相反的，卻得出結論說，馬克思自相矛盾，不會運用自己的理論！“咳，這些人那怕是能讀懂也好啊！” - 遇到這類批評時，馬克思是這樣感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124)

馬克思地下有知，看到不長進的陳芳明，時隔一百多年還再重覆巴爾特之流的錯誤，想必也要再感嘆一次：「咳，這些人哪怕是能讀懂也好啊！」一百多年來，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十有八九都是肇因於沒有讀懂，這類例子車載斗量，陳芳明不過是又作了一次不光彩的表演罷了。 ☆

(待續)

反輻射混蛋和伊拉克禁運

陳真

今天(1月16日)是「波斯灣戰爭十周年紀念」。其實不應該說「紀念」，因為這場戰爭還沒有結束，其實也不應該說是「戰爭」，因為實力相差懸殊，就好像我們不會說一個三歲小朋友和拳王阿里「打架」一樣。這不是戰爭，這是屠殺一整個國家的人民！不但屠殺，而且用七十萬枚帶有輻射線的depleted uranium飛彈，汙染伊拉克整個國家！

95年轟炸Sarajevo以及99年轟炸Kosovo，英美也都是用的這種輻射混彈。一來「做實驗」，看看「效果」如何，二來「出清存貨」，生產了這麼多，不用「可惜」。

結果，十年來，在被炸國造成一堆畸形兒出生，癌症罹患率升高數倍，小朋友一個個長得奇形怪狀，這事卻從來都上不了主流媒體。十年來，這事好像不存在一樣。

最近因為有一些駐守巴爾幹半島的北約士兵，相繼罹患癌症，這種禍延子孫的東西，才第一次上了新聞檯面，吵遍整個歐洲。其實，這根本不是新聞，而是發生十年的事了，彷彿別人家小孩的命就不值錢似的，一定要等到自己人死了，才開始「重視」。

不過，重視也是重視假的，因為，英美政府老早就預測這一切後果。不可思議的是，這兩個「偉大」的國家，竟然都否認這東西對健康有危害。如果說中共宣稱六四事件沒死半個人是一種「天大的謊言」，那我不知道英美政府這番話又該怎麼稱呼了。政治上的謊言之離譜，有時真是讓人好奇說謊者那個膽子究竟是從哪借來？！

跟輻射混彈一樣可怕的是那殺人於無形的禁運(sanction)。英美主導的伊拉克禁運，也已邁入第十年。千言萬語實在不知從何說起。我們常批評台灣媒體如何不公，如何扭曲、忽略、抹黑、漂白，可是，如果跟西方主流媒體相比，恐怕也是小巫見大巫，他們一手可以遮天，可以把死亡世界說成迪斯耐樂園。

今天去倫敦參加十周年抗議聚會，警察比群眾還多得多，把群眾團團圍住，可見英國官方還蠻「重視」此事的。可是，回家打開電視一看，連篇累牘在講一對雙胞胎嬰兒透過網路被收養和一個15歲少女遺棄嬰兒的新聞，講得好像很人道的樣子。可是，別人國家被你十年禁運，餓死病死炸死了一百萬個小孩，今天有一群人在你們的「總統府」前集會，官方還出動這麼多警察，逮捕了許多人，一個小時的晚間新聞，卻對此活動隻字不提！

這種忽略，它倒不太像是一種「陰謀」，而是一種「陽謀」，一種「習慣」，一種「理所當然」，一種「反射動作」，一種對他人世界的漠然與無知。他們無法理解別人家死了小孩有什麼關係！

好幾年前，美國其實曾偷偷派一組輻射和醫療專家，去伊拉克調查「輻射混彈」的威力。結果，那個調查團，現在死了只剩下一人。那個人，曾出席去年在劍橋舉行的一個為期兩天、有關伊拉克禁運的百人研討會。他說，他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但他要揭露此事。聽眾聽了很感動，大家站起來給他鼓掌了好幾分鐘。連調查團唯一生還的當事人都現身說法了，美國卻完全封鎖這條新聞！

當然，「民主」國家的新聞，哪裡是你能封鎖的，問題是，他根本不必封鎖，媒體自己就自動不會報了。為什麼？因為他們是「同一國」的，利益和品味是一致的。就算會報，也是把你淡化成不重要的馬路消息、花邊新聞，或者扭曲成他們所「希望」的模樣。

比如說，英國政府前年邀江澤民來玩，劍橋大學還邀他來圖書館參觀，英國各地的台灣學生於是群集抗議，跟對岸來「反制」的大陸學生大小聲，十分熱鬧，新聞鬧很大。可是，明明是台灣學生在抗議，新聞卻變成以西藏為主體。為什麼？因為西藏問題是西方人覺得重要的事，他們的頭腦裏根本不存在台灣這個島似的。所以，新聞會「自動調整」成他們所「希望」的那個模樣，他們希望大家都用跟他們一樣的眼光看世界！

英國國防部也跟美國一樣，他們早知道輻射混彈的危害，也是睜眼說瞎話！

至於禁運，理由是說海珊發展生化武器，可是，如果生化武器是禁止發展的東西，為什麼英美等強國自己可以例外？而且，伊拉克的生化武器當初是美國幫忙發展的，英國也正是伊拉克的武器賣主，因為那時候他們都還是好朋友，需要伊拉克來打伊朗，後來鬧翻了，伊朗不構成威脅了，就又換另一套「正義」說詞。Kosovo 戰爭也是一樣。

當一個國家有能力和適當時機發動戰爭時，他永遠不必怕找不到理由，「違反人權」是最常拿來「用」的理由之一。可是，中國是全世界人權紀錄最差的國家之一，英美又為什麼這麼想巴結他呢？為什麼不也一樣「主持」一下「正義」？

波斯灣戰爭，美國直接死於戰場的士兵不到三百人，但美國單是這種輻射混彈就發射了七十萬顆，而且，還丟了上百萬個長得像玩具的某種先進地雷。只要一撿起來就會爆炸。因為長得像玩具，於是害慘了許多伊拉克小朋友。而且，這種地雷厲害在它不是要你命，而是要你傷殘。因為，你死了就死了，以後再生一個就好了，但是，你若只斷了一隻腿或一條手臂，你的國家就必須用好幾倍的人力和物力來治療照顧你。也就是說，他不只跟你打眼前的仗，他還要跟你打未來的，讓你永難翻身，你越

難翻身，他當老大來對你上下其手的時間當然也就可以拖得越長。

底下三個數據、兩項證詞、一句沒天良的話，供參考。

●伊拉克衛生部(Ministry of Health)統計指出：截至1997年8月，經濟禁運已使125萬名伊拉克兒童死於饑餓或疾病。該數據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附和。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1997年11月指出：現有96萬名五歲以下伊拉克兒童因禁運，處於饑餓邊緣。

●聯合國安理會設置的人道小組(Humanitarian Panel)1999年3月報告：這個國家(伊拉克)由禁運前的相當富裕變成大規模的貧窮，此一事實可以從其嬰兒死亡率躍居世界最高之一看得出來；23%的新生兒體重不足；四分之一的五歲以下兒童慢性營養不良；59%的居民無法經常有乾淨飲水；83%的學校需要大幅度整建。

●Martti Ahtisaari(聯合國Under Secretary General)1991年3月帶領調查團至伊拉克，他說：「過去我們所見所知的任何事物，都沒辦法幫助我們接受這樣的破壞景象－宛如世界末日(near-apocalyptic condition)。」

●Denis Halliday(前聯合國Humanitarian Coordinator for Iraq，1998年10月辭職)：「我們正在毀滅一個國家，事實正是這麼簡單和恐怖。這是非法而且不道德的。」

●1996年，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承認：禁運殺死了至少五十萬名伊拉克兒童，但是「我們認為這個代價是划得來的。」

我不是要說伊拉克政府純潔無辜，但是，我們相信：食物、乾淨的飲水以及基本醫療用品之取得，是一種基本的權利，必須無條件地回復；使無辜兒童挨餓、承受病痛為手段，無法合理化任何政治目的，是一種令人厭惡的暴行！！

我平常看到這些東西，都想自動跳過去，於是就把資料裝箱收藏，想說等我哪一天心臟比較強壯時，或者有多一點能力做些什麼時，再來仔細研究。我雖然是屬於鐵石心腸型的，但是，使壞也總得有個限度，不能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不能用三百人殺別人十幾萬，接著再用十年禁運來餓死病死別人家一百萬小孩，然後說這是主持國際正義！這不是正義，這是滅種！這是屠殺！

人使壞總有個盡頭，因為人早晚會進棺材，可是，國家使壞卻只有靠上帝或眾人的意志，才有可能制止，否則遙遙無期。

大概很少人確切知道以上這些事情後，還能無動於衷的吧？！我常想，如果有人想安靜地過自己的日子，想「與世無爭」，那麼，活在這種時代，可真是他媽的生不逢時！

★

台灣工運在轉捩點上

鄭孟文

一、前言

八四工時的抗爭已經落幕了。這場抗爭，表面上雖然勞方勝了，但真實情況，卻令人興奮不起來，因為，勞方勝利的果實，得來十分僥倖，基本上是朝野幾大政治力量互鬥的產物，而不是勞方自身的力量壯大，抗爭的結果。

更糟糕的是，勞方的勝利只是表面的。實質上，台灣勞工在這場抗爭中失去了政治力量的奧援，更失去了廣大社會的理解與支持。表面的勝利卻以勞工在政治力量中以及整個社會中更加孤立為代價。總體而言，絕非工運之福。他將導致未來的勞工抗爭更加困難。

雖然如此，但是八四的抗爭，是近幾年來台灣勞工運動少有的高潮（雖然這是局部高潮）。在工運低迷的時期，任何局部的高潮都有可能鼓舞部份勞工及工運朋友的熱情與信心，從而維繫台灣勞工運動的火苗。

還有，在低迷時期的工運，統治階級與資方總是容易肆無忌憚地打壓勞工，而且比較不掩飾地曝露其專政、剝削的本質。這將是啓蒙勞工意識最容易的時期。例如，在早期社運蓬勃時期，民進黨（及其「黨外」的前身）一貫表現對工運的支持，曾經迷惑了不少勞工與工運朋友。但在這次八四抗爭中，民進黨完全站在的勞工的對立面。這將對勞工意識的覺醒與工運路線的討論提供絕佳的材料。

因此，八四抗爭雖然落幕了，但是抗爭的經驗必須認真地加以分析、討論，並以此來廣泛地教育勞工階級及工運朋友們。千萬不能「事如春夢了無痕」地讓這場抗爭經驗束之高閣。過去的抗爭經驗，哪怕是失敗，令人洩氣的歷程，也都可能是覺醒群眾的好素材。

二、從兩週八四到每週四十？

八四抗爭的結果，一般認為勞工勝了，因為陳水扁政權意圖將兩週八四小時工作制延為每週四十四小時工作制失敗了。勞工守住了兩週八十四小時的底線。

但是，兩週八四小時與多數資本主義國家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相比，實屬落後。歐洲多數國家自1970年代便陸續以法律規定勞工每週工作四十小時制。美國從1930年代開始，非農業勞動者的每週實際工時便降到接近四十小時。蘇聯1917年革命後宣布每天八小時工作，每週實質工時在小時左右，二戰期間曾延長，但戰後又於六〇

年代回復。即使中國大陸，1995年元旦開始的勞工法，亦明白規定（雖然在實際上違規甚多）每週工時四十小時，且最高工作時間（即加上加班時間）不得超過每週四十四小時。可見，不論工業較先進或落後，不論該國國民平均產值（GDP/Capital）高於或低於台灣，多實施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

尤有進者，法國及若干歐洲國家都已進入每週工時三十八小時或更短。另外，歐美國家正在討論每週35小時（每天7小時，每週5天），32小時（每週工作4天）等等方案。相較之下，八四工時抗爭即使真的依靠勞工本身的力量爭取到了，也沒什麼光彩可言。台灣工運，如果能夠基於勞方本身實力爭取到每週工作四十小時以下，才是領先世界潮流的勝利。

但這樣的勝利，對目前台灣工運而言，幾乎是可望而不可及。即使我們把目標訂在工業化國家二、三十年前就已開始實行的周休二日制（即每週四十小時），也是困難重重，尤其在這次抗爭之後，因為這次抗爭的爆發，乃是陳水扁上台以來經濟持續不景氣，民進黨為討好資產階級以舒緩產業出走的壓力而產生的。民進黨為替自己傾向資方找說詞，便一直論述說縮短工時是不利於勞工，因為資方將受不了勞方的要求而出走，反會造成勞工大量失業的結局。這種似是而非的說詞，無形中將台灣當時失業率節節高攀的原因歸咎於勞方縮減工時的要求，從而在社會輿論中造成一種偏見，認為勞工都是一群不能共體經濟困頓時艱的自私者！甚至誤導社會大眾，以為當時經濟的不振是勞工貪得無厭所造成的。

在八四抗爭中，有些人也注意到民進黨這種栽贓的說詞，因此在一些抗爭場合中辯明這種栽贓。但由於長期以來，勞工的主張不易在主流媒體中報導出來，此外，民進黨以執政者的方便，其栽贓的說詞大幅度地於各種媒體披露，因此，這種辯解發揮不了大作用。整個「八四」運動中，實在是民進黨醜化和孤立勞工的過程。

在此情況下，背負造成台灣經濟不振罪名的縮短工時運動，守住雙週八四成果已是十分勉強；要想進一步拓展到每週四十小時這個其他國家在二、三十年前便已跨過的里程碑，在八四抗爭「勝利」之後竟是不可能企望的目標！

三、「八四」勝利的代價

社會輿論對勞工一貫的偏見，是台灣勞工運動不易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偏見造成社會大眾普遍不能支持勞工運動，使得台灣的勞方不僅要對抗資方與官方的打壓，還要應付社會大眾的誤會的責難。勞、資對抗，變成勞與資、官、社會大眾三者的對抗。同時對抗這麼多敵人，難怪台灣的勞工運動低迷不振。

歷史上成功的勞工運動多注意擴大勞工運動的同盟軍，以取得更廣泛的社會支持。所謂鐮刀斧頭圖案，便是象徵農民與勞工的同盟。在資本主義力量仍然十分旺盛的時代，勞工運動如果要有真正的成長，一定要廣泛地爭取同盟軍，擴大社會基礎。

就爭取社會的支持這點來講，在八四的抗爭中，陳水扁政權在策略的應用上無疑地遠優於勞方。勞方在過程中被描繪成短視（「勞委會」一再論說縮短工時造成資方出走關廠，長期而言不利於勞工）、貪婪（台灣的工資已經太高了）、自私（經濟都這麼差了，還要爭奪勞工的利益），使得原本歧視勞方權益的主流意識型態更加恣意地氾濫開來，勞方在社會中更加被孤立起來。

醜化與孤立勞方，對於正在賣力拉攏資產階級的陳水扁政權而言，是十分必需的，如何爭取與掌握資產階級，是新執政的民進黨的一大課題。受到勞工、環保選民等支持而獲得政權的民進黨，很快就體會到拉攏資產階級的重要性。然而，由於兩岸問題及廢核四等政策上得不到資產階級的歡心，醜化與孤立勞工便成為陳水扁政權向台灣資產階級示好的唯一有效工具。這個脈絡讓我們更深一層地了解，何以民進黨會比國民黨在縮短工時問題上更傾向資方。

我們可以進一步預測，未來當朝野政黨再度為某些事關資產階級利益而相持不下之際，勞工的權益將再度是民進黨用來進行政策交換的籌碼。

另外，經過了這次運動中成功地被孤立與醜化，勞工在未來的任何重大抗爭中將發現要比以往艱難得多。

這些分析告訴我們，「八四」的抗爭勞方雖然勝了，卻付出巨大的潛在代價。

四、「八四」運動的負面效應問題

從上面的討論看來，似乎「八四」運動充滿了負面效應。但我們也要指出，運動有其正面意義。

首先，要先澄清，「八四」運動的這些負面效應決不是「八四聯盟」積極工作者的錯誤。不！這些「八四聯盟」積極工作者在惡劣的工運環境下達到了保衛八四工時底線的目標，並帶來勞工運動局部的高潮。他們的努力應當獲得台灣勞工及關心工運者的掌聲。

「八四」運動負面效應的根源，主要是勞、資力量對比太懸殊，以及策略考慮不周所致。

勞、資力量對比懸殊，是一個全球普遍性的問題。幾百年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積累下來鉅額的財富都集中在資方手中。特別自1980年代中期，私有化（即台灣所謂的「民營化」）與全球化浪潮下，不僅物質力量的鴻溝加大，在意識型態上資方亦展開一波洶湧的宣傳浪濤。財富分配更加兩極化，意識型態上更是一付只有資本主義（也因此只有資本家）能夠解決世界任何問題的氣勢。勞、資力量的對比懸殊的程度，可能是1848年以來所僅見。

就台灣情況而言，勞資力量懸殊又加了一個不利條件，即台灣的政權一貫赤裸裸地干預勞、資間的爭紛，並明顯地站在資方的立場。國民黨政權時期，這種官方公然

袒護資方的作法，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件。

民進黨執政後，人們期望這種情形得以改善。尤其當民進黨還未執政時，部份派系表現支持勞工的立場，給工運部份人士帶來期待。不幸這個期望在「八四」運動中落空了。民進黨不僅未積極協助勞工往每週四十小時的目標邁進，反而主動地要把雙週八四小時延為每週四十四小時而引發了這場抗爭。政黨輪替的意義對勞工是不存在的。

不特如此，台灣勞方在對抗資方的抗爭中，還會產生部份勞工及工運領袖者基於對新政權的期待而作出錯誤判斷的情形，甚至還有因為個人生涯考慮或集團利益的需要而打算與新政權合作。這些無疑地會給台灣的勞工運動帶來額外的障礙，更加削弱勞、資力量的對比。

至於策略考慮不周，一方面是資方與官方手段的高明(他們順利地孤立與醜化了勞方，正如前述)，另一方面則是台灣的勞工運動長期缺乏全局策略觀點所致。

無論就勞資力量對比懸殊或策略不周，都是長期、體質性的問題，不能把責任歸咎於「八四」運動的工作者。相反地，透過他們的努力進行了這場抗爭，人們才有機會檢視這些問題。

五、怎麼辦？

「八四」的抗爭曝露了這許多問題。人們要問：「那怎麼辦？」

這是一個最重要的事。如果我們不能改進這些曝露出來的問題，那麼「八四」抗爭所付出的鉅額代價便將血本無歸，名符其實地「贏了表子，輸了裡子」。

其中最重要是認識的問題。「八四」抗爭讓人們有機會認識了民進黨親資方的本質。但是，這個認識尚未能普及於廣大的勞工群眾，甚至連部份工運人士都還未看清這點。

「知己知彼」，是兩軍對抗要致勝的先決條件。在舊政權時期，敵我界限較明顯，「知己知彼」的工夫即使不涉入，也不會有基本的差錯，但在新政權上台之初，民進黨對工運的立場是工運人士必須釐清的首要問題，「八四」抗爭，讓人們有機會來了解新政權的這個立場。這是「八四」運動的重大貢獻之一。但是基於民進黨未上台時的一些支持工運的作法，一般人很難敏銳地認識這個本質性的問題。

因此，當前的主要任務之一，便在於將這次抗爭中所檢視出來的現象，廣泛地讓勞工運動者及勞工群眾知道。以此建立共識，達到「知己知彼」的起碼程度。台灣工運此時此刻或許可以出版一份發行廣泛的簡單刊物，把「八四」抗爭的詳細過程及獲得「彼方」的訊息傳揚出去。成為廣大勞工共同知悉的基本素材，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各種分析、討論，以期建立共識。

其次，針對全局策略考慮不周的問題，要加強對台灣社會及資本主義本質全局了

解的學習。不可否認，十多年來台灣的工運亦發展出策略思考。但相對於陳水扁政權大格局的策略部署，過去台灣工運的策略格局都太狹小，基本上都屬於戰術或戰役性的，鮮少有戰略全局性的視野。而且這些戰術或戰役性的策略思考，又往往某個工運團體範圍內的運作，整體性的勞、資對抗或勞、官對抗，都是由各工運團體臨時結盟組成，不易形成一個全盤性的戰略思考。以此倉促成軍的同盟隊伍與雄厚的資方或官方對抗，反從策略角度來看便很難佔上風。因此，台灣工運若要成長茁大，加強全盤策略思考的教育以及整合工運團體，實為必經之道。

最後，還要深化對資本主義的了解。在醜化勞工階級的說詞中，陳水扁政權常提出論述說，縮短工時會導致勞工失業。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述，不僅誤導了社會大眾對「八四」抗爭意義的理解，甚至也在一些勞工朋友中造成意見上的混淆。還有，關於縮短工時的社會意義，勞資力量對比演變的分析，以及本文未談及但十分重要且迫切的加入WTO可能的影響，等等，勞方都需要提出一套有說服力的說詞於社會大眾。否則，勞工運動將被矮化為部份社會弱勢團體追逐私利的行徑，不易引起社會的共鳴。在此情況下，勞工力量被孤立於社會總體的重視與論述之外，也就是必然的宿命了。

深化對資本主義的了解，有待更多站在勞工立場的知識份子的投入，左翼朋友們特別是責無旁貸。過去，台灣勞工運動認識深化的不足，實是台灣勞工運動瓶頸的重要因素之一，而這又由於台灣左翼知識份子力量薄弱所致。如今，「左翼」雜誌的出現開始聯繫了左翼知識份子。我們期待這個逐漸凝聚起來的左翼知識力量，能夠關注與配合台灣勞工運動的需要，為克服過去工運深化不足的問題而出一份力量。

六、結語

台灣的勞工運動在轉捩點上。民進黨的右傾化與台灣經濟面臨的困局，是勞工運動的危機，也是轉機。「八四」的抗爭，提供許多值得反省的題材與刺激。運動不在乎一時的挫折，而擔心不知從挫折中改進。如果認識到「八四」抗爭中勞方實質被醜化與孤立的情況而思加以改進，這或許是台灣勞工運動重新出發的契機。 ★

年興紡織事件記事本末

倪世傑

前言

1980年代，台灣曾經爆發自主工運浪潮。相對於「鬧雞」，「自主」代表著擺脫國民黨威權政府以及資本家對工會的控制，更代表著工人得以藉由工會民主地形成屬於工人集體的意見，對抗官資聯手剝削。

1979年，遠在拉丁美洲的尼加拉瓜進行著一場社會革命。從工農利益出發、志在解放尼國工農群眾的桑定民族解放陣線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但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年中，美帝不斷地扶植游擊武力騷擾桑定的建設，在孤立無援的國際環境下桑定終究不敵美帝的進犯。1990年代，右派查莫洛政府上台，尼加拉瓜再度走向依附帝國主義的格局，尼國工農群眾再度落入資本主義剝削體制的深淵。

1996年，台灣年興紡織挾其資本以及良好的政商關係，來到尼加拉瓜進行投資。延續著在國內視工人如草芥的心態與管理風格，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戕害勞動人權的罪行，不僅尼國工人揭竿而起，更引發一波全球毘伐年興的浪潮。

緣起

2000年5月，民進黨籍的陳水扁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同年8月13日，陳水扁展開為期2週的中美洲暨非洲6國「民主外交友誼之旅」。隨團的官員包括國安會秘書長莊銘耀、外交部長田弘茂、總統府副秘書長簡又新、經建會主委陳博志、經濟部長林信義、（前）新聞局長鍾琴。

另外不容忽視的是還有一支龐大的工商團體代表，包括三大工商團體龍頭全國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辜濂松、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王又曾、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林坤鐘、中小企業協會理事長戴勝通、新光關係企業董事長吳東進、九如公司董事長林隆士、台糖公司董事長錢秉才、榮民工程公司董事長沈景鵬、亞新工程顧問公司董事長莫若礪、互助營造公司董事長林清波、年興紡織公司董事長陳榮秋、義美公司副董事長高志尙、大同公司總經理林蔚山。

據總統府官員表示，這次陳水扁出訪率領了龐大的工商團體代表，就是想參觀中美洲的投資環境，如果有適合工商界前往投資者，對友邦國也是一種經濟援助與商機。

正當陳水扁在尼加拉瓜進行訪問之前，一群美國的工運人士及關心勞工權益的宗

教領袖 - 其中包括美國國家勞工委員會 (National Labor Committee, NLC) 的克納漢 (Charles Kernaghan)、底特律大主教甘柏頓 (Thomas Gumbleton)。他們原本希望當面向來自台灣的陳水扁總統當面陳情，抗議來自台灣的業者 - 年興紡織惡性剝削當地紡織廠勞工。不過，尼加拉瓜政府以他們可能威脅陳水扁總統的訪問行程為由，在陳水扁總統抵達前夕，已經請他們先行離境。

藉由網際網路 (因特網、互聯網) 的使用，時空距離大大的縮短了，對社會運動的跨國化效果尤其顯著。總統大選過後，亞太勞動快訊社透過美國「勞動人權運動組織」(Campaign for Labor Rights, CLR) 所傳送的電子郵件得知在尼加拉瓜的四家工廠的紡織工人遭到來自美、韓、台資方惡劣對待，需要全球運動人士的聲援。亞太勞動快訊社隨即連絡CLR並查閱年興紡織相關資料翻譯成英文後傳送到當地供運動運用。

直到8月陳水扁出訪中美洲此等事件才在國內媒體爆發出來；10月，苦勞工作站、敬仁勞工中心、亞太勞動快訊社以及世新大學社發所陳信行教授、社發基金會林正慧等團體組成「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Taiwan Solidarity with Nicaraguan Workers, TSNW)，並聯合國內兩大總工會 (全總、全產總)、三大工運團體 (勞陣、工委會、勞權會)，針對年興紡織，展開一連串抗議、揭露的行動，希望年興紡織能夠拿出善意與尼加拉瓜正太廠 (Chentex) 的桑定工會 CST 談判，共謀解決之道。然年興紡織似乎不知勞動人權為何物，直至筆者撰寫此文之時談判依舊處於破裂狀態。

以下將就桑定工會CST在正太廠的抗爭大要、美方工運人士的抗議行動、以及台灣「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三方面的行動作一整理，以其華文讀者能對年興紡織正太廠事件能夠近一步了解，並在這個基礎上提請四方大德提供工作小組批評與建議。

戰鬥現場：尼加拉瓜年興紡織正太廠

壞事傳千里

年興紡織戕害勞動人權的罪行，飄洋過海來到美國引起非政府組織「國家勞工委員會」(NLC) 的注意。1997年11月，美國全國性新聞節目Hard Copy及國家勞工委員會來到尼加拉瓜首府馬那瓜附近的腊斯馬西迪斯 (Las Mercedes) 自由貿易區進行訪調，訪問對象為年興正太廠的工人。訪調中挖出了諸如濫用童工、性騷擾、強迫加班、低於生存所需的薪資等等侵犯勞動人權的罪行。

這一集的Hard Copy節目在全美各地播出之後引起了觀眾的震驚，他們之前並不知道平日所穿的牛仔褲 - Levi's、Lee、JC Penny、Faded Glory、Bungle Boy - 竟是在如此充滿著血汗的環境下生產出來的。

消息傳回尼加拉瓜，正太廠的管理幹部立即開除了接受Hard Copy節目訪問的工人，當地報紙並指責協助這次訪調的桑定工聯(Federation of the Sandinista Labor Central, CST)秘書長奧鐵加(Pedro Ortega)為「叛國者」；此外，正太廠的管理幹部甚至以每人100尼幣(美元)為「走路工錢」，找了一群工人走上街頭反對國家勞工委員會以及Hard Copy的「不實報導」。未料，奧鐵加之前早已祕密地組織了之前被正太廠解雇的工人，因此當奧鐵加領導的被解雇工人在遊行隊伍附近拿著擴音器登高一呼，這群「走路工」紛紛轉向並隨著被解雇的工人瑪利亞(Maria)高喊「是的，我們被剝削、還被性騷擾！」。

經由大眾傳媒的報導，年興在自由貿易區對待工人的暴行被徹底的揭露出來，直接燃起工人籌組自主工會的怒火。

建立自主工會

之後這段期間，積極的工人不斷奔走爭取工人對自主工會的支持。1998年1月24日，工人拿著一份工會發起人名單向尼國勞工部申請成立合法工會，翌日，發起名單中的90位工人隨即被開除，1500名工人中有1200位當天發起小規模的罷工抗議資方打壓。資方最後讓步了，工會得到承認，被開除的工人得以復職。這個工會的名字為「正太廠桑定工會」(Union of Chentex Garment Workers - CST)。

當正太廠的自主工會成立後，資方馬上扶植成立了一個黃色工會 - 中央工會(CTN)。資方成立黃色工會的目的在於瓦解正太成衣工人工會。管理幹部頻頻接觸工人並要求他們加入中央工會，並利誘工人說如果加入中央工會將可以獲得交通運輸等等多項經濟利益。正太廠方同時幫這些工人繳納會費。

鬥 爭！

1998年8月，正太廠與兩工會簽訂團體協約，然協約並未觸及工資、交通、午餐津貼部份。1999年7月，包括Gladys Manzanarez Tercero和Harling Bobadilla在內的正太成衣工人工會理事寫信向正太總經理陳元寶(Chen Yun Po)要求協商工資等事項，正太拒絕討論，於是他們誘擬定一正式提案，要求在8月約滿後每小時加薪8美分。

2000年3月，正太廠主動幫中央工會的工人加薪。在回應正太廠的這項舉動以及尼國勞工部幾次協調無效後，正太成衣工人工會在4月27日展開為時一小時的罷工表示抗議。5月1日，工會幹部Felix Rosales Sanchez被管理幹部技誘下慘遭暴力攻擊，翌日，正太廠宣佈解雇正太成衣工人工會的幹部，幾乎所有正太廠的工人在2000年5月2-3日間都參與了罷工。5月3日左右，也就是罷工工人將要離開正太廠前，正太廠聘雇的保全人員誘之以利(20元尼幣)要工人簽署一項反對罷工及正太成衣工

人工會的聲明，不願簽署這項聲明的工人之後均被保全人員留置在工廠門口並遭到盤查。大約有350名工人拒絕簽署這項聲明，不久後他們都被正太廠解雇，並得到尼加拉瓜勞工部的立即確認。之後，同樣的，在尼加拉瓜勞工部的確認下。大約又有150名工人因拒絕簽署一項自願退出正太成衣工人人工會的聲明而被解雇。其他員工，則在面臨開除的威脅下，簽署退出正太成衣工人人工會的聲明書。

5月27日，尼國勞工部批准正太廠提出開除9名正太成衣工人人工會幹部的申請，並把他們的名字列上黑名單，讓他們在自由貿易區內永遠找不到工作。

6月29日，正太廠對正太成衣工人人工會幹部提起刑事訴訟，意在懲罰之前他們領導的罷工行動。10月3日，美國貿易代表白茜芙就以上事件發函至尼國外交部，具文如未改善勞工權益，尼國在「加勒比海貿易關係法案」(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 CBI) 中的優惠可能生變。

10月18日，勞資第一次協商破裂，年興駐尼總經理黃明偉甚至沒有出席；12月12日，勞資展開第二次協商，工會方面原本準備接受尼國政府提出的條件：五位幹部復職，另六位在勞動人權辦公室。但黃明偉馬上又反悔了。他聲稱無法接受任何工會幹部復職，但可接受四名工會幹部在勞動人權辦公室工作。除此之外，他另宣稱可以接受50名被解雇的工人重新復職。

12月21日，黃明偉再度推翻之前復職、設立勞動人權辦公室等提議，勞資協商再次觸礁。2001年1月，似乎出現轉圜跡象，在美國駐尼大使館勞工參事的見證下，黃明偉、正太廠桑定工會就談判內容做出口頭協定，協定內容包括：

1. 2名工會幹部復職
2. 80-100名遭開除的桑定工會會員復職

桑定工會一再退讓，最後大打折扣的協定最後又慘遭黃明偉片面推翻！藉口只有七名會員合乎雇用資格，口頭協定視同作廢！

美國：市場所在地的鬥爭

年興紡織生產基地遍佈第三世界。除了在苗栗的兩個廠區外，包括非洲的賴索托、史瓦濟蘭，中美洲的墨西哥、尼加拉瓜，董事長陳榮秋個人亦在南非共和國投資牛仔褲工廠，堪稱台灣「經濟奇蹟」下達成生產全球化的「跨國公司」。產業之所以外移，原因除了第三世界低廉的勞動力成本、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外，市場的親近性尤為重要。就年興紡織而言，尼加拉瓜為「加勒比海貿易關係法案」(CBI) 的締約國之一，享有商品輸美「免配額」、「免關稅」的實質優惠，自然吸引勞力密集產業前往投資。除了年興紡織外，台灣的中國唯一製衣、富太國際、鼎大企業，美國的Mil Colors, Targets 以及南韓的Jen Il 在尼國皆設有成衣紡織廠。

美國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以及首屈一指的帝國權力，美國的運動團體-如國家勞工委員會（NLC），往往透過串連消費者運動潛在的可能性與利用美帝國主義與其他國家及資本間潛在的矛盾達成向不效業者、政界施壓的目的。

「勞動人權運動組織」（CLR）、「尼加拉瓜網絡」（Nicaragua Network）、國家勞工委員會（NLC）等團體等團體於全美各地發起消費者傳單發送運動。他們在 Mil Colors, Targets等購物中心向過往的消費者發放傳單，讓民眾知道裡頭賣的牛仔褲很多都是在人不道的「血汗工廠」下生產的。

2000年9月底，「國際紡織、製衣、皮革工會聯合會」（ITGLWF）秘書長科尼（Neil Kearney）向「國際勞工組織」（ILO）上訴正太廠及尼加拉瓜政府侵害勞動人權的行為。

2000年10月初，美國貿易代表署代表白茜芙（Charlene Barshevski）表示，在尼加拉瓜自由貿易區所發生的勞資爭議將會影響尼國未來在「加勒比海貿易關係法案」（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 CBI）中的優惠。

2000年12月初，美國「憲法權利中心」（Center of Constitution Rights）、「美國聯合鋼鐵工會」（United Steelworkers of America）和紡織業工會「團結」（UNITE!）等三個勞工團體，爲了要求美國陸軍和空軍向年興紡織位於尼加拉瓜的正太廠施壓，要求廠方提高工資，並改善勞工工作環境，因而代表被剝削勞工向法院控告正太廠和母公司年興紡織違反國際勞工權利法規。

全國勞工委員會（NLC）引述船運紀錄指出，正太廠曾把生產的「Royal Manor」和「Ponytails」兩個品牌商品賣給美國軍方。美國洛杉磯檢察官對年興提出控訴，指控年興尼加拉瓜工廠是一間工作環境惡劣的血汗工廠。也正是因爲這起告訴，嚴重地威脅到年興紡織在美國市場的利益，年興感受到壓力才不得不與桑定工會重開協商大門。

2000年12月19日，美國聲援尼加拉瓜勞工組織前往位於華盛頓特區、休斯頓、波士頓、紐約、芝加哥及洛杉磯的「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陳情，表達尼加拉瓜正太工廠系統性的違反勞工人權深切的關注，希望台灣政府能夠出面協調。

台北駐美經濟文化代表處（華盛頓特區）的聲明大致如下：

中華民國政府非常關切在尼加拉瓜正太廠所發生的勞資爭議。我國的政策是所有的投資者在海外都必須以公平地、尊重地態度對待當地勞工。在其他國家擁有生產設備的投資者必須遵守國際勞動標準以及所在國的勞動法令。政府將幫助正太廠以及其它在尼加拉瓜的台資企業推動良好的勞資關係。為了鼓勵正太廠的管理幹部以及勞工重建積極正面的關係，政府建議正太廠重新雇用在西元2000年五月及六月被解雇的十二名工會幹部。

程建人代表於會中告訴與會代表在台北召開了一次會議，參與會議的代表來自外交部、勞委會、經濟部、資方團體等六個部門，會後總結對正太廠的管理階層的建議如下：

1. 建議重新雇用之前被解雇的十二名工會幹部；
2. 包括正太廠在內的其它工廠都必須與工會保持良好的溝通管道。

代表國家發言的駐美代表程建人態度十分明確：建議重新雇用之前被解雇的十二名工會幹部。但年興紡織董事長陳榮秋、駐尼總經理黃明偉依然故我，連美國運動人士都直呼不可思議！

約略同時，美國勞聯—產聯（AFL-CIO）總裁史威尼（John Sweeney）亦特別寫了一封公開信給年興紡織董事長陳榮秋，對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計劃地侵害勞動人權的行為表達最深刻的關切。

除了在美國各地的抗議外，之前提及位在加拿大的「國際紡織、製衣、皮革工會聯合會」（ITGLWF）提供相當的實質助力；南非、賴索托、丹麥等地的工會亦赴尼國當地聲援正太廠工人對抗惡質台商的鬥爭。國際自由勞聯（ICFTU）的2000年世界工權報告中對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的惡行劣跡多有著墨；紐約時報、倫敦金融時報等國際傳媒亦做相當篇幅報導。繼仿冒、盜版王國後，台灣在國際上又成爲侵害第三世界國家勞動人權的代表，這血腥的惡名可是向國外撒再多銀兩都買不回的！

台灣工運界抗議年興打壓尼國工人勞動人權的鬥爭

早在2000年2月，國民黨政府即已接獲勞委會駐美代表的緊急通報，在尼加拉瓜投資成衣廠的年興紡織因有計畫的侵害勞動人權，引起國際工運界及美國民主黨國會議員極大的反彈。2000年7月，也就是陳水扁總統進行「民主外交友誼之旅」前夕，民主黨籍眾議員布朗（Sherrod Brown）和安德魯斯（Robert Andrews）等五名國會議員聯名寫了一封信給台灣總統陳水扁，敦請陳總統聯繫年興的總部，敦促他們要求誠太的管理階層坐下來，和CTS工會協商出解決衝突的方案，包括讓被開除的工會代表及員工復職，並再次尼加拉瓜需要外國資本繼續投資，以及這些資本所創造出來的、當地非常需要的工作機會。

陳總統訪問尼國後也知道年興紡織在當地發生了勞資爭議，年興董事長陳榮秋也隨同在訪問團中，陳總統便派經濟部長林信義會同陳榮秋「了解」當地的爭議。如前所述，美國國會議員早在陳總統出訪之前即已告知，等到尼國工人及美國工運人士都跑來抗議了才感到事態嚴重，不是外交敏感度出了問題，便是忽視勞動人權；另一方面，從日後所蒐集到的資訊判斷，除了陳氏家族擁有年興紡織股份近40%外，台元紡織、裕隆集團亦爲重要的股東，而林信義部長就任前的職務正是裕隆集團下的中

華汽車總經理。台灣向來詬病已久、相機為利的政商關係在扁政府中又找到了另一個活生生的例證。

若在以往，這一類的新聞對國內絕大部份的閱聽大眾而言實在無足輕重，但隨著台灣資本逐步全球化赴海外找尋生產基地後，原本在台灣那一套欺凌勞工的把戲不僅原封不動、甚至變本加厲地帶到當地的工廠。柬埔寨、越南、中國大陸、菲律賓、尼加拉瓜....只要是台資落腳生產的地方，大都會傳出台商與韓商並列為侵害工權的「首惡」。本著「工運無國界」的精神，以及台灣產業資本大舉外移引起國內失業狀況日益惡化的前提下，工作小組成立，正如孫窮理所言，希望藉由這個機會「提出問題」，並在未來建立兩地工人間建立認識與合作的基礎：

台灣的工人運動在「跨國合作」上，是幾乎沒有什麼基礎可言的，在現在並沒有提出對於國家具體該怎麼做的對策之前，把問題提出來，相當地重要，而這個所謂對「國家」的施力，應該是同時針對移出國與移入國兩者，這就必須在兩地的工人間，建立共同的認識與合作基礎。

之後，工作小組整理相關資料，送交兩大總工會與三大工運團體，並得到這五大團體的支持；又在苦勞網舉行網路連署，得到海內外眾多運動人士的回響。

修理年興！

2000年11月6日，工作小組與五大加盟連署團體及大學社團、學界人士將近七十餘人赴年興紡織北市總公司抗議；11月8日，工作小組突襲年興公司在北市台灣證券舉行的說明會，會中年興公司尚展示其所製作的宣傳錄影帶，其中宣稱「尼國勞工一年只休息一天-耶誕節」、尼國總統阿雷曼並在錄影帶中現身公開為年興宣傳。初期的行動利弊得失各半：年興紡織相當程度認識到國內工運界也開始反對他們在海外的劣行，這對他們的公司形象會帶來十分負面的影響，公司意圖打壓我們的行動，當天抗議代表各團體發言的朋友11月13日都接到了年興所發的律師信，警告如有後續行動將以毀謗、公共危險罪控告。另一方面，除極少數媒體記者對勞動相關議題具備一定概念外，產經線記者幾乎無法掌握，報導品質堪慮，連帶影響我們向大社會發聲的效果。

史上首次針對外交部的抗議行動

由於年興的母國正是寶島福爾摩沙，再加上在這一個月間收集到的相關訊息，工作小組決定在12月1日到外交部和外交部官員「談清楚、說明白」。為何要去外交部抗議的原由大致如下：

1. 根據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的〈獎勵業者赴有邦交國家投資補助辦法〉第三條和第四條所述：業者赴有邦交國投資者，得於投資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就僱用當地國員工薪資、廠房設備租金或融資利息，擇一向外交部申請補助。僱用當地國員工薪資補助及廠房設備租金補助，分別以員工每人每月薪資及廠房設備租金百分之二十為準；申請融資利息補助，以向金融機構融資期間實付利息百分之三十為準，補助期限均以五年為限。

第五條至第七條明定：業者參加政府籌組或外交部委託所組成之投資考察團，赴有邦交國家考察，得向外交部申請機票款補助；在有邦交國家實際投資金額十萬美元以上者，得於投資後檢附機票票根，向外交部申請補助於投資前派員考察之機票款。業者前往有邦交國家投資，得向保險機構辦理投資保險；其保險費，由外交部及業者各自負擔半數。

人民納稅給政府興辦各種事業本無可厚非，但補助這些打壓外國工人權益的惡劣廠商豈不助紂為虐？在國內失業狀況日益惡化的當下，政府尚在「提昇中華民國與友邦經貿及外交關係」的前提下修訂此法鼓勵廠商外移，構成受薪階級誠實納稅卻在再分配過程中反過來加速失業的荒謬鬧劇，從這裡頭這也讓不諳外交事務的運動人士再度體認國家濃厚的資產階級性格。

2. 年興紡織駐尼總經理黃明偉原為中華民國駐尼加拉瓜大使館空軍武官，退休後直接就任總經理一職，據外交部資料顯示，外交部已補助年興紡織 1000 萬元以及其轉投資蝦養殖事業 4000 萬元，共計 5000 萬元新台幣是否涉及利益輸送以及利益迴避原則，令人懷疑。

根據以上資料判斷，年興紡織與外交部之間關係匪淺。因此，當 12 月 1 日的抗議行動要求外交部調查其中是否涉及不當利益輸送時，當時負責接見的外交部副部長林基正、經貿司長儼然像是年興公司的公關人員，為其公開說項，經過近一個小時各說各話的漫長溝通，外交部還是在聯盟的壓力下，被迫做出以下五點共識：

1. 黃明偉由駐尼武官轉任年興總經理一事，將會委託政風單位進行調查是否違反利益迴避條款；

2. 調查結果將會於 12 月 11 日前正式回函二大總工會（全總、全產總）、三大工運團體（勞權會、工委會、勞陣）；

3. 外交部希望促成與年興公司對談。針對這一點，聯盟代表要求必須是在正式、公開的場合展開對談，時間、地點再議；

4. 關於再「鼓勵民間業者赴有邦交國家投資補助辦法」中加入勞動人權條款，外交部承諾會研究是否可行；

5. 外交部對於年興雖已補助一千萬元台幣，但現在並沒有計畫繼續給予年興補助。

赴外交部抗議後年興紡織似乎已承受相當壓力，但依然如死鴨子一般嘴硬得不得了，12月4日工商時報刊載了大版面的陳榮秋專訪，他明白的提到：要輕易讓步，年興不如關廠！拿關廠相要脅的，不是美國工運人士、不是桑定工會（他們反而向美國成衣廠商喊話呼籲不要減少訂單！），而是陳榮秋你自己！

立法院公聽會

2001年元月2日，由立法委員李正宗國會辦公室於立法院舉辦年興公司勞動人權公聽會。

據年興公司發言人吳明澄表示，這本來是一件單純的勞資爭議事件，但是卻遭到激進的工會四處散布謠言，再加上美國方面來自於貿易競爭的壓力，使得事件複雜化，讓年興公司成爲對外投資的最大受害者。但與會的勞工團體則對年興公司說法感到強烈質疑，工作小組代表陳信行指出，年興公司的勞動條件，在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LO）、國際紡織勞工聯盟等具公信力的國際性勞工組織都有詳盡的調查報告，不能單憑年興公司一面之詞。此外，聲援尼國工人的立足點，是站在工作權、團結權、爭議權的國際人權標準上，而年興公司不當解雇工會幹部的惡質行徑已經嚴重違反這些勞動人權的國際性原則，且年興公司扶植親資方的中央工會、打壓自主工會等破壞勞工團結權的做法，更讓台灣工人感同身受！

全產總勞保基金審議委員廖文瑞表示，全產總在勞保基金審議委員會中佔有席位，若年興不儘速改善尼國勞動條件、恢復工會幹部工作權，將會提案要求相關單位釋出對年興的持股，以免年興勞資爭議無限擴大，影響到勞保基金的獲益。勞權會代表唐曙表示，外交部應在對外投資補助的相關法令中增列勞動人權條款，以避免年興這種危害台灣外交形象的事件一再發生，同時，他也希望外交部能讓國內勞工團體成立調查團，赴尼國年興廠區實地調查。

外交部經貿司代表項恬毅則認爲，外交部鼓勵對外投資的基本原則，首要在於遵循當地法令，對於這點，年興表現向來不錯，但不料在此一勞資爭議事件卻演變成政治風暴，使問題變得複雜。

立委李正宗勉勵年興公司儘速拿出誠意，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希望勞委會密切關注年興公司無工會的問題，必要協助其籌組工會。
2. 要求勞保局在審議勞保基金投資時，將年興公司勞資爭議事件納入審核項

目，以避免勞保基金受到牽連造成不當虧損。

3. 要求外交部關切年興公司在尼國的勞動人權問題，若有影響我國國際形象之事由，應停止予以補助。
4. 盼年興撤回對國內勞工團體的法律告訴，以免事件持續擴大。
5. 希望年興公司在過年前（1月底前）能回應工會訴求。

2001年元月中，「中央工會」反對「桑定工會」四名幹部及數十名成員復職返廠，同時傳出資方考慮裁員甚或關廠，發起兩千員工走上街頭抗議。我們不禁懷疑，如非資方授意，年興管理階級怎會放任2000名工人「集體罷工」？甚至還有十六輛遊覽車接送至美國大使館、「桑定解放陣線」總部及尼加拉瓜天主教大主教各個抗議地點？

代 結 論

有些朋友問我們，尼加拉瓜的事你們去關心什麼？年興在台灣連工會都沒有你們去瞎忙些什麼？我們必須誠實的說，處在全球化的時代，資金（台）、生產（尼）、市場（美）分別在不同的地方進行時，抗爭自然是跨國性的，一國的抗爭或許成效有限，但跨國抗爭的潛能無窮。另一方面，當資本得以在全球尋找最廉價的地區進行生產時，勞動條件的下降是必然的，反應在台灣則是產業外移失業連連，同時這也是因為工會組織率過低以及工會功能不彰所致。工作小組常提到，「幫助尼加拉瓜工人正是幫助我們自己」，只有全球工人聯合鬥爭，才能阻止資本無窮盡的需索，工人階級才有當家作主的一天！

★

台大商圈的第一面紅旗

巴黎公社 咖啡屋

開幕期間一律八折優待！

資產階級的美食享受 · 普羅大眾的消費價格 ·
激進的腸胃革命 · 解放的人性空間 ·

誠摯邀請：在進步的道路上，以及正想追求進步的朋友；
結伴光臨，聽馬賽曲！大快朵飴！

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tel: (02)23677543

熱烈歡迎：右派保守人士，以及風派精明份子；
移駕來此，嚙法蘭西多士！改造學習！

編輯報告

二十一世紀已經來臨，我們將面對的是一個左翼新復興時代的來臨，或是繼續右派保守反動的統治，種種的挑戰正考驗著我們。

在左翼內部，大家對於許多議題都還存在不同的看法，亟待交流與整合，因此我們特別開闢了【野風與星火】專題，針對一些爭議性的話題進行對話：在上期《左翼》強調台灣左翼朋友不應該迴避民族問題的討論，何六九〈當幽靈徘徊不去的時候〉，進一步主張左翼應該批判漢族民族主義情結，以求掙脫各式各樣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結，這樣的論點過去較少在台灣左翼圈內論及，我們歡迎各方能夠繼續就這個議題進行深入的討論與對話。十四歲女星王瞳拍攝的塑身廣告，曾經在主流媒體上引發了激進主義女性主義者卡維波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之間的論戰，現在馬克思主義者林深靖〈青春睿智卡維波〉，對於卡維波的論述提出批判與反對，過去台灣有關性別議題的爭論主要是圍繞在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者之間，我們欣見在《左翼》出現另一種觀點；去年，陳映真與陳芳明在《聯合文學》上展開一場持續的文學論戰，杜繼平〈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上）〉，對於陳芳明這位自稱是左翼學者、卻連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都搞不清楚的教授進行尖銳的批判。

波灣戰爭爆發已經十周年，美、英帝國主義在當地的種種惡行最近愈來愈多被媒體揭發，但台灣對於這一議題卻甚少報導，一般人似乎也還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陳真〈反輻射混蛋和伊拉克禁運〉，使我們對於美國在伊拉克的暴行能夠有較為全面的認識。

八四工時鬥爭雖然暫告一段落，但仍然存在許多省思與檢討之處，鄭孟文〈台灣工運在轉捩點上〉，指出了今後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倪世傑〈年興紡織事件記事本末〉，對於過去這一段時間台灣、尼加拉瓜及美國三地的工運人士如何攜手共同對抗年興紡織有著深入的描述。

本期因為稿擠，連載特稿：黃志龍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因此順延一期，要請作者與讀者見諒。

近來有一批左翼朋友成立了〈巴黎公社〉咖啡簡餐廳，本期特別刊登了一只〈巴黎公社〉的小廣告，這個餐廳成立的宗旨是要成為台灣左翼同志聚會、對外接觸、國際聯結及散播、交換進步訊息的場所，我們希望這些努力都能為台灣左翼隊伍的建立創造更好的條件。

左翼 第十五號

出版日期：2001年1月31日

初版二刷：2001年6月30日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六號



故慰安婦カソ・ドツキヨソ肖像畫(指紋肖像作品)
由韓・日三千餘名支持者以手捺指紋共同完成

【野風與星火】沒有「幽靈」，只有心中之鬼

揭開帝國主義幽靈的假面

帝國主義打造的以漢族民族主義為敵的「台灣民族主義」才是虛無自虐徬徨徘徊的幽靈
以偏蓋全何以成全

樊梅地 / 2

官土生 / 8

夏桐 / 14

何苦 / 16

從阿瑪斯號油污事件看全球化的一個病徵

劉鳴生 / 18

【爭鳴與求是】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癡呆的左派？（上）

卡維波 / 19

流亡的告白 鍾喬 / 33 讀「風簷之左」有感

吳俊宏 / 35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中〉

鄭國棟 / 37

【特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四)

黃志龍 / 45

沒有「幽靈」，只有心中之鬼

樊梅地

《左翼》第15號何六九〈當幽靈徘徊不去的時候〉（以下略稱〈徘徊〉），理論知識淺陋，立論邏輯錯亂，文章本身不值得討論。但作為反面教材，〈徘徊〉提出了漫性地苦惱著台灣相對進步的思想界的一些問題，值得一談。

一．「不問民族」的問題本質

〈徘徊〉以為，有人主張台灣的變革運動應該超越統·獨的論爭，即越過台灣獨立論和中國統一論，進行一島的變革運動。無如〈徘徊〉咬牙切齒地以為此「不問民族」論，其實就是為「漢族民族主義」開綠燈，為「漢族民族主義」「護短」，藉以「痛恨的態度」去「苛責」「台灣民族認同」。這其實是台獨派皮相的詛咒。

一九七〇年，北美的台港留學生為美國片面將釣魚台列嶼行政權劃歸日本而崛起，發展為保衛中國領土釣魚台、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和美帝國主義的運動。一九七一年，運動向左迴旋，發展為中國民族統一運動。由於正值文革期間，毛澤東主義的中國社會主義成為一代海外知識份子改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世界觀和生活實踐的標竿。以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合法的代表，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和台灣獨立，主張兩岸最終的統一……成為「保釣」運動左翼共同的政治選擇。文革結束之後，一方面文革的暗部逐漸呈現，一方面中共的路線方針從激進的不斷革命論向著集中發展經濟的方針移行。毛主義被束之高閣，文革道路遭到清算，市場經濟論煽動了全社會對商品和物質的飢餓……在「釣運」左翼中以社會主義和毛澤東主義改變了自己和人生道路的人們，開始深刻地懷疑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共的社會主義道路，從而使原本理所當然地以大陸社會主義統一台灣、變革台灣的思想陷於苦惱。他們開始思考台灣的社會主義變革道路的另外可能的選擇。左翼統一論逐漸變成了左翼的統一躊躇派。

一九九二年以後，隨著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與私有經濟綜合經濟迅猛發展，這些毛派人士眼見中共對台政策逐步非革命化，及至九七年香港回歸，他們眼見了紳商階級主導的、妥協的民族統一模式，加深了毛派人士的失望。在另一方面，對中共黨的性質、其對台政策、和港澳模式統一的深刻懷疑，並沒有使他們轉而選擇既有的右翼和「左」翼台獨，因為他們的理論知識遠遠超過了各派台獨。

而凡此，都促使毛派人士逐漸趨向於某種「一島社會主義」變革論。九〇年代

中，這些毛派朋友陸續回台，首先找台灣在地左翼統一派——主要是五〇年代肅清中倖活下來的前政治犯和七〇年代在地保釣左翼、即《夏潮》雜誌周圍的年輕世代——尋求同盟。但後者對於民族統一的近於「黨性」的堅持，使他們至今無法走到一起。在「台灣民族論」、「台灣意識論」自八〇年代後在台灣形成一世霸權意識型態的環境中，上述台灣毛派把工作之難以展開，歸咎於滲透到台灣生活之方方面面的「統獨糾葛」，遂有「不問統獨」、「不問民族」的主張。

台灣在地左翼一直把毛派的朋友當作一時尚不能完全契合的朋友。但〈徘徊〉卻不明究理，無端指責這些朋友是在背後陰助「漢族民族主義」，打擊了「台灣民族派」的罪魁，咬牙切齒、破口大罵，突出地表現了它的幼稚與粗暴。

二·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分成古典的民族主義和現代的民族主義。

少數幾個具有悠久歷史、創造過輝煌的文明或宗教的民族，如中國、羅馬和希臘等，很早就有「華」、「夏」、「漢」的意識和認同；有羅馬人、希尼利人、希伯來人的意識。這些我族認同，已不同於單純的血統認同，而在血族之上摻合著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和宗教的強烈尊榮感。

現代的民族主義又應該一分為二。第一種是和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有密切關係的、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隨著商業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市民登上歷史的舞台。資本主義需要廣闊統一的市場，這就需要打破一民族中封建小邦的壁壘，建設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保障資本的自由流動，為資本的擴張做後盾。於是資產階級市民起來革命，打倒封建國家，建設現代統一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不列顛、法蘭西、德意志的光榮意識和民族統一意識和「民主」、「自由」的口號，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鮮明旗幟。這便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國家的民族主義。

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為了爭奪原料和市場向外擴張，爭相分割世界，於是世界進入了帝國主義的時代。世界劃分為兩大部分。一部份是少數的、富有的、資本主義的強大的、剝奪和壓迫者的民族與國家，而另一部份是占世界大多數的、貧困的、前資本主義的、弱小的、被剝奪和被壓迫民族與國家。強大的、壓迫與掠奪性國家的民族主義發展為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藉口傳布基督教化、傳播現代文明，散播「民主」與「自由」，擔負起「白人的負擔」，把自己的「生命線」隨意推到別人的庭院，主張霸權利益，而以殖民地、租界、勢力範圍、保護國等形式宰制弱小的、被壓迫和被掠奪本各族和人民。小林善紀的「日本精神論」、「台灣獨立」和「日台聯合」反對中國，都是日本的民族主義，拒絕承認慰安婦和其他戰爭犯

罪，和美化日本在台殖民歷史莫不是日本民族主義。美國藉口「民主」、「人權」到處干預他國事務，以「安全」知名分裂別人的民族，堅持發展NMD以「防範『流氓國家』」、「保護美國及其同盟國」，也莫不是霸強國的、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

另外一種現代民族主義是弱小的、被侵略、被掠奪和壓迫的國家及民族的民族主義。這些弱小、被壓迫國家的社會都處於形形色色的前資本主義社會——處在半封建、封建、甚至是部族共同體階級的社會，因此尚未發展出伴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而來的現代民族主義。但是列強殘酷的侵凌，使全民族面臨滅亡的危機時，在這些前現代社會中最先出現的是農民的、前現代的、帶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武力與帝國主義懸殊的、以血族認同為基礎的抵抗，如義和團、太平天國起義，如一八九五年後台灣反佔領鬥爭中農民的前現代武裝游擊抗日行動。胡阿錦起義，宣稱要「誅滅倭奴」就是一種血族論的反帝思想。柯鐵說日本人「大非人類……為嗜殺戮」；焦吧年事件首謀余清芳強調「古今中華主國，四夷臣欽」。而日本「倭賊」來侵，使「中原大國變為夷狄之邦」所以要反抗日本。這分明是〈徘徊〉所不憚於咒罵的「漢族民族主義」，充滿了對漢族認同的自尊與驕傲感。而在前現代社會面接帝國主義強盜時第一階段的反帝圖存運動的思想，世界各地都不能不是〈徘徊〉所百般鄙視的「種族民族主義」，只可惜〈徘徊〉的作者的先祖也無從例外。

及至農民的反帝運動失敗，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殖民主義終竟帶來了帶有各種極限性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社會發生重大變化，在通商口岸興起了現代商工城市，出現了資產階級市民和現代工資勞動階級，出現了帶有舊地主根源的民族資產階級。這些和現代世界體系有了聯繫，感受到帝國主義對自己的資本主義發展帶來重大阻礙的資產階級，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發動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例如康梁改革運動和林獻堂等人的改良主義）。其中之激進者則走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台灣蔣渭水等和孫文的辛亥革命）的道路。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運動的第二階段，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這個階段又一分為二。它的初階段往往也脫離不開血族論（如排滿運動）。及至在通商口岸成長的現代無產階級作為社會力量增長，在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後，才逐步發展為在血族論之上豐富了階級論和國際主義的、（半）殖民地現代民族主義。

論民族主義，應該聯繫到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即不同的生產方式），善於認識到西方現代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與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關係，善於認識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與壟斷階級的資本主義之間的聯繫，也要善於認識後進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不同階段、不同階級的民族主義。似〈徘徊〉那樣歷史唯心主義的乾嘍，只能暴露其以「左」派裝扮自己、卻敗絮其中的面目。

由此可見，從民族認同而種族認同而現代的民族認同，有一個歷史唯物論的發展（即與社會生產方式的不同階段相適應的發展），更有一個辯證法的發展，即民族、種族到民主的辯證的、互為孿生的關係。種族意識發源於民族認同，現代民族認同中內包著種族意識。日本帝國主義離不開大和民族主義；德國的法西斯擴張離不開日耳曼亞利安種族優秀論。八年抗戰中發達起來的中國民族主義中，到處可見中華民族認同的歷史驕傲感。歷史唯心主義地把民族主義同種族認同機械地斷絕，說明了〈徘徊〉的非科學性。再說〈徘徊〉疾言抨擊的「種族主義」所造成的種族相殘，也要考慮到這些條件：（1）帝國主義的世界割占，把許多還處在氏族共同體階段的民族硬生生地編入資本主義掠奪體制，並利用和挑撥部族仇恨與殘殺來進行殘酷統治；（2）廣大第三世界地區，在被帝國主義割占之前，從來沒有現代國家的疆界，各氏族、各部族、各種族或宗教共同體依自然的發展而犬牙交錯地生活。但帝國主義為割占的方便，硬生生劃下了疆界，留下大量的社會、經濟、宗教和種族糾紛。二次大戰後，帝國主義策略性地讓殖民地「獨立」，使「獨立」之後社會即刻面臨帝國主義支配所長年積累的種族矛盾的爆發。帝國主義的「學者」和「理論家」以嫌惡的口吻談獨立後社會的種族矛盾，實無非在掩飾殖民體制的罪惡，美化殖民地歷史。〈徘徊〉對所謂「種族主義」的咒罵，其實是帝國主義老爺的論調。

三·階級主義和民族主義

〈徘徊〉疵牙裂嘴的詛咒「漢族民族主義」，其目的是宣傳他的「台灣民族主義」。他說「漢族民族主義」會「麻痺」台灣工人的「階級意識」。這是人云亦云的把階級主義和民族主義對立起來，以「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標榜。但這不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左翼》第十到十二期李崇人的文章〈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對這個問題做了極為精闢的分析。恩格斯以為，為了波蘭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就要優先解決把波蘭從外族壓迫和統治狀況下解放的問題。因為一個民族如果不能從外族支配下得自由，那個民族就無法專注於其他目標（例如階級解放）的達成。恩格斯說國際工人運動，只能是已經獲得自由與解放的工人之間和諧的關係。在帝國主義壓迫下，民族解放的鬥爭是階級解放的條件。

再從亞洲尤其是中國的歷史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鬥爭，與反帝民族解放往往是合二為一而不是對立的。社會主義的目標是獲得解放、自由和獨立的諸民族自由的聯合所形成的大家族。對於殖民地壓迫下的諸民族，反帝民族主義驅動廣大民眾爭取民族的解放，斯而後才有獨立的工農無產階級致力於自己的解放。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在亞洲、尤其是中國帶來人民的勝利。列寧這樣讚嘆：亞洲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帶來社會主義的勝利。在二戰期間，蘇聯以愛國主義動員蘇聯農民贏取反法西斯、捍衛社會主義鬥爭的勝利。把階級運動和民族運動對立起來，是膚淺的

看法。

四·「台灣民族主義」的欺罔

當然，〈徘徊〉反對的只是作崇於其作者腦袋裏的「漢族民族主義幽靈」，卻極力宣傳他的台灣民族主義。左派又怎樣科學地看待「台灣民族主義」，成為理論課題。

「台灣民族主義」的成立，首先要看有沒有一個「台灣民族」的存在。歷史上，「台灣人」從來不曾獨立建國過。她也沒有經過各階段生產方式嬗變的歷程。台灣的原始社會是非漢人（也即非「台灣人」）的原住民社會。由於漢族移住民和荷蘭、西班牙等重商主義殖民主義的干擾，這些原住民的氏族共同體社會的自然發展受到阻害，沒能自然地推演到奴隸社會階段。明鄭以後至於清代，漢族人從大陸帶來成熟的、封建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台灣的社會性質一變。在台灣的地方社會史上，於是就缺少了奴隸社會階段，這也說明了台灣社會不是一個自來自然發展的社會，而是封建時代漢族移民的社會，是中國本部漢族社會發展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很多「台灣民族論」者都以為自盤古開天，就有一個昌盛的「台灣人民族」存在。這苦難的民族陸續受到荷、明、清、日、國民黨「外來」「殖民政權」的統治。

這種刻板說法有兩個問題。明鄭、清廷和中華民國之治台，可不可以和荷蘭、日本的對台統治，在性質上都目為「外來政權」的「殖民統治」。因為〈徘徊〉的作者自詡為一個「左」派，他就應當知道列寧對帝國主義的界說。列寧說，帝國主義有五個特徵：「……(1)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這樣的高度，以致造成了在經濟生活中起決定作用的壟斷組織；(2)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已經融合起來，在這金融資本基礎上形成了金融寡頭；(3)與商品輸出不同的資本輸出有了特別重要的意義；(4)瓜分世界的資本家家國際壟斷同盟形成；(5)最大資本主義列強已將世界上的領土劃分完畢……」明鄭對台灣統治，是一種豪族藩鎮封建統治；在鴉片戰爭之前，清朝對台灣的統治是封建的統治。鴉片戰爭之後，台灣連同全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受到帝國主義資本、買辦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和大地主階級的統治。因此不論是明鄭、鴉片戰爭前後的清代，都不符合列寧的五個條件，把明鄭、清代治台與荷蘭殖民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對台支配等量齊觀，是烏龍「左」派的爛言。

再從人口學觀點看台灣漢族系移民社會的形成過程。

從1640年代末至50年，在荷蘭當局治下的原住民六萬人。鄭芝龍和荷蘭統治當局從大陸沿海運貧困農民移民來台從事半農奴勞動，自1640至61年間，漢族移民從5,000增至35,000，分別居住在打狗、下淡水、笨港、二林、大員等地。

鄭氏治台期間，大批漢族的軍事移民使台灣的人口大增。1661年先後來台士

兵、隨從、眷屬等共計30,000多人。1664年，沿海島上鄭軍眷口、宗室、豪紳7,000人來台。1674年，鄭軍俘清兵二千餘人來台圍壘。80年，鄭軍又從福建沿海撤軍員數千人來台。因漢族移民大量湧入，至鄭氏末期，台灣漢族人口已經超過十萬人。明鄭不是對原居台灣的「台灣人」和「台灣民族」的統治。鄭王朝統治的是自己從大陸帶來的兵員和農民。

1683年，明鄭敗亡，清朝中國統一了台灣。次年開放海禁，「流民歸者如市」、「內地入籍者眾」。但不久施行海禁，但對岸冒禁偷渡來台者每年以十數萬人計。據統計，從1763年到1811年間，台灣的人口從六十六萬人增加到將近兩百萬人。這種高人口增加率當然不是自然的。一代代生養出生的增加率，而是移民性的增加率。在清朝治台前，其所統治的根本不是原住台灣千百年的「台灣人」或「台灣民族」，而是陸續累年來自對岸大陸的漢族「中國人」！

1850年到60年間，台灣作為移民社會的特徵逐漸消失，進入了世代定居的社會。到1893年，台灣人口才增加到250幾萬人，人口增加率下降，呈現人口的移民增長向自然增長轉變。一個自我存在的，有別於中國人的「台灣人」、「台灣民族」的形成說，只能是彌天的謊言。

四〇年代末露出苗頭，五六十年代發展於日本、七十年代發展於美國、八十年代猖獗於島內的民族分裂主義，從其發展歷程看，表現出世界戰後冷戰史的反動烙印。

1943年，即二戰結束前夕，美帝國主義（若柯喬治之流）早已開始占有台灣的陰謀。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47年發生二月事件，內戰形勢開始逆轉。眼見人民革命力量的壯大，在美蘇冷戰態勢不斷升高情勢下，美帝主義企圖以「託管」、「自決」、甚至「獨立」將台灣從新中國分離出去，培植一個反共、親美、獨立於中國的台灣，成為美國至今奉行的台灣政策的基調。而形形色色的獨立論，連同兩蔣政權時代的「反共統一」、「勝共統一」，及今日的「和平演變統一」論，其實都是為執行美國干預中國內政、分裂中國的帝國主義政策服務，是冷戰時代反共、反中、親美的總的意識形態之一環。最近，日本右派漫畫家小林在他的《台灣論》中熱烈讚揚台灣的台獨派精英之反華、親日和反共，叫囂台灣獨立，日本提攜台灣共同敵對中國，生動說明了「台灣民族主義」無非是美日帝國主義意識形態。

五、台灣變革論中存在著民族解放的問題

簡單概括當面台灣社會的性質，台灣是一個「新殖民地·壟斷資本主義」的社會。

台灣作為美國的新殖民地，表現為歷屆政權對美帝國主義政治、外交、軍事和冷戰戰略利益的庸從；表現為經濟上對美依附；表現為一九七九年前台灣成為美國冷戰

前線，表現為台灣學識、文化、思想、意識形態壓倒性的對美扈從；表現為依「台灣關係法」的台灣之美國附屬化。但在這一切之中，尤其表現為自 1950 年以後美國干涉中國內政、長期分裂中國，最近則表現為布置 TMD，把台灣組織到日美安保條約新指針及所謂「有事立法」中，使兩岸民族對峙激化。台海的分裂對立，是美帝國主義干涉台灣人參與過、並為之付出大量犧牲的中國革命鮮明昭著的事證！

因此，高舉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旗幟，反對美帝干預中國內政，反對美帝對台灣的新殖民地支配，克服民族分裂的矛盾，不同於「黃帝子孫」一類的封建國粹主義，而是從台灣社會之新殖民地性質規定出發的。台灣的變革運動，存在著反對美(日)帝國主義新殖民支配的民族解放的課題。而民族統一正是在台灣的民族解放鬥爭的核心。

台灣變革運動不但不能「不問民族」，而且要旗幟鮮明地反對美(日)新殖民主義，反對甘為帝國主義工具，以民族對峙結構為統治工具的歷屆反共反動政權和形形色色的台灣分離主義，最終克服民族分裂的矛盾。

當然，從台灣新殖民地性推演出來的反美帝民族解放的任務，和從台灣壟斷資本主義性質推演出來的、以社會主義變革為目標的「人民民主主義」的方針，有待更深入的討論，但這已不在〈徘徊〉提出的問題範圍，限於篇幅，就留待高明了。

★

揭開帝國主義幽靈的假面

官土生

一、新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方式

很多人以為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沒什麼關係，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就民族理論來看，帝國主義就是以獨占資本為主體的民族國家對外擴張對異民族壓迫的民族主義。是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其本民族的資本積累與擴張的目的，掠奪了全世界的資源，掀起了無數戰事、殺害了無數生靈的最凶惡的民族主義。因此，被壓迫民族覺醒的民族主義當然是他的最大的敵人，是它要不斷掃除的對象。二十世紀上半葉以前，帝國主義是用機槍大砲、用直接的高壓殖民統治、用露骨的歧視、用發動侵略戰爭、用直接的掠奪來進行世界統治，來對付被壓迫的民族主義的。

二次戰後，產生了新帝國主義，它在本質上與過去的帝國主義上並沒有什麼兩樣，但在手段策略上，卻有很大的不同；更高明了，它把它的最凶惡的民族主義巧妙地隱藏起來，戴上慈善又進步的假面，遂行掃除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民族主義。它不再自己直接去統治殖民地，因為那會引起直接的反抗，而在各地各國各民族培養代理人實行間接統治，使被統治民族自己內鬥，他坐收漁翁之利，還贏得被統治民族的敬仰；他不再直接掠奪，而用市場經濟、世界分工、金融操作、IMF、WTO、World Bank，不費吹灰之力，世界的資源就自動跑到他那邊；他不再用機槍大砲等暴力手段迫使其他民族屈服，而是用傳播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發展理論、市場理論、自由民主人權、消費生活樣式、惡魔化民族主義，甚至用左的論述，…等思想體系，不知不覺地改變被壓迫人民的價值、意識，喪失了民族的主體，成為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俘虜而不自知。

當今，戴著各種假面的新帝國主義的幽靈，正在全世界的各意識領域活動，已占著文化霸權的地位；它也許是在你的身邊，甚至已成了你腦子的一部分。他會戴著全球化理論的面具，也有可能戴著環保、性別、人權的面具，甚至戴著民族的或左翼的面具。總之，它是新帝國主義用資本全球化來統治世界的同時，在意識形態領域統治世界的新方式。

二、何六九的「民族論」

何六九批評說：「台灣左翼，只問階級不問民族」。說得對！

他說：「無產階級應有自己的民族立場」。說得好！

又說：「要迎戰台灣的民族問題！」。說得勇！

然而，當他落實到台灣的具體現實，談論台灣的「民族問題」時，卻與上述的原則論完全相反，全部走了樣。憑空吆喝還不算，根本就是走到了左的對立面去了，還當了新帝國主義的喇叭。借用他說的話，那就是：刮去了左翼的皮，發現原來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

洋洋大作〈當幽靈徘徊不走的時候〉，就是他的「民族論」。該文思路混亂，反反覆覆浪費了不少《左翼》的寶貴篇幅。清理一下該文，嚙語般的內容，可以知道，何六九想說的就只有下面兩點：第一，他認為台灣的「民族問題」（也就是民族矛盾），主要在中國民族與台灣民族之間的矛盾；第二，因此，當前台灣左翼的首要任務就是打倒「漢」民族主義，並且高度評價台灣民族主義（雖然他還是為了保住左翼的皮，而遮遮掩掩、閃爍其詞，不敢正面說出來）。

對於他吆喝要打倒的「漢」民族主義（實際上，他想打倒的是中國民族主義，漢民族主義只是一個代罪羔羊），他是怎麼說的呢？

他一口咬定，「漢」民族主義就是「血緣」民族主義，也是「種族」民族主義；是仍盤旋兩岸上空的幽靈，咻咻作響，隨時要掀起腥風血雨；是野蠻的、嗜血的、退

化的、貪婪的、違反「文明世界常規」的，他說，漢民族主義仍然牢牢掌握台灣的文化霸權，興風作浪，不斷製造民族矛盾、嚴重麻痺台灣工人階級意識的提升，不但是台灣工人階級的敵人，也是中國各民族的敵人。

至於他是如何高度評價台灣民族運動(或主義)的呢？他說：台灣民族運動是國民黨壓迫的台灣民族認同、又是漢民族主義的對立體、是民主運動、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民族認同、有新興事務的特質……。

三、是站在什麼人的立場的「民族論」？

是這樣嗎？讓我們來檢驗檢驗他的「民族論」的真假，看他到底是站在什麼人的立場的「民族論」吧！

首先，何六九咬牙切齒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漢」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現實中，是不是仍盤旋兩岸上空興風作浪呢？很遺憾的，今日的中國，不管台灣或大陸，早已不存在他所謂的「漢」民族主義。自從一百年前孫文放棄了「排滿興漢」、「驅除韃虜」的口號以來，它就不再出現了。何六九大張旗鼓地批判「漢」民族主義，只是策略性地把落伍過時的漢民族主義說成是中國民族主義，而得以更盡情地污蔑中國民族主義。而且，當今台灣的上空占文化霸權地位，且咻咻作響，不斷製造民族矛盾，麻痺台灣工人意識的，當然不是漢民族主義，更不是中國民族主義，而是已取得政權的台灣民族主義。何先生！請走出幻覺，看看現實的世界吧！

孫文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民族主義新講中說過：中國民族對外自求解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就是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真義。他所說的「中國民族」就是指：原來的封建的中國民族，在近代的反革反封建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包括漢民族等五十六個大小民族（或族體 ethnic group）所共同組成的現代民族；這個中國民族，在近百年來抵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中所產生的，關於追求中國民族的獨立、建立統一的中國民族國家以及各民族平等的理念、立場和理論，便是中國民族主義。它與二十世紀初以來，在亞、非、拉等一系列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出現的民族主義相同，在理論上繼承了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期的民族主義的進步內容。實踐上，在反帝反殖民統治爭取本民族獨立與解放的民族運動中，扮演一個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性質上，它同屬於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

戰後至今，在美國新帝國主義圍堵中國，介入台海，製造並維持了兩岸長期隔離和對峙的民族分裂狀態的歷史中，中國民族主義是抵抗新帝國主義以及克服民族分離主義的力量，它維護並追求中國民族國家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在台灣，它的目標主要是反帝並追求民族的統一。它是新帝國主義及其屬從者的對立物；是他們的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何六九戴著左翼的帽子高喊打倒「漢」民族主義，跟著新帝國主義攻

擊中國民族主義，無異於在意識型態上幫助新帝國主義圍堵中國，強化中國民族的分裂構造，這不是戴著左的假面的帝國主義幽靈是什麼呢？

何六九爲了攻擊中國民族主義，還狡猾地把中國民族主義抹黑成種族主義。

從民族發展的理論來看，以共同的血緣或血統作爲特徵的族體（狹義的民族），早在原始時代末期，人類的兩次大分工，並且私有制形成之前，就已不存在了。然而，從歷史來看，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在西方的資產階級經歷了上升期的民族主義，進入對外殖民對外擴張的民族主義時期之後，一種以血統、種族作爲民族區分的種族主義突然興起。它是一種思想體系，認爲各種族在智力和道德能力上是先天不平等的，種族的先天差異決定著各種族的歷史發展和文化水平，並主張優秀的種族應凌駕於劣等種族之上。這種邪說，是帝國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體系，在政治上替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鋪路，當辯護士，譬如社會達爾文主義、條頓主義、德國納粹主義…等都是。中國民族主義是在白人的種族主義的歧視和壓迫下成長起來的，深受其害，這是任誰都知道的，它當然是全世界反種族主義的重要力量，何六九居然把這樣的中國民族主義誣蔑成種族主義，這種作法是新帝國主義的新手法，譬如，美國在侵攻科索沃時，所啓動的意識型態攻擊，便是大肆宣傳南聯盟是種族滅絕主義者，到底誰才是種族主義者？

四、要從台灣的社會歷史中來談民族問題

民族和階級是人類最大最重要的社會群體，兩者既有關聯也有區別。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有資產階級的民族觀，也有無產階級的民族觀，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是不是有具體的社會歷史分析，是不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

在何六九的「民族論」中，我們看不到台灣的歷史，也看不到台灣的社會，更看不到世界的內容。該文除了反覆使用一些左翼的名詞外，完全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歷史分析，只有空洞名詞的叫囂，這註定它必然是假的左翼民族論。

要想從左翼的立場談台灣的民族問題，絕對不能離開台灣的具體社會歷史來談；也就是說，台灣的民族問題必須放在台灣社會歷史的基本性質（規定性）中來談，否則都是空談。

五、怎麼看在台灣的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台灣登上了近代世界史的舞台後不久，就成了中國封建國家的領土，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部分，這是台灣社會歷史的大前提，所有談論台灣的民族問題絕不能離開這個前提。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在西方帝國主義壓迫、剝削、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台灣作爲封建中國的一部分，也一起淪爲半殖民地。但甲午戰爭後割台，使台灣完全淪爲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而大陸則繼續著如孫文當年所面對的「日本駐兵於南滿，俄

人駐兵於蒙古，英人駐兵於西藏，法人駐兵於滇黔，日思瓜分」的悲慘的半殖民地狀態。台灣在殖民地條件下的反帝反殖民族運動，與全中國的半殖民地條件下的反帝民族運動，雖然在歷史條件上有不同之處，一個是殖民地，一個是半殖民地，當然在形態上也不同，但性質上都是屬於中國民族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而運動的理念目標也都同屬中國民族主義的範疇。台灣的抗日反殖民族運動，從早期的反割台鬥爭、反日占武裝抵抗，及至有近代性格的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和戰爭末期的「光復運動」，它的目標，或隱或現地，都是朝向復歸中國的方向，而不是獨立建國，可說是全中國的反帝民族統一運動的一個特殊形態。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台灣以「光復」的形式復歸中國，而不是像朝鮮以一個民族單位獨立建國，就是一個明證。它是台灣社會歷史在民族問題上的必然歸趨。

戰後初，兩岸曾有一個短暫的統一的民族國家。但由於民族內部左右鬥爭的國共內戰的擴大，再加上美國新帝國主義的介入，中國的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完成全民族的統一的前夕，美國新帝國主義出兵台灣海峽，把國共內戰以海峽為界長期固定化起來，自此，台灣成為美國在東亞冷戰中，圍堵大陸社會主義中國的反共前哨基地。美國一方面全方位強力支持國民黨的反共獨裁政權，透過反共獨裁政權的手，對全民戒嚴，並發動白色恐怖全面肅清台灣的反蔣反美進步力量，另一方面，用美援著手改造台灣的社會經濟以及社會意識，創造了一個依附美日的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使台灣成為資本的樂園，美日的國際加工基地。這就是美國在台灣的新殖民主義支配的真相；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支配，捏造、維持並強化了台灣與大陸同民族間的分離與對峙的構造，成為五〇年代以後台灣社會性質的主要規定性。是諸如：國民黨反共獨裁政治與依附型資本主義經濟的雙重構造，以及在意識型態領域，如何六九所指的官方「漢」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國民黨黨意的中國民族主義）和民間的唯「美」是從的價值觀的並存現象，以及其他社會諸問題等結構性問題的總根源，階級問題、民族問題更不用說了。沒有看到這一點，就無法掌握戰後台灣社會歷史的本質，容易落入空論，甚至滑向帝國主義者的觀點。

對這樣的台灣社會歷史規定性的認識，在七〇年代的思潮以及鄉土文學論戰中，曾被觸及也有類似的討論。可惜，進入八〇年代以後，卻被洶湧而來的「台灣本土論」、「台灣意識論」所淹沒；在新的歷史時期，分離主義的台灣意識論取代了國民黨的反共意識論，成了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最愛，在台灣的意思識型態代理商。

新的歷史階級始於一九七九年；在政治上，中美建交、台美斷交、大陸提出「和平統一」以及美國「台灣關係法」出台的變動，搖撼了國民黨反共獨裁政權存立的基礎；在經濟上，以一九八五年七國高峰會為象徵的、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壟斷資本，所發動的「新自由主義」世界戰略，啟動了台灣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化、國際化、經過

一連串股、匯、房地市的金錢遊戲，台灣的本土資產階級掙脫了國府的胎衣，登上了台灣的政經舞台；在意識型態領域，這同時，分離主義的台灣本土論、台灣意識論乃至何六九讚美的台灣民族論也紛紛躍上舞台。在這背景下，原本在七〇年代隨著台灣本土資產階級成長起來的，親美、反國民黨獨裁的民主化運動，在國民黨瘋狂的壓制下，也走上了嗜用省籍矛盾以台灣人對抗外省人的訴求來擴大政治力量，蔣經國解除戒嚴和李登輝體制鞏固後，終於完全質變為反中國的政治力量，把自己的階級和集團的利益冒充為全台灣人民的利益，甚至有人炮製了一個「台灣民族論」，把台灣人民戰後以來，在美國支持的國府獨裁政權與資本的雙重壓迫下的歷史怨憤轉化為對中國人的仇恨，對異民族的仇恨，把台灣人民獨立自主的願望導向獨立建國，並誇稱它為「台灣民族主義」，以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它是八〇年代以來美國的「台灣關係法」體制的產物，也是美國新的牽制中國戰略下的產物。它一貫主張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公投論」、「自決論」、「金馬撤軍論」…等，都是執行了美國在五十多年前在介入台灣分離台灣的歷史中策劃的理論，它美化日帝殖民歷史、贊同日美安保條約、希望日本把台灣列入日美安保範圍、爭取TMD…等等，都暴露了它並不是如何六九所誇贊的那樣，「有新興事物的特質」、「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民族認同」。它取代了並進一步承續了國民黨的反共主義，把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意識內化為台灣人意識，繼續執行美國圍堵、牽制中國的任務，維持兩岸民族分離和對峙的構造，並保護了美國在台灣的利益，保持了美國在台灣人民心目中的慈愛又進步的面貌。

六、帝國主義與台灣的階級意識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它是以反共戒嚴意識鎮壓了台灣工人的階級意識；今日，在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統治下，就是以這個台灣「民族意識」（或稱為「主義」也好）麻痺了台灣工人的階級意識，阻礙了台灣工人階級對遺留的反共意識的清理，延滯了台灣工人早日對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認識。沒有認清這個問題，沒有超克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反共主義，乃至這些主義在當今台灣的總代理——台灣民族主義，則台灣的工人階級意識是不可能茁壯的。

當今的中國民族主義，仍然也必然是一個以反新帝國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現實中，民族主義（或運動）應以反帝與否作為判定真假的依據，沒有反帝內容的民族觀點（運動或主義也好），就會滑向帝國主義那一邊而不自知，或成為帝國主義的幽靈。中國民族主義及其統一運動必然是以反帝為前提，只有這樣的中國民族統一運動，才會消除新帝國主義意識及其在台灣的代理意識對台灣工人階級意識的長期統治，台灣的工人階級意識才會茁壯起來。而揭開帝國主義幽靈假面的工作，更是一個長期艱巨的工作。



帝國主義打造的以漢族民族主義為敵的「台灣民族主義」 才是虛無自虐徬徨徘徊的幽靈

夏 桐

《左翼》第十五號所刊何六九先生文章——〈當幽靈徘徊不去的時候〉（以下簡稱何文），使用相當多的文字，很凶猛的抨擊「台灣左翼人士」的「漢族民族主義」認同或本質。何文反映出一些問題，應予討論。為求討論不致渙漫失焦，故不宜依照何文的方式論述，目的在希望關心這些問題的人，特別是年輕的朋友們，能比較直接與切合實際的有所了解。以下是幾點陳述，就教於各方朋友。

（一）何文的企圖心不小，可惜在重要與基本的史實認識上，以及必要的相關理論的素養上，都有不足的缺失，因此，蕪長的何文反而表現得像一場雜燴式的叫嚷，內容混亂喪失說服力，十分失敗。原則上，何文狂亂詬誶的「漢族民族主義」，除非業已經由持不同立場與觀點的人士充分討論或論辯，大家都比較確定了它的義涵，再做深入的探討方為妥當，否則像何文這樣，跳出來便用指名叫罵的措詞指稱「漢族民族主義」，便是一種很膚淺、不可取的態度，這會讓人不想跟它對話。因為，遭到何文濫射的砲火所波及的一方，第一感覺就是何文只是在作粗魯的挑釁，好像街頭的飆車惡少，肆意的攻擊無辜的弱勢行人。而對這種人，應該報警處理才對，或者再把他們送交精神輔導單位加以治療，來幫助他們正常成長遠離歧途。

無從得知何文是以什麼自我定位或立場大放厥辭，不過耐著性子讀畢全文，勉強給人這樣的「心得」：即何文認為，台灣的左翼人士必須放棄或抗拒「漢族民族主義」，好讓何文中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得以取而代之。這是要求或命令台灣的「漢族民族主義」在台灣讓路退位，而如此就可以避免或解決掉台灣工人階級因為這兩種不同甚或敵對的認同所導致或可能導致的分裂，進而台灣的左翼人士也就可以因此告無罪於「左」了。何文耗費了一大堆囉里囉嗦的話，要說的竟然是這麼一個意思，似乎煞費苦心，但它的一廂情願卻令人啼笑皆非。

何文中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也缺乏明確的內涵，但它卻勇於指令左翼人士先行解除自己的「漢族民族主義」認同，俾不妨礙台灣工人階級（全體）都去接受或服膺「台灣民族主義」。人們不免要質疑，如依何文之意，要怎麼才能辦到讓左翼人士漢族民族主義者放棄他們所信仰的主義？何文有什麼本事可以把它認為那麼不好的「漢族民族主義」的想法移植到這些左翼人士的腦袋裡？而且，何文似也有必要在針對左翼漢族民族主義者叫陣的同時，也告訴台灣的工人階級，一旦接受或認同了「台

灣民族主義」，台灣工人階級會跟此前認同「漢族民族主義」時，有些什麼不同？何文在困難於或不能明白定義「漢族」跟「台灣民族」的差異與「敵對」究竟何在的情況下，一味作空洞的喊叫，恐怕只會引起左翼人士的訕笑，而且也是全無可能說服工人階級改換「舊」認同建立「新」認同的。

何文的鴨霸自大在於，它恫嚇左翼人士，指稱「漢族民族主義」將分裂台灣工人階級，因此，如果既是左翼人士，但又造成台灣工人階級的分裂，豈不是走到自己的反面？何文狡獪的企圖利用左翼人士使命感的對工人階級的認同與尊重，來玩弄這樣的一個弔詭，其實剛好反證它自己對台灣工人階級的無情與小看，甚至只是企圖把工人階級當成攻訐「漢族民族主義」時的可利用工具。何文並不擔負對台灣工人階級任何責任，特別是在道德上。何文拋出台灣工人階級中出現的對所謂「台灣民族主義」認同，作為台灣工人階級已（有部分人）是敵對於「漢族民族主義」的解釋，是冷血與自以為得計的進行對左翼人士漢族民族主義者的鬥爭，目標在破壞台灣工人階級與左翼人士的天然同盟關係，並要用扭曲變造的所謂「台灣民族主義」把台灣工人階級加以毒化。何文幹的是分包「台獨」工程的某一個部分！與此同時，它學舌般的左翼腔調，尤其令人不齒。

（二）何文在後段終於承認它站在美日帝國主義的一邊，是以一種同屬漢族卻不肯認同漢族血緣的「台灣人」，擔任「反華勢力的前鋒」。何文沾沾自喜於漢族民族主義者對它的指責，來證明它是如何的以反漢族為榮。但是，何文也正是因為如此，洩露了它自己徬徨尷尬的靈魂，這才是幽靈的形象：它不再是漢族，而是美日帝國主義的傀儡，並且以充當好這個傀儡的角色，換取主人的酬賞——建立一個非漢反漢的台灣民族之國為「台灣民族主義」的目標，但包括它自己在內，無人知道它在那個目標之前要徘徊游蕩到哪一年？這是個永無機會投胎做人的幽靈。任何人的內心如果是這般狀態，它的虛無荒涼，陰暗孤獨，絕望自虐，是可想而知的。這一悲劇的主要原因出自一種對自己的血緣的唾棄鄙視，卻自以為這樣可以交換到異族的欣賞獎掖，而取得一種優越於本族同胞的地位，但事實上，這種人將永遠是異族的傀儡，漢族人口中的幽靈。其生命是何其無意義。而如果漢族是真正健康雍容的，這種人正是我們民族應該無私的付出悲憫同情，盡可能喚回的迷路亡羊。當然，漢族也不應坐視放任這種人像病毒一樣，在同胞之中複製繁殖，散播自虐自毀意識，使得漢族無法從次等人類的羞恥困窘境遇中自救超越，如此而使得美日帝國主義的對華戰略坐享其成。

必須把何文當作漢族中少數有民族自卑感及民族虛無主義精神疾患的一種自白，漢族同胞應有醫治它的愛心與能力，這是漢族民族主義的真諦。

（三）近現代以來發生在漢族以及全中國的重大災難，是不可能抽離帝國主義因

素的。任何抽離帝國主義因素而又企圖討論與解答這段歷史中的與今天兩岸的重大問題，不是無知就是有意的逃避，於事是無補的，反而更有誤事的可能。漢民族有必要重視這一教訓。

今天的中國，包括台海兩岸，總共有近十三億的人口，而兩岸現行的體制，也都是強調國內民族一律平等的，尤其中國大陸在這個問題上的實際施政，在全世界都享有肯定的口碑。何文在這裡有意的將兩岸間在統獨問題上的爭端，導誤成漢族與「台灣民族」的衝突敵對，漢族在「文攻武嚇」「台灣民族」，恐怕很難說是出於無知，而更是出於故意，這種居心是令人不以為然難以苟同的。即使何文真的發生功效，左翼人士的漢族民族主義者全都自棄立場，向「台獨」路線投降，跟祖國一刀兩斷。然而一個全都是「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台灣工人階級，又能怎麼樣的強化「台灣民族運動的生命力」？何文的最終目標是要驅策台灣的工人階級在「台灣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時分，都能奮勇挺身，去跟「猖狂囂張」的漢民族決一死戰，為「台獨」捐軀嗎？這是為「台灣民族」而犧牲還是為美日帝國主義的反華陰謀當炮灰？何文有責任作應有的說明。工人階級不應該是美日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反華陰謀的工具。

左翼人士面對公共議題時，思想、立場是容許分歧多元的，也是容許討論辯論的。只有這樣，在左翼人士四周的兄弟姐妹們才有機會，因此擴大或深化自己的思維與眼界，以利自己做選擇。基本上，左不左，不是什麼框框，這樣那樣的民族主義，也不是什麼框框，重要的是在一個完整的思維思辨過程後，我們做什麼選擇，而這一選擇是利我們民族的，有利於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有利於弱小民族的。 ★

以偏蓋全何以成全

何 苦

●假設：甲、乙、丙三個人，欲選擇A、B、C三個方案，其偏好順序為甲： $A > B > C$ ，乙： $B > C > A$ ，丙： $C > A > B$ 。若依多數決，則以甲、丙二人均有 $A > B$ 之偏好；甲、乙二人均有 $B > C$ 之偏好；依「遞移律」則 $A > C$ 成立。然而，乙、丙二人均有 $C > A$ ，又顯與 $A > C$ 矛盾。本例在「公共政策與選擇」中，常被引用。

●錯把「主觀共識」轉成「客觀法則」。「統獨」的公投若可行，台灣來一次「宗教」公投，再將基督教切割成「基督教長老會」。如此，若多數選佛教，長老會是否要改信佛教，或搬到美英去居住？又如此的公投，需幾年舉行一次？再來個大舉移民遷居？本例若推到極端，以這「實用主義」的觀念：反正真理是什麼，先不論，用了再說，有用就是真。如此，煽動群眾、騙取選票（有錢時可買票，沒錢時騙票），當選了，就表示符合真理。迨執政，再改變承諾又何妨？如此，歷史上的法西斯，起先靠欺騙而贏得支持，如希特勒，不是諷刺嗎？

諸如此類，以不同的範疇（民主多數決、數學遞移律，有用所以是真…）做隨意切割，而無視於事物發展時部份與全體、過去與未來、內部與外部、公共與私人……之連繫與有機互動，當然會有：以「幾何同心圓」由內往外，由台灣往外之親疏論的提出。抑或：以「外來政權」之地理觀念，模糊了本國暴政與外國侵略。秉此，《左翼》第十五號有文批判「漢族民族主義」。是否可舉歷史上某時間、某人物之某政策，而下定論到整個「民族論」，如此「台灣民族主義」就是否完美無缺了？美國的少數民族政策是否比大陸還高明？藏人擺脫農奴、文盲又如何解釋？「次殖民地」與「殖民地」有何不同？「次殖民地」的病變所導致內部的矛盾是否應持續予以固定化，再加擴大？或應反省、癒合，臻全體人民於大幸福？

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大陸、台灣時，日本廣大人民也是受害者。時至今日，動不動就罵「日本鬼子」、「拒用日貨」、「拒絕日本文化」，某種意義上可以理解，但某些行為有些極端也是事實。如此，對不少日本人，為不論是大陸或台灣的解放進步事業做出積極貢獻的人們，總是不太公平吧！

不錯，中國人又不少缺點必須深加反省。大陸、台灣的人民很多對台獨也抱有理解與同情。時值二十一世紀，人們何不再將眼光由台灣、大陸擴大到亞洲甚至世界？由左看右，由右看左；由上看下，由下看上的以偏蓋全，均非全面性。筆者也不敢斷言本文就不會以偏蓋全。當「民進黨」要向台灣百姓給他一點時間來表現時，同樣地，為什麼就不會想到：也要給十三億的大陸一點時間來逐步完成人類史上帶領由封建而民主，由饑餓而富裕，由被封鎖而獨立自主，由落後而進步的壯舉？台灣與大陸難道就不能共同來攜手合作嗎？當然，筆者不會天真到認為這是一條平順的道路，但反而這才能更彰顯出這項事業的價值與對人類的貢獻。★

從阿瑪斯號油污事件看全球化的一個病徵

劉鳴生

阿瑪斯號漏油，導致綠色執政漏氣。汪洋中的一條沉船，讓我們看到一個新興政權的沉淪。鵝鸞鼻海域油污事件因當局的延誤輕慢，惡化成美麗寶島的生態災難，如今，更因究責而衍化為新政權內訌的源頭。交通部長葉菊蘭和環保署長林俊義可能因此下台，內閣的搬風勢將再度引發政局的動盪。

八掌溪事件的官僚殺人，犧牲了四個工人的生命。油污事件也因官僚的麻木遲鈍而斷送了台灣最美麗海域的生機。民間的怒吼雖震動了幾個官位，生命與生機卻已都無法挽回。然而，牽涉到一個政權、一個社會的事件，尚可以用懲處尸位者的手段來平息民怨，用檢討失職者的過程來記取教訓，若是事件關係到全球化體制與國際社會，那麼，我們可能只能讓無力感像油污一般四處漫漶。

事實上，近二十年來，國際貨輪、油輪因船難油污黑潮而造成地球生態災難的事件層出不窮，這其實是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體系之下，國際海運業界盲目競爭、瘋狂追求利潤的結果。僅1996年，就有70艘油輪在全球海域沉沒，1999年12月12日在法國布列塔尼(Bretagne)海域遇難的艾利卡號(Erika)油輪，油污黑潮使蔚藍海景為之變色，對海洋生態、漁業、觀光產業都造成致命的打擊，沉船漏油的污染彷彿是法蘭西國土上長出一片膿瘡，迄今仍是令人揪心的傷痛。

艾利卡號掛著馬爾他的國籍旗，船主是希臘一個政商實力雄厚的運輸集團，基地港在倫敦，負責營運管理的是義大利的一家公司，被英國的一個經紀商所租用，船員隊伍由印度人組成，發生船難時的航行任務是為法國的TotalFina煉油集團運送原油。一艘船竟然擁有這麼複雜的身分，令人眼花撩亂，事實上並不是偶然！船籍身分的迷宮化，是國際海運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叢林法則之下，為求降低成本，增強競爭力，普遍使用的避責、避稅手法。

目前約莫有15個微國小國，在國際海運市場上販賣主權營利。這些人口總共僅占全球人口0.4%的迷你國家，基本上對於海洋運輸並不具有查驗、控管的設備和能力，卻讓全世界大部分的貨輪、油輪，掛著他們的國籍旗在全球海域上航行。船隻在這些被稱為「稅賦天堂」的國家入籍，掛著「權宜旗」航行，既可享受稅賦優惠，降低成本，又可以掩耳盜鈴，利用國際上煩瑣的外交程序和異質的司法體系，規避航行風險上所應擔負的賠償責任。

這種扭曲、病態的現象，如今卻成為全球化的常態！不妨去問問台灣航業大亨張榮發，長榮集團所屬的船隻，究竟有幾艘是掛著台灣的旗幟？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的困境和局限，也許可以是藉口，避稅、避責恐怕才是主要的考量。艾利卡號複雜的身分，使得法國對於油污黑潮的索賠陷入迷宮一般的困境。同樣的，「阿瑪斯號」油污事件，破壞墾丁國家公園自然生態，社會成本損失鉅大，台灣當局也提出要對船東求償。然而，恐怕光是釐清事主就是一個艱鉅的任務，更別提外交交涉和國際訴訟上的曠日費時！★

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癡呆的左派？（上）

——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

卡維波

如何看待今日的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坊間的某類左派、仿左派、人文主義派、濫情脈脈的浪漫派都認為：消費文化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控制的新形式；廣告創造出虛假的需要或慾望；通俗文化乃是文化工業所操縱的產物；通俗文化複製主流社會的意識形態，而青少年則是最容易受騙被洗腦的受害者。這些是本文所要反駁的觀點。在所有的人實際上都處於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內部**的今日，知識份子若還假裝處於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外部**之某個戰略高地，並且在這個不存在的外部擺出全面拒絕、全面揚棄、全面批判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的姿態，那就只是思考與實踐的懶惰無能，企圖否認消費與通俗文化本身也是戰場。如果消費與通俗文化不是等待社會主義革命後自然消亡或光復的領地，相反的，它本身就是戰場（亦即，一個不能被「下層建築」或經濟結構所決定的戰場），那麼左派別無選擇地只有從內部抵抗，亦即，這個領域內的抵抗資源與策略必然也是來自商品消費和通俗文化之挪用。這就是考驗左派的創造想像力、要求左派搞笑可愛性感（即生產愉悅／認同／慾望）、挑戰左派能不能做到青春睿智（而非成年癡呆）的關鍵了。

這篇文章分成A B兩個部份。A部份是把這個爭議放在台灣的脈絡內，穿插著我對別人論戰文章的回應，這算是為進一步討論掃清障礙；為了增加閱讀的樂趣，我還附錄了個小故事專欄來生動化我的論點。B部份則是比較直接處理本文的主要問題，不清楚「青春睿智卡維波」論戰的讀者也可以直接閱讀B這個部份。

應當聲明的是：「左派」應該是千奇百怪、各路人馬都有的，所以文章中被當作批評標靶的「左派」，只是某類左派，不過為了行文方便就簡稱「左派」吧。

A計畫

一、爭論的背景

這篇文章一方面回應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維波〉（載於《左翼》第15號），以及間接回應有關減肥塑身與女性主義的幾篇文章和零星的網路議論，另一方面，我也企圖回應近年來和台灣公民社會自發的媒體監管運動密切相關的媒體批判或批評。易言之，我認為當前有一種主流的媒體批評論述已經成為現今台灣幾股不同來路的政治與實踐立場背後的共通論述，所以不但林深靖所呈現的左派會使用這個批評論述，而且構成目前台灣公民社會主力的幾股力量也會使用同一批評論述或批判論述。這幾股

力量包括主流的婦女兒童福利與教育團體、問政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宗教服務團體等等。對於這幾股力量所整編形成的台灣公民社會（我則偏好稱之為「市民社會」），在歷史演變、社會動力、權力策略方面更進一步的分析，則必須留到筆者未來對全球化下台灣社會變動形勢的分析再說。這個媒體批評的效應之一，就是對於性偏差／年齡偏差／各種新科技偏差的建構。不過，我在本文內只駁斥這個媒體批評論述關於消費／通俗文化／廣告／青少年次文化等錯誤的理論假設，故而本文還不是對此一批評論述所接合的反動退步力量的總清算，只能算是清算鬥爭的序曲。

當前台灣市民社會所使用的媒體批評論述，幾乎無例外地採納了類似法蘭克福學派的菁英立場（雖然該學派立場有其反納粹的歷史社會背景），也充滿了傳統左派對於文化工業、廣告與消費的假設與修辭。事實上，自從社會主義國家崩解，傳統左派路線不再是一個有效選項而只是一個有效修辭之後，各種各樣的保守派也開始挪用傳統左派的假設與修辭來應對全球化下新變動的文化政治。最近，張錦華與黃浩榮批評某個電視塑身廣告而於《中國時報》發表〈還童的女性？弱智的男性？〉（時論廣場版 2000 年 12 月 18 日）一文，即是這類典型的媒體批評。

針對上文，我寫了〈老化的媒體批評·弱智的女性主義〉（《中國時報》2000 年 12 月 日），從「女性情慾」與「青少年文化」兩條主軸來批判前文。之後有數篇文章回應我的文章，其中包括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維波〉。現在我針對一些女性立場的回應繼續寫了〈女性主義標準答案錯在哪裡？——多元性感的神話與現實〉（即將發表）；本文則是針對青少年文化與晚近主流媒體批評而作。

我覺得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維波〉代表了比較一般常識性的批判說詞；不過我回嘴兩句、借題發揮還是應該的。故而以下我針對論戰的部份回應一下，但是我把比較觀念性的問題留到 B 部份才處理。

二、爭論的主軸：消費的文化意義不能被生產（者）所決定

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維波〉講到塑身事業的老闆黃河南花大錢買廣告與捧明星，長榮財團的張榮發花大錢支持陳水扁，說他們都是透過廣告包裝，創造認同，讓人們產生慾望去投票與購買商品服務云云。但是這些事實到底證明了什麼？林深靖是否假設：只要花大錢，就可以保證效果？廣告與購買就是簡單因果關係？（這當然都是錯誤的假設。）他是否認為資本家藉著商品所意圖生產的意義與認同就是固定不變，而非不斷被挪用與轉換，甚至可能形成對抗的意義與認同？他究竟如何看待「現代的商品生產與消費也同時是意義的生產與消費，意義的消費則經常具有愉悅與培力的效果」此一事實呢？是否只需持一負面態度就完成了左派的「批判」任務？

林深靖不斷強調資本家的財大氣粗、資本家生產出來的意義鞏固了父權資本主義。他可能以為這些事實就自動証明了消費產品的反動，因為他誤以為通俗文化與消

費現象都是資本家意圖的實現；他以爲人們排隊買Hello Kitty就證明了資本家的宰制與勝利。這些其實都沒有碰到我文章的主要論旨。我關心的是：（例如）排隊之前或之後的Hello Kitty人生，Hello Kitty在自我與互動中的角色，如何談論與挪用Hello Kitty以產生各種反抗與顛覆的意義等等。畢竟，利用Hello Kitty的資本家並沒有想到有人會給兒童看Hello Kitty打炮的圖片（請見<http://intermargins.net> 網站內倡遊妓報／倡遊學園／國小篇），也無能關心或預料Hello Kitty是否會造成什麼權力效應等等。而左派如果只是擺出批判姿態，把所有通俗文化與消費很輕便地歸檔到「父權資本主義生產與複製」之內，這是一種與現實不相干、沒有實踐能力、也沒有抵抗著力點的詮釋。

事實上，通俗文化、廣告與商品所構成的意義，很多時候是曖昧的（例如不會是純粹異性戀，也會和跨性別或同志調情；不會是一對一，而可能是勾動外遇慾望）。即使其文本的字面意義或現實意義確實是複製主流意識形態的（例如充滿年齡歧視），左派或任何批判詮釋的任務就正在於進一步挪用轉化其意義（例如使之反轉為年齡抗爭的意義，或者編出其階級抗爭的意義等）。

把現有的意義挪用或編出反抗或顛覆意義的詮釋，不但需要詮釋者的想像與創造力，也需要詮釋者深入通俗文化與消費主體的生活與立足點，因為後面這些主體早就在各自的生活脈絡與社會位置內產生出各種具有抵抗意義的零星詮釋，群眾的智慧及其被壓迫的處境可以幫助詮釋者編出新的抗爭與意義。如果把群眾當作盲從的傻瓜，或者只看到生產領域，那麼就是放棄文化詮釋這個重要戰場，也因此會忽視在生產過程以外、彰顯於消費文化領域內的許多權力關係與問題。

例如，如果只是貶低排隊購買Hello Kitty或減肥瘦身的人群，譴責製作Hello Kitty的童工血汗工廠，或者指出減肥風潮讓資方大賺其錢等等，這些都還沒有觸及與生產領域同樣重要的消費文化層面，更不能因此證明所有相關的實踐在每個權力關係的面向都是反動的。

傳統左派認爲真正的戰場在生產領域，其他權力問題（如性／年齡／性別／族群等）解決的關鍵在於階級權力問題，因此對於各種抵抗形式也都以一個先驗現成的「整體」來評估。這種態度自然會輕忽（例如）減肥或追求性感對於青少年、老年在不同生活脈絡內所可能產生的諸多文化意義與複雜效應。（對於傳統左派所主張的「階級」與「結構」的雙重優先論，我與一些朋友曾以「人民民主」的綱領來批駁）。

三、做身體

上一節我把雙方爭論放在綱領的高度上來總結，現在則回到具體的減肥塑身問題。

減肥是一個很普遍的實踐，我很懷疑減肥會對不同性別／年齡／性／身分有同樣

的文化意義，或是對個人處境都有相同的影響。我不認為父權資本主義壟斷了減肥的意義；我認為減肥的重要面向之一，便是減肥具有晚期現代的「做身體」之意義。

「做身體」是個簡化或許有點誤導的縮寫，意指著 Anthony Giddens 所講的「籌劃身體的反思過程」(reflexive project of self)，它表現於身體管理，也在形形色色的身體管理中將身體當作一個開放可塑的籌劃，體現著自我、生活風格或認同。這種「做身體」現象與動力的出現，和晚期現代的社會趨勢相關。從身體管理這個角度來理解普遍的減肥現象，也就是不把減肥視為單一「外力」所完全決定的身體，而是身體本身、現代自我與諸種現代力量所建構的身體。

在這裡需要指出，「做身體」是男女老少與各個階級都存在的晚期現代現象，並不是林深靖在〈青春睿智卡維波〉中所說的是「富貴閒人的專利」。因為身體管理不是特指去參加美容事業的昂貴減肥班；事實上，還包括戴耳環、唱KTV、禁慾、刺青穿洞、避免污染風險的食物、美容、吃藥、性、運動、荷爾蒙治療、體態、打坐、泡湯、做出性感模樣、養生、彩繪指甲、抗失眠、拍寫真、飲食攝生、束胸或束屛、入珠、化妝、避孕、作息、增高、裝飾、留剪染燙頭髮、扮裝、變身等等不一而足。林深靖以為在 7-11 長時間打工的青少年就較少機會「做身體」，恰恰是看不到青少年打工的身體規訓與日常生活(校園、家庭)身體管理的關係，也看不見長時間打工的動力與身體的來源、以及他們下班後的人生。林深靖把「做身體」當作「富貴閒人的專利」，也就是忽略「身體」這個戰場，彷彿身體的爭戰不發生在「富貴閒人」以外的身體上。這是一個很錯誤的假設，也因而不可能在今日的身體與文化中發現新的抵抗策略／論述／空間。

四、自主性：形上學還是辯證法？

在另一個地方，林深靖好像也講了些如何介入青少年次文化與「做身體」的方針。他先引了我的話，然後加以評論，以下就是他所說的話：

卡維波又說，今日的青少年，「在全球化的傳播網絡內，從新宿或倫敦取得更多做自己和做身體的慾望與符碼，編出一個個和父母與教育制度的規訓相衝突的身體，並且透過這個衝突與爭戰來取得自主。」為什麼青少年爭取「自主」，不是透過個人與生活環境的對話，不是透過生命經驗和生存實踐形成主體的歷史感(historicite)，而必須透過「全球化的傳播網絡」，變成放眼新宿的「哈日族」，或是遙望倫敦的「skin-head」？

對此我想做出兩點評論：第一，關於「自主」。第二關於「全球化」(留在下一節講)。

當前主流的(從傳統左派的批判論述而來的)媒體批評論述，有一個十分策略性的論述技巧，就是把「自主」形上學化以及選擇性地運用在偏差的或新興的(可能攪

擾現存秩序的) 群體實踐上。這也就是說，她們把「自主」放在類似「自由意志 vs. 決定論」的形上學架構中，只要是偏差的、新興的集體現象，就以「社會結構決定」為理論依據，以簡單因果關係(例如廣告宣傳造成虛假慾望)為證據，來說明群體喪失了自主性。有趣的是，在大陸熱與Hello Kitty熱，兵馬俑熱與刺青熱，高行健熱與飯島愛熱等等對比中，總是只有後者群體被視為喪失了自主性。(當然，相反看法也還是存在的：例如，台獨認為大陸熱是台灣自主性的喪失，中共則認為高行健熱是西方炒作，中輟生則認為被強迫去參觀兵馬俑的在學學生很可憐等等。)此外，當一種群體實踐不再新興(不再形成令人矚目的熱潮)，而且不再限於特定人口群時(如青少年)，此一群體實踐既然已被馴服收編，也就不再被視為偏差，更沒有「自主性」的問題。例如，手機熱(特別是青少年的手機熱)曾被視為炫耀性消費或消費自主性喪失的表現，但是隨著手機的普遍，這個問題也就很少人提起。一天觀看三、四小時電視曾經被視為電視成癮，但是現在已經成為全美的平均電視最低觀看時數，也就沒成癮之說。相反的，現在卻有網路成癮之說。當然，等到全民日夜上網後，網路成癮之說也就會完成其時代功能了(在過渡期幫助主流鎮壓可能的權力秩序不穩定因素)。

總之，從買米吃飯、戀愛結婚、打工上班，到買Hello Kitty、手機、上網、閱讀資本論、刺青染髮，這些無不是在一一定的社會結構限制內、社會文化建構之下的主體的行動。從中區分「自主」與「非自主」行動，此一形上學論述本身便有其「偏差控制」(social control of deviance)的權力效果。

我建議從辯證法而非形上學來談論自主：我們不必費心地去否認主體作為行動者的能動性；相反的，我們要強化被壓迫者的能動(agency)，我們要為他們培力(empowering)、讓他們得力壯大(empowered)，我們要使他們更自主。這至少意味著(例如)我們要生產更多顛覆現實的反對論述，製造更多的矛盾與對立，因為自主總是在對立矛盾與衝突鬥爭中產生的。

不把「自主」形上學地看成免於權力或社會建構的自發，而把「自主」當作矛盾衝突的效果，並且從此辯證觀點來看青少年次文化，我們便可以發現我之前論斷的「睿智」了。我在前文曾說：

今日青少年在全球化的傳播網絡內，從新宿或倫敦取得更多做自己和做身體的慾望與符碼，編出一個個和父母與教育制度的規訓相衝突的身體，並且透過這個衝突與爭戰來取得自主。易言之，青少年的身體風潮與性化，是其追求並展現自我的萌芽努力。這些商品化的性感身體信息影像或許是另一種身體規訓，但是青少年正在利用消費文化的身體規訓來對抗父母師長強加的禁慾身體規訓，而在這個爭戰的縫隙中壯大自己的自主性。

這就是從辯證法而非形上學的觀點來看「自主」。從這個觀點來分析青少年自主性，簡單的說：今日「消費／通俗文化」與「家庭／官式文化」是有矛盾對立的。由於政治社會化以及許多意識形態複製的要求，家庭／官式文化不得不採取許多和消費／通俗文化迥異的「教育」方式，這個矛盾對立是青少年自主性的重要來源。對比之下，許多所謂的「教育改革」則是在企圖減低這兩種文化的衝突，企圖調和兩者（例如採取隔離策略，准許青少年的休閒生活完全讓消費／通俗文化支配，但前提是不攪擾校園生活、不准進入校園，另一方面，則希望父母家長對子女次文化寬容讓步等等）。但是這種調和在現階段很難成功，因為中學生就是要在校內染髮戴耳環等，父母就是不寬容子女自由等等。而這些都給予激進年齡政治（the cultural radicalism of age politics）相當大的介入空間。

不客氣的說，消費／通俗文化在喚醒青少年自主性方面，比左派做得要多上千百倍。左派只看到青少年一窩風買手機，就斷言手機文化的缺乏自主性，卻沒有深入青少年的手機文化與其所造成的父母師長規訓方面的困擾，以及同儕凝聚方面的壯大得力。更重要的，左派只講青少年流行手機讓資本家賺錢，卻沒看到今日中等學校普遍強制禁止學生帶手機上學，很多大學也不准學生上課接聽手機等等充滿壓迫的管教行為。晚近易利信手機有個廣告，顯示一群中學女生上課以手機來彼此傳訊（「不要講話，要專心——專心用手機聊天」），並且調侃（情）年輕的男老師。這說明了廣告商比左派更深入學生生活。這個廣告利用了現實不存在的烏托邦狂想（中學生不准帶手機上學 vs. 上課用手機傳訊）與性／性別操作，但是這個廣告也有喚起學生抗拒不合理規定的權利意識之潛在可能。此處便是激進社運可以而且應該介入的地方：把手機文化更進一步地轉化為政治行動，喚起青少年的反抗與權利意識，製造真正的矛盾與官式文化管教上的困難。很清楚的，主流的教改團體是不會站在青少年這一邊的，其調和策略必然是准許青少年可以帶手機上學，但是上課時必須關機。在這方面，左派應該學習並且支持像「青少年解放陣線」所發起的「教室使用手機權」（可參考其在「國際邊緣」上的網頁 <http://intermargins.ncu.edu.tw>）。

其實今天激進社運可以介入青少年權力問題之處甚多，因為青少年「做身體」而帶來與家庭／官式文化（國家的政治社會化、人口的生命政治 bio-politics、學校權威與管教、教育過程中階級的再生產等）的衝突矛盾甚多，幾乎無處不是戰場。我們看到激進的性教育、酷兒（同志）青少年、放心藥解放、反文化的搖滾樂與電子音樂、援交妓權等等的抵抗論述——但是左派還在形而上地否認青少年次文化的自主性！

五、全球化

林深靖在文章中還問：「為什麼青少年爭取『自主』，不是透過個人與生活環境

的對話，不是透過生命經驗和生存實踐形成主體的歷史感？」很顯然他所指涉的這些東東不是消費／通俗文化，可能是一些現在青少年沒什麼興趣的左派教材吧。這些左派教愉悅的焦點，那麼，不從青少年這個生命經驗、人生實踐、生活環境入手，卻妄想跳脫這個現實來灌輸青少年什麼成人自認政治正確的價值與真理?!就像同志運動必然從同志次文化出發一樣，年齡解放運動也必然從青少年現有的次文化出發，承認其內中包含的（源於主體社會位置的）合理性與抗爭性，以及可能帶給其他運動的不同珍貴資源，另一方面，也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從既有的各種解放運動汲取資源與挪用現有的批判論述，以便接合各類反對運動與論述。

曾聽到左派對於右派掌控歷史詮釋權感到不滿。其實，一本傳達左派歷史教材觀點的暢銷漫畫書，會比右派的學校歷史教科書更對青少年有影響力。但是以某些左派脫離青少年現實、放不下身段、不熟習一般漫畫的符碼來看，我很懷疑這些左派能夠做出這樣的東西。諷刺的是，右派能夠在「教材」中有偏差的科幻、性、烏托邦狂想，而左派卻還在追尋「純淨的」（不受消費與通俗文化污染的）歷史感——這就註定了左派與青少年的隔離。（何春蕤等人製作的《青春?性別快報》漫畫書，則是激進性教育的一個初步嘗試。）

林深靖還問：為什麼青少年爭取「自主」，必須透過「全球化的傳播網絡」？其實，我的意思是指出：全球化對於青少年抵抗在地的權力佈局而言，有著正面的意義。全球化帶來新的抵抗機會、資源與空間，為現有霸權創造新的難題；或說，「在地—全球」的結構下，存在著太多差異與空隙，容許青少年遊走與逃逸。無論是台灣民族主義或好萊塢電影工業，沒有單一的力量可以完全壟斷青少年的文化空間。對於全球化效應的進一步分析，則留待我未來其他文章再說。

六、任性與馬克思

林深靖在〈青春睿智卡維波〉後半部（網路版的補遺部份）提出的，是和性／別相關的問題。我覺得這部份的討論比較沒有價值，把激進的性政治描繪為「任性」，還創造出一個「率性」的說法作為對比，深度上不如那些立場上和我們敵對的女性主義言論。歸根究底的講，不管是林深靖或是主流女性主義，這些言論都還缺乏「性政治」（politics of sexuality）的眼界，也就是Gayle Rubin所指出的：性無法被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等等所完全解釋，性無法被化約為性別／階級等，「性」是一個和年齡／性別／階級／種族……同等程度自主的領域。缺乏性政治眼界的論述，根本還停留在「去政治」的層次，無法和酷兒等論述有「批判性的對話」（critical dialogue）。

左派可以自問：如果在談勞工或階級問題時，無法把階級當作一種權力關係或政治關係，而只是大談勞資和諧、勞工抗爭可以「率性」但不要「任性」云云，這種論

述可能和馬克思主義有「批判性的對話」嗎？事實上，現在的左派可以和女性主義有批判性尊重與和諧的屁話。同樣的，左派如果真的要進入性政治的對話，就必須使用「壓迫、剝削、歧視、管制、支配（宰制）、階層、殖民化、平等、權利、自由、正義、抵抗權力、多元、民主、解放」這些現代的政治語言來描述、解釋、分析、定義、建構、改變……「性」與性（權力）關係。更需要正視「性壓迫」，亦即，因為處於性底層而被分派到比性上層較差的收入、財富、職業、教育、身分地位、官職的機會，以及無法像性上層那樣擁有或運用各種自由權利；性下層身為二等公民、缺乏自尊，向上流動必須「順服」（conform）以及朦混假扮（passing）；而且在文化、媒體、教育、公共領域、空間環境等方面遭到歧視與不平等待遇等等。

林深靖的「性不應任性」論述，其實在馬克思那裡也有相似說法。馬克思曾經反對因為感情破裂就可以離婚，因為馬克思認為父母還要顧及子女和他們的財產，離婚會使家庭離散，故而不應讓夫妻兩人任意決定。馬克思說：「婚姻不能聽從已婚者的任性，相反的，已婚者的任性應該服從婚姻的本質；誰隨便離婚，那他就是肯定任性」。有人或許會聯想到馬克思在另一處所說的：「要是我重新開始生命的歷程，我不再結婚」，不過這應該是錯誤聯想，而且稗官野史不是重點。重點是：馬克思用「任性」云云來談離婚，雖然從今日看來並不適當，但是馬克思的談法有其時代因素，還可以理解。不過在性政治不但旗幟鮮明、而且內部路線差異浮現的今日，如果左派還用「任性」來批評性政治，那就不可理解了。

七、為了左派論述言之成理，塑身女人，請你犧牲做個受害者吧！

林深靖之所以用「任性」來批評我，基本上不脫形上學觀念的「自主」，亦即，是追求一個免於父權文化建構、免於資本家追求利潤所塑造的虛假慾望的自主。可是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這種論述如果不是選擇性地運用到塑身或性感上，那麼在父權資本主義社會內還有什麼是自主呢？「自主」似乎必須來自純粹、未受父權資本主義污染的某個原始狀態或社會主義社會，這種形上學的自主論述最大錯誤就是對於塑身或性感的全面否定，以為塑身或性感的效果與文化意義是確定的與單一的（即被規格化、被男性物化等），是被父權資本主義的生產者所決定的，而且沒有任何介入干預與挪用的可能，因而也不可能為那些塑身與性感的實踐者培力，她們因此只是被操縱的玩偶而已。（熟習性政治的人不早就厭煩了這個簡化論證嗎？）

林深靖有一段話是這樣說的：

而在當今的台灣社會，文化工業的暴力與暴利，導致「腿細、皮白、更有波」成為男性讚許、女性自我期許的價值觀。女性在惹人垂涎或垂憐的慾望中，遺忘了自己。

我想很多熟習性政治辯論的女人會對上段話回應說：「別臭美了！」這段話的另

種解讀就是：男性資本家與批評家都把女性的「惹人垂涎或垂憐的慾望」當作男性的傑作，當作男性加害的後果，以為女人都被洗了腦，才會是要惹「男」人垂涎或垂憐。可惜這只是男性集體的性幻想，不會成真。重點不只是：女人「腿細、皮白、更有波」可能是在惹其他女人垂涎或惹自己垂憐。重點是：即使女人是惹男人垂涎，也絕非「遺忘了自己」，而是要積極的操縱與「征服（加害）」男人。They are out to get you, man! 如果你不信這種培力女人的另類解釋有效，那你就等著和她們互動吧！

八、性／別政治的「派別」

刊載林深靖文章的《左翼》雜誌在該期的編輯報告中說：「十四歲女星王瞳拍攝的塑身廣告，曾經在主流媒體引發了激進主義女性主義者卡維波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之間的論戰，現在九二一民報的林深靖...對於卡維波的論述提出批判與反對，過去台灣有關性別議題的爭論主要是圍繞在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之間，我們欣見在《左翼》出現另一種觀點」。

我希望這個編輯報告不是要把教科書裡的「激進女性主義、自由女性主義、社會主義或馬克思女性主義、後現代女性主義」拿來台灣套用。這個目前很流行的分類是西方學院的產物，也主要是學院人的關懷，首先做此分類的Alison Jaggar的那本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雖然從學術觀點來說，寫得很好，但是這種分類並不能反映實際西方婦女運動的不同立場與策略。各個運動組織都有很複雜的政治與駁雜的論述策略，然而，這樣的分類後來也多少會對運動有所影響。

我認為台灣的性／別政治更不能直接套用這種西方分類，因此我對於國內女性主義者寫的那本套用西方流派分類的教科書有些意見，我認為那只是承襲了國人從派別主義分類做學問的舊方式，讀了以後根本沒有感受到運動的能量。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在台灣出現更多基礎草根的性別研究之前，不可能寫出一本有問題意識與運動眼界（而不是機械式地分門別派）的教科書。問題是，台灣當時的主流女性政治力量需要那麼一本集體創作的「正統」，也就是在功能上能夠代表所有女人的一種對外發聲，於是該書就在形式上「女人統一」，這本教科書也因為其沿襲西方的分類而有了某種學術正當性。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該書是從本地實際的生活歷程與運動經驗來寫，恐怕也必然不能涵蓋各類女人的差異（女工、少女、公娼、二奶等），因而也就不能成為代表所有女人的「正統」了。

我在其他地方分析過台灣主流女性主義與西方意義下的激進女性主義之差異，對此《左翼》可能還需要更多分析。《左翼》把我們視為「女性主義」，我希望這不是因為《左翼》把「性別」和「性」化約為同一問題（這種化約有時是一種異性戀與男性沙文主義的表現）。不論如何，在某些台灣主流女性主義的分類系統中，我們絕對

不會被歸屬於女性主義或性別類，而只是屬於「性」類。。其實我們可以說是「性激進主義派」（例如在妓權、生殖科技、色情、性騷擾等論戰中），這種扣帽子固然是無法勝之以理之後的下策，但是台灣竟然也有人糊裡糊塗地採納這種標籤，例如把妓權派稱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或者把我們稱為「性解放派」，因為反正「性解放」是個政治不正確的污名）。雖然有人拒絕承認我們和女性主義／性別相關，但是如果我要放膽形容我們在性別或女性主義方面的立場，那麼我們倒是願意接受「性激進派的女性主義」、「跨性別的女性主義」、「酷兒的女性主義」等說法。

台灣左派並不能因為把台灣的現實世界分類為「激進 vs. 自由」女性主義立場之後，就能夠快樂地給自己一頂社會主義或馬克思女性主義的帽子，從此安居樂業。從過去到現在，我一直看到左派只是在性／別「外部」喊話，用的都是全面否定論述，這樣並不能真的給自己一個位置（當然還有等而下之的左派想去依附主流女性主義，想要勞工脫離邊緣位置而進入公民社會）。左派如果覺得現在台灣性別政治各派都沒有「左味」，那只有親自下來幹一途，進入性別政治的內部。至於比「性別」污名而且更少正當性的「性」，我猜左派可能更沒興趣了。此外，性政治的派別當然不同於女性主義的那些分類，就我所知，目前全球學術界都還沒有把性政治立場派別做分類（可能在同志政治內有所謂「同化派」與「酷兒派」之分，最近我在某次演講中曾嘗試做過初步的分類），故而，左派還需要分析不同性政治立場的對立社會位置，才能弄出一個左派的性政治立場。在左派研究階級都感到自顧不暇的情況下，還是外部喊話比較低成本。

九、人是機器

順便一提的是，在這次論爭中還有一篇陳建志的〈資本主義機械文明創了新高？〉（2000. 12. 23 中國時報），此文批判資本主義物化男女兩性，乍看之下也好像是左派立場。這類文章越來越多的原因不是左派開始深入人心，事實上，只是因為已經沒有了要全盤推翻資本主義的國家或有實力的政治力量，現在在論述上全盤批判資本主義不會被誤會是與之掛鉤，可以安全免費的獲得批判姿態。陳文主要的重點是說資本主義把人變成了機器，但是這不是左派，而只是人文主義或溫情脈脈的浪漫派而已，故而我反而認為此文立場是相當陳腐而非批判的。

資本主義把人變成機器的觀點，是了無新意的，人文主義者佛洛姆就曾說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把人貶低到成為機器的附件，被它的節奏與需求所統治。它把人變成消費機器，變成徹底的消費者」。陳建志強調現在的人將自己想像或變成為機器，而且從機器中得到力量。但是這種現象只對浪漫派才構成感傷或批判的題材，對於另類世界觀的人而言，則完全是理所當然與歡欣鼓舞的事。例如，早期唯物主義者早就對人沒有了任何懷舊鄉愁，一心要離開上帝所創造的伊甸園，他們因此喊出了「人是

機器」。近年來，也有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將「機器戰警」這種生化電子人（cyborg）當作新社運主體的隱喻。至於人類肉體的機器化在未來似乎是會必然實現的，畢竟，現在已經在發生中，我看不出來為何這是應該被批判的趨勢。

十、誰惡黃河南？

不少人（包括林深靖在內）回應我文章時，都把我寫成是替王瞳（14歲模特兒）那個特定的廣告辯護、或者替廣告主黃河南辯護。大概是黃河南令很多人討厭吧，而我的文章竟然為一個令人討厭的資本家辯護（不喜歡王瞳的人似乎也不少），故而林文這樣的寫法就有喚起讀者認同來抗拒我文章的情緒效果。這種寫作策略其實也是廣告文案的一種寫法。

討厭黃河南，可能是人們覺得他相貌猥褻，但是卻左擁右抱，大賺女人錢，現在又搞小美眉。無疑的，這些「討厭」都是「情緒」在後面作祟，但是仔細去分析這些情緒，又怪傷感情的，因為這些「情緒」好像有點政治不正確（如果黃河南是愛情忠貞、不花心、老實誠懇、風度翩翩、斯文有氣質的年輕極帥弟弟，那就不討人厭了？）

林深靖說：黃河南花錢捧王瞳不是要王瞳「做自己」，而是要捧王瞳做偶像明星。這種觀察跟我的文章的論點毫不相干。我要談的是：（1）台灣社會很普遍的減肥實踐之社會意義——做身體、「做自己」、做性感；（2）反駁主流媒體批評對於電視上某些影像的看法。故而我關心的是那些對青少年做身體與「做自己」有影響的消費文化與廣告或媒體影像（不限於王瞳廣告，也不在乎生產這些影像之目的）。所以請大家回應我講的這兩個主要問題，好唄？

我雖然和黃河南劃清了界線，我的文章和他不相干，但是我也不會讓那些對他有情緒的人高興。我要這麼說：黃河南對我而言，和比爾蓋茲、張忠謀、王永慶、海夫納……是一樣的，他們沒有差別，都是資本家或企業家。對他「特別」感冒，那心理真是有鬼（這句話和林深靖無關，而是講別人）。

十一、左派與年齡政治

最後讓我回到青少年問題來。左派如果要有效地介入年齡解放，首先在認識論上，就應該承認年齡是和性／種族／性別／階級／身體等一樣的位階，各有內在的組織原則與操作邏輯。年齡不是階級關係的產物，因此不能把所有年齡現象與實踐都現成地區分為是這個或那個階級的；階級無法窮盡年齡現象，兩者沒有一對一關係——就像有的階級現象是不分年齡的，而很多年齡現象則是非階級的。總而言之，既有的階級論述與知識是無法窮盡說明年齡領域的；簡單的說，《資本論》不夠力處理青少年問題。今日某些左派的悲哀則是：年齡解放的激進派或許熟讀《資本論》，但是左

派卻不熟習年齡政治與文化。別人知左知己，左派卻只知此不知彼，那麼左派還能進入年齡政治內部嗎？還是只能在外部搞全盤大拒絕？

林深靖〈青春睿智卡維波〉一文在看待青少年次文化問題上，不加批判地就接受了西方殖民與資產階級主流社會的青少年建構（源自西方殖民與西方資產階級），缺乏年齡政治的眼界：例如在他這篇文章中，「青春／青少年」就不像「左派／勞工」那麼具有正面含意，甚至隱含了某種貶意。以下在本文的B部份，我將先追溯左派與青少年的關係的社會歷史發展脈絡。（本文的B部份下期刊出）

（待續）

☆

附錄：來自無處的幾個小故事——愛如潮水／可以上我／Che

愛如潮水

我的愛如潮水	愛如潮水將我向妳推
緊緊跟隨	愛如潮水它將妳我包圍
我再也不願見妳在深夜裡買醉	不願別的男人見識妳的嫵媚
妳該知道這樣會讓我心碎	答應我妳從此不在深夜裡徘徊
不要輕易嚐試放縱的滋味	妳可知道這樣會讓我心碎

李宗盛作詞的《愛如潮水》看似有很確定的文本與社會意義：這是傳統異性戀男人在面對女性情慾高漲的社會脈絡下的一種反應。這首歌所反襯出來的女主角喜歡深夜買醉、徘徊與放縱，不被單一男人所掌控；然而男主角在歌詞中先說「不在乎妳心裡還有誰」，但是接著卻又以「會讓我心碎」來柔性阻止女主角的情慾生活方式。這首歌側面地描繪出異性戀男人無法掌控女人情慾的現實，但是又企圖以男性珍貴的洶湧愛情「緊緊跟隨」與「包圍」女人，呼喚女人自願放棄自由，讓男性「包圍」與「安慰」。這樣一來，男性就可以奪回原本的獨佔掌控權了。

上面這個解讀既有社會現實的印證，也有文本證據的支持。看來這首歌乃是資本主義父權制下文化工業為異性戀男人服務、對女性洗腦的文化產品。這條歌越流行大賣，就顯示異性戀父權壓迫女性情慾也就越深入人心。

這首歌確實在台灣十分流行，可惜流行的現實與上述這個解讀完全不相干。此歌成了「同志國歌」，廣受台灣同志的喜愛。這個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現象很顯然是消費者對於這首歌的二度創作，對這首歌意義的重新生產。這個新的意義所產生的流行，離開了原本創作者意圖扣連的社會脈絡。而這樣的故事每天都在發生。

可以上我

我小時候常常搞不清楚安全別針、大頭針、迴紋針的區別。最近讀了《利器》

(時報出版社)一書才對這些「利器」各自複雜的源起與演進過程稍稍有所了解(雖然此書寫的也不夠清楚深入)。例如「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羅馬人就發明了安全別針」，1849年Walter Hunt申請專利的設計在原針上加上彈簧作用，這就和今日的安全別針相同了。安全別針或大頭針現在都是很便宜的，但是根據此書，大頭針曾經是很昂貴的，但是後來卻極為便宜。迴紋針也是非常便宜的，甚至因為其便宜而被「濫用」：某個迴紋針製造商在1958年調查，「每十個迴紋針就有三個不知去向，而十個當中只有一個用來夾定紙張，其他的用途包括當牙籤、指甲夾、耳挖勺、領帶夾、玩紙牌的籌碼、兒戲的計分工具、別針的替代品、還可以充當武器」。我相信它還有「無盡的功能」，例如，以發明迴紋針自豪的挪威人在「二次大戰時，許多挪威人甘冒被捕之虞，將迴紋針別在衣服領口，抗議德軍的武力入侵」。奇妙的是安全別針在當代次文化也有過類似的用法，不僅出現在龐克次文化中，也出現在同性戀次文化中。

在愛滋危機中，西方同志次文化有所謂「更安全的性」(safer sex)的提法，這乃是針對主流的「安全的性」所夾帶的道德禁慾意含的批判提法。「更安全的性」強調任何性(包括禁慾在內)都涉及風險，性必然是一種風險管理。性激進派更進一步把「更安全的性」色情化，讓更安全的性也是最色的性。總之，在這個時期，許多西方同志在衣服上別上安全別針，表示自己響應「(更)安全的性」的呼籲，這是同志次文化對安全別針這個小商品的挪用。不過，以安全別針標示自身實踐「更安全的性」，就好像另一些同志用手帕來表示自己搞安全的性一樣，可以被建構為某種主流印象，亦即，某些性是安全的，其他的性是不安全的；故而某些人是高級的，其他人(濫交或性工作)是污穢的。這種建構則是再次挪用之前對安全別針的挪用。

這故事還沒有完：由於安全別針有藉著表明自己的性方式(我是戴保險套做愛的人)來篩選性伴侶的功能(如果你也同意戴保險套，那你可以找我)——雖然這個功能會產生某些主流人士排他的效果——這個安全別針的篩選功能卻也立刻被濫交者再度挪用：我戴安全別針就表示「我正在尋找(安全)的性或性伴侶」，亦即，「你可以上我」的意思，這是安全別針的色情化。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看到「安全別針—更安全的性」的不斷被挪用，意義的一再轉換，這些意義差異極為細微，但是卻又是各種政治立場的交鋒。次文化所挪用的商品可能會是昂貴的，但是也可以是像安全別針這樣的便宜的小東西。

CHE

張廣天、黃紀蘇的《切·格瓦拉》一劇轟動大陸，被張廣天批判的新左派、自由主義，以及其他門派的討論也很多。其實自從Che死後，全球各地就有一波波此起彼落、以各種方式進行的不斷「紀念」，有些是以Che來批判中南美洲獨裁政權與中情局的，有些是暗批卡斯楚的……。真是有多少不同政治立場，就有多少對於Che的不同挪用。連資本主義的文化工業也會偶而推出Che相關的文化產品，畢竟

Che具有很吸引人的英雄浪漫反叛形象。(《新新聞》729期2001/2/22-28報導民進黨政策會現場也懸掛著某黨工從紐約帶回來的Che海報畫像)。

現在我要講的不是什麼文化商品，而是一個啤酒廣告海報。這個啤酒廣告海報以熟悉的Che畫像為主，Che的帽子上的五星標誌有著啤酒品牌KGB字樣，畫像右下方則有兩種KGB的啤酒，左下角則寫著「join the revolution」(加入革命)。(想看這張海報的可以去<http://intermargins.ncu.edu.tw/>的專題討論內有關塑身與媒體批判論爭的本文的網路版)。

如何理解這個廣告海報呢？教科書的標準答案是：資本主義把Che商品化，挪用Che的形象為啤酒消費者的認同，等等。總之，這個廣告海報很聰明、很厲害，消費者則是任人宰割的。

我一向很喜歡Che的畫像，也有收集馬、恩、列寧、史大林、機器戰警等左派人物畫像為辦公室裝飾的嗜好。KGB的Che廣告畫像真的很酷，比沒有啤酒的正統Che畫像還要有趣。事實上這張廣告畫像越看越有味道，於是趁著黑夜尖沙咀街道四下無人，我悄悄上前小心地取下貼在牆上的廣告海報，一張完好無缺地海報現在就掛在我的辦公室內了。

至於台灣何處有賣KGB啤酒或伏特加，我不知道。因為我不喝酒。



緊緊握你的手

<第十三期至第十五期捐款名錄>

小馬與老羅	US\$100	施 淑	5000	梅丁衍	2000
中國民主社會黨	5000	郭奇正	1000	馮建三	1500
朱政騏	500	陳威佑	3000	黃文雄	2000
吳澍培	3000	張敏生	5000	蔡同學	300
吳肇熙	1000	張裕成	US\$100	蔡伯堯	1000
佚名*	200	張增榮	1000	魏玫娟	1000
林正慧	1000	曾昱隆	200	顧燕翎	5000
洪禎國	2000				

計：NT\$40700 + US\$200

*本刊於二月八日收到捐款二百元，但郵局並未提供該捐款人任何資料。

由於本刊郵寄費用統一由捐款支付，匯款註明補貼郵資者，恕併作捐款處理。

流亡的告白

鍾喬

流亡是現實的冷酷，卻也是文學的巨大象徵。因為，當身體跟隨著心靈在異境中接受風雨的鞭笞時，歸宿便超越了空間的拘限，蘊生出靈魂的根。然則，流亡卻也可以是身體飄離於原本歸屬的國度之外，靈魂卻被囚禁於閉鎖的黑暗空間中。高行健的「逃亡」一劇就是一個具體的例證。八九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以流亡者身份棲身歐陸的高行健，寫下「逃亡」一劇，像是對自己的文學和政治進行了一番告白。劇中僅有三個角色：聲稱「逃避一切集體意志」的中年人；燃燒著理想的青年人；「無法在槍口下作愛」的浪漫姑娘。他們在槍聲響徹廣場夜空的緊急時刻，惶惶躲進一間漆暗的空屋裡，在打火機的微焰中感受到「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死前的絕望……。」而後，象徵是血的污水汨汨淹進屋子裡來，成了一面鏡子，映照著高舉行火機，自語自言地說：「我舉著火把，我是自由女神」的姑娘的臉。

流亡。高行健的文學流亡，竟是在一幢沒有出口的廢屋中發生，面對的是「一旦覺醒的話，最終還是在逃避自我」的情境；面對的是劇中的理想青年高聲吶喊：「我看見一個個黑色的太陽，慘白的死光照著穿喪服的人們——」

靈魂，在沒有出口的廢墟流亡，並高舉打火機摹仿自由女神雕像的身姿，這除了是文學的象徵，也宣告了政治的選擇。這時，身體便不再渴望停留在沒有「自由女神」的土地上，進而積極地潛往標榜「自由女神」精神的國度。

是什麼樣原因，讓一個作家陷入如此龐大的虛無中，屢次聲稱自身的文學和集體的記憶斷然隔絕呢？是什麼樣的虛無，讓一個劇場人在想像世界中，如此幽微地在黑暗中舉起象徵帝國主義的火焰呢？

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鮮血？是人民紀念碑石階上被清除後的彈痕？是集體的國家機器碾碎了個人生命的脈息？還是……意識型態的航標趨動著作家靈魂深處的孤舟？果是如此，倒讓我想起巴勒斯坦籍的後殖民論知識人薩伊德。他自幼在西方社會長大，卻因意識型態的航標偏流向左，即便病中依舊劇烈反思如何澆熄帝國主義的火焰。他說：「東方從來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被視作『它者』而存在……。」這「它者」，薩依德所提到的「它者」，意指須被西方所界定的東方，讓我聯想起「逃亡」一劇中在暗室裡，以姑娘角色的身份矗立起來的「自由女神」對自由的界定。亦即，「她」之所以令人嚮往，因為「她」代表著恆久不變的居高臨下象徵。

我希望我不是在宣讀一種政治正確。因為，在這個左右難辨的世代裡，意識型態的旗幟時而插在一堵高高的牆上。然而，文學生命的流亡卻也不免要浮沈在意識型態

的河流上，這又是鮮明的事實。畢生在寫詩的志業上，奮力告訴世人一心擺脫文學意識型態束縛的智利詩人聶魯達。1947年，他攜帶著寫作中的詩集：「漫歌集」“CATOS General”，在祖國智利流亡，因為，上台不久的總統魏地拉，搖身一變，從親近人民的左派變成轉向帝國的右派。於是，詩人「利用更深人靜的夜晚／嘗試各種各樣的生活／忽而流淚，忽而寫詩，不斷地更換衣裝／我就這樣渡過了這些陰霾密佈的日子／我是警察追捕的逃犯／在那清冷的時分／在那寒星高懸的黑夜／我穿過城鎮、樹林、農莊、港口／走進一戶又一戶的家門／握過一個又一個人的手」。這些詩句，寫在「逃亡者」這組詩中。

同樣是逃亡，聶魯達為的是躲開臣服於帝國勢力的本國獨裁軍政府。他的靈魂沒有流亡在無出口的廢墟中，卻在尋常人的生活中聽見所有的門戶都在說：「他就是我的兄弟。」

詩人在流亡中寫作的詩集，成了另一個革命者在山間游擊戰時無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切·格瓦拉在「玻利維亞日記」中描述他為解放而展開的流亡。他述說著如何在星光下為游擊隊員朗讀「漫歌集」的種種。他將聶魯達的詩句抄在日記本上，寫著「你那勇敢的船長的小小遺體」。這句詩用來形容被槍決後躺在木板床上的格瓦拉，似乎有著某種比真實還真實的隱喻。

流亡。在作家身上推湧著形貌相異的潮水。這潮水的氣息似乎也因為著作家的思想與情感，而有所不同。德裔劇作家，同時也是知名的馬克斯主義者布萊希特，在踏出德國的第一步時，便語重心長地說：「我們是被驅逐者，流放者。我們不安地等待著，儘可能靠近邊界，我們等待著重歸家園的一天。」流亡是為了回家，至少對布萊希特而言，重返斯土斯民，繼續敘事劇場的研究與實踐，是他步上流亡之途時無法從心中抹去的精神圖像……。

現在，我努力想著如果流亡成爲一種敘事體的話。我將如何記載其現在劇場經驗中的精神流亡狀態呢？

西元2000年代元旦的前夕，我攜著記滿情節綱要的筆記本，站在加爾各答噪音充斥的街頭。一個行乞的老人，伸出他乾巴巴的手掌，用一雙充滿好奇的眼神，瞧著在烏煙中漸失去笑容的我。黃昏的天空，烏鴉張開黑色的翅膀，盤旋著，像是對著這貧困的第三世界城市呱呱叨唸著黑色的預言……。然而，黑色並非劇院門口的劇場人一貫嚮往的顏色。因為，他們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仍然信仰紅色的理想。除了和印度共產黨往來密切之外，並在寫實的鏡框劇場裡，以相當貧困的經濟條件宣揚社會主義的未來。剛上演的一齣戲，搬演的竟是下一代人如何復甦共黨體制的主題……。對此，我雖極力不表贊同，卻見到被宰制國家想從帝國脫身出來的選擇。當然，或許他們正陷入另一種教條的危機中。看來，他們非止沒有因激進的戲劇運動步上潛逃的道

途，並且在劇院中擁有成千上萬的支持者。他們不是被放逐者啊！那麼，他們的精神處於流亡狀態嗎？我想是的。當我想起全球化的浪潮，以超乎想像以外的速度襲捲貧困中掙扎的國度時，我憂心地見到他們的靈魂在失序的街道上流亡。

因而，流亡並不僅僅因政治迫害而發生。也不僅僅發生於浪跡異國的道途中。流亡，愈來愈多地發生在自己家鄉的土地上。幾年前，八個來自亞洲不同國家的演員，在亞洲各個城市演出一齣稱作：「亞洲的吶喊」的戲碼。戲中一開始的一場象徵性的風暴，將人從鄉村驅趕前往流離的城市。後來，這場風暴演變成一顆懸在空中的氣球，讓人在競逐貨幣的價值中迷惘失所。這是在全球化風潮中流亡的亞洲人的寫照。

隔後不久，一個稱作「野戰之月」的日本帳篷劇團來三重的重新橋下演出。他們在帳篷的泥濘中找尋一顆美軍失縱成謎的核子彈頭。而後，他們宣稱演出的戲碼為：「出日本記」。運用詩歌中隱喻的手法，軍事工業在全球範圍內的商品包裝，在舞台上暴露無遺。「野戰之月」的演員們生活在夾雜著現代化消費與軍國記憶的日本境內，他們靈魂的底層卻翻滾著流亡的風砂。

在族群認同獲致政治上正確，卻隱藏種種精神性風暴的島內。一群演員在一個稱作記憶的月台上追尋埋葬於現實中的想像。一個原住民在都市邊緣浪跡，戰爭的陰影仍然在他心口徘徊。他和其他上台的演員一般，以一種隱喻的，詩一般的身體訴說流亡在家鄉的困頓。這是最近的一次劇場經驗，似乎同樣以精神流亡為影射現代人生。

我在閱讀和創作上體驗著流亡，這和相對走在流亡之途的詩人、劇作家，或有形式的差別，卻毫無本質的不同。只是不同的世代，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創作態度，讓人步上不同的「流亡」道途。★

讀「風簷之左」有感

吳俊宏

中國時報上連載的「風簷之左」一文，深刻的描述著一群老同學的近況。自從幾年前，我因生活壓力，離開台灣的左翼運動後，已許久未與老同學相處了，聽說老同學間，近來為了申請補償金的事情，鬧得非常不愉快，主要原因，正如風文作者所描述的，是時勢的變遷，以及老同學的面臨的有限的歲月。

將近30年前，我還是大學四年級的時候，因參與左派的學生革命運動，而被捕入獄。在綠島執行的時候，我有幸認識許多老同學，當時他們已被關了25年，雖然臉頰已略見歲月流失的老態，但言談間仍不時表露出對信仰的堅持，以及對共產黨的信賴。

我到的時候，文革尚未結束。文革的劃時代運動，也鼓舞著他們的心靈，彼此間也瀰漫著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氣份，企圖讓自我更加提升，思想更加純正。記得當時，

我和幾位比他們年輕 20 幾歲的新一代左翼知識份子，在他們的感召下，爲了不願當臭老九，曾經自願的到監獄廚房去當幾年的伙夫，也希望經由勞動的改造，去除腦子裡不純的思想。工作之餘，老同學中理論程度較高的人，不時傳來一篇篇親筆寫下的，有關社會主義理論文章，供我們閱讀，這在當時是相當危險的事，但老同學自有他們的堅持與無畏，而我們幾位年輕同學，也才真正的學到了社會主義的理論。

老同學歷經了 50 年代的肅殺氣氛，但似乎並不因此畏縮，該有的鬥爭，他們決不退縮，不但在理論上與『白帽子(台獨)』人士針鋒相對；與監方的鬥爭也是有理有利有節的進行著，記得 1978 年 12 月 10 日人權日時，老同學和我們幾位年輕人共同策劃一次監獄大絕食，聽說這次大絕食傳到台灣後，促成了隔年世界人權日的美麗島事件，這可能是老同學對台灣民主運動的一大貢獻。

80 年代初，台灣的政治環境已較寬鬆，幾位陸續出獄老同學，遂趁這個時機，進行老同學的集結行動，利用婚喪喜慶，將散落各地的老同學匯集起來，最後成立「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回想這段期間，我開著車，載著他們，南北奔波，深夜不停。只見他們臉上不曾露出疲態，反而不時顯露滿足的微笑，彷彿前途一片光明，理想就將實現。

然而時代的巨輪，似乎無情的一步一步的壓碎他們的心。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個倒下；過去心中的黨，出現相當程度的腐敗；昔日監獄裡據理以對的政敵，如今登上了台灣的執政舞台。老同學的夢想不曾擴散，反而日漸孤獨，台灣社會似乎無法接納他們那份真誠。

失望之餘，部份老同學不再奢求，理想既然夢碎，何不就此戛然停止，管他統獨，管他什麼公平正義，眼前最實際的是如何渡過這所剩不多的餘生。這種心境，可以說存在於大部份的老同學裡，說來也無可厚非，幾近半世紀的堅持，也足以對得起自己了。

不過，還有一部份人，似乎不這麼想。時代的變局，固然令他們心碎；對岸出現腐敗，固然令他們落淚。但想想當年投入這趟風起雲湧的運動，並不全然因爲有著對岸的黨，較大的成份是對這個理想的信仰。遙想當年，風簷苦讀，望著一頁頁用日文寫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內心的投入，真是滿足，如今再展昔日扉頁，仍然鏗鏘有力，理論本身並不因時代變異而失色。既然如此，何在乎一個黨出現了墮落，也無所謂誰辜負誰的問題，況且全世界從歐美至亞非拉，不就還有那麼多的左翼同志相伴而行嗎？

因而，社會主義仍然是他們的理想，國家統一仍然是他們的世界觀。他們的舉止令新一代不會浸淫過社會主義理論的年輕人迷惑、質疑乃至不屑，但他們堅持獨行。

只要理想是對的，總有一天，會雲淡風清的。誰說春天走離了，就不會再來。理想一時受挫，也並不一定證明這個理想是不正確的。

老同學的失望，老同學的堅持，你說是思想的變節也好，是信仰的固執也好。他們蒼白的身影，終爲台灣歷史留下可歌可泣的一頁。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中〉

鄭國棟

陳芳明對馬克思主義的可笑的歪曲不僅於此，更荒唐的滑稽戲還在後頭。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中，把唯物史觀做了扼要簡明的概括：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82）

這段話已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名論，凡是論述唯物史觀者，無不以此為主要依據，陳映真當然也不例外，他在〈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第191期）中，根據這段話的要旨批評陳芳明未從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著眼來論述台灣新文學的發展。然而，陳芳明竟然指稱馬克思的上述論斷是「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還以一副覺今是而昨非的先進姿態說他已不再「迷信這種陳腔濫調語言」，指控陳映真猶「奉為神明」，是「教條的、僵化的思考方式，早已偏離了唯物的軌道，而帶有濃厚的唯心傾向」。其實，他那裡曾「迷信」過，他只是「迷糊」，從一開始就「迷糊」，而且「迷糊」至今猶未清醒。這些對馬克思與陳映真的批評，最明白不過地暴露了他對歷史唯物論驚人的無知。陳芳明是怎麼理解「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個唯物史觀的壘本命題的呢？且看下面分解。

陳芳明先是不無得色地質問，生存在資本主義的台灣與面對正在資本主義化的中國大陸，「陳映真的意識形態（按：指陳映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由怎樣的「社會存在來決定？又是由怎樣的『生產方式』來形成？」進而嘲諷道：

「台灣統派語言的疲態，極其精確而典型地由陳映真表現出來。他的思考方式，不僅悖離了當今的中國社會，同時也與當前的台灣社會全然脫節。陳映真的左派語言，恰恰與他引用的馬克思『社會存在論』與『生產方式論』，發生了可笑的矛盾衝突。他雖然是自稱為唯物論者，他的思想內容在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卻是找不到相應

的經濟基礎。」

接著陳芳明道出了他自命唯物卻極端主觀唯心的本質，抨擊陳映真：「他再三強調『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並不是甚麼科學知識態度。他頑強的拒絕面對客觀現實，而自囚於他馬克思主義的空中閣樓之中，恰恰證明了人們的意識是可以決定社會存在的。」

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

這些幼稚的言論充分顯示了陳芳明的不學與低劣的理論思考能力。馬克思為何提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論？所謂「社會存在」、「社會意識形式」是什麼意思？這完全超乎陳芳明的知識與理解能力。正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歷史唯物論的立論基礎與形成背景，也就不可能理解「社會存在」論的內涵，從而混淆了「社會意識」或「社會意識形式」與「個人意識」（即個人的思想與立場）的區別，這才對陳映真提出了上述荒謬可笑的質疑，得出了他主觀唯心的結論。

阿圖塞之所以推崇馬克思為人類的科學知識和自覺實踐開闢了一個「歷史的新大陸」，就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推翻了主導人類思想數千年之久的唯心史觀，首度確立以人的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的世界觀，使人們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認識有了正確的立足點，為人類研究歷史與探索未來的方向提供了一把鑰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 - 1846年間，為了批判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哲學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樹立指導無產階級從事社會革命的世界觀，兩人合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部著作中，詳細闡述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論證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的命題。該書序言開宗明義就說：

人們迄今為止總是為自己造出關於自己本身、關於自己是何物或應當成為何物的種種虛假觀念。他們按照自己關於神、關於模範人等等觀念來建立自己的關係。他們頭腦的產物就統治他們。他們這些創造者就屈從於自己的創造物。我們要把他們從幻想、觀念、教條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來，使他們不再在這些東西的枷鎖下呻吟喘息。我們要起來反抗這種思想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5）。

馬克思與恩格斯把人們從唯心史觀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的方法就是從人的現實生活出發，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32）

在確立了這個唯物的歷史前提後，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闡釋了人的存在與意識的關係：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關係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裡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遙遠的形式）的制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30）

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就踢倒了唯心論的神龕，把被唯心論者搞得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又具有創造並統治現實世界的神威的觀念、“思想”，從虛無縹緲中押回到活生生的現實基礎上：

德國哲學從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這裡我們是從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想像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只存在於口頭上所說的、思考出來的、想像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真正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揭示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聲的發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適應的意識形式便失去獨立性的外觀，……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30 - 31）

在上面這些引文裡，所謂的「意識」都是指道德、宗教、哲學、法學等指導、規範人的思想與行為的「社會意識」，而「存在」、「生活」指的都是「社會存在」即：人在勞動生產過程中結合成的社會生產關係，也就是社會的階級關係與經濟結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人是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87）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中又說：「語言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因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同上，第一卷：35）這表明人的生存、生產與意識型態都離不開社會。

主觀意識與客觀結構

為什麼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首先，歷史唯物論揭示了：人

爲了生存就必須通過社會分工進行生產，以勞動改造自然界的物質使之成爲人類所需要的產品，然後再分配、交換、消費勞動產品以維持生計，這些經濟活動構成了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現實基礎。在維持溫飽之餘，人才可能從事政治、宗教、哲學和藝術等活動。再者，在哲學的認識論上，唯物論主張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識是第二性的，意識反映外在的客觀世界，構成意識的內容。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資本論》第一卷：24）但這裡必須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辯證唯物論而不是機械唯物論。意識與物質、主體與客體，絕不是機械的反映關係，也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既對立統一，又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9）就表明了理論與實踐、精神與物質可以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馬克思在1845年寫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要鉤玄地闡述了歷史唯物論的要旨，第一條就表示：

前此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在內）的主要缺點都在於對對象、現實界，即感性世界，只以對象的形狀或直觀得來的形狀去理解，而不是把對象作為人的具體的活動或實踐去理解，即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活動的方面不是由唯物主義反而是由唯心主義抽象地闡明了，——唯心主義當然不知道實在的具體活動本身。費爾巴哈所想要的是和思想對象實在不同的感覺對象，但是他不把人的活動本身當作對象方面的活動來理解。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質”裡只把認識活動當作真正的人的活動，而把實踐只理解和固定為猶太人的那種卑鄙的表現方式。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或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此處根據先光潛改譯的譯文，見《美學拾穗集》：73，天津：百花文藝，1980）

馬克思在這裡第一次提出實踐的觀點，批判了前此的機械唯物論不知道客觀對象也是人的實踐活動的產物，只以靜態、直觀的方式觀察、反映外在的客觀世界，忽視了人的實踐的主觀能動性，結果卻由不知實踐為何物的唯心論者片面而抽象地闡述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馬克思通過實踐的觀點，克服了西方哲學中主體與客體分裂、以及認識與實踐分離的二元對立，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完成了主客體的統一。歷史唯物論表明，人用有意識、有目的的實踐活動，既改造了世界，也深化了對世界的認識，同時還增強了本身的能力，而客觀世界經過人的實踐改造即由舊貌換新顏，成爲人必須重新面對與認識的客觀實在。不過，馬克思的實踐觀點與片面強調人的主觀意志的唯心論者有根本的區別。馬克思主義始終把外部客觀世界的結構視爲實踐活動的限制條件，認爲只有充分研究客觀世界，掌握其運動規律後，順勢而爲，才可能達到預定的目的，否則，

不但費力多而收功少，還會經常事與願違，遭到失敗的命運。

陳芳明根本不理解這些歷史唯物論的要旨，搞不清楚何謂「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胡說什麼「陳映真的左派語言，恰恰與他引用的馬克思『社會存在論』與『生產方式論』發生了可笑的矛盾衝突。」還不自知淺陋地下了「人們的意識可以決定社會存在」這個荒誕不經的結論。如前所述，歷史唯物論的「社會存在」是指人的社會生產關係所形成的階級與經濟結構，它決定的是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法律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宗教、道德、政治思想、法學、藝術等社會意識形式，而不是個人的思想、立場。個人的思想、立場固然主要受本身階級的影響，但也可能因這樣那樣的因素改變立場，背棄本身的階級。饒是如此，主觀立場的變化並不可能改變客觀的階級規定。一個工人可能或因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蒙蔽或被資本家收買而背叛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支持資本家，成了工賊、勞工貴族，但他絕不可能因此就成了資產階級。陳芳明所謂「人的意識可以決定社會存在」，才真是可笑的謬論，只足以說明他的無知妄言與主觀唯心的思考方式。

陳芳明的主觀唯心論還明顯地表現在他批評陳映真的這段話：

「在他的經濟決定論裡，並沒有看到人的主體之存在，並沒有看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滲透的事實，更看不到人的心理結構，以及人本身就是自己的歷史之創造者。」

所謂「人本身就是自己的歷史之創造者」，這種論調與古希臘詭辯學派的普羅泰哥拉所說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一樣，片面強調了主體的作用。十九世紀末，俄國的民粹派也同樣高唱此調，遭到了列寧的嚴詞批駁。其實，馬克思在1851年—1852年3月間寫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早就指出：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603）這又再一次證明陳芳明的不學與淺陋，陳芳明批評陳映真是「一個徹底唯心的偽唯物論者」，其實是他自己的自畫像。

東西「輝映」的兩隻“馬克思主義”跳蚤

走筆至此，對陳芳明這個自我標榜為“左翼”的跳蚤，真有夫復何言之感！看來，還是拿陳芳明自己神氣十兄地責罵別人的話回敬給他自己最為恰當：

「以有限的知識做籠統的表達，是長期存在於台灣知識份子中的惡習……最基本的黑格爾、馬克思經典，他也不甚了然。」

話又說回來，陳芳明雖然高聲叫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論是「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但先是他的導師史明拿著這個命題當公式，主觀唯心地硬套在

台灣歷史上，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地曲解台灣史料，以證明台灣社會歷時四百年已發展成與中國大陸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從而為所謂「台灣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陳芳明學舌於史明，多來年一點也不花腦筋地照抄照搬史明的台獨史觀，直至發表在《聯合文學》上引起陳映真批判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依然不改。謂予不信，請看陳芳明的原文：

「在日本殖民體制的支配之下，不僅使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經文化連繫產生嚴重的斷裂，也使島上住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徹底的改造。原是屬於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封建社會，在殖民政策的影響下，急劇轉化成為以工業經濟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台灣社會的傳統漢文思考，也正是受到整個大環境營造的改變而逐漸式微，而終至沒落。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知識的崛起，以及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再擴張。就是由於這種新世紀的到來，台灣新文學才開始孕育釀造。」

這段論述所表達的，不正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嗎？陳芳明一方面自己還在以此為立論依據，一方面卻又標榜自己已經「覺悟」，不再「迷信」這「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豈不怪哉？這只有兩種可能，或是他壓根兒不知道他從史明那搬來的論點源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論；要不就是，他缺乏最起碼的知識真誠，純粹為了攻擊陳映真而故作違心之論。

陳芳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何以糟到如此不堪聞問的地步？我們大概不好說他連《馬克思格斯選集》這種最基本的典籍都不曾讀過。但可以確定的是，即使讀了，「他也不甚了然」。何以故？我們不妨探究一下，以為後來者戒。

阿圖塞在1969年為法文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寫了一篇序言，指導讀者閱讀的方法。他提到理解《資本論》有兩種困難。第一種肇因於受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控制；第二種則由於缺乏理論修養。其實，這兩種困難豈僅閱讀《資本論》時會碰到，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典著作時都無法避免。

陳芳明正是既未徹底擺脫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又不曾潛心鑽研哲學、政治經濟學，甚至連本行的史學方法訓練也沒搞好，以這樣的浮薄之徒要想弄懂體大思精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是戛戛乎其難如上青天了。

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寫信給康·施米特痛斥曲解唯物史觀為唯經濟決定論並且當做公式隨處濫加套用的社會民主黨“青年派”作家保爾·恩斯特(Paul Ernst)說：

「這個人具有如此豐富的想像力，以致不把別人的話讀成相反的意思，就連一行也讀不下去，這樣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想像力用於其他方面，而不能用於社會主義這個非幻想的方面。讓他去寫小說、劇本、文藝評論和諸如此類的東西；這樣他只會損害資產階級教育，從而對我們有利。……這個反對派所表現出來的一大堆幼稚的胡說八

道和絕對愚蠢的東西是我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過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91）

恩格斯這番重話，火氣旺得可以聞出焦味，多麼像在描述陳芳明啊！陳芳明與恩斯特一東一西、一今一古，時隔百餘年，卻又何其相似，相互「輝映」成趣。康有為有言：「東方有聖人出，西方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看到陳芳明與恩斯特這對絕配，康有為的話可以改為：「東方有蠢人出，西方有蠢人出，此心同，此理同。」

慘遭陳芳明歪曲、濫用的何止馬克思主義理論一家，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也一樣不能倖免。接著我們來看看陳芳明的漿糊腦袋是怎麼胡亂攪和這些理論的。

（待續）

☆

左翼飛鴻

《左翼》雜誌編輯：

很抱歉一直未能如約對《左翼》上持續開展的重要討論繼續發表看法，今天讀了第十五號上刊載的何六九〈當幽靈徘徊不去的時候〉，談一點觀感。

該文的觀點是很有代表性的，相信也很有影響，因為我在和某些臺灣朋友交流時就對這些觀點耳熟能詳了。因而，讓這樣的觀點參加辯論，並促使左翼人士反思、批判，不言而喻是很重要的，也是必須的。然而，《左翼》發表的這篇何六九的文章，在分析性、資料性和理論性程度上，都是對不起讀者的，更對不起其所代表的觀點的重大影響力；這篇文章不會促使人們對其所代表的思潮加深理解，更談不上使人信服了。

這篇文章的主要特點是：只有主觀的、直覺的感受、見解、結論，而沒有最起碼的史實、事實的佐證，或是哪怕一星半點的其所批判物件的引語。首先，這篇文章所批判的中心概念，“漢族民族主義”，就是這樣一個憑空出世、天馬行空的莫須有之物，我是第一次看到這樣一個詞語，我不知道哪個當代論述（亦即章炳麟以後）確實有這樣一種口號，如同“台獨”一詞的確是推動台獨運動的人所使用的話語和口號。

如果說，文中所藉以得出“血緣性”、“仇外性”的結論的有關現象和言論的確

存在，因而論證總結出一套尚未被言說的“漢族民族主義”是可能的話，那麼，作者的論證工作完全沒有，作者所引用的事實根據貽笑大方。作者對臺灣歷史上和當代的民族問題有些隻言片語，但和我所瞭解的有關史實和事實相差很遠。文中對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史也是僅有隻言片語，但從這些隻言片語中，能看出作者對有關歷史基本無知，或根本不在乎。比如說：“象徵著被壓迫人民革命進步的民族解放運動，竟然給族裔對決和野蠻殺戮的瘋狂浪潮打開閘門。”然而，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作者所說的“族裔對決和野蠻殺戮”，恰恰是民族解放運動在世界範圍內退潮的主要症候。又比如：“民初五族共和的口號（以及後來中共的民族政策）可以說是對於血緣漢族民族主義的笨拙掩飾和補救，絲毫無法改變漢族民族主義的血緣論本質，無論如何也欺騙不了中國境內的異族。”很奇怪作者讀的究竟是哪個版本的中國現代史？最起碼，作者是在把歷史和現實放在他所製作的“漢族血緣民族主義”概念的普羅克魯斯特刑床上砍頭去腳。相信作者所代表的觀點在臺灣有影響，但作者對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荒唐解讀，使得作者對臺灣歷史和現實的解讀也完全不可信。

從風格上說，文章從開始到結束沒有進展，通篇每個段落都是同一個簡單意思，至於唯一的一段對史達林的引證，也純屬裝飾，“民族”和“種族”的區別，這是簡單常識，在這個問題上煞有介事地進行論證，是拙劣的偽理論。

讀完此文，令人不禁懷疑作者給自己貼的左翼標籤。作者的基本範疇，不過是“現代文明社會”－“血緣民族情結”，“多元民主時代”－“獨裁權威體制”，這些都是自由主義或右翼人士認知世界的基本框架，而左翼的基本範疇和對立，在作者那裏都是不存在的，比如現代中國史上的國共衝突，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和世界被壓迫弱小民族，老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與此相比，“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工人階級”等等辭彙，在文章中只起了方便的點綴、烘托和玩弄作用，而無任何批判意義。我確實質疑這篇文章有任何意義上的“左翼”價值。

《左翼》雜誌是我敬佩的刊物，雜誌所引導的辯論是極其有價值的。何六九先生所代表的觀點絕對應該參與辯論，但絕不應是像何六九先生這樣的文章，因為這種文章根本沒有論理，而只是觀點和情緒的宣泄。也很難根據這樣的文章，來對其所代表的觀點進行嚴肅的說理和批評。而相反的好例子，是同期發表的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維波？》，以及早些時候趙剛先生所作《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這兩篇文章都緊扣原本文本，加以分析和批判，而不是憑空臆想出所批判物件；而且其作者的左翼立場是真實的，而不是蒙面的道具。

祝好。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 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 〈四〉

黃志龍

產生於農村的這種「市場化可能剩餘」，爲了追求更高的利益而找到「鄉鎮企業」（政府從前將人民公社生產鐵、水泥、發電所、化學肥料、煤等小工業稱為「社隊企業」，1984年以後「社隊企業」改稱為「鄉鎮企業」）。

當然，除了農業剩餘變成「資本」以外，鄉鎮企業的形成尚須另一個重要條件：那就是可以與這個資本相結合的勞動力也可以自由移動。人民公社解體的另一個作用，就是使從前被迫擠在公社內而無法「市場化」的「剩餘勞動力」突顯出來，使其能夠和資本結合，產生替代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以外的另一個積累體制。

開始於1978年的新農業政策，使限制人口移動的政策難於執行。因爲：

(1)1978年以後，因農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使農村的人口過剩的程度更加顯現，因而難於使他們留存在農村；

(2)政府採用新農業政策以後，大大地修正了1978年以前的糧食生產第一主義，獎勵糧食以外，包括林、牧、漁業的農業的全面發展。隨著農業的多樣化，農村勞動力市場也開始流動化。更由於政府注重專業戶的養成，有意願的農民以剩餘資金和剩餘勞動力專心從事於經濟作物、養殖業、食品加工業、農機耕作、運輸業、建築業、飲食業等各種專業，因而加速了農村勞動力市場的流動化。

於是，政府限制勞動力移動的政策也不得不緩和下來——如1984年，國務院終於准許在一定保留條件之下，也就是不配給糧食的條件下，在鄉鎮從事工業、商業、服務業的農民和其家屬可以移住到城鎮。但是由於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自由市場的普及，這個保留條件幾乎不曾發揮抑制人口移動的作用。同時，糧食的自由市場也創造了促使農民到中、大城市從事勞動的條件。

總之，隨著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解體，農民開始擁有可投資於收益性較高的非農業部門的資本剩餘，更由於農村和鄉鎮之間的勞動力可以移動，使「市場化可能」的資金和勞動力迅速結合而興起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就替代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

系而成爲在中國形成新的積累體系的契機；也就是說，鄉鎮企業是中國體制改革所產生的新的經濟主體，是由於在糧食生產第一主義的政策下，經常缺乏輕工業產品的農村，脫離人民公社的拘束而自由生產並出售商品的新企業單位。更由於鄉鎮企業的生產率和收益性比農業高很多，因而吸引農業部門的資本剩餘和勞動力剩餘而產生爆炸性的擴大。

從1983年出現鄉鎮企業之後，到1989年之間，鄉鎮企業擴大7.3倍。反之，農業的生產擴大速度相當緩慢，到了1985年鄉鎮企業的生產總額已超過農業生產額（1989年已超過2倍）。1987年，鄉鎮企業的生產額也超過包括農、林、牧、漁、副業的廣義農業生產額。

據統計資料，經濟體制改革後，農業生產比率急減，而農村工業生產比率則有顯著的增加。加上由於建築、運輸、商業部門的增加，中國農村在較短時間內以顯著的速度實現多樣化，而這種多樣化的中心就是鄉鎮企業。

另外，自1983年以後鄉鎮企業的勞動力，在七年之間從3234萬人增加到9366萬人；也就是說，在這期間內吸收了6132萬人的勞動力。1989年，中國農村的勞動力有4億939萬人，而鄉鎮企業則佔了其中的22.9%，由此可見，鄉鎮企業已成爲解決中國農村過剩勞動力就業的最有力新主體。

再者，鄉鎮企業對解決中國全體的過剩勞動力也有貢獻。在中國總勞動力之中，以城市國營、集體企業爲核心的非農業勞動，從1983年的1億1746萬人增加到1989年的1億4390萬人（增加2644萬人），而在同一期間內，鄉鎮企業勞動力的增加是6132萬人。

鄉鎮企業當然不是在全國一起發展的，是集中於大城市圈以及大城市圈附近，且擁有豐富農業地帶的幾個沿海省。其中典型例子就是近於上海經濟圈的江蘇省南部。

鄉鎮企業之所以能夠如此擴大，起因於勞動生產率的差異，而使每人的所得、收益率能有所增加。以1989年爲例，鄉鎮企業每一個勞動力的生產額是7931元，而同年的農業只有2016元（相差3.9倍）。非農業收入在農民收入中所佔比率，從1978年的7.0%增加到1988年的27.3%。這就是因爲農民減少對農業的投資而將剩餘資金和勞動力投資於以鄉鎮企業中心的工業部門的結果。

鄉鎮企業的技術大多是屬於傳統性的具有高度勞動密集性質，因此鄉鎮企業從農業部門強力吸收勞動力，因而緩和人口對農地的壓力，提高農業生產率，也造成將貨幣剩餘和勞動力剩餘再投入鄉鎮企的積累效果。

鄉鎮企業的產品直接和農村的需求要有關。因此可以說鄉鎮企業的形成是，以資本、勞動市場以及商品市場爲仲介而使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形成有機的連結。如黃青和、王誠德、何道峰等人在「世界經濟導報」上以「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上的農工

關係」的題目發表的「鄉鎮企業是創出了因過於迅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缺於整備的農工間的聯繫關係，因而使中國成爲一個有機體的重要角色」。因此，鄉鎮企業的形成，改變了由於社會主義原始積累而扭曲的積累構造。

4. 新積累機制的形成

從第一次五年計畫到1978年，國營工商業部門所上繳的「企業利潤」和「工商業稅」占了國家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但1978年以後，上述二者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率，由於企業上繳利潤的遽減而開始下降。

1978年以後，企業上繳利潤的減少是由於在城市改革的過程中所推行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結果——首先是將一定比率的國企利潤留存於企業內部；然後是經過事前設定上繳利潤的額度，讓企業承包；1984年以後更採用以納稅制度替代利潤上繳制的「利改稅」。

因此，工商稅收相對地提高其比率。雖如此，企業收入和工商稅收的總和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佔的比率，從1978年的90%減少到1990年的60%左右。

如上所述，企業收入和工商稅收的來源主要是經過價格剪刀差所轉移來的農村剩餘，因此其比率的降低證明將農業剩餘吸入國庫的權力體系已經弱化，也因此，財政機能對國民經濟的作用也隨著弱化——到了1989年，財政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率就減少到22.2%。但在另一方面，政府對城市住民的保護政策，如：保障糧食等基本消費物質的低價格配給，副食品補貼、物價補貼等等，卻一直沒有改變。於是導致了財政收支的赤字——1979年以後，出現了經常化的財政赤字。

這個發展促進了企業自主權的擴大，以及以企業內所保留的利潤爲企業擴大資本的「預算外投資」的擴大。1980年以後，以企業保留利潤爲主，以國內銀行借款和外國資金爲輔的「預算外投資」迅速擴大，而預算內投資則相應減少。因此，中國設備投資的重心——即全民所有制企業基本建設投資在預算內投資中所佔比率，從1979年的75.8%下降到1989年的20.8%，而投資財源的顯著多樣化，也使得國家透過財政收支統治全民所有制單位的企業經營體系，不得不進行改變，也就是降低國家財政在資本積累機制中所扮角色，從而顯著擴大自我投資和銀行的角色。

1983年以後，鄉鎮企業在非全民所有制單位中的地位迅速上升——鄉鎮企業工業生產總額在非全民所有制單位工業生產額中所佔比率，從1978年的40%左右上升到1989年的54.2%。這就是說，全民所有制單位在工業總生產額中的比率，從1980年代開始減少而非全民所有制單位則上升，且在非全民所有制單位中，鄉鎮企業的比率又佔一半以上。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說，在經濟體系改革的過程中，鄉鎮企業成爲新的積累機制的核心。（待續）

編輯報告

左翼之間如果沒有批評與討論，思想就無法深化，認識也將無法提升，更談不上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結合，因此我們一直期盼左翼內部能夠開展建設性的論辯與對話。

自從何六九過去兩期就左翼與民族問題提出他的特殊看法後，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與討論。本期我們就收到四篇相關的文章：樊梅地〈沒有幽靈，只有心中之鬼〉，尖銳地指出台灣的變革運動是不應該「不問民族」的。官土生〈揭開帝國主義幽靈的假面〉，批評何六九的論述已經走到左的對立面，甚至成為新帝國主義的傳聲筒。夏桐〈帝國主義打造的以漢族民族主義為敵的台灣民族主義才是虛無自虐徬徨徘徊的幽靈〉，批判何六九的「台灣民族主義」缺乏明確內涵，也反對他將漢族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對立的作法。何苦〈以偏蓋全何以成全〉，強調應該對於中國大陸的發展給予更多的理解與同情。同時，蕭喜東也以讀者投書的形式表達他對何六九文章的不同意見。我們希望針對這一議題，各方能夠繼續進行深入的、良性的討論。

劉鳴生〈從阿瑪斯號油污事件看全球化的一個特徵〉，以最近在墾丁海域發生的阿瑪斯號漏油事件為例，說明跨國輪船公司利用「權宜輪」規避責任所產生的問題。

《左翼》有關性 / 別議題的討論一直非常缺乏，卡維波〈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痴呆的左派？〉，除了對《左翼》上期林深靖〈青春睿智卡維波〉一文進行答辯外，他並提醒傳統注重生產領域對抗的左翼朋友不要忘記在消費文化等其他領域的鬥爭，這樣強調「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的觀點實值所有左翼朋友深思。

中國時報不久前曾經刊出〈風簷之左〉報導文學小說，報導五〇年代老同學的近況，吳俊宏這位在七〇年代政治受難的大學生，特別以「年輕的老同學」身份撰寫〈讀風簷之左有感〉，說出他的感受及其與作者不同的史觀。鍾喬〈流亡的告白〉，比較高行健與其他第三世界文化工作者之間流亡形式的差異。鄭國棟〈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中）〉，繼續批判陳芳明對於馬克思主義概念上的無知與濫用。

黃志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四）〉，本期主要探討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崩潰和鄉鎮企業的興起。

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台灣論》的中文譯本已於近日在台灣出版，書中對慰安婦的描述更在島內引發激烈的爭論與衝突，許多右翼的政客、資本家與文化人紛紛跳出來為《台灣論》辯護。因此我們特別選取一張已故慰安婦的肖像作為本期的封面，它是由三千餘名聲援慰安婦的日韓友人以手捺指紋的方式共同完成的。在慰安婦問題上，台灣左翼實在還有許多應該努力的地方。

左翼 第十六號

出版日期：2001年2月28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七號



〈1952.5.1・人民廣場〉

作者：新井廣治

軀體倒地，理念站起——紀念「巴黎公社」130週年
金錢、霸權、流氓

俞向南 / 2

倪世傑 / 7

【爭鳴與求是】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癡呆的左派？（下）

卡維波 / 10

台灣「左派」的幾個毛病

陳真 / 29

漫談婚姻的起源與解體

俞力工 / 34

爲蕭洛霍夫「申冤」

呂正惠 / 37

【特稿】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五）續完

黃志龍 / 39

原連載鄭國棟的〈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下），因續稿未到，本期暫停刊出

軀體倒地，理念站起

—— 紀念「巴黎公社」130週年

俞向南

2001年3月18日，法國地方選舉第二輪決選，左翼聯盟在巴黎市議會163席中拿下93席，社會黨候選人德拉諾（Bertrand Delanoë）理所當然被推為巴黎市長。媒體普遍稱之為「歷史性的勝利」，因為，「這是130年來，法國首都首度脫離了右翼的掌握。」130年前，就是1871年。那麼1871年的巴黎是什麼樣子？

巴黎被雷鳴般的呼聲驚醒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驚醒了。」這是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的寫法，他緊接著問道：「公社，這個使資產階級的頭腦怎麼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麼呢？」

今年是「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成立130週年，我們就試著來回答馬克思當年所提出來的問題。

在台北的青年學生可能會以為它是一間咖啡屋的名字。就在2001年初，台灣大學附近的一條巷道裡，悄然出現了「巴黎公社」的招牌，招牌下是一座奮起的鐵鑄紅星。根據該咖啡屋的廣告用語，它是「台大商圈的第一面紅旗」，提供「資產階級的美食享受，普羅大眾的消費價格，激進的腸胃革命，解放的人性空間」。進入咖啡屋，迎面的是一座慌目的斷頭台，斷頭台上擺著店裡的名片，名片正中顯眼地寫著「巴黎公社，Since 1871」。

有人或許會認為，這只不過是商品革命時代的又一個革命商品，就像印著切·格瓦拉（Che Guevara）俊逸頭像的T恤一樣，將革命轉化為消費流行。當然，台北的巴黎公社很自然地成為進步知識界高談闊論的場所，成為有反骨的青年學子約會或獨自閱讀的所在。一家小小咖啡屋的存在，似乎也簡單地象徵著：台灣持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當權者對左翼份子的網羅迫害，於今正式走入歷史……

熟悉歷史的人當然知道，1871年的巴黎公社有更重要的象徵：它是全世界第一個由勞動階級建立的政權，雖然只存在了短短72天（1871年3月18日到5月27日），卻已建立無數的典範，對人類政治社會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

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在色當（Sedan）一役，拿破崙三世率同部隊將領繳械投降。消息傳回巴黎，群情激憤。9月4日，巴黎人民蜂起佔領市政廳，宣告成立法

蘭西第三共和，終結了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然而這個革命成果很快被保皇派和資本家聯合的勢力所篡奪，組成了所謂「國防政府」。國防政府卻並不執行國家防務，不組織人民抵抗外敵，反而是奴顏卑膝地與侵略者互通聲息，自甘成爲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在法國境內扶植的傀儡。馬克思的評語是：「國防政府在民族義務和階級利益二者之間發生矛盾的時候，沒有片刻的猶豫便把自己變成了賣國政府。」

讓勞動者得以生存，讓大家能夠戰鬥

巴黎勞動者主張繼續抗敵，於是群起號召，組成了30萬人的「國民自衛軍」。1871年1月6日，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發布〈告巴黎人民書〉（又稱〈紅色公告〉），義正言詞地指出：「如果市政廳諸君還有一絲愛國之心，他們就該自動引退，讓巴黎人民自己拯救自己。實行市政自治，或者成立公社，不論其名稱爲何，這是人民唯一可循的救亡之路。」

「對現政權的改組嘗試，都會是對它的一種粉飾，必將重蹈覆轍，永受災難。維持這種政權，就意味著投降。麥茨（Metz）和盧昂（Rouen）的慘敗已經告訴我們，投降不僅會導致飢餓，而且終將導致全體的覆亡和恥辱……巴黎人民絕不能容忍這樣的災難和恥辱。他們深知，現在還來得及採取決定性的措施，讓勞動者得以生存，讓大家能夠戰鬥。」

這個「讓勞動者得以生存，讓大家能夠戰鬥」的號角，既喚醒了巴黎廣大的民眾，也造成國防政府的恐慌。1871年3月18日凌晨，國防政府「行政首長」梯也爾（Adolphe Thiers, 1797-1877）下令襲擊勞動者組織的陣地，勞動者各營隊迅速反擊，向市中心挺進，當晚攻佔市政廳，升起第一面紅旗。梯也爾及其政府官員狼狽竄逃，逃到巴黎西郊的凡爾賽閉門困守。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接管政府各機關，並隨即於3月26日進行巴黎公社普選。在選出的公社委員中，工人出身者佔了將近半數。

巴黎公社所訂定的一些法律原則，迄今仍在法國被視爲進步的社會立法，而成爲左翼政黨捍衛的標的。譬如，依據巴黎公社的法令，合法婚姻與同居關係的配偶享有同樣的撫恤待遇，婚生子女與非婚生子女享有同樣的權利，這是首度在法律上和道德上同時將婦女的地位提高到與男性同樣的高度。

其次，巴黎公社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法國迄今仍是在歐洲國家中宗教影響力最淡薄的國家，尤其教育範疇的「非宗教化」，迄今仍是法國社會的普遍信條。公社同時也確立了義務教育的原則，在薪資上，將教師的薪水加倍，政府官員的年薪則規定最高不得超過六千法郎，只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工資。影響所及，迄今法國的教師仍是令人艷羨的職業，教師資格會考也成爲每一年度的大事。

在勞動人權方面，巴黎公社除了要求在招聘合同上明訂工人工資，下令將業主遺棄的工廠或工場轉由工人以協作社的方式經營。同時也以健康和維護合理家庭生活爲

理由，取消了夜班勞動。迄今，法國法律對於各行業的夜間班和假日勞動仍有嚴格的限制。

從上面的這些法規及其深遠的影響來看，有史家說巴黎公社雖是短短的 72 天，卻改變了整個法國的歷史，這個說法應不為過！

公社是婦女解放的先聲

值得一提的事，在巴黎公社中，婦女首度集體地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了自主、積極的角色，公社是婦女解放的先聲。公社中有龐大的「婦女協會」組織，每次集會有三四千位婦女參加，她們要求「消除特權」、「男女平等」、「勞動多樣化」、「縮減工時」……等，將政治參與結合到經濟需求和勞動條件的改善，在公社婦女中已是普遍的認知。

公社支持她們解放的欲求，她們也為公社的存亡大無畏地獻身。公社期間，有一些駐巴黎的國外媒體進行報導。當時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的一位通訊員在 1871 年 4 月間寫道：「如果法國完全由女人組成，這將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國家呀！」可見，當時公社的女性是如何的強悍。當一位婦女被問及為何參與公社抗爭時，她只簡單地丟下一句話：「我喜歡有時間可以用來思考！」

婦女不僅負責救護傷員，還實際參與了戰鬥。根據當時報紙的描寫：「1871 年 5 月 25 日，當國民自衛軍的戰士放棄水堡街(rue Chateau-d'eau)的街壘時，突然有一群婦女衝出來接替，她們穩穩地端著槍，口裡高喊著『公社萬歲！』隊伍中有許多是年輕的女孩，其中有一位 19 歲的少女，身穿海軍陸戰隊的服飾，像著魔了一般的廝殺，後來被一顆子彈射穿額頭。她們終於被凡爾賽的部隊包圍，其中有 52 位戰鬥中的倖存者，還是被一一槍斃。」

巴黎公社失敗後，被移送軍事法庭審判的婦女就多達 1051 人。泰晤士報的記者在 5 月 29 日如此寫下：「我看見一位穿著國民自衛軍服裝的少女走在一大群被俘囚犯之中，當其他人都低著頭時，她卻是昂首闊步。這位少女身材高挑，一頭金髮披散在肩膀上，她無畏地直視圍觀的人群，人群中有詛咒辱罵的聲音，她揚眉睥睨，泰然自若的神情讓所有的男人赤紅了臉。」

公社中有多位相當活躍的女性，譬如有「蒙馬特紅姑娘」之稱的路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她原是一位鄉村教師，在公社中擔任婦女俱樂部的主席。公社期間，到處可以見到他的身影，聽到她慷慨激昂的演說。公社失敗後，她被判處流放遠洋荒島，直到 1880 年最高當局對巴黎公社的特赦令發佈。她回到巴黎時，民眾夾道歡迎，整個街道為之堵塞，馬賽曲、國際歌和巴黎公社時期的戰鬥旋律響徹雲霄。再譬如俄羅斯籍的伊莉莎白·德密特里耶芙(Elisabeth Dmitrieff)，她是第一國際的成員，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訊息的掌握，主要是透過她所做的工作報告。

摧毀官僚軍事國家機器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第三章提及巴黎公社的「經驗」時，說：「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據這個經驗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任務」，他接著又指出，「馬克思認為對《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據巴黎公社社員的革命經驗而做出的。」列寧所說的修改，是指對「官僚軍事國家機器」的態度，他認為，馬克思從巴黎公社所得到的教訓是：革命不應該只是簡單地奪取官僚軍事國家機器，也不應該只是把這個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而應該是以摧毀、破壞現成的官僚軍事國家機器作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決條件」。

從這個角度來看後來社會主義政權的出現和發展，自史達林專權時代的蘇聯到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在1989年的崩解，事實上是因為這些政權的性質是以另一種形式鞏固了「官僚軍事國家機器」，形成另一個新的壓迫階層，以致從革命者淪為被革命的對象。

馬克思的確在他那個時代，從巴黎公社的經驗中，看到「官僚軍事國家機器」最惡質的一面。他看到駐紮於凡爾賽的梯也爾政權，竟然為了剿滅巴黎公社，與敵國普魯士當局利益交換，向俾斯麥要回十萬戰俘，加入圍攻巴黎的行列。以致1871年5月中旬之後，雙方軍力對比發生重大變化。5月28日，公社最後一座街壘失守。自此，凡爾賽的官僚軍事國家機器對巴黎人民展開血腥的報復，據統計，有3萬多人被殺害，5萬多人被逮捕。

在馬克思眼中，凡爾賽政權的行政長官梯也爾只不過是「一個玩弄政治小騙局的專家，背信棄義和賣身變節的老手，議會黨派鬥爭中施展細小技術、陰謀詭計和卑鄙奸詐的巨匠。他一失勢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權在握則毫不躊躇地把革命浸入血泊；他只有階級偏見而沒有思想，只有虛榮心而沒有良心；他的私生活和他的社會生涯同樣卑鄙齷齪……」然而，即使是這樣一個令人不齒、不屑的小人，一旦他掌握了官僚軍事國家機器，還是可以發揮無比的威力，甚至將其變成屠戮同胞的工具。巴黎公社的經驗讓馬克思慎重思考消滅國家政權這個「寄生贅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說：「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僅僅這一點，就會把法國的復興向前推進了。」

「國家」究竟是什麼玩意兒？「國家」與「社會」之間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關係？一個剷除「國家」的「社會」是否可能？當我們思考人類政治結構的問題時，巴黎公社至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出發點。法國作家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以他豐富龐大的作品見證了誕生巴黎公社的那個年代。對於巴黎公社，他曾經有過一個評語：「軀體倒地，理念站起」（LE CADAVRE EST A TERRE, MAIS L'IDEE EST DEBOUT.）

或許正是這個站起的理念，有待我們用心去追尋！

小心 3 · 18 ！

130年前的3月18日，當法蘭西的權貴階層紛紛向外來侵略者投降，在侵略者羽翼下回頭欺壓自己人民的時候，巴黎的工人蜂起捍衛民族的尊嚴，抵禦普魯士帝國的侵略，痛擊百般諂媚侵略者的買辦政權，建立了反壓迫、反侵略，以民主、平等、自由為理想的巴黎公社。

去年的3月18日，在台灣，一個貪瀆無恥的政權崩落，一個新興的政黨崛起，官僚軍事國家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

今年的3月18日，巴黎在右翼當家130年之後，被左翼用選票攻佔。台北的街頭則被一群極右翼的亢奮者佔據，他們絕大部分是新政權支持者，歡欣鼓舞慶祝當權一週年；領頭的人士大部分口袋裡都還裝著往返機票，他們在遊行後很快要回到定居地的美國或日本，在美國世界霸權的罩護下，在日本殖民帝國的眷戀中，過著安穩、舒適、高等的生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然是金美齡女士。這位自稱「穿最高級的衣服、享受美食、住在豪華的房子，並過著規律的生活」的東京定居者，專程回台來頌揚日本殖民主義的美德，吹捧一位極力召喚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帝國美夢的漫畫家，推銷一本踐踏台灣弱勢原住民族群、凌辱台灣貧苦女性的漫畫書。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一時之間竟成為台獨的聖經。而台灣最高當局與這些人的眉來眼去，不禁讓人想起130年前，被巴黎公社所唾棄的，那個依附於外來野心家和侵略者的買辦政權。

3 · 18，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必須小心的日子！

★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金錢、霸權、流氓國

倪世傑

1989年蘇東波倒台，冷戰結束，美國頭號假想敵於焉消失，並意味著「歷史的終結」。毋需爭論，世界各國只要照著美國定出來的遊戲規則按步就班來，世界即將永久安樂和平。沈醉「歷史終結的幻象」以期待彌賽亞之降臨實在視資本積累的無上命令於不顧，忘卻歷史歡欣鼓舞的同時一連串的驚愕卻無情的在展現在世人面前。

歷史

1991年，老布希轟炸巴格達；1993年，當時甫繼任的柯林頓命令對伊拉克進行導彈攻擊；1994年，柯林頓出兵科索夫；1999年，波蘭、匈牙利、捷克加入北約，北約正式東擴；2001年2月16日，甫就任的小布希立即宣佈以「出於自衛的例行性任務」為由與英國空軍聯手空襲巴格達，共計二名平民死亡、二十餘位民眾重傷。十年前美國即不顧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擅自進行針對伊拉克的禁運，保守估計已有一百萬名兒童死於營養不良、醫療設備缺乏。英國一位支持工黨的戲劇工作者品特（Harold Pinter）曾如是說：「我們已經轟炸伊拉克好多年了，殺了不少人，但是對伊拉克的經濟制裁卻宰了更多的伊拉克人民。」

流氓國家

「流氓國家」（rogue state）概念的出現並不是最近的事，半個世紀前英國政府就曾經使用過這字眼，但近二十年來美國又從倉庫中再度翻出了這個字兒。1980年代起，一般的宣傳動員手段在西方國家逐漸失去效用，約略與其同時，「不聽話」的國家似乎又多了起來。1984年，美國藉口進行演習對尼加拉瓜桑定解放政權展開軍事攻擊；1986年，雷根轟炸利比亞，理由是「為免受未來的打擊而採取的自衛」；1989年底，在違反國際法原則下綁架巴拿馬總統諾列加（M.Noriega）。冷戰結束後，依據美國官方的說法，美國將會繼續負起保衛世界的責任。總之，就如同在電影「桃色風雲一搖擺狗」中勞勃迪尼洛所飾演的華府危機處理專家的對不知情的中情局探員所說的：美國需要一個敵人！

這個敵人是誰呢？以往藍波出任務鎖定的那些國家（越南、阿富汗）不是倒台就是轉向，目前還能稱的上是「威脅」的，就屬「西班牙裔的大毒梟」、「國際恐怖組織」等「流氓國家」了。從「終極警探」到「空軍一號」，莫不一直複製著美國飽受恐怖組織威脅的印象，甚至到「致命武器4」，已經挑明的說美國最大的敵人就是中國。

爲什麼又需要「潛在的敵人」呢？除了藉此維護並拓展美國對世界霸權統治的利益外，美國國內的產業結構特性更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

軍事—工業綜合體

戰爭、軍事工業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其不可輕忽的重要性。1929年的大蕭條直到二戰後才劃下句點。也只有戰時，藉著「破壞」以「創造社會有效需求」，凱恩斯的需求面經濟學才得以持續。二戰時武器大量消費，美國因此獲得大量的武器訂單，工廠漸次開工，失業蕭條景象不再。冷戰開啓，軍火、航太工業重要性大增，居於地廣人稀、保密性佳、適合武器演習的西部各州軍火商地位大爲提高，雷根即藉此勢力入主白宮。1980年代，主張「小政府」的余契爾、雷根在大西洋兩岸相繼掌權，美國從1982年起的五年每年的軍費增長率爲7.5%，這與縮小政府權力、減少赤字的訴求明顯背道而馳。

此時英美兩國建構起「流氓國家」的面目，並與其盟國重申「防禦」的重要性，不時以武力攻擊「不聽話」的第三世界國家。美國所著眼的不外其經濟利益：原物料的來源；爲了能夠持續獲得維持國內發展的廉價原物料，對第三世界維持有效的統御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1993—1997年間，柯林頓政府賣了一千九百億美元的軍火到世界各地；1998年選舉季，軍火商則捐輸民主黨二百萬美元。在此期間台灣則向美國進口了大約一百四十億美元的軍火，算是大客戶了。

華爾街

小布希下令空襲的前幾天，那斯達克指數狂跌，證券分析師指出高科技類股的股價「明顯的高估了」。美東時間二月十六日下午一點，也就是紐約證交所收盤前幾個小時，美英空軍聯手空襲伊拉克。但諷刺的是，空襲猶如股市的一劑回春妙藥，不僅挽回了原本大跌的盤勢，軍火類股股價更是扶搖直上（因戰鬥機使用的長程、準確度高的導彈），石油類股（Exxon, Chevron, Texaco...etc.）也因傳聞伊拉克石油工業重創預期油價上揚的心裡下升值。小布希從政前曾在擔任董事的哈肯（Harken）能源企業股價也以5.4%的漲幅坐收。

軍火類股成爲投資公司轉換手中持股的首選也並非偶然。除了網路、資訊等高科技類股因獲利率下降逐漸走軟外，還與一般民間市場蕭條脫不了關係。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美國最大的軍火承包商—因商用衛星市場疲軟宣佈削減該業務部門，並向華爾街放話未來將把業務重心重新擺在獲利豐厚的先進武器製造上。

小布希政府上台後的幾週內，軍火製造商更是不遺餘力地向新政府進行遊說。二月十二日，小布希表示，主張運用新科技，研發更輕巧、更機動及更精密的新一代軍

備，以面對「新時代的危險」。他甚至表示將不惜為此推翻國防部和國會議員所中意的若干較老舊武器系統。他說，「我們的目標是超越在老舊武器系統上追求無關緊要的改進」。二月十四日，小布希宣佈 2002 年預算中將花費廿六億美元用於研發新武器。這是他承諾將在二〇〇六年之前增加兩百億美元國防研究開發經費的「頭期款」。

兩天後，巴格達就挨轟了。

可以想見，在達康 (dot.com) 類股夢幻般的破滅後，五大軍火製造商的股票——洛克希德馬丁、波音 (Boeing)、通用動力 (General Dynamics)、諾斯拉普—格魯曼 (Northrop-Grumman)、以及雷斯安 (Raytheon)，必將一飛沖天扶搖直上，直接排擠美國民生工業資金的供給；同時，在小布希矢言加速投資軍備創新之下，美國的公共衛生、教育以及社會福利支出必將被迫減少，「流氓國家」人民挨轟的機率也因而大增。

馬前卒

就如同渥太華大學教授丘蘇多夫斯基 (M. Chossudovsky) 所言：如果沒有那隻看得見的拳頭，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根本無法運作；若不是麥克唐那道格拉斯 (McDonnell Douglas) (F-15.16 戰鬥機製造商)，麥當勞亦無法昌盛。韓戰、越戰、佔領格瑞那達、攻擊尼加拉瓜、出兵科索夫、轟炸伊拉克、出兵哥倫比亞 (Columbia Plan) 等等軍事行動的目的不僅僅在於維護美國的霸權，國內軍火製造商的利潤在其中更是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兩者相互為用為開拓「自由市場」的領域並肩作戰。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近日解密的資料指出，80 年代美國發展星戰計劃的目的正是希望困住蘇聯的財政以促使其倒台；十餘年後，美國還想重施故技於中國，便發展出戰區飛彈防禦系統 (TMD)、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NMD)，迫使中共回應而重蹈蘇聯覆轍。

四月份，台美軍售會議即將召開，美國務卿鮑威爾於三月八日的參院外交委員會報告中承諾美國對台軍售，小布希政府不會與中共諮商，台灣總統陳水扁、外交部長田弘茂咸認為美國官方對台灣釋放極大的善意，再度肯定了「台灣的民主成就」，走出「麻煩製造者」的陰霾。

衡諸美帝全球戰略、經濟利益等複雜背景，台灣實在沒有必要成為為其衝鋒陷陣的馬前卒。



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癡呆的左派？（下）

——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論

卡維波

〔前情提要〕

本文的「A計畫」部份（載於《左翼》第16號）回應前一期林深靖的〈青春睿智卡維波〉。林文對青少年消費文化持負面看法，其標題也隱含著對「青春」的貶抑，形成「青春睿智卡維波」的反諷意含。我則認為消費／通俗文化的意義不是固定而是時常協商鬥爭的，因此也經常被青少年所挪用並形成零星的反抗，正如同「青春睿智卡維波」的反諷也可能在論述實踐中被挪用反轉。為了繼續說明「卡維波，果然青春睿智」，我將在本文中比較細部地從青少年解放的立場來闡述青少年通俗文化與消費，以顯示晚近台灣主流媒體批評的一些錯誤假設。我的諸個論點可能有些分散，但是主軸乃是針對一些流傳於空腦知識份子間、已經人人琅琅上口的八股論調，他們以為只要口唸「商品化、物化、消費主義、結構限制……」等等「大掰咒」就自以為是「批判」了，這篇文章則顯示他們不過是成年癡呆了。

B計畫

一、左派革命是一首青春之歌：認同青年與頌揚青年的左派時期

Frank Dikotter曾指出，「青年」在晚清的時候還只是指著約16歲到30歲有錢人家的男性，但是在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時期，「青年」不但包括了女性，也包括了工業部門裡的年輕勞工；更重要的，「青年」變成了重生、活力、與現代性的有力象徵，代表了理性、進步與科學。在這個時期，「青少年」還沒有被發明出來，畢竟，就連西方中產階級的童年／兒童觀念也是在此時才開始傳播到中國。

早期現代時期的左派，不論是共產黨或者其他社會主義流派，都十分偏好與重視「青年」。中國的左派也不例外。從陳獨秀到許多左派文人的論述來看，中國共產黨在召喚青年與建構自身為青年化身上，都比其他政治力量成功；中國共產黨推翻「舊社會」的革命動力也因此被隱喻為「青春之歌」（小說電影名）。

在這個時期，「青年」，作為一個被發明的社會範疇，正是民族國家的希望與革新力量。今昔對比，現在「青年」這個詞幾乎已經完全失去了這樣的含意。實際上，「青年」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範疇也已經不存在了。

青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青少年」。然而，在這個社會歷史過程中，左派也開始隨著西方殖民與資產階級主流社會的年齡建構起舞，其對年齡政治的認識也從「青年是社會希望」轉變為「青少年是社會問題」。

二、青年的衰亡與青少年的興起：邁向青少年解放

與青少年對比的是「成年人」，這是個嶄新的說法。

在新文化運動時期，「青年」的對比並不是成年人，事實上，過去「青年」與「童年」的界限還很模糊，「童年」與其知識／權力在當時才剛剛誕生（有關兒童的各種論述與科學、與兒童相關的制度機構——如兒科醫學與國民教育等——才剛剛萌芽）。後來「青少年 vs. 成年人」這個新說法則很明顯是年齡的社會建構，特別是在兒童或童年的社會建構隨著現代性的發展而更形深入後才出現的現象。

不過，過去「青年」雖然連結了正面評價（民族國家的希望），卻也同時包含了青年的「問題」。例如民初反手淫運動的學者說：「要預知民族的興衰……要估計國家的未來，只需檢查我們青年的床單」（即，有無留下手淫精液的痕跡）。晚近被發明出來的「青少年」並沒有承繼太多「青年」的正面評價，但是卻接收了所有「青年」的「問題」，並且還被建構出更多的「青少年」問題。

建構青少年的最重要歷史機構乃是中學¹。也只有當中學成為普及全民的教育制度時，青少年才成為一個無分階級的全社會範疇。青少年在這個社會建構下被「生物化」，其所遭到的歧視與壓迫往往訴諸「自然」或「天生」的生物理由，一如過去婦女被歧視與壓迫也是訴諸生物理由一樣。

在歧視方面，階級／性別／種族等等歧視上常見的操作方式也同樣的出現在年齡歧視上。首先，青少年作為年齡下層，本身就被連結到負面價值，故而必須被監督、導正或規訓（年齡階層不但是年齡分類，而且還對應著高下的價值判斷）。其次，在不同年齡階層的比較上，歧視的運作乃是以平均值來忽略個別差異，或者以偏概全。這些歧視也常常得到社會科學、醫學、性學、新聞報導的「證實」，各種研究結果則更形深化對青少年的認識／歧視，也進一步構成了法律上對青少年的認定和規訓。

在壓迫方面，青少年沒有公民所擁有的各種自由權利（如財產權、參政權、祕密通訊權、自由移動權等），甚至連二等公民都談不上。在現實生活中，台北市以外的青少年有許多每天生活在校園暴力（體罰等）之下，身體遭受成年人毆打鞭撻，被暴力強迫接受主流的意識形態與規訓監視，至於毆打形式以外的身體懲罰與口頭的威脅暴力則更為普遍。現代幾乎沒有其他被壓迫者每日都承受這樣的制度性暴力統治。青少年在家庭中遭受親權的統治，在公共空間（如街上或網咖）則被所有成人所監視，也被警察等公安機構所騷擾。青少年在經濟上被剝削，缺乏自尊，無法和成人享有同等的人生機會選擇。這些都是青少年被壓迫的事實。

雖然青少年、原住民、性多元、勞工、婦女、特能(殘障)都是被歧視與壓迫的身分，而且其歧視與壓迫都有共同點(如分配的正義)，不過在其身分建構與認同發展等機制上卻互有差異，在抵抗壓迫歧視的資源與條件方面也很不相同，故而也不可能簡單相同的單一反抗策略。例如勞工基本上沒有現身出醜的污名，但是性多元(同雙性戀、性工作、跨性別、愛滋病患等)就有現身出醜的困難；以勞工或婦女所具有的抗爭條件想當然爾地來要求性多元或青少年，就是一種「胡不食肉糜」的觀點。

年齡是導致不平等的社會分層(stratification)的一個面向(Bradley)，階級、性/別、族群等壓迫權力也常常從年齡壓迫來施展，故而批判論述必須從年齡政治的角度來看待青少年。以下我將從青少年解放的立場來討論青少年通俗文化與消費。

三、互相衝突的主流建制

隨著富裕社會與消費文化的興起，青少年的社會建構有了新的制度力量與變數。除了原有的學校、法律、社會科學、醫學、性學、新聞報導、攝影影象之外，還多了商品消費以及大眾傳媒和通俗文化。

不過，這些制度與機構(各自有多重目的與複雜源起)所建構的青少年並不是一致融貫的，其所採用的「知識/權力技術(規訓)」也充滿異質性，只能藉著文化中的青少年主流論述來維持(縫合)不穩定的大致統一。「消費/通俗文化」與「學校(官方)/家庭」這兩組主流建制，在目前社會形構中有著無法協調的衝突矛盾。(例如1925年中國的教育部就頒佈「整頓風化令」以取締女學生遊逛娛樂場，要求學校通知違令的女學生家長等等。類似的禁令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存在，可見官式文化在這方面的堅持性。)這個可以簡稱為「官式文化 vs. 通俗文化」的衝突矛盾，也給予青少年機會在同樣的場域內進行多樣的「反建構」操作。青少年次文化對現狀的順從與抵抗、被體制剝削或對體制反叛、對主流文化的迎與拒，都必須在這些互相衝突的主流建制脈絡內觀察。

四、文化研究的取向

有關消費與通俗文化、青少年次文化的討論，文化研究(特別是新葛蘭西傳統)很早就駁斥了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菁英觀點，但是晚近台灣主流的媒體批評卻完全略過當代文化研究，甚至簡單套用「資本主義(父權結構)物化/商品化/媒體洗腦/廣告催眠……」這些大掰咒來批判一些攪擾或改變現狀的新現象。從他們的立論來看，他們並不是像Jim McGuigan、Todd Gitlin等等這類在文化研究領域之內提出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事實上，台灣這些主流媒體批評似乎只是簡單地撿拾了幾個口號揮舞，完全沒有跟上文化研究這一、二十年的發展²。

不論如何，為了豐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我將簡單地重述過去文化研究少數幾個

和本文相關的觀點（我所挑選的觀點不可避免地會遺漏文化研究中其他很多重要的主題），但是我希望這將有助於我們擺脫那些簡化教條的說法，重新看待像減肥美容的媒體風潮、凱蒂貓、偶像追逐等等通俗文化與消費現象，並且使得這個辯論在未來能夠在新的地平線上繼續。

五、文化消費的矛盾與反抗（激化擴大／掩蓋壓抑）：Bell vs. 左派

英國文化研究的緣起其實就是對經濟化約論（也就是馬克思的經濟下層決定文化上層）的批判。從化約論來看，任何商品消費或通俗文化大概都有利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繼續統治，而左派的文化批評活動就是把某些消費與通俗文化現象，解讀／詮釋為宰制階級陰謀操縱技術的又一次勝利施展。於是只要（1）某個商品消費幫助了資本家賺錢，（2）通俗文化的某些元素在複製既定價值觀念或權力關係，（3）某個對象新近被納入市場關係，（4）某個領域被更進一步商品化了……，這些就都立刻構成了資本主義宰制成功的證據，而從不被視為是新社會矛盾的可能出現，或危機的可能擴大，或抗爭的可能機會等等。

不過，與其說化約論左派的文化詮釋不重視經濟領域以外的鬥爭，倒不如說它意圖否定性別、性、年齡、族群、身分團體等主體的文化與日常實踐的進步性與有效性。換句話說，化約論的左派幾乎舉不出任何一件其他主體所做的消費或通俗文化實踐是可能有正面意義的（此處的「正面」乃是相對於左派的政治價值而言）。

事實上，從現代主義文藝到後現代的享樂主義，許多左派都認為它們是有利於體制的。不過這也不稀奇，不只左派，連右派——例如被視為文化保守主義的 Daniel Bell——也反對享樂主義，後者並且認為後現代的享樂文化根源來自現代主義文藝的進一步商品化。

不過，Bell 和左派們（典型者如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庫色）反對享樂主義的共通點只是表面的。因為左派還只是簡單地認為享樂文化有利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維繫，而 Bell 卻辯證地看出享樂文化造成了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Bell 說：「現代主義文藝是否如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說已被收編了呢？在單個層面來說，是的，因為現代主義被轉化為促銷與利潤的商品。但是在更深刻轉變的結構中，這個現代主義轉化為商品的過程只會更損害到資本主義本身的基礎」。相較之下，馬庫色的觀點因而（頗為反諷地）只是「單面的」。換句話說，資本主義文化內部存在著矛盾，而不是簡單地再生產（複製）資本主義下層經濟結構而已³。有關 Bell 的論點，我將放在註腳內進一步說明⁴。

在此我不是聲稱 Bell 的論點正確。我想強調的重點也不只是：「資本主義文化沒有內部矛盾」的想法恐怕不夠辯證；更重要的是，我要強調：文化領域內的諸多矛盾不是萬流歸宗地都來自——或走向——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基本矛盾，後者並不解

決或決定所有的矛盾。我們應該承認各類矛盾的存在與意義，而不是否認（掩蓋）矛盾與隱含在其中的抵抗。我們還應該藉由激進論述來擴大矛盾與製造新的矛盾，否則終究也只是在掩蓋與壓抑矛盾而已⁵。

某些左派總是把眾多矛盾化約為一種「基本」矛盾，或者只談各類矛盾對現實的順從性——而非抗爭性，這些都是在掩蓋與壓抑矛盾。換句話說，如果左派在分析通俗文化與消費實踐時，只強調這些實踐配合了並複製了資本主義的層面，而不注重與擴大這些實踐與現實之間矛盾和反抗的層面，而只是喃喃絮叨「受結構限制而有其侷限性」（哪一種實踐沒有侷限性？），也不思考如何非經濟化約地突破其侷限性，那麼左派依然是在掩蓋與壓抑社會矛盾。

在今天，青少年的消費與文化實踐經常直接與家庭、教育建制和官式文化相衝突與矛盾；有效地擴大與激化這些矛盾，以促進青少年對自身處境的反思與能動，才是左派積極的作為。很明顯的，想要「有效地」激化與擴大矛盾，而不是「胡不食肉糜」式的場外指導，就必然要串連青少年的通俗文化，而非空降左派的空靈論述。在我談及這點前，讓我先談清楚消費與通俗文化為何能產生矛盾與反抗的可能。

六、洗腦與真假需要——馬克思 vs. 全球化

不論左派或女性主義者在討論塑身廣告時，總是假設廣告與購買商品之間是個簡單的因果關係，彷彿媒體或廣告的影像無須中介就有效果：消費者被廣告所操縱與影響，創造出「虛假的需要」，而消費則灌輸順服的觀念、壓抑政治的抗爭。這種貶低消費者的看法，也有貶低女人、青少年、教育程度低者的含意，因為正是這些消費者往往被認為是容易受騙與不理性的主體。

在這種批判中最容易被貶低的消費通常是：被認為缺乏社會價值的消費，有可能攪擾現狀或接近偏差的消費，會改變原有身分地位或階層高下階序之消費，可能使舊有人際關係與人倫產生變化的消費，或者關連到通俗文化的新風潮消費。相較而言，如果是高等文化的消費或家庭消費，就很少會被貶低（儘管這類消費才是維持社會建制的重要基礎）。以此看來，貶低消費論述，其本身也是不同主體之間鬥爭的修辭策略。

最常見的一種貶低論述就是說消費者被廣告「洗腦」了。這個詞原本來自右派的反共宣傳，目的是貶低那些擁護共產黨的人民缺乏自主能動，故而說親共者是被共產黨「洗腦」。

和廣告洗腦論述密切相關的則是「真實需要／虛假慾望」的區分。然而在今天，其實這是一個無法成立的假區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說：

「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產物，因此多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於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麼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

我認爲馬克思這段話說明了：首先，需要或慾望（及其滿足方式）原本就是歷史的、相對的，不同國家有不同水平的需要慾望。其次，無論真假慾望，都是透過文化來建構與詮釋的，它們無法獨立於文化。換句話說，沒有什麼真實需要是「自然」決定的。（試問：大魚大肉、有機蔬菜、旅遊、彩色電視機、性愛合一、手機……是真實或虛假的慾望？）

不過，馬克思的講法也必須放在今日全球化的脈絡裡來進一步修正；雖然馬克思時代已經有了全球化現象，但是當時民族國家內勞工生活對外的區隔性以及對內的同質性，都十分顯著，而這些恰恰是今日全球化現象正在逐漸改變的對象。馬克思那段話的脈絡，主要是在談各國在工資水平的高低方面會有文化的差異，有些國家可能需要較高的生活水準，故而馬克思的講法或許有可能被延伸爲：外勞在台灣領取較低的工資或許是合理的。但是我不認爲左派應該接受這樣的主張。更有甚者，如果外勞被台灣消費文化影響因而改變生活方式與慾望，並且想要更多的工資，這是虛假慾望嗎？或者，如果台灣本地工人受到媒體上西方工人形象的影響，而想要更高的生活水準，這也是應當被批判的嗎？

在上面的引文中，馬克思也強調「工人階級是在什麼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此一因素。由於社會變遷的加速度，同一民族國家內的不同世代在成長與進入勞動市場時的文化差異很大，成長於富裕社會與消費主義的世代，或者成長於經濟蕭條與景氣衰退期的世代，其需要慾望當然會和其他世代不同，同時，由於世代更替的週期不斷縮短，故而同一民族國家內並沒有馬克思所設想的一個統一的「文化水平」，而是有世代差異的。如果新世代具有高於過去生活水準的慾望需要，或者相反的，如果舊世代的生活水準的慾望需要高於新世代，那麼這些慾望需要是否必須被否定？爲什麼必須被否定？既然這些慾望需要都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結果，我們還能稱之爲「虛假」嗎？

不過，即使修正過的馬克思說法，也不足以處理「真實慾望 vs. 虛假需要」的問題，因爲還有許多慾望需要無法納入經濟範疇內被解釋。例如性的慾望需要，以及身體管理相關的慾望需要等等，這都需要馬克思主義或女性主義以外的理論資源來分析。任何想要把（例如）某種特定S/M或人獸戀商品的性慾望需要，從階級、經濟、民族文化、父權、國家機器等等角度來作直接連結的企圖，都會有簡化的危險。

七、你喜歡批判別人的商品消費慾望嗎？

曾國潘的女兒曾紀芬在1932年說，馬桶、玻璃窗、衣櫃等是西化者追求時尚的奢侈慾望。以今日的語言來說，曾紀芬是指責馬桶等乃是西方殖民者所製造的虛假慾望。而當時甚至還有人曾經以生理的理由說馬桶「違反自然」（即，大便時應當採蹲式而非坐式）。

現在人們將曾紀芬的這個說法視為民國守舊派的迂腐，但是大大小小的曾紀芬今日充斥「批判」界，這些人不斷宣稱「真實需要」截然不同於被父權或資本主義所建構的虛假慾望。然而這兩者的區分卻充滿了沙文主義的色彩——什麼是「曾紀芬」口中的「真實需要」？說穿了，「我的（沒有）慾望就是大家真實的需要」！

某少女看了廣告的手機或凱蒂貓就好想好想擁有，就有強烈的購買消費慾望（甚至因為沒錢買，後來就用援交來換取）。這就必然表示此少女被洗腦、是主流消費的順民、在政治立場上擁護資本主義嗎？錯！對商品的慾望本身並不是被洗腦的證據。有關狂想與慾望的心理分析說法也證實：慾望商品和政治立場無關。例如，右派也會有慾望購買《資本論》一書，女性主義者也會慾望男性沙文主義商品，批判A片與減肥的人往往照常看A片與進行減肥，更不必提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那些人的慾望了。很明顯的，慾望或消費不一定就是缺乏政治覺醒或「順民（順從）意識」的表現。所有批判消費慾望的人其實都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永遠都只批判別人的消費慾望，從來不會自我批判。

八、購買與消費是市民的一種公共交往

左派、仿左的保守派與人文主義派等等所有空腦的批判家，只知道急急忙忙地去批判別人的消費慾望，但是卻沒注意消費慾望的實現過程——購買。

對的，離開家走到市場或街道上，與人交往，這個購買過程（不論最後成交與否）都可以產生慾望／認同／愉悅。換句話說，慾望／認同不一定是由「看廣告」所引發的，購買（或不購買）的愉悅／認同也不必然和那個特定的商品本身有關，因為購買過程涉及了都市景觀、室內與櫥窗設計、購買流程、市民交往等一系列複雜的因素。就像去麥當勞絕不是只關乎電視上的漢堡廣告與漢堡本身而已。以下我只簡略地談談現代消費社會中的「交往」(intercourse——最早馬克思與恩格斯用intercourse這個英文字或verkehr這個德文字來指商品的交換活動或商業人際往來，我在此沿用並發展此一用法，但是我的用法並不包括哈伯馬斯所謂的溝通communication)。

早期現代的經濟交往促進了平等主義與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在市場經濟發達的社會裡，消費購買是公共交往中的一個重要形式，但是人與人之間的這種購買的經濟交往其實並不都等於單純的物物交換行為；許多時候，經濟交往和原有的社會文化網絡形成了交織（例如社區的網絡、族群的網絡、親友的網絡、次文化的網絡等等，也與購買消費的網絡發生關連）。即使在都會陌生市民間偶發的、「非私人化」(impersonal)的消費購買中，也常常伴隨著或附加著其他意義的交往——至少，在這種消費購買行為中認可了既定的一些市民交往規範，維繫了社會團結與秩序。總之，許多不同意義的市民交往都可能透過商品交換來達成。

用更簡單的話來說：一個社會總是人和人在發生形形色色的關係，但是這些關係

有時是依附於或透過商品交換來達成。例如，社會內的各種「知識」，可以從購買中互相交換學習而來。（此處的「知識」除了指買賣雙方所擁有的各類資訊、經驗、意見、社會觀察、價格評量、語言等等，也包括了不必言明、默會可知的文化意義、角色扮演、規範、身體規訓、禮儀、情感評價、互動儀式、自我認同、服裝流行、風格、道德態度等等。）當然，這些「知識」也可以從其他關係中交換學習得來，但是消費購買乃是陌生市民公共交往的一個常見方式。例如，在台北敦南誠品書店買書，和網上購書絕對不同，在此處購物時，連身上穿的衣服與打扮、身體語言，都是某類市民交往（但不交談）的重要成份。

從這個角度來看，誰是實際的購買者——誰的身體親自出現在市場上與人交往——就是很重要的。因為就是這個購買者（如外勞女傭），而非指使她去購買的出錢者（如外勞的主人），在市場上和他人做實際的交往、和他人發生關係。在商品社會中，販賣者與購買者的特徵或屬性則會影響文化、市場、城市風景等等的某些層面。（例如，倘若外勞都不外出購物而均委託他人代購，雖然同樣的商品被購買消費，但是此社會的公共交往就會有不同的面貌。）以下讓我用女人與青少年為例，來說明購買作為公共交往的意義。

九、女人與青少年的購買／交往

早期在消費主義成形時，家庭消費是大宗。因此此時的消費主義主要以女人為訴求目標，內容也以女人的家庭角色為脈絡，被視為強化了女人屬於家庭的刻板印象，於是「消費主義—女人屈從」成為批判的焦點。但是消費主義也同時給予了女人權利意識，讓她們可以以消費者身分在公共領域中與他人交往；同時，女人被視為家庭購買方面的專家，比其他家人更擅長購物，因而在家庭裡擁有力量與權力，購物也成為樂趣的來源。這種家庭婦女的消費主義狀態至今仍然相當主流，但是已經乏人批判。

雖然錢是男人賺的，但是購買卻使女人走出廚房，在公共空間流連忘返。購買常是女人彼此交際的方式，也是「女人文化」的一部份，更是使女人和社會普遍發生關係的媒介——購物是女人的「濫交」：購物讓女人處處可去、到處都去，也使女人多方面地進行社會交往。

同時，購物也使市場以女人為家庭消費的實際掌權者，是市場交往中的平等／頭等公民。男人只好藉著「不屑家務採買瑣事」、「幕後指揮」等說法，來掩蓋其在市場交往領域中身體的缺席事實。（空腦的男性理論家則以為購買無須智慧、腦袋空空也可購買，而且誤以為無須身體與情緒、「空有腦袋」的理性溝通也可以造就早期現代以來市民交往的秩序與意義⁶）。

發達的青少年消費對青少年也有類似的正面效果：青少年藉著消費購買過程，合法地現身於公共空間，並且取得（與成人一樣）佔據或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合法享

用公共資源等等。(根據統計,美國青少年在「血拼魔兒」shopping mall中常常只是消費那裡的空間與形象、聚集人氣和交友釣人約會、只逛不買。)但是更重要的,青少年經常在和購買相關的一系列相關交往活動中,不但建立次文化的人際與認同網絡,還建立起次文化的商業網絡,校園附近販賣補帖或光碟的商業網絡即是一個例子。又例如,有些地點的顧客們(彈子房、泡沫紅茶店、網咖等)可能彼此都認識,或者都會光顧其他消費地點等等。另外在像台北光華商場的商業交往中,我們可以觀察到電腦商家並非只是單純「販賣」而已,而是透過販賣來形成次文化;次文化與商業網絡互相支持滲透。許多青少年的購買與消費也常常在「次文化—商業活動」中轉化為販賣與生產:例如相互買賣補帖或放心藥,又例如在青少年的便利商店或速食店打工文化中,其「顧客/打工者」身分經常互相轉換,其身體規訓也彼此學習滲透(參見何春蕤,〈台灣的麥當勞化:跨國服務業資本的文化邏輯〉一文)。一般來說,青少年商業中由於員工也多是青少年,所以顧客/員工身分很容易轉換,這種轉換也促進兩者之間的進一步交往,以及人際交友、工作介紹等圈子之形成與擴散。

十、次文化的商業網絡——社運應該商品化

次文化內的商業網絡事實上是次文化再生產的重要力量,例如飆車族的文化與交往絕不只是限於街頭狂飆,而同時是在機車改裝等商業網絡內受到支持;這也是為什麼某些青少年次文化即使被視為偏差(如使用放心藥 psychedelics,俗稱吸毒),也很難被公安力量所根除——因為次文化(以及其所包含的狂野、顛覆、挑戰、抗爭、腐蝕、進步)正如吸血鬼般地依附在推動資本主義社會運轉的商業網絡內。這麼看來,具有激進運動性質的偏差次文化必須積極自覺的與主流文化互相滲透、利用主流的制度、組織、商業交往網絡等等來吸取資源和從事實踐。

許多社會運動組織偶而也會涉及商品買賣,但是多未能建立商業網絡,也因而難以壯大其運動次文化。這些運動組織即使只賣紀念品、書籍等,仍然是以靦靦的態度來面對「運動商品化」的指控,而不能振振有詞地指出「商業化」才是未來運動的理想出路,只可惜缺乏人才、資金、網絡門道與精力而已。更廣泛的來看,有些運動的次文化商業網絡是自發形成的,例如同志運動相關的酒吧與書店、藝廊等形成的網絡,而這種商業網絡與同志次文化、同志交往有密切共生、共同壯大的關係。總之,社運如果要發達壯大,就必須發展商業網絡,這樣的網絡也才能夠孕育人才、發展次文化、有助於草根組織和動員。

然而許多運動組織即使經營書店、咖啡餐店或販賣東西,也從未正視運動的這個商業部份,並將之提升到理論的高度來討論其意義。19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運動與嬉皮運動也曾有其商業網絡(放心藥、二手貨、手工產品等),但是卻沒有得到應有的正視與認可(McRobbie)。事實上,那些販賣現場經常是由女人與年輕人在經手,

有身段的男性社運大老們則忙著處理「大事」。在這方面，社運論述中忽略或輕視商業活動，也意味著對女人與青少年的貢獻之忽略與貶低。

總的來說，男性社會理論家對於「再生產領域」一向是忽略的，不但忽略性／性別／家庭，也忽略消費／購買、以及交往。上面談購買時，我沒有多舉「販賣」的例子，其實販賣者的社會交往也常被窄化為「圖利」，而沒有被更深入的探究，此處暫不深談。此外，購買與消費雖然都可以成為公共交往，但是購買與消費是不同的行為與概念。下面讓我們看看除了「交往」以外，消費的其他面向。

十一、主動消費

晚近的消費文化使得消費不是只消費物質或服務，而還消費象徵符號；對象徵符號的消費有時甚至是消費的全部原因，或至少是主導原因。這使得消費主要是文化場域的實踐。

事實上，所有消費幾乎都是文化實踐：人們在消費中積極主動地創造或維持某種身分認同（個人或集體的）。由於認同必須自我自力主動地建構，故而消費從不是簡單地反映生產，商品消費的文化形式與意義因此不能被化約到階級／經濟／生產。正如 Mica Nava 所說：消費不但是經濟活動，也是交往與對立、形象與認同、夢想與安慰。

上述「主動消費」的觀念，強調的不是主動選擇商品或消費者主權，而是說，商品的意義必須在消費過程中才能實現，而這則給予了消費者主動介入詮釋的可能性，使得商品的意義不一定是生產者所意圖的、所強加或決定的。

「主動消費」是理解通俗文化的一個關鍵：文化研究將通俗文化，特別是次文化，視為大眾主動消費商品的結果：人們利用湊合借用（bricolage）商品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人們創造／複製／建構意義、形象與認同，而這些在文化場域內的主動消費也與通俗文化互相構成。通俗文化的拼貼／挪用／湊合／賦予意義等則是創造力的表現。

換句話說，文化工業提供了文化商品，但是人們卻在使用文化商品時生產出通俗文化。即使人們在消費過程中無異議地接受了商品事先設計的現成意義，人們也需要主動地「啟動」這樣的意義才能完成消費。文化消費本身就是意義的生產，而人們必然處於一個賦予意義的能動位置，並且往往藉由這樣的行為來培力、得到愉悅或者抵抗。

十二、通俗／次文化的抵抗與培力

上述的結論在各種次文化中更為明顯：次文化把日常普通的事物挪用與重新詮釋，這種文化借用也是一種「收編」，但卻是由下而上的收編（Fiske 稱之為「編出」excorporation，相對於收編的吸納「編入」incorporation）。

次文化風格之所以會具有反叛的因素，乃是因為「風格」就是借用拼貼（bricolage）

而成的：將符號象徵從其原初脈絡抽離，商品重新被串連，這是個自我定義的活動，對原初意義或生產者的意圖自然形成抵抗，並很容易在被壓迫的情境中產生反對意義。例如，青少年次文化透過各種行為（音樂品味、追逐偶像、做身體、黑話或內行等等），以符號象徵形式來反抗師長與父母文化，文化工業則有可能將青少年次文化進一步商品化。

成年人一般看到的只是文化工業在操縱青少年，在製造流行或「帶壞」青少年，以為「流行」都是從上而下強加於青少年的。成年人之所以有此印象，乃是因為成年人往往透過與青少年文化劃清界線而奠立本身的「成年人」地位，結果因隔絕而並不熟習青少年次文化，以為文化工業網羅了一批深懂青少年心理的廣告行銷高手與創意人員，所以能夠讓青少年如痴如迷。

其實，文化工業所創造的新一波流行，往往是對次文化舊一波流行元素的收編，但是文化工業卻賦予了這些元素或符號一種正當性。結果，一方面可能使它們原初的反叛或偏差意義減弱，但是同時也使得這個商品能在更廣大的範圍內被消費與流行，因而具有文化接受性（cultural acceptability）。另一方面，被削弱的反叛與偏差卻也有可能因為被認定而得到正當性，並因為擴散而形成另一波編碼的可能素材和榜樣。這個抵抗與收編的過程，可以被看成是不同主體權力協商過程，也往往帶來真實的文化變遷與符碼意義的變化⁷。

十三、意義無法被「霸權宰制」或「反對抵抗」的任一方所獨佔

這不是說通俗文化必然是培力與抵抗的，正如我們並不否認有時候消費是順從生產者所意圖的意義，有時候文化工業也極力在其中操縱。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以下兩點：

第一，正如性產業的力量不能決定性產業的文化影響／效應，文化工業的權力也不能等同於文化工業的影響／效應。例如，一個資產龐大的跨國唱片公司可以使〈愛如潮水〉必然流行嗎？或許。（其實統計指出，失敗的促銷例子更多）。但是他們能使〈愛如潮水〉變成「使異性戀女性臣服於一夫一妻意識形態下」嗎（如果就文本字面來分析，好像如此）？可是結果卻不是（愛如潮水曾是同志國歌）。（請參見本文A計畫之附錄）

第二、意義和愉悅很難被獨佔與控制，意義並不終止於商品交易的結尾。文化領域總是意義爭戰的場地；意義就是社會實踐與社會鬥爭。商品符號在消費實踐中被賦予意義、被選擇、被著色、被重組、被挪用，這些既是認知的、也是情感的、身體感知的過程都包含著創造的元素。當然我們不否認〈愛如潮水〉的生產（作曲詞者、歌唱者、包裝行銷者）是有創造力的，但是誰又能否認消費者將之變成同志國歌的創造力呢？意義信息不是生產者單方傳送／消費者照單接收，而是在消費中被再度製作或

加工；故而 de Certeau 把消費稱為「二度生產」。生產者的意向與產品的文本並不能決定消費的效果。

事實上，商品的使用價值無法在事先確定，只能在每次實際使用中才體現。資本家要交換價值，消費者卻要使用價值（或符號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對資本家而言只是可以交換，但是對消費者而言，卻有很多不同的使用價值。此外，由於個別資本家也常常惟利是圖，而不會關心產品「落入壞人手中」——亦即，不關心該產品是否會被轉換其意義而不利於資本家整體——這也是為什麼消費與通俗文化領域可能會出現不利於資本主義的矛盾。

之前曾提到 Bell 認為資本主義文化矛盾的一個因素便是享樂主義文化。Bell 曾說：「享樂主義的世界是時裝流行的世界，是照片、廣告、電視與旅遊的世界。這是個讓你信以為真的世界……上個十年最成功的雜誌被稱為 playboy（遊戲玩耍的男孩）不是偶然的……其成功主要在於這本雜誌鼓勵了男人性獵豔的狂想。Max Lerner 曾說，性是美國生活最後未開發的西部邊疆，在這個強強滾的社會（go-go society）中，性成為成就動機的最高峰。1950 到 1960 年代，性高潮的秘教崇拜取代了財富的崇拜，成為美國生活的基本熱情」（70）。Bell 這類分析的反動性，在於未能重視文化意義的多樣詮釋與變動性質，其實際效果便是掩蓋與壓抑了矛盾和可能抗爭。

例如，在 Bell 所描述的這個男男女女都要性高潮的 1950-60 年美國文化中，要如何看待同一時期曾經發揮影響力的激進性政治的高潮論述呢（W. Reich 的《高潮之功能》）？難道這是激進派性政治與體制共謀的證據嗎？在同一個時期也有「中立」的性科學（馬斯特與瓊生等關於女性高潮的論述），這也是享樂文化的共犯嗎？可是女性主義不也立刻轉而把這個通俗的「享樂的」高潮論述激進化，成為女同志分離主義的彈藥（Anne Koedt〈陰道高潮的神話〉）嗎？

由這個例子來看，文化戰場的「編入（收編）」與「編出（挪用）」是不斷進行的，沒有人擁有最後的意義、詮釋。對批判體制的人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從通俗文化編出激進與抵抗的論述，而非哀嘆激進與抵抗的論述已被體制收編。

易言之，批判者要做的，不是尋找 liberation 可能是 libertine 的蛛絲馬跡，而是從 libertine 積極編出 liberation。（註：libertine 即是自由隨性、任性放縱的意思。Liberation 則是解放。）

但是為什麼有些左派的慾望卻總是在 liberation 中尋找可能是 libertine 的蛛絲馬跡，想把兩者界限區分清楚呢？

我認為左派這種態度建立在以下的假設上：資本主義是單一巨大的並且能夠吞噬所有反對，把所有的異議都齊一地佔用為一個同質的主宰文化。因此，收編必然是一個全面化的過程：被收編的就不可能是真的反抗，真的反抗則必然無法被收編。在這個前提之下，「商業化的文化反對」與「真正的文化反對」的區分必然須是清楚的；

「真正的抵抗」和「與體制共謀」的界限也必須是清清楚楚的。

左派這種假設有其政治上與知識上的許多盲點，此處只需指出意義是無法被宰制或反抗的任一方所獨佔。其實，liberation與libertine必然共享許多意義元素，也不可能區分得清清楚楚，即使區分清楚也是一種無益的實踐，因為從libertine積極編出liberation才是有用的。

十四、通俗文化 vs. 高等文化

許多左派視通俗文化為另一種「人民的鴉片煙」，認為通俗文化提供人民安逸的愉悅，讓人民宣洩了不滿因而順服現狀。這樣的觀點忽視了文化領域內「兩種文化」的矛盾對立，以及由此矛盾而來的階級鬥爭、年齡鬥爭等等。

在文化領域裡，一方面有官方的與高等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有通俗文化。官方的文化通常有直接的政治目的，在打造國族認同時表現為一種國族文化，這種國族文化與上層階級的高等精緻文化關係密切但是不完全相同⁸。相對於高等文化的國際或西方成份，國族文化則有許多傳統文化和地方文化的成份，但是這些成份也會借用高等文化的符碼與呈現形式，故而官方文化有時與高等文化的界限模糊。國族文化也可以關連到族群或種族的鬥爭，不過，此處我只談高等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矛盾。

高等文化常有道德規訓的意含，通俗文化則是嘉年華式的。前者是嚴肅的、精神昇華的、靜態的、美術或博物館的、國家支持的等等；後者則是歡笑的、肉慾身體的、動態的、市場或街頭的等等。

高等文化與通俗文化兩者也代表了不同的品味與階級意義。在Bourdieu的講法裡，品味的高下在於一種美學的目光，也就是能否和事物的實用價值與實際操演產生距離的目光——這種目光則從關注事物的功能轉移到其形式。不過，這種有美感距離、純美學的目光，是透過美術館才被制度化的，因為在美術館內靜靜擺設的事物已經失去實用功能，只剩下純粹形式供人沈思與凝視。換句話說，近代高等文化品味的美學目光其實是一個隨著美術館等藝術建制誕生的歷史發明。

相對來說，通俗的美感與品味則多半是實用的、多元的（系譜複雜、湊合借用、互相指涉）、非「永恆的美」，也不放諸四海皆準，可能存在於不法的、鄉野的或次文化的小圈子中，或者被商品化而有文化接受性。通俗品味充斥於通俗文化、商品設計與邊緣次文化中（卻被評為低俗或甚至惡俗），但是卻是多元美感的真正來源（在此我們已經找到女性主義苦尋不著的多元身體美感與性感的文化資源了）。

高等文化的創造者是少數的一群文化菁英或藝術家；通俗文化的創造者就是大眾，人人都是藝術家，這是集體的努力生產的結果。文化工業提供了原料和半成品，但是大眾才有活力與創造力來加工生產通俗文化。大眾產生出來的，也許會被收編成為新的商品，但是這不是故事的終了：正因為永遠都有新的創造，所以才有不斷的編

入（收編）與編出。總之，我們不應該假設創造力只存在於文化工業，也不應該假設：通俗文化完全是文化工業操縱符號與意義的產物，而大眾只會消費接收現成的意義而無創造力。

不否認大眾的創造力，不把通俗品味視為低下，強調通俗文化的參與性與民主性，於是有了「普通或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的說法。這是一個有複雜歷史的觀念（起源於菁英主義、同質的共同體社會等觀念），但是Raymond Williams將之與這些分離，而注入了參與民主的觀念。Paul Willis則更肯定通俗文化作為共同文化的民主、抵抗與培力意義。不論如何，透過資本主義的商品消費，為「普通或共同文化」鋪平了道路，這是文化的平等，品味的多元而無高下。

高等文化、通俗文化與官方或國族文化，當然有互相收編滲透的情形。這些需要逐個地歷史—社會的考察。例如，雲門舞集起源於高等文化，但是在訴諸群眾的室外場地表演時，其實又扮演起國族文化的角色。一般來說，雖然以高等文化形式來收編通俗文化內容（如古典音樂樂團演奏通俗樂曲等等）比較常見，但是在像美術館、國家劇院、經典、高校與大學課程這些高等文化的主要建制方面，通俗文化的滲透仍然少見（特別是在高等教育課程與經典方面）。不過，通俗文化與高等文化的高下之分並不因為彼此邊界的滲透而消失。

十五、青少年與電視廣告

高等文化與通俗文化的高下之分，除了有階級鬥爭的意義外，還涉及年齡鬥爭，因為一般青少年不但普遍被視為缺乏高等文化教養與文化品味，而且通俗文化還主要地被視為青少年的文化。

一般在談到青少年文化時，特別是消費與影像文化時，青少年常被視為被廣告操縱洗腦，比較容易受騙上當花大錢。Mica Nava卻指出青少年其實很不好騙，因為事實上，青少年廣告比較sophisticated（上道），比較繁複，比較多鏡頭變化／快速剪接／多樣打光配音，比較壓縮更多符碼，更多抽象與腦筋急轉彎，和那些訴諸家庭主婦的廣告不同。這說明了青少年的文化技巧很高——只要看MTV就知道。

青少年之所以有較高的文化技巧，很少是來自正規教育，而多半是因為他們自幼就熟習電視廣告與影像文化。廣告的文本乃是從其他文化產品來，如政治、電影、廣告，這些符碼交互指涉、諧擬……，用典愈多則愈難解碼。此外，廣告與媒體的自我解構、自我解碼，更使得青少年的文化技巧高超，也拉大成人（包括學術份子）與青少年的距離。Fiske因而指出，兒童很早就是電視廣告「懷疑的閱讀者」，反而是父母的禁看妨礙了兒童電視識字解讀能力的發展。

由此來看，那些斷言「青少年被電視廣告操縱」的大小批評家，顯示的不是青少年的智商低下，而是批評家本身的癡呆程度。

十六、青少年與身體

當代對於身體的重視(裝扮、減肥、飲食、運動、性、養生、整型等)有許多社會—歷史的因素,包括所謂的「文明化過程」(N. Elias)、個體化權力技術(M. Foucault)、個人主義化(U. Beck)與對身體的反思性籌劃(A. Giddens)等等。這些都還需要其他文章來說明,而不能像那些沒有學問的空腦批判家那樣歸諸於「廣告物化身體/身體情慾商品化」等大掰咒。

現代的身體規訓在規模與細緻深入個體方面,是傳統上從來沒有的,而且兒童青少年與邊緣人首當其衝。可想而知,對於身體規訓的抵抗,也必然集中於身體規訓的實體——身體,與形式——規訓,因此,身體必然就是這個抵抗規訓的戰場。當然,有力對抗官方規訓的往往是另一種規訓或身體管理,然而在這種抵抗中,主體卻得以操作其中的矛盾,而重申對於其身體的控制權。

青少年的反抗與(次)文化經常是集中於身體的。正如Hebdige所說:「如果青少年不能擁有什麼,至少擁有自己的身體。如果青少年無法施展任何權力,青少年至少可以在自己身體上施展」。外表的酷異作怪或刺青,是在普遍失業與從不就業的環境下,公然宣告無意參與搶飯碗的行列,自斷後路,在社會把你淘汰前,先把自己葬送。Hebdige這樣的解釋正是把身體次文化聯繫到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矛盾。

不過總的來說,各種各樣的身體流行或者具有性別特質的風格,其實沒有內在意義:例如男性特質風格可以被女性挪用,刺青貼紙可以因不同年齡而有不同等級的偏差意義等等。總之,符碼是非常易塑的,可以不斷地被「做」或修正——例如,化妝可以使女人更正經或更偏差。此外,許多看似與身體無關的消費也可以透過論述而連結到身體管理,故而身體的抗爭也是非常普遍多樣的。

之前曾經說過,青少年不論走在哪裡總是在成人的監視下,上課時間或甚至放學後穿著制服在「不良場所」的遊蕩,或身體彼此的親熱,更立刻引來親權的凝視。青少年對這個時刻被監視的反抗,不一定只是躲避隱藏,反而有時會故意作怪和愛現,以吸引更多的目光與凝視,從而將被監視的不安,轉化為被觀看的愉悅。事實上,青少年次文化往往就是在監視與逃避監視的空間中成形,故而其文化風格趨向招引目光的作怪或甚至殘虐身體的奇觀,這是對監控的反抗:要反客為主地把被監視的處境轉換成表演的奇觀,產生操作他人凝視的愉悅。這正是Hebdige所說的「躲在亮處」。

十七、文化激進主義

青少年一直有兩種被建構的形象,例如英國維多利亞時期將工人階級的青年分成兩類:「乖的/罪犯的」,「有道理的真窮/不知上進的懶窮」,「不良的/壞透的」,這個二分趨勢一直存在,後來的「好玩歡樂/麻煩」也是一樣。這些二分往往是透過具體形象來被呈現與被建構,如果我們分析現今的許多青少年廣告或媒體影像,我們

會發現同一個影像主體可以瞬間交替出現兩種形象，或者可以同時有這兩種方式來解讀。這是否代表著這種二分建構可以和平共存、相安無事呢？絕非如此。

廣告或報導中的「偏差與乖順」、「上進與頹廢」、「陽光快樂與陰暗犯罪」的瞬間交替與同時並存，只是粉飾兩者之間衝突的烏托邦狂想，而這兩者的矛盾關係則時常被置換為官式文化與通俗文化的緊張關係。但是不論是禁慾規訓的官式文化，開明禁慾的教育改革，著重享樂的通俗文化，理性規劃「工作／休閒」的新倫理與機制（如周休二日和休閒工業）等等，都不能使青少年和諧平順地同時內化以下兩種生活風格與人格——亦即，在官式文化的場域內服從、禁慾、勤勞工作讀書等等，但是在通俗文化的場域內有節制的放縱、享樂、接受現有休閒與娛樂產業的安排等等。換句話說，在每個場域中總是同時存在著踰越、違規、顛覆、抵抗、挪用、錯置等偏差行爲。

從青少年解放的立場來看，偏差不是社會問題或不當的社會化、缺乏管教；而是抵抗，也有時是生存策略。偏差充滿了詮釋的空間，或至少可以被連結到抵抗。

我曾經在〈政客的性道德與國家的理性化〉一文結尾處，提倡「文化的激進主義」(<http://sex.ncu.edu.tw/sexwork/acitivity/ning.html>)，也就是倡導偏差的人生風格並瓦解主流價值和家庭（例如此刻的援交、嗑藥、跨代戀、變裝、亂倫、刺青、換伴、戀屍、通姦等，但不限於這些）。這種源自現代主義文藝的文化激進主義，它的反禁慾主義乃是愉悅與好玩的過度或濫用（the excess of pleasure and playfulness），而這種過度或濫用不但和以勞動生產為中心（productivist）的主流制度與價值尖銳對立，也不同于「有節制的享樂」式的休閒娛樂產業之工作倫理。

文化激進主義這種抗爭策略的選擇，是我和另外一些談流行文化與消費者最大的不同處。後者的文化研究與政治總是選擇「安全」與「潔淨」的策略：「安全」，因為它總是在已經被知識份子所接受的批判常識內操作，而不是干犯眾怒地替偏差與變態辯護；「安全」，也因為它對激進偏差／保守反動都保持距離，各打五十大板的維持學術客觀中立，而在它的文化政治中，被警察法律權力監視的文化激進主義亦被描述為一種危險的權力。「潔淨」，因為它總是優雅與拘謹地迎合高等文化的趣味／品味；「潔淨」，也因為它不是替罪犯醜怪噁形辯護。

事實上，這種安全與潔淨的抗爭策略正呼應著資本主義的新工作／享樂倫理。當代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同時需要生產與消費，遊戲與工作。浪漫主義與清教主義是資本主義所需的學生文化，這兩種性格典型（character ideals）都需要被編入同一個人格（personality）中，而這個雙頭的倫理顯然此刻在中產階級身上已經被制度化（Stephens）。

不過，我認為就像所有的倫理要求一樣，資本主義的新工作／享樂倫理總是充滿力有未逮、難以內化的實行困境，對於青少年而言尤其如此。換句話說，我們不應假定這個新倫理能將當代的工作倫理與享樂倫理輕鬆地縫合並維持區隔——特別是，文

化激進主義將直接影響這個新工作／享樂倫理所想要保持的平衡、所要調和的張力。

十八、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通俗文化的動力

毛澤東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說法，曾經遭到許多人的懷疑。歷史難道不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英雄與天才的創造嗎？同樣的，通俗文化與次文化難道不是文化工業、行銷、廣告創意、明星偶像、節目製作、特技音效、美術設計等等的創造與操縱嗎？

我在上面曾經以主動消費、二度生產、「次文化與文化工業的互相滲透、循環再生產」來說明我的論點。此處我只做幾點簡單的補充以總結本文。

首先，青少年的流行文化本身也是年齡區隔（建構）的一種實踐。如果一種流行風格太大眾、太普及，以致於不分老少都流行，那麼就無法區隔年齡，故而此時我們必然觀察到青少年對這個流行的進一步改造、挪用、變化（或甚至揚棄），以維持自我認同。此處的改造挪用或許是細微巧妙的差異，也可能有偏差的意含。我要強調的重點是：年齡建制本身會促使青少年創造次文化。

次文化不但經常有反抗主流文化的可能意義，也可能被富於想像創造力的社會運動挪用。例如，Afro黑人的大蓬頭髮型在黑人民權運動中興起，就是「黑即是美」新美感風潮的一部份。另外，現在也有顛覆舊男女關係與形象各類影像、廣告與商品，之中有以跨性別美感來重塑男性身體者、有以破除禁忌之女性自由精神與語言來行銷者，不一而足。這股建基於新慾望的商業風潮比起女性主義的論述更為有力與吸引人（例如晚近「身體聽妳的，世界也會聽妳的」廣告），而且可以開發出新的情緒和身體、引發社會矛盾或建立性／別次文化。

其次，一般對於通俗文化經常採取一概而論的批判，例如「少女漫畫書都是複製父權」等等，文化研究則顯示漫畫這類大量生產的產品必須逐本分析，而非一概而論。同樣的，一種流行文化的社會效應也是很難一概而論的，例如日本的視覺系藝人在台灣的文化效應究竟是什麼？或許是青少年本身性別認同曖昧的投射？但是也有人說這造成青少年一窩蜂的模仿抄襲，但是這種批評卻看不到很多跨性別者以視覺系來偷渡自我身分或自我正當化。

有人或許認為，如果政治力量與資本力量都很龐大的促銷活動，將會使該文化產品的意義貫徹生產者的意圖。但是事實上，即使是強勢的、極權國家支持的流行文化產品也必須經過主動消費的協商（negotiation）或妥協過程。例如曾流行於中國的「血染的風采」一歌，既表達了愛國主義的意含（因而滿足國家的宣傳需要），但也讓人民表達了對中越戰爭的悲傷哀痛（因而滿足了人民的反戰情感）。

再者，從商品的成功賺錢與否、廣告的動人與否等來衡量其社會效應與文化意義，顯然是不相干的：因為商品可以象徵地或符號地被擁有（無須購買），被不斷挪

用（不是只使用一次），這些都和成本或利潤無關。例如，台灣泛亞手機一系列勾動外遇的廣告電影之文化效應，和這個手機的市場成敗是兩回事。同樣的，周星馳的東／西遊記（大話西遊）賣座慘敗，但這部電影作為被消費的文化產品，卻產生無法預估的次文化效應與龐大影迷。

歷來對影迷、歌迷、hello kitty迷等等「迷」（fandom）的刻板印象，都是把她們當成完全失去理性而被業者或偶像操縱的一群人，尤其是因為「迷」代表一種不能自己的行徑，所以更被視為沒有自主能動性。但是文化研究也顯示這種刻板印象的錯誤：迷哥迷姐們不但團結力量大，可以影響業者與偶像，而且還可以藉著許多種不同方式來重新改寫原本文化產品（如電視節目）的意義（Jenkins）。此外，由於網路的發展，各種「迷」與次文化認同更容易聚集、影響、改造原有文化商品的意義：不論是電視節目、電影、羅曼史小說、電子音樂或Rave派對、流行音樂、偶像、星座等等網路討論與交換，都呈現迷哥迷姐們自我建構意義的景況，原來的生產者並不能控制這些派生或新生的意義與文化。

近年來的科技發展使得操弄影像的技術門檻降低了，人們可以自行創作影像音樂等，也可以「實體的」二度創作現成的文化產品，例如擷取現成的電影片段、影像音樂等等，加以改造改編。例如，大陸的地下光碟將電影《臥虎藏龍》重新配音，小林的《台灣論》被改寫成具有性／別歧視意味的對白，而網路更便利了另類文化產品的流通等等。不論這些挪用改造是否為了諧擬或其他目的，左派都應該捍衛其自由變造及流通的權利，抗衡無限上綱的「智慧財產權」。畢竟，這些發展都將是次文化社運更進一步發達與介入挪用主流娛樂工業的機會。

凡此總總都在說明，一般左翼或流行的媒體批判都沒有掌握到青少年通俗次文化的複雜權力操作、多樣社會效應與可能抗爭意義，特別是由於各種主流的建制並不是彼此一致而無衝突，這些內在的衝突與社會矛盾反而有可能促進主體的反思（reflexivity）與能動性。事實上，現代制度與個體都愈趨知識資訊飽和的反思性，個體所面對的往往不是缺乏選擇或機會，而是被選擇所淹沒，卻又無能近用最有利的機會。在權力操作方式轉變，強制性減少的情況下，社會運動在政治－論述策略上，與其繼續以「自主性」來質疑消費與通俗文化內的行動者，倒不如積極介入與挪用消費與通俗文化，來使行動者得力壯大。

十九、左派必須轉向主體

可是傳統左派為什麼不能接受這樣的政治－論述策略？這可能有很多原因，此處我只談一點。

在傳統左派的看法裡，資本主義的優越性只在於其強大的生產力，但是這個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會受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限制，故而其生產力水平只能達到某個最

高極限，接著就只能帶給人類災難（如經濟危機的循環、長期景氣衰退、失業、浪費、社會不平等、軍備競賽等等）。相較之下，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卻能夠比資本主義更進一步能解放生產力，故而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契機。

以上這個傳統左派的分析只聚焦於經濟生產的領域，我認爲這是不夠的。因爲這忽略了資本主義在文化領域內的解放力。特別是在二次大戰以後，資本主義在民族國家、政治、勞動市場與雇傭、教育、管理、全球通訊傳播與金融、貿易等「結構的轉變」之同時，進而也開始改變更基本的社會構成關係，也就是「主體的轉變」，亦即，家庭、人際關係、性／別、倫理、文明禮貌、童年、人性（情感）、道德、身體、公私領域區分等「主體建制」的改變。在後者所屬的文化領域，我們看到了資本主義巨大的解放潛能。

過去社會主義國家（官方左派）有興趣的只是官方文化或國族文化，但是1980年代末蘇聯與東歐的人民卻被消費社會所吸引，也加速了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至於一般左派則總是假設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主義與通俗文化是反動的，資本主義除了解放生產力之外沒什麼其他好處，故而資本主義所帶給文化領域的改變也都不會是什麼好東西。易言之，左派不但反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勞資權力關係），也不看好資本主義的商品（使用價值與符號價值）與消費之影響。我認爲左派在此完全缺乏分析，因此對於我所謂的「主體的轉變」很容易持負面看法，認爲資本主義帶來的是人性扭曲、人際冷漠物化低俗縱慾功利等等，因而墮入感傷懷鄉田園詩的人際關係與主體。

文化與社會價值領域的鬥爭（主體的解放）和全球化等結構的轉變，如何相關與如何介入，都是進步的社會運動所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二十、青春睿智和寫長文之間的關係

我寫這篇長文的目的，其實不是爲了回應什麼文章，而是不忍再看到已經在思考問題的年輕人受到空腦學人的「批判大掰咒」影響而日趨愚笨化，只能不斷想像群眾（甚至自己）是「體制結構的受害者」。這種輕鬆不費力的古舊想像有時替懶人找到無能爲力的藉口，有時替妒恨者正當化法西斯或歇斯底里的行徑，有時促使人將戰場放在國家、法律、公民社會等中心地區，以及管理／決策／規範等「向上提升」的位置（亦即，從制度面——從上而下地改造群眾），而不是「向下沈淪」地在通俗文化與商業體制之內充滿想像／愉悅／慾望、爲主體培力的邊緣戰鬥。這篇長文因此要丟出一些新的思考資源與論述，提示人們尋找新的抗爭路徑。

關於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還有許多議題我沒有寫到，可以深入的面向實在太多了，但是文章長只能長到一個地步，寫作者只能寫到一個地方。之後，就是讀者通行無阻的地帶，讀者開始寫作的地平線。以此與大家共勉。 ★

更正聲明

《左翼》上期(十六號)刊出的卡維波〈青春睿智的左派？陳年癡呆的左派？(上)〉一文，出現三處漏字，現將補正部分刊登如下(黑體字為原文遺漏部份)，並就此向讀者與作者致歉：

25 頁第一段：

「這些左派教材或許是營養豐富的饗宴，可惜現在青少年還沒東西糊口(青少年運動尚未起步)，此一說法就恐怕只是「何不食肉糜」了。既然消費 / 通俗文化提供了滿地的武器，可能的抗爭空間，也是青少年慾望 / 認同 / 歡愉的焦點，那麼，……」。

26 頁第一段：

「事實上，現在的左派可以和女性主義有批判性的對話，是因為左派承認性別是一種權力關係，不把性別去政治化，不會講什麼兩性尊重與和諧的屁話」。

28 頁第二段：

「目前全球學術界都還沒有把性政治立場派別做完整分類(可能在同志政治內有所謂「同化派」與「酷兒派」之分)，因為這是個龐大的學術工程，涉及了歷史與全球兩個範圍(最近我在某次演講中曾嘗試做過性政治派別的初步分類)，……」。

台灣「左派」的幾個毛病

陳真

左派加個引號，沒有不敬之意，純表疑惑，因為，我實在不知道「左」一詞在台灣的确切用法與含義，究竟上下左右怎麼分，我實在很疑惑。也許，在「革命」之前，我們得先花許多時間做「名詞解釋」。奇怪的是，這樣的名詞混淆，我在英國卻感受沒那麼強烈。

在英國，管你上下左右，似乎都是「你家的事」，不會因為左或右，就增添了優越感。台灣不一樣，「左」，經常像一種特殊名牌化粧品，抹在臉上，光采動人。於是，動不動就要說自己左別人右，吃人豆腐。可是，究竟何謂「左」，「左」在哪呢？

我認識的許多左，整天罵資本主義的，幾乎是錢賺得一個比一個兇，一個個擠破頭努力想往功成名就、榮華富貴的方向走，所謂「萬惡不赦」的「資本主義邏輯」，沒有一項不是甘之如飴、如魚得水、盡力迎合的。

有些昔日「同志」，甚至早已是大財團的哥倆好一對寶，你儂我儂分不開了。嘴巴或許左，五臟六腑卻全是高貴名牌。而且，噴的口水，往往比流的汗水或淚水多，更不用說「灑熱血」了。

當然，不是說大家「都」這樣，我也不是想指證「誰」就是這樣。就像有人若說「許多醫生喜歡賺錢」，完全正確！不過，那當然不是說每個醫生「都」這樣。我們若說「有些醫生甚至喜歡收紅包拿回扣」，也完全正確，但那也不表示我們有什麼證據足以揭發弊案。就像批評「升學主義」一樣，純「抽象」，而不是暗示「誰」該或不該升學。這一點簡單的寫作邏輯，實在不必老是每次都要做聲明。

有些東西，要做了才算數，掛在嘴上，毫無意義。除了左好玩、左時髦、左深奧的之外，台灣左還有一些不同於海外左的特點。這些特點，或許足以說明為什麼這樣一個理應獲得許多人認同的東西，在台灣卻沒有太大市場。

我相信，許多台灣左，興沖沖地看到這個標題後，一讀內容，恐怕要不屑了。為什麼？因為我要講的，不會是他們所欣賞的那種「高深」的理論或社會分析調調。

台灣左，還有底下一些毛病：

1. 犬儒，不信人性之善。鄙夷「感情」之類的東西，甚至敵視或漠視「人權」。但是，左之所以為左，是因為賭爛這世界不公，少數人含著銀湯匙出生，多數人卻「註定」累得半小死、當奴隸。如果我們不信人之善，那麼，大家都是壞蛋，既是壞蛋，無異「黑吃黑」而已，既是「黑吃黑」，公不公平又何妨?! 在台灣，「左」和「人道」彷彿是死對頭，英國「左」卻和「人道」是一體兩面；左，是因為有某種對人、對生命的感情做基礎。

1.1. 因為不信人之善，所以往往表現得很沒有「人味」，無情；一味酷愛「解構」、「顛覆」、「批判」或「分析」。「分析」或「知識」都很好，但如果沒有人味做基礎，就不可能引起共鳴，因為，知識是冰涼的、死的、沒有力量的，人們不會因為多明白了一些「左」知識之後，就一呼百應、獻身「革命」。力量，是來自被許多「台灣左」所鄙夷的「感情」或「善」這類看不見也摸不著的東西。

1.2. 但是，怎麼樣才算有人味、有感情？我不知道。那只是一種感覺。不過，

感覺卻是最重要的，不是知識。我發現，對許多「台灣左」來講，好像世界上不可能有好人、大家都是一丘之貉似的。如果有人提到誰是「人格者」，或者提及「感情」、提及「愛」或「上帝」或「阿拉真神」等等等，那你就是「思想有問題」，就是「不夠左」！這實在是很莫名其妙！而且，左不左，有那麼值得驕傲嗎？一個驕傲的左，還會是左嗎？

1.3. 舉一例，在英國，動物保護運動是可以和「左」掛勾的（人都不放過了，何況動物?!），可是，在台灣，這議題對個個「胸懷大志」、「學問高深莫測」的「左」來說，卻很可能是根本不入流、資產階級的貓狗小事。可是，在我看來，這樣的運動，卻是左之為左的一等大事。

2. 鬥爭性強，喜歡搞權謀，喜歡利用、操控人。陰陰沉沉的，講話通常很不直接，心中懷有另一套鬼胎。也許因為不信人之善，所以，鬥爭性特強，喜歡分敵我，於是，經常形成一堆小圈圈，私相授受，「外人」或「正常人」難以一探究竟。表面上是用意識形態分敵我，實際上是用利害關係來分。

3. 不尊重個人的存在。彷彿總是認為「個人」意志不存在，而只是某種集體性概念下的一個「零件」而已。可是，左之為左，不就是因為承認並且推崇個人的存在之獨特性嗎？

4. 不食人間煙火。因為不相信人之善，對人也無情，於是嘴巴左，心不左，對別人的痛苦似乎敏感度反而比一般人低，彷彿與世人隔絕似的，相當冷血。我相信左有各種類型，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冷血的左！

5. 愛吊書袋，酷愛術語，好像總是很擔心別人不知道他唸過哪些書或懂哪些術語似的。因為左變成化粧品，而化粧品之所以是化粧品是因為它是要增添臉上光采用的，所以，講起話來，往往故意要讓別人聽不懂，越聽不懂越好，以示貴賤有別，益增光采。

5.1. 「自視甚高」，不喜歡與一般「凡夫俗子」或「販夫走卒」溝通，只喜歡「菁英」之間的高來高去，對市井小民的言論或想法，往往不屑一聞。

5.2. 我當然不是在反對談論深刻或理論化的想法，但是，沒有什麼深刻的想法是只有少數「菁英」才能理解的。我們很容易發現，台灣左講的話，對一般人而言，通常不知所云，動不動就是一堆根本不必要的術語或「論述」；好像很沒有誠意跟一般人溝通似的。就好像一個醫生如果要跟家屬解釋病情或做衛生教育工作，那你就應該想辦法把難的變成簡單的，至於術語或特定學術之間的對話，就留到醫學研討

會上去講就好了。

5.3. 即使勉強看得懂，也很難讓人有興趣閱讀，這些左朋友，給我的感覺是好像很喜歡寫「學校作業」似的。我們寫那些文謔謔的東西，還寫得不夠多嗎?! 我有時想，台灣左這麼喜歡吊書袋，這麼急著要展現「知識」，是不是因為自信心不足的關係?

5.3.1. 左跟右一樣，都是一種「生活方式」，不是一種抽象的「知識」。

5.4. 「自己人」之間，則喜歡爭誰才是「正統」、「正港的」左。許多口水花在爭論「誰才是真正左派?」，爭論的方式當然也就是互相努力吊書袋給對方看，比一比誰才是真正「知識」高強的武林盟主「左冷禪」。

6. 有膜拜「教條」或「黨中央」的強烈傾向，所以特別難溝通。或許是因為一心只惦記著要左左左，所以，求知上，往往有嚴重偏食傾向，容易得「知識營養不良症」。大家老講著一模一樣的口號標語，面目模糊，讓人分不清誰是誰。往往看兩行就知結論，所謂「分析」，往往就是套一定公式，像好萊塢電影，像同一家補習班畢業似的。

7. 有爪爬仔性格。因為自己滿腦子都是「純正」的左思想，所以特別喜歡在別人的一言一行中，找出對方「思想有問題」的蛛絲馬跡。比如說，鄙夷或敵視有宗教信仰或強調人性之善的人。

7.1. 可是，我不明白，一個人如果沒有一點點「宗教」精神，怎麼可能「左」? 一個人，即使真的是某種宗教的教徒，跟他左不左又何干?

7.2. 又比如說，敵視什麼「自由主義」，凡是與「自由」相關的，都變成「敵人」，實在很怪異。可是，一個人如果不是渴望自由，渴望從糟蹋人的操控力量中解脫，又怎麼可能「左」?

7.3. 不但爪爬，並且更進一步跟一切「不夠左」或「很右」的「異己」保持距離，全視為「敵人」。可是，一個人有許多面向，任何一種想法，當它被「應用」在實務上時，便有無數的糾結纏繞，不是一刀兩斷。所以，亂分敵我是毫無意義的。如果我們不在乎找一個所謂「右派」或「資產階級」的醫生看病開刀，就不該介意和任何「異己」共事或溝通或交友。亂組小圈圈，敵我意識特強，只是跟自己過不去。

7.4. 偏左的維根斯坦的想法沒錯，如果你想了解這個世界，那就離它遠一點；偏右的Karl Popper的說法也沒錯，如果你喜歡某個想法，愛護它的最好做法就是批評它；宗教聖徒齊克果說得更沒錯，如果你真的喜歡上帝，那就少自稱「基督徒」，少去「談論」祂；好萊塢電影「臥虎藏龍」說得也沒錯，握緊雙拳，你什麼也拿不到，放開手，你有了全世界。同樣地，一個團體，最好的「中心思想」就是「沒

有中心思想」。

7.5. 我們如果想毀掉一個東西，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變成一種朗朗上口的教條；並且，根據教條，來給所有不合教條的人劃歸為「敵人」。

以上聽來或許很玄、很「唯心」，或許不合左派之「務實」胃口，但它其實再真實也不過。我們不能老是期望事物照著我們的期望進行，相反地，我們只能乖乖地順應事物的本質走，該怎麼樣就怎麼樣，該生生滅滅的就讓它生生滅滅；如夢的就讓它如夢而去，那麼，所謂「永恆」，也就是當下那一瞬間，也才有可能企及。

以上七個「症狀」，互為因果，環環相扣。這樣的左，想要壯大，無異癡人說夢，因為，人的社會儘管有各種制度，但人的基本心理狀況是一樣的。任何一種想法，如果無法使人「感動」，那麼，也不可能普及。

說「感動」，如果聽起來太刺耳，那麼，至少也要讓人「有好感」。畢竟，我們不是在談一種「科學知識」，而是在談一種「生命價值」，一種「看世界的方式」。不管你對一加一等於二有沒有好感，你都得接受它，但是，左，卻不是這麼一回事。事關「價值」(value)的事，當然也只有用談「價值」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多談情，少說理。不是我們反對論「理」，而是在價值的世界裏，沒有「理」可以論！

怪異的是，台灣左卻整天想論「理」，論理還不夠，而且進一步鄙視起感情來！這就好像不管你做了什麼「科學分析」，「證明」了嫁給你之後的各種好處，都不可能追到男女朋友一樣，因為，事關感情的事，也就只能用感情來談，別無它法。

一切謀略、知識或分析性的道理，在有關「價值」的事務上，都起不了作用。相反地，在該論理的東西上，我們就該冷冰冰地讓抽象理性來決定是非，比如說，當我們在討論某種數學定理。

這些或許聽起來很無趣，但是，它卻是最重要的；我覺得它是許多想法無法引起共鳴的最大致命傷。

我們應該對人性多一點信心和理解，我們應該相信幾乎所有人都不喜歡不義，都會喜歡善，都是有感情的生物，而這些看不見的東西，才是力量的真實來源。如果我們要逆天行道，違背人事物的基本性質去做事，長期來看，絕不可能有所作為。

最後，必須再度聲明的是：當我們批評升學主義時，並不是要叫你放棄升學，同樣地，以上種種，也都無法做那樣的「推論」。比如說，要相信「感情」和「善意」，不是叫你整天談溫馨、講愛心；比如說，不要吊書袋，不是說你不可以談學術或用術語；比如說，「左」是一種價值觀，要在生活上做了才算數，不是說你必須先成爲一級貧民；比如說，誰是「正統」沒什麼好爭，不代表我們不該爭論左的意涵；比如說，不要亂分敵我，不代表我們該和稀泥或宣佈解散等等等。以此類推。 ★

漫談婚姻的起源與解體

俞力工

最近看到有人戲謔“離婚的最大原因為結婚”。雖說是戲言一句，但卻反映了當前中國三個突出的社會現象；一是離婚率達到空前的13%高度；二是同居而不結婚的人數日眾；三是婚外關係越來越普遍。國家當局出於維護一夫一妻制和整頓社會風氣目的，於本年一月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修正草案）》。

三次離婚高潮

據了解，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先後出現過三次“離婚熱”。第一次發生於五十年代，此時凡對包辦婚姻不滿的夫妻，紛紛提出離婚要求。在此之前的民國時代，雖然也制定有提倡婚姻自由的婚姻法，但礙於種種時代局限無法有效推行，因此就維護婚姻自由、男女平等角度觀之，第一次的“離婚熱”對全國人民說來是一大喜劇。第二次離婚高潮出現於文革高潮時期與整個七十年代。文革初期，眾所周知，提出離婚的一方多出於保護自己、與配偶劃清界線的政治目的而作此決定。其後，知青紛紛回流又斷絕了上山下鄉時期所締結的婚姻。就社會影響看來，這第二次離婚高潮的確是個人間大悲劇。第三次高潮則起自改革開放，如今勢頭非但不減，甚至還以飛快的速度直追離婚率超過30%的歐美國家。現階段的離婚高潮與前兩次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如今離婚理由眾多，其中感情不睦者有之，婚外情糾纏不清者有之，鬧財產糾紛者也有之。雖然筆者對時下衛道者所提出的“純然是場鬧劇”的批評不敢苟同，但對社會上風風雨雨的議論和無情的交相指責，卻認為起碼是個先進國家不該有的亂相。

婚姻的起源

談及離婚，的確還非得順藤摸瓜，從結婚的歷史根源加以剖析不可。

百年前出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學術界主流長期認為，人類社會在兩、三千年前一夫一妻婚姻制出現以前，曾普遍、長期存在過母權大過父權的母系社會。這個“野蠻”時代的情況，大體上是：生產力不高；財產公有；男女勞動自然分工；婦女對物資分配和擇偶有支配權；擇偶的主要因素在於性愛…。因之，這雖然是個朦朧、落後、原始的時代，卻是個處於後兩千年“文明”的男權時代的婦女高不可攀的境界。

筆者一向懷疑這種歷史觀是否過於受浪漫思想和理想主義影響；同時也始終不

解，為何“野蠻”時代的人類就不會像大多數脊椎動物一樣地，由一個強壯的男子同時支配數個力氣僅及男子一半的女子？除此之外，儘管十八、十九世紀的史學家在許多殖民地發現殘存的母系社會，但因此就斷言“母系社會曾經是個史前的普遍現象”也似乎是個相當大膽的推斷。不論如何，不容抹煞的是，他們對婚姻起源的探討、研究與解說作了極大的貢獻，那就是，通過法律方式、用訂立契約的辦法，把男女共同生活的關係建立為制度（婚姻），同時把財產的所有權和繼承權明確加以規定，卻是隨著下列社會、精神條件的出現才可能實現：由為買而賣過渡到為賣而買的商品經濟；私有財產觀念；男子通過戶外勞動（如畜牧、貿易、農作）創造的財富遠遠超過通過自然分工、主要在家內勞動的婦女；生產力的提高足以使家庭擺脫群居而成為獨立經濟單元；擁有財產所有權的男子著意讓已生的下一代（主要是兒子）繼承財產；擇偶與締結婚姻的考慮不再是性愛而是經濟利益；擇偶的權利由婦女本人轉移到父母的包辦；婦女的平等地位下降到從屬地位，同時又非得對能力許可的男子的納妾行為“欣然”或默然接受；一般物資商品的交易蔓延到買賣奴隸和婦女；富裕家庭與貧窮家庭之間出現階級之分；財富的積累引起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由是更加突出男子的優越地位；為對應階級沖突和戰爭，需要把氏族不斷擴大為部落，部落擴大為國家…。

剩下的問題是，為何一開頭就規定一夫一妻制而不採納三妻六妾制？據較可靠的解釋：制定一夫一妻是個符合男女自然人數的分配辦法，一來可使每個“平凡人”知道界線何在，而同時卻不能阻止優勢者藏姣納妾。至於伊斯蘭教的一夫多妻制，史學家的解釋是：連綿的戰爭造成大批男子的死亡，因此是個例外現象。

於是乎，浮現在我們眼前的脫離“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畫面，是個婦女的社會功能由“半邊天”淪落為生育下一代的“泄慾工具”。該情況直到資本主義社會，起碼馬克思主義者這麼認為，具有人身自由而又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男女之間，才又出現了脫離經濟利益考慮的真正的愛情與性愛。出於上述歷史觀和對共產社會的憧憬，建立一個排斥國家機器、恢復財產公有、實現男女平等、消滅階級差別、反對剝削、提倡自由戀愛、結婚自由、離婚自由的未來社會，一時成為左派陣營的神聖奮鬥目標。

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實踐

既然如此，一旦階級敵人打倒，為何還需要強調“一夫一妻”呢？早期左派理論家的答覆是：一、為了公平；二、保護婦女；三、愛情有排他性。那麼，年輕人禁不住要繼續追問，既然社會已無階級之分、經濟也不再是擇偶的考慮因素、愛情又有排他性，“一夫一妻”，不，應當說“一男一女”完全可能成為自然發展的結果，因此婚姻制度是否多餘？遺憾的是，我們從老一輩的理論家處找不到一個滿意的回答。如果有，那就是：我們不需要解決下一代人的任務！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頓然給許多先後成立的共產國家帶來了實現“愛情至上”的機會。固然，與包辦婚姻時代相比，甚至橫向地與資本主義社會對比，社會主義社會的家庭關係較純朴、和睦是個不爭的事實。但是，經仔細觀察，即便在這些共產社會，愛情也始終不是締結婚姻的唯一因素。在那裡，愛情之外，寂寞、性壓力、需要精神依靠、年齡壓力、社會壓力、升遷、遷居、出國、政治野心、意識形態原因、對介紹人的信賴、甚至對父母的順從等等，都可能成爲事後反悔的“一念之差”。因此，隨著婚姻的延續，只要有朝一日時過境遷，使得上述任何一個或多個條件改變，同時夫妻之間又無法培養出愛情之火，促成婚姻的解體的因素就實在是多得不勝枚舉。

愛情至上與婚姻自由

至於愛情或性愛，似乎也有程度高低的不同，時間先後的不同。以下，不妨先節錄兩則恩格斯先生的觀察與態度：（一）“現代的性愛（筆者按，指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男女之間），同單純的性慾，同古代的愛，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前所愛者的互愛爲前提的；在這方面，婦女處於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愛的時代，決不是一向都徵求婦女同意的。第二，性愛常常達到這樣強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結合和彼此分離，對雙方來說即使不是一個最大的不幸，也是一個大不幸；僅僅爲了能彼此結合，雙方甘冒很大的危險，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擲，而這種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姦的場合才會發生。”恩格斯，《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第73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5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二）“如果說只有以愛情爲基礎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麼也只有繼續保持愛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過，個人性愛的持久性在各個不同的個人中間，尤其在男子中間，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確實已經消失或者已經被新的熱烈的愛情所排擠，那就會使離婚無論對雙方或對於社會都成爲幸事。這只會使人們省得陷入離婚訴訟的無益的污泥中。”同上，第79頁

如今站在21世紀的高度，回顧恩格斯的觀點，不能不爲他的深邃洞悉力折服。前者說明，當男女之間產生愛情時，經常是會不顧一切後果的，當然更不會考慮到沒有愛情的婚姻是否還值得留戀。後者則說明，一旦任何一方有驛動之心，採取包括立法的任何手段加以制止，只會給社會與當事人帶來更多的不幸。

當下的婚姻不僅涉及男女之間的感情與子女的扶養問題，隨著商品經濟的擴大，也必然摻雜了許許多多的利害關係。考慮到中國的具體發展情況，前景似乎只有兩個，一是集中精力盡快把經濟搞好，只要能夠像北歐國家那樣讓婦女就業率達到70%以上，徹底改變婦女的弱勢地位，把婚姻解體所造成的衝擊減輕到最小程度，那麼，國家當局就不再有需要爲無關痛癢的家務事操心；或者，不要讓一小撮人先富，加之配合改革前的嚴刑峻法和行政干預，促成一個“要你愛就得愛”的局面。



為蕭洛霍夫「申冤」

呂正惠

前蘇聯作家蕭洛霍夫的名作《靜靜的頓河》，有人譽之為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和平》，是二十世紀小說的重要成就之一；但在西方，這部小說的價值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更有甚者，作者本人自小說出版以來，終其一生為「剽竊」的流言所纏繞，揮之而不去。像蕭洛霍夫這樣的例子，可視為二十世紀政治意識型態對立下，文學輿論界之「不公平」的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靜靜的頓河》從1925年開始寫作，28年第一、二部發表，作者蕭洛霍夫一躍而成為蘇聯的重要小說家，這一年他才二十三歲。小說對頓河地區哥薩克人生活與習俗的巨幅生動的描繪、對眾多人物性格深刻的掌握，出自這麼一位年輕而不知名(之前蕭洛霍夫只出版了兩本短篇小說集)的作家之手，確實相當令人意外，「剽竊」的謠言自此開始流傳。

剛開始的「耳語」說：小說是某一在內戰中被打死的白軍軍官所寫的，蕭洛霍夫偷了他的手稿。這個謠傳迫使「無產階級作家協會」(即「拉普」)的五位領導作家在《真理報》發表公開信，嚴厲加以譴責。1930年，流亡海外的名作家安德列夫去世十週年，在為他所編的紀念文集《安魂曲》中收錄了安德列夫寫給友人哥烏舍夫的一封信，信裡提到哥烏舍夫偶然同名的頓河生活隨筆和旅行札記《靜靜的頓河》，於是蕭洛霍夫被「坐實」為剽竊哥烏舍夫。三十五年後，當蕭洛霍夫被提名為諾貝爾獎候選人時，蘇聯報紙上有人發表〈一個不應該忘卻的名字〉一文，文中提到投效白軍、落魄以終的詩人克留柯夫(名詩人葉賽寧早期的扶持者)，說他留下一箱手稿，「毫無痕跡地遺失了」。文中一點也沒提及蕭洛霍夫，但明眼人都了解作者是「項莊舞劍」。不過當年的諾貝爾獎還是頒給了蕭洛霍夫。1970年，蘇聯評論家馬采伊大概在蕭洛霍夫的默許下，寫了一篇文章，談到《靜靜的頓河》在素材上多少受到莫拉卡洛夫的劇本《紅色哥薩克》的影響。但這一篇意在「澄清」的文章，在某些西方評論家眼中，卻成了蕭洛霍夫剽竊的另一證據。1974年，巴黎出版了一本書《「靜靜的頓河」之激流》，仍然堅持蕭洛霍夫剽竊。負責出版這書的是另一諾貝爾獎得獎人索忍尼辛(他是著名的極端反共者)，他認為，這書已為《靜靜的頓河》的還原鋪平了道路。

索忍尼辛的想法很有意思，值得再提一下。按他的設想，《靜靜的頓河》是白軍所寫的，是革命恐怖時代不可重複和無可辯駁的見證，然而卻在代表革命立場的蕭洛霍夫的「篡改」——增補、歪曲——下，成為支持革命的重要文獻。

這些想法透露了兩個重要的觀點：1. 《靜靜的頓河》的文學成就是不容否認的，

因此，索忍尼辛才那麼在乎書中的「政治立場」；2. 這本書只有反「恐怖政治」的白軍才寫得出來，紅軍只能加以「剽竊」、「歪曲」。在這裡，索忍尼辛毫不妥協的「反共」立場昭然若揭。

支持無產階級革命的人就寫不出偉大的作品嗎？或者，他們就不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嗎？我們可以這樣問索忍尼辛和所有懷疑蕭洛霍夫創作才能的人。

在這裡，我突然想起英國名評論家喬治·史坦納的一句話，他說：支持法西斯的陣營沒有出現過偉大的作家。史坦納對左翼作家有些同情，發言意有所指，但是否正確則有待考查。事實上，德國文化界名人支持或同情希特勒的並不在少數，譬如哲學家海德格、指揮加福特葛格勒、卡拉揚，還有荷蘭的指揮家孟根堡、法國鋼琴家柯爾托。但是，這些人在戰後短期受到清算後又重新出頭，西方評論界仍然對他們讚不絕口，他們的「政治立場」並沒有成爲致命傷，嚴重影響他們的藝術評價。他們某些時期的行爲，頂多只是他們漫長的一生的一個小小的污點而已。

而蕭洛霍夫則絕然不同，有關他「剽竊」的謠傳始終是橫亘他一生的陰影，藉此以「撼動」他的小說成就，而他如此卓卓特立的《靜靜的頓河》，在西方的二十世紀文學系譜中，也一直被擺在「邊緣」，聊備一格而已，難以和西方的現代大師比肩。譬如，西方評論家有誰曾設想過，把蕭洛霍夫放在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等人的身邊擺一擺看呢？

其實西方不只是對待蕭洛霍夫如此而已，他們對待「鐵幕」內的作家都一例如此。假如你被蘇共官方批判、甚至迫害致死，那麼你就是「大作家」，如曼傑爾斯坦、阿赫瑪托娃、巴斯特納克、索忍尼辛；假如你被官方表揚、或者甚至你並沒有特別被表揚，只是也「不對抗」、因此也不被「批判」，那麼你就沒資格被西方「吹捧」，當然更不會得諾貝爾獎。想想看，在這種「文化統戰」邏輯下，諾貝爾獎還「不得不」頒給蕭洛霍夫，「鐵幕」內唯一的一位，你能夠不對他「刮目相看」嗎？

對「鐵幕」內的藝術家一例以「對抗」官方作爲評價標準，對西方支持法西斯的藝術家則作態「薄懲」之後，該支持的繼續支持，該表彰的繼續表彰，誰說西方評論文學、藝術不「政治化」。其實，他們清楚得很，法西斯只是資產階級「內部矛盾」，而「鐵幕」陣營在意識型態上主張「無產階級革命」，純屬「敵我矛盾」，是絕對不可以輕忽的。

最近買到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蕭洛霍夫文集》（八卷），又買到孫美玲編譯的小書《作家與領袖》（收錄蕭洛霍夫和斯大林的通信，北京大學出版社），對蕭洛霍夫一生的創作和生活歷程稍有了解，不免有些感想，作此短文以爲記錄。

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 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五〉續完

黃志龍

5. 城鎮企業的發展

鄉鎮企業的發展速度、吸收勞動力的擴大能力以及不亞於國營企業的企業規模等等，都是很多報刊雜誌已介紹過的。同時，歐美、日本的報刊雜誌也經常列舉鄉鎮企業的種種缺點——如，浪費能源、低水平的技術、有品質不良的製品、惡劣的勞動條件、環境破壞等等事實。但，從歷史論、文明論等角度來觀察中國農村的工業化、商業化和多角產業化時，應該可以說，中國農村的工業化是人類歷史經驗上未曾有過的、巨大的農村城市化現象。

在那裡，雖然工商業發達卻也堅持農業的發達。看不到由於近代化而產生的所謂農村的「過疏化」現象。當然也見不到如英國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現象，或二次大戰前在日本經常發生的大規模的佃農抗爭。但是由於無計畫的經濟區建設而產生的土地荒廢，以及由於負擔的增加而產生的農民暴動，是確實存在的。

雖然當前的中國還存在著缺乏衣食以及最低限度醫療的眾多窮苦人民，但就整個農民而言，其生活水平真正是有所提高的。爲了提高窮困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國政府舉辦過幾次特別會議，認真檢討並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具體方法。雖然這些努力還沒有產生顯著的成果，但這些政策和措施是絕對不同於先進工業化國捨棄窮困人民而進入資本主義繁榮期的歷史經驗。

從費孝通等「內發型發展論」者的立場來分析鄉營、村營的「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的發展史，可將之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以農養工的階段」，是以農業的資源、勞動積累以及農民的資金來建立農村鄉鎮企業並使其成長的階段。在這階段，鄉鎮企業的生產額是農村工農業總生產額的40%以下，而從事於非農業部門的勞動者也只佔全農村勞動力人口的30%左右。在這一個階段，工業對農業或農村所能提供的支援是：吸收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將部分收益提供給農村，補助幹部的收入或社會支出。80年代初期的蘇南地區，80年代中期到後半期的珠江地區就是屬於這個階段。而在常德、民權等地區，則在90年初期才要進入這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農業、工業互補階段」。在這個階段，鄉鎮企業佔農村工農業生產總額的比率是50~70%，而非農業勞動力在農村總體勞動力中所佔比率達40~50%。鄉鎮企業從農民的信用合作社等組織取得資金，並以「以工補農」作為口號。鄉鎮企業對鄉鎮社會的援助開始正式化——鄉鎮企業不僅架橋、建養老院、補助自來水建設的設備，也提供村幹部、學校老師的薪水，並在農忙時期提供耕作援助隊。這是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近代化過程中，從未出現過的現象。80年代中期到後期的蘇南地區、珠江地區就是屬於這個階段。

第三階段是「以工建農」的階段。在這時期，鄉鎮企業積極貢獻農業的現代化，進行機械化、土地經營的大規模化等，並且倡導「以工哺農」的口號。在這個階段，鄉鎮企業已佔農村工農業生產總額的90%以上，而農村人口的70%以上是從事於第二、第三產業。因此，表面上雖然是農村，實質上卻已成為農村工業鎮。在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蘇南地區已達到這個水平。

由此可知，雖然農業的生產成本已高過工業，但中國還是堅持保護農業的決心。費孝通認為，唯有進一步集中農地，在鄉鎮企業的支援下促進農業機械化，才能提高中國的農業生產率，也使農民對其將來抱有希望。

6. 鄉鎮企業的展望

a. 鄉鎮企業的發展模式

「現代化理論」是，根據歐美先發、先進國家的經驗，以歐美學者為中心而形成的社會變動理論。根據現代化理論，歐美先進國家是根據本身的努力而創造出現代化的「內發型發展」模式；而許多非歐美後進國家是以先進國家為模範而進行現代化的「外發型發展」模式。

「內發型發展論」是，針對「現代化理論」提出異議，探討後進國能否有內發型發展的可能性這個問題。

「內發型發展論」者認為：雖然有些國家是完完全全借用歐美發展模式的外發型發展；但適合地區的生態體系，根據社會構造、精神構造的傳統，依靠地域住民的創意，創造新的生產、流通組織以及新的衣、食住方式的內發型發展也可以同時進行。這就是說，內發型發展論者認為，外發型和內發型是可以在同一社會的不同地域中同時並存的。

「近代化論」是以全體社會（或國家）為單位而思考，所以一個社會中雖然有些「變化」或「變種」(Variations),但可當做同一模式而加以分析。但「內發型發展論」則以共有同一生態體系的地域為單位而思考，因而認為在同一社會的不同地域同時存在著不同的社會變動模式。於是不同地域的不同模式之間的比較以及互相關係為研究的中心課題。

中國自開放改革之後所出現的鄉鎮企業，是「內發型發展論」者的重要研究題

目，因而他們特別重視費孝通所提出的「模式」。費孝通認為，所謂「模式」(Model)就是，某特定地域，在某種特定歷史條件之下的，具有特色的經濟發展過程。模式所強調的是，不同地域必有符合該地域實情的不同發展途徑。

就中國而論，「內發型發展論」者本來認為，外發型和內發型發展是在不同地域同時並存的——他們認為，中國沿海 14 城市的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深圳、汕頭、珠海、廈門、海南省等經濟特別區是「外發型」，是外國擁有資本、技術、設備的主導權；而中國人口中佔 80% 人民所居住的農村的小城鎮工業化是「內發型」。但費孝通卻把「內發型發展論」者認為屬於「外發型」的珠海模式當作「內發型」和「外發型」的結合方式。對這個問題，費孝通認為，「縱使引進外國資本，鄉鎮企業不一定會變成外國資本的承包企業，從屬於外國資本；也有以內發型的鄉鎮企業為主體，使外國資本為地域住民服務的可能性」。

費向通提出「外向型」的概念，並以企業是否將資金等從外國引進與否做為「內發型」和「外向型」的區別所在。因此縱使發展模式是創自自己社會、地域，也可以有「內發型」、「外向型」及「內發型和外向型的結复合型」的三種。並再將「結复合型」分為：

- (1) 外向型支配內發型，使其從屬化。
- (2) 內發型和外向型在同一企業中並存，而各自分擔不同角色。
- (3) 內發性成為主體，而使外向型為地域住民服務。

費孝通等人現在所注意的是屬於「結复合型」的(3)模式——也就是，開始時以「內發型」出發的企業，採用「外向型」而成為「內發、外向結复合型」，然後又從結复合型轉換為「內發型」。因此這就證明外向型不等於從屬於外國資本。

如前所述費孝通從針對小地域的嚴密調查開始，指出各地域的特徵，然後創出從現實社會發展的角度，將其特徵明確化的所謂「模式」的概念，而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等等一連串模式。

這種「模式」的概念，並沒有將各地域絕對化，而是以該地域本身的特徵為基礎而後將其和現在中國最緊要的外向型模式結合——因為中國為了儘快脫離後進狀態，趕上先進國水平，在經濟方面所強調的是由政府指導的「外向型」產業的發展。因此，原來以國內市場為目標，以農村的自主、自立工業化而興起的鄉鎮企業也自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向以國外市場為目標的「外向型」產業的方向發展。

但值得注意的是，費孝通並沒有肯定外向型發展才是中國未來的理想。內發型發展和外向型發展都是以各地域特徵為基礎的。縱使從外部引進資本、技術、設備、資訊或人才，只要以該地域的生活為基礎，內發型發展並沒有改變其本質，而且外向型發展也無法忽視該地域固有的傳統、產業、環境等等。這就是以中國的傳統為基礎而面對外向型產業的費孝通的看法。

在珠江地區，出現鄉鎮企業的「上昇轉化現象」——以屬於珠江模式的順德縣為例來說，缺乏資金和技術的鄉鎮企業爲了以外銷獲取外匯，引進資金和技術。然後由於資金的積累而擴大規模，更以自力進行技術革新，製造自己開發的製品而提高內發型。但在眾多鄉鎮企業中也可見到提高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性，強化外國企業的承包企業性質，從屬於外國資本的現象。

中國是否會捨棄內發型發展而轉爲以外向型發展爲中心的社會？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因爲中國實在太大，難於轉化爲全面依賴國際社會的外向型發展社會。首先，中國不能將國內所需糧食全面依靠進口。發展農業、養育超過12億人口是極爲重要的問題。

再說，由於地理和歷史條件，中國發展了多種多樣的傳統、文化、產業和經濟等等。因此各地區間的差異非常之大，難於將中國當作一個整體。也就是說，難於將中國帶到同一型的外向型發展。於是我們需要一種內向型發展和外向型發展共存的思考。

b. 鄉鎮企業發展和瓶頸

1978年以後，中國經濟的活性化打破了原有的以地域爲單位的自給自足圈，造成了更大的市場單位，因而產生基本原料產業以及運輸等基礎建設部門的瓶頸。

但，本來承擔解決這些瓶頸的重要角色的全民所有制單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明顯降低，其預算內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也只佔13.4%，因而難以達成任務。

鄉鎮企業的發展，不僅創造出有機的農工關係，也創造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新的循環和積累的方式。

但以鄉鎮企業爲核心的非全民所有制單位固定資產的持續擴大，卻需要龐大的資金。

舊積累機制已崩潰的情形下，爲解決基本原料、基本建設的瓶頸以及擴大鄉鎮企業所需的龐大資金，出現了王建在其論文中所提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構想」——發展以勞力密集製品爲主的外銷導向工業化，以其強大的雇傭吸收力來解決農村的過剩勞動力，然後將外銷所獲取的外匯用來促進重工業的成長。趙紫陽也在1988年1月的「沿海地域經濟發展戰略」中主張：以鄉鎮企業爲核心的沿海地域勞力密集加工業的進料加工和製品外銷以及以「三資企業」提高製品品質，更新技術，改進企業管理技術，開拓外銷徑路。

其實，趙紫陽、王建所提倡的新戰略所根據的就是南韓、台灣等NIC's的開發經驗。因此假如令NIC's興起的那些諸條件還存在，而且國際市場也大得足夠收納中國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工業的產品，其新戰略似乎有成功的可能性。

現在中國的發展趨勢，事實上是由於對外的積極開放政策而走上國際循環論的方向，也就是使鄉鎮企業走向外向型發展的方向。

當中央主導的國際大循環政策影響鄉鎮企業的營運方式後，「內發型發展論」者所重視的，依靠農民的創造性，以農民的自主性努力為基礎，積極利用傳統產業，活用自然地理條件而發展過來的鄉鎮企業，尤其是其「離土不離鄉」的愛鄉思想似乎也遇到不得不改變的命運。(全文完) ★

作者與編者

編按：

《左翼》在十四號及十五號兩期曾經刊出何六九先生有關左翼與民族問題的兩篇大作，並在上期(十六號)引起許多熱烈的討論，本月初我們接到何六九先生寄給《左翼》的第三篇大作〈林書揚的歷史世界〉，不過，編輯部同仁在經過討論後決定不刊出該文(原因見編輯部給何六九先生的回函)。

我們正準備給何六九先生回信時，接到他對《左翼》十六號批評他文章的回應「小感」，編輯部在回函時順便對何六九先生的「小感」做了一些補充說明。我們現在將何六九先生的來函及編輯部的回函一併刊出，希望有助讀者理解信中所描述的內容。

何六九來信

編輯先生：

看到了《左翼》16期對拙文的反應。無論是從數量的豐富來看，或者是從言語的劇烈程度來看，這可能是《左翼》創刊以來，最為熱門也是最令人感情衝動的議題。

然而，這幾篇文章對於展開建設性辯論與對話，深入良性批判的工作，恐怕恰恰是發揮了反作用。

獨裁威權式樣的文宣，不必論證就給異議分子加上帝國主義傳聲筒、奴僕等帽子，動輒鬥臭鬥垮。不料在《左翼》上，我們竟然也看到相同手法。何六九的來路，與討論議題何干？分析何六九祖先的血緣，這是那門子的嚴謹討論？四篇文章，外加一篇讀者投書，都是同樣的任性方式，毫無二致的粗暴語氣。吐口水淹死人，就是這個樣子吧？文章「對不起讀者」，所以「絕不應」刊登，莫非又出現了新聞檢查？

歷史的詮釋，正是左派在上層意識形態打破傳統霸權文化壟斷的戰場。質問何六九文章根據那個版本的歷史，似乎表示所謂的正史不但深入一般人心，也牢固地占據不少自認左派人們的心靈。歷史詮釋到底需要依賴那種版本才不會「對不起讀者」？願有以教我。如果真的能夠找到此版本，相信這個貢獻可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了。

16期的編輯報告提到何六九對民族有「特殊看法」。這似乎表示，相對的(不特殊)看法是台灣左翼的主流。編輯先生若能夠儘早裁決並公布不「特殊」的主流看法，省去「對不起讀者」的言論無意中漏網出現，不是大家都可以耳根清靜了嗎？

台灣左派會沿襲中國文革(非文革時期也一樣)血淋淋的言語暴力，還是會另圖努力建立健康的對話論戰風格？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上次寄上對林書揚先生一些看法的稿件，不知是否依照鄙意交給林先生過目？依目前不少人氣急敗壞、動了真怒的氣氛看來，貴刊若是不便刊登，當然可以理解。若能坦白告知決定，當然最好。如果兩星期內未收到回復，我可以體會，當另外處理。

祝 編安

何六九

編輯部回函

何先生：

謝謝您寄給《左翼》的第三篇大作。編輯部同仁日前開會討論後，我們很遺憾地決定無法採用您的這篇大作。

《左翼》成立以來，一直希望能提供左翼朋友一個公共論壇的場域，讓大家在對話及辯論，以形成共識，進而建立隊伍。因此，我們希望《左翼》的對話是建設性的，參與論爭的各方應該清楚的說出自己所贊成或反對的主張（就像您在十四及十五號的文章），使其他朋友能夠據此提出不同意見，讓辯論良性地開展下去。

過去許多左翼朋友喜歡截取對方論述中的某一句話猛批，往往容易流於斷章取義，無法進行正面的對話，我們希望《左翼》能夠避免這樣的論爭模式。

我們仍然歡迎您對《左翼》十六號有關批評您民族問題的論述進行反駁，讓左翼之間能就民族問題繼續深入交換意見。

《左翼》編輯部 敬上

ps.: 我們正準備給您回信時，接到您寄來的對《左翼》十六期回應的"小感"。我們會將您的"小感"刊出。針對您的來信，有一點我們想特別向您說明：《左翼》十六號編輯報告中稱您對民族問題的"特殊看法"，是指您在這一問題上言人所未言"過去較少在台灣左翼圈內論及"（《左翼》十五號編輯報告語），並不表示這意指您的看法與左翼主流不一樣。事實上，我們認為，左翼根本是不應該有所謂主流與非主流之分。

編輯報告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遠在法國巴黎的勞動人民，以果敢的行動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屬於工人階級的全新政權——〈巴黎公社〉。雖然這個政權在短時間內就被右派反動階級以血腥暴力消滅了，但是公社如慧星一般閃亮的勳業，卻永遠的照亮不分種族的全人類爭取真正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宏偉願景。只要我們承認是人，就不可能放棄巴黎公社曾經呈現過的那個社會理想。

在紀念巴黎公社建立一百三十年周年之際，俞向南〈軀體倒地，理念站起〉，分析了巴黎公社成立的背景、時代意義及其對當前左翼運動發展的啓示。倪世傑〈金錢·霸權·流氓國家〉，批判所謂的「流氓國家」事實上乃是美國資本主義軍事—工業綜合體所塑造的「潛在敵人」，以維護美國的霸權利益。

卡維波〈青春睿智的左派？陳年痴呆的左派？（下）〉，繼上期反駁對青少年文化持負面看法的論述後，作者進一步從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左派在面對消費文化時應該採取的運動立場與策略。我們希望，今後文化研究者與傳統左翼運動者之間能夠開展更多的對話與互動。陳真〈台灣「左派」的幾個毛病〉，深刻地描繪出作者個人對台灣某些「左派」人士的印象與疑惑，值得所有左翼的朋友省思。

俞力工〈漫談婚姻的起源與解體〉，針對中國大陸近來正在草擬修改婚姻法，作者比較了社會主義婚姻的觀念與實際狀況。呂正惠〈為蕭洛霍夫「伸冤」〉，主要是在為遭到西方右派文學界污蔑的《靜靜的頓河》一書作者蕭洛霍夫辯護。

黃志龍〈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體制的形成、解體和鄉鎮企業（五）〉，本期刊載的是連載的最後一部份，作者透過鄉鎮企業的發展比較社會主義中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展道路上的異同。本期因為續稿未到，鄭國棟〈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下）〉連載，延至下期刊出。

針對《左翼》十六號上多篇文章的批評，何六九寄來一篇「小感」回應，我們特別開闢〈作者與編者〉專欄，除了刊出何六九的來信，也登載編輯部給何六九的回函。

左翼 第十七號

出版日期：2001年3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八號



〈殘殺〉

作者：布斯多斯

【**勞動評論**】 評析勞動三法改惡
全球醫療事業勞工罷工的啓示

張大元 /2
范國棟 /8

中國怕制裁嗎？

韓德強 /15

【**爭鳴與求是**】 卡維波，左派裝可愛？

林深靖 /21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下〉 鄭國棟 /25

評析勞動三法改惡

——揭露民進黨政府親資反勞的真面目

張大元

象徵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化」、「民營化」、「開放化」、「柔軟化」、「私有化」、「去管制化」等口號，在台灣開始為我們所熟悉的時期，大致與政治上的解嚴時期重疊。因而，掌權者輕易將之與政治民主化相扣連，從而將之解釋為民主自由的重大指標，甚至是偉大成果。但事實上，卻恰恰相反，美國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在面臨 70 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一般性危機」下，紛紛放棄原先的凱因茲主義（以社會福利制度而聞名的凱因茲主義原本曾被視為一方面可克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模型的內在缺陷；另一方面又可以壓抑二次大戰後正日漸興起的社會主義運動的良方），轉而採取否定貧者的生存權的新自由主義。於是，美國開始在第三世界尋求符合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能力的政權。80 年代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後來雖然在形式上建立起來，但因為其外在主要動力與新自由主義有關，因而變得相當畸型。我們從這樣的脈絡來理解新自由主義，就不難理解民進黨政權作為新自由主義的執行者的政權角色。

從資本的立場來看，新自由主義戰略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就是「柔軟化（彈性化）」。資本家將「節省成本」與「減少庫存」併在一起，企圖建立所謂的柔軟的生產體制。而這樣的生產體制的變化，必然是以對勞動的極端的柔軟化統制為前題條件。也就是說，資本企圖將勞動者生活的所有過程納入自己的管理之下，要用的時候就來拿用，用完了就可以隨意丟棄（大量資遣）；勞動的時間（彈性工時、計時工）、勞動的空間（契約工等），都可以隨資本家的需要而片面決定。以上的說法，對台灣的工人來看，已經不是什麼理論，而是現實。

4月16日的中國時報，記者訪問前經濟部長江丙坤，問道：「台灣會不會發生工潮？」，江丙坤的回答是：「要發生的話，早該發生了。」

在上述的問答中，透露了一個訊息。連連的大量解僱而造成的失業問題，以及日漸惡化的勞動條件，工人潛藏的憤怒不無爆發的可能性，以及要不是台灣工人力量長期積弱不振，怒憤早就爆發了。

不久前，勞委會提出勞動三法（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團體協約法）修正案，並送交行政院。勞委會企圖透過勞動三法的改惡，防範工人自然爆發的反抗，其用意是非常明顯的。

以下將根據此次修法的內容，勾繪出勞委會企圖建立的工會像，並對其中重要的條文提出批判。

工會法修正版第一條關於工會的宗旨，原先的「保障勞工權益……改善勞工生活」的字句被刪除，改為「保障勞工結社自由，促進工會發展」，目的在於使工會的活動更清楚地侷限在具體的僱傭關係中。因為，現行條文中的保障勞工權益、改善勞工生活，尚留有工會運動在社會面、政治面上發展的正當性。

工會法修正版第十一條有關工會會員，將原先的「強制入會員」改為「自由入會制」，目的在於方便資方分化工人，降低勞工參加工會的比率。勞委會主張「自由入會制」的表面理由是要保障工人不團結自由，但我們知道根據憲法精神而制定的工會法，是一部保障工人團結的自由的法律，因此團結的自由是積極的自由，而沒有明文規定的不團結的自由，只是一種消極的自由，兩者的位階不能相提並論。勞委會可能忘卻了法律明文保障團結的自由，是因為現實中可能存在一種勢力，會妨礙團結的「自由」，這股勢力正是資方與政府，這是一般憲法學上的通論。也就是說政府才是破壞工人團結嫌疑最大的勢力。果然，這股嫌疑最大的勢力，公然破壞工會的團結，只不過它不是公然主張「不可以有團結的自由」，而是用另一種方式，也就是透過主張工人有不團結的自由，而實質地破壞工人的團結。

工會法修正版第十六條有關理、監事的任期，將原先的任期三年上限，改為四年，目的在於誘導理、監事的任期延長，以方便資方拉攏收買。此條文應該與工會修正版第三十三條特別新增訂理事長會務處理假日數高於一般理、監事的規定，以及第十五條特別新增的理事長對外代表工會之規定，一起來檢討。如此就可以發現勞委會企圖以理事長較長的會務假來誘導目前大多數採取常務理事制的工會改採理事長制，然後再誘導理事長任期延長，更重要的是看似不重要的「理事長對外代表工會」條文，實際上，反映在團結協約的簽署時，就變成了理事長具有團體協約的簽署權，而不需會員大會追認。也就是說，資方可以利用較長的時間拉攏理事長，進而在簽署團結協約時，收買理事長，一獲得理事長的簽署，會員們再怎麼反對也已經無效了。

工會法修正版第三十三條有關會務假，將三十名會員以下的工會理、監事會務假縮減，又將原先可請全日會務假者，從原先的常務理事，改為理事長。其目的一方面是爲了縮減會務假以妨礙工會正常運作，另一方面又技術性地誘導工會將原先的常務理事制改變爲理事長制。

勞資爭議處理法修正版(以下簡稱爭議法)第二條有關勞資爭議當事人之規定，修正版將現行的「勞工團體」改成「工會」，目的在於禁止自主性的非工會團體所主導的一切爭議行為。勞委會在修法說明中表示，「勞工團體」其實指的就是「工會」，因為修法的目的只是將之明文化而已。但事實上，因為台灣93.5%的產業工人是沒有加入工會組織的，這絕大多數的工人，從過去的實際經驗來看，他們的抗爭組織方式，最常見的就是「自救會」，也就是說，改惡的「爭議法」將禁止此類組織的集體爭議行為。另外，還有一種在打壓工運的國家中常見的爭議行為的方式，是工人為了組織工會而遭到資方及政府的打壓，因而進行的集體爭議行為，自然是非工會主導的爭議行為，改惡的「爭議法」中，此類爭議行為也會被禁止。由上述二例中可見發現現行條文的「勞工團體」分別包括了工會以及非工會的「工人爭議團體」，但勞委會卻說「勞工團體」指是就只有「工會」，顯然與事實不符。

爭議法修正版第四十九條有關爭議行為的定義，此條為新增條款，將爭議行為定義為爭議當事人為達成其主張所為之罷工、怠工、鎖場及其他阻礙事業正常運作或對抗之行為。此處所謂的「阻礙事業正常運作」語氣模糊，極可能將現實中勞工經常使用「順法鬥爭」擴大解釋為「阻礙事業正常運作」，另外，「對抗之行為」，更包括了勞工在事業場內進行的拉布條、舉標語、呼口號等，根本不防礙正常生產的宣傳活動。勞委會如此擴大解釋爭議行為，目的就是為了限制上述行為的進行，因為爭議行為的行使，必需經過複雜的決議過程。尤其是將「對抗行為」解釋為「爭議行為」，簡直是聽所未聞。工會正常的宣傳活動，例如拉布條、舉標語、呼口號，因為亦屬於「對抗行為」，因此就會被解釋為「爭議行為」。結果就是，一般性事業的勞工，則連個呼口號，都要以直接投票方式並獲得「全體」會員過半數之同意；而公共事業的勞工，則更連呼口號的權利都被根本性地剝奪。

爭議法修正版第五十條有關爭議行為之決定，此條為新增。規定工會的爭議行為需「全體」會員「直接」投票並獲得過半數同意才得為之。目的在於提高爭議行為決定程序的障礙，以妨礙罷工決議。我們可以看到是「全體」會員之過半數，而不是參加投票人數之過半數。另外，硬性規定必需採「直接」投票，無非是想要增加投票的障礙，以降低投票率。

爭議法修正版第五十一條有關爭議行為需和平理性為之的規定，此條為新增。爭議行為的合法與否，根據外國的判例：應該從其主體、方法、程序、樣態等，具體且綜合性地判斷其是否具有合法性。但此條文的目的卻是企圖將程序、目的、手段中任一者不合規定，就將之規定為非法爭議行為。也就是要讓罷工的主導者步步面臨家破

人亡（非法爭議行為→附帶民事賠償）的危機。

爭議法修正版第五十二條有關特定性質的工作人員禁止爭議行為的規定，此條為新增。為了最大限度保障勞工的集體行動權，禁止爭議行為的範圍應該限定在危害人身安全的部份即可，但修正版中卻將之擴大為維護廠房的安全、衛生的勞工。其目的在於一旦發生爭議行為，最大限度地減少勞工的參加，結果罷工變成了只能是少數工人參加的行動，同時，修正版中並沒有限制「禁止代替性勞動力」的條文，因此，資方就可以雇用代替性勞動力，取代參加罷工者的工作，結果，罷工除了會造成參加者的自戕之外，資方根本不會有任何損失。

爭議法修正版第五十四條有關爭議行為期間工資的給付，此條為新增。內容不但明文規定罷工期間資方不支付薪資，而且還規定資方可以以勞工所提供的勞務沒有實益為由，拒絕受領。其目的在於將勞工最後的武器，轉化為勞工必需先自戕而後才能使用的武器。對於勞工的另一武器－怠工，則准許資方以更傷害性的手段予以反擊。另外又新賦予資方對抗性武器－鎖場，使得在資僱關係中居於從屬性地位的勞工，陷入更嚴重的不平衡關係。關於罷工期間應否支付工資的問題，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工資到底是什麼？從修正版條文來看，顯然勞委會採取的是極右派的「勞動成果說」。也就是要有勞動成果，才支付工資，罷工既然沒有任何勞動成果就不必支付工資。在此可以附帶說明一點的是，勞委會主委陳菊為了抬舉自己而對外宣稱的自己的兩位偶像格瓦拉與盧森堡，絕對會痛責「勞動成果說」，因為他與她一致認為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工資根本不是勞動的成果，而是勞動力的再生產費用，簡單說就一家人的生活費用。我們暫且從此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出發的正確觀點退讓一步，單從現行的法律體制來說，有關工資性質的規定，「工資二分法」才是通論。所謂工資二分說，學者之間在論述上雖然略有不同，但一般的共識為，所謂勞動契機包括「勞工設定其受雇者身份的部份」與「在僱主的指揮命令下每日提供具體勞務的部份」，這兩者中前者對應的是「生活保障性質的工資」；後者對應的是「交換性工資」。根據此學說，罷工期間勞工只是暫時拒絕提供勞務，但拒絕提供勞務的目的不是為了永遠斷絕勞雇關係，而是為了在比較有利的條件下繼續提供勞務，因此，僱傭關係顯然是繼續存在的，亦即，屬於前者「生活保障性質的工資」部份，必需照常支付。勞委會所主張的「勞動成果說」，既不符合現行的法律精神，也不符合一般的慣例。例如，勞基法中規定，例假日、國定假日為有給休假，屬於特別性質的產假，臨時性的天災地變，皆給予有給假。亦即，上述沒有具體勞動成果的日子，依然規定要支付工資，證明工資與勞動成果沒有關連。另外，也可以從目前台灣主要的工資體制是反映年資的工資體制這一點來看。年資越高薪資就越高，其原因是年資高與年紀大幾乎有著直接

的關聯，而在可工作年齡中，年齡越高，代表家中生活開支也越大，因此，工資才與年資成正比關係。

除了上述修正的部份之外，現行版本的典型惡法條，也全部保留下來。保留惡法條亦是一個決定，當然代表民進黨政府的勞工政策，不能因為它是國民黨政所制定就與民進黨政府無關。包括：

在工會法方面違反結社自由的部份有：

■違反「禁止事前認可」

第九條：發起組織工會，應有第六條所規定人數之連署，並組織籌備會，辦理公開徵求會員、擬定章程、召開成立大會等籌備工會。工會應於成立大會後三十日內，檢具章程、會員名冊及理、監事名冊，向主管機關登記。

■違反「保障團體自由制定規約、章程及選出代表的權利」

第九條：「工會章程應載明以下事項…」。

第十三條：有關工會理、監事名額之限定。

■違反「禁止行政機關的介入（依據行政或法律解散工會）」

第三十七條：工會有下列情事之一時，主管機關得請求法院解散之…。

■違反「保障工會的自由運作及活動（包括團體行動權等）」

第十條：工會章程應載明下列事項…

第十四條：工會置理事、監事，由會員中選任之，其名額…

第十五條：理事會處理工會一切事務，理事長對外代表工會…

第十六條：工會會員年滿二十歲者，得被選為工會理事、監事。

第十七條：工會理事、監事之任期，每任不得超過四年，其選任之限制由工會章程定之。

第十八條：…工會理事、監事及會員非執行工會職務上之行爲，工會不負其責任。

第十九條：工會會員人數超過一百人以上者，得依會員人數比例選出代表，行使會員大會職權。…

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三條有關監督之所有內容。

■違反保障自由組織及聯合組織的權利」

第六條、第七條有關產業、職業工會之設立。

第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一條有關聯合組織之設立。

在「爭議法」方面：

■違反勞僱自治原則的權利事項與調整事項之劃分

第五、第六、第七條、第五十條有關權利事項不得行使爭議行為之規定。

■剝奪勞工集體行動權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第五十三條等有關公用事業的禁止爭議行為及強制仲裁規定。

■妨礙勞工行使集體行動權之規定

第二條有關集體行動權的行使，勞方只限於「工會」的規定

第七條有關爭議期間勞方不得有影響工作秩序之行為

第五十條有關權利事項不得罷工之規定

綜合以上來看，民進黨政府企圖透過工會與勞資爭議處理法的修改及惡法條的保留，妨礙工會的籌組、對已籌組的工會則降低工會的組織率、妨礙工會的正常運作、加強政府干涉工會的權力、強化一人代表（理事長制）的權力以便資方拉攏收買、將勞工權益限定於具體的勞資關係而不包括對社會、對政府的關係、剝奪非工會的勞工團體的勞動三權、在工作性質上（有關安全、衛生工作者不得參加爭議行為的規定）、在目的上（權利事項不得進行爭議行為之規定）、在行業上（自水來、電力以及諸多政府可任意指定的行業禁止爭議行為）、在組織類型上（禁止非工會的勞工團體進行爭議行為）、在決議權上（對爭議行為的決議過程的種種礙障）、在過程上（只要爭議行為中的任一環節被認定為非法，就將整個爭議行為規定為非法）、在結果上（以不支付罷工期間的工資的方式，使罷工可能獲得的成果與罷工期間損失的工資相抵，讓勞工在罷工中無法獲得實益）、在對抗權上（賦予資方攻擊權），限制甚至禁止勞工的集體行動權。

民進黨政府如此一方面打擊勞工的生存權，另一方面又修改法律的方式限制勞工的勞動三權的作法，或許能一時壓抑住勞工，但總有一天，勞工的憤怒會向火山一樣的爆發。惡法必將遭到勞工的違法抵抗！ ★

（本文與《勞動前線》五一特刊，同步刊載）

全球醫療事業勞工罷工的啓示

范國棟

前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提出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團體協約法修正案將送交今年立法院審議，其中除軍公教之外，草案中新增電力、自來水、航管事業禁止行使爭議行爲，以交付仲裁處理。電信、大眾運輸、公共衛生、石油煉製、醫院及燃氣事業勞工雖有罷工權，但有三十天的「冷卻期」。與現行未設定產業別及罷工冷卻期之規定差異甚大。

罷工乃資本主義體制下無法完全避免的產物，且爲勞工解決勞資爭議的最後手段⁽¹⁾。醫療事業屬於服務性產業，勞動者在勞務付出的同時，即轉換成商品給消費者。儘管健康的達成有生理、心理與社會等因子，但在公共衛生領域，不到二百年歷史的現代醫療所扮演的角色卻非主要，甚至造成不少反效果⁽²⁾。台灣民眾常視醫療照護爲其健康的最後防線，卻甚少思考醫務勞動能否順利地轉換成健康。所以醫療事業勞工爲其勞動條件改善而採取罷工，易給社會大眾負面印象。

到底醫療事業勞工是否具有罷工權？他們的專業與職責是否會與罷工權產生衝突？在雅虎英文網站以 hospital、strike、cooling 關鍵字搜尋到的資料超過兩千筆，其中有關醫療事業勞工罷工冷卻期的報導者亦達數百篇，但國內對此一議題的探討不多⁽³⁾。我們從文獻中搜尋廿世紀後半期，國內外醫療事業勞工罷工的原因、規模與影響進行分析，以提供社會大眾省思。

各國醫務勞動者罷工事件

美國在1965至1971年間，私立醫院中超過一半的工作人日喪失是因爲醫院受僱者的罷工⁽⁴⁾。1987到1990年間，平均每年有39件罷工事件在健康照護產業中發生，其中醫院部份即佔20件。罷工天數範圍從2到347天，人數從60人到1799人，參與罷工者更包括醫師、護士、非臨床專業人員，協助談判爭議的團體有醫師委員會、國際機工協會、服務業勞工國際聯盟、美國鋼鐵工人聯盟、美國公務員聯盟、及賓州、俄亥俄州及紐約州護士公會等⁽⁵⁾。

實習及住院醫師的罷工事件更不斷上演，爭議內容包括過低的薪給、過長的工作時間、惡劣的工作環境、訓練課程和提升低水準的病患照護品質。儘管針對住院醫師

的問卷調查報告顯示，85%的醫師認為只要重要的醫療設備與措施能在短期因應，罷工仍具有正當性且不會對病患產生致命的傷害⁽⁶⁾。並有住院醫師是全美醫院中最具生產力的醫師的看法⁽⁷⁾。1976年美國全國勞動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判定洛山磯 Cedars-Sinai 醫學中心的實習及住院醫師具有學生身份，故不得籌組工會向醫院進行集體談判，即引起很大的爭議⁽⁸⁾。當主治醫師逐漸受僱於健康照護組織，這迫使他們嚐試籌組工會，1972年醫師 Sanford Marcus 籌組美國醫師牙醫師工會即是一例。兩年前美國醫學會表態贊成醫師籌組工會，和全國勞動關係委員會認定醫療從業人員包括實習、住院醫師和主治醫師，只要確認是受僱於健康照護組織或醫院者，為提供專業處置服務病患，均可組織團體以集體爭議方式改善工資、工時和勞動條件⁽⁸⁾。

在美國部份營收免稅的非營利性社區醫院，居民甚至對醫院的經營取向擁有決策權。然而面對政府圖利醫療財團及保險業者的稅制改革，促使這類醫院被迫合併、或為財團收購轉為營利取向，造成醫療提供與居民需求出現落差。民眾與醫院受僱者透過訴訟，要回自己的醫院的抗議活動則是此起彼落⁽⁹⁾。

1983年以色列耶路撒冷醫師對專業薪級制度不滿，引發了全國11000位有照醫師中近8000名醫師發起長達四個月的罷工，其中4700位受僱於勞工聯合保險機構(Insurance Institute of 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Labor-Kupat Holim Sick Fund)，另3000名服務於公立醫院。罷工期間醫院營運只維持30%的醫師人力(包括開刀房)，只有急診部門編制不減。結果，Shaare Zedek 醫院的急診量僅出現33%的成長⁽¹⁰⁾，而罷工期間的死亡率並沒有明顯變化⁽¹¹⁾。

1995年西班牙 Badajoz 省的醫師罷工事件中，與前一年同期病患急診量進行比較，除了增加了860人次外，住院率與治療結果與非罷工期間無明顯差異⁽¹²⁾。南韓醫師於去年八月發動第二次全國性罷工，抗議醫藥分業的實施剝奪了醫師賣藥貼補開支的權利。當時，南韓一萬九千家診所中，仍有四成以上繼續看診，但六月份的第一次罷工則只有10%的診所為患者看病⁽¹³⁾。

澳大利亞墨爾本的護士在1986年發起為期50天的罷工，表達出對專業權和薪資結構的不滿⁽¹⁴⁾。英國 Dudley 地區的醫院受僱者及其他工會團體，去年底抗議政府對國家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局部改革為 Private Finance Initiative (PFI) 制。因為 PFI 涉及下降公部門醫療事業受僱者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以利私部門的財團經營者獲取基金補助，他們所發起的罷工抗議行動至今仍在延燒⁽¹⁵⁾。

日本醫療院所的受僱護士，長期以來面對人力短缺和嚴峻的工作環境。1989年日本醫務勞動者工會聯盟(Japan Federation of Medical Workers' Unions)發起「護士潮」，要求醫院增加護理人力、協調夜間輪班工作時間、履行每週五日工作制、合理評估護士的工作量與更好的職業訓練。藉由展現罷工實力和減少罷工對病患

照護的不良後果，經三年努力，終於促使政府修改健康政策增加醫療院所的護理人力配置，並且贏得日本民眾對這群白衣天使的敬重⁽¹⁶⁾。

台灣的醫護罷工事件

台灣醫療事業勞工的爭議事件，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台北馬偕醫院護士針對薪資和工時向英籍院方要求改善，並成立「看護婦協會」進行罷業抗議。1946年台大醫院醫師因聘僱缺額問題，發起為期二十天的罷診活動。1988年中國醫藥學院北港馬祖紀念醫院護士，為抗議院方不合理待遇、福利及行政措施，原擬集體休假一天，經雇主承諾改善勞動條件後平息。接著新竹市南門醫院三十名護士和書記集體休假一天、高醫附院二十餘位藥師於作業務繁忙時集體前往院長室談判、中國醫藥學院附院護士七十餘人集體離職、馬偕醫院近百名醫師以開會怠工等方式，來抗議資方低薪低福利的惡劣勞動條件⁽¹⁷⁾。

過去十年，亦有台大醫院、成大醫院、高雄醫學院、北市宏恩醫院、國泰醫院、省立基隆醫院、全國校護、台安醫院、長庚醫院等，各類醫務勞動者針對自身工作權益，進行怠工、罷工、集體休假、集體離職、甚至遊行抗議，讓社會各界瞭解他們的低劣的勞動條件。但是罷工則多在資方經營不善，對勞工薪資發生積欠或掏空資產準備歇業時才發生，已面臨失業的罷工實為時已晚。

國民政府來台後，並未能依憲法第一百五十七條實行公醫制，但仍透過開辦公勞農漁保險，在廣度與深度上，間接地增加政府對人民的健康照顧。爾後又依憲法增修條文於1995年開辦全民健保，雖不能全部減免人民在健康照護上的花費，但總是將人民的健康照護往公部門負擔這一方向推進一步。政策執行造成了醫界生態的大變動，醫院大型化成為趨勢，健康照護體系中的受僱者亦超過二十萬⁽¹⁸⁾。

1997年3月實施的「醫藥分業」，表現為醫院和開業醫師對抗藥師團體的鬥爭，為的是爭奪調劑權所衍生的利益再分配⁽¹⁹⁾。1998年7月除醫師外之醫療保健人員者均適用勞動基準法，若依法行事將使得醫療財團的人事成本負擔增加⁽²⁰⁾。於是醫界雇主開始對醫院勞工進行裁員，或透過派遣、外包方式經營醫院，此時造成不少受僱者失業⁽²¹⁾。今年開始實施醫院合理門診量，則出現醫院協會等團體(醫療企業)與基層醫療協會(自營開業醫)間的利益衝突⁽²²⁾。

從團結到罷工

國外的罷工事件起因可略分為兩方面，一、由制度面引起的，包括公共部門內部的變動^(10,13)、由公共部門轉向私營部門的醫療制度變革⁽¹⁵⁾、私營部門間的兼併或向公共部門的侵吞⁽⁹⁾，均會造成醫療從業人員甚至包括病患、社區居民發起抗議行動。二、各類專業人員的勞動條件改善，特別是私營體系中各類專業人員面對日益惡化的

工作條件^(8,16)或薪資福利⁽¹⁴⁾，要求資方進行改善所發起的罷工活動。

動員方式和與病患的互動則呈現出四類現象，一、依專業別即可發起罷工⁽⁵⁾，未必需要全院受僱勞工集體動員，儘管法令上對部份專業勞工的集體協商權有所設限⁽⁸⁾；二、結合非醫療產業之工會團體向資方施壓⁽⁵⁾；三、調整接受病患照顧之條件或方式，並維持急症救護體系的運作，起碼在死亡率或併發症發生率之統計不上升，使病患權益影響最小^(6,11,12)；四、民眾的醫療權益是可以和勞工的利益相結合的，透過各類型的抗議活動能促使兩者間有良性的互動，減少醫療財團或政府不當施政的負面影響^(9,15,16)。

台灣的醫務勞動者於執業前，需向各縣市之醫師、葯師、護士等各類公會登記入會，或參加著重學術研究的各類學會。除此之外，並無長期關注自身勞動權益的相關團體或組織，但這些人民團體在受僱勞工與資方的鬥爭中鮮少現身助力。當勞工面臨勞動條件下降，甚少向地方勞工事務主管機關提出調解，只能個別或零星地在職場上和資方進行對抗，並多以集體請辭來報復資方。依現行法令規定勞資爭議調解，其過程起碼需24日至32日，且非經調解無效不得罷工—已相當於國外的罷工冷卻期。但最大差異在於世界上承認勞工爭議權、罷工權的國家，都有「刑事免責」、「民事免責」、「禁止不利益對待」三方面之規定，藉以保護勞工。本國僅工會法第十八條略有提及，其餘則付諸闕如，導致實務上勞工在罷工結束後還要與雇主纏訟數年，這也是台灣勞資爭議鮮少以罷工呈現的原因之一^(1,23)。

離職並不等於罷工，它只迫使雇主在勞動力市場中尋求勞力補充以利營運。罷工則是透過工會團結互助(企業內部的勞工或不同產業體系勞工)展現罷工權，可能針對企業內某部門或全部勞工工作條件等議題與資方談判，改善後的「果」是由罷工勞工所共享。故常有所謂的罷工糾察線，讓資方不得於罷工期間僱用替代勞力進行生產運銷，或其他資本家無法對同行進行支援，最後迫使資方與勞方談判。儘管九〇年代各國政府面對勞資爭議大量運用罷工冷卻期的方法，由地方或中央的勞工事務主管機關針對爭議事件，訂定長短不一的罷工冷卻期，即官方欲透過公權力介入調解，以使經濟活動得以延續，違犯之一方則多被處以罰款。如1995年加拿大政府決定將Alberta省Calgary醫院的洗衣作業外包給私營企業，該院洗衣工人即公然違抗罷工冷卻期的命令，發起的罷工事件連該院醫師都配合取消預訂手術，並得到數千名他院醫療事業勞工的響應⁽²⁴⁾。相較國外，國內依工會法向地方勞工主管機關登記者，只有高雄醫學大學醫療事業產業工會、國軍左營醫院產業工會、高雄市立婦幼醫院產業工會和高雄市醫師職業工會。

勞資身份既關鍵又模糊的醫師

雖然美國醫師已被應允組成區域性的獨立工會或勞工團體與雇主進行集體談判，

但仍有三種障礙迫使這種集結不甚普遍。一、醫師目前不習慣集體出時、出力、出資與雇主進行談判，仍常經專業學會的介入，如美國醫學會為洛克菲勒紀念醫院的醫師所托解決勞資爭議；或透過法律、政治、和抗議議題上表達支持，向全國工會組織尋求援助。二、醫師自認負有病患照顧的義務，無法在不影響病患權益下，向雇主施以經濟壓力，因此病患常成為雇主得以繼續惡化受僱者勞動條件的緩衝閥。三、為免因提出激進的看法違逆經營者，而被視為麻煩製造者的心理戰，迫使因訓練或個人因素的資淺醫師不得不表現保守好幾年⁽²⁵⁾。所幸醫師和其他受僱者間在醫療作業上的從屬或先後關係，對勞資糾紛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⁵⁾。

醫師不僅在台灣醫療發展史上佔著決定性的角色，甚至在政治體系、社會結構、經濟條件等方面，均使台灣人民對醫師產生極端崇敬的心理⁽²⁶⁾。所以當醫療保健成為有利可圖的產業，誘使企業財團紛紛搶佔分食這塊市場⁽²⁷⁾，受僱醫師的百分比也逐漸提高⁽¹⁸⁾。醫師在傳統上的崇高地位，則在生產關係改變後的醫病倫理和醫療團隊中，異生出助益雇主生財的條件，甚至產生自身反噬的效果。首先醫院協會等雇主色彩濃厚的團體在健保大餅分配過程，多先壓制藥局藥師或診所等開業醫師團體，影響病患（經濟利益）流向的政策制定^(19,22)。醫院經營者再以高薪誘因拉攏主治醫師，使其自認加入經營團隊，甚至因此改變醫療行為，同時藉其專業形象對內「安定」醫療工作團隊⁽²⁸⁾。由於醫療工作的特性，醫院內佔絕大多數的非醫師員工其自主性很難超脫出醫師的控制⁽²⁹⁾。再者，醫院的薪資成本可概分為主治醫師、住院醫師、其他醫療工作者和非醫療專業人員四類，前兩者亦高出後兩者許多。

除薪資誘因外，部份主治醫師藉其主導的專科醫學會以提高新進醫師入會的門檻，避免造成該科專科醫師市場過剩；或藉提升醫療品質的幌子，向衛生署及健保局要求增列諸多健保給付應由該科專科醫師執行之要件。如此一來可減少分食病患來源的壓力，二來保有日後在受僱與開業自營間選擇的空間，三來增加對受訓醫師之低薪、高工時的管控能力。

最關鍵的是，雇主在付出各類成本後仍有優渥利潤，主要來源是對非主治醫師員工的各種剝削。及透過媒體宣傳誤導病患的健康概念，使得低品質的醫療得以繼續存在。讓藥品、檢查與處置的消耗成為主要目的，新開發的藥物、檢查乃至於侵入性治療有其市場，結果健保大餅的實質效應（健康維護）被削減許多。

結論

面對全球化經濟的衝擊，各國政府對健康服務公部門的預算開始縮水，逐步讓渡給醫療業及保險業的企業財團。民眾花在健康照護的自付比例愈來愈高，以及視醫療產業為搖錢樹的醫院財團，也迫使醫療人員的勞動條件下降^(30,31)。醫療事業勞工是否可以藉罷工權的行使迫使政府增加預算，進而改善醫療照護品質，各方意見不一^(2,3)。

但政府與人民都有責任去預防罷工的發生，也就是要創造一個可以避免衝突的工作環境，還有設置解決他們和醫院間糾紛的仲裁機關。而非放任這些照顧民眾健康的醫療人員，飽受雇主的剝削，或被迫接受醫療企業內部薪資福利不合理分配的苦果。

分析台灣和國外醫療事業勞工的罷工事件，台灣的工會組織率低、受僱者間串連性弱、發動爭議的格局小，且與他類產業工會結盟幾近於零等現況著實令人擔憂，再加上相關勞動法令規定遠較國外保守，不利勞工罷工權之行使。他們在勞動市場上淪為刀俎的情形只會惡化，其處境雖不致慘似傳統產業，但在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都還無力成形的此刻，政府尚不思索建立迅速且有效解決勞資糾紛的管道，還要進一步延緩勞工自衛的最後法寶－罷工權，這無異是替醫療財團可以更進一步壓迫勞工進行背書。此時，民眾的醫療品質會是優質的提升，還是無量下跌？答案其實很明白了！

★

參考文獻

1. 黃雙喜：罷工爭議權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2. 愛德華·田納著，蘇采禾譯：科技反撲－萬物對人類展開報復。初版，台北市，時報文化 1998:45-94。
3. 蔡振修：「醫事人員罷工有罪嗎？」討論會會議記錄。醫事法學 1996;5:84-97。
4. Solomon RC. Collective bargaining in the health care field: the housestaff controversy. Health Matrix 1987;5:3-16.
5. Burda D. Fewer healthcare strikes in '92. Mod Healthc. 1992;22:46.
6. Kravitz RL, Linn L, Tennant N, Adkins E, Zawacki B. To strike or not to strike? House-staff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during a hospital work action. West J Med 1990; 153:515-9.
7. Frishauf PM. Residents—the most productive physicians in American. Hosp Physician 1979;15:8.
8. Yacht AC. Collective bargaining is the right step. N Engl J Med. 2000 ;342: 429-31.
9. Scott L. Communities strike back. Residents oppose ceding control to outside not-for-profit chains. Mod Healthc. 1997;27:26-8, 30, 32.
10. Slater PE, Ever-Hadani P, Adler Y, Ellencweig AY: Emergency department utilization during a doctors' strike. Am J Emerg Med 1984;2(6):486-490.
11. Slater PE, Ever-Hadani P. Mortality in Jerusalem during the 1983 doctors' strike. Lancet 1983;2:1306.
12. Buitrago F, Gamero Samino MJ, Vergeles Blanca JM, Cano Lozano MJ. Do physicians' strikes influence the utilization profile of hospital emergency services? Rev Esp

Salud Publica 1997;71:35-40. [Spanish]

13. 南韓醫界第二度發動罷工。民生報 2000;8.12.:pA7。

14. Arch M, Graetz B: Work satisfaction, unionism and militancy amongst nurses. Community Health Stud. 1989;13(2):177-85.

15. Seventh Round of Rtrikes Against a PFI Staff Transfer in Dudley Group of Hospitals. Workers' Daily Internet Edition 2000;November.21.:No.198. [http:// www.wnne.demon.co.uk/ww2000/d00-198.htm#dudley]

16. Katsuragi S. Better working condition won by 'nurse wave' action: Japanese nurses' experience of getting a new law by their militant campaign. Nurs Ethics 1997;4:313-22.

17. 黃文弘：台灣醫界事件之概括。醫望 1998;28:44-50。

18. 彭花春：中華民國87年衛生統計動向：醫療設施現況、醫事人力及醫療資源。初版，台北市，衛生署 1999:p. 參1-p. 參.30。

19. 崔萱傑：論醫藥分業與醫療服務責任之範圍。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20. 陳真慧：醫院護理部門主管對勞動基準法之認知及其因應策略之態度調查研究。國立台灣大學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21. 鄭夙惠：台灣私立醫院組織互動之實證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碩士論文，2000。

22. 基層醫協聲援健保局。民生報 2000;10.3.:第A5版。

23. 鄭傑夫，劉志鵬，陳金泉，陳文靜：勞資雙贏聖經—工會、勞工訴訟、勞資爭議、團體協約。二版，台北市，新自然主義 2000:104-110。

24. Plawiuk EW. Wildcat! Calgary Hospital Workers Defy Back-to-Work Order. January, 1996, in Industrial Worker "ewplawiuk@geocities.com"

25. Clousson JP. Physicians and unions: an oxymoron? Surg Neurol. 2000;53:403-5.

26. 陳永興：台灣醫療發展史。一版，台北市，月旦出版社 1997:97-114。

27. 蕭文，顏裕庭：企業設立的醫院。台灣醫界 2001;44:65-66。

28. 洪幼珊：醫院醫師薪資制度對醫師醫療行為影響之探討。國立臺灣大學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29. 林琳琳：醫師生產力與醫院管理之互動關係。中國醫藥學院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30. 范國棟：台灣民眾與醫療界應關心世界貿易組織對醫療服務業的影響。台灣醫界 2000;43:57-60。

31. 陳美霞：全球化與公共衛生界的自省。中華衛誌 2000;19:12-15。

中國怕制裁嗎？

韓德強

美國電子偵察機撞毀我軍機、入侵我領空事件發生後，從總統布希、副總統切尼到國務卿鮑威爾、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都發表了十分強硬的講話，命令中國政府不得登機檢查，必須迅速放機組人員，不會停止對中國沿海的電子偵察，而且絕不會道歉。美國沒有錯，有錯的是中國飛行員。對中國飛行員的死亡，美方只能感到遺憾。

與此同時，中國輿論普遍認為，中國不但有權登機檢查，而且有權以間諜罪審判美機組人員，有權要求美國停止對中國沿海的電子偵察。最起碼美國必須道歉。

這樣，雙方就陷入了僵局。實際上，這個僵局拖下去是對中國有利的。因為美機組人員在中國，美機也在中國。中國不急，美國急。於是美國政府給中國提供了兩種選擇，一是拖下去，美國不給中國正常貿易關係，從而妨礙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4月8日鮑威爾的威脅）；二是美國道歉，但僅限於沒有通知中方而降落中國機場一事，而不對撞毀我軍機道歉，也不停止偵察（4月9日 CNN 報道一位元美國政客的建議）。

我們應該接受那種選擇呢？第一種方案則是抓住中國的軟肋，進行赤裸裸的威脅。華盛頓郵報早在4月3日就威脅過，如果中國不放人，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的確，經濟制裁是一張王牌。美國知道中國最怕經濟制裁，最希望加入世貿組織，而這都取決於美國。因此美國相信，無論美國多麼強硬，多麼霸道，中國都只能忍氣吞聲，都只能打落牙齒往肚裏咽。第二種方案實際上是玩弄文字遊戲，給各自找個臺階下，把撞機事件當作一件小事輕輕抹去。也就是撞了白撞，死了白死，一切照舊。

這就把一個尖銳的問題擺到了全體中國人面前：中國到底怕不怕美國的經濟制裁？到底要不要加入 WTO？

一、經濟制裁對中國利大於弊

要分析經濟制裁對中國的影響，首先要瞭解多年來中美經濟交往密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事實上，中美經濟交往密切對中國既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有很多，中國進口了美國的大量高檔消費品，大到波音飛機、小轎車、電腦，小到撕貼條、口紅、

牙刷，使一部分中國人得以與世界消費水平接軌；中國學生大量留學美國，工作於美國，給部分學生其及家人以一步進入發達國家的機會；中國人可以與美國人同步賞好萊塢大片，看麥當娜的屁股，聽傑克遜吼叫，沐美國先進文化之甘霖；中國的紡織、服裝、鞋、玩具製造業大量向美國出口，給中國提供了寶貴的外匯和就業機會。

壞處也不少，由於中國大量進口美國高檔消費品和設備，允許美國跨國公司投資中國，使中國的製造業受到嚴重損害，中國的民用飛機工業幾乎全軍覆沒，中國的轎車工業成爲美國的裝配車間，中國的電梯、程式控制電話、移動通訊、電腦等行業均被美資和外資企業佔領，中國的東北重工業基地氣息奄奄。由於中國重工業和機械製造業受損嚴重，銀行貸款無法歸還，職工工資無法保障，造成大量工人失業，銀行壞帳大幅度增加。不僅重工業和機械工業，甚至日化工業、醫藥工業、辦公設備業等都存在類似情形。而我們曾經寄予希望的技術引進卻沒有實現，道理非常簡單，跨國公司正是依靠其核心技術來佔領市場，獲取高額利潤的，它們真能輸出技術嗎？如果跨國公司輸出被淘汰的技術給我們，我們也沒有得便宜。一是二流技術被當作一流技術賣，價格奇高；二是用二流技術生產的產品沒有市場競爭力；三是反而培養了我們的技術依賴性，使我們永遠喪失技術創新能力。因此，一部分中國人消費高檔進口或合資消費品的代價，是使中國最具有發展潛力的工業和技術受到致命打擊，並使相應的國企工人大量下崗。

中國部分學生留學美國，對他們本人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對於中國的長遠發展來講卻完全可能是一件壞事。眾所周知，在留美學生數量迅猛增長的九十年代，學生的留學心態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學習技術報效祖國轉變爲取得美國永久居留權，或者說從愛國轉變爲逃離祖國。當然，更精致的變化是在那兒都無所謂，只要有錢就行。因此，即使真有一部分留學生身懷絕技回國創業，其心態也是等待跨國公司收購，或到納斯達克上市，賺取一次性暴利。中國名牌大學的學生把留學當作人生“寄託”，成爲“GT”派(GRE&TOFEL),使北大、清華等院校成爲新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院士張光鬥先生日前曾坦率擔憂，中國大學正在培養汪精衛思想。有奶便是娘的汪精衛思想，加上躁動不安的暴富心理，使中國大學已經不再是造就科技人才的殿堂，而成了熙熙攘攘的低級人才生產和集貿市場。這在客觀上使中國教育之花被美國輕易摘走，使中國的教育之樹腐蝕變質，從而從根本上損害了中國的技術發展潛力。

中國人同步消費好萊塢大片，在大多數青年人來看，也許的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是其實好萊塢大片像鴉片一樣，麻醉人的心靈和意志，損害人的分析思維能力，使人成爲直覺和感官的俘虜，使人放棄對社會事務的關心，喪失行使民主權利的

能力，成為社會的被動看客，直至任人宰割還大叫痛快，實際上直接損害著每一個觀看者的長遠利益。與此同時，好萊塢大片還嚴重衝擊了中國的電影電視業，使中國影視業面臨著關門歇業的危險，直接奪取著從業人員的收入和就業機會。

中國的服裝、鞋、玩具製造業的確是中美經濟交往的直接受益者，它們占中國對美出口的一半左右。但是在這三個行業的出口相關企業卻與英美十九世紀初期的血汗工廠十分相似，工人（大多數是進城打工的農民）每天十四、五小時的工作，所得報酬卻僅能糊口。產生的利潤絕大部門流入到了企業主、中間商和美國大零售商手中。1997年國務院新聞辦《辦關於中美貿易平衡問題》白皮書中說：“（美國）從中國進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國的零售價為9.99美元，而從中國的進口價僅為2美元。在這2美元中，中國只獲得35美分的勞務費，其餘65美分用於進口原材料，1美元是運輸和管理費用。”而在美國的統計中，出國對美的出口額是9.99元。由此可見，真正從中美貿易中獲得鉅額利益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在中國，是企業主和車間工頭，而不是工人。如果美國停止從中國進口服裝、鞋和玩具，受傷害的是美國消費者，美國零售業巨頭，耐克公司，而中國工人則無非回到鄉下種田。只要農副產品價格上升，則鄉下種田的損益比遠高於在血汗工廠打工。事實上，近幾年農副產品價格一直下跌，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恰恰是美國廉價農產品對中國的大量出口。去年八月，河南鄭州小麥市場上，國產小麥售價0.40元/斤，而美國進口小麥的到岸價卻只有0.35/斤。正如此廉價的美國小麥極大地損害了中國農民的收入，迫使農民流入血汗工廠為美國製造玩具。

如果美國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中國同時停止從美國進口小麥，進口消費品，進口機械設備，則中國農民的收入反而會提高，農村的需求得以啟動，中國企業又失去了美國這個競爭對手，市場和利潤空間同時增大，中國經濟就有可能走出蕭條，就業可能增加，銀行呆壞帳可能減少。不僅如此，當中國停止進口波音飛機時，一方面會給中國民機工業提供機會，促進中國飛機製造業的技術進步，而且如果我們作為應急改進口空中巴士時，還能增強中國與歐盟的聯繫，在國際上進一步孤立美國。

可見，由於中美經濟密切交往對中國弊大於利，中國本來就應該興利除弊，減少對美經濟交往。也就是說，經濟制裁並不是美國手裏的一張牌，而是中國手裏的一張牌。它對美國的損失遠遠大於對中國的損失，而給中國帶來的長遠利益又遠遠大於短期損失。中國是一個大國，各種資源和生產能力齊全，可以做到獨立自主，並在獨立自主互惠互利的基礎上開展國際經貿往來。如果別人想以終斷貿易往來來威脅，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二、加入WTO對中國弊大於利

中國加入WTO的利弊得失本來就是極具爭議的問題，在我看來，在絕大多數國有企業、絕大多數農民、絕大多數民營非出口型企業看來，中國以目前所承諾的代價加入WTO是弊大於利的。

WTO是一個貿易規則，WTO規定，各國企業都將在同一賽場上按同一規則進行公平比賽。問題是，發達國家的企業是經過數百年市場競爭拼殺出來的大鯊魚，而中國企業則是剛剛經歷了幾年市場風雨的黃魚、帶魚，如果按同一規則角逐，則必然成爲鯊魚的美餐。在中國企業普遍缺乏國際競爭力的前提下，盲目加入WTO，只能是爲跨國公司全面佔領中國市場，兼併中國的大中型企業，使中國經濟成爲新式殖民地經濟鋪平道路。在新式殖民地經濟中，仍然會有一部分中國人受益，他們可以成爲跨國公司的中高級經理，成爲跨國公司的分銷，享受接近發達國家的收入水準，但這部分人只能是極少數。由於跨國公司的生產效率高，競爭能力強，同樣產值所能容納的就業量少，中國的大部分人都可能失去體面的工作，或只能靠打臨工和救濟生存。以農業爲例，中國16億畝耕地容納著5-6億勞動力，如果美國大農場進入中國農業實施大規模的兼併，使中國農業在美國資本的統治下現代化，則中國農村將只能容納1000萬左右的勞動力。絕大部農民只能流入城市，靠乞討或搶劫度日。類似地，如果中國汽車工業被美國資本整合，則中國汽車工業將減員三分之二以上。

拙著《碰撞——全球化陷阱與中國現實選擇》（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專門討論了WTO格局下各行各業的前景和出路，並批評了中國相當一部分經濟學家的市場浪漫主義或競爭萬能論。我認爲，正是這種流行理論把中國帶入到競爭過度，核心工業能力被摧毀，銀行壞帳如山，外內債務急增，失業不斷擴大的險惡境地。而WTO則是市場浪漫主義思路的極致發揮，它所要求的不僅是一國範圍的自由競爭，而且是全球範圍內的自由競爭，讓全球500強來統治世界經濟。事實上，目前各行各業大打價格戰，通貨緊縮，市場蕭條，正是競爭激化的結果。這樣繼續下去，只能是陷入越來越深重的經濟危機。

市場浪漫主義的教皇則正是美國。也就是說，恰恰聽從了美國的教導，中國經濟陷入了經濟危機。因此，要解決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必須重新認識WTO，重新反思競爭萬能論。

三、借美國的經濟制裁，重新調整發展思路，實現尊嚴和富裕的雙豐收

有網友說，人在矮簷下，不能不低頭。尊嚴和富裕不可得兼啊！

這話乍聽有道理，細想有問題。美國怎麼能實現尊嚴和富裕的得兼呢？我們二十

多年放棄尊嚴，又換來了多少富裕呢？國家統計局公佈，中國總體上達到了小康水平。然而，包括農民在內的大多數中國人的實際感受卻是剛剛溫飽，而且前景莫測，不知道孩子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會比自己好。還是鄧小平同志說得好，如果按資本主義的分配方法，絕大多數人還擺脫不了貧窮落後狀態，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就可以使全國人民普遍過上小康生活。現實生活正在實現他的預見。中國如果有 5% 的人富裕起來，就是 6500 萬，這部分人就可能遍佈城鄉各地，遍佈黨政軍各部門，成爲人們致富的榜樣，成爲人們生活富裕的象徵。但是這部分人的富裕從根本上是靠 95% 的不富裕，因此他們的榜樣無法學習。如果把富裕的 5% 和貧窮的 95% 平均起來說成是大多數小康，我看這只能是自欺欺人。所以，總體來看，我們今天的真正問題是尊嚴和富裕的雙重失落。在那一小部分富裕者看來，中國才是以尊嚴爲代價換得了富裕；在大多數溫飽線上的人看來，是富裕者的苟安犧牲了貧窮者的尊嚴。

富裕者爲什麼對美國硬不起來？因爲他們是靠著美國倡導的弱肉強食的市場邏輯富裕的，他們靠著把中國的資源和初級產品源源不斷地輸送給美國獲益，他們的消費品有賴於美國提供。因此，美國人要打，只好隨它打，要罵，只好隨它罵，我自縮頭內心笑。這種心態表現在外交實踐上，就表現爲“習慣性弱軟”。

當然，富裕者也分兩類。一類富裕者是買辦型的，他們在任何時候都會對美國服軟；另一類富裕者與美國的聯繫較少，而衝突較多，他們遇到撞機事件也想硬，但卻容易被輿論引導，不知不覺地膝蓋發軟。在中國富人中，明確地屬於前一類的還是少數。因此中國仍然有可能強硬起來，爭取尊嚴和富裕的雙豐收。

就此而言，美國還真是一個好榜樣。美國在政治上獨立之初，經濟上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主要靠出口棉花、小麥、森林、皮毛換回英國的工業製成品。這經濟殖民地模式使美國統治結構基本上爲受益於該模式的進出口商人和農場主所主導，對英國有很強的依附性。但是，當 1807 年英國炮艦炮轟美國商船切薩皮克號時，美國民眾被激怒了，美國國會通過了禁運決議，停止與英國的貿易往來，即美國對英國實施了經濟制裁。由於美國製造業長期微不足道，制裁對普通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很大困難。但是，美國民眾還是咬緊牙關堅持了一年多，使美國製造業以 200% 的速度增長，奠定了美國工業發展的基礎。1812 年，美英再度交戰，貿易額又一次急劇下降，給美國工業提供了第二個發展機會。此後，美國開始實施系統實施貿易保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成爲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爲止。由此可見，美國今天的富裕實際上恰恰是由於維護尊嚴帶來的。與美國相反，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南美大國，由於不敢維護自己的尊嚴，二百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的經濟殖民地，被稱爲美國の後院，至今沒有富裕起來。

事實上，西方七國都是靠貿易保護起家的。美國、德國、日本的貿易保護是有目共睹的，其實連英國都一樣。在英國工業革命前，其紡織業競爭不過印度，英國議會禁止印度紡織品進口，又禁止本國紡織原料出口，從而培養起了可以產生工業革命的紡織品需求。中國目前雖然仍然落後，但是我們有發展的巨大潛力，只要我們實行恰當的貿易保護政策，制定相應的長遠發展戰略，不是不可能躋進發達國家俱樂部的。但是，這必須以不遵守發達國家制定的規則為前提。自由貿易原則是發達國家阻止落後國家強大的戰略武器，只要落後國家實行自由貿易，必然成為發達國家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一個環節。這正是 WTO 對中國的最根本的危害。

如果我們能夠認清自由貿易對中國的危害，重新思考WTO的利弊，那麼美國威脅不讓中國加入世貿，就會成為中國體面地放棄所有關稅減讓、市場開放承諾的最好理由。事實上，正如克林頓所說，中國加入WTO對美國有百利而無一害。因此，當中國認真重新思考WTO時，真正著急的反而是美國。這樣一張好牌放在手裏，卻讓美國人當好牌來打，這正是中國外交的最大失策之處。

那麼具體我們應該怎樣調整長遠對策呢？我在《碰撞》已經作過詳細闡述。簡述如下：

中國應該採取市場現實主義，認清國際經濟競爭的形勢，綜合考慮國內資源制約，確定國際經濟競爭戰略的長遠目標和當前重點，規劃國內各產業取捨和發展方式，以期持久地保有國際競爭優勢，或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爭取將弱勢轉化為優勢並保有之。很顯然，中國是國際經濟中的弱勢國，因此我們的經濟競爭戰略必然只能是以弱勝強的持久戰。為此，首先要考慮自身的弱點，保證這些弱點不成為對方攻擊的突破口，從而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同時，則是努力尋找對方的弱點，避實擊虛，削弱對手，壯大自己。這樣，才可能在一個較長的時期裏，把清醒堅定的長遠戰略與靈活機動的戰術策略組合起來，把國家整體力量的厚重堅實與市場機制的輕便多樣結合起來，打一場以弱勝強的經濟持久戰。這一戰略可能將由四個要點組成：就業優先，資源節約，集中力量扶持戰略產業，為科技和教育事業重鑄靈魂。

就在結束本文時，我到網上瀏覽了一下，發現這樣一條新聞：“儘管中美兩國政府關於撞機事件的磋商還在進行，美國海軍已經緊鑼密鼓地開始策劃如何歡迎 24 名機組成員返回。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部發言人Sean Gibson中校說，會有一個返還過程，我們正在為這件事情做準備。”看來，中國這次又準備“習慣性軟弱”了。

卡維波，左派裝可愛？

林深靖

卡維波自稱是左派，而且是可愛的左派。在《國際邊緣》網站裡，他極力勸勉我們「左派裝可愛」的必要。在〈青春睿智的左派？成年癡呆的左派？——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見《左翼》第16、17號）長文中，他也強調，對於商品消費和通俗文化的挪用，即是要求左派「搞笑可愛性感」，是「考驗左派的創造想像力」、「挑戰左派能不能做到青春睿智（而非成年癡呆）的關鍵」。

「歷史終結」與「告別革命」

卡維波也在文章中展示了幾個「挪用」的範例。譬如，給兒童看凱蒂貓打炮的圖片，就是「挪用Hello Kitty以產生各種反抗與顛覆的意義」。譬如，一個上課打手機聊天、調情的廣告，「有喚起學生抗拒不合理規定的權利意識之潛在可能」。當然，包括青少年「做身體」、嗑藥、援助交際等，卡維波都看到了「抵抗論述」，「幾乎無處不是戰場」。

卡維波還演示了另一個「挪用」的範例。那就是把〈青春睿智卡維波？〉文章標題中的問號悄悄拿掉，「青春睿智」從反諷變成讚頌，然後，堂而皇之地挪用到自己的頭上。由於卡維波在論戰中的拿手招數是頻繁地將「老化」、「弱智」、「癡呆」、「空腦」、「懶惰」、「無能」、「沒有學問」……等詛咒性形容詞拋到對手頭上，因此，在文章中要證明自己「青春」、「睿智」、「聰明」、「腦滿」、「勤奮」、「能幹」、「飽學」……就成爲明知其不可而爲之的任務。當然，對於像卡維波這樣以「機器戰警」做爲人類未來理想的好萊塢影迷來說，在「夢工廠」裡，一切「不可能的任務」，都可以「可愛」名之。

對於卡維波所不屑的「傳統左派」，當然還少不了如預料之中的「化約」、「教條」等一陣亂棒。我在〈青春睿智卡維波？〉一文中已指出，「化約論」或「教條」的指控，既是絆倒左翼的陷阱，也是消解馬克思主義論述的利器。就像指斥對手老化、弱智以凸顯自己「青春睿智」一樣，卡維波似乎也認爲，只要拋出「化約、教條」，就足以反證自己的思維是如何的「縝密、靈活」。

很可惜，卡維波的手法常常是粗糙地「化約」對手的觀點，拙劣地將幾個人云亦云的所謂「教條」概括他自己並未曾深入的馬克思理論。關於消費與通俗文化，卡維波主張要「擺脫那些簡化教條的說法，重新看待像減肥美容的媒體風潮、凱蒂貓、偶像追逐等等通俗文化與消費現象」，他遺憾台灣的相關討論，「完全沒有跟上文化研究這一、二十年來的發展」，而「英國文化研究的緣起其實就是對經濟化約論（也就是馬克思的經濟下層決定文化上層）的批判。」

他說，「自從社會主義國家崩解，傳統左派路線不再是一個有效選項而只是一個有效修辭。」卡維波如此急於宣告社會主義的失效，與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和李澤厚的「告別革命」說，看不出有什麼差別。而他以經濟決定論來「化約」馬克思的思想，事實上是西方右翼學者自十九世紀以來的陳腔濫調，關於這一點，博學強記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鄭國棟所寫的〈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一文（見《左翼》第15號），已有明晰的批判，我不再贅言。

不要讓問號消失！

就像〈青春睿智卡維波？〉的重點是在那個後來被卡維波「化約」掉的「？」號一樣，做為自覺的社會主義者，我對於對於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態度，可以很簡單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不要讓問號消失！

由於對既定體制的恆常質疑，對異質的、可能的替代方案的追尋，我們面對當前社會中一切障眼法、腹語術，忍不住要去戳穿；當許多人被快樂、希望、春天、花蕊、有夢最美……等甜蜜音符催眠時，我們很不幸被驚醒。我們不可能像卡維波所說的「當所有的人實際上都處於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內部的今日……還假裝處於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外部之某個戰略高地」，我們只是有意識地「身」在其中，而不願「陷」在其中。對於資本主義消費社會中「權力」與「錢力」交織的龐巨陰影，我們可能更為敏感，對於消費行為中的商品拜物教以及通俗文化中的偶像崇拜狂熱，我們感受到更深刻的荒謬與荒涼。

當然，在卡維波的認識中，這一切都可能被「挪用反轉」，而形成「零星的反抗」。卡維波基本上還是把對既定威權的挑戰與挑釁視為一種價值，這是左翼進步論述的基礎，但是他又很不屑地把所謂「傳統左派」打為「成年癡呆」，是「青春」的反面，是青少年的對立面。比起文革紅衛兵的「造反有理」，以及法國1968年學運的「禁止說禁止」(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卡維波所頌歌的青少年，也

許稍顯蒼白，但是由於擁有打炮的凱蒂貓玩偶和有WAP功能的個性化手機，他們的叛逆形式似乎變得更為豐富多彩。

卡維波以「拼貼」(bricolage)來形容青少年通俗文化，事實上以他所舉的例證，與其說是拼貼，不如說更像是「萬花筒」(kaleidoscope)：隨機聚散、偶然、不沾黏，基本上局限於一定的空間，變化萬端，但絕不出格。

遺產與階級再生產

卡維波採用「年齡政治」的觀點，以二分法區隔「青少年」與「成年人」的世界，前者睿智進步，後者癡呆保守，彷彿世代之間是斷裂的，彼此各成自主、封閉的領域，完全忽略了遺產與階級再生產的關係。事實上，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分配，世代之間的傳遞繼承，更甚於同世代不同收入者之間的橫向攤派。一個自幼即擁有數千萬長輩贈與的陳家待嫁少女，我們很難期待她參與反高學費的街頭抗爭；同樣的，一個不用當兵的青年醫生駙馬，與陪同失業父母到勞委會門口埋鍋造飯的待役或待業青年，大概也很難期待他們有什麼共同的立場。無差別地看待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就像當權者聲稱要同時保障東京貴婦金美齡和慰安婦阿嬤的「言論自由」一樣的虛妄；林肯是這樣做比喻的：狼和羊都同樣追求自由，有人或許因此滿足於兩種動物之間消除了差別，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狼要的自由是吃掉羊，羊要的自由是不被吃掉。

卡維波以同樣的二分法區隔「通俗文化」與「高等文化」，他說：「高等文化的創造者是少數的一群文化菁英或藝術家；通俗文化的創造者就是大眾，人人都是藝術家，這是集體的努力生產的結果。」然後，卡維波又借用文化研究的觀點，將通俗文化與商品消費連繫起來，指出通俗文化是「大眾主動消費商品的結果」，他說，「所有消費幾乎都是文化實踐：人們在消費中積極主動地創造或維持某種身分認同(個人或集體的)……消費不但是經濟活動，也是交往與對立、形象與認同、夢想與安慰。」

卡維波一方面將消費行為無限上綱，另一方面又將通俗文化移入聖殿，他強調通俗文化的「拼貼」風格即具有反叛的因素，「將符號象徵從其原始脈絡抽離，商品重新被串連，這是個自我定義的活動，從原初意義或生產者的意圖自然形成抵抗，並很容易在被壓迫的情境中產生反對意義。」

卡維波的分類和定義，無疑是導引向「青春就是美的，流行就是好的」這種整體主義的觀點，青少年通俗文化反可能因此走向民粹、媚俗的方向。青春固然是值得讚

頌的，但是，對青春和「現此時」(the present)的過度揄揚，卻也可能造成對歷史和「既往」(the past)的輕忽和蔑視。近年來，日本否定侵略戰爭的漫畫書動輒銷售上百萬，右翼勢力在漫畫世代中聲勢浩蕩；美國選出了被認為對歷史極盡無知的鷹派總統小布希；歐洲新法西斯政黨在法、義、比、奧等多個國家崛起……多位學者已指出通俗文化與民粹主義的依存關係。同樣的，流行固然是可慾的，但是過度追求流行也可能產生神聖化收視率、眼球數、銷售量、民調支持度的結果，台灣這幾年來政治和媒體的民粹、媚俗傾向（政治人物、影視明星競相「裝可愛」），與整體通俗文化的氣息和溫度明顯是相互感應的。

蹦極遊戲

大教授卡維波這篇佔了《左翼》30餘頁篇幅的長文，華富炫麗地點綴著文化研究、酷兒理論、後現代的學院名詞，如此彷彿肌體刺青一般醒目邀眼的文字，一方面展現了「青少年通俗文化」逐浪追潮的風采，另一方面，在罵起「那些沒有學問的空腦批判家」時，顯然更為鏗鏘有力。只不過在這個生活方式選項超市化的現代社會，在這個諸說混同的新時代（New Age），在這個蠻橫、獵奇、高效率的新自由主義與恣肆、放縱、嬉鬧的新自戀主義難分難解的新世紀，他慣性的二分法思維模式，以及奔赴既定事物另一個極端的叛逆典範，不禁讓人想起高空彈跳（中國大陸稱為「蹦極」，是更形象化的用語）的遊戲：一個可愛的左派，在山頂和山谷之間迅猛起落，其間充滿了刺激（刺眼激進）、驚駭（驚世駭俗），但是遊戲者知道身上很安全地綁著堅固的繩索，他很清楚自己終究會回到山頂的「控制台」，擦擦冷汗，卸下繩索，然後，出發尋找下一個玩樂的景點……

★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下〉

鄭國棟

80年代後期，台灣這塊美國的經濟、文化殖民地，經過知識界的文化買辦之手，開始進口在美國宗主國大行其道的文化商品——「後現代主義」。不旋踵，台灣的知識文化界也就以學步摹倣來的拙劣舞姿，紛紛大跳起「後現代」來。一些「後現代」的術語、概念被半生不熟地大量使用於學術圈與傳播媒體。但陳芳明直到90年代初尚未跟上這股風潮，猶矇然於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理論概念。

為台獨意識形態服務的《謝雪紅評傳》

爲了宣傳台獨史觀，陳芳明自稱費四年之功撰述了《謝雪紅評傳》，於1991年7月出版。這部洋洋七百多頁充斥著錯誤的敘述與荒謬的解釋的政治宣傳品，旁徵博引了數百種史料，狀似嚴覈務實，實際上是陳芳明在史明的台獨教條導引下，用他那沒有學精的十九世紀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派科學實證史學與粗陋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加工製造的劣等貨，甫出版即被淺薄的台獨知識份子濫加吹捧爲所謂「劃時代的貢獻」、「劃時代的創舉」（對此後文會有進一步的批判）。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的後記中自我標榜：「這本書的撰寫，在於釐清長期以來統治者所加諸於謝雪紅身上的扭曲形象。我要尋找謝雪紅的原型，主要是爲了尋找台灣人的歷史原貌。」（1991b：712）但1992年4月路況在《中國論壇》第379期發表〈歷史意識與歷史造像運動〉的書評，運用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詮釋學與後現代理論指出陳芳明標榜「要尋找謝雪紅的原型」、「尋找台灣人的歷史原貌」，其實，是爲了替台獨意識形態服務，而「將謝雪紅塑造爲台灣民族的史詩英雄」：

《謝》書自始就是一部「時效性」的歷史書寫，它針對官方意識形態的「革命法統」加「文化道統」的「反共復國神聖史詩」，提出了另一套「民族解放建國史詩」。於是，「謝雪紅」這個名字從塵封的檔案與沈埋湮沒的禁錮記憶中挖掘出來，重新洗雪擦亮，搖身一變爲解放台灣人民的「聖女貞德」，召喚著一個新民族新國家的誕生。此一「時效性歷史」的現代史詩企圖才是《謝》書真正的旨趣所在，至於其史料的蒐羅舉證是否客觀翔實，行文修辭是否時而流於煽情誇飾，則猶其餘事也。

其實，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原就是相應於資本主義理性化過程的一種集體化的

「激情形式」(passional form)，無論是官方說法的「反共復國神聖史詩」，或是《謝》書的「民族解放建國史詩」，要之皆為相應於同一個台灣資本主義國家模型的兩套民族激情形式。前者歷經四十年的文化霸權優勢，終於在解嚴以來解咒除魅的狂飆洪流中日趨式微沒落。後者乘勢崛起，企圖取而代之，在資本主義「解除疆界」的運動中，以「本土現實」為圖騰符碼進行「再疆界化」的掙扎努力，召喚台灣社會大眾重新凝聚為一個新民族的歷史主體，一個重寫國家命運的「命運共同體」。在這「集體主體化」的非常運作中，當然有其意識形態糾結的歷史系譜與社會現實脈絡，然而最有趣也最耐人尋味的，卻是它所訴求的「激情的與活生生的形式」。這「激情的形式」不是別的，就是《謝》書所揭櫫的「歷史造像運動」。

不知「後現代」為何物

路況雖然誤用了加達默爾effective history的概念(路況譯為「時效性歷史」)(註1)，但這些評論可謂道出了《謝雪紅評傳》的實質。不過，一來路況把《謝雪紅評傳》的「民族解放建國史詩」與國民黨的「反共復國神聖史詩」等量齊觀，顯露了台獨史觀並不比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族主義史觀更「科學」、「客觀」、高明，都同樣是以意識形態建構的產物。這對多年來不斷指控「統治者刻意擦拭與惡意歪曲」台灣歷史，嘵嘵不休地叫嚷要根據「史實」，「建立以一個台灣社會為主體的史觀」的陳芳明來說，自然是極為難堪的事。再者，路況以「癡候」閱讀法寫書評，文中又多方徵引了伽達默爾與福柯、德勒茲(Gilles Deleuze)、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人的後現代主義觀點，不知詮釋學與後現代理論為何物的陳芳明讀來如墜五里霧中，根本看不懂路況的批判何所據而云然。陳芳明不先虛心補課搞懂對手的觀點，卻惱羞成怒寫了貽笑大方的《書評不是這樣寫的》一文，以台灣學術紀律檢察官的姿態，指責路況「嚴重觸犯了書評撰述的大忌」，「學識淵博，卻非常不誠實，甚至是非常反智的」，還提出「尊重知識的基本條件，是專業與敬業」。這篇反駁文章就像他與陳映真的論戰，都是在感覺到對手的批評直接刺中本身要害，卻又無力理解對手的論旨之下，出於心理自衛機制的反射式攻擊行動，徒見其不自量而已。

眼見美國、台灣的學術文化界(特別是文學領域)後現代、後殖民的術語到處流竄，陳芳明這幾年也不甘落後，耍弄起後現代、後殖民的詞彙。然而，由於既缺乏嚴格的思考訓練，也無哲學、社會科學的紮實功底，一如他的曲解、誤用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理論在他筆下也同樣荒腔走板，大失原旨。

前已述及，陳芳明秉特主觀唯心的台獨教條任意把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戒嚴體制定性為殖民統治，於是解嚴後的台灣進入了後殖民時期，解嚴後的台灣文學也就成了所謂的後殖民文學。這種純粹為了政治教條服務的分期標準，明眼人一看即知其嚴重違

背客觀現實，自不待言。可笑的是，陳芳明爲了替他的台獨教條找理論依據，援引了近年來在國際學術界頗爲時髦的後殖民理論，以壯聲勢。然而，頭腦不清又不肯用心的陳芳明，以他一貫望文生義、想當然爾的思考方式，在曲解馬克思主義之後，又胡扯起他根本沒有搞懂的後殖民與後現代理論了。陳芳明在這段引文中把後現代理論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 概念解釋成：「文學上習以爲常的、雄偉的審美觀念與品味」，並說在台灣「這種審美是以中華沙文主義、漢人沙文主義、男性沙文主義、異性戀沙文主義爲基調」，接著又把「大敘述」混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先驅葛蘭西(Gramsci)首創的「文化霸權」(hegemony) 概念，思想混亂與無知妄議的程度，真足令人驚詫。

何謂「大敘述」？

陳芳明見到「大敘述」(grand narrative) 的大(grand)，不用心細究其理論內涵，就拿出他寫詩的想像力把它想像成是「雄偉」，然後直接附會到他所痛惡的中華民族主義上。其實，所謂「大敘述」根本與「雄偉」毫不相干，更與民族主義無涉。在後現代理論中，「大敘述」與「主導敘述」(master narrative)、「本源敘述」(metanarrative) 是同義詞，都是指號稱放諸四海皆準、俟諸百世不惑，統攝科學、道德、美學等所有學問於一體，且聲稱人類正朝向自由、進步解放目標前進，但又未經經驗證實的理論體系。後現代理論的內容紛繁多姿，各主要理論家的論點也不盡相同，但大多質疑十八世紀啓蒙運動所標舉的理性、自由、進步、解放的觀念，右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自由主義，左打社會主義(特別是史大林主義)，認爲兩者都繼承了啓蒙運動的遺產，把人當作理性的主體，自居爲世界的「中心」，並藉由突出科學、理性的「大敘述」，支配人類的思想，壓制了其他非科學、理性所能規範的知識、欲望、情感等領域。後現代理論認爲啓蒙運動的「現代精神」(modernism)，猶尊理性、科學，強調總體性(totality)，造成了思想上的恐怖專政，也爲政治上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 奠立了合法的基礎，於是「解放」的口號反而成了鎮壓的枷鎖，爲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脫困之道就是批判「現代精神」，超越啓蒙運動，打破理性的獨裁，開發出百家爭鳴、異議之花遍地開放的生動活潑的局面。

這裡且舉後現代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歐塔的說法以見一斑：

「我以“現代”一詞來指稱運用本源論述(metadiscourse) 爲本身合法化的科學，這種本源論述明白地訴諸像：精神辨證法、意義詮釋學、理性或勞動主體的解放、或者財富的創造這類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我所說的“後現代”就是對本源敘事(metanarratives) 的質疑。」(Lyotard 1984: XXIII - XXIV)

李歐塔在《解釋後現代》一書中又說：

「“後現代的問題”越是在國際上展開討論，就越顯得複雜起來。1979年寫作《後現代狀況》時，為了簡化起見，我把“後現代問題”與“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連繫起來。

在《後現代狀況》中，我論及的“本源敘事”(metanarratives)是指現代特性(modernity)的標誌法：理性與自由的不斷前進解放、勞動的進一步解放或災難性解放(資本主義異化的價值的源泉)、以資本主義技術科學的進步使全人類富裕、甚至——若把與古代的古典主義對立的基督教本身包括在現代特性中的話——以靈魂皈依基督為愛世人而殉身的敘事來獲得救贖等等，黑格爾的哲學統攝了所有這些敘事，並且，就此而論，它本身就是玄想的現代特性的凝結。」(Lyotard 1993: 17 - 18)

我們對照李歐塔對「大敘事」的闡述與陳芳明純粹憑著望文生義而來的曲解，就可看出其荒唐可笑的程度，真可謂中外古今罕有其匹。

不知「後殖民」何為物

再看陳芳明在《後現代或後殖民》一文中的一段話：

「後現代主義在於解構中央集權式的、歐洲文化理體中心(logocentrism)的敘述，而後殖民主義則在瓦解中心／邊緣雙元帝國殖民論述(Appiah / 19-24)」(陳芳明 2000c【1998】：55)

這段話陳芳明標示說是引述Appiah收在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主編的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的論文。但通讀Appiah的全文卻看不到陳芳明引文中的任何一個字。原來，陳芳明把117頁上的編者引言誤植為Appiah的論述。頁碼引錯事小，連作者也張冠李戴，那就證明了他知識上的詐偽。陳芳明經常指責別人不遵守學術紀律，屢次高喊要維護台灣的學術紀律與尊嚴，然而，他自己不但違犯學術紀律的次數遠高於一般人，所違犯者還皆為不可饒恕的錯誤，丟盡了台灣學術的臉(如果他寫的東西還算是“學術”的話)。

不僅此也，陳芳明扯進後殖民理論以為台獨教條張目之際，卻不認真搞懂後殖民理論(話又說回來，台獨本身就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他若真的了解後殖民理論就不敢胡亂套用後殖民理論為台獨教條撐腰了)。他在《後現代或後殖民》中說：「所謂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後』，並非指殖民地經驗結束以後，而是指殖民地社會與殖民統治者接觸的那一個時刻就開始發生了。對於殖民體制的存在，殖民地作家無不採積極的抗爭(如批判)，或消極的抵抗(如流亡、放逐)。因此，這裡的『後』(post)，強烈具備了抗拒的性格。」(同上)這段話沒有註明來源，但其實

也主要抄自 Ashcroft 等人所編文集的編者引言。該書編者是這麼說的：

「我們所界定的“後殖民”並不是指“獨立後”(post-independence)或“殖民主義之後”(after colonialism)，因為這樣一來就會誤以為殖民過程已經結束。實則從殖民統治一開始就產生了後殖民主義。後殖民論述實乃與殖民主義俱生的對立物。就此而論，後殖民的寫作有一段很長的歷史。〔Ashcroft et al, eds. 1995: 117〕

Ashcroft 等人這段話的涵義是說，後殖民主義不是個按年代分期的概念，而是與殖民主義對抗的產物，所以“後殖民”不是指殖民統治之後的歷史階段，要而也沒有「後殖民時期」之說。自 1970 年代晚期興起的後殖民理論旨在批判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對殖民地人民思想、心靈的宰制，造成被殖民者的奴化人格。這種意識形態的控制，並未隨殖民統治的結束而告完結，迄今仍以新殖民主義的方式支配著形式上獲得獨立的前殖民地，因而後殖民理論竭力清理殖民主義的遺毒，力圖重新確立前殖民地人民思想、心靈的主體性，以擺脫奴性，自覺地對抗帝國主義的支配。對於後殖民理論的「後」(post) 字該作何解釋，在後殖民理論中迭有爭議，有人認為，「後」字是指殖民地獨立以後的時期，但 Ashcroft 等人不同意這樣的觀點。陳芳明既引用 Ashcroft 等人的解釋做為立論依據，卻又同時自相矛盾地指稱「1987 年解嚴以後應該可以定義為後殖民時期」(陳芳明 2000c [1998: 55])。這就跟陳芳明一方面用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做為詮釋台灣歷史的基礎，另一方面又自打嘴巴地大肆批評那是「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一樣，根本沒有搞清楚自己囫圇而吞的理論觀點的確切含義，稀裡糊塗地亂讀，也稀裡糊塗地濫用，這無不彰彰明甚地顯示陳芳明思想的混亂與理論思考能力的薄弱。

後殖民與後現代的後結構主義來源

以下我們再來看看陳芳明是怎麼談所謂的「後殖民文學」與「後現代文學」的：

後殖民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便是作家已自覺到要避開權力中心的操控。這種去中心(decentering)的傾向，與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有人常常把解嚴後台灣文學的多元化現象，解釋為後現代狀況(postmodern condition)。不過，這裡必須辨明的是後殖民與後現代之間有一很大的分野，乃在於前者側重強調主體性的重建(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而後者則傾向於強調主體性的解構(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後殖民主義者則非常重視歷史記憶的再建構。以這個觀點來檢驗解嚴後文學蓬勃的盛況，當可發現那是屬於後殖民文學特徵，而非後現代文學的精

神。(陳芳明 1999)

陳芳明的這些話表明他對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了解是極其膚淺的。後殖民與後現代固然有所差異，但兩者的關係密切，都反對中心的霸權壓制或抹煞處於邊緣的異己(other)，主張讓被中心貶低為卑賤、反「常規」者發出自己的聲音，確立本身的地位。這些共通的觀點不是陳芳明所謂的「異曲同工」，而是系出同源，都受惠於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福科、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福科與德希達繼承了德國哲學家尼采、海德格對西方以笛卡爾思想為代表的人本主義(humanism)的批判。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哲學觀把人視為理性的主體，具有認識並控制外在客體的能力，這就突出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人成了自然的主人，一切事物都淪為人的俘虜，由人的理性構成的知識成為無堅不摧、所向披靡的巨大權力，不論是外在於人的客體或內在於人的欲望、感情都成了受到人的理性壓制的「異色」，不得不向人的理性俯首稱臣。西方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高舉理性、自由的大纛，發展了科學技術，造成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突飛猛進，對非資本主義地區大肆擴張掠奪，理性、科學、自由也就隨之席捲天下、包舉宇內躍居為放諸四海皆準的「現代精神」被尊為至高無上的「真理」，不符合理性、科學、自由精神者即是不成熟、「未開化」、「落後」、「野蠻」、「反常」。此所以著名的後殖民理論家史碧法克(Gayatri Spivak)會指控：「帝國主道的主體與人本主義的主體兩者關係密切。」尼采與海德格不滿於理性的專制，不願萬事萬物都沈淪在理性的淫威下輾轉呻吟，任由理性的計算宰制，於是大肆抨擊人本主義，強調人的主體性與理性是站不住腳的形而上學，指出人的主體與理性有其非理性的根源，理性主導一切只能使人類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尼采更強調沒有所謂絕對、客觀的真理，每一種不同的觀點都可言之成理，所謂「事實」也須靠人的詮釋才得以成立，如此等等。

德希達的解構理論深受尼采與海德格的影響，在理性／非理性、中心／邊緣、西方／非西方、男／女等等二元對立的關係中，指出兩者的相互依存並力圖顛覆前者對後者的支配地位。在《白色神話學：哲學文本中的隱喻》一文中，他指出西方白種人奉理性的形而上學為普世最高權威，指控非西方、非理性者為非法，其實是種族中心論的帝國主義行徑。海德格痛折笛卡爾的人類中心觀視外在於人的物為「異己」，漠視其存在的價值，濫加宰制。福柯承其遺緒也極力撻伐笛爾式的理性主體錯誤地把罪犯、瘋子、外國人、同性戀者、女人都視為「異己」加以壓制、排斥。福柯推崇尼采反啓蒙理性的精神，否定人可以根據某種中心、本質掌握真理的總體理論，認為這將掩蓋人類社會的複雜多樣，壓制差異，形成思想的專制，因而主張解消主體、放逐本質、挖掉所謂「真理」的本源基礎，倡導運用局部分析的方法分析社會不同層面的事

物，讓分殊各異的觀點、立場百花齊放，綜放異彩。康德曾在《什麼是啓蒙運動？》一文中說，啓蒙運動的意義在於人類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從而擺脫了不成熟狀態。福科抨擊這種觀點把本是歐洲文明在特定歷史時期發展出來的啓蒙理性普遍化爲人類的本性，抹煞了人類的異質性。福柯還根據尼采的「權力意志」論，提出權力生產知識而知識也鞏固權力的觀點，並指出西方的殖民主義正是利用知識與理性達成了對非西方世界的經濟支配與政治霸權。

德希達、福柯上述反理性至上、反中心、反總體性理論、反本質論、反客觀的絕對真理，強調異質、多元、邊緣的看法，既成了後現代理論的主要論點，也給後殖民理論諸多啓發。此所以後殖民論者如Linda Hutcheon, Bill Ashcroft等人常說後現代與後殖民兩者緊密相連，有頗多重合(overlap)之處。

後殖民的主體觀

當然，後殖民主義並不同於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片面的否定宏大敘事、普遍性、主體性，帶有濃厚的懷疑論、相對論甚至虛無主義的傾向。這自然與強調政治意義汲汲於確立本身的主體意識以對抗帝國主義支配的後殖民論者有所扞格。但這種區別也不是簡單如陳芳明所說的後殖民「側重強調主體性的重建」而後現代「傾向於強調主體性的解構」，或者「後現代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在於主體的解構，而後殖民主義則在追求主體的重構」(陳芳明 2000c, [1998: 56]) 兩者在主體性問題上除了差異之外還有重合：後殖民論者與後現代論者一樣反對身份認同的本質論。後殖民論的代表人物如：薩伊德(Said)、史碧法克、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都同意後結構／後現代反本質論的這一觀點：人的主體、身份不是先驗、固定的，而是人爲建構起來的，不存在純粹、不變的民族與文化本質。因此，他們反對爲了對抗帝國主義而大肆宣揚本土本質特徵的本土論(nativism)，指責建立在本質論上的「身份認同的政治策略」(identity politics)。封閉了主體、身份朝向開放、包容的可能性，只強化僵固的身份認同觀，結果等於是重複了壓迫者二元對立的邏輯，並沒有超越支配者而開出一條更高明、可取的新路。因此薩伊德步式反殖民的先驅法農(F. Fanon)之後，提出了「開明的後民族主義」(enlightened nationalism) 提倡超民族的國際團結，巴巴也強調化文文化交融的混血(hybridity)論。許多後殖民論者也指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其實是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被殖民者中也存在著與殖民者的共謀勾結，二者並不是單純的對抗關係，僅只突出殖民與反殖民的對立面，不免失之片面、膚淺。這些視野都超出陳芳明所理解的後殖民主義。多年來，陳芳明陷在台獨教條的框框裡，只會用本省／外省，如「歷史的整體性，基本上就是一種歷史結構。……這種結構性的觀察，又必須放在本省、外省兩條路線的脈絡裡，才能看得清

楚。」(陳芳明 1992: 80)、台灣意識／中國意識、台灣人／中國人的對立這類粗糙而又站不住腳的台灣人本質論去強暴台灣史料、歪曲台灣文學的內涵。以這種簡陋淺薄的思考方式去看後殖民主義，根本無法掌握其精義，是理有固然的。

陳芳明不僅對後現代、後殖民的主體觀不甚了然。對後現代的歷史觀更無半點認識，胡扯什麼「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後殖民主義者則非常重視歷史記憶的再建構」。後現代主義者那裡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李歐塔在批評有人把後現代主義的「後」字解釋成繼現代之後的一段新時期時說：

這種按年代序列的線性觀念本身就完全是“現代的”。它既是基督教、笛卡爾也雅克賓精神(Jacobinism)的一部份：既然我們啟動了全新的某種事物，時鐘的指針就必須撥回到零點。正是現代特性(modernity)這個觀念與這個原則密切相關：與傳統決裂再設置煥然一新的生活與思考方式，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

我們懷疑這種“決裂”事實上是忘懷或壓抑過去的一種方式，也就是，重蹈覆轍而非超越前進。(Lyotard · 1993: 76)

這裡完全沒有不在意歷史記憶的意思。不僅李歐塔沒有忽視歷史，福科也以歷史學家自居。致力於重建被中心排斥的邊緣論述的被遺忘的歷史。後現代的主要理論家反對中心霸權壓制處於邊緣的弱勢者，鼓勵被壓迫者發出異議，重建本身的地位與尊嚴，故而也支持婦女、少數民族、勞工、同性戀者等被壓制者向支配者爭奪歷史解釋權，以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著名的後殖民學者Hutcheon就指出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都共同關切歷史與邊緣問題(Hutcheon: 1989)。

後現代史學的特點是立基於德希達的「文本之外無他物」與福柯的「權力知識」論，質疑實證史學所謂的歷史「客觀性」，強調史料只是客觀存在的「過去」的遺痕(trace)，而非「過去」本身，史家撰寫歷史都是從當代的現實出發，根據特定的意識形態，著眼於特定的利益，為權力鬥爭而服務的。因而，沒有純粹「客觀」的歷史，也不可能重建真正完整的「過去」本身，所有撰述出來的歷史都受到史家具有的價值觀與所處的社會脈絡影響，歷史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為爭奪正統解釋權的權力鬥爭的戰場(參考: Jenkins 1991)。這根本沒有什麼「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的問題。

陳芳明之所以一意要否定解嚴後台灣文學的後現代現象面，代之以後殖民文學，仍然是主觀唯心的思考作祟，硬要把解嚴後台灣文學塞進他根據台獨教條劃分的後殖民時期裡，卻徒然暴露了他對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的淺薄無知。以下我們接著看陳芳明是怎麼幹那足適履的勾當的：

……曾經被權力邊緣化的弱勢聲音，在戒嚴時期所形成的挑戰格局是相當多元化

的。中國大敘述的文學開始遭逢台灣意識文學的挑戰。然而，台灣意識文學不免帶？敘述的色彩時，也終於受到原住民作家與女性意識作家的挑戰，同樣的，當女性意識作家開始出現異性戀中心的傾向時，也志作家的質疑。這說明了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特別精采的原因。台灣意識文學、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同志文學都同時並存的現象，正好反證了在殖民時期與再殖民時期台灣社會的創造心靈是受到何等嚴重的戕害的。潛藏在社會內部的文學思考能量一旦獲得釋放以後，就再也不能使用過去的審美標準當做僅有的尺碼。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應該分別放在族群、階級、性別的脈中來驗證。

每一族群，每一個階級，每一種性別取向，都有各自的思維方式與歷史記憶，或階級記憶，或性別記憶，都分別是一個主體。在日據的殖民時期與戰後的再殖民時期，主體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以統治者的意志做為唯一的審美標準。在單一標準的檢驗下，社會內部的不同價值、欲望、思考都完全受到忽視。但是，在後殖民時期，威權體制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鞏固，劃一的、全盤性的美學也逐漸讓位給多樣的、局部的、瑣碎的美學。（陳芳明 1999）

胡亂攪和後現代文學與後殖民文學

陳芳明在上面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地把台灣意識文學、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同志文學，各種不同性質的文學，不分青紅皂白全裝進了「後殖民文學」的籬筐裡。陳芳明這種歸類之荒謬是顯而易見的。後殖民主義的對立面是殖民主義，而女性主義的對立面是男性沙文主義，原住民的對立面是漢族沙文主義、外省籍作家的眷村文學的對立面是台獨法西斯而同性戀的對立面是異性戀中心論，各有不同的矛盾對立性質，不同的對抗對象。按照陳芳明自己的說法，「後殖民文學」是對抗殖民主義重構被殖民者主體的文學，又是殖民時期之後的文學。但男性沙文主義是自母系社會崩解，父權社會確立後，不論中外都存在了幾千年的事實，與殖民主義毫不相干，全世界（包括台灣）女性主義及其文學的發展也都早早於後殖民理論。異性戀中心則是幾千年來中外皆然的思想，何關乎殖民與後殖民？陳芳明又說「台灣意識不免帶有大敘述的色彩時，也終於受到原住民作家與女性意識作家的挑戰。同樣的，當女性意識作家開始出現異性戀中心的傾向時，也不免受到同志作家的質疑。……在族群問題方部分面，漢人沙文主義事實上還相當程度地瀰漫於知識份子之間。……外省作家或眷村作家的作品，常常必須受到『本土』尺碼的檢驗。」（陳芳明 1999）。據此而論，那麼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同志文學如果可以被歸類為「後殖民文學」那就是因為它們分別對抗台獨法西斯的台灣（漢人、男性沙文主義）意識與異性戀中心的殖民壓迫以樹立自己的主體性了。然而，陳芳明的後殖民史觀矛頭所向明明白白地是國民政府的戒嚴體制與中華民族主義，在這裡這些「後殖民文學」所抵抗

的對象(殖民主義)卻焉轉換成了台灣意識與異性戀中心論了。我們一再指斥陳芳明思想混亂、滿腦袋漿糊，在此可以再度證明陳芳明不但沒有能力掌握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要旨，他連前後一致、連貫完整地表述自己觀點的本事也付諸闕如。

陳芳明在上述引文中還說「不同的族群記憶，或階級記憶，或性別記憶，那都分別是一個主體。……在後殖民時期，威權體制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鞏固，劃一的、全盤性的美學也逐漸讓位給多樣的、局部的、瑣碎的美學。」多樣、局部、瑣碎(應該說是相對於總體的片斷、裂片[fragmentation])這些都是後現代理論反對現代總體性理論而塑造的用語，而強調差異、異質、多元與邊緣弱勢群體的獨特存在價值，倡導小敘事(minor narrative)、小論述(minor discourse)，也是後現代理論家如：福科、李歐塔、德勒茲、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人的主旋律，陳芳明卻又諱言(或曰不知)其後現代起源，一股腦兒全派給了後殖民。其實，從80年代末，一批留美回台的後馬克思主義者即在報刊、雜誌上積極鼓吹新社會運動，大量引介福科、德勒茲、瓜塔里等人的後現代觀點，提倡情欲解放、邊緣論述，對女性主義、同性戀、原住民、國族認同等問題多所著墨，其影響也反映在文學表現上。陳芳明卻爲了符合他台獨教條的框框，硬是用胡說八道的技倆把解嚴後台灣文學的後現代痕跡抹除淨盡，殊不知，這種卑鄙的心態與行徑，非但無法掩盡天下人耳目，徒令有識者齒冷而已。

人格分裂與思想錯亂

過去，陳芳明經常號稱要重建「客觀」的台灣歷史，「尋找台灣人的歷史原貌」，奪回台灣歷史的解釋權，又高呼「歷史研究，絕對不是爲了爲政治效勞而進行的」(陳芳明1992：81)。但任何真得史學三昧的人都可輕易一眼看穿陳芳明所寫的台灣歷史無不是在搞台獨的政治宣傳。然而，他屢屢以「客觀」、「不是爲政治效勞」自居，譴責「統派的歷史解釋，是僞民族主義，也是僞社會主義的；其真正面目，只不過是爲中共的政治目的效勞服務。」(陳芳明1998a：17)，說得多麼慷慨激昂、義正辭嚴！不過，荒唐透頂的是，就在與這段話的出處同年同月同日出版的《左翼台灣》序言中，他一反前調說了一段狠狠自掌嘴巴的話：

我很同意所有的歷史解釋都屬於政治的、所以就在這個立場上我特別堅持。我越來越不相信有所謂客觀的解釋，從而我也不相信有所謂客觀的學術。台灣社會既然塑造了我這樣的人格，那麼我在討論台灣歷史時，便不可能無視台灣社會所具備的殖民地經驗。這是很主觀的，無需討價還價。(陳芳明1998b：8)

「特別堅持」，「所有的歷史解釋都屬於政治的」，「不相信有所謂客觀的學術」、「這是很主觀的，無需討價還價」，口氣的決絕與專斷跟他指責「統派」、「中國學者」不客觀，「為政治目的效勞服務」一般無二，面對這種在同一時期出現卻絕對自相矛盾的論斷，我們除了說他人格分裂、思想錯亂之外，找不到另外的理由。

陳芳明自己願意撕下多年來偽裝客觀、超政治的假面具，露出本相，我們當然歡迎。但只聽罪犯自己坦承犯行還不夠，我們還必須回到犯罪現場重建作案過程，才可以定讞。陳芳明向來以建立左翼的台灣史觀自翊，我們就根據他對日據時期左翼運動史的論述，揭露他不但史學無方，更且缺乏史識，有慚史德，為了服務台獨的教條而武斷史料，逞一偏之見的劣跡惡行。

扭曲台灣歷史製造反中國情緒的台獨史觀

歷史經驗是建構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佔台灣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自大陸移民來台傳承了漢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生活方式與思想意識無不深受中國文化的濡染，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並未根本改變這一事實。台獨搞台灣獨立在台灣內部碰到的最大阻力就是台灣漢人由根深蒂固的漢民族觀念衍生出來的中國意識。因而，台獨要建構「台灣民族」論煽動台灣漢人脫離中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計地歪曲台灣歷史，把台灣說成是中國的「棄地」，台灣人是中國的「棄民」，而中國歷來都對台灣實行殖民統治，藉此加工製造出仇視中國、中國人的「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台獨史觀，不論左、右派，所根據的理論容有不同，但都是圍繞這一主軸展開的。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自不例外。在他所寫的以謝雪紅為中心的台共歷史中，有幾個重點：一「台灣是一個被壓迫的象徵」，台灣人身負「原罪」，不論在台灣的國民黨或在大陸的共產黨統治下都註定要遭受被壓迫的悲慘命運。二、極力吹捧謝雪紅，把她塑造為台獨的「民族鬥士」，「一生都強烈表達了台灣人的反抗精神」，反映了「全體台灣人的命運」，「代表了潔白與火熱…必將是一個不屈的被壓迫者的永遠象徵」。三、最重要的是，盡力切割開台共與中共的關係，強調台共是日共的台灣民族支部，與中共處於平行、獨立、自主的地位，中共非但無助於台共的發展反而破壞第三國際「一國一黨」的原則，力圖控制台共、「篡奪」領導權，於是造成台共分裂，導致台共組織遭日本總督府摧毀。換句話說，中共成了台共在日據時期未成氣候乃至潰散瓦解的罪魁禍首。而謝雪紅才是台共的正統領導中心，代表了與中共對立的親日路線，從而成為中共批鬥謝雪紅的根源。這些說法究竟是根據可靠證據得來的合理論斷？還是政治偏見加上不學無識的謬妄之言？我們不妨好好加以檢視一番。

歷史研究的基本精神是「求真」，但在歷史研究中，罕見有完備無缺的材料可供

採用，有關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資料，常因證據湮沒竟或根本沒有留下記錄而出現斷裂、罅隙，而涉及現實政治者，更往往因檔案封存、尚未解密或當事人出於主客觀因素未公佈本身證言，致使史料嚴重不足。因此，史家撰寫歷史重建一去不復返的「過去」時，不免要依據殘缺的材料，做一定程度的推斷。以補足歷史的空隙。但史學的戒律要求，從事這種推斷。試圖建構歷史圖像時，切忌任意、武斷，必須秉持嚴謹、審慎的態度，做到孔老夫子所說的：「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換句話說，史料越是有限，就越能檢測出史學功力的高下，史德與心術的優劣。只要歷史工作者態度嚴肅認真，有合乎邏輯的思考，精通史學方法，具備博洽的歷史與社會科學知識，即使在文獻不足徵的情況下，也常能由新出土的材料或尚存於世的當事人證明其所測繪出的圖像符合真相或雖不中亦不遠。反之，受強烈的黨派成見或主觀好惡所左右而寫出的「歷史」，一旦檔案解密或散佚失落的材料重見天日，乃至當事人現身發言，虛構的神話必不攻自破，登時暴露撰述者違理害真的醜行。

台共為何提出「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主張！

陳芳明會費心廣搜史料撰述日據時代的台灣左翼運動史，主要是受他的台灣史啓蒙導師史明影響。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政治綱領提出了「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主張，史明見之欣然色喜，主觀唯心地加以曲解、挪用，據以為台獨左派「台灣民族」論與「台灣獨立」論的張本。台共的政治主張必須放在日據時期具體的歷史背景與時空條件下，才能明瞭其真實涵義。首先，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民的直接對立面是統治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台灣獨立當然是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鎖鏈枷鎖。再者，台灣人民不論是漢人或原住民都不屬於日本大和民族。根據第三共產國際民族與殖民地綱領，台灣人民以「台灣民族」的身份要求民族獨立與殖民地的解放是天經地義的。最後，中國本身積弱不振，也正遭逢包括日本帝國主義在內的國際帝國主義的侵凌、壓迫，國勢凌夷，並無餘力要求收復台灣，僅能暗地協助(註2)。依據當時的國際形勢，鼓勵台灣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獨立解放，可以大大削弱日本的國力，有利於中國對抗日本的侵侮。此所以不論國民黨或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前都支持台灣的獨立運動，而在抗戰勝利後又都立即力主收復台灣。這中間沒有什麼矛盾之處，反而是基於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恢復中國完整主權的一貫政策。左右派台獨根本不了解這樣的歷史背景與時空條件，自以為聰明地質疑國共兩黨對台灣問題的主張前後矛盾，徒見其淺薄無識。台共的領導幹部蘇新在1980年有《關於「台獨」問題》一文批駁台獨對台共「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主張的曲解。他說：

我們這裡說的「台灣民族」，指的是居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和「高山族」，並

不是指別的什麼「台灣民族」。因為世界各民族中，不論是政治學上，或人類學上，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台灣民族」這個名詞。……當時的所謂「獨立」，當然是指「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自己成為「獨立的國家」。當年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任何殖民地的革命鬥爭都是採取這種方針的。……至於台灣能不能歸還中國，什麼時候歸還中國，那是中國革命成功以後的事情。但思想上是有「台灣歸還中國」的準備。……至於「台獨」人士利用舊台共的綱領來為它的「台灣民族論」和「台獨」運動辯護，這是對歷史的歪曲。舊台共的「台灣獨立」的政治綱領，是根據當時的台灣社會的具體情形制定的。當時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所以把反對日本統治的革命運動說是台灣的民族獨立運動，是「名正言順」的。

「台獨」各派有一個共同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國民黨人當作外來的異民族侵略者，把大陸的人稱為「中國人」、「中國民族」、「中華民族」，把原來的台灣人稱為「台灣民族」，故意製造一種民族矛盾，把台灣的革命鬥爭說成是「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獨立運動」。（蘇新 1983：263-267）

蘇新的這些說明很透徹地闡明了台共當時提出「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緣由。曾任台共第一屆中央委員的莊春火也在1988年5月29日由「台灣史研究會」舉辦的「台灣抗日運動與台灣獨立主張」的演講會上表示，當時的第三國際決定，殖民地的各民族應該獨立，因此台共遂站在漢民族的立場，主張台灣獨立，這與現在的台獨主張大不相同（《聯合晚報》，1988.5.29.另參見：莊春火 1988）。

史明引謝雪紅為同道

史明罔顧這些歷史脈絡並利用謝雪紅受到中共批判、整肅的遭遇，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中刻意凸出謝雪紅在台共的地位，把謝雪紅說成代表日共台灣民族支部的勢力與企圖篡奪台共黨權的中共系統對抗，並曲意迴護謝雪紅的政治錯誤（史明1980：592-593）。揆其目的不外強調台共相對於中共的獨立性與台共、中共之間的對立，藉此彰顯台獨左派上承謝雪紅為代表的台共，也獨立於中共並與中共對抗的立場。史明的忠實信徒陳芳明撰述的日據時期左翼運動史大體上是循此基調進行，並以更為激越的情緒，大加發揮。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由於台共的主要領導幹部或亡故或於二二八事變後居停大陸，個人撰寫的自傳、回憶錄又大多未公開發表，故而台共可供研究的直接史料除了輯錄於日本《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文件與審訊口供外，為數不多。尤其關鍵人物謝雪紅完整的自傳久未面世，更是研究台共的一大障礙。陳芳明為了宣揚台獨史觀，在史料極為殘缺的情況下，依靠《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蘇新的自傳與回憶錄、日共成員的回憶文字與台共幹部親朋故舊的悼念文章，口述記錄，大膽寫起了

《謝雪紅評傳》與相關的台共歷史。本來陳芳明如果抱持清朝考證學家崔述所說的嚴謹態度：「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以他所網羅採挾的豐富材料，也可以寫出接近實際情況的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然而，在滿腔激情的台獨狂熱下，他只顧醜詆中共，發洩反中國的情緒，根本無法冷靜地分析材料。小心求證，加以所學不精，沒有搞好史學方法，故而屢見睜眼說瞎話，肆意曲解材料，不遺餘力地吹捧謝雪紅，為謝雪紅曲筆迴護，上粧抹彩，把她打扮成聖潔的台灣民族女英雄，甚至譽為「世界性的領導者」。

不過，對陳芳明來說，很不幸的是，由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的謝雪紅長篇自傳《我的半生記》，被楊克煌的女兒楊翠華從大陸取得，並於1997年12月在台北出版了。書中披露的謝雪紅個人經歷與台共歷史徹底摧毀了陳芳明依據史明的台獨偏見所虛構的神話。

是誰企圖以主觀意志改變客觀史實？

前面已經提到，陳芳明撰寫台共歷史念茲在茲的就是要證明：台共與中共是平起平坐的，而中共只圖篡奪台共的領導權，對台共非徒無助而又害之。他自述研究台灣左翼史的動機時說：

北京的決策者，有計劃、有系統地對台灣文學、台灣史學建構一套周密的歷史解釋。中國學者在採取左派觀點，分析台灣歷史過程中的政經結構，企圖剔除台灣與中國社會之間的歧異史實，而刻意強調兩個社會有同質性格，並進一步聯繫到「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北京對台政策。以研究台灣共產黨史為例，中國學者既解釋台灣左翼受中共的領導，又宣稱台共的成立係中共一手扶持。在這樣的解釋裡，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史觀是僵硬地套用在台灣歷史之上。中國學者的研究，全然不符史實，並且也非常違背學術的紀律。面對如此嚴重的錯誤，台灣對於左翼史的研究是不能不及時著手進行的。只有在確立台灣本身的史觀之後，才有可能批駁來自中國的挑戰。

第二，由於島內思想與言論尺度的放寬，台灣的統派學者終於不再掩飾他們對北京政權的靠攏。在教條的政治信仰指導下，他們也採取一種貌似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台灣歷史。基本上，在這方面的研究，「統」的味道遠遠超過「左」的解釋精神，政治氣息則高高凌駕於學術訓練之上。統派歷史解的重點，無非是呼應北京對台政策。依照那樣的史觀，台灣的左翼運動幾乎就是中國革命的下游，台灣社會簡直是依附中國的陰影而成長的。中共地位受到無上的尊崇，凡不利於北京的史實都受到精心的掩蓋與擦拭，台灣歷史人物如果受到肯定的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有自主性的理想與行動，反而是由於中共的支配與指揮。台灣左翼史在這種摧殘式的拼湊之下，其面目全非的程度，可謂不堪辨識。統派的歷史解釋，是偽民族主義，也是偽社會主義的；

其真正面目，只不過是為中共的政治目的效勞服務。這種來自台灣內部的輕侮，對左翼史研究所造成的扭曲，並不亞於來自中共的蠻橫解釋。要維護台灣史實的正確性，要保存台灣學術的自尊，左翼史的重建顯然無可拖延。

第四、左翼史研究具有文化批判的意義。……有自主性的殖民地知識份子精神，便是孕育濃厚的抵抗文化與批判文化。台灣左翼運動遺留下來的批判傳統，在後殖民時期的今天仍然寓有高度的暗示。尤其是北京企圖在台構築代理人政權的事實，使台灣知識分子產生自覺，而這樣的自覺與左翼傳統是可以密切結合起來的。「台灣民族」、「台灣獨立」、「台灣革命」的主張，是左翼運動提出來的；面對著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在台統治者的投降心態，這些主張還是帶有強悍的現代性。因此，台灣左翼史的研究，是改造殖民文化時不可偏廢的重要工作。（陳芳明 1998：16-19）

你看，只要說「台灣左翼受中共的領導」，就是把「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史觀僵硬地套用在台灣歷史之上」，就「全然不符史實，並且也非常違背學術的紀律」，「只不過是為中共的政治目的效勞服務」，罪名不小，帽子很大。他更嚴厲地指控中共說：「中共史家對於台共的態度則是予以篡改、扭曲，以便符合北京對台政策的要求。他們最典型的說法，便是再三強調台共是在中共的『直接指導與協助之下』成立的。……蘇新到中國後所寫的自傳，也指出台共在上海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名義誕生。……如此簡單的事實，中共卻一再牽強地要篡改，以便導出『台共接受中共指導』的結論。這種知識暴力正好反映出北京的殖民心態。企圖以主觀意志來改變客觀史實，正是殖民主義的另一種變相表現。」（陳芳明 1998a：255，257）這下是連「殖民主義」的滔天大罪都搬出來了，但到底是誰「企圖以主觀意志來改變客觀史實」，等一下我們就會見分曉。他又說：「一般人都妄加論斷，台灣的抗日運動，是接受中國的領導。這個沒有根據的論調。在戰後沿用了四十餘年，而從謝雪紅的史實裡，我們發現中國是在台灣抗日運動中扯後腿。從她的整個政治生涯，也可發現台灣抗日運動的視野極為開闊，而且也一直是一種自發性、自主性的運動，它不僅沒有被中國領導，反而還去領導中國的抗日運動。」（陳芳明 1998a：187），「曾經身為第三國際指揮下的台共主席，她（按：指謝雪紅）並不認為毛澤東的地位比她高。在第三國際的系統裡，中共與台共的主席，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同上：197）最後，陳芳明給中共與台共的關係下了這樣的論斷：「從謝雪紅的史實來看，中共並沒有對台共有過任何的協助；相反的，它在幕後唆使的奪權運動，使台共偏離第三國際的戰略原則，使台共發生內部分裂，……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後投靠中共不久即受到整肅鬥爭，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偃是她從來就是拒絕中共的領導」（陳芳明 1998a：42），「中共是否助協」台灣人民的殖民地革命？答案很清楚，全然沒有。然而，中共自來出版的有關台灣史書籍，卻再三宣稱給予台共有力的支援與指導。歷

史事實活生生提出了證辭，中共不僅沒有協助，反而對台灣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革命力量處處阻撓，使抗日陣營發生分裂，終而導致台共的覆亡。」(同上：232-233)這些義憤填膺、氣勢洶洶的指控，到底有沒有可靠的根據呢？沒有！用陳芳明的話再說一次，「全然沒有」！

謝雪紅自傳摧毀台獨左派虛構的神話

陳芳明以上的這些看法是根據什麼呢？

原來，他始終認為謝雪紅是二二八事件後才於1948年在香港成為中共黨員的。在此之前，謝雪紅「走的仍然是舊台共的道路。……舊台共一直是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陳芳明 1991b：277)因而與中共頻生磨擦。陳芳明一直認為由中共的台籍黨員翁澤生、蔡孝乾、潘欽信等人組成的「上海大學派」(簡稱「上大派」)在中共中央指使下向謝雪紅代表的日共路線後奪權才造共的內鬩分裂(陳芳明 1991b：86，148-149，191-216；1998：98-119，227-233，248-253)。陳芳明的這些認知完全與歷史事實不符。

實際的情況是怎樣呢？我們來看看謝雪紅自己是怎麼說的：

1925年六月間，由安真、宣中宣兩人介紹我、林木順、陳其昌等幾個台灣青年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記得是林木順代我填表。……1925年七月間，我、林木順、陳其昌三人由杭州調往上海參加「救援會」工作。……我調來上海之後不久，黃中美幾次叫我去「法國公園」或到旅社講話。他幫助我提高對共產黨的認識，鼓勵我爭取入黨，並向我了解我的家庭、出身和經歷等。同年八月間，黃中美到開北我的住處，向我宣佈我已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介紹人就是他。(謝雪紅 1997：170，173，174)

看吧！史明與陳芳明整個對謝雪紅與台共歷史的詮釋，最關鍵的一個立足點，就這樣被謝雪紅的自述徹底摧毀了，由此而建立起來的那些主觀臆造與胡說入道也就如朽木難撐之大廈立時轟然崩塌、灰飛煙滅了！

說來可悲，如果陳芳明不被台獨的狂熱情緒所蒙蔽，能夠以冷靜、清醒的頭腦去分析他辛苦搜集來的豐富史料，原本也不難推斷出這個歷史事實。這可從以下幾點看出：1·陳芳明在探討是誰推薦林木順與謝雪紅到莫斯科留學時，提到「根據日共領袖之一德田球一的回憶錄，謝雪紅乃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台灣支部所推薦」(陳芳明 1998a：55)；2·陳芳明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已知在1924、1925年之間「可以確信的是，林木順在這段時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上：53)，其實這就可以

合理的推測，與林木順關係密切，同在上海大學就學，又一齊被選送莫斯科受幹部訓練的謝雪紅也有中共黨員的身份；3·在《謝雪紅評傳》中，陳芳明又引述謝雪紅親信周明的話說：「一九四六年底蔡孝乾到台中找謝雪紅，當時謝要求恢復黨籍」（陳芳明 1991b：275），既謂之「恢復」黨籍，即表示先前已具備黨員身份。這種種跡象都可以合理推測謝雪紅早在進莫斯科東方大學前已加入中共，而謝之得入東方大學也是中共推薦的。請看謝雪紅的自白：

1925年10月間，黃中美同時向我、林木順和林仲梓三人宣佈黨命我們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他說黨派我們赴蘇學習是為了培養幹部，考慮將來幫助台灣的同志在台建黨。（謝雪紅 1997：183）

這不是很清楚了嗎？不但謝雪紅、林木順是中共選派赴蘇聯學習的，而且還「是為了培養幹部，考慮將來幫助台灣的同志在台建黨」。

可笑的是，陳芳明自己被台獨魔障所惑，無法合理的推斷謝雪紅早年即已加入中共也就罷了，當中共中央在1986年9月15日為謝雪紅舉行骨灰移放儀式上發表〈謝雪紅同志生平〉總結對她一生的評價中提到謝雪紅「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陳芳明竟然還幼稚地質問：「文中提及，謝雪紅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就是很不實際的一種寫法。中共與台盟人士，有什麼證據可以顯示她在這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陳芳明 1991b：107）

中共有沒有指導台共？

正是由於史明與陳芳明不知道謝雪紅早在1925年即是中共黨員這一事實，他們無視既有材料中早已明白顯示台共與中共關係密切的現實，虛構出謝雪紅堅持「台灣民族」論與「台灣獨立」、謝雪紅領導的台共與中共對抗，以及中共中央企圖篡奪台共黨權的故事。陳芳明一再譴責中共史家所說的台共是在中共的「直接指導與協助之下」成立的。然而，這個事實並不是中共史家憑空捏造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就明白引述了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台灣共產黨暫時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之名義組黨」、「日本共產黨目前因為選舉鬥爭而忙碌，有關組黨事宜應請求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王乃信等譯 1989：9）。史明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中引述這段文字（史明 1980：576），就連陳芳明自己也在《謝雪紅評傳》中加以引用（陳芳明 1991：88）。可是，在同書中以及述及台共的文章裡，陳芳明卻不斷否認中共「援助指導」台共，痛斥中共「棄史實於不顧」、「一再牽強地要篡改」，是「知識暴力的橫行」，甚至扣上「殖民心態」、「正是殖民主義的另一種變相表現」的大帽子。我們說陳芳明睜眼說瞎話，肆意曲解史料，絕非過當之辭。

中共不但在台共建黨時受託「援助及指導」台共。在1929年4月16日日共遭日本當局大逮捕而癱瘓之後，台共無法再與日共聯繫接受領導，第三國際遂委由東方局通過中共領導台共的工作。《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所收錄的謝雪紅口供就說：

黨成立十日後，於上海有數名黨員遭受檢舉，致與日本共產黨的連繫斷絕，同年八月林日高為恢復連絡而上京。翌年四月發生所謂的四·一六事件，致連絡再次中斷，其後直接連絡的希望更是渺茫。因而企圖透過翁澤生與中國共產黨連絡，……此間，我數次向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或國際東方局提出報告，……（王乃信等譯 1989：125，128 - 129）

同書收錄的翁澤生供詞又說謝雪紅在台共發生權力鬥爭後，

阿女（按：即謝雪紅本名）向中共中央部上訴……其後連續地以同一旨趣的報告呈上中央。中共方面亦認為有調查的必要，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旬，中共中央員會的組織部長就上述各點審問過我。……接著於同年五月重被交付中共審查委員會……（同上：132）

台共的內訌鬧到中共中央去要求調查、裁奪，這不是領導關係又是什麼？

對於台共與日共、中共、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曾任台共第二屆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的蘇新在1981年所寫的〈台灣共產黨的歷史〉一文中有很好的說明：

台灣共產黨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具體地說，即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從誕生到消亡），在台灣出現的怪物。說它是怪物，是因為它是三不像的東西。

第一，它成立時，是作為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叫「台灣民族支部」），組織上（名義上）屬於日共，但是，日共從來就沒有有效地領導過它。

第二，它成立後，由於日共遭到大破壞（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分別叫做「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台共與日共的關係被切斷，因此，台共的領導機構，不得不通過台胞的中共黨員（翁澤生等），求助於中共中央。因此，台共雖然與中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思想上、政治上，比較多地得到中共中央很大的領導。

第三，一九三一年二月間，第三國際東方局派人到台灣，召開台灣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台共就名義上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的支部，但是，實際上是通過中共中央，接受東方局的領導的，因為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是瞿秋白，第三國際東方局負責人也是瞿秋白。

總之，台灣共產黨，成立當時是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但是，思想上，政治上受中共的影響較大。

說它是日共的一個支部，不像；

說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不像；

說它是中共的一部分，但又沒有組織關係，也不像。

所以，我說它是「三不像」的怪物。（蘇新 1993：128 - 129）

蘇新這篇未完稿與其自傳、回憶錄一起收在《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裡，陳芳明引用蘇新的自傳中所言，台共是日共系統來痛斥中共「篡改」史實，而同一本本文中對台共歷史的敘述，卻因與其論調相背，即視而不見，這算那門子史學方法？我們說他武斷材料，無視反證，洵非過份。

謝雪紅為何眾叛親離？

史明與陳芳明將台共「改革同盟」開除謝雪紅黨籍奪取領導權的內訌歸因於台共「上大派」奉中共中央之命剷除日共系統的謝雪紅，完全是出於台獨偏見的曲解。這種說法之站不住腳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論謝雪紅即是中共黨員的事實，單從謝雪紅本身就讀上海大學，而本為日共黨員的蘇新與農民組合的趙港等人與中共並無淵源，卻也群起而反對謝雪紅，使謝陷於四面楚歌、孤立無援中，就可得知所謂中共的「上大派」與日共系統的謝雪紅對立這種分類法是粗糙不堪，難以說明問題的。其實，《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對台共內鬥的觀察是頗為深中肯綮的：

蓋阿女與改革同盟一派造成對立的原因，主要基於對客觀形勢的認識不同，以致對黨戰術的見解引起差異。惟其久久在在不活潑狀態下採閉門主義，徒以神秘殿堂將黨包藏，一味壟斷黨的權力，阿女此等性格與女性特有的傾向，使黨員產生反感與不滿，加以種種感情因素似乎也有存在，終至演變成內訌，彼此除名，積極的互相排擊鬥爭。（王乃信等譯 1989：124）

然而，陳芳明對謝雪紅的壟斷權力與專橫卻拿出女性主義來為她迴護說：「謝雪紅處在女性受到歧視的時代裡，……她為了對抗男性沙文主義，處理組織的方式也許也不能不有過度的反應。這些因素應該考慮進去，才能知道她在當時之所以被孤立的理由。」（陳芳明 1991：202）這番開脫的話可謂用心良苦。然而，不管出於什麼原因，身為革命組織的領導者，只要不能團結人以集合眾人之力戰勝敵人，那就會危害大局，就是不適任，就該下台。其實，何只革命組織、政治團體不容許這種現象長期存在，任何一個民眾團體，只要想發展也不會容許其理至明。謝雪紅的跋扈、暴烈性

格在多項資料中都有所反映。陳芳明目己就引述了謝雪紅東方大學的同學、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夫人楊子烈的描述說：「她對『表弟』（按：即林木順）是很嚴厲的，動輒咬牙切齒用台語斥罵。中國男女同志看不慣她那驕橫樣，言語之間，對她不免有些諷刺，但她個性倔強，仍罵如故。…見她橫眉怒目，聲調高亢，知道她又發了雌威。大家都討厭她，奇怪的是她那位臉黃身瘦的『表弟』始終一聲不響，異常馴服。」（陳芳明 1991：72）這裡所呈現的簡直是「女性沙文主義」了。前台共中央委員莊春火也指出謝雪紅以「蠻橫」的方式奪了台共書記林日高的權（莊春火 1988）。

謝雪紅到大陸後之所以遭受批判、整肅，除了她的地方主義傾向與個人英雄主義之外，還有個原因就是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時，專權跋扈，妒賢嫉能，搞「家長作風」，多次誣陷同志是「國民黨特務」、「叛徒」，致使多人久久難以翻身。主要受害人之一就是蘇新。蘇新來本極受中共中央重視，1950年周恩來原打算起用蘇新任外交部日本科科長，卻遭謝雪紅誣指在日據時期是台共「叛徒」，使得蘇新不再受中共信任，過了三十年暗淡的生涯。對此蘇新晚年憤恨不平地說：「可惜出任日本科科長的事，因謝雪紅極力反對而不成。對這點，她大概是驚（怕），她沒有本事，她一個女孩子，也無讀冊（唸書），也無受什麼教育，在工作能力、專業方面要勝過我，當然是不可能。」（蘇新 1993：91）蘇新所言確實道中了謝雪紅的心態。謝雪紅由於本身能力與地位不相稱而產生的自卑、自憐心理在她的自傳裡也有所表達：

有很長時期人們都以為我是個知識份子，卻不知我是個文化水平很低、不會寫字的人。這件事常令我心中產生矛盾；每當我被組織提拔得越高時，我就越擔心自己的低文化和高職位不相稱，以致於越想要盡力掩蓋自己文化低的事實，唯恐暴露了這個事實會辜負組織對我的器重和提拔。在東京的時期，許多工作，特別是抄寫工作都是林木順替我做的，而上級領導卻又偏要重用我，我就擔心不能完成任務。一些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每因知道我文化低的事實，就開始歧視我、蔑視我、不服我、排斥我，以至於侮辱我，我一輩子吃了不少這樣的虧。（謝雪紅 1997：235）

史學敗類的醜行

謝雪紅對台共的「改革同盟」成員如王萬得、蕭來福、蘇新三人奪取她對台共領導權的事一生銜恨在心，在她於大陸得勢時，毫不留情地打擊報復，誣告陷害，就連夙無冤仇的人僅因提了逆耳之言也捏造不實罪名，橫加栽誣（葉紀東 2000：116 - 121）。面對大量指控謝雪紅的材料，陳芳明不敢否認謝雪紅的犯行，但他卻曲筆為其迴護說，那是在宗派鬥爭中不得已而為之的自衛反擊，然後又歸咎於中共的「誣告制度」（陳芳明 1991b：578 - 579）。然而，蘇新、蕭來福等人都是在「台盟」內部

尙未發生宗派鬥爭之前就被謝雪紅誣陷，而葉紀東本來是謝雪紅想拉攏的人，也被謝雪紅誣告了，這是主動出擊而不是自衛反擊。至於歸咎於什麼「誣告制度」，那麼1997年11月5日台獨先覺彭明敏公開造謠構陷當時主張三通的民進黨主席許信良在1984年向中共要求資助，且於當上黨主席後前往中國駐日大使館報到，這又是什麼「誣告制度」造成的呢？

本來，撰寫歷史的基本態度應該是清朝史學家章學誠所說的：「聞見互參而窮虛實之致，瑕瑜不掩而盡抑揚之能。」然而，陳芳明所寫的台灣歷史在台獨教條的指導下，卻充斥著唐朝史學家所指斥的「醜行」：「舞詞弄札，飾非文過…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這種史學敗類，我們還是用劉知幾的話給予定論最為恰當：「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註(1)

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每個人一出生就被「拋擲」進入他無可選擇的世界，在成長過程中深深浸潤於其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社會生活中，形成其基本價值觀與偏好，從而構成其存在的基礎。加達默爾承襲海德格這個存在本體論的觀點，發展出他的詮釋學理論。他提出effective history的概念，揭示歷史傳統深植於每個人的意識中，形成根深蒂固、無法拋棄的「偏見」，構成了人存在的基礎。因此，歷史並不只是「過去」的事，而是對每個人當前的處境仍舊產生根本的影響，故曰effective history（即對當前仍有作用的歷史）。持此觀點，加達默爾既反對強調歷史客觀性的蘭克派史學，也反對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與狄爾泰（Dilthey）所主張的，用體驗、移情神會（empathy）的方法去理解歷史文本以掌握、重建作者真正意圖的傳統詮釋學方法。加達默爾一反傳統歷史詮釋的看法，認為詮釋者詮釋文本時，不是要力求消除本身無可避免的「偏見」，相反，應該正視歷史傳統構成的既定偏見，用這種偏見形成的當前「視域」（horizon）與過去的文本的視域，在閱讀、詮釋的過程中對話、交融，經過辨證的綜合形成一個更高更新的視域。換句話說，詮釋的理解不是重建過去而是把過去的意義依據當前的情境加以「翻譯」、因此，由過去的歷史傳統形成的「偏見」不是有礙理解歷史文本的消極因素，而是具有創造性的積極因素。路況把effective history譯為「時效性歷史」，誤解成古為今用、著眼於現實作用的歷史。他說：

所謂「時效性歷史」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時效性」內容？如果說歷史的「真相」是指過去存在過的「真人事實」，「時效性歷史」貼可說是根據這「真

人實事」所改編的足以啟發現實人心的「歷史／故事」(hi / story)。「歷史」從「開始就是這樣一種「雙重書寫」，它一方面必須迴溯過去發生的「真人實事」，力求逼真客觀的報導分析，一方面又必須透過這些「真人實事」編撰塑造出史詩演義式的情節動作與戲劇主體。歷史的書寫不只是述說：「歷史上的『誰』如何如何」，它更要宣稱：「你應該取法認同歷史上的『誰』如何如何」。

這顯然已非加達默爾原意，而是後現代史學的觀點了。

(註2)

葉榮鐘寫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第一章中提到，「祖國派」的台灣抗日領袖林獻堂1913年到北京造訪梁啟超請教抗日之道，梁啟超告以三十年內中國無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對日本不可力敵，只能效法愛爾蘭人抗英之法，先求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也在同年告訴前往痛陳台人處境慘狀的甘得中，中國內亂方殷，十年之內無法幫助台人。這都說明中國非無心收復台灣，而是力有未逮。只有知道這個背景，才能理解何以懷抱中國民族主義，深受國民黨影響的台灣青年張深切等人卻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從事「台灣獨立」的革命運動。台獨昧於當時的歷史環境，每見「台灣獨立」之名即引為同調，用以證明台獨有其歷史根源，實屬可笑之至。

參考書目舉要：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自由時代周刊社

陳芳明(1988)《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台北：敦理

- (1989)《鞭傷之島》，台北，自立。

- (1991)〈七〇年代台灣文學史導論〉，《現代學術研究專刊4》，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1991b)《謝雪紅評傳》，台北：前衛

- (1995)〈百年來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中外文學》第273期，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

- (1998a)《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

- (1998b)《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台北：麥田

- (1992)《探索台灣史觀》，台北：自立。
- (1999)〈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第178期
- (2000a)〈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聯合文學》，第190期
- (2000b)〈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聯合文學》，第192期
- (2000c)〈後現代或後殖民〉，收於周英雄、劉紀惠編《書寫台灣》，台北：麥田。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1997)《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楊克煌之女)出版。

蘇新(1993)《未歸的台共魂》，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葉紀東(2000)《海峽兩岸皆我祖鄉》，台北：人間。

莊春火(1988)〈我與日據時期的台共〉，台北：《五月評論》，第二期。

王乃信等譯(1989)《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即：《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中譯本】，台北：創造出版社。

Alchusser(1971) Lenin and Philesophy and Other Fsk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Aschcroft, Bill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Fe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Ed. By Colin Gorde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Hutchen, L. (1989) circling the Downspout of Empire, Ariel 20(4).

Lyetard Jean-Francois(1984)The postmodern Ce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onnesota Press.

-(1993)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Jenkins, K. (1991) RethingKing History. London:Routledge.

Gandhi. L. (1998) Postcolonism Theory

Fanon, F (1990)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Bhabha, H. (198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編輯報告

近來，國際與國內的政經情勢，正在起著深刻變化，深值所有左翼朋友密切注意。

首先，繼去年年底企圖修改勞動工時，將兩周八四工時延長為每周四十四小時遭到挫敗後，民進黨政府現又計畫對勞動三法提出修正案，以瓦解台灣的工會組織，削弱勞工對抗資方的力量。由於此次修改內容充滿著自由化與彈性化的新右派（新自由主義）精神，因此引起許多工運團體的不滿，並在最近對勞委會進行一連串的示威與批判，不過，新政府完全不受這些抗議聲音的影響，仍然一意孤行，強行要將三法送立法院修正通過。勞動三法修改內容具有高度專業性，其中處處充滿陷阱，一般勞動大眾根本無法了解法案改惡會對大家產生何種影響。因此，我們特別刊出熟悉勞動法律的張大元〈評析勞動三法改惡〉，除了一一列舉勞委會擬議中修改的勞動三法各條文所隱含對勞工的不利之處，並藉此揭露民進黨親資反勞的真面目。范國棟〈全球醫療事業勞工罷工的啓示〉，則具體的分析勞委會修改的勞動三法對於醫事人員面對勞資爭議時所受到的限制。

其次，國際局勢也似日益險惡，美國偵察機與中國大陸軍機發生擦撞所引發的風波還在發酵中。美國的蠻橫作法在國際間雖引起許多批評，但美國政府不但有所節制，反而一再升高中美之間的對抗，從布希總統上台以後所強調的右翼保守政策，正在進一步形塑出一股新的冷戰氛圍。如果新冷戰體系真的形成，無疑對於全世界與台灣社會朝向一個進步的方向發展將構成嚴重的打擊。面對美國的打壓，中國應該如何自處？韓德強〈中國怕制裁嗎？〉，這篇於四月十日撞機事件尚未落幕前完稿的文章強調，中國不要害怕美國制裁，因為制裁對中國是利大於弊。中國反而應該趁此機會，退出WTO，走一條獨立自主的道路。可惜四月十日以後的事態發展顯示，誠如韓德強所言：「看來，中國這次又準備『習慣性軟弱』了」。

林深靖〈卡維波，左派裝可愛？〉，是對左翼過去兩期刊載的卡維波〈青春睿智的左派？陳年痴呆的左派？〉一文的回應，他不同意像他這樣的傳統左翼是脫離商品消費與通俗文化之外，只是不願「陷」在其中。同時，他也提出警語：過度強調青春、流行，反而可能走向民粹、媚俗的方向。

鄭國棟〈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下）〉，透過對陳芳明所撰寫的《謝雪紅評傳》等著作的批判，繼續揭露陳芳明在馬克思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理論上的無知。

國際情勢的變化，目前是我們無法掌握的，但在經濟長期不景氣正在來臨之際，團結台灣內部進步力量，制止右翼政治勢力與資本勾結迫害勞動大眾，卻是我們立即可以進行的迫切任務。

左翼 第十八號

出版日期：2001年4月30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十九號



〈民兵〉

作者：波塞（古巴）

變本加厲，哪來輪替？——阿扁就職週年的一些聯想

劉鳴生 / 2

【勞動評論】抗爭年餘 終獲勝利

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小組 / 5

資本全球流動下的勞工權益與勞工連結

蔡志杰 / 6

批判勞委會有關縮短工時的解釋

關工韻 / 7

一盞寒泉薦秋菊，羅紗憑欄空悲切——關於工資的說明

夜讀五車書 / 8

民族凝聚力的探索

林書揚 / 11

【爭鳴與求是】反卡維波論述提綱

汪立峽 / 16

質疑對蘇聯解體與“和平演變”的評論

小堡佬 / 22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一〉

黃志龍 / 24

變本加厲，哪來輪替？

—— 阿扁就職週年的一些聯想

劉鳴生

陳水扁就職總統週年前夕，《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一書推出，媒體上風風火火，大事炒作，使得五二〇的意義，與其說是阿扁就職一週年的紀念，不如說是李登輝退職一週年的懷念。

本源一體，並無二致

該書開卷第一篇即是陳水扁的序文，以極盡頌德歌功的華麗字句，表述輝、扁之間，「本源一體，並無二致」，刻意坐實兩人之間的繼承關係，共同分享「順利通過政權輪替的關鍵考驗，一舉攀登世界民主潮流的高峰」的歷史光環與普世榮耀，「為我國民主體制樹立不朽典範」。

弔詭的是，既然如此強調兩人之間的傳承關係，強調決策和施政風格的一貫性與一致性，那麼，前後政權之間，究竟是什麼被「輪替」了？

難道，整個台灣社會全面動員、集體發燒的總統大選，就只是為了列寧所說的：把軍事官僚國家機器，從一些人的手裡轉到另一些人的手裡？李登輝和陳水扁二人一再矜誇發生在 2000 年的政權轉移是如何了不起的豐功偉業，如何「開拓了國家的新格局與新境界」，「為我國民主體制樹立不朽典範」。然而，我們不得不質問：如果一個社會並沒有因為政權的變換而獲得更新，如果長期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在政權易手之後是換為被壓迫、被剝削，那麼，當權者憑什麼向我們誇耀、賣弄他們彼此之間相互「輪替」的功績？

我們都知道，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是：政府建立在人民的參與之上；由於直接民主在當代民族國家的架構下有其執行的困難，因此，代議民主成為普遍的政體形式。代議民主是假設：公民意志的表達和實現，是透過人民當中選出的代表來執行。然而，早在 18 世紀，盧騷（J.-J. Rousseau）就已指出，將自己的權力交付給代表，等於是人民讓渡出他的自由，因為無法保證代表的意志一定忠實於總體的意志。20 世紀有關代議民主的實證研究（譬如 Carre de Malberg）也發現代議制度中「騙取民主」的普遍現象，亦即，一批選舉產生的寡頭，取代了人民主權，許多國家因此形成

所謂「寡頭鐵律」的現象。

當代民主的最大敵人，不是專制獨裁，而是當選者對權 / 利的集體壟斷。在台灣，要回到兩蔣的威權統治模式，人民已不可能答應；但是，輝、扁體制下，一個日漸具體化、結晶化的權 / 利壟斷集團，卻是以「民主」、「輪替」的高亢頌歌掩蓋了人民的耳目。

印證「寡頭鐵律」的現實

代議民主的一個陷阱是：民主政治原則上是要求候選人和選民的相近似(如此才有「代表」的意義)，然而，事實上，當選的卻絕大部分是與一般人民有重大區隔者(職業政客、政治世家、資本金融集團代理人……)。台灣由於長期缺乏左、右思維，候選人的政治光譜極為狹窄，選民的選擇更為有限。候選人儘管面貌不同，其思維方式、政策取向，甚至背後金主，都可能是「本源一體，並無二致」。一場勞師動種的選舉，也許權力的位置上換了屁股，充其量只不過是高層的「換班」，哪稱得上是「輪替」？

在歐洲的老牌民主國家，政黨的區隔習慣性地以左、右為分野，因此，政黨的輪替(alternance)常是意味著政策的重大轉折。譬如，今年法國媒體出現大量回顧20年前政黨輪替的文章：1981年5月，密特朗所帶領的「左翼聯盟」擊敗右翼候選人季斯卡，入主艾利樹宮總統府。當時，整個法國社會開展了一場既深且廣的政策辯論，包括重要工業集團和銀行的國有化、電視公共化、地下電台合法化、公共教育普及化和非宗教化、廢除死刑、國家圖書館和美術館等重大工程的投入……這些明文記載於《左翼共同綱領》(社會黨與共產黨協商擬定)的政策，無一不與過去的右翼政權做出鮮明區隔，新政權即代表著新思維，選民的投票明顯標示對政策的取捨。哪像台灣，名為「政黨輪替」，事實上是：新政權公然宣稱他是前朝舊人的忠實繼承者，在施政上，我們這一年來所看到的，也無非是舊體制舊思維的變本加厲，選民究竟決定了什麼？

李登輝接下蔣經國的位置之後，在「民主化」的同時，已積極在台灣社會進行以勢力和財力為判準的整編工作。地方議會的黑金勢力在短時間內大量膨脹，縣市議會的議長、副議長一個個從江湖走向總統府會客室。總統府的主人以高爾夫球場聯繫了商場和政治鬥場，一個權、拳、錢三者交融共生的集團日愈集結壯大，形成一個互通聲息、相互照應的權貴集團。

陳水扁上台後，大老闆或大老闆代理人進一步長驅直入政府部會，紛紛佔據權力

制高點；總統的貼身人馬則向國營事業體延伸，逐漸掌控經濟的命脈。整個權貴階層的同質性越來越高，壟斷的資源越來越龐大。從李登輝到陳水扁，與其說是完成「政權輪替」，不如說是完成權貴集團再生產的機制。也因此，政府決策方向明顯地越來越向資本家傾斜，勞工的權益日愈緊縮，社會中下階層的相對剝奪感越來越深。台灣當權者在高度標舉所謂「人民的力量」的同時，也印證了代議民主政治中「寡頭鐵律」的現實。

對富人是天堂，對窮人是騙局

1989年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崩解之後，美國右翼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書，他將「歷史的終結」定義為「人類意識型態演變的終止，西方自由主義民主成為普世的價值，成為人類政府最終的形式」。翌年，波斯灣戰爭爆發，美國以推動「世界新秩序」為己任，透過絕對的軍事優勢貫徹其霸權意志。台灣的民主化，基本上是這一波「世界新秩序」浪潮下的產物，政權的交遞在美國的監控和護衛下順利完成。九〇年代以來，輝、扁兩位總統先後在美國媒體摘取「民主」的桂冠，他們將美國情治系統在台北的深化鋪設視為安全的指標，以在美國過境和過夜視為最高的榮耀。

事實上，從歷史現實來看，民主的轉型並不是一勞永逸的。近10年來，世界上族群衝突遍地烽火，福山「歷史終結」的天真樂觀早已破產。過去的歷史也告訴我們，民主的浪潮也是可能倒捲的，譬如，在20世紀初年早已享有民主令譽的歐洲國家，義大利在1922年，德國在1933年，先後馴服於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獨裁鐵腕之下。同樣的，在1960年代，一系列軍事政變也快速摧毀了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的民主政體。民主的轉型，越是依靠外來監控機制，就越增加其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代議民主政體的設計與商品經濟分工的需要是息息相關的，然而商品經濟的勝利並不必然民主的確立。商品經濟由於過度重視市場競爭，而忽略了社會公平和分配正義的層面，最後使得民主徒然成為朗朗上口的空洞語言，失去了社會動員的能量。這正是扁政權目前所面臨的重大危機。這一年來，台灣社會從高度亢奮的動員到急速的幻滅，集體性的虛無與消沉可能使政治變革的活力一蹶不振。

在一篇批評考茨基的文章中，列寧寫道：「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這一年來，台灣政局的發展，在我們看來，似乎有意要證實列寧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的詛咒！



抗爭年餘 終獲勝利

年興公司尼加拉瓜正太廠工會與資方正式簽署協定

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小組

五月十日下午五點，台商年興公司尼加拉瓜正太成衣廠的資方與CST工會正式簽署了協議，結束了從2000年四月迄今長達13個月的勞資爭議。

協議中規定，年興公司必須從週一開始恢復四名被非法解雇的工會幹部和十七位會員的職務。其餘的遭解雇的幹部將領到雙倍的法定資遣費和雙倍的爭議期間積欠工資。他們承諾將所領的賠償金的百分之五捐給工會罷工基金以支持未來的組織工作。

過去一年以來，正太廠鬥爭所引發的國際壓力使得另外三個加工出口區工廠（台商如興、兆興和韓商KB國際）的工人順利組織了合法工會，目前還有好幾個工會正在等待法定承認手續的完成。一度面臨存亡關頭的尼加拉瓜工運又復活了起來。

工會幹部們以及他們在尼加拉瓜人權運動中的盟友們表示，無庸置疑地，沒有之前的強大、協調一致、跨部門的國際行動，正太案不可能以工會幹部的復職收場。

美國全國勞工委員會（NLC）表示，我們參與支援年興工人的各國各組織在這個案子中共同學習到了很多，也共同地感到十分自豪。

尼加拉瓜最高法院於4月4日做出史無前例的裁決，認定CST工會從事的是合法合理的勞資爭議行爲，公司解雇幹部與會員的行爲是非法的，因此，年興公司必須讓工會幹部們恢復原職。

然而，年興公司尼加拉瓜總經理黃明偉馬上表示他絕不接受裁決，準備要關廠。年興公司董事長陳榮秋並在台灣發起組織「中南美洲台商協會」希望能在台商之間拉幫結派對付「打壓」。

另一方面，黃明偉四月底在尼國向要求復職的工會幹部提出了原意付他們每人4,500到6,500美元的酬勞，如果他們願意放棄法定的復職權利。年興公司提供的賄賂相當與普通工人3、4年以上的工資，而這些幹部們住在髒污狹小的破爛小屋，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這筆錢無疑是極大的誘惑。然而，這些工會幹部們拒絕了！他們說，他們如果接受了賄賂、犧牲了工人運動的原則和工人階級的尊嚴，將會愧對支持他們這麼久的國際團結行動。

終於，熬過了種種考驗，CST正太工會勝利了。這同時也是我們所有從經參與團結行動的各國工人與各界人士的勝利！

★

資本全球流動下的勞工權益與勞工連結

——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的勞資爭議落幕對我們的啓示

蔡志杰

針對台商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正太廠的勞資爭議，尼加拉瓜首都馬那瓜市上訴法庭於四月四日終審判決，確定了年興在去年五月因勞資爭議而解雇九名工會幹部是非法行爲，要求年興公司無條件恢復其職位，並償付所有積欠工資。這個判決終於使年興公司低頭，五月十日正太廠資方與勞方自主的桑定工會正式簽署了協議，年興必須恢復若干工會幹部及會員的職務，其餘的遭解雇幹部將領到雙倍的法定資遣費和雙倍的爭議期間積欠工資。

這個事件落幕給我們兩點啓示：一、資本流動要遵守國際勞工公約。年興公司的行爲之所以引起爭議，除了勞動條件的低下之外，更重要的是漠視勞工的團結權、集體協商權及爭議權。當正太廠勞方組織自主工會爭取提高勞動條件時，年興資方扶持鬧雞工會與自主工會對抗，只與親資方的工人作工資協商、不理會自主工會，甚至開除自主工會幹部，還停留在台灣戒嚴時期資方的低劣行徑。尼加拉瓜上訴法院的最後判決，終於確認國際公認之勞動三權的神聖不可侵犯。

二、勞工國際連結以抵抗資本全球剝削。1995年九月英國利物浦碼頭工人大罷工，一艘由非工會工人裝載貨物的貨輪「海王星玉號」偷偷出港，國際間碼頭工會爲了聲援利物浦工人，決定抵制這艘貨輪、不幫它卸貨，於是這艘船在北美洲東西岸的各大港口都碰壁而回，越過太平洋到了日本還是吃閉門羹，就這樣在海上流浪好幾年，「海王星玉號」事件是近年來國際勞工連結最著名的一個案例。

隨著資本全球流動、到處尋找最便宜的勞動力，勞工的工作權備受威脅，但勞工也已逐漸明瞭，對抗資本全球流動的最佳方式，唯有國際間的勞工也要團結起來。就年興正太廠案來說，除了當地尼國自主工會的努力之外，在美國及台灣都有勞工團體參與聲援尼國工人的行動，以各種方式對年興公司施加壓力，迫使年興必須正視尼國工人合法應有的權益。國際勞工連結，這是資方不可忽視的力量，更是勞方自己不要忽略的最佳利器。

★

批判勞委會有關縮短工時的解釋

關工韻

去年年底對抗民進黨政府的「捍衛 84 工時鬥爭」，最後以工人的勝利告一段落之後，雖然我們不會天真地認為（兩周）84小時從此將在各個事業場落實，但也總以為如果不能落實，問題也一定會出在：資方利用各種方式違法抵抗／政府兩隻眼都閉著。但出乎意料之外的，問題竟然出在「勞委會」違背立法精神的「法律解釋」。目前的資產階級政府是維護整體資本家利益的這一點，我們不意外，意外的是它連盜亦有道的原則都不守。

今年一月一日起，法定工時縮短了6個小時，也就是休假日從周休一日變為隔周休二日。休假日的擴大，就如同公務員的休假日的擴大一般，理所當然是有給假的擴大。但勞委會為了偏袒資方竟然將縮短工時的6小時解釋為「下班時間」，而非「有給休假」，並且玩弄文字「不得任意減薪」、「6小時加班需支付加班費」。雖然這兩句話不管是分開來看，還是連起來看，都像是沒有問題的樣子。但若再仔細地看，就可以發現「6小時內的加班時間只需支付0.33或0.66倍的加班費」的勞委會解釋。勞委會的意圖是想將工人的加班費大幅縮水，以防止工人的實際工時的縮短。針對勞委會的如此惡行，我們提出以下幾點意見，對勞委會表達強烈的譴責！

一、 勞委會違背誠信原則，推翻自己的前提條件

修法前我們的工時是週休一日，而週休的日子是有給假。這樣的概念在台灣不但有法律作支持，更已經成為社會慣習。因此，從大選前到去年十二月行政院企圖工時翻案的這段期間，不管是勞方還是官方、資方，所有有關工時的爭論：隔週休二日、一週休二日、週休一日半，增加的週休日數，都是以有給假為前提條件的。尤其是勞委會曾提出縮短工時後，全台灣資方一年需增加加班費支出1,776億元的說法（當然這個數字的計算是有意義的），其前提就是增加的週休日數為有給假。因此，勞委會此舉，就好像我們一般在市場談價格，其單位是台幣，已是共識、前提，不需再特別聲明，但待成交後，一方突然說：「我剛才談的價錢，不是台幣，而是美金。」對於勞委會不惜如此卑鄙、無賴，來討資方歡心，我們提出最強烈的譴責！

二、 世界性發明「下班時間」貽笑國際

根據勞委會的解釋，台灣的週工時，從原先的週 48 小時加 8 小時有給休假，變為週 42 小時加 8 小時有給休假加 6 小時「下班時間」；而關於時間與工薪的關係則更分為「無給下班時間」、「6 小時有給下班時間」、有給休假、有給勞動時間。混亂至極，台灣第一。

三、 延長工時，圖利資方

勞委會如此絞盡腦汁，違背共識，自創「下班時間」，爲了就是使所謂「下班時間」的加班費，從原本的1.33、1.66倍，甚至以假日加班計算的2倍工資，降到0.33、0.66，圖利資方。況且原本加班費比照原工資加成計算的目的，在於抑制長時間的勞動，如今，勞委會把6個小時內的加班費降到0.33或0.66，無異於鼓勵長時間勞動。舉例來看，勞若月工資爲三萬，一小時加班費不到42元；若月工資兩萬，一小時加班費不到28元。結果，勞委會口口聲聲說「縮短工時是世界潮流」，但實際上自己卻正在違逆世界潮流。除非勞委會認爲，大幅壓低加班費可使勞工不願意加班，達到降低工時的效果，但是這種看法也和現實中的勞資關係與勞工薪資構成（低薪已經很低使工人需靠加班貼補家用）相差太遠。

四、 加班時數增多，妨礙新的雇用機會，失業問題更加嚴重

對資方來說，每個月可以令每個勞工以超低價格提供26.6小時的加班，在此情況下，資方不可能放棄使用如此廉價的勞力，而增加雇用。另外，與此同理，原本可預期的縮短工時對裁員的抑制效果，也將大打折扣。

五、 只有有給休假，沒有「下班時間」

勞委會之所以有機會用一大堆言詞搞得煙霧迷漫，只是因爲有兩個最簡單的問題被菊花瓣抹掉了。第一，縮短工時本來就不應該減薪，否則就違反了當初勞資政雙方在爭執時所謂「1,770億」等等數字的前提，國際工運兩百年來爭取縮短工時的歷史也完全失去了意義。在英國的學齡兒童即使每天工作十四小時也餓不飽肚子的時代，如果縮短工時要減薪，資方當然很願意縮短工時，因爲工人爲了肚子自己會加班把減少掉的工時補回來。縮短工時意謂著社會整體生活品質的提高，如果減薪就完全失去這方面（以及其他任何一個方面）的意義。第二，所以，一旦縮短工時，如果實際工時仍維持48小時，那麼第43個小時的性質就和原先每日工作八小時中的第9個小時完全一樣，或者就會等於假日加班。★

一盞寒泉薦秋菊，羅紗憑欄空悲切

——關於工資的說明

夜讀五車書

日新時薪變魔術

目前關於工資，在產官學界都習慣一種算法，即認定每月工時就是240小時（每天8小時×30天），但是每週的56小時中，有8小時是有給休假，而實際要工作的

時間是48小時，這種48/8的有給時數，到了縮短工時後，就變成42/14。但是這種看法到了計算時薪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因為以時薪計算的話，做42個小時就是領42小時的錢，老闆不會說「每做42小時，再加領14小時的薪水」，或是「每做3小時，發4小時的薪」。所以一樣的月薪，換算成時薪重說一遍，就會有不同的結果，就好像我們現在拿33元去換一美元，半分鐘後再把一美元換回台幣，結果一定少於33元一樣（這個動作同一天之內做幾百次，就會一毛錢都沒有）。

例如勞委會在訂定基本工資（應稱為最低工資）時，考量的是一般勞工最低限度的生活狀況，但是基本工資以月薪訂出後，就除以240來當作時薪，或除以30來當作日薪。可是，以時薪或日薪計算的話，「有給休假」就會消失，一個以時薪計算的工作者除非連「有給休假」都去「有給上班」（通常在這裡不會有1.33、1.66或2），否則就會連基本工資都領不到，也就是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都達不到。

八小時工作是以第九到第廿四小時的休息為前提

事實上，機器也需要休息和保養，更何況是人。一份月薪工資要照顧的家庭，以及要養活的勞動力，不是只養240小時，而是養720小時。我這八小時的工作，是以我在第九小時到第廿四小時之間的睡眠、帶小孩、看電視、交朋友、上社區大學等等為前提，如果沒有之後十六個小時的種種活動（或不活動），我這八小時也沒辦法好好上班。一份月工資就是要負責這個工人的工作、保養、休息、調劑與產能升級，還有把小孩養大並教育以製造下一代的（技術）工人，一句話，工資是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費用。所以嚴格說來，雖然計算上一個月的支薪時數只有240小時，事實上每天的第九小時到第廿四小時工人仍然在支領薪水，只要勞動契約成立，就要領這一份完整的月薪，至於勞動契約中的正常工時則以勞動基準法為上限。縮短工時是因為生產力的提升使得同樣的質量可以用更少的工時去完成，再上社會的進步，所以在所得不變的情形下，可以增加工人睡覺哄小孩看電視交朋友和學習的時間。

所謂的加班費，是在延長工作時間的情況下，工人要付出比正常工時更大的代價去進行休息和保養（例如，喝更多的維士比），所以應加發更高的工資支付這多出來的費用。現行用月薪除以240來作為1.33、1.66的計算基礎，只是圖個方便；就是要除以720再乘上3.99、4.98也可以。

不要再說「做多少事，領多少錢」、「沒有提供勞務可以不給薪」

有人認為，工資不是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的費用，而是「做多少事，領多少錢」，也就是所謂「勞動成果說」，勞委會間或也會流出這種說法「第四十三小時起沒有提供勞務，當然不用給薪」或「在勞資協商後可以不給薪」。但是，如果工資真的是勞動成果說，那麼工人領到的工資應該是現在的幾倍乃至幾十倍以上，因為一個

事業單位、一間工廠所生產出來的，作為有形或無形的商品所具有的價值，扣掉原料、機器的折舊等等費用，剩下的都是工人做出來的，所以「做多少事，給多少錢」，工人應得的比現在會多更多，最多再扣掉管理、會計、運輸等費用，股東還有地主（如果地是租的）會一毛錢都拿不到（股東做了多少事呢？）。

如果勞委會有意無意間總是會流露出「沒有提供勞務可以不給薪」的說法（這是羅沙小姐和切先生一定會反對的說法），那以後就可能發生罷工沒有錢（現在的修法方向已經打算這麼做了），颱風假沒有錢，選舉假沒有錢，病假沒有錢，春節端午節沒有錢，喪假沒有錢，颱風、選舉、喪病，家裡就不用吃飯，工人只有在提供勞務的時候才實際享有憲法賦予的生存權。最後，主委女士就會發現，其實42/14中的14小時都是「沒有提供勞務的」，從白令海峽到安地列斯山都存在著的「有給休假」就要從美麗之島消失，換成快樂希望的「下班時間」來統治。

0.33，1.33，2.33

但是幸而（或不幸）勞委會還沒走到這種地步，因為「有給休假」到今天還有利用價值，就是所謂的「0.33、0.66」說。勞委會一下說沒提供勞務就不用給薪，一下說第43小時是有給休假（所以已經拿了「1」，只要再拿0.33），什麼時候對資方有利，可以採取完全互相矛盾的說法，（這是愚蠢還是犯罪呢？）。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假日上班的「加倍發給」問題，內政部台內勞字第256453號（73.10.18）解釋令上，如果月薪三萬，即日薪一千，則假日上班，當天工資總共2000還是3000呢？

按照工資是整個月養家活口的費用，或按照「有給休假」的說法，五月十三日星期日，我在家睡覺玩小孩看電影就有錢拿，例如，1000元，這是勞動契約一成立時，就已經放在我口袋裡的；如果這一天還要我來上班，那等於是我要額外付出一天，就好像是五月卅二日一樣，那麼我當然要再拿到這一天（5/32）的日薪1000元，內政部的解釋就到此為止，共兩千元，後來成立的勞委會也延用這個說法，民進黨的、人權鬥士的、羅沙和切的私淑者的勞委會也延用這個說法；可是這個說法忽略了，這一天的工作其實是延長工時，我本來每六天工作就要休息一天，下星期才有力氣和心情繼續上班，現在叫我連第七天都要工作，比上帝創造世界還辛苦，所以這一天本來就應給我更多的工資，例如，加發1000元，就像平常的第九小時要加發0.33倍（共1.33）一樣，這一天我要拿到的是2，也就是2000元。五月卅二日的2000元加上五月十三日星期日的1000元，總共是3000元。同理可證，第43小時應為加發1.33，或者說，總共為2.33。

如果羅沙還在，她一定會這麼說的。

★

民族凝聚力的探索

林書揚

前言

民族是人類的群體生活在進化過程的某一階段上，經多項因素的成熟而達成的一種歷史性共同體。

有關民族的造因，亦即此一共同體的結合要因，非止一端，其中雖也含有血緣、地緣等原屬於自然條件者，更主要的，還是屬於後天的歷史社會因素群。需要留意的一點是，民族的原有自然因素，都已成爲發展中的"揚棄因子"而被融解於後天"社會屬性"之中，不再單獨成爲民族階段特質的決定性因素。這一點是屬於生物學自然種學概念的"人種"、"種族"，與屬於社會科學概念的"民族"之間的重大差別。

民族的形成

如眾所周知，人類在自然屬性方面爲一種群居動物。而動物的群居，不外以血緣與地緣爲最強固的聯結因素，此一階段，群居之人類相較於其他群居動物，其內在關係的單純性，並無甚大差別，等到人類在其維生手段--集體勞動中，腦力因素漸形發達，漸由簡單的本能活動進而爲複合性的、定型、定向性社會活動後，人與其他動物之間的最大界線，才歷史性地被區劃出來。此乃爲人類社會構造的基石--"生產關係"的出現。

生產關係既已存在，則賴其作用而得以把分別存在的各種潛在性生產要素，包括人與物，按序組合。並其組合之產物--各種生存資料，亦得以有序地分配於各成員之間。此一物質的生產關係，遂成爲所有社會中人際關係的永久性基礎。而在此一永續性基礎上面，終能形成一定特色的生活文化體系。至此，一個共同體，由初期偏於客觀因素(地域、語言等)的"自然群體"，通過經濟操作上的現實紐帶的維繫和推動作用，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達成足以產生主觀認同的心理狀態，而進入"民族"的歷史階段。

簡單地說，民族最初乃以自然的血緣地緣團體爲原始起點，因經濟生產力的進步而擴大其結合範圍(空間條件)，並延續其歷史時段(時間條件)，到了具備一定內

涵與特質的文化系統已然完成，成爲群體成員之間普遍的心理狀態與共識的基礎，至此，一個 " 民族 " 於焉產生。

在有關民族的諸項成因中，經濟爲一促成因素，而文化則爲一成就因素。換句話說，如無恆常保障個體聯繫的經濟紐帶的存在，群居的共同體無法維持，文化培育的條件亦無由產生。而如非形成一文化實體，反映出群體的認同感，則此一群體仍未能成爲一自覺的行動統合體，仍未能在世界史中佔取一種影響歷史的流向和面貌的位置。我們之所以在歷史的現階段上重視民族，是因爲此一具有集體意識的共同體，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曲折歷程中，仍能發揮上述的一定作用之緣故。

當我們檢討有關民族的實際構成要因時，不可機械地自囿於概念本身的架構之中，必須在具體的歷史觀下觀察所有民族的演進軌跡。如上面所提的民族的促成因與成就因，乃漫長的形成過程中的共因關係，而不是各自單獨存在的主因。一個自然共同體，固然非通過經濟紐帶的恆常促動，無由產生及培育文化，無由達成民族的存在層次。然而，一旦達成文化實體的民族層次後，即使喪失了有形的經濟紐帶的維繫，基於歷史的慣性原理，只賴文化紐帶仍然可以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維持其原有的心理要素 -- 民族意識，也仍然可以成爲世界史中潛在的意志統合體，不過我們不可將此一文化精神要素加以絕對化，認爲 " 文化在民族永在 "。按之歷史，不具經濟要素的聯繫爲基礎的文化同質性，終將逐漸走上異質化過程，即使原爲一個民族，也遲早難免於分解的命運。

民族的內部結構

經濟既爲民族社會的有形紐帶，質言之，生產關係同時也是民族共同體的基本內在關係。則生產關係中所存在的矛盾，同時也將限制民族利益的整體一致性。具體地說，在階級社會時代，一個民族不易表現爲一純粹的利害共同體，除非遭到異質性特高的外敵無保留的攻擊外，凡在生產關係中的佔有者階級，大多難於貫徹一場生死與共的民族自衛鬥爭。因爲佔有者階級都具有階級自私心態，階級機制也容許其將外來壓力轉嫁於非佔有階級，因而常將階級的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勢高置於民族的文化價值之上，爲前者而犧牲後者，仍然符合佔有者階級的倫理。在這種情況下，對外的民族鬥爭，往往不僅無法降低，反而會加劇內部的階級矛盾。

其次，一個民族內部的佔有階級，也自有它的發展機制。這只要看看近世歐洲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正與近世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過程同軌同步，即可窺出新生產關係中佔有者，對抗舊生產關係中的佔有者的策略佈置。時至現代的帝國主義階段

中，昔年反對封建割據與壓制的民族主義推動者，竟已變成落後民族的新壓迫者。也就是說，目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的佔有者階級，當年面對封建領主的壓迫時，為民族主義的倡議者，但一旦在新生產關係中取代封建領主而躍居為支配者時，則走上了它的對立面，成為受壓迫者的民族主義的對抗體。鑒於佔有者階級對民族立場的如此的雙重性，當我們思考民族問題時，切切不可忽略民族與階級的實際關係的性質。

階級與民族，是經濟與文化範疇的具體化。在個人的現實生活中，經濟的利害被視為直接影響生存的基本問題，而文化的取捨，卻被認為是派生性的生活調適問題。做為行為動機，強弱自有分別，則在社會運動方面，也就有緩急先後了。因而，雖然民族共同體的一般意識反映為個人的民族情感時，即令顯得強烈激昂，但在總體的歷史性作用力方面，仍不能不受該共同體內部階級構造的最終決定。歸根究底，只有民族內部階級矛盾的最後解決，才能為民族共同體的趨一性提供真實的歷史條件。

民族的政治分合

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民族在政治的主權歸屬上不曾經歷分合過程者。

造成民族分合的誘因至為多端，羅貫中雖然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這只是一種直覺式的斷語，事實上，分合現象的原因，未必和政權持續時間的久暫有直接關係。

一個文化實體的民族，與一個政治實體的國家相重疊時，即俗稱之民族國家，在歷史上並不多見。大都是由多種民族構成一個國家，或由一個民族分立或分隸數個國家。這中間的分分合合，雖各有一定導因，或外力所導致者，或內訌所招來者，大抵皆可視為一個民族的內部矛盾激化至於突變的結果。即使誘因屬於外因，也必通過內在結構的變化過程，才足以促成變局。此所謂"外在必須通過內在的門"的道理。

民族在政治上的分合，乃社會事物發展規律下的現象，不全為成員的主觀願望所支配。雖然從民族心理的認同感來論，合為常態，分為變局。然如果顧及社會變遷中的非主觀因素，亦即超個人意志的某種客觀趨勢，則大可不必純由感性立場認定"合"為民族最高之善。"分"為民族絕對之惡。民族畢竟為人類歷史過程中的產物，而非天生註定的人類最高和最後的組合狀態。我們的民族倫理，也必須在具體的世界狀況下，時時做出相對性、合理性的自我定位和自我評估，不應該始終拘泥於某一絕對性的，超歷史的價值觀，自陷於思想的僵化狀態中，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虛心探討分與合的相對合理性，不應抱守一種絕對化的理念幻影。而應在歷

史的客觀趨勢下，尋找該合而合，由不得不分而分的因果脈絡，這樣的認識態度，始可稱為科學的民族倫理。

分合現象的合理基準

然則，此一決定民族分合的客觀而合理的標準為何？亦即賦與民族分合現象一定歷史正當性的根據在哪裡？

鑒於至今為止的歷史檢證，我們不得不確認，在原則上，不論是單一民族社會抑或多元民族社會，若其既存的內在結合形態，與客觀的未來發展原理相一致者，即使原為分裂者亦必趨向統一之局，而原已統一者，其凝聚力必將更趨堅強，與之相反，若其內在結合形態與發展原理相悖者，即使已合者亦必趨向分裂。

所謂"結合形態"，乃指強制性的權力基本結構，主要為國家公器，政治公權的握用和營運方式。而所謂"發展原理"，則意為可使社會實踐力愈形提高，生活內容愈形充裕的整體要素的加速動員系統。換言之，結合形態是在政法等強制系統中"部分"聚成"全體"的方式。而發展原理則指一個結合體做為人類史中的推演單元，不斷自我完善的動力因。如從社會學的見地來看，任何一個民族社會的結合形態，都以基礎的經濟和上層的政法體制的契合為主要架構，而發展原理則以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統一的永久運動為基礎。結合架構主要出於主觀設計，帶有矛盾調和與階級支配的性質。但發展原理的現實推展，卻往往超出一時的主觀反映和主動性操作的範圍，個人一時之間難窺其全貌。

如前所提，近代民族社會每有導因於基本生產關係中的矛盾性質的種種內部對抗，則有關民族整體的發展原理，也常因此類對抗性立場，成員之間難於取得一致的觀點。往往利於甲方者不利於乙方，反之亦然。然而，一個社會能否臻於進步發展，並不全以成員的主觀願望為轉移。今若成員中的甲方屬於既得利益的佔有者，而乙方則僅為勞力的奉獻者，甲方首先憑其所握有之物權，得以運作其巨大的社會權能，乙方卻僅為在甲方驅使下耕耘而無權主動收穫者，則甲方立場自然重視現狀的維持，乙方的立場則必定將未來的發展寄托於現存桎梏的擺脫。在此立場相反的情形下，以甲方為優位的結合原理如果還能提升全社會的生活質量水平，則甲方尚可稱為全體發展原理的階段性代表者。如果以甲方為優位的此一結合原理，不但已顯出難於推動生活質素的進步，反而已帶來停滯甚至倒退，此時，以揚棄而非容忍現存結合方式為立場的乙方，將取代甲方而成為新發展原理的代表者，到此，有關民族分合現象的合理性根據，已呈現在我們眼前。

民族凝聚力的問題

一個民族社會，若其現存結合原理的代表者同時亦為未來發展原理的體現者，則此一社會的內部凝結力必甚強韌，否則在組織衝突的客觀作用下，社會對抗趨於劇烈化，社會痛苦深刻化，有堅持當前結合方式為利者，有因失望與憤懣，另行尋覓新途徑者。在此種動機目標的巨大衝突下，民族意識的認同意義，顯然空虛而無力，前此之文化紐帶必被迫退居次位，而聽任更迫切的政治考慮與經濟算計的指揮。

民族社會的結合原理與發展原理時而吻合，時而相背，本為社會事物變化規則之一，以上所論民族分合問題，尚未落實到現實層面，僅為一單純化的思維公式，只可視為有關民族凝聚力問題的另一角度的探討。

最後，針對民族凝聚力的觀念本身，提出數點意見如後：

一、民族凝聚力，應該是成員間認同感一體感的行為傾向。是個別成員內在自發的求同願望，而不僅僅是政治系統的強制約束下的，外在行為的趨同性。因而凝聚力只可培育，不可強迫。

二、民族凝聚力的培育，不可過度偏於傳統精神價值的強調。因為民族傳統的價值觀，往往以簡單的道德判斷命題揭示，在現實生活的變遷中容易形骸化、空疏化。用之號召群眾，時而產生負面效果，且易使群眾養成表裡不一的雙重精神面貌。

三、民族凝聚力既在民族抑壓時期被強調，亦即，做為抵抗外來壓力或克服對外艱難時的有力反應方式而被重視。因其如此，提倡時應同時注意人類史的廣闊視野，避免陷入自閉心態的民族本位主義。

結語

一個民族社會，只要結構合理，制度適正，個別成員的創造積極性得以充分發揮，則內部凝聚力必能維持不墜。因此，如何培育民族內部的凝聚力，首先應以社會政策的健全發展為前提。否則，即使在宣導上大力突顯歷史的光榮記憶，仍然無法把政法層次的強制聚合，內化為主動自發的，道德意志的認同。

當然，在精神文明建立運動中，民族精神價值仍不失為社會成員的心理紐帶。只要努力將其象徵意義加以活性化、實質化，應該也是一項不容忽視的教育項目。

反卡維波論述提綱

汪立峽

卡維波在《左翼》16號和17號上發表了他反駁林深靖的長文《青春睿智卡維波》一文（見《左翼》第15號）。我猜測對於卡維波這篇長文，恐怕沒幾個人真正從頭至尾，一字不捺的仔細讀過。卡維波到底在說些什麼呢？根據我耐著性子細心披閱的結果，大致而言他說了四個方面：(1)傳統左派只看到資本主義的生產領域，忽視生產過程以外的消費文化領域(2)消費／通俗文化現象並不都是資本家意圖的實現(3)消費／通俗文化領域本身就是戰場，在這裡可以通過想像力和創造力，挪用和轉換商品原來的意義(4)激進社會應該介入，挪用消費／通俗文化的意義，並進一步轉化為政治行動。

本文不打算就卡文的繁瑣論述逐句評論，那種吃力不討好的糾纏混戰，只會讓讀者認為是兩個無聊文人在意氣鬥嘴（儘管我所作的夾批和扎記加起來的字數不會少於卡文）。我只想提綱式的說說我的看法。

卡維波說他撰寫那篇長文的目的是「要丟出一些新的思考資源與論述，提示人們尋找新的抗爭路徑」，既然如此，就讓我們來研究分析一下他是否真的丟出了一些新的思考資源和提示人們尋找到了一條（或某條）新的抗爭路徑？

一、馬克思主義傳統與性政治

卡維波在他的文章中一再攻訐左派（不管是「傳統左派」或「台灣左派」）不懂性政治和年齡政治，似乎只要任何左派沒有像他那樣重視（或正視）消費文化的「挪用」和「抵抗」效應，就是無視于性政治的存在。卡維波這種自以為抓到左派「把柄」的譏評論調，不僅對別人有欠公平而且暴露了自己的知識傲慢。

任何的約略涉獵過馬恩著作的人都知道《共產黨宣言》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都或多或少談到了性與階級政治的關係，而且被公認是「性政治」論述的源頭活水。這表示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突出生產領域和階級鬥爭的重要性，但也並沒有忽視性／性別在社會關係和意識形態領域的作用與意義。

在馬恩之後，馬克思的幾個女兒以及羅莎·盧森堡甚至列寧等人也都可算是性政治的奠基人。更特別的一個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早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就高倡「性政治運動」，將政治解放和性解放結合在一起。賴希率先提出「性革命」能「成爲新社會的助產婆」，能製造新的社會形態。爲青少年的性解放振臂疾呼的也要數賴希是領航人，在賴希看來，社會對青少年的性壓抑的嚴重性和殘酷性超過了對社會任何一個階層的性壓抑。他甚而要求給青少年提供法律保障，以反對雙親、教師和政府當局的「性暴政」，還主張爲青少年的性滿足創造方便，包括爲青少年實現性要求提供必要的場所和工具。

賴希於二十歲那年(1927)加入奧地利共產黨，此後即以精神分析學家和共產黨員的雙重身份從事活動。他不只是嘴巴說說而已，更親身參與德國工人運動，在工人群眾內部發動了一場「性政治運動」。賴希認爲社會主義革命僅從生產領域著手還不夠，必須在生產領域和階級鬥爭的基礎之上，進行一場「性革命」，他相信「性革命」是摧毀現存社會的一顆重磅砲彈，可以作爲階級鬥爭的補充。

不論從理論的創新還是實踐的激進來看，卡維波這類性政治論述者都難于說比上個世紀初的共產黨人賴希更爲超前。其實，卡維波所津津樂道的那一套觀點源自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西方後現代主義思潮中的所謂「激進民主」流派，卡維波和他那一夥人偏好叫作「人民民主」(關於這個「人民民主」在下文我還會多說幾句)，「性政治」則是激進民主的論述策略之一。這一派的觀點和賴希最大的歧異在於他們排拒馬克思主義所強調的生產領域和階級鬥爭，認爲人有許多慾望需要無法納入經濟範疇內被解釋，性的慾望需要和身體管理的慾望需要就是他們認爲最顯著的例子。這一派主張消費文化領域以及屬於這個領域中的「性」和「身體」等問題，可以獨立于生產和階級領域之外自行運轉並產生「自我建構意義」的能量。捨此之外別無新意。

二、「到處都是戰略」，但問題是：敵人是誰？

卡維波們自稱「文化激進主義」或「青少年通俗文化的左翼政治」，十分相信在消費通俗文化中「到處都是戰場」，認爲資本家無法壟斷商品所意圖生產的意義與認同，相反的，任何商品消費的意義都可以不斷地被挪用與轉換，甚至形成對抗或抵抗的意義與認同，遠遠超出資本家的意料之外。卡維波爲此列舉一些電視廣告、流行歌、網路情色…爲證，不認爲青少年消費者「被洗腦」或被創造出「虛假的需要」。他還特別以一則手機廣告說明「廣告商比左派更深入學生生活」，「這個廣告也有喚起學生抗拒不合規定的權利意識之潛在可能」，「此外便是激進社運可以而且應該介入的地方：把手機文化更進一步地轉化爲政治行動」，而他所說的「政治行動」不過

是「喚起青少年的反抗與權利意識，製造真正的矛盾與官式文化管教上的困難」。

如果卡維波真的相信如此這股「挪用」商品的意義及其所產生的「對抗」作用，就可推進他們所嚮往的「人民民主」，那麼這個「人民民主」必然落得「資產階級民主」的下場。這是不是把話扯遠了？是有那麼一點。話得繞回到文化激進主義所執著的消費通俗文化戰場來講。一個遠離生產過程和經濟，孤懸在外的消費文化戰場，所能實現的「民主」是什麼屬性呢？

「民主」的定義從它的源頭，即古希臘城邦政治來講，指的就是多數平民統治的政治，相對的則是少數統治的「寡頭政治」。而歷來的統治階級爲了維護既得利益不喜歡民主，因爲那意味著把權力交還給人民大眾，包括政治權力和經濟生產權力。法國大革命之後登上歷史舞台的資產階級（英國是另外一個例子）在面臨新興無產階級要求民主的壓力下，端出了政／經分離式的民主，即在政治領域給予人民「民主」，在經濟領域仍然是剝削者和被削者涇渭分明的「絕不民主」，而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專政」。說到這裡，話已經很清楚，連繫到卡維波們在自絕于經濟生產領域而致力于消費文化領域的「挪用」、「抵抗」戰場時，所能企及的「人民民主」充其量也只能在「資產階級民主」的範疇內打圈子。

三、「挪用」的迷思與實際

我們現在來談談消費／通俗文化戰場的「挪用」效應問題，因爲這關乎到卡維波所說的「性政治」、「年齡政治」以及「性」和「身體」論述的核心策略。

卡維波承認學校、家庭對青少年是一種「師長規訓」，商品市場對青少年是一種「消費文化規訓」，又迷信後著可以「挪用」來「抵抗」前者，試問，既然兩者都是「規訓」，以其一對抗另一，其間青少年的「自主」究竟是什麼屬性？卡維波喜談辯證法，請問在這種不斷被「挪用」的「抵抗」與不斷被收編的「抵抗」之間所產的自主性，還是不是黑格爾所說的「主人-奴隸」關係的辯證顛倒？或只是「奴隸-奴隸」關係的形式變化而已？卡維波是很難回答這個問題的，因爲他所信奉的「挪用」原則，實際上是一個無止盡的同義反覆「怪圈」罷了。

四、只見「身體」，不見歷史

卡維波同林深靖的論戰是從「做身體」（塑身）開始的，按照卡維波對「做身體」的定義並不限于「塑身」，舉凡戴耳環、刺青、養生、慢跑、打坐、洗澡、修指甲、化妝、做頭髮、打扮…等等，都包括在內，總之就是「身體管理」。既然「做

身體」是這個意義，那麼可見「做身體」是歷史發展的產物，每個歷史階段都有其「做身體」的花樣，並非如卡維波所以為是「晚期現代」或「晚期資本主義」的專利，而是古已有之的現象，歷來都同年齡階級、身份、地位、財富有不解之緣。晚近的「身體」理論則是後現代主義思潮關注最多的事物之一，西方國家書店裡充斥著這一類的東西。過去的列寧主義者現在是徹頭徹尾的拉康主義者，每一個人都從生產領域轉向「性政治」；切·格瓦拉的社會主義也在一夕之間讓位於福柯之流的「身體論」。性和身體現在已經變成所有時髦東西中最時髦的一個，而且從私領域進入了公領域，舉目所見幾乎都和「性」與「身體」有關，正如英國馬克思主義者特里·伊格頓(Terry Eagleton)所指出的：「對身體健康的關注現在已經逐步發展成爲一種主要的精神疾病」，若說這是「性拜物教」的結果也不爲過。

從歷史唯物主義來說，無論現在或過去，「身體」不管怎麼「做」，只是一個反映特定社會經濟形態和社會意識形態的現象而已，從來不具有被卡維波以後現代思維所描述或所指望的「戰場」性質和作用。當然，在卡維波們看來，這種論調「厭煩了！」「了無新意！」，但是事物的發展和事情的真象會因爲你們「厭煩了」而改變嗎？一個理論的有效性會因爲你們認爲沒有「新意」而失效嗎？若是把每個時代都會有的青少年與成年人的緊張關係，即青少年對成年人「規訓」的反抗表現說成是「性」或「身體」文化的「挪用」與「抵抗」，甚至是對體制的潛在變革力量，未免太一廂情願了吧！

五、究竟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還是「虛假的需要」？

卡維波在文中提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一段話：「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範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於自由工人階級是在什麼條件下形成的，從而它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卡維波的原意是想利用這段話來否定有所謂「虛假的需要」的存在，即需要根本沒有真實和虛假的問題。然而，馬克思這段話的前提明明指的是「必不可少的需要」，不知是卡維波沒看清楚，還是故意忽略了？「必不可少的需要」當然是真實的需要而不是虛假的需要。但是，「必不可少」並不是任由個人主觀決定的，而是「歷史的產物」。卡維波顯然把這段話錯誤的理解成只要工人階級有怎樣的習慣和生活要求，那就是「必不可少的需要」。關鍵端在於什麼是歷史的產物？這一提問的重要性是在指出「虛假的需要」也會是歷史的產物，歷史並不是只會製造真實的東西，這是常識。所以「必不可少的需要」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也可能是「虛假的需要」。

這個問題有點類似關於「自由的選擇」爭辯，有沒有「自由的選擇」這回事？人

們總以為有自由的選擇，因此就算我們明知道根本沒有這回事，他也必須假裝有自由的存在，因此很多選擇事實上是強迫性質的。

卡維波在另一處還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用來指涉商品交換活動和商業人際往來的「交往」(intercourse)概念。「交往」這個概念用來描繪資本主義商品市場和消費文化的全面圖景：複雜、多樣、虛假、迷惑，以及進步的一面…的確比「交換」、「構通」、「消費」、「交易」這些概念更周嚴、更精準，這在卡文關於這個概念運用的長段描述中已經說得很清楚。但令人不解的是這個概念同青少年消費通俗文化的「挪用」策略之間有什麼必然的聯繫？由卡文本身的論述來看，「交往」概念適足以證明「挪用」的無效性，而不能證成「挪用」的「抵抗」效應。實際上，「交往」概念更容易幫助我們了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那個「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著名的命題。

六、異化的當代形式：對日常生活的普遍控制自覺的反異化鬥爭是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

卡維波一直強調「積極介入與挪用消費與通俗文化」，大有將此策略視為變革社會的突破點的意味，因此在他的論述中令人訝異的發現，似乎媒體廣告都潛藏有革命的信號，而青少年儼然都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地下黨，這究竟是他對文化激進主義的天真幻想，還是理想主義的衝動焦躁？卡維波相信「意義」無法被霸權宰制，也不會被「反對／抵抗」的任一方所獨佔，這話沒錯，但又如何呢？《愛拼才會贏》這首閩南語流行歌曲早被工人運動「挪用」為「抗爭」意義的工運戰歌，但任何一個工人都知道僅憑這首歌曲是「贏」不了什麼東西的，決定輸贏的到頭來還得看階級意識的覺醒程度和集體戰鬥意志的堅決力度。連生產領域的工人運動在「挪用」消費文化的意義時，都只能止於「挪用」作用的本身而已，更何況茫茫人海中不特定的青少年呢？

在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例如盧卡奇就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文化邏輯中，不論是誰，也無分男女老少，都掙扎在由資本和商品所控制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現今資本主義日常生活和通俗文化中，充斥的大量扭曲和支離破碎個性的異化現象以及空虛感和無聊感，正是卡維波所再三頌揚的「挪用」、「錯置」和「顛覆」，用盧卡奇的話來形容：「正是這種生活的表面上的無憂無慮的產物，正是這種生活方式必然造成的令人感到日益壓抑和無聊的產物」。

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否認「壓抑」、「無聊」、「焦慮」或逃避性的「歡娛」…等等異化現象潛藏著變革現狀的可欲能量，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這些異化現象通常

是以扭曲的個性，通過尋求刺激、冒險、麻醉、放縱、作怪…等行為表現出來，扭曲的和支離破碎的個性無論怎麼「挪用」既存文化的「意義」，都無助於其重塑「完整的個人」的個性，只會加重個性的扭曲和異化的內在化而已。

作為當代左派的嚴峻課題，首先就是揭露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形成的巨大文化矛盾和異化現象，以及這些矛盾現象的產出根源規律和人們身處其中的困局，從而激發人們自覺的反異化鬥爭的熱情和勇氣，為重塑完整的個人和個性而戰鬥。同樣重要的是，這種文化戰線的反異化戰鬥絕不能是孤立的，它必須同時和反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的政治鬥爭與社會運動，特別是工人運動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產生可預期的效應。關於這一方面的看法與策略，已超出本文的範圍，只好留待必要時再寫了。



編輯部小啓

刊載於《左翼》第15、16、18號的〈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本文書目有多處錯漏，第18期並漏植了一段引文，唯無損於全文大旨，故不再訂正、補漏。該文經作者校訂、增補後，將交由人間出版社連同陳映真、曾健民在《聯合文學》批判陳芳明的文章，結集成書，將於近期出版。有興趣的讀者，可閱其書，以窺該文完整的全貌。

緊緊握你的手

<第十六期至第十八期捐款名錄>

「巴黎公社」一董事	3000	林志成	1000	張盈慧	100
主知名	1000	林瓊華	1000	劉孝春	2000
朱天心	5000	金恒杰	1000	潘小俠	1000
江博鴻	1000	紀欣	1000	鍾喬	1500
李榮武	US\$300	郭力昕	2000	顧秀賢	1000
林先生	5000	陳真	1000		

計：NT\$27600 + US\$300

質疑對蘇聯解體與“和平演變”的評論

小堡佬

不久以來，《文藝理論與批評》雜誌，連續發表多篇政論性文章，文章中不無正確的見解，但有些論點酷如劍拔弩張，給人以皮肉痠痛的刺激，還有解構主要和次要左與“左”的概念，因為沒有充分事實根據，其可信性值得商榷。

例如這樣的話：“有人把蘇聯 70 多年的歷史誣蔑為專制暴政的歷史”。如果不是患有健忘症的人，就會記憶猶新：我們黨幾十年前就把蘇聯定為“社會帝國主義”，而且提出“打倒美帝打倒蘇修”的口號。因此，說蘇聯專制暴政至少有一半正確，誣蔑二字加在誰頭上值得考慮！三中全會《決議》上沒有為蘇修平反的條文，只有對蘇修嚴肅鬥爭的記錄（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130 頁）。從來就有種合情合理的習慣和共識，即便有功之臣腐敗了也同樣把他稱之為罪犯，絕對不能稱之為有功的罪犯。還有這樣的話：“像蘇聯這樣有 70 多年歷史，足以和美帝在世界上抗衡的社會主義大國，怎麼會傾刻紅旗落地，突然瓦解？”眾所周知，蘇修是鐵杆反動派，把它稱為紅旗，是不是把夜貓子當成金鳳凰了？要在文革時出現這樣的紕漏，不就地槍斃也得打你個半死不活！在從前提到蘇聯，就連吃屎的孩子都知道：“衛星上天紅旗落地”！早已落在地上的紅旗就變成毫無光彩的破布了。

把蘇聯解體歸因於“和平演變”，是從前的學者不注重的課題，即便這種認識有一定的道理，但根據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據的唯物觀點，它也處於次要的地位。國內外的學者研究蘇聯解體得出幾種認識：表面看來，是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抑喉”使蘇聯在內外交困中窒息了，比較起來，葉利欽應負主要責任。當時，戈爾巴喬夫正在黑海休假，中央發動了八一九政變，逼迫戈爾巴喬夫辭職了。政變平息後，戈爾巴喬夫回到中央時、葉利欽早已擬定好建立聯合體的方案，戈爾巴喬夫只是生氣卻無力扭轉局面，他推行的“人道民主的社會主義”改革也就此畫上句號，他當總統的生涯也告結束。葉戈二人對蘇聯解體起到不小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使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是“極左”路線帶來三大矛盾，三大矛盾又導致三大危機，即經濟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說白了就是支撐蘇聯的根基腐朽了（見《葉利欽時代》一書，河南文藝出版社）！赫魯曉夫上台後，蘇聯經濟發展到頂峰，總產值佔到世界第二，人均收入接近 5000 美元，相當於世界上的中等水平。但不知他吃錯了什麼藥，忽然發起高

燒，恰好在中國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的時候，他揚言要三年趕上美國，於是就殺雞取蛋，把耕牛奶牛全都送進屠宰場，搞得農業一場糊塗，許多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紛紛破產（見今年4月《雜文報》）！中國只有“十年浩劫”，蘇聯類似文革的浩動持續好幾十年，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大清洗、大逮捕、大屠殺，受害者5000萬人，槍決40萬人，其中包括許多知名的元帥將軍，使得斯大林死後後繼無人。赫魯曉夫奪權後胡折騰，又“左”又右，把黨解構成全民黨，帶來政治中樞的解體。對比起來中國要幸運得多，終究還留下了鄧葉幾個救命的菩薩。蘇聯假設還有幾個像伏羅希洛夫那樣的人物，解體就不會那麼順利了。

血的教訓怵目驚心，蘇聯解體是“極左”帶來的悲劇。在全球化的複雜局面下，中國面臨機遇也面臨挑戰，要有效地防止國際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必須堅持鄧小平關於“要防右主要是防“左”的理論”；還要反對“製造個人崇拜”的不良風氣（見《中共黨史大事年表》140頁；）更要逐步實行馬克思關於普選公僕的原則，公僕的工資不能高於工人（見《馬恩選集》二卷）。蘇聯和中國革命實踐中的經驗教訓，且要高度重視，必須分清什麼是主要矛盾，什麼是次要矛盾，千萬不要架起大炮打蒼蠅。階級分析方法不能丟棄，但必須事實求是地加以運用，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應有新的發現，不能停留在十九世紀的認識水平上。我國鄧江兩代領導人，因勢利導，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已經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這是我們繼續前進的保障；另外，在資本主義內部也在增長社會主義因素，那裡的共產黨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工貿和文教組織，還有工人農民自動在組織起社會主義性質的機構和合作社（見今年4月15日《中國青年報》）。

在我國當前，似有自由主義的萌動，也出現了不少社會醜惡現象，但這些都不是時代的主流，不能因此而否定改革開放。有目共睹，我國經濟持續增長，農民吃飯問題基本解決，持續二十多年的半飢半飽的票證時代成為過去。社會醜惡現象和犯罪率升高，不免使一些目光短淺者杞人憂天，懷念起“極左”的優越性，說出為文革和支持者鳴不平的話，把文革是為打倒走資派修改成“封資的閘門關得過死，故而謂之“左”（今年2期《作品與爭鳴》）！反對封資是積極進步的，怎麼能在左字上加括號呢？還有人顛倒主要防“左”的理論說：“既要防左防右也要防壞”（見99年11期《作品與爭鳴》）！去掉括號的左代表進步，這樣的失誤是蓄意而為還是馬虎所致？還有人這樣說：“一大二公農業學大寨，不是比解放前還好了許多嗎？”（99年6月《名字》雜誌）！多麼高明的見解，竟能在“極左”裡發掘出光輝…由此可見，“左”比右更難在人間消失，當前還不適合再來一次反右派運動；當然，對右的東西必須批判。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

——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一〉

黃志龍

「1930年代以後的史達林主義和其繼承者所執行的“獨裁”，是否就是俄羅斯革命不可避免的結果？這個問題長期存在於馬克思主義者與其批判者之間，且因個人的立場、看法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答案。例如，托洛斯基於1937年出版的「被出賣的革命」，就依據十月革命的精神來揭發史達林，意圖從「史達林的墮落」中救出十月革命及其靈魂——布爾什維克主義；反之，索忍尼辛的「尼古拉群島」則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必須為史達林時代的大肅清、集中營負起責任的最後承擔者。

英國著名（也可說是研究蘇維埃、俄羅斯歷史最具權威性）的歷史學者E.H. Carv，在他三十多年的著作活動中，高度推崇托洛斯基傳記——「先知三部曲」（武裝的先知、被解除武裝的先知、流亡的先知）——的作者Issac.Deutscher的論點。E.H. Carv在其初期與後期的著作之中，對歷史的認識出現不容忽視的變化，這一方面源自於Carv本身不懈的精神努力，證明了他對歷史的更深一層的理解，但另一方面，他與Issac.Deutscher的對話也是促成這種歷史觀點改變的一個重要的機緣。

Deutscher認為，Carv過於強調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連續性」，而忽視其「本質上的差異」。Carv將列寧視為建設蘇維埃圖像的指導者，將內在於列寧思想或列寧主義的理想主義要素，當作是附屬性的東西，因而把從列寧到史達林的歷史過程當作是連續性的過程。這就是說，Carv沒有正確把握理念或思想在歷史上所伴演的角色，因此把不再將「革命理想主義規定歷史人物的行為」視為圭臬的史達林時代視同於列寧主義時代，也就是在不知不覺中透過史達林主義的「菱鏡」(prism)來觀察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這個問題，其根源在於Carv研究蘇維埃國家的旨趣，他對馬克思主義的關心固然重要，但卻不是首要的目的。登場於Carv著作中的列寧，並非革命家列寧、理想主義者列寧而是長於治國之術的列寧、或類似俾斯麥的列寧。在這種看法下，列寧與史達林之間就不存在明顯的界線了。

對於Deutscher的批判，Carv雖然認為Deutscher在歷史認識上似乎過於強調理念要素，忽略了「現實的考慮往往支配政策」這一面向，但也承認「革命難以忘懷鼓舞著他的烏托邦夢想」的事實，且在俄羅斯共產黨的代表性理論家布哈林和葉·普烈奧布拉任斯基（J.Preabrajensky）合著的「共產主義的ABC」英語版的序文中說：「做為烏托邦夢想家的列寧是構成列寧這一個人的組成部份，早期布爾什維克主義對烏托邦的渴望，是屬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本質部分，是不容忽視的」。Carv在其共四部的大著「蘇維埃俄羅斯史」的最後一部「計畫經濟的基礎」中，終於發覺存在於列寧與史達林之間的鴻溝，他表示「史達林版工業革命的手段破壞了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無產階級或社會主義革命本來的觀念”」，因而做出「史達林的工業革命是革命，但同時也是反革命」的結論。這就是說，Carv曾經透過史達林主義的稜鏡來看馬克思主義，但到了晚年，就根據古典馬克思主義（史達林主義之前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準來評判史達林主義——批判史達林版工業革命的非人性性質。

史達林主義並非如西方全體主義（totalism）史觀者所說的，是俄羅斯革命理念預設路程的頂點。簡單說，列寧主義的象徵是在於列寧的早期布爾什維克主義，以及從二十世紀初到1920年代的共產主義的思想、運動和體制，而史達林主義則是30年代以後共產主義的思想、運動和體制。將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做此定義時，不僅涉及到蘇維埃革命史，也涉及到包括中國革命史在內的「既存」社會主義論——因為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體制崩潰之前，史達林主義一直都是共產主義的主流（支配性潮流）。

另外，「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主義」的時期劃分，主要依據「客觀的時代特徵」，列寧和史達林不過是作為這個時代特徵的表徵而已，因此這個時期劃分和他倆作為領導者的在職期間、生存期間並不一致。之所以要做如此時期劃分的理由在於：從列寧主義轉變為史達林主義所形成的政治體制，就是「既存」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原型」的緣故。在這裡所提到的「列寧主義」並非在「前」蘇聯所通用的列寧主義，亦即將馬克思、列寧的思想體系、思維構造解體之後，依照政治需要或「權力」的正統化邏輯，而將其中的幾個「觀念」重新組合的、具有「國教」性質的意識型態，而是在如此庸俗化之前的、做為俄羅斯革命理念的馬克思主義及其實踐的總體。

對於所謂「史達林主義」的政治制度和價值體系的形成而言，19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是具有決定性的轉捩點，其中最具關鍵性的政治變動，是在1929年所發動，被史達林稱為「從上而下的革命」的農業集體化。這場席捲了在蘇聯人口中佔有絕大多數的農民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其結果是將先前建立在「同意、協商」的基礎上的政

治權力，以及黨與農民之間的關係，「變化」為「從上而來」的強制。這種經由集體化所建構出來的農場體系，是在新威權主義的關係之下才得以持續的存在，因此這種「質變」在性質上具有持續性，也由於這種性質，「由上而下的革命」的結果必然牽動了全盤政治體制的變質。這個過程一直進行到1930年代後半才暫時停止。1936年制訂的新憲法（也就是所謂的史達林憲法）就是這種變化在「法制」上的具體表現。

當然，正如同對列寧主義的形成做出貢獻的人，並不侷限於列寧本人，而是包括政治立場未必一致的普列漢諾夫、托洛斯基、馬爾托夫、布哈林等人。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對列寧主義的形成與發展做出貢獻。因此，有些人認為將它稱之為「布爾什維克主義」較為適當。同樣地，史達林主義也不能完全歸於史達林個人的作為，而是更廣泛的歷史產物。如何看待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歷史關係是關於「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根源性問題 -- 因為，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決定了對俄羅斯革命的評價以及對「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歷史定位等有關歷史學爭論的見解。

一、從國際主義到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1) 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

民族主義可說是，將國民中壓倒性多數的至高忠誠集中於國族國家 (nation state) 的政治信念，以及基於這個信念所產生的體制與運動 -- 也就是說，在政治價值的位階上，將對國族國家的忠誠置於至高無上的位置的信念。這種民族主義產生於18世紀末的歐洲，繼之而來的十九世紀則被稱為是「民族主義的時代」。在此同時，社會主義思想也逐漸成形進而展開其運動。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1848年發表其影響了人類歷史的「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把民族主義視為國際主義的「反命題」(Antithese)，反而把它當作達到更高層次的國際秩序的自然踏腳石 -- 他們觀察到資本主義經濟和技術的發展已經突破了國族國家的架構，因此認為無產階級革命以及伴隨著革命而來的新秩序，必然是屬於國際範圍。但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高度發展，一方面促進經濟的世界性統合；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諸國之間為了爭奪殖民地而激烈對立，又刺激了殖民地、次殖民地地區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使先進資本主義和亞洲、非洲等殖民地、次殖民地地區之間發生激烈的糾紛。民族主義從而成為「世界政治上的可燃物」，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

列寧所面臨的政治現實是，一方面在國內存在著複雜的、延續迄今的民族問題；另一方面，在國際上也不得不面對世界性的民族主義。列寧對民族主義的看法，簡單的說，就是：在勞工運動、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列寧從頭到尾反對民族主義，但對表現於少數民族、殖民地、次殖民地「自主要求」的民族主義，則積極予以評價並加以支持。列寧認為：殖民地、次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以及進行民族主義鬥爭的社會運動，是屬於前社會主義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階段，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更由於是「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因而可成為與資本主義進行鬥爭的無產階級運動的同盟軍。列寧和羅莎·盧森堡、托洛斯基等同時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確信無產階級運動以及未來的「新秩序」，必須是超越民族主義的、屬於國際性的秩序。因此，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列寧將贊成其本國排外性民族主義和戰爭政策的第二國際加盟諸國，視為違背社會主義的叛徒而加以彈劾。他和托洛斯基等人所發動的十月革命，本來就沒有把它當作僅屬於俄羅斯一國之內的革命，而是將之視為是全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導火線 -- 這一點就是二次大戰後的革命與俄羅斯革命的根本差異所在。他們認為，俄羅斯的革命權力不過是屬於過渡性的暫時存在而已，它即將被包含在隨之而起的全歐洲、甚至全世界社會主義共同體之內。因此，就社會主義（革命和革命後的）秩序而言，列寧始終是國際主義者，在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問題上，基本上是繼承馬克思的立場。

綜觀俄羅斯革命後的社會主義歷史，在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問題上，似乎和馬克思主義的想法，以及繼承馬克思主義看法的俄羅斯革命背道而馳，一切頂著社會主義名號的體制和運動都緊緊的和民族主義相扣連。蘇維埃俄羅斯從某個時期開始，便告別了俄羅斯革命的理念 -- 國際主義，從而躲在蘇聯中心主義的殼內高呼俄羅斯革命的自我完結。俄羅斯革命和以其存在為前提的歐洲社會主義，以及先進諸國的社會主義，自此遠離革命而分享民族主義。

俄羅斯革命之後，所有成功的革命無一不是假借政治運動和民族感情的同盟而取得勝利。在革命後新體制的統治上，政治菁英也以民族主義作為統合國民的手段。史達林支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時，表面看來似乎將國際主義置於民族主義之上，但實際上卻是在國際主義的名義下驅使小國為蘇聯的利益而犧牲，是與國際主義完全無關的俄羅斯民族主義的異常肥大症。因此當史達林主義的強權消失時，一直被壓抑的民族情感不能不爆發起來。

由於馬克思主義徹底鼓吹並實踐超越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民族主義對於 20 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衝擊就特別大。這不免使人懷疑：社會主義體制的菁英是否言行不

——嘴巴上標榜社會主義，但在實踐上其實是民族主義？

1960年代以前，就整體而言，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在國與國之間，以及在一國內部都顯現出和諧的外貌 -- 公認的「社會主義教義」認為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並不矛盾，「民族」和「階級」可以統一在「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之下。但60年代以後，這種表面上的和諧無法維持下去，表現在中蘇兩國間的爭論以及衝突，中國和越南，越南和柬埔寨之間的武力衝突，華沙公約機構武力介入捷克「布拉格之春」等等。

(2) 一國社會主義論

在社會主義體制的歷史上，民族主義之所以成為社會主義的秩序原理，是以1924年史達林發表的「一國社會主義論」為契機。由於蘇聯國內外情勢的變化，以及因而產生的黨和國民的心理變化，一國社會主義論迅速（但並非立即）地被接受。

在20年代的黨內鬥爭中，托洛斯基等反對派曾經激烈的批判「一國社會主義論」，認為這違背了俄羅斯革命的理念。但在1929年末，史達林贏得黨內鬥爭之後，「一國社會主義論」就確立了其正統教義的地位。1929年12月21日，第三國際書記局在慶賀史達林五十歲生日的賀文中，公開讚揚一國社會主義論是史達林的「歷史性貢獻」。1936年憲法（即所謂史達林憲法）宣言更進一步規定：在蘇聯，社會主義社會基本上已完成時，一國社會主義的教義則從黨的規範升級為國家的根本規範和憲法原理。因此，相信不相信一國社會主義就成為了「考驗對黨、對國家是否忠誠的“試金石”」，任何質疑或批判一國社會主義者，立即被打為首惡的異議份子——托派份子。

一國社會主義的正統化被追溯到俄羅斯革命時期，強調一國社會論是俄羅斯革命理念的繼承，列寧在一開始就主張一國社會主義論，而反對者就是托洛斯基。

將俄羅斯革命理念和一國社會主義論做此結合的並不限於蘇聯，整個採取「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都是做此承認。所以在中蘇論戰以及其他對立抗爭中，任何一方都沒質疑一國社會主義的正當性和歷史地位。戈巴契夫在十月革命七十週年紀念演講中，還在攻擊托洛斯基為反對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列寧主義叛徒。

就「既存」社會主義體制內的政治菁英而言，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教義以及作為其理論基礎的民族主義是超越歷史的真理。但事實是如何呢？沒有歷史的偽造，這種解釋是不可能成立的。

(a) 少數民族的自治權

十月革命後成立的革命政權，在新政府(人民委員會)內設立專門處理民族問題的「民族問題人民委員部」(由史達林擔綱)。宣布革命勝利的八天後，新政權發佈「俄羅斯諸民族權力宣言」規定了國內的民族政策，承認俄帝領土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對此，羅莎·盧森堡於1918年在牢獄中撰寫的「俄羅斯革命」，嚴厲批判革命政權的民族政策，她認為「十月革命既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承認民族自決權便是對民族主義的讓步，是對革命理念、國際主義的倒退」。對於這個批判，列寧將民族自決比喻為「離婚的自由」而予以正當化——「離婚的自由」是兩性基於平等、真愛而相結合的前提條件而不是目的。社會主義是支持超越民族主義的國際主義，但真正的國際主義是以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意志的結合為基礎的。所以當現實上民族的壓迫和不平等確實存在時，國際主義的先決條件就是承認各民族的自決權利從而消除這種壓迫和不平等。認為一旦承認民族自決權就和國際主義相矛盾的說法，等於將擁護離婚自由看成是鼓勵破壞家庭...

(b) 支持民族獨立運動

在對外政策方面，革命政權重視並支持民族問題，尤其是東方(中東、亞洲)的民族主義。自從1905年革命之後，列寧即表明對亞洲民族主義的關心。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民族、殖民地問題尖銳化，有利於革命運動。革命政權立即表明對民族獨立運動支持，其東方政策在中東獲取可觀的成果。1920年第三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正式通過有關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歷史性決議，並於大會後不久在裏海召開「東方諸民族第一屆大會」。革命政權以及第三國際認為他們對民族主義的熱烈支持並非意味著從國際主義的倒退，而是有利於補強國際主義——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被當作是即將來臨的、以歐洲為主戰場的世界革命的同盟軍。

第三國際的政治局並不認為亞洲的民族主義可以替代歐洲革命，或具有不同於歐洲革命的獨立價值。當時列寧等人對民族主義的一貫看法是，民族主義終將因為即將成立的世界社會主義共同體而完成其歷史使命而趨於消失。所以，迅速地注意到20世紀政治中突出的民族主義問題，並將其作為社會主義革命戰略的一部份，是列寧等俄羅斯革命領導者們獨特的見解，但他們對民族主義的看法和生活於十九世紀的馬克思、恩格斯一樣，認為民族主義是到達更高層次的國際主義的「自然的墊腳石」。

(c) 與歐洲革命的關連

當然，在現實政治上，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關係很複雜，而且也不是很整合的。從領導者們的言論可知，作為主權國家的領導人的「現實考慮」和作為革命家的

「理想主義展望」之間的鬥爭，或者是說，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之間的相剋是很明顯的。這一點就表現在黨內對德國和平問題的激烈討論；表現在外國干涉和內戰期間內，強調保衛祖國的愛國主義和熱烈獻身於世界革命的主張等等的爭議上。

對於革命時期的領導者們而言，他們最優先的行動基準是歐洲革命，而且認為歐洲的無產階級在不久的將來必會完成革命任務 -- 因為列寧等革命家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爆發，必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崩潰。在這種認識與展望之下，他們確信十月革命是不久之後必會發生的歐洲革命的導火線，俄羅斯革命的成功與否，完全依靠歐洲革命的成功與否。

當然，對歐洲革命的可能性，並非黨的每一個領導者都持有相同的認識。史達林從開始就對歐洲革命持有懷疑的態度。他在1918年1月的黨的中央委員會議上說：「歐洲並沒有革命運動的“現實”，有的只是革命的“可能性”而已，我們不能依靠“可能性”」——根據E.H.Carv的研究，史達林是反對列寧而主張「歐洲沒有革命運動的事實」的唯一中央委員。雖如此，基本上俄羅斯革命與歐洲革命之間的有機連帶還是黨的基本行動準則。

當歐洲革命的希望已渺茫時，列寧、托洛斯基等人的「確信」還是沒有動搖。他們還是意圖從「在國內，與農民協力共同推動國家建設，對外聯合中國、印度等亞洲解放運動」來找出一條道路。

列寧、托洛斯基等人對於歐洲革命的不符合當時實際情勢的信心，是來自於他們對社會主義在思想邏輯上的結論 -- 因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後」的新秩序。由於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科技之下，民族主義已成爲落伍思想，因此，在資本主義後的，也就是在經濟上、技術上比資本主義更高層次的社會主義社會裡，民族主義更是時代錯誤（anachronism）的意識型態。社會主義是以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爲中心而實現的世界共同體，所以俄羅斯革命只不過是作爲這個變革的突破點才有意義。這些就是規定列寧等人行動的根本原理。換言之，他們對民族主義的看法是，「沒有資本主義核心的內在變革，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不可能的」這種觀點在邏輯上的結論。

(d) 新的觀點

可是，革命政權所熱烈期待的歐洲革命，雖然有一段高揚時期而有利於蘇聯內戰的勝利，但旋即在1920年後開始退潮，並且以1923年德國革命的失敗爲轉機，逐漸

遠離了成功的可能性 -- 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相對安定期的到來。

另一方面，蘇聯內部1921年推行的新經濟政策（NEP）克服了內戰後的政治、經濟危機而趨於安定 -- 在政治上獲得農民支持，在經濟上則由於農業的復甦而避免了國民經濟崩潰的危機，經濟的自立更生已見曙光。對外，蘇維埃政權利用資本主義諸國之間的矛盾，以外交手段鞏固其擠身歐洲列強的地位。資本主義諸國暫時失去以武力干涉，消滅革命的機會。

在外交上，民族或國家利益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因此到了1920中期，俄羅斯接受民族主義的架構成爲主權國家 -- 這是逼人們再一次調整或再檢討有關革命思考的新現實。再調整或再檢討應如何做，以及做到什麼程度？成爲1920年代蘇聯共產黨內部鬥爭的中心論點，而成爲論爭導火線的，就是史達林於1924年末發表的「一國社會主義論」。

(e) 一國社會主義

俄羅斯革命認爲民族主義是極爲重要的政治問題，但並不屬於社會主義本身的問題。之所以重視民族主義的理由在於：民族問題和農民問題都被包括在對內、對外都還未完成的布爾喬亞革命課題中的問題，因此要往社會主義前進，就必需解決包含民族主義在內的布爾喬亞革命課題爲基礎才能達成。

列寧等革命的領導人們並不認爲，民族主義和以農民爲主體的農業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或社會主義的秩序原理。他們對亞洲的民族主義的態度，是把它當作作爲主戰場的歐洲革命的同盟軍而加以支持並表示同感或同情。

史達林於1924年末發表的一國社會主義論，是從根本上修正黨對民族主義的立場 -- 將社會主義體制嵌入主權國家的架構內而成爲社會主義秩序的一個要素。

從今天看來，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歷史意義有如下兩點：

(1) 一國社會主義論修正黨對民族主義的原則、立場，將社會主義的秩序以適合民族國家的架構重新形成 -- 把原來屬於國際秩序的社會主義改爲一國的秩序。

(2) 一國社會主義切斷俄羅斯革命對西歐革命的「依存」看法，宣布俄羅斯革命的「自主性」，而將存在於俄羅斯革命思考中的，以歐洲爲中心，以俄羅斯爲邊緣的看法“解體”。

根據史達林的解釋，一國社會論是俄羅斯革命的理念，是淵源於列寧主義的教義，而不是其修正。因而長期被馬克思主義者當作真理而被接受。從1930年代之後，對這個教義的批判或質疑都被當作對社會主義的最惡毒的異議份子。

革命前，列寧根據帝國主義 -- 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 -- 不平衡發展的法則，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在像俄羅斯這樣的屬於邊緣地域的國家，也就是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最弱的一環」的後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獲得勝利的可能性。這可以說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向來主張以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為中心的世界革命論的立場的重大修正。但列寧的這個特異立場，是就革命（在奪取政治權力這個意義上的）也就是革命的「順序」而言的。就以俄羅斯革命為導火線，無產階級革命不久將發展為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這個展望而言，列寧的立場與馬克思、恩格斯的立場並沒有兩樣。但史達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所主張的是，列寧等人所沒有提到的，有關「革命後的建設問題」 -- 也就是，在一個國家內，就算是如俄羅斯這樣的經濟後進國內，以「自力」（不依靠歐洲革命的支持）可以建設並完成真正屬於馬克思主義（也就是做為資本主義後的新秩序）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就是說，一國社會主義論的中心論點是：「俄羅斯在一國內以自力所建設的新秩序就是馬克思所意味的社會主義」這一種屬於「新秩序的性質」^(註一)的問題，如史達林在1926年發表的有關「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的論文中說：「...（一國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是）以我們國家內部的力量可以解決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矛盾；在其他諸國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支持下，但不需要其他諸國預先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條件下，我國的無產階級掌握權力並利用其權力而完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由此可說，一國社會主義論的特異性並不在於革命的優先順位問題，也不是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是非問題。由於俄羅斯革命在1920年代後的國際孤立，在蘇聯一國內有著手建設的必要性是所有領導者的共識，因此才發生如20年代的「工業化論爭」 -- 探討蘇聯一國的建設方案。

「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另一個重要論點是，有關這一個「教義」的歷史位置的問題 -- 也就是說，一國社會主義論並非俄羅斯革命的理念、列寧主義的修正，而是其繼承，也是其正統的解釋。在1926年二月的上述論文中，史達林說：「否定一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就是不相信社會主義建設的大義，是脫離列寧主義」。因此，在蘇聯一國內以自立完成社會主義是可能的，而否定這個可能性（據史達林，否定這個可能性的是托洛斯基的理論）的是，違背俄羅斯革命的精神、列寧主義的異端邪說。

一國社會主義論發表之後，在黨員、國民之間引起強烈的共鳴，而獲得了作為黨正統教義的地位，並被接受為國民信條。1920年代的黨內鬥爭中，一國社會主義論

的正統性受到質疑，並以引發激烈論爭，但到了 20 年代末期，史達林派獲得勝利之後，確立了其正確性。到了 30 年代，一國社會主義成爲由國家權力所保證的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對他的批判和質疑被當作和「托派」一樣，是罪惡的一端。

根據正統主義者的說法，一國社會主義的論爭中，史達林之所以能獲得勝利並確立其正統教義地位的原因，在於：他是列寧主義的正統解釋，且在理論上是正確的。所以在蘇聯的史達林批判後，共產主義的論爭中（如中蘇論戰），一國社會主義的是非對錯並沒有成爲爭論的議題。也由此可知，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及教義的正統性是爲所有「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領導者們所共同接受的。

史達林說，否定一國社會主義可能性的主張是不相信俄羅斯國民力量的悲觀主義，是與列寧無關的孟什維克立場。但正如許多人所指出，否定一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的，並非托洛斯基個人的見解，而是當時黨的共同立場。一國社會主義論發表之前，所有蘇聯領導者都不相信憑俄羅斯一國的力量就可以到達社會主義社會 -- 連史達林本身都不例外。他在發表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幾個月前曾說：「一個國家，尤其是像俄羅斯這樣的農業國的力量，不足以達到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和社會主義的組織化...」而且說：「一般來說，這就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列寧主義理論」。當時的蘇聯共產黨採取否定一國社會主義可能性的立場，其實是對社會主義基本觀念的邏輯結論 -- 黨的社會主義觀念是：社會主義秩序無法和民族基礎兩立，社會主義是國際規模上才能夠成立的。

列寧等俄羅斯革命的領導者們對社會主義的共同看法是：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後的秩序，是以資本主義所達成的生產力、文明爲基礎，並把它更高度化社會。據他們的見解，「在資本主義下，生產力已發達到無法和民族障礙兩立的地步時，在邏輯上生產力更進一步高度化的社會主義時代，國族國家不可能成爲社會主義社會的架構，社會主義在國族國家的架構內不可能達到完成的地步。」

「國際主義並不是抽象的原理而是經濟事實的表現。」「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於民族基礎上，但不可能在這個基礎上完成。」--托洛斯基的這些說法代表馬克思社會主義觀。因此，將社會主義置於民族主義架構內的「民族社會主義」就是反動思想。所以假如以一國社會主義論以前的黨立場是正統時，一國社會主義論才是異端思想。

隨著時代的變化，社會理論、教義受到修正是極爲自然的事情。假如一國社會主義論也依據合理根據加以修正並明白說出時，就可獲得理論說服力。但史達林所做的

是，加以修正卻又否認修正，因而在邏輯上無法得到一貫性。假如要修正邏輯化，就必須從根本上檢討與「一國社會主義“不”可能論」表裡一體的傳統社會主義觀。也就是說，「如何才能使古典意義下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做為資本主義後的秩序的社會主義，在民族國家的架構內完成」（如果這樣做，可以保持古典社會主義觀，但必需修正其架構），或者是將「在民族架構內所建設的新秩序稱之為社會主義 -- 也就是對社會主義予以新的定義」。如此才能使一國社會主義論獲得邏輯整合性、合理論據。但史達林完全沒有做這些工作。所以一國社會主義論，由於史實的扭曲和缺乏邏輯一貫性有著致命缺憾。但一發表就在黨內和國民之間引起激烈且廣範圍的共鳴而被當作正統主義接受。因此其所以如此被接受的理由，不能以理性或邏輯來解釋。

20年代的蘇聯和30年代以後的蘇聯不同的是，教義不可能以權力逼迫人民接受。教義的是非是在黨的會議上，由領導們的公然爭論來決定。雖如此，一國社會主義論卻迅速滲透於黨和國民之間，從下支持史達林，讓他在黨內鬥爭中獲得勝利。一國社會主義論之所以能夠迅速且廣泛被傳播的最大原因在於：這個教義的主調是，向國民、向民族感情呼籲，是訴求於民族主義的心理、心情而來的，而這種社會共鳴之所以能形成，與俄羅斯革命的內外諸條件的變化有關 -- 西歐革命的低潮，蘇維埃國家由於外交手段而提高其在國際上的威信，由於新經濟政策的成功，國民經濟得以自力復興……等等，在20年代中期以前發生的這些現實變化，使其與將俄羅斯革命的存亡寄望在西歐革命的傳統態度不相容。 -- 大多數的黨幹部已經成為精勵於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外交的行政官僚，而不再是革命家。佔國民中壓倒性多數且又是新經濟政策的最大受益者的農民，是傳統的民族主義者。從農村來的大多數勞動者也是如此。加之，戰爭、革命、內亂等相繼而來的慘禍，使人們之間產生疲倦和倦怠感，因而極端希求安定與秩序，迅速喪失其對可能引發動亂的西歐革命的關心。所以一國社會主義論中唯一明確的主張 -- 確信俄羅斯可以以自立完成社會主義建設 -- 引發了強烈共鳴。一國社會主義論是，對在新經濟政策下的俄羅斯的現實變化所產生的新心理、新態度等既成事實的適應與迎合。所以托洛斯基批評一國社會主義論所說的「史達林核心官僚都是以既成事實為根據」這並沒有錯。此後，史達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貢獻」幾乎都是既成現實的合理化，或以方便的手段使理論正當化。（如引進不平等工資制度、階級鬥爭激化論、國家權力的最大限強化、一黨統治的制度化等等）而這就是政治神話的誕生。一國社會主義論和所有政治神話一樣，為了訴求國民的心理、心情而單純化、圖式化，因而比理論性呼籲更具有更深、更廣的滲透力。不久之後，一國社會主義論升級為第三國際的神聖原則，使第三國際改變路線承認俄羅斯社會建設的優先權。1929年12月21日，史達林50歲生日時，第三國際書記處以提倡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歷史貢獻作為讚美史達林的重點，而且在幾乎同一時候發動，以工

業化、農業集體化爲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建設，也是以一國社會主義論爲口號而全力推行。這種社會主義建設所引起的政治、經濟、社會變動，在1936年12月的新憲法中，被認定爲「基本上已建設了馬克思所意味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爲，在所有制方面，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所有已成爲支配性的所有權關係；社會的階級構造已經消除剝削階級而由勞動者、農民（主要是集體農場的農民）、勤勞知識份子所構成；馬克思所說的「按勞分配」已成爲分配原則。於是，史達林認爲現實已證明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正當性。所以可以說，1936年的憲法就是一國社會主義論的勝利宣言。

問題在於：在短短的六年內就「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的這個說法，是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方法。在史達林思想裡的社會主義，是缺漏了「人的解放」這一個社會主義根本目標，只是形式上的機構論而已。列寧在1920年說：「我們現在還不能引進社會主義秩序」。針對這種說法，托洛斯基認爲並不是悲觀主義，而是「歷史的現實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共識。30年代的社會主義觀點是全面否定這個「共識」而成立的。

一國社會主義的教義化和實踐是民族主義在社會主義歷史上的勝利，所以也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上的重要轉捩點。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結合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當一國社會主義成爲教義後，馬克思主義就和民族主義妥協了。因此人們誤認爲，古典馬克思主義所謂的國際主義是19世紀的落後信條，20世紀是民族主義的世紀，而符合20世紀的教義就是一國社會主義。（待續） ☆

（註一） 在西方世界，許多人誤會「一國社會主義論」是「革命論」--即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本質是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不依靠歐洲革命的援助就可掌握權力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因此一國社會主義論由於俄羅斯革命的勝利而以或證明其真理性。因此，如以「革命論」看一國社會主義論，（而不是從「秩序的性質」）來看，一國社會主義在思想上，在實踐上起源於俄羅斯革命的說法（如史達林）是有道理的。

編輯報告

台灣變天已經一週年了，我們究竟應該如何來看待與評論陳水扁政權？

劉鳴生〈變本加厲，哪來輪替？〉，批判陳水扁與李登輝兩個右翼政權之間的延續性，因此根本不存在歐陸國家左右政黨之間輪替所出現的政策大幅改變，只有變本加厲的政策延續；作者並進一步指出資產階級民主的侷限性。

《左翼》過去多次報導有關尼加拉瓜勞工反抗惡質台商壓迫的過程，現在我們很高興地向讀者報告：尼加拉瓜年興紡織正太廠勞工經過一年多與資方的抗爭後，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小組〈抗爭年餘 終獲勝利〉，針對運動的勝利落幕作了簡短的報告。成員之一的蔡志杰〈資本全球流動下的勞工權益與勞工連結〉，則分析在全球化的時代這一國際勞工運動串聯成功的原因與意義。

自從勞動工時由每周四十八小時縮短為兩週八十四小時後，站在資本家一方的勞委會近日對每週縮短的六小時提出「下班時間」這一奇特的解釋。關工韻的〈批判勞委會有關縮短工時的解釋〉，特別分析勞委會在使用「下班時間」這一概念的荒謬性及其在計算加班費時對勞工的不利之處。夜讀五車書〈一盞寒泉薦秋菊，羅紗憑欄空悲切——關於工資的說明〉，對於工資的概念進行理論的分析，同時批判了勞委會對工資解釋上的矛盾與荒謬。

針對卡維波與林深靖過去一段時間在《左翼》上的論辯，汪立峽〈反卡維波論述提綱〉亦加入了戰局，他指出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對性與階級政治關係的重視，並質疑卡維波「到處都是戰略」這一主張的可行性。

近來，我們常常收到一些來自大陸地區的稿件，小堡佬〈質疑對蘇聯解體與“和平演變”的評論〉，就是一位大陸友人對於當前中國大陸有關蘇聯解體與和平演變論述提出的質疑，作者並提出他對蘇聯解體原因的解釋以及應該如何看待「改革開放」。

繼對於社會主義原始積累問題進行深入的分析後，黃志龍接下來將他對列寧主義與斯大林主義歷史關係的觀察心得整理成〈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一文，提供《左翼》連載，這個問題的重要性，誠如作者所言：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決定了對俄羅斯革命的評價以及對「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歷史定位等有關歷史學爭論的見解。

我們希望在《左翼》上面對於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驗回顧所進行的討論，能夠幫助大家釐清問題所在，提升認識水平，破解主流社會似是而非的曲解論述。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能進而尋思下一步應走的道路。

左翼 第十九號

出版日期：2001年5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com.tw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二十號



〈抗戰〉

作者：梅健鷹

中間的迷思—— 山盟，泛藍與慘綠之間？

林深靖 / 2

【運動現場】九二一災民與台灣失業勞工同命運！

災 盟 / 6

台汽客運走入歷史……

台汽工會 / 10

【爭鳴與求是】鄉鄙之歌

何六九 / 12

如何站起來？怎麼走出去？

郭力昕 / 28

時事雜感

何 苦 / 33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二〉

黃志龍 / 36

中間的迷思

—— 山盟，泛藍與慘綠之間？

林深靖

一股浮躁、游移、懸盪、不確定的氣氛，像暴風雨前的烏雲一樣，籠罩在福爾摩莎的上空。阿扁就職總統一週年，帶給台灣最普遍的感受是：「真實感」的消亡。

為紛亂的政局尋出路

過去確信的，如今心旌動搖；過去服膺的，如今滿腹狐疑。台灣數十年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的積累與犧牲，將少數幾位幸運者推上權力的巔峰，幸運的當權者卻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將運動的理想與改革的信念推落谷底。多少政治承諾轉眼間成為空言戲語，多少寶貴的社會資源浪擲於空轉虛耗！沒有人說得清楚，阿扁究竟「要」或是「不要」什麼，「做」或是「不做」什麼。

做為新政府的最高決策者，阿扁這一年來，南來北往，東拉西扯，但是話語始終閃爍，面貌日愈模糊。除了在公營、官股產業鋪排親信人馬時展現高昂意志之外，施政未見方針，規劃未見格局，經濟一路下滑，社會日趨下流，這種「溜滑梯」的政治，成為八卦與狗仔的樂土。整個台灣社會陷入偷窺偷情偷安的亢奮之中，在一片閑言碎語的氣氛之下，「真實」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話題與聲色。

而幾經撕裂互噬的國民黨，從雲霄朝廷跌落凡塵荒野，反而出現重新黏合的跡象，先後從國民黨離散出去的新黨和親民黨，又拾起從母體脫落的臍帶，三個本源一體的政黨牽牽扯扯，拼貼成一隻三個頭顱的藍色異形，媒體普遍以「泛藍軍」或「汎藍軍」稱之。在語義上，「泛」者，淺薄也，譬如泛泛之交。「汎」通「汜」，意指過量而造成的災害，譬如洪水汎濫，譬如色情汎濫。泛/汎藍軍最大的問題，一是淺薄，不談綱領思想政策目標，只有私己利益的計較和苟合；其次是過量，不明不白的龐大資產，使得這個沒落大家族的成員只著眼於遺產繼承的攻防，喪失自力更生的意志，彼此之間，分得不乾脆，合得不情願。而立法院中與其實力不相稱的席位數量，也使得整個在野組合浮腫虛胖，既無力在制衡位置上開創新政局，只有死皮賴臉拖累執政者的蠻纏瞎幹。

綠色執政，從「新手上路」的嫩綠，到屆滿週年時，竟是一片慘綠。在野的藍軍，漫氾開來，成為台灣社會更大的災害。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山盟」成立。施明德、許信良、陳文茜、趙少康、廖正豪、黃石城、王清峰、朱雲鵬、孫大偉、陳文茜、溫世仁、趙少康、薛琦、賴聲川等人共列為發起人。2001年6月8日的成立記者會上，他們宣告要扮演「費邊社」的角色，結合理性的力量，「為紛亂的政局尋出路，為苦悶的社會找答案」。在成立宣言中，他們指出：英國費邊社的成立，是有感於當時社會對資本主義欠缺反省，山盟的成立是由於台灣政治人物對權力缺乏反省。

既安全又左右逢源

媒體普遍對這樣一個新的政治組合樂觀其成，視之為夾處於藍、綠兩軍之間的「中道」力量。文化評論名家張大春在《勁報》的專欄中預測「山盟」的成員在半年後將大增，因為，「畢竟失意的人要比得意的人多很多。他們左道走不通，右道也走不通，於是很可能竟然成了中道。」

台灣社會對於所謂「中道」或「中間」力量，似乎有一種近乎浪漫而頑固的期待。當朱高正籌組「社會民主黨」，左批國民黨「爛黨」，右罵民進黨「亂黨」時，就有不少文化人寄望他發展「中道」的力量。2000年的總統大選，連戰陣營也以「中道」來包裝候選人那畢生養尊處優而顯現出來的敦厚愚驚形象。陳水扁則公然以「新中間」來做自我漂白與定位。

對政治人物來說，「中間」顯然代表了一個超然的位置，既安全又左右逢源。在《台灣之子》一書中，陳水扁說他的「新中間路線」是要超越省籍、族群、政黨與統獨的矛盾，以建立政治上的最大公約數。如今，「山盟」要做為超然的中道力量，大概也超越不了阿扁「新中間」的講法。

在人類歷史上，衝突與矛盾其實是社會進步的源頭活水。當然，這其中有大衝突小衝突，有真矛盾假矛盾，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應該是從這些衝突與矛盾的辯證互動中去尋索社會進步的力量與方向，而不是故作超然地站到「中間」，自以為是地扮演「大和解」之神。不直接面對社會實存的衝突與矛盾，不深入探究這些衝突與矛盾的根源，動輒就要「超越」，就要展現「中間」的美德，這是偽善，是欺妄，對選民而言，是包藏禍心的鴉片。

陳水扁曾經在大選前刻意到倫敦政經學院向季登斯（Anthony Giddens）取經。季登斯做為英國工黨的「國師」，是「第三條道路」或「新中間」的理論建構者。季

登斯寫過《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一書，其副標題是「激進政治的未來」(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季登斯自許為「政治激進主義者」，而他在該書的導論中就提到：「政治激進主義思想長期以來主要是與社會主義思想聯繫在一起」，他的「超越左右」基本上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於西方歷史發展上的對話和反思(reflexivity)。

儘管季登斯的論述有許多值得爭議之處，然而，他至少經歷了面對衝突，解析矛盾的這個思辯過程。在英國撿了便宜的阿扁，卻全然跳過這個歷程，回到台灣就大賣其「新中間」與「超越」。結果，阿扁如願以償榮登大位，但是在總統的寶座上，屁股是大了，腦袋卻小了，空洞的「新中間」，如今是不敢面對現實的游移與閃爍。

爲了強調他對經濟的賣命，阿扁說他願意爲資本家洗腳、綁鞋帶。這樣諂媚的用語，別說是社會主義者，連「radical」的人都會嚇壞。缺乏社會主義的質素，「新中間」根本沒有任何意義可言。當然，在台灣特殊的處境下，「新中間」可能被偷渡爲「超越統獨」的口號。但是，在政治現實上，所謂統、獨的中間，無非就是維持現狀，在民意調查中，維持現狀可以是一個安全的、絕對囊括大多數支持者的選項，卻是一個「虛設」的選項，因爲維持現狀是建立在歷史時空停滯的假設，長遠來看，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一般民眾可以藉由這個虛設選項自我安慰，做爲政治上的決策者，若是以這種虛設來麻痺自己，那是愚昧；若是藉此來蒙蔽選民，那是罪惡。

尋找行動的信號

山盟的「中道」，沒有什麼理由可能超越「新中間」。山盟以「費邊社」(Fabian Society)自許，費邊社做爲一個議政論政的知識菁英團體，在英國有上百年的歷史，它所出版的小冊子，在自我介紹的部分，都會寫上：費邊社是「自1884年以來即網羅了有思想，而準備討論有關民主社會主義問題的社會主義者；並且爲了在這一變遷的世界中，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他們不斷提出實際的計劃。」這一段話涵括了三個重要的、自我定位的質素：一是思想，二是社會主義，三是實際的計劃。而這三者，正是山盟所欠缺的。以山盟目前的成員來看，他們最頻繁接觸的是記者，不是書本，也不是工農大眾；他們最熱愛的是一閃即逝的鎂光燈，是瞬間的繁華與榮耀，絕不是艱苦、長期的勞動與經營。

曾任費邊社領導人的喬治·柯爾(G. D. H. Cole)在1941年發表了一本題爲《費邊社會主義》(Fabian Socialism)的小冊子，他在書中所描寫的英國三、四〇年代的社會，其實與我們今日生活的台灣並沒有太大的差別。他寫道，在政治生活上失

去領袖的英國人民，每天週而復始的生活情境是：「有在數量上和種類上不斷增長的廉價的娛樂活動，尤以電影為最；有上下班日益遙遠的路程，這使家庭除週末外只是個宿舍而已；而工廠成為下班鈴一響即急忙散夥的地方；有無線廣播電台，它只是把新聞和謠言傳到家中，而不是使人到酒店或政治集會上去；有報紙，其中的大多數處心積慮地在真正的政治內容上變得空洞無物而代之以大量瑣碎的八卦……」這一段敘述，時隔一甲子，卻只要把其中的「電影」改為電視，把「酒店」改為巴黎公社咖啡屋，就是我們今天所過的日子。

柯爾認為費邊社做為政治組織，其責任即在改變這樣的生活狀態。他認為，對於政治工作者而言，機會將是巨大的，但危險也大，「如果因我們沒有事先共同考慮我們將要幹什麼，從而草率行事，我們將聽任那些為了自己的目的而深思熟慮並結合在一起的小集團所擺佈。」顯然，在他那個時代，他已預見了「新潮流」的危險性。

這位費邊社的思想家，還做了更危險的預言，他說：「未來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將是在大企業的支持下，從保守黨的隊伍中產生出來的。」他警告我們，要小心長榮和長榮所支持的政治黨派。

那麼，要以何種形式的策略，來預防這些緊迫的危險呢？他說：「我們必須重新創立社會主義運動，把這種運動做為一種道德信仰，而不僅是作為經濟上喜愛這種社會組織形式甚於另一種社會組織形式的表示……我們這一代正在尋找信號，尋找行動的信號。」

凡是對費邊社有興趣的人，至少應該看到這樣的信號。這是柯爾對山盟的友好建議。他還語意深長地感嘆道：「讓左派政治陷入銷聲匿跡的境地是災難性的！」他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在台灣，真正嚴重欠缺的是左派，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所謂「中間」。

★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九二一災民與台灣 失業勞工同命運！

災 盟

由於面對全球化的市場血戰，台灣資本不是外移出走，便是就地陣亡，因此，失業人民與日俱增直線上升，從而，失去了穩定收入以繳還房貸，半生血汗所購置的安身立命之所，便遭到銀行無情地查封法拍，所以，許多勞工的命運便從就業被迫失業，從「屋奴」向下沈淪為另一種「災民」！

因為，失業勞工與九二一災民的現實悲慘處境極為相似，家宅、頭路以及人生未來皆化為烏有！從表象看來，九二一災民是由於地震所產生，而勞工「災民化」則是經濟性災難所造成，然而，究其根源，兩者咸肇因於「體制化」人禍！

九二一人禍的元兇之一——偷工減料，絕不能僅以「官商勾結」乃至「政商一體」這般道德化批判觀點來予以理解，而是台灣資本主義不斷發展下，住宅被徹底市場化的必然結果！當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灣總體經濟與人口同步快速成長，農村剩餘勞動力被擠壓至都市或周邊衛星城鎮，從而對脫離大家庭而獨立居住的需求就自然暴增，因此，房地產，當然成為資本開發與追逐暴利的新商品，加上大眾游資充斥，卻無股市或其它投資場域予以分散吸納，只好集中湧進房地產市場，將房價地價競相炒作推高！

縱觀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發展史，從無例外，暴利或謂之超額利潤的下一階段，鐵定導致市場競爭加劇，由於營建產業並不具有太高的技術門檻與資本門檻，再者，從日本沿襲而來的「預售屋」制度，引誘了非營建資本、地方政治派系資本、地主階級以及經營小生意致富的小資產階級等，如蒼蠅看到牛屎般地趨入房地產市場！台灣由於國共鬥爭失敗的經驗，並且要發展加工代工出口的資本主義，是以，必須形成中央集權集錢的政治體制，地方政權在長期無法享有招商自主權與產業規劃權下，就只能朝向土地炒作與住宅興建及公共工程尋求「貪污謀利」的空間，這也就部份說明了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區域選舉的主要政治獻金來源是土地營建資本，以及地方政治派系是以土地營建資本為經濟主體。

暴利除了加劇市場競爭外，同時也必將致使金融資本相隨吸血！於是乎，金融資本更推波助瀾地扮演這些要成爲營建資本的金援者角色，不是浮貸濫放以助其買空賣空與逃漏稅外，便是挪用存款以高利貸借其2500萬(建設公司的法定資本額)來通過經濟部的形式化審查，得以成立合法立案的建設公司，這也就是日後「一案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林立之故，也是許多集合式住宅受災社區無「法」求償的人禍起源。

「一案公司」的核心意義不在於其規避法律責任的道德層面，而在於其爲逐鹿房地產市場開方便大門，是以，市場供需關係從需大於供快速地扭轉爲供大於需，營建業平均利潤率急跌驟降，資本要再積累，別無它法，唯有節縮成本，那麼，偷工減料勢在必行，無關良心道德！甚且，民國83年實施容積率管制，催動了營建資本搶建風潮，熟練技術勞動力供不應求，爲偷工減料提供了雪上加霜的助因！所以，九二一大地震只不過是暴露偷工減料的自然外力，市場經濟，才是偷工減料的體制性根源！

至於非公寓大樓住宅的震毀，諸如傳統社區、農村聚落、三合院、販厝、原住民部落、客家夥房，以及座落於斷層帶上的住宅等，乍看之下，是國家機器長期對於地震危害毫不設防所致，亦即是統治政權漠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道德」問題。然而，以「道德」觀點詮釋雖容易找到「人禍兇手」是誰，但是，卻更容易產生這樣的簡化推論，即以「好」政府取代「壞」政府，並且，也很難邏輯一致地看待，統治政權對於防癌(如乳癌、子宮頸癌等)的積極宣導與免費檢測、胎內嬰兒健康的檢測與預防，乃至於立法強制機車騎士戴安全帽、酒後不得駕車等爲保障人民生命權的政策作爲，與極端輕忽地震危害的懸殊差異？

當然，這一方面，是由於上述“非地震”危害人民生命的死因，皆可表現爲定期增長的數據化趨勢，是以，在一定程度上較爲引起統治政權的警覺與重視，而地震作爲一種難預測、非定期、低頻率發生的災難，是連整個台灣社會都不設防，遑論「知覺」落後遲鈍的政府？

另一方面，對非地震危害人民生命的死因防治工作，僅需在既有的行政建制擴大業務範圍，如公共衛生系統與警政系統，所以，政府預算支出對此方面增加的額度不大，但投資報酬率卻高，更重要的是，對這些死因的防治工作絕不會阻礙台灣總體資本的積累，甚至於促進某些產業的發展，例如醫療、藥品與安全帽製造等。

但是，若要對地震進行有效的防治，就必須全面檢測所有建築物的耐震強度與施

工品質，這首先在執行人力方面，就遠遠超過目前政府建管單位的負荷，假使委託民間專業技術人力（如建築師、結構技師、土木技師、大地工程技師、學者教授等）執行，則所需經費驚人！

其次，一旦對公共建築物落實檢測，就形同捅出黨政、民代與營造資本、黑道之間難見天日的蜂窩！任何一個不太愚蠢的統治政權都不可能拿磚頭砸自己的腦袋！國民黨政權不可能，民進黨政權亦復如是，因為除了舊行政官僚將從中掣肘外，民進黨執掌地方政權與進入各級民意系統多年，絕難清白脫身！

再者，全面檢測民宅之後，耐震強度不足者必佔絕大多數，則其拆除重建或修繕補強的費用從何而來？斷層帶上居民的遷建怎麼處理？在新宅完工之前的安置問題又如何解決？因拆除重建所引發的各種土地所有權的爭議又怎麼搞定？不難想像，國家機器必須付出龐大的公共資源方能竟功，而這僅僅圖利壯大了內需導向的營建資本外，卻高度排擠了對其它產業資本積累所「合法」輸送的公共資源，這包括政府預算的排擠、資金的排擠，勞動力的排擠、教育與學術研究資源的排擠等，這對向來以加工代工出口導向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是極其不利，因此，絕不會被國家機器所接受。更何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系統，也打死不會成為自個兒的「麻煩製造者」！

至此，我們就能充分地理解，國家機器對地震危害的輕忽，政府對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漠視，不是單純的統治「道德」問題，而是為了服從台灣在國際分工的半邊陲位置下，以加工代工出口導向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之必然結果。

另外，必須強調的是，國家機器絕非對地震危害毫無設防，否則就很難解釋，為何沒有任何一處加工出口區、工業區與科學園區是興建於斷層帶上！也沒有一座核電廠是興建於斷層帶上！更沒有任何一所重要統治權力機構是興建於斷層帶上！而維繫著台灣經濟命脈的科學園區之所以選擇在新竹、高雄或台南，除了具備各種有利於電子資訊資本積累的客觀條件外，還有就是遠離台灣歷史上發生地震的震央高頻區—台灣中部與花東地區！

也正由於台灣中部位於地震震央高頻區，就部份說明台灣中部長期不受國家機器的“青睞”，而未將重點工業或策略性產業規劃設置於該區域內的原因，從而，國家資源在資本積累需求的分配調撥下，就必定減少對台灣中部提供基礎建設的公共投資，則更進一步阻卻了產業發展，形成了惡性循環的現象。

尤其以南投來說，正是在此一惡性循環的邏輯下，一直對外交通不便利，直到近年，唯一對外往來的交通幹道中投公路才興建完成。是以，南投便命定地成爲貧窮而封閉的地區，這也就是何以南投人民的自殺率始終高於台中縣市二十多倍，災民自殺人數佔總數百分九十以上之故。而只能在發展農業和觀光業的客觀條件下，人口外流程度遠甚於其它地區，所以，在九二一地震過後，人們才會在南投猛然“發現”大量的獨居老人、單親家庭、失依家庭、中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家庭與失業家庭等特殊弱勢災戶。

其實，國家機器並非全然漠視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而是「選擇性」地漠視，而決定「選擇性」的關鍵邏輯就在於，公共投入與資本產出的效益比，以及有助或妨害台灣總體資本的積累。以此兩項原則來檢視國家機器對其它非地震的自然災害防治態度，就豁然頓悟；例如，經常遭受颱風後水患之苦的汐止，政府之所以長年拖延消弭水患的公共工程，最根本的原因是汐止並非資本積累的群聚所在，倘若汐止換作新竹科學園區勞工集中居住的社區，即使花費再多的政府預算也連夜動工，因爲一次水患，就可能讓新竹科學園區停工三天！又如，對土石流的事先防治總是無動於衷，或是在新聞揭露悲慘「災情」後，才被迫亡羊補牢！理由無它，受到土石流威脅之處皆是窮山僻壤，資本敬鬼神而遠之，假如某山區是生物科技資本的園區，則即使土石流侵害的機率幾希，國家機器也將慎重地採取萬無一失的防治工程！

最後，再從階級屬性來看，集合式住宅的受災戶其實是從鄉村擠壓出來的過剩勞動力，進入了資本僱傭關係，而以工資所得購買公寓住宅的無產階級，若是上升成爲資產階級者，其所購買的住宅不是高級透天別墅，便是無須偷工減料的華廈，而非集合式住宅的受災戶，則是外移回流或是被迫死守鄉里的農工階級，甚至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被遺棄的社會底層邊緣人。

職是之故，對九二一大地震所造成廣大苦難與壓迫的考察，不僅要去「天災」化，更要去政府化，亦即，人禍根源不是「漠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政府，而是以加工代工出口爲導向的資本主義體制！而政府，或是國家機器，只不過是「漠視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劊子手與壓迫的具象代表而已！所以，九二一災民與全球化下的台灣失業勞工，不僅被壓迫的處境相似，而且，所對抗的敵人更是一致，目前與未來都應當「人民鬥陣，車拼相挺」！

台汽客運走入歷史……

六月三十日台汽工會西站現場文宣

台汽工會

過了今天午夜，普及又安全，陪您一起長大的台汽客運就要消失了！

台汽的虧損，是因為路線釋放給財團派系，是因為公司必須政策性收購水準參差不齊的違規遊覽車，是因為作為公營事業必須照顧偏遠地區民眾，必須承擔義務支援救災的責任！

但是，員工何辜？員工家庭何辜？台汽結束後，上千個家庭陷入絕境，政府卻說台汽員工就業都已安置妥當事實上，平均年齡47.6歲的員工，在失業率高漲的今天，能往何處去？

台汽工會對於交通部硬性結束台汽營運感到悲哀，更對交通部無視台汽一千多名失業員工的處境，感到無比的憤怒。從27日開始，台汽員工每天進行「如影隨形」行動，希望交通部長葉菊蘭能正視台汽員工的苦痛、而不要只為國光公司強力背書而已。然而，部長有時間參加慶典、看展覽，卻沒時間理會在外苦苦守候的員工，甚至乘車加速逃逸、幾乎衝撞在場員工。葉部長不負責任至此，失業的台汽員工只好持續加強力量。

從簡單的算術中，就可以看到台汽員工究竟還有多少沒有工作、究竟還有多少未獲得交通部承諾的「全面就業安置」：

3210（員工總數）－1090（集資國光員工—內含轉介至其他公營單位的80人）－265（資遣後移轉國光—國光已無缺額）－48（其他轉介至公營單位者）－24（轉業至其他民營客運業者）－660（辦理月退休者）
＝1123（未來尚無出路，只能領移轉民營條例最低標準6＋1平均工資）

交通部多次對外宣稱已經為所有台汽員工安排出路，只是因為台汽員工「不願意就業」而已！實際上，交通部、勞委會所舉辦的北中南三地的就業博覽會，成功辦理轉業的不到三十人！若政府真的已經做到百分之百就業安置、真的確實能提供台汽員工能養家活口的適當工作，台汽員工何須一再走上街頭？

台汽員工平均年齡47.6歲，在家庭最需要時還面臨中年失業的危機、轉業又困難，若葉部長持續漠視失業問題，勢必會產生更大的社會問題！

交通部力挺國光公司，但是國光公司成立過程草率，集資過程又違反公司法。區區三億多資金又如何能在市場競爭，最後黃金路線和黃金地段還是落入財團手中。現在國光還未上路，員工已群起不滿勞動條件大幅下降。國光公司真能保障大眾行的權益！？

您知道嗎：

私營客運為利潤不顧安檢和員工健康！

私營客運為賺錢不願正常行駛偏遠地區！

只有台汽才能提供安全的大眾運輸工具！

只有台汽才願不計成本行駛偏遠地區！

只有台汽能制衡私人業者哄抬票價！

只有台汽才能在天災人禍時義務救援！

損失的不只是台汽員工！

工會爭的不過是一份穩定的工作，一個有希望的未來，這是台灣所有普通老百姓的願望。今天是公營的台汽結束營運，明天就是私人企業的裁員關廠，我們有著同樣的命運……



鄉鄙之歌

何六九

在民族運動堪稱最爲歷史悠久的英國¹，民族認同曾經在歷史上一再產生強大的凝聚力，在許多方面幫助形成了這個國家的面貌。這股力量使得這個老牌民族國家的人民，在歐陸強國虎視眈眈的險惡國際環境下，同心協力渡過了過去數百年間一再來到的重大危難，使得這個當年的寡民小島國發展成爲歷史最爲悠久的穩定民主國家，並且一度執世界經濟、科技之牛耳。但是，很多近代政治評論家和學者不約而同地觀察到，除了在大戰期間而外，英國人在過去近百年來卻以相當冷漠的態度對待自己的不列顛民族主義²。倘若今天有人在這個國度裡登上講壇高談闊論不列顛民族概念或者愛國主義，肯定會引來聽眾們不耐地哈欠連連。如果執意要大張旗鼓提出民族復興或者愛國統一之類的主張，來當做競選綱領，恐怕要遭人笑話，再不然就要被社會一般當做是喜歡鬧事的狹隘種族主義者看待。

難道這是一個過氣帝國的子民，已經到了人心普遍渙散的地步，對於自己民族前途毫無信心？這又不然。聯合王國雖然不再有當年日不落帝國的光環，卻仍然是一個令人敬佩的經濟、科技、文化大國，甚至於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軍事大國。這個社會仍然不斷培養出眾多世界級的傑出文學家、科學家、思想家、藝術家，仍然享有它的公民的無比忠誠和熱愛。這還是一個精力充沛、在各個領域都能夠不斷向上提昇、繼續創新的社會。

在戰後的法國和德國，我們也可以看到相類似的情形。這兩個國家的人民過去曾經在各自的民族主義旗幟下，把對方視爲不共戴天的世仇，數度大動干戈，血流成河。一個拼命要保住或者“收復”一、二百年前從日爾曼人手中以武力強行奪得的亞羅二省，另一個則非要“解救”那早已深深受到法蘭西文明燻陶的日爾曼裔同胞不可。雙方都不曾虛心聽取亞羅二省日爾曼裔人民的真正意願³，卻都以爲自己有著復仇雪恥的神聖使命。經過幾次犧牲極爲慘重的戰爭之後，這兩個社會的人民終於猛醒過來，不再輕易爲“民族尊嚴”和“收復失土”的口號而盲目激動。他們的統治階級不再能夠輕易利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以驅使人民去充當炮灰，向對方發動戰爭。數年前東西德的統一並沒有促成日爾曼民族主義的狂飆。民族自省仍然是當今眾多德國人所鑠而不捨的課題。法語與德語通用的亞省斯特拉斯堡市，不再是

任何一方私有的神聖領土，反而被選定為當今歐盟機構所在地的重鎮，成為歐洲各民族和睦寬容、攜手合作的象徵。

這個現象應該是不難了解的。任何一個社會都應該有著遠比土地歸屬或者自豪感更為重要的課題。如果通過自己社會上多種較為理性的渠道，就足以適度界定自己當前的共同需要和未來的展望，從而產生凝聚力來協同努力達成，又何必成天聽取那些震耳欲聾的民族大義吶喊？社會共識若能夠通過多元互動的意見交流過程來達成，自不需要那些不講道理、嘩眾取寵、唯恐天下不亂的“愛國流氓”上下其手，禁絕相異意見、壟斷社會輿論，把有關區區一寸見方土地的小事端無限擴大，成為事關全民族生死榮辱的天大問題，把整個社會帶上危險的道路。對於見過世面的世界級民主社會的公民而言，無端亢奮的民族激情豈能不是廉價濫情、俗不可耐？

英國人不是早在百多年前就說過“愛國主義是惡棍們的最後避難所”嗎？這句話肯定是在不齒“愛國流氓”囂張猖狂行徑的情況下所說的。怪不得，他們總是對於不知節制的民族狂熱嗤之以鼻。他們之中有人形容這種激情發作是“鄉鄙根性之害”⁴。用句較為通俗的話來形容，他們其實是在譏笑那些夜郎自大的鄉下佬，對於現代政治文明的見識十分有限，沒有能力掌握諸種較具豐富、明確內涵的政治概念來了解當今世界和界定表達自己的需要，只知道玩弄幾個煽情的口號，謀圖在政治上興風作浪。如此說來，對於高音貝民族主義吶喊缺乏胃口，莫非是成熟文明社會裡的常態？

有趣的是，在英國本土早已經缺乏市場的不列顛民族情操，卻在許多北愛爾蘭新教徒當中越發炒熱起來。長久以來，他們緬懷新教徒過去曾經征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光榮歷史，每年定期用大遊行方式向當地天主教徒示威和露骨表達自己的優越感。他們強調新教的宗教認同⁵，要求人們尊重愛爾蘭曾經長期臣屬英王陛下的歷史傳統，誓與英倫祖國永不分離。他們甚至於不惜一再訴諸血腥暴力，可惜無法喚起英國本土的新教徒“同胞”們對於這個“民族大義”的關切⁶。英國許多研究調查一再顯示，大多數的英國人根本不在乎北愛爾蘭領土主權歸屬何方；半數以上甚至認為，北愛爾蘭應該從英國分離出去。北愛爾蘭新教徒很是不滿。因為英倫祖國的“同胞”寧願為遙遠偏僻的福克蘭小島一戰，對於近在眼前的北愛爾蘭反而毫不眷戀。可是在英國公民眼中，這些無比“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大概算是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吧。

鄉鄙復仇記

歷史確實充滿了無數令人驚訝的詭譎矛盾。

長期以來，常有人指謂，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用以掩蓋階級矛盾、欺騙無產階級

的思想工具。從過去和當前的許多事例來看，這種說法不能說是沒有根據。然而，在資本主義歷史最爲悠久的英格蘭，現在一般(包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反而最不在乎“民族大義”⁷。而人類有史以來最爲龐大的“無產階級專政”(至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如此界定)國家，卻舉國上下愈來愈把民族主義當做最爲神聖的政治原則看待，高過於無產階級的切身利益。這是不是說，接受民主體制規範的英國資產階級不再需要民族主義，而對於整個社會每一個領域所有活動都要嚴密規範的中國共產黨，反而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需要它？最老牌的民族國家的公民，不懂得珍惜自己祖先曾經統治長達數百年之久的領土；而在一個曾經發誓要超越這個老牌資本主義英國的後起之秀的“社會主義”國度裡，人們卻一再被曉示告知必須去霸佔大片從來不曾被自己的血親祖先所征服和直接統治過的領土。如此說來，民族主義豈止是資產階級所專利壟斷的統治工具而已⁸。

當前英國公民對於民族情懷索然無味，可是他們的國家在過去不列顛愛國主義日正當中時期開始的所作所爲，卻直接促使本來對於民族認同毫無所知的漢人⁹，展開了百年的漢族民族主義和民主政治的運動熱潮，迄今尚無休歇跡象。而這個被激起的漢族的運動熱潮，在廢除英國等帝國主義強權在華不平等條約、達成原來的民族解放目的之後，卻全盤推翻這個運動原來的另一個政治目標，徹底改弦更張，不但禁錮了本民族人民的身軀和心靈，而且以最大的敵意和最嚴厲的手段，來對待爲其所統治的“非我族類”以及不肯屈服於獨裁專制政權的同一血緣的民族或者族群。過去的四、五十年間，漢人民族主義不但沒有帶給海峽兩岸以民主政治健康發展的機會，反而成爲國共兩個統治集團用以抗拒民主潮流的思想道具。二者都不約而同地聲稱爲了“國家民族”的利益，以最殘暴的手段剝奪了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民族主義就這麼被挾持去充當壓制民主呼聲的滅音器，實行獨裁專制的藉口。

這個轉變免不了要激起另一波的民族反抗與民主要求的運動。其中的一個政治運動，在台灣打破了一個奉漢族民族主義之名的殘暴獨裁體制，開啓了漢人社會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民主新紀元。

而在這個新興的民主社會裡，過去曾經長期遭受民族壓迫的族群人民，並沒有在解除壓迫枷鎖之際，如同不少地區人民那樣推波助瀾地造成另一個民族主義的狂熱浪潮。相反的，一般對於嶄新民主體制的關注投入之情，遠遠超越了以往遭受歧視欺凌所積累的憤怒。他們一再表現出寬容的胸襟，寧願讓美好夢想通過有別於民族動員的另一種政治程序得以實現。一個建立在現代公民意識基礎之上的政治認同，開始形成。從英國到台灣，民族主義情懷的漲落歷程似乎快要走完一個曲折的歷史循環。

鄉鄙政治學

民族主義，這是一個多麼令人費解的歷史現象！讓我們來討論一下民族主義這一個意識形態本身。

從拿破侖戰爭開始的十九世紀歐洲和拉丁美洲，民族運動風起雲湧。從日爾曼人居住的土地，到愛爾蘭、意大利半島、波蘭、希臘、塞維利亞，甚至於偏遠的玻利維亞、墨西哥，都席捲在民族獨立運動之下。當時幾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以為民族運動主要是訴諸本能層次的感性，本身沒有什麼實質的思想內容可言。他們估計，流行一時的民族運動只不過是一個過渡現象而已，遲早會被人類文明的進步所超越。他們沒有預料到，民族主義在下一個世紀居然會有如此驚天動地的發揮¹⁰。

從十九世紀以來，歷史上固然出現了無數卓越的政治思想家，但是我們實在找不到真正出色的民族主義思想家。而二十世紀出現的眾多傑出政治家，充分了解當代民族主義的無比潛力，也依此而制訂若干影響深遠的政治策略，大大改變了這個世界的政治版塊。但是，他們並沒有對於民族主義的哲學基礎本身做出值得一提的貢獻。各地以民族主義運動理論家自居的人士，都不曾表現出令人心服的人文素養和思想能力。歸根究底，那是因為，除去了那些從各種政治理念和哲學思潮借取和套用的觀念和詞匯之後，民族主義的思想內容所剩無幾。一位聞名思想家比喻得好：民族主義是“不可分解和不可剖析的”¹¹。如果內容空洞無物，或者是胡亂地七拼八湊而來的，當然不值得分析，也無從認真分析。在民族運動造成近代歷史大動盪、衝擊了全球各地無數人生活的歷史背景之下，這毋寧是極大的諷刺。

每一個戰爭的開啓，無論是出自於如何見不得人的動機，決策者無不大作其正義凜然的宣戰文告，非要擺出師出有名的姿態不可。連古代的賊寇集團和當代的黑道組織，也要費心提揭一個“義”字，更何況現代的民族運動。其實，每一個政治運動之所以需要相應的思想架構，內在的考慮還是主要的。因為這是一個政治運動內部凝聚力的來源，不能不悉心建構。然而，人文思想上的條件越是貧乏，人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方向就越接近人類的原始性直覺。正如同稚童習慣在疼痛時喊爹娘一樣，大凡粗魯無文的無知鄉愚每當身處危難關頭的時候，總是要祈求於祖宗的保佑。於是，很多晚近的民族主義運動者從一開始都急切要從遠祖身上尋找自我存在的理論根據。除此而外，他們實在不知何去何從。

在此情況之下，明明是近代歷史環境下的一個相當晚近的產物，卻都要追溯遠古，把它說成是一個自古已有，等待被喚醒的事物¹²。明明是為了解決當前（而不是

自古已有的)政治問題而展開的運動，與久遠的先人毫無牽連，卻要吟唱“祖宗在注視著我們”¹³。問題是，每當人們追溯遠祖的時候，總是事實與神話不分，而且經常張冠李戴，穿鑿附會，甚至於憑空杜撰新神話。六十年前，有兩位學者嘲諷道，民族可能是“一起錯認祖宗”的結果¹⁴。在此情況下，講求嚴格考證的信史觀念都是多餘的，反正只要“信仰產生力量”就夠了。於是，荒郊野外亂葬崗上來路不明的鬼魂，突然之間被一批以孝子賢孫自居的人們供奉膜拜起來，奉為神聖無比的祖宗。亂認祖宗的荒唐事，經過一番的精心修飾設計，成為鄉鄙政治學開宗明義第一章，也適用為政治領袖人物心靈閉塞的遮羞布。孫文和蔣介石有關漢族民族主義的論述，都是很好的例證。

疫情蔓延

民族主義固然缺乏思想內容，卻是一個感染性極強的政治理念，在世界各地迅速廣為流傳起來，造成空前的大動盪。在二十世紀，民族主義成為世界各地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所普遍通用的政治利器。起源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這個政治理念，到後來反過來成為殖民地人民反抗這些國家侵略行為的工具。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很多地方的人民脫離了殖民統治。這個正面的反帝歷史意義是必須肯定的。

但是，很多的災難也隨著民族主義的發揚光大而到來。最常見的是，在同一個新獨立的國家之內，某一個族群或者宗教派別堅持自己的優越民族認同，歧視和壓迫境內的異類(包括那些經歷不同歷史經驗、接受不同文化或者宗教)人民。另一個同樣常見的悲劇則是，獨立國家之間因為不同的民族認同而不得安寧，甚至以最殘暴血腥手段加害對方，連婦孺都不肯放過。這樣的悲慘例子，多得不勝枚舉。

各地因為民族主義激情而產生嚴重負面後果的事例，都因為互異的當地情況而各具特色。可是，若是把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類似悲劇事件加以分析歸納，其中帶來最大禍害、最令世人忐忑不安的，似乎有一個共同的特徵——血緣觀，也就是當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混為一物的時候。遠的不提，近年來一再發生在巴爾幹半島的族裔滅絕慘事，就是很好的例證。這是其來有自的。

上一、二個世紀開始從歐洲流行的主要政治理念，大多具備相當完整的思想架構和豐富的哲學內容，在發展上都有相當久遠的歷史，以及各種人文思想條件的相輔補充。後進社會若有意加以吸收，都需要相當長時期的啓蒙學習過程，涉及了整個社會政治文化的自省和重建。對於向來與歐洲文明相隔閼、文明傳統差異極大的社會，這是很不容易的事。然而，民族主義則不然。這個同樣起源於歐洲的政治理念，正因為

缺乏足堪稱道的哲學基礎，所以十分容易被那些在現代人文素養上不甚了了的人們所效仿。(很多自以為承繼數千年悠久古文明而盲目自負的傳統社會，短期內消化不了現代文明的種種政治理念，往往錯把內容最為貧乏的血緣民族主義當作現代政治理念的最佳代表而加以全盤接受。)可是這並不稍減它在政治動員方面所可以發揮的驚人力量。它因此成為後進社會競相學習的對象。

只是，這些社會所模仿的，不是那種早已納入民主政治體制規範之下的英國不列顛類型的民族主義¹⁵，而是那個後來被俾斯麥和容克貴族集團所挾持壟斷的、以血緣為中心的日爾曼民族主義，以及亞洲開始崛起的血緣論大和民族主義。要模仿這種血緣民族主義，並不需要思想上的高度修養，即使是鄉愚也很快就會有無師自通的自信和發揚光大的驕傲。在一度沉醉於民族激情的德國社會，民族主義以外的政治理念早都有相當深厚的人文思想根基。這種政治文化方面的條件，可以在某程度上約束那些易於失控的政治煽動情緒，至少可以幫助這個社會在激情過後從事深思自省，走出非理性的祖宗崇拜狂熱，穩健成熟起來。在這個社會裏，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必須為種種的優質理念思考和綿密法制所共同規約，逐漸被公民意識的政治認同所取代。

然而，在刻意模仿血緣民族主義的後進社會裡，具有現代意義的政治文化條件往往不存在，或者嚴重欠缺，因此思想自律、文化自省的能力普遍相對微弱。換句話說，人文思想條件匱乏，不足對於發飆的血緣民族主義狂熱產生制約作用。政治情緒一經煽動起來，很容易可以星火燎原。那些承繼古文明的傳統社會，不但不例外，而且很多自恃祖先高人一等而更加沒有節制。激情發作之後若有舉國破爛局面，不但不能促進民族自省，反而為另一次血緣民族主義更猛烈的發作醞釀條件。這為後進社會的政治發展投下一個莫大的陰影。

鄉鄙二重唱

其實，後進社會所輸入進口的，除來民族主義之外，尚有其它政治理念，包括馬克思主義。當那些以無師自通而自鳴得意的民族主義理論家進一步要通曉其它政治理念的時候，教條主義乃成為一個殊難逃避的死胡同。思想貧乏是教條主義的溫床。並不是所有的教條主義者都是鄉愚，可是，鄉愚們總是對於教條情有獨鍾。

馬克思主義原本具有相當豐富的思想內容，不是民族主義可以望其背的。但是在幾乎所有通過民族運動而建立或者重新建立政權的後進社會，民族主義一旦在政治文化領域裏建立獨領風騷的主導地位，立即開始表現出對於其他現代政治理念(以及一般性的現代文明成就)的排斥，企圖依照自己的胃口和眼界來重新詮解其他的政治理

念——換言之，鄉鄙化。連有些以社會主義國家自居的地方，馬克思主義也逃避不了鄉鄙化的命運。即使在那些民族主義並沒有立刻壟斷政治文化的國度，馬克思主義往往抗抵不住文化貧瘠一再的腐蝕，而被狹隘僵化起來：整個哲學體系到最後變成幾個粗糙口號；一本小小的語錄冊子居然能夠重新闡釋和安排世間的萬般事理。

一個傳統社會如果一直沒有能夠及時培養出良好的文化條件，來消化那些具有豐富思想內涵的現代政治理念，到後來，鄉愚沙文主義發飆，對於鄉愚而言十分深奧難懂的馬克思主義在當地社會的地位，不能不被簡單易學的民族主義所架空或者取代。嚴格說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可能同時也是一個理直氣壯的血緣論民族主義者。但是在一個現代文化嚴重貧血的國度，人們見怪不怪。鄉鄙化的馬克思主義，反過來被用來為哲學貧困的民族主義背書，鄉愚哲學家乃更加理直氣壯起來。他們自以為是馬克思主義者，其實不過是閉塞而且狂妄的民族主義者罷了。這大概就是當今中國的境況，以“左派”自詡的台灣統派人士的思想寫照。

當粗陋的民族主義和狹隘僵化的教條主義匯合成為主流政治文化的時候，文化流氓和政治強盜必定橫行無阻。一群指鹿為馬的鄉愚政治家，輕易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無條件的呼應認同，這個社會不能不抓狂，凡事不知適可而止，沒有能力懸崖勒馬。這也許可以說明，為什麼紅色高棉的波爾波特能夠輕易把柬埔寨推下一個亙古未有的大浩劫，為什麼成千上萬的中國工程師會加入土法煉鋼的瘋狂行列。如同喚出惡魔的笨拙魔術師，終為惡魔所凌虐。

儒夫癡候

有一派研究民族問題的學者認為，族裔血緣是構成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於是最為重要的因素。從基因著手，學術界也許可以對於人類族裔血緣的分類得到科學性的了解。但是，這與民族主義者的血緣觀念是完全不相干的。血緣論之所以在偏激民族主義者當中盛行，恰好是因為它的本質是神秘和非理性的，當然不會去接受科學理性的規範。我們甚至於可以說，他們對於這方面的科學研究是很不放心的。重點在於血緣論的這個性質，而不在於血緣基因本身。血緣不過是一個連鄉愚也能夠善加發揮的觀念罷了。問題是，思想貧血的血緣民族觀經常有詞窮理盡的時候。所以，對於偏激的民族主義者而言，血緣可以有而且必須有各種同樣具有無法明白言傳和超越理性的替代品和補助道具。例如唯我獨尊的宗教、語言，自吹自擂的優良文化傳統，自欺欺人的歷史傳說等等。在血緣思考驅動下所產生的激情，輕而易舉地尋得血緣論以外的替代品，賦予同等的非理性和反理性激情成分。

偏激民族主義者有時候可以不是徹底的血緣論者¹⁶，卻都不脫同樣的鄉鄙根性。他們是先天的仇外主義者。可是，他們更痛恨所有不肯接受他們所欽定的民族認同、文化認同或者宗教認同的“同胞”，其痛恨程度尤勝於他們對於所有外在敵人的仇視。同血緣或者血緣接近的族群，一旦因為某種原因而被當作異類看待的時候，就會遭受加倍嚴酷懲罰的命運。在這時候，血緣論往往去而復返，而且其反理性成分變本加厲，成為一切仇恨憤怒和屠殺暴行的道德依據。對於不知現代政治文明和公民意識為何物的鄉鄙而言，尤其是對於那些喜歡把慎終追遠歌頌為人間所有道德和善性的唯一準繩的人們而言，有什麼比祖宗的尊嚴更神聖？有什麼比嚴厲處置所謂“數典忘祖”的背祖行為更加天經地義？每當他們在對外事務或者對外戰事挫折連連的時候，若要渲泄仇外的怒氣，必然要從內部的“賣國賊”著手。自己沒有膽量向強鄰尋仇較量，自卑而且遷怒，矛頭隨時指向無力還手的近親。何其英勇！若是國內出現重大麻煩而自己又缺乏解決能力的時候，弱勢的異類“同胞”也是易於下手的理想替罪羔羊。何其便當！這種現象在血緣民族主義者當中是很常見的。姑且稱之為懦夫癩候吧。

也許是由於這個原因，在血緣方面差異不大的族群和民族當中，往往互相表現出最大程度的敵意，一方奉血緣的“民族大義”之名，向另一方作出最是血腥殘暴的“淨血”¹⁷殺戮。國民黨對待敵國的殘暴佔領軍講求以德報怨，而對於在血緣上同樣屬於廣義漢族的台灣人則以血淋淋的大殺戮相待，絲毫不念血緣之情¹⁸。

諷刺的是，在同樣意義上的差異相距極大的人們，反而能夠一再在新天地結合成為活力十足的新興民族。

理性與血液

在巴爾幹半島的“淨血”殺戮場上，到處有持槍結隊的弱冠少年，像是醉酒的鵝群¹⁹。他們胸中充滿無可言名的道德勇氣，一再從事大規模的燒殺強暴。血的確是醉人的，嗜血癖好也具有高度感染性。特別是對於那些血氣方剛、不知尊重理性以及生命尊嚴的狂妄少年而言。社會學家嘗說，這批人是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熱狂的最大感染對象群。但是，始作俑者則另有其人。

在許多民族主義者當中，以血液從事思考²⁰或者以血液代替思考，理所當然地蔚然成風。這不但涉及了那個壟斷和管制“真理”的龐大國家機器，也感染了大批表明以追求真理和發掘事理真相為職志的學者、評論家。血濃於水。血緣論的非理性成分可以很容易感染許多（甚至是大多數）理性知識的傳播者。原來，富有理性知識的人

們，也有難以逃脫“鄉鄙根性之害”的時候。不但如此，他們還會成爲這場“鄉鄙根性之害”疫情的主要傳染媒介體，醉鵝群的唆使者。極端日爾曼民族主義納粹德國最忠誠的支持者當中，有極高比率的中小學教師和大專院校教師——理性科學知識的最主要傳播者。當前兩岸最容易激動起來的漢族民族主義倡導者，也有類似成分²¹。在他們的背書之下，醉鵝群自以爲得到無上天理的認可，更加爲所欲爲、肆無忌憚。他們所帶來的禍害，其實更甚於那些少不經事的醉鵝群。

可以說，大多數現代文明社會都曾經有過偏激愛國主義和血緣民族主義泛濫成災的慘痛經驗。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德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富有現代公民政治素養的人們，對於無端的民族愛國激情也因此大多知道深加提防。除了對於一般國民學養的悉心培育之外，他們的社會更通過立法設下許多防範措施，通過國家機器執法機構不懈執行：醉鵝群逃避不了嚴密法律的約束，唆使者也不能把言論自由和學術獨立當作避難所。

反觀在許多仍然擺脫不了“鄉鄙根性之害”的地方，如過去的紅色高棉、國民黨和當今的中國、塞爾維亞，國家機器不但是醉鵝群的最主要唆使者和保護者，甚至於自己就是醉鵝的化身。

塞維利亞上下聲稱五百年前的克索沃是他們歷史文明的搖籃、祖先戰敗喪身之地，所以是他們的神聖領土，不許任何人懷疑。他們怎知克索沃土地在過去數千年間不會孕育過其他（包括阿爾巴尼亞）文明呢？不會是他人的先祖頭顱當犁、鮮血灌溉，經之營之，而且一再以犧牲無數性命來捍衛的家園？中國領導人喜歡自稱是炎黃子孫，也要不惜動武強迫他人如此相信。若說他們自己是古代突厥、匈奴、鮮卑、契丹、瓦剌的後人，那還有幾分道理。至於他們所一再渲染的史前石器時代的炎黃事跡，缺乏可信的歷史根據，只能說是有心人晚近穿鑿附會、不值得認真的神話罷了。

然而，這兩個國家的代表居然一再在國際場合大言不慚，將這類令人嘔飯的幼稚論點大加宣揚，說成是他們國家政策的神聖依據。這兩個國家之中的一個，爲了大塞爾維亞主義而發動一系列戰爭，最終以舉國糜爛、原有的聯邦國紛紛獨立的大慘敗收場；另一個則揚言也要爲類似的理由而發動另一場戰爭。看他們臉不紅、氣不喘，不自知自己正在全世界現代公民社會之前賣弄自己的鄉鄙根性和孤陋寡聞，還自以爲是在義正詞嚴地陳述一個偉大無比的大道理，除了嘆息說鄉愚沙文主義者總是缺乏自知之明之外，還能說些什麼呢？

文明社會之敵

然則，所有後進社會的民族運動都是非理性的嗎？不然。

在距離解嚴已經超過十年的台灣社會，仍然有許多血性的漢族民族主義者蠢蠢欲動，不耐地等待復辟和審判異端時刻的到來。然而，在遭受數十年民族壓迫的人民當中，當他們成功地以民族反抗形式為自己掙得一定的民主權利之後，反而開始以一種近似淡然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民族認同。除了少數的孤立個案之外，他們並沒有因為血性漢族民族主義者一再在街道上公然辱罵挑釁，而激怒得回報以同樣的激情。不但如此，他們當中還有許多人經常在各種場合互相告誡說，穩定的民主體制才是台灣人民福祉的最大保障，而偏重倡導台灣民族主義則是可能帶來負面作用的。所表現出來的寬容和自信，與另一造的偏執和自大，恰成強烈對比。

有人擔憂地說，這是因為台灣民族概念根基不夠雄厚。這種揣測似乎沒有必要。學會以文明理性的方法來表達自己政治立場的人們，本來就不應該那麼容易讓血液沖昏了頭腦。在政治智慧上較為成熟的人們當然知道，血性的心態固然鄉鄙可笑，而更嚴重的則是它容易失控，成為脫韁之馬。他們知道擇取運用種種其他非血性的方法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無論是階級的利益或者是民族的利益。從英國社會觀察所得，應該足以得到這個啓示。如此，我們似乎應該為在台灣所看到的自制自律現象感到欣慰。

但是，我們似乎也不宜過於樂觀。英國社會並沒有一個以不列顛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為唯一至上政治指導原則的國家機器；而英國的媒體、教育界、學術界和主要政黨，以及各階層人民，也早已不屑於無端倡導民族情操，或者讓民族激情左右政治思考。這是一個民間社會根基十分雄厚的現代文明社會，不會容忍非理性鄉愚恣意發飆，挾持社會公器、壟斷言路，誤導青年學子。事實上，即使是任何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民主社會，也仍然不忘十分用心繼續厚植和維護自己社會的優質人文條件，儘量不使之輕易遭受獸性暴力和偏見謬論的傷害。反觀台灣，情形大有不同。整個文化霸權還牢牢地掌握在那些對於近來的民主變革深懷敵意、無時不想找機會鼓動激情風潮以達成復辟目的的漢族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手中。主流媒體、教育界和學術界，仍然遵奉過去國民黨集團以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為主體所建構起來的政治文化²²，並且決心要繼續長此以往，永遠保住這一個深具反理性基因的政治文化在台灣人民靈魂心智裏的霸權地位。

血緣觀民族主義之所以為害於民主社會，是因為它是非理性的，而且很容易轉變成為反理性。這樣的理念往往包裹著歷史正統和學術超然的神聖外衣，供奉在先烈牌

位之下，絲毫不允許人們有理性質疑的餘地。換句話說，掌握了血緣民族論的權威，就等於掌握了絕對真理，容忍不了相左的意見，進而也就不能容忍言論自由。在一個血緣觀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的社會，民主政治體制必定會遭受到重大的顛覆威脅，多元文化發展的空間也大為緊縮。當一個社會的許多公民可以因為某種無法真確數說清楚的歷史恨民族仇、或者血緣排外情緒，而輕易激動起來，造成莫大社會動盪，這就不可能是一個穩定的民主社會。在此環境下，優質的政治文明素養缺乏肥沃的培育土壤。情況一日未有根本改善，民主體制的內在隱憂一日不除，民間社會的思想根基也無法真正鞏固起來，為公民政治共識和社會凝聚力的形成過程留下一道莫大的缺口。

顯而易見，任何一個民主社會都需要健康的政治文化來配合，方得以持續發展下去。而這個政治文化得以生存發展的一個先決要件，就是首先要使得大部分公民有能力從思想文化上成功反制那種狹隘而偏執的血緣民族激情-非理性政治思考的最重要根源。這當然涉及了人文思想方面的長期準備工作，同時也需要法制方面的配合。然而，台灣社會一般似乎不以為這個課題值得關注，長期以來努力推動教改運動的眾多人士也無意顧及。

使得事情更加嚴峻和更加複雜的是，台灣社會還要面對霸權企圖心十分旺盛的唯血緣論民族主義中國。這個外來的威脅連同內在的隱憂，足以置民主台灣於死地。

上駟對下駟？

在殖民統治或者深具民族歧視性質的獨裁統治之下，爭取民主權利的運動大多同時帶有民族解放運動的性質。民主與民族的兩個主要訴求，共同構成為整個政治運動的核心精神。然而，從反抗運動開始，到成功推翻獨裁政權或者擺脫殖民統治之後，這二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會經歷若干變化。如上所說，國共二黨都在民族解放之後，徹底背棄當初的民主承諾。而這也是很多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一般常見的典型。在這些典型裏，藐視踐踏民主權利的統治集團，無例外地都多方倡導民族主義，以欺騙人民，掩飾獨裁暴虐的醜惡本質。而他們的民族主義理論依據，殊少不以血緣論為主。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典型：從民主體制的開始落實開始，原來與民主運動同步驅動的民族訴求卻逐漸淡化。台灣就是其中的一個。在這種類型的情況下，民族認同大多會逐漸脫胎換骨，被那種以民主權利為中心的公民意識所取代。若加追溯，其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民族認同，就已經開始立意不以血緣觀念為主。民族解放之後，血緣因素更見減少，甚至於絕跡。相對於血緣民族主義者在取得政權之後更加著重民族主義宣傳、仇視民主訴求而言，公民意識的民族認同則是以共同維護民主體制以追求社

會的進步爲主題，相對地淡化民族主義。但是，這並不是說，民主社會內部不會有血緣論民族主義狂潮。

由於種種原因，這兩種迥然不同性質的民族認同觀念經常同時存在於一個社會之中。眼前我們就可以看到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與公民意識的台灣認同觀念，同時存在，而且無時不互相抵觸。以當前的情況而言，前者雖然充滿鄉鄙根性，卻因爲長期一直盤佔各種文化領域裏的要津而仍然居於文化強勢地位，後者雖然具有現代文明的優點和新興事物的銳氣，卻明顯地處處居於劣勢。如何扭轉更易二者的強弱立位，事關台灣民主體制的前途，不可不察。這固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議題，但是還需要考慮到現實的另一面。

自從進入民主紀元以來，台灣民族運動已經逐漸喪失作爲一個解放運動所普遍具有的活力。同時，公民意識範疇的台灣認同觀念卻愈來愈普及，愈來愈強化起來。這其實並不是互相矛盾的。因爲公民意識的理性成分充實了民族認同的內涵，進而成爲民族認同的代名詞；而一度十分強有力的台灣民族概念，化爲公民意識的一個精神基石。於是，原來的台灣民族運動不再可能繼續依照原來的軌道運行下去。原來的民族反抗形式，已經不再是可能的了。這個變化意味著，當台灣人民要站出來推翻血緣漢族民族主義者的文化霸權的時候，已經不再有一個民族反抗運動可以成爲各方力量的結集點。換言之，民族解放在文化意義方面的落實所需要的力量泉源，必須在民族思考的範疇以外去尋找。雖然說，公民意識的民族認同觀念不是鄉愚政客所能夠任意玩弄的，當然較適合於現代民主社會，但是，能夠從思想上有效反制鄉鄙根性血緣論民族主義的，還不是任何一種性質的民族認同概念，而是公民意識本身，真正具有現代文明內涵的政治文化。一個社會要徹底戰勝血緣民族主義，終究必須戰勝民族主義本身。要戰勝民族主義本身，就必須從戰勝社會內部仍然具有生命力的血緣民族主義開始。這是一場批判檢討傳統文化和建立新文化的運動。

如果說血緣論民族主義具有感染性，現代文明的公民意識何嘗不是？

當今中國統治集團把馬列主義視同敝屣，不能不依賴那種帶有濃厚種族主義色彩的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來重新建構他們的統治哲學。接下去，他們大概也要步當年國民黨集團的後塵，從事儒家倫常道統的復辟工作了。中國舊有的傳統思想去而復還，以其龐大無比、死而不僵的軀體，勢必要佔盡所有的精神空間。這個官方欽定的雙面統治文化，其實是一條走向文化窒息、遠離多元民主的道路。漢族人民憧憬已久的民主自由和文化新紀元，恐怕要更加遙遙無期了。

中國既然堅持要把台灣問題當做自己的內政問題看待，就免不了要承受這個立場的報應。獨立自主而且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民主台灣，若使能夠成功擺脫漢族血緣論的思想桎梏，建立嶄新健康的現代的、公民的政治文化，形成一股空前有力的思想與道德的刺激力量，當然會時時刻刻逼迫海峽對岸漢族人民走上自省之路。數百年來地力枯竭的中國政治文化土壤，恐怕非如此不能得到滋潤沃化的機會。也許有一天，中國人民因為台灣人民鏗而不捨的奮鬥而終於了解，那些沙文主義色彩十足、廉價庸俗的血緣漢族民族主義，必須從自己心靈徹底排除出去，如此才可能從獨裁集團手中奪得思想的自由，才可能開始建立一個真正的民間社會，他們的政治前途也才可能曙光初露。他們終究必須明白，學會真誠尊重"非我族類"以及相同血緣族類的異民族（亦即公民意識定義下的民族），才可能開始解決中國境內的民族問題。

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無人理會那些喋喋不休、跳上跳下的鄉愚，台灣社會不再為鄉鄙之歌所困擾，中國社會不再隨著鄉鄙之歌的旋律而瘋狂起舞，台灣的民主體制才能夠真正得以鞏固，中國社會才能夠邁進現代文明的新紀元，海峽兩岸才能夠真正和平。

在這個世紀性的大課題上，台灣的非民族主義者應該勇於積極投入，而不是置身事外。我們切莫誤以為探討民族主義問題等同於倡導民族主義。因為，對於漢族民族主義理論依據展開最深刻的理性批評，就是對於所有民族主義非理性部份本身最為積極的反制。當理性默默無言的時候，非理性的喧嘩就會繼續籠罩台灣島嶼，以及中國大陸。事實上，任何一個偉大的民族反抗運動的開始，都不可能沒有非民族主義者的積極參與。我們甚至於可以說，他們的參與具有決定性的良性影響，使得整個運動步上更為健康的道路。沒有他們的積極參與，一個社會很可能在民族運動初步成功之後倒退到一個比殖民統治還要不如的層次。即使在民族反抗得到勝利之後，他們還有未竟之業。因為民族運動最後的任務，全部仰賴他們。唯有他們才能夠帶領這個社會真正走出民族思考的狹隘格局。

當台灣民選的政治人物因為對岸血緣漢族民族主義者的無理戰爭威脅而不能不言語謹慎的時候，台灣的民間社會豈可以人人心中有個小警總、小公安？

註釋

1. 有學者認為，早在十六世紀初亨利八世時代，民族概念已經在英國開始流行了。Liah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1992. 第一章。

2. 以專治東歐民族主義問題而聞名英國史學家H.S.Watson甚至於認為，不列顛民族主義是不存在的。關於這個現象的起因，有眾多解釋。不過大多相信，英國人的民族認同與他們的大憲章、國會、法治、公民權利等等的政治傳統和體制機構密切聯繫在一起，幾乎完全沒有血緣論成分。

英國學者A.D.Smith在為近代史上的民族運動作統計時，詳盡臚列有一百一十個之多，包括有法、德、日、意、漢、印度等等，唯獨未把英國列入在內。另一位學者在八萬篇文史論文摘要電腦資料庫中，找出七、八十篇有關德意志民族和愛爾蘭民族的論文。可是，關於英國民族，則只有兩篇間接涉及，勉強可以充數。參閱 Gerald Newman, *The Rise of English Nationalism: A Cultural History 1740-1830*, 1987。序言。該書作者認為，早在法蘭西大革命爆發的時候，長期發展的不列顛民族主義運動已經大體完成。

3. 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的一課”，對於當代歷史有相當大的歪曲，不知尊重境內居絕大多數的德語系人民的想法，應該當作是有時間性的“愛國”文宣品看待。不過，即使到了法德人民終於衷誠和好、都不再想互相尋仇之後，漢族民族主義者竟仍然把它奉為不世之作，列為中學生研讀教材。

4. the curse of rurality. 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1997, pp90-112. 他所討論的，主要是柬埔寨。不過，以之形容二次大戰以後中國的漢族民族主義，也是恰當的。這位英國學者又提出“農民沙文主義”說法(p99)。想起土法煉鋼和小紅書的瘋狂，不禁為之叫絕。也許，鄉愚之輩一旦掌握政治大權，大概都有沙文主義的傾向。

5. 當地新教教會的牧師，有不少是最極端的不列顛民族主義者。在英國，只有一成多的新教徒經常上教堂。而在北愛爾蘭的新教徒之中，這個比率則高達六成半。

6. Michael Ignatieff,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1995, pp162-190, 第六章。

7. 在1979年開始的保守黨長期執政期間，民族情操淡薄的英國資產階級制訂和執行了一系列財經措施，以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這激怒了大多數都有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意識的蘇格蘭人，使得蘇格蘭民族主義大為風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不是由於那個集中於英格蘭地區的資產階級無意於宣揚大英愛國主義，蘇格蘭獨立派恐怕早已經超過自治派，成為多數派了。Joyce McMillan, "Scotland's Quiet Nationalism",

in Richard Caplan, John Feffer, eds., *Europe's New Nationalism*, 1996.

8. 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是濫用漢族民族主義的最大罪魁禍首。台灣的統派人士似乎覺得，這兩個罪魁禍首因為某種原因而情有可原；台灣民族反抗運動者膽敢抗拒他們“父祖之國”的漢族民族主義，萬萬饒恕不得。這種態度本身其實帶有特定的民族偏見。也許他們從來不曾虛心去了解，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何以支持愛爾蘭民族運動。

9. 在十九世紀的最後數年，漢人社會從留學生界開始廣為接觸民族的概念。連民族一詞，也是來自日本。當時流亡日本的梁啟超，一再為文加以深入探討，可謂開風氣之先。只是一般似乎沒有注意到，他並沒有倡導那種言必稱祖先的狹隘漢族民族主義，在思想深度上遠遠超越了孫文等人。一次大戰結束後，中國出現五四運動，漢族民族主義在當代知識分子當中開始得到普遍認同。至若中國漢人普遍具有民族主義的概念，那是更為晚近的事。

10. Isaiah Berlin, 'Nationalism: Past Neglect and Present Power', *Against the Current*, 1980, pp337-340.

11. 同上， p342.

12.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83, p47-48. 漢族民族運動也沒有例外。見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96.

13. 戒嚴時代末期台灣反抗運動歌曲玉蘭花歌詞。

14. 原文為 'a society united by a common error stoits origins'. J. S. Huxley & A.C. Haddon, *We Europeans: A Survey of 'Racial Problems'*, 1935, p16.

15. 有些學者將之歸類為公民民族主義，以有別於血緣民族主義。

16. 例如，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者歸結都要以炎黃子孫自居，卻可以視需要暫時略過炎黃系譜不論，而片面強調歷史文化、固有領土疆域或者其他因素。例如，當他們要厚顏霸佔異族土地的時候，就把炎黃子孫論藏起來。論理過程的飄忽不定，避重就輕，時東時西，也許就是思想閉塞的一個徵兆。

17. ethnic cleansing. 例如當前巴爾幹半島上的族群衝突。Michael Ignatieff, 'Nationalism and Tolerance', in Richard Caplan, John Feffer, ed., 'Europe's New Nationalism', 1996. 半島上種種因素應該更有利於多民族和睦相處。可是，有些地區通婚率雖然高達三成，卻一再發生最為慘烈的“淨血”戰事悲劇。許多觀察家習慣地把悲劇悉數歸咎於宗教衝突和歷史仇恨。事實上，這個地區的宗教容忍程度，在歷史上超過於歐洲其他許多地區。所謂歷史仇恨之說亦然。V.P. Gagnon,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Case of Serbia', in Michael Brown, et al.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1997.

18. 台灣人曾經長期受到異國文化影響，這似乎特別引起國民黨集團的憎恨，因而被視為背祖的異類。

19. Michael Ignatieff, 1996. “醉鵝”一詞，引自 Mark Thompson, A Paper House: The Ending of Yugoslavia, 1992.

20. 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名言。

21. 例如，堪稱為漢族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的新黨，和過去的國民黨，都特別喜歡在台灣的各級選舉中炫耀自己候選人的“高學歷”。

22. 台灣教育部1996年出版的國語辭典，在附錄的‘中國歷代紀年表’列舉黃帝在位期間為公元前2697-2599。石器時代無文字，神話人物當然不可考，居然還有登基確切年代！唯有政治企圖心十分旺盛而且毫不尊重史實的人，才會如此大膽。企圖心所求者，不外是台灣學子的歷史認同和民族認同。



如何站起來？怎麼走出去？

——「交工樂隊」首次歐洲巡演的意義

郭力昕

三月中，民進黨勝選週年的那個週末，當所有媒體都熱烈提供舞台與聚光燈給世台會大遊行與金美齡的「台灣人站起來」個人秀時，靠自己本領「走出去」的幾位台灣音樂人，在同一個週末於台北客家文化會館舉辦的交工樂隊歐洲巡演成果討論會，則除了公視、《破週報》與《大成報》，沒有任何主流媒體有興趣來看一眼，瞭解一下這個默默扛著台灣的名字走出去的美濃客家新民謠樂團，在世界的舞台上，發生了什麼事，取得了什麼經驗與成果。

這就是真實台灣的一個常態景觀：文化藝術工作者單槍匹馬、披荆斬棘的讓台灣走出去的努力，可以輕易的被那些政治熱鬧一筆勾消；而台灣的媒體，卻依然狂熱於政治、輕忽於文化。至於在主流媒體做為陪襯的文化/藝術的訊息空間裡，又慣性的將太多的篇幅與力氣，放在主流的、已成名的、長袖善舞的、或被定於一尊的那些人、團體或事件上，進行頻繁的、錦上添花的報導或評論。

這些現象，大致反映了台灣媒體一般對政治與文化的素養和眼界：對政治的品味，是追逐煽情事件、人事衝突與商業效果的；對文化的認識，則通常是附和、勢利、缺乏觀點的。它們凸顯了台灣極度需要出現公共性質的、以及比較左翼(或至少比較批判)觀點的媒體空間。但是，這並非本文要談論的重點。讓我回到被媒體忽略的那場交工樂隊的巡演討論會，試著陳述這個非主流音樂隊伍的歐洲行，有什麼值得討論的意義。

當台灣的電影、舞蹈、劇場、美術、以及文學等主要藝術領域，在以本土的創作人才和本地社會脈絡的意義下，先後都有傑出的創作者走出台灣範圍、站上國際舞台時，唯獨音樂一項，無論何種形式，卻瞠乎其後。從西洋古典音樂到東/西洋流行音樂，從來是單向輸入；從本土的流行音樂商品到非主流音樂創作，幾乎是一律走不出華人文化圈的範圍。台灣背景而活躍於西方的古典音樂演奏家與指揮家，表演的是西方的音樂作品；活躍於東瀛的流行樂手/偶像，唱的是日本的歌；一些中樂團或類似之傳統音樂表演團體的出國巡演，大體上是透過官方文化交流的安排，或負有宣慰海外僑胞的意義；本土流行音樂產品，流轉在東南亞與北美洲封閉的華人移民社群裡，

做為認同與鄉愁的工具；至於出現在奧運會場的阿美族歌手郭英男的動人歌聲，則只是西方音樂工業與奧運「商場」藉助異國情調創造濫情與商機の偶然性結果，沒有任何文化輸出的主體性意義。

在這樣的關照標準下看交工樂隊の歐洲巡演，則他們成功的走出台灣與演出成績，不僅在非主流樂團及世界音樂/民族音樂の領域裡，是國內の頭一遭，即便在其他音樂領域，也難以找到先例：交工以客家語言唱歌，使用許多本土傳統樂器，樂曲改編自客家傳統民謠、或新創樂曲並注入其他音樂質素與時代精神，歌詞則吟詠庶民生活情感、當代社經議題、或鼓舞美濃鄉親反水庫運動の堅定意志。帶著這樣の音樂內容，他們進入的是西方の音樂場合，與專業領域の聽眾。

演出的場地，從布拉格的Palac Akropolis、比利時布魯日音樂節(Brugge Festival)、到巴黎のNew Morning，都是在非古典音樂領域の重要表演場所。觀眾則是西方當地の音樂專業人與愛好者。對交工の報導與評論，則刊登於各城市の主要媒體上，如法國の《解放報》、《費加洛報》，捷克最大の日報《DNES》、英文報《布拉格郵報》等等。(關於交工赴歐巡演の當地反應，在公視記者賀照緹隨行採訪の系列報導、與《破週報》記者林倩如於151期の專題報導中，已有較詳細の描述。)重要的是，從演出場地、觀眾反應、到媒體樂評，沒有官方的安排與動員，憑的是交工本身の特質與能耐，和促成此行の音樂工作者鍾適芳在歐洲長期累積の個人資源與專業聲譽。

嚴格的看，交工の歐洲行，還不能說取得了絕對豐碩の成果，而可能比較更像是走向國際舞台の初次學步經驗。不過，它的象徵意義是足夠的。交工樂隊，一個民族/本土/非主流の音樂團隊，一個拒絕流俗、勤於自省、發軔於愛鄉之社會運動、並扣緊生活、文化與政治の音樂隊伍，一個大步，跨出了台灣音樂環境向來停滯貧瘠、無創造力、自我欣賞の落伍生態，開始將自己放在世界の尺度上，對他們自己的音樂、表演與文化，進行更為嚴謹而具有辯證意義の測量、錘鍊與思考。當政府要致力提升國內音樂文化の金曲獎，依舊只會繼續將最大の興趣放在流行音樂商品の年度家家酒派對時，交工樂隊展示了勇氣與決心，要面對寬闊の視野，接受嚴格的標準與挑戰，走一條更辛苦、孤獨的路。

從某種比較「現實」的角度來說，交工樂隊其實大可不必如此辛苦。在台灣の交工，儘管是仍是苦哈哈の非主流樂團，但他們存在的意義已然充足，也累積了相對充裕の社會資源與評價：交工整理/發揚美濃客家文化與音樂的工作，需要延續；他們

做為美濃鄉親反對興建水庫之社運的擴音器的功能，在新政府政策搖擺不定之下，恐怕也得繼續(就算美濃水庫確定不建，若交工要將自己定位為服務社運的音樂隊伍，則新議題有的是)；另一方面，他們有美濃鄉親的堅定支援，與一群熱情交工樂迷的死忠支持；在非主流音樂/文化的媒體與評論圈，對交工也持續給予著肯定與鼓舞。

然而，這些意義與資源，在交工走出台灣、站上國際舞台時，就無法自動轉換成掌聲與讚美。從公視的現場記錄影片看來，幾場表演的觀眾確實喜歡交工誠懇摯樸、草根性格的演唱，但這喜歡，可能相當程度也包含著對初次聽到來自台灣美濃客家音樂的新鮮感(例如對從未聽過的嗩吶、月琴、傳統鑼鼓的興趣或好奇)。在語言文化、社會脈絡互異的國際舞台上，音樂內容中特定的社會/政治指涉，難以成為交流溝通時最具吸引力的部分，而通常是(或者說至少必須通過)對音樂的具有特色與專業品質的表現本身。

此行的帶路者鍾適芳在公視的訪問中坦言，交工下一次再回到歐洲，觀眾要看到的就不會只是這些，而要期待一場在音樂性與唱作能力更趨於豐富與專業水平的演出。也就是說，在好手輩出、競爭激烈的國際音樂舞台上，美濃交工新民謠對歐洲音樂人的某種新鮮感，恐怕只能用一次；對交工樂隊成為職業音樂團體在台灣必須面對的各種困難，他們同情的理解不會維持太久，不會在聽音樂時隨時放在評量的條件裡。對交工而言，這當然不太公平，但卻是想走進西方舞台不得不面對的嚴酷情境。

接下來的問題是：那麼，為何交工樂隊一定要走出去，走進由西方認定或主導的國際音樂舞台？在台灣已有充足意義的交工，何不就專注於貢獻台灣社會、發揚客家文化，省下那些為了「走出去」需要耗費的額外力氣？對這樣的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也只有交工自己能夠決定路該怎麼走。不過，這些問題或可引發一些思考與討論，我在此試著拋出一點點。

首先，交工樂隊的音樂目的是什麼？在凝聚美濃客家文化、反水庫社會運動、批判政經社會現象等等之餘，音樂本身的精進與創造性，是否亦為目的之一？換句話問，在多大的程度上，交工樂隊及其音樂，是背負著眾人期待/自我期待之上述各項使命，而大體上工具性意義地存在著？我必須先強調，藝術的工具性存在，並無對錯問題；任何音樂團體要以社運或凝聚族群認同做為音樂的主要/唯一目的，是可敬的。我唯一擔心的，只是若長此以往的音樂工作在訊息傳達上的效果問題。

記得在一次針對交工音樂的座談會上，民眾音樂的前輩梁景峰教授，建議交工在

音樂創作裡也可以加入一些幽默感等其他創作質素，不見得需要隨時都激昂悲愴、握著拳頭抗議。現場有些與談人不甚同意，認為交工要傳遞的社運訊息對美濃鄉親而言是嚴肅迫切的事，恐怕沒有心情「幽默」。我則以為，在這種急切之社會改造的心情下，就不容易懂得梁老師的思慮。做為熟悉西方六十年代以降的民眾音樂、在七十年代與李雙澤等共同開啓了民歌創作運動的客家人梁景峰，難道會不理解交工的嚴肅使命？正是因為梁景峰珍惜這樣一個音樂團隊的終於出現，會盼望他們能夠可大可久，不會因為過度集中於對社運等功能的實踐激情，卻可能反而較快地耗盡創作者與聽者雙方的續航熱情。如果 Bob Dylan 持續的只寫 *Blowin' in the Wind* 或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這樣的歌（雖然它們也都是經典性的作品），我恐怕 Dylan 無法到六十歲的今天仍想唱歌，仍能創作。

音樂性與社會批判，不必然是兩個沒有交集的二選一命題。交工可以不需要為音樂而音樂，但也不必要為社運而失掉音樂。如果他們未來的創作，仍以容納訊息為唯一的優先構思方式，而音樂則大抵停留在承載訊息的功能而相對地顯得「簡單」的話，就不免要讓人回歸到一個基本的問題：那麼，社會訊息為什麼要透過「音樂」這個特定形式？為何不直接生產口號標語或批判文章？音樂性/原創性更強、表演能力更成熟的音樂創作，對更有力、更細膩而長久的反映社會與創造文化所可能產生的效益，我們有沒有經驗過、或給予足夠時間與努力的實踐過？

其次，交工站上國際舞台，走進西方音樂界，有什麼充分的意義？我們先看看李安與《臥虎藏龍》站上奧斯卡頒獎台上的意義。許多人認為《臥》片不算是台灣電影，它主要也是拍給西方人看的；此外，它的得獎，對台灣凋弊的電影工業沒有幫助。儘管如此，沒有人能否認，當最佳外語片的頒獎人在全球轉播的典禮上，唸出「台灣」的名字時，我們得以「久久爽一次」地重溫了幾十年前少棒隊曾帶給我們的集體自信與自豪。這也許說明了，在成為國際孤兒已經很久的台灣，儘管似乎已被迫地「習慣」了這狀態、甚至集體自我膨脹地與國際社會兩相忘於江湖，但潛在的被看見、被肯定的需要與慾望，還是一觸即發的。

回過頭來看交工。客家族群及其文化，在台灣長期受到壓抑。交工樂隊的使命之一，是以美濃文化為出發點，重建客家文化的主體意義，恢復族群的認同自信。面對強勢的、商業的、西方與東洋等諸種文化的宰制力量，這項復興的工作並不容易。在討論會上，交工樂隊的主唱林生祥描述，美濃鄉親對客家歌謠如何能拿到歐洲表演感到驚奇與驕傲，並紛紛塞紅包給交工祝他們順利成行。因此，先不談台灣客家音樂文化向國際輸出的文化平等之象徵意義，就以美濃客家音樂能走進西方舞台的事實，對

美濃鄉親、客家族群、以至於所有渴望被聽見/被尊敬的台灣人而言，是否已是一種有效地建立其主體認同與集體自信心的階段性策略？

這裡可能會引出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的文化主體意識與內在自信，非要透過西方舞台才能建立或確認嗎？文化上的西方標準或國際規格，有沒有它的問題呢？我想，對於擁有足夠自主意識的知識人/文化人而言，西方的肯定沒有必然的意義，但這些人在現階段的台灣究竟是極少數。而西方標準當然有它的問題，即使特別強調族群文化差異、凸顯地方音樂特質的「世界音樂」，在這個名稱上，仍是歐洲人鑄造出來的。但拒絕與西方接軌、交鋒，以泛民族主義者的心態關在家裡自我護衛，並不能夠因此阻止的了西方音樂從馬勒、馬塞里斯(Winton Marsalis)到瑪丹娜對台灣持續而全面的輸入與「教化」。

對抗西方的文化霸權與新殖民主義，光是擺出一些政治進步的批判姿態，在道德愈加失去作用的今日，恐怕是沒有多少實際效果的。要與西方分庭抗禮，得靠實力與策略。與西方世界交流、折衝的過程中，一方面先有足夠能力接受它的遊戲規則，站穩自己後再開始修正它的遊戲規則，恐怕是必要的路徑。如果赴歐巡演的這支音樂隊伍，只是販賣某種可口的、趣味的「台灣情調」，而沒有此行之領路者向來反對劣質音樂商品裡之文化剝削、反「歐洲中心主義」、與輸入國外音樂的同時也爭取國際接受台灣音樂等的堅持態度，是不會贏得歐洲樂評人/音樂節負責人的尊敬、並爭取到巡演機會的。走進歐洲的交工樂隊，也正是這樣一個堅持格調、絕不諂媚、謙虛而又自信的音樂團體。他們的歐洲行，對台灣在國際的正面形象，踏出了一條成本很低、而開拓性很大的新的道路。

過去的舊政府每年花錢在《紐約時報》等買下全版廣告宣傳台灣形象，或進行各種方式的凱子外交，但除了浪擲納稅人的錢，毫不見效果，國際上依然寸步難行，走不出去；台灣偶爾的形象加分與驕傲的站起來，是靠電影人或雲門舞集等等這些藝文工作者。相對於那樣一種國家財政的浪費，則被主流媒體全面忽略的交工歐洲行的意義檢討，在予交工樂隊以應得的注視之餘，也用了一些篇幅，思考台灣有效且有尊嚴與主體性地走進國際的其他行動。這些不必靠金錢「援交」、不必親吻山姆大叔的腳丫，就可以讓台灣站得光采、走得出去的文化輸出，也許能讓我們從台灣政治與媒體陀螺式原地瞎轉的亢奮與「自得其樂」的狀態中，跳脫出來，仔細評估其中的意義。

時事雜感

何 苦

「維持現狀」論所引發的問題

◎有幸參加某次研討會，由某一獨派人士，佯裝有度量，邀一位統派人士及一位「不統不獨派」人士，計三人座談。不統不獨派標榜「客觀超然」，謂台灣大多數人較安於維持現狀，一切應以對台灣是否有利為出發點。看似客觀、中立，也許是逃避、投機，如何判斷？

◎從事學術工作或專業研究應秉持中立態度。這也是一句很喜歡被人引用、看似有理的話。但筆者祇聽過有「學術獨立」，卻未聞「學術中立」。近年台灣社會倒是很進步，一些未曾見過的學術包裝詞，大量出籠，孰令致之？

◎Call-in 節目又再度討論到國策顧問是否應該明確向「中華民國」效忠。頗具彈性與自由度的林重謨立委與主張台獨的李永熾教授有一共同的附和觀點，主張不必拘泥名稱（讓人家自由認知），而應著重於與土地的結合（這一點就不能自由認知了，否則就不愛台灣）。其實這兩付天生的好腦袋又將國家組成四要素的：土地、人民、主權、政府，以有利於台獨解釋的方式作切割了。反正老百姓才不去分辨「國家」與「政府」有何不同？

如果要「維持現狀」，從這瞬間起大陸人與台灣人都不能生孩子了，也不能呼吸，否則就不是「維持現狀」囉！笑話！遑論遊說美國售台武器，或再金購某一新的邦交小國，更非「維持現狀」。「維持現狀」的背後其實尖銳反映出台灣百姓被台獨謬論玩弄之同時，渴求兩岸安定、和平而不可得的一種無奈與盼望。

學術或專業研究意在不為外力所支配，秉持客觀求真的態度，以從事獨立自主的研究。M. Weber 主張應將倫理·實踐之價值判斷從社會科學予以排除（主·客獨立）；但過度排除價值判斷的潔癖（如自由），結果是在暗默中承認了某特定的政治

立場(如自由競爭論)。在此既定的架構下，人們僅能做些枝枝葉葉的技術處理和改進(此並不意味不必要著手於小處)，至墮入了逃避現實的旁觀立場。反面，H. Freyer 則強調社會學者應投身現實社會，主張主·客體的同—性；但過度強調主體意志的認識態度，將會陷入把「獻身真理」與「獻身現實」混同的危險。中立也好，自由也好，過份強調其份量，竟致將其絕對地普遍化，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先驗真理，其實便包藏了某特定目的。

至於說「國家名稱應與土地結合」，說穿了就是：「台灣土地」就是「台灣國」的邏輯。那麼，金馬所屬的福建省又被切割了。土地不能切割，也不能搬運；主權不能分割、人民可以移動搬遷、政府可以移動被推翻。體制內改革叫政權轉移，不流血，不改國號；體制外變革叫革命，流血，改國號。所有權(主權)與使用權(治權)不同，所以是否應該說：「中華民國」是一個「治權」獨立的「政府」比較正確？「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治權」獨立的「政府」，但她在70年代進入聯合國後，就代表中國行使主權。除非再打一戰，簽約割讓領土或主權，否則還是國共內戰的延續。

殘酷的現實——人生何必這樣

◎金美齡沒有時間與熱情投入慰安婦的復權與補償工作，但卻有時間打扮入時參加酒會、嘉年華遊行，接受某些人喝采(符合人性愛現的一面)。王清峰女士卻幾年來為慰安婦默默工作，奔波勞碌(違反了人性好逸惡勞的一面)；而且還被金美齡批評：太過激動，律師工作一定做不好。前者卻又口中常說受到迫害，表情輕鬆，一副不在乎、其奈我何的表情。

◎有人被關了幾年，且被關時的牢獄條件比起50年代好多了，或戲稱被關在賓館也不為過；其間又可假釋，或戲稱分期付款的坐牢也可以。這種人在民進黨真多，而且常將愛台灣掛在口中，彰顯自己是民主、自由的鬥士，比之處男、處女孩純潔。那麼，有一個被關三十多年(南韓甚至有被關四十年以上者)的老政治犯，「台灣曼德拉」稱號又不能冠在自己的頭上，今後社會看來應稱他是「台灣的蒙娜麗莎」才算公道吧！但他可能不會接受的。

◎民進黨立委林重謨很喜歡用「自由」來四兩撥千斤，自認超然灑脫。祇不過他說的自由·民主是Freedom·Democracy或Liberty·Democracy？或均不是？當一些人抽出「自由」的尚方寶劍時，似乎忘了：「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的警言了。筆者當然不見得同意已連到非得要燒「台灣論」一書不可的地步，但有「明是非、辯善惡」的批判則是非常必要的。筆者也不認為所有台獨份子均會贊同小林、許文龍、金美齡、蔡崑燦（當然幕後的搔癢者是誰，眾所周知）的論點；但更希望有主張台獨的人士，能有對「台灣論」進行反駁的文章出現。「台灣論」令其存在會有「反面教材」的功能（三、四年前基督教長老會不也是要人們拒訂、拒看聯合報嗎？他們尊重了閱報的自由嗎？），但要批判性的閱讀。它當然不是單純的漫畫，就猶如小林本來預定三月八日來台造勢，緊接著三月十八日前後幾天台獨的一些活動，若將之連串起來看，其中就有明顯的企圖可循，而不是自由、單純或一臉裝傻的無辜相。

◎三月十八日在遊行隊伍中可看見林重謨立委口中喊著：中共打壓「台灣」。但應該是中共打壓「台獨」，捍衛主權吧！更正確的說應是：中共打壓台獨中，死不認錯，又扭曲歷史，附從日本極端軍國主義殘孽，並勾結少數美國反華勢力，卻故裝自由民主人士的偽善者才對吧！

以上所述，諒必是人生社會中常可體會的小道理，也不必然限定於政治的話題，或左翼的論點。筆者在此也不認為中國大陸所作所為，全然是對是好，也不願將人性用抽象的視點來予以一般化；但可惜的是，現實的人生不少卻是這樣的。每個人往往站在自己的角度，借用先驗的推理，來自我膨脹，推銷自己觀點，也不忘醜化對方的形象。唉！人生何苦來哉？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

——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二〉

黃志龍

二、從「社會」到「國家」

(1) 關於國家的問題

(a) 做為「必要之惡」的國家

成形於19世紀中葉的「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將「國家」看成是與「社會」有所區別，又由社會所支持的「實體」(這裡所說的國家，相當於英語的State或State Power，也就是含有統治主體、政治權力等意涵的「國家」，以有別於與祖國、國民相聯繫的Country和Nation)。這種將「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看法起源於19世紀的社會觀，認為「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雖然經過原始積累階段取得了相對自主性，但又從屬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並受其支配。

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部分的19世紀自由主義社會觀，將「國家」視為是人為的、形式上固定的、背離人性的「惡」，而將「社會」視為是符合人性的、自然的「善」，是在人的共同生活上最具權威的「善」——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雖然是對19世紀自由主義的反叛，但在思維構造上兩者畢竟擁有共通的要素。因此，馬克思將「政治強制的消滅，社會自治的發展，以及由社會來吸收國家的公共機能」視為是建設新社會的過程。馬克思認為，一旦做為國家存在的必要條件的階級對立，歷史地消滅時，做為必要之「惡」的國家也終將消亡。

從目前的「現實」看來，馬克思主義將「國家的消亡」視為是新社會的表徵的這種「未來的圖像」，似乎仍然顯得有些突兀，但就馬克思主義而言，一旦廢止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主義狀態後，在計畫性生產的秩序中「國家」將會喪失其存在的依據。

但是，馬克思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他肯定在任何社會生活中公共機能都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他認為，即使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後的一定期間內，公共機能必然還殘存著政治強制的性質，因此，承擔這種強制任務的國家就仍然被需要。不過，這種暫時性、過渡性的「國家」，只能夠存在於社會自治實現以前的階段。因此，馬克思將革命後的權力命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是走向「消亡」過程中的國家，或者是列寧所謂的「半國家」——也就是逐步走向非國家過程的國家。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及在1905年革命時由勞動者自發地組織起來，並且在1907年十月革命中再生的「蘇維埃」，就是這種過渡性國家的模式。

(b)《國家與革命》中的去官僚體制

關於革命後權力的型態和機能，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提出了一定的構想。該書出版於革命之前，長期被共產主義者奉為圭臬，在該書中列寧主張發動革命，粉碎包括議會體制在內的舊國家體制，要求重新創建出「公社型權力」。這種權力型態主張：「任何人只要能讀、能寫文字，都可以藉由公選來輪流統治」，不需要以「專門資格」任命的公務人員（行政官吏、職業軍人等等），也就是廢除一切與公選制無關的官僚制度、常備軍和警察等等，而以結合立法、行政、司法為一體的「勞動者蘇維埃」為統治主體。

列寧之所以認為任何人只要有識字能力，都可以行使統治機能的原因在於：

1/. 無產階級國家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的國家，因此從前由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所需要的壓制機構，就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統治機能可以單純化；

2/. 科技的高度發展，也可以單純化統治機能。

(c)從社會到國家

基於上述，我們可以將列寧的社會主義國家理論簡單的描述為「從國家到社會」的過程。但是，二十世紀的政治社會（不管是資本主義體制或社會主義體制）卻都走向相反的方向，也就是走上「從社會到國家」的道路。

首先，面對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資本主義社會喪失了對資本主義經濟「自我恢復機制」的信心，要求由國家出面干預市場來解決危機的思考和實踐，取代了自由放任的「不干涉主義」，預示了「國家主義時代」的來臨。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蘇聯也正進行著「從社會到國家」的轉型——開始於二〇年

代末期、在三〇年代中期達到頂點的快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正是藉由強大的國家權力來推動，從而確立了由國家全面掌控生產手段的「經濟的國家主義管理體制」。1936年的蘇聯憲法，宣布蘇聯所實現的社會主義經濟在政治上的上層建築，並非是逐步走向消亡的國家，而是被最大限度地強化了的國家，以及因為國家強大化而完全弱化的社會。

因此，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走向並不是「從國家到社會」，而是「從社會到國家」。E.H.Carr曾指出，這意味著「國家」和「社會」兩者的區別的逐漸消解。就二十世紀的政治經濟現實而言，「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看法已不符實際。誠然，單就國家作為經濟計畫與經濟活動的主體這一趨勢來說，E.H.Carr的指責並非沒有道理，但是如果我們考察到「史達林批判」後的「既存」社會主義體制歷史時，便會發現先前為國家所解消的社會，有再度主張其自主性而與國家相抗衡的趨勢。因此，現代社會主義思想的課題，正從「從社會到國家」轉換到「從國家到社會」的向度。但是，其具體化途徑為何？目前還處於摸索的階段。

(2) 關於黨的問題

在這裡所說的「黨」，是指在「既存」社會主義體制中佔有獨佔地位或非競爭地位的政黨——共產黨。在「既存」社會主義體制裡，由於「黨」的獨佔性或非競爭性地位，加上這個地位又沒有期限，因此，「黨」就成為永遠的政權黨。這種地位不僅是在事實上，也表現在憲法上。「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通常都將「黨」規定為「領導核心」和「領導角色」，進一步保障其統治地位。換言之，不管是像只有共產黨才是合法政黨的蘇聯或像採取多黨合作制，容許共產黨以外的民主黨派合法存在的中國，兩者不管是在制度上，還是現實上，並不存在政權更替的可能性。

社會主義諸國的憲法通常將組織分為「國家組織」和「社會組織」，前者是公法上的權力主體（以蘇聯為例，包含最高議會、部長會議、省、司法機關、軍隊、警察、地方蘇維埃、國有企業等等），在法權制度上，黨並不屬於國家組織。不管是革命前或革命後，黨在法律上一直都屬於社會組織。在1936年以前，蘇聯憲法上甚至完全沒有關於黨的規定，一直要到1936年的憲法才首度在有關「市民的權利和義務」的條文中，針對「結社的自由」對黨做出規定，也就是說，在法律的形式上，黨的基本性格是自發性的結社，並不歸屬在「有關國家組織」的範疇。

1977的新憲法將對於黨的規定轉移到「政治體制」一章，將黨規定為「蘇維埃社會的領導力、社會的政治體系、國家組織及社會組織的核心」。雖然，這是進一步反

映了黨的現實機能，但依然維持黨並非公權力的主體而是社會組織的解釋，同時也沒有規定黨的權利和義務。

「黨的領導性角色」不僅在蘇聯，也在所有「既存」社會主義體制內被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憲法原理。「黨的領導」在制度上的意義就是「黨」佔有國家權力的中樞，而「黨的領導」的危機，就成為社會主義的危機，否定黨的領導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因此，在史達林批判後的各種政治改革，都有限在不與這個將黨和社會主義在價值上同一化邏輯相抵觸的範圍內。但是，「一黨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它既不存在於俄羅斯革命的政治設想中，也不存在於其革命領袖們的政治構想當中，它絕非是一種超歷史的存在，不過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因此，考察它在歷史中的各種變貌，便可以認識到「從社會到國家」的歷史過程。

(a) 列寧的黨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並沒有針對革命後的權力提出「未來的圖像」，做為國際主義者，他們並沒有將一國的秩序當作永久性制度的想法。雖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論證了「國家消亡」的歷史必然性；馬克思也曾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提出做為過渡時期權力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公社國家的構想，但是他們並沒有針對這個問題進行有系統的論述。

所謂列寧的「黨論」，指的是列寧發表於1902年的《怎麼辦？》一書中所提到有關黨的組織理論，該書針對在沙皇專制政治統治底下的俄羅斯革命的特殊形勢，提出著名的「先鋒隊」組織概念。雖然它並不涉及無產階級革命後或布爾喬亞革命後有關黨組織的問題，但也無法否定「它」對革命後黨的型態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因此，部分的人就認為列寧關於先鋒隊政黨的概念中含有一黨制的萌芽。

從客觀的邏輯來說，列寧的黨建理論和革命後具有威權主義色彩的政權黨之間，確實存在著某些聯繫。但是如果說他提出先鋒隊概念是以實現「一黨制」為目的的話，那就是理論與歷史的誤解。正確的說法應該是，列寧的黨建理論不過是在歷史上被用來合理化「一黨制」的論據而已。我們在解釋歷史的時候，絕不能為了「現在」而利用「過去」。

一般而言，所謂列寧的黨建理論或可要約如下：

1/. 黨組織和勞動者組織的區別：

列寧主張，黨是由少數自覺的職業革命家所構成的集團，集團的幹部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武裝自己的革命知識份子，並且必須歸屬於一個黨組織（如小組、支部等）。在1903年的黨代表大會中，馬爾托夫依據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大眾政黨的傳統觀點，主張：雖然不屬於黨組織，但從黨的周圍支持黨的人也可認為是黨員。列寧就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這種廣泛的支持者應該包含於勞動者組織當中而不是做為黨員。

2/. 犧牲民主主義原則、高度中央集權的黨組織：

列寧認為在缺乏政治自由的俄羅斯專政制度之下，為了有效地對付強大的警察權力和憲兵等情治單位，黨的組織原則應該和勞動者組織有所不同，黨必須是秘密組織。因此，西歐無產階級政黨所採取的完全公開、選舉制、廣泛的民主主義組織原則，對於俄羅斯的革命形勢而言只有百害而無一利。黨所需要的組織原則是最嚴格的秘密活動、嚴格的黨員篩選，職業革命家的隊伍。

3/. 黨對整個勞工運動的強力領導：

列寧認為，黨對整個勞工運動發揮強力的指導性是運動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沒有革命菁英的領導，無產階級的自發性鬥爭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階級鬥爭。

總之，在《怎麼辦？》一書中，列寧所提出的黨，是在高度中央集權的組織原則上，以嚴格的紀律來結合的少數職業革命家的秘密結社組織，並且由這個組織來指導勞工運動。列寧確信，面對著沒有政治自由的專制政治、不管在質上或量上都尚未成熟的勞動階級，但卻擁有強大的革命知識份子集團的俄羅斯革命條件下，要統一分裂的運動，組織全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只有走向職業革命家政黨的這條道路。

就日後的發展而言，歷史證明了這是最適合俄羅斯革命運動的組織原則——也就是繼承俄羅斯的革命傳統、符合俄羅斯革命的特殊條件的組織原則。

列寧的黨建理論由於在表面上與史達林時代的黨有幾分相像，時常被當作「集權主義政黨」的典型。俄羅斯及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也常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中所提到：「共產主義者除了無產階級的利害之外，沒有特別的利害，共產主義者不會提出特殊的原理，使無產階級運動服從於它…」等有關無產階級政黨的傳統觀念，來對列寧進行批判和攻擊。面對這些批評，列寧從來也不曾改變過他的看法。

不過，到了1905年，一方面由於勞動者蘇維埃的設立，象徵著無產階級從下而

上的自發性革命運動的高揚；一方面由於帝俄政府開始容許某一程度的政治自由，因此可以進行合法運動等新的革命形勢。列寧重新檢討了黨的組織問題，開始積極倡導黨內民主，推動勞動者民主主義的發展。列寧將菁英主義先鋒隊政黨的概念改為大眾政黨，全面發展黨內民主、尊重由下而上的自發性群眾運動。

1905年12月，在第一屆黨的協商會議「有關黨的再組織」的決議文中首度承認黨內民主原則，包括：民主集中制、廣泛的選舉制、最廣泛的公開性、幹部任期制以及嚴格的報告義務等等。在1906年的黨大會上，更進一步在章程中明白的規定：「所有的黨組織必須以民主集中制的原理構成」，將黨內的批評的自由、保持少數意見的自由、形成派系的權利等等規定為民主集中制的主要內容。列寧認為所謂「保留少數意見的自由」：是在「多數決」決定某種意見後，少數派仍可保留其意見，然後可以為了在下一次的機會中貫徹其意見而做出努力。只要在行動的層次上服從多數，保留少數意見並不會和對黨的忠誠相矛盾。

從1907年十月革命成功到內戰爆發的這段期間內，民主主義原則充滿在黨組織中，尤其是革命後的數個月內，「布爾什維克黨在黨內進行著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也是他黨在歷史上少有的率直的反對意見和爭論」，黨員依據「在黨尚未做成決議前擁有行動自由」的原則展開激烈的論爭。可是，內戰的爆發宣告了短暫的黨內民主的結束。革命政府為了自我防衛，不得不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將嚴密的軍隊紀律施用於政治、經濟生活之中，要求黨員要接受「鋼鐵一般的軍事紀律」。

內戰結束後，一方面在黨內爆發的「工會論爭」，再一次證明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非一言堂政黨傳統」的頑強性；在另一方面，布爾什維克黨做為「一黨制」的政治獨佔卻也成為既成事實而固定下來。「一黨制」當然會在觀念上改變黨的性格、組織的統一和規律，「工會論爭」的最後階段，面對著黨分裂的嚴重危機，黨的第十屆大會做出了禁止派系活動的決議。這個決議原先不過是暫時性的非常手段而已，但卻為走向一言堂組織結構化的道路創造了積極的條件。

列寧晚年在病榻上，以1905年的組織理論為基礎，堅持發展民主主義以防止黨的分裂和確保黨內安定，提出恢復勞動者民主主義以尋求黨的改革方案。但是，書記局的位階已經在黨組織中獲得鞏固，並隨著列寧因病淡出政治舞台而日益表面化，加上政治局內部權力鬥爭的激烈化，黨的安定和統一就越來越倚重書記局的維持。因此，書記局從單純的執行機構質變為重要甚至具有決策性政治意義的機構。從組織的面向來看，列寧死後的黨內鬥爭是黨的權力逐漸集中於書記處的過程，而反對派的消

滅和史達林派的勝利就是這個過程的結果。

(b) 列寧主義的問題

列寧在《怎麼辦？》一書中不斷的強調：在俄羅斯，由於受到獨裁政權的統治，中央集權和民主主義是無法兩立的。這種特殊性的規定就隱含著「假如沒有帝俄的專制統治，中央集權和民主主義就有可能並存」的邏輯。因此，1902年的黨建理論和1905年的民主集中制組織理論之間並沒有邏輯上的矛盾。當人們討論列寧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的連續性時，往往將列寧1902年的黨建理論和黨在30年代以後的「一言堂化」直接地聯繫起來，但是如果我們考察其歷史的發展，這個看法就顯得過度的單純化。

不過，列寧並不是一貫地主張勞動者的民主主義。十月革命之前，就革命的目的而言，在當組織的效率和民主主義的要求兩相衝突時，列寧往往傾向選擇前者。即便是在革命後，由於身任黨和政府的最高負責人，也不得不站在與要求勞動者民主主義的反對派相對立的立場。因此，如果一昧的想要撇清列寧主義和史達林「一言堂政黨」的關係，也和事實不符。前蘇聯著名的反體制派歷史學者Roy Medvedev就指出：「列寧對於民主主義的實現以及發展型態和方法的發言並不是很充分，有時候甚至還有幾分偏差，因此還有商榷的餘地」。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要說「一言堂政黨」的形成是史達林的有意識的作為，這也與史實相違背。E.H.Carr就說：一言堂政黨的形成，並不能歸咎於某個個人有意識的作為，也不是由誰一貫地反對。當黨的紀律適用於他本身的時候，反對派的領導人便會抵抗。但是在此之前（當他還屬於當權派的時候），他是歡迎這個作法的。例如，日後成為擁護黨內民主主義的旗手的托洛斯基，在「軍事論爭」和「工會論爭」時期，便時常嘲笑堅持勞動者民主主義的反對派是不符現實的烏托邦主義者，而在1924年的第十三屆黨大會中，極力主張黨的「一言堂化」的必要性的卻是季諾維也夫。

如果說，列寧和早期的布爾什維克領導階層，是在面對著專制政治的狀況下，或是面臨危機的條件下才否定民主主義，這也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當我們研究「既存」社會主義體制時，假如忽略了體制具有與思想、運動不同的獨特性時，我們往往會產生錯誤的認識。

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是有錯，但他一旦成為擁有數億離飢餓線不遠的龐大人口的領導人，又面對著不能不以快速的工業化來保衛革命的危機時，就不得不藉由一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來調度人民的積極性，使人民自覺的接受高積累低分配的經濟政策，也就是說，以高政治水平和低生活水平來要求人民——雖然「人民公社」是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的實現，但「人民公社」本身也是從革命的基礎力量（農民）吸收農業剩餘的機構（為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而保障資本積累的機制）。

再則，組織是由人們所造成的，造就它的人們以為組織只不過是為了達成某一目標的工具而已，但組織一旦形成，經過某些階段後會反過頭來控制創造他的人們。列寧等早期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們似乎忽略了這種被稱為「異化」的現象。

列寧和早期的布爾什維克領導者們對組織的看法，較為明顯的特徵是對人的理性的樂觀主義。列寧在他討論自發性和目的意識性的理論「外部注入論」中，重視由上而下的指導勞動階級的自我覺醒，因而強調「宣傳」、「煽動」的機能。但列寧所謂的宣傳、煽動中缺乏「操縱」（以不合理的 communication 傳遞訊息來產生對精神的影響）的要素。

在《怎麼辦？》一書中，列寧將「宣傳」定義為：將眾多的思想傳達給對方，讓他去做理性的判斷；而「煽動」就是，根據對方理性判斷的選擇而號召其採取行動。換言之，列寧認為領導者對群眾的號召就像是「幼兒實現其潛在能力」一樣的具有教育的性質，而不是以非理性的方法「操縱」群眾，作用於群眾。

E.H.Carr說：「列寧公然主張教育群眾、影響群眾的必要性，但他相信以理性的說服，或經驗教育才是正確的方法。到20世紀中期，他的這種理念已經在蘇聯或其他地方喪失效力。這一點就是列寧和史達林的根本差異。」

（待續） ☆

更正啓事

本文上期刊載時，內文提及的英國歷史學者E.H.Carr，本刊誤植為E.H.Carv，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與讀者致歉！

編輯報告

台灣的政壇最近真是亂得不得了，八十老翁李登輝重出江湖引發的效應，使得台灣社會似乎又要陷入統獨對立的情結中。另一方面，有些自命「中道」的政治人物於是組織「山盟」，希望能扮演英國「費邊社」的角色，為紛亂的政局尋出路。但這些標榜中間或新中間的政團與政治人物，在沒有左翼思潮的指導下，真的能為苦悶的社會找出答案嗎？林深靖〈中間的迷思〉，告訴我們：台灣社會並不欠缺各種形式的「中間」，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左翼力量的興起與行動。

失業問題日益嚴重，我們究應如何看待與面對？九二一大地震受災戶聯盟〈九二一災民與台灣失業勞工同命運！〉，深入地分析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台灣失業勞工與九二一災民所面臨的共同困境，以及一致對抗的共同敵人。六月三十日深夜，雖然經過台汽工運激烈的抗爭，台汽客運仍然被迫走入歷史，而由國光公司取代，一千多名台汽員工也隨之失業。台汽工會〈台汽客運走入歷史〉，是當日台汽工會散發的兩份文宣的合併本，讓讀者能夠了解台汽員工的處境與心聲。

左翼與民族問題的關係一直是台灣左翼必須要面對與解決的議題，何六九過去針對這一主題已在《左翼》數度表達他的意見，並曾引起激烈的論辯，現在何六九在〈鄉鄙之歌〉一文中，進一步申論他所提出的建立在公民意識基礎上的民族論。我們歡迎關心民族問題的左翼朋友，能夠針對這一議題繼續進行建設性的批評與對話。

郭力昕〈如何站起來？怎麼走出去？〉，報導美濃交工樂隊不久前前往歐洲演唱的活動過程及意義，並對這支客家樂團未來的發展提出嚴格的期許。何苦〈時事雜感〉，透過兩篇對當前時政的評論，指出台灣社會當前的一些怪現象。

黃志龍〈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二）〉，本期主要是針對列寧《國家與革命》及《怎麼辦？》等論著的分析，探討列寧主義有關國家與黨角色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差異。

由於《左翼》目前使用的E-Mail登記公司新浪網近來進行帳號重整，以致《左翼》過去對外聯絡的兩個E-Mail帳號中twleft@sima.com.tw已經關閉，讀者今後請透過twleft@sinamail.com繼續與我們聯絡。

左翼 第二十號

出版日期：2001年6月30日

E-Mail: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永和郵政549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二十一號



〈西里西亞的婦人〉 作者：帕·斯泰勒(波蘭)

【爭鳴與求是】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上）	張懷思 / 2
帝國主義與虛假的公民文化圓舞曲	洪學弟 / 24
致何六九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汪立峽 / 30
但丁、全球化與世界政府	左 思 / 32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三〉	黃志龍 / 3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 左翼統一派

張懷思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自十八世紀末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兩百餘年來，民族主義非但沒有如一些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理論家所預期的趨於式微，快速化為過眼雲煙，反而在二戰後的第三世界成為主導力量，至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隨著東歐、蘇聯共產體制的崩解，民族主義更再度掀起高潮，促成蘇聯、南斯拉夫聯邦的分裂與兩德的統一，巴爾幹半島也因之重又陷入種族紛爭的漩渦，造成深重的災難。對這股牽動世界歷史的洶洶巨流，左右各派的理論家與學者紛紛提出分析與對策。自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來，西方學術思想界更形成研究民族主義的熱潮，其勢頭至今未衰，不少紮實的論著，於焉問世，給統獨爭論不休的台灣提供了巨大的參考價值。在統獨之爭白熱化的一九九〇年代，台灣學術界圍繞著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問題，發表了數以百計的論文與專著，但從左翼觀點立論者不多，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

哈伯馬斯的理性溝通論

從《左翼》創刊到第十二號，左翼陣營針對階級於民族問題及兩岸關係，展開了第一波的熱烈爭論。參與爭論的各方，觀點容有差異，但態度真誠，觀點鮮明，不脫擺事實、講道理的基本規範，在相互商榷、溝通下，對釐清問題，促進了解，無疑有極大的助益。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極力倡導在「理想的溝通情境」下，進行理性的論辯，以期尋求合理的共識。這樣的風格沒有能在第二波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戰中再現。

哈伯馬斯在論述理性的溝通行為時，提出要通過溝通達到相互理解，進而形成共識，必須滿足四個要件：1. 陳述的言詞明白易解；2. 陳述的內容真實可信；3. 態度真誠；4. 論證精當令人折服。簡而言之，就是易解、真實、真誠與正確。哈伯馬斯認為，只有根據這四項規範，在沒有受到暴力威脅或欺詐的扭曲之下，進行對話論辯，才可能達成理性的溝通與理解，取得真理的共識，否則就沒有理性的溝通可言。哈伯

馬斯的這個觀點著眼於建立開放的公共論域所需的形式條件與程序規範，其實不能保證社會共識的形成，但在一定範圍內，仍不失為可依循的溝通規範。

《左翼》第二波關於民族主義的爭論是由何六九在第十五號發表的〈當幽靈徘徊不去的時候〉(以下簡稱〈幽靈〉)挑起的。作者表面上是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一般地否定民族主義，實則主要矛頭對準中華民族主義，並為台灣民族主義鳴冤叫屈，末尾則是大聲疾呼台灣的左派起來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揭露和徹底批判漢民族主義的所有負面性質，並且把它當作一個思想運動來努力從事」。口氣不小，調子也唱得很高。然而，這完全不是篇事實充分，論證嚴謹的文章，全篇充斥著作者個人的主觀臆斷與對中華民族主義的仇恨情緒，不過是篇雜感性質的東西，根本不值一駁。然而，由於文中運用大量尖刻、挑激的字眼攻擊左翼的統派，且毫無根據地醜化中華民族主義，罔顧事實地美化台灣民族主義，還是激起了樊梅地等人在《左翼》第十六號的駁斥。

老鴉倡守貞？

極其可笑的是，在遭到措辭強烈的反駁後，何六九竟然致函《左翼》編輯部高談起「展開建設性辯論與對話，深入良性批判的工作」，還忿忿不平地指責：「獨裁威權式樣的文宣，不必論證就給異議份子加上帝國主義傳聲筒、奴僕等帽子，動輒鬥臭鬥垮。不料在《左翼》上，我們竟然也看到相同手法。何六九的來路，與討論議題何干？分析何六九祖先的血緣，這是哪門子的嚴謹討論？四篇文章，外加一篇讀者投書，都是同樣的任性方式，毫無二致的粗暴語氣，吐口水淹死人，就是這個樣子吧？……………台灣左派會沿襲中國文革(非文革時期也一樣)血淋淋的言語暴力，還是會另圖努力建立健康的對話論戰風格？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何六九自己在文章中責罵左翼統派內心深藏漢民族主義與右翼統派「勾肩搭背」，是「偽裝」、「偽善」、「詐騙」。這又是什麼雅馴的字眼？所謂「展開建設性辯論與對話，深入良性批判的工作」、「建立健康的對話論戰風格」，誰不贊成？而且在《左翼》上早就有了良好的前例，不勞何六九來提倡。何六九本身的文章，包括在《左翼》二十號上的〈鄉鄙之歌〉(以下簡稱〈鄉鄙〉)，一貫的用囂張、挑釁的口吻攻訐台灣左翼的統派，一貫的任性、恣意醜詆中華民族主義，為台灣民族主義幫腔助勢，也一貫的自稱是國際主義者、非民族主義者，但又一再強調台灣工人階級不能不問民族，並抬出公民民族主義大加讚頌。言論如此藏頭縮尾、閃爍不定，難怪《左翼》第十六號的駁斥文章要把他說成是披著國際主義的毛皮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哈伯馬斯所提的理性溝通的四大要件：明晰易解、真實、真誠與正確，何六九無一具

備，卻侈談「建設性辯論與對話」、「健康的對話論戰風格」。其荒唐可笑，有如妓院的老鴇一邊還在掛牌營業，一邊卻在奔走呼籲婦女守貞，聞之不能不令人作三日嘔。

其實，何六九大可不必唱此高調。既然是立意要掀起一場文化大革命，是要與中華民族主義決一死戰，而且也粗暴地謾罵了論敵，又何必害怕論敵以牙還牙，一遭反擊便忙不迭地指控別人語氣粗暴，是「血淋淋的言語暴力」呢？既然要搞文化革命，而且是「大」革命，那麼用毛澤東的名言來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何六九自己不就是這樣子實踐的嗎？他的文章是既不溫良也不恭，更談不上讓了。何六九的作風真像極了馬克思所嘲笑的：「攻擊別人時狂妄粗暴，對別人的粗暴則歇斯底里地易動感情」。至於所謂語氣粗暴，何六九指的是「奴僕」、「帝國主義傳聲筒」之類的措辭。這其實非中共乃至文革所獨有，更非中國首創。就左翼而言，自馬克思以降，爲了與數千年的私有制傳統徹底決裂，爲了運用批判的武器「揭露舊世界，並爲建立一個新世界而積極工作」，在批判論敵時，鋒鏑所向，常是毫不容情，或者用何六九的話說是「粗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說：政治經濟學「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於參養的文巧的鬥爭」，在《剩餘價值理論》第一卷也指責庸俗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上的阿諛奉承的侍臣們」。這些話都足夠資格符合何六九所謂的「粗暴」標準。列寧批判論敵的措辭之激烈，就更不用說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中，他譴責考茨基「向興登堡和威廉二世效犬馬之勞」。在〈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中，他又痛斥普列漢諾夫等人「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者和沙皇的走狗」。這些話也絕對夠得上何六九所謂的「血淋淋的語言暴力」。何六九大可不必把發明的專利權奉送給中國與中國的文革。在現代中國，魯迅倒有一句廣爲人知的絕罵：“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不過那是1930年爲貶損主張文學沒有階級性的梁實秋而創造的，其「血淋淋」遠在中共革命成功之前，當然更與文革八竿子打不著了。

論戰的基本規範

問題的關鍵不在用什麼樣的語言，而在於：一、爭論是什麼樣性質的爭論？二、名與實是不是相符？如果爭論雙方的出發點是抱著嚴肅、誠懇的態度，以有理有據的論述方式，爲探索真理、尋求共識而論辯，那就會是「揖讓而升，降而飲」的君子之爭，雙方據理力爭，所用的措辭、語氣自然不會有刀光劍影，也就能創造出哈伯馬斯所期望的「理想的溝通情境」。因爲初衷是「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爭鳴的目的是爲了求友，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的，所以雙方雖然在「爭」，甚至是「戰」，但終究還保持了磊落的武士風度，講究就事論事，以理服人的基本規範。《左翼》第一波關於階級與民族的爭論，正是這樣一種「建設性辯論與對話」、「健康的對話論戰風

格」。反之，如果挑起爭論的一方，一開始就打出「革命」的旗幟，那首先就已把對手視為革命的對象，雙方既屬敵我對抗，語氣要不「粗暴」，用詞要不「血淋淋」，那是天方夜譚。何六九自己發起衝鋒號的那篇〈幽靈〉就是個明證。但是，即使是敵我兩軍對壘，假使能以堂堂之陣，揭正正之旗，拿出紮實可靠的論據，嚴謹精當的論證，表現出深厚的理論功底與博洽的知識，結結實實地指出論敵舉證錯誤，論述粗疏之處，有效地駁倒論敵的觀點與立場，那也能博得觀者的喝采，甚至讓有氣度的對手尊為可敬的敵人。反之，如果像何六九那樣，先是搞不清中華民族為何物便濫肆宣洩反華情緒，誣詆左統人士。在樊梅地等人提出反批判指其為台灣民族主義張目，是帝國主義傳聲筒後，卻不敢面對論敵的指控，提出辯解，依舊怙惡不悛，在〈鄉鄙之歌〉中繼續自拉自唱他那自以為高明、「文明」的公民族主義老調，醜化中華民族主義。這就顯示他根本不願面對問題，打一場光明磊落的論戰。何六九認為，「帝國主義傳聲筒」、「奴僕」等指控是「粗暴」、「血淋淋的語言暴力」。這完全是心虛、膽怯的自解之詞。眾所週知，用詞的恰當與否取決於名實是否一致，無關乎「文雅」或「粗暴」。對一個信守承諾的人，即使用文雅的「食言而肥」指責他，也構成不可忍受的侮辱，而痛斥一個醜顏事仇和逢迎權貴搖尾乞憐者為「奴才」、「走狗」，也絕不是什麼污蔑之詞，更說不上是「粗暴」。關鍵不在於所定的罪行嚴不嚴重，而在指控的證據確不確鑿、充不充份。

以上就是我們對論戰交鋒的基本看法。由於何六九沒有一點坦蕩的君子之風，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們也不準備待他以君子，與之商榷決疑，而是毫不留情地徹底揭露他裝神弄鬼、形左實右的反動本質，戳穿他除了會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說一些空話、大話之外，根本是個不學無術、思想錯亂的庸妄之徒。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與批判化的道德〉的附言中說：「我回答海因岑先生並不是為了擊退他對恩格斯的進攻。海因岑先生的文章值不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為海因岑宣言為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料。」我們駁斥何六九也同樣不是因為他的文章值得回答，而是通過對他的批判可以釐清一些與民族主義有關的問題，並對統獨問題提出左翼的觀點。

曲解中華民族主義，膜拜公民族主義

何六九在《左翼》共發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十四號的〈民族問題：台灣左翼的阿堵物〉，數千字的文章立場擺得很左，歷數馬克思、恩格斯對民族問題的論述粗糙，盧森堡則在民族問題上馬失前蹄，全文滿紙空話，沒什麼論證，其實就是要說一句話：左翼不能迴避民族問題，要從無產階級世界觀出發，提出自己的民族論，戰勝右翼，帶領台灣工人以及整個社會在民族問題上更進一層樓。立意很好，可是就像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沒有拿出真貨。接著就是第十五號的〈幽靈〉。令人不勝訝異

的是，我們非但沒有看到「從無產階級世界觀出發」的民族論，反而是在激烈反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情緒之外，把台灣民族主義打扮成自由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加以吹捧，從而淪為自由主義的尾巴。而我們引頸企盼的何六九式的左翼民族觀卻依舊在虛無縹緲間，不見降世，以慰吾人之望。〈幽靈〉的胡言亂語在第十六號上遭到樊梅地等人的重擊後，經數月的整軍經武，何六九又捲土重來，但迴避了樊梅地等人所批判的台獨與台灣民族主義實為帝國主義的衍生物這個重點，在二十號的〈鄉鄙之歌〉中重申〈幽靈〉的基調，不過，不同的是，這回採用論文的格式，引述了一些西方學者關於民族主義的看法，比較成系統地陳述了他的論點，但也更全面地暴露了他主觀唯心、機械的形而上學思考方式，絲毫沒有一點唯物辯證的觀點，也充分顯示了他不唯對世界史、中國史甚至台灣的歷史與現實驚人的無知。更致命的是，他根本沒有讀懂引為立論依據的西方學者的論述，卻用自己的主觀成見胡亂曲解，濫加發揮，使這篇文章成了丟人現眼的笑話大全。

何六九在〈幽靈〉與〈鄉鄙〉兩文中呈現的思路與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一、他先把中華民族主義窄化、曲解成基於血緣的漢族民族主義，然後再將之貶斥為非理性、愚昧、狹隘的種族主義。接著便歷數漢民族主義的罪狀：1.長期以來不斷製造出台灣民族主義與漢民族主義的民族矛盾對立；2.麻痺台灣工人乃至中國大陸工人的階級意識；3.一向在兩岸為獨裁威權體制提供最得力的掩飾和辯護；4.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格格不入；5.在在阻礙台灣社會（以及中國社會）在政治思考上拋開過時舊傳統舊偏見、邁步向前的最大精神束縛。經過何六九曲解後的中華民族主義在他筆下就這樣成了集罪惡之大成的萬惡淵藪了。

二、他宣稱，相對於愚昧、狹隘、落後、非理性的血緣論漢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則是非血緣論的文明、開放、進步、理性的公民民族主義。

三、他認為不列顛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在英國早已缺乏市場，並大加歌頌，從而供奉英國為民主、文明、理性的公民民族主義的典型。

不見左翼的民族觀，充當自由主義的尾巴

傳統右派台獨的意識形態有幾個基礎，一、美國與國民黨式的反共八股（即中共是個殘暴的專制政權）；二、由「二二八」事變激化的台灣地方意識；三、粗糙的半調子美國版自由主義。這些因素構成了反共、反中國、反中華民族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核心。所謂台獨左派雖然套用根本沒有搞通的馬克思主義語言來粧點門面，建構台灣

民族論，但骨子裡與右派台獨的台灣民族主義是一路貨，都淋漓盡致地呈現了小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的色彩。自上一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獨的新世代不滿基於省籍矛盾且法西斯化的台灣民族論，開始提出西方自由主義者主張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近幾年漸成台灣分離主義的流行論述。

何六九擺出十足馬克思主義左翼的架式，譴責左翼統一派是「偽裝」成馬克思主義者、實行「詐騙」的一群「偽善」的漢族種族主義者，還大言不慚地說要以較為先進、優越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在民族問題上，提出「絕大不同的看法」，戰勝右翼。然而，在〈幽靈〉與〈鄉鄙〉二文中，我們看不到一丁半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影子。何六九的觀點其實了無新意，一、他只是雜揉了新舊台獨的論調，而且極為惡劣的是，爲了想兩面討好新、舊型台獨，睜眼說瞎話地把新型台獨所反對的「福佬沙文主義」的台灣民族論硬生生附會成「公民民族主義」；二、他緊跟在自由主義者的屁股後面，以連比較嚴謹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會有的肉麻語調歌頌起時髦的「公民民族主義」。充分顯示他不過是自由主義的尾巴，而且是較為深思的自由主義者也不肯要的爛得發臭的尾巴。何六九用他粗陋簡單的主觀唯心思維，把西方學者爲了方便分析而劃分的「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何六九把它窄化成血緣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兩種民族主義理想類型(ideal type)，視爲機械的、絕對對立的兩極。族裔民族主義代表非理性、愚昧、落後、狹隘，甚至血腥，而公民民族主義則代表理性、開明、進步、寬容。總之，是黑暗與光明、野蠻與文明、善與惡的天淵之別。然後，拿著這抽象的兩極對立概念去解釋十九、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也拿來抨擊中華民族主義，美化台灣的分離主義。何六九就是以這樣的思維，自以爲很“理性”地指責所有的民族主義者，特別是中華民族主義者「思想貧乏」、「閉塞」、「偏執自大」。然而，何謂“理性”？用最通俗的說法，那就是運用理智，排除好惡情緒的干擾，不受主觀成見所左右，以客觀存在的事物、證據爲依據下判斷、作結論。何六九對民族主義者，特別是中華民族主義者，如此充滿激情的詈罵，恐怕自認爲是出於義憤，甚至是崇高的道德義憤：民族主義造成多少流血衝突啊！簡直是罪惡堆積如山，十惡不赦！尤其，套用台獨常有的口吻來說，中國正以“民族大義”爲名，用武力威脅台灣，多麼“霸道”、“蠻橫”、“不文明”、“無理”啊！可是，這絕不是什麼“理性”的反應。對於民族主義這個兩百多年來深深影響了人類歷史，至今餘威未戢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真正理性的態度是斯賓諾莎所說的：「不要哭，不要笑，但要去理解！」。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之處，在於它不僅僅像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那樣對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與不人道，有極大的道德義憤，更重要的是，它把義憤轉化成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做出最深刻、理性的科學分析的動力，而馬克思主義的深邃洞見又反過

來成了鼓舞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道德熱情的最強大的理論武器。這就是非理性的道德熱情與理性的科學分析的辯證發展關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得好：「……訴諸所謂永恆正義。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作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做象徵。……憤怒出詩人，……可是憤怒……所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的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資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一版，第189頁）其實，何止政治經濟學如此，所有關於人的學問莫不皆然。

美化、吹捧台灣民族主義

數十年來，左右各派的理論家與學者正是出於對民族主義這一極重要的歷史運動的重視，用理性的態度，作出了深刻分析，出版了為數可觀的著作，使人們對民族主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可是，何六九完全沒有這種理性的態度。他根本不會用心認真的研讀諸多探討民族主義問題的論著。對於世界各地區、各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歷史，更是毫無認識，只會把他沒有搞懂的“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作為二元對立的抽象概念，一個貶之入地，一個捧之上天，然後胡亂套用在世界的歷史與事務，尤其是兩岸關係上，來盡情發洩他對民族主義的不滿情緒。以下我們就來逐一揭穿何六九的論述在態度上的不真誠、內容上的錯誤、論證上的邏輯錯亂與知識上的淺陋，證明滿口空話、大話與廢話的何六九，不但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連自由主義者也算不上，只不過是個不自量力，沒有自知之明的蠢才！

何六九自稱他不是民族主義者，更不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可是他美化、吹捧台灣民族主義的程度，恐怕連台灣民族主義者都要愧不敢當，而新型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則更是絕不敢苟同。何六九是怎麼評價台灣民族主義的，這裏且引錄兩段文字，以見其厚顏公然顛倒黑白，違背事實到何種程度：

「漢族民族認同和台灣民族認同之間有極大的差異，不宜視為同類事物。至少，台灣民族運動從開始就相當成功地擺脫了血緣論色彩，在內容上比較接近一般常見於現代文明社會的民族認同。……」（〈幽靈〉）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典型：從民主體制的開始落實開始，原來與民主運動同步驅動的民族訴求卻逐漸淡化。台灣就是其中的一個。在這種類型的情況下，民族認同大多會逐漸脫胎換骨，被那種以民主權利為中心的公民意識所取代。若加追溯，其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民族認同，就已經開始立意不以血緣觀念為主。民族解放之後，血緣

因素更見減少，甚至於絕跡。相對於血緣民族主義者在取得政權之後更加著重民族主義宣傳，仇視民主訴求而言，公民意識的民族認同則是以共同維護民主體制以追求社會的進步為主題，相對地淡化民族主義。」（〈鄉鄙〉）

在何六九的用語中，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血緣民族主義，都代表了愚昧、反動、閉塞，可是唯獨台灣民族主義成了例外。台灣民族主義者長期挑動省籍矛盾，將省籍矛盾無限上綱，高喊「台灣人出頭天」。大肆煽動「台灣人意識」，以謀快速奪權建國。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前，動輒以「中國豬滾回大陸去！」辱罵甚至毆打具中國意識者，連不會說福佬「國語」者都遭惡言相向，乃至被趕下計程車。在高雄的群眾聚會中，還出現台獨屠宰豬隻後升上旗杆的血淋淋場面，這些台獨法西斯的行徑，是台灣民眾記憶猶新的事。可是，何六九卻膽敢胡說什麼「台灣民族運動從開始就相當成功地擺脫了血緣論色彩，在內容上比較接近一般常見於現代文明社會的民族認同」，「其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民族認同，就已經開始立意不以血緣觀念為主」。要戳破何六九這種厚顏無恥的瀾言，很容易。我們來看看新生代的台獨論者是怎麼說的：

「洪耀福（當時為美麗島辦公室組織部主任）首先指出，民進黨必須克服四大問題，才能轉變為成熟的現代民主政黨：一、應從強調對抗心態的反對黨，轉化唯有企圖心的執政黨。二、應將單一窄化的台獨議題，轉化為多元社會議題。三、應將教條而不切實際的中國政策，轉化為務實的中國政策。四、民進黨已被窄化為福佬政黨，很難爭取以北京話為主的年輕人支持。

王時思（當時為新國會研究室副主任）則對族群問題痛切表示，民進黨至今仍未對濫用族群矛盾的現象進行反省，以致「台灣」逐漸成為另一種沙文符號，造成「大台灣沙文主義」的擴散。尤其把新黨貼上「外省黨」的簡化標籤，更只求政治方便，完全無視於族群矛盾的政治惡果。

沈發惠（曾為彭謝競選總部幹事）也就族群問題提出批評，認為民進黨其實和李登輝一樣，都只會標舉「台灣人的悲哀」，卻不能認真客家、外省、原住民等其他族群的悲哀。

陳俊麟（當時為選舉對策委員會副執行長）則呼籲，民進黨應誠實面對兩種選民流失的危機：一是新黨選票中，高達六成為本省籍。二是傳統的民進黨選民，高達三成流向李登輝。只會把新黨說成「外省黨」，或把李登輝說成「轉向台獨」，畢竟只

是自我安慰的鴉片主義，並未真正面對民進黨的發展危機。

李建鴻（當時為翁金珠國會辦公室主任）則單刀直入，直接批判台獨有教條化的危險，認為不少民進黨人只會說堅持台獨的原則，卻提不出實踐台獨的方法，以致在黨內逐漸形成「台獨法西斯」文化，根本無法對台獨的實踐困境，展開真誠嚴肅的討論。更嚴重的是，民進黨的領導階層，到處充斥個人英雄主義，更使務實理智的良性對話難以形成。

外省第二代的段宜康（台北市議員）更坦率指出：一九九四年省長選舉，民進黨喊出「台灣人支持台灣人」，難道不算是族群動員？他譴責民進黨內「仍在利用族群矛盾得到利益的領導人」，認為民進黨應反省「大福佬沙文主義」，不能只利用既有的族群矛盾，挑選最容易走的路。他還指出，不管是標舉「台灣人尊嚴」的彭明敏，或是主張「台灣黨」的許信良，事實上都在利用族群意識抄政治捷徑。彭明敏訴諸民進黨的本省人支持者，許信良則試圖和最大的本省人勢力國民黨結合，兩人都未慮及政治捷徑所可能帶來的族群衝擊。」（引自郭正亮，1998：90-91）

說這些話的時機，時在不遠，就在1996年4月，彭明敏高舉台獨旗幟參選總統，慘遭挫敗後不久，新世代台獨所做出的痛切反省。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無不在重重地抽打何六九那張胡說瞎話的嘴巴。古往今來，這世界總不缺一種喜歡掩耳盜鈴、自以為聰明的蠢才，何六九就是這種貨色。他竟以為摀住自己的眼睛，信口胡言，世人就會輕易讓他矇騙過去，到頭來他只能自欺，除了白痴，連小學生他也騙不了。

台灣民族主義是超級血緣論

何六九說的渾話還不止於此。他雖然不止一次自稱不是台灣民族論者，可是他不但處處在以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立論，還替台灣民族論者塗脂抹粉，把他們打扮得非常民主、文明、理性，而所謂漢民族主義者則被醜化成反民主、非理性、粗鄙。且看〈鄉鄙〉中的兩段文字：

「而在這個新興的民主社會裡，過去曾經長期遭受民族壓迫的族群人民，並沒有在解除壓迫枷鎖之際，如同不少地區人民那樣推波助瀾地造成另一個民族主義的狂熱浪潮。相反的，一般對於嶄新民主體制的關注投入之情，遠遠超越了以往遭受歧視欺凌所積累的憤怒。他們一再表現出寬容的胸襟，寧願讓美好夢想通過有別於民族動員的另一種政治程序得以實現。一個建立在現代公民意識基礎之上的政治認同，開始形成。從英國到台灣，民族主義情懷的漲落歷程似乎快要走完一個曲折的歷史循環。」

「在距離解嚴已經超過十年的台灣社會，仍然有許多血性的漢族民族主義者蠢蠢欲動，不耐地等待復辟和審判異端時刻的到來。然而，在遭受數十年民族壓迫的人民當中，當他們成功地以民族反抗形式為自己掙得一定的民主權利之後，反而開始以一種近似淡然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民族認同。除了少數的孤立個案之外，他們並沒有因為血性漢族民族主義者一再在街道上公然辱罵挑釁，而激怒得回報以同樣的激情。不但如此，他們當中還有許多人經常在各種場合互相告誡說，穩定的民主體制才是台灣人民福祉的最大保障，而偏重倡導台灣民族主義則是可能帶來負面作用的。所表現出來的寬容和自信，與另一造的偏執和自大，恰成強烈對比。」（《左翼》第二十號，第14、21頁）

在何六九的文章中，完全以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口吻再三提到「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民族壓迫」。我們倒要問問這個「台灣民族」是個什麼玩意兒？他的內涵與構成分子為何？又遭受了怎麼樣的「民族壓迫」？何六九斬釘截鐵地否認台灣民族主義是血緣論的民族主義，這點我們不妨同意，但理由與何六九的截然不同。台灣民族主義並非超越了血緣論，而是連稱血緣民族主義的資格都沒有。台灣民族主義者雖然如何六九所云「血緣同樣屬於廣義漢族」，但他們的福老沙文主義比漢民族主義還要狹隘、閉塞。一般的血緣論民族主義是容納所有同血緣的人為「我族」，許多台灣民族主義者對不附和台灣民族論，甚至只是不講福佬話的客家人、外省人，雖然同屬漢族，也加以排斥、歧視，對非漢族的原住民，那就更不用說了。這已經不是一般的血緣民族主義而是舉世少見的極端褊狹、排斥性的超級血緣民族主義了。這也是台灣民族主義搞了幾十年，從海外到台灣，從戒嚴到解嚴後已自由化、民主化十多年的今天，卻始終得不到台灣絕大多數不論省籍或族群的台灣居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對這點，前引台獨新生代的痛切陳詞已可充分說明。何六九煞費苦心地想抹除台灣民族主義以福佬人為中心的極端褊狹固陋的超級血緣論的痕跡、但終究徒勞無功。在他自己的論述裡，就充分暴露了捉襟見肘、自相矛盾的窘態。他先是在〈幽靈〉中說：「台灣民族運動從開始就相當成功地擺脫了血緣色彩」，然後又在〈鄉鄙〉中說：「從民主體制的開始落實開始，原來與民主運動同步驅動的民族訴求卻逐漸淡化。台灣就是其中的一個。在這種類型的情況下，民族認同大多會逐漸脫胎換骨，被那種以民主權利為中心的公民意識所取代。……然而，在遭受數十年民族壓迫的人民當中，當他們成功地以民族反抗形式為自己掙得一定的民主權利之後，反而開始以一種近似淡然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民族認同。」何六九在這裡既說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民族認同」會「脫胎換骨」被「以民主權利為中心的公民意識所取代」，「以一種近似淡然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民族認同」。可見台灣民族主義本是一種與以公民權利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不同的東西。否則，「脫」什麼樣的「胎」，又「換」什麼樣的「骨」呢？

那麼這個不是「公民民族主義」而又以「台灣人出頭天」為主要訴求的台灣民族主義，按照何六九自己的機械二元對立觀，不是他所鄙夷、痛加斥罵的「血緣論民族主義」，還會是其他的什麼東西呢？何六九的論述中雖津津樂道「台灣民族運動」、「台灣民族解放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但從未給予明確的內涵，即一方面妄加比附於「公民民族主義」，一方面又自打嘴巴地承認兩者是不同的東西。這個困窘之境除了肇因於他妄圖為台灣民族主義這個天殘地缺的醜怪之物化妝美容以欺人耳目之外，還由於他根本不知道「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兩者既有所區別又相互聯繫的辯証關係。關於這部份我們在下文會進一步詳論。

台灣民族主義為何退潮？

對於以福佬沙文主義為核心的台灣民族主義在1990年代中期後之所以由盛而衰，「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逐漸在台獨陣營中得勢的原因，何六九把它歸功於台獨內部自覺自動地轉化。這當然也是罔顧事實的渾話。在台獨運動中，「民主」與「獨立」雖然並舉，但孰重孰輕，何者為目標，何者為手段，一直存在著矛盾。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民族主義的獨立建國優先論可說佔居主流地位。換句話說，所謂「打倒外來殖民政權」、「台灣人出頭天」的主張是主軸。而所謂「民主」的訴求，主要是從認為民主代表多數統治、多數決定的概念出發，以為福佬人既佔台灣人口多數，只要能煽動起福佬人的「台灣人意識」（實即所謂「台灣民族意識」），擴大省籍矛盾，將之加工製造成虛構的「民族矛盾」，獲得福佬人的認同，就可對內以「民主」之名快速奪權建國，對外乞求美國為首的反共國家允許「民族自決」，獲得國際承認，取得國際地位。在台灣民族主義者這樣的思維裏，「民主」只是奪權建國的工具，而不是最高的價值。即使是比較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台獨論者，也只是把「民主」當成為台灣獨立背書的「程序」要件，此即所謂「公民投票」、「住民自決」論。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民主的真正實質內涵。可是，就連這種形式上的程序民主，在台灣民族主義者的眼中也不是首要之務。在極力擴大省籍矛盾，將之上綱上線為「民族矛盾」的煽動宣傳下，自然發展出前述極其褊狹與反理性的福佬沙文主義，造成台灣社會內部愈趨嚴重的省籍衝突與統獨對立情勢。

台獨的論述漸由福佬人中心的台灣民族主義轉向公民民族主義，主要是以下兩個因素所造成：一、至1992年立法院全面改選，台灣的立法機構已完成本土化，迨1996年總統直選，則整個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已經民主程序獲得認可，而國民黨卻依然牢牢掌握了政權，所謂的「外來政權」論就此連表面上可以成立的理由都付諸東流，更何況總統大權落在台灣人李登輝手上，所謂「台灣人出頭天」的感情訴求也得到了滿足，此際再販賣什麼「台灣民族主義」已經不會有多大的市場了；二、如前所述，

台灣民族主義造成的台獨法西斯作風滋生了嚴重的省籍衝突，在政治與社會領域中都加劇了緊張的對抗。面對中共 1995 年連番的武力示警，新黨與民進黨內的非台灣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都憂心台灣的內亂將傷害台灣的民主，並予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機會，因而倡導省籍與統獨的「大和解」，形成共同對抗中共以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的統一戰線，力主在資本主義民主憲政的框架下，依照民主的規則，分配權力，尋求妥協，尊重多元的差異，維持台灣的安定。1996 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旗幟鮮明標舉台獨立場，卻遭慘敗，激起了前已述及的不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民進黨新世代的強烈批判。並於 1996 年 5 月 7 日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明確否定台灣民族主義，提出了具有公民民族主義內涵的主張。因此，很諷刺的是，中共以武力警告台獨，遭到何六九咬牙切齒的痛恨，卻也遏制了台獨的氣勢，加速台灣民族主義的退潮，逼使台灣內部必須用形式民主的原則，緩和省籍與統獨的對抗。

因而，台獨陣營中公民民族主義逐漸取代台灣民族主義論，主要是現實上台灣民族主義不但已經行不通，而且還危害台灣，再不改弦更張，只能給台灣帶來深重的禍害。這既是迫於政治現實不得不然的轉型，也是台獨內部經過激烈鬥爭才有的結果。彭明敏等從民進黨出走另組「建國會」，台灣民族主義的基本教義派自行成立「建國黨」，陳水扁所提出的「新中間路線」，都是這場鬥爭後的產物。這個路線變化，距今未遠，人物、事證俱在，本不難察知。然而，何六九卻把它描繪地很詩意，說什麼「一般對於嶄新民主體制的關注投入之情，遠遠超過了以往遭受歧視欺凌所積累的憤怒，他們一再表現出寬容的胸襟，寧願讓美好夢想通過有別於民族動員的另一種政治程序得以實現」，「所表現出來的寬容和自信，與另一邊的偏執和自大，形成強烈的對比」。這些鬼話根本與實際情況不符，明眼人一看即知純屬何六九爲了諂媚台獨而寫的諛頌之詞，不過是文學侍從之臣常幹的下流勾當，不唯無法欺人，只能增加有識者對他的鄙夷。

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曲解

何六九文章的矛頭主要是對準中華民族主義。可是這個蠢才不僅愚昧，他還無比疏懶。他卯足了勁濫加醜詆中華民族主義，但何謂「中華民族」？他在謾罵之前，完全不會稍稍下點工夫去了解，連最基本的認識也沒有。他所幹的事就是把中華民族主義等同於血緣的漢民族主義，然後再貶斥爲排他的、引起嗜血的種族屠殺、種族清洗的種族主義。在他眼裏，兩岸的民主、階級、統獨問題的根子都出在他所曲解的這種中華民族主義。一句話，萬方有罪，罪在中華民族主義。

我們先來“欣賞”幾段他的妙論（也是謬論）：

漢族民族主義其實是一種以種族認同為主軸的血緣民族主義。……細加分析當前漢族民族主義理念的內涵，我們可以發現，它不但在過去數十年間沒有一絲一毫的長進，而且每況愈下，在許多方面越發暴露文明退化、思想閉塞、道德破產的精神狀況。無論是海峽的此岸或者彼岸，凡是直接或者間接有關漢族民族主義（或者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著，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濫情、粗糙和理路錯亂，無異於乩童的無知迷信和誇張矯做。

“炎黃子孫”和“中華民族”的觀念，互相牴觸，漏洞百出，貽笑大方。官方廣加宣傳如此狂妄幼稚的觀念，居然連漢人知識分子也興奮地群起附合。在立論上膚淺而且在精神上相當不理智的血緣論民族主義理念，一旦通過國家機器之手，執意在一個多民族或者多族群的國家內部雷厲風行下去，必定招致強力反彈。果不其然，這是過去和眼前真確發生在海峽兩岸的事。

.....

民初五族共和的口號（以及後來中共的民族政策），可以說是對於血緣漢族民族主義的笨拙掩飾和補救，絲毫無法改變漢族民族主義的血緣論本質，無論如何也欺騙不了中國境內的異族。難怪大清朝一瓦解，蒙古等族紛紛獨立求去。將近百年後的今日，他們仍然要獨立求去。今日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即使僑居異國多年，對於國民黨所設置的蒙藏委員會咬牙切齒、深惡痛絕，對於目前直接統治他們的中國更不用說了。在新疆，武裝民族反抗已經進行有年了。若要怪罪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和“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恐怕應該先反省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的不是。不幸的是，天下間的種族主義者都是先天性缺乏反省能力，因為種族主義是不受理性約束的，甚至於是反理性的。

.....

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在許多情況下其實根本等同於仇外的漢族種族主義）使得中國境內民族問題越來越嚴重。這本身固然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它首先從許多方面扭曲了漢族人民的精神面貌，腐蝕了漢族人民的道義勇氣和政治識辨思考能力，模糊了漢族工人階級的階級觀念和階級使命感。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多元認知和寬容尊重精神，立受重創。一個文明民族之所以偉大的條件，因之凋零；民族靈魂庸俗不堪，甚至於變得嗜血暴戾，把戰爭殺戮當做兒戲，輕率地要動用飛機大炮“教訓”鄰國，以為自己有本領擺出武力威脅的姿態是一件很體面的事。（〈幽靈〉，《左翼》第十五號，第3、4、7頁）

何六九這類對中華民族主義語氣高亢、充滿激情的控訴充斥在〈幽靈〉與〈鄉鄙〉中。他自命“理性”，沒有像很多左翼人士陷入中華民族主義的“魔障”，也顯得非

常大義凜然。然而，他的“理性”與“大義”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那是緣於對中國歷史、現實狀況的極其無知與保守反動本質。

漢族主要不是基於血緣的概念

關於炎黃子孫與中華民族的概念問題。我們先引幾段史書的記載，給何六九這個蠢才兼懶漢開開眼界：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是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記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魏書》，卷一，序紀第一）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遷居朔野。」（《周書》，卷一，帝紀第一）

這兩段文字，一是北魏皇帝拓拔氏，一是北周皇帝宇文氏溯其血緣譜系的記載。兩朝都是鮮卑人，但也自稱是“炎黃子孫”。再往前的西晉時期，鮮卑人慕容氏建立了前燕政權，也說：「其先有熊氏（按：即黃帝）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晉書》，卷一〇八，慕容廆載記）。是不是只有鮮卑的胡人才自稱“炎黃子孫”呢？那又不然。匈奴人赫連勃勃在西晉末年建立夏國，即「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並稱：「朕大禹之後，……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晉書》，卷一三〇，赫連勃勃載記）。非漢族而自稱漢族苗裔的王國，在所多有，此處不一一列舉。北朝的胡人政權不僅自認血統源於炎黃，還積極實行漢化政策，直斥南朝的漢人政權為“南僞”、“島夷”，與之爭中華正統。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胡人向中原地區大規模內徙，建立北朝政權；晉室南渡後，漢人政權直接統治了南方的蠻、獠、俚人等少數民族。數百年間，通過不斷的征伐、衝突，從北到南，促成了漢族與南北各種族裔在血緣、文化上的相互滲透與融合。至隋唐而中國結束南北分裂，復歸統一，完成了一次民族的大融合。隋唐的統治集團俱由漢族與鮮卑族混血構成。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唐高祖、太宗、高宗連續三代俱為鮮卑族女子所生，家族中更頻頻與胡人通婚，這些俱為史書明載，廣為人知。故而，在傳統中國，“漢”“蕃”或“華夏”與“夷狄”之別，主要是根據“文化”而非“血緣”。對此，大陸的歷史學者做了很好的概括說明：

「按照“大一統”理論，“華”、“夷”是可變換的，而區別“華”、“夷”的最高標準是文化。這個作為標準的文化在當時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文化。符合這個文化規範的是“華夏”，不符合這個文化規範的是“夷狄”。因而，大一統思想很容易為陸續內遷的少數民族所接受，並用來作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在大一統思想的指導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數民族一邊自稱為華夏“先王”之後，在族源上與漢族認同，一邊主動接受漢族文化，在境內努力推行漢化政策，在文化上以中華自居。」（《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編寫組 2000：589）

回族的民族學學者也指出：

「在基因和體質方面進行比較，北方漢族與蒙古族更為接近，而與南方漢族距離較大。所以構成“漢族”的最最重要的基礎，不是體質特徵和血緣基因的同源，而是文化層面的同化。廣東人是漢族，但是廣東人的體質特徵與越南人相接近，而與北方漢人差別很大，廣東話發音與漢語普通話的差別也很大。中原王朝在區分屬民時，常用的範疇是“化內”和“化外”。所謂“化”在這裏指的是漢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認同是“天子”的臣民。“化外之民”則是需要教育開化的“生蕃”、“蠻夷之屬”。中原文化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認為“化內”和“化外”可以相互轉化，“有教無類”，所以古人也懂得辯証法。」（馬戎，2001：85）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只有少數民族的不斷漢化，也有漢人不斷融入少數民族中以及少數民族之間相互融合的諸多史實（參考：翁獨健主編 2001；《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編寫組 2000）。因此，中國著名的社會學與民族學學者費孝通特別指出：

「在看到漢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時，不應忽視漢族也不斷給其他民族輸出新的血液。從生物基礎，或所謂“血統”上講，可以說中華民族這個一體中經常在發生混合、交雜的作用，沒有哪一個民族在血統上可說是“純種”。」（費孝通，1989）

中華民族的內涵

關於“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內涵，費孝通 1988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 Tanner Lecture 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演講。這篇論文結合了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與作者親自至少數民族地區調查研究的多年成果，對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做了系統的闡述，普獲中國與國際學界的重視，目前已成大陸詮釋中華民族觀念最具影響力與代表性的觀點。且看他是怎麼說的：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這也許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過程。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還有他的特色：在相當早的時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同上）

在費孝通的理論中，中華民族是由 56 個民族作為基礎，共同構成的一個更高層次的有機統一體。各個民族由廣義的文化（語言、宗教、生活習俗等）構成獨特的群體，但在歷史發展的長期過程中，通過經濟、文化的交流與政治的統合，逐漸為形成一個包容各個族群（ethnic group）的民族（nation）即中華民族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在百餘年各族人民攜手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過程中，各族人民陶鑄了休戚與共、榮辱攸關的感情與意識，終乃形成共同的中華民族意識，確立了中華民族在多元的族群文化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一體格局。1996 年 10 月，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舉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費孝通提出了書面發言〈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把他的觀點做了簡要的概括如下：

「第一個論點是：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 56 個民族的民族實體，並不是把 56 個民族加在一起的總稱，因為這些加在一起的 56 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的、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裡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這個論點我引申為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論。多元一體格局中，56 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

第二個論點是：形成多元一體格局有個從分散的多元結成一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有一個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漢族就是多元基層中的一元，由於他發揮凝聚作用把多元結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

第三個論點是：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

並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所以高層次的民族可以說實質上是一個既一體又多元的複合體，其間存在著相對立的內部矛盾，是包含了差異的一致，並通過消長變化以適應於多變不息的內外條件，而獲得這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費孝通，1997）

中共的民族政策

中共自1949年執政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平等原則，在既批判大漢族主義也反對地方小民族主義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推行了一系列尊重少數民族的政治、文化權利的政策（可參考：《原住民族》第12期），先確立法律上的平等，再逐步消除實際上的不平等。費孝通的觀點正是對中國大陸的民族政策的一個理論概括。誠如費孝通所言：

「新中國的成立在我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大事，全國社會結構起了重大變化，其中之一是民族關係的大轉變，從不平等的關係轉變為平等關係。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民族間的關係十分複雜，但是幾千年來基本上沒有變的是民族間不平等的關係，不是這個民族壓倒那個民族就是那個民族壓倒這個民族。在這段歷史裡中國在政治上有過多次改朝換代，佔統治地位的民族也變過多少次，但民族壓迫民族的關係並沒有改變。直到這個世紀的初年，封建王朝覆滅進入了民國時代，才開始由孫中山先生為代表推行了“五族共和”的主張。又經過了幾乎半個世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方出現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事實，並在國家的憲法上做出了規定。從此我國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出現了一個新的民族平等的時代，現在又經過近半個世紀。今天回想起我們中國這個民族關係的根本變化，如果針對當前世界上民族矛盾和戰爭至今未息的形勢來看，不能不承認民族平等是件有關人類共同命運的根本大事。在一個和平大同的世界裡，民族平等是絕不能少的條件。這個條件在我們中國首先實現，在人類歷史上是應當大書特書的。」（同上）

要消除幾千年歷史發展造成的族群之間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實際上的不平等，從而解決族群之間的矛盾，當然不是幾十年甚至百年所可輕易完成的。尤其只要階級社會沒有廢除，國家就不可能消亡，國家不消亡，民族的矛盾也就無從徹底解決。因而，今天中國大陸也還存在著由各種不同因素造成的這樣那樣的族群矛盾。可是，何六九一不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認識民族矛盾產生的一般根源，二不具體分析新疆、西藏獨立運動的性質，而片面地歸因於所謂「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西藏、新疆的獨立運動是哪些份子在領導？又是基於何種因素搞分離主義？何六九從不一問。列寧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到：

「在封建關係或宗法關係和宗法農民關係佔優勢的比較落後的國家和民族中，要特別注意以下各點：

.....

第二、必須同落後國家內具有影響的僧侶及其他反動的和中世紀式的份子作鬥爭；

第三、必須同那些企圖利用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蘭主義和其他類似的派別作鬥爭；」（《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四卷：275）

1950年代以後的西藏獨立運動，其起源是達賴喇嘛為首的統治階級不願放棄神權統治與殘酷的封建農奴制，不惜充當美、英帝國主義的反共、反華工具，這與國民黨為維護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依附在美國帝國主義之下反共如出一轍，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而新疆的獨立運動同樣是一批原有的統治集團，不甘失去既得利益，藉著宣揚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大搞反共反華把戲（參考：陳延琪、潘志平編，2000）。這類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且不論馬克思主義者必然大加撻伐，連自由主義者也頻頻指摘，不予苟同。何六九卻為其打抱不平，把藏獨與疆獨問題一股腦兒全歸罪於所謂「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徒見其反動保守的本質，不要說他空口自我標榜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純屬欺人之言，他連充當自由主義者的資格也沒有。

何六九若硬要指中國大陸的民族矛盾都是「血緣論漢族種族主義」造的孽，那麼我們倒要質問何六九：美國是個貨真價實的“公民民族主義”國家，何以自建國以來以黑白人為中心的種族衝突不斷，迄今仍暴動頻生？這又是什麼因素造成的？而何六九所頂禮膜拜將之供奉為“公民民族主義”典範的英國為何種族矛盾也日形惡化，近年來屢屢發生有色人種的暴動？這些活生生、血淋淋擺在世人眼前的現實，斷非頭腦簡單、知識淺陋、立場反動的何六九所能解釋說明的（對此我們在下文會繼續深論）。至於何六九原本用來譴責所謂“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的話：「把戰爭殺戮當兒戲，輕率地要動用飛機大砲“教訓”鄰國，以為自己有本領擺出威力威脅的姿態是一件很體面的事。」，我們奉勸他還是把它奉送給他那“文明”、“寬容”但「民族靈魂庸俗不堪，甚至於變得嗜血暴戾」滿手血腥的宗主國——美、英帝國主義吧！兩百多年來的世界歷史，這種例子還少嗎？

中國大陸固然還存在著諸多有待逐步克服的民族矛盾，但其民族政策的基本方向是無可非議的。大凡實際做過調查研究者都可承認其進步性，近年來台灣學界也不乏

兩岸民族政策的比較研究，可為覆按，這裡且引述一位中國蒙古族的民族學學者的看法做為佐證：

「多族群國家的實踐表明，多元文化的互動並不會產生嚴格意義上的一種民族文化吃掉另一種民族文化的現象，而是會產生第三種甚至第四種文化，至於這第三種或第四種文化稱為什麼文化，那只是個由時間和空間限定的命名和信仰問題。鞏固和加強多族群國家政治和國土的一體，有利於多元文化的並存和互動。國家的強大干預可以有效防止毀滅性的民族仇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甚至發展少數民族文化。文化多元和政治、國土一體是一個辯證統一體，在現代化社會的特定歷史階段中，它們應當是並行不悖、相互依托的，中國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對於多族群國家來說，在承認多元文化現實的同時，強調政治和國土的一體，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民族國策。」（納日碧力戈 2000：224）

“理想類型”並不等於現實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漢”、“華夏”等名詞所指涉的主要是“文化”的概念，而今日中國大陸的“中華民族”概念更遠非何六九所謂的“血緣漢族種族主義”。何六九在〈幽靈〉與〈鄉鄙〉中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攻擊，除了反華情緒外，沒有一絲一毫的歷史與理論知識的依據，他有什麼資格談“理性”呢？又是誰有關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述「濫情、粗糙和理路錯亂，無異於乩童的無知迷信和誇張矯做」呢？正是何六九自己！

何六九的論述之所以「濫情、粗糙和理路錯亂」，除了他的反動本質與主觀唯心的思維使然，還由於他自以為聰明又極為輕佻、懶惰。對於民族主義這個極具影響力的意識型態與政治運動，他只會簡單地把它視為「缺乏思想內容」、「內容空洞無物」、「不值得分析」、「也無從認真分析」，然後斥為「非理性」、「愚昧」、「思想閉塞」的表現。這個蠢材根本不稍微想一想為什麼被西方社會科學界奉為一代宗師的韋伯（Max Weber）會是個德國民族主義、甚至帝國主義者？為什麼被西方哲學界推崇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且對西方科技文明有深刻批判的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會支持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他們也都是何六九所貶斥的「思想貧乏」、沒有「深厚的人文思想根基」、不知「文明」、「寬容」為何物的「閉塞鄉鄙」嗎？也是「以血液從事思考或者以血液代替思考」嗎？何六九之沒有能力理性分析民族主義的成因，只能訴諸非理性的情緒性攻擊，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他隨便看了幾本洋書，但又沒有搞懂就濫加曲解，然後愚昧地盲從起來，終於陷入「無異於乩童的無知迷信和誇張矯做」。

在西方學術界被稱為民族主義研究奠基者的孔恩(Has kohn)，出於西方自由主義的成見，把民族主義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理性、多元、依據自由意志形成的“西方式”民族主義，以英、法、美三國為代表；這種以社會契約組成的民族國家滿足了具有社會進步觀念的新興中產階級建立政治共同體的渴望。另外一種則是以社會有機論為基礎、帶著濃厚感情、神秘與威權色彩的“東方式”民族主義，以東歐、俄國與亞洲國家為代表；這些地區因社會落後、中產階級軟弱無力，故由低層的貴族與知識份子訴諸民眾的民族自覺抵抗拿破崙的入侵，並倡導民族主義(參考Smith 1991: 80-81; 1996: 182)。孔恩這樣的分類對比，當然是過於粗糙簡單且不盡合乎事實，但其後不少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仍加以襲取，作為分類民族主義的標準。不過，思慮比較嚴謹的學者如Smith、Greenfeld都強調這種分類只能當作便於分析的韋伯式理想類型(ideal type)，並不能直接套用在具體的現實事例上。韋伯的“理想類型”又稱“純粹類型”(pure type)，是在掌握複雜的客觀世界時，從一個特定角度，片面強調某些因素，將分散、無聯繫的現象整理成的邏輯一致而無矛盾的分析概念。因此，這是一種在現實世界中無法經驗到的純粹由思維建構的烏托邦，更不是對客觀規律的理論概括。如韋伯所言：「這是一種概念認識，既非歷史事實(historical reality)，甚至亦非真正的“事實”(true reality)。他甚至不太適合用作為一種把一個真實的情況或行為算作一個實例的先驗圖式。」

所有民族主義都含有“公民”與“族裔”的成分

正因如此，以研究民族主義聞名於國際學術界的英國學者Anthony D. Smith一方面用“西方或公民的模式”(Western or "civic" model)指稱由「歷史形成的領土、法律—政治共同體、成員享有法律—政治上的平等，及共有的公民文化與意識形態」這些要素構成的國族，另一方面用非西方的“族裔”(ethnic)模式來指稱「強調血統與本土文化的共同體」的國族觀念，將兩者作為二元對立的“理想類型”加以對比(Smith 1991: 11)。但他隨即指出：

「實事上，每一種國族主義都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包含了公民的與族裔的因素。有時公民與領土的因素居主導地位；在另一時候則是族裔與本土的組成部分受到強調。……這表示在這兩個對立的國族模式背後，對國族這個與其他集體的、文化的認同相異的東西，是由什麼因素構成的，兩者有某些共同的想法。它們都認為：國族是聚居在連成一整片的領土中的人口；他們必須有自己的祖國；他們的成員享有共同的民眾文化與共同的歷史神話、記憶；成員在共同的法律體系下有相互的合法權利與義務；國族有一個成員可在領土內流動的共同的分工與生產體系……從概念上說，國族在不同的情況下，依不同的比例混合了公民、領土與族裔、宗譜的這兩個方面。正是

因為國族有這樣多重的面相，才使國族認同在現代生活與政治中成為如此富有彈性而又持久不衰的力量，並且使它能夠卓有成效地結合其他有力的意識形態與運動，卻不失其本身的特性。」(Smith 1991: 13-15)

另一位研究民族主義的著名學者Liah Greenfeld也使用了“公民的”(civic)與“族裔的”(ethnic)二元對立模式來分析國族主義。但同樣強調：

「當然，必須要緊記在心，這兩種分類僅僅是為了精確指出在不同的一特定的國族主義中某些表明其特色的傾向。它們必須被看做是可以趨近但不可能完全合乎現實的模式。在現實中，很明顯地，兩種類型混合在一起是最常見的型態，但這些依不同比重組成的混合物，其相異的程度仍大到我們足以辨識它屬於何種類型，因而，這種分類法仍是有用的分析工具。」(Green 1992: 11-12)

這兩位學者的著作何六九在〈鄉鄙〉中都曾引用，然而，何六九這個蠢材完全沒有他們的這種認知，只會粗糙而且錯誤地把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機械地視為兩元對立絕不相容的模式。一方是文明、理性、進步，另一方則是愚昧、非理性、落後，兩者判然分明，一在九天之上，一在萬丈淵底。正是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模式使何六九的文章漏洞百出，處處自相矛盾。

公民民族主義也靠歷史神話建立民族認同

由於何六九濫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公民民族主義的“理想類型”，以之盡情嘲笑、斥責所謂“血緣論民族主義”的歷史神話，卻正好暴露了他的淺薄無知。他自以為“理性”地說：

「……人文思想上的條件越是貧乏，人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方向就越接近人類的原始性直覺。正如同稚童習慣在疼痛時喊爹娘一樣，大凡粗魯無文的無知鄉愚每當身處危難關頭的時候，總是要祈求於祖宗的保佑。於是，很多晚近的民族主義運動者從一開始都急切要從遠祖身上尋找自我存在的理論根據。除此而外，他們實在不知何去何從。

在此情況之下，明明是近代歷史環境下的一個相當晚近的產物，卻都要追溯遠古，把它說成是一個自古已有，等待被喚醒的事物。明明是為了解決當前（而不是自古已有的）政治問題而展開的運動，與久遠的先人毫無牽連，卻要吟唱“祖宗在注視著我們”。問題是，每當人們追溯遠祖的時候，總是事實與神話不分，而且經常張冠李戴，穿鑿附會，甚至於憑空杜撰新神話。六十年前，有兩位學者嘲諷道，民族可能是“一起錯認祖宗”的結果。在此情況下，講求嚴格考證的信史觀念都是多餘的，

反正只要“信仰產生力量”就夠了。於是，荒郊野外亂葬崗上來路不明的鬼魂，突然之間被一批以孝子賢孫自居的人們供奉膜拜起來，奉為神聖無比的祖宗。亂認祖宗的荒唐事，經過一番的精心修飾設計，成為鄉鄙政治學開宗明義第一章，也適用為政治領袖人物心靈閉塞的遮羞布。

.....

問題是，思想貧血的血緣民族觀經常有詞窮理盡的時候。所以，對於偏激的民族主義者而言，血緣可以有而且必須有各種同樣具有無法明白言傳和超越理性的替代品和補助道具。例如唯我獨尊的宗教、語言，自吹自擂的優良文化傳統，自欺欺人的歷史傳說等等。在血緣思考驅動下所產生的激情，輕而易舉地尋得血緣論以外的替代品，賦予同等的非理性和反理性激情成分。」（〈鄉鄙〉，《左翼》第二十號 15-16, 18）

對這些幼稚的論調，我們引一段 Smith 的話就足夠燭照其淺陋了：

「幾個世紀前，西方國家用血汗澆鑄出民族的認同感，而今西方的觀察家安然坐享其民族認同，卻習於因十九世紀歐洲或二十世紀亞、非洲的民族主義知識份子過甚其詞地編造民族歷史而嗤之以鼻。那些民族認同鮮少受到質疑，也沒嚐過流亡之苦或家國淪亡、文化凌夷之痛的人，當然沒什麼必要為建立獨特可識的認同而尋“根”。然而，當別地方的人必須從屋頂上高嚷：『我們有所歸屬，我們從我們的祖先與我們的歷史知道我們的民族特性。』他們則以含蓄而隱晦的方式也說著同樣的話。民族認同中有許多充滿欺罔與曲解的“神話”及“記憶”，那完全無關緊要。所謂“不證自明”的英國或法國的民族認同正是由這類神話與記憶構成的；有了這些虛構不實的神話與記憶，英國與法國才成其為“民族”，一旦沒了這些神話與記憶，英國與法國不過是一大堆聚居在政治空間裡的人口而已。

當然，“民族”的概念遠不止於神話與記憶。但神話與記憶卻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沒有記憶（雖則是選擇性的記憶），就不可能有認同，沒有神話，就沒有集體的目標，而認同與目標或天命，正是民族這個概念不可少的要素。（Smith 1986：2）

Smith 這些話是在指責英、法等國那些“現代化”派的學者，但對盲從其後的何六九也同樣適用。我們並不認為中華民族一定需要靠“神話”來建構。我們只是要藉此指出何六九所虔誠跪拜的英國或廣而言之歐洲“文明”民族，其民族認同也是靠“神話”建構起來的，也有其“非理性”的根源。

（待續）

☆

帝國主義與 虛假的公民文化圓舞曲

洪學弟

擁有悠久長遠民主運動史的英國，也是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其島國的型態使其與歐陸各國有迥然不同的面貌，四周繞海讓英國得以擺脫外國經濟勢力的大舉入侵，過去英國有更好的機會保護其島內的市場與新興工業，隨後英國的棉紡織業站起來了，伴隨著軍事、外交、經濟嗜血地進入新的市場，挾恃著船堅炮利開關打開落後國家的門戶，拉丁美洲、土耳其帝國、印度儘管不情願，卻充當這個老牌帝國主義的有效幫兇，展開帝國主義的第一頁。英國人過去雖以日不落國子民自居，這堪稱為「英國統治下的和平」奇蹟，普天之下皆為英國人讓路，雖然在這背後是不少人被踩著「讓路」，英國人以身為英國公民自豪，當時是世界的工廠、一流國家，儘管如此，英國人內部的分離主義仍持續了數百年，威爾斯人、蘇格蘭人、甚至北愛爾蘭共和軍仍不放棄對英國人的霸權進行挑戰，英國內部的民族主義仍久久不滅！君不見電影明星史恩康那萊就以蘇格蘭子民的身分邀大家前往蘇格蘭旅遊觀光！

但這個過去的一流國家，轉眼之間就變成了二流甚至三流國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的金融重心由倫敦移到了紐約，世界工廠的地位也就讓位於美國，現代美好的事物也都齊聚於美國，這個亦是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¹，在美國我們可以看到最新的尖端技術、最進步的基礎科學、最有光彩、富裕的生活也都齊聚於這個世界的重心，正如十五世紀的威尼斯、十七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十八世紀的倫敦一樣，此時的紐約是全球金融、經濟的重心，世人皆認為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也在那邊ⁱ，包括最具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的典型亦是在美國。

如同 G. Almond 與 S. Verba 所指出現代國家的政治文化應是參與者為主的政治文化，成員雖受到國家機關的統治作用，卻也了解實際參政權力，並能實際去行使參政權。弔詭的是，這個號稱擁有公民文化的民主政體，其一九七〇年代的投票率(54.2%)卻遠低於其他歐陸民主國家(84.5%)ⁱⁱ，隱約地我們可以看到公民文化是難以貫徹到每個部分、每個階層，特別是每幾年投一次票，在零和遊戲中選出比較不爛的蘋果後，就結束其公民的身分，只有投票日才是以公民的身分參與²，在平時則是任由政客、利益團體、壓力團體在國會議場上角逐，誰的聲音、力量大，誰就可以掌握公共

政策的決定，公民卻要毫無異議地服從於這個決定³。公民文化在此仍顯示出侷限性，特別是對族群、階級等衝突無法完全解決，像是民族主義的問題，即使是號稱最有包容性的公民文化亦無法妥善解決，有時需要時間來考驗這些問題的答案。而且公民文化假定的「人爲理性動物」之前提亦不必然完全成立，美國學者Binkley曾說：「每一位投票者果受何種動機力量而決定其投票？絕大多數之決擇並非經由邏輯的思考途徑。」ⁱⁱⁱ，建基於理性理想的公民文化及民主政治(但在實際層面上往往卻是不理性的)，未必能解決棘手的民族問題。

近代國家建立的幾個階段之中，其中有一個階段是不可少的「族國意識凝聚」，每個國家建立之時總要自我塑造一筆輝煌的豐功偉業交代國家的由來，這個步驟是近代國家在締造之時必會去做的，如同十七世紀的英國人也曾認爲「上帝是英國人」、法國人視查理曼帝國爲其先驅、德國人則是把查理曼大帝當成日爾曼人的先祖^{iv}，換句話說民族性可能源於生活經驗、並加以推演組織成確切的理論，其有可能對相關問題提出解決，當然也有過度推演的可能，但這卻不能以單純無稽之談觀之，對於民族性、民族主義的討論可以不去談它，但它的客觀問題卻有可能繼續存在^v，這也讓學者有研究討論的空間，但前提是不能偏激化否則會促成類似法西斯等政權的悲劇覆轍。不過過度主觀地忽視它，也如同忽視自己的出身、家族一般，過於簡單化、容易被追逐利益的論述所壟斷。

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他國的公民自由是不重視的，帝國主義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遑論他國公民的自由，帝國主義國家只重視自己的公民有無公民文化，而不顧他國的公民有沒有不受霸權炸彈的威脅，凡是帝國主義國家利益至上，甚至是軍事工業綜合體的利益至上，研發的新武器馬上就有實驗場地，以伊拉克的民眾爲標靶、把耗乏鈾彈當垃圾丟在科索沃、長年對伊拉克實施禁運讓伊拉克兒童死於營養不良及缺乏醫療照顧，難道這些被炸的民眾不是「公民」、亦或他們只是實驗品而已，這些事件從來就不是霸權國家的主流論述，「公民文化」的社會是不管這些的，儘管可以上得了主流媒體一天兩天，第三天大家就忘了這些不聽話國家的「公民」，畢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吧！帝國(霸權)主義的利益至上！能上的了主流媒體的除了金融行情炒股票的新聞外，大概就是那些政治領袖搞婚外情的八卦斐言罷了！公民文化裡誰管這些第三世界的子民是死是活，只要帝國主義的市場能維持、帝國主義的產品能打入全球各地，其他世界的子民不關帝國公民的事。

長久以來對伊拉克的禁運，理由是海珊發展生物化學武器、他們暗中發展核武器，一禁就禁了十年，伊拉克的兒童死於醫療器材不足的一大堆，美國、英國兩個老

牌「民主、帝國」主義國家卻用會致癌的炸彈、地雷來對付伊拉克^{vi}，難道老牌民主國家真的是站在正義的一方？自己可以用核彈試爆、導彈試射，就不允許其他國家有這種武器的研發能力，只允許自己國家毀滅地球、不允許地球在他人的手裡毀滅，只准自身成爲最大的生化武器生產國、就不容許他國研發以免被“流氓國家”所濫用？難道霸權國家的自身行爲就都完全符合君子的規範？這裡看出帝國主義發動戰爭跟隨著是該國的利益原則，丟些炸彈可以促進國內軍火工業就丟，倒不必有正義藉口，出師之名隨便找就有，至少英國會附和美國的做法，畢竟兩國利益趨同嘛！

擁有公民文化的國家媒體、論述對這些「小道消息」是不報導的、不評論的，這些新聞只是充當廣告之間的負載波而已，公民則有選擇性的過濾、遺忘這種事情的存在，同樣以一件事情看待-利益至上原則，國家的利益至上，他國的子民存活不關我的事！在利益至上的原則下，防止溫室效應化加劇的京都議定書協定，也就成爲美國的利益至上的表現，要簽不簽操之在我，別國「公民」別想干涉我，而且美國國內的主流論述亦相當地忽視京都議定書的重要性，這難道就是公民文化所塑造出來的環保政策嗎？公民文化不是萬萬皆能吧，利益至上原則大於公民文化、公民政治原則。

在霸權國家的公民社會裡是這麼地忽略其週遭鄰國的「公民」死活，對於受軍事駐紮、經濟受制於霸權國家的「公民社會」更不用說了，實際說來這應該不算是公民社會，因爲臣服(subject)的公民是佔大多數的，習於臣服於霸權的經濟模式、思想論述、軍事宰制裡，凡是聽任老大哥行事準沒錯！動靜得宜皆由老大哥，老大哥的利益至上！弔詭的事常發生在一些自認爲民主國家的週遭，一九八〇年的光州事件原本只是要求民主化的抗爭，反對軍事獨裁政權的活動，但在市民被獨裁政權彈壓圍城之際，民間也一直流傳美國會派兵支持民眾的民主化運動流言，市民認爲這個老牌民主國家會起而保障這個民主化訴求才是，後來的結果卻是美國同意協助政府軍來彈壓光州，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對此發表談話：「這已不是人權的問題，而是重大的國家利益問題」^{vii}，在此又說明帝國主義的利益至上，這不是公民政治或公民文化可以解決的問題。

根源於冷戰時期的「恐共症、恐左症」就這麼遺傳下來這幾個帝國主義的附庸國家，在經濟資金上接受老大哥帝國的協助(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爲了吸引老大哥跨國企業進駐(壓低勞動條件、抑制工會運動勢力、打壓左翼勢力)，在軍事上受老大哥的保護(向老大哥買武器、接受老大哥的訓練、演習、甚至代老大哥前往“匪區”偵查、在國內實行白色恐怖以保衛國家安全)，在外交上聽從老大哥的指揮(在安理會上配合老大哥的演出、在外交政策上依循老大哥的指引)，更誇張的是，連思想都是裝

著霸權國家的主流論述，對左翼這個東西則避而遠之，深怕沾染到它就會引起思想、行動上的不純正而禍害隨即上身一樣，連民族問題也一面倒地接受老大哥的思想準則，絲毫不能有另外的一條路或論述，更甯提「第三條路」了，因為說來說去只有霸權國家的那一條路，帝國主義利益至上原則，而非公民文化、公民政治的討論，在此附庸國家的公民文化、公民政治成爲民主看板、民主櫥窗，碰到民族問題不能討論，只有老大哥的論述才能成立，其他的論述皆是非理性的、根源於血緣的言論而已！

美國軍方、智庫常發布消息，指出中共有多少枚導彈對著台灣，事實上台灣的屁股後面卻有更多的陸基、海基的彈頭對著全世界，霸權國家聲稱這是要對付流氓國家，殊不知這種行爲出於本國是保護利益原則、對於世界其他各國來說卻也是一項威脅。反中國共黨霸權的同時，同時也看看你過去“信賴”的夥伴是否也正在做軍事競賽的啓動者。當日本逐漸關心起中共海軍逐漸強大時、南海小島上的基地擴張時，我們的主流媒體卻很少報導漁船在釣魚台附近公海被日艦撞沉、日本右翼份子在釣魚台豎立燈塔，這個號稱有政黨輪替的民主國家裡，公民政治竟也對此漠不關心、或睜一眼閉另隻眼，對中國的霸權行爲大肆報導、對美、日的一些霸權行動就刻意忽視不去看它，這樣的公民文化是不是值得期待、亦或是這只是種虛假的公民文化，大家不應太在意，反正有沒有它大家日子還是照過。

當日本右翼份子寫了本頌揚台灣殖民主義的小書後，公民文化對此的不聞不問才是應該檢討的地方，而不能只是幾個左翼的知識分子、愛國主義者大聲叫囂的東西，試問這些慰安阿嬤是否就被台灣公民文化再次傷害，因爲國人的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對此不聞不問、不思不想地就大肆宣揚日本右翼的殖民、皇民主張，公民文化民間社會對此竟是如此的冷漠、慰安阿嬤怎堪這些喝成一氣的人在那邊叫囂、甚至形成美、日、台三者連線時，這才更顯露出公民社會的侷限性，慰安阿嬤的傷口一再地被這些附庸思想在傷口上撒鹽。對這些附庸份子來講，他們認爲民族問題只有一種論述，就是帝國主義的利益原則至上，一切聽從霸權國家的指示，其他的論述都是非理性的、根源於血緣論的論述，附庸份子認爲這些非理性的行爲皆不可取。當南韓已經開始示威燒日本教科書抗議竄改史實時，台灣出奇「冷靜」地對待此事我們才體認到公民政治是這樣的好用，只要不說話新聞熱度一下就過去了，原來不思不想、全盤照搬移植的論述皆可接受。台灣的漁民認份點吧！受限於霸權國家的國界、武力，公民文化在此展現的是附庸的性格，台灣漁民寧可不捕魚也要避免船隻被撞翻！

在台灣幾個較有系統的民族主義論述中，除了原本以《夏潮》雜誌爲主的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左翼路線外^{viii}；另一支較大論述當屬新潮流系的

“台灣新民族主義”論述，期望一方面建立台灣人民的主體性，另一方面也對中國神話法統深深誠慎恐懼，例如其重點不斷地強調透過對國民意識的形成，他們期待以公民國家(Citizen State)的方式形成新的國家。在一九八九年《新潮流》^{ix}雜誌紀念鄭南榕先生的專集裡，特別強調其以外省人子弟的身份，為台灣獨立獻身的情操；進而希望在這樣的基礎上，以相互包容和解的心，共同促成群體的國民意識^x。不過卻也有人對當初鄭南榕先生處理自由時代雜誌社的組工會案粗糙的手法不以為然，顯示鄭南榕先生對工會(或左翼運動)抱持著“特別的看法”⁴。特別的是，當新潮流的做法在當時國民黨主流、非主流的民族觀點中，新潮流系其實是代表本土資產階級利益的台灣人(福佬人)民族主義論述^{xi}，這點相信在左翼圈內的討論已經不少。雖新潮流系有提出“生產式民主的社會福利”作為過右的修正^{xii}，但仍難掩其作為福佬人民族主義的論述光芒，成為台灣具有特色的一支民族主義論述；認為在既“獨”且又有點“社會民主”的味道中，讓這塊地的公民意識抬頭，不過在今年高達4~5%的失業率下，一百多萬的受失業波及的人口相信已經嗅出了這股“獨特”的氣味與意義非凡的“失業公民意識”。

在印度獨立之前，英國的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當然不須要講民族主義，他們講求的是「世界主義」(只不過這是英國人主宰的世界)，難道印度工人就不需要公民文化的薰陶？當然在英國國力衰退之後，講帝國主義也沒有人會信，因為其列強的領導地位早已讓渡給了美國，這個從不說自己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卻常常幹起形同帝國主義壞事的民主國家。這次在義大利的G8高峰會內，美國總統布希曾說：「我相信這些反全球化的抗議人士不是代表窮人」，但是我們也不應該把布希看成是美國窮人甚至是全世界窮人的代表，因為早在一八九一年，恩格斯就已經指出美國的兩大黨政客是：「把政治變成一種收入豐富的生意…兩大幫政治的投機家，他們輪流執掌政權，而國民卻無力對付這兩個大的政客集團，這些人表面上是替國民服務，實際上卻是統治和掠奪國民的。」^{xiii}，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看法如今聽起來仍相當有趣且富有意義。Braudel說：「十八世紀，資本在全歐和全世界游動。使用金錢的方法、手段和花招並非萌發於一九〇〇年或一九〇四年…資本主義什麼花招都會耍，昨日如同今日，其特點和力量在於能一招不靈、再施一招，一式無效、再用一式，能夠視情況而十易其計，而千變萬化，自身卻能相當好地保持不變、依然故我。」^{xiv}。看來把資本主義這個詞套換上「帝國主義」詞時，帝國主義圓舞曲在今日則能跳得相當順暢流利，千招萬式任其運用，且萬變不改其宗——利益原則至上！公民文化只能依著利益至上的原則亦步亦趨的跳著「帝國主義圓舞曲」！

註釋

1 F. H. Giddings 在「民主與帝國」一書中指出，「世界之上，早已有其“民主帝國”，此即兩個英語族國，英國與美國；假使英美兩民主帝國不求統治世界，其他的專制國家將會設法霸佔世界。」…。「反對美國向外發展，乃是向宇宙定律作無聊而多餘的駁斥。」（浦薛鳳，現代西洋政治思潮，正中書局，1990，頁246、269）
 ·在意識型態終結的時代，共產專制國家紛紛瓦解或轉型，Giddings先生的話特別值得我們深思。

2 盧梭曾說：「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的。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
 ·馬克思也曾說：「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壓迫人民。」（以上皆引自王立民，〈總統大選的幾點觀察〉，《左翼》第四號2000/02/28，pp18）。

3 當然公民也可以選擇被罰鍰、或等進監獄，Prezworski舉出一個等紅燈的例子，例如大家會看到紅燈而停車，可能是因為人們相信遵守交通規則是最好的運輸方式；也有可能是基於習慣而停車；但如果不停車時被警察捉到，這入就會被罰款，如果他不繳罰款就會進監獄。停車等紅燈這種服從行為可被看做是輿論一致的行為（如自願性的協議），但也是一種強制盔甲保護的贊同（是一種被內化的強制力量，通常在行動中隱而不見，如同葛蘭西的觀點）。（Prezworski, Adam. *Capital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張虹譯，資本主義與社會民主，桂冠，1995.pp215.）

4 當時一位參加組織自由時代雜誌社工會的成員回憶說，「在工會這方面，打從我們跟鄭南榕談判開始，就有黨外陣營的一些朋友出面，表示關心，他們極力勸我們和解，最大的理由是，當時的自由時代，是反對國民黨陣營裡，最重要的一個言論堡壘，絕對不能讓它倒了，若是倒了，會讓很多反對運動的支持者失望的。這個理由太強了，沒多久，…大概是台灣近代反對運動史上，最短命的「工運」，自由時代工會只維持了三天便宣告瓦解。（我走過的台灣路 {轉換點}，<http://www.love.org.tw/b/b10024.htm>）

參考資料

i Braudel, Fernand.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資本主義的動力，楊啟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pp.52-53.

- ii Arend Lijphart, *Constitutional Choices For New Democracies*. Edited by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Democracy*. 1996. Pp.168.
- iii W. E. Binkley,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序頁 4 .
- iv 任德厚, 《政治學》, 三民書局, 1995, pp.95 .
- v 任德厚, 《政治學》, 三民書局, 1995, pp.189-190 .
- vi 陳真, <反輻射混彈和伊拉克禁運>, 《左翼》第十五號 2001/01/31; 倪世傑, <金錢、霸權、流氓>, 《左翼》第十七號 2001/03/31 .
- vii 洪根洙, <韓戰經驗的克服>, 《左翼》第八號 2000/06/30 .
- viii 請參考 郭紀舟, 《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 海峽學術出版社, 1999 ,
- ix 新潮流 1989 : 4 .
- x 董建宏, <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左翼知識份子及其困境>, <http://tc.formosa.org/magazine/tcm-19/Art-5.html> .
- xi 董建宏, <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左翼知識份子及其困境>, <http://tc.formosa.org/magazine/tcm-19/Art-5.html> .
- xii 新潮流 1993 : 試刊號 .
- xiii 引自 王立民, <總統大選的幾點觀察>, 《左翼》第四號 2000/02/28, pp.17-18 .
- xiv Braudel, Fernand. *La Dynamique du Capitalisme*. 資本主義的動力, 楊啟譯,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3, pp.68.

致何六九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汪立峽

何先生:您好

拜讀了您發表在《左翼》第 20 號上的大文。關於民族主義問題,你不厭其煩的說了那麼多,想必寫的很辛苦,原無意再跟你爭論什麼。只是有一點更塞於胸次,不說不舒服,那就是:支撐你的「理論」的最重要的一些事實,卻被你刻意扭曲了,很有必要提出我的「異見」,供作討論。

你提到英國,說他們“總是對於不知節制的民族狂熱嗤之以鼻”,或許你如此「推崇」英國人的原因,只在於有那麼個英國佬(你沒說是誰)批評民族激情是“鄉鄙陳腐之害”,看來“鄉鄙”這兩個字很窩你的心,構成了你全文的「基調」,動則辱罵統派和中共是“鄉鄙”“懦夫”,不惜無視英國實情而任性恣意「闡釋」你的所謂「現代文明的公民意識」、「民間社會」民族論。

但是，擺在眼前的事實卻是英國社會出現了個極右派政黨「英國民族黨」，而且在上月(六月)大選中頗有斬獲，他們主張將非白人少數族裔驅逐出英國。受他們影響，七月初英格蘭北部工業城布拉福爆發了上千名亞洲移民和白人青少年暴力衝突事件，起因於亞裔工人的「反納粹聯盟」於集會時，無端遭到一群白人以種族歧視的侮辱字眼叫罵，才引起雙方扭打混戰。這並非單一事件，類似的衝突過去幾周還發生在奧耳丹、里茲、班來等英國城鎮。

請問何先生，如果英國真的像你所說的是個“不齒「愛國流氓」囂張猖狂行徑”的國度，怎麼會發生這一連串「愛國流氓」事件？怎麼會讓白人至上論的「民族陣線」這類極右組織一個接一個的出現？怎麼會把大量選票投給排外的「英國民族黨」？

還有，如果真像你所說的英國人蔑視「愛國主義」，說什麼“愛國主義是惡棍們的最後避難所”，那麼請問英國不惜發動舉國若狂的福克蘭爭奪戰，強佔阿根廷的福克蘭群島，難道不算是「愛國主義」的一次大操演？追根究底，指責“愛國主義是惡棍們的最後避難所”，譴責民族激情是“鄉鄙根性之害”的人，只不過是某幾個英國政客和文人，卻被你挑選出來而且不加克制的誇大為全體英國人的「共識」，目的只在於利用這類說詞為發洩你自己詆毀統派和中共是所謂「偏激民族主義」、「血緣民族主義」、「漢人民族主義」……的失控情緒而服務罷了！我這樣說有沒有過火？相信你心裡是明白的。

至於你真正想說，卻始終給人如墮五里霧中感覺的「文明的公民意識」、「民間社會」等等自以為「進步」的民族理論，我只想引用你也同樣尊敬的馬克思的一段不太常被提起的名言送給你做參考：（在此有必要賣弄一下英文，因為關於「公民」意識「民間」社會……等詞彙，主要源自英文）

The standpoint of the old materialism is “civil “society; the standpoint of the new is “human “society, or socialized humanity.

——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第10條》

在馬克思看來，什麼“公民”(civil)社會這類論調，根本是舊唯物主義(old materialism)的觀點。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New materialism, 原文省略了materialism這個字)強調的是“人”的社會(“human” society)或社會化的人性(socialized humanity)。

言盡於此。希望爾後再談到類似問題時，不再見到你以「好為人師」的高傲之姿「教訓」別人。

祈諒並祝好運！

汪立峽 握手

但丁、全球化與世界政府

左思

七大工業國(美、英、法、德、義、加、日)加上復甦中的軍事強國俄羅斯，G8 集結了全球的財富、權勢和最先進的科技、武力。八國首腦齊聚一堂，任何一個決策都可能決定世界的命運。G8 高峰會，儼然已形成一個「世界政府」的格局。

「世界政府」的理想其實有相當早的起源。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就在其《政治學》中指出：每當幾個物體結成一體，其中必有一個起調節和支配的作用，其餘則服從調節和支配。詩人但丁(Dante, 1265-1321)從這個說法引申出一統政體的必要，唯有在一統政體之下，調節者和支配者的絕對權威才得以建立，普天下的幸福、穩定、和平也才得以獲得保障。在《論世界帝國》一書中，但丁寫道：「人類的幸福有賴於人類意志的統一。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有同一的統治意志引導其他意志達到統一，因為世人的意志屈從於誘人的青春歡樂，需要加以引導。」

關於這位《神曲》的作者，恩格斯在〈致義大利讀者〉一文中是這樣說的：「義大利是第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誌的。這位大人物就是義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

新千年的第一個G8 高峰會就這樣回到「第一個資本主義民族」的國境舉行，詩人但丁世界帝國、世界政府的理想，似乎也要等到如今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架構之下，才獲得實踐的機會。2001年7月20日到22日，八大國首腦率領隨從、侍衛、幕僚共兩千多人，浩浩蕩蕩進入義大利利古里亞海沿岸的港都熱那亞，他們將在極盡豪華氣派的會場，擔負起「調節和支配」地球運轉的重責大任。他們要在這一年一度的富國強國俱樂部中達成共識，以「同一的統治意志引導其他意志達到統一」。

G8高峰會的所在，就是向全世界發號施令的城堡。然而，這一次的高峰會，同時吸引了20萬來自全球各地的示威者和造反者，使得堂皇富麗、固若金湯的堡壘，一

時之間竟成爲困頓圍城。隨著全球化巨輪的加速滾動，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日愈澎湃洶湧。自1999年12月的WTO 部長級會議在西雅圖招引抗議團體的龐大動員以來，幾乎只要是全球性建制性質的機構，都遭逢到反全球化人潮的挑釁和抵制。從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乃至美洲自由貿易區、歐洲聯盟，會議開到哪裡，抗議人潮就湧到哪裡。今年包圍 G8 高峰會的人數更是創造歷史性紀錄，西雅圖示威已是令人震撼，集聚熱那亞的反全球化群眾更是西雅圖的四倍有餘。

聲勢浩壯的示威群眾顯然已對位高權重的領袖們造成巨大威脅。下一次的WTO 會議地點將在荒遠的沙漠當中，熱那亞高峰會將與會者的住宿地點安排在一艘船上，而明年的G8 將被安排在加拿大的偏僻山區。這些「世界政府」的決策者竟然必須這樣掩掩藏藏，縮頭斂尾，利用沙漠、海洋、高山的大自然屏障來阻隔人群。若是詩人但丁再世，這樣的情境恐怕很難寫入《論世界帝國》一書當中，而必須以魔幻縹緲的《神曲》來記載。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

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

——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三〉

黃志龍

(3) 關於權力的問題

(a) 無產階級專政

在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中，理想和現實之間差距最大的是有關「權力」的問題——在理想中，權力會逐漸的縮小並歸於消滅，但在現實中，權力卻往往被濫用且以龐大的力量君臨於社會之上。從1850年，馬克思在「法蘭西的階級鬥爭」一文中提出「從社會主義革命到廢止階級的過程中，必然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階段」的概念之後，無產階級專政被認為是馬克思社會主義權力學說的核心觀念。

如果我們將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無政府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的權力學說相比較時，我們可以發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性，就在於其做為社會主義權力的過渡性上。簡單地說，馬克思主義以廢止國家為其終極目標，在這一點上與徹底否定權威的無政府主義有相似之處。但是，馬克思主義又主張從社會主義革命後到「階級消滅從而國家消亡」的目標全面實現之前，仍然需要一個過渡性的權力形式，這就和主張立即廢止權力的無政府主義相對立。在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都主張革命後的一段期間內還需要權力，但是因為國家社會主義不肯承認社會主義權力的過渡性性質，以及其權力的特殊型態，所以兩者的見解又有分歧。

簡單的說，馬克思主義的權力學說是處於無政府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之間。但就權力的根本思考而言，馬克思主義的權力論是比較接近於無政府主義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展望「國家的消亡」，只承認權力的過渡、暫時必要性。在馬克思主義中本來就不存在著以權力的永久化為前提將權力神聖化的想法。所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主要的批判對象，是國家社會主義而不是無政府主義。這本書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在於其徹底否定權力的思想。

「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革命後所需的暫時性的、過渡性的「階級歸屬」的表現形式，而不是與民主主義對立的「獨裁」政治。反而由於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者

統治，是構成社會多數者階級對少數者的統治，因此擁有民主主義的性格。但是，由於「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歷史表現，往往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來推行權力的絕對化，而不是將權力逐漸解消於自治社會之中。因此，無產階級專政一辭常常被濫用來長久化權力體制和其執行。

(b) 工農民主專政論和不斷革命論

在1905年革命以前，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展望革命的共識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是布爾喬亞革命的主體，所以革命勝利後所形成的政權是由資產階級來承擔。在這個過程中無產階級也會扮演積極的角色，但卻祇是次要的角色。列寧的工農民主專政論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正是建立在這個共識的基礎上。

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1905年的革命是挫折的布爾喬亞革命。雖然Narodvik（人民主義者）主張一次（或一階段）革命論（從專制政治直接飛躍到社會主義革命），似乎受到馬克思的默許，但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卻無法接受這個看法。列寧等人認為不通過政治民主主義的道路而逕自走向社會主義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們都是兩階段革命論者。

但列寧和托洛斯基所質疑的是：雖然革命的性質是屬於布爾喬亞革命，可是革命的領導勢力以及掌握革命的階級為何一定是布爾喬亞階級？關於這個問題，列寧和托洛斯基從1905年革命的經驗中得到答案。

列寧根據「1905年革命是由革命的無產階級和農民所推動的布爾喬亞革命。雖然革命運動的要求並不包含社會主義，具有布爾喬亞的性質，但革命的中心勢力是工人和農民」的事實指出：「布爾喬亞革命的勝利，不一定是布爾喬亞階級的勝利」。列寧認為，能夠與俄羅斯專制政治鬥爭到最後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的覺悟比布爾喬亞革命更先進，因此才能從頭到尾完成民主主義革命。

但是後在進資本主義國家的俄羅斯，無產階級只佔國民中的少數。因此，列寧認為要完成布爾喬亞革命，其運動性質必須是受到國民大多數所支持的國民革命。俄羅斯的後進性使無產階級站在布爾喬亞革命的第一線，但是無產階級只有和農民階級聯盟才可能在布爾喬亞革命中佔多數而獲取勝利。因此，革命後的權力形式應該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主義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所以在革命政府中，非無產階級代表有可能佔優勢）。這一點就是列寧和托洛斯基「不斷革命論」的差異所在。

至於，在如何從工農民主專政走到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如何從布爾喬亞革命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上，列寧的看法是：農民分配到土地後可能不再支持社會主義，因此，在無產階級革命的階段，無產階級必須和「半」無產階級（貧農）聯

合。不過，列寧更進一步的認為，俄羅斯的工農聯盟獲得勝利後，必然會刺激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所以俄羅斯的民主主義革命是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引爆劑），而西歐無產階級在革命勝利後必將反過頭來援助俄羅斯的無產階級革命。換言之，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導權不在於俄羅斯等後進地域而在於資本主義先進諸國的無產階級。由此可知，列寧還是忠於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想法的。

反之，托洛斯基的革命論是將俄羅斯的布爾喬亞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和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當作連續過程，因而被稱為不斷革命論。托洛斯基針對俄羅斯社會構造的的特殊性進行分析，做出：後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比資本主義先進諸國更早獲得權力的結論。他認為，1871年的巴黎公社，並不發生在英、美等資本主義核心國家，而是發生在屬於“小資產”的法國巴黎，就是最好的例證。他說：「將無產階級專政依附於國家技術力量（生產力）的想法，是極為單純的經濟主義唯物論的偏見」。他從“1905年，資本家以關廠來回應工人對8小時工時制的要求後，俄羅斯的勞動者起來佔領工廠，並由勞動者本身管理工廠，從而獲得其要求（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要求）”的經驗中，確信「在像蘇聯這樣的後進國家，國民中只佔少數的無產階級在還未發展成多數者之前，就可以在資本主義尚未發達的時期單獨地獲取權力」。

這個顯然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主張和托洛斯基本人對農民和西歐革命的看法有關。托洛斯基認為，向來只關心地方利害的農民，在本性上不能成為獨立的革命勢力，在近代社會中，更因為「資本主義的歷史是農村從屬於城市的歷史」，所以農民在政治上更為無力。或許，在民主選舉上，勞動者的一票等於農民的一票，但是在革命時期，1000個罷工中的鐵路工人在政治上比100萬個農民來得更有力量。農民的支持當然是必要的，但只有無產階級在權力鬥爭中證明其堅決意志時才能獲得農民的支持，因為弱者會被強者所吸引。總之，托洛斯基認為：「無產階級獲得權力後會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現於農民之前」。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階段，由於農民反對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這兩個無產階級的主要政策，農民的支持就變成不可靠。於是，托洛斯基認為無產階級權力為了其存續不能不求助於西歐革命的支持。這就是說，托洛斯基堅信：縱使少數者也可獲得權力，但少數者的長期統治只能依靠俄羅斯革命和西歐革命的結合。

關於這一點，列寧後來透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不均衡性等理論，也得出「後進家國俄羅斯的無產階級可能比西歐先進國更早確立獨立政權」的構想，而1917年列寧的所謂「四月綱領」，就是這個思想到達頂點的政治綱領。

十月革命是在缺少歐洲革命支援的情況下，面對二月革命未能完成的布爾喬亞課

題（土地改革），革命政權執行徹底的土地改革而獲得農民的支持。就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過程而言，不能不承認不斷革命論對歷史發展的洞見。但就十月革命後革命政權如何取得農民的支持而言，在沒有發生西歐革命而使得俄羅斯革命陷於孤立的情況下，列寧的現實主義想法（多數者革命）對尋求革命的存續而言，是有較大選擇餘地。

(c) 一黨統治與代行主義

在革命期間，俄共中央於非公開的黨會議中，曾經激烈爭論關於應該是成立布爾什維克的單獨政權？或是與其他黨成立聯合政權的問題。根據現在已公開的會議記錄，列寧、托洛斯基等人在會中強硬主張單一政黨，但他們的主張是針對行政機關（人民委員議會）而言，至於在行政機關的選出母體，也就是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全俄羅斯蘇維埃大會等「代議機關」，是以複數政黨的共存為前提。可見，俄羅斯共產黨的一黨統治並非來自革命政權的權力構想，而是由於苛酷的內戰致使複數政黨的共存成為不可能後的結果。

1918年4月，一方面日本軍隊登陸海參崴，外國勢力開始干涉革命；一方面，在外國勢力的鼓勵下，國內反革命份子的活動也開始活躍，於是右派社會革命黨做出接受「國際聯盟」援助的決議，公然宣布打倒布爾什維克獨裁。同時孟什維克也不再隱瞞對布爾什維克的敵意。面對這種形勢，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在1918年6月14日，以「協助反革命集團」為理由開除這兩個黨派，留存於中央權力機關的政黨，只剩下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但由於以農民為主的左派社會革命黨強烈反對布爾什維克強行徵收糧食的政策，認為這是「城市對農村的宣戰」，並對布爾什維克單獨和德國講和也表明嚴重不滿，因此開始以暴力及暗殺手段對付布爾什維克。首先暗殺德國駐莫斯科大使並在莫斯科地區發動暴動；繼之開始暗殺布爾什維克主要領導人，甚至造成列寧身負重傷。除了國內的反革命軍之外，德國、奧地利、捷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法國、英國、波蘭、日本、芬蘭等軍隊也不斷攻擊，而被封鎖而陷於飢餓狀態的國內也不斷發生暴動，暗殺以及鐵路、橋樑的爆炸等。羅莎·盧森堡以「政治生活的野獸化」來說明這種情況。由此可知，布爾什維克的一黨統治，是現實上被迫從「公社國家」理念全面撤退後的結果，這與德國納粹黨用武力鎮壓他黨，有意圖地奪取單獨政權的情況有所不同。

不過，在內戰結束前，列寧、托洛斯基等領導者已經出現將無產階級專政和一黨專政同義化的言論。隨著一黨統治成為既成事實之後，他們更主動接受這個事實並加以擁護。但是，在這裡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對既成事實的擁護並不等於制度化的承認。雖然一黨統治的事實已在進行中，在1918年7月所制定的俄羅斯共和國憲法中完

全沒有有關黨的規定。同時，在1919年通過的黨綱領中規定：「政治權利的剝奪、任何對自由的限制，都是當剝奪者爲了固守或復活自己特權意圖時，爲了鬥爭的暫時性手段，才成爲必要。隨著人剝削人的客觀可能性逐漸消滅，這種暫時性手段的必要性也會消滅。黨是向著縮減以及完全廢止（剝奪政治權利、限制自由）的方向走的。」在這個綱領中，我們絲毫見不到宣布社會主義社會的完成以及將一黨統治長久化的史達林邏輯。

一個可能的疑問是：既然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階層的腦海裡並沒有一黨制的觀念，爲何在內戰結束後，卻又立即地適應了一黨統治的事實，並斷了回歸複數政黨的念頭？

歷史的研究還沒有找出肯定的答案，但可能的理由似乎如下：

〈I〉布爾什維克不僅缺乏一黨制的觀念，也缺乏長期的制度構想，因此也沒有多黨制、政治複數主義的構想。革命政府爲自己的政府加了「臨時」兩字——他們認爲這個政府只不過是在不久之後，在全世界規模的「國際社會主義秩序」出現之前的，短期的過渡時期權力而已。加之，他們相信革命後包括黨在內的革命權力將會迅速「消亡」，因此他們對這個問題並未提出進一步的設想。這就是說，由於他們相信權力的暫時性，反而肯定在內亂後的社會荒涼中，成爲唯一政治凝聚的黨的單一統治。

〈II〉他們缺乏對「一黨制邏輯」的理論性預知能力。列寧的組織論中缺乏了對「組織客觀邏輯」的洞察。「組織的客觀邏輯」是組織一旦成立，就會依照他本來的運動邏輯運作而且反過來規制創造他的人們的活動（也就是異化）。在列寧等人的思想中，組織是服務於創造者的目的，創造者可依照其意見而自由操作、變更，甚至可以將其廢止的工具而已。一黨統治是爲了戰勝內戰，使革命政權繼續存在的唯一的政治選擇，列寧等人因此將一黨統治正當化。但他們無法預知，一黨統治一旦固定化就會引發黨以及國家體制的質變。從列寧晚年對秘書的口述記錄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在和史達林的鬥爭中已關心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是已經來不及深究。同時，在20年代末期，布哈林等人也注意到「一黨制的邏輯」，但也已經「時不我與」。

總之，黨在如何對應被統治者對黨表明不信任的問題上尙未深究的情況下，便在20年代接受一黨統治並予以積極的擁護。雖然列寧的黨論以及其「先鋒隊」觀念在一黨統治正當化的過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不過正如Deutscher所說的：「歐洲社會主義思想的任何一派，都沒有注意到當取得政權的社會主義者失去勞動者的信任時，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就邏輯上而言，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理念和一黨統治的固定化是互不相容的。當

無產階級成爲統治階級而無產階級對黨的領導表示不信任時，由於沒有其他合法政治勢力可以替代，因而不得不忽視階級的意志。在這段期間，領導者和勞動者之間根本不存在「黨不會犯錯誤」的觀念。那麼，黨因一黨統治的固定化而不得不帶有反民主性質時，在邏輯上如何將一黨統治正當化呢？這種正當化的邏輯就是所謂的「代行主義」。

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也就是無產階級作爲統治階級行使其職權時，需要做爲政權主體的階級的存在。在十月革命時，這個階級（無產階級）的確是存在的，但在長時間的內戰中，勞動者因工業解體而四散，許多政治意識較高的勞動者不是在內戰中死亡，就是轉移到行政部門。內戰的結果導致勞動階級的解體，在這種情形下，黨就作爲無產階級的代理人而行使其治權。

Deutscher說，布爾什維克是由無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菁英主義（或威權主義）這兩種傳統所構成。在革命初期，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相當顯著，但一旦勞動階級解體時，就只有依據菁英主義的傳統，將自己當做無產階級利益的唯一代言人。因此，黨就將黨的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等置化」作爲政治政策的基礎。

1928年7月，布哈林在和加米涅夫的秘密會議中，針對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指出：「黨和國家如此完全成爲一體，就是罪惡的根源」。這是因爲布哈林對於行政權力介入黨內問題的處理，破壞了以批評的自由和理論鬥爭爲不可或缺要素的黨內民主，替而代之的是行政的一言堂秩序，從而GPU（國家政治保安部）成爲黨內生活的決定性要因等等局面，表示深深的憂慮。但如果以更全盤化視野來看，黨和國家一體化的現象所意味的是，由單一政黨統治的固定化所帶來的包括黨在內的，整個統治結構的變質。換言之，黨和國家的一體化是與以黨和國家雙重的變質爲內容的一黨制問題有所關連。

從歷史看來，一黨統治是十月革命後，爲了對付政治上的反對者所採取的所謂「紅色恐怖」的直接結果。但令人吃驚的是，布爾什維克的權力理念中完全沒有一黨制的觀念，而更令人吃驚的是，當一黨統治成爲既成事實時，布爾什維克卻能夠快速地適應並加以擁護。如不能瞭解這一個事實，就無法理解布哈林對加來涅夫所表示的那種悔恨之意。

宣布十月革命勝利的彼得堡蘇維埃決議，慶祝了歷史上稀有的無血革命。因此大家認爲，這是「國家與革命」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可以比以往任何革命更少的流血和犧牲而完成」的實現。

革命勝利的十天前，列寧說：「我們不僅現在不會行使，而且將來也不會行使，將不帶武器的人們帶上斷頭臺的法國革命的行爲，因爲我們的背後有力量（多數者統

治)」。布爾什維克喜歡拿自己的革命和法國革命相比較，就「恐怖主義」的問題而言，布爾什維克是想極力避免雅各賓派所犯的歷史錯誤。所以當以「準備對革命政權的武裝叛亂」的罪名將立憲民主黨非合法化時，托洛斯基說：「法國革命時，雅各賓派將比這些人更老實的人以防礙人民意志的罪名帶上斷頭臺，但我們尚未有處刑過任何人，也不準備處刑」。他並不是空口說白話。在革命勝利後的三個月內，革命政權並沒有處刑任何人。

布爾什維克這種對行使權力的樂觀態度，也影響到他對其他政黨的態度。革命後討論到有關組成新政府的問題——是布爾什維克的單獨政權或聯合政權時，從黨中央委員會的議事紀錄中，還沒有發現暗示對其他黨派進行鎮壓的發言。列寧、托洛斯基極力主張布爾什維克的單獨政權，但他們並沒有主張在選出政府的「母體」(蘇維埃大會、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實行一黨統治，而且在這些機構中還是以複數政黨的共存做為前提來進行討論。當一些同志擔心，不用恐怖政治就無法維持布爾什維克的單獨政權，也會變成不負責任的政治體制時(後來變成事實)，列寧等人則以「蘇維埃只要以一次票決就可以推翻政府」來做為回答。列寧在1918年1月的鐵路工作人員大會上說：「蘇維埃權力優先於政黨」，「當勞動者不滿於自己的黨時，蘇維埃可以讓他們改選自己的代表，將權力轉移到其他黨派，改造政府」。可是在這段期間，剛誕生的革命政權由於內亂和外國軍隊的干涉而面臨嚴重危機。政府決心，不管用任何手段都必須保衛革命。因此為了求生存而依賴權力的強化，尤其是行使恐怖主義政策。

革命的數星期後，內亂和外國軍隊的干涉的危機開始出現。於是托洛斯基在1917年12月的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上說：各位反對我們以較有節制的「恐怖」對付階級敵人。但各位要知道，不到一個月之內，我們必須依照偉大的法國革命家的前例，不得不執行更為激烈的恐怖。我們不僅要以牢獄，更要以斷頭臺來對付敵人」。不久之後，革命政權以「與反革命和怠工鬥爭」的理由，設立「全俄羅斯非常委員會」(簡稱“解卡”，1922年改為「國家政治保安部 GPU，1954年更名為 KGB，1991年10月解散)。開始時“解卡”的活動領域是為了解決軍事危機，恢復和維持秩序，所以組織也不大。但在內亂、外國軍隊干涉以及由於革命政權向農民強制徵收糧食的政策而產生的緊張和危機感之中，到了1918年夏天，“解卡”成為孤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對政治反對者進行赤裸裸的權力鬥爭的機關。

總之，布爾什維克的理念是實現公社國家，但在現實狀況下不得不從這個理念全面後退而成唯一黨統治。即，布爾什維克的一黨統治並非其理念的實現，而是「狀況」的產物。

(d) 黨的權力和國家的消亡

與公社國家互為表裡的「多數者統治」，具體的說，是在擁有農民階級的支持和西歐革命的支持這兩個條件之後，才能成立。但革命後的狀況並沒有往他們所期待的方向發展。在國內，農民由於革命政權將土地分配給他們而支持革命，但隨著內戰的發生，農民在革命政權實施糧食的強制徵收後便開始反對他。在俄羅斯這種農業國家裡，農民的氣氛當然會傳染給城市勞動者。另一方面，在國外，西歐革命的徵象尚未成熟之前，資本主義列強就支援俄羅斯的反革命並派遣軍隊意圖鎮壓革命。這個誕生不久的體制，在國內則被對體制表示冷淡甚至敵意的農民所包圍，而在國外則被對布爾什維克抱有敵意的資本主義世界所包圍。

1918年10月～11月，列寧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背叛著考茨基」一書。在其中，針對列寧考茨基所謂的「純粹民主主義」做出回應，他說：「獨裁就是立足於暴力的、不被任何法律所拘束的權力。無產階級的革命獨裁是無產階級針對布爾喬亞，以暴力爭取過來，並將其維持的權力」。列寧說出這些話的心情，頗類似被迫進行內戰的越南領導者們，面對美國自由派人士指責越南「獨裁體制」、「非民主主義」時的憤怒心情。對於這種情況，領導者們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主張權力的強化和正當化。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領導者們說出，將黨的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同義化的暗示性言論。

正如同「戰時共產主義」的名稱所表明的，這是將對付存亡危機的戰時體制和期待西歐革命的共產主義理想主義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的強化和軍事規律是易於和從下而來的大眾的自發性結合的。所以布爾什維克所主張的一黨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同義化，是迫切的危機感和革命形勢的高揚所自然而然發生的領導者和大眾一體化的率直表現。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是意味著，當時的布爾什維克的思考中缺乏了當領導者和大眾之間的一體化喪失的情況產生時，也就是危機已去而革命狂熱也冷卻時，應該如何處理權力問題的思考。這也是暴露出布爾什維克沒有想到包括一黨制在內的，一國權力長期存在問題，以及缺乏對權力的長期構想。

換言之，這時候的共識是，內亂時期所採取的權力政策是被狀況所逼迫的一時措施，而不是修正有關權力的根本理念。因此，權力的強化只不過是「國家消亡」日程表暫時性的變通而已。所以1919年3月，第三國際的創立大會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決議中，一方面承認了被強化的權力，但一方面又指出：「廢止國家權力是以馬克思為首的所有社會主義者的目標。如果不能實現這個目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主義，

即不存在平等和自由。要完成這個目標只有依靠蘇維埃民主主義，即無產階級民主主義。因為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不斷地使勞動者的大眾組織參加國家的統治，因而立即準備國家的完全消亡。」

十月革命的結果並不是走向「國家死滅」，也就是權力解消於社會，反而是權力被社會所吸收。一黨制國家就是這種被逆轉觀念的制度化，也是「去史達林化」時所遇到的厚壁。

正當化一黨統治的邏輯中當然含有一黨統治的暫時性或一時性的邏輯，也就是說，在勞動者階級不存在的例外條件下才可以行使一黨統治，當強大的勞動階級已經形成時，黨當然就不應該行使一黨統治了。但當時的黨領導者們的腦海裡似乎並沒有明確的思考日後的複數政黨的共存競爭，以政治複數主義替代一黨統治的問題。因為他們對一黨統治後的展望並不是複數主義的政治體制，而是包括黨本身的消滅在內的所有政治支配的消滅。

1920年夏天的第二國際第二屆大會的決議「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的角色」中說：「隨著階級的全盤廢止，無產階級的黨就再也不需要」，「當共產主義不再成為鬥爭的目的，而全部的勞工階級都成為共產主義者時，共產黨就完全消滅於勞動階級之中。」1924年史達林也說，「階級不再存在時，無產階級專政就會死亡，而黨也當然消亡」。這種發展方向是國家消亡論的延長，是政治強制的消滅以及黨消滅於工會之中，而不是現在許多人所討論的複數主義的政治體制。

從當時的公式文書、領導者的言論中可知，恐怖統治不僅僅是革命時期的偶發事件，而是革命後不久就成為執行政策的計畫性手段。因此如迴避由「紅色恐怖」所象徵的赤裸裸的權力行使，就無法討論革命後權力的實情。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說革命政權事先就準備以紅色恐怖為手段行使其權力，也是沒有根據的。羅莎、盧森堡所草擬德國共產黨綱領中，有如下一節：「在布爾喬亞革命，流血、恐怖政治、殺人等是布爾喬亞手中不可或缺的武器，但在無產階級革命，根本不需要使用恐怖以達到其目的，也憎恨暗殺…」。布爾什維克政權本來是準備依照這種「樂觀主義精神」行使其權力的。這種行使權力的樂觀主義是來自於國家消亡的理論，而「消亡」則於無產階級革命後便立即開始。

「國家消亡」的觀念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當廢止（消除）階級後國家也會廢止。這裡所說的國家，是指作為「權力」的國家（即 state）而言，但從無產階級革命所嚮往的世界性秩序看來，應該（雖然

沒有說明)也包括國境(即做為地域概念的國家)在內的。再說,由於國家的廢止被認為是一個漸進的持續性過程,所以以「消亡」來表現較為適當。國家消亡後的秩序有種種說法,如:公共機能喪失其政治性格,變成看守社會真正利益的單純的管理機能;對事物的管理、對生產過程的管理取代對人的支配(統治),在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的基礎上,組織新的社會生產;人們不必藉助於權力,以自治維持共同生活秩序的行爲成為習慣等等。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實現這些秩序的前提條件,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聯繫無產階級革命和國家消亡之間的過渡性權力。

關於國家消亡的期間,「國家與革命」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立即廢止一切權力的主張,但對期間、過程則沒有明確的說法。列寧只提到國家消亡的過程是具有持續性,是依靠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發展速度等。作為過渡期權力的無產階級專政,規定列寧立場的根本前提是,國家消亡的過程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立即開始進行。因為無產階級權力是多數統治者的權力,而且因立足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科技成果,可以將統治機能極度單純化。列寧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在於(1)鎮壓剝削者的反抗(2)組織社會主義經濟(3)指導中間階層。列寧認為巴黎公社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是鎮壓資產階級反抗時的手軟。但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權力的抑壓是多數者對少數者的抑壓,因此可以減少流血和犧牲,也可以使國家機能單純化。於是軍隊、警察、官僚等與人民游離的特殊機構的必要性將會減少甚至歸於消失,於是實現由普通人來統治的公社國家——人民自治性的結合的實現。所謂社會主義的成熟就是權力的逐漸消滅的過程,也就是如托洛斯基所說的:「社會主義的成熟度,可由國家解消於社會的程度來測定」。由此可知,國家的消亡是革命勝利後立即開始的一貫連續過程,而不是1930年代由史達林定性化的順序:即無產階級革命後的一定期間內,先在政治機能、經濟管理機能方面強化權力,然後才使其歸於死亡。

革命後不久,國家消亡的理念就受到嚴重的修正,而迄今該理念似乎已宣布破產。但事實上「國家消亡」的烏托邦或者是對於未來的構想,在20年代以後的每次政治變動期都以種種型態復活——在20年代的黨內鬥爭、經濟論爭中,當事者決定其態度時,深受這個理念的影響。1930年代史達林捨棄國家消亡的觀念,並將權力的強大化和神聖化提昇為馬克思主義的教義時,托洛斯基則在其「被出賣的革命」一書中讓這個觀念復活,並據以作為批判、分析30年代體制的基準。在批判史達林的那段期間,赫魯雪夫也重提過這個觀念。(待續)

編輯報告

《左翼》在出刊之初，就以建立台灣左翼隊伍相期許，我們深知台灣左翼經過白色恐怖鎮壓已成社會邊緣力量，隨後內部又因兩岸關係與民族問題而出現爭論與分裂，我們深信台灣左翼如果在這些議題上不能取得共識，進而與主流的文化霸權進行抗爭，則台灣人民將繼續受主流意識的宰制，陷於互鬥而無法自拔。因此我們一直歡迎任何自許左翼的朋友都能以《左翼》為對話論壇，就民族問題進行論辯，以理解各方的主張與論述。

目前在《左翼》出現的民族問題辯論上，大別之可分為兩派：一種論述認為在反共的年代，台灣的反動統治當局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撐腰，對於左翼長期加以打壓與污名化，以致部份自認進步的朋友不敢觸碰兩岸問題，更不敢思考未來台灣發展的方向，影響所及，對於美國帝國主義也完全不加以批判，他們反對這種反華不反帝的心態。另一種主張則強調台灣左翼應該從本土出發，切斷與中國大陸的血緣關係，甚至認為中國大陸才是台灣最大的威脅。

從《左翼》第十五號以來，何六九曾經就左翼與民族問題發表過三篇論文，並引起很激烈的論戰。針對何六九在上期所發表的〈鄉鄙之歌〉一文，本期我們共收到三篇回應的文章：張懷思〈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上)〉，透過對何六九過去數篇論文的批判，指出這些論述的謬誤，並進一步指出左翼與統一之間的關係。洪學弟〈帝國主義與虛假的公民文化圓舞曲〉，對於何六九高捧所謂的公民文化不表贊同，他以種種實例來說明美國帝國主義所具有的只是虛假的公民文化。汪立峽〈致何六九先生的一封信〉，則以另一個老牌帝國主義英國為例，反駁所謂的「現代文明的公民意識」民族論。

七大工業國與俄羅斯所組成的G 8，不久前在熱那亞舉行高峰會，再度引來全球各地反全球化的左翼人士聚集抗爭，並引發激烈的警民衝突。左思〈但丁、全球化與世界政府〉，以此次事件為例，說明宰制全球政經秩序的反動當局，卻不敢面對民眾的抗議聲浪，顯見所謂的全球化與世界政府所具有的虛幻性，宛如但丁的「神曲」。

黃志龍〈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三)〉，本期主要是探討社會主義政治體制中權力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問題。

左翼 第二十一號

出版日期：2001年7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二十二號



〈勝利的時刻〉

作者：杜勃拉維茨(捷克)

經發會共識，階級矛盾擴大的開始

劉鳴生 / 2

紙上工運？傳媒式工運？

何學政 / 4

人民左翼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島外接續部分

林書揚 / 10

【爭鳴與求是】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中）

張懷思 / 14

兩個偶然指派的命運和一個異鄉人

葉芸芸 / 35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四〉

黃志龍 / 39

經發會「共識」， 階級矛盾擴大的開始

劉鳴生

經發會結束以來，在媒體上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當屬「共識」兩字。爲了慶賀大會「圓滿」閉幕，總統大宴賓客。觥籌交錯之間，達官貴人彈冠相慶，喜樂融融的氣氛溢出宴會場外，在翌日的各大新聞版面上交織成一片歌讚頌揚的祥瑞之音，彷彿120位達官貴人所達成的322項「共識」，已然如陳水扁所言的，「堂堂溪水出前村」，破除了台灣社會的歧見、障礙，從此前途開闊，遠景光明，王公貴族從此率同全民百姓，一起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

經發會是一個很奇怪的決策機制。從李登輝到陳水扁的政權，最引以爲傲的，無非是促進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成就。然而，經發會恰好是一個最違背民主化與本土化原則的怪物！那些在經發會裡發言盈庭的企業大老闆，有誰是我們「選」出來的？有哪一位經歷過「民主」的考驗？這些人華車豪宅頭等艙，子女養在國外，個個在瑞士銀行有美元戶頭，除了其工廠排放的毒氣廢水污物之外，與台灣「本土」有多少相干？爲什麼是這些人在決定我們的前途？爲什麼這些人的共同意見竟可被包裝爲台灣的「共識」？

「共識」來自拉丁文的 consensus，原意是指生理學上生物體內各器官的依存協調關係。在政治學上，則引申爲社會上不同個體之間共同意願的建構或滲透，透過規律分析和政策辯論所形成的「共識」，可以促進公民性的養成和政治生活的組織化。然而，意識型態的操作以及媒體的宣傳、說服機制也可以形成強制性或虛幻性的「共識」。後者通常用來掩飾階級的矛盾和社會的衝突。

民進黨當權一年多以來，苦於提不出政策，做不成決策，如今，資本家從幕後走到幕前，在經發會現身，我們終於知道，原來大老闆的意見就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其實就是一個大企業，自總統到各部會首長，也不過是各就其位的企業經理。這樣的認知，是勞動階層從經發會所獲得的「共識」。

也因此，在經發會場外集結示威的勞工團體和環保團體，直接以「金發會」為他們所抗議的對象命名。

8月26日閉幕的經發會，對台灣的政治經濟環境而言，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過去，金融財團大資本家還客客氣氣地掩身幕後，由其代理人或參養的政客在檯面上活動，政治和經濟領域在專業上畢竟還有其區分。如今，大老闆耐不住性子了，自行披掛上陣，在經發會上直接拍板定案，交由行政部門去執行。阿扁總統說行政院對於經發會的決議，「沒有否決權」，如此赤裸裸地讓資本家集團的意志凌駕於國家行政之上，還真是舉世罕見！此外，還有大老闆威嚇要把場外抗爭者解送綠島，更像是財大氣粗的法西斯。

當然，大老闆的攻城掠地，不見得完全一帆風順，他們之間還是有一些利益糾結，以致未能一致在經發會上取得「共識」。譬如，「土地增值稅減半徵收兩年」的議案，在經發會最後是被列為「多數意見」而不是「共同意見」。但是，迫於銀行和地主財團解壓紓困的急切性，竟由總統率先排開陣勢，行政院照單全收，以罕見的高效率全盤通過，使得未被列為共識的土增稅減半，居然成為經發會後第一個列入施政目標的案子。

經發會讓我們看到，政府作為政治主導者的功能已然喪失，從今而後，官員唯一的職能是經濟管理，政治人物一個個淪為大企業的經理，聽命於大老闆，為資本家的利潤服務。經發會的每一條共識幾乎都服從於「新自由主義」宗教的教條：利潤至上、貿易自由化、市場統合、經濟去管制化。

是什麼樣的處境，竟讓大老闆們失去資產階級細緻、拘謹、有教養的美好一面，而在經發會上暴露出其粗暴、急功近利的不雅形象？是不是台灣的經濟果真已惡劣到令人跳牆、翻臉的局面？或者是，台灣的勞工太過軟弱，團結不成，動員無力，工會領袖自甘成為當權者的應聲蟲，無形中鼓舞了資方的驕縱傲慢、肆無忌憚，不將勞動者放在眼裡？

經發會的「共識」，其實是階級矛盾擴大的開始！



索閱本刊及來稿請寄： 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E-mail:twleft@sinamail.com
如果您願意在財力上支持這份通訊捐款請劃撥郵政帳號：19408351 戶名：黃德北

紙上工運？傳媒式工運？

何學政

在資本全球化的現今，炒作性及投機性的金融貨幣到處流竄，投資在實業生產上的資金遠不及這種投機性的炒作，有人稱之為「紙上經濟」(paper economy)，其造成的負面影響有二：一個是紙上經濟不須大量勞力，故大量失業成為其必然結果；其二是投機資本的風險極大，稍有不慎恐會釀成骨牌效應ⁱ。很明顯的資本全球化的世界是個資格門檻很高的國際俱樂部，不是一個進入門檻低的遊戲，它排斥低收入者也拒絕了教育程度低的人ⁱⁱ，易言之「贏家通吃」的情況將在全球化的底下更為普遍。那這種資本全球化的趨勢是否就要使得工會或工運都棄械投降呢？還是更團結地更有技巧地來抵抗呢？不過台灣界的工運目前卻興起了一股第三條路線的潮流「紙上工運、傳媒式工運」，雖然這股潮流不能稱之為台灣工運的主流，不過它卻一點一滴地往下滲透到(trickle down)工會幹部與基層會員的心中，認為即使在大環境下不利於工運的低潮，我們只要仗勢著在媒體之前露露臉、開開政府的會議、或向政黨黨團遊說(lobbying)一下，認為這樣就是工運的主流路線，而不深刻地組織我們的群眾、教育會員他們什麼是「資方的手法、官僚的迂腐」，認為工會只要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參加call-in就能反映出勞工現實的苦境時，台灣的工運發展將不能向前邁進，甚可能在資方的欺凌、官方的誘騙下、工會幹部的不知不覺中，群眾的利益被出賣而不自知，還歌功頌德地讚揚這些工會幹部時，工會運動也將持續地在全球化彈性勞動政策下打著左燈往右走、掛著自主進步向後退！

事實上「紙上工運」沒什麼不好，也不是不重要，在媒體上公開反駁資方的說法、官方的虛假數據，這個做法是應該做的，而且更應該去積極的做，不能放棄一絲一毫地陣地讓資方、官方所奪走，在統治階級暨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下，文化霸權無疑地勢掌握在這些人手中，工運應該能在這邊拿幾分就算幾分；但是無疑地，我們不能把「紙上工運」當作工運的全部，紙上工運是工運的一支，但卻不應該主導整個工會運動的推展與行動，也不應該把紙上工運誤認為工運的主流現況，因為這樣對工運發展是不健康的。或許有人會質疑，那我們的紙上工運不就恰恰巧巧地在替我們做解合-再接合(disarticulation-rearticulation)的工作嗎？正好相反，我們的紙上工運進行的地步充其量只是反駁一些官方、主流論述謬誤的說法，在葛蘭西(Antonio

Gramsci)ⁱⁱⁱ的看法裡面，有機的知識份子必須和社會的某一階級結合成一個整體，他們不只是雄辯家、說客，而且更應該是與所屬的群體有生活互動上實踐的聯繫，他們更應該積極的參與活動且負擔教育群眾的責任，將群眾的知識水準提升到哲學思想的程度。我們的紙上工運對「另外一套世界觀」都沒有想像的空間，甚至會問「什麼是另一套的世界觀啊？是美好的勞動福利？還是更加的勞動條件啊？」，這樣的工會幹部能教育底下的會眾到什麼樣的程度？筆者相當質疑！

過去我們的工運有時會借用國外的一些工人運動的果實來威脅資方、遊說官方，說「啊！國外的福利體制那麼好！我們也要那一套的福利制度！」，殊不知國外有系統的社會福利制度，都是奠基在工人運動、工人團結的力量而來，或是官方懼於社會運動的壓力而來(如德國的俾斯麥)，其工人運動至少對另外的世界還有一份想像存在，也願意為此想像及世界觀、為工人的後代而犧牲，才可能有那種福利體制。到了今天我們的工會幹部沒有盡到教育群眾的地方是，沒有告知國外那種福利體制形成的背景及前因後果，以及其與工人運動之間的關係，光是強調「啊！我們工人要這種跟國外一樣的勞動者福利體制」，想光以甜頭來引導會眾、以國外例子遊說官方及資方，筆者覺得這樣的工人運動則是過得相當空泛而無根，所謂空泛是指「工人是要那種福利體制(standard of life) 還是要另外一個世界觀的生活方式(way of life)」^{iv}，這點不但工人群眾不知、一般的工會幹部也大概會搞得不清不處；所謂無根就是光是這種遊說而無實際力量去組織工人、教育工人，工人群眾與工會幹部形成隔閡而不自知、工會變成幾個遊說者的俱樂部。空泛而無根的工會動員起來則是相當脆弱，動員群眾上街抗議，靠得不是說理或理論，而是靠著人情請託和人際關係，這種動員力量就會顯得相當侷促且有限，很難得動員一次，而且還要靠工會幹部一個一個去拜託「啊拜託你來啦！反正你閒閒在家裡也是沒事啊！走啦！跟我動員去遊行啦」，動員的當天則有如作秀，大家上街頭人人是明星，以餵飽媒體胃口為優先，媒體之前、報章雜誌上大家都講得義憤填膺(但在跟資方、官方談判時卻又表現得相當曖昧不清)，到底動員之後，群眾對這次動員的目的、後續發展能持續關心的能有多少，能有幾個群眾清楚地說出他們的訴求與受到的影響？動員對他們的往後政治態度(能否影響他們的投票行為、是否可以依其階級來投票)、社會生活能否有影響？這樣的運動在遭受挫折和打擊時，工運幹部與群眾是否能堅持下去？關於這點，筆者很悲觀！

在過去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工運團體之間無疑地可以形成統一戰線來撼動這個威權政體，工運也可以提出他們所認為最好的想像及世界觀來組織、吸引工人群眾，雖然工運團體之間可以紛紛嚷嚷，為著省籍情節(或稱國族認同)、工運路線或過去的一些恩恩怨怨有所區隔，但起碼大家都是在為這塊土地上的勞動人民而默默耕耘、犧

牲奉獻，對著不照顧勞工的國民黨大肆批評、上街抗議。但在去年民進黨上台後，這個過去跟我們赤腳勞工兄弟站在一邊的政黨被大家拱上大位了，一夕之間變成了執政黨，一時之間勞工兄弟們也對這個過去對勞工很有「好感」的進步政黨滿心期待。但近一年多新政府的表現無疑地讓工人大失所望(也許有些人對新政府還是有所期待)，從工時案、勞動三法的修改、到最近經發會的召開，筆者實在看不出民進黨與國民黨究竟有什麼差別？因為兩者只是在比較誰比較「右」而已！沒有哪一個政黨具有左的立場。在阿扁勝選之後，許多學者也提出他們對陳水扁新中間路線的看法，不過大概沒有人認為他的新中間是階級的新中間，而一致的看法應該認為阿扁的是兩岸政策的新中間^v。筆者認為民進黨在工時案是站在比較退步的四十四小時且又讚揚虛偽的勞資政協商體制、在勞動三法上民進黨準備瓦解工會、在經發會的期間上從總統、民進黨九人決策小組、經濟部、經建會、下至勞委會^{vi}一直提出不利勞動條件的提議(即使是無心之過講錯了話，也是其對勞動議題的無知與誤解)，擺明著就是新政府貪圖資本家的鈔票與選票嘛！視勞工為棄土^{vii}，相信各位開會的勞工代表都能深深體會這句話的涵義，而勞工團體也紛紛放話要政黨們年底看勞工怎麼反映，但這句話憑良心講只是句氣頭上的話，能不能藉此教育群眾、要群眾依著階級議題、視政黨是否照顧勞工而去投票，這是一個關鍵，換句話說，沒有把這股力量「組織」起來，勞工代表只是喊爽的而已！而且就算組織了成爲一股投票的鐵票部隊，在現實的政黨選擇中卻沒有一個階級政黨可選擇，這堪稱爲台灣勞工選民的悲哀，沒有選擇的投票算是投票嗎？沒有一個階級政黨叫這些群眾如何去投票？不過這是現實操作的問題，筆者在此無力且無能對此做出更進一步的探討。

回過頭來說，台灣的工會體制有無這套教育群眾的機制、動員群眾投票的方法，甚至是養成工人集體生活的習慣，這些都是「紙上工運、傳媒式工運」力量有所不逮的地方，不要再說「我們都有在做組織的工作啊！」，是不是形式上的組織、是不是儀式上的抗議活動，一到選舉、一到動員就可立見分曉，台灣的工運缺乏的是實質工運、扎實的組織！藉此經發會的召開，工會幹部應該教育群眾認識「官方的嘴臉、資方的貪婪及所謂的勞資政協商如何運作、成果(或惡果)」，同時也是叫群眾辨別工運團體行動力的時機，因為這不是只光靠在報上、在媒體上的發言就夠，過去工運團體的行動力和實踐力都是大家看在眼裡的，沒有這群工會幹部及會務人員的辛勞，就沒有今天的工運；但是怎麼換了個政黨執政就變了個樣，有的工運團體甚至有如啞巴吃黃蓮(有苦不敢說、不會大聲喊出來)，過去大家可以站在同一陣線反對國民黨的獨裁與霸道，如今工運團體對經發會好像被施了個魔法一樣，動員也不夠力，也有些工運團體選擇不動員或不教育群眾，認為只要靠著遊說力量及紙上工運，就可以讓我們的工運爭到工人的福利、抵抗資方的需索無度，問題是「紙上工運」若缺乏行動與組

織來教育群眾，紙上工運無疑地將勞工推到資本家、官方面前「犧牲與出賣！」。勞工們在工作現場辛勤工作一整天後，能有幾個會員會對報紙上、媒體的報導做出深刻的回應與感想，工會幹部要是無能在此方面做出教育的功能，可以預見地又讓出一大塊陣地供資本家與官方來佔領使用，其後果就是會有類似「經濟這麼不好，我們要跟老闆共體時艱、先求有再求好」的論述出來，甚至到最後一套資本主義的邏輯模式、生活方式都出來了如「三天捕魚兩天曬網 有什麼不可以、這是世界潮流，大家要珍惜工作，勞工們要提昇自我的學習能力、有信心的人不怕競爭、大家有苦日子過了」，資本主義的打手在此刻即會發揮其應有之功能，替資本主義嗜血的掠奪、剝削做合理化、正當化的一番論述出來！到了此時，工會往往淪為被鞭撻的對象、被認為是貪得無厭的一群人、勞工則淪為砧板上的一塊肉，任憑資本家取用、官方一起共享勞動成果而勞方無力反抗的情況！

怎樣看待工會代表們進入勞資政協商機構或政府機構內，也許在檯面上、電視機鏡頭前好像工會代表已經可以和集團公司的決策人平起平坐，和政黨代表們握手稱好，不過這個景象好像也是最近才有的現象。我們可以看一看美國工會領導人的例子，過去美國勞聯(AFL)的S. Gompers不也是這樣成為美國全國的權力精英嗎？在新政時期美國一大堆工會領袖不也這樣加入且支持羅斯福(F. D. Roosevelt) 的政策嗎？儘管意味著工會領袖有更大的決策權，試問這些工會領袖的權力到底在哪邊？是服從於工會會員的利益？還是只能在國家決策機制下，屈服於國家上級決策的意志？筆者認為是後者的成份居多吧！工會領袖(抑或工會沙皇?)儘管認為自己已爬到其職業生涯的頂點，也有了相當的地位與聲望，但這種工會的權力精英跟全國的權力精英比起來究竟還是屬於「權力的中層」，至少Mills是如此認為的^{viii}，因為這批人是政府造就出來的、政府可以不用他們；而且跟其他的權力菁英比起來，工會領袖們還是稚嫩的新手。不論工會領袖抑或工會在美國的權力結構上，都是屬於依變項而不是「自變項」。在這樣的體制下，工會沒有自己的政治或經濟路線，也許只能被官僚、政治菁英、工商大老牽著鼻子走，工運難免跌跌撞撞甚至重蹈覆轍！

在羅斯福新政之前，資本主義面臨最大的危機，他開始向工會視好、吸納工會或進步人士進入決策參考體系，但工會幹部卻不察他的改革仍是在資本主義體下的一種經濟類型，工會幹部所能做的決策仍只是在這個架構底下的一種平衡^{ix}，儘管當時工會力量很強大，但經過新政時期的吸收之後，美國的工會運動從此一落千丈，原因是工會無能在政治上形成第三股勢力(亦即組成一個全國性的政黨)。易言之，工會未能在新政時期建立自己的組織系統、政治管道，反而急著去為羅斯福的新政部門而服務，換來的卻是工會的成長受限制。往後美國工會雖也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試圖影響國會議員，但效果仍舊相當有限，它仍然無法直接影響對勞工有利的法案獲得通過。

在八卦腥羶色充斥的傳媒市場中，觀眾的胃口、口味早已被這些傳媒餵得麻木不仁、喪失味覺，大量的新聞雜誌擺在架上任人選購，整個大眾文化產業(mass culture industry)也為資本主義而服務，大眾傳媒則使我們習於生活的消費傾向，將我們的日常生活標準化，但終究造成個人在此之間共同點：疏離，大眾傳媒不過是在複製相同的銀幕經驗而已^x。所以妄想光靠著紙上工運就可以促進、提昇勞工福利的想法，無異緣木求魚。在每天眾多的新聞消息中，工運或勞工新聞只能佔某個小版面，就算當天發生了很大的勞工新聞事件，當時間過了三、五天後，還能留在勞工朋友們心中的恐怕很少且如浮光掠影一般！這樣的紙上工運、傳媒式工運能對勞工們有什樣的啓發呢？

紙上工運、傳媒式工運讓工運者有露臉、展現文筆的機會，這也無可厚非，但若光注重紙上工運而沒有對群眾做教育、做組織的工作，在整體環境對工運不利時，工運的脆弱性特別容易顯現出來，與資方談判時就會顯得不得不妥協的態度(以免被記者說為“需索無度貪婪的勞工代表”)，那台灣好不容易十幾年累積下來的工運經驗與果實就這樣被一一摧毀，工會運動脫離群眾壓力而在大眾媒體前露臉、展現，工人群眾的利益也同時在此遭受資方、甚至官方的剝奪而無力抵抗，不知工會運動過去堅持的理想、價值，怎麼換了個政黨執政，過去的這些理想價值則逐步退讓甚至泯滅，工會幹部不得不跟資方來妥協？難道只是一句「無奈」可以交代含混過去！所以工人運動不能只是光在紙上工運花心力，必須還要在群眾之間、行伍之間做起教育、組織動員的工作，深刻地讓會員感受到這種運動的重要性與會員本身的相關性。紙上工運一旦成為工運的主流，稍有不慎就會跟「紙上經濟」一樣引發風暴，不過跟紙上經濟不一樣的是，紙上工運的風暴不會影響到資方，反而有利於資方操縱(紙上經濟引發的風暴則會同時影響資本與勞工)，工運將一蹶不陣、倒地不起。

當政客們也開始使用“solidarity”和“union”的字眼作為其在地化、本土化的招牌時，紙上工運者仍自以為是地使用傳媒當作發聲的管道，而脫離勞工運動應有的組織路線時、失去運動應有的活力與本質時，紙上工運者被媒體、政客玩弄了也渾然不知，偏離其原本工運組織者應該有的方向，而急著去跟資方談判與協商，卻忘了基礎的工會民主原則是工會運動的根本時，勞工們依舊過著渾渾噩噩的勞動生活，顯難有進步的一天！

爲何強調勞工組織及教育的重要性，其實最重要的是要讓會員養成集體行動的習慣，要養成這種階級意識需要靠著組織與內部有效民主(effective internal democracy)來形成，因爲國家官方和資本是「結構形成的網路連結」(structurally-formed network articulation)^{xi}(亦即，勞工是否會發現到最後，看到國家官方跟資本是站在一起的！)，勞方的連線若不能奠基於階級意識的啓發而採取集體行動，在面臨官方、資方聯手打壓之時，勞方將迅速瓦解而遭受撲殺。在民主政治中，勞工是以公民身分參與投票，但這個公民身分有可能是以中國人、台灣人、派系樁腳、消費者、納稅人的身分來參與民主政治；紙上工運充其量只能做爲發聲的管道之一，但這絕不應該是工運組織的形式與實質，勞工若沒有建立與其他階級不同的世界觀、沒有自己的組織生活與階級意識，在民主政治與資本主義體制下，勞工將只是“沒有臉孔”的一群選民^{xii}，跟其他公民沒什麼兩樣，一旦選舉後就是政客的天下，紙上工運對此是沒對抗力量的！要記得，資方有兩票(選票及鈔票)，勞方只有一票，如果連這一票都不能好好把握，就別怪資方與官方聯手合作的慣用技倆-政資大合作、勞工閃一邊。工人們在遭受挫折及打壓時，只能說聲「天佑勞工」了！



註釋

- i 劉梅君，〈工時之辯證與經驗省思〉，政大勞研所，2001。頁23。
- ii 蔡明璋，〈台灣全球化 哪個階級受益？〉，中國時報2001/03/02。
- iii 郭紀舟，〈七〇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頁9-10。
- iv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66. Pp.211.
- v 黃瑞明，〈民進黨的左派聲音在那裡？〉，中國時報2000/12/25。林良榮，〈台灣勞工的第三條路〉，勞動者電子報2000/04/05。左思，〈小語氾濫，道德橫行〉，左翼第九號。
- vi 〈習慣就好〉，聯合報黑白集2001/08/16。
- vii 〈被視如棄土 勞工團體不滿〉，世界日報2001/08/10。
- viii 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王逸舟譯，〈權力菁英〉，北市：桂冠，1994。頁341~342。
- ix 同上。頁357。
- x 石計生，〈馬克思理論與當代社會制度〉，台北：揚智文化，2000。頁208-212。
- xi 趙剛，〈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探索〉，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1998。頁28-29
- xii 王振寰，〈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叢刊〉，1993。頁216。

人民左翼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島外接續部分

——台灣人民反帝運動於三〇年代初 瓦解後在中國大陸的延續活動概況

林書揚

一、

日警對台灣社運的全面性大逮捕事件，從1929～31、32年，共發生過數起。被逮判罪入獄者外，至33年左右已有數百倖免者潛入對岸大陸。他們在9·18事變後「抗日救亡」運動日漸高漲的大陸政治形勢下，以「台灣反日帝革命必須以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為前提」的戰略立場和政治信念，積極投入社會各方面的運動，包括對台籍居留民、台灣留學生的組織和宣傳工作。

二、

當時逃避日警追捕進入對岸的社運人士，以其政治立場而言，大致原於左派（台共、農組系統、文協左派、民眾黨左翼），中間派（各團體中的民族主義派、改良主義派）為多。共同立場是反對日本的殖民統治。30年代的中國，正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時期，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為兩大組織性政治勢力。且於20年代曾經發生過幾次局部性內戰。不過以31年9·18事變為轉機，逐漸出現「民族團結一致對外」的世論。同年十一月，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江西省瑞金成立。各省包括東北的紅區也積極準備著抵抗日本軍事侵略的人民游擊戰的佈置。但南京國民政府在蔣介石主導下仍堅持著「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國共之間的軍事的、政治的鬥爭情勢仍然相當嚴峻。不過9·18、5·30等相繼爆發之後，中日之間不可避免的民族鬥爭的趨勢顯然超越了國內階級矛盾而變成了時代的首要急務。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之下，30年代台灣社運分子各按個人的理念傾向或黨派關係進入了當地既有的政治體系或暫時從事自主性的民間組織工作。

三、

台籍人士進入大陸大約有四種情況。（1）留學。（2）避難。（3）參加抗戰。（4）經商或就業。隨著中日關係的緊張，日本的侵略準備態勢和中國的應戰準備態勢日愈突顯，台籍運動分子的組織與宣傳活動也日益緊密。依政治的黨派色彩來看，台胞政團可大別為二。一種是國民黨系統，另一種是共產黨系統。國共兩黨在大陸是經

緯分明，對抗激烈的兩種組織體。但在20、30年代的台灣，在異族日帝的高壓統治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是一種自然成型的鬥爭型態。即使在具體個別問題的政策或理論建構上時而出現衝突，也不至於嚴重化。因此，在現實上台籍運動家在這個歷史時段上的黨派分途，並不會帶來太大的內部障礙問題。更何況不久便再度出現國共兩黨聯合抗日的新局面。

四、國民黨系統：

早期的自主性政團有(1)台灣獨立革命黨——台灣義勇隊。(2)台灣青年革命黨。(3)台灣國民革命黨。(4)台灣革命黨。前三黨先聯合成立「台灣革命團體聯合會」，再由台灣革命黨參加成立了「台灣革命同盟會」(41·2·10)。另外，40年開始，在重慶有中國國民黨台灣黨部的籌備會工作。(主任翁俊明)。42年9月～11月在重慶舉辦台灣黨務工作人員訓練班，各團體都有參加。因太平洋戰局的好轉，訓練內容由一般性政務轉為敵後特殊任務。43年台灣省黨部正式成立，前述的有關團體解散。省黨部當時主要以將來投入台灣收復戰中的政工部門為目標。45年5月謝東閔代表參加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會，台灣黨部被視為「戰地黨部」。成立當時黨員689人。後隨戰局發展，前進福建漳州。在香港有工作機構。也有由美軍協助在塞班島進行台灣收復工作訓練的計劃。屬於這系統的人士中有少部分具有中共祕密黨員的身分。其餘都在戰後早期以執政黨各機構人員身分回台，對光復初期的台灣政局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因為下列幾點因素，除了極少數外，大多逐漸邊緣化了。甚至有人在二·二八事件和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年代受牽聯犧牲。他們原來抱著一腔熱情和期待回到別後十年的故鄉，但政治的現實是冷峻的。(1)從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半，人事物象的隔絕和脫節太大。(2)因陳儀施政的嚴重亂象和腐敗，使他們的形象大受牽聯。(3)國民黨當權派對早年的台灣反日鬥士的左派背景深具戒心。隨著國共兩黨的矛盾在戰後的表面化，他們的處境日漸艱難。總之，政治的權力舞台，自古便是絕情的。二戰後的中國，甫行復歸版圖的台灣人民大眾必須面對未曾預見過的歷史轉軌的大風暴。而一批曾經肩負著反抗殖民壓榨體制任務的先行隊伍中，竟然有那麼多的熱血漢子慘遭新壓迫機制的吞噬！如此看來，台灣第一期人民左翼運動，不能不說在前後兩度的族外反帝鬥爭和族內階級鬥爭中黯然收場。

五、中國共產黨系統：

台灣反日運動的初期階段(1920年代初到26年文協轉向)，如文化協會的成立(21年)，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等，主導是地主階級。意識型態是漢族主義及由漢族主義所引導的三民主義。但自20年代中期台灣留學生在殖民本國的日本或精神母國的中國大陸，更多地接受的是以1917年的俄羅斯蘇維埃革命，

19年第三國際的建立為契機的馬列共產主義的世界觀、歷史觀、社會觀。以其為方法論的反資本帝國主義世界支配的廣泛的國際人民左翼的革命實踐運動。20年代早期的台灣留學生很敏銳地在日本東京、京都，中國北京、廈門等地，投身於自發性的社會科學研究會之類。而當年的時代思潮，也逐漸地匯聚為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兩大系統。因此，當該年代後期，那些在留學地接受過新思潮洗禮並也實際參與過當地的反帝反資運動的年輕人，紛紛回台從父兄手裏接下新一波的殖民地人民左翼運動的主導權時，他們之中有不少已經在日共、朝鮮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人事、思想理論、具體問題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解，建立有一定範圍的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31年起一批一批的避難潮流向對岸大陸時，民族主義派或中間改良派大概自然趨向握有中央執政權的中國國民黨，而台共系統或具有急進民族主義傾向的部分人士則投向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系統。

對於接觸、協助至吸收台灣反帝抗日鬥士這一方面，中共相當積極，儘管受限於本身鬥爭條件的比較弱勢，但中共自中央到地方組織，都有計劃的執行其政策。以當時的實況而言，具有下面四種方式或方向。

(一) 收納於中央蘇維埃根據地。30年代初，中共黨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江西瑞金，有蔡前外20餘名台籍者。各任職於黨政機關。34年1月，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工農兵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定位台灣住民為「少數民族」。41年派代表參加「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蔡前為大會主團成員。

(二) 直接佈置於重要白區，利用其台籍身分進行特別任務。37年李偉光、盧秋濤等人先在上海成立「台灣革命大同盟」，發表抗日救國宣言（載在救亡日報）。一方面替新四軍祕密承擔情報、收購各種器材、藥品等，也負責對台民的宣傳工作。（37年9·18「救國時報」上海電）。對上海的台灣抗日活動，日方極端重視。搜捕日嚴。38年張河波一人被領事館警察逮捕，押回台灣。

(三) 吸收國民黨左派的台籍人士，如丘念台等至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受訓。丘念台回廣東後以少將參議身分組織延安回來的台籍青年成立東區服務隊專搞政工。（該計劃曾取得毛、周認可）。

(四) 協助具有准戰鬥部隊性質的台灣義勇隊。李友邦創立之始，由中共浙江省黨部派張一之（張啓權）協助，任祕書長。除了隊務一般外，主要負責思想教育。

此外，38年～45年之間，中共的兩大報「新華日報」（重慶）和「解放日報」（延安）總共載過56篇的台灣問題論說。

六、

至45年8月15日，日軍終於不支而接受無條件投降。二戰結束。大陸上的台灣革命隊伍中，參加國民黨系統者主要以中央執政黨的黨·團工作者身分參與南京國民政府的入台接收部門，或展開基層組織的建設工作，以陳儀的施政目標——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為群眾宣傳的主要口號。他們有執政黨的身分、機構、人脈、資源及早年從事群眾運動的地緣、人緣關係，理論上應有相當的運動空間，只因前述的制約因素，還是難於儘情開展。從八月到十月之間，出現了各地早期運動家所自發成立的人民團體，有「三民主義研究會」、「治安協助會」、「新生活促進會」、「台灣政治同盟」、「新青年會」、「還中會」、「青年同志會」等等。多數屬於民族主義派或中間民主改良主義派。但不久，台灣義勇隊副隊長張士德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區團籌備工作負責人的身分，由簡吉協助進行吸收統合各種自發性團體的工作。至46·1·10也被強迫解散。

另外，具有更大的組織基礎和經驗的台灣左翼群眾組織活動，也同時展開。這些大都由出獄的左翼運動家主持。有（1）台灣人民協會（10·5）由謝雪紅、楊遠等推動。機關報《人民公報》，成員多屬舊台共。11·17成立台北支部。同日陳儀公佈「人民團體組織臨時辦法」（2）農民協會。成員多屬舊農組關係者。10·20在台中成立。到會代表130名以上。也有文協會員，部分舊台共。一月後連間接報名的會員曾達到一萬以上。後被劉啓光一派人滲透，遭受破壞。（3）台灣學生聯盟。學生們受到上提兩協會成立的鼓勵，10月初旬成立。以普及國語運動、三民主義宣傳運動為主，但一如農協，也受到反動派破壞。（4）台灣總工會籌備會。10·20成立於台中。

當這些本島舊左翼人士的自發性組織活動進行之際在延安的中共中央也早已建立了對台工作的政策執行機關。日本投降後十天，延安成立了台灣省工作委員會，任蔡前主持，組成領導機構，以數個月時間潛行祕密進入台灣。而台灣左翼運動經過了12年的斷層，漸要進入難度更高的第二期。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 左翼統一派 (中)

張懷思

何六九演了一齣滑天下之大稽的醜劇

英國與法國被許多西方學者奉為“公民民族主義國家”的先驅與典範，它們的民族認同是怎麼用“神話”建構起來的？又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出版過《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等名著的美國世界史專家 William McNeill 對此有扼要的說明：

「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歐洲雄強之國回過頭去從蠻族中隨意認祖歸宗，大肆編造祖上神武威猛的英勇事蹟，於是乎近幾個世紀中，所謂各民族國家內率土之民莫非同宗的神話，就這樣根深蒂固起來。(值得一提的是，法國與英國選擇了高盧人與不列顛人做為想當然耳的民族先祖，然而，他們現在的民族語言是分別從侵略高盧人與不列顛人的征服者那裡繼承來的，他們卻樂於無視這些征服者對其民族形成的歷史作用。)全國系出同一族源的虛構之事，自此發榮滋長，尤其自 1789 年以後，這些認蠻族為祖宗的新蠻族國家，訓練所有的成年男子使槍弄劍，用民族認同感使他們精誠團結，心甘情願地服從選定的領袖，這與那些只動員國內部份人力參戰的政府相比，顯示了實際的優勢威力，這種國族同源論的論調就更為盛行了。(McNeill 1994: 6—7)

McNeill 這段話可以做為 Smith 所言的註腳。何六九在〈鄉鄙〉中指斥“血緣論民族主義”說：「每當人們追溯遠祖的時候，總是事實與神話不分，而且經常張冠李戴，穿鑿附會，甚至於憑空杜撰新神話。六十年前，有兩位學者嘲諷道，民族可能是“一起錯認祖宗”的結果。在此情況下，講求嚴格考證的信史觀念都是多餘的，反正只要“信仰產生力量”就夠了。於是，荒郊野外亂葬崗上來路不明的鬼魂，突然之間被一批以孝子賢孫自居的人們供奉膜拜起來，奉為神聖無比的祖宗。亂認祖宗的荒唐事，經過一番的精心修飾設計，成為鄉鄙政治學開宗明義第一章，也適用為政治領袖

人物心靈閉塞的遮羞布。這些話其實正是英、法等國建構民族認同最好的寫照。這真是曠古絕今的巨大諷刺！何六九這個無知之至的蠢蛋，一邊鄙視、嘲諷「缺乏人文思想」、「粗魯無文的無知鄉愚」、「事實與神話不分」、「亂認祖宗」，一邊卻對“鄉鄙政治學”的始作俑者，效愚夫愚婦之所為，頭如搗蒜般地善頌善禱，天下事之滑稽寧有過於此者？何六九著實演了一齣滑天下之大稽的醜劇。

中國的歷史文化為各族人民所共創

中國大陸的“中華民族”概念是建立在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知識基礎上，兼顧了客觀的自在與主觀的自覺兩個方面，並未訴諸沒有確鑿根據的神話。一般所謂“炎黃子孫”之說，其實是取其象徵符號的意義¹。大陸學界根據考古學與歷史學的實證研究，認為中國可稽的第一個王朝是夏朝，司馬遷《史記》所載的三皇五帝，只不過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並非信而有徵。這只要查閱大陸學術界有關中華民族的諸多論述即可得知，此處不贅述。何六九把中華民族主義窄化為漢民族主義，尤其是血緣論漢民族主義，只足以證明他的鄙陋無識。從他的論述中可知他的中國歷史知識沒有超出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範圍。他有關中國歷史的一些看法顯示，他的中國歷史知識水平甚至還不如一個用功的中學生。在何六九的認知裡，中國歷史只是漢族的活動史，只有漢族政權統轄過的領土才屬於中國的疆域。他在〈鄉鄙〉中胡說什麼在中國大陸「人們卻一再被曉示告知必須去霸佔大片從來不曾被自己的血親祖先所征服和直接統治過的領土。」這根本是連中國歷史常識也沒有的蠢話。何六九竟然會不知道，中國的疆域是幾千年來諸多不同的族裔通過征伐與搏合逐步擴展而來的，不單靠漢族之力。少數民族或者曾建立地區政權乃至擁有半壁江山（如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與宋、元之際的遼、金、西夏），或者曾入主中原成立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如元、清），在中國歷史中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文化的內涵也同樣是各民族通過長期的交流融合而成的，在文學、藝術、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各個方面無不包羅揉合了諸多民族的特色。因而，不論在政治或文化上，都不能把中國歷史粗糙、簡單地歸結為漢族史，更不能把中華民族等同於漢民族。胡琴、琵琶之類的樂器原本不是“胡樂”嗎？但今天已成了代表中國的“國樂”。旗袍原是滿族婦女的服裝，如今則成了代表中國特色的女裝。舉世公認的中國文學瑰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也不是漢人，而是滿州旗人。中國現在的疆域主要是繼承滿族建立的清王朝而來。如果何六九要否定歐洲強權所設定的國際法中的主權繼承論，我們也同意，但請何六九立即發動一場全世界的政治大革命，打破帝國主義所控制的資本主義主權國家的國際體系，消滅階級對立，抹除國界，實現大同世界，這才顯得出宏偉的氣魄與無比的能耐。而不是龜縮在台灣一地，只會妄想用無知與謊言，搞一場徒以自欺卻絕對無法欺人的所謂“文化大革命”。

中華民族主義的基礎

何六九這個鄙陋的蠢材根本不知道現代中華民族主義的興起與中華民族意識的高漲，並非起於漢族的血緣觀，而是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帝國主義入侵，強迫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貪得無厭地分割、掠奪中國的土地資源、財富，殘酷屠殺無辜人民，中國各族人民爲了對抗侵略，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付出了慘重的犧牲，才用血河淚海澆灌出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中華民族主義與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意識。這個中華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意識是用活生生的血海骨嶽的慘痛歷史事實與深入骨髓的亡國危機感自覺地建立起來的，用不著訴諸遠古渺不可稽的神話。清末，中國遭逢帝國主義瓜分豆剖，國將不國，滿族貴族盛昱憤而疾呼：「起我黃帝胄，驅彼白種賤，大破旗漢界，謀生皆自便」(引自馬戎、周星主編 1999：117)。盛昱不但主張打破滿、漢的種族界限，還把滿族也歸屬於具象徵意義的黃帝子孫，呼籲全體中國人不分族裔、團結起來，共禦外侮。清王朝終於不免覆亡，遜清皇帝溥儀及一小撮前清大臣不甘失勢而充當日本傀儡，在1932年成立“滿州國”，也不旋踵倒台，結束一場醜劇，都是因爲違背了中國各族人民不分畛域救亡圖存的這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浩蕩巨流，最終只能淪爲泡沫，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們還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中華民族主義的自覺性。一個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名人梁漱溟。對中國現代政治史與思想史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梁漱溟以捍衛、發揚新儒家文化聞名，也寫過《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是“鄉村建設”派的領導人物，還擔任過“中國民主自治同盟”的秘書長，是國共兩黨之外，第三勢力的要角。但梁漱溟其實是元朝皇帝宗室的後裔，姓“也先帖木耳”，屬蒙古族。元朝滅亡後，其祖先未隨元順帝逃回蒙古，而取「孟子見梁惠王」之語，改漢姓爲梁，與漢人通婚，世居於河南、廣西等地，至曾祖父而定居北京成了北京人。梁漱溟終其一生認同的是以儒家爲中心的傳統中國文化，自居爲中華民族的一員，所致力者在於中國的復興(見汪東林1988)。另一個例子是台灣的名作家李敖。李敖在自傳中明言自己祖上爲苗族，衆所周知，他是個自由主義者，但近年來不遺餘力地批判台獨，積極鼓吹中國統一。像梁漱溟、李敖這樣既非漢族後裔，也不曾錯認祖宗，卻都自覺地成爲中華民族主義者的例子，在現代中國所在多有，絕不罕見，是普遍現象，而非特例。他們沒有如何六九所云「以血液從事思考或以血液代替思考」，而是相反，用自覺的理性代替血液，選擇了自己的民族與國家認同。當然，這些都超乎何六九那褊窄淺陋的知識之外。

現代化派 VS. 本源派

何六九對所謂“血緣論民族主義”的激情攻擊與對“公民民族主義”的頌揚，根本不是基於紮實的研究與嚴肅的思考，而是囫圇吞棗一些西方“現代化”派學者的論點，在既沒有能力消化，更無本事批判下，排洩出來的一堆臭不可聞的胡言亂語。

關於 nation 與 nationalism 的定義與內涵，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並無一致的看法。對究竟是先有 nation 再出現 nationalism，或者是 nationalism 創造 nation，也一直是聚訟紛紜的問題。對於 nation 的起源與形成，西方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 nation 乃西方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即現代化）的產物，是經過社會與政治菁英刻意建構出來的，不存在於西方現代化之前，而民族主義也是應現代化產生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而興，此謂之“現代化派”（modernist），右翼的 Ernest Gellner 與左翼的 Eric Hobsbawm 可稱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另一種觀點是，nation 並非到了現代才由民族主義者營建成的人造物，而是古已有之，憑藉歷史、語言、價值觀、血統等要素構成的文化共同體，此謂之“本源派”（primordialist）或“源遠流長派”（perennialists），John Armstrong、Pierre Van den Berghe 等人屬之。（參考：Gellner 1997：p2-p3；Smith 1998：18-23；O'Leary 1998）。

在經歷過德國、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肆虐與二次大戰的茶毒後，西方（特別是歐洲）學術界大多對民族沙文主義深惡痛絕，因而，自 Hans Kohn 以降，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多半仇視民族主義（尤其是所謂“族裔民族主義”），把法西斯主義視為民族主義猖獗的必然結果（O'Leary 1998：67；Smith 1998：16）。現代化派的學者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從事民族主義研究的，他們有的從自由主義（如 Gellner），有的從馬克思主義（如 Hobsbawm）的立場，研究歐洲的民族主義，力圖解構民族主義的神話，消解民族主義的動力，庶幾可免民族沙文主義再度為患歐洲，禍及全世界。不過，值得一提的是，Gellner、Hobsbawm 雖則在情感上反對民族主義，但都力求用理性的態度（事實上，他們被批評者指稱過於強調理性，從而不夠重視民族主義予人歸屬感的凝聚作用），尊重證據，以唯物的方法嚴謹地研究民族問題²，此所以他們的著作雖不乏可議之處，但終究贏得佳譽，蜚聲士林。

對於“現代化”派歷史學者的心態與觀點，Smith 曾舉出三個特點並予簡短的評論。我們撮要如下，以見其概：

一、民族主義持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強調民族主義固有的愚昧與破壞性傾向。Smith 指出，或許因為“現代化”派的歷史學者痛感民族情感與民族主義攪動人心的心理層面，故比政治科學與國際關係的學者更猜疑、敵視民族主義，也因而有時使他們易遭受指控，說他們把民族主義這個有多種層面的事像簡單地只歸結為單一的社會—心理因素，犯了過於偏重心理因素的毛病。更嚴重的指控是，他們把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當作首要的對象，忽視或迴避了就某種程度來說並不受民族主義宣傳家活動影

響的民族構成過程的重要性。這種傾向的結果之一就是，“現代化”派的歷史學者刻意低估了民族主義所發揮的某些正面作用，甚至是“建設性”的方面。

二、“現代化”派的歷史學者一般都認為民族主義的理論貧乏，也確信民族是用大量捏造的神話、傳統建構出來的共同體。因而，與許多人類學者一道共同戮力於“解構民族”，並揭露那些搬弄民族主義、利用群眾懷祖情緒為黨派利益服務的團夥在意識形態上的目的。對此，Smith評論道，如Hobsbawm所承認，只有某些傳統深植於群眾之中，也只有某些傳統可長可久，而民族則是持久存在的“編造出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s”）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如果是這樣，在什麼意義上我們該視民族為“編造”的或“建構的”（“constructed”）傳統？為什麼編造民族的行為這麼常見，而且在極其紛雜多樣的文化與社會環境中都能深深打動人心，歷久不衰？不論建構得多麼好，沒有一種人造的事物能像民族這樣飽經興衰榮枯而不亡，或歷經滄桑事變而長存。顯然，民族的構成絕不僅僅是民族主義捏造出來的，而所謂“編造”之舉必須從另外一種意義，即重新組合既存的要素這個意義來理解。

三、“現代化”派的第三個見解與所謂民族與民族主義是“人造”的觀點密切相關，即認為民族與民族主義具有現代的特性。Smith指出，“現代化”派的這個主張固無不當，即：民族主義是指一個社會群體的某些成員認為他們該建成“國族”並勉力完成獨立、統一與認同的一種意識形態與運動，這樣的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末期的產物。就在此際，興起了一種民族主義的學說，宣稱世界分成各具特性的民族，民族是所有政治權力的來源，只有歸屬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人類才能獲得自由，國際的和平與安全也有賴於所有民族組成獨立的國家。只是到了十八世紀，在歐洲的國際體系中，這種思想才大為風行。“現代化”派的這些見解大多數的歷史學者都表同意，國族被視為純屬現代的概念與社會組織型態，其產生須具備國家官僚體系、資本主義、擺脫神權統治與民主政治這些“現代”才有的條件。Smith對此說提出三點批評：

1. 這種觀點也是有不實的（mythical）成分，用言過其實的詮釋來為當前的目的或未來的目標服務。“現代國族的神話”指涉，在現代之前“沒有民族存在”（“nationless”），並誇大了現代化促使國族產生的作用。

2. 即使根據“現代化”派的假設所建立的民族主義概念，不同的民族群體之間在型態與分期上也有重要的差異。在西歐與北歐的民族國家是緩慢而持續地浮現的，與後來在民族主義時期才創造的“營造出來的國族”（nations of design），兩者之間有所差異，這點必須注意。很顯然，在西方“國族構成”（nation-formation）的過程是未預料到的，也非刻意而為，先是由具支配地位的族裔共同體鑄成國家，再逐

漸變為民族國家。在其他地區國族構成的過程則需要外部的刺激與有計畫的積極行動。

3. “現代化”派對民族主義產生的解釋的真正麻煩是歷史深度不足。“現代化”派只把民族與民族主義視為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過渡過程的產物，這就很難解釋人為何會回歸傳統，覺得族裔的歷史源遠流長。連續與斷裂的平衡受到破壞，於是現代社會所要求的集體認同就變成困惑難解的問題。前現代共同體的文化模式有助於解釋何以在現代世界會有這麼多人把忠誠與團結集中在民族上面，這正是關注前現代的文化共同體之所以必要且重要的原因。世界的許多地方過去是按照古代與中世紀的不同族裔共同體組成其社會與文化結構，並沿襲至今，而現代的民族與過去的族裔共同體共有祖先的神話、記憶與某些文化要素，竟或還共有同一塊領土與名稱，這些事實可提供我們一個更好的出發點來研究在現代民族的構成中所涉及的文化轉型與重生，以及民族主義在這些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Smith進一步表示，即使族裔特性的要素是“建構”與“再建構”出來的，有時更是純粹“編造”出來的，但族裔文化內涵的“建構”與“再建構”，數百年來甚至千年來，一直未曾中斷，而有些族裔共同體雖然改變了文化特性，歷經多年，其共同體的特色卻依然清晰可辨，這些事實表示，我們忽略這些共同體的存在，且無知於這類共同體對現代民族構成的影響，實為冒險之舉。(Smith 1996 [1992] : 190-193)

Smith的上述評析既準確概括了“現代化”派的基本觀點，肯定其可取之處，又兼取“本源”派觀點，指出“現代化”派的盲點，可謂持平之論。

我們對照Smith的上述評析就可很清楚地看出，何六九是在未求甚解地囫圇吞棗“現代化”派的觀點後，即奉為教條，用以批評民族主義。他在〈鄉鄙〉中攻訐強調歷史文化傳承的民族主義者為「粗魯無文的無知鄉愚」、「思想貧血」等等，都是淪為“現代化”論教條主義後的無知妄語。Gellner在他的名著Nations and Nationalism中批判地繼承了Elie Kedourie對所謂民族乃天然生成的說法的批評，認為傳統民族主義者宣稱民族(nation)有如中了魔法而沈睡多年的睡美人，有待民族主義者這個王子的親吻，以從酣夢中覺醒的說法不足採信，強調民族與民族主義是現代化過程的人為產物。Gellner指稱：

「所謂民族是自然天成，是上帝用來劃分人類種屬的方法，而成為國族之事雖遲延已久，終為政治天命所定，這些說法俱屬虛構。民族主義有時利用先前存在的文化將其轉化為民族，有時加以編造，更經常的是抹除前已存在的文化，這才是實情；這麼做，不論是好是壞，一般說來，也無可避免。」(Gellner 1983 : 48-49)

Gellner 這個反“本源”論的論點，是“現代化”派的代表性觀點。“本源論”與“現代化論”雙方曾多次論辯，Gellner 晚年更於1995年10月與Smith直接就民族是否有其歷史根源展開交鋒。最後在其對民族主義研究的晚年定論之作Nationalism中，他修正了前此的觀點，承認“本源論”也有其可以成立的論據，他說：

「什麼證據可以判定這個爭議呢？如今我們不再停留在直覺看來互不相容的兩種假說裡了，雙方就可獲得的所有證據而言，都同樣站得住腳。」(Gellner 1997: 93)

他強調指出，他有關民族主義的論述，

「不管怎樣，就歐洲來說，大體上（黑體字為原文所有）合乎可得到的證據，但也不是天衣無縫，亦非普遍適用於各地的情況。問題仍在未定之天，有待進一步整理證據或提出論證。……我們的看法是，有些民族真正帶著古已有之的肚臍，有些則是由民族主義的宣傳為本民族捏造了肚臍，有些則全然沒有肚臍。我相信迄今為止最多的是第二種情況，但如有確鑿可靠的研究，我仍願修正我的看法。」(同上：96)

Gellner 確實表現了一位實事求是的嚴謹學者的可敬風範。

相形之下，何六九的愚而好自用就顯得相當粗鄙可笑了。他在〈鄉鄙〉中不加思考地引用Gellner在晚年已經加以修正的觀點，把Gellner針對歐洲民族主義的論述愚昧地奉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教條，拿來濫情攻訐非西方的民族主義。我們前面說過，他誣詆中國有關中華民族的論述「濫情、粗鄙和理路錯亂，無異於乩童的無知迷信和誇張矯做」，正是他自己的寫照，在此又得一證明。

Nairn 有關民族主義的論述

以上我們已批判了何六九主觀唯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無知及盲目吞食西方“現代化”論者的唾餘等種種劣行醜態。但何六九之愚不可及尚不僅止於此。他為了故示高明而引用了一些洋書作為論據以壯聲勢，好像他對民族主義問題與英國社會頗有研究似的。其實，在〈鄉鄙〉中，從標題開始，他壓根兒就沒有搞懂他所引據的那些洋書，有些甚至不是一般簡單的誤解，而是完全顛倒了作者的原意。這只有兩種可能：或者是沒有讀懂，或者是故意曲解，蓄意搞知識詐欺，妄圖瞞天過海以欺世人耳目。以下我們就一一加以揭露，拆穿這個自以為聰明的天下第一等大蠢才的真面目。

何六九〈鄉鄙之歌〉一文的“鄉鄙”之意，據他自云是借用了Tom Nairn的著作

Faces of Nationalism一書第五章The Curse of Rurality之名，他是怎麼理解Tom Nairn這篇文章的意思的呢？他說：

「他們總是對於不知節制的民族狂熱嗤之以鼻。他們之中有人形容這種激情發作是“鄉鄙根性之害”。用句較為通俗的話來形容，他們其實是在譏笑那些夜郎自大的鄉下佬，對於現代政治文明的見識十分有限，沒有能力掌握諸種較具豐富、明確內涵的政治概念來了解當今世界和界定表達自己的需要，只知道玩弄幾個煽情的口號，謀圖在政治上興風作浪。如此說來，對於高音貝民族主義吶喊缺乏胃口，莫非是成熟文明社會裡的常態？」（《左翼》，第20號：13）

Tom Nairn 如果看到他的觀點竟然遭到何六九這樣荒唐的曲解，肯定要張口結舌，甚至怒火中燒。Tom Nairn是個左派，但也是力主擺脫英國的中央集權，要求自主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自1970年代中期，他就認為民族主義問題是現代歷史無可迴避的主要現象，民族主義一方面是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支配，完成獨立與解放的利器，另一方面又造成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並成為法國獨裁者戴高樂與第三世界獨裁政權的護身符，對於民族主義這種善惡兼具的兩面性，馬克斯主義未能從理論上妥加處理，因而造成馬克斯主義重大的歷史性挫敗。（Nairn 1977：329-331）。Nairn指出：

「這樣的民族主義其真義從道德上、政治上、人性上總難說清楚、講明白。因而，用道德的觀點對待民族主義，不論是推崇讚美或痛加譴責都無濟於事。他們只是逮住這頭怪物的這一面或那一面，不願承認這是長在同一個頭上的兩張面孔。但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主義有如古羅馬站在門口的門神Janus，一張臉向前看，另一張則向後看。民族主義也像Janus一樣，站在人類社會邁向現代性的通路口。人類在被迫通過這道窄門時，不得不拼命回頭，盡其可能從過去集聚一切可以找到的力量以通過“發展”的嚴酷考驗。也就是這種情勢有助於我們了解何以所謂“非理性”因素會不能不極其普遍地出現在往現代化發展的過程。」（同上：348-349）

爲了補馬克斯主義在解釋民族主義問題上的不足，Nairn根據歷史唯物論，汲取了Gellner的“不平衡發展”觀、Andre Gunder Frank的依附理論與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從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不平衡發展”的觀點，探討十八世紀後民族主義勃興的成因與現象。Nairn強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落後地區的民族爲了外抗強權，力爭上游以取得經濟發展，遂訴諸歷史傳統，發揚民族主義。因而，民族主義既雄心勃勃地向前發展以完成現代化，又回頭崇拜本民族的

特有傳統，同時具有前瞻與後顧的兩張面孔。至1990年代，又進一步發展他的觀點，結集成書，即1997年出版的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何六九所引用的該書第5章The Curse of Rurality: Limits of Modernisation Theory.是為紀念已故的Gellner而作，稍加增補後，也收在1998年John A. Hall編的The State of the Nation中。全文的主旨在探討族裔民族主義產生的社會經濟根源，從而指出Gellner用現代化觀點解釋民族主義興衰的缺失。Nairn文章起首就舉近來在歐洲的北愛爾蘭、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國的科西嘉與前南斯拉夫等地大量出現的族裔民族主義暴力衝突為例指出，族裔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是小農及附著其上的傳統文化，族裔民族主義本質上即是由農民階級轉化成民族。現代化是一個犧牲農民的殘酷過程，工業化、都市化造成農村經濟破產，大批農民被迫離鄉背井進入陌生而又競爭激烈的都市，淪為無產者，於是在農村與都市都有眾多在工業化過程中充滿挫折與被剝奪感的群眾。一些都市階級特別是知識份子遂動員這些受挫的群眾以期建立民族國家。

Nairn還引用法國學者Gerard de puymege的研究指出，源自法國的“沙文主義”(chauvinism)正是農民(沙文是農民出身的軍人)剛離開農村痛苦地適應都市生活的群眾心裡的深刻反射。而“沙文主義”在初期即是農民如何“被塑造成法國人”的一個方面，在法國的民族神話體系中不斷再生產出農民重視血統與土地(blood and soil)的特質，因而法國人就在意識形態上保留了農民的特性。這樣的觀念還滲透進1789年法國大革命帶來的革命成份中。因而法國公民既懷有人權宣言中的公民權利思想，又有濃厚的族裔觀念，融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於一體。這就是1890年代惡名昭彰的迫害猶太裔軍官Dreyfus以及目前右翼的排外運動之所以在法國發生的意識形態因素。Nairn指出，現代化包含了好幾代農民在農村的過去與都市—工業化的未來之間的搏鬥，是一場生死交關的鬥爭。民族主義就是這場戰鬥的本質要素，絕非只是其副作用。

Nairn對Gellner現代化理論的批判

Nairn據此批評Gellner的現代化理論過於強調機械工業、轉化方言為統一的文字語言、民族主義者編造農村傳統等等現代特性的部分，只注意促成變遷的動機與工具，而忽視了作為這個變遷的“原料素材”，即經歷現代化的農民群眾。Nairn認為，馬克斯主義學者Perry Anderson等人對Gellner最有力的批判就是他過於理性主義(over-rationalism)。Anderson批評Gellner的理論過於唯物主義，忽視了現代民族主義不容略過不談的集體意識，民族主義的主要作用不在於Gellner所云的促

進工業化，而是實現了民族的認同。Gellner在論述民族主義時未能探察民族主義魅力，遂使他錯失了20世紀最爲重要的問題（Anderson 1996：425）。Nairn深然Anderson之言，但可惜Anderson沒能指出民族主義的魅力的根源所在。Nairn認爲目前最可成立的說法應是，其根源在於大部分形式的族裔民族主義與“鄉村”存在狀態的連結上，Nairn批評說，Gellner的理性主義使他總是視“傳統”爲民族主義者偽造出來的，但在一些重要的實例中，“傳統”確實是浸泡在並非總是虛構的真正傳統的血液中。

Nairn以上述觀點來解釋現代民族主義的勃興與族裔衝突的成因。在他的文章中舉了柬埔寨的波帕（Pot pat）政權與法、德等國的民族主義爲例子，來說明在現代化過程中，民族主義者以受損害的農民階級爲基礎，鼓吹民族主義，力圖在現代化的殘酷競爭中求勝圖存。而在極端的情況下，就出現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與柬埔寨的農民烏托邦社會主義，造成災難深重的後果。Nairn的結論是，由Gellner開創的民族主義的現代化理論太過強調隨工業化而來的所有文化因素，對現代性的無往不利也太過自信，Gellner承襲了啓蒙運動的樂觀精神，認爲民族主義促使現代化完成後，便會功成身退，失去影響力，結果低估了在現代化過程出現的城鄉對立運動中，受損害的鄉村所作的長期反撲。

何六九對 Nairn 觀點的曲解

我們把上述Nairn文章的要旨拿來與何六九的曲解相互對照，就可看出何六九這個大蠢材根本沒有讀懂Nairn的文章，他連Nairn思想的邊都沒沾上。他的思考能力低劣到連Nairn文章的標題The Curse of Rurality:Limits of Modernisation Theory.都看不懂。其實光從副標題就可知道此文旨在批評Gellner的現代化理論，然而，何六九在沒有能力理解全文要旨之下，只憑他反民族主義的主觀情緒就把它錯譯成“鄉鄙根性之害”，通篇拿“鄉鄙”一詞濫情詈罵他所謂的“血緣論漢民族主義”者。Nairn用“rurality”一詞來指傳統價值觀所從出的鄉村特性，在Nairn的用法裡“tradition”與“rurality”是同義詞。我們在上面已概述了Nairn文章的要旨，Nairn是要指出產生族裔民族主義及族裔衝突的社會經濟根源，在於在現代化過程受創的農民階級對現代化的反應，通篇沒有何六九所謂「譏笑那些夜郎自大的鄉下佬，對於現代政治文明的見識十分有限，沒有能力掌握諸種較具豐富、明確內涵的政治概念來了解當今世界和界定表達自己的需要，只知道玩弄幾個煽情的口號，謀圖在政治上興風作浪」的意思。Nairn這位左翼的民族主義者一篇有深度的理論文章竟被何六九這個極爲弱智低能的假理性主義者隨意糟蹋，拿來當作謾罵民族主義者的工具。這種丟人丟到家的笑話，真是「此事只應台灣有，人間難得幾回聞」了。

何六九對英國的諛頌

本來一個人如果資質魯鈍也不見得就是壞事，所謂“勤能補拙”，古往今來不少在學問、專功上卓著聲名者都不是稟性聰穎過人，但卻能孜孜矻矻、勤勤懇懇地治學做事，真積力久之後，終有所成。最糟糕的是，自以為聰明，好行小慧，不肯踏實將事，以為裝腔作勢，耍點詐偽伎倆，就能唬弄人，以逞所圖。何六九就是道道地地的這種蠢貨。他理論文章讀不懂也就罷了，更惡劣的是，他還搞騙術，顛倒原作者之意，來附會自己的偏見，藉此達到唬騙世人的目的。

何六九的〈鄉鄙〉一開頭就對曾是十九世紀世界霸權的英國帝國主義大唱頌歌，把英國樹立為不再高唱不列顛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國家的典範，對之大加頂禮膜拜，胡說什麼英國人「對於民族情懷索然無味」、「不列顛民族情操」、「在英國本土已經缺乏市場」。然後以英國的民主、理性、文明為標準，大肆譴責、嘲諷民族主義者與提倡愛國、主張統一者是沒有見過世面、「孤陋寡聞」、「不知現代政治文明和公民意識為何物的鄉鄙」。我們先引幾段〈鄉鄙〉的文字，再來戳穿何六九對英國的歌頌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

「很多近代政治評論家和學者不約而同地觀察到，除了在大戰期間而外，英國人在過去近百年來卻以相當冷漠的態度對待自己的不列顛民族主義²。倘若今天有人在這個國度裡登上講壇高談闊論不列顛民族概念或者愛國主義，肯定會引來聽眾們不耐地哈欠連連。如果執意要大張旗鼓提出民族復興或者愛國統一之類的主張，來當做競選綱領，恐怕要遭人笑話，再不然就要被社會一般當做是喜歡鬧事的狹隘種族主義者看待。

.....

有趣的是，在英國本土早已經缺乏市場的不列顛民族情操，卻在許多北愛爾蘭新教徒當中越發炒熱起來。長久以來，他們緬懷新教徒過去曾經征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光榮歷史，每年定期用大遊行方式向當地天主教徒示威和露骨表達自己的優越感。他們強調新教的宗教認同，要求人們尊重愛爾蘭曾經長期臣屬英王陛下的歷史傳統，誓與英倫祖國永不分離。他們甚至於不惜一再訴諸血腥暴力，可惜無法喚起英國本土的新教徒“同胞”們對於這個“民族大義”的關切。英國許多研究調查一再顯示，大多數的英國人根本不在乎北愛爾蘭領土主權歸屬何方；半數以上甚至認為，北愛爾蘭應該從英國分離出去。北愛爾蘭新教徒很是不滿。因為英倫祖國的“同胞”寧願為遙遠偏僻的福克蘭小島一戰，對於近在眼前的北愛爾蘭反而毫不眷戀。可是在英國公民眼中，這些無比“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大概算是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吧。」（《左翼》第20號：12-13）

「以專治東歐民族主義問題而聞名英國史學家H.S.Watson甚至於認為，不列顛民族主義是不存在的。關於這個現象的起因，有眾多解釋。不過大多相信，英國人的民族認同與他們的大憲章、國會、法治、公民權利等等的政治傳統和體制機構密切聯繫在一起，幾乎完全沒有血緣論成分。」(同上：25，註2)

世界主義是建立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

這幾段文字有關英國與北愛爾蘭的材料，主要取自英國學者Michael Ignatieff的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一書。然而，何六九的主觀論斷卻與原作者的看法完全相背。該書是作者爲了探討冷戰結束後何以民族主義再度興起，而走訪前南斯拉夫、德國、烏克蘭、加拿大的魁北克、庫德族人聚居區與北愛爾蘭六個地區，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Ignatieff在書中自述，他本來自詡爲無國界、超越民族藩籬的世界主義者，但在經過實際考察各地的民族主義問題後，他有了如下的反省：

「全世界至少有一打融多種族裔於一爐的大都市，僑居、流亡、移民的各類人等都在此落腳。居住在這些大都市的專業人士，視超越民族界限的心態為理所當然。……在帝國瓦解後的全球主義時代裡，只有很幸運地住在富裕的西方的世界主義者才得有超越民族主義的意識。全球主義為許多衰弱得無力建立自己不受侵犯的國家的弱小民族帶來混亂與暴力……相信世界主義的優點的人無不認為發生在波斯尼亞 (Bosnia) 的族裔衝突必須打住。但極為明顯的是，世界主義的信念只是那些其民族國家的生存已獲確保的人才能擁有的特權。雖然我們已進入帝國瓦解的年代，但尚未走向超越民族主義的時代，而我也看不出我們要怎麼做才能超越。倫敦、洛杉磯、紐約這些大都市之得以廣納四海、包容寰宇人士，關鍵在於英、美民族國家有能力強制維持其國家秩序。一旦秩序崩潰，如1992年發生的洛杉磯暴動，那麼，文明、廣包多族裔的城市就像任何東歐國家，同樣極有可能暴發族裔戰爭，這是顯而易見的。因而，就此而言，像我這樣的世界主義者並沒有超越國族。最終來說，世界主義與超越民族主義的精神總是依賴民族國家為其公民確保安全與文明行為的能力。僅就此意義而言，我是個公民民族主義者，即相信民族國家有存在的必要，也相信公民有責任保衛民族國家，使民族國家有能力確保我們要成為世界主義者所需要的安全與權利。至少，站在世界主義的立場，對為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戰鬥的人民所表現的殘暴行為，加以鄙視與感到震驚，都是錯誤的。畢竟，他們只是在為世界主義者長期視為理所當然的特權而戰鬥。」(Ignatieff 1994: 11-14)

Ignatieff 在該書導言的結尾甚至語帶諷刺地說：

「如果愛國主義如約翰遜（Samuel Johnson）所云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那麼超越民族主義論（Post-nationalism）及隨之而來的對他人民族主義感情的鄙視，也同樣可以說是世界主義者最後的避難所了。」（同上：16）

從Ignatieff上述的基本觀點，我們就可知道，Ignatieff是個懷有世界主義理想，但比較清醒的公民民族主義者。他雖然不贊成族裔民族主義，但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了解族裔民族主義與族裔衝突之所以產生的複雜因素，並不像何六九那麼幼稚地對之任意鄙視，施加濫情的醜詆。

何六九對 Ignatieff 的著作斷章取義

Ignatieff不但清醒地認知到世界主義是只有在確立民族國家的自主權後才能期求的理想，他對英國不列顛民族主義的本質也有極透徹的認識。在何六九所引據的該書6章，Ignatieff通過探討北愛爾蘭與英國的關係，對北愛爾蘭問題的根源與英國的民族主義做了深刻的剖析。然而，何六九非常卑鄙地完全抹去了作者在全章中的主要論旨，只斷章取義，拿來做為諛頌英國已不高談愛國主義、「對於民族情懷索然無味」的根據。我們在前面摘引過何六九的這段文字：「有趣的是，在英國本土早已經缺乏市場的不列顛民族情操，卻在許多北愛爾蘭新教徒當中越發炒熱起來。……他們甚至於不惜一再訴諸血腥暴力，可惜無法喚起英國本土的新教徒“同胞”們對於這個“民族大義”的關切。英國許多調查一再顯示，大多數的英國人根本不在乎北愛爾蘭領土主權歸屬何方；半數以上甚至認為，北愛爾蘭應該從英國分離出去。北愛爾蘭新教徒很是不滿。因為英倫祖國的“同胞”寧願為遙遠偏僻的福克蘭小島一戰，對於近在眼前的北愛爾蘭反而毫不眷戀。可是在英國公民眼中，這些無比“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大概算是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吧。」我們來對照一下Ignatieff的原文看看何六九搞了什麼鬼花樣：

「效忠英國的北愛爾蘭人注意到，當阿根廷入侵“不列顛擁有主權的領土”福克蘭群島時，英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傾瀉而出（黑體為筆者所加），但對阿爾斯特（Ulster）（按：北愛的一省，為新教徒聚居地）卻漠不關心，這種難以理解的反差，令忠貞的新教徒痛心怨憤。英國本土的不列顛人只要可能就願意放棄阿爾斯特。多次的民意測驗中大多數人支持不列顛放棄北愛爾蘭的主權或者與愛爾蘭共享對北愛的主權。」（Ignatieff 1994：218）

請看！Ignatieff在這裡分明提到了英國人對福克蘭群島事件「民族主義感情傾瀉而出」（the outpouring of nationalist feeling），可是在何六九的文章裡卻

不見蹤跡，反而出現了「不列顛民族情操」「在英國本土早已經缺乏市場」的主觀臆斷。關於不列顛民族主義的問題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談。且先說英國人為什麼對北愛爾蘭興趣缺缺，是不是如何六九所云「在英國公民眼中，這些無比“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大概算是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吧」？

Ignatieff在概述了不列顛與愛爾蘭在政治與宗教信仰上的對抗歷史後，對英國人漠視北愛爾蘭的原因提出了解釋：

「從1688年到至少1912年，阿爾斯特的新教徒相信，〔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國王〔被信仰新教的威廉三世〕挫敗，保證了新教徒在愛爾蘭的優勢地位，並確立了不列顛的君主立憲政體，這段歷史是他們與不列顛國家共有的奠基神話。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愛爾蘭最終成為不列顛民族國家建立中的重大失敗。做為不列顛認同核心的新教信仰使英國無法把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完全同化進聯合王國。……不列顛人之無法視阿爾斯特為不列顛不可缺少的部分，與不列顛人認識到他們的國族建造在愛爾蘭碰到最重大的失敗有極大的關係。北愛爾蘭長期的暴力衝突使不列顛人的心理更加確信，阿爾斯特畢竟是矛盾而難解的異己，即愛爾蘭。」（同上：223）

在Ignatieff的分析裡，完全沒有何六九所謂英國人視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為「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這種全憑主觀臆斷而來的胡說八道。

不列顛人可列入具有最強烈民族主義的民族之林

對於何六九所頌揚的「除大戰期間而外，英國人在過去近百年都以相當冷漠的態度對待自己的不列顛民族主義。倘若今天有人在這個國度裡登上講壇高談闊論不列顛民族概念或者愛國主義，肯定會引來聽眾們不耐地哈欠連連。」這到底是不是英國的實情？我們來看看Ignatieff的觀察：

「1978年我從加拿大來到英國。我很喜歡不列顛處在一般人相信的衰落中。它比較沒有那些自視為世界中心的民族的偏狹心態。它沒有美國那麼自以為重要，沒有西德那麼自滿，沒有法國那麼自我封閉。它處在困境中，這使它成了有趣的居住地。……但等住久一點，我就發現在不列顛能容下多文化、多種族與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的空間，遠比我原先認為的要狹窄得多。主張包容多文化、多種族與世界主義的人和依然只從英國本身著眼，不願歐洲入侵，確保不列顛的君主政體與議會主權的人，雙方的觀點仍鏖戰不休，未決勝負。這是為不列顛在歐洲的地位而爭執3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只有傻瓜才會相信歷史是站在世界主義者這邊。」

不列顛對歐洲的深閉固拒令我懷疑，不列顛人自以為已超越歐洲大陸人低下的民族主義情緒，我過去其實是受了他們的欺騙。這只不過是不列顛人慣有的虛偽矯飾作風的另一種表現。實際上，不列顛人可列入所有民族中具有最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民族之林。實則現代民族主義就是英國人的一項發明。」(同上：221)

何六九的知識詐欺

Ignatieff還指出，北愛爾蘭新教徒的族裔民族主義其實是折射出不列顛人真實形象的一面鏡子：

「不列顛的民族意識總體上仍然認為國族是體現在君主而非人民身上。不列顛人自視為君主的臣民 (subjects) 而非公民 (citizens)。一般人民對法治、議會主權、國家穩定這些歷史成就的信守也傾向於表現在把君主政體幼稚地理想化上。可以這麼說，由公民組成的國族最終會表現出比由臣民組成的國族更堅決也更勇於捍衛這些成就。……在阿爾斯特愛國派對不列顛特性的崇拜中，不列顛民族主義的族裔與公民的兩種成分開始分離。……同樣的分離也很容易在不列顛發生，事實上也正在發生。像國族與君主這樣的民族認同的象徵一度代表了法治與公民民族國家的外殼；如今已因幻想破滅、不公正與壓迫而淪為純粹是保守反動的象徵。如果一個社會不再教導孩子不列顛的特性是與正義而非族裔有所聯繫，則其象徵符號必將出現在憎恨的招貼上。」(同上：242—243)

以上就是何六九在談英國的民族主義與北愛爾蘭問題時，所曾引用的Ignatieff的書中第六章的主要觀點。Ignatieff揭露了英國人以慣有的虛偽矯飾作風掩蓋其骨子裡濃烈的民族主義，也指出了北愛爾蘭新教徒其實是折射英國本質的一面鏡子。但這些Ignatieff的真正主要觀點完全沒有在何六九筆下出現，何六九只是斷章取義曲解Ignatieff的原意來附會本身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斷。這不是知識詐欺又是什麼？Ignatieff寫的是本深度調查報導的書，沒有深奧難解的理論，而且文字明白流暢，如果何六九連這樣的英文都會因沒有看懂致生曲解，那麼我們就該徹底質疑何六九的英文閱讀能力，因而他引據英文資料而發的議論也就沒有一點是可信的。實際上到底是何種情況，何六九有責任向讀者明白交代。

不列顛的民族沙文主義洶湧澎湃

何六九搞知識詐欺的卑鄙勾當還不只一樁。英國這個帝國主義大盜，過去幾百年中在全世界幹盡了殘酷屠殺、奴隸買賣、販售毒品、掠奪財富、侵佔土地、欺凌弱小民族的罪惡行徑，犯下擢髮難數的滔天罪行，渾身上下，從頭到腳的每一個毛細孔都

沾滿了骯髒的污血，至今雖因帝國瓦解，百病交侵、衰頹不振而爪牙搖搖欲墜，已淪落為二流國家，但不甘國勢中落，猶思逞其餘力，以維凶焰，而不時與其充當新興世界霸主的同源兄弟美國帝國主義狼狽為奸，繼續在東歐與第三世界鬻張肆虐。然而，何六九卻費盡心機，大搞知識詐欺，一意想為這個靈魂污濁不堪、形骸衰朽老醜之至的老牌帝國主義美容整型，妄圖把它偽裝成“文明”、“理性”風度翩翩的濁世佳公子，以欺世人耳目。何六九的這種卑劣動機與手段，除前文已經揭發的之外，以下我們再舉一個例證。

何六九在〈鄉鄙〉中不知羞恥地諛頌英國說：

「長期以來，常有人指謂，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用以掩蓋階級矛盾、欺騙無產階級的思想工具。從過去和當前的許多事例來看，這種說法不能說是沒有根據。然而，在資本主義歷史最為悠久的英格蘭，現在一般(包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反而最不在乎“民族大義”。」(《左翼》第20號：13—14)

何六九這段話還加了一個註腳用以證明他所言不虛：

「在1979年開始的保守黨長期執政期間，民族情操淡薄的英國資產階級制訂和執行了一系列財經措施，以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這激怒了大多數都有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意識的蘇格蘭人，使得蘇格蘭民族主義大為風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不是由於那個集中於英格蘭地區的資產階級無意於宣揚大英愛國主義，蘇格蘭獨立派恐怕早已經超過自治派，成為多數派了。Joyce McMillan, "Scotland's Quiet Nationalism", in Richard Caplan, John Feffer, eds., *Europe's New Nationalism*, 1996.」(同上：25—26)

英國現在是不是如何六九所云「包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反而最不在乎“民族大義”」；英國資產階級是不是「民族情操淡薄」？我們就先看看何六九所引以為據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Joyce McMillan究竟是怎麼說的：

「更糟糕的是，與保守黨對蘇格蘭要求民主自治越來越深的敵意俱來的還有保守黨極度高揚的反動的盎格魯—不列顛民族主義政見—以高亢、孤芳自賞、反歐洲、充斥南英格蘭本位主義觀點的聲調大聲叫嚷。和歐洲許多新興的反動的民族主義一樣，不列顛主流政治中洶湧澎湃的民族沙文主義，大可以把它理解為民族國家日益無力對抗全球市場與貨幣投機的一種反應，也可以看做是民族主義政客為了重申政府組織的重要性而強力促動的結果，他們藉恐懼外來移民、憎惡歐洲聯盟與其他國際機構、日益偏執地看待持異議的“內在敵人”，鼓動虛假的民族政治問題來推動政務。

但蘇格蘭人只能認同那種最自由與最包容異文化的不列顛民族主義型態，他們以越來越深的懷疑，冷冷看著這種帝國瓦解後猶不甘沒落的妄自尊大，也越來越深切地感到，過去不列顛以自由、包容的方式解決多民族國家的共存問題，因而使臣屬的民族還可過上尚稱愜意的日子，現在這種自由多元的政策恐怕已難以維繫。1990年代初期，《格拉斯哥前鋒報》的民意調查發現90%的蘇格蘭青年根本不願自稱是“不列顛人”，而且大部分人認為“不列顛屬性”不如做個“歐洲人”來得重要。

不列顛的政治新風氣、余契爾主義的教條與1980年代“贏者通吃”的政治制度之粗糙與沒有彈性，這些再一次使不僅蘇格蘭人而是不列顛境內的其他人民也同感嫌惡而離心離德。1995年1月，日益壯大的修改八八憲章的不列顛憲政改革運動在倫敦發起了大遊行，參與的不僅是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的改革運動代表，還有黑種不列顛人、流浪漢、殘疾者、公共服務媒體工作者、失業者、醫療工作者、自由派警官、工會人員、選舉改革者與環保運動者，所有的人都抱有同樣的怨氣，感覺受了保守黨16年的一黨統治，自己都遭到邊緣化與排斥。」(McMillan 1996: 78-79)

所有的民族國家都有愛國主義

我們在這裡又再次碰到了「此事只應台灣有，人間難得幾回聞」的咄咄怪事。何六九說現在英國人「最不在乎“民族大義”」、英國資產階級「民族情操淡薄」，可是他引為論據的原作者Joyce McMillan卻在痛斥代表英國資產階級的保守黨執政16年，大倡排外的民族主義，使民族沙文主義在「不列顛主流政治中洶湧澎湃」！何六九完全顛倒了作者的原意，藉此來支持他跪拜過了氣的英國帝國主義的正當性。中國古代有「揮魯陽之戈以返落日」之言，何六九這個不但愚昧而且下流的天下第一等大蠢蛋竟然笨到想揮舞詐騙之術充當魯陽之戈來力挽早已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國聲威！這是一種什麼品質？我們且留給讀者判斷。

何六九在文章中一再提到英國人已不興提倡民族主義乃至愛國主義，還引了他所不知道的18世紀英國文學大家Samuel Johnson (1709-1784)說的：「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避難所」一語來譴責民族主義者，譏笑所謂的“愛國流氓”。且不說在多民族國家不宜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混為一談，我們倒要問一問今天哪一個國家(不論其政體與意識形態為何)的學校(至少是中小學)、媒體、政府不在或直接或間接的培養國民的愛國心？哪一個國家不以國旗、國歌作為國家象徵在潛移默化國民的國家認同？我們這樣提問的目的不在對愛國教育、愛國主義下該或不該的價值判斷，而是要指出在整個世界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行嚴酷的競爭的國際體系時，沒有一個國家會不以愛國主義來凝聚國民的向心力與團結精神，認清這個事實就不會像何六九那麼幼

稚地以爲英國或所謂公民民族主義國家就不提倡愛國主義了。

何六九頭腦不清的嚴重程度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我們在前面引述過，他根據 Ignatieff 的書中材料提到「北愛爾蘭新教徒很是不滿。因爲英倫祖國的“同胞”寧願爲遙遠偏僻的福克蘭小島一戰，對於近在眼前的北愛爾蘭反而毫不眷戀」。這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可是頭腦清楚的人，第一個會想到的是，爲什麼英國舉國上下要爲遠離本土，靠征服、強佔來的微不足道的小群島而戰，它的動機與動力是什麼？如果英國真是“文明”、“理性”、“寬容”，那麼它應早早把搶奪來的屬地雙手奉還原主，並致上深深的悔罪之意，爲什麼還要勞師動眾，置國內失業、困苦的人民於不顧，卻虛靡鉅額國家公帑去展露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呢？然而，何六九完全沒有這種思考。如前所揭露，它既不顧 Ignatieff 在書中對英國的北愛爾蘭政策所做的分析，更沒有想到英國派軍遠征福克蘭群島正是大英帝國愛國主義的徹底表現。一個國家可以很“文明”地、沒有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地放棄原屬本國的領土，卻很不文明，也很不理性地不願歸還強佔來的海外蕞爾屬地，天下寧有是理？又是什麼邏輯？偏偏何六九這個大蠢材就是沒有這個頭腦看出這個不可解的矛盾，妄自下了這樣的斷語「可是在英國公民眼中，這些無比“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大概算是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吧。」

Hobsbawm 對福克蘭事件的分析

既然何六九言必稱英國，而且也很標榜“理性”。那我們就來看看也自許理性而且也是左翼的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 Eric Hobsbawm 是怎麼分析福克蘭事件的吧！

「戰爭爆發與其後的交戰期間，不列顛是什麼情況？且讓我試著扼要綜述。首先發生的是許多人幾乎都有暴怒之感，認爲斯可忍，孰不可忍，非得有所作爲不可。這種情緒遍及所有階層，充斥於民間。所有黨派，不拘是右派或左派，都有同感，就這點而言，這種憤怒是非政治性的。我知道許多參與這場反阿根廷運動的左派，甚至是極左派，與右派人士有同樣的反應。正是這種普遍的憤怒與羞辱之感表現在第一天的國會議事中，要求採取行動的壓力實際上不僅來自余契爾及其政府，而是來自四面八方，既來自保守黨的極右派，也來自自由黨與工黨，只有極少數例外沒有附和。我想，這是一種可以實際感受到的大眾情緒。任何敏感於這種氣氛的人都知道激動的情緒確實在瀰漫，任何沒有察覺到一般民眾的這種感情，而且在這個階段仍不了解這種情緒並非媒體製造出來而是一種真實的激憤與羞辱之感的左翼人士，應該嚴肅地重新考量他們判斷政治的能力。這種情緒可能並不特別可取，但宣稱不存在這種情緒則是非常不符實情的。

這種勃然大怒的感情與福克蘭群島本身無關。我們知道福克蘭群島只不過是裹在好望角大霧中的一塊遠方領土，我們對其既無所知也不在乎。真與此息息相關的是：1945年以來的本國歷史，1960年代晚期英國資本主義加速惡化的危機、特別是1970年代末與1980年代初的經濟蕭條。……因此，阿根廷侵佔不列顛的一小塊領土的消息傳來，許多人氣憤填膺的反應可以用下述的話來表達：“我們是個幾十年來不斷走下坡的國家，外國人越來越比我們富裕、進步，每個人都瞧不起我們，要不就是可憐我們，我們再也不能在足球上打敗阿根廷人或其他人，不列顛的每一件事都出了差錯，誰也不真的知道該怎麼辦，又該如何扭轉頹勢。但這回一撮外國人認為他們大可直驅軍隊攻佔英國領土，而且以為不列顛人已沒有用到對此莫可奈何。得，這是壓垮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必須有所行動了。我們對天發誓，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會真的只是躺在那兒任由他們踐踏。”」（Hobsbawm 1989：52—53）

左翼不能把愛國主義完全讓給右派

英國的右派當然趁機利用英國人民這種不甘帝國沒落的破落戶情結，出兵福克蘭，大肆煽動民族沙文主義，鼓吹愛國主義，加強軍備。Hobsbawm指出：

「這是個極為危險的警訊。今天蔑視他國的極端愛國主義（jingoism）特別強烈，因為它是作為這個國家大多數人（包括許多工人）感到衰落、沮喪與自卑的一種補償。這種感情又因經濟危機而更為強烈。極端的愛國主義從象徵意義上有助於人民感到不列顛並沒有在沈淪，還能夠幹出一番事情，還可以受到重視，而且，如他們所說，還是個“偉大的”不列顛。」（同上：61）

這就是一個理性的英國左翼學者對當時遍及英國上下各階級的極端愛國主義所做的分析，這樣的觀察分析當然與何六九的胡說八道完全背道而馳。但Hobsbawm與何六九更大的差異是，他沒有何六九那樣情緒性地譴責愛國主義、譏嘲所謂的“愛國流氓”。相反，他特別指出：

「左翼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左翼之所以不願妥加處理這個國家的愛國主義問題有多種理由，其中有一種是緣於傾向排斥民族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這個特別的歷史性概念……因而，有種感覺認為，愛國主義在各方面都與階級意識有所衝突（確實也常常有所衝突），還認為，統治與主導階級為他們的目的而動用愛國主義可獲取極大的利益，這也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何以不夠重視愛國主義的問題有一些道理。所以做為一個歷史學家讓我提醒你們，愛國主義不容忽視。英國工人階級長久以來有一個並不總是與富於鬥爭精神的階級意識大不相容的愛國主義傳統。」

Hobsbawm 還進一步指出：

「愛國主義的危險從過去到現在都是明顯的，其所以危險，是因它過去與現在都極容易導向統治階級的極端愛國主義、仇外的民族主義，當然也極易轉為我們今天所見的種族主義。在愛國主義與工人階級的其他情操與想望分離之際，甚至被用來對付工人階級之際，即民族主義可被拿來對抗社會解放時，愛國主義的危險就特別巨大。沒有人太注意英國憲章派工人運動中的極端愛國主義的原因，是因為它結合了極富鬥爭精神的階級意識，並且為其所掩飾。一旦愛國主義與階級意識分離，而這是很容易發生的，其危險就特別明顯。反之，當這兩者攜手並進，不僅會大大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也會大大加強工人階級在改造社會的廣泛聯盟中帶頭領導的能力，甚至使工人有可能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得領導權。……把愛國主義完全讓給右派，是危險的。」（同上：60）

證實了何六九的無知與卑劣

Hobsbawm 從歷史經驗中得出工人的階級意識若與愛國主義結合，將獲得巨大的解放能量，他強調把愛國主義放手交給右派是危險之舉，這恰與何六九大肆攻擊愛國主義成強烈對比。這樣一來，Hobsbawm 卻也就成了何六九所謂的“愛國流氓”了。然而，把 Hobsbawm 對民族主義的深刻研究、對福克蘭事件的深度分析與何六九對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膚淺了解及情緒性謾罵做一對比，誰才理性？誰才有資格稱為左派？我們也請讀者自行判斷。

以上我們逐一批判了何六九對中華民族、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對英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社會的無知與曲解，完成了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逐一揭穿何六九的論述在態度上的不真誠、內容上的錯誤、論證上的邏輯錯亂與知識上的淺陋，證明滿口空話、大話與廢話的何六九，不但不是個馬克斯主義者，他連自由主義者也算不上，只不過是個不自量力，沒有自知之明的蠢才！」，也揭發了他罔顧事實、睜眼說瞎話地為台灣民族主義幫腔助勢，完全扭曲、顛倒他所引據的英文著作作者的原意來支持他跪拜諛頌英國帝國主義的正當性，種種卑劣下流的無恥行徑。我們相信我們的指控雖然嚴厲，但鐵證如山，證據確鑿，無可翻案。何六九竟然想憑這種用極其淺薄的知識、錯亂的論證與卑鄙的欺詐堆砌起來且充滿主觀偏見情緒的論述，來搞所謂“文化大革命”，確實讓人感覺像個沒有見過世面的鄉鄙愚夫，妄想靠賣弄一點明眼人一看即穿的障眼法，滑稽的要弄幾招花拳繡腿就可充當郎中行騙江湖，其無法輕易得逞是理所當然的。

（待續）

☆

註釋

1. Smith 指出，“神話、記憶、價值與符號象徵”四者合一構成“神話—符號象徵”綜合體（“myth-symbol” complex）。這個“神話—符號象徵”綜合體經歷史記錄傳遞，並塑造了個人經驗，集代代相傳、擴展綿延不絕的信念與感情之大成。因而，要找出族裔共同體（ethnie）的特性及其經久不衰的原因，不能求諸地理環境、階級結構乃至軍事與政治關係。換言之，要掌握族裔認同特性就必須探究其神話與符號象徵的形成與內容，了解其歷史記憶與中心價值，亦即其“神話—符號象徵”綜合體，並查知其在族人中散播與傳承給後人的機制。由於神話、符號象徵、記憶與價值是承載在變動極為緩慢的人造器物與活動中，並藉之傳播，故而族裔共同體一經形成，在正常情況下，任它物換星移，總歷久常存，代代不息，甚至可達千百年之久。千姿百態的社會與文化過程都可在其中演出，而不論吉凶禍福也都會影響其休咎安危。西方研究民族主義的“現代化”派學者通常偏重強調民族主義具有促進國家的政治與文化統一、發展經濟與克服社會失序等“工具性”、“功能性”的作用，而忽略了民族國家的族裔根源及“神話”、“記憶”等凝聚人心、維繫民族認同的重要性。Smith 提出“神話—符號象徵”綜合體的概念正是為補正“現代化”理論的缺失。（見 Smith 1986：15—16）

2. 馬克思主義者的 Hobsbawm 具有歷史唯物的觀點毫不足奇，但政治立場反共的保守派 Gellner 卻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自稱其社會學研究的立場是“多型式的唯物論”，明確堅持研究社會事物應一般地先考慮其物質的決定因素。因而，它的民族主義研究常被批評過於強調經濟因素，有經濟歸原論之嫌。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Perry Anderson 還語帶不滿地說：「它的民族主義理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心一意地貫注在經濟功能論上。」（Anderson 1996：425）另一位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 Tom Nairn 也指出了 Gellner 的現代化理論強調了社會經濟力量造成了現代特性。（Nairn 1997：11—12）

緊緊握你的手

<第十九期至第二十一期捐款名錄>

尹章義	2000	施威全	2000	陳昭瑛	5000
左中鋒	666	孫大成	US\$50	無名氏	30000
安公子	5000	陳先生（北京）	3000	楊祖珺	2000
安公子	5000	陳光興	1000	藍進忠	1000
何學政	300	陳明河	500	魏小姐（中和）	1000
林正慧	500				

計：NT\$58966 + US\$50

兩個偶然指派的命運和一個異鄉人

——序藍博洲新書《台灣好女人》

葉芸芸

每一次，自以為走過了一座橋，或跨出一道籬籬；之後不久總會發現，原來自己又越進了另外一道籬籬之內，不知道還有幾座橋？等待在前方。

一、

「偶然」指派給我兩個無法抗違的命運，其一是出生之時間、地點以及民族的屬性，其二是性別。這是生命的原點。

我出生的地點在台北市的大龍洞。台北並不是父母親的故鄉，是他們流浪生涯中途的一站。台北也不是我的故鄉，而是流浪生涯的起點。父母親的故鄉是鹿港，那也是他們的祖先自大陸流浪到台灣的最後一站。我卻不曾在鹿港生活過，那一棟座落在台中市西區的日式房院，曾經醞育生命中最早的二十年的家，才是我的故鄉。

出生於日本領台之後，前半生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父親，早已預見日本的戰敗，以及因而將有的台灣回歸祖國的可能性。湊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幾個月來到這世界的我，遂而有了兩個富於歷史感的名字。父親不僅從老子道德經的〈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找到一個吻合他當時心境的名字，又另給一個充滿期待的乳名“光復”。這出生當時之條件：時間、地點以及民族的屬性，決定了我將存在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的客觀環境；這絕不可能由自己選擇，也沒有能力改變的，我慎重地迎納，恰似對不可知的敬畏。這已經被決定的，是昨日之我，是歷史的我。從不停滯的時光，一分一秒由指縫間消逝，「昨日」卻不一定就隨之而過去。「昨日」極可能呈現在「今日」，乃至於延續到「明日」，以一種相似的或是不完全相似的面貌。

「偶然」拋擲給我的另一個命運是我的性別，既歸屬於女人的族類，便永遠不可能成為男人。女兒、妻子和母親，這三個重疊的角色，乃是永恆的今日之我，是日復一日都不會改變的天職。做為女兒的我，備受保護。但是，父親卻不能相信，他自己有能力能夠保護子女免於恐懼。父親一生歷經政治的殘酷與不義，早年目睹日本軍隊鎮壓台灣人民反抗之殘酷，年長積極參與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運動。回歸祖國的夢，在壯年之時生而復死，深埋心坎的只是：二二八事件與五十年代陰暗的政治經驗，那令他即便寫日記的慾望都要壓抑的記憶。

從小就知道，「長大」的定義其實是等同於離家遠行的。小學的時候，送姐姐出國留學日本；中學的時候，送哥哥出國留學美國。終於，父親將我也託付給一個可能替代他保護我的人，甚至於必須舉債，也要送我們雙雙離開島嶼的故鄉。父親總是戲謔這是「放生」，而他確信這是最好的抉擇。

三十年前離家時，我不曾明白的只是，此去將成異鄉人。

異鄉人的距離感是獨特而充滿挑戰的。故鄉很遠又很近，只在記憶中的一個時間與一個地點。異鄉很近也很遠，生活在其中，又不在其中。我因而變得喜愛旅行？或是確信此生是地球村的居民？從一個陌生的城市小鄉到另一個陌生的城市小鄉，永遠攜帶著一顆好奇心，永遠保持著旁觀者的距離。有時也不免自問，何處是兒家？回到故鄉還能找回歸屬感嗎？被款待成客人並不奇怪，怪異的是自己也越來越習慣，甚且歡喜作客。鄉愁又是什麼？當故鄉與異鄉變成同樣的熟悉，又同樣地生疏。

直到有一天，理解到在美國的非洲人普遍有一種失根的忿怒而震驚不已；忿怒，不僅因為他們的祖先被白人擄掠為奴隸；忿怒，更是因為與自己的文化根源~非洲文化~的斷裂。

幡然明白，為什麼自己總是生活在兩個割裂的世界？

為什麼離開島嶼之後，就一直在尋找島嶼的歷史？卻有很長一段時期，以為導引我走上此路的，只是許多偶然的緣份。著魔似的尋找故鄉的歷史，好似回闖時光的隧道，成為「昨日」的俘虜，而與真實的「今日」的生活全然割裂。這卻也是每一個今天的生活中，僅能擁有的一片自己的天地。現實中，寄居的北美洲，有另一種政治文化體系與歷史背景；現實中，謀生工作在另一個即非文學也非歷史的領域；現實中，有無法逃避的天職~女兒、妻子和母親。

無法停步，獨自遊走在兩個世界的邊緣，在故鄉與異鄉，在昨日與今日；在無法逃避的天職與尚未建立的自我之間。有時好像困在沒有出口的房间；更多時候，似乎是在靠不了岸的大洋中，不知道該憤力往前游去，還是隨波逐流？

二、

身為女性，意味的是挑戰。此生的最大挑戰莫過於抗拒母親一輩的命運。想要與母親不同的那個夢的到來，正是挑戰之端。那是我初為人母，被父親放生，離開島的故鄉之後不久。突然之間，「自由」不再是捉摸不定的名詞，而是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

的確曾經有夢，一個要創造有異於母親之命運的夢，並且努力以赴。然而，與此之同時，卻也清楚地知道，將永遠無法成為自己夢想要成為的那個女人。因為我背負

著與母親相同的歷史，事實上，母親不正是我的歷史？我不知道如何能夠迴避「昨日」的呼喚，在每一個「今日」。

不只一次，母親告訴我，六歲喪父的她，此生最爲感激的乃是有了讀書的機會，那是大多數她的同輩所不曾有的。年輕的母親，不僅是喜愛書畫音樂的窈窕淑女，並且是雄心進取的；在1925那一年的夏天，她曾經與就讀彰化女中的十多位同學，成爲第一批登上新高山(玉山)的台灣女性。十八歲自彰化女中畢業，初任教職，已經是月薪四十元的職業婦女(當時一個20人口之家，一日的菜錢大約一元足夠矣)，可以獨力撫養寡母與幼弟。無論年輕時候的母親，是否也有過「男人與女人將會毫無異議地肯定他們之間的友誼」這樣高貴而大膽的憧憬？她確實曾經擁有過自己的一片天地。結婚之後，優雅而不露痕跡地，她讓自己成爲一個男人背後的女人。只有一次，母親告訴我，父親過世的那年，七十歲的她突然發現，自己對於家之外的世界一無所知，而那才是她一生最爲慌亂的時刻。母親是幸福的，不只是因爲她的愛情和婚姻美滿。也是因爲，她優雅而平靜地接受了~女兒、妻子和母親爲她唯有的天職。

母親的同輩出現過幾個異類，三十年代活躍於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社會運動女將~葉陶~是其中之一。朋友們稱她爲陶兄，她的文學家丈夫楊達被稱爲貴嫂。當她出現在我童年的記憶裡時，正是貴嫂在火燒島的政治牢獄的歲月，她是一棵大樹，獨力承擔著一家生計的中年婦人。與母親的「永恆不變的女性氣質」全然相異，葉陶坦率而不居小節；我總是從她那豪邁又帶著一點戲謔感的笑聲中，得到足夠的鼓勵，自由地去想像她昔日流氓婆的丰采。沒有工作是低下的，賣花賣煙的葉陶和銀行董事長夫人永遠是一樣的尊嚴，大老闆和三輪車夫的買煙錢具有同樣的價值。但是，長期的操勞過度，還是過早地奪去她的生命。我常想像~那個結婚前夕與楊達雙雙被日本警察逮捕的她，那個曾經相偕與楊達在南台灣鄉村池塘裡裸泳的她；當那個試圖要改變世界的勇敢的夢，在生命旅途的最終以「模範母親」收場時，她那不肯認命只做女人的心，可是平靜無波？我好像又看到了，她嘴角那一抹帶著戲謔的微笑。也許，葉陶才是我的鄉愁，在身爲女性的原鄉。

另一位與母親同輩的，是當我在尋找二二八事件的口述歷史時，所採訪的一位見證人。常讓我想起她的，不是有關事件的證言，而是她身爲女人的一段自述。說起年輕時候的自己，端莊的K女士毫不遮掩；因爲婚姻不美滿，而有很嚴重的自卑感。富裕的娘家，礙於體面，無論如何不肯答應讓她離婚。沒有想到，白色恐怖的五十年代，因爲國民黨的追捕，萬不得已而隨中共地下黨員的丈夫逃到大陸，卻改變了她的下半生。在翻天覆地的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備受鍛鍊的她，逐漸建立起對自己的信心，成長獨立，並學有所用成爲大學的日文教授。終於，有勇氣提出離婚的要求，結束一段痛苦的婚姻。

三、

的確，我也曾經懷有無限的憧憬，對那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撐起半邊天的婦女同胞們。然而，期待藉由制度的改變，而使得數千年封建與儒家思想之下的兩性問題，全盤獲得解決，畢竟是過份樂觀的。這個讓女人喪失自我的悠久文化，不也是女人與男人一起營造起來的？我又如何能逃避自己的一份責任？

無論是故鄉或異鄉，昨日或今日，誠然都不是女人的國度。在神聖母性或美麗愛情的名譽之下，自願地被剝削，自我迷失的陷阱從不匱乏。委曲或乖巧地做為男人的背影，或是強悍地與之抗衡，還沒有一條康莊大道。

看著同輩們的努力、掙扎與徘徊，有時不免覺得我們正是那失落的一代，在世紀轉折的十字路口上。雖然無法保持永遠的樂觀，但是可以期待，真正的蛻變將在很遠的未來現身，而我也未必看得到。

前生與來世均不可知，今生則充滿了偶然；有限的生命只存在於一段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存在於一個特定的集體環境之中。別無他途，我只能從生命的原點出發，做為一個人，因為只做為一個女人是不足夠的，去發現自己，去建立自我。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發現又重新建立。直到有一天，遇見一個我能夠心平氣和接受，並願意與之共生死的 " 自我 " 。

四、

早在八十年代後期，在陳映真先生所主持的人間雜誌，讀到幾篇有關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報告文學；當時對文章的作者藍博洲一無所知的我，內心深處有一股按捺不住的興奮。

多年來，藍博洲先生默默地尋找，獨自探索那黑暗禁默的白色恐怖年代；在他勤勞地耕耘下，這一段長年被湮滅的民眾史，彷彿嚴冬過後，方甦醒過來的廢園，竟而新苗綠芽逐漸地茂盛起來。

在這世紀之初，看到藍博洲的新著《台灣好女人》即將出版，最是難得的喜悅。透過藍博洲的筆端，我更為清楚地認識自己的「昨日」，現代史中的台灣女性，也才有一個較為完整的面貌。在最為黑暗的時代，她們從不曾缺席過，她們也不僅僅是悲劇的男性英雄的背景；她們勇敢有夢，並且堅定不移地擔當著歷史傳承的責任。

我不僅感謝藍博洲寫這本書的用心，也感謝他催促我寫成這篇文章。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

——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四〉

黃志龍

三、黨的國家化

(1) 一言堂的黨

革命前，布爾什維克與西歐的勞工運動有密切的聯繫，是隸屬於第二國際的自發性組織，因此布爾什維克把自己定位為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由下而上從事勞工運動的自發性結社。雖然，列寧在其〈黨論〉中為布爾什維克添加了異質性要素，但並未否定黨的市民社會性質，反而是以這種性質作為其黨建理論的前提。

內戰結束後，雖然「一黨統治」已經變成是既成事實，但是黨仍然努力地想維持其市民社會性質。誠如Deutscher所說：「雖然已經進入一黨統治的時期，布爾什維克仍然極力地想維持其原有的，有紀律但也有自由的戰鬥性馬克斯主義者的聯合體」。全黨的意見仍然依照以往的習慣，是透過廣泛的交換意見，公開進行理論上、政治上的討論來形成。也就是說，布爾什維克雖然迫於形勢在內戰後採行「一黨統治」，但在黨內的組織生活仍然堅持「保留少數意見的權利、表達意見的自由、地方自主、資訊公開」等等組織原則——這些就是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前身）在1905年所通過「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democratic centralism）的基本內容。

整個二〇年代，布爾什維克花了不少力氣試圖將「黨的固有性格」和「一黨統治」統一起來，但卻以失敗告終——就結果而言，一黨統治的固定化不僅使黨失去其社會性質，也使其變質為國家權力的中樞。這種變質過程可稱之為黨的「一言堂化」，發展到極致就是「一言堂主義」。

(a) 組織、紀律和民主集中制

組織作為一種「人的集合體」，如果沒有維持其統一性就無法發揮機能，而維持著這種統一性的共通「行為準則體系」就稱之為「紀律」（discipline）。組織的性

質決定了紀律的性質並保證其運行。例如，在村社共同體等傳統集團中，「習慣」就是紀律，是藉由傳統的制約力來保證其執行；由專制君主或獨裁者統治的集團，君主或獨裁者的意志就是束縛集團的根本紀律。在政黨，由於其組織「性質」的特殊性從而擁有獨特的紀律。蘇聯共產黨在「一言堂主義」起支配性作用之前，是以「民主的中央集權主義」，也就是「民主集中制」作為黨的紀律。民主集中制是1905年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的兩個主要派系：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都同意的基本組織原則。在1905年革命高潮的背景下，列寧撤回了他發表於1902年的「黨論」中的威權主義要素，轉而支持組織大眾政黨和擴大黨內民主的組織路線。在此之前，他認為這種組織原則只有在西歐民主主義之下才可能實現。

民主主義和中央集權主義是兩個大異其趣的組織原理。「民主集中制」以「從下而上的民主程序」做為不可或缺的前提，在黨的權威和意見的形成過程中，積極地將這兩個互相對立的要素吸納成為一個組織原則。換言之，黨的意志的統一，是以組織成員見解的多樣性為前提，而且在制度上還必須保證組織成員表達各種意見的自由，保證資訊的公開以及各級黨組織的自治等等。黨的決議是經由組織成員廣泛的意見交換後，由下而上的做成階段性的結論。民主集中制認為唯有經過這個民主的過程，使成員增強其參與的意志，從而維持組織活力和機動性時，強調組織成員必須嚴格服從黨的決定和權威的中央集權主義才能夠有效的運行。同時，這種「由上而下」的權威還必須在下次決定組織意見時，再次以「由下而上」的過程來檢驗。如此，「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反覆循環辯證的過程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精神。

(b) 保留少數意見的權利

要保證「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過程繼續不斷的循環，最重要的條件是「保留少數意見」的權利。全黨的意見一旦形成，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者當然有服從的義務，但是這種義務只限於「行動」的層次，絕不包括必須撤回自己的意見。少數者有權保留自己意見，並且擁有在下次會議（如黨大會）中爭取成為全體意見的自由。假如不保證這種權利，從下而上的循環過程就不可能存在。所以結成「派系」（fraction）的自由就被認為是保證這種權利的重要制度。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在於區別「統一性」（unity）和「一致性」（comformity），認為「統一」（或統合）是透過多樣性才能實現，多樣性和各種不同意見之間的紛爭是有利於組織的健全化和進步。因此，在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中，並不存在著要求組織成員「自我批判」，以撤回自己意見並贊成全體意見來能證明其對組織忠誠的準則。

「一言堂主義」，首先排除了做為民主集中制不可或缺的前提的「多樣性」，也就是排除了差異性的統一，是消滅和吸收差異的組織原理。這種組織原理縱使不公然否

認「從下而上」的民主程序，也會使其「形式化」。因此在「一言堂主義」之下，不得不使用「交換見解」以外的手段來取得統一，也就是當個別成員意見與全體意見相左時，則要求該成員撤回其本人的見解（自我批判）、或當他拒絕撤回時則將其排除於組織之外。這就是說，在「一言堂主義」之下，意志的統一是依靠成員對「絕對權威」，具體的來說，就是對黨組織中最高位階的個人或集團的無條件依順來達成的。

由於這種組織是由「從上而下」的嚴格的位階秩序所構成，強調無條件服從「由黨的權威所決定的全體意見」。因此，以成員見解的多樣性或各黨組織的自治為前提的「由下而上」的民主過程，一直不是統合的必要條件，反而被視為是不利於「不可能犯錯誤」的最高權威，是阻礙統一的絆腳石。所以這種「一言堂主義」必然會導致合議制代表機關的無力化、形式化（因為合議制代表機關是交換各種不同意見的場合），並使執行機關的權力無限膨脹。

（c）一黨統治和一言堂化

考察迄至三〇年代為止的蘇聯政治史，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從「民主集中制」走向「一言堂主義」的變化軌跡。當然，助長蘇聯共產黨「一言堂主義化」的因素有很多，但就二〇年代的歷史而言，「一黨統治」的固定化和黨的大眾政黨化，應該是最重要的兩個因素。在這兩個因素的相乘作用下，蘇聯共產黨非常迅速的完成了「一言堂主義化」。

首先，在多黨制的情況下，一旦與自己所屬政黨有了不同的見解，政治家可以選擇投靠其他與其立場一致的政黨，或另組新黨來從事合法的政治活動。但在「一黨統治」的情況下，這些人除了殘留在這個與自己立場相左的政黨之外，沒有其他可以繼續其合法政治活動的場域。因此，在「一黨統治」的條件下，黨不得不讓那些異質份子留在黨內，從而黨就成為表現各種不同利益或要求的場所。假如黨的目的和黨的組成份子之間沒有一定程度的均質性，統合組織意志的民主機制就會運轉失靈而無法維持。所以，在「一黨統治」的情況下，就不得不依靠不同於民主程序的紀律和組織原理來統一全黨的意志。「一言堂化」就是在一黨統治之下，取代民主集中制來因應新的組織狀況的統合原理。

其次，由菁英政黨出發的列寧式革命政黨，自從成為執政黨之後，逐步的走上「大眾政黨」的道路。1917年4月蘇聯共產黨的黨員人數大約為4萬人，革命後黨員人數急增，到1923年初時已有黨員48萬5千人，而1926年更迅速的突破100萬黨員。大眾政黨化的現象使黨內民主主義和組織統合陷入兩難的局面，創造了組織走向官僚化或寡頭化的條件。就蘇共黨史而言，在內戰後面臨著內外危機情況下，黨在1921年的大會上一致通過的「派系廢止令」，就是黨走上一言堂化的關鍵性分歧點。

「派系」就是，有共同見解的黨員們，為使其共同見解能夠成為黨的全體意見，從而組織起來進行各種宣傳活動所形成的集團。列寧曾經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也就是保障所有少數派和忠誠反對派的權利、保障各級黨組織的自治權、所有黨的職務必須經由選舉產生、報告義務、定期性交替……」，「少數者擁有批評的權利，以及為了在下次大會中決定問題而進行『煽動』的權利，但是在政治行動上必須服從多數者」。因此，容許結成派系是保證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從也就是保證「從下而上」的民主主義統合的重要制度。

這一點，可以從革命後的黨內鬥爭這個事實得到證明。黨在革命後仍然繼續肯定黨員有結成派系並進行活動的權利，列寧本人也在「工會論爭」中發表過「原則上結成派系的自由是當然的權利」的言論。但是，一旦這個論爭發展到足以引起黨的嚴重分裂，導致統一體的機能無法推行，或者是發生像1921年2月的“喀琅施塔德”海軍基地叛亂那樣的政治經濟危機時，列寧便下定決心要廢止保障派性活動的權利。該提案在1921年的黨大會中獲得支持，一致決議禁止派性活動並下令解散派系。

這個「派系廢止令」是為了解決當時所面臨的危機而形成的臨時性決議。為了解決這個危機，幾乎所有的幹部都贊成禁止派系，但這個決議並沒有對其效力的適用期限做出規定，因此日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黨內產生新的爭議。站在黨的執行機關的立場（如總書記史達林），當然希望能夠永久禁止派系的存在。因此主流派（史達林等黨機關的幹部一直都屬於主流派）一直援用禁止派系的決議以便封殺「反主流派」的活動，而反對派則從黨內民主主義的立場要求廢除該項禁令。因此，該項禁令在三年後的黨大會中仍然沒有列入黨章——也就是說，在這段期間，黨內的意見還沒有成熟到可以將禁止派系制度化的程度。事實上，整個二〇年代都存在著強而有力的派系（反對派也指控史達林派本身就是一個派系），並展開黨內鬥爭，而史達林等主流派也不得不在言論的層次上進行對抗。正式將禁止派系條款列入黨章，是在史達林完全掌握黨機器的三〇年代（1934年的第17屆大會）。所以，托洛斯基後來所說的：「批評的自由和理論的鬥爭是黨內民主主義不可否定的事實。布爾什維克無法容忍派系的教義，只是衰退期的神話而已」絕非是無的放矢。

（d）黨內批評的自由

禁止派系的決議雖然嚴重地限制了實現黨員權利的手段，但並沒有否定黨員保持少數意見的權利，以及以此作為前提的「從上而下」形成黨意的民主過程。因此，不能夠單純的將黨的「一言堂主義化」歸咎於禁止派系的決議。例如，在該屆大會中，為了再次確定「黨中央的決定必須迅速、正確地執行。同時在有關黨生活的問題中，所有有爭論的問題，在黨尚未做決定之前，完全可以自由地在黨內做討論」的規定，在有關黨的建設的決議中特別記載了：「黨內批評的完全自由」。黨章中雖然規定：

「黨員不服從黨的決定時，可以採取包括開除黨籍在內的制裁」，但在當時並沒有要求持反對意見的黨員必須放棄個人意見，或要求他們進行自我批判，承認自己的錯誤。黨所要求的只是在「行動」層次的服從而已。所以，禁止派系的決議絕非是否定「從下而上」的民主過程，黨也不是在禁止派系後便轉變為「一言堂主義」。

雖然黨的領導階層在做出決議時，主觀上並無將黨的組織原則轉變為「一言堂主義」的意圖，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從歷史發展的結果看來，「禁止派系」的決議最後的確成為黨轉變為「一言堂主義」的重要佈置。因為：

〈I〉雖然，派系的禁止並沒有剝奪黨員批評黨權力的權利，但由於禁止或嚴重限制黨員在黨內形成小團體將其不同意見訴諸於黨內輿論的活動，因此縮減黨員對抗黨權力的對抗力。

〈II〉對黨權力的批評究竟是派系活動，或黨所容許自由的言論活動，是難於判定的微妙問題。假如有獨立於黨執行機關的監察委員會來判定時，也許可以防止不利於黨員的裁判。但因應於這種需要而設立的監察委員會後來卻喪失其獨立性，淪為執行機關的隸屬單位。因此，其判定易於傾向執行機關的意向，也就是盡量將言論自由的容許範圍狹窄化。

〈III〉該屆黨大會的第七項決議（當時屬於秘密條款）規定：中央委員會可以罷免、開除黨大會所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此決議削弱了代表機關的權力，為黨的執行機關的中央集權化開路。

由於上述這些因素的作用，也由於「禁止派系」的決議，更由於黨從菁英政黨轉變為大眾政黨，為黨組織的官僚化提供條件，黨組織的一言堂化才得以迅速進行。正如E.H.Carr說，黨的一言堂化並不是由任何人有意識地計畫的過程；也不是由任何人一貫反對的過程。有些人往往把黨的一言堂化和史達林連結在一起。沒錯，史達林是黨的一言堂化的最大受益人，但如果說一言堂化是由他個人意志所推動，也是不符事實。在二〇年代，由於新經濟政策的成功，使社會實現了經濟和政治的安定；構成社會的兩大階級（工人和農民）之間也獲得和諧的關係。這種社會關係的安定化同時也緩和了包括「代行主義」在內的威權主義要素，阻止了黨的一言堂化趨向。事實上，二〇年代是「大膽的、知性和藝術性實驗的時代」，是實驗「無數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和藝術樣式的時代」，因此在本質上不同於三〇年代以後的官僚主義一致性。在蘇聯70年歷史中，二〇年代是在藝術、社會科學、歷史等領域中最豐收的時代。因此，整個二〇年代一言堂化的趨勢雖然很強，但阻止他的力量也不可忽視。這種阻止的力量使布爾什維克固有的政治文化繼續存在。真正造成黨走向「一言堂化」的關鍵性轉換，是以「從上而來的革命」做為媒介，這是包括史達林在內的任何政治菁英都沒有預料到的戲劇性變化。（待續）

編輯報告

熱鬧哄哄的經發會終於在八月下旬結束了，爲了挽救民進黨執政以來出現的經濟危機，台灣的大資本家與朝野政黨終於攜手同坐一室，共商應付之道，並且在會後達到了三百二十二項的「共識」。但是其中許多「共識」事實上是以犧牲台灣勞動者的利益爲代價的，劉鳴生〈經發會共識，階級矛盾擴大的開始〉，直接質疑這種違反資本主義民主體制的經發會正當性何在，他並預言這將是台灣階級矛盾擴大的開始。

在官資聯手大幅將勞動條件改惡之際，來自工運方面的抗爭力量卻是如此薄弱，何學政〈紙上工運？傳媒式工運？〉，對於當前台灣工運所面臨到的一些困難與瓶頸有非常深刻的檢討，尤其批評目前台灣工運過於偏重媒體效應，忽視組織紮根工作之落實，值得所有關心台灣工運的朋友深思。

除了對現況進行檢討外，我們更應該追溯台灣工運與左翼運動早期發展的歷史過程，林書揚〈人民左翼從第一期到第二期的島外接續部分〉，即是對於台灣人民左翼運動早期與島外的互動所作的完整介紹。

在有關民族問題的論辯上，張懷思〈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中）〉，除了反駁何六九將中華民族主義等同於漢族血緣主義的論述外，並舉証批評何六九在引述西方左翼學者詮釋民族問題時出現的錯誤，最後作者並強調「左翼不能把愛國主義完全讓給右派」。

葉芸芸〈兩個偶然指派的命運和一個異鄉人〉，是爲左翼作家藍博洲新書《台灣好女人》寫的序，該書介紹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期間受到迫害仍堅持理想的五位台灣進步女性的故事，透過這段序言，作者自己回憶個人的成長經歷，也讓我們對這位流浪在異鄉的進步女性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黃志龍〈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四）〉，本期主要是探討黨的國家化問題，分析布爾什維克黨如何成爲一言堂化的一黨統治過程，讀來格外發人深省。

左翼 第二十二號

出版日期：2001年8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二十三號



〈覺醒〉

作者：貝爾南士高尼(秘魯)

九一一事件初探

陸文瑯 / 2

從九二一災後重建看台灣《社區總體營造》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左判 / 5

【爭鳴與求是】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中)

張懷思 / 8

本期稿擠，原連載之【持稿】〈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順延一期

九一一事件初探

陸文瑯

911事件，震驚世界。各種分析評論，汗牛充棟。唯多屬右翼及自由主義論點。本文試以台灣左翼立場，來探討此一重大事件。

一、為「恐怖主義」正言

西方媒體，眾口一致聲討「恐怖主義」。美國政府挾「反恐怖主義」以號令諸侯，為美軍侵略阿害汗輿論及外交上的基礎，恍如當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我們也反對傷及無辜。911造成數千名平民死亡，這些人多是無辜的。

但，我們不同意在片面地譴責「恐怖主義」，而不去更嚴厲地譴責美帝國主義長期以來對阿拉伯人及全世界弱勢民族的壓迫。特別在中東、西亞地區，美帝國主義長期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對阿拉伯人民的欺凌，是造成阿拉伯人民反抗美國的基本原因。弱勢的阿拉伯人民長期在國際政治及媒體上得不到公正的對待。他們被迫採用「恐怖主義」的手段，根本的原因還在於美帝國主義長期打壓阿拉伯人所致的。更該譴責的，是美帝國主義！

有些自由主義者「同情」地表示理解阿拉伯人長期受打壓的痛苦，但又說，「如果不用恐怖主義的手段，將更能得到世人的同情」。這是睜眼說瞎話。半世紀來，美、英等國偏袒以色列侵負阿拉伯人。可是，世人（應當說是這些自由主義份子）、西方媒體群、國際強權等，何曾給阿拉伯人一個公道！

再就「恐怖份子」的最大罪狀：「傷及無辜」來說，有哪一次戰爭沒有傷及無辜！兩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海灣戰爭，等等、等等，每次戰爭傷及的無辜都遠超過911的五、六千人，二戰末，美軍投擲廣島原子彈殺了六萬六千人，三天後又投在長崎殺了三萬九千人，都遠超過911的死亡人數。雖說日本是侵略者，但美國竟然將如此鉅大殺傷力的炸彈投擲在平民居住的大城市，以我們今日對911的責備標準來說，美國是超級的大恐怖份子！（這裡決無為日本侵略者開罪之意。日本侵略中國所傷及

的無辜又更遠超過兩顆原子彈的死亡人數。僅南京大屠殺，日軍對南京無武器的市民更殺了數十萬之眾，是兩顆原子彈死亡人數的數倍！日本軍國主義實為超超級的恐怖主義。）

但是，很少人譴責美軍投擲原子彈的行徑（雖然，我們認為美軍的原子彈轟炸於大城市中，尤其是第二顆，絕對是該受譴責的），主要是因為日本軍國主義是更大的恐怖主義；爲了打敗這個惡魔，不得不傷及無辜。

由此可見，「傷及無辜」不能作譴責的唯一準則。要看是否爲了更崇高的目的。爲達目的，總要付出代價。只是代價不能高過目的。

這種「代價論」是連保守的自由主義者都能接受的準則。但歷來的左翼還是力求避免使用「恐怖主義」的手法，主因「恐怖主義」給予壓迫者合理化其行徑，同時易模糊了反抗者訴求的理念。整體而言，不利於進步事業。

因此，一個真正的左翼不會認同「恐怖主義」。其理由主要不是「傷及無辜」，而是它不利於反對帝國主義。

但是，當「恐怖主義」的事件發生時，左翼也不應該盲從強權對「恐怖主義」的撻伐。這不是批評「恐怖主義」手段不當的時候，這時左翼更該做的，是藉大眾因事件而好奇之際，將受壓迫者被欺凌的實況介紹出來，曝露帝國主義的真面貌。

二、國際反帝力量的復振

不管主流媒體如何污名化911，象徵資本主義權勢的紐約世貿大廈及美國五角大廈受到攻擊事件，整體而言鼓舞了國際反帝運動的士氣。

二次大戰後的反帝運動，在六、七十年代達到高峰。但從八十年代開始，這個一度造成美帝國主義侵越戰爭失敗的國際反帝浪潮都迅速衰弱了。尤其到了1980年代末期，蘇聯東歐的解體，北京的天安門事件等事件的發生，更使反帝運動的氣勢跌到谷底，美帝國主義獨霸世界；帝國主義的基礎－資本主義體系也因此獲得空前的聲勢。全球化的浪潮，挾著自由化、國際化與私有化的內容，便在這樣的聲勢下衝擊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

這股新保守主義氣聲的粗壯，曾使右翼份子歡欣鼓舞，斷言「歷史已經終結」。

不可否認，許多進步力量陷入空前低潮，不少人也染上悲觀、消極的心態。

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全球化的浪潮，特別是透過 WTO 的機制，在造成資本主義繁榮的同時，也惡化了原已十分嚴重的貧富差距。一個新型的反帝運動 - 反 WTO 及 G7 (G8) 運動，迅速開展出來。1999 年的西雅圖十萬人示威，給 WTO 的樂觀推動者帶來心頭的陰影。這個心頭的陰影到了今年初義大利熱諾亞的衝擊，更成爲 G8 國家的夢魘，帝國主義者沒料到，當他們熱衷於推動資本主義全球化之陽，反資本主義也全球化了！

而這股全球的新力量，到了 911 事件，又發展出一種新型的反抗方式。

過去，資本主義全球化孕育了一種怪獸 - 跨國公司。這種怪獸財力雄厚(多數第三世界國家的一年預算都小於一個大型跨國公司的一年開支)，勢力深入許多國家。他們在許多國家賺取鉅額利潤。卻把利潤流往總部所屬國(多數為美國，日本及西歐亦有不少)，使第三世界國家資本積累不易，從而擴大富國與貧國的差距。尤有甚者，跨國公司憑藉雄厚財力及全球性市場網路，不斷擠進或收編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企業，造成失業及其他社會問題，而由於其跨國性，它們承擔的社會責任極少。

「恐怖主義」吸取了跨國公司的這種跨國性。正如跨國公司不屬於多數國家卻在這些國家運個；「恐怖主義」也出沒在許多國家，讓美帝國主義不易一網打盡。

911 的反帝事件，豐富了反帝運動的內容。全球化的時代，帝國主義未必站上風！

進入二十一世紀，反帝運動再度復振！全球化下的大 WTO、反 G8 運動結合了阿拉伯民族高度創新的鬥爭方式，低潮十多年的反帝運動正重新育積力量，蓄勢待發！



從九二一災後重建看台灣《社區總體營造》 對台灣社運的影響

左判

社區團隊與災區

1999年9月21日，台灣中部發生了近百年罕見的大地震，地震之後，除了政府的力量進入災區之外，另外還有一股不容忽視的民間力量，就是台灣所稱的「專業社區工作團隊」。關於這些台灣社區團隊的形成原因，有其背景因素，容後說明，先就災後這些團對進入災區所引發的一些現象談起。

災後大量的民間捐款湧入災區，此時又面臨到總統大選前的曖昧不明，各方勢力都深怕這些資源成為對方陣營的選舉資源，所以都互相抵制對方使用這筆資源。在這個同時，有一些看似公正客觀的小團隊進駐災區。於是這筆資源的大部份，就依循著災後社區再造的各種名目，化為很多筆的小資源伸介給了這些災後進入中部災區的小團隊。

而這些錢的使用上，有絕大部分是用在非實體建設上，這些企畫案大多以心靈重建，社區意識重塑，或打造社區新文化……等為名目，來使用這筆資源，其具體實行的內容有創辦社區報，社區戲劇工作坊，影像工作坊，或是一堆奇怪名目的活動，而直至最近這些活動更是大膽的從災區慢慢的移往都市，在九二一週年之際，當災區有些部落連基本的安置都尚未完成之時，都市中居然把這些捐款拿來舉辦一些追悼性質的音樂會，而這一些活動的舉辦也都和這些所謂的專業社區團對或多或少有一些關連。

或許從字面上無法體會專業社區團隊與災後重建和社會運動到底有什麼利害關係，這裏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災後有些原住民災區在地震後，建築物雖然沒有受到太大的損害，但是所居住的周遭環境卻受到了土石流的威脅，而在政府的災後慰助措施上，以及救災的安置上都沒有把這些有土石流危機的部落列入考慮。這件本來就應該是行政體系要處理解決的事情，而各級單位都視若無睹，這時出現了一種狀況，大部分的社區團隊就開始向民間組織提出企畫案來要資源，往往這些資源不夠作全數的災民安置，這些團隊就美其名為拋磚引玉，蓋個十數間做為樣品，而事實證明，拋出了磚到最後還是引不到玉，並且很明顯的表露出這些團隊的真面目，他們根本就沒有要

解決問題的決心。不然就是完成臨時安置組合屋後，守著組合屋，然後再以災後重建為名，把這群組合屋當搖錢樹，向各個團體遞送企畫案，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活動，而原本應該是以這些災民需求出發來運用的這筆資源，卻反而成為騷擾災民的禍源。（註：這些活動往往無法吸引災民參加，但是辦活動如果參與者太少主辦的單位很難結案，所以這些團隊會以死纏爛打的方式拉居民來參與，另一方面，這些社區團隊，掌握了仲介資源的能力與權力，居民不配合意味著往後引入資源的減少）

而這些所謂的『專業社區團隊』即是在地震前，順應著台灣《社區總體營造》這個潮流而形成的團隊。

社區總體營造的形成背景

在李登輝接掌政權後，提出了所謂的心靈改革，其說法即台灣的很多問題必須從心靈改造做起，為了落實這個概念於是開始了一連串的相關政策，其中就包括了社區總體營造。社區總體營造形成的背景有下列幾項：

1. 政治上的考量——李登輝執政後就積極的想為台灣獨立運動打造適當的環境，為了奠定『大台灣國家主義認同』便運用了社區共同體的概念，並進而提出了《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把台灣大多數在文化界、藝術界、歷史界的人士導入地方的文史的研究上，此時在全省各地紛紛成立了上百個個人文史工作室，其中以台原出版社所出版的書籍為其典型，而其老版林經甫就有明顯的政治意圖——台灣獨立。（註：這和之後台灣的修改教科書有很大的關連）

2. 城市與鄉村差距過大——一開始台灣所操作的社區總體營造，就是抄襲日本自班運動以來的造町經驗，而日本在推行這樣的運動其實就是面臨到都市與鄉村差距過大所帶來的鄉村問題而提出的概念，為了能穩定鄉村的基本生活能力，避免因為鄉村持續的人口流失及傳統產業沒落帶來的社會問題。但是同一套概念移植到台灣來的時候確有相當大的落差，台灣的發包制度與地方派系的力量是陳其南所無法預料與掌握的，在日本雖然造町運動無法從本質上改善農村住民的生活，但是最起碼也改善了農村的環境，而台灣所執行的社區總體營造卻因為惡質的工程發包文化，而淪為地方派系的大餅。（註：陳其南就是把社區種體營造引入台灣的人類學者，當時任文建會副主委，現為台灣清華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宜蘭仰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3. 社會運動力量的緩解與收編——在之前就有提到，社區總體營造在出發點上就是要消弭社會發展上的矛盾，但是在台灣卻產生了與日本不同的現象，台灣從社區

總體營造開始後，逐漸的摸索出一套更加有用的政治手段，當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這個政策之後，有些立委爲了打造清新的文化立委形象，開始吸納一些具有文化背景及社會運動經驗的知識青年進入立法院的體制當中，自此之後社會運動當中的許多文化工作者，開始接受政府部門的資源爲生，逐漸的形成一種依賴關係，而當這種依賴關係形成之後，就很難跳離體制的束縛，再爲社會的正義與理想來奮鬥。

小結

總和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歸納出政府如何利用社區總體營造這個政策：

一、社區總體營造吸納社運菁英——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上，文化界的位置是扮演一種啓蒙與帶動群眾的重要力量，而當時社區總體營造在運作初期，也是打著振興地方傳統文化的旗幟，投入大量的資源給予文化界，而這種供需關係形成後，許多的社會團體或個人，開始把重點工作轉移至此，大家開始來瓜分這塊大餅，而這種型態越轉越大，到最後台灣所有的民間團體，或多或少都接受了這樣的資源取得方式，在這次地震後，甚至還有一些自命爲社運團隊的民間團體開班收費授課，教導新成立的民間團體如何寫企畫案，如何結案…等，如何向政府部門請錢的方式。這樣的方式成爲台灣特有的社會運動團體生存方法，而一些社會運動議題衝撞到政府的主流價值的時候，這些接受政府資源的社會運動團體往往避而不談，形成社會進步的阻礙力量。

二、社會總體營造使得社會運動議題侷限與窄化——因會文建會所主導的社區總體營造就是把範圍侷限在地方性的議題上，所以各團體在操作社區的改造運動上很難把視野放大到台灣整體社會的問題上來審視，加上資源有限，很多的矛盾就發生在地方上各團體資源的爭奪之上，更不用說把矛盾層級提高來看待台灣的社會矛盾，也消耗了台灣社會運動界的內部力量。

三、李登輝利用了社區總體營造來打造台灣當前的主流意識——社區總體營造強調了台灣的地方文化，有些學者利用了提升地方文化自信的論點，開始激發出一些地方民粹主義的信徒。也配合了社區的各個文史工作室所做的地方文史研究，開始逐漸打造大台灣民粹主義的史觀，尤其是在台灣原住民的歷史研究上。

在台灣921地震後，社區總體營造的問題逐漸出現，這些因應社區總體營造而產生的社區工作團隊進入災區，很多問題的癥結逐漸被檢驗出來，而那些自稱爲社會運動工作者的社區團隊也漸漸的面臨到一些行爲上與自己所宣稱的言論不服的窘境。但是這些問題點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在論述上與實踐上的總檢討才有可能逐漸的被澄清。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 左翼統一派 (下)

張懷思

我們在前面已明白表示過：

「由於何六九沒有一點坦蕩的君子之風，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們也不準備待他以君子，與之商榷決疑，而是毫不留情地徹底揭露他裝神弄鬼、形左實右的反動本質，戳穿他除了會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說一些空話、大話之外，根本是個不學無識、思想錯亂的庸妄之徒。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與批判化的道德〉的附言中說：『我回答海因岑先生並不是為了擊退他對恩格斯的進攻。海因岑先生的文章值不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為海因岑宣言為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料。』我們駁斥何六九也同樣不是因為他的文章值得回答，而是通過對他的批判可以釐清一些與民族主義有關的問題，並對統獨問題提出左翼的觀點。」

何六九比用自由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還低劣

何六九以一副正宗馬克思主義者的姿態大談「無產階級世界觀」、「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可是，正如我們所指出的「他主觀唯心、機械的形而上學思考方式，絲毫沒有一點唯物辯證的觀點」，「在〈幽靈〉與〈鄉鄙〉二文中，我們看不到一丁半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影子」。1913年列寧在〈論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概念〉中，痛斥孟什維克派的阿·葉爾曼斯基「用自由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以自由派的觀點偷換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階級鬥爭觀點」（《列寧選集》，第二卷：451）。何六九在民族問題上所幹的勾當，比諸阿·葉爾曼斯基在階級鬥爭觀點上「用自由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其低劣尤有過之，他是如我們在前面所揭露的「緊跟在自由主義者的屁股後面，以連比較嚴謹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曾有的肉麻語調歌頌起時髦的『公民民族主義』，充分顯示他不過是自由主義的尾巴，而且是較為深思的自由主義者也不肯要的爛得發臭的尾巴。」

這樣的指控並無過當。我們引述過被何六九曲解的自由派公民民族主義者 michael Ignatieff 對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的基本見解。Ignatieff 指責像何六九那樣「對為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戰鬥的人民所表現的殘暴行爲，加以鄙視與感到震驚，都是錯誤的」。在我們曾提到的 John A. Hall 爲紀念 Gellner 而編的論文集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中，也有多位專研民族主義的自由派學者對“現代化”派過份貶抑民族主義，誇大民族主義的負面性提出了批評，諸如此類的論文，所在多有，不勝枚舉。即使像 Gellner 這位自由主義“現代化”派的代表人物，雖不支持民族主義，但也以嚴肅冷靜的態度，用唯物的觀點力求客觀地探討促動 18 世紀末以來民族主義洶洶巨流的社會經濟因素。他不但沒有如何六九那樣憑著鄙陋、淺薄的知識，幼稚地醜詆民族主義，濫肆宣洩反民族主義的情緒，在晚年反而承認民族主義可激發毀家紓難、殺身成仁等崇高無私的情操，他指出：

「我們所論證的民族主義感情的根源既不淺薄，也不可鄙。這些根源可能並沒有在所有人與所有的社會環境中發生作用（實際上也沒有），但它們確實深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境況中。它們成了我們的存在與處境的本質要素。他們威力強大，而且是理所當然的強大。也許它們的表現並非全都可取，但就其本身而論，這些民族主義感情的根源既無可迴避，也不可恥。……民族情操可以是，也常常是，真誠而深刻的。胸中懷有深摯的民族情操的人切莫因此而駁斥我提出的〔現代化〕理論。事情不是這麼回事。我的理論並不否認民族主義感情的濃烈深厚，或甚至加以蔑視。相反，我整個觀點正是以此為至關重要的前提之一。濃烈深厚的民族主義感情恰恰就是我的理論所完全承認，並且認為必須加以解釋的，我所勉力嘗試者也就在此。我所提出的解釋是否得當，那是另外一回事，且留待他人論斷。但決不能說，我的理論否認或無視民族主義感情的深厚與真摯。相反的情況才是實情。」(Gellner 1997: 12)

何六九的論述雜湊了左右派庸俗觀點之大成

不僅一些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者不會如何六九那樣像中了邪的乩童裝神弄鬼，滿口胡言亂語，台灣有些治學態度比較嚴謹的自由主義學者也沒有何六九這樣由無知而來的輕佻、張狂。例如：江宜樺在 1998 年出版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就以自由主義的觀點對民族主義與台灣的統獨之爭做了深入的探討；兼具進步自由主義與後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趙剛 1996 年 1 月在《台灣社會研究》第二十一期發表了〈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針對台灣民族主義，從反民族主義的立場批判了族裔民族主義。兩位的論述雖都有值得商榷之處，但

態度誠篤，用功頗深，終屬瑕不掩瑜的力作，不論是論證的嚴謹程度或理論的深厚都遠超乎何六九之上，更別提他們根本不搞何六九那種刻意曲解、顛倒所引資料原意的卑劣技倆了。

如前所言，我們批判何六九除了因為他極端淺陋無知卻又輕狂囂張外，還因為他和海因岑一樣，為我們提供了有趣的材料，可藉此探討有關民族主義與統獨之爭的一些問題。

何六九的論述內容頗像美國中國餐館賣給不知正宗中國菜為何物的洋人吃的雜碎，烹調手法極其拙劣，色香味無一具備，深諳中國菜美味者見之無不倒盡胃口。何六九的論述可謂雜湊了左右派庸俗化的觀點之大成。他濫情攻擊民族主義與頂禮膜拜公民民族主義，既來自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膚淺認識，也源於一些自由主義者從個體原子論觀點出發對集體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深懷的疑懼；而他對中華民族主義的厚誣醜詆與對中國統一的排斥則是與新舊型台獨一樣，出自對中國歷史與兩岸現實情況的無知；他在〈鄉鄙〉的最後部分再度跟在自由主義者屁股後面，大談多元民主、“民間社會”、“現代文明的公民意識”這些典型的自由主義論調，同樣也是盲從附和某些自由主義者把民族主義與民主對立起來的論調，與在民族問題上雷同，成了自由主義的尾巴。以下我們先談談左翼的民族觀，再對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提出看法。

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不必然對立

關於民族與階級的關係，在左翼陣營中歷來有一種流傳甚廣但卻片面的形而上學觀點，即把階級與民族、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機械地視為絕對對立的兩極。所謂「工人無祖國」被理解成似乎無產階級沒有民族屬性、沒有國民身份，從而把主張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與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當成資產階級所專有，視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時而大加撻伐，似乎一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即有違國際主義的左翼立場。之所以產生這種錯誤的認知，一是未曾深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對階級與民族關係的論述，二是如列寧所云：「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9卷：128）也就是說，未能根據唯物辯證法，以歷史唯物論深入分析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特定階段與具體情勢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片言隻語當成抽象的公式，據為立場，不加細究即隨處套用。其實，一般在片面強調國際主義，否定民族主義時，都忽略了“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光從字義就可知道是“國家”或“民

族”(nation)之間的聯合。“國際主義”正是在承認國家或民族已先存在的基礎上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是否定國家、民族的存在或反對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而是相反，力主民族（尤其是具有深厚歷史基礎與生命力的大民族）獲得獨立地位，並組成統一的國家，掃除分裂割據的局面，建立具有統一的貨幣、法律、度量衡、關稅與交通系統的大市場，以利資本主義的發展，提高生產力，從而加速社會矛盾，促進社會變革。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不同之處，是在馬克思主義視統一的民族國家為通向破除階級對立從而促成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主張各民族國家在獨立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國際合作，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則是標舉“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力圖在控制國家政權後，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名，掩蓋階級矛盾，並以國家資源做為對外擴張的憑藉。因而，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問題上是根據歷史唯物論，從是否有利於推動人類的歷史進程、有利於世界革命來判斷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運動的作用，而不是用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抽象原則毫無區別地反對一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馬克思對民族問題的看法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民族問題的主要觀點，李崇人在《左翼》第十號的〈統獨右左問題的上下求索（上）〉中，已做了扼要、準確的闡述。在此，我們再做一點補充與進一步的申論。1866年6月間，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討論了當時發生的普魯士與奧地利戰爭，會中也因“民族特性”問題而引起爭論。普魯東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民族與國家皆無存在必要，遭到馬克思的全面批判。馬克思在6月7日與20日寫信給恩格斯說：

「巴黎大學生中的蒲魯東派（《法蘭西信使報》）鼓吹和平，宣布戰爭是過時的東西，民族特性是無稽之談，並且攻擊俾斯麥和加里波第等人。把這一策略當做同沙文主義論戰的手段來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魯東的人（我這裡的好友拉法格和龍格也在內）竟認為整個歐洲都可以而且應當安靜地坐在那裡等待法國老爺們來消滅“貧窮和愚昧”，而他們自己愈是厲害地吶喊“社會科學”，就愈加陷入貧窮和愚昧的統治之下，他們簡直太可笑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24）

「此外，“青年法蘭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種觀點，說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陳腐的偏見”。這是蒲魯東派的施蒂納思想。一切都應當分解成小“團體”或“公社”，然後它們又組成“聯合會”，但並不是國家。在人類

的這種“個體化”以及相應的“相互性”向前發展的同時，其他一切國家的歷史都應當停頓下來，全世界都應當等候法國人成熟起來實行社會革命。那時他們將要在我們的眼前做這種試驗，而世界其餘的部分將會被他們的榜樣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樣的事情。這一切正是傅立葉期待於他的模範的法倫斯泰爾的。此外，所有用舊世界的“迷信思想”來使“社會”問題複雜化的人都是“反動”的。

我在開始發言時說，我們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廢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們講“法語”，就是說，講會場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語言，我的話使英國人大笑不止。接著我又暗示說，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覺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為由模範的法蘭西民族來吞併各個民族了。」（同上：230—231）

馬克思在這裡明確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否定民族特性與民族且反對國家的論調，並諷刺侈談超越民族與國家的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正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骨子裡並以領導全世界社會革命的模範民族自居，實際上並無法真正擺脫民族特性打在他們身上的烙印。因而，馬克思主義決不是什麼“民族虛無主義”，也決不像無政府主義那樣幻想一夕之間憑主觀意志廢除國家，而是主張通過各國聯合進行社會革命，破除階級對立，創造使國家消亡民族融合的客觀條件。

國際主義並不意味取消祖國、犧牲祖國

關於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關係問題，我們舉一個很有典型意義的例子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對愛國主義的立場。1893年8月法國將舉行眾議院選舉，當年春天，法國的各個保皇派集團在無政府主義者的支持下，大肆誹謗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工人黨所主張的國際主義原則是反愛國主義。法國工人黨的全國理事會遂於6月17日發表《告法國勞動者》的聲明予以駁斥，刊載於《社會主義者報》，並在法國北部一些城市中組織群眾大會宣讀該項聲明。我們大幅徵引如下，藉此闡明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關係：

「同志們：在對工人黨取得勝利進展恨得要命但又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我們的階級敵人使用了他們手中剩下的唯一武器——誹謗。正如他們過去妄圖歪曲我們的社會主義一樣，他們現在又在歪曲我們的國際主義。雖然這些人說我們不要祖國，但是整整一個世紀以來，正是他們的所做所為使祖國的領土遭到侵略和分割；他們的階級把祖國奉送給世界主義金融家匪幫去掠奪；他們的階級榨取祖國，在黑卡馬里和富爾米不斷製造流血慘劇；這些人，我們不僅過去就不允許他們把集體決定問題同無政府主義這個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醜惡表現相混淆，而且現在也決不允許他們把我們的光榮口號“國際萬

歲”解釋成“打倒法蘭西！”這樣的無稽之談。

不，國際主義決不意味著取消祖國，決不意味著犧牲祖國，當國家形成的時候，國家就是迎向我們正在朝著人類團結道路上前進的第一個同時也是必經的階段，而由全部當代文明所產生的國際主義則是這條道路上的一個新的階段，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階段。法蘭西國家也是這樣，它使各省擺脫了不合時宜的對立狀態以達到各省的聯合，所以法蘭西國家的形成不是與各省相對立的，而是符合於它們的利益，促進它們的自由和繁榮的；人類的國家也是這樣，它要求生產、交換和科學方面的社會化組織，所以人類國家的形成不是並且也不可能是有害於現存各國人民的、而只能是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有利於各國人民取得最高度的發展的。

走上了導致人類全面繁榮的國際主義道路的人，並不是就不再是愛國主義者了。正像上一世紀末法國人既是法蘭西人，同時仍然是普羅凡斯人、勃貝第人、佛來米人或布列塔尼人一樣。

恰恰相反，國際主義者能夠宣稱自己為唯一的愛國主義者，因為唯有他們清楚地了解應該怎樣改善條件，才能夠保證而且一定保證祖國以及所有從敵對變為團結的各國的前途和強大。

人們在高呼“國際萬歲！”的時候。他們也就是在高呼：“勞動的法蘭西萬歲！法國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萬歲！法國無產階級只有支援所有各國無產階級的解放才能解放自己！”

法國社會主義者是愛國主義者，還可以從另一角度，根據另一個理由來論證，因為法國過去是而且現在已經註定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我們要而且不能不要一個強大的法國，這個法國應既能保護共和國不受聯合起來的君主制國家的侵犯，也能保護它即將到來的工人自己的1789年免遭資本主義歐洲的聯盟——至少是可能的聯盟——的破壞。

正是法國的巴貝夫、傅立葉和聖西蒙的著作開始了社會主義思想的醞釀，這些社會主義思想後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以科學的完成。

正是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先行即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就是在這裡發生的一成了階級鬥爭的大戰場，它為了勞動解放的事業，於1832年在里昂、1848年和1871年在巴黎都曾貢獻出無數的英雄起義者。

正是法國，儘管它的兒女被凡爾賽軍大批屠殺，它在自己的不朽的1889年巴黎代表大會上舉起了倒在自己的血泊中的國際旗幟，並首創了五一節的慶祝活動；它第一個在用選票奪來的市政廳上，升起了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無產階級的紅旗。

因為它的革命的過去將保證社會主義的未來，所以當二十三年以前它處於危急之中的時候，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國家的國際主義者在三色旗下趕來保衛它，同時，新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置自身的自由於不顧，盡一切力量來阻止對法國進行無理的和罪惡的分割。

……現在，我們已經證明，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不僅不互相排斥，而且是人類之愛的兩個相輔相成的形式，所以我們面對著我們的誹謗者再次大聲宣佈：

對，法國工人黨就是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同反對德意志帝國。

對，法國工人黨就是和比利時工人黨一同反對資產階級的科堡君主國。

對，法國工人黨就是和意大利的勞動者和社會主義者一同反對薩瓦君主國。

對，法國工人黨就是和海峽彼岸年青的而且已經相當強大的工人政黨，一同反對英國寡頭政治的、資本主義的憲政。

對，我們就是並且定要和整個地球的無產階級一同反對一切地方的統治者、有產階級。

而且我們相信，我們法國的同志們、在廠房和田地裡勞動的人民，

一定會擁護黨的全國理事會的雙重的、實質上是同一的口號：

國際萬歲！

法蘭西萬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518：—521）

國際聯合只能存在於國家之間

恩格斯在看到這份聲明後，於1893年6月20日給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寫信說：

「工人黨對“愛國主義”採取的新立場就其本身而言是很有道理的。國際聯合只能存在於國家（黑體字為原文所有）之間，因而這些國家的存在，它們在內部事務上的自主和獨立也就包括在國際主義這一概念本身之中。假愛國主義者施加的壓力，遲早定會招致這樣一類的聲明，…」（同上：84）

6月27日，恩格斯又致函馬克思的女婿，也是法國工人黨領導幹部的保爾·拉法格，針對《告法國勞動者》的聲明提出「全面的看法，他說：

「你們對無政府主義者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布朗熱份子們的胡鬧提出抗議是完全正確的，…特別是在普選的前夕，決不能聽任別人恣意誹謗。所以對這一點我同意。德國人也不止一次這樣做過，…」(同上：86)

恩格斯對聲明中過份強調法國本位的一些缺失也提出溫和的批評：

「我希望你們的宣言在法國產生影響，但我同樣希望它在德國不為人所注意。理由如下（這並沒有什麼嚴重的，但我認為有責任提醒你們注意，以便你們下次能夠避免）。

關於愛國主義者一詞的使用，關於你們自稱為唯一“真正的”愛國主義者，這些我不想談了。這個詞涵義片面——或者說詞義含糊，依情況而定——所以我從來不敢把這一稱號加於自己。我對非德國人講話時是一個德國人，正像我對德國人講話時又純粹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一樣。我認為，要是你們只稱自己是法國人，倒會取得更大的效果；因為這反映了事實，其中也包含了由此而得出的邏輯結論。但是我們先不管它，這是個風格問題。

你們以法國革命的過去自豪，並認為它的革命的過去將保證它的社會主義的未來，這也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覺得，你們在這樣做的時候，似乎太接近布朗基主義了，也就是說，太接近於這樣一種理論：法國註定應該在無產階級革命中起它在1789—1798年資產階級革命中所起的那種作用（不僅是首倡者作用，而且是領導者的作用）。這是同今天的經濟和政治的實際情況相矛盾的。法國工業的發展落後於英國，目前也落後於德國，德國從1860年以來進步迅速。法國的工人運動今天已不能同德國的工人運動相比。但是，無論是法國人、德國人或英國人，都不能單獨贏得消滅資本主義的光榮。如果法國—可能如此—發出信號，那末，鬥爭的結局將決定於受社會主義影響最深、理論最深入群眾的德國；雖然如此，不管是法國還是德國，都還不能保證最終的勝利，只要英國還留在資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國際的事業。如果你們想把它變成只是法國人的事業，那你們就會使它成為做不到的事了。」(同上：86—87)

主張中國統一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恩格斯還從德國的立場指出聲明中令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工人不快的不當措辭：

「而且還有一點非常不好。你們寫道：“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同反對德意志帝國”。在資產階級報刊上這被翻譯成，“反對德意志國”。而且所有的人也一定會這樣理解。因為法文 empire 既可解釋為“Reich”〔“國”〕，也可解釋為“Kaisertum”〔“帝制”〕；德文“Reich”一詞則側重在體現著民族統一（黑體字為原文所有）的中央政權這一概念；而這種統一是德國社會主義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條件，他們將誓死為之戰鬥。我們決不（黑體字為原文所有）想把德國推回到1866年以前那種四分五裂和軟弱無力的狀態。要是你們說的是“反對皇帝”或“反對帝制”，那就不會有任何人反對，雖然那位庸碌無能的威廉不是一個值得這樣重視的人物。敵人是資產階級——地主和資本家。在德國，人們對這一點很理解，所以我們的工人不理解你們提出要幫助他們戰勝柏林的狂人是什麼意思。

因此，我曾請李卜克內西不要談你們的宣言，只要資產階級報紙未提到它。他是，如果有人以這樣不恰當的提法為依據來攻擊我們的人賣國，那就會引起相當不愉快的爭吵。

簡言之，加深些互相了解並無害處——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同個人之間的平等一樣是必要的。」（同上：88—89）

法國工人黨的聲明與恩格斯對它的評論，給我們提供了瞭解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兩者關係的絕佳材料，極有助於釐清長期以來廣泛存在於左翼陣營中的誤解。從中我們可以明白得知：一、「國際主義決不意味著取消祖國，決不意味著犧牲祖國。當國家形成的時候，就是通向我們正在朝著人類團結道路上前進的第一個同時也是必經的階段，而且全部當代文明所產生的國際主義則是這條道路的一個新的階段，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階段。」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不僅不互相排斥，而且是人類之愛的兩個相輔相成的形式」；三、「國際聯合只能存在於國家之間，因而這些國家的存在、它們在內部事務上的自主和獨立就包括在國際主義這一概念本身之中。」；四、民族（國家）的統一是社會主義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條件，決不能使國家陷於四分五裂和軟弱無力的狀態；五、民族的自豪感與愛國主義不可過份膨脹，導致民族沙文主義；六、「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國際的事業」，非單一國家所可為功。因而，長期以來不論在國際或台灣的左翼陣營中，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視為對立互不相容的兩極的看法，顯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的真正本義。Hobsbawm 強調把愛國主義完全讓給右派是危險之舉，而工人的階級意識應與愛國主義結合，以戰勝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確有見地。

在法國工人黨的聲明與恩格斯的評論中，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極為注意不允許右翼誣蔑他們「不要祖國」、「賣國」。法國工人黨指責資產階級的「所做所為使祖國的領土遭到侵略和分割，他們的階級把祖國奉送給世界主義金融家匪幫去掠奪」。恩格斯還提醒拉法格，法國工人黨聲明中的不當措辭如果讓資產階級利用作為攻擊德國社會民主黨「賣國」的口實，「那就會引起相當不愉快的爭吵」，從而破壞了兩黨的國際團結。其中的道理至為明顯，鮮有任何一個政治團體或階級組織在屈膝於外國的要求，出賣國家利益，喪權辱國，恬不知恥地充當外國走狗後，仍能見容於本國多數人民，逃過遭受唾棄的命運的，這在中外的近現代史中屢見不鮮，早有明證。而在面對外國侵略領土、干涉內政與壓迫剝削之際，無產階級政黨必然要充當最堅決、最頑強的抵抗力量，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自不待言。

正是基於上述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作為左翼，我們正大光明地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理直氣壯地主張兩岸應該極力排除美國帝國主義的干涉，結束國家分裂的局面，完成中國的統一，這絲毫沒有什麼輸理的。

何六九是戴著左翼假面具的右翼台灣民族主義者

何六九這個不知馬克思主義為何物的蠢材，先是說了一篇「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動中無法迴避的天大問題」、「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所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之一，甚至於有可能是某一個時期最主要的共同課題」，因此無產階級不能「不問民族」，台灣的左翼不能迴避民族問題，應該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提出與右派「絕大不同的」民族觀，「戰勝右翼，帶領台灣工人以及整個社會在此議題上更進一層樓」，「從鬥爭中表現出階級的獨立性和主導能力」，等等的空話、大話，結果是他非但沒有提出「絕大不同」於右派的左翼民族論來「戰勝右翼」、「表現出階級的獨立性和主導能力」，反而是一方面憑著自己的淺陋無知肆意曲解、醜詆中華民族主義，一方面同樣淺陋無知地吹捧公民民族主義，充當自由主義爛得發臭的尾巴，甚至不惜用詐騙手段諛頌英國帝國主義為公民民族主義的典型，最後則突然在毫無論證下，又變成了他所反對的「不問民族」論者，認為左翼「沒有理由要成為民族主義者，無論是血緣民族主義者或者公民民族主義者，左翼人的眼界，應該遠遠超越這個民族認同所涵蓋的範圍」，「能夠從思想上有效反制鄉鄙根性血緣民族主義的，還不是任何一種性質的民族認同概念，而是公民意識本身，真正具有現代文明內涵的政治文化」，「唯他們（非民族主義者）才能夠帶領這個社會真正走出民族思考的狹隘格局」。可是，他那個內容空洞、形態模糊的「不是任何一種性質的民族認同觀念」的「公

民意識本身」，那個所謂「公民意識定義下的民族」，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卻始終如夢似幻、像神又類鬼的玄秘莫測。就這樣，何六九這個冒牌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在《左翼》上的三篇文章，除了從他的雜碎腦袋中倒出一大堆陣陣惡臭令有識者聞之掩鼻的垃圾，並徹底暴露他卑劣下流的詐偽品質外，他大言不慚地吹噓要「從較為優越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出發」提出的左翼民族論，最終還是個大大的零，獨留下一批假冒偽劣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劣等貨，供人訕笑唾罵。

何六九之所以以大肆吹噓要提出優於右派的左翼民族論讓台灣工人階級，「領導整個台灣社會」始，最終卻以右派尾巴的面目出現，主要的原因是他根本未窺馬克思主義的堂奧，妄圖拿一些粗糙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做成的劣質脂粉遮掩他那雞皮黃臉的半調子自由主義。可是，只要一張口，那劣質脂粉即片片剝落，盡露醜怪的本色。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何六九這個帶著馬克思主義假面具，化粧術極為拙劣的蠢材，骨子裡其實是個台灣民族主義者，他曲解、厚誣中華民族主義，明目張膽地扭曲事實美化台灣民族主義，頌揚公民民族主義，大談「民間社會」（其實是指所謂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嶄新健康的現代、公民的政治文化」，把資本主義民主體制說得非常“文明”、“理性”、“自由”，是「漢族人民憧憬已久的民主自由和文化的新紀元」，其所做所為實與台獨學者吳乃德所明白表示的若合符節：

「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形成）在目前這個歷史階段和政治環境中，它所面對的『敵人』主要是中國。或者更正確地說，台灣民族主義一直在中國的陰影下發展。而它所對抗的思潮，也是主張大一統中國的民族主義。因此在現實的環境下，它的任務之一主要是在脫離中國，至少脫離中國民族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成為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武器，也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合理化基礎。」（吳乃德 1996：36）

德希達（Derrida）對政治、經濟自由主義的批判

台獨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之所以漸由福佬沙文主義轉向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公民民族主義，除了我們前面已指出的內部因素外，還有個國際大氣候。那就是東歐、蘇聯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後，全世界的右派無不額手稱慶，認為資本主義的政治與自由經濟體系，已獲全面勝利，於是歡欣鼓舞地高奏凱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裔美籍的保守派福山那臭名昭著的“歷史終結”論。福山宣稱，過去曾與自由民主政制爭雄的君主政體、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俱已為手下敗將，人類的意識形態與統治制度演進到自由民主制已達終點，自由民主從此在全

球獨領風騷，「不分地域與文化，舉世莫不一致熱望憧憬自由民主制度」，再也沒有其他敵手可取而代之，人類歷史的進程至此終結（Fukuyama 1992：X I, X III）。蘇聯、東歐“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轉型與中共鄧小平路線的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似乎為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提供了現實的證明，似乎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將通過全球化的浪潮，一統世界，君臨天下。這對數十年來唯美國馬首是瞻，意識形態上徹底臣服於美國的台灣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確是一大福音。自 20 世紀八〇年代以來，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的深化，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部分中小企業主推動的資本主義民主也逐步取得進展，李登輝上台後更加速進行，至 2000 年陳水扁在總統大選獲勝，國民黨下台而達於頂點。十多年來，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之類的福山式論調被台灣分離主義者奉為意識形態支柱，成了反對中國統一，主張「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振振有詞的根據。何六九整個論述的意識形態內涵基本上不脫此範圍。我們說他根本未登馬克思主義堂奧，是個蹩腳的冒牌貨，除了前面已揭露、批判的部分外，另一理由即在此。

大凡稍悉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馬克思、恩格斯畢生用力最多者正是在剖析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並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學、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意識形態，徹底揭露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的階級性與虛偽性，提醒無產階級洞悉資產階級傳佈的這些意識形態迷霧，勿為所惑，方克改造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故而，只要真正深體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者，即便不贊成社會主義革命或對無階級社會能否實現存疑，也很難再像何六九那樣跟在自由主義屁股後面天真地相信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會是什麼“文明”、“理性”、令人「憧憬」的「新紀元」。

我們就舉對二戰後的西方思想有重大影響的後結構主義代表人物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為例來說吧。正當福山這類保守反動的自由主義者得意洋洋地宣告資本主義大獲全勝，馬克思主義已然失靈之際，德希達於 1993 年 4 月在美國加州大學河邊分校召開的“馬克思主義往何處去？”學術會議上，發表專題演講《馬克思的幽靈們》，極力抨擊以美國為首高唱的所謂“全球化”、“國際新秩序”，痛斥福山所傳播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福音書之虛妄，大聲疾呼應該繼承馬克思主義徹底的批判精神。他指出，以福山為代表的保守反動的意識形態正形成世界文化霸權的獨斷教條，政客濫予誇飾，媒體齊聲頌揚，知識圈與學術界也有一大批人同氣唱和，這套佔居主導地位的論述成了狂熱謳歌的符咒：

「這套咒語被迴環讚頌、頂禮膜拜，大加吹捧，成了信守不渝的萬靈處方，有如萬物有靈論者的魔法。它以步伐整齊的節奏宣稱：馬克思不靈了，共產主義完了，死定了，共產主義的希望、論述、理論與實踐也隨之長眠九泉，永難再起了。資本主義萬歲！市場萬歲！經濟與政治的自由主義永世長存！」(Derrida 1994: 52)

德希達還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主張，由強權支配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與國際法必須改變，以建立“新的國際”，並指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下，自由主義所謂“民主、自由、人權”論述的偽善不實：

「由於國際法已出現多種危機，我們才力圖建立“新的國際”機構。這個“新的國際”觀點已揭發了人權論述的限制，今天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實際不平等遠遠超越過往的人類歷史，只要市場法則、“外債”與科技、軍事、經濟發展的不平等依舊支撐這樣令人驚怖的實際不平等，人權的論述就終究不夠充分，有時顯得偽善不實，而無論何時則都是徒具形式、自相抵觸的。正當有人厚顏無恥地傳播名為自由民主理想的福音，自認已最終實現了人類歷史的理想：不再有人類歷史中侵害諸多人類的暴力、不平等、排斥、饑荒以及經濟壓迫，此時就更有必要宣揚這種“新國際”的觀點。且莫陶陶然於歷史的終結，歌頌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市場的降臨，也不用歡慶“意識形態的終結”與偉大的解放論述的末日，我們切不可忽視世界各地無數觸目可見的苦難景況：

人類再怎麼進步都無法讓我們無視在地球上男人、婦女、兒童遭受奴役、饑饉甚至滅絕的人數之多，就絕對數字而言，是前所未見，史無前例的。」(同上：85)

這就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台灣分離主義者奉為無上教條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所做的深刻批判。

資產階級民主也同無產階級相對立

幾十年來，台灣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深深依附於美國，學術、文化也同樣淪入被殖民的境地，美國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通過學術、文化買辦與媒體在台灣紮下了深厚的基礎，成了反共的工具，也為分離主義者提供了意識形態的武器。一些局限於狹隘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份子無法超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樊籠，並不令人訝異。但何六九以正宗馬克思主義者的口吻侈言所謂“無產階級世界觀”、“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整個論述卻未脫自由主義右派的框框，屢見對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頌揚，大談什麼“民間社會”、“民主自由和文化新紀元”、“現代文明的新紀元”。他也與分離主義者一樣，淺薄地自以為比

中國大陸“文明”、“現代”。

在我們前面引用過的法國工人黨《告法國勞動者》聲明中，曾以自以為法國的民主共和國比較優越的姿態表示「法國工人黨就是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同反對德意志帝國」。恩格斯對這種錯誤的心態提出批評說：

「歸根到底你們的共和國是老威廉和俾斯麥造成的。和所有我們的君主國的政府一樣，它是資產階級的；…

共和國的形式—這只是對君主制的單純否定，而推翻君主制將不過是革命的必然結果，在德國，資產階級政黨如此破產，以致我們可以從君主制直接過渡到社會共和國。今後，你們不能再把你們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看作別國人民應為之努力的東西來同君主制相對立。你們的共和國也好，我們的君主國也好，同樣都是同無產階級相對立的：如果你們幫助我們反對我們的君主主義資產者，我們就幫助你們反對你們的共和主義資產者。這是一個相互的問題，絕不是慷慨的法國共和主義者解救君主國的不幸臣民。這不符合國際主義的思想，更不符合你們的共和國倒在沙皇腳下這樣一個歷史情況。不要忘記，如果法國為了沙皇的利益並在沙皇的援助之下同德國打起仗來，正是德國將成為革命的中心。

……………

另一方面，你們把共和國本身說成是無產階級所渴望的東西，把法國說成特等民族，這就使你們避而不談同俄國的聯盟或（更確切地說）臣服於俄國這一不愉快但是推不翻的事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87—89）

恩格斯在這裡強調了兩個重點：一、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也好，君主專制國也好，「同樣都是同無產階級相對立」，二、法國當時是「倒在沙皇腳下」，同俄國聯盟「或（更確切些說）臣服於俄國」。因此，法國沒有理由自以為比君主國的德國優越。恩格斯的批評說明了如果具有真正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就會清醒地認知到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和君主專制國一樣，「同樣都是同無產階級相對立」，因而真正的左翼所著力者在於批判資本主義民主徒具形式的虛偽不實，揭露自由主義是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麻痺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所標榜的“自由”、“民主”、“平等”雖然動聽，在資本主義下卻根本不可能真正實現。而臣服於他國的無產階級既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放，更沒有資格談什麼「解救君主國的不幸臣民」。

台灣資本主義民主的欺騙性

台灣這十幾年來，以急就章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化改造，繼1980年代在“經濟奇蹟”論的催眠下滋生“經濟暴發戶”心理後，朝野上下又瀰漫了淺薄的“政治暴發戶”心態。正如王立民在〈總統大選的幾點觀察〉中所指出的：

「“主權在民”論這些年來在李登輝為首的右翼勢力極力鼓吹下，已被塑造為台灣的主流價值觀，成了牢籠台灣人民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在1871年也早已指出：『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意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壓迫人民。』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從總統以降的各級民選行政首長、議員莫不通過選舉從人民公僕異化為社會的主人而享受榮華富貴，鬧出層出不窮的愚民自肥的醜聞。所謂三權分立，制衡監督，實則形式大於實質。不法的醜聞遭揭發後，嚴重者雖可能被迫下台。但趕下了虎又從統治階級中再遞補上狼，或遲或快重演濫權自利的把戲。歐、美、日本的投票率之所以奇低，常不過半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看膩了這些選舉把戲，又無力改變，只有以不投票來消極抵制。而台灣民眾則剛服下『主權在民』的迷幻藥不久，猶陶陶然於『頭家』的封號，誤以為投票選出騎在自己頭上的統治者就是“民主”而沾沾自喜。」（《左翼》第四號：18）

陳水扁上台後，一連串的財經、勞工政策（包括近日完成的經發會共識）無不日益暴露其右翼政權的本色，即無不日益證明恩格斯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制與君主專制「同樣都是同無產階級相對立」的論斷。在台灣政治經濟體制“自由化”、“民主化”之時，其實也就是階級矛盾與日俱增之際。多年來，李登輝、民進黨等分離主義勢力利用虛假的“省籍矛盾”作為奪權鬥爭的工具，掩蓋了實質的階級矛盾。如今，台灣民族主義者高唱的“台灣人出頭天”已實現有年，台灣的政治經濟問題卻每下愈況，金權政治泛濫不止，財富分配日益惡化，資產階級的權力有增無已，工人階級則不但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受剝削的境遇沒有改善，其團結、爭議、組織等各種權利也正遭逢進一步的壓制。面對這樣的情勢，何六九所為何事呢？他在充當統治階級的幫凶，用自由主義的論調，與分離主義者齊聲唱和。念茲在茲者不是揭露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政治、經濟自由主義的欺騙性，而是不惜用詐騙的卑劣手段，美化英國帝國主義，吹捧公民民族主義，大談“民間社會”、“公民意識”，極力推銷以自由主義為內涵的所謂“嶄新健康的現代的、公民的政治文化”，汲汲於鞏固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其根本目的就是執行我們前面引述過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吳乃德所說的：

「因此在現實的環境下，它〔台灣民族主義〕的任務之一主要是在脫離中國，至少脫離中國民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成為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武器，也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合理化基礎。」

何六九不止一次的聲稱自己是“非民族主義”者，但這就跟他滿口“左翼”、“無產階級世界觀”實則形左實右是自由主義的尾巴一樣，純屬欺人之談。他整個的論述完全站在台灣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不論是對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主義的曲解或對“二二八”事變的解釋，都是十足台灣民族主義者的論調。近年來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的分離主義者提出“公民民族主義”論，其用意在以“公民意識”培養出台灣民眾與中國分離的“國民意識”，何六九之所圖亦不外乎此，但這除了能吸引一些脫離實際、不食人間煙火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外，收效不可能太大。

Habermas 論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

何六九幼稚地以為只要通過曲解、醜化中華民族主義，抹除台灣民眾的中華民族意識，大肆推銷“公民意識”，就可達到鞏固他的台灣民主共和國的目的，這只能暴露他主觀唯心的思維方式與他對他所跪拜的西方資本主義極其無知。我們在前面已批判過他不加深思地囫圇吞棗“現代派”學者的論點，把“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機械地視為絕對對立的兩極概念，因此，他根本不知道，英、法等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是與強調共同祖先、歷史、文化的民族認同。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同體共生的。關於這點我們在前面已有所論述。這裡我們再舉Habermas的觀點來加以補充。自20世紀90年代Habermas即積極贊成歐洲統合，並進一步鼓吹“世界社會”。他認為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主權國家已無法妥善處理內部日趨多元的文化與外部的全球化趨勢，民族國家將趨於式微，原本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必須重新改造，聯合國的組織形態也應加以變革，使之具有“世界政府”的作用，能有效執行根據民主、自由、公正的原則制定的世界性法律規範，維護全世界的人權，以利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平等的“世界社會”（參考：Habermas 1999）。Habermas這個源自康德（Immanuel Kant）的構想，理論上是否可以成立，實際上是否行得通，遭到左右各派學者的強烈質疑，此處我們不予討論。我們只是要指出，Habermas即使在鼓吹超越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世界公民社會”，為民族國家高奏輓歌之際，也並不像何六九那樣極其無知地割裂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中的族裔與公民成份，對民族主義濫加醜詆。Habermas在論述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民主制的關係時說：

「然而，只有中央集權的領土國家才塑造了歐洲的國家體系。16世紀時，從英國、

法國、葡萄牙、西班牙與瑞典這些王國中產生了領土國家。其後，在按照法國模式民主化的過程中，這些領土國家也逐漸轉化成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形成確保了資本主義得以在全世界發展的一切條件。民族國家既提供了法治管理的基礎也確立了個人與集體得以自由行動不受政府干預的法律框架。還有一點，而也正是這點此際令我們關注，民族國家為同質的族裔與文化奠立了基礎，這也使政府的民主化自18世紀開始得以逐漸推進，雖則這是用排斥、壓制少數族裔的方式完成的。民族國家與民主實為法國大革命的孿生子。從文化的觀點來說，民族國家與民主都是在民族主義的蔽蔭下茁長的（黑體為筆者所加）。」（Habermas 1992：2）

Habermas 還進一步指出民族主義所形成的民族集體認同之所以能「發揮摧化早期的現代國家轉型成爲民主共和國的作用」，是因爲：一、宗教改革後，天主教與新教決裂，雙方衝突的結果，宗教開始多元化，君權神授論不再能做爲王權正當性的來源，政治權威必須轉而從俗世的人民中取得統治的正當性；二、在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民眾被迫脫離傳統的社會關係，解除了現代社會早期的行會等社會組織的束縛，變成既可自由流動卻又孤立的個人，於是產生了社會整合的問題。此時，民族的集體意識可使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結合起來，積極從事政治活動。民族國家正是運用民族認同促成社會整合，並以同一民族的人民主權論推動民主化來確立統治的正當性。在這樣的過程中，原來臣屬於威權統治的人民就逐步取得公民身份。因而，「民族主義促進了從私人屬民變爲公民的身份轉化」（Habermas 1996：284 - 285）。

Habermas 在闡述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時，不像某些自由主義者片面地把強調集體意識的民族主義與從個人主義出發的資本主義民主完全對立起來，而是明白揭示了由民族主義滋生的民族意識、民族認同在促進民主制度發展上的重大作用。

單憑抽象的人權與民主觀念不足以凝聚人心

他特別指出，從專制國家轉型爲憲政民主國家，徒有抽象的人權與人民主權觀念，不足以爲功：

「如果最終沒有從臣民中產生由自覺的公民構成的民族，就不會有推動這種轉型的力量，即使在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國也無濟於事。要有這種推動政體轉型的政治動員，就必須獲得一種比有點抽象的人權、人民主權觀念更能打動人民心思的訴求。這個缺口是由現代的民族觀念來填補的，它首先能激起生活在共有的領土的居民對同一共和國產

生歸屬感。只有具備基於共同歷史、語言與文化的民族認同，只有意識到屬於同樣的民族，散居於廣大領土各地的人民才會感到政治上休戚相關。公民們於是自視為整體的一部分，不論這個整體用什麼樣的抽象法律術語構成。這類的民族自我意識是指由知識份子用傳奇的神話、歷史與文學傳統精心建構起來的獨特民族精神，並經由當時的大眾媒體廣為傳播。這樣的文化認同為政治認同提供了社會整合的基礎。

這說明了何以公民身份是用雙重符碼拼寫成的：它不僅僅是用公民權利界定的法律身份，而且還是用文化界定的共同體成員。兩個方面首先是互為補充的。不從文化的角度詮釋政治成員的權利，歐洲民族國家在發軔期就無力達到我所稱道的主要成就：即從法律上賦予公民民主的權利，建立一種新式的、抽象層次更高的社會整合。」(Haberman 1996: 285—286)

Habermas一貫主張理性主義。他雖然不支持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權國家的形式已不能適應多元文化與全球化趨勢的要求，因而鼓吹用民主憲政的政治文化取代民族國家同質的傳統文化作為新的民族認同依據，形成以民主憲政原則為核心的“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但他仍實事求是地充分肯定了民族主義在促成西方資本主義與其民主制度發展上的積極作用。何六九滿嘴“理性”，侈談“公民意識”、“真正具有現代文明的政治文化”、“公民意識的民族認同觀念”，可是，不論是他反對的民族主義或他主張的“公民意識”，他都不曾用心研究、思考過，對民族主義除了激情謾罵醜詆，對所謂“現代的、公民的政治文化”除了盲目的歌頌禮讚，我們都看不到什麼基於可靠的知識、理論而來的理性論述，觸目所見反而是一大堆胡言亂語、瀰天大謊與下流無恥的詐術。這與我們前面所引述過的Smith、Nairn、Ignatieff、Hobsbawm、Habermas等人的理性態度相比，其差距真不可以千萬里計。這些西方學者的論述也恰如照妖鏡一般，讓何六九那用“左翼”、“理性”的詞句包裝的卑鄙猥瑣、非理性的醜陋原貌，立時無所遁形。

國族認同與民主

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確立與民族主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點除了剛才引述過的Habermas的觀點外，十九世紀英國的自由主義理論名家John Stuart Mill與法國歷史學家Ernest Renan也都有所論列。Mill指出：

「在一個由不同民族構成的國家，自由的制度近乎不可能確立。實行代議制度必須有統合的公眾意見，但在一國的人民中若沒有同胞感情，特別是如果使用不同的語文讀

與說，那就不可能形成統合的公意。」(Mill, 1993: 396)

法國的歷史學者Ernest Renan在1882年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What is a Nation?闡述了“構成“國族”的要素。Renan分別就種族、語言、宗教、物質利益、地理等各種因素，逐一探討它們與國族形成的關係，結論是：單憑這些因素不足以構成國族，國族的成立主要依靠人民的精神與共同意志。Renan這篇影響深廣的演講，已成研究國族問題的必讀之作。其中有諸多洞見常為後人引用，如：「遺忘歷史，甚至搞錯歷史，是形成國族的一個必要因素，因而歷史研究的進展常會危及國族意識。」自由主義者尤其喜歡徵引這句話：「一個國族的存在就是每天的國民公決」，來做為公民民族主義的依據，似乎國族僅是經由個人的選擇、同意構成的。但這只是片面地理解Renan的原意，從而扭曲了Renan的觀點。其實，Renan是這麼說的：

「一個國族就是一股精神，一種情操。這股精神或情操是由兩種實則為一的東西構成的。其一繫於過去，另一項則立於現在。一是共同擁有一筆豐富的歷史遺產，另一則是眾意僉同，和衷共濟，為光大家業願奮鬥不懈。諸位先生，人不可能是憑空出世的。國族之得以存在，就像個人，是先人長期歷盡艱辛，流血、流汗、犧牲、奉獻的成果。在各式各樣的崇拜中，敬拜祖先是無可非議的，我們之成為今日的我，是拜祖先之賜。英勇壯烈的史詩、聖賢豪傑之士與輝煌燦爛的歷史—我是指真正的輝煌，這些必然成為我們確立國族觀念時的可貴資產。既分享過去的榮耀，又具有共同的意志；合力完成豐功偉業，且願再接再厲—這些都是一個國族存在的必要條件。犧牲越大、越多，愛也就越深。…歷史的光榮與憂患，同心擘劃共創遠景；共患難，同歡樂，齊希望；這些事情比認同於海關與根據戰略構想而劃定的疆界要有價值得多。這些事是即使種族不同，語言有異也都能共同體會的。我剛才說“共患難”，共患難確實比同歡樂更能團結人。在國族的記憶中，苦難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苦難會迫使人民興起匹夫有責之感，要求人民共赴國難。

因此，我們明瞭了，過去所做的犧牲與未來要完成的規劃共同使國家凝成牢固的統一體。國族必有其歷史傳承，只是就當前的角度來說，這個歷史傳承都包含在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裡，即，同意並且明確表示願意共同生活在一起。容我用個比喻來說，一個國族的存在是每日的國民公決，就像個人的存活即是宣告生命的仍在延續一樣。」(Renan 1995: 153—154)

Renan雖然過分突出了主觀因素對國族形成的作用，顯現了濃厚的唯心傾向，

但他既主張國家認同取決於個人的選擇，又強調歷史文化因素對個人的意識與意志的決定性作用，事實上是結合了公民與族裔的兩項要素來建構他的國族認同論，這與片面強調公民政治意識的公民民族論者有著極大的區別（參考：Yack 1996：197—198）。

國族認同分裂使台灣民主制度的基礎不穩

Mill 與 Renan 就民族認同與民主及國族認同與公民意識之間的關係所陳述的觀點，在我們探討台灣的民主問題與統獨之爭時，很值得注意。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胡佛曾對台灣的國家認同出現分裂而危及民主制度提出如下的看法：

「但對中國有所了解的人應該知道，中國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及一個很厚實而寬廣的文化底子，未來發展的潮流，仍然會很澎湃的。今天在發展的道路上雖遭到一時的挫折，總希望全體中國人一起來奮鬥。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更要心存『為生民主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如有人自外於中國，甚至對中國人的苦難加以嘲弄，一定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認同上的道德問題，引發激烈的衝突。時下很多人把兩岸對抗當成是一種利害衝突，恐怕失之膚淺。因之，我們如拋捨中國人根本認同的道德問題而不談，必然不能把握住問題的癥結。

我一向主張民主自由，但民主自由是國家內的一種制度，如大家對國家認同欠缺共識，也就是發生不同的國家認同，民主自由的根基就非常動盪，有關的制度就會變形。台灣最近幾年來的民主化，像政黨及選舉等相當程度地成為國家認同衝突下的武器，很多人都抱著惶惶不安的心情看選戰中『中國人』與『台灣人』的對罵及毆打，我們很為這樣的民主發展擔心。」（胡佛：1995）

台灣民族主義者吳乃德根據 Mill 的觀點也指出了台灣國家認同的衝突對民主自由體制造成了諸多難題：

「在正常的民主過程中，執政的一組政治領袖，在其執政期間對外代表了全國，對內則有足夠的權威動員全國的社會資源解決社會面臨的難題。然而在國家認同衝突的政治體中，不同群體的人民對敵對的一組政治領袖必然懷著不信任感，甚至認為後者不具有合法性。在國家認同衝突的情況下，政治領袖——即使是執政的一方——的權威和信任，因此只及於部份的人民。

在國家認同有所衝突的政治體中，『忠誠』的反對——民主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比

較不容易生存。因為具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反對者的「居心」較可能被懷疑。而當執政者壓制反對者的時候，壓制的行動不但具有較高的合法性，而且也比較可能受到民眾的支持。

在國家認同衝突的情況下，言論自由——是一個民主的必要條件，也比較可能受到壓制。我們在上面提過，國家認同的形成固然有歷史力量的作用，可是歷史力量要發生作用，主要是人為加工的社會工程的結果。國家認同的創造和散佈，很大一部份來自人為的努力。民主社會中的言論自由因此是型塑國家認同的重要條件。正如Mill指出的，如果單一國家認同的形成先於民主化，那麼它對民主鞏固不會造成障礙。可是如果一個社會在國家認同尚未獲得一致之前就先民主化，那麼民主化帶來的不是國家認同的共識，而是更激烈的、更清楚對立的國家認同。這對民主鞏固將是一個難題。民主體制中的言論自由，將如何保障宣揚不同國家認同的言論，尤其當其認同的對象是一個對該社會懷有敵意的國家？「民主政治的生存經常需要一個經由基本共識所建構的情感架構，政治歧異在這個情感架構下得以被容忍。」(Emerson 1967: 223) (吳乃德 1997: 26—27)

胡佛與吳乃德俱為自由主義者，也都具備現代的政治公民意識，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知與感情卻有極大的差異，也就是在公民與族裔這兩項國族認同的要素上，兩人並不一致，導致在國族認同上南轅北轍，分屬統獨兩方。他們都看出了由於在國族認同上產生重大的分歧，故而台灣的民主制度難以鞏固。他們的觀察證諸台灣這十多年來的政治發展，特別是民進黨執政後朝野政治勢力的衝突對抗，可謂道中了台灣政治亂象的要害。不過，他們提出的對應之道，卻因國族認同的歧異而迴不相侔。胡佛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人根本認同的道德問題」，分離主義者如再「自外於中國，甚至對中國人的苦難加以嘲弄，一定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認同上的道德問題，引發激烈的衝突。」換句話說，分離主義者一日不放棄醜詆中華民族與中國並回歸中國人的立場，那麼不僅台灣內部的激烈對抗無法消弭，兩岸的緊張關係也不可能好轉，台灣的民主制度自難有鞏固之日。吳乃德則從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視中國為「敵人」，主張以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為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武器，並用發掘、重構台灣歷史等方法推動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以期形成台灣的國族認同，解決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衝突問題(吳乃德 1996: 36; 1997: 25—29)

自史明、王育德以降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多年來想利用捏造、曲解台灣歷史來建構台獨史觀，塑造台灣民族的認同，在迭遭統派學者的批判、解構後，如今已

然失去公信力，除了一些台灣史盲尚為其所欺外，已不可能取信於台灣多數民眾。吳乃德設想用重構台灣歷史來促成台灣民族的認同，終屬徒勞，對此我們不加贅論。我們在這裡只集中討論現今分離主義者用來對抗中國統一的主流論述，即從自由主義出發，標榜“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以“公民意識”、“公民社會”為內涵的“公民民族主義”，指出其理論上的缺陷。

台獨的「住民自決」、「公民投票」論缺乏正當性

許多自由主義者經常以“天賦人權”、“社會契約”這類沒有實際根據的神話與個人主義的原子論哲學觀來論證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道德上的正當性，振振有詞地大肆鼓吹“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並由此推出“民族自決”、“公民投票”等涉及國家主權爭議的主張。台灣的分離主義勢力目前正是拿自由主義的這些抽象原則當作教條，作為推動與中國徹底分離的意識形態工具。自由主義這一整套所謂“天賦人權”、“自由、民主、平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馬克思與恩格斯早在《神聖家族》、《資本論》、《經濟學手稿》、《反社林論》等經典著作中即予以徹底的批判，任何真正具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人，都不會再為其所惑。即使在非馬克思主義者中，只要肯結合實際認真探討資本主義民主理論的學者，也已指出其理論上的缺陷與運用到現實中出現的問題。多年來許多自由主義者根據個人主義的原子論把民主自由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對立起來，反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已遭到受黑格爾哲學影響的“共同體論”(communitarianism)學者的強勁批判(參考：Mulhall and Swift 1992)。由於與我們要討論的焦點無直接關係，此處不予細論。

台灣的分離主義者根據自由主義的抽象原則抬出“住民自決”、“公民投票”、“公民民族主義”等主張，自以為很符合“文明”、“民主”的資本主義“普世價值”觀，希圖獲得美國為首的國際勢力的支持，達到脫離中國的目的，其實，這不但是對資本主義民主理論的認識不足所產生的幻想，也是出於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無知而打的如意算盤。美國最富盛名的民主理論學者Robert A. Dahl早已指出，一般倡導民主制度的人總是預設已先存在一個民主制度在其中實施的具體確定的完整政治疆域，但他們很少探究這個完整的政治疆域是由什麼原因，什麼力量形成的？這個政治體的人口與領土的大小，為什麼是目前這樣而不是另外一個數字？事實上，實施民主制度的國家，其人口與領土疆界不是也不可能由民主理論與民主制度本身來確定，而是由歷史與政治的力量決定的。Dahl舉加拿大魁北克省要求獨立與美國康乃迪克州要求對節育政策有自主權等議題為例指出，小至停車大至住宅政策、外交事務乃至於地方的完全自治、徹底獨立等爭議都涉

及兩個方面：一是提出要求控制的事項的範圍（scope），二是哪些領域（domain）內的人有權決定這些事項。他認為，對於哪些事項可以要求控制與誰有權決定這些事項的爭議，通常沒有普遍適用的原則與解決方案，而必須視具體的環境條件。

「就如同這些主張本身，可行的解決之道也極大程度取決於特殊的信仰、傳統、神話、歷史經驗，簡言之，取決於一群具體的人類所具有的紛繁多樣的經驗構成的現實，經常，或者說極常，關於範圍（scope）與領域（domain）的爭議並不是由合理的訴諸正義、自由、民主、自決、效率與其他抽象理念的力量來獲致解決，而是以暴力與強制的力量。抽象的價值觀只不過是為獲勝的結果的正當性充當合適的合理化根據。」（Dahl 1989:195）

Dahl 特別指出“每個民族都自我界定”（every people defines itself）與“政治獨立自主是絕對權利”（political autonomy as an absolute right）這兩種常被提出來做為普遍適用原則的訴求，其實是虛幻不實的解決方案（illusory solutions）。他質疑“每個民族都自我界定”的原則說，雅典人曾自認是住在獨立而民主的城邦中不同於其他希臘人的秀異群體，兩千年後，現代的希臘人自稱是一個民族而雅典人如今是更廣大的希臘人中的公民；維吉尼亞人在美國革命時認為自己是個維吉尼亞人的成份多於是個美國人，1861年美國爆發內戰，維吉尼亞人則自認為是南部聯盟的公民而非北方聯邦共和國的一員，今天則認為自己無疑是美國公民。由此可見，所謂“每個民族都自我界定的原則本身無法判定上述那種民族認同的主張是比較合理的，每種主張都符合“每個民族都自我界定”的原則，若照此原則，那麼要解決相互衝突的民族認同就唯有依靠宣傳與強迫，這麼一來，這個原則也就無法成為解決民族認同問題的方法，不啻宣告無解。關於“政治獨立自主是絕對權利”的說法，Dahl 也質疑說，一個民主國家如果宣告承認政治的獨立自主是絕對的權利，只因為任何一群人令人信服地表現出他們新而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體可以通過民主程序治理，就允許他們獨立自主，那麼國家或任何強制性的組織就都不可能存在。因為這樣一來，任何一群人只要在任何事務上遇到國家的強迫就可要求並通過分離來獲得獨立自主。他認為，這實際上是為無政府主義合理化，因而若認可政治獨立自主的絕對權利實屬錯誤。（Dahl 1989:196-197）

Dahl 在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討論什麼時候一群人構成有權民主自治的人民？，結論是：

「我們無法在民主理論中解決民主政治單位的範圍與領域怎麼樣才適當的問題，就像多數決的原則一樣，民主的程序必須以適當的單位為先決條件。民主程序的判準必須以單位本身合乎法理為前提。如果單位本身是不適當或不合法理的一即如果它的範圍與領域沒有合理的根據—那麼就不能只因為遵照民主的程序就認為它是正當的…。

要合理判斷民族單位的範圍與領域，我們就必需超越學理深入到實際判斷中去。因而，在實際的世界，什麼人構成民主目的的“人民”(What constitutes "a people" for democratic purposes)這個問題，由經常使用暴力與強制的政治行動和衝突來決定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根據由民主的原則與實踐而來的合理推論。因為如我們所見，在解決這個特殊問題上，民主理論並沒有多大效用。我曾說過，民主的構想並沒有產生確定的答案。民主的構想是以歷史與政治所已經給予或將給予的答案為前提的。(同上：207，209)

台灣政治紛爭的癥結

Dahl在這裡明白指出，哪些公共事務該被訴諸公決？而又是哪些人該被列入有權決定那些公共事務的“人民”範疇？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人民有沒有權利單靠本地的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獨立？所謂“多數決”是指魁北克省一地人民的多數，或是全加拿大人民的多數？這些爭議往往不能靠抽象的民主理論與民主程序本身來解決，相反，通常是議題範圍與誰是有權決定的人民主體的問題，經由歷史傳統與政治力的衝突對抗加以確定之後，才可能實行民主的程序。Dahl 這個觀點獲得西方不少研究民族主義與民主轉型問題的學者的重視(參考：Brubaker 1998：Stepan 1998)

我們根據前述Mill、Renan與Dahl的論述，來看台灣當前的政治紛爭，當可洞悉箇中癥結。台灣目前的狀態是：一、自李登輝主政以後，逐步朝脫離中國的方向滑動，至提出“兩國論”而徹底表露分離的意圖，但格於中共的反對與美國的不支持，自陳水扁上台至今，猶不敢推翻現有憲法，重新制憲，改變領土主權範圍，公開宣佈法理上的獨立，卻又不肯承認“一個中國”原則，處於「統一無心、獨立無膽」，不統不獨的懸浮不定狀態；二、由於在最根本的國族認同上產生分歧，朝野各黨派對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公共政策時生齟齬、對抗，屢屢無法取得共識，難以協調合作，使台灣的整體發展遭遇嚴重的障礙，這在陳水扁以絕對少數僥倖當選總統後，反對台獨的民眾與黨派認為其缺乏足夠的正當性，在不信任感之外更增加了不服與不平之心，情況尤其惡化。實際上正應驗了Mill所說的：「實行代議制度必須有統合的公眾意見，但在一國的人民中若

沒有同胞感情，…那就不可能形成統合的公意。」台灣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搞得亂象不止，一方面因為中下層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飽受過度勞動之苦，無力也無暇了解、過問政治事務，真正當家作主，唯有冷漠以對或淪為政客煽動、操縱的對象，而統治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也大多不脫“政治暴發戶”之氣，類多沐猴而冠者流，真解民主真義者尚不多見，遂致政壇群魔亂舞、怪象環生。另一方面則是國族認同分裂，對台灣前景、目標所見互異，自難能和衷共濟，生休戚與共之感。面對這種情勢，台灣分離主義者的主流對策是，暫借“中華民國”的招牌，拖延統獨對決的時刻，企圖從歷史文化教育上，逐漸消除台灣民眾的中國意識，同時以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對內培養台灣國的國民意識，以統一國族認同，對外則藉此爭取美國為首的國際勢力支持走向法理上的獨立。但我們可以很肯定地斷言，這樣的如意算盤到頭來終屬徒勞，理由如下：

“台灣主體性”的幻覺

一、如我們在前面所討論過的，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之得以確立，並非單靠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所可為功，其前提是具有以歷史、文化、語言為基礎的強固的民族認同，用Habermas的話來說就是：「民族國家與民主都是在民族主義的蔽蔭下茁長的。」台獨的台灣民族主義問題不在於它鼓吹民族主義，而在於“台灣”民族主義之缺乏可靠、令人信服的依據。台灣數百年來是中國的一個移民社會、台灣漢人從語言文字、宗教、文化乃至整個生活習俗無不襲自中國大陸，因而台灣社會保留了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認同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中國意識。台獨妄圖在這源遠流長、根基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之外，另搞一個與之對立的“台灣文化”，創造出“台灣民族”的認同，這除了像史明、王育德及其徒子徒孫那樣，用淺薄的知識、粗陋的理論硬生生地捏造、曲解台灣的歷史文化外，別無他法。但也正因其手法粗糙，往往荒唐錯謬，與史實及現實生活體驗過於乖違，種種謊言詭辭很容易就被批駁、揭破，流為笑談。台獨運動的主要導因是二二八事變與國民黨在台灣的法西斯統治。“二二八”事變的起因與性質本是專權又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權在其統轄區荼毒人民而普遍激起中國各地民眾抗暴中的一環，國民黨在台灣的高壓統治也是其政權的法西斯本質使然，基本上都不是什麼省籍矛盾，更談不上民族壓迫問題。可是，淺陋無識又急功近利的台獨卻硬是加以曲解成外省人甚至中國人壓迫台灣人，胡扯什麼台灣民族主義，高喊反民族壓迫。國民黨在台灣除了黨政軍上層在蔣介石時代主要由外省籍權貴掌控外，不論是政府機構、學校、官營的企事業單位都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地方政治也交由台灣的地方派系分贓，至蔣經國當政更加速進行本土化政策，連上層統治集團也吸納了不少台籍人物。經濟上則用“獨裁開發”的手段，削弱地主階級，扶植自

耕農，並全力發展依附於美日帝國主義的加工出口經濟，培植了大量的台灣資產階級，在付出鉅額的人與土地成本下，造就所謂的“台灣奇蹟”。在這個過程中，不分省籍都被編入了不同的階級。台獨罔顧這些客觀現實，渲染省籍矛盾，乃至無限上綱到民族矛盾，搞了幾十年卻始終無法獲得台灣多數民眾的支持，到今天不僅台灣民族主義已沒什麼市場，連民進黨也須改走所謂“新中間路線”，將台獨主張模糊化，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在國民黨統治下，得利的不都是外省人，受壓制剝削的也不都是台灣人，拿省籍甚至台灣民族來作為劃分敵我的標籤，是註定要失敗的。台灣沒有令人衷心信服且穩固的歷史文化作為民族認同的基礎，單憑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很難收凝聚人心鞏固國族認同之效，這是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公民民族主義”論難期有成的主要因素。

二、如Dahl所指出，徒有“民主程序”不足以解決民主的範圍與領域問題。哪些議題可以訴諸公決，參與公決的人民其內涵如何構成，難以由民主理論、民主制度本身來確定，而是取決於歷史與政治力。因而台灣分離主義者提出的“住民自決”、“公民投票”等主張，並無法從民主理論中獲得正當性。對於台灣的主權歸屬，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反台獨勢力都認為在兩岸的憲法都主張“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台灣無疑是中國的一部分。故而台灣的主權問題不能單靠台灣本身來決定，而是全體中國人皆有權參與決定。眾所周知，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與國際勢力干預下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台灣分離主義者片面主張將台灣脫離中國內戰狀態，企圖引進國際勢力把台灣由中國的內政問題轉為國際問題，不論在現實上或法理上都無法證明其正當性與可行性。今天台灣分離主義者既不敢也不能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並向國際宣告獨立以取得法理上的獨立國家資格，卻又不願遵守憲法明白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就顯現了其左支右絀的困境。故而所謂“住民自決”、“公民投票”不論在台灣內部、中國大陸或國際上都不可能獲得有力支持。台灣分離主義者想罔顧實際情況，拿自由主義抽象的民主理論當作普世適用的萬靈公式，如Dahl所言，這是難以站得住腳的。

三、因此，我們必須撇開抽象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從實際情況出發來看台灣的統獨問題。十幾年來，所謂“台灣主體性”的論調在台灣分離者口中叫得震天價響，可是，說來諷刺，這種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台灣主體性”骨子裡卻是由匍匐跪拜美、日帝國主義的奴性構成的。我們這麼說絕非出自主觀偏見。只要看看分離主義者歌頌日本殖民台灣是為台灣的現代化奠基，李登輝、金美齡等人對日本右翼勢力的諂媚、逢迎，再看看李登輝、陳水扁為首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對美國的卑躬屈膝，美國主子喝令立正，絕不敢稍息的奴顏媚骨。最近的例子則是美

國發生“911”事件，外交部長田弘茂主動表態台灣必須站在美國這一邊，行政院還自動下令要台灣為“911”下半旗致哀，種種不勝枚舉的例證，無不彰彰明甚地顯示台灣分離者十足卑賤的奴性。他們所高喊的“主體性”實際上不過是仰美日帝國主義鼻息，鑽在美日保守勢力的褲襠下搖尾乞憐的奴性。台灣分離主義者之所以會產生自欺欺人的“主體性”幻覺，主因在於20世紀80年代之前，台灣與中國大陸隔絕，依附在美日帝國主義下，搞出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80年代後又進行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造，遂在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籠罩下，沾沾自喜，以為可以永遠攀附在美·日帝國主義之後，脫離中國而發展出比中國大陸優越的政治經濟體制，卻完全不自覺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是依靠什麼樣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形成的？台灣的政治經濟體制又有什麼內在的弱點？是否真能獨立自主的發展？當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發生重大變化後，台灣又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台獨日暮途窮的政治經濟分析

關於這些問題，李崇人在〈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下）〉做了很扼要的分析：

「近二十年來，在中共開放大陸市場，港、台資金大量湧入大陸下，港、台、大陸已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國經濟圈。這個趨勢在兩岸加入WTO後，會更加快速的進行。由於兩岸在80年代之前的發展戰略不同，兩岸在經濟結構上有高度的互補性。大陸在毛澤東時期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不以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為指導原則，主要著力於重工業、國防工業與高科技，走的是重積累輕消費的路子。台灣則是加入世界體系的國際分工，按照比較優勢論，充當跨國資本的加工出口基地，發展勞力密集的輕工業，急功近利的結果是，重工業的基礎薄弱，基礎科學與高科技都難望大陸項背。因而大大限制了台灣產業結構升級的潛力。80年代後，大陸與東南亞也紛紛效法東亞的加工出口模式，其土地、勞動力成本本來就低於台灣，加上台灣內部勞工與環保運動風起雲湧，更加重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做為台灣加工出口經濟主幹的中小型企業除了大量外移大陸與東南亞之外，別無生路。90年代後，大陸加速了經濟增長，內部市場擴大，高科技產業也開始茁長，而台灣的生產成本有增無已，政治鬥爭在民主化後更形劇烈，整個投資生產環境日形惡化，催化了台灣企業加速外移至積極招商引資的大陸。而且，此際外移的已不僅是中小型的勞動密集產業，大型企業與電子、信息產業也趨之若鶩地往大陸投資設廠。過去，民進黨一再以危及國家安全的理由堅決反對兩岸三通。近來，從總統陳水扁到大批民進黨立委卻大談三通為台灣經濟發展所必須，李登輝限制台商投資大陸的『戒急用忍』政策已不合時宜，應早日鬆綁。以前聲嘶力竭地高喊的所謂國家安全忽焉置

諸腦後，不以為意了。這很鮮明地顯示了客觀現實的發展趨勢。綜而言之，統一的中國大市場的形成是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產生結構性變化然結果。

二戰後，中國的分裂是美國利用台灣做為遏制中共的工具所致。80年代前，台灣在美國卵翼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中國大陸隔絕，依附在美、日帝國主義下，成為美日經濟圈的附庸，獲得高速的經濟增長。但台灣的依附型經濟並不具備自主發展的能力。80年代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丕變，美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支援轉弱，大陸實行經濟的改革開放，台灣的產業結構轉型發生困難，迫使台灣重回中國經濟圈。這些因素使台灣的分離勢力陷於愈來愈不利的處境。

眾所周知，台灣要從中國徹底分離出去，沒有美國的鼎力支持絕無可能。台獨運動從來不具備獨立自主的能力。過去如此，未來也必然如此。面對中國大陸強勁的民族主義，美國若公然支持台獨，就必須冒與北京開戰的危險，這非但將危及美國本土，也破壞了美國推動資本全球化與和平演變中國的大戰略，無論如何是得不償失之舉。在美國看來，台灣進入中國經濟圈，可與全球資本共同戮力演變中國大陸，有利於使中國早日與美國親善，並可降低兩岸的緊張關係，避免美國捲入戰端，這遠比支持台獨符合美國利益。台灣在美國這樣的戰略構想下也只能俯首聽命。主張台獨的陳水扁從總統大選前到僥倖當選後，一再申言，他的兩岸政策會讓美國滿意，即可窺見此中消息。

台灣的漢人無論是血統、語言、宗教無不源自中國，而台灣與大陸近百年的兩度分離又無不為帝國主義所造成。台獨在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大肆煽動反中國的情緒，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這無疑只能製造兩岸人民的仇視對立，尤其為深懷反帝民族意識的大陸人民所無法容忍。台灣要搞獨立，兩岸只有戰爭一途，絕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這是無可迴避的現實。台獨人士經常自說自話什麼兩岸是遠親近鄰，台灣獨立之後，兩岸可以親善友好，成為兄弟之邦，這些純屬自欺欺人的痴人說夢。其實台獨要能成功，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敦請美國主子出兵打敗中國。不過，付出的代價卻是，美國從華盛頓到洛杉磯都可能遭到中國核彈攻擊而死傷慘重，台灣也落得個一片斷壁殘垣。姑不論要美國為台灣建國流血只是天方夜譚，果然成真，請問又對誰有利？從這點來說，台獨只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沒什麼獨立自主而言，從而台獨也沒有什麼左右派之別，思維上都是主觀唯心，實踐上都是帝國主義的奴僕。」（《左翼》第十二號 30—32）

台獨欲為美國忠狗亦不可得

李崇人的上述分析是一年前所撰，證諸陳水扁政權在不久前通過經發會修正

了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放鬆了對台商投資大陸的限制，足見其分析的正確性。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分離主義者猶不知今夕何夕，對此憂心忡忡甚至痛加指責此舉將導致台灣融入中國經濟圈，喪失台灣的“主體性”。殊不知在台灣經濟成長率下降，失業率不斷攀高下，再不改弦更張，放棄台獨的意識形態，將引發政治、社會的動盪，陳水扁即面臨政權的“合法性危機”，總統寶座終將不保，民進黨政權只有垮台一途。這不是空喊什麼“台灣主體性”、“公民意識”、“公民社會”所能解決的。李崇人的分析很冷靜地指出台灣獨立所要付出的重大代價與其在當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下難以得逞的結構性因素。這是包括何六九在內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必須務實面對的問題，光是抬出正當性薄弱的、實際上也做不到的“住民自決”、“公民投票”，大談“公民民族主義”、“公民意識”、“公民社會”等論調，情緒性地指責中共“蠻橫”、“不文明”，理論上既站不住腳，也無補於實際。

何六九很在乎左翼統一派斥責台灣分離主義者是美、日帝國主義的“奴僕”、“走狗”。我們在這裡先引述在日據時期曾以漢人的孺慕之情賦詩呼喚祖國的台灣老作家巫永福的一段話：

「台灣人受過台灣光復時的浩劫記憶猶新，二二八事件慘案的歷史傷口陰影依然存在，四十年戒嚴的憎惡，更有四萬元舊台幣兌換新台幣壹元的痛苦經驗，對大陸不再有幻想。因為政治對生活的品質影響極大，其好壞對人的思想影響也是最現實，猶如古諺謂，『願作太平狗，不作亂世民。』感情歸感情，現實歸現實，台灣為自求多福，安定發展，大家一起來建設新國家、新台灣有什麼不好呢？」（巫永福 1989）

這段話是巫永福〈台灣獨立為什麼不好？〉一文的結論，通篇以我們上面批判過的“自由民主意識”、“台灣主體性”為立論依據。我們感興趣的是，巫永福坦白承認「願作太平狗，不作亂世民」，意即願當在台灣享受民主、自由、富裕的“太平狗”而不願成為中共專制統治下的貧窮之民，這相當有代表性地準確道出了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心聲。這也很符合“公民民族主義”論強調擺脫族裔觀念與感情，根據“理性”，自由選擇國族認同的主旨。關於源自“台灣主體性”幻覺的心理，我們已經批判過。這種一廂情願的“太平狗”思想，目前碰到的實際問題是，台灣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並無自主性可言，台灣若斷絕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聯繫則必將陷入經濟危機，而美國主子在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考量下，不願冒犯中共以致危害美國的利益，非但不肯公開支持台灣獨立，在李登輝提出“兩國論”激怒了中共之際還勒緊拴在台灣頸子上的皮帶，加以制止，李登輝分裂中

國的圖謀遂告流產。這顯示了台灣連充當美國走狗對抗中國的價值都大為降低，欲如冷戰時期之為美國忠狗也不可得了，陳水扁上台後的“四不一沒有”政策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今天，台灣的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在野勢力已認清了這個現實，明白宣示“不當美國對抗中國的馬前卒”、“不做美國反中國的棋子”、“不充當中美對抗的炮灰”、唯獨何六九之流的台灣分離主義者還不拋棄幻想，妄圖靠繼續抱住美國大腿，建立台灣共和國，豈不悲哉！在美國主子心中，拴在台灣分離勢力這條走狗脖子上的皮帶，視其利益考量，可緊可鬆，一旦不合所需，甚至會為其製造麻煩時，毫不猶豫地加以絞殺，烹調成祭品，絕不是不可能的事。真到了那一天，那也只能說台灣分離主義者自甘下賤，咎由自取，怨不得誰。

左翼的中國統一觀

我們可以很明確地告知何六九之流的分離主義者，只要他們一日不擺脫依附美、日帝國主義的奴才思想，不論抬出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深懷反帝意識的中國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心目中都不可能獲得脫離中國的正當性。正如恩格斯在批評拉法格時所說的，臣服於俄國下的法蘭西共和國沒有資格談要幫助德意志帝國的工人階級尋求解放。恩格斯在 1882 年 2 月 7 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說：

「一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民族獨立，歷史地，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範圍內才有可能，…民族獨立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4 卷：427—428）

這也是我們對統獨問題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本觀點。

以研究世界史與民族問題聞名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 Hobsbawm 曾指出：

「原先正統的十九世紀自由民族主義與當前力圖用分離主義來界定群體認同的潮流正相對立。自由民族主義旨在擴大（黑體字為原文所有）人類社會、政治與文化單位的範圍：力求統合與擴張而不是限制與分離。這是何以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自由且革命—民主的十九世紀傳統如此志趣相投的一個原因。反殖民的民族主義者視“部落心態”、“地方團體意識”或其他局部與地區的認同為反民族的意識，這種反民族的意識是為眾所周知的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利益服務的，因而必須加以摒除，或說至少要將之置於民族意識之下。」（Hobsbawm 1996 [1992]：257）

Hobsbawm的這個觀點很可以說明我們從中華民族的立場主張中國統一的觀點。

我們通過批判何六九的論述，全面表述了左翼的統一觀。我們歡迎統獨左右的各路“方家”就此提出質疑辯難。我們強調“方家”是要著重指出，有意義的論辯，正如我們在本文之首引述的Habermas的理性溝通論所言，須具備四項要件：1、陳述的言詞明白易解；2、陳述的內容真實可信；3、態度真誠；4、論證精當令人折服。故而，我們期望有經過慎思、明辯，不但從理論上，更是建立在現實情況上，提出可信的證據，邏輯一貫，論證精審的批評，讓我們在統獨問題上有更深刻的認識。至於用詞之“文雅”或“粗暴”尚屬其次，我們不屑於帝國主義者與何六九之流“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慣技。只要真能以“理直”做為基礎，我們不懼任何“粗暴”的批判。我們願以此不算不情之請的要求，就教於各路方家。（全文完）



編輯部更正

《左翼》第二十二號張懷思〈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中) p.17 第11行 p2 - p3 乃 92 - 93 之誤。P.17 第26行在一、之後漏植一個“對”字，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與讀者致歉。

註釋

3. 台獨曲解“二二八”事變將其起因非常幼稚膚淺地歸諸所謂落後的中國政權統治先進的台灣所導致的文化衝突。何六九這個台灣史盲附和台獨這種可笑的論調，並為了醜詆他所謂的血緣論民族主義是歸罪於漢民族主義。他在《鄉鄙》中說：

「在血緣方面差異不大的族群和民族當中，往往互相表現出最大程度的敵意，一方奉血緣的“民族大義”之名，向另一方作出最是血腥殘暴的“淨血”殺戮。國民黨對待敵國的殘暴佔領軍講求以德報怨，而對於在血緣上同樣屬於廣義漢族的台灣人則以血淋淋的大殺戮相待，絲毫不念血緣之情。」（《左翼》第二十號：19）

又加上註解說：

台灣人曾經長期受到異國文化影響，這似乎特別引起國民黨集團的憎恨，因而被視為背祖的異類。

關於“二二八”事變的起因與經過，近年來隨著史料與當事人的見證的大量出現，真相已日見明朗，一些比較根據客觀證據立論的著作也已出版，正可證明台獨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此處我們只要引證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自由派學者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的一段材料就可駁倒台獨與何六九的“二二八”事變的荒唐解釋：

「抗戰後期，甘肅、四川為徵兵徵糧，均曾發生過民變，以甘肅為嚴重。勝利之後，一九四六年九月，四川亂事又起，眾至十餘萬，不久平定。十二月，西康以不堪省府主席劉文輝的橫徵暴斂，大規模的暴動繼之而來，眾至五十餘萬，組織『政治革新委員會』，歷時三個月。（郭廷以 1980：780）

這裡所敘述的大陸各地民變發生時間都與台灣的“二二八”相去不遠，而起事民眾的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又遠過“二二八”。請問這也是所謂的“文化衝突”或者“血緣論漢民族主義”造成的嗎？分明是國民黨政權既暴虐又無能，激起全中國各地的民憤，才同時造成包括“二二八”在內的民變蜂起，「反饑餓」、「反迫害」的學潮亦復洶湧。台獨卻硬要說什麼是中國人壓迫台灣人，落後的中國統治先進的台灣所致的鬼話。還很可笑地據此推論說，香港在回歸中國後也會發生類如“二二八”的文化衝突事件。結果，時至今日，台灣的政治是一片亂象，而經濟情況比香港還糟。台獨的幼稚論調遂不攻自破。

4. 江宜樺在《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一書中，忽視了Habermas對民族主義在鞏固歐洲民主制度上的肯定。他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對Habermas的觀點做了不盡準確的解讀。（江宜樺 1998：110—113），有一部分甚至是誤解（同上：122）。

參考書目

- Anderson, .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Balakrishnan.G.(1996) *Mapping the Nati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Balakrishnan(ed.) Mapping the n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55-266.
- Berlin, I. (1981) Against the Curr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eton, R. (1988) "From Ethnic to Civic Nationalism English Canada and Quebec, "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1:1, 85-102.
- Caplan, R. and John Feffer eds. (1996) Europe's New Nationalism: State and Minorities in Conflict.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hbour, Omar and Micheline R. Ishay eds. (1995) The Nationalism Reader.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1997) Nation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 Praxis International 12:1-19.
——(1996) 'The European Nation-State-Its Achievements and Its Limit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vereignty' in Gopal Balakrishnan ed. Mapping the Nation, 281-294.
——(1998)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Tr. By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9)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Cambridge, MA. : The MIT Press.
- Hall, J.A. (ed.) (1998)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 J.A. and I. Jarvie eds. (1996)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Ernest Gellner. Amsterdam-Atlanta, GA: Rodopi.
- Hobsbawm, Eric (1989) Politics for a Rational Left,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92)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 Hroch, M. (1985)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From National Movement to the Fully-Formed Nation: The

- Nation-Building Process in Europe' in Gopal Balakrishnan ed. Mapping the nation, 78-97.
- (1998) 'Real and Constructed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91-106.
- Ignatieff, M. (1994)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 Lundestad. G. ed (1994) The Fall of Great Powers. Oslo • Oxford: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Neill, W.H. (1994) Introductory historical commentary, in G. Lundestad ed. The fall of great Power, 3-21.
 - McMillan, J. (1996) 'Scotland's Quiet Nationalism' in Richard Caplan and John Feffer ed. Europe's New Nationalism, 75-84.
 - Nairn, Tom (1997)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97)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O'Leary, B. (1998) 'Ernest Gellner's diagnosi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overview, or,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in Ernest Gellner philosophy of nationalism?' in Hall, J.A.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40-88.
 - Realit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992】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 in Gopal.
 - Smith.A.D.(1983)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omes &Meier Publishers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Las Vegas-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6)【1992】'Nation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in Gopal Balakrishana (ed.) Mapping the Nation, 175-197.
——(1998)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Greenfeld, Lian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Yack, B. (1996) "The Myth of the Civic Nation", Critical Review 10, no. 2 (spring 1996), 193-211.

- 江宜樺 (1998)《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
- 張茂桂等 (1993) 《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費孝通 (1989)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1997) 〈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 納日碧力戈 (2000) 《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 馬戎、周星主編 (1999) 《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與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翁獨健主編 (2001) 《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編寫組 (2000)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北京：民族出版社。
- 郭正亮 (1998) 《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 《原住民族》第12期·台北：原住民部落工作隊。
- 巫永福 (1989) 〈台灣獨立為什麼不好？〉，《首都早報》，1989.10.4第6版。
- 陳延琪、潘志平主編 (2000) 《泛突厥主義文化透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趙剛 (1996) 〈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1期，1 - 72。
- 汪東林 (1988) 《梁漱溟問答錄》，香港：三聯書店。
- 李崇人 (2000) 〈統獨右左問題的上下求索〉(上)《左翼》，第十號。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下)《左翼》，第十二號。
- 吳乃德 (1996) 〈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5 - 38，台北：月旦出版社。
——(1997) 〈國家認同和民主鞏固之衝突、共生與解決〉，收於游盈隆主編 (1997) 15 - 30
- 游盈隆主編 (1997)《民主鞏固或崩潰 - 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出版社。
- 郭廷以 (1980) 《代近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胡佛 (1995) 〈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序〉，收於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台北：世界書局。
——(2000) 〈用寬度的眼光破解政治難題〉，《聯合報》，2000.1.6第15版。

- Anderson, P. (1996) Science, Politics, Enchantment, in Hall, J. A. and I. Jarvic eds.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Ernest Gellner*, 407-426.
- Balibar, E. and Immanue Wallerstein (1991) *Races, Nation, Clas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Brubaker, R. (1998)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272-306.
- Dahl, Robert, 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 (1994) *Specters of Marx*. Tr. By Peggy Kamu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Hall, S. (1996) New ethnicit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441-449.
- Mill, J. S. (1993【1861】)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London: Dent; Rutland, Vt. Tuttle.
- Morely, A and Kua-Hsing Chen eds.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eledge.
- Mulhall, Stephen and Adam Swift (1992) *Liberals and communitari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Renan, E. (1995) "What is a Nation?" in Omar Dahbour and Micheline R. Ishay eds. *The Nationalism Reader*, 143-155.
- Stepan, A. (1998) "Modern Multinational democracy: transcending a Gellnerian oxymoron.",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219-239.
- Wallerstein, I. (1995) *After Liberali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編輯報告

九月十一日發生的紐約世貿大樓自殺攻擊案，勢必將對今後全球的局勢產生重大的影響，但台灣的媒體卻受美國文化霸權的影響，只是一面倒的對所謂的恐怖主義行動加以譴責，陸文瑯〈九一一初探〉先對恐怖主義概念加以釐清，並進而論及九一一事件對國際反帝力量提振所具有的時代意義。此刻，美國正準備發動大規模入侵阿富汗的戰爭，阿富汗的人民正用他們的血肉為我們築起抵抗帝國主義擴張的長城，為著全人類永久的幸福而奮鬥，我們祝禱他們勝利成功。

九二一大地震已經兩周年了，台灣的主流社會似乎早就忘掉了災區的存在，「災區」一詞已被「重建區」所取代。從災變以來，許多社運工作者曾經投入災區工作，有些人甚至現在還留在災區為民眾服務。另一方面，一些打著「專業社區工作團隊」的團體與個人卻假藉重建為名，開始吞蝕災區重建的資源。左判〈從九二一災後重建看台灣社區總體營造對台灣社運的影響〉，對於這些伴隨李登輝時代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出現的社區工作者有著很深入的分析與批判。本文初稿雖然完成於去年歲末，但所揭露的問題迄今仍然存在。

張懷思〈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下)〉，在接連兩期對何六九民族問題的論述加以評擊後，本期的結論部份，作者將焦點轉而集中闡述統一與左翼之間的關係，作者認為：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不必然對立，國際主義並不意味取消祖國、犧牲祖國，主張中國統一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我們很遺憾本期的《左翼》脫期了，第二十三號的《左翼》事實上是與第二十四號同時出刊的。左翼的工作同仁基本上都是以工餘、課餘的時間投入刊物編輯與印製工作。過去兩年裏，靠著許多左翼朋友的支持，《左翼》一直能維持準時出刊，但各項人力、物力的困難卻也一直侷限著我們的發展。本期《左翼》未能準時出刊，似乎也顯示《左翼》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究竟何去何從，正考驗著所有《左翼》工作同仁，我們將會嚴肅面對，也希望所有關心台灣左翼運動發展的朋友一起來思考這個問題。

左翼 第二十三號

出版日期：2001年9月30日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二十四號



〈憤怒的人民〉

作者：楊納雄

誰能代表陳水扁？

林深靖 / 2

瞄準經發會——從就業組談起

鄭怡雯 / 5

世界反全球化鬥爭與台灣左翼青年運動

楊偉中 / 9

【爭鳴與求是】“理直氣壯”因何而生？（一）

何六九 / 19

覆汪立峽先生

何六九 / 31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五〉

黃志龍 / 33

誰能代表陳水扁？

林深靖

今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高峰會於10月21日在上海科技館落幕，與會領袖身著唐裝在萬里長城的大屏幕下一字排開。作為會員體的台灣缺席了，但是，在這個權力的隊伍中，看不出任何的空缺。也就是說，台灣在APEC中固然有它的位子，而它究竟在不在位子上，似乎完全不影響整體的畫面。

最後共同發表的「領導人宣言」和做為附件的「上海協議」及「E-APEC戰略」，台灣當然也沒有簽字。一段小小的歷史空白很快被島內選戰場上聲嘶力竭的怨懣所填滿。抗議中共打壓、欺負的聲浪很快淹沒了民進黨的每一個造勢會場。從海峽彼岸到此岸之間如此快速的情景變遷和情緒轉換，反而讓大家忘記了「缺席」的意義。

在哲學意涵上，「缺席」原可以是另一種方式的「存在」。缺席所形成的「空無」足以改變事物生成發展的性質。譬如，單親家庭裡，父親或母親長期「缺席」，這種缺席將形成一種足以影響子女成長過程的特殊「存在」。在司法上，「缺席」（不在場）可以是最有效的證據力。在政治上，「空椅子」可以是一種政策，用以作旗幟鮮明的表態。上海的APEC年會，台灣在雙部長會議和企業領袖論壇（CEO）全程參與，惟獨在最後的元首高峰會缺席了，其癥結當然是在台灣「領袖代表」人選的問題。台灣的缺席如果有意義，那麼其意義就在於「領袖代表」所引發出來的爭議。歸根究底，一個問題：誰能代表陳水扁？

回顧今年台灣規劃參與APEC年會的過程，陳水扁早在7月底就對美國洛杉磯時報的記者放話，表示他希望親自赴上海參加領袖會議，而不是依照慣例派出領袖代表。台灣當然有權力做這樣的主張，但是，既然要打破既有規範，首先就必須要求重議1991年10月2日中國大陸、香港、台灣三地同時加入APEC時所簽署的「諒解備忘錄」（簡稱MOU），對於1993年首度高峰會所形成的「西雅圖模式」也必須要求重新審視。然而，從7月到10月，台灣方面並未就此做任何的聲明或努力，因此，阿扁的放話很合理地被理解為自慰式的表態。

直到10月9日，雙部長會議和CEO論壇已經準備就緒，距離領袖會議也只剩11天，陳水扁才突然拋出李元簇做為領袖代表的人選，而且，二話不說，居然就是「唯一的人選」。

已退休多年的李元簇重新出山，媒體在驚詫之餘，紛紛嘆為奇招妙局：李元簇具有前副總統和現任總統府資政的身分，如果他可以成行，那麼是阿扁的勝利，一舉提高了台灣代表的層級；如果中共悍然不接受，那麼被打壓的事實可以輕易轉化為年底選舉的訴求，對於習慣於以悲情激忿造勢的民進黨而言是一大利多。果然，一切都依計行事，在宣佈攤牌缺席的當晚，阿扁就在高雄的民進黨造勢晚會上痛批中共蠻橫鴨霸，斥罵在野黨媚共反扁，出賣台灣。熟悉的語言，熟悉的人潮，熟悉的反應，阿扁獲得他所熟悉的溫暖與安全。在這樣的場合，沒有人能夠代表陳水扁！

然而，陳水扁選擇李元簇做為他的「代表」，如果只是停留在這種表象的得失算計，政治論斷未免太過膚淺，忽略了決策者更深沉的性格和心理機制。在潛意識裡，李元簇以做為「沒有聲音的副總統」而著名，相對於盛氣凌人、口不擇言的呂秀蓮副總統，李元簇的緘默乖順可能是阿扁總統最深沉的想望，正因為念茲在茲，一旦需要選擇代表時，李元簇的影像首先浮出。

此外，李元簇的雀屏中選，也暴露出陳水扁「政治資源私有化」的施政風格。APEC 是當前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最重要的舞台，台灣加入APEC的這10年來，政府的外交、財經部門投下多少人力、心血，多少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為了APEC 而皓首窮經，這一切長期的、集體的智慧和努力，竟因為阿扁的即性決策和個人好惡而頓失著力點。遙想去年總統大選揭曉之後，阿扁即無視於政權交接的龐大工程，像花蝴蝶一樣到處演說、致詞，將「政黨輪替」標示為個人的豐功偉績，彷彿過去數十年的反對運動完全為他量身打造。而在他當權的這一年多以來，國營事業體的領導職位一一成為他安插家臣親信或酬庸金主財團的工具。如今，台灣經濟低靡，無數人因為失業而頓失生計與生趣，像APEC 這樣重要的經濟組織，更應該是台灣積極穿梭，擴展經濟合作領域的大好機會，如此台灣社會的共同機會和公共資源，竟化為阿扁個人私有的得失算計！一年多的綠色執政，無非是政治資源私有化的歷程。阿扁的APEC 決策，也只有放在這個脈絡中才可以索解。

阿扁似乎誤以為所謂「領袖代表」就是他個人的代表，因此，他自己決定了就算數，完全忽略了民主政體在政治決策上的延續性和可預測性原則。台灣做為APEC 的會員體，在行政體系、研究機構已積累出豐富的經驗和應對模式，民間對於參與APEC

也有一定的期待和認知，這些豈能因個人的私心和情緒而斷絕？

話說回來，即使認定這位「代表」是陳水扁的代表，而不是台灣整體的代表，可以完全不考慮 APEC 所要求的財經資歷，不考慮這位人士是否在上海行之後又將重新歸隱山林，既不「拚經濟」，也不涉政局，與台灣的未來發展是絕緣體；而只是純粹把他視為無聲無害的「一次性」工具，那麼像李元簇這樣一位過氣的乖順政客，一位舊政權的舊式官僚，他其實比起唐從聖更不適合代表陳水扁。

唐從聖做為在電視綜藝節目上模仿總統的諧星，他必須無時無刻地對阿扁「察其言，觀其行」，他對阿扁的揣摩成為其經濟活動的主要部分。何況，當今政治人物在公眾場合的活動本就帶有相當強烈的「表演」性質，唐從聖對阿扁本尊「表演」的「再表演」，有時候反而會有意想不到的鏡像效果，讓我們看到了被隱諱的角度。

且讓我們發揮奇思異想，做一個跡近科幻的假設：如果讓唐從聖做為阿扁的分身參加 APEC，那麼，他肯定會成為全球媒體矚目的焦點，會成為整個會場的核心人物，做為東道主的江澤民肯定會慌了手腳，無以自處。那麼，阿扁的「不在」，反而會因為其荒謬感和新聞效應，形成一種巨大的「存在」！要提高台灣的「能見度」，這是一個不妨考慮的步數。

★

小啓

本刊為贈閱性刊物，稿件全由左翼的朋友提供，本刊亦無能力支付稿酬，故文章版權悉屬作者本人，任何轉載本刊文章者，請自行與作者本人聯繫。

瞄準經發會

——從就業組談起

鄭怡雯

在景氣低迷民怨四起之際，阿扁說台灣的經濟問題並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信心問題。於是打著三大優先（台灣優先、經濟優先、投資優先）四大方向（全面招商、吸引投資、活絡經濟、創造就業）旗幟的經發會，成了執政當局藉此提振信心的法子。會議期間據說朝野黨派、勞資雙方、學界智庫等各路人馬紛紛出場表示意見，最後洋洋灑灑達成了三百二十二條共識，提出了「深耕台灣、佈局全球」的新世紀國家經濟發展願景和策略目標。撥開這些眼花撩亂的條條點點，以及諸多宣示口號的煙霧迷障，本文擬從就業組共識到近日的發展來探討，這些對策背後是如何反應了對問題的認識，又新世紀國家發展願景究竟所指為何？

經濟優先？投資優先？

翻開就業組總結報告五大題綱，林林總總條文所揭示的方向，與其他組別共識調性基本上殊無二致。總地來說，其核心要義即是藉由壓低包括勞動力在內的各種生產要素成本，以方便老闆們做生意。如此這般的旨意，貫穿整個會議，成了經濟發展的真諦。

「修改勞動法規，健全勞資關係，擴大勞動參與」為就業組十四位委員的共識題綱一，看似無毒無害的文字陳述，背後卻是內藏玄機。首先，會中共識是以建立勞資協商機制作為所謂擴大勞動參與的表現，但無論是廠場層次抑或全國層級，考驗勞資協商的關鍵之鑰正是力量的對比。歐洲社會統合主義發展模式一向被視為勞資集體協商的典範，但言必稱歐洲者卻往往忽略了這樣的發展正是工人運動壯大下的產物。執政者為避免勞資衝突持續升高進而影響政權合法性的維繫，因而建立一套可透過體制協商的管道，以期消弭衝突。而在勞資力量對比尚仍懸殊的台灣，近年來從工資調整到處理勞資爭議等勞動政策修法意向來看，勞資自行協商已成了官方屬意的政策方針，並美其名為走出國家統合主義窠臼的「勞資自治」精神展現。然橘逾淮而為枳，也無怪乎經發會號稱勞資政三方共識下的勞資協商機制，會把目標明明白白赤赤裸裸地直指往勞動彈性化之路邁進，而「放寬工時彈性」、「放寬工時限制」等「排除企

業人力資源運用困擾」的具體共識，則實體化勞動彈性化的面貌，充實其血肉。因此在經發會鮮明地豎起彈性化的大旗後，為落實經發會決議的勞動三法修法緊迫在後，通過「工會幹部會務假落日條款」、「工會的不當勞動行為」等條文草案，此舉不僅再陷工會於捉襟見肘，難以施展的田地，同時更強化彈性化方針的火力，使其更為鞏固。

另一方面，原先被勞工代表視為戰果的「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會後卻傳出官方將以程序法作為日後規劃的方向，在避免降低企業經營意願的考量下，刪除限制雇主出境、延緩雇主投資其他企業上市上櫃，以及積欠勞工資遣費、退休金等優先清償權等多項強制性條文，日後雇主只要在大量解僱勞工前，先訂出計劃與勞工代表協商，並報請地方行政主管機關備查即可（經濟日報2001/08/29）。這麼一來，關廠解僱勞工的方便之門為雇主而開，「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不單淪為「保護大量解僱勞工法」，更成了資本家動輒以撤資勒索工人的一項利器，畢竟關廠解僱非難事，更何況就算不依官方程序辦事，頂多罰他個幾十萬就可了事。事態若真如此展演下去，「修改勞動法規，健全勞資關係，擴大勞動參與」的就業組首要共識，還倒不如以「勞資協商-->勞動彈性化-->大量解僱」三部曲描繪來的真切些。換言之，藉由勞資協商作幌子，行勞動彈性化之實，工人若頑強抗拒，則以大量解僱伺候之，如此直搗黃龍，據說，也是為了「提振信心」解決經濟問題！（註一）

活絡經濟？創造就業？

面對越演越烈的失業情勢，這次經發會就業組提出的因應措施具體可見題綱三「建構完整就業安全體系」。就業安全體系主要由就業輔導、職業訓練和失業保險三個支點構成，而失業保險單獨立法則擬與職訓、就業輔導系統相接合，希冀藉此完善化整體就安系統。

辨症論治始能抓出藥方。就安體系作為一劑藥方，不免令人感到失業彷彿是個人問題，非因社會結構使然，因此只有透過不斷的職業訓練，提昇素質以解決問題。但如果說就安體系主要作為促進就業的手段，下一步便是尋求與工作機會的媒合。在經發會總結報告中可知，就業機會主要透過兩種途徑，一是執行外勞緊縮政策（見題綱二）來拓展本勞就業機會，但與此同時也把減少外勞薪資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納入共識，然弔詭的是，廉價外勞勢必增加雇主聘僱的誘因，儘管外勞政策會在總量管制原則下進行修正，但是別忘了，儘管共識文裡充斥不少抽象模糊的字眼，但其中卻有著這麼一則清清楚楚的但書--「勞委會在執行(外勞)政策時應主動協助業者進用所需人力」。所以外勞政策如何「以促進本國勞工就業為目標」，看來只有天知道。此外，

在就業機會的開創上的積極作為，經發會則是提出了以下三點對策：1. 以工代賑，救濟失業。2. 整頓觀光景點基本設施，積極發展觀光事業，吸引外國旅客。3. 降低稅率、增加公共投資、加強基礎建設、提昇產業競爭力、以創造就業機會。

有鑑於失業蔓延對社會安定維持的破壞力使然，因此不少國家的福利支出和失業率係呈現正相關走勢。永續就業工程作為以工代賑救濟失業的主要內容，實際上是以「福利雇用」型態來替代救濟支出的便宜之計。就目前推行的永續就業工程而言，區區六個月的執行時間（註二），工作性質大多是以照顧服務取向為主，收入僅略高於基本工資，因而此一措施可發揮的效益大抵不脫生活照顧。先不論在資本主義社會下「永續就業」此類近幾天方夜譚的字眼，生活照顧能有多長的「持續性」，還得視政府有多大的能耐來擴大社會福利支出。但是從經發會整體訴求觀之，不難得知，眼下打的算盤一大部分是透過降低老闆們的稅款，來提昇所謂的產業競爭力。這麼一來，稅收的減少必然影響國庫實力，除了就業安定基金作為可能的資金來源外，政府若無法在財務上給予挹注，長期來看，無疑宣告了此等社會型永續就業工程計劃將窒礙難行。

再者，在提昇產業競爭力必能創造就業機會的緊箍咒作用下，老闆們卯起來索求各種以提昇競爭力為名的諸多措施，打壓勞動條件成了當然的一環。但是提昇競爭力讓老闆好做生意，與促進就業之間真存在絕對的必然關係？為了提昇競爭力，鼓勵產業進行結構調整，因此修改公司法經營相關法規，便利企業併購（見產業組報告），然併購和裁員失業，從經驗材料得知總是一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生關係；又寄望藉由推動休閒農漁園區計劃、發展社區暨地方特色產業來振興農村和地方經濟，促進當地就業的同時（見產業組報告），卻也在提昇企業競爭力的疾呼下，壓低勞動條件，降低勞動成本。面對著工資減少和失業增加的實際景況，這些新生萌芽產業若以國內市場為主要訴求，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窘境下，恐怕也無以為繼。況且若真要競比企業競爭力，尤其是在勞力密集的製造產業，就算工人在老闆撤資勒索的威脅下，主動降低勞動條件，老闆果真會因此不落跑？如果說工資等勞動成本是老闆眼中最大的考量，以目前台灣的物價水平，無論如何怎麼也不可能比得上在南中國的民工來得廉價——一天工作16小時工資3000元新台幣的生活條件。對資本家來說，大概很難找出死也要「優先」留在台灣的理由。相形之下，工人們忍氣吞聲，以為委屈可以求全，無形中卻長了資本家們的氣焰，撤資成了勒索工人的超有效手段，一種誠惶誠恐的氛圍挾持著整個社會。

事實上，全國工業總會為彙集國內工商界對經發會的看法，曾經於五月二十五日

至六月七日間，針對所屬理監事暨會員代表（大多為製造業龍頭）進行意見調查，根據這次調查，工業界目前營運上所面臨的瓶頸，最大的問題便是「同業競爭激烈，無利可圖」(67.8%)，其次是「國內市場飽和」(46.1%)。這兩者都點出了生產過剩——大量生產卻不見得有消費者，為當前面臨的根本困境。而給予老闆們各種租稅優惠、降低工人勞動條件和土地資金取得的便利，只是把白花花的銀子直接往老闆口袋裡倒，就連本應是保障工人基本生活的退休金改制，在堅持不增加政府財政負擔的共識前提下，也轉身成了替金融資本集資的管道(註三)。

陳阿扁說經發會是得來不易的成果，是第一次朝野政黨共同攜手，以由下而上的民主方式所達成的全民共識，他還說經發會是兼顧永續的環保、勞工的權益、弱勢的照顧，以及社會的正義，符合他阿扁一再強調的「新世紀、新國家、新中間路線」的精神。但是老闆們發狠需索無度、政府讓資本家們予取予求和工人發愁過日的景象，才是經發會的實際情況和效果。阿扁又說了，經發會的結論是否能夠落實，重點不在於中共能夠接受什麼，而是台灣民眾可以接受什麼。這種老闆發狠、工人發愁、政府像個傻子般隨老闆起舞的經濟發展，台灣的勞動大眾，我們，能接受嗎？

★

註釋

註一：刪除對企業具約束力的程序法風聲一出，即引起勞工團體的反彈，勞委會於是聲明不會放棄相關的實質懲罰條款。十月初出爐的大量勞工保護法草案初稿，雖保留了不准企業負責人的其他公司上市上櫃，以及禁止海外投資的條文，但至本文截稿前，由於資方代表反對，勞委會則又表示會對這些限制規定再作修正，使其不致過度侵犯資方經營權（中國時報2001/10/06）。後來發展仍待持續關注。

註二：自九十年七月一日推行的新制，扣除第一個月的籌備期，實際工作時間為九個月。

註三：在一場名為「勞工退休金制度改革對保險業的影響」座談會裡，與會者談到八月二十一日完成的就業組總結報告，其中多軌制並存的退休金設計，為保險業者商業年金介入，開啟了一道門。會中並決議由國泰、新光、外商保誠各派代表，加上精算學會、壽險公會、勞工代表與勞委會處長陳仲賢等共同討論未來適用的保險新商品。

世界反全球化鬥爭與 台灣左翼青年運動

楊偉中

一、前言

2001年6月24日，星期天，兩萬名以上群眾聚集在西班牙巴塞隆納市中心抗議世界銀行，世界銀行破天荒的宣佈取消原訂於25日到27日舉行的經濟發展會議。6月26日凌晨，在南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首都摩爾斯比港(Port Moresby)，警方對抗議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界銀行私有化計劃的群眾開火，三名學生死亡，十七人受傷。繼6月14到16日，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強力鎮壓在哥特堡的反全球化示威後，這是又一樁更血腥的鎮壓事件。沒有想到的是，一個多月後，20多萬群眾聚集在義大利熱那亞抗議八國高峰會，義大利警方卻公然射殺一名示威青年。各國政府對反全球化運動採取了日漸升高的暴力鎮壓，已經引起國際性的關注與抗議。

從1999年12月西雅圖的反WTO群眾示威開始，從布拉格到尼斯，從墨爾本到漢城，反全球化運動在世界範圍展開，與此同時，世界各地工人階級、青年與被壓迫群眾的反抗也在復興。今年4、5月，希臘工人階級發動二十多年來最大規模的群眾動員，總罷工席捲各城鎮，以抗議退休金的所謂「改革」。2000年2月，爲了反抗當局的新自由主義攻勢，赤貧的厄瓜多工農發動反叛，推翻了政權。在亞洲，印尼群眾推翻了蘇哈托獨裁政權，類似的場景也在菲律賓上演。

僅僅在幾年前，資本主義的辯護士還在高唱歷史的終結，宣稱自由市場已經獲得歷史性的勝利，如今，反全球化運動和世界各地的反叛，突顯了資本主義體制的不穩定，預示了反對腐敗、不公以及各種經濟社會壓迫的全球性抗議運動即將到來。在各國的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有一個雖佔少數但具有相當意義的成份正在覺醒，他們拒絕並反抗資本主義帶給他們生活與家庭的不幸與壓迫。世界的形勢正在改變，十幾二十年來全球社會變革運動的低潮有了轉變的契機。

在台灣投身社會變革運動的我們，實在有必要充分掌握世界形勢的新發展，並從反全球化運動中汲取經驗教訓，檢討我們運動的方向與策略。對我們來說，世界各地的反抗運動不應該是和我們無關的媒體上的騷動。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台灣，不正也經歷著失業、私有化、勞動法令改惡、勞動彈性化、社會福利削減和生態環境破壞等的威脅！？

二、什麼是全球化？

在今天，我們不斷從政府官員、政黨領袖、企業精英、專家學者和大眾媒體那裡聽到「全球化」這個詞。全球化被描述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純粹客觀的、自然而然的過程：技術革命、不斷增長的國際貿易與投資、民族國家的終結和國界的逐漸消失等，他們片面強調世界各國、各地區之間經濟、政治、文化上聯繫的增長，強調新科技的使用及其利益，對他們來說，全球化等於繁榮、進步和安定，意味著「地球村」的來臨。

不管這些政府官員、政黨領袖、企業精英、專家學者嘴巴上說什麼，他們腦中所想，並在他們的行動中追求的全球化是資本的全球化和普遍化。爲了克服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和利潤率下降的危機，過去二、三十年，那些支配了世界政治經濟的跨國財團及其政府，在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至上的意識型態）的指導下，極力在全球打破一切旨在維護人權、環境、勞工和婦女權益的種種保障，讓資本在全世界和各個生活領域自由投資，以便把全球資源財富及自然生態都變成大財團可以買賣賺錢的商品。這一切都在「自由化」、「取消管制」、「私有化」的名義下進行。技術進步、市場的開放和佔據支配地位、在全球範圍內實踐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經濟危機和企業競爭的激烈化，由此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的再結構與整合 - 這就是我們說的「全球化」。

歷史與社會的發展告訴我們，如此的全球化不是幸福與富裕的全球化，而是長期失業、貧窮飢饉、社會衝突、生態浩劫和戰爭的全球化，全球化不是勞動人民自由交往與聯合的全球化，而是少數富豪加劇剝削掠奪的全球化。我們的這個斷言不是出於什麼意識型態，而是當前世界的殘酷現實。

世界上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口（其中70%是女性）正處於絕對貧窮的境地，每天甚至掙不到一美元！長期的大量失業正在蔓延，全球幾乎三分之一的勞動力不是處於失業就是未充分就業的境地。在第三世界國家，每天有一萬九千名兒童死亡。從1995年到2000年之間，全球財富增加六倍，但是都集中在三萬七千家跨國企業手中；西方七大工業國只佔世界人口的11%，但是卻擁有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3。

自從1950年以來，世界貿易增長了11倍，經濟增長了五倍，結果卻是只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工業國家竟擁有世界財富的85%，在這些國家中，當然也不是全體國民受益，而是由統治精英獨享。美國被多數台灣人民認爲是民主、平等和富有的天堂，實際上從1975年到1995年，美國財富增加了60%，但卻被1%的人口所壟斷。1980年，普通美國公司總裁的收入是工廠工人收入的42倍，但是到現在，竟已相差到425倍！根據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報告指出，近三分之一的美國低薪家庭無法負擔平日購買食物、房租或健康保險等基本開支，在

1999年，超過四分之一美國工人賺的薪資屬於「貧窮水準」。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經濟體制下，人民連維持基本的生存都有困難，更談不上參與公共事務，所謂的民主只是個假象，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是最新、最知名的例子！

我們必須指出，這種意義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絕不僅僅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過去二十多年來，各國統治階級有意識的作為。當我們說反對全球化的時候，首先就是指反對這種跨國財團支配下的全球化。強調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為統治精英及其學者們不斷強調全球化是不可阻擋的，只有順應一途可走。但是，既然全球化不單純只是客觀過程，更是統治階級自覺推行的政經路線，既然這個路線造成了全球範圍內勞動人民處境的急遽惡化，那麼我們就有可能而且必須提出另一條戰略，指出人類社會發展的另一條道路。

關鍵就在於：如何改變現狀？走什麼道路？

三、世界規模的反全球化運動

1999年底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的大規模示威激起了反對全球化和資本的國際機構（WTO、IMF）運動的高潮。此後，幾乎每當這些國際的經濟與金融機構集會時，都遭到成千上萬示威群眾的包圍抗議。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是新一代青年與勞動者開始投身變革運動的清楚信號，從198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和它的意識型態教條-全球化、自由市場、彈性化等幾乎席捲了全世界。但是如今情況有了變化，一部份青年、勞動者甚至所謂中產階級開始質疑這個制度-不僅是在貧窮的南半球，同時也在西方國家，特別是在美國這個首屈一指的帝國主義國家和所謂新經濟的搖籃！

近兩年來大規模的反全球化運動，至少有下列數起：

——1999年11月 美國西雅圖 反對世界貿易組織

成千上萬群眾抗議世貿自成立四年來推動的貿易自由化政策。

——2000年4月 美國華盛頓 五一勞動節前夕遊行

兩萬名工會、勞工組織和環保人士反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約有1350人被警方逮捕。

——2000年9月11日 澳洲墨爾本 圍堵世界經濟論壇（WEF）

示威群眾組成人鏈，希望阻止作為全球富豪和統治精英的俱樂部的論壇召開。

——2000年9月26日 捷克布拉格 反對世銀、國基會（IMF）

連續多天有一萬五千人堵塞會場周圍街道，捷克的總統 - 「民主鬥士」哈維爾派出軍警鎮壓，甚至有納粹黨徒協助警方。

—— 2000 年 10 月底 南韓漢城 抗議第三屆歐亞高峰會 (ASEM)

韓國民主勞總和學生與市民團體發動三萬工人、學生團結一致反對全球化，喊出「另一個世界是可實現的！」。

—— 2000 年 12 月 6 日 法國尼斯 反對歐洲聯盟 (EU) 高峰會議

共計八萬來自各地的示威者，包括歐洲工聯 (CES) 發動的工會會員冒雨遊行，反對大財團控制下的歐洲和歐盟一體化政策，爭取一個保障人民生活的歐洲。

—— 2001 年 1 月 27 日 瑞士達沃斯 反對世界經濟論壇

瑞士軍警以防範暴動為由，阻止來自歐洲各國群眾到來示威。在地球的另一端，巴西的阿雷格里港，一萬人參與名為「世界社會論壇」的民間會議，討論有別於財團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和社會模式。

—— 2001 年 4 月 加拿大魁北克 反對美洲自由貿易協定

鋼鐵工會會員、環保人士和左翼團體走在一起，共同反對貿易協定，指出它方便大資本的剝削自由，使美洲各國工人的待遇競相向下調低，使財團利潤需要凌駕於環境保護之上。

—— 2001 年 5 月 1 日 世界各地 國際勞動節

世界各地都有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反對官商全球一體化政策，要求保障勞工權益。

—— 2001 年 6 月 16 日 瑞典哥特堡 反對歐洲一體化

八萬來自歐洲各國的群眾，反對歐洲聯盟進一步推動經濟自由化及抗議美國總統布希到訪。警察粗暴對待示威者，更開槍打傷群眾。

—— 2001 年 7 月 20 日 意大利熱那亞 抗議八大工業國會議 (G8)

創紀錄的十五到三十萬群眾聚集在熱那亞街頭，遭到警方強力鎮壓，一名青年當場遭警方射殺！

以上所列只是較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事實上，在全球各地都有大大小小反對新自

由主義、反對全球化的鬥爭。在東亞地區，除上述的韓國以及社會主義運動相對強大的菲律賓外，反全球化運動也有所發展。鄰近台灣的香港，是跨國資本推動中國私有化進程的重要據點，早在1997年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年會時，就有反對陣線的組成，進行了示威活動。2001年5月，財富論壇在香港舉行會議時，《全球化監察》及部份學生、民間團體，舉行了反對富豪瓜分世界，主張全球資源人民共享的抗議行動。在泰國，2000年5月6日，有數千名群眾抗議在清邁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ADB）33屆年會。在日本，2000年7月在沖繩召開的八國高峰會也遭遇了抗議者，現在日本的進步團體也在籌組ATTAC（Association for the Taxation of Financial Transactions for the Aid of Citizens，國際上重要的反全球化運動組織，1998年創立於法國，創立的初衷是要課征托賓稅Tobin Tax，以管制資本流動，在尼斯示威和巴西世界社會論壇中都有重要角色）的日本分部，準備更積極的推動反全球化運動。

除了密集的抗議，運動還提出針對全球化、各國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訴求。當然，在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運動團體中，存著不同的主張和運動路線，我們試著把其中主要的訴求歸納如下：

一、人民的需要高於利潤及「商業秘密」。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促進全面就業，縮小貧富懸殊及保護環境，而非幫助壟斷財團「提高競爭力」；為此有必要限制以至消除壟斷財團對員工、消費者及環境的剝削自由。

二、政府有責任保證為達到尊嚴地生存所必需的一切資源（空氣、食水、糧食、住房），都能以免費或低廉代價獲得，不容許任何人借壟斷民生事業而謀取暴利。

三、各種社會服務（教育、醫療等）維持公營，反對商品化、私有化以及外包。

四、立法限制及消除大財團對國計民生的壟斷；向大財團徵收累進稅；本地註冊的跨國企業，若違反外地有關保障勞工、環境、婦女等的法律時，本地司法機構亦有權追究責任；凡上市公司均須向一切利益攸關者（員工、消費者、當地社區）負責而非僅向股東負責；嚴重損害有關人等的利益者均可取消上市資格（例如修改法律限制上市公司在有盈利時裁員）。

五、不容把人類及一切動植物細胞及基因變成買賣盈利的商品或申請專利；無線電頻譜是公共財產，不應被財團壟斷作為謀利及思想、文化控制的手段。

六、任何國際經濟協議（WTO, APEC, NAFTA...）都不能再擴大在金融、投資、貿易上的「自由化」；地區經濟及貿易上的整合，有關勞動，環境、社區、婦女、兒童權益的保障不僅必須置於首位，而且必須逐漸向最高標準者看齊，而不是如現在般通過惡性競爭變成向最低標準看齊；人民的需要及糧食安全高於自由貿易。

七、由本地一切公共權力機構起，一直至地區或國際協議及機構止，都必須貫徹資訊透明及真正民主的原則，反對黑箱作業及不民主的做法。

八、發達地區工時應短至每週30小時；發展中地區的目標應為35-40小時。扭轉普遍超時加班的做法，以縮短工時而不降低勞動條件來減少失業；應增加社會福利及教育開支，反對削減社會福利及教育開支。

九、大大增強對勞工、婦女、消費者、生態的法律保障；對一切大企業普遍強制實行由員工及一切利益攸關者監察企業遵守上述法律；任何犯法的跨國公司、其最高刑罰是收歸社會所有，由工人監督生產；董事局主要由政府代表、員工代表及一切利益攸關者組成，實行民主經營。

十、發展工人、婦女、環保運動的國際性連結；強制跨國公司承認其屬下各地工人所組織之國際性工會的集體談判權；任何國際或區域性經濟整合都必須賦予工會法定權利、以過問一切有關勞工待遇的問題。

十一、保障婦女的生育自主權；反對禁止墮胎的法律；反對強迫墮胎；所有工作場所均應設立免費托兒所供員工使用。

十二、全面禁止核武及核能發電；把汽車、能源工業逐步收歸公有並就運輸與能源業的永續發展進行民主規劃以減少溫室氣體。

十三、取消第三世界債務；扭轉目前的過份的「出口導向」方針，改為銳意發展國內經濟，尤其確保廣大農民的生存與發展；保護當地原有社區經濟中的小生產、合作社及任何集體生產免受跨國公司的侵害。

十四、加強限制金融資本的國際性流動；對外匯投機徵收托賓稅及其他必要課稅；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所直接或間接付出的工資應漸漸與最高地區看齊；強迫跨國公司廉價轉讓技術；按照世界工農利益重訂知識產權法。

當然光憑這些訴求並不足以根本扭轉跨國資本推動的全球化，許多主張也是無法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完全實現，但卻是引領運動往建立一個真正民主平等的新社會方向邁進的橋樑。

四、台灣青年運動能從反全球化運動中學到什麼？

壓迫是全面的，反抗不能是孤立的、個別的

從前述世界反全球化運動的訴求中，我們可以看到運動涵蓋的廣度和各議題間的聯繫，可以認識到不管是生態的破壞、性別壓迫加劇、勞動者處境的惡化和人民民主權利的下降都和資本主義全球化脫不了干係。反全球化運動是一個廣泛的陣線，不同運動領域的活動份子面對同樣的敵人，正在找尋積極合作的可能性與方法，許多單一

議題的運動喊出了「沒有議題是單一的」(No issue in Single)的口號。

台灣的學生運動歷經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獨裁政權的鎮壓，到1980年代中期伴隨民主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崛起，開始了新一波的運動。這一波的學運一直有著左翼(投身社會運動，推動社會改造)和右翼(以政治民主以至於台灣主權獨立為運動目標)的分野。到90年代中以後，隨著資產階級代議民主的確立，左右分野逐漸模糊，僅存的學運組織多以關注社會議題為活動重心，帶有左傾的色彩。

然而即使在學運左翼中，也有著重大的缺陷。一方面是運動目標模糊(空泛的社會改造和左翼理想)，無法提出有別於既存體制的另一條道路。一方面，在運動的議題上，不但停留在所謂「社會」運動的層次，缺乏政治性的目標，更往往侷限於個別社運領域(工運、環運、原運、婦運等)，無法進行跨領域的連結，也不能將不同運動的焦點皆對準問題的根源 - 資本主義體制。

這些問題都顯示學運幹部養成過程上的片面，我們缺乏系統性的對社會、對世界形勢的認識與分析，缺乏對社會變革道路的探索與辯論，缺乏對階段性運動重心的討論，沒辦法把個別的運動議題與整個社會的變革連結在一起，總之，我們的運動往往是支離破碎，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然而，我們所反對的這個體制，卻是一個整體，它所產生的矛盾是如此複雜與深刻，如果不根本改變我們的運動模式與幹部養成方式，運動不會有真正的進步與成長，更不用說能提出值得群眾信賴的新出路，建立政治上新的選擇！

重建左翼，使之成為新的選擇

學運視野的支離破碎和狹窄，當然也和台灣社會主義思想與運動的低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也還沒有擺脫低潮，但是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開始挑戰了新自由主義的霸權，激發人們積極探索社會的新出路。

另一方面，各國傳統的工人政黨-斯大林主義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在新自由主義攻勢和蘇聯瓦解以來，社會主義思想公信力大幅下降的情況下，進一步的保守化。社會民主黨(以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民黨為首)在全球化壓力下，提出所謂第三條道路、新中間路線的主張，實際上拋棄了改良資本主義、建立福利國家的傳統路線，轉向擁抱新自由主義，現在它們連「改良派」都稱不上了，充其量是資本主義的管理者。

斯大林主義傳統的共產黨大都社會民主黨化(如義大利共產黨更名為民主左派，引發分裂)，許多黨派消失或邊緣化，而參加政府的黨派同樣執行新自由主義的路線(如法共和前義共)。新社會運動的產兒-綠黨也急速的右傾，其先驅-德國綠黨在參加執政的紅綠聯盟後積極的支持新自由主義政策，並力主德國參加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的行列。這種種變化都使得過去在社民黨和斯大林主義黨夾擊下邊緣化的激進左翼-堅持徹底變革資本主義，建立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 - 有了再出發的契機。

在英國，激進左翼面對工黨的保守黨化和反全球化運動的浪潮，開始探索建立一個真正反資本主義的工人政黨的可能性。1998年9月，在蘇格蘭，以蘇格蘭戰鬥派（Scottish Militant Labour，前工黨戰鬥派，現為蘇格蘭社會主義黨中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派ISM）為主的幾個激進左翼派別成立了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SSP），除了積極參與各項運動外，也投入選舉，99年五月蘇格蘭舉行了首次蘇格蘭議會選舉，該黨的領導之一Tommy Sheridan當選為議員，不到三年的時間，他們在黨員數和政治影響力上已經有可觀的成長。在英格蘭和威爾斯，倫敦市長與議會選舉時各激進黨派籌組的倫敦社會主義聯盟發展為全國性的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Alliance，SA），參與了今年6月的大選。英國最大的馬克思主義黨派-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SWP）面對反全球化群眾運動的興起，開始改變過去的方針，參加了蘇格蘭社會主義黨和社會主義聯盟，開始比較積極的尋求激進左翼的聯合。

在法國，由於群眾對主流政治勢力的逐漸失望（當然包括自97年起執政的社會黨-共產黨-綠黨聯盟），激進左翼（主要是托洛茨基派）有更大的成長。工人鬥爭派（Lutte Ouvriere，LO）的女候選人Arlette Laguiller在1995年總統大選中得到1 615 552票，得票率5.30%，1999年歐洲議會選舉，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LCR）和工人鬥爭派聯合競選，得到914 680票，得票率5.18%，總共當選了5名歐洲議會議員。今年三月的地方選舉，LCR、LO和工人黨（PT）都有相當斬獲，選後媒體已經開始預估，明年法國總統選舉中托派將超過法共的得票數。

此外，在丹麥、愛爾蘭、西班牙、挪威等國都有類似的發展。在澳洲，幾個激進左翼組織也在去年8月成立了社會主義聯盟。在國際的層次上，這些來自不同左翼傳統的組織也開始尋求進一步聯合，甚至成立新國際組織的可能¹。激進左翼成長的背景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日趨加深的社會矛盾和傳統工人政黨的保守化，它說明了在群眾對現有體制和政黨不滿加深時，建立一個健康的、值得群眾信賴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勢力是必需（讓進步群眾有新的選擇，避免淪為消極悲觀）而且可能的！

台灣的歷史發展與前述國家相比有其差異性，但不變的是同樣急需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勢力，讓不滿而迷惘的群眾能有新的選擇。台灣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的水平當然相對的低落很多，然而多年來運動雖然歷經曲折與挫敗，仍有一定的累積，我們有具歷史傳承的左翼政黨，有致力於工人現實鬥爭的進步工運組織，近些年來也形成數個以青年一代運動份子為主力的新興運動團體，有旨在促進左翼人士交流對話的刊物，還有許許多多分布在各運動領域的工作者。在失業率高漲、貧富更加

兩極化，主流政治勢力又皆是保守力量的現在，我們必須嚴肅思考如何建立一個廣泛的、群眾性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勢力！

以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國際行動對抗資本的國際活動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國際團結的重要性與急迫性。百多年來，「國際主義」不斷受到譏笑（包括自認進步的人士在內），他們往往認為所謂國際主義不過是口號與空想。然而國際主義從來就不是空談，不是口號²，一方面，歷史證明國際團結運動是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來的³；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在世界市場上日益集中化和中心化，國際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不但有共同的根本利益，而且只有以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國際行動對抗資本的國際活動，才可能使工人階級對抗國際資本的行動不被「民族」的利益所分化、削弱和癱瘓。⁴

我們也必須了解這種國際團結不是閒暇時刻、茶餘飯後對遠方運動的討論與聲援，而是貫穿整個運動與組織的基本原則。我們必須從針對個別議題與運動的國際團結出發，有系統而長期的協調各國的運動，在中、長期改變國際資本與國際被壓迫者的力量對比。

首先，我們必須拋棄只從台灣自身角度來分析和認識問題，應該從國際的脈絡來認識台灣的問題，發展出世界性的觀點，這方面的努力可以說非常的不足。我們應該認識到台灣作為資本輸出國和勞動力輸入國的位置，認識到台灣（過去到現在）在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戰略體系中的角色，並以此來重新檢視我們運動的理念、方向和具體訴求。

如果反核與環境運動無視於台灣核廢料和污染輸出造成的禍害；如果工運領導者助長群眾中錯誤的認識，將反失業運動導向反外勞的行動；如果進步的運動份子對台灣政府長期以來支持各國獨裁政權的外交活動沒有批判與反抗，那麼真正進步的運動和反資本主義的政治勢力是不可能建立的起來的！

然而，這樣的認識是不可能光靠著努力學習就能達成的，資本主義在全球造成的矛盾與壓迫是極其複雜，如果我們只從世界某一部份的觀點（不管是帝國主義國家、不發展的/半殖民地的國家還是所謂發展中國家）出發，我們所理解的世界圖像將是極其片面的。如果沒有發展國際性的連結，參與國際性的組織，在這個動態的過程和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者、運動活動份子討論，是很難建立真正的國際主義觀點的。

五、結語

30萬群眾聚集在熱那亞抗議八國高峰會的場面，深深震撼了人心，反全球化的

鬥爭不只也不能僅表現在抗議WTO、IMF、G8等國際機構上。反全球化的鬥爭是植根在每個國家的工作場所、學校與社區中的，如果沒有各國工人和環保等運動家、社會主義者等在基層努力，建立運動的網絡，交流彼此想法，是不可能出現如此波瀾狀關的運動的。

在國際層面發展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社會運動的團結與組織；

在台灣致力於建立一個群眾性的反資本主義政治勢力；

在工作場所、社區和學校，從事日常鬥爭，建立草根組織，並努力把個別議題和個別領域的運動連結起來，讓群眾逐步認識到他們日常的苦難與整個資本主義體制的關係。

這三方面的工作是我們必須同時並進，為之奮鬥不懈的目標。沒有群眾基礎，任何進步的理念就如同離開水的魚一般瀕臨死亡；但是沒有獨立自主的進步政治力量，任何草根運動的力量都無法真正凝聚起來，並將被主流政黨所收編；沒有國際的視野與團結，我們終將被狹隘的民族觀點所束縛，運動也將支離破碎，相互抵銷。

跨國的統治階級推動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政策，給我們的運動帶來新的挑戰、新的困難和新的任務，也創造了新的契機。根據新的形勢，檢討舊的運動思維與模式，攸關運動的生死存亡，刻不容緩！

★

註釋

- 1 如，2000年12月4、5日，在巴黎舉行了反資本主義左翼歐洲會議，參加團體有LCR、SSP、葡萄牙的左翼集團(Left Bloc)、挪威的紅色選舉聯盟(Red Electoral Alliance)、丹麥的紅綠聯盟(Red-Green Alliance)、盧森堡的(The Left)、瑞士的團結(Solidarities)、瑞典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英國社會主義聯盟及社會主義工人黨和希臘的宣言(Manifesto)等。澳洲的民主社會主義黨(DSP)在促進各國社會主義組織的連結上也做出了許多有益的貢獻。
- 2 其實真正空想的是各國政府所宣稱的以「國際合作」來解決國際性的生態浩劫、貧窮、債務危機、南北差距等問題。最近京都議定書的例子正說明：在既有體制下這種國際合作的不切實際。
- 3 早在美國南北戰爭時，英國工會運動就成功阻止英國站在美國南方奴隸主一邊干涉美國內戰，1910、20年代德奧英各國工人支援俄國革命的罷工、30年代西班牙內戰的國際團結、60年代越南革命的國際團結運動等都是最著名的例子。1997年國際工運支援利物浦碼頭工人反私有化抗爭和美國UPS工人罷工抗爭，以及台灣的年興案都是新近的例子。
- 4 美國勞聯產聯(AFL-CIO)領導層關於世貿組織和自由貿易的保護主義觀點是很好的說明！

"理直氣壯"因何而生？ (一)

——回應〈當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何六九

前言

近數月以來在"左翼"有關民族問題的論爭中，"左翼統一派"先生們無論就論題的擇取，以及論爭的表達方式和語言特色而言，都令人大開眼界。他們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同時還能夠大言不慚地倡導血緣論民族主義，而竟然絲毫覺查不出其中天大的矛盾。在國際左派運動中，這本身就是一件駭人聽聞的怪事。更不長進的是，他們在理論依據上，基本上還只是百年前漢人民族主義運動剛開始時的架構。真是枉稱唯物主義者。不過，如果就他們爲了捍衛這個民族主義而所作的表現來說，卻是他們百年前的前輩所望塵莫及的。那就是滿口髒話的能耐。

在達成當初提揭的目的之後，一個具有正面意義的政治理想也有開始墮落的可能。特別是在許多第三世界後進社會，在達成民族解放目的之後，民族主義往往很快開始喪失進步銳氣。若是欠缺高程度政治文化的不斷淘洗，不斷節制其天生具有的負面性質，和不斷提升其正面的內涵，並使之明朗化和具體化起來，那麼，此種歷史條件下的民族主義就很可能難於逃避墮落的命運。當今的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跟百年前的前身，差別就在這裏。至少，當年的漢族民族主義者勇於向強者挑戰，如今，他們卻專門對付弱小。

一項政治主張若是到了需要依賴論理以外的手段方得以闡釋發揮，想來必定已經到了無法用理性語言來規範的程度了。若是有意急切維護此類政治主張，卻無論如何也找不出令人信服的好道理來，大概只有訴諸原始本能，求助於大量的口水了。當事人思想貧乏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這個政治主張本身嚴重缺乏嚴謹的理論基礎，應該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說，政治主張本身的條件，已經決定了倡導和捍衛的手段。這個手段，往往是該項政治主張真正本質的忠實反映。越是失去現實意義的陳舊政治主張，越需要高度誇張的語言和做作來捍衛，方能夠"理直氣壯"得起來。越是破爛腐朽的招牌，人們越喜歡用鮮艷耀眼的漆工來粉飾。墮落的政治理念，總是如影附身地隨伴著同等墮落的作風。理念越是墮落，作風也就跟著越加墮落。

就這點而言，就在"左翼統一派"先生們在"左翼"上群體歇斯特理地狂亂謾罵，

自鳴得意的時候，其實已經悄然留下了十分生動而且豐富的歷史記錄。人們大致可以從而論定，非理性的潑婦罵街其實是狹隘種族主義者在末日階段的最後自衛武器。從今而後，人們可以通過這批“左翼統一派”人士的動作和詞匯，相當精確地了解到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的非理性內涵和暴戾性向。而此類民族主義之所以成爲殘暴獨裁政權的最愛，其中道理也就很容易明白了。這些精彩的歷史記錄，恰如博物館裏的陳列物，永恆地袒裸展示自己，靜待千萬後代參看者的剖解。對於台灣政治文化的提升而言，這是多麼可貴的反面教材！

不過，潑婦式政治理念的對立體，若是具有真實的理論意義，就絕對不可以同樣採納潑婦式的發作。罵街的歸罵街，有意義的討論，若是不通過嚴格推理的過程，肯定不可能得到適當的發揮。即使不願意直接回應潑婦式的泥濘四濺，嚴肅認真的論理研討工作卻是絲毫鬆懈不得。因爲，一旦罵聲蓋過一切，口水淹沒大地，無疑就是理性沉默的黑暗日子的到來。我們如何可能輕易忘記那個群魔亂舞鬼唱歌的法西斯年代呢？

本文直接檢討“當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一文（“左翼”#23）的核心主張，胡鬧的部分恕不奉陪。考慮到“左翼”篇幅有限，本文分割成不同單元。第一部分討論兩題目：1. 早期漢族民族主義，2. 重估漢人的民族革命。

一· 早期漢族民族主義

希臘人的祖宗

十九世紀初，若干希臘知識分子受到法蘭西民族主義的影響，開始倡導希臘民族主義運動。他們一開始就自稱是古希臘人的血緣子孫，要跟古希臘文明攀上嫡傳的歷史正統關係。事實上，古希臘文明時代的希臘人，早在亞歷山大對外軍事擴充不久之後，就開始逐漸外遷；後來再加上一系列的蠻族戰亂、瘧疾、瘟疫和地震，造成希臘許多地區人口爲之一空¹。今日的希臘人，絕大部分是從北方南遷而來的一支斯拉夫人，與古希臘人毫無血緣關係²。這在國際史學界是早有定論的³。偏偏那些自以爲血統純正的希臘人（包括他們當中的愛國學者）激昂無比地高聲否認，迄今不休。

在拜占庭時代，今日的希臘一度稱爲斯拉夫尼亞，即斯拉夫人之地的意思⁴。這些新移民後來很可能是因爲皈依東正教的原因，經過相當長時期，在語言文化上慢慢地完全希臘化。不過，他們在文化上並不曾好好繼承古希臘文明，也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文化貢獻。以致於在文藝復興時代，歐洲人要了解古希臘文明，到處找不到古希臘著作，還必須依賴阿拉伯文譯本。可見當時的阿拉伯人關心古希臘文明，而且頗爲

用心學習。不知道，這些斯拉夫裔的希臘人到底是數典忘祖呢，還是數祖忘典？

這支錯認祖宗的斯拉夫族，原來生息在希臘以北地區，是在一支亞洲蠻族入侵壓力下而開始了歷時百年之久的移民南遷。有趣的是，這支亞洲蠻族在征服和逼迫這支斯拉夫人部分逐漸出走之後，在當地定居下來，自己卻反而徹底斯拉夫化起來⁵，失去自己的語言⁶，到後來完全以斯拉夫人自居。這就是當今保加利亞人的祖先。有趣的是，在上一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居然還有若干保加利亞人成了泛斯拉夫主義運動的急先鋒。

希臘民族主義運動在若干歐洲強國支持下，很快使得希臘脫離奧圖曼帝國數百年統治，獨立建國。這個民族在建立自己的國家之後，開始粗暴對待境內的少數民族。它不承認希臘北部的馬其頓人都有其不同的文化和歷史傳統，還堅持說古代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也跟現代希臘人一樣，都是純種原希臘人⁷。自己錯認祖宗不打緊，還要強迫他人也一同錯認祖宗。其實，今日的馬其頓人極可能是另一支不同於希臘人的斯拉夫人，遷居當今希臘、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等國交界地區已有千百年之久，有自己獨特的語言、歷史記憶和血緣認同。

希臘國境以外的大部分馬其頓人，在二次大戰後建立自己國家，一度成爲南斯拉夫聯邦的一員。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是希臘政府向來堅持說，希臘境內馬其頓人只是會說斯拉夫語的希臘人，千方百計要同化他們，禁止他們使用母語，逼迫他們改變姓氏和名字，改變地名、村名，禁止他們擔任公職，割絕他們與鄰國其他馬其頓族人的關係。尤有甚者，還用種種方法逼迫他們遷離祖居之地，規定要遷到希臘南部；同時鼓勵具有“健康民族意識”的希臘人遷入該地⁸。如今，在希臘的馬其頓地區已經找不到馬其頓裔的律師、工程師、醫生和資本家。即使是僻遠的村莊，也逃不過泛希臘主義的壓力。遲至六十年代，若干地區的馬其頓鄉民被迫集合在希臘東正教教士、政府官吏、軍隊、警察面前，集體發誓永遠不再使用自己的母語，即使在家裡也不允許⁹。希臘政府以爲如此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境內的馬其頓人問題。這不但是民族壓迫，這簡直是毫無人性的民族滅絕。若干國際人權機構數度提出嚴厲批評。

希臘官方如此蠻橫無理，一般希臘人也同樣惡形惡狀。希臘境內許多馬其頓人不堪其苦，只好背離鄉土，移民到澳洲和加拿大等地。可嘆的是，他們在新居地生活了數十年之後，仍然繼續不斷遭受到當地希臘裔移民的歧視和排擠¹⁰。至於那些四散在希臘各地的馬其頓人的遭遇如何，不問可知。

1992年間，南斯拉夫聯邦解體，馬其頓申請以“馬其頓共和國”的名義加入聯合國。希臘政府立刻表示反對，他們宣稱馬其頓其名是希臘民族光輝歷史的一部分，是希臘文化遺產，不准他人剽竊使用。希臘社會上下更是群情洶湧，民族主義情操狂熱

到極點，有些嘩眾取寵的政客公然擺出不惜一戰姿態，不同意見的希臘人士莫不噤若寒蟬。當時的希臘總理，以態度不夠強硬而去職。這件在世界各地有識之士眼中簡直荒謬絕倫的事，居然被希臘內外的希臘民族主義者，包括移民異國已有數代之久的希臘裔人，看成為是一件十分神聖的偉大事業，關係著整個希臘民族的生死榮辱。希臘政府發動空前強大的外交攻勢，強迫國際社會不去承認這個新而獨立的國家的國名。最後，這個國家只好以“前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之名加入國際社會。馬其頓人不解的說，他們不再與南斯拉夫聯邦有瓜葛，也不是只存在於過去而已，為何非得冠上“前南斯拉夫”之名。

好戲連連。希臘政府意猶未盡，繼續鬧翻了天，不准這個國家在國際場合使用自己的國旗，只因為這幅旗幟很像古代馬其頓王室的徽章。於是，馬其頓運動員在奧運會上，只好跟台灣的選手一樣，使用奧運旗幟。在主要的大國之中，只有中國承認這個國家正式國名是“馬其頓共和國”。而中國所要求的交換條件是，馬其頓政府必須在台灣問題上支持中國的立場¹¹。中國支持一個走投無路的小國，為的是要這個小國去幫助逼迫另一個小國走投無路。而這個四面楚歌的小國，必須依靠出賣另一個小國的利益，來換得國際生存空間。世事如此曲折，令人感慨。

漢人的祖宗

中國的漢族民族主義者，也很希臘¹²。

如果說，現代希臘人在民族問題上不可理喻，十九世紀末以來的漢族民族主義者也毫不遜色，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至少，古希臘的哲學家、文學家和軍事家都是確實曾經有過真正生命的血肉之軀。漢族民族主義者卻要找一個新石器時代的神話人物來膜拜。廣義的漢族，遍佈黃河、長江流域上下，以及吳越、閩、粵等地區，語言和血統都有不同。數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早已在許多地區發現若干文明遺址，與黃河流域古文明同等古老，甚至於更為古老。這足以說明，所謂的漢族本身是多族體，各族起源各有不同，不可能在五千年前才突然共同源出一地。至少閩南與閩北地區，在秦漢以前與中原隔絕，自成一個獨立的生息天地。炎黃源流之說粗陋無據¹³，根本不值得嚴肅對待。奇怪的是，海峽兩岸的漢族民族主義者每年都要煞有介事地祭拜黃陵，中國政府更是多方鼓勵。百年以來，愈來愈多的人共襄盛舉，行禮如儀錯認祖宗。連自以為唯物的“左翼統一派”人士，竟然也熱情萬方地擠進這個愚夫愚婦的行列裏，深深相信黃帝的神話¹⁴。

錯認祖宗的鬧劇固然滑稽，其實應該算是一件無傷大雅的事。有人披麻戴孝、呼天搶地要去充當孝子賢孫，若是連他們真正的老祖宗都默默無言，干卿底事？把萬世一系當做大和民族精神基本要義的人們，堅持要去膜拜那個很可能系出朝鮮貴族的天

皇老祖宗¹⁵，只要他們自己心甘情願，有何不可？可是，當人們在刺刀（或者飛彈也是一樣）威脅下被強迫去錯認祖宗的時候，這個原來僅僅是一個令人忍俊不禁的小小鬧劇，就成了一個莫大悲劇。問題是，這種悲劇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注定非發生不可。因為錯認祖宗的行為本身，帶有不理性的基因。

套用一句孫文的話，民族主義是一種“信仰”。大概凡是信仰，就是神聖不可懷疑，就不應該是科學性嚴謹分析的對象吧！若是如此，何來理性思考？何來值得稱道的思想家？從依賴神話的穿鑿附會開始，這已經注定了民族主義理論難逃思想內容貧乏空洞的厄運。大概是由於同樣原因，所以像孫文那樣思路不清晰、學識平庸的人物，才會被那麼多的漢族民族主義者尊奉為一個博大精深、承先啓後的偉大思想家，而連不學無術的蔣介石，也足以成為孫文思想體系的繼承人。

這表示，現代許多民族主義運動的思想基礎，有很多非理性的成分。民族主義運動遠比民主運動、社會運動、階級運動等等，更容易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響。神話所代表的不可捉摸和不可考據，常常使得民族運動的發展充滿許多不易理解的變端和偏激。民族主義是“以血液思考”（俾斯麥語）的理念，是絕對道德的化身。為了民族，人們可以集體地去搶掠霸佔“非我族類”的財物土地，可以集體地濫殺無辜，可以集體地不顧廉恥、虛榮自誇，可以公然糾眾潑婦罵街，而絲毫不會感到愧咎。當社會上大多數善良而且頗富公德心的公民，一旦加入一個民族情懷無比亢奮的激昂群眾體的時候，往往會不遲疑地投入一些顯然缺乏理性的事件。當統治集團動用國家機器來號召全體公民“以血液思考”的時候，民族主義是何等的強悍和霸道！

很多民族主義的理論，開宗明義第一章就從錯認祖宗開始。如果事情必須如此首開其端，並不能因此證明民族主義和民族運動是無謂的。不應該因為許多的民族起源說涉及一些荒謬絕倫的情事，而全盤否定民族主義和民族運動¹⁶。神話傳說固然不能當真，卻有其象徵性意義¹⁷。當它與民族發展的其他條件配合起來，就成為一個存在的事實。這固然是現實存在的事實，可是，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毫不質疑地加以接受或者容忍。因為涉及問題並非僅此而已。“左翼統一派”的先生們似乎完全沒有了解這一點。

當神話傳說的誇張不實成為政治現實的一部分，特別是成為其中一個異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的時候，這個民族的政治生活殊難不遭受到一定的“顛覆”。這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如果並不是因為已經被扭曲而致上下把裝神弄鬼當做尋求真理看待，也難免因為整個民族任憑鬼神的擺佈而開始被扭曲¹⁸。若是政治文化上缺乏相當的制衡機制，錯認祖宗的民族運動其實是一個非常不祥的開端。許多野蠻的不理性作為（例如潑婦罵街、“淨血”殺戮），一旦披上民族外衣，往往因此被許多人當作是“理

所當然"的。多一分的錯認祖宗，往往就會多一分的反理性暴戾傾向。現代文明先進社會，大多能夠走出這個神話傳說的階段，開步向更高的文明階段邁進。他們有更多元的精神資源，足以產生穩固的凝聚力。一個民族運動如果已經有了百年歷史，而輿論界、教育界、學界和政治人物，卻仍然沉迷於那些荒誕的神話傳說，甚至於用武力威脅和痞子無賴手法強迫他人相信，那麼，我們實在不應該坐視不管。我們反而應該勇於挑戰，把粉碎此類神話傳說當作重要的任務看待。特別是身為左翼人，更應該努力鏟除（而不是維護）這個有礙於階級團結的種族主義偏見的理論基礎。

讓我們看一看初期的漢族民族主義。

種族主義本色

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民族主義，特別在初期，大多會反映出許多自發的性質：樸素、情緒性、不明確，甚至偏見、自大。清末的漢族民族主義，也具有這個性質。其中有一股種族主義色彩濃厚的傾向，以孫文、章太炎¹⁹、鄒容等人為代表²⁰。他們不了解大清王朝各族之間以及漢族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實質關係，把當時的一切政治問題歸咎於滿族，以為只要驅逐後者，建立漢人的國家，所有的難題就迎刃而解了。他們當初並沒有各族平等對待、共存共榮的構想。自己不去深入研討困境的根本緣由，反而只知把異族當做方便的替罪羔羊來咒罵、攻擊，這原是一般種族主義者的共同傾向。

孫文的思考方式，帶有極濃厚的會黨色彩。他的革命組織觀念以及組織運作，幾乎全盤以傳統會黨模式為準；他的民族主義想法，更是以會黨式排外情結為基礎。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會黨排外情結，不但粗陋而且十分不穩定，只有小部分與現代意義下的民族主義相符合。遲至1924年2月，孫文還說：“長此以往，如果不想辦法恢復民族主義，中國將來不但要亡國，或者要亡種”。他的對策不過是，喚醒四萬萬同胞，以及由宗族結合成民族²¹。有現代常識的人，居然相信四億人會“亡種”，簡直不可思議。“亡種”或許是一種旨在喚起危機意識的提法。不過，這更反映言者本身的內心世界。民族不是由具有現代政治意識和共同政治認同的國民所組成，而是以“宗族”為基礎，這不說明血緣思考在此人思想上的份量嗎？可見孫文的民族主義觀念，雖然在臨死的一、二年間有一些新提法，其實還是沒有超越傳統會黨的水平。

在辛亥以前的時期，另外也有以梁啟超為代表，在種族主義以外多方發揮民族主義想法，同時也是較能夠考量中國多民族的現實因素，較具思想深度的另一派提法。兩派之間，不免有不少爭論。雖然梁氏對民族問題的見解²²，遠遠超過於當時的種族主義派人士²³，卻無法在當時的漢族民族運動中取得思想領導地位。在民族主義的宣傳競賽上，常有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許多較具理性和深謀遠慮的看法，往往被較具

情緒性的“激進”主張所排斥和取代²⁴。

1912年間，孫文屢次宣佈民族主義目標已經達成。言下之意，此後不必再談論民族主義了。事實上，一般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的確冷卻下來；有一段時期，孫文極少提及民族主義。到了1919年的五四運動前後，方才又熱衷起來。不過，民族主義熱潮可以起伏不定，運動的矛頭可以轉向，種族主義的烙印已經決定了漢族民族主義的精神面貌，以迄於今。

有濃厚種族主義傾向的民族運動，一旦鼓動起來，很快就暴露本性。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滿人隨即在廣州、西安等地遭受漢人屠殺，從而開始了將近百年之久的悲慘歷程。漢族在此事例上表現出對待“非我族類”的記恨和不肯容忍異己的態度，這不是孫文等人種族主義式民族主義運動種瓜得瓜？在許多地方，民族解放一旦達成，驅逐異族成了一個最迫切的工作，總是帶來莫大災難。在種族主義者的狹隘觀念世界裡，除此之外，大概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多元民族的問題了。他們甚至於不知道自己民族應該有什麼真正遠大的政治展望，更不用說去勇敢構想一個各族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天地。

漢族民族主義者在辛亥之後很快領悟，對於區區“百來萬”（孫文一度是如此估計的）或者數百萬滿人，若要“驅逐”或者使之“亡種”，不但極為不易，而且是萬萬做不得的。因為大清皇室固然可恨，這個王朝征服鄰近異族擴張所得的江山，卻是十分多嬌。果真驅逐了所有的“韃虜”，豈不從此喪失大片疆域？於是，對於向來厭惡異族的漢族民族主義者而言，同化論就成了當時理所當然的對策了。從那時候起，“中國人有最強的同化力”的說法開始大為流行。甚至於到了今日，漢人當中常有人沾沾自喜說，滿人以及其他若干異族已經被漢人同化了。他們所關心的，當然不是異族的文化程度，而是在霸佔異族土地之際，足堪告慰自己這是一件文明的偉大事業。種族主義規範了漢族民族主義的精神面貌，漢化論則為這個政治理念在多元民族現實環境下的實踐指出一個方向。

無自知之明的漢化論者

漢人在辛亥以後所面臨的多元民族問題，並非前所未有的。嚴格說來，真正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不及當代近二百國家的十分之一。其餘的當然是多民族的國家。從十九世紀以來，歐洲幾個多民族大國都面臨境內弱勢民族風起雲湧的民族運動所帶來的困擾。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莫不竭力想找出根本的解決方法。其中最為普遍的，莫過於同化政策。沙皇麾下烏瓦洛夫大臣在1879年開始大規模實施的俄化政策，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最廣為人知的。這個政策在俄國境內非俄羅斯人居住地區雷厲風

行，強迫俄語教學，嚴禁其他民族使用自己的語言。同化論者無非是以自己為標準範本，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制性手段，逼迫弱勢民族去學習和認同。就像漢化論者一樣，他們莫不自以為這是一件符合文明精神的神聖事業。

孫文不一定知曉烏瓦洛夫大臣的俄化政策，卻是當時中國熱心倡導漢化政策的一個代表性人物。他在若干著作和演講中，一再呼籲要把中國境內其他所有異族人民漢化，以便建立一個單一的民族。辛亥以後由原來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迫不及待地在各處設立機構，多方鼓吹和招募漢人移民“邊疆”。漢化和土地資源搶佔大概就是“五族共和”的真正意義吧。

孫去世之後的國民黨上下，也都是清一色的漢化主義者。同樣是同化論者的烏瓦洛夫大臣所代表的，是一個充滿自信的民族，一個文學藝術空前輝煌的社會。中國則不然。辛亥革命後的中國，長期處在列強壓力下，連年內戰，四分五裂，幾無自保能力。不但如此，年輕一代發現古老的中國文明已經沒有能力應付現代世界，焦慮萬分地展開一場新文化運動，連語文本身都要痛加改革。他們和幾乎所有的同時代的漢人，其實還不知道如何才能夠拯救自己積弱破碎、風雨飄搖的古老國度。可是大批漢族民族主義者在此自顧不暇之際，卻已經磨刀霍霍，準備圖謀於境內異族，要去教化人家。大概凡是同化論者，都是這般心急。不過，像漢化論者這麼缺乏自知之明，在他們同行當中也是罕見的。

然而，同化論者果真能夠如願嗎？

二次大戰以後，西方學者紛紛熱衷於現代化理論研究。有些學者以為，現代化的結果使得市場功能充分發揮，教育普及，語言文化交流加快，社會流動頻繁以及大量通婚，因而使得民族同化趨勢不可遏制²⁵。這個看法曾經相當流行。不過，歷史發展所顯示的，完全不是這回事。自從十九世紀以來，除了若干建立在新關領土的國家之外，同化政策絕少有成功的例子。沙皇的俄化政策不但沒有達到大俄羅斯化的目的，反而激起了當時沙皇帝國境內的芬蘭、波蘭、烏克蘭等地的民族獨立運動；高加索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也在那個時期開始。漢族民族主義者喜歡吹噓，周遭異族在過去千百年來是如何的受到漢人文化的薰陶。可是，辛亥革命發生後短短一個月的期間，中國官吏即被趕出蒙古；緊接著，若干蒙古王公和喇嘛宣佈獨立，並且得到內外蒙古各地王公的響應²⁶。從那時候開始，尤其是近數十年來，中國境內主要的非漢族民族不但沒有放棄自決自主的要求，而且愈來愈堅持自己的要求。

世界各地的同化論者似乎都自以為自己民族有著優越的文化，都認為弱勢民族的民族認同充其量不過是落後而狹隘的地域主義，根本缺乏雄厚的文化根基。他們總是要隨時隨地藉機會如此教訓弱勢民族的人民。除了同化政策而外，他們還要制訂愛國

主義，以取代被統治民族的民族認同，求取裹脅式的政治忠誠。愛國主義所指的是對於疆土、政府機關、歷史共同記憶、全國性的英雄人物等等的忠誠。在單一民族的國家裡，愛國主義也許等同於民族主義，或者說二者之間沒有加以嚴格區分的必要。但是在多民族的國家裡，二者不但不等同，而且是互相衝突的。

對於同化政策的對象而言，同化政策和愛國主義不但是一種壓迫，更是無可忍受的民族侮辱。更何況，弱勢民族人民很容易就可以覺察出來，同化政策和愛國主義的背後還有領土霸佔和經濟掠奪的強烈動機。怪不得弱勢民族的反應大多是異常強烈的。他們要維護自己的尊嚴，也要捍衛自己的生存。在民族認同意識本來還沒有普遍存在的弱勢族群當中，民族運動卻反而因此迅速產生了。

在現代社會裡，來自不同民族的脅迫挑釁，無論是表現在語言、文化、宗教或者政治權利等方面，必然會喚醒自己民族的“我類”意識。當相互關係具有對立性質的時候，從覺察民族間的差異，到發展成爲自覺地維護自民族的利益和尊嚴，不過是一線之隔。同化政策一旦付諸實施，恰好會造成這種後果。這種政策也許會普遍增加民族或者族群間的往來，促進共同語言廣爲流通，但是這也使得弱勢民族更加倍敏銳地感覺到民族間的差異和不平等地位。

世界各地同化論者的一項共同錯誤，就是誤以爲在弱勢民族人民當中推廣了強勢民族的語言，使得後者認識強勢民族的歷史文化，就是同化政策成功的明證。其實這是一廂情願的自我陶醉。難道不斷對滿人宣揚孫文“驅逐韃虜”革命綱領的真知灼見，數說“漢奸”²⁷的可恥，歌頌那個與金人（很可能就是滿人的祖先）誓不戴共天的“民族英雄”岳飛，無論使用的是那一種語言，就能夠使得他們認同漢人嗎？殊不知，滿人雖然在許多方面漢化了，但是仍然有自己強烈的民族認同，仍然不會去認同於漢族²⁸。從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來看，同化政策所造成的異化效果，遠超過同化效果²⁹。弱勢民族自己的民族認同，在強勢民族同化政策與愛國主義強力灌輸的空前壓力之下，仍然倔強地存在，甚至可以說是因此而倍加蓬勃起來。同化論者的美夢都是要落空的。他們的美夢粉碎在“被同化”人民的民族反抗之下。漢化論得到大規模實踐機會，並且在現實考驗下遭受大規模的失敗，那是近半世紀以來的事。只是漢族民族主義者到現在還沒有能夠從失敗中猛醒過來。“左翼統一派”先生們，在強調民族的血緣成方之外，也不忘強調民族的“文化”性。他們跟那些右派漢化論者之間的“階級”差別，大概早已經被相同的“文化”性給全部模糊了。

早期漢族民族主義者，腦海裡充滿了這些漢化的宏謀大業，和令人垂涎欲滴的帝國版圖。畫餅充饑，未來的可以等待。可是，臨頭的大禍卻是無論如何也迴避不了。因爲內外危機已經接連排山倒海地傾壓而至。偏偏在此生死關頭，好作春秋大夢的他

們，首先暴露自己完全沒有能力達成自己的首項任務：“喚醒”漢民族。

仍然是一盤散沙

人們依據常識判斷，大多以為先有民族，而後有民族主義。事實恰恰相反³⁰。經過長時期的思想醞釀和政治宣傳，甚至於長時期的政治鬥爭和武裝對抗，才能夠使得這一個開始時僅流行於少數人當中的想法，逐漸發展成為大部分或者全部人民的共識。

當這項想法還在少數人當中討論、流傳的時候，也就是在它普遍得到接受之前，我們可以說這個民族已經誕生了嗎？當中國絕大部分土地上的人民普遍停留在“一盤散沙”的階段，對於外力入侵和民族主義呼喚抱持冷漠態度的時候；當中國對外戰爭需要依靠野蠻的拉伕才能夠解決兵源問題的時候，我們可以說現代政治意義下的漢民族已經誕生了嗎？當絕大多數中國國民，在心態上仍然停留在自然經濟的蒙昧無知、各自為政的境況，絲毫不能把自己的日常生活與民族的生活連繫起來的時候，漢民族或者中華民族其實只是一個概念、目標，而不是一個存在的事實。除了人數極為有限的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以外，如果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不能夠日常通過印刷品或者其他傳媒，超越自己直接生活的有限天地，來進行日常的同步“想像”³¹；如果他們沒有能力共同切實覺察到他民族的存在或者可能帶來的威脅；如果極少數假洋鬼子吆喝幾聲就能夠成功地禁止所有的阿Q關心國家大事和參與政治，那麼，這個民族命運的認同只是在極少數人當中流傳而已。這時候的絕大多數漢人，在政治意識的水平上，仍然無異於大清皇帝的順民，還沒有具備現代國民的民族認同觀念。

在十九世紀末中國，無論是梁啟超還是孫文，無不為中國國民的“一盤散沙”和其他缺陷而浩嘆不已。從那時候開始，直到民國成立已經有了相對長的一段時間，喚起民族意識一事仍然是中國政治運動者無日不憂慮有加的事。“一盤散沙”，這就是五四運動時代的青年所繼承的“遺產”。

(待 續)

☆

註釋

1NicholasCheetham,MediaevalGreece,1981,pp13-23.

2DimitriObolensky,TheByzantineCommonwealth:EasternEurope500-1453,1971,pp64-97.AlsoA.Vlasto,TheEntryofSlavsintoChristendom,1970,pp5-12.

3FerdinandSchevill,AHistoryoftheBalkans,1981,p72.

4RinnShinn,ed.,Greece:ACountryStudy,1986,pp14-15.

- 5 Walker Connor, 'From Tribeto Nation?',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13, 1991. 後來收集於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1994. Chris Anastasoff, The Bulgarians, 1977, 第三章。
- 6 今日的保加利亞語，只剩下不及十五個原有蠻族的詞話。Chris Anastasoff, The Bulgarians, 1977, p26.
- 7 這一點在學術界迄無定論。不過，古代馬其頓人的工藝品、語言、習尚，與古代希臘人有相當程度的差異，則是可以肯定的。
- 8 Stoyan Pribichevich, Macedonia: Its People and History, 1982, pp134-147. Hugh Poulton, Who are the Macedonians? 1995, pp161-171.
- 9 Stoyan Pribichevich, 1982, pp237-247.
- 10 Loring M. Danforth, The Macedonia Conflict Ethnic Nationalism in a Transnational World, 1995. 第七章。
- 11 馬其頓政府 1992 年 10 月 14 日發表新聞。同上, p153.
- 12 希臘民族主義者與國民黨集團所設計的政治機構，有一個不謀而合之處：“僑選”國會議員。國家大事可以讓不繳納稅金而且永久居住在外國的外國公民置喙，堪稱民主體制的怪現象。
- 13 莊萬壽，“「炎黃子孫」論”，《中國傳說論》，1996 年, pp31-36。兩千年前司馬遷提及，這些是當代有識之士所說不出口的“不雅馴”的神話傳說。
- 14 左翼 #21。
- 15 日本考古學家發掘古代天皇墓址，發現天皇家族極可能原先是朝鮮族。見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 p96.
- 16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83, p56.
- 17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1991.
- 18 相關的討論參閱 David Archard, Myths, Lies and Historical Truth: a Defence of Na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5, XLIII, pp472-481.
- 19 章太炎的中華民族理論，可以說是比當代其他漢族民族主義理論家的主張更加荒誕不經。參閱：李朝津，“章太炎的民族主義—中國近代自由民族主義典範形成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 1996, Kauko Laitine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ang Binglin as an Anti-Manchu Propagandist. 1990.
- 20 林濁水，“民族主義的變奏曲：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思想”，《瓦解的華夏國》，1985 年，pp115-147。歷來台灣島內關於孫文等人民族主義思想的討論，以此文最為出色。

- 21 孫文，《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五講。
- 22 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1959.
- 23 不識外文的梁啟超，熟悉西方政治理論，也洞悉中國政治現實，除了民族問題之外，提出很多發人猛醒的議論，遠遠超過那個接受西方教育的孫文。梁氏的政治見地，其實不是孫文等人所能望其背的。
- 24 當年這方面勝負的意義，似乎不在於革命與改良的路線爭端。因為這段時期革命與改良之間的界線，往往模糊不清。孫文和梁啟超等人的想法和作法，不易如此簡單的一分為二。潘英的有關論文，值得參閱。
- 25 Karl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s: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ity*, 1966.
- 26 Nakami Tatsuo, 'Protest Against the Concept of the Middle Kingdom: The Mongol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Eto Shinkichi, et al., eds., *The 1911 Revolution in China*, 1984, pp129-149.
- 27 滿人以自己民族利益為重，理所當然。非漢人，何以成漢奸？漢人違背滿人益，莫非可以稱為滿奸？漢奸一詞的濫用，是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者無視於多元民族的實際環境，不知自我節制的一個表現，在許多方面暴露出偏窄種族主義者的本色。
- 28 如同二十世紀上半葉，大批印度青年並不會因為接受完整牛津、劍橋英式古典教育，而認同於大英民族。在今日中國，仍然有近一千萬人自認為是滿族人。
- 29 Walker Connor, 'From Tribe to Nation?',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13, 1991. 後來收集於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1994.
- 30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1982.
- 31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983.

覆汪立峽先生

何六九

多謝公開信("左翼"#21)的指教。鄙人理當知無不言，公開回覆。如果一次討論不完，還可再討論一次。鄙人一定奉陪。不過，能否言無不盡，以後還得看足下的興趣和編輯先生的決定了。

首先，足下指陳鄙人不說出那個膽敢詆毀民族主義神聖性的"英國佬"(好個有文化的典雅稱謂!)是誰。只有在兩種情況下，足下才有可能不會知道那個"英國佬"是誰。其一，"左翼"編輯先生刪改了鄙作，所以註解#4不見了。不過這位編輯先生雖然有他已定的立場，有權力捍衛他的"特別"或者不"特別"的理念，卻沒有刪改鄙作。其二，編輯先生既然沒有刪改，那就是足下沒有稍為用心去求證，而粗心忽略了這個註解。若有不求甚解，應該反求諸己，不好急於遷怒於人。無論如何，現在趕緊補上，以供參考之用：Tom Nairn,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1997, pp90-112. 這個"英國佬"是何方神聖？曾任英國的"新左評論"編輯"佬"是也。他是一位頗有思想見地的左翼人，下筆嚴謹，在國際左派運動中是受尊重的。

其次，足下認為鄙文一些"最重要"的論據有誤。那是關於英國極右派種族主義者的近況。那些人自稱盎格魯撒克遜子孫後人，自以為因此而享有了不得的天賦權力，可以動輒要流氓口出惡言，動武傷人，還自以為理直氣壯，正義凜然，當然令人討厭。美國的白人種族主義三K黨也一樣。民主社會出現此類偏極份子，原是不幸，卻也不足為奇。因為這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實在沒有必要以偏蓋全，以為英國上下盡是極右派種族主義者。極右派種族主義者是自己社會的邊緣人物，為社會大眾所不齒。他們的暴力猖狂行爲，也不斷被司法執法機構所注意監控。足下說英國極右派種族主義者在最近選舉"大有斬獲"，言下之意好像就快要執政一樣，甚至於已經成為英國政壇的主宰力量了，整個英倫三島也因為四處都頻繁發生排外暴動流血事件而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這恐怕大大有違實情。應該說，選舉中真正"大有斬獲"的是工黨，極右派種族主義者根本不可能享有那麼大的影響力。足下顯然不熟悉英國的輿論和政情，不無強不知以為知、危言聳聽之嫌。

只是這些足下所謂"最重要"的論據恐怕也不能夠直接證明什麼。較為重要的也許應該是：足下可曾看到過，英國和美國主流媒體成天自稱是白人或者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媒體，強迫他人認祖歸宗嗎？若是這樣做，在他們的社會裏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原因很簡單，他們都是多族群社會，他們的輿論界、教育界、學界以及法律的闡釋和執行，也不斷(雖然還嫌太過緩慢)因應這個現實而相應調整、進步。他們的社會雖然百病叢生，階級對立尖銳，卻有許多機制(包括義務教育的課程)，不斷尋求有效制衡和遏止種族主義。

反過來看，同樣是多族群社會的台灣和中國，主流媒體(還有學術界，"左翼"不少作者，各級學校教科書)卻成天高嚷大家都是炎黃子孫，不允許他人有異議，根本不把少數民族看在眼裏。若看到有不從者，過去是政治迫害、公然大加集體羞辱，現在則是絲毫不知節制的言語暴力，一派痞子無賴作風。他們也跟那些英國極右派種族主義者一樣的蠻橫，以為凡是炎黃子孫就可以對非我族類(特別是對於膽敢公然質疑炎黃子孫論的人們)隨便破口大罵，好像那是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天賦權力一樣，怪不得表現得十分

的"理直氣壯"。在許多社會，這都會被認為是偏激種族主義者的可鄙表現。(上面提及的那位"英國佬"，曾經戲稱此類"理直氣壯"的鄉鄙行徑為無知村夫的沙文主義。妙喻。)然而，這在台灣和中國，卻被許多人當作是應當大力提倡的好模樣。這其實就是文明與野蠻的一項差別。這才是"重要"的。不知足下以為然否？希望足下不會因為看到英國有極右派種族主義者的猖狂，而有意效法跟進，連帶以為漢人種族主義者的偏見和劣行是值得"理直氣壯"去久久遠遠地不斷宣揚和捍衛下去。

足下果真相信，西藏人、維吾爾人、蒙古人、台灣原住民，甚至古代匈奴人、鮮卑人和契丹人都是炎黃子孫嗎？甚至於，大江南北的漢人也全部都是炎黃子孫嗎？足下果真相信炎黃子孫口號在現代多族群社會裏是恰當的嗎？應該當作左派的神聖戰號嗎？但願不致於如此吧。但願以足下的聰明才智，還不致於相信黃帝確實"有子二十五人"此類"語多不雅馴"(司馬遷老早就這麼形容過當代有關三皇五帝的鄉談軼說)的荒唐話吧。若是繼續執意倡導炎黃子孫說，終會遭人訕笑或者"教訓"，恐怕不是意外。足下好自為之。

再者，足下又提到弗克蘭島之戰。帝國主義當然有它的陰謀詭計，可是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意義。鄙人並沒有觀察到如足下所說的，英國舉國上下民族主義沸騰捉狂，各方請戰，要去占領他國土地；反而觀察到英國人普遍認識到他們遲早要撤島，很早就有意通過談判解決問題，問題在於取得最有利的條件。相形之下，是阿根廷的軍人獨裁集團在設計佈局，刻意以神聖領土之名煽起民族激情，堅持發動戰爭、武力解決，目的在於轉移國人對於獨裁集團大規模捕捉、刑虐和秘密處死大批異議人士(特別是阿根廷左派和進步人士)的普遍痛恨，以及對於軍人治國導致學國糜爛的極度不滿。軍人獨裁集團還企圖為自己博取"收復失土"的阿根廷民族英雄的令名。這個以萬民性命為兒戲的軍事冒險，以自己之弱去搏敵人之強，結果是一敗塗地，自取其辱，更拖累了整個阿根廷社會。

這批在國際事務上顛預無能的軍人的所作所為，其實跟反帝根本扯不上關連。對外無能，卻對內凶狠殘暴到極點，動輒藉反共之名，對準老百姓猛扣扳機。他們恰好是濫用民族主義的惡棍，是狹隘民族主義懦夫的典型代表。

鄙人以為，帝國主義耀武揚威固然應該值得譴責，一群飯桶軍人大權在握，胡作非為，特別不應該加以美化歌頌。莫非足下有意把這批草菅人命的軍人獨裁者(還有那個把自己社會帶到破產邊緣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密勒塞維奇-又是一個善於欺壓弱小卻得到中國贊揚肯定的"民族英雄")當作反帝楷模，要大家好好學習？只因為他們是"反帝"的"愛國者"，即使對工人運動和民主運動人士大肆殺戮，也應該大力支持嗎？而反抗軍人獨裁的各種進步力量，妨礙這些反共軍人獨裁集團的"反帝"事業，就應該被孤立起來嗎？反帝若是到了這般是非不分的程度，首先遭受到傷害的是真理本身，必定給反帝事業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樣的"反帝"(還有"反霸")公式，胡亂套用是沒有益處的。看來又是足下沒有認真分析全盤情況吧。

至於民間社會(或公民社會)的問題，原本是鄙人早已經計劃要好好探討的課題，足下以及其他兩位作者提出，正中鄙人下懷。不過當下還有一批"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的先生們，叫罵指名要求款待，鄙人隻手力單，一時侍候不過來，請稍待。鄙人決不迴避，決不偷工減料，也決不濫用下作的潑婦罵街來替代嚴肅的論理。有意義的論題，值得用嚴肅的態度來對待，千萬輕佻不得。足下若還有什麼看法，儘管先行繼續提出來，鄙人日後一并回覆。

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

——從列寧主義到史達林主義

〈五〉

黃志龍

(2) 黨的「國家化」

在蘇聯歷史上，開始於1929年的「農業集體化」被稱為是「從上而來」的革命。所謂「農業集體化」就是聯合以家戶為單位的小農（在蘇聯則稱為中農），成立以「集體農場」為名的生產合作社運動。

馬克思以英國做為經驗材料，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將會誕生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括農業在內）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主要生產方式，也就是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小農生產這種「舊的中間階層」必然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高度發展而日趨沒落。但是，馬克思並沒有預料到，小農生產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仍然在農業上佔有優勢地位的情況。在德、法國等歐陸國家，雖然資本主義機器大工廠已經高度發展，隨著勞工運動的昂揚，社會主義政黨也有了掌握政權的機會，但在農業上，小農生產還是佔有優勢。於是，就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政黨而言，執政後應該如何正確的對待小農階級就成為一個棘手問題。

有關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法、德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主張：小農是即將統一在社會主義大生產中的未來的無產階級。但這種統一，也就是集體化，只有在農民真正自願的基礎上才能獲得圓滿的結果。具體地說，就是藉由提供足夠的物質條件（農業機械與化學肥料等）以及實例，進行耐心的說服和教育，使農民認識到社會主義大規模生產的優越性，從而在自願的基礎上放棄小農經營轉而投入合作社運動。

(a) 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

革命後，布爾什維克因接受社會革命黨的農業綱領（繼承自1870～80年代由俄羅斯知識份子所組成的革命家團體——人民主義者“Narodraki”，該組織主張將土地解放給農民）而實施土地革命，導致農民因擁有土地而「中農化」，出現了恩格斯所謂的「小農問題」。但是，與德國、法國不同的是，當時的俄羅斯在經濟上屬於歐洲最落後的國家，缺乏誘使小農自發地走向集體化所需的工業能力。因此，必需先進行

工業化，使農民享受工業化的果實後才能使其感覺到大經營比小農經濟更為有利。但就蘇聯當時的條件而言，為推行工業化所需資源不得不依靠轉移農業剩餘來達成，也就是說必須在犧牲農民及農業的基礎上完成工業化建設。這就是蘇聯工業化和集體化所面臨困難的源泉，也是二次大戰後，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所在。

蘇聯在二〇年代的工業化論爭的主軸，就是如何找出既能「獲取農民同意」又能達到「工業化要求」的妥協點(或調和點)。當時，在蘇共黨內雖然有各種不同意見，但是「工業化必須在農民的同意下才能推行」是一致的原則。因此黨內一致認為，農業的集體化是長期的、漸進性的目標，是需要「數個世代」才能成功的事業。但是在現實上，集體化的過程卻與繼承恩格斯立場的布爾什維克構想完全不同：

首先，在缺乏集體化所需物質和技術條件下，「農業集體化」是做為短期的政策目標而急躁的進行。本來被認為至少需要花數十年才能完成的事業，卻在從1929年末到32年末，短短的三年之內就宣布已完成其歷史任務。

其次，這一場急促的「農業集體化」不是以農民的自動自發為基礎，而是藉由國家權力的強制以及狂熱的群眾動員為主要手段來進行的運動。

正由於國家權力是變革的主角，因此這是「從上而來」的，而且不是漸進性的改革，是在短期間內執行的飛躍性變革，也就是革命——「從上而來的革命」。集體化破壞了以農民的同意為基礎的二〇年代統治體制，創出了新威權主義權力構造(史達林主義)。

這場「從上而來的革命」，也從根本上修正了有關革命後統治方式的想法——馬克思主義並不否認在政治革命的某一段時期，為了「剝奪剝削者」而採用強制或獨裁的可能性。但就革命後的建設而言，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是傾向於「改革」而不是「革命」，是基於睿智、熟慮、社會成員的合意與自動、自發性的漸進過程。俄羅斯革命的指導者基本上也繼承這種想法。革命前列寧說：「蘇維埃不會、不想、也不可以執行任何在經濟現實上，在大多數人民的意識上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改革」。他在的所謂「遺書」中也說：「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和安定的根本條件是，勞動者和農民這兩個基本階級的同意」。「從上而來的革命」為衝動性、爆炸性的政治變動(例如，三〇年代大肅清)開了先例，是與「以被統治者的同意和自發性參與為基礎的漸進性的改革」完全相反的道路。

史達林以「階級鬥爭的激烈化」、「國家權力的最大化」這兩個命題，將這種政治變動的方式教義化——他在1923年1月的黨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的演講，放棄從前的立場，認定：「國家的逐漸消亡」以及「階級鬥爭的鎮靜化」是「反革命理論」。

他說：「階級的消滅並不是由於階級鬥爭的鎮靜化，而是由於它的強化而達成」、
「國家的消亡並非由於國家權力的弱化而是由於它的最大限度的強化而達成」。

「從上而來的革命」，是為了解決由於農村餘糧收購的不順利所引發城市工業地區嚴重缺糧問題而採取的緊急手段，以及為此而產生的國家權力和農民之間的緊張為契機而發生的。因此，開端只不過是為了克服當面危機而採取的應急對策而已，並非長期政策，也沒有更改路線的意圖。所以危機發生前的黨大會中，以史達林為首的黨領導階層還反覆強調：「以農民的同意為基礎的新經濟政策，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由此可見，「為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必須採用適合這個目的手段」這種「目的與手段」的統一一直是蘇共領導階層的行動準則。黨的領導認為，這不過是克服危機的非常手段而已，當危機過去後還會回到新經濟政策的原來軌道。因此把這種非常手段稱為「非常措施」。

(b) 非常措施

所謂「非常措施」就是，針對不願以公訂價格將一定量的糧食賣給政府、合作社等公家機關，或煽動農民不要出售糧食的不合作農民，行使權力的強制措施的總稱。

根據新經濟政策，農民如何處理自己收成的農作物——出售給政府、在地方市場出售或儲存——原則上由他們自由決定。政府等公家機關應利用價格機制等經濟方法，誘導農民出售農作物。依照新經濟政策的原則，當農民不願將農作物出售給公家機關時，應該採取提高公訂價格、進口糧食、向農民供給工業製品等經濟方法來完成糧食收購。使用公權力的強制收購，因違背新經濟政策而被嚴格禁止。

「非常措施」雖說只是一時的措施，卻完全否定新經濟政策。在「迅速的工業化」已確立為黨的總路線的前提下，黨以在當前情勢下，除了採取「非常措施」之外沒有其他打開危機的方法為理由，將這種否定新經濟政策的措施正當化。

1927年5月，英、蘇斷絕外交關係，戰事隨時可能爆發；加上在中國方面，蔣介石實施所謂「清黨」（破壞第一次國共合作，大規模屠殺共產黨人）導致中蘇關係緊張化。面臨著內外壓力，黨的領導幹部基於國防的需要，完全拒絕可能引發工業化速度減緩的任何讓步（例如提高糧食收購價格），於是在1928年1月初，黨採取類似內戰時期徵收糧食的「非常措施」。其實，採取「非常措施」的根本原因是，馬克思主義完全沒有預料到的，革命後（尤其是後進國家的）工業化、近代化的命題，也就是後進國家工業化時所共同面臨的積累和農民的問題，即所謂「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這個問題。

布爾什維克原來是以都市勞動階級為基礎的政黨，十月革命是先在城市獲得勝利

後才影響到農村。黨在整個二〇年代還沒能在農村發展出有效的組織網絡，整個二〇年代，農村最完備的體制機構是蘇維埃（地方自治行政機關），黨是依靠蘇維埃才能夠統治人民。在新經濟政策下，農村蘇維埃和合作社就是國家權力和農民之間的主要聯繫機構，也就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機構。因此，「非常措施」無法依靠農村蘇維埃和合作社來執行，只好由黨和其派出機關替代原來負責收購糧食的蘇維埃、合作社來進行。

「非常措施」是由黨——正確的說，就是在二〇年代逐漸在黨內集中支配權的黨機關（以總書記為首的專職黨工集團）決定並執行的。1928年1月6日，黨的政治局沒有經過制度上所必須的，經由「國家權力議事程序」而直接向地方黨機關發出執行「非常措施」的命令，並由地方黨書記負責執行這種威權主義措施。於是，地方黨機關就指揮政治警察、治安警察、司法機關向不合作的農民發動強權，強制農民供應糧食。

「非常措施」的執行產生立即的效果，糧食的收購量一下子就上升，但卻在政治上付出慘重的代價——黨在「國家」和「社會」之間，選擇了將自己隸屬於「國家」的地位，也就是，縱使訴諸於壓制手段，也要使「社會」從屬於「國家權力」。黨將自己與「國家」同一化，放棄了其做為「社會組織」的身份。

從機構上看來，這種情況意味著如下二個變貌：

〈 I 〉本來由國家機關（地方蘇維埃）和合作社負責的糧食收購業務，從此劃歸由黨機關來執行，形成以「黨機關為頂點的公權力一元體系」。政治局的指令容許：「當國家機關、合作社等不服從黨機關的命令時，可以不經過法定程序而予以解散、更換其成員或予以行政、司法制裁」。因此黨和國家之間的組織界線被撤除，黨機關將自己置身於國家機關之上。更由於要求以「黨機關為頂點的公權力一元體系」來執行「非常措施」，這種「強權」的發動導致黨機器不能不和警察權力等「強制裝置」取得緊密聯繫以執行任務。同時，位於權力頂點的黨機器，在形式上並非國家機器，因此其權限在法律上並沒有受到限制，從而其權限不可避免的具有「權力的恣意性」——在這裡可看到後來在三〇年代的大肅清時期發揮戲劇性作用的、由黨機關和（國家）強制裝置互相滲透而形成的「超越性權力」的開端。

〈 II 〉黨和國家的結合反過來影響黨的內部組織，成為黨組織變質的開端。史達林承認政治局的指令是包括了對地方黨領導者未能完成責任時的威嚇，即黨的地方組織不執行指令時，可不必依據黨章所規定的程序以及可無視黨和國家在組織上的峻別，採取從上而下的制裁措施。在民主集中制下，保障各級黨組織的自治權是從下而上的統合的重要組織原則，而這種地方黨組織的自治是當時黨員的行為規範。因此，

政治局對地方黨部的威嚇，是對地方黨部權利的嚴重侵犯。

1928年4月的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議：儘速廢止「非常措施」並復歸新經濟政策。但全體會議後，危機更一步深刻化，因此「非常措施」以更廣泛、更嚴酷的方式運用於農民。爲了使農民對政策的反感鎮靜化，7月召開的全體會議再度宣佈終止「非常措施」並保證以後不再執行。不過，雖然當年糧食有很好的收成，秋天的收購成績卻很糟，使莫斯科等城市再度缺乏糧食。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以快速工業化（對重工業大規模設備的投資）爲主要內容的第一次五年計劃案即將成立，快速的工業化政策和對農民的經濟讓步就成爲兩難。更由於農民和新經濟政策的代言人布哈林被擠出黨領導階層之外，黨當局不再採用對農民的讓步政策，而改採對農業共同體或統合於共同體的全體農民使用國家強制的、被稱爲「烏拉爾—西伯利亞方式」的收購方式，而暫時迴避危機。不過這種「烏拉爾—西伯利亞方式」於1929年春天適用於全國之後，黨的權力和農民之間的龜裂已擴大到難以修復的程度。有鑑於此，黨的領導階層認爲事態已經發展到了不能再拖延的地步，於是在黨內以農業集體化解決糧食問題的意見便急速抬頭。

1929年春，是新經濟政策的政策架構徹底解體的時期，也就是「階級鬥爭激烈化」的時期。蘇共中央捨棄漸進的「改革」方法，而在國家權力的主導下，以狂熱動員爲手段採用急進式的「革命」。此時，對糧食的採購採取反抗態度的農民被稱爲kulak，被視爲「階級敵人」而成爲鎮壓對象。

開始於1929年夏天的糧食收購的宣傳活動，是由已經「國家化」的黨機器全權負責，全面採用事實上已經形成對全體農民政治強制的「烏拉爾—西伯利亞方式」徵收農民所有的剩餘糧食。「我們的力量是無所不能的」，這種過於相信權力的宣傳是已經對「與農民的和解死了心」才會發出的。

1929年末，如暴風雨似地展開的「集體農業化」是在農民對國家、黨的信賴，對政策的支持以及自發性參加都極度降低的條件下，「由上而下」動起來的運動。因此，集體化是繼承了在黨與農民紛爭過程中被制度化的威權主義統治方式和「國家化」的黨。當集體化運動達到頂點時，1930年2~3月間，「黨的國家化」趨勢以及「一言堂化」已達到決定性階段。

1930年1月底，政治局做出「消滅kulak階級」的秘密決定，其主要內容是：爲了實施達到集體化目的的關鍵性手段，即「消滅kulak階級」（強化對反抗農民的鎮壓，使農民大眾的抵抗無力化的措施），必須將黨機器確立爲權力中樞——也就是在各級委員會中的寡頭制機關（當時指導黨活動的中樞）之下，由黨機關、蘇維埃、政

治警察（GPU）的各代表組成三人委員會，負責執行「消滅 kulak 階級」的任務。因為三人委員會是設立在黨機關之下，所以在形式上不屬於國家權力機關，但也由於它的成員中包括了蘇維埃和政治警察的代表，因此就成為黨和國家機器的複合體。更由於它在形式上屬於黨的體制，因此做為國家機關的權限並沒有明確化，從而可能行使恣意性的權力。同時，由於這種性格的非法定權力站在權力的頂點，隸屬於它的全部政治機構也是有同樣的具有非法定權力的性質，這就導致蘇維埃喪失了其做為群眾自治組織的性質，變質為威權主義統治的機構。

(c) 對「超越性權威」的恭順

農村統治構造的變貌，不可避免的引發全體政治體制構造和原理的轉變。因此，「從上而來的革命」是黨的質變和政治體制轉變的原因，而黨的「國家化」正是以此作為契機而進入決定性階段。在這階段中，一言堂以及擬軍事化的新紀律取代了民主集中制成為黨的基本組織原理。具有軍事紀律的「新」的黨替代了以前的「做思考、討論的黨」，於是，無條件服從於黨的最高領導人或領導集團的意志，這種由上而下的嚴格位階秩序就成為典型的組織型態。所以，凡是不符合於這種權威性格的「從下而上」的民主主義統合，以及保障民主主義統合的制度或黨員權利，就一律以阻礙組織統一為理由而加以排除。1930年，史達林在政治局委員會中強辯說：「以前的黨組織是屬於“孟什維克”式的」在「從上而來的革命中實踐的軍事規律才是布爾什維克本來的組織原理」。史達林這一番話所意味的是：一言堂主義的黨在觀念上已經成形。所以，在1934年修訂的黨章中否定了保留少數意見的權利和結成派系的自由，而各級黨組織的自治權也加上了「與黨的決定不發生矛盾」的但書而使其淪為形式。

黨的「國家化」和「一言堂化」二者表裡一體，成為難於抗拒的壓力，形成「黨機關領袖的意見就是黨的意見，黨的意見就是國家的意見，國家的意見就是社會的意見」的邏輯等式，而這種邏輯等式又成為社會主義原理或邏輯的順序。換言之，就是形成以黨機關領袖為頂點的位階制。1929年12月21日，總書記史達林的50歲生日被當做無前例的國民儀式來慶祝，就是走向這種變化的象徵性事件。在慶祝的讚辭中推崇史達林是最高的政治領導者，也是黨的最高理論家。在此之前，史達林是以實務家、行政官的姿態博得好評。史達林被稱為「最高理論家」的事實反映了：黨的理論教義的解釋權，歸屬於以總書記為頂點的黨的位階制並由其獨占的趨勢。

(d) 領導核心

1936年憲法是將有關黨的規定明文化的首部憲法，也因此成為「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典型憲法。但也許由於事實乖離了理念，並沒有對黨的位置做出適當的規定。

不過，史達林在「憲法起草委員會議長」的報告演說中，做出了的解釋性的結論。他說：「政黨是代表階級的，所以複數政黨的結社自由，只有在存在著幾個敵對階級的社會中才能成立。在蘇聯，只有勞動者和農民這兩個友好階級，所以沒有複數政黨存在的基礎。在蘇聯，只有一個黨，即共產黨的存在基礎」。史達林的說辭擴大扭曲了「當階級的對立不再存在時，黨也會消滅」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信念，是毫無根據的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理念。但是他公然宣佈：「共產黨是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唯一統治政黨」（一黨制），是有劃時代意義。換言之，史達林憲法規定「黨是領導中心」所意味的是，在制度上不承認共產黨以外的其他政黨可以成爲其替代政黨，因此，也確立了「沒有黨的領導，就不存在社會主義體制」這個耳熟能詳的社會主義體制基本原理。

四、結語：史達林主義和「去史達林化」

在思想的層次上無法比較古典馬克思主義（史達林主義以前的馬克思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因爲在「經驗」（或實踐）的層次上，史達林主義是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很大膽的修正。但在客觀上，史達林並沒有創造出替代馬克思主義的體系，主觀上也沒有這種意圖。史達林主義中包含了諸如「一國社會主義論」、「國家權力強化論」等修正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但他一直強調那些就是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正統，而不是由他所創造。因此，所謂史達林主義的原理只好從做爲其經驗（實踐）聚積結果的規定性、制度化中去尋找。

在歷史上，規定「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特質的「民族主義」、「國家」等觀念的形成時期，大致上和「從上而來」革命的發展屬於同一時期，也就是二〇年代末期到三〇年代。因此，以這些觀念爲原理性框架而形成的政治體系，可稱爲「三〇年代體制」。三〇年代體制不僅是蘇聯「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原理，對二次大戰後成立的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體制也發揮規範性作用。當然三〇年代以後，「三〇年代體制」受到種種，甚至相當重要的變貌。但既使如此，三〇年代體制仍做爲制度上、價值上的架構而限制其自身進行根本性的變貌。

許多社會主義體制研究者，因爲不滿將「三〇年代或以後的社會主義體制，視爲是俄羅斯革命理念的直接、必然發展結果」的正統派論述，將在時間上、空間上擁有這種作用的「三〇年代體制」通稱爲「史達林主義」，視之爲「從俄羅斯革命理念和實踐乖離化的體制」。當然，「史達林主義」這個用語，其定義因人而異。有些蘇聯反體制歷史學者、美國政治學者們認爲，史達林主義的本質是由史達林所執行的權力濫用、大量鎮壓、恐怖主義等等，主要在行使權力時的極端主義。

這種看法顯然把史達林主義和史達林個人強制牽引在一起，將政治批判和歷史認識混淆的狹窄看法。在歷史認識上，無論擁有如何強大權力的行使者，也只是歷史舞台上的一個演員而已。歷史所要關心的是，除了演員以外，還有演員表現他演技的整個舞台。換言之，在歷史認識上，儘管個人是如此的偉大、強大，卻不是能夠自由操作歷史的神或惡魔。所以在這裡所使用的史達林主義一辭，就是象徵歷史時代的概念。

〈I〉史達林主義是使民族主義內在化於社會主義秩序之中，因而使超越主權國家層次並抑制主權國家的普遍理念，質變為為主權國家服務，使其利害正當化的理念。這種質變，是由三〇年代一國社會主義的教義變成國教，而由國家權力的強制所保證而確定起來的。

〈II〉史達林主義的體制原理是，使國家站在比社會更為優先的地位。所以有些學者認為：「史達林全部思考的中心在於國家」。

在1933年1月的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史達林提出：「階級的消滅並非由於階級鬥爭的鎮靜化而是由其強化而達成」，「國家的消滅並非由於國家權力的弱化，而是由於其最大限度的強化而達成」的新命題。當蘇聯宣佈基本上已完成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也已經鎮靜化，實現了社會和諧時，這一個立場也沒有受到任何修正。

如前所述，史達林憲法規範並制度性地強化了「最大限度地國家權力」。因此，社會、社會組織相對於國家的自主性則遭到完全地否定，而黨的「國家化」正是這種否定的中介。「由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不再被認為是歷史變化的決定性要素，取而代之的則是「由上而來」的政治強制和國家。如此一來，對社會主義的忠誠是對國家、對占有國家中樞地位的黨的忠誠，而社會主義就是由國家完全掌握生產手段。由於國家是主要生產手段的所有者，所以也就是社會主義理念的獨占者。「從上而來的革命」成爲這種轉換政治原理的經驗基礎，而「黨的國家化」就是這種轉換在機構上得的表現。

在史達林主義的巔峰時期，確立了黨不會犯錯誤的神話，而且更進一步的確立了史達林的神化。這就出現了「國家可以做任何事情」這種「國家的去道德化」現象。

雖說很吊詭，但國家的壓倒性優勢是和大眾政治參與空間的擴大一起併的——「史達林主義化」將大眾帶上政治世界並使其政治化。由於工業化和集體化社會主義競爭的展開和傳統共同體的解體，導致政治空間擴大到社會基層，因而將大眾動員到政治世界。大眾不僅僅是被動的接受，往往由於狂熱和社會地位上升而積極的參與政治事務。但是，剛剛粉墨登場的人民大眾並不是自立於國家之外、擁有主體性的人

們，而是接受權力的煽情操縱的對象。國家是以類似商業宣傳的手法，操作並動員群眾，使國家更完全地站在比社會更為「優越」的地位。

三〇年代蘇聯是大眾政治化的戲劇性時代，它包括了英雄的犧牲和走出權力的控制。但也是在大眾的默許下，甚至是由於大眾的參與而徹底地、無情地鎮壓對國家權力保持自主性批判思考的人們的時代。

〈Ⅲ〉史達林主義是以「個人埋沒於全體」的形式確立「社會主義的共同性」。

納粹主義是「權力」破壞了既存的高度文明、市民文化，復活了隱藏於文明表層下面非理性的神話性思維，並將之用來確立特異的集體性。史達林主義的共同性，是深埋於蘇聯社會的傳統的村舍共同體文化滲透於布爾什維克政治文化的結果。這是由於在國家和共同體之間產生了敵對關係，而國家卻在共同體解體的條件尚未成熟之際，就以「從上而下」的方式執行，因此反而強化了農民抵抗共同體解體意識的「解體的不徹底性」的結果。也因此爲了確立共同體，不得不強化「從上而來」的權力規制。E.Deutche針對三〇年代政治文化的戲劇性變貌做出如下的描述：「列寧時代，布爾什維克習慣於以理性利益、進步的理想主義訴於『階級意識已覺醒』的工業勞動者。布爾什維克也以理性的語言對待農民。但當布爾什維克不再依靠西歐革命，認識到只有依靠自己以外，沒有其他出路時，反而以原始的咒術語言訴諸於民眾」。所以托洛斯基在《被出賣的革命》一書中指出：「史達林體制下的幹部，對待部下或市民的驕傲自大的態度，非常非常像沙皇時代的官僚」。

馬克思的思想核心在於：「社會主義的目的是人的解放，是個別人格的全面發展；社會主義並非個人被一致化的、自動化的社會；個人並沒有隸屬於國家或官僚政治的社會」。列寧在「國家和革命」中所構想的，也是以這種人的全面發展爲基礎的新社會。但符合於「史達林主義」秩序原理的「社會主義時代的人」，並非馬克思、列寧、羅莎盧森堡等人所描寫的，做爲自己生活的主人、創造者的人，而是完全隸屬於國家而在其庇護下的一致化的人。如此，史達林主義的政治文化使人民產生不易剷除的對國家的寄生心態。

不過在史達林主義之下所進行的建設成果是無法否定的。它在短期間內始使歐洲最落後的農業國變成強大的工業國。大眾教育的普及、社會保障、完全就業、城市化等等也都有所進步，社會構造也有質上的變貌。這些工業革命的成果成爲走向社會主義經濟的社會基礎。但這些成果卻與實現「人的解放」這一些社會主義的目的無關，反而史達林型的工業革命造成了與此目的相反的「隸屬」的秩序。因此如E.H.Carr所說：史達林主義是擁有「革命」與「反革命」的兩面不同面貌的變革。史達林式的工業革命之所以不符人性的原因之一，是追求社會主義這個目的時並沒有選擇符合這個

目的的手段，而將它所選擇的手段合理化成為社會主義原理的就是史達林主義。

從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看來，史達林主義在工業建設的某一階段以前，或文化的一定水平以前，對歷史而言可說具有積極的意義。但當工業化和社會文化的變貌到了如沒有技術和文化的創新就無法再進一步發展的階段時，史達林主義就成為進步的阻礙要因。

首先發現這種情況的是托洛斯基，他在「被出賣的革命」一書中說：「行政的計劃化充分顯現其力量，但同時也曝露出其力量的界限」。史達林死於1953年3月。史達林去逝的3年後，第20屆蘇聯共產黨大會將他從「神壇」上拉下來。此後，在蘇聯及其他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內所產生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各種變化，可以總稱為「去史達林」——因為對社會主義的活化性而言，史達林主義已證明其為關鍵性阻礙要因，因而是史達林主義喪失其現實存在的理由的過程。

從一九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的蘇聯史，是「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分歧點。因此，藉由對這個分歧點前後的比較，可瞭解既存社會主義體制的特徵。

蘇聯在二〇年代的歷史，大致上是十月革命理念的忠實的實踐。當然，歷史並不是理念的忠實實踐所形成，縱使行為者忠實於理念，歷史卻往往造成與其理念不同的結果。三〇年代體制中，有許多要素是在二〇年代形成並發展的。所以許多人說，歷史是連續和變化的複雜合成物，但是由於歷史學家所生活的時代狀況以及主觀態度不同，所重現的契機或變化的契機也就有所差異。由此可見，歷史認識離不開價值判斷，因此歷史也不斷地被重寫。

「去史達林化」的一個大潮流是個別體制的獨特性和自主性的擴大。1955年蘇聯共產黨撤回了對南斯拉夫和狄托的無理批判，1956年3月，蘇聯共產黨第20屆大會（除了成為「去史達林化」的出發點之外）也進一步的承認了走向社會主義的不同道路和民族共產主義。所以該大會所強調的並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否定蘇聯過去對民族主義的壓抑和對小國民族主義的支配。

由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對捷克的軍事鎮壓看來，個別體制取得自立性的道路並不平坦，但是，雖說如此也不可否定的是個別體制逐漸增大其自立性，而蘇聯共產黨也逐漸喪失其國際領導力。

不過，「去史達林化」並沒有找出國際統合的新模式，至少個別體制的民族主義並沒有昇華為新的國際主義。但小國主張民族主義是正當的權利，對「去史達林化」後民族主義的迸發不能只給予否定性的評價。正如列寧的民族理論所說，「民族自決」不過是為了追求兩性以真平等為基礎的結合而行使的離婚自由的權利而已。如果

大國因爲自身的利益而壓抑小國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互相認知，也許是走向真的國際主義的第一步。所以舊蘇聯時代，成爲俄羅斯沙文主義犧牲者的少數民族要求恢復權利的行爲，可解釋爲帝國的瓦解，但也可說是基於民族平等的新統合的前階段。

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顯現「去史達林化」界限的事件是發生於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改革的聲音首先發自於共產黨的內部——一言堂的黨，由於黨權力集中於少數的黨機關，因而使黨分裂爲「全能的寡頭制」和「無權力的大眾」。1966年的捷克共產黨的行動綱領說：「並非黨統治社會而是由於自由且進步的社會主義發展而完成其領導責任。黨不能強制其權力，而是由於不斷的黨活動而獲得其權力。黨不能以指令強迫人民接受其路線，而是由於黨員的活動和理想的正確性而使其實現」。黨行動綱領的這一段所表明的，是將已國家化被保障政治獨占的黨復原爲社會組織，然後使黨擔任由下而上的民主化責任；也就是要求黨的改革恢復民主集中制，發展黨內民主主義。但黨的「去國家化」這個改革構想，由於包含了去史達林主義制度核心的邏輯，因而被將史達林主義視爲社會主義，將黨的領導視爲社會主義體制基本原理的蘇聯和東歐的政治菁英認爲反社會主義，因而遭遇到華沙公約機構的軍事介入。

戈巴契夫政權的 *perestroika*（重建、改革）再三強調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的民主主義的發展是經濟活性化不可或缺的 premise。從戈巴契夫和改革派知識份子的言論可以瞭解，在思想上鼓舞 *perestroika* 的最重要因素是，十月革命的理念以及二〇年代以前的爲建設社會主義而發生的思想及政策上的爭論以及其實踐——這是由於十月革命到二〇年代末的思想和實踐，在質上遠比「去史達林化」更爲豐富的緣故。

以「去史達林化」爲契機所產生的各種「既存」社會體制內的改革都告失敗，而蘇聯和東歐也都轉向資本主義陣營。如前所說：「在歷史認識上，不管個人是如何的偉大，卻不是可以自由操作歷史的神或惡魔。無論怎樣強大的權力行使，也都不過是歷史舞臺上的一個演員而已。歷史所關心的，除了演員以外，還有演員表現演技的整個舞臺」。史達林主義也一樣，沒有史達林所處時代的內外各條件，也就是他表演演技的歷史舞臺，史達林主義是不會產生的。因此，除了產生史達林主義的內外諸條件（就現在而言，最重要的是資本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霸權主義稱霸世界，是對社會體制的武嚇和和平演變的政策）完全消失，「既存」社會主義體制是不可能完全恢復到馬克思所期待的，而蘇聯十月革命領導者們所意圖建設的社會主義體制。這也就是說，當資本帝國主義還是今日世界的主流勢力時，一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全文完）

編輯報告

十月下旬在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會高峰會，台灣首度缺席，此舉對於台灣與國際世界的互動雖造成無可彌補的傷害，但對於正因經濟不景氣而陷於愁城的陳水扁及民進黨而言卻是一大利多。林深靖〈誰能代表陳水扁？〉，對於陳水扁這種「政治資源私有化」的作風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八月下旬經發會落幕後，台灣的勞動關係體系正出現空前未有的變動，勞委會現正磨刀霍霍的提出包括退休金縮水、變形工時等各項修改勞動法令的提案。經發會就業組中有關「修改勞動法規，健全勞資關係，擴大勞動參與」的共識究竟實質意義是什麼？鄭怡雯〈瞄準經發會——從就業組談起〉，指出這些決議只是壓低勞動力在內的各種要素成本，以方便老闆們做生意罷了！

過去二十年間，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結合在一起的力量襲捲全球，不論是在國家與國家之間或國家內部，貧富的差距都在拉大，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則在急速的惡化。但從一九九九年西雅圖反WTO抗爭以來，全世界的進步力量也正在摸索出一套對抗全球化的模式，出身學運的社運工作者楊偉中〈世界反全球化鬥爭與台灣左翼青年運動〉，對於當前反全球化鬥爭的現況作了極為全面的介紹，他並進一步指出台灣青年運動能從這股反全球化運動中學到什麼，以及這種國際連結對台灣左翼運動發展的時代意義。

何六九的〈鄉鄙之歌〉在《左翼》第二十號發表後，汪立峽曾撰〈致何六九先生的一封信〉回應（《左翼》第二十一號），何六九也為此發表〈覆汪立峽先生〉一文。此外，針對《左翼》過去幾期刊出張懷思〈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對何六九的批評，何六九另撰〈理直氣壯因何而生？〉駁，文中繼續強調他的漢族血緣批判論。由於篇幅所限，何六九來稿原包括早期漢民族主義與重估漢人的民族革命兩部份，本期只能刊出第一部份。

黃志龍〈社會主義的理念與體制的乖離（五）〉，本期刊出的結論部份主要是探討斯大林主義產生的背景、內容、影響，及「去斯大林化」的出現。作者最後提出警語，特別發人深省：當資本帝國主義還是今日世界的主流勢力時，一國社會主義是不可能長久存在的。

左翼 第二十四號

出版日期：2001年10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二十五號



〈力耕在荒土上〉

作者：黃新波

我們的看法與態度

編輯部 /2

馬克思主義思潮與台灣知識份子

陳映真 /3

爲什麼搞「新民主論壇」

林書揚 /16

誰該爲阿根廷危機負責？

楊偉中 /22

《南天之虹》——湮滅和再生的歷史

曾健民 /26

【特稿】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一〉

黃志龍 /31

我們的看法與態度

編輯部

在《左翼》24號出刊的九個月後的現在，《左翼》25號出刊了！

在這續刊的時候，編輯部要以前二十四期的具體勞動成果來向大家表明我們將繼續堅持的兩點態度：1.持續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絕無公開募款的行為。2.編輯部對外維持無面目的狀態，絕無屬於個人的。

左翼雜誌自創刊以至二十四期的這兩年的時間裡，實際固定參與編輯、印刷、裝訂的人員不超過三人，在裝訂的過程中，除有零星的朋友的幫忙，大多是編輯部同人的家眷，每期的出刊，總得有人達30個小時以上的持續工作。而在經費上，除了郵資之外，印刷機借自朋友之處，我們把每一期的成本壓到只剩下紙錢，而在捐款不足之下，編輯部同人更是經常自掏腰包——這樣的生產方式，面前我們將持續下去。因為我們相信為求長期的對抗，運動的持續，生產工具必須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勞動實踐換取資源上的不足，是當前台灣左翼必修的課題，特別是在當前台灣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社會，社運團體中瀰漫著向政府拿資源，與資產階級政客攪和以及市民運動化的墮落現象，通過我們的實踐，我們希望能對這樣的風氣，有稍加導正的幫助。我們信奉兩句話：「生產勞動決定意識型態」及「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有幾分實力，做幾分事，如此才能避免墮入向政府拿資源而導致的運動路線上的必然妥協。我們希望更多認同我們這種生產方式的朋友，共同來幫忙。我們接受捐款，但絕無主動以「左翼」名義公開募款的行為。

台灣的變革運動自解嚴後的風起雲湧，到如今的陣陣漣漪，我們認為這固然與世界左翼運動的退潮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台灣的變革運動的急功近利，目光狹小，使我們一步一步陷入了支配階級的收編過程，失去了站在階級的立場與支配階級進行政治鬥爭的能力。當然，也根本不可能探討、分析、實踐當前的政治鬥爭目標。在此情況下，左翼力量的集結或組織化自然難以形成。結果，在為了組織化而進行的一次次合作、相處過程中，變革的熱情快速消退，變革變成只個一場權謀戰術的遊戲，人的問題以及人與人的相處問題已經成為台灣左翼運動發展的最大障礙。因而，我們不得不強調，在我們追求社會變革的過程中，必需先進行自我的改造，那就是保持實踐上的道德性與純潔性。

由於台灣左翼力量的分散與幼嫩，我們覺得目前還是以多討論取得一致的共識為首要，不怕爭論，只怕不談，所以我們繼續公開這個園地讓所有懷抱左派理想的朋友，共同深耕。

自24號出刊後迄25號出刊前，經朋友轉交，收到王乃信先生台幣2,000元及何鴻志先生台幣2,000元兩筆捐款，特此致謝！

馬克思主義思潮與台灣知識份子

——序杜繼平新著《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

陳映真

馬克思主義思潮流傳到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的台灣，造就了一些台灣人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思想家和革命實踐者的歷程，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卷（漢譯本《台灣社會運動史》，創造出版社，一九八九）中，有比較豐富的資料。書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思潮從兩個來源滲入台灣。在新俄革命成功和第三國際的強烈影響下，二〇年代日本的知識界和文化界急速左傾。當時留學日本的一些台灣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日本左派個人或團體的影響而左傾，把馬克思主義思潮帶回台灣，起了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後，受到一九一七年成立的蘇聯和一九二一年建立的中共，以及中國左翼反帝風潮（例如五卅運動、北伐革命）的影響，當時留學大陸的台灣青年知識份子也受到思想衝擊，把馬克思主義思潮帶回台灣，也起到一定的影響。留日馬克思主義青年比較著名的有彭華英、連溫卿、蘇新、和楊遠等，受到中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思潮影響的，比較突出的有翁澤生、許乃昌、林木順、謝雪紅、潘欽信、蔡孝乾、王萬得等人。

台灣馬克思主義者，以馬克思的知識思想體系，寫成理論文章，成為台灣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並不很多，但也還是不少，是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重要傳統和文獻。

據連溫卿指出，早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在東京發行的《台灣青年》上，就有彭華英寫文章介紹「旋風似的社會主義學說之發展」。一九二三年七月，《台灣青年》又刊出秀湖寫的〈台灣議會主義和無產階級解放〉。一九二四年四月，在上海的台灣左翼青年辦的刊物《平平》，有文章抨擊台灣資產階級的議會請願運動，並且主張「一、對內謀全民族的極鞏固的團結；二、對外和勞農俄國、以及日本被壓迫階級與朝鮮、中國等處的被掠奪民族結成國際的聯絡……做革命的鬥爭，這樣我們才能到完全的解放……」

一九二六年八月，在《台灣民報》上，陳逢源和留學中國大陸，並曾被中共選派前往莫斯科學習的許乃昌之間，爆發了有關「中國改造（革命）論」的爭論。

陳逢源的文章題為〈我的中國改造論〉。他依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著名的序文有關歷史和社會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公式，先強調社會進化的行程有一定的客觀規定性。因此，資本社會比封建社會進步。雖然當前世界資本主義已屆其衰亡的末期，但資本社會「非達到極點」，「斷沒有社會主義之實現」。未來社會主義社會非經資本社會之洗禮不可。

陳逢源繼而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一部份已進入資本主義（如上海、漢口等），但大部份仍停留在封建社會。眼前中國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蘇聯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日本的資本主義道路。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弊端百出」，所以日本的將來只有走蘇聯的道路。

但陳逢源說，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受到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摧殘，一方面在一次大戰後看見「中國工商階級的興起」。所以他主張中國要先走資本主義道路，以強大化的工商階級削弱軍閥，統一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以改造中國。

同年十月，許乃昌也在《台灣民報》上發表長文〈駁陳逢源的中國改造論〉。他強調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序言中所稱，當物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時，「社會革命的時代便展開」這一論述中的革命、突變、變革的一面。親身在大陸體驗了一九二七年清黨前夕聯俄容共、國民革命時期的許乃昌，力陳中國的改造端賴國民革命。他認為中國已淪為「資本主義列強的公共半殖民地」，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商品市場、原料供應地、資本的投入所」。而沿海地區的中國工商業，無非是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和買辦主義資本的工商業。封建餘孽軍閥分別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和操控，中國內戰無已，貧困破產，再也不可能走日本資本主義改造、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之路。而當時聯俄容共進步的國民黨提出的國民革命論，主張聯合先進國被壓迫人民和世界被壓迫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工具的封建軍閥、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扶助工農階級，由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的國民革命，改造中國。

針對陳逢源的扶助中國工商階級，許乃昌指出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反動性」。他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資本固然有一定矛盾，但也有彼此互相溫存的一面。他們對中國工農階級的崛起心存疑懼，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鬥爭中，中國資產階級叛賣了革命。陳逢源企望中國資產階級救中國是妄想，而中國的改造，只能依靠中國的工農階級。

受到二〇年代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鼓舞，殖民地反帝鬥爭的聯合可能使殖民地解放運動不經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向社會主義改造「跳越」的思想，一時流行於

當時第三國際的思維中。受此影響，許乃昌特別強調「社會組織」(即社會生產方式)的可跳越性，主張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有可能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直接向社會革命「跳越」。許乃昌認為，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既已不是封建社會，也不是資本社會，而是「帝國主義時代特殊的殖民地中間形式」的社會，頗類後來一般所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許乃昌批評陳逢源的社會演化觀的「機械唯物史觀」。許乃昌主張社會發展行程各國各民族不完全一樣，不能機械地套用公式，而「必須連系一國社會特殊形式和國際政經關係」。如果中國國民革命勝利地打倒了帝國主義，匯合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了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支配，則落後國(殖民地)的資本主義自無發展餘地和可能，於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中國國民革命就會「自然發展為社會革命」。許乃昌接著引用了列寧所說勝利的無產階級進行組織化宣傳，在蘇維埃援助下，「則落後國沒有蹈襲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之必要」……而進入蘇維埃組織……達到共產主義的話。

許乃昌說，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封建宗法社會正在解體。「一九二一年後，外國商品大量輸入中國，外國工廠和銀行林立……」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不是資本社會，「也不是由封建社會向資本社會過渡的社會」，而是「帝國主義時代特殊中間形態的社會」，所以既不能像蘇聯一步走向社會革命，也不可能走日本資本主義化道路，而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過渡進入社會主義。

同年十一月，陳逢源發表長文〈答許乃昌氏駁中國改造論〉。他仍然強調革命只有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向來的生產關係成了新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才發生。他引用馬克思的話「當物質存在條件懷孕於舊社會母胎內滿期之前決不會發生社會革命」的話。因此中國社會的改造，仍須鼓舞「國民精神」(民族主義)，以打倒封建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促成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陳逢源以實際數據比較了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間中國紡紗工業的巨步發展，說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內鬥的空隙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陳逢源反對許乃昌以社會革命改造中國之論，因為依當時國際形勢，中國一旦豎起赤旗，必然外部招來列強干涉，內部也引人民疑懼。至於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先進國與落後國無產階級間利益也不一致。陳逢源更以革命後蘇聯不得不實行妥協的「新經濟政策」，開放農村自由市場，中農階級滋生，「以經濟上的讓步替代政治的讓步」，這是不估計社會性質，「只靠暴力推翻舊政權」的結果。他也批評革命後的蘇聯行一黨專政，「斷非無產者的天堂」。陳逢源一再強調「中國不能實行共產主義」，一再強調以民族主義(「國民精神之振興」)「求國家之統一」，打倒帝國主義列強與封建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接受「資本主義的洗禮」，實行資本主義，再以社會政策救濟資本主義的弊端……

同年十二月五日，蔡孝乾也在《台灣民報》發表〈駁芳園（即陳逢源）君的中國改造論〉，指出當時中國問題的根本，是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豆剖瓜分，「於是才有辛亥革命、五四和五卅」。在帝國主義壓迫下，中國不可能發展。而當時中國的一點工商業，無非帝國主義或買辦資本，中國走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他也以五卅運動為例，說明中國資產階級動搖性和反動叛變。「當前中國的生產關係比革命前的俄國還落後，無產階級受到多重壓迫，因此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打破現在的生產關係—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改造中國」。

一九二七年二月，許乃昌寫〈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指出陳逢源的「共產赤化」論是反共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主義論，是反共宣傳，「資本家的辯護人」。他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序文：「科學的批評的一切判斷，是我們所歡迎。然而對於我所未曾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那偉大的夫魯連斯的格言依然可以適用於我：『你行你自己的路，任別人說他們要說的話吧。』」許乃昌最後說，「我們絕不怕有根據的批評。但對於那些有產階級的『輿論偏見』可以不必管牠了」，結束了這次冗長的爭論。

這場論爭的兩造，固然有左、右，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革命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區別，但早在台共先後兩個政治綱領之前兩年至五年之前，台灣思想界就發生（全部或部份）使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語言，討論社會變革（「改造」或革命）理論中關於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變革運動的性質，變革的主力、變革對像和變革運動的方針政策等諸問題，是台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文獻。其次，已故台灣史學者戴國輝曾向作者提示，陳許間「中國改造論」之爭，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爭論的表面雖然談中國的「改造」，其實骨子裡也是躲避日本偵警爭論殖民地台灣革命的兩條路線—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改良論的道路，還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道路。果然，則這次爭論在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之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第二個重要文獻是台共一九二八年政治綱領和一九三一年的政治綱領。雖然這兩個綱領都有日共、中共和第三國際在起草、審定上的影響，但畢竟也是台灣馬克思主義者參加起草、審定的文獻。二八年綱領中有關勞動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問題和赤色救援會等方針策略的提綱，是由林木順總結起草的。現在就兩個綱領關於台灣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變革（革命）運動的性質、階級分析、變革對像和變革主力等各方面的理論認識，做最概括性的介紹。

一九二八年綱領

一、**社會性質**：殖民地台灣社會「一方面存在著（日帝資本）占支配地位的高度

資本集中，同時又存在著台灣本身落後、幼稚、依附性的資本。在台灣農村存在著非資本主義（封建）經濟要素」。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了。

二、變革運動的性質：封建的地主·佃農關係，總督府獨裁政治、日本金融資本與台灣封建地主階級的結合……凡此皆規定了台灣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

三、階級分析：二八年綱領將台灣社會階級劃分為九個，即日帝大資產階級；「反動資產階級」（指台灣本地以地主為基盤的、有濃厚封建成份、依附於日本金融資本的大資產階級）；「進步資產階級」（指從地主階級演化出來的城市工商資產階級）。日本帝國主義資本阻礙他們的充份發展，又身受歧視與壓迫，使他們帶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也有妥協動搖性；小資產階級，指的是小商人和小企業經營者，經濟地位不穩固，在日常中受日帝經濟壓迫而瀕於破產，故有較資產階級熱烈的革命性，但也帶有動搖性。其他教員、知識份子也屬於這個階級；大地主階級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走狗，依靠對佃農的現物榨取而存在；中地主，指佔農村人口八%而擁有二八·八%土地的地主階級，有資本主義傾向，但也與進步資產階級有連繫；自耕農階級，他們占農村人口三〇%，占有二三%土地。因農村工業的發展、土地集中、日帝強徵土地而日益零落，瀕於破產，淪為農業無產者與貧農，故有其革命性；貧農和農村工資勞動者，他們蒙受日帝和本地地主階級的雙重壓迫，是農村中最低下的階層。農村工資勞動者指農村工廠工人、農場雇工及從農村分化出來的自由勞動者。而集結在農民組合旗下的農民，是自耕農、農村工人和貧農，正與日帝展開殊死的鬥爭；工人無產階級，占全人口三〇%。在世界不景氣中，提高了政治與組織的自覺，但尚未結成獨立的階級勢力……

「二八年綱領」雖然把台灣社會階級細分為九種，強調由工人階級領導、團結貧農和其他帶有不同程度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進行「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以完成反日帝而自日帝取得民族解放與獨立，並打倒封建主義，完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最後向社會主義過渡。綱領批評當時文協左派和工農運動的骨幹多為進步小資產階級和青年學生，有「左」傾現象，對殖民地台灣社會殖民地半封建性認識不足，從而主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傾向，加以批評，力言台灣革命是台灣無產階級為領導核心，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展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但是特別受到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受資產階級叛變出賣所遭受的慘烈「清黨」的鎮壓與迫害的歷史經驗影響，二八年綱領仍然對台灣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之動搖和薄弱性，加以強調，警惕資產階級在革命中走向反動。饒有興趣的是，和許乃昌一樣，二八年綱領既強調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又不憚於強調革命最終向社會主義必然轉化

的展望，理由是 革命由台灣工人階級領導； 中國與日本革命的社會主義展望（以及蘇聯的壯大），等等。

一九三一年的綱領，雖然更多地受到主要是中共、其次是國際的影響，但相對地台灣馬克思主義者已進一步有了自己起草各項提綱的能力。例如三一年綱領中政治提綱、勞動運動提綱、農運提綱、青運提綱和好運提綱，分別由蘇新、蕭來福、陳德興、吳拱照和莊守起草。趙港、王萬得也是當時主要的馬克思主義者。

和二八年綱領相較，受到當時中共激進化的影響，三一年綱領把台灣的階級分析簡化為日本獨占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依附性或買辦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農階級和「勤勞大眾」。對於台灣社會性質，綱領認為台灣是「高度發達的日本人資本主義與殖民地落後的自然經濟、小手工業」的結合體。較諸二八年綱領，三一年綱領對台灣大小資產階級採取更消極和不信任的態度，強調了台灣資產階級對日本大資本的依附性，買辦性和地主階級根性。因此雖然綱領規定台灣革命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除外）完全排除在革命的主力—工農、小資產階級和勤勞階層……之外，主張「孤立資產階級」，直接實行「土地革命」以消滅地主封建勢力，並且在「農村與工廠進行烈的階級鬥爭，打倒日帝，建立台灣工農民主政權（蘇維埃）」。然而綱領又認為當前革命的性質「仍為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革命」，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必由之路。而與許乃昌、二八年綱領一樣，三一年綱領更熱烈地提出台灣革命在島內外革命形勢下最終向社會主義革命移行的展望。

一九三一年，日軍發動侵攻我國東北的戰爭，日帝在島內展開對於各反帝、反殖民社會運動的全面「檢束」（起訴）。文協、民眾黨、農組和台共先後遭到徹底的法西斯鎮壓。但從黨和其他陣線四散的力量，逐漸移轉到台灣文學戰線，繼續和敵人進行曲折的鬥爭。直到一九三四年左右，台灣文藝界仍熱烈探討大眾語，大眾文學這些左翼文學理論。從台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史的觀點看，一九四三年皇民文學派西川滿、濱田隼雄、葉石濤，和反帝民族主義派世外民、吳新榮、台南雲嶺和伊東亮（楊達）關於評價台灣新文學中現實主義的爭論中，楊達的文章〈擁護狗屎現實主義〉最見突出。一九四三年，日本當局要全面將台灣新文學納入文學為侵略戰爭服務的「台灣文學奉公會」，西川滿在《文藝台灣》發表了〈文藝時評〉，辱罵台灣新文學批判現實主義傳統是「狗屎現實主義」，頌揚日本文學的唯美主義傳統，最後又大力宣傳為侵略戰爭服務的皇民文學。楊達的駁論提出審美的階級性（農民、農業、農作物對「屎」的評價），更以靈活的辯證唯物主義討論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對立統一。楊達說真正的浪漫主義是從現實出發，並對現實懷抱熱烈的希望，盡力去改革現實中

的醜惡，發揚現實中存在的亮光，凝視現實，克服現實中的「否定要素」，培養否定要素中的肯定要素，轉換否定與黑暗為肯定與光明。而真正的現實主義，也是立腳在（敢於改造、敢於勝利的）浪漫主義……楊達文章說理深刻，處處發揮辯證唯物論的智慧，義正辭嚴，在戰爭末期日本法西斯氛圍逼人的時代，勇於鬥爭，捍衛了台灣新文學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這是台灣馬克思主義文學論中相當重要的文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身在大陸從事抗日活動的台灣人革命家李友邦，在一九四一年發表了題為《日本在台灣之殖民政策》的小冊子，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自十九世紀後半以迄四十年代初的台灣社會經濟性質。他和前此台灣社會性質論的分析略為不同的是，他強調鴉片戰後台灣封建經濟的崩潰，佔優勢的日帝資本已經一掃農村自然經濟，將台灣經濟納入日帝的國民經濟。但他也指出日帝在台保留了封建主佃榨取關係，日帝和台灣封建大地主階級相溫存的關係。李友邦也指出台灣本地資產階級反帝革命意志的動搖性和軟弱性，與受薪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可能性。然而李友邦的變革理論最終卻強調殖民地台灣內部在日帝強化支配下，民族矛盾的絕對性，以「各階級共同的（民族解放）利益為基礎」，引導民族（反帝）運動之發展，最後先打倒日帝而自日本獨立，然後與中國革命合流，使台灣復歸於中國，完成民族的解放與統一。《日本在台灣之殖民政策》，今日視之，可能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但無疑是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有關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的不能忽略的文獻。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自殖民統治下解放。從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九年未，大陸和台灣之間很快地納入當時全國的政、經、文化和思想的共同的潮流。舊台共人員如蘇新、謝雪紅復甦，在文化和社會運動中活躍。一九四六年中共省工委來台，吳克泰、周青、陳炳基、葉紀東年青的共產黨人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下活躍。在這個時期，台灣的變革運動自然成為中國大革命的一部份，自然沒有特別發展台灣一省革命理論的需要，而仁人志士，無不投入大革命的實踐中，後來有的在四七年二月事件後西渡大陸，更多的人仆倒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暴風中。台灣優秀作家呂赫若、簡國賢、朱點人、徐瓊二等人毅然奔向了革命實踐，潛入地下，最後都壯烈犧牲。

但出人意料的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了高於日據期的豐碩成果。一九四五年底開始，有些進步的大陸文化人來台，和台灣本地進步知識份子共同從事進步文化宣傳啓蒙的工作。在文學上，一九四六年開始配合大陸進步文藝機關的號召，紀念魯迅，論述魯迅。在創作作風和創作方法上，宣傳文藝作家深入人民群眾的生活，主張對日據下台灣文學進行為了再出發的反思，提倡大眾的、人民的文學，提倡現實主義的文學和宣傳民主鬥爭的文學，並確立了台灣文

學是中國文學組成部份之論。這些理論家有楊逵、范泉、賴明弘、樓憲、張禹、王思翔和龍瑛宗。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開始，在《台灣新生報》歌雷主編的「橋」副刊上展開了一場延續到一九四九年春天的，關於如何重建光復後台灣新文學的熱烈的討論，參加論議的有省內外作家和文化人、文藝批評家，很大一部份人都使用或素樸、或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方法和語言，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本省作家楊逵和省外作家羅鐵鷹的論文。

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五日，楊逵發表〈臺灣文學問答〉，對當時台灣文學界共同關切的若干問題提出了思想深刻的回答。楊逵說，中國各省各地都設有特別標榜各省各地的文學，但在四八年當時，卻有提倡「台灣文學」概念的必要。這是因為五十年殖民統治為台灣帶來一定的社會、歷史和生活的變化，造成光復初期省內省外人士之間的隔閡。光復後，有識之士，莫不為消除此隔閡而努力。深入台灣人民的生活，表現當時台灣人民的遭遇、苦惱、思想和感情的「台灣文學」，甚有必要。

楊逵認為「台灣文學」不能與中國文學對立而論，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然而台灣「託管派」、「親日派」、「拜美派」要發展他們的文學，就與中國文學對立起來。這種文學是「奴才文學」，不得人心，不能發展。

二二八事變以後，特別是國府當局常常說台灣人民受日本奴化教育，才對陳儀集團的統治有了二心。這種說法很引起省內知識份子的反感。楊逵的回答說，自有階級和(帝國主義)民族壓迫，壓迫階級和民族就對被壓迫階級和民族進行「奴化教育」，以利統治。但有人為自己私利被奴化了，但「絕大多數人不被奴化」，而且起而反抗，支持抗日鬥爭(領導過幾萬農民組成的「台灣農民組合」的楊逵當然對此有深刻的體會)。楊逵說當時的台灣「託管派」、「拜美派」就是被奴化的人。楊逵說，國府法西斯獨裁統治和長期隔閡，「使台灣人民無從接觸」當時大陸「很高的文化」(指民主革命思潮)。省內省外有識之士，應該力爭深入省內與省外人士間的交流與團結，「到人民中去，支持和理解台灣人民。而這正是當時『台灣文學』的任務。」

就是這樣，緊密聯繫了一九四八年全中國國情，楊逵提出了「台灣文學」寫什麼—寫台灣人民的生活與現實；寫誰—寫廣泛台灣人民的生活與苦惱；為什麼寫—為了反映台灣社會和歷史真實，增進省內外同胞的民族團結，為了反對獨裁政治、反對親美崇日和分離主義的「奴才文學」。在有關「台灣人民思想被日本奴化」的問題，楊逵以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論，論證統治階級(或民族)的奴化教育自古有之，但不都

能達到奴化的效果。拒絕奴化、果敢地為解放而鬥爭的史實所在多有。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起，駱駝英（羅鐵鷹）在「橋」列刊連載了長文〈論「台灣文學諸論爭」〉，為這次的廣泛論議做了總結。文章的要旨如下：

一、四〇年代當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規定了中國文學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文學應該在四八年當時「反帝民族革命時代」中，在民族民主立場上，在反（美）帝·反封建原則下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

二、駱駝英說，一方面台灣直接受到日本統治五十年，台灣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實倍於大陸文學，而予以高度評價。但他也同時認識到殖民地台灣孤懸海外，孤獨無援地面對日帝壓迫，所以台灣文學除了表現反帝抵抗的精神，也有少部份表現出悲觀、絕望的消極精神。

三、他提出要把台灣的「特殊性」與內地中國的「一般性」做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的認識。駱駝英從台灣社會經濟史觀點，回顧了鴉片戰爭以至馬關割台的歷史，來說明台灣是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自來獨立的社會被日帝割佔，也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侵凌中國人民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份。四八年當時的台灣社會，因四五年光復而成為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一環，因此台灣社會既有其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也是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普遍（一般）性格的具體顯現形態。要看到一般性，同時也要看一般中的特殊，即一般與特殊的辯證統一。而台灣社會的特殊性，「必然而且應該向內地人民普遍覺醒的一般性（指當時民主革命）轉化」。在一九四八年內戰形勢急轉直下的背景下，話中的思想，不言可喻。

四、關於台灣文學要繼承「五四」還是超越「五四」精神的問題，駱駝英也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提出了回答。他說，中國社會自「五四」以來，社會經濟有很大變化，但中國社會形態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本質基本沒變。一九二七年後中國的工人階級逐漸覺醒，中國社會發生了量與質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各地建立了工農政權，一九四八年當時，中國革命「已經臨近了決定性的勝利」。因此台灣新文學「應該不但承繼五四精神和五四以來一切優良的傳統」，回到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與科學」的原點重新出發。

五、在台灣左翼文藝思潮史上，駱駝英在這篇文章中深入、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他討論了「消極浪漫主義」、「積極浪漫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

討論了現實主義以及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革命的現實主義……他也討論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創作理論中關於文學作品中的階級性、個性和典型性問題，使台灣馬克思主義文論相對於三〇年代的素樸、簡單，提高了很多。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國民黨當局先發制人，全面鎮壓受到大陸上的學生民主運動影響的、以台大和師院為中心的進步學生。和學運有連系的楊遠、《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歌雷及文藝論爭主要角色孫達人被捕下獄，雷石榆遭驅逐，隨之茫茫無際的五〇年代反共肅清撲面而來。台灣馬克思主義者、傾向者、組織、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文藝理論被連根剷除，反共法西斯主義在內戰與國際冷戰雙重結構下成為窒息性的反共「國家安全」體制，全面破壞了台灣馬克思主義的傳統。

從一九五〇年，一直到一九七〇年的保釣運動前後，台灣被編入美國遠東反共反華的冷戰前線。極端的反共主義和經由美國「援助」體系，留美體系，美國冷戰意識形態和右翼自由主義經由美國宣傳、教育和意識形態機器所培養的大量台灣親美精英長期統治台灣。在文藝界，戰後美國冷戰意識形態之一翼的，以美國為中心而擴散的「現代主義」、「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在四七年迄四九年台灣左翼文論被粉碎後血腥的泥土上，遍開陰白顏色的花朵，支配了台灣的文學與藝術。三〇年代以來台灣和大陸發展的進步文學和文論傳統被全面禁絕，台灣文壇變成了外來文學的殖民地。

一九六〇年代末，以美國為中心，連帶在歐洲、日本等地爆發了左傾的學生和校園運動，標榜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越戰、反對歧視黑人，主張改革高教課程，增進校園內進步課程和言論的自由，也主張重新認識中國、越南、古巴和中南美洲的革命。在進步學生和教師、知識份子的推動下，風雲迭起。受到其影響，台港留學北美的部份學生受到震動，逐漸形成星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重新研究和認識中國革命及三〇年代左翼文學。因此，一九七〇年保衛釣魚台運動發生後，運動很快地左右分裂，是自然的事。在釣運左翼，產生了比較系統深入研究馬列主義的個別的知識份子，在文革結束、保釣運動歸於沈寂時，還有個別的幾個人至今日猶繼續沈思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諸問題。對於這些人，應該提到許登源、金寶瑜、蔡建仁和李義雄、林孝信等人。在熱火朝天的文革中探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這些知識份子，在八〇年代展開的大陸「開放改革」等重大的生產模式的轉變引起了他們批判的關心。重新審視中國社會主義、再思與捍衛毛澤東主義，討論毛澤東以工農聯盟發展中國經濟的方針、毛澤東以群眾運動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策略、毛與劉鄧關於「勞動改革」(labour reform)的不同觀點、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中共黨的階級性質……這些思想探討，一直延續到九〇年代。對於中國社會主義

變化的憂思，不可避免地使他們重思左派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及民族與階級、國際與國家諸問題，終至於發展為部份保釣左派與（中國）民族主義、國家認同相悖而形成一種台灣一島社會主義變革的強烈傾向。在另一方面，從九〇年代中後，特別是金寶瑜的論文中，表現了她對資本全球化與第三世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世界金融獨占資本主義的批判的分析。而蔡建仁、林孝信返台後孜孜矻矻致力於運動實踐，相對較少發表論文。

在七〇年代的台灣文藝界，受到北美保釣左派的曲折的影響。前文已經說過，保釣左派，利用在北美比較「自由」的環境，和各大學東亞研究機關豐富的藏書，方便許多人去尋找中國革命和三〇年代左翼文學作品與理論，從而改變了世界觀、人生價值，也改變了對文學藝術本質、創作對象、作品創作方法的觀點，逐漸否定了新殖民主義的外來「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而重新回到為民眾寫、寫人民群眾、重視文學的中國民族傳承，強調了作品的民族風格、民族形式的左派文論傳統，對台灣政治、經濟、文化的對外附庸化，提出強烈的批判，而對六〇年代末台灣社會經濟性質，也提出了素樸卻重要的「殖民經濟」論。雖然總的說來，在法西斯戒嚴時代，鄉土派文學理論未成體系，質樸而無法深入展開，但從台灣文藝思潮史看來，一九七七年到七八年的鄉土文學大論戰實際上接續了中斷了二十年的「文學寫台灣人民及其生活。文學講民族形式和風格；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一在一九四七至四九年台灣新文學論議中提出的左翼文學理論的傳統，沖破了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後文學領域上內戰／冷戰意識形態，在沈重壓力下，戰勝了反共文學和外來新殖民化文學，影響深遠，是台灣左翼文學及其理論的一次奇蹟般的復甦。

從一九五〇年代大肅清後，台灣少數士紳與來台省外右翼民主人士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與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全中國的民主運動（反蔣獨裁、反美反日、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的性質完全不同，自始就帶著反（國民黨法西斯）獨裁、親美、親日，反共，不反美日帝國主義，以「民主自由」的台灣充當外國勢力反共冷戰前線等這些特質。謝雪紅一再告誡「反蔣也要反美」的卓見，不見容於這些台灣戰後歷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發展到「美麗島事件」之後，乘七〇年代後國府外交合法性破滅之時，突變為反民族分離主義。台獨論議一時成為意識形態霸權，但至今尚沒有見到他們以嚴謹的社會科知識建構的系統性的理論著作。

前文說過，保釣左派在北美洲尚見餘緒，並且在理論上留下了一些不能磨滅的跡痕。在上述極概括性的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二十一世紀出台的年輕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杜繼平的定位，就初步表現在這本文集《階級、民族和統獨爭議：統獨左右的

上下求索》了。

我以為這本書在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潮史上，至少有這幾方面的特點：

一、作者廣泛、全面通讀並研究了大量馬恩列的著作系統，徵引廣博，據以分析和批判重要的知識和思想問題，是三〇年代以來台灣馬克思主義者留下的文獻中所少見。

二、和戰前甚至七〇年代的台灣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不同，杜繼平也深入研究了各家激進的發展社會學派，在傳統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添加了諸如西方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等新的裝備。例如本書中從世界體系論分析和批判了台灣民族分裂主義，就有新的視角。而即使在大陸，在八〇年代之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很少與戰後世界上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新的社會科學理論和學派有碰觸的機會。

三、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基礎上，為了批判和理解，杜繼平也一絲不苟地通讀一些右派的、自由主義的，在當代國際學界中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起作用的西方論著。而且因為這樣，杜繼平才能廣徵材料，揭發和批判台灣分離主義「理論家」歪曲、斷章取義、濫用西方右派、自由主義派、反馬克思派的理論為分離主義服務的學術詐欺，揭破何六九對於西方自由派關於「公民民主主義」論等問題的一知半解。本書中〈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就是這一類文章的代表作。在〈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中，也揭發了陳芳明對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認識錯誤甚至無知，擊中其知識詐偽的要害。

四、杜繼平廣徵博引馬、恩、列的原典，說明和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對於階級與民族的關係，階級運動與民族獨立、國家統一運動的關係，關於無產階級只有以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為條件成長、發展、奪取國家政權，關於國際的聯合只能以各個獨立民族國家為條件，以及關於左翼將祖國、愛國主義這些概念拱手讓給反動右派的危險性等重要問題。這些論述很及時地為文革後台灣新舊左派只談階級、忌談民族與國家，忌談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忌談建設統一獨立的中國，甚至有人不同程度地向台灣一島社會主義傾斜的思想迷亂與苦悶，提供了新的參照架構和深刻的啟發。我個人就覺得受益不淺。

五、從一九五〇年迄今，美帝國主義干預中國內政，培養台灣分裂主義，使台灣成為反對中國人民，反對東亞人民的冷戰戰略前線，在台灣淪為現實上美國新殖民主義保護區的現時代，作為台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杜繼平和其他一些避談民族統一的「左」派不同，始終旗幟鮮明、針鋒相對、不假辭色、果敢堅決地對台灣反中國

的民族分裂主義進行猛烈的鬥爭，揭穿台獨派諸「理論」的誤謬，暴露其為美日新帝國主義的扈從奴才根性，表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現實及歷史中矛盾核心緊密聯系的批判精神，以及勇於面對歷史的反動做堅決、及時鬥爭的氣概，震動人心，令人讚佩。

六、杜繼平對當前中國從社會主義的蛻變（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懷抱嚴肅、認真的關注，並在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在大陸留學，親自觀察、體會、調查了這一場巨大變化。對於這個變化，杜繼平毫不曖昧地、批判地認定當前大陸的生產方式已經資本主義化。他不苟同把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的社會主義建設說得一團漆黑的論調，實事求是地對中共建國後的前三十年的思想、方針、建設給予科學的評價。但另一方面，他並不因當前大陸經濟的資本主義化而只談階級，不問民族，或向一島社會主義傾斜。正相反，他清楚認識到中國民族統一、建設獨立強大的國家對於包括台灣無產者在內的中國無產者形成更強大的階級，促進台灣和祖國大陸新的變革的重要性。

相應於大陸經濟社會的重大變化，當前的大陸也正在展開「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派的深刻理論爭議。台灣的左翼知識份子終究不能自外於這一場或下一場論爭。像杜繼平這樣的新生代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應該自覺地刻苦學習和鍛鍊，早日成長，以與大陸學界以「等身高」的地位，共同探討國際獨占資本主義必欲全面支配和剝奪全世界的歷史時代中，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再變革的前程，從大陸經過一九四九年的大革命、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旋又與世界體系「接軌」的歷史和社會經驗出發，為世界被壓迫人民探求新的解放與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的方針。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理由不像印度、中南美、中東所產生的幾個國際性的、批判的發展理論家那樣，適時出現中國的、屬於全世界被壓迫各民族與人民的變革的、批判的發展社會學派。這就不能不寄厚望於像杜繼平這一代年輕的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了。

無可諱言，特別在「蘇東波」巨變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蛻化之後，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相對正處於退潮的時期。但同樣地絕不可忽視的，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各派學術、思想領域中，仍然具有強大的威信和深刻的學術理論影響。但，由於歷史原因，台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傳統，不能不說一般地薄弱。因此，把杜繼平這初收的理論果實，擺在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實踐史中去評價，本意在對杜繼平和少數一些在當前台灣的這裡和那裡結成小規模馬克思主義讀書、研究小組表示敬意，並且為了像我這一代已老的「左」派，由於用功不足、實踐無力而給今日青年留下一個思想空虛荒蕪的局面，使他們步履艱難，表示深深愧對後之來者的懺悔、自責，與對他們的努力的感謝。

爲什麼搞「新民主論壇」

林書揚

前言：

「新民主論壇」的提議，反映著廣大的社會各階層，對2000年政黨輪替後的嚴峻的政治現實，所受到的心理衝擊，及普遍的社會傷痛下的深刻的反思。之所以定名爲「新民主」而不取更尖銳的急進色彩的用詞，一方面透露出當前台灣社運的一般的上限意識，同時也暗默中指出，那是另一階段的起步線。如此的提法或許讓人連想到30年代的中國階級內戰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當然兩者在歷史階段和社會構造及環繞的國際形勢條件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但即使如此，若以辯證發展的史觀立場來加以概括，則兩者都屬於歷史上常見的「改革質變」的問題。前世紀初葉，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國民黨，和跨世紀爭到了政權輪替機會的台灣民主進步黨，都因本身的歷史性特質而早早異化，由改革者變爲新的壓迫者，因而引來昔日同盟隊伍的袂裂奮起。只是畢竟兩種社會、兩個不同歷史時段之間的差異，使人民面對改革與反動的嚴重倒置時，所採行的方法也自然不同。30年代受背叛的中國工農大眾，對變了質的國民黨的反擊，還是二段革命的武裝鬥爭。而另一方面，跨越二十世紀後，台灣受矇騙的勤勞大眾對新的壓迫者所採行的，將是擺脫「民主」迷思的，自覺與批判的思想啓蒙運動。也可以說，政權交替兩年後，深深受創的勤勞大眾的，初階的再起運動。那是符合社會動態規律的意識型態領域中的新動向。我們願意如此定性將要起步的「新民主論壇」。

何謂民主：

民主一辭，習慣上指一種重視多數的組織原理，或出以多數意志的統治型態。其實，「民主」具有三個層面的內涵。首先，是一種社會價值論。其次，是根據此一價值論而建構的制度規範。最後，是實際展示在生活中的運作模式。「民主」據此三層面的意義，直接形成大眾生活中的強制或誘導的因素，必然關係到社會的穩定和未來的進步，其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予期中的「新民主論壇」，其主要的活動方式是針對使大眾的現實生活往下沈淪的眾多問題，集中歸納爲政策政令及施政實況對民主原理的背離和破壞所導致的惡果，而對此作有力的揭露和批判。這類批判基本上有待一般民眾對「民主」價值論的清晰的認知和不踰的堅持。以下先就作爲價值論的「民主」原理，稍加論述於後。

蓋一部人類文明史，不過近萬年。而迄今為止的有關社會組織原理的探索，也就是使個體凝結成群體的規範理論，粗略地說，有上古神權時代的超絕價值論，中期王權時代的精英價值論，以及近代民權時期的「多數」價值論。由具有超絕權威的「神旨」之下的古代統合，到少數聖雄精英引領下的中世紀結聚，到以成員中的多數公意為最高裁決的近代共同體。這種組織進化的軌跡，雖然在黑格爾論理學中有「自由擴充論」的圖式，但那不過是一種觀念思辯的繪述。多數價值論的時空背景其實在於歐陸產業革命後的總人口的增加，和晚期封建體制下階級人口比例的變化。也就是，十七、十八世紀英法等國家的第三階級人口對貴族人口的數量優勢再加上封建身分制下，「辛勤工作的多數」和「特權安享的少數」的強烈對比等，而隨著市民階級的自覺和城市貧民的政治認識的提高，把社會價值的承載體由唯一者經少數者再轉到不確定多數的社會心理傾向的演變，形成了近代市民革命理論的背景。亦即，市民革命又稱為「民主」革命的由來。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制約及異化

所謂市民革命指的是近代史開幕期的資產階級革命。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挾其新型的組織力吸收消化大部份的封建身分制生產關係，而終致以政權手段確立了制式的，一切經濟關係的基本型態----自由人(針對封建制身分而言的)對物質生產手段的佔有型態。而當近代資產階級以經濟實力者的條件向封建統治者進行政治抗拒時，特別是發動參政權鬥爭時，它是一種階級聯合戰?的組織者和代表者，而不是單獨的挑戰者。即使是一切技術條件尚稱簡單的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還是有不同部門的協作關係網恒常存在。除了，所謂的生計三要素的原始部門(土地、工具、勞動)外，還有資金調度，原料收集，成品流通，交易交換，甚至法律事務，管理工作...等，若以階級身分而言，這個協作網便包括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在封建政治體制下都是屬於無權階級的混合體(其內部沒有政治支配關係，但有經濟的剝削關係)。史上出現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便是由資產階級帶領其他無權階級以多數派姿態壓倒孤立的封建貴族階級。時至十九世紀，多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各經曲折，大都陸續達成了革命目標，建構了資產階級民主政體的國民國家。只是，當貴族階級退出政權結構後，接著掌權的資產階級雖然廢除了封建身分制度而代之以形式平等的國民參政權，和其他的基本公民權，只因經濟基礎部門的財產私有制是資產階級的生存基盤，財產權的有無大小所造成的社會行為能力上的不平等還是被溫存下來。簡言之，在封建體制下，主結構的「經濟基部」和「政治上層」的兩大領域中，只有貴族階級是有權(政治)有財(經濟)階級，支配著無權有財的市民階級和無權無財的農民工人階級。而當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過後，資產階級變成了有權有財的新支配者，但農民工人等革命同路者只能取得不完整的公民權，在經濟上仍然處於少財(部

分農民)或無產(工人)的傳統窘狀中。

起自十九世紀初葉的英國的人民憲章運動，法國巴貝夫主義運動，英國(十小時)工時法運動，柏林三月革命，維也納三月暴動，第一國際的成立，巴黎公社事件，英國工會法的制定，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成立，第二國際的成立，二十世紀1917年俄羅斯革命，翌年德國革命，1919年第三國際的成立，在這一段歐洲資本主義的全面確立階段中所顯現出來的衝突主線，無非是那一批雖然從封建隸屬下被解放出來，卻因為「無財」而「無權」，或說，因為「無權」而「無產」的社會新大眾徒擁有總人口絕大多數的比重卻被排擠在實質的民主權利之外的階級階層，經過意識化組織化後的，彼落此起，綿延不斷的爭權大波浪。這種階段式的鬥爭流程，更因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衡原理。進入二十世紀以降，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終至帝國主義的武力瓜分導致兩次世界大戰。戰後全球被區隔為經濟的先進國家和落後國家。「既開發」和「開發中」的實質差距愈形嚴峻。經濟力、政治力和軍事力的「總力戰能量」變成了宰制幾十億地球人口命運的最高規律。經過世紀之交蘇聯東歐集團抗拒態勢崩解，美國的單極超霸勢力幾乎罩蓋全球不同國家不同民族文化圈，建立以高效的壓制手段，強以實力者的自由意志為共同依歸的所謂的「人類史上第一個『民主帝國』」。全球五大洲中，置籍於聯合國者189國(2001年9月)，雖然發展階段不同，國情有異，但做為現世紀群體社會的構造原理和發展規律大致相同。再落後也不至於維持著全面的部落封建制，而最進步者，也還未進入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自由國土」。「先進國家」比較上維繫著「原型或發展型資本主義」的社會型式，基部經濟則已進入最高度獨佔的階段；而「開發中國家」則傾向於各自的政治風土下的變型甚至畸型化邊緣化的資本主義。而美國的全球性支配實體，其實是金融與科技的獨佔體以史上最強的軍武勢力為背景的操控系統。

我們經常看到「驕傲的美國」擺出「單邊主義」的高姿態睥睨群邦，另一方面，「狡猾的美國」也以「民主政體」和「自由經濟」做為現代文明國家的兩大標幟。其實，「民主帝國」的吊詭，「帝國民主」的反諷，表示在物質文明上現已攀登上一個頂峰的美國，只是驅使文明手段的新野蠻主義，以其令人生畏的「反恐」戰爭哲學，已經暴露出本身最深奧的恐怖本質。

美國「民主帝國」的「民主」是虛飾，是表裝，而「帝國民主」的「民主」只是另一種壓抑機制。「民主」一辭之所以廣受誤用甚至被惡用，不但帝國主義者惡用它，各色資本主義政權也濫用它，藉以遂行各類社會操控，掩蓋各種不當的政策意圖，理由之一，是盜用者認為它已經變成了歷史的沈澱物，多人不願刻意翻弄它。但

正因為那麼多的資產階級的利己政策假借著「民主」之名，甚至還附上「普世價值」視其爲絕對善，這種強權即公理的大逆流，迫使人們警覺到，民主的批判運動此刻應該進入時代意識的中心位置。不論在美國還是在台灣。

民主價值論的再認識

民主價值是多數價值論，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但那不是物理性的的量的優勢。作爲價值的承載體，唯一的條件，是這個多數(複合體)的內在關係具有的優質性。亦即，成員與成員之間必須有基於自我肯定的相互肯定。洛克的平等自然權、盧梭的契約主體論都是反對封建意識的早期理論萌芽，卻也預示著未來社會實踐中的幾個重要規定。崛起中的資產階級以私財擁有者的身分落實反封建身分制的個人主權論，卻無情地排除了非私財擁有者在新秩序下的諸多權利。但即便如此，資產階級民主的設計還是反映了進步中的一些的社會組合原理。像近代公民論，授權代議，責任政治等，都是演進中的積極概念，即便在未來更高一級的社會主義實質民主的體制建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就成員個人與集體事務而言，必須有(1)自主參與;(2)平等討論;(3)多數決定;(4)共同遵守的內在規範。

如一個多數體不具有上述的具體內涵，則這個多數不過是等同幫會的存在，不能承擔任何正面進步的作用。當然，集體中的個體必定具有先天、後天的不同優劣條件，因而在其參與權、決定權方面不可能完全一律。但在政治範疇內導致於制度的，或者運作型態方面的結構性不平等，造成了形式民主中的實質的反民主，或程序民主中的實質歧視時，意味著名目權利下的無權狀態的存在，將不僅導致內部體制的不穩或衝突，也使得集體的發展嚴重受阻。所謂社會的沈淪現象，指的是這一類的構造型障礙的後果。

台灣民主改革的異化與「新民主論壇」

台灣的民主改革運動，做爲台灣資本主義成熟過程中的必然的政治伴隨現象，一般研究者的看法大約集中在七〇年代初葉。也就是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後，因中(大陸)美關係的遽變而導致的新的國際處境和以成長率超過10%的，由輸出指向轉向重工業化的經濟形勢爲背景的階級結構的變化，逐漸準備著向國民黨特權官僚體系挑戰的民間運動。自從1949年國府中央遷移台北，國民黨政府的兩大特質，其一爲大陸、台灣的地區差別，其二爲國民黨傳統的威權高壓政治，逐漸積累其潛在對抗性。前者的矛盾昇高，形成了分離主義；後者的必然結果便是本地新興資產階級爲背景的民主改革運動。二十世紀初葉發生在中國的亞洲型共和主義革命，雖然初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世界史性格，但因數千年集權封建的傳襲因素，使得政權構造的前近代性仍未被

揚棄。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的所謂「立足點平等」，仍然不出形式平等，至於以「革命民權」凌駕天賦人權，只是黨權優位主義，是革命時期的資產階級戰鬥體制的必然制約。由軍政、訓政而憲政的推展過程中，即使在中央遷台後，台灣社會基部的資本主義全面化深化時期，主政的國民黨仍然徘徊在低度形式民主的防線上，經兩代「強人政治」之世未見進步性突破。隨著經濟結構體演變而產生的基部與上層的矛盾正是台灣民主改革運動的社會內因，從而提供給1986年成立的民主進步黨補完國民黨憲政的缺失的歷史性機會。也是賦與民進黨相對正當性的根據。該黨從早期的黨外運動時期，以民主改革與台灣建國的雙重目標推進到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反對運動始變成群眾運動。而長期執政的國民黨也逐漸採行調整傳統的威權體質，適應驟變後的社會實況的有限措施。面對1985年美國總統對台灣民主化的勸告，1986年民進黨的正式成立，1987年蔣經國終於宣佈解除戒嚴，大陸旅行解禁，1988年報禁黨禁也相繼解除。1989年解嚴後的立委縣市選舉，1990年李登輝接任後的「國是會議」，1991年動員戡亂時期結束、廢除臨時條款後首屆中央民代全數退職，1992年刑法一百條的修改(思想不罰)，翌年，國民黨當局終於宣佈台灣已無政治犯。至此，所謂民主政體的形式架構似乎大致完成。1996年，第九屆「總統」採「全民直選」，國民黨遷台五十年後的執政，說得上首次取得了較大的合法性基礎。而台灣資產階級民主的舞台裝置也終於一應俱全了。此後到2000年，朝野攻防的重點逐漸偏向制度運作面的爭議，包括修憲問題、黨政分際、國會改造、政黨法、金權與黑道等等盡屬於形式民主的範圍內。到2000年的政權攻防戰，並沒有出現形式民主實質化的進一步作為。到了政權交替實現，掌權者由官僚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轉為新興本土資產階級的受託人，人民在各方面的民主權利並沒有實際的改善。在所謂的民主代議制下，人民的參政權利唯有通過選舉代議人，參與決議並監督執行。如果社會上存在著不當壓力，使得弱勢條件者無法自主投票，而另一方面，強勢條件者不會是壓力的受害人，反而可能是壓力行使人。則投票權對前者是空文，是「形式民主條目」，而對後者才是「實質民主條目」。有多少所謂「民生法案」直接影響著人民大眾的實際生活，決定著芸芸眾生的痛苦和幸福，卻在大眾的代議人極端劣勢的場合被決議、被執行。種種「形式民主」變成了統治者的「實質壓迫」的掩蓋物，甚至變成被壓迫者頸上的輪索。資產階級向封建特權階級挑戰時，要求的是名實相符的民主權利(參政權加財產權)，但當他們面對人民大眾的同樣要求時，只願意給名不給實。

政權交替兩年來的施政實績，因非本文範圍，此處不細說。國民黨和民進黨各自代表的兩種資產階級，前者以更多的政治特權實現經濟剝削和資本累積，而後者則以更多的機能性資本循環做為表裝，實則還離不開政治特權的更細緻的連帶運做(如所謂經發會，九人小組的設計)。民進黨之所以無法提高迄今的中低度形式民主，是因

為該黨所代表的台灣資本主義實體對境外經濟強權的從屬性，亦即，台灣資本主義是資本帝國主義時期的殖民地資本主義，這就註定了台灣新起的本土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反動性格。也就註定了形式民主的局限性了。

結語：

資產階級專政下的民主制度和民主運作，人民大眾必須經常注意其虛飾性。不僅如此，當代台灣的兩種不同形成期的資產階級以政權交替為契機，逐漸走向合流，藉以共同抵抗來自大陸的促統壓力，也是必然的趨勢。台灣社會所面臨的兩大矛盾，其一是屬主要矛盾的兩岸問題；其次是屬基本矛盾的勞資問題。因兩方面的形勢發展都會直接衝擊到政權的存立，當政權認為情勢嚴峻到危及其安全時，它可能連有限的形式民主都不惜收回。如兩岸問題中有「兩岸人民關係法」中的間諜條款，公務員忠誠調查辦法，大眾傳播法，內亂外患罪的新罰則(立法作業中)等。勞資問題方面則有勞動三法的改惡，種種其他扶資抑勞的政策群的執行作業。在這兩大領域的立法過程中，人民大眾的參與權是受到實質的抑制的。

最後，資產階級形式民主的受愚受害者，亦即一般俗稱的勤勞大眾，是政治上受統御，經濟上受剝削的階級階層的混合體。具體一點說，在資本主義體制的社會中，以勞工階級為主的，從事於各種社會有用性行業的偏低收入者，都被概括在其間。他(她)們承擔著主要的社會生產的責任，卻因收入水平的限制，除了各自的職業工作外，少有參加其他社會性活動的機會。他(她)們除了選舉期間以投票者身分被動員外，其被選舉權是典型的「名目權利」。但除了過渡期的「革命政權」之外，任何一時期的政權都依靠著他(她)們的公民同意權。他(她)們擁有一些名目權利，卻只有貧乏的實質權利。他(她)們勞心勞力卻要承受著最大量的社會痛苦。也正因為如此，他(她)們具有社會批判的道德資格，也同時掌握著社會基層結構的內部剖析的有利位置。而「新民主論壇」正是有待他(她)們熱心投入的，當代民間政治批判運動的一種。其意義之重大是勿容爭議的。★

誰該為阿根廷危機負責？

楊偉中

去年底南美大國阿根廷爆發經濟危機，引發大規模的群眾抗議，12月20日總統戴拉魯亞（Fernando de la Rúa）被迫下台，不到兩週就更換了五位總統，政局空前動盪。阿根廷深重的危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但是許多主流媒體都說危機是由於「過於浪費」、「社會福利和薪資過高」。事實絕非如此，真正搶走阿根廷財富的是過去26年來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就是台灣慣常說的「自由化、國際化」政策。

在軍事獨裁下開始新自由主義實驗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發生軍事政變，和鄰國智利一樣，阿根廷在軍事獨裁下開始了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將軍們一方面殘酷的鎮壓工運，工人、學生和知識份子遭到逮捕、暗殺或失蹤，死難者達三萬人；一方面改變以往實施進口替代工業化、以發展民族工業和國內市場為主的政策，向國外開放部分的商品和金融市場，使得大批中小企業破產，也引起了國際金融資本的大規模投機活動。軍政府在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和戰爭失敗（攻佔英國屬地福克蘭群島以轉移國內不滿）中垮台。

軍事獨裁雖然在1983年結束，但民選政府仍繼續推動新自由主義，從阿芳辛（Raul Alfonsín，1983-1989）、梅南（Carlos Menem，1989-1999）到戴拉魯亞（1999-2001），每一任政府上台之初都許諾要改變前任不得人心的政策，但個個都食言，而且變本加厲。

在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後有隻來自IMF的黑手

美國主導的IMF是阿根廷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大推手。70年代起，西方國家的銀行勸誘第三世界國家舉借外債，好為他們的過剩資本尋找出路，第三世界國家逐漸累積了大量債務。而IMF一方面強調舉債能增加外匯儲備，強化國家實力以對外開放經濟，一方面以債務來剝削和支配這些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為了償債勢必需要IMF的貸款，IMF就要求它們推行新自由主義式的「結構調整計劃」（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me，SAP），如果不遵從就無法獲得IMF和商業銀行的貸款，連其他國際機構的援助都很難獲得。

IMF計劃的目的不在發展經濟，更不是為了社會公平，而是要保證債務國的償債能力，所以要撤除各種對勞工的保護，削減公共服務，以維持所謂的預算平衡。它鼓吹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好增加出口來賺取外匯以償還債務，過去第三世界國家為了經濟自立而採行的扶持民族工業（出口補貼、進口保護和優惠貸款等）的政策被迫全面放棄。市場至上、自由競爭和減少政府干預成了主流的意識型態。

在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推動下，軍政府大量向西方國家的私人銀行舉債，甚至強迫財務健全的國營石油公司YPF舉借外債。這些外債往往不是進入了官員的口袋，就是被軍政府拿來購買軍火等物資，舉借外債更提高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軍政府的信任與支持。借來的外匯並不是由中央銀行來監管，卻往往存在原借款銀行的帳戶裡，存款的利息甚至還低於借債的利息。軍事獨裁期間（1976-1983年），阿根廷外債從82億猛增到435億美元，使得阿根廷背負沉重的償債壓力，每年繳付的巨額利息才是造成財政收支惡化的主因。

私有化、自由化、美元化和勞動彈性化使阿根廷陷入深淵

除了大量向外舉債外，二十多年來阿根廷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還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貿易與投資自由化。包括降低以至於廢除關稅和非關稅障礙，好讓外國貨品能大量進口；取消對外資投資領域和將利潤匯出的限制，提供種種優惠。

二、廣泛的私有化。梅南政府大力推動私有化，其速度之快、範圍之廣、數額之大都在拉丁美洲名列前茅。以國營企業背負巨額外債等理由，不到三年間多數國營企業被賤價出售給跨國資本，據估計在私有化過程中阿根廷流失了600億美元。私有化領域涉及電信、民航、石油、化工、鐵公路、天然氣、水電、煤鋼、軍工以至電視、旅館、港口、倉庫、賽馬場等，社會安全體系也在94年部分地私有化。如今阿根廷三分之二的大企業都掌握在外資手中，包括和國計民生息息相關的關鍵部門。伴隨私有化而來的是官員的化公為私和大規模的解僱，1992年9月通過國營石油公司私有化的法令，到年底該公司就解僱了77%的員工，國家衛生管理局甚至在私有化前就裁員三分之一，私有化必須為阿根廷的高失業率負責。

三、經濟美元化。梅南政府上台之初，通貨膨脹一度高達4000-5000%，他任命卡瓦洛（Domingo Cavallo）為經濟部長，力行所謂的「經濟改革」，經濟美元化是其中的關鍵。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阿根廷的披索和美元以一比一的固定匯率聯繫起來，國內有多少外匯儲備才發行多少貨幣，從此阿根廷失去了透過貨幣政策來干預社

會經濟生活的力量。另一方面當世界經濟衰退、金融危機爆發，巴西等國紛紛以貨幣貶值因應危機時，由於匯率釘牢美元，披索被高估，使得阿根廷的出口競爭力降低，更加惡化了經濟形勢。

四、「改革」勞資關係、推動勞動彈性化。阿根廷有強大的工人運動傳統，摧毀工運力量，全面壓低勞動條件是新自由主義的重要目標。先是軍政府以暴力鎮壓工運，同時大幅降低工資和福利，梅南政府更在1996年推出勞工改革方案，擴大雇主解僱及改變工資、工時和調職的權力，削弱工會集體談判的力量，勞工的處境更加惡化。

誰是得利者？

實施新自由主義使得跨國資本、金融利益集團和大出口商從中得利，但代價是對西方國家的從屬地位更為加深、整體經濟形勢惡化和社會矛盾加劇。危機爆發前，阿根廷已連續四年陷入經濟衰退，官方公佈失業率從70年代的3%上升到20%，有15%工人未充分就業。在IMF鼓勵借新債還舊債的政策下，外債累積達1550億美元，不斷攀升的利息造成嚴重財政壓力。中低收入階層的實際工資和收入下降，98年起私人部門工資下降了20%。就算在經濟增長時期，收入分配差距仍不斷加大。1974年人口中最富的10%得到國民收入的28.2%，最窮的10%只得到2.3%；到1997年，上述兩個數字已變成37.1%和1.6%。飢餓和貧窮成為普遍現象，退休者的處境最為惡劣。1974年約有7.7%的家庭處於貧困，1996年增加到20%，2001年則有33%的民眾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平均每天有二千人淪為貧民。文盲比率從70年代的2%上升到12%，半文盲則從5%增加到32%。阿根廷曾是世界第九大經濟體，如今卻不斷地沉淪。

戴拉魯亞政府——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1999年，戴拉魯亞出任總統，繼續執行IMF的緊縮政策：控制政府支出並讓財政赤字歸零（就是降低已經極低的教育、福利、醫療等開支），以此吸引外資回流並藉以獲得新貸款。持續的衰退和社會開支的減少使得國內需求和政府收入大為收縮，赤字反而更加惡化，外資外逃更加嚴重，又被迫實行進一步的緊縮政策。2001年3月戴拉魯亞再度任命惡名昭彰的卡瓦洛出任經濟部長，在7月份提出削減薪資和退休金達13%的零赤字方案，12月1日更下令限制民眾提款每週不得超過250美元，政府公佈的2002年預算將進一步削減20%的開支。這些政策全都嚴重的打擊那些需要公共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需要現金來支付房租、學費和各種生活費用的工人、貧民和所謂的「中間階層」。

受盡了二十多年磨難與欺騙的民眾當然無法再忍受下去了。戴拉魯亞上台以來，三大總工會先後發動了八次總罷工以反對政府的緊縮政策，失業者也組織起來，用阻

斷重要公路、中斷貨物運輸的手法，迫使政府出面解決失業問題。2001年10月國會大選中超過30% 選民棄權，去投票的民眾中有近30% 投下廢票，主要的兩大黨都流失大量選票，激進左翼政黨卻大有斬獲，這些跡象都顯示民眾對主流政黨和政客的唾棄。在社會兩極分化中淪落的中間階層也投入到抗議的行列，他們和失業者、工人一起迫使政府下台。

形勢還在惡化，抗爭還在發展

戴拉魯亞政府垮台以來，阿根廷的社經形勢持續惡化，官方的失業率數字高達30%，光是一月和二月就增加20萬失業人口。由於經濟衰退、披索貶值和進口商的囤積居奇，物價不斷飛漲，一般民眾的基本消費品價格平均上揚40%，麵粉甚至上升了300%。民眾的生活更加困苦，現在已有50% 民眾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現任總統杜哈德（Eduardo A. Duhalde）拿不出任何有效解決危機的方案，IMF則藉機提出更多更嚴酷要求。

另一方面，各地的民眾進一步組織起來，他們在各地形成社區議會，和失業者運動與工人串聯，召開全國性的集會，2月中舉行的全國工人代表會議明確地提出了拒絕償還外債、將銀行和主要企業國有化、禁止解僱、將關閉或解僱工人的企業國有化並由工人管理、杜哈德下台、建立工人政府等要求和號召。許多民眾已不再對主流政黨抱持幻想，他們正在探索改變阿根廷社會的道路。

另一條道路、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阿根廷不是特例，從80年代開始新自由主義就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被當成經濟成長的唯一道路。如今它的禍害不僅在阿根廷蔓延，反對這條道路的也不只是那些受害者或是「少數偏激的反全球化份子」。去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世界銀行前任副總裁和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就強力批判IMF和世銀是「市場基本教義派」，推行沒有廣闊社會視野的經濟政策，完全不理會人民的死活，讓第三世界國家走進地獄，他甚至說「解決世界的貧困和危機的辦法很簡單：消滅剝削者」！

雖然台灣和阿根廷的發展道路有所差異，具體的政策內容也有分別，但是從80年代中以來，台灣奉行的同樣是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和政策，對外開放、自由市場被視為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公平的萬靈丹，「政府為企業而存在」，吸引投資成了國家的首要任務，「自由化、國際化、民營化」的政策不容挑戰。阿根廷的苦難、斯蒂格利茨的警語很值得我們深思。

《南天之虹》—湮滅和再生的歷史

曾健民

「在這裡，一個世界落幕，另一個世界誕生」
——畫家魯奧特的「六十四幅「受難」組畫」的旁白

一、懸掛在「二二八紀念館」中的歷史迷霧

走上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二樓，可以看見一張巨幅的複製木刻畫，題名是「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從它大尺寸和陳設的位置來看，顯然館方製作者有意突顯它的義意。

畫，是以發生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黃昏的台北街頭，查緝私煙的暴力現場為題材，用新現實主義的木刻藝術高度地表現了「二二八事件」的恐怖瞬間；生動的畫面，似乎仍響徹肅殺的槍聲，以及台灣民眾驚恐、倉惶、憤怒的嚎叫，穿過五十年的歷史時空，強烈地衝擊觀眾的內心。是怎樣的一位藝術家，會在二二八事件的恐怖時刻，冒著生命危險一刀一刀刻下令人震撼的控訴呢？畫作的旁邊只簡單地寫著創作者的名字「力軍」，然而，「力軍」是誰？並沒有詳細的說明。再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到該幅作品的線條粗糙不夠清晰，顯然不是直接從原版複製出來的，而是經過無數次反覆拷貝流傳出來的影印件；可見得，館方的製作單位也並不清楚該作品的原版流落何方？以及該作品的來歷和創作者的生平？因此，它就像一幅被懸掛起來的戒嚴時期地下流傳的反抗文化一樣，大家只管飢渴地吸吮它的精神或感情的養分，誰都無暇顧及它的作者是誰，來歷如何？然而，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十五年當中，「二二八事件」得到了政府的平反和補償，出版了大量的有關「事件」的研究、調查和證言，「事件」真相不但已大白，甚至到了被「圖騰化」的地步。但是，這幅當時直接見證並控訴了「事件」的唯一藝術作品的來歷，卻仍處於戒嚴時期的迷霧中，未獲紀念館的「平反」，可說是一大憾事。

二、另一面的戰後台灣史

事實上，只要長期關注台灣的「民主化運動」的人，對這幅畫，可能都會有一點印象。它是在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的八十年代初，第一次出現在運動中的；由於它強烈的控訴內容和主題，正可以作為控訴國民黨政府反民主作風

的象徵圖像，因而不斷地在運動中流傳刊布。但是，誰都不知道它從什麼地方來、作者是誰？

直到九十年代，才有研究者解明了該木刻畫的作者「力軍」的本名就是「黃榮燦」，也約略地知道了他是光復初期從大陸來台的木刻藝術家，是當時最活躍、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人之一；然而，不幸地，他在一九五二年的白色恐怖風暴中仆倒在馬場町的刑場。直到今年，一位日本民間學者橫地剛先生，經過數年的研究調查，才把黃榮燦的生平和作品，包括他的思想和時代完全出土復原，並結集成《南天之虹》一書出版，這才使五十多年來，一直徘徊在台灣海峽上的「黃榮燦」的魂魄得以安息。

可以說，這幅作品在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事件」中誕生後，還未來得及和台灣民眾見面，便被湮沒在時代的暴風雨中了。經過了三十多年的反共恐怖年代的鎮壓，直到八〇年代初，才又以「作者不詳」的身分重回台灣的「民主化運動」，長期間，大家都不知原作者是誰，一直使用著這木刻作品的控訴力量；而全面解開原創作者的滄桑歷史竟然費了五十年——半個世紀的歲月。

它的誕生、湮沒、流離、回歸和再生的歷程，正是時下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另一面的戰後台灣史，同時，也是戰後中國大歷史悲劇的一個縮影。

三、在「內戰和冷戰」中湮滅、流離和再生的歷史

二二八事件後，在光復初曾經擔任文化思想舞台的重要報章雜誌，幾乎瀕臨癱瘓；特別如《人民導報》、《民報》、《和平日報》、《政經報》等進步的民主報刊，都被迫停刊，台灣文化思想界頓失「喉舌」。許多進步文化人，如蘇新、陳文彬、黎烈文、王思翔等人，不論本省籍或外省籍，紛紛倉惶脫難上海或香港。這使同處國府統治下的上海，頓時成了報導二二八事件的中心，如《文匯報》、《光明報》、《大公報》等進步報刊，從三月二日起一直到四月底，連續、大量地報導並評論了台灣的二月「起義」。譬如：就在事件後，三月四日的《文匯報》在第一版刊出了〈台灣動亂真相〉一文；香港的《華商報》也在同日（三月四日）的社論以〈台灣人民的抗爭〉為標題，大大報導事件並聲援了台灣人民。在這許多有關「事件」的報導中，在四月二十八日的《文匯報》，名作家唐弢主編的「筆會」副刊上，刊出了一幅題為「恐怖的檢查」（台灣二二八事件）的木刻作品，也許是爲了避開國府軍警的耳目，作者署名「力軍」。這就是黃榮燦在事件中偷偷刻下的作品；當時，他躲開了國民黨軍警特的監視，悄悄地把這件作品帶到了上海，一心想用藝術的形象向全中國的民眾控訴國府軍警在台灣的暴行。這件木刻畫的控訴，自然也成了戰後全中國風起雲湧的，反國民黨強權統治，要求「民主、和平、團結」的大潮流的一部分。然而，《文匯報》在刊出這件作品的一個月後，也在國府的高壓下被迫停刊。

數月之後，黃榮燦本人回到了台灣，在台灣繼續從事新現實主義的美術運動；而「恐怖的檢查」作品原版就留在上海，參加了該年年底（一九四七年）「第二屆全國木刻展」，與其他大陸來台的木刻家描寫台灣景象的十多件作品一同展出。當時，國共內戰戰局日漸緊張，在「國統區」的自由展出已相當困難，因此，展覽結束後，「中華木刻協會」便把展出的所有作品，贈送給魯迅的日本至友內山完造之弟——中國木刻藝術的催生者內山嘉吉先生，使這些中國木刻作品得以在日本繼續展出，當然，黃榮燦的「恐怖的檢查」也是其中的一件。

然而，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的韓戰爆發，使戰後的東亞歷史產生了巨大的「逆轉」；美國主導的東亞冷戰，不但使朝鮮民族南北分裂，也使中國的國共內戰以台海為界長期隔峽對峙；作為美國東亞冷戰中心基地的日本，也走上了扈從美國圍堵中國大陸的道路。這歷史的「大逆轉」，使原本處於同樣的戰後「民主重建」潮流的大陸、台灣和日本，被分割塊離，人民之間也彼此阻離隔絕。這使在日本展出的這批中國木刻作品，只有長期滯留在日本；而回到台灣的創作者黃榮燦卻在這個歷史大逆流的白色恐怖中被刑殺，棄葬在台北近郊的六張犁的亂葬崗上。自此，作品和人長期被湮埋在東亞冷戰的歷史暗處，無人聞問。

但，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一九七一年，隨著尼克森訪問大陸，東亞冷戰局勢的漸趨緩和，日本與大陸建立了外交關係。在這個大環境下，一九七四年內山嘉吉把他長期保存的三百六十四件中國木刻作品（其中包括了黃榮燦的「恐怖的檢查」），全數捐給日本神奈川縣立近代美術館，並在翌年舉辦了「中國木刻畫展」，也出版了木刻畫冊。

走上開放改革的中國大陸，在一九八一年，「中華全國木刻協會」為了紀念中國新興木刻運動五十周年，出版了《中國新興版畫五十年》，其中，被內山長期保存的「恐怖的檢查」也被收錄其中，同時也付上了作者黃榮燦的生平簡介。長眠了三十年的黃榮燦和他的作品，終於再度見到了日本和中國大陸的陽光，回到了中國木刻的歷史。

然而，「恐怖的檢查」與台灣人民的見面，卻必須等待台灣「民主化」運動的進展，而遲至一九八四年才實現。

一九八三年，海外著名的左翼民主運動月刊《台灣與世界》，在第四期上（一九八三年九月）以黃榮燦的另外一副木刻作品「收穫」為封面，並簡單介紹了黃榮燦的生平；接著，在該刊的第九期上（一九八四年三月），當年黃榮燦在台灣師院（今台灣師大）的學生，也是友人秦松先生寫了〈黃榮燦不寂寞了〉一文，介紹了黃榮燦在光復初期的文化活動，並寫了一首詩追悼他，這是黃榮燦被煙滅三十年後，首次回到人的世界。到此為止，雖然黃榮燦本人的生平大致回復了輪廓，但仍未與他的代表作

「恐怖的檢查」有任何的聯繫。亦即，在海外和在台灣的反國府民主運動中，還不知道黃榮燦就是「恐怖的檢查」的創作者。

一九八四年的七月，代表台灣左翼民主運動旗手的《夏潮論壇》，刊出了陳鼓應〈台灣第一個政治暗殺事件——許壽裳〉一文，作為該文的配圖，「恐怖的檢查」第一次被刊載在台灣運動刊物上，回到了台灣。因為當時仍是國府的戒嚴時期，為了避開反共戒嚴的恐怖檢查，編者把題名改為「木刻『台灣二二八』」，也沒有印上作者的姓名。雖然沒有人知道創作者的名字，也不知道它的來處，但是由於作品本身的藝術生命力，超越了時代、政治的限制，與八〇年代台灣反國民黨統治，熱烈要求民主化運動的心靈產生了激烈的共鳴；自此，這幅木刻畫便成了控訴國府的戒嚴統治、要求民主化的代表圖象，經常出現在「民主化」運動的抗爭現場或黨外雜誌上。

戰後初期，它以控訴國府鎮壓台灣人民要求「民主自治」的行動而誕生，但來不及與台灣人民見面，便開始了流離、放逐的歷史。在東西對峙的冷戰時代和狂暴的國共內戰歷史中，三十七年間，它與一大批台灣人民要求社會正義和政治民主的運動、歷史和人在一起，被打入冷戰和內戰歷史的黑牢，就如它的創作者黃榮燦被棄葬蔓草野山中一樣。但是，歷史不會永久在狂暴的統治者掌中，終究要回到人民的手中。木刻畫「恐怖的檢查」，從台灣二二八中誕生，到了大陸上海，再到達日本，然後又由日本回到大陸再回到三十七年間的流離歷程，就是戰後東亞冷戰歷史的軌跡；前半段的歷程是席捲東亞的冷戰歷史，後半段就是冷戰緩和和東亞的民主力量逐漸茁長的潮流。最後，它由台灣左翼民主運動的手帶回到台灣，代表著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已達到了新的高點。同年，一九八四年，被反共狂嵐的白色恐怖監禁最久、長達三十四年的政治受難人林書揚先生，也被釋放了。但是，當時仍然沒有人知道，木刻畫的創作者黃榮燦本人，仍無人知曉地，在六張犁山崗上與孤魂野鬼為伍，等待著文化思想界的努力。雖然他的創作已經回到了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大潮。

一九八七年台灣的解嚴和大陸開放改革的進展，為黃榮燦回到台灣社會，創造了條件。一九九〇年開始，大陸的藝術家、評論家吳步乃（筆名吳陟），在《雄獅美術》等雜誌上連續發表了有關黃榮燦的生平和作品的文章，這才使大眾知道了「恐怖的檢查」的創作者原來就是黃榮燦，終於把作品與作者連繫起來，把作品歸還給了作者。但是，對黃榮燦的身世仍然只有簡單的印象，只有初步的出土和復原。

同時，李敖出版社出版的《安全局機密檔案》，也給黃榮燦的死，提供了確切的證據。根據該檔案，黃榮燦是因「吳乃光叛亂案」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被警總逮捕，一九五二年的十一月被刑殺。

但是，黃榮燦被刑殺後葬在何處？至少一九九三年爲止，仍然是個謎。奇蹟似地，一個出獄後生活在台灣社會底層的政治受難者，長期間默默燃燒的意志和苦行終於揭開了這個謎。他就是台灣政治受難者互助會成員的曾梅蘭先生。他爲了尋找同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被抓被關，且後來被刑殺的兄長徐慶蘭的屍骨，數十年來以泥水工爲業輾轉各地，「全省走透透」，每到一地便踏遍當地墓地尋找哥哥的葬身處，終於奇蹟似地，在一九九三年，台北六張犁的亂葬崗上的荆棘草叢中找到了哥哥的葬身之地。他闢開荒煙蔓草一看，居然是一片埋葬了二百零一具的政治受難者屍身的亂葬崗，黃榮燦的墓石也與其他的受難同志們一起孤零零地落在陡坡上。近半世紀的風雨浸漫過的、約一尺高的墓石上，隱約可看見「黃榮燦之墓」的字樣，右上方則刻有「歿於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五十年的歲月，六張犁附近已矗起了七橫八豎的公寓群，沸揚的市囂和車水馬籠的基隆路就在眼前，但是黃榮燦和他的受難同志，卻被深深埋在暗黑的荒草叢中，在陰間徘徊不見天日，不得安息；就像同時被煙滅的台灣的另一面歷史、文學、哲學與美學一樣。日夜盼著時代的正義力量，闢開歷史的荆棘洗清墓碑，回到中國、台灣的現代史冊。

四、使《南天之虹》誕生的力量

也在同一個時代，青年作家藍博洲，從八〇年代中末起，開始對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歷史和人物，進行了調查和研究，奠定了可貴的成果。藝術家梅丁衍教授，也投入了對黃榮燦的生平、作品的發掘、搜集、調查和研究，並取得了極大的進展。在這些基礎上，最後，把黃榮燦的生涯、作品、思想和時代全面發掘並整理成書出版的，是日本的良心友人橫地剛先生。據他說：因爲讀到了藍博洲的著作後，「全身像遭電擊般，震顫不已」，後來，在藍博洲引伴下，一九九七年第一次前往六張犁的政治受難者墓地時，使他「放眼望去，頓時說不出話來」；看到像黃榮燦一樣的，無親無故的外省籍受難者，他說：「他們的魂魄似乎仍徬徨在分隔的台灣海峽上，「想進一步認識自己來到人世間的戰爭前後的世界，這樣的強烈願望所驅使」因此，毅然投入了對黃榮燦的調查研究。作爲一個民間學者，他自費自力地橫跨日本、大陸、台灣三地，點點滴滴地辛勤搜集資料，爲此，曾一度過勞病倒幾乎喪命。費了四年的時間，終於完全復原了黃榮燦的生平、思想和時代。使半世紀徘徊在分隔的台灣海峽的黃榮燦的靈魂得以安息，並使他的精神重回中國、台灣兩岸的歷史和社會。

黃榮燦的生命在半世紀前落幕消失了，經過了暴風雨的長夜，今天，他的作品和精神世界又再生了。

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

〈一〉

黃志龍

前言

關於俄羅斯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向來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有著極大的分歧。大部分忠於馬克思主義原典的「正統馬克思」唯物史觀信奉者（例如考茨基等人），通常否認俄羅斯革命的社會主義性質。他們質疑，在農民佔有人口中的大多數、工業發展僅限於幾個大都市、管理計畫經濟的文化條件和組織條件又付之闕如的狀況下，俄羅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

二次大戰後，東歐國家的社會主義化明顯地是在軍事強制底下完成的，而中國、古巴、越南等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又建立在遠比革命前的俄羅斯還要落後的經濟基礎之上。對於這一些國家而言，社會主義的魅力並不在於能夠充分的利用資本主義所創造出來的經濟潛力，而是在於能夠將這些國家從「低開發」、「極度貧窮」和「無知」的深淵中拯救出來。

這些國家的革命基本上是反對殖民地剝削、民族隸屬以及貧窮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不同於馬克思預言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地區的所展開的階級鬥爭。因此，在革命勝利後，這些國家的首要目標在於消除落後——不僅僅是在經濟上，同時也是在社會、文化上消除落後。這就與馬克思在經典中所展現的歷史法則大異其趣。

列寧曾經指出：「既然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那麼為何不能以革命的手段來獲取一定水平作為前提，再依靠工農的力量和蘇維埃制度為趕上其他國家的水平而前進呢？」列寧的主張充分地反映出布爾什維克思想精髓——在「未成熟的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也就是說「運用國家權力的介入，擺脫經濟上的後進性，使其達到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水平」的思想。為使經濟近代化，趕上其他先進國家，國家權力的運用不僅在於生產手段的國有化，也包括全面支配經濟資源的分配過程。蘇維埃模式（史達林體制）經濟現代化戰略，可以概括為下列三點：

(1) 節縮消費、增加積累，大量投資於新的工業部門以期達成迅速的工業化。

(2) 選擇性地、不平衡地將資源運用於特定部門。亦即，不依照由實際需求所決定的消費→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等發展次序，而由史達林將其逆轉為「投資」優先於「消費」；「輕工業」優先於「農業」；「重工業」優先於「輕工業」；「生產」優先於「基礎建設」部門；「教育」（尤其是技術和職業教育）優先於住宅建設…。上述的「選擇性」也適用在生產技術的運用上——不僅在高順位部門，也在高順位工作部門優先使用近代科學，導致高科技與低科技在部門間以及工作部門間並存。同時，爲了節約資本而使用強制勞動和群眾動員。

(3) 最大限度地（不計成本地）利用現有的資本和勞動力——不以收益性爲基準的擴大生產量和雇佣量。這一點也表現在重視經濟上已經落後的生產設備的維修上以及對基礎建設和住宅維護的輕視上。

蘇維埃型（史達林體制）戰略在克服「未成熟性障礙」上到底有沒有成功：

(1) 一般而言，蘇維埃型發展戰略的初期目標（尤其是在與工業基礎有關的礦業、鐵、鋼以及重工業技術部門的迅速創建和大幅度擴張）大致上有所成就，證明了中央計畫化的有效性。

(2) 但就成長的社會成本而言，「計畫」經濟無疑是失敗的——工業部門勞動力的過剩配置，被認爲是將失業隱藏於工廠門後，而指令性的經濟管理體系也成嚴重的環境破壞。

(3) 高度的成長成本並沒有帶來消費的提高，反而產生「短缺經濟」和官僚化分配機構的濫權。

(4) 最後，蘇維埃戰略因資源和勞動力的枯竭，使其經濟成長速度嚴重減緩。

總之，蘇維埃型發展戰略可用「保守的近代化」來概括：就克服經濟上的後進性而言，它確實帶來了無法否定的進步；但在另一方面，因壓抑消費，打擊勞動人民的主觀能動性而無法應付迅速進行的科技發展——它較成功於傳統產業的發展卻在使用高科技的產業方面落後，也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進的消費願望。

既然「既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不是因爲舊社會的生產關係已成爲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桎梏，爲了解放生產力而誕生的新體制，因此在其發展過程中便不可避免地產生許多與馬克思主義理念相乖離的面貌。所以，在「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裡，尤其是史達林去世後，便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改革方法——如「市場社會主義」等等。

1991年12月的蘇聯解體，意味著Pyergestvoyka（其意為「重建」；是舊蘇聯戈巴契夫政權所推行的改革路線）的結束。Pyergestvoyka提出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市場經濟的存在意義和可能性。但可惜的是，在理論上尚未得到充分結論之前，就因為體制的解體而解體。解體後的政府認為：自由市場經濟和中央集權性計畫經濟無法並存，從而選擇了全面走向自由市場和私有化的道路。從此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大合唱，席捲全世界。

主張「新思考」的Pyergestvoyka在進行「重新認識歷史」的過程中，因史達林體制成立的歷史解密而展開了有關列寧社會主義理念的一連串討論。在這場討論中，一般將1918年中期到1921年初期的「戰時共產主義」，視為是史達林體制的原型，因此，轉而嚴厲批判列寧的社會主義經濟構想。例如，將「商品廢絕論」視為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反農民意識型態的基礎，而指摘列寧在當時也支持這個想法；又例如，指控「戰時共產主義」時期意圖實現馬克思、恩格斯「沒有商品的社會主義」的觀念，而「新經濟政策」(NEP)正是對這個理念的放棄；又例如，批評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商品生產的不可兩立論」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單一工廠論」就是引導「戰時共產主義」的錯誤理論等等。如此一來，將推行農作物的分離徵收、廢絕市場，全面性的工業國有化的「戰時共產主義」視為史達林主義的根源，然後認為戰時共產主義不僅是迫於被帝國主義列強的干涉戰爭以及內戰所採取的「非常措施」，同時也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雪維克的社會經濟認識為基礎而形成的政策體系。所以從戰時共產主義走向NEP的轉變，就來自於列寧對其社會經濟認識的重新思考。

但是，這些批判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將市場經濟視為當然的存在，從而判定對市場經濟持否定態度者有罪的態度。所以有些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如不從理論上確定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至少在其進入共產主義階段之前）市場存在的根據，就無法有效反駁「引進市場經濟等於資本主義化」這種當前對社會主義經改壓倒性的批評。

在馬克思所謂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階級不再存在，甚至連分工也都已不存在，當然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存在。但是如果是在史達林所定義的社會主義階段，也就是說，在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這兩種所有制型態並存的社會主義階段，市場和計畫應該不是兩者擇一的問題。而且，一般將「計畫」僅限定於「中央集權的指令性計畫」的定見，也忽視了「多樣可行性」的理論上的窄化。其實Pyergestvoyka的主張是，為了將生命力已經枯竭的指令性計畫經濟轉變為具有彈性的、有效率的計畫經濟，從而大膽引進市場經濟概念所形成的市場和計畫的共生關係。

同時，在社會主義階段是否還存在市場經濟是一回事，但是在進入社會主義的物

質、精神諸條件都尚未成熟的國家，尤其是以「走向社會主義」為目標的國家，在條件的準備時期（即所謂的特殊過渡階段），利用市場經濟是否就是「走資」？這個問題又是另外一回事，因而是值得深論的。

從1921年到1928年，在蘇聯所推行的「新經濟政策」（NEP）就是誕生後不久的「落後」的「革命後社會」，利用市場經濟復興國民經濟，進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諸條件的政策體系。NEP之後，中國「新民主主義」建設路線以及「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的建設路線，都是利用市場經濟的活力來建設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各種條件而又控制其無政府主義作用的一個構築社會經濟體系的嘗試。在這種嘗試中，市場和計畫這兩種社會經濟調整機制的探討（包括兩者的共生關係）是非常主要的。

同情社會主義卻不屬於馬克思主義者的英國著名經濟學者Goan Robinson，因為「既存」社會主義體制乖離了馬克思主義理念，並非馬克思主義所謂的社會主義，因而將之視為：「...不是資本主義『後』的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替代物。意即，無法共享產業革命的諸國民模仿其技術或成果的手段。也就是說，在不同比賽規則之下達成迅速積累的手段」。換言之，她認為「既存」社會主義並非資本主義「後」的秩序，而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本主義替代物。（Goan-Robinson: Marx, Marshall and Keynes', in *Collected Economic papers*, vol.2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60, p.15)）

根據她的說法，等於不承認存在過所謂的「既存」社會主義。但蘇聯、東歐等「既存」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雖然不是馬克思所謂的「社會主義」，卻也是社會主義的一種——也許在「社會主義」之前需要加上如「國家」等字以便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有所區別。或許，如果將Robinson夫人所說的「社會主義」改為「特殊過渡階段」，上述的論點就有道理了。意即：發展中國家因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諸條件尚未成熟，因而正處於著手建設其條件的階段，也就是「特殊過渡階段」，並不是資本主義「後」的階段，而是資本主義的替代物。

〔一〕查蘇利奇給馬克思的信

A. 西歐近代社會科學的特徵和侷限性

社會科學做為認識社會的手段是產生並發展於西歐近代社會，其中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學、歷史等等不同的社會科學部門。因此，過往的世界觀，其特徵就在於以西歐近代社會做為基準來看過去、現在的世界，並展望其將來的世界觀。當然，以起源於西歐近代社會的社會科學以及其概念、範疇、命題、法則等來研究西歐社會時，必然會展現一定程度的有效性。但是，如果將認識對象改為非西歐社會時，其有

效性就會產生問題。20世紀的現實已迫使西歐中心主義世界觀的破產，也呈顯出支持這種世界觀的西歐近代社會科學的侷限性。

20世紀的特點，就是在世界範圍內，打破了西歐小世界的壓迫而產生了許多非布爾喬亞、非西歐的開發中國家（包括開發中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這些國家在世界社會運動中成爲積極的規定因素之一。這些開發中國家的誕生，迫使社會科學必須從西歐中心主義的近代社會科學，發展成爲以整個世界爲視野的新的現代社會科學。

在社會科學的各個部門中，首先對西歐中心主義發難的是經濟學，著名的經濟學者P.A·Baran反省了這種偏重於研究西歐世界的現象。他在「成長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一書中說：「先進國的獨佔資本、帝國主義支配和低度開發國家的經濟後進性之間有密切關係。兩者在現實上是一個整體性問題之中的不同層面而已。」Baran的問題意識被A.G·Frank的「中心和邊陲」、S·Amin的「邊陲資本主義構成體論」所繼承而形成「依賴理論」，並產生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

就西歐近代社會科學而言，大體上首先出現的是布爾喬亞社會科學，然後產生批判布爾喬亞社會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學派。這一對誕生於西歐近代社會的兄弟，彼此間雖然激烈爭論，但其爭論焦點在於布爾喬亞西歐和社會主義西歐之間的優劣問題；但在如何對待非西歐社會的問題上，雙方並無二致，都是將非西歐社會視爲是西歐社會的被動的陪同者。雖說如此，馬克思主義在做爲世界體制的資本主義全體構造中，不僅將西歐社會，也將非西歐社會做了正確的定位，而且在研究世界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中，提出：在世界規模上的從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爲共產主義社會的運動法則性。

馬克思主義提出做爲世界體制的資本主義——包括被迫編入資本主義再生產圈內的非西歐社會——的特徵如下：

- 1.在資本主義（誕生於近代西歐社會）的主導下成立了世界史上第一個具有有機關聯性的世界經濟體系。正由於它成立了這種世界經濟，資本主義才能成爲世界體制（做爲世界體制的奴隸制、封建制既不曾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

- 2.世界資本主義是以西歐資本主義發展爲主要推動力而展開運動，非西歐世界在實質上卻是西歐資本主義能否存在及壯大的不可獲缺的要因，但在邏輯上卻可以被忽視（例如，在「資本論」中，非西歐世界只在「資本的原始積累」中被提起的四個促進契機之一而已。即，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代租稅制度、保護貿易制度之中的殖民制度）

19世紀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看法是，世界資本主義的運動是直接且全面性地由西歐

資本主義運動所規定，非西歐社會的反抗運動是可以不予考慮的。在馬克思共產主義學說中占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宣言」(1848年)，也只是將西歐以外的社會視為是被動性的角色。共產黨宣言所提出的西歐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後勞動者政權的一般政策是：收奪土地所有、高度累進稅、廢止繼承權等等。但那些都是屬於西歐的國內政策，而缺落了非西歐地域殖民地、隸屬國（包括西歐地區內殖民地）的解放政策。

當然，發表共產黨宣言時，馬克思主義對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問題已有所意識，但他們認為：要實現被壓迫民族解放的關鍵性條件，是無產階級革命在西歐的勝利。由此可知，雖然馬克斯主義在問題意識上一貫主張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解放，但是在「非西歐社會的命運決定於西歐社會」這個命題上，馬克思主義和當時的布爾喬亞學派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其實，西歐資本主義的形成、發展的全部過程，是以西歐部分地區以及非西歐地區的殖民地化、從屬化過程作為前提條件而進行的。世界資本主義一方面在特定的地區內成功的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打造出國民經濟和民族國家，形成走向布爾喬亞發展道路的國家群體；另一方面，也同時產生了被這些國家壓迫、被剝奪了形成國民經濟和民族國家的可能性，從而走上從屬性發展的民族群體。所謂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以上述兩者的對立和互相作用為內容的複合性發展。

但是，就整體而言，在19世紀被迫進行從屬性發展的非西歐地區各個民族尚未成熟，因而沒有被認為規定世界社會運動的一個要因。由此可知，馬克思學派的「只有『大工業特有產物』的無產階級才是革命階級。存在這個階級的西歐布爾喬亞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夠在世界規模上推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變革」。這個認識就是直接受限（被制約）於19世紀這個時代的。

19世紀是，一如列寧在20世紀初期的一連串有關帝國主義研究中所說，是世界資本主義登上一個高峰的時代。在此之前的整個發展過程中，世界資本主義運動的規定性要素，是西歐資本主義和以其為立足點的布爾喬亞階級。非西歐地區的民眾是在西歐布爾喬亞及其代理人的欺壓下，被迫（逼）走上「奴隸化和埋沒於礦山」之路。

如上所述，19世紀的西歐社會科學除了屬於少數派的馬克思學派之外，對非西歐社會的民族、社會問題並沒有留下值得檢討的遺產。也就是說，近代社會科學的主流——布爾喬亞社會科學並沒有將非西歐社會一體視為人類社會。反之，馬克思學派則至少已正確認識到西歐布爾喬亞社會的財富和繁榮是以非西歐社會的貧困、荒廢為代價而得來的。所以馬克思學派的社會科學是19世紀具有代表性的西歐內殖民地愛爾蘭、波蘭的民族獨立問題以及摸索著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途徑的俄羅

斯「人民主義者」(Naroduiki)所提諸問題的研究中，創立了雖然還不能令人滿意卻是現代社會科學必須繼承的一個理論遺產。

B. 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和馬克思學派

所謂愛爾蘭問題就是指，在19世紀，有關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的勞工階級解放(社會主義革命)和英國殖民地愛爾蘭地區的民族解放革命之間的關係。即西歐的布爾喬亞社會的勞工階級解放問題和非西歐地區民眾的民族、社會解放問題之間的關係。

本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做為世界體制的資本主義運動，其積極性的規定要素在於西歐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認為西歐布爾喬亞社會的勞工階級的勝利、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才是殖民地、從屬國家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社會解放的決定性條件。

但是19世紀後半，由於工業的發展和殖民地經營，使大英帝國積累了龐大財富而繁榮，也因此而產生勞工階級的「布爾喬亞化」，英國勞工階級墮落為「勞工貴族」。他們擁有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須的所有物質條件，卻喪失了革命的熱情。反之，在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觀」力量是，從貴族、天主教主教神父擴大到人民大眾、下層階級(貧農層)。於是愛爾蘭的經濟鬥爭同時變成為「民族鬥爭」，比英國勞工階級更具有革命性。就是說，在愛爾蘭已形成民族解放的變革主體。

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拋棄從前認為愛爾蘭的獨立是不可能的想法以及愛爾蘭問題的解放必須依靠於英國勞工階級的革命勝利這種看法，從而認為獨立是不能避免的，英國勞工階級的階級鬥爭和愛爾蘭民族解放鬥爭的互相支持可得到兩者的解放——英國勞工階級為「愛爾蘭民族解放」的鬥爭是(英國勞工階級)自我解放的首要條件；愛爾蘭的獨立是英國勞工階級解放的前提條件之一。

就馬克思主義學派而言，「波蘭問題」和「愛爾蘭問題」一樣，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社會解放問題，是和人類的「普遍解放」有關的問題。資本的獨裁和帝國的獨裁都是同樣應該打倒的敵人。「一個民族不可能在一方面繼續欺壓他民族，卻在另一方面可享受自由」(恩格斯)。

馬克思學派在執筆「共產黨宣言」之前，已指出做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之下，具有兩種基本的社會矛盾。其一是在西歐的布爾喬亞社會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另一個則是殖民地宗主國和殖民地、從屬國之間的矛盾。

一開始時，馬克思主義學派認為：殖民地隸屬國的民族解放問題是可以由西歐的布爾喬亞社會的勞工階級的勝利而獲得解決的。但在19世紀，世界上最成熟的西歐內殖民地「愛爾蘭問題」，「波蘭問題」的全面性、發展性研究的結果，得到如下結論。

1. 殖民地宗主國的階級矛盾和殖民地的民族矛盾之間，具有密切的互相依賴關係。

2. 除了以前者的解放為前提而後者獲得解放之外，以後者的解放為前提而解放前者的條件也已經成熟。

就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發展而言，除了愛爾蘭問題、波蘭問題之外，還扮演中要角色的是「俄羅斯問題」。

c. 查蘇利奇給馬克思的信

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後，俄羅斯社會產生大變動——爲了遂行戰爭，尼克來一世向農民約定農民的解放。戰後更由於農民暴動，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不得不履行「農奴解放」的約定。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在反革命堡壘」中發生的龜裂。

由於農奴解放而發生的社會變動中，產生了許多擁有不同思想傾向革命家各自在摸索著俄羅斯社會革命的方向和戰術。亡命於西歐的部分社會革命家，在那裡開始接觸到馬克思的思想並將其介紹給俄羅斯國內。因此1872年，「資本論」的俄語版在彼得堡發行，除革命家之外也受到知識份子的注意。然而，令這些俄羅斯的革命家和知識份子困惑的是：「資本論」序言中的「縱使一個社會找到其社會運動的自然法則...該社會無法跳躍自然的發展階段，也無法以法令將其去除...」、「產業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只不過是向產業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展示其未來的面貌而已...」。

俄羅斯農村雖然由於農奴解放而進入急速的解體過程，但在廣大的農村地區還殘存廣泛的農村共同體。就這種俄羅斯社會而言，俄羅斯是否必然要經歷「資本論」所描述的新的剝削階級？俄羅斯也和德國一樣，註定要走英國走過的路？或者是可以跳躍這個階段而進入馬克思所說的高層次社會？這是俄羅斯革命家讀過「資本論」之後自然產生的疑問。

1881年2月16日俄羅斯人民主義者（Naroduiki：19世紀80～90年代在俄羅斯主張向農民解放土地的知識份子革命家團體。後來發展為「社會革命黨」）成員之一，後來結成「勞動解放團」的查蘇利奇，代表她們的同志向馬克思寫一封信，質問有關俄羅斯發展的展望，尤其是對俄羅斯農村共同體的命運以及世界所有國家要經過資本主義階段是否就是歷史的必然？等問題。

馬克思於1877年11月左右，給「祖國雜記」編輯部的一封信中說：「（資本論中有關）原始積累那一章，只不過是將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從封建經濟秩序的胎內生出來的過程說出來而已。如果將我對西歐資本主義生成的歷史描寫，轉化為所有民族無論在任何歷史的情況下都必須經過的『宿命性』的、具有普遍性發展過程的歷

史哲學理論的話，那絕不是我的本意...」。

假如西歐的歷史發展並非具有普遍性的發展過程，屬於非布爾喬亞世界的俄羅斯將來有何發展的展望呢？查蘇利奇當年所提起的問題，即使在今天還是非常有意義。

馬克思給查蘇利奇的回信中說：「俄羅斯的農村共同體是俄羅斯社會的再生據點」，指出俄羅斯的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的可能性。（即移行「社會主義社會」的多樣性）那麼馬克思究竟根據什麼理由指出這種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的可能性呢？

寫給查蘇利奇回信草稿的一年後（1862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於「共產黨宣言」俄羅斯第二版的序文中，馬克思提出：「俄羅斯的農民共同體是是否能夠直接移植到共產主義共同所有這種更高層次的型態，或者是相反地走上與西歐歷史發展同樣的解體過程？」這個問題，並且做了如下的回答：「對這個問題，今天所能夠做的唯一回答是：假如俄羅斯革命能夠引發西歐的無產階級革命，而後雙方能夠互相互補，現在俄羅斯的土地共有制可以做為共產主義發展的出發點」。這就是說，俄羅斯的非西歐、非布爾喬亞發展的可能性是以俄羅斯革命和西歐革命的結合為條件的。

恩格斯更重視保障非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他認為，俄羅斯能夠迴避資本主義制度的痛苦的「第一條件是，從外而來的衝擊，西歐經濟體制的顛覆，首先產生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本主義的崩潰」。「西歐無產階級對布爾喬亞的勝利，由於這個勝利而發生的資本主義生產被由社會管理的生產所取代，就是俄羅斯共同體能夠提高到西歐同一階段所必須的提前條件」，「剛進入資本主義生產，因而還留存在氏族制度以及其遺物的國家，這些後進國是無產階級在西歐獲得勝利，資本主義經濟在其產生的故鄉和其繁榮的國家被克服，而從前的資本主義西歐的先例和積極支援的條件下才能夠開始走向社會主義的被說短的過程。」而且這種過程不僅僅是適合於俄羅斯，也適合於現在還處於前資本主義階段的所有國家。

由此可知，馬克思學派並不認為：一般地說，處於前資本主義階段的後進國社會革命可以由自力開展共產主義發展的道路。他們認為，後進國家的非資本主義發展可能性完全依靠於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和獲得勝利後的西歐共產主義的先例和積極援助。

雖然由於資本主義在19世紀末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因此外國帝國主義阻礙東方諸民族社會、經濟發展，剝奪他們到達西歐、美國所到達的發展階段的可能性。但一如「帝國主義論」的作者列寧一再所說，走向社會主義的「多樣性」依然存在，這一點，更可以由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而可獲得證明。

（待續）

☆

編輯報告

《左翼》在間隔達九個月後續刊了！在這段期間中，接到許多關心的朋友與讀者的垂詢，編輯部在此向諸位關心的讀者表達歉意與謝意，並以〈我們的看法與態度〉一文，對我們的主張作一個簡要的說明。

杜繼平先後在《左翼》雜誌中發表了〈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跳蚤「左翼」的滿紙荒唐言〉和〈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三篇理論性的長文，目前蒐集了這三篇力作及其他論文，將於八月中集結出版《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一書。陳映真先生特別為該書寫了一篇〈思主義思潮與台灣知識份子〉序文，詳述了自日據末期陳逢源與許乃昌有關台灣社會性質分析的論爭，一直到七〇年代的保釣運動，描繪了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台灣知識份子中所產生的影響，進而肯定杜繼平做為台灣難得一見的馬克思理論研究學者，並以此期勉台灣左翼在理論探討上用功與精進。

林書揚的〈為什麼搞「新民主論壇」〉乃是就最近由勞動黨、勞權會等單位所發起的「新民主論壇」作旨趣的說明與主題的闡述，其中對台灣輿論上好用的「民主」一詞，有深入的剖析與探討。

去年底南美大國阿根廷爆發經濟危機，引發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政局空前動盪，不到兩週就更換了五位總統。楊偉中的〈誰該為阿根廷危機負責？〉一文為我們說明這次危機產生的背景，文後並對一向好談「自由化、國際化」的台灣社會提出警訊。

曾健民〈《南天之虹》——湮滅和再生的歷史〉一文為我們介紹今年出版的一本有關二二八事件版畫「恐怖的檢查」作者黃榮燦傳記的新書——《南天之虹》，並說明了光復初期，兩岸文化人交流的熱絡背景與時代意義。黃志龍本次的理論讀本特稿〈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就社會主義在開發中國家的實踐經驗作理論的探討。

原於上一期刊載何六九〈“理直氣壯”因何而生？〉因後續稿件磁盤故障，本期暫停刊載，未來視修復狀況或重新取得新稿，再予以刊登。

左翼 第二十五號

出版日期：2002年7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二十六號



〈午夜·三等列車〉

作者：訥維

如何看健保費雙漲	臧汝興 / 2
冷眼看「一邊一國論」	官土生 / 5
農民的國際主義？——法國農民領袖西思·柏威訪談	鍾秀梅 譯 / 13
後現代態度與後現代左派	汪立峽 / 22
台灣「少年仔」如何罵陳映真	呂正惠 / 25
【爭鳴與求是】“理直氣壯”因何而生？（二）	何六九 / 33
【特稿】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二〉	黃志龍 / 41

如何看健保費雙漲

臧汝興

衛生署健保局以健保財務危機為由，宣布健保費率從 4.25% 漲到 4.55%；增加病患的部份負擔之後，八月二十七日由各總工會及「醫改會」發動了三萬人的大遊行，暴露出台灣醫療體制的諸多問題。

面臨健保局保費收入不足以支付醫療費用支出的財務危機，雙方都把焦點放在醫療浪費上。不過不同的是，健保局認為支出增加太快是因為民眾的醫療浪費與人口老化；而工會及「醫改會」方面則認為是醫院的醫療浪費。因此，健保局提出調高保費費率及抑制民眾看病的提高部份負擔；而反對方面則要求暫緩調高，只有先消除醫院的醫療浪費，然後才願意考慮調高案。

首先，必需對健保局的看法提出反駁。

一、關於人口老化造成醫療費用迅速擴大的說法。1996 年 65 歲以上的健保投保人共 169 萬名，保險給付 623 億元；到了 2000 年，人數成長到 187 萬人，保險給付 936 億元。也就是四年間老年人口只成長了 10.6%，但保險給付卻成長了 50.2% 之多。也就是說，老年人口的增加根本不是醫療費用增加的主要原因。再換一個角度，從每一老人每年的健保支出來看，1996 年健保局平均為每一老人支出的金額為 3 萬 6 千元，但到了 2000 年卻快速增加到 5 萬元。費用的如此快速增加，是否象徵老人的健康也獲得了相應於此的保障？答案恐怕每一個人都知道，是因為醫院的「促銷」手法更厲害了。

二、關於醫療浪費問題。我們知道目前健保支付醫院醫療費用時，是採用「行為別」給付方式，也就是醫院做了多少行為，健保局就按該行為的價目表支付，例如，打了一針，開了十粒藥、照了一張 X 光等。在此情況下，醫院做為一個以營利為目的的事業單位，我們不難想像其擴張營業額的方法。例如，對醫師採取無底薪或低底薪制，以迫使醫師充當擴張營業額的尖兵；疏於無法提高營業額的預防醫學的發展；在無法有效製造病人的情況下，盡量對每一個送上門的病人，採取多投藥、多檢驗、多開刀、多門診等方法。尤其是醫藥未能分業，使得病人拿不到醫師的處方簽，不得已每次拿藥都必須看門診，更是台灣健保門診次數超高的原因。從幾年前，醫師為了拒絕醫藥分業而展開空前規模的街頭示威，就可以看出拒絕交出處方簽對醫師利益的重

大。檢驗項目、次數的繁多、用藥量的氾濫也是有統計可以證明。例如，台灣每百萬人的電腦斷層、核磁共振設備數都遠高於西方國家；每人每年打點滴的數量，更是高出西方國家數十倍；每次門診開藥，西方國家平均開 1.9 種藥；而台灣卻高達 4.3 種。或許有些醫師要反控，說病人主動的要求，才是造成醫療浪費的原因，但，我們必需要問，整體來說，醫療提供的決定權到底在誰手裡？難道台灣的醫院是自助式的「199 吃到飽」？量與種類都是病人決定？

另外，在台灣，門診病人中佔比率最高的是看感冒。我們都知道一般而言感冒不一定要看醫生，多休息，多喝水，調理一下身子就可以復元了。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們每個工人一年的總工作時數高出西方國家約 700 小時，以一天八小時計算，約高出 90 天，再加上在台灣請病假要比西方國家困難許多，因此，上班的人一遇上感冒，通常都會儘量快點吞下大把大把的感冒藥，根本不敢隨意請假休息。相信這也是造成台灣看感冒人次超高的原因。

在這次相互（？）指責醫療浪費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民眾指責醫院醫療浪費；而指責民眾醫療浪費的卻不是醫院，是健保局！醫院躲在後面始終一言不發，健保局卻強力為大坑健保局的醫院代言。

三、就在八二七反健保雙漲遊行的前一天，行政院透過報紙大肆宣傳「台灣的健保是全世界最好的健保制度」。我們不禁要問好在哪裡？撇別根本沒有全民健保的美國不談，就拿台灣跟歐洲國家比比看。台灣的健保保費低是不爭的事實。但歐洲國家的平均所得遠高於台灣、健保的保障範圍遠大於台灣（台灣健保支出只佔總體醫療支出的 55%；而歐洲國家則高達 80、90%，例如有的國家不但保助聽器、甚至連眼鏡都保）、醫療照顧遠優於台灣（例如，一個病人住進醫院，在歐洲國家平均約有三個人照顧，反觀台灣只有 1.5 個人照顧）、誤診率低於台灣…。也就是說，行政院單憑便宜，就宣布台灣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按此邏輯，也許有一天，行政院會指著一台 386 電腦說：「這是全世界最好的電腦！」

接下來，我們來檢討一下參與這次「反健保雙漲」運動的團體的訴求。大部份的團體將問題集中在「藥價黑洞」（醫院向藥商買進藥品的價格與醫院向健保局申報的藥價之間的差距）、浮濫申報等醫院的浪費，從而願意在這些問題獲得解決的條件下，接受調漲案。在目前的情況下，確實民眾的最大憤怒是來自醫院浪費卻推給民眾偏面承擔，因此做為一項訴求是可以接受的。但更重要的是，做為一種運動必需要對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進而提出一個未來的方向。從這個的觀點來看，克服了「藥價黑洞」、浮濫申報，健保問題就能解決嗎？國民的健康就能獲得照顧嗎？

從 1995 年到 2000 年的五年間，每年健保給付從 1938 億元增加到 2917 億元，增加幅度達 50.5%。但，同期，決定保險率的薪資卻僅從 35,499 元（平均薪資）調升到 41,961 元，調幅僅 18.2%。照這樣的趨勢，五年後，健保財務一年就會有九百多億的虧損。這根本不是解決「藥價黑洞」（據估計也只是一百多億）可以解決的。況且，在健保開辦之初健保尚有盈餘時，「藥價黑洞」、浮報問題就已存在，它根本不是健保問題的真正核心。

真正的問題在於在各產業的平均利率潤不斷下降的現今，醫療產業做為一種由國家保障其售價的新興產業，成為各業資源紛紛擁入的產業，這些資本的紛紛投入，必然要求相應於投資資本的利潤，在這樣的情況下，造成了醫療資本的總營業額成長始終與 GDP 的成長維持一定的關係，而近幾年來，台灣醫療產業的成長率，一直維持在略高於 GDP 的成長水平；相反地，工資的成長卻遠遠落後的 GDP 的成長。也就是原本應該以照顧人民健康為目的的醫療，卻在私有化下，以營利為唯一目的的情況下，隨著資本的邏輯運轉。

另外一點就是如何看待這次的部份負擔調高的問題。這次健保制度是保費費率與部份負擔皆調高。而健保局刻意強調費率上漲的部份，對於部份負擔上漲的部份則輕描淡寫。事實上，我們知道健保費率一旦提高（4.25% 提高到 4.55%，提高比率為 7%），資方與政府的保費支出也會同比率的增加。因此，在其他條件不改變的前提下，政府、民間企業者對國民健康的負責比率並不會改變。在此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有一定雇主的工人保費只需負擔保費的三成、無一定雇主的工人也只需負擔四成，但整體平均而言，由國民負擔的保費佔整體保費的 38.56% 最多、其次才是政府的 35.03%、民間企業者 26.42%。因此，以金額而論，這次費率上漲後，保費支出增加最多的仍是一般民眾。但是，部份負擔的上漲，意義就不同了。以 2000 年的統計來看，全年的醫療支出是 5,254 億元，其中由健保給付的部份為 2,917 億元，佔 55.52%。即，健保只保了整體國民健康的 55.52%，其餘主要是家庭自行負責的，例如、部份負擔、購買保險給付的藥品、施術、成藥、民俗醫療、簡單的醫療器材等。而這次部份負擔的上漲，代表的是健保負擔範圍的縮小；家庭自行負擔部份的增加，也就是政府對國民健康負責的比率會縮小。這一點與過去數十年來，從沒有任何健康保險到有公教、勞教、農保，最後到 1995 年開辦全民健保，政府對人民的醫療保健的負擔比率一路擴大相比，是一個明顯的政策轉折。

更令人擔心的是，在一波波的民營化的風浪中，健保可能會成為下一個民營化的對象。一般來看，如果政府冒然提出健保民營化，其可能遭到的民眾的反彈，會比其他公營事業要來得高。在此情況下，我們懷疑健保局故意對醫院不盡監督之職，放任

醫院浮報、亂開刀、開藥，正好為將來的民營化製造合理的藉口，值得嚴加提防。

最後，我們必需提出落實憲法第一百五十七條「國家為增進民族健康，應普遍推行衛生保健事業及公醫制度」，讓人民的健康不再成為財團的獲利手段，才可能根本的解決問題。同時，我們也認為目前第一步就是由健保自己開辦一級醫院並逐步收購財團醫院，如此，才能抑制醫療費用的不當成長、實現醫療資源的平均分配。

★

冷眼看「一邊一國論」

官土生

八月三日，陳水扁透過視訊，在世台會（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東京年會上，拋出了「一邊一國論」和「公投急迫說」；頓時，輿論譁然，有人叫好有人憤怒，台灣社會陷入惶惑不安狀態，當然，也引起了大陸和美國的強烈反應。

接著，扁政權的存、院、黨各方紛紛出動，對該「論說」所引發的負面效果進行「滅火」、消「毒」（獨？）。忙著解釋說，它只是無意的「脫稿演出」，是對大陸最近的「不友善」打壓（如，大陸在扁就任黨主席之日，挖去諾魯的邦交…等）的「情緒反應」，並辯解說，「一邊一國論」只是「事實的描述」，並沒有要改變台灣現狀的意思，大陸政策一切都沒有改變；說「走自己的路」只是指「走自由民主的路」，並不是「台獨的路」。更匆匆派出以陸委會主委蔡英文為主的國安系統人員赴美報告、解釋、說明，而得到美國「姑妄聽之」的回應，落得向美「負荆請罪」的地步。

雖然扁政權口口聲聲辯解說，「一邊一國論」不是台獨論，甚且責怪媒體把它過度簡單化，但是，從此論一出立刻造成社會大震盪，以及美國強烈的回應來看；還有，從八月六日中國時報的民調數據來看，有45.1%的民眾就認為「一邊一國論」就是在推動台獨，只有15.2%的民眾表示它只是宣示台灣的現狀不是搞台獨，也有超過半數以上的民眾認為它對社會民心、經濟有很不好的影響。可見得大多數「民心」都直接感受到它就是「台獨論」，而「台獨」必招致「危機」。一個以民粹起家的政權，

豈會不在意？

面對大多數民眾的疑慮，陳水扁本人又於八月七日改口說：「一邊一國論」已被過度簡化，可能造成誤解，應該說「主權對等論」比較符合完整的意旨；並強調「主權對等論」的說法就是，「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目前的國號叫中華民國」，這是民進黨黨內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中的一段口訣。亦即，把「一邊一國論」重新又掛上「中華民國」的招牌，以減少負面的效果。

一．〈台灣前途決議文〉與「一邊一國論」

這麼反反覆覆，扁（騙）來扁去，我想，絕大多數的民眾都會被搞得「霧煞煞」，到底陳水扁說的「一邊一國論」是「啥米」？其虛實如何？又，它與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和〈台獨黨綱〉又有什麼關係，有什麼區別？

陳水扁曾於八月三十日出面解釋他拋出「一邊一國論」的背景是：

- 1．以〈台灣前途決議文〉處理〈台獨黨綱〉
- 2．為了因應「台灣正名運動」
- 3．為了「回應大陸一中原則下的三通壓力」

讓我們檢證這番說詞談起，特別是其中第一條，所謂「以〈台灣前途決議文〉處理〈台獨黨綱〉」，是指在七月三十日，陳水扁「主席」在主持了民進黨高層會議後，決定以1999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作為民進黨處理兩岸政策的最高原則，但對原來的〈台獨黨綱〉卻予以保留，而採取兩者並存的兩手策略。這兩者有什麼不同、有什麼相同呢？是這樣的，〈台獨黨綱〉的中心意旨是否定台灣現狀（中華民國），追求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灣共和國），並制定新憲法；而〈台灣前途決議文〉是認為，維持台灣主權獨立的現狀就等於台灣獨立，不必另外再追求或宣布台獨，因此常常被複誦的一段口訣是：「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然而，它真正強調的是「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部份，「中華民國」只是掛在前面的招牌，實際上就是掛著「中華民國」招牌的「新台獨論」，不管何者，其本質都是台獨論，只不過前者可稱為舊台獨黨綱，而後者是新台獨黨綱。雖然如此，因為它仍掛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且強調維持現狀不必宣布台獨，因此，安撫了許多不認同台獨的「民心」，也安定了「軍心」；另一方面，也應付了大陸的「一中原則」，不觸犯美國的「一中政策」，而使陳水扁得於2000年大選取得了政權，因此，〈台灣前途決議文〉是民進黨現階段，為了取得多數民眾的認同，取得政權，繼續維持政權，執政修辭學在台獨論。也就是在過去一段時間，扁政權常常掛在嘴邊的所謂「新中間路線」的內涵。

二、「一邊一國論」就是對抗性的「兩國論」

然而，這次的「一邊一國論」，卻突破並大大越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的底線。

這從他講話的實際內容可知，他是這麼說的：

「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簡單地說，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

很清楚地，它已經拋開了〈台灣前途決議文〉中，作為掩飾「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這台獨真義的「目前叫中華民國」的招牌，而直接接上「台灣跟對岸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本來，〈決議文〉是用「國號叫中華民國」來使「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保持模糊曖昧的彈性，可進可退；而「一邊一國論」已完全拆除了這模糊曖昧的想像空間，直接說明了「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投話的意思就是指：「台灣與對岸中國是一邊一國」，還加重語氣說：「要分清楚」。

這是百分之百的「兩國論」，甚至已越過了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連「特殊」兩字也不用了。是迄今陳水扁政權最露骨在台獨論。

雖然，就如前面已提及的，他不斷進行滅火、消「獨」，再三重申中性的「主權對等論」或掛「中華民國」招牌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強調大陸政策不變，甚至說「要做好三通的準備」，「該開放的繼續開放，該交流的繼續交流」。但是，從他執意把「一邊一國論」的英譯，定為「one country on each side」就知道，陳水扁政權並不願從「一邊一國論」的前線撤退，就如前駐美代表陳錫蕃在八月八日的中國時報上所說的：「扁政府採用“country”而非“state”…在意涵上超越了「特殊兩國論」（按：當時是用state來定兩國的“國”，而非用Country）所以刻意選用“Country”，代表扁政府有意和中國大陸『告別』」。

因此，我們可以大膽斷言，拋出「一邊一國論」絕不是什麼「臨時起意」或「情緒失控」的失言，而是經過縝密計劃的政治戰略的一部分。即便如此，這個早已策劃好的，迄今最高調最露骨在台獨宣示，它的實際可行性如何？作者認為並不大。因為，只要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沒有事巨大的、質的變化，在美國還要不斷複誦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以及「不支持台獨」的政治語言的格局下，陳水扁政權再喊萬句的台獨一邊一國，也僅是「政治話語」，化為行動的條件不存在。

何況，與李登輝提出「特殊兩國論」時的政經條件相比，它的可行性、實現性又更低了；當時，在政治條件上，李登輝勢力橫跨兩黨，集民進黨和國民黨的萬寵於一身，有高達80%的民眾支持率，無人可批其逆鱗，連這樣的好條件時機，李登輝都無法將兩國論化為行動，還換來美國的一片痛伐，落得一身「麻煩製造者」之名。而陳水扁充其量只有40%的支持度，還有國親兩野黨的制衡，另外，這兩、三年來，兩岸經貿、文化、民眾的交流、統合的趨勢更是日月千里，勢不可當，特別是，台灣對大

陸的貿易依存度已進逼 25%，台灣的貿易黑字幾乎全來自中國大陸，兩岸三通的壓力如千軍萬馬之勢，看來就要衝潰陳水扁政權的重要牆障。在這樣兩岸現實形勢下，「一邊一國論」，充其量也僅是「政治話語」的成分居多。

陳水扁政權懂不懂得這個現實？我想他們當然是懂的，顯然懂，爲什麼要執意去做呢？爲了什麼？這就與陳水扁政權所處的政治環境，以及他最近的新全盤政治戰略有關了。

三、所謂的「大戰略安全」

因此，就「一邊一國論」論「一邊一國論」，是無法全面掌握它的真義的；必須把它與陳水扁政權最近一齊大張旗鼓推出的各種活動，擺在一起看，聯繫起來分析，才可以看清楚他的真正戰略意圖。

首先，就是從七月底開始的敲鑼打鼓重啓的「南向政策」；口口聲聲要與東協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區協定」，而呂秀蓮的印尼秀也是這南向政策的泡泡劇之一。其實，早在 1994 年，李登輝政權就曾經爲了扭轉台灣經濟西進大陸的大勢，而祭出逆向操作的「南向政策」，事後證明，許多受鼓動南向的台商蒙受了大損失，是徹底失敗的經濟政策，唯一的贏家是李登輝，因爲他透過這個大政治秀，獲得了許多政治資本。明知如此，陳水扁政權爲什麼要重蹈覆轍呢？我們只可以說，這「南向政策」，與其說是經濟的南向政策，倒不如說是政治的「南向政策」，搞經濟是虛，搞政治才是實。

還有，在八月十九日，又大張旗鼓地舉行了所謂「美日台三邊戰略對話」的會議。會後，陳水扁和與會者的談話，便提出了所謂「安全、民主、經濟」的三錨說，大意是說：

1. 在「安全」議題上，台灣願意在「美日同盟」的架構下，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建立美日台民主國家的夥伴關係」。
2. 在經濟議題上，主張建立「美日台自由貿易區」，共同加速建立亞太民主國家的「經濟共同體」。
3. 在民主議題上，主張強化「亞洲民主同盟關係」。

再如，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於日前訪日回台後，也興沖沖地自吹，要積極建立「美日台東亞安全機制」，希望在二年內與日本簽定「自由貿易區協定」。

最近的九月八日，陳水扁政權又和三芝召開了所謂「反恐與民主議題的戰略會議」。會議的十點結論，除了宣示要堅定支持美國在全世界（特別在西亞、中亞、東南亞）的反恐行動，並願意繼續以「具體行動」參與外，還是再三高唱「民主」調（當然是追隨美國標準的民主）；說要儘速成立「台灣民主基金會」，與先進民主國家建立民主聯盟；說要建立「亞太地區民主同盟」，促進亞太地區民主化；更要提出「中國大陸人權報告」，以「台灣之音」廣播，邀請大陸「民主人士」來台觀摩，來「促進大陸民主化」。

四、把台灣拉回和冷戰時期一樣的老路

由上就可清楚看出，陳水扁最近常掛在嘴邊的所謂「大戰略安全」的具體輪廓，它包括：(1)以「民主」作最高政治商標，組織國際民主聯盟，用「民主」對抗大陸、和平演變大陸；(2)推銷美日台自由貿易區或與東亞各國的自由貿易區，以扭轉兩岸經貿日漸深化的統合趨勢，並且以台灣的經濟資源去交換政治利益；(3)在軍需、國防、安全上，積極投靠「日美安保體制」。

這「大戰略安全」的總的特點就是，更主動積極的投靠美國，拉攏右傾化的日本，依慮已全球化的「美日安保聯盟」，企望緊抱美日安保體制的後腳跟，充當美日安保的馬前卒，遷至中國大陸的發展，以得到美日的安全保障，維持對島內的統治，抗拒大陸「一中原則」的壓力。

因此，陳水扁所說的「走自己的話」，其實就是「走美國和日本的路」。同時，從台灣二戰後迄今的五十多年歷史經驗來看，它的本質，很清楚地，等於重走冷戰時期國民黨政權的老路。

在政治商標上，「民主之聲」來取代過去的「自由之聲」，用「民主聯盟」來取代過去的「世界自由聯盟」；在經貿上，用「自由貿易區」來取代過去的「日台美三角經貿體系」；唯一不變的，不管過去或現在，都是以依慮制霸亞洲的「日美安保體制」來維持政權。只不過在後冷戰的現在，安保聯盟已由東亞地區擴展到了世界性的安保聯盟，而日本的軍國主義化日趨明顯，特別在911之後，在美國「以反恐之名制霸世界」的局勢中，更形擴張。

關於打出以「民主」作政治商標的事，不禁令人想起過去國民黨政權的作法。過去的國民黨政權，在對內方面，明明是實施威權的獨裁統治，卻要高喊「自由」，自稱為「自由中國」，稱台澎金馬為「自由地區」，蔑稱大陸是「奴役中國」；還明定一月二十三日為「自由日」，長期動用各種資源成立由谷正綱等主持的，由國際反共保守勢力組成的「世盟」和「亞盟」，用「自由」世界聯盟的名目來推動反共反中國大陸的宣傳。在冷戰結構的保護傘下，以反共反中國大陸為國家意識型態，以維持對內的獨裁統治，本就是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因此，主動積極配合美國的最高冷戰意識型態——「自由」的宣傳，是加入國際反共、冷戰俱樂部的保證，同時，也有利於對大陸的政治宣傳和對內國民意識教育。以「台獨」為其黨綱的陳水扁政權，所做的完全與國民黨政權同出一轍，只不過以「民主」取代已過時的「自由」而已（因為蘇東波劇變、冷戰結束後，「自由」在政治意識型態上的宣傳價值已消失了，冷戰後，突出世界矛盾，可說是「南北矛盾」；也就是以美國為首的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的矛盾，如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反恐戰爭…等，美國獨大的「反恐制霸」世界格局中，美國的「民主、人權」口號成了代替「自由」的無上意識型態，也成為打擊「敵

人」制霸世界的利器，也就是李登輝、陳水扁等說的「普世價值」)。記得在八〇年代末蘇東波劇變正如火如荼進展時，大陸也發生了天安門事件，產生了大批「民運」份子（「民主運動」分子），國民黨政權就曾大力支援過「民運」，並開始轉以「民主」作為反制中國大陸的宣傳口號；如此看來，陳水扁政權只不過是傳承了國民黨政權的本質，並進一步發揮而已。

還有，所謂要與美、日、東協締結「自由貿易區」的宣傳，實際上，它與李登輝政權時期鑼鼓喧天推銷的台灣要成為「世界營運中心」的政策是一樣的，由於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思想，以及基本上只憑借此阻擋台灣經濟西進的企圖，因而註定了失敗的命運。所謂「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基本上也是想以政治力來扭轉台灣經濟與大陸統合的客觀趨勢，可預期這是不可能實現的。那麼可以知道，扁政權大力推銷這個政策，是政治宣傳的意義大於經濟政策的意義吧！

五、原來只是選舉路

然而，陳水扁政權似乎忘了世界東西兩陣營嚴重對峙的冷戰歷史已過去，以圍堵中國大陸為任務的東亞島嶼冷戰線也已消失，在「全球化」的快速進展中，中國大陸經濟迅速崛起，雖然，「美日安保體制」還存在，仍然想繼續制霸亞洲，但它與中國大陸之間已不是如冷戰期的絕對對峙，而是既交往又鬥爭的，而且在經濟、安全、反恐問題上，合作大於對立。在這樣的亞太國際格局中，一個在政治上刻意拉高與大陸對抗的台獨政權，恐怕很難成為「美日安保俱樂部」的正式會員吧！充其量，只有資格扮演一個「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好用的卒子吧！美國不是時時刻刻申明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以及「不支持台獨」嗎？再從這次作為扁政權重大文宣，前述的「大戰略安全」一部分的「美日台三邊戰略對話」會議來看，與會者的身份，日本方面不是一些退休的外交、自衛隊官員，就是在日本的政局中影響不大的極右翼人士；而美國方面也僅是一些如傳統基金會的親台人士，可以說，很難期待有實際的政策實行力，僅止於開開會說說話而已吧！

由上述分析可知，陳水扁近日常掛在口上的「走自己的路」，其實就是在國家定位上走「一邊一國」論的路，在經濟、安全上走投靠「美日安保」的路，然而，這條路卻是窄或是走不通的路，難道陳水扁政權不知道嗎？我想，他是十分明白的，但是又不得不走。為什麼明明知道，卻非走不可呢？作者認為，這只是喊出來的路，那不是真要走的路；總言之，它只是一場作給中國大陸，特別是作給台灣選民看的一場大型的政治秀場。就像他們把它美化成要走「自由、民主、人權、和平」的路一樣；秀演過了，政治利益收到了，大家也都忘了。

綜言之，不管是拋出「一邊一國論」，或營造「南向」氣氛，宣稱要重新投靠「美

國安保」，或是簽訂日美台自由貿易區，都是在營造一個要拉高兩岸分離和對立局面的政治姿勢，來對應漸漸感到無力操控的兩岸關係，以及用來重新動員、凝集、統合泛獨民衆的支持，以蓄積陳水扁連任的政治能量。

六、追求連任的焦慮以及「台美族」的「美」夢

陳水扁政權，在此時此刻祭出這一系列，抱括「一邊一國論」的所謂「大戰略安全」。它的原因，總地來說，主要是由於追求連任的焦慮。造成他這種焦慮的客觀因素以及採取這一系列策略的原因包括有：

1．基本上，他是一個不過半數支持的政權，他的當選與李登輝的護持很有關係。然而現在，擁有扭轉乾坤的李登輝已下台了。而且，國親兩黨也磨刀霍霍，形成極大的壓力。這次的連任，只有靠自己的鐵票，泛獨派的力量，不但沒有外部的奧援，甚至還有未自李登輝護持的台聯瓜分獨派資源的壓力，而且，他上台後的「新中間路線」也使他的獨派資源流失不少。在這樣的客觀處境下，爲了後年初的勝選，首要的便是統合，並鞏固泛獨派鐵票的支持，唯一可以選擇的，便是極度拉高台獨的政治姿態，作出與大陸對決的姿態，如一邊一國論便是。

2．兩岸經貿、文化，全面的快速結合，以及民間三通的壓力，使他漸漸失去掌控兩岸關係的權力。因此，只有採取逆勢操作的手法，祭出與美、日、東協簽定自由貿易區的脅迫姿態，讓兩岸關係的主控權回到手中，以使用這主控權來換取企業界對他的政治支持。

3．他的智囊團的成員，大多是「台美族」，亦即，都是在國民黨的思想教育下成長，並全盤接收美國價值的一代；是國民黨反共戒嚴下，思想的成長受到限制，除了接受反共、反大陸、恐共的思想外，只有全盤接受美國教育，把美國的價值當做普世價值。因此，他們的世界觀是唯「美」是從的。只有以美國的頭腦去思維，在美國的架構下、價值體系下尋找自己的出路。重新投靠「美日安保聯盟」，便是當然的結果。

4．然而，特別是他們看到911以後，美國逐漸在築構一個以反恐爲旗幟的制霸世界的體系。而其中，中亞、東南亞是重心，以反恐爲藉口，正把力量伸入這個地區，企圖重築冷戰時期制霸亞洲的局面，而包圍、牽制、質變中國大陸的發展，是隱藏在後面的核心指針。在這樣的形勢的分析下，陳水扁的智囊們，認爲這是對抗中國大陸的絕好時期，因此積極尋求投靠美國，在美日安保架構下，重新把台灣帶到和冷戰時期一樣的，與中國大陸分離和對峙的局面。只有製造和維持一個這樣的局面，民進黨在台灣社會的政治權力才會源源不絕。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看，民進黨的政治資源，是在動員不同時期的台灣社會的矛盾中來的；譬如，吸收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社會力，激發族群矛盾，最後便是動員統獨矛盾，而怎麼持續維持對抗中國大陸的局面，

是今日和將來，民進黨維持它的政治力量的基礎。因此，拋出一邊一國論，就是想以此刺激中共，引起中共的強烈反應，來製造中國打壓台灣的「悲情意識」，「抗爭意識」，產生對大陸的敵愾心，以凝聚選票。可預見的，此後，陳水扁政權必定會利用一切機會來進行中國打壓台灣的宣傳。

5. 在將來臨的十月布江會議之前，拉高台獨的政治姿態，一方面可以給美國在與大陸談判中作球加碼；另一方面，也是提高在兩岸關係中自己的價碼。

這不但不抵觸美國的利益，甚至還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怪不得在一邊一國論後，美國只是公式地重申「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卻拐彎抹角地釋出並「不反對台獨」的訊息。

結語——如果「美」夢成真？

1950年6月27日韓戰爆發後第三天，美國爲了圍堵中國大陸而派出第七艦隊進入台海，凍結了中國內戰，並從外交、軍事、政治、經濟多方面扶植敗退台灣的國民黨內戰政權，對島內實行反共政治獨裁和依賴美日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自此，台灣便成了一個美國在東亞冷戰中圍堵和牽制大陸的重要反共、反中國大陸的基地，如何操控這個島嶼與中國大陸的分離與對峙的局面，以獲取美國的國益，這在美國的世界冷戰戰略中是十分重要的。今日兩岸的分離和對峙結構全起源於此，台獨只是這個特殊結構的產物。

因此，台灣島內的政治格局，從1950年起迄今五十多年間，便一直取決於三方面的力量：(1)中國追求民族統一發展的意志和力量(2)美國制霸全球的世界戰略中與中國大陸的對抗力量（也就是，如何牽制大陸）(3)在上述二大力量的範疇內，島內各方政治力量的競爭。瞭解了自1950年以來，台灣島內政治結構的這種特徵，便很難說「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句話了，因爲主權並不完全在台灣手上。高喊「主權獨立」，充其量只是向大陸喊話，或說給無法理解自己命運的台灣同胞聽，以獲取選票而已。

歷史地來看，從1950年形成固定下來的世界冷戰結構，造成了近40年的國民黨反共獨裁對台灣的統治，以及台灣與大陸的分離與對峙；冷戰崩解後，曾經維持了近十年的兩岸緩和關係。然而，911以後，美國企圖以反恐的大義來制霸世界的局勢，會不會進一步發展？就像冷戰結構長期支配世界一樣，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陳水扁的獨派政權以「一邊一國論」爲國家認同的基調，再加上「民主」商標和投靠「美日安保聯盟」的大戰略安全，可能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持續支配台灣的未來命運也說不定！

農民的國際主義？

—法國農民領袖西思·柏威訪談—

受訪人：西思·柏威 (Jose Bove)

提問人：拿俄米·可蘭 (Naomi Klein)

翻譯：鍾秀梅

譯者按：這篇「農民的國際主義？」訪問稿，曾刊登在2001年的《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 12)。作者為法國著名的農民領袖西思·柏威 (Jose Bove)，他建立了「Confederation Paysanne」農民組織。這個組織的網站 <http://www.confederationpaysanne.fr/>，曾帶領農民反抗麥當勞為首的垃圾食物工業，並因反對基因食品而入獄。這幾年在西雅圖、義大利、巴西等反全球化運動與世界社會論壇中，都有他的吶喊。當巴解領袖阿拉法特陷於以色列軍隊的層層包圍時，西思·柏威率領四十幾名歐洲和平運動者，冒著戰火的危險，聲援巴勒斯坦人民。接近五十歲的西思·柏威，少年時期受法國1968年學生運動影響。他的運動歷程有何不同？他對WTO的觀點是什麼？農民的國際主義概念為何？

提問人拿俄米·可蘭 (Naomi Klein) 是加拿大著名的得獎記者，也是加拿大「窮人運動」的倡導者。她在《國家》(Nation)、《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村聲》(Village)、《全球郵報》(Globe and Mail) 等媒體撰寫評論文章。曾在哈佛大學講課，是《向商標說不》(No logo) 一書作者，此書一度獲保衛報 (Guardian) 最佳書籍獎。

(感謝現留德學生吳昱賢關於譯名和網站的提供)

問題1：在法國，你是怎麼成為運動者？當時，你還太年輕，大概沒有搭上1968年學生運動列車吧？

回答：我當時還是國中一年級學生，不住在巴黎。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是還是感染到了五月風暴的討論氣氛。我做的不多，只佔領了學校足球場。到了第三年我才開始參加示威。十七歲時，我捲入了拒絕效忠國家的鬥爭，這個組織遍及全法國，為兵役的抗拒者同時又是逃亡者的支持網絡。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出席軍事法庭，為在軍中

偷竊和冒犯上司而遭牢獄之災的常備兵提供法律服務。我們蒐集與案情相關資料，並將軍中所發生的醜陋事件披露。

1970和1971年之間，我隨我的父母親在中學畢業後，搬到柏都（Bordeaux）。我的父親是果樹疾病防治研究員，因工作緣故，常搬遷。小時候，我們也在柏克萊待了好幾年。

我本可以在柏佛（Bordeaux）讀大學，因為要全職搞反兵役運動而作罷。70年代初期，拉閘客（Larzac）高原的農民和我接觸。因為國防部要在那裡將軍事基地由三千公頃擴張到一萬七千公頃，所以當地農民要求我們幫忙建立反抗組織。這個組織網絡超過二百個，遍及全法國，連德國和英國都有支持者。

高原上的實體都被禁建。1973年，我們就在軍方所標示的區域搭建羊棚。數以千計的支持者前來幫忙。我們花約二年的時間，用石頭這種最傳統方法建舍，組織「與牲畜圈養在一起的運動」。同時間，我們又接觸底里牛斯山（Pyrenees）山區的農民組織。之前，我們把逃亡兵役的年輕人送到那裡做工。那裡群山陡峭，農民幹活全靠雙手，機械化根本進不去。在底里牛斯山，我初次嘗試當奶農和製乳酪的滋味。

1975-76年的冬天，拉閘客農民決定在讓軍方買去的農地上蹲點。後來，我搬到蒙特多（Montredonn）當羊農，我在這個區域有聯繫密切的關係。

問題 2：那個階段，主要影響你的思維是什麼？

回答：有兩大串。一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特別是巴枯林、克魯泡特金、普魯東、西班牙內戰時的無政府主義。在柏都時有一些西班牙內戰的榮退戰士住在那裡，我們常有討論的機會。第二個思維是非暴力路線，像馬丁路德、甘地和在美國加州組織摘葡萄工人的墨西哥農業工人領袖西沙·恰維茲（Cesar Chavez）。甘地主義的想法是，如果你改變不了的自己的生活，就別想改變世界。這個路線嘗試把逐漸茁壯的群眾鬥爭，整合到成氣候的非暴力行動中。

問題 3：在西歐和美國，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運動，曾立下很好的口評。這個影響一直到延續到反抗雷根和賒契爾主義。特別在美國，似乎新生代捲入了反全球化運動。在法國，是不是少了類似清楚的反抗運動，同時也沒有積極培養新血？

回答：七十年代的法國社會是充滿戰鬥力的，那時的政治氣氛是和左派政黨第一次執政相關。密特朗在1981年選上總統時，左派朋友覺得希望無窮，後來卻退潮了。有些人憂心的說：「我們快做點事吧！不然左派變過街老鼠了！」，有些人對政治幻滅，他們說：「本以為拿了政權可以改變一些事，但改個屁！」，從此離開了這個陣營。八十年代的法國金錢至上，是個人主義和商業化的社會。但是農民運動卻不受城市左翼低迷的氣氛和功利社會的影響。我們在1981年的拉閘客高原上抗爭勝利後，便開始

進行自力更生的實驗。我們把年輕人帶到那裡，專心研究如何做羅克福特奶酪和密集農業。我們為小農爭取權利，組織工會組織，後來成立了「農事協會」(Confederation Paysanne)。所以說，八十年代，我們的生活很豐富，絲毫沒有讓衰敗的都市左派氣氛感染上。

我把話題拉回到你所問的關於新生代的問題。九十年代的鬥爭灰濛濛的，有觀點是沒錯，但沒把人考慮進去。那時冒起一些運動，像無住屋住房運動和反軍事運動(sans-papiers)抗爭。這些運動開創了新的運動形式，並形成這幾年反全球化的運動。2000年六月，在米樓的砸毀麥當勞行動中，超過十萬個支持者，這些人大部分是年輕人。之後，在尼斯(法國)、布拉格(捷克)、熱內亞(義大利)不同的政治意識出來了。他們較有全球性的思維，相較於著重在職場或反抗國家的舊社會運動顯得相形見色。

人們在對抗磐若堅石的全球經濟體系中，知道敵人在哪裡。過去西方對這個問題掌握不住。人們很難具體找出新的異化形式是什麼，因為新的經濟體系是個獨立體，和政治領域可以毫不相關。法國的這個新運動是很特別的，我們並沒有切斷和其他運動勢力的連接。這些運動包括移民權的爭取、失業者與無住屋者的鬥爭，同時也是反抗新自由主義的基石。我們認為反全球化運動不是天馬行空，得從這些鬥爭幹起。

問題4：你在1987年成立組織，這個組織內容是什麼？

回答：第一：保衛農民即是工人的權益。因為賣給我們設備、肥料、種子和飼料的公司和銀行，剝削了我們的利益。第二：這是反對密集農業的鬥爭。理由是，以外銷導向為主的跨國公司，他們僱最少的工人，卻要最高的利潤，從不考慮生態和食物品質。以畜牧業為例，當小牛生下來之後，被迫與母牛分開。機器將母牛的奶分離，奶送到工廠殺菌、去脂、乾燥、再製、包裝，然後又送回到農場裡。為什麼要這樣？因為牛奶分開加工是歐洲共同市場高額補貼政策，說這樣比在農場直接製造划算。從經濟和生態角度看來，真是走火入魔。密集農業牽涉的健康問題，更加說明了替代農業的重要性。

這個歐洲共同市場的高額補貼政策，與歐洲保守政治和宗教合為一體，總是想控制和剝削農民運動。另一方面，傳統左派的農業政策也是一邊糊塗，完全違背世界農民的利益。所以說，我們需要自主的政治黨派，勾勒出我們的農業政策，這個政策是符合農民利益的，並非利用他們。我們獻身於可持續農業文化發展型態，這個型態尊重環境保護、健康食物和工人權利。只要堅持我們的計劃，不限農場面積，或使用各種方法生產有機農業，每個農民均可加入這個組織。我們有四萬個會員。今年(2001)的「小規模農業」選舉(Chambre Agriculture)，我們贏了28%選票。在一些省份更多、在「阿維宏」(Aveyron)地區贏了44%、「拉蒙薛」(La Manche)增加到46%。

問題 5：你是怎麼調動起反對垃圾食物工業，像砸毀麥當勞行動？

回答：八十年代，我們反對酪農在牛身上注射激素刺激生長。這個後果危及到大眾的健康，是個很強的杯葛行動。當時農業部長不顧製藥工業的強力遊說，被迫制定限制使用激素的政策。八十年代後期，歐洲共同市場也禁止牲畜注射激素。但情勢逆轉，在1996年美國向國際貿易組織（WTO）投訴，抱怨歐洲拒絕進口激素牛肉。歐洲商會會長費希爾（Franz Fischler 是德國人）組織了一個激素肉品的農業科學會議，在會議中居然篡奪科學家的結論，總結出有五成的激素肉是安全的，真是不像話。

因為在1996年之前，反對激素牛的運動受到強烈支持，而且這個運動隨著瘋牛症、比利時毒雞（因為注射苯酸二氧和沙門氏菌）、基因食物（事實上，歐洲議會控制此類工場）等事件的發生，又和人們對食物鏈日益增加的焦慮感連接起來。1999年夏天，世界貿易組織有關農業貿易議題的最後期限到期，美國列了一長串歐洲農產品（羅克福特奶酪包括在內），並加稅到百分之百，為報復歐洲抵制激素肉的行動。這個結果對地方影響甚大，不僅是對羊酪生產者而已，根本牽連著整著拉閘客高原的農業存亡問題。

當我們喊著要砸掉在我們鎮上才建一半的的麥當勞時，人們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它的象徵性意義太強了。砸毀麥當勞行動是要求健康食物、農業工人反對跨國公司的行動。這個跨國工業的體質相當脆弱。我們分別將麥當勞的門框堆放在拖拉機、拖車上，然後遊街示眾。右派和民族主義者扭曲我們是反美國主義者，但是多數民眾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反對壟斷性全球食品生產的行動。

我進入監牢之後，從電視上看到國際聲援我們的行動，很多美國農民和環境運動者寄支票過來。

問題 6：你怎樣和其他土地的農民和農業生產者形成國際團結行動？

回答：八十年代就已經想過要組織歐洲層級的運動。當瑞士、奧地利、德國的農民連結冒起時，我們就不能故步自封。我們需要共同的架構，來應付完全讓農企業利益架空的歐洲農業政策。所以我們決定設立「歐洲農事合作」組織（Coordination Paysanne Europeenne），總部在布魯塞爾。因為通過這個組織，我們才和其他洲的農民有所聯繫。十年前，設立國際農民運動的想法產生了，於是誕生了「農民通路」國際組織（Via Campesina）。有許多不同性質的農民組織投入：南印度卡那塔卡省（Karnataka）的農民組織扮演重要的、激進的、直接行動的反對基因種子的鬥爭；他們有一千萬農民支持。另外，巴西的無地者農民運動，領導佃農佔領農地，他們有很重要的社會與教育計劃。在歐洲、北美、中南美洲、亞洲和非洲各有不同組織和計劃。目前，國際農民組織的執行體，以南美洲宏都拉斯為基地。我們準備在2002年移到亞洲。

問題 7：你和「農民通路」國際組織 (Via Campesina) 組織到西雅圖反抗世界貿易組織，你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批判是什麼？

回答：1986 年的關貿總協定(GATT)，將食物與農業帶入議程，這是農企業的一大勝利：沿著新自由主義貿易的路線，向前跨越一步來規範農業貿易和生產。很多國家的食物政策被限制了，他們被迫以有效的以較低關稅與份額，進口美國和歐洲的產品（掌握了全世界八成的食物）。1994 年馬拉喀什 (Marrakesh，摩洛哥首都) 協議決議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又將自由主義的農業貿易推進一步。現在其他國家只能以保護人們和牲口健康為理由，拒絕食物進口。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定由營養法典 (Codex Alimentarius) 食品工業鉅子採決，六成代表來自歐洲和美國。

西雅圖會議，期待將馬拉喀什協議的資產負債表當作會議的主題（當然，沒有出現！）我們需要的官方報告，承認南方國家是最大損失者：打開了大門，讓農企業摧毀南方國家的自給自足農業文化。舉個例子，南韓和菲律賓的稻米生產為自給自足的，現在他們被迫進口便宜的米，打擊這些地區的稻米生產。印度和巴基斯坦正被迫進口紡織布，對這些地方的小棉農而言，真是災難一場。巴西（主要農產品出產國），受營養不足折磨的人口逐年增加。跨國公司拿走一切，毫不把靠土地生存的龐大農業人口看在眼裡，更何況他們有能力養活自己。

問題 8：你們在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訴求為何？

回答：第一、每個國家有權把關稅提高，以保護他們的農業與食物資源，並且平衡城鄉差距。人們有基本權利在他們的區域生產食物，換言之，這是反對歐美農企業把廉價勞力和沒有環境管制的雞、豬場、溫室蔬菜等食品，取代原有生產地的食物。這些跨國工場並沒養活當地民眾，反而摧毀當地民眾，迫使小農離地。像巴西的情況就是很好的例子。

第二、我們必須對跨國公司進行「反傾銷」運動。因為跨國公司建立很好的手法要消滅小農文化。他們受到進口商和外國資金的資助，利用大量的媒體，將便宜但品質差的產品，像洪水般的席捲每個國家。一但小農被打垮了，他們再把食品價錢提高。像在非洲，歐洲大型肉品公司投下重資補貼凍肉市場，非洲牲口的飼養就是依賴跨國公司的需要生產。因此，取消進口食品補貼是向「平等貿易」(fair trade) 躍昇一步的策略。因為世界市場就會對農產品的真實價格做出反應。

第三、我們反對賦權於跨國公司對所有的活體（動植物）進行專利權。對地球而言，這是剝削的嚴重形式，是雙重的搶劫行爲。專利權被看成是新發明或新科技，而不是自然資源。基因種子非但是科技，也是六成化學公司的專利產品。這些公司為下一年的撥種，在全世界搜括種子，慘忍的掠奪農民的專利認證權。跨國基因公司計畫已經對生物多樣性主張毫不留情的進行攻擊。比如，亞洲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已經

發展培育出十四萬種的稻米，這些品種也已適應於地方品味和生長條件（長米、短米、高矮不一、品味不同、密度高、耐濕、耐熱）。跨國公司破壞自給自足農業，以密集基因、減少人工種植方式，只生產五種米。在一些亞洲國家（菲律賓和中國更糟），有三分之二的稻田讓五種基因米佔據了。

問題 9：你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回答：我們曾經和聯合國的國際貿易法庭（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的法官候選人查特爭吵過（這個法庭與國際人權法庭『International Court of Human Rights』是平行組織）。國際貿易法庭的一舉一動都應該公開化，讓不管是個人利益、團體、工會和國家都能夠把案子送進去。國際貿易法庭的角色，扮演著組織性任務，他們有權建議國際性的經濟條約，是否該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議程。凡是聯合國成員，不管是個人與集體權利，從衣食、健康、教育到住行都得由他們同意。這些基本權利硬搞進市場，那麼經濟性組織就該和國家一樣受到重視。這個東西和京都環境變遷協議是一樣的道理。

問題 10：可是京都環境變遷協議是個非常弱的判決？

回答：當然是，這我也同意。但總是需要時間。像國際戰犯法庭（International War Crimes Tribunal），也是花了近二十年才被四十個國家認可。面對多邊貿易，提問什麼組織架構是基本的要求。我們需要建立長期的全球視野，不要太天真浪漫。所以說一定平衡的力量是需要的。

問題 11：但是像你所屬的組織，曾經喊著與其改革倒不如關閉世界貿易組織。北方與南方的經驗，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否爭吵不休？

回答：「農民通路」組織的要求是「食物不要受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我們兩方面都同意「食物自足、食物安全、農民專利權」。對南方人民來說，食物自足權是抵抗進口農業的入侵。對我們北方人民而言，則是反對出口補貼和密集農業。所以說兩方面並沒有矛盾。我們可以展開不會損害農民利益的行動，不管這是巴西無地農的基因大豆種植、或者是我們才在去年一月幹的；讓南印度班加羅爾的農民，到法國傾倒基因米、或者有效的支援墨西哥扎葩思梯韃，我們的要求並沒有矛盾。當然，「農民通路」國際組織內部有不同觀點，從不同意見與經驗的交換，組織同是訓練又是辯論的形形色色的網絡。這才是真正的農民國際，也是把南方與北方搞在一起的活生生的例子。

問題 12：難道全球化運動，不該反對像北約大西洋軍事組織（NATO）、世界貿易組織

這樣的機構？

回答：這又更複雜了。不是說不反北約大西洋組織，而是在軍事衝突背後，正進行著經濟殖民的詭詐與毀滅性結構，此結構是通過世界貨幣組織和世界銀行運轉的（打開跨國公司的邊界、撤除公共服務、私有化等）。例如，九十年代中期，在薩拉熱窩（南斯拉夫中部城市，Sarajevo），有些已經除役的法國軍團，代表魏萬第（Vivendi, 原先是法國國家水利單位『Eaux de France』）跨國公司全心全力研究南斯拉夫的水路與建設。當科索沃戰爭結束了，跨國公司留下來重建波斯尼亞的基礎設施，現在是魏萬第這種私人資本運作薩拉熱窩的水路系統。從拉丁美洲、非洲、亞洲和其他地方，我們也看到這種宰制性經濟的形成。

我們當然需要痛斥單邊軍事強權，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但是，經濟霸權遠比這個重要。所以說與其圍繞著軍國主義，到不如趨向對特定衝突的反戰運動。在波斯灣戰爭期間，法國有很強的反海灣戰爭的運動，因為密特朗社會主義政黨對這個運動提出公訴，所以這個運動曾面臨困境。西方介入戰爭僅僅是為了石油的利益，所以反戰人士以西方國家鮮為廉恥為由，走上街頭。科索沃和波斯尼亞戰爭的情勢又更為難以理解。反戰陣營一分兩路，一派人認為北約大西洋組織不該介入戰爭，另一派人說米羅什維奇是腐敗、國家社會主義兼法西斯政權，是舊式史達林主義在塞爾維亞的復辟，北約該介入。人們知道接下來在科索沃多年的屠殺行動，所以有很多該採如何反抗與團結形式的討論。我的立場是，反對任何形式的軍事。戰爭一但爆發，是會死人的。所以我也反對美國轟炸阿富汗。

問題 13：你對影響左翼思考的法國共和論份子（republicanism Chevenement）提出的反全球化運動觀點是什麼？又如對英國的貝恩（Benn）的態度是什麼？

回答：當我於 2000 年一月，參加巴西阿雷格里港的反全球化會議時，共和論份子同時在法國電台展開公共辯論。這涉及到兩種不同的反全球化觀點。共和論份子他們認為民族國家應該是全球化的防禦土牆，應設法抵擋跨國資本。但我認為這是幻想。跨國公司、多邊投資協議和自由市場，已超越國家邊界運作成另一個層級。所以在這個脈落下，說我們可以有很強的民族國家做靠山，這是講不通的。他們提出保護人民的理由，是種慰藉式的海市蜃樓。當法國內政部長提出限制移民的移民政策時，連帶也將基本自由人權運作也廢除了。北方與南方人民的不平等關係，即時把邊界關閉，也解決不了基本問題，反而讓移民問題堆向危險。

問題 14：美國是不是在多邊協議的關係上，唯一不讓削減其力量的民族國家？

回答：當然！美國完全控制國際貨幣組織與世界銀行，在安全理事會上他放一個屁，別國也不敢吭聲。美國政府只不過是大財閥的御用工具。美國政府的功能只簡化成，

依賴大型企業的利益罷了！拿布希與高爾的選戰來說，人們很難做出選擇，因為是半斤八兩。反倒是綠黨候選人奈達的戰情，反應了美國政治的真實情況。候選人的產生，是有效地由金融與工業集團推選出，代表他們的利益。這個系統全然服役於金剛不敗的自由經濟利益。這在美國聯邦政府的層級上就很清楚的顯現出來了：跨國公司直接操作州政府機器。中央政府的功能像是起動機，用意識型態與憲法的形式支持州政府運作。但是，擴大成新自由主義層級，就不是只有美國所能維持的。在世界貿易組織裡，邊界打開了，裡頭有歐洲、美國的右翼和社會民主黨。但是，在歐洲，現任歐洲商會理事長拉米（Pascal Lamy 法國社會主義黨成員）（其繼承人布里丹 Leon Brittain 英國保守派）的立場也是半斤八兩。今天到處都是壟罩著「自由主義萬歲！」這口號。我們應很有耐心的緊盯著我們各個國家內部的敵人，而不是只注意國際明星與政客。

問題 15：法國社會主義黨喬斯潘當上總理後（喬斯潘在年五月讓民族陣線勒潘打敗了），允諾要比布來爾（Blair，英國首相）或是史若德（Schroder，德國總統，聯邦總理。）更為基進的路線。你的評價如何？

回答：可怕的是，不管左派（如果社會主義黨有幸稱為左的話！）或是右派政黨上台，他們的經濟方案差異不大。例如，縮短工時並沒有明確實施，只是在每個不同工場或部門內部互相讓步妥協。他們將採取中間立場，因為大選將近。也可能會進一步吸納左派票倉，所以做出對自主運動感興趣的秀。但並不是說說而已！他們對自主運動並沒有任何政策方案。在多哈（Doha）的世界貿易組織會議上，法國政府是跟在歐洲市場屁股後面。2002年五月的大選是場廢票率指數的選戰。很多民眾對左翼政權感到失望。他們並不認同這些左翼的候選人。在第一回合選戰裡，左派的票會減少。席拉克和鳩思平並沒有提供另類方案讓人民選擇。他們的社會遠見差距不遠。這個社會情勢是經濟邏輯逐漸升高，並朝向高於政治意志的狀態。政黨領導人只是為優勢的一方充做調解人。我們的組織不幫任何政黨，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該投誰。

問題 16：可是你在總統大選中，已經有你的立場了嗎！

回答：從來沒有！我的角色志不在此，何況我們的組織是不站立場的。放話的人是丹尼爾（Daniel Cohn-Bendit）（他目前是法國綠黨 Les Verts 的歐洲議會議員，這個人很特殊，德法混血而有雙重國籍，68年巴黎五月學運領導人，之前是德國綠黨的歐洲議會議員，底下是他網站 <http://www.cohn-bendit.org/>），西雅圖抗議之後，社會主義黨又重申了我的立場。他們的目的是要讓社會運動分裂，把我們當作是蹦跳床，助他們一把去當他們的狗官。說的明白一點，他們是披著兔皮的狼，他們並沒有自己的自主運動的邏輯，卻在已建立好自主運動的政治場域中扮演反對派勢力。

我的行為從不像政黨領導人，或職業政客一樣，對人民不負責任。社會運動或我們的聯合體是能夠讓人民自己代表自己。現今的經濟體系是法律保障的獨立機體，假設我們要創造新的政治的話，就應該對這情勢有所理解。

問題 17：你在今年夏天到了以色列佔領的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農民一起抗議以色列的佔領行為。你從這個情勢中學到什麼？

回答：第一：我經驗到以色列以武力佔領巴勒斯坦，真是一點都不假的軍事殖民主義！以色列正在佔領區和在以色列內的阿拉伯人施以種族隔離政策。他們同時採用一系列新自由主義配套措施，通過剝削巴基斯坦廉價勞力，意圖將中東和全球生產巡迴旅行團合為一體。沿著佔領區邊界，我看到了和中墨自由貿易邊界一樣的自由貿易生產區。所以這個衝突裡，有很嚴重的經濟成分。聯合國需要建立解決方案。但也需要以基進的觀點，重新將經濟層面的問題聯繫起來，才能提供巴基斯坦人獨立發展的未來。

問題 18：金融時報曾經得意洋洋的宣告，911 事件已把反全球化運動逼向牆角。你如何評估，恐怖份子攻擊美國，改變了一切嗎？

回答：一點都沒有改變！世界情勢一如往常，反全球化運動也照樣進行。我們看到美國國內宣傳媒體醞釀出兵的需要。這個戰爭的目標讓無辜的人民遭受報復，他們已經飽受各種苦難折磨。轟炸阿富汗只對世界帶來不穩定。美國盯緊前蘇聯的中亞國家的石油利益，想要在石油暨經濟發展組織國（OPEC，以西歐和北美等國為主）之外，建立不受其控制唯一石油受益國。所以我們的主張是：「向塔裡幫說不！向恐怖主義說不！向戰爭說不！」。

我們也在經濟危機中，也看到新意識產生了。他們對經濟管制與公眾介入的需求提高了。我們多年來所建立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自 911 事件之後更為令人信服。但對那些簽署支持戰爭的國家，他們以為這是新自由主義的擴張，可以解決不同國家和社會既成的不平等關係。他們腦袋不清，911 事件恰好是讓人民清算這些簽署國之國內既存的社會和意識型態，並要求基進改革。這些國家反而尋求國際擴張，逐步升高與蔓延國際衝突。當新自由主義增加世界的苦難時，正好擴大受苦的人，採狂熱自殺性行動攻擊新自由主義。



後現代態度與後現代左派

汪立峽

自馬克思以來百多年裡反反復復而現在又再次熱烈起來的理想主義和自由主義，普遍主義和多元主義的爭論，在很大的程度上同後現代思潮脫不了關係。

在台灣，人們喜歡把普遍主義叫作“普世價值”，而且常常將多元主義和普遍主義攪和在一塊兒，混然不覺二者經常處在對立狀態。

屢見不鮮一種怪現象是：當台灣的民主和人權狀況遭人訕笑時，當權者和幫閒文化立即搬出“多元主義”自我化解；當對付別人時，又將民主和人權說成是“普世價值”自我抬高。

爲什麼會這樣呢？

按道理後現代思潮極力突出多元主義價值，不遺餘力反對普遍主義是其題中應有之義，可是在這裡卻看不到後現代左派對普遍主義的論調作過什麼揭露和批判。

意識形態帝國主義

台灣當權者和學界中人，每當提到“普世價值”或普遍主義之時，好像老在說給美國人聽，意思是：“我們是一國的”。

美國人同樣喜歡高唱多元主義和普遍主義，而且同樣打馬虎眼將二者含混使用。不過，當美國人使用“普遍主義”一詞時，通常是暗示或明示存在著某種人類一直追尋的，放諸四海而皆准，適用於一切社會和民族的政治經濟制度，並且認爲哪一個社會或民族對此持有異議，他，美國就有權進行干涉。忽然之間，強調尊重多樣性、歧義性的多元文化主義就被擱諸腦後了。

很明顯，美國的普遍主義漠視、憎惡和敵視任何由於歷史原因而形成的民族與文化特殊性，鼓吹一種人爲“理性”設計的反歷史、超歷史政治經濟理論的“唯一正確”，以及這種理論的霸權和壟斷地位。易言之，就是意識形態帝國主義。

後現代態度之所以對美國這種反歷史的抽象普遍主義喪失批判能力，根源在於後現代主義歷史觀深信人類由於個體視野的限制，人們對歷史各有不同看法，從而就無法與他人分享共同的意義而只能是自說自話，連一切作品也都成了因人而異有待解讀的所謂“文本”。後現代左派武斷地指出：人類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同經驗。既然如此，可以想見，如果特殊的歷史局限使理解他人成爲不可能，那麼理解自己也將成爲

不可能。正是在此處，後現代歷史觀同美國史觀一樣否定了歷史具有普遍性。其實這也就是後現代態度反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原因。然而，根據後現代的多元價值理論，理當反對一切普遍立麼面對美國主張的抽象普遍主義就不能貫徹而手軟了呢？

後現代態度之一：也就“唯一正確”

不能說後現代理論對“現代性”（包括反中心，反邏各斯、反唯理性論、反權威，強調特殊性、多樣性、多元性、主觀性，等等）的批判和“解構”對當代毫無貢獻，至少在對抗資本全球化所形塑的“同質文化”上，在破除傳統形而上普遍主義的“元敘事”（或稱“大敘事”）上，仍是一種值得稱道的論述武器。

不過，有必要指出的是，後現代態度本質上的“虛無”和“無所謂”能否有效承擔這種抵抗的重責大任，著實令人起疑。

在後現代左派看來，任何東西都是不確定的，連同自己也是這樣。唯一實在的只是“解構再解構”。他們給人的感覺常是：不嚴肅。不過，對他們來說“不嚴肅”正是當代生活的真實狀態，他們不過反映“真實”而已。

儘管後現代左派對世界被搞成這個樣子不太滿意，但決不是本來意義上的批判態度，而是接受這個世界的荒謬性並且按照荒謬把它進一步徹底荒謬化。以便在失去意義中獲得些許快樂。

人們在許多時候會發覺後現代“解構”論述或許在很大程度上孕育了“去中心”的情緒，然而，提供的卻只是一種軟弱的反抗。後現代左派不是正面迎擊美國普遍主義的權威，而是使用一種“游移不定”的論述策略斷喪了任何確定的意義。以這種鬆弛的形式怎能對抗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強大的攻勢？

其實，對後現代態度來說，更致命的是在有意無意之間，常將“特殊性”作為一個“普遍主義”的主張予以提倡。後現代左派認為誰要是否認多元主義價值誰就是該受譴責的強權和專制。換言之，這種對“特殊性”和“多元性”的偏好說到底還是一種普遍主義反對另一種普遍主義，自身依然是“唯一正確”。

後現代態度之二：不准生氣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到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從尼采、海德格到當代女性主義（左翼）和綠黨，從毛派、托派到無政府主義，都已經狠狠批鬥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弊病，但這些都是義憤填膺“路見不平一聲吼”的批判，不是後現代態度。在後現代左派看來，現代人並不喜歡犧牲，“犧牲”這個概念不合現代人的脾明，那是屬於“過去的”的風格和熱情。現代人對現狀不滿意就只能表達為不生氣的自我嘲諷或搞笑戲謔（如果生氣那就不後現代了）。這種“無理想的批判”才是後現代的態度。

後現代態度有一種奇特本事，可以把一切生活現象和生命情慾，都弄成很搞笑的

事情，理想主義似乎還有那一點兒，只不過退化為淡得不能再淡的背景，“我”字掛帥成為新的風景，可是這個“我”也必須成為搞笑對象，才算貫徹了“解構”。

“解構”可說是在後現代左派的不二法門，手法可以各式各樣，諸如多義化、歧義化、誤讀、反諷、顛覆、挪用、戲謔、無厘頭…等等。對他們來說，有現代社會就會有後現代態度，人們無須讀福柯和德里達也會成為後現代群眾。他們給這些群眾都發了“自由證書”，於是就不再有嚴格意義上的“革命”了，一切胡搞瞎拚都是合理的。

後現代態度之三：我說的都不算數

誰能夠對後現代左派批判呢？誰都辦不到。後任到核心理論認為並不存在任何普遍的價值，只存在著最終是無意義的“特殊性”，“多樣性”、“歧義性”。倘若真如後現代左派所說沒有普遍的人性，也不存在人類生存的共同目標，那麼歷史將成為一句空話；如果人類經驗真的缺乏共同一致的東西，意識也將無由存在，生活只剩下零亂的碎片。在這一層意義上，後現代史觀同美國帝國主義史觀是一致的：即宣布“歷史終結了”，所不同的只不過是從相反的方向作出了相同的結論。

後現代態度在理論上的一個更大疑難是，如果人們否認存在著主觀喜好之外的行為準則，結果只會是狹隘排外和自自膨脹（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僅僅依賴後現代思想和自由主義的“寬容”說教是不可能防範社會失序的。後現代左派和自由主義者都強調人類有限的理性能力不可能為別人的命運做主，認為以理想主義來規劃社會和人，最終只會是“通向奴役之路”。然而，誰又能否認“理想”不僅僅是一批人相聚的理由，同時“理想”還暗示了現實社會的匱乏、不平等、未完成的狀態，以及改造的必要。就是說，理想主義和歷史普遍主義可以轉換成一種動能。

其實，請這些話在很大程度上是多餘的，因為後現代態度到頭來是不清不白的，有一種跡象是這樣的：後現代左派不會真的去批判右派，也不會真的去批判馬克思主義左派，而是笑話它們，如果有人要求他們“給予說法”，那麼他們就笑話自己。他們會對你說：我是“當下”的左派，一閃而逝，我說的都不算數。

辯證法的啓示：一與多的關係

細心的讀者可以從以上的論述中，發現筆者已對普遍主義作了二類區分：一是歷史的、具體的普遍主義，一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普遍主義。前者承認在歷史中，或說在特定的歷史過程中，存在著相當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存在著歷史內在的普遍規律。後者堅持只有一種經過“理性”設計的最優方案可以為普遍準則，否定任何由於歷史原因而形成的民族與文化的特殊性與多元性，尤其反對有歷史規律的存在。

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歷史普遍主義相信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對立統一關係，二者既對抗又同一，而不是孤立的和絕對的存在。抽象普遍主義則相反，認為像美國這樣

的國家被賦與了一項在全球推行民主和人權的政治使命，其他文明和文化應該放棄他們的特殊性，融入美國設計的具有普遍性的最優政治方案之中，並且徹底否定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具有對立統一的關係，堅持二者是水火不容的存在，所謂“多元文化”只有在接受美國“普世價值”的前提下，才被允許存在。

但是，歷史普遍主義堅信人類在多元文化併存中，具有各自向上提升的共同目標，一個以多種形式表現的更高目標。

★

台灣「少年仔」如何罵陳映真

——游勝冠兩篇文章的剖析

呂正惠

一、

有一天，一位藝文界的朋友從台中辦事回來，氣沖沖的打電話質問我：「你怎麼會教出游勝冠這種學生？」原來，他偶然看到十二月十日《台灣日報》副刊上游勝冠（他現在已是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的副教授）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台灣良心 VS 中國良心——我看陳映真〉。我的朋友說，游勝冠對陳映真的批評，簡直莫名其妙。他說：你以前到底是怎麼跟游勝冠講陳映真的？他在電話裡至少花了半小時以上脾氣和牢騷。

第二天，朋友把剪報傳真給我，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此前不久，南方朔因為讀了陳映真近期三篇小說新作，有感而發，在中時副刊寫了〈蹣跚的老靈魂——陳映真〉。他說，像陳映真這樣的台灣頂級作家，因為不符「政治正確」的標準，未能獲得各種文藝獎項，證明「台灣對待文學一如對待政治，甚至比政治還要惡質。」這種「評論」，游勝冠當然「不爽」，除了發出異論之外，還列舉了一些他現在反對陳映真的理由。

我把這篇文章讀了一遍，覺得又好氣又好笑。說實在的，我認為游勝冠本人的見識無論如何不至於低到他的文章所表現的那種程度。若是如其文之所言，真是不值識者一哂。於是我文章丟開，忙其他事情去了。

事有湊巧，元月七日我到學校餐廳吃飯，剛好桌上有一份《台灣日報》，隨手拿來翻閱，竟又在副刊發現游勝冠另一文章〈中國的雪悲哀的落著〉。這個奇異的題目

吸引我讀下去。憑良心講，這篇文章完全不同於前文，寫得極「高妙」——但仍然是罵陳映真的。不過，也就是這篇文章讓我真正生氣了——十年前還具有鄉土樸實氣息青年，現在居然也學了以「狡獪」的文筆入人於罪了。

整個下午我心情壞透了，一直在想，游勝冠爲什麼要連寫這兩篇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毀謗陳映真的文章？

第一篇的荒唐論述要點有二：首先，游勝冠說「陳映真的文學成就之高，在文學界所享的地位之尊貴，根本不需文學獎錦上添花。」這真是「王顧左右」了。誰都知道，現在台灣最尊榮的文學獎、文化獎都是「成就獎」，而自從民進黨執政以後，這些獎項常常（不是全部）是「酬庸」的。這是南方朔（以及南方朔所引述的林懷民）感嘆之所在。游勝冠會不知道南方朔的言外之意嗎？其實這只是第三者的不平之鳴，陳映真本人根本不作此想。據我所知，國家文藝獎兩次有人推薦他，主辦單位行文問他是否同意參選（也許包括提供資料），他都不予回覆。

游勝冠的第二論點其實才是他抨擊陳映真的重點。他說，自從穿梭於兩岸之後，陳映真的「民族大義逐漸壓過知識分子的風骨與人道精神」。他「擁抱中南海的當權者，享受中共官方所給予的榮耀、利益」，「成爲只會歌功頌德的右翼知識分子」。他不曾「對中共打壓人權的作爲發過一聲批評」，「何嘗像他早期在台灣發表的小說一樣，爲可能正被跨國公司壓迫的中國人民說過一句話」？爲什麼陳映真可以是「台灣良心」，而不能同時是「中國良心」？

這是台獨派惡意攻訐台灣左統派的標準模式，只不過陳映真作爲左統派的「象徵」，更常被當作箭靶而已。其主要論點有二：一、依附中共權勢，謀取榮耀與利益，二、爲了中國民族主義，喪失了人權關懷與人道精神。

第一點最不值得一駁。誰都知道，台灣左統派日子很難過。台灣另有一種「政客統派」，從大陸面見某些大人物回台灣之後就「傳述」訊息，似乎他是「代理人」；誰都知道左統派沒幹過這種事。左統派在台灣既無錢、又無勢，搞活動都是自己捐錢，到大陸去也是自己出錢。如果偶然一些儀節性的會見就可以算是獲取「榮耀、利益」的話，那真是讓我們自己「見笑」（不好意思），因爲我們實在「什麼都沒有得到」。如果別人這樣批評，我會認爲他們不是無知就是惡意，不必理會。游勝冠這樣講只會讓我生氣，因爲這一些他聽我講過一些，也看過我（以及和陳映真）的一些行事，居然還刻意如此評說。那麼，他意欲何爲？

再說到陳映真個人。六十年代陳映真因他的社會主義理想而被國民黨關押七年，七十年代出獄以後長期生活在再度被捕的陰影之下，八十年代以後因堅持左統立場而被他許多過去的「信徒」所拋棄，成爲「蹣跚的老靈魂」。相對來講，現在一些被台

獨派尊寵為「大老」的人，六十年代在做什麼，七十年代又做了什麼事，台獨派文人自己都很清楚。但是，我們從來不敢「苛責」他們；而他們，以及七十年代曾經信服過陳映真的現在的台獨派，也從來不敢懷疑陳映真的「人品」，而只批評他的理念。只有陳芳明一流人物，以及較年輕的不懂事的台獨派，才會抨擊陳映真依附權勢、謀取榮耀與利益等等。這樣的「惡意毀謗」只足以照見這些批評者本身的靈魂而已。

至於陳映真「穿梭兩岸」所得到的「利益」，我個人的了解是這樣的：他所開過的車子，全都是朋友或賣或送給他的破舊的二手貨，用過一陣即被迫廢棄，中間「缺貨」時，夫妻兩人即以一輛破舊的摩托車代步（現在就是如此）。據我旁敲側擊所知，他每個月的固定收入，約略等於正教授的半數（從我跟他生活的形態來比較）。他所經營的人間出版社，從來沒有賺過錢，都是靠他幾個兄弟在支撐。我偶然提了一大袋新買的書或CD去看他的時候，都會因為自己亂花錢而內心有些不安。對陳映真的生活狀態並非一無所知的游勝冠可以講得出這種批評，真讓我感到傷心。

說到陳映真或左統派基於中國民族主義而不敢表現「中國良心」，我可以舉一件最讓我們傷心的事。台灣的資本家在台灣惡性關廠，不給予或只給極少遣散費，置台灣工人於不顧；到大陸開廠，又以從前日本人在台灣「管訓」台灣工人的方式變本加厲的施之於大陸工人。這種情形台灣記者並非不知道，但我們在台灣的報紙上往往只看到某個台商被搶、被殺的大篇幅報導。我們可以大膽斷言，最為苛待大陸工人的都是台商。左統派的任何言論，幾乎無法上到台灣的公眾媒體。如果我們具體舉發這些事件，台灣媒體會以什麼「角度」報導呢？至於說在大陸，我個人知道林書揚和陳映真都曾做過一些同時合乎游勝冠所謂「中國良心」和「台灣良心」的事。這些當然沒有必要公開出來。

我們通常都從歷史、文化角度批評台獨派各種論述的「錯誤」，而不太涉及他們的人品和行為模式。如果要按游勝冠這種推理方式，我們也可以指出：號稱「愛台灣」、「關懷台灣人民」的台獨派文化人，面對今天台灣的經濟劣勢及中、下層嚴重的失業問題時，就只能說：這些都是國民黨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不要忘記這裡面有李登輝執政的十年）、或者這都是因為反對黨的蓄意杯葛以致民進黨不能有所作為、或者這都是因為大陸把台灣的資金吸去了。至於民進黨政策明顯的偏袒資本家（這跟國民黨並無二致）、民進黨內部的腐敗和無能、以及民進黨以意識形態面對經濟難題，這些都只能讓反對黨去批評，以進一步「落實」反對者的「惡劣態度」。除了「獨立」、「尊嚴」這些「台灣民族主義」的大政之外，講這種話的台獨派文人，是否還真正關心「人民」的生活呢？按其邏輯來講，這是否為了「民族主義」而放棄另外一種「台灣良心」而成為「右翼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呢？

我們也可以體會這些文人的「困難」。獨立的力量還不夠雄厚，爲了維護它的存在，只好作出某種「犧牲」。我們基本上並不疾言厲色的把這種態度稱爲「右翼」，而只會攻擊他們的「右翼的種族主義」，或者過度的袒護資方。當然，我們不敢否認在目前的兩岸僵局之下，台灣左統派發言的特殊空間，更不會因爲有人罵我們是「右翼」，我們就授人以柄。我們沒有那麼「傻」。至於到底誰比誰「更右」，那就請別人瞧瞧看吧！

不過，這裡不妨簡單談一下我們長期以來的思考方向，這當然絕不會是如游勝冠所說的「中共打壓人權的作爲」，以及別人也許會提到的對所謂「疆獨」、「藏獨」的打擊。這種邏輯原本就是西方（特別是美國）「妖魔化」中國的策略之一，我們當然沒有「責任」依此行事，以順別人的心意。

我們的主要想法是這樣的：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策略到底如何，會不會出問題？近期特別重要的是，開發大西北的大計劃能不能圓滿實現？不過，我們更憂心的是：在整體性的、大幅度的經濟發展中，雖然無法避免貧富不均的現象，但所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底體現了哪些社會主義的「最基本的精神」？這些又體現在什麼地方？憑良心講，這兩個大問題我們連「了解」的能力都還不夠。就「左派」的立場來看，第二個問題尤其重要。也許已經到了至少應該在台灣討論這些問題的時機。已在元月中出刊的這一期的《人間叢刊》《因爲是祖國的緣故……》就是經由陳映真策劃的第一次嘗試，這樣的工作我們在將來還要在能力範圍內陸續進行。總的說來，如果台獨派還要批評我們不具「中國良心」，那就讓他們去說個痛快，我們沒有義務按他們要求的「方式」去關心（或批評）中國，以贏得他們的「歡心」。

二、

游勝冠第二篇文章就寫得曲折而高明得多，在委婉的抒情筆調下隱藏了銳利的刀鋒。我先重點指明他的「作意」，再來分析他的巧妙的「用心」。

首先，游勝冠鈔錄一段鍾理和傷感的日記，以表明鍾理和對二戰之後中國前途的憂心，而憂心裡也有對當權者的批判。接著游勝冠就批評，陳映真竟然不能體會鍾理和作爲中國人「對中國的深切而焦慮的愛」，而苛責鍾理和帶著被殖民知識分子的「劣等感」，「用『殖民地』這個本質有罪的雜質將他排除於純淨的中國人之外」。

游勝冠再往下的「推論」就更「高妙」了，我直接抄原文：「陳映真反獨的神經是太過敏感了……這種只看立場、不問是非的獨斷態度，其實很傷『民族情感』，二二八事件前後，中國政權也用類似的兩面手法處理台灣人當時的認同困惑與對政治腐敗的不滿，一方面用柔軟的聲調勸說台灣人接受他們已是中國人的認同，一方面疾言厲色將台灣人的被殖民『原罪化』，不直接負起弄得天怒人怨的政治責任。」這

樣，一輩子反對國民黨的陳映真，竟然跟國民黨是「一丘之貉」的中國人了。

在我看來，游勝冠這篇文章的「主題思想」是前面所抄錄那一大段話的結語。他說：

為了推卸中國應負的責任，又任意質疑台灣人民族忠誠度的做法，難道不也是戰後對立於中國的台灣主體意識所以萌生、茁壯的主因嗎？

按他的行文脈絡與推理邏輯來說，「中國人」自己不考慮自己的「問題」，而只「要求台灣人認同中國」從而懷疑「台灣人的忠誠度」，這就是「台灣主體性」意識產生的主要原因。在這方面，陳映真對鍾理和的批評也反映了這種心態。在這種結論的「映照」下，本文的題目「中國的雪悲哀的落著」就充滿了曖昧性，似乎「同情中國」，但又暗示了對「中國」的藐視，讓充滿了「主體意識」的「台灣人」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感覺」。

對於游勝冠這種「論證邏輯」，我想從最核心的一點來加以反駁，即所謂「中國」在戰後對待台灣人的態度。在這方面，游勝冠企圖把當時國民黨的「惡政」和「中國人」加以混淆。

抗戰勝利，國、共內戰爆發時，國民黨的軍隊總數超過二百五十萬，是共產黨軍隊人數的兩倍多，在武器、裝備和運輸能力上更占有明顯的優勢；而且，國民黨對所有的大城市、全部工業基地、以及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擁有領導權（《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八四一頁，中國社科，一九九四）從整體形勢來看，國民黨穩贏不輸，所以蔣介石敢於悍然挑起內戰。但是，在四年之內，竟然以共產黨出人意料（包括共黨自己在內）的大勝突然結束，這中間的關鍵就在於「民心」，國民黨大失民心，從而輸掉了天下。

抗戰結束後，國民黨失掉民心的第一步就是所謂的「接收」。在這方面，我們還是引用台灣讀者也許比較願意相信的《劍橋中華民國史》的論述。它說：「隨著官員的復員和接收過程的發展，接收這個詞轉為通用的同形異義詞，其意義轉變為搶劫或掠奪……根據流行的說法，這種人（按指接收大員）所關心的是五子，即條子（指黃金）、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關於官員接收時對「淪陷區」人民的態度，同書又說，他們以「恩人」的態度自居，而且「在接收台灣和滿洲時表現得尤為明顯」。這引發了台灣的二、二八事件，而在東北，「都在傳說，除非所有想叛亂的人都干脆投到共產黨一邊，否則那裡日後也要爆發一場叛亂。」

而且，國民黨要求「淪陷區」的教師和學生接受「再教育」，「那些在佔領期間已從學院、大學和中學畢業的學生，必須通過書面考試才能保留其畢業資格。教師也

要通過旨在測試其對國民黨的了解和忠誠度的種種考試」。這種「污名」和「恥辱」性的政策，當然引起了「淪陷區」人民的勃然大怒（以上見前引書八四三～五頁）。

在這種背景下，當四七年二月台灣發生反國民黨的事變時，除了國民黨黨營媒體，所有大陸的報刊、雜誌都大力抨擊國民黨，沒有人相信「台灣人受到奴化教育影響」的「謾言」，因為所有受到、看到、聽到「接收」之事的人，無不對國民黨的「違法亂紀」的種種作為充滿憤怒。這是國民黨在戰後喪失民心的整體過程的第一波。

不過，台獨派當然不用這種角度來「理解」歷史。不論他們對中國現代史或國、共內戰史了解多少，他們總樂於簡單推論說，既然國民黨代表「中國」來接收台灣，國民黨的態度就是整體中國人的態度。在這裡我們只簡單指出，在二、二八事件前後，不知有多少在台外省人一直在和台灣人共同反對國民黨；同時也要指出，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的精英知識圈大半左傾而支持共產黨，所以才會在五〇年前後的白色大整肅中犧牲慘重。台獨派從來不願意哪怕只提一下這些「史實」。

游勝冠雖然也承襲了這一類型的說法，但在文章寫作的「設計」上卻更巧妙。他先從陳映真對鍾理和〈夾竹桃〉的批評入手，由此證明陳映真「中國意識」的心態非常狹窄，和國民黨並無二致，從而達到「中國人」對待「台灣人」的態度大有問題的結論。其實，游勝冠對陳映真文章的解讀完全是斷章取義和惡意扭曲，必須嚴正的加以指明。

七十年代台灣本土文學「再發現」的熱潮中，楊逵和鍾理和是最受重視的兩個作家。當時有關鍾理和的介紹和評論不少，但首先涉及鍾理和作品中極為複雜的「中國意識」問題的，無疑的當數張良澤〈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一九七四）一文。當時張良澤還持「中國」立場，他從鍾理和的「原鄉意識」入手，仔細的爬梳鍾理和「祖國經驗」的作品資料。他了解到鍾理和在〈門〉和〈夾竹桃〉等小說中對「中國人」有許多嚴厲的批評，但仍然認為，鍾理和是「表現強烈的民族精神」的作家。張良澤這篇文章，就資料的完整性而言，到現在仍然有參考價值。不過，就立論而言，這篇文章顯得「四平八穩」，把其中涉及的問題留待別人更深入去申論。

首先點出鍾理和「祖國經驗」中的「認同危機」的，其實就是游勝冠所大力抨擊的陳映真的〈原鄉人的失落——試評「夾竹桃」〉（一九七七）。陳映真相當仔細的分析了〈夾竹桃〉如何描寫北京的大雜院（可以說是「中國現況」的象徵），最後指出，小說中的台灣人曾思勉（代表鍾理和）以「旁觀的」、「犬儒的」態度，「懨懨然欲自外於自己的民族和民族命運」。陳映真分析了鍾理和如何從「原鄉人」的民族血緣感情中疏離出來，漠然於自己民族同胞的貧窮與苦難。陳映真又說，這是「殖民地喪失了自信的知識分子」受殖民者影響，扭曲的看待自己民族的一種方式。

從歷史、文化的角度來分析鍾理和某些作品所呈現的「認同危機」所以產生的原因，從民族的以及人民的立場來指出其盲點，就這兩點而言，陳映真這篇文章至今仍是鍾理和評論中極有見解而仍然值得參考的。以日據時代的小說而言，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男主角陳有三對「本島同胞」的藐視，就完全等同於曾思勉對北京大雜院的看法。這證明，陳映真所指出的現象，是殖民地文學中相對於「反抗」成分的另一種較消極的、值得反省的成分。

這是就陳映真文章的「洞見」而言。如果要談到「作家批評」的完整性而言，陳映真的文章是有其缺陷的。由於鍾理和先後住在瀋陽和北京，都是「淪陷區」，在這裡，「台灣人」的身份是相當敏感的，這可能影響了鍾理和和當地人的密切交往。再加上鍾理和身處異鄉、既貧困、又孤獨，這也可能影響他的心境。如果把這兩種因素考慮進去，那麼，陳映真的批評語氣也許會有所不同。陳映真後來在談及他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所寫的文學評論時曾自我批評說，「在某些觀點和分析上」犯了「庸俗化、簡單化和教條主義」的錯誤。這雖然有些自謙，但多少也有些實情。

不過，這絕不如游勝冠所說的那般冷酷，那般以民族大義將鍾理和「排除於純淨的中國人之外」。我們試看其中的兩段文字：

鍾理和的一生，代表著那個時代知識份子一生的歷程。鍾理和的民族感情，也是一定歷史過程下的產物，具有重大意義。他代表了在光復前後的一部份台灣省知識份子的個人痛苦的心靈的歷程。

這是一種歷史的理解與同情，哪裡像游勝冠所說的那種「純淨」式的「排除」。至於像「用『殖民地』這個本質有罪的雜質將他排除於……」這樣的「行文」，只能稱之為「惡意的毀謗」。如果陳映真真是如此，那他如何面對如賴和、楊逵、呂赫若、朱點人等許許多多的「抗日」台灣作家？又如何面對他的在殖民地成長的父親？陳映真在文中即將結束時又說：

我們的批判，是針對鍾理和的一部份作品中的一部份思想而發，卻無絲毫的損折於對鍾理和做為一個人、一個藝術家的敬意。他以可敬的堅毅正直忍受一生難以置信的惡運；他對文藝工作不渝的忠謹和辛勤的工作；他為整個五十年代的台灣農村留下珍貴的記錄，特別是做為一個殖民地的孩子，他心靈所受的，歪曲的痛苦，都引起我們對他深刻的懷思。

這樣努力全面考慮鍾理和一生的成就，強調自己的「批判」只是「一部份」中的「一部份」的陳映真，真如游勝冠所說的表現出「只看立場、不問是非的獨斷態度」嗎？我實在搞不清楚，到底誰在「獨斷」了？

陳映真批評鍾理和的這一篇文章，台獨派一直是非常在意的，這當然有其背景。一九七七年五月，葉石濤在《夏潮》雜誌十四期發表了〈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這是七〇年代鄉土文學陣營第一次透露出建立「台灣文學自主性」的要求。雖然葉石濤措詞謹慎，陳映真還是敏銳地感覺到了。他馬上在六月號的《台灣文藝》革新號二期上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加以回應，儘可能委婉的指出文中的「分離主義」傾向。接著，八月號又在《現代文學》復刊第一期發表〈原鄉人的失落〉。按文末所記，本文雖然寫於四月，但因問世時間的連續性，理所當然的可以視作陳映真對「自主論」的第二次回應。在指出鍾理和的民族認同危機以後，陳映真寫下了這一段話：

但是，這絕不是一個孤立的、特殊的案例。當殖民地的知識分子，被殖民者所給予的「現代」教育開啟了智慧以後，他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自己祖國的殘破和落後，自己同胞的「貧困和無知……」。於是有一部份人拚命地使用殖民者的語言，穿著殖民者的服飾，模仿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一切的文化，卑視和輕賤自己的同胞，一意要按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一直到今天，我們看見多少人在國內、國外，表現出這種民族自我認同的失落。

陳映真這一段話當然不一定是指當時還在「潛在」發展的台獨派（因為也可以指海外的另一種人），不過，他們看了一定很不舒服、甚至很生氣。從八〇年代開始的統、獨大論戰中，陳映真一直堅持這種「左」的（同情落後地區的人民）、民族主義的立場。

也許有人會認為，陳映真堅持以「民族大義」來責備分離主義者，這作法相當僵硬。我以前多少也這樣認為，但現在卻逐漸相信，實情並非如此。我根據自己與台獨派的朋友相處的經驗，覺得他們之中某一部份人（我鄭重聲明，不是全部）的某一種議論連我都無法忍受。他們似乎在暗示，中國人是一種劣等民族，永遠腐化和落後。我覺得，即使你不認為你是「中國人」，你也不應該這麼藐視「我們中國人」。這種人正是以「已開發文明」的立場去藐視「落後國家」，這絕對是一種向殖民者或資本主義傾斜的「右」的立場。我現在認為，陳映真的批評的話應該如此解讀。

不過，我也必須趕緊說，在我看過的批評陳映真的台獨派中，一般我都不太會生氣，因為，我覺得，他們似乎在對陳映真那種「獨特的道德觀點」表示憤怒。他們並沒有誣蔑陳映真的人格（擁抱權勢等等），也沒有惡意扭曲陳映真的意思（殖民地本質有罪等等）。在這之前，我只看過陳芳明有意如此行文，現在，我又看到游勝冠似乎在?陳芳明的後塵，並且有變本加厲之勢。既然如此，那就讓他去吧！

"理直氣壯"因何而生？ (二)

——回應〈當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何六九

二·重估漢人的民族革命

國民黨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官方歷史教科書，都把大清王朝的覆亡解釋成爲是一場民族革命的結果。特別是國民黨方面，數十年來不停地說，孫文領導同盟會在武昌發動起義，一舉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這種說法不盡符合史實，甚至於可以說大部分違背史實。一般把教科書和無數印刷品上的這些說法當做真理看待；在先入爲主的影響之下，以致於不易明白早期和當前漢族民族主義的真正性質。有必要在此對於這場“民族革命”做一個簡略的再思考。

不知所措的革命家

根據孫文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的說法，辛亥前後的漢人有四萬萬，滿人則只有百來萬或則數百萬。這些滿人分散各地，持有高階官職的只是其中極少部分。特別是從所謂的“同治中興”之後，在大清治下廣闊領域上整個龐大文武體制之中，這極小部分滿籍官員所佔的份量，愈來愈小。整個國家機器，從中央到地方，其實是以漢族地主階級的代表爲主。若是僅僅依賴爲數極其有限的滿人官吏，如何能夠順利運作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試想，由少數腐敗透頂滿人權貴所維繫的大清王朝，必須經過四萬萬漢人長達數十年的努力，犧牲無數人性命，才能夠予以推翻，這豈不是把滿人的政治軍事本領渲染得太過於不可思議了嗎？

革命向來是政變的最好煙幕彈，絕佳的藉口。嚴格說來，清室不是亡於同盟會，而是亡於在大清王朝藉以統治廣大漢人的國家機器，或者其中的主力部分。新軍是大清賴以自保的新式軍隊。其中一小部分在武昌舉事。但是，成功地牽制了武昌以及江南各地革命軍的，也是新軍。輕而易舉地把“孤兒寡母”趕下台的袁世凱，正是新軍的首腦。辛亥革命後，各省宣佈獨立，是促成清室覆亡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各省政治主導權幾乎完全掌握在清廷所設置的省級議會。而這些議會所代表的地方地主階級勢力，其中或許有新舊之分，不過向來主張改良，反對革命，是新軍的後台。武昌的槍聲促使他們從各地不約而同地挺身而出，及時捍衛他們在地方上的政治主導權，進而企圖置喙全國性的政治主導權。辛亥之後，

表面上看來是共和替代了異族王朝，實質上，絕大部分地區的政治權力體制並沒有改變。這是一場僅涉及國家機器局部政治權力重新排列的政治變革，革命黨人仍然被排拒在政治實權之外。與其說這是革命，不如說是政變，更符合實情。一場爭奪中國統治權力的大鬥爭，包括各派系集團的問鼎爭霸，地方與中央的對抗，各地方間的短兵相接，是在清帝遜位之後才真正如火如荼地展開的，一直到1949年才告一段落。

在1912年之前，諸如袁世凱那些舊有統治集團的漢籍實權人物，掌握從中央到地方的絕大部分統治機構，向來把革命黨人當作真正的對手看待，一概趕盡殺絕，毫不留情。反而是孫文之流的革命派人物，只知以排滿為號召，不死心地一再設法遊說清廷漢籍大員起來反滿，似乎完全看不到清室背後的這個龐然大物早已經有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日程，似乎不知道這個龐然大物正在虎視眈眈，待機而動。怪不得孫文等人在辛亥之後，不明就裡地被各色各樣的舊勢力修理得鼻青眼腫。一個幾乎完全建立在種族排外情緒基礎上的民族革命理論，注定不會有長遠政治展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脫離現實，不能夠對於當時的情勢有適當的評估和因應。相對於中國當時所面對的各種重大問題的複雜性而言，驅滿綱領的片面性是顯而易見的。辛亥之役以後的中國情勢，比以前更加混亂，更加不可收拾，也更加難以理解，簡直把這些革命家追逐得驚惶失措，不知如何自處。革命家被“革命”動盪嚇壞了。

孫文從一開始就以漢族民族運動的領導人自居。可是，他不了解，漢族民族運動有著比排滿（和漢化）更為重要和迫切的政治任務。他沒有把民族運動的方向跟當時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連繫起來看。他在辛亥之前，還曾經一再表示歡迎日本向中國東北地區發展。宣統退位之後，他迫不及待地宣佈民族主義綱領已經達到。袁世凱屈服於日本的二十一條，引起中國南北一片憤慨討伐聲音。這時候的孫文，反而向日本政府表示願意接受比二十一條更有利於日方的條件。他顯然沒有了解到列強與舊勢力的勾結關係，以及列強對中國的嚴重威脅。對於一個大半生時間生活、旅居在美國、日本、香港、東南亞、英國等地的政治家而言，這不能不說是嚴重的政治短視。其他的第一代中國革命家，似乎也都不能夠超逾這個政治短視。

至於“喚起民眾”的說法，第一代革命家都是口惠而實不至。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之間，孫文成天想的，除了向日、英等國示好之外，不過是在各地大小軍閥當中拉攏盟友而已。大概所有異想天開的事都想遍了，而且也天真地一再嘗試和碰壁了，就是沒有認真想要跟“民眾”一起。那些以為孫文學養不佳而頗為不屑的革命派人物，更無意與販夫走卒為伍。嚴格說來，在這一代漢族民族主義者的觀念裡，“民眾”其實是不包括在民族之內的。阿Q是不准革命的。就這一點而論，革命派與改良派並沒有什麼根本上的不同。

再說，孫文的民族主義與民權主義也是互相抵觸的。依照孫氏的民權主義，在革命成功之後，民主政治必須經過長期的“訓政”階段才是可行的，因為“民眾”還沒有參與政治的條件。“民眾”既然在他眼中還有待教化，喚醒他們豈不等於是喚醒一個不可知的怪物？既然人民大眾不得直接參政，如何成其為民族成員？如果說孫的民生主義的共產意義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那麼，他的民族不也一樣是未來式的嗎？

十九世紀以來的歐洲，民族運動不但帶領各地的政治運動，也是新思潮在當地的主要鼓吹者。中國則不然。孫文和他的戰友們，對於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面臨文化思想生活劇變的預兆，幾乎毫無覺察，甚至於連這個民族在上層領域是否應該有一個新導向，也都不曾有過什麼思考。面對辛亥以來中國的危機，第一代的革命家確實表現不出令人信服的革命展望和政治判斷力。怪不得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十分尊重他們，也不期待他們出來帶領老大中國走出歷史陰霾。從當地的報刊雜誌和當代人的言論著作，可以看到這一點。

新生代自尋出路

那個時代中國年輕一代的知識分子終於明白，要去就教於當時即使是名重一時的革命家，無異是問道於盲；他們自己必須尋找出路。這是五四運動的歷史背景。除了民族問題之外，他們已經深深感覺到整個中國社會都籠罩在舊有陳腐政治文化和倫常道統之中，幾至不能呼吸。他們掀起了一場新文化思想運動，對於舊文化傳統展開無比劇烈的批判。這個運動牽動了當代整個中國的所有政治變化，在國民黨重組以及中國共產黨建黨之後，造成一個革命浪潮。

孫文等人在民族主義理論本身的發揮，並沒有直接促成這個重大的躍進。事實上，他根本沒有這個遠見。他自反袁以來，甚至於早在辛亥以前，一直把爭取英、日等列強對他的支持當做為最為重要的課題看待。從1919年至1921年之間，中國各地學生愛國反帝運動十分熾熱，他卻不曾公開直接譴責過帝國主義。他還一度批評學生運動反帝之不當。遲至1923年，國民黨的宣言也僅僅低調提及爭取修訂不平等條約。比較公平的評價，應該不是孫文影響和領導了五四運動的民族運動熱潮，而是五四運動學生們的反對帝國主義言論影響了孫文，使得他的民族綱領後來有了若干修改。以孫文為代表的漢族民族運動，在辛亥以後偃旗息鼓。是五四運動重新賦予這個運動以新的政治生命力。

是五四運動促成了這個躍進。更貼切的說，是新一代青年不再寄望於孫文那一代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之後，自己採取行動，徑自伸手去掌握主導權，造就一個蓬勃的民族運動。學生運動在膽識和理念上，輕易超逾了許多從事革命運動長達數十年的革命

家，這大概是史無前例的。也可見，中國的政治環境和革命情勢，早已經不是第一代革命家所能夠掌握得了的了。

租界

五四運動從北京首開其端，很快地擴及中國各大城市。不久，運動重心轉移到上海。這個發展模式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值得我們思考¹。

外力的干預侵略行爲，常會助長當地社會的民族反抗運動。租界是十九世紀中以來，列強侵略中國的歷史產物，是國際資本勢力在中國的跳板，象徵著所有不平等條約的罪惡和羞辱。五四運動所開始的另一個浪潮的漢族民族運動，超逾早期漢族民族主義的侷限性，把注意力轉移到列強對於中國的侵略，把租界當眼中釘，一個攻擊的重點目標。可是，租界與漢族民族運動的關係，並不是如此單純而已，其中還涉及了多層的歷史問題。

清末不容於朝廷的改革派和革命派，紛紛避難於租界。民初被軍閥一再逼走、在大江南北無處安身的孫文，數度躲進上海法租界，籌劃東山再起。五四運動前後大部分的新文學和新思潮出版活動，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和反軍閥的政治宣傳工作，也集中在租界。魯迅在租界裡從事一系列批判論著。連中國共產黨也在租界成立。租界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領導中國精神生活的文化重鎮，各門各派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的關鍵地帶。當代所有重要政治想法的形成和傳播，大部分都與租界脫離不了關係。在列強的“保護”之下，各種思潮理念得以充分發揮，匯聚成爲一股中國史上罕見的活力。沒有租界，中國現代的文學藝術和各種思潮的活動，勢必大爲不同。不但如此，各地租界的環境更培養了中國現代化所迫切需要的新一代金融家、企業家、工程師和經理群。

在上海租界所帶動的風潮之下，中國新文化運動和民族運動快速展開，撼動整個漢人社會，改變了年輕一代知識分子的世界觀，使得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更能夠在共同的課題上從事同步的思索交流。在大清覆亡以來的混亂、晦暗、無望政局中，這無異是一股嶄新的力量，一個重要的新變數——更確切的說，一股由新一代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積極分子所結合而成的新興勢力。以民族主義爲中心的孫文一代革命家所未能真正激發起來的民族活力，如今迸裂而出，帶動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鉅變。終於，在北洋政客、大小軍閥的舊秩序的廢墟之上，新的民族國家的雛形得以誕生。也許可以說，沒有上海，或許沒有北伐；沒有上海，或許也不會有延安。

何以所有這些都與租界有關呢？

爲儒家意識型態籠罩千百年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凡事泛道德化，早已喪失自新能

力的停滯封閉世界，沉悶得足以窒息任何新思考的種子。租界似乎是中國廣袤大地上唯一可以自由呼吸的綠洲之地。同時，租界也是現代世界在中國的一個視窗，代表著唐代以來最大的外來文化衝擊，也象徵著古老中國文明已經喪失接納和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之時，尋找新的生機的地方。在一個外力“保護”的環境下，這個生機方得以有滋長的機會。這似乎表示，古老文明不但在精神層次上死而不僵，而且還足以產生鉅大而且無所不在的物質力量，扼殺新興事物的生命，或者阻止新生命的成長。在此歷史環境下，這個為新一代漢族民族主義者所深惡痛絕的租界，卻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功能，幫助漢人社會在文化思想方面得以暫時逃過古舊社會巨靈的扼殺之手，步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同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

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往往把這個運動形容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各國，在科學、藝術、文學、哲學思想等各種領域裡產生了無數劃時代的偉大成就和鉅著。如果以同樣的準則來衡量中國自五四以來的成就，我們實在臚列不出一張傲人的成績單。文明史上，人類對於自己傳統文化的批判，似乎不曾有過如同近代中國那樣的徹底和不留情。而近代歷史上幾個主要的民族國家，如英、法、德、意、俄等國的文化思想運動，似乎也不曾如五四時代的中國那樣貧乏，那樣缺乏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成果。在思想哲學方面如此，在文學藝術方面亦復如此²。不能不令人深思。

我們不應該說，近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缺乏產生世界級偉大作品的 ability。因為，自從租界消失之後，嚴寒的政治冬天立即鋪天蓋地席捲而至³，新文化運動不再有海闊天空自由發揮的機會了。這是一個空前短命的新文化運動。有了北伐和延安，漢族民族運動開始展現前所未有的活力，一心一意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租界注定遲早要面臨消失的命運。隨著租界在激昂的民族主義吶喊聲中消失，中國新文化思想運動也嘎然而止，現代中國新文化運動者，幾乎從此不再生息呼吸。當漢族民族運動還在反抗外力的時期，中國經歷了一個空前的思想和文學藝術創作的黃金時代。當新的國家機器在民族運動浪潮中建立起來，特別是在它得到完全鞏固的時候，這個黃金時代也告一段落。

關於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不過，五四運動涉及漢族民族運動之處，還是值得提出討論的。

至上的民族，善嫉的神祇

除了新文化運動而外，從租界裡更發出嘹亮的民族呼聲。這二者是互為因果的。民族存亡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一切思考的焦點所在，可以說是追求新思想的最基本動

機，是評估傳統文化的最高標準。在許多方面，這個呼聲是如此的迫切和激昂，決定了當代文化思想與文學藝術創作活動的節奏板拍，決定了這些活動的內容與取向。

本來，民族解放本身是一個相當具體的政治綱領。民族主義是這個綱領的宣傳工具。只是，當人們把民族主義宣傳當做一件比什麼都重要的歷史性工作來大加推展開來的時候，民族主義開始有了自己的生命。如同一塊強力磁鐵一般，吸盡一切資源，壟斷所有的思考，開始排拒許多理性因素，添加許多非理性因素，吸引社會上長期存在的負面偏見和仇恨，反過來咄咄逼人，吞噬新文化思想運動，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規範民族運動的根本性質。這個民族主義少了一份理智的約束制約，多了一份浪漫的狂暴性。

十萬火急之中，一切爲了救亡。爲彌補民族主義思想內容之不足，幾乎所有的宣傳工作，都饑不擇食地求救於神話，或者製造新神話，甚至大量歪曲歷史，賦予許多誇張不實的政治訊息；把民族自信和自豪建立在一系列不健康的觀念和情緒基礎之上。偏重依賴民族起源神話謊言的民族主義，難以避免哲學貧乏癥候。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個民族運動的思想內涵和政治展望。

如果說，民族存亡的神聖課題超越其他一切考慮，高於思想自由的權利，這是不是意味：爲了早日取得民族解放，可以不惜中止新文化思想運動？可以不惜以民族的思想活力爲其代價，來換取民族解放？當人們普遍以爲對於“漢奸”的絕對罪惡應有的絕對憎恨，必須絕對高過對於複雜歷史條件下所有錯綜互動因素的細膩觀察和耐性思索的時候，具有濃厚排他性的民族主義情操與日俱增，所有文明長足進步所不可缺乏的容忍異見的寬宏精神卻日益萎縮。當人們爲了民族主義這一個他們認爲神聖不可侵犯、同時也是不可能精確規範的事物，而不惜放棄自己自由思考的權利的時候，他們其實正在一步步地拉開一張足以窒息整個民族思想能力的大幕蓬。

在大部分的歐洲民族國家，民族運動的出現，是在當地經過文藝復興運動以及相當長期的新文化思想運動的洗禮之後才發生的。到了那個時候，因應新時代的許多哲學文化思想方面的條件，雖非粲然大備，至少足以造就較爲成熟深厚的政治文化。然而，漢人的中國社會則不然。

五四運動所代表的新文化思想運動，並沒有給漢族人民留下值得依恃的豐富文化條件，足以規範和制約種種一定會層出不窮的各色各樣政治傾向，以及那個基本上還沒有脫離種族主義階段的漢族民族主義。哲學貧乏的民族主義，橫行在一個傳統政治文化體系已經崩盤，而新的政治文化還甚少建樹的貧瘠大地上，發揮強烈的排他性，輕而易舉地取得思想獨霸地位，主導漢族人民的政治思考，把他們政治抉擇幅度拘限

在狹窄的空間裡。

在此情況下，集體與個人、權力與責任、政治考量和其他考量、眼前需要與長遠展望等等的輕重取捨，找不到適宜的平衡點。當代人根本不把這個平衡點當做一件值得探求的事物看待，或者不具備從事這種探求的思想條件。當歷史鐘擺開始往一個方向擺動的時候，簡直了無阻力，以至久久不停，劃出一道絕大的、幾乎是無垠的擺幅，索討莫可言明的歷史代價。當歷史鐘擺往另一個方向擺蕩的時候，又是了無阻力，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這個社會又要再度付出重大代價。

在這個民族至上的土地上，自由主義運動幾乎不曾有過發展的機會；而馬克思主義運動也開始了一段畸形扭曲的發展歷程。在民族主義善嫉神祇，唯我獨尊的祭壇上，眾神默默，思想的權利和新文化思潮終於成爲犧牲品；原來期待百鳥齊鳴的新天地，化爲死寂的廟堂。埋葬了租界，得到了民族尊嚴，也終止一場新文化運動。民族得到解放，也失去了自由。租界的歷史意義，竟然是如此的耐人尋味。漢人賴以救亡的民族主義，成爲這個民族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緊箍咒。也許是因爲所帶來的傷害是如此的深鉅，以至於到現在爲止，漢人當中還不曾出現出色的思想家，有能力和勇氣本著批評性的態度，深入評估和省思漢族民族主義的哲學缺陷。

國家機器

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早期漢族民族運動，在辛亥前後以及五四運動所開始的這兩個階段，無論在綱領目標或者社會動員方面，都有根本上的差異。後人每每通過後一個階段的種種來了解前一個階段，因而忽略了前一個階段所表現出來的嚴重缺陷。問題是，這些缺陷並未隨著後一個階段而消失，反而因爲後一個階段的緣故，而使得人們更加習以爲常，而更加得以確定和保存下來。

也許，不依賴高度激昂而盲目的煽情，就不能把民族活力匯聚成攻堅的光束，在萬分緊急的困境下達成民族解放。也許，歷史動盪的專斷性，使得民族解放不能不以民族的精神生活爲其代價。也許，這都是當時歷史條件制約下所無可避免的。然而，人們卻往往從而論斷，所有發生過的，都應該繼續延續下去，任其一再重演。於是，反映過去一個特定時代的負面表現，很容易成爲一項足以幫助造就新時代的先決歷史條件。新時代不是一個新的開始，而是過去的延續。

辛亥前的民族運動，偏重依賴自發性力量，主要目的僅限於推翻異族王朝而已。從五四運動、國民黨重組和中國共產黨建黨所開始的政治運動，則十分明確以國家政權爲目的。國民黨通過與舊勢力結合，掌握舊有的國家機器，中共則意圖打破舊有國家機器，積極建立新的雛形國家機器。最後二者都在不同的地盤上，各自擁有龐大的

國家機器。在這過程中，漢族民族主義因為國家機器因素而開始具備一項前所未有的性質。這項性質與以上所提的哲學缺陷，互相影響。

事實上，國家機器對民族主義產生重大作用的事例，並不是罕見的。這在世界各地一再發生過，而且仍然繼續不斷在發生。民族主義運動本身已經具有十分不易駕馭的莫大生命力，再加上國家機器龐然大物插手主導操縱，更使得民族主義在現代政治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一再在國際間與各國內部掀起滔天大浪。其中的互動作用，值得我們進一步繼續探討下去。

(待續)

☆

註釋

1 參閱 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January 1993.

2 參閱劉再復與林崗的《傳統與中國人》，1988。

3 中國北伐末期，蔣介石佔領南京。不久，他的特務組織系統的勢力也開始伸入上海。從那時候開始，一度從新文化運動和再出發的民族運動中吸收不少新血輪的國民黨，開始在文化思想領域走回頭路。來自租界的眾多出版物所代表的批判運動，曾經逼迫文化保守派一再退卻。如今，終於有一個政黨挺身出來，保護這些形同喪家之犬的文化保守派。二次大戰結束，租界成為歷史名詞，也不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天地。國民黨集團逃到台灣之後，展開一場抑制新思潮的復古風潮；文化守舊派勢力趁著白色恐怖籠罩之便，在台灣建立起一個思想僵硬而閉塞的天地。一直自以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繼承者的新中國，也在建國後不久的反右運動中，開始全面退卻到另一個同樣僵硬閉塞的天地。

4 參閱《舊約》，出埃及記。

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

〈二〉

黃志龍

〔二〕特殊過渡階段

A.「典型」和「非典型」的革命論

一般而言，馬克思、恩格斯被視為是「先進國家革命理論」的提倡者。恩格斯在「共產主義的原理」中說：「共產主義革命並非只是單一國家的事情，而是在所有文明國，也就是至少是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等國家同時引發的革命」。這種說法的理論根據，就是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一個社會的生產力在還能夠發展時，就不可能沒落；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內還未完全成熟時，決不可能替代舊的生產關係...」。

事實上，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馬克思在其生涯中總共做了二個系列的研究：一個是有關歐洲社會，尤其是歐洲布爾喬亞社會生產關係的研究；另一個就是非歐洲社會、非布爾喬亞社會的研究。從世界資本主義的立場來看，前者是屬於「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的研究，而後者就是「從屬(依附)性後進資本主義」即殖民地、從屬國的研究。

馬克思、恩格斯確實將其主要的精力，傾注於「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的研究，因此其相關文獻不僅是在數量上較多，在理論上的完整度也較高。反之，對於「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研究的文獻則較少，理論的完整度也較低。但如果據此就認為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理論，僅僅侷限於第一系列的文獻的話，那就失之偏頗。晚進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進展，充分的說明了這個問題：

- (1) 首先，20世紀和21世紀世界史，面對在前蘇聯、中國、古巴、越南所發生的社會革命以及二戰後新興民族國家的興起的現實，在客觀上產生對於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及其社會發展理論的要求——具體地說，就是要求從整個世界的視野來研究「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
- (2) 近20～30年來，馬克思、恩格斯原典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有關他們研究

後進性、從屬性（依附性）社會的理論體系也取得了顯著的發展和彰顯。

馬克思、恩格斯在以「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文獻為中心的一連串論文中，設想以世界先進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為突破口，進一步構思在世界範圍內從資本主義轉型到共產主義的總過程。其基本的設想如下：

- (1) 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並取得勝利；
- (2) 後進資本主義國家受到這種革命的影響，進而發生社會革命；
- (3) 後進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以獲得勝利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為模範，並且在其協助下以較短的期間內朝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
- (4) 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這就是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論的「基本模型」。但馬克思、恩格斯另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可稱之為「非基本模型」的世界革命論。即：

- (1) 在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發生社會革命；
- (2) 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受到這種革命的影響，引發社會主義革命並取得勝利；
- (3) 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以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為模範，並且在其援助下以較短時間內向社會主義前進；
- (4) 在世界範圍內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對上述「非基本模型」的世界革命論，馬克思、恩格斯並沒有留下完整的著作，但在其「論愛爾蘭」問題、「論波蘭」問題等歐洲內部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問題，以及有關「印度」問題、「中國」問題和晚年的「俄羅斯」問題等一系列論文中，針對以「開發中國家的社會革命」為開端的世界革命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討。其基本的論點如下：

- (1) 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革命論——在世界範圍上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轉變過程的理論——其關鍵性要素是，社會主義革命在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國的勝利；
- (2) 最可能成為世界革命引爆點的是，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但也不能排除從屬（依附）性後進資本主義國的社會革命成為引發世界革命的契機；
- (3) 但從屬（依附）性後進資本主義國的社會革命在國際上陷於孤立時，也就是後進國社會革命沒有能夠引發先進國社會主義革命時，後進國的社會革命就可能面對失敗的命運。

B. 違背「資本論」一般規律的革命——「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

世界資本主義是以支配／從屬關係為其基本性質。佔有統治地位的支配性社會經濟體制，可稱為支配性資本主義，而被支配的社會經濟體制就是從屬（依附）性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就是支配性資本主義和從屬性資本主義的統一體。站在從屬性資本主義的立場來說，針對支配性資本主義的研究和其結論，是不可以片面的將其絕對化。

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 19 世紀，從屬性資本主義為支配性資本主義所規定，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運動大都由支配性資本主義的運動所左右。因此，歐洲中心主義的，也就是忽視了從屬性資本主義或從屬性社會的想法，在當時佔有優勢的地位，幾乎所有的研究都集中於支配性資本主義或產生支配性資本主義的歐洲社會。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對於近代世界的認識，基本上也難免落入西歐中心主義的窠臼，將其主要精力傾注於支配性資本主義的運動——生成、發展和沒落——的法則的研究。其研究結果就是「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等等有關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文獻。

在 19 世紀後半葉，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從產業資本主義轉移到世界帝國主義（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各種條件已經逐漸成型，支配性資本主義和從屬性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也逐漸尖銳而趨近於爆發點。然而，從產業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階段的轉移，實際上完成於馬克思、恩格斯已去世的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因此，馬克思主義必須取得新的發展。第一位進一步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論和社會主義的是列寧。

列寧，除了關注支配性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外，還注意到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國的，包括民族解放革命、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以及結合上述兩者的革命問題。

19 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以「團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為口號，但 20 世紀卻以「團結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為口號。這種表現在口號上的改變，實際上反映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 20 世紀之所以不同於 19 世紀的基本課題——以「共產黨宣言」為代表的 19 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關於變革主體的認識，在 20 世紀發展為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為代表的世界觀和變革主體認識。

列寧說：「現在數千萬、數億人民——事實上是地球人口的壓倒性多數——表現為自主的、積極的革命要素。而在世界革命的將要來臨的關鍵性戰爭中，以民族解放為目標的地球住民中，大部分者的運動，將會把矛頭指向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而且可能扮演比我們所期待的更為偉大的革命角色。20 世紀就是，在先進國內無產階級對布爾喬亞的內亂和在未發達的後進的被壓迫民族中，包括民族解放運動在內的一連串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互相結合的時代」。

在 19 世紀末期，做為世界體制的產業資本主義轉化為帝國主義世界體制，而這個世界體制就是由屬於「先進國／獨立國／宗主國」系統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屬於「後

進國／從屬國／殖民地國家」系統的民族這種互相對立的兩群所構成。前者的繁榮是由後者的窮困所供給；前者產業發展是由後者的「低開發的發展」所促進。

20世紀是帝國主義體制開始動搖的世紀。帝國主義體制的動搖首先表現在由帝國主義諸國之間以世界再分割為目標的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其結果促進了一個「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的誕生；同樣地，具有同樣性質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不但在東歐和東亞產生一些「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更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誕生許多非布爾喬亞、非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國家。

第一次世界大戰迫使俄羅斯內部矛盾上升到轉捩點，從而在1917年大戰末期引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結果，國家權力由列寧等共產主義者所掌握。但是，剛剛在政治上繼承了俄羅斯帝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缺乏保證其社會性質轉變為社會主義的客觀前提，而且主觀條件也還很脆弱。因此，列寧所領導的革命，實質上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這種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差異是：

「社會主義革命」是發生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下，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已經成熟的結果，其發展過程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由於是在資本主義時期或「前」資本主義時期，社會主義的革命的前提條件還不充分，尚未成熟。所以它的發展過程應當修正為：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在俄羅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特殊的社會主義革命——由於不同於19世紀馬克思學派的理論推測，因此被認為是違背了「資本論」所揭櫫的一般規律的革命。列寧本身也認識到這種差異，所以他說：「情勢的演變變成了不同於馬克思、恩格斯所期待的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將『國際社會主義革命先鋒』這一個光榮的角色給予我們俄羅斯的勤勞、被剝削階級，而不是給予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階級」。「當我們開始國際革命時，我們之所以如此做並非相信我們能夠在國際革命上走在別人前面，而是由於各種原因而不得不開始革命」。

當俄羅斯十月革命的勝利而誕生標榜社會主義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時，出現了各種批評。以考茨基（K. J. Kautsky）為首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就以「如俄羅斯這樣的後進國是無法進到社會主義建設」，「俄羅斯還沒有到達實行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俄羅斯不具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前提」，「俄羅斯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到達足以實現社會主義」...等等理由批評列寧與布爾雪維克的社會主義建設政策。

針對這些批判，列寧做了如下的反駁：「世界史就其全體而言，必然依照一般法則來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不僅不會排除其發展的特殊型態，或發展時期的特殊順序，反而是以此做為前提的」，「要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誰都不清楚

這個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麼——因為西歐各國都有不同的水平），但為何不能先以革命的手段獲得一定水平來做為前提，然後再以工農權力和蘇維埃制度為基礎，為趕上其他國家國民的水平而前進呢？各位到底在哪一本書上看到不可以或不可能變更普遍的歷史順序呢？」

當時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固執於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僅僅抱住 19 世紀馬克思學派的教義，認為只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才是能夠在世界規模上轉型到共產主義的唯一推動力，從而嘲笑俄羅斯勤勞民眾的社會主義建設方針。

然而列寧卻明確指出：做為推進世界革命的另一個力量——即一個新的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族解放革命和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20 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的變化，證明列寧主張正確性。那就是，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大眾從世界資本主義中學會了訓練、教育和組織鬥爭。他們紛紛為自身民族的解放革命、為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革命、或者為同時以民族解放、社會主義為目標的革命而站起來。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再也無法像 19 世紀那樣，絞殺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國家民眾的社會革命。世界資本主義已產生巨大的關鍵性變化。

列寧反駁德國社會民主黨、第二國際的多數理論家而下的驚人的論斷：在 20 世紀，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社會革命勝利後，才創造出建設社會主義的各種前提，這種顛倒的歷史發展是可能的。他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個表現，並不是承認新的經濟秩序就是社會主義，而是意味著實現「走向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權力的決心」（論左傾幼稚病）。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屆大會」的「民族、殖民地委員會」上說：「...就後進民族而言，『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是不可避免』的看法，是錯誤的（應該『更正確』地說：可以逾越資本主義佔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制度和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而不是逾越本來應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完成的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因為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大生產的基礎上，是建立在生產社會化和商品化的基礎上。所以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和現代化是不可逾越的。）」「共產國際」需要確立「在先進國無產階級援助下，後進國轉移到蘇維埃制度，跳過資本主義階段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之後能夠進入共產主義」這個課題的理論根據。

這裡所說的「一定的發展階段」就是，能夠替代資本主義而完成資本主義歷史任務的階段。如此資本主義階段才能夠逾越。這就是說，「一定的發展階段」和「資本主義階段」這兩個發展階段之間的關係是並列關係而不是前後關係。以中國為例來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不必經過資本主義階段，而是經過「新民主主義階段」之後就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階段」是「資本主義階段」的替代階段。所以「新民主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關係是並列而不是前後關係。

列寧所提的「一定的發展階段」是從屬性後進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必須經過的過渡階段。但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時是不必經過的。這種從屬性後進國家所特有的「過渡階段」可稱之為「特殊過渡階段」。「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的「過渡時期」（或過渡期）是先進資本主義社會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前必須經過的，需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過渡時期」。

從屬性後進國家經過「特殊過渡階段」而獲得高度發展的生產力和現代化之後，再經過哥達綱領批判中所提「過渡期」，之後才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1917年，以俄羅斯革命為先行者而展開了世界革命。因此就俄羅斯的勞動者而言，不僅沒有社會主義的先例，也沒有先進國積極的援助。此外，蘇聯還被支配性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攻擊。所以其建設社會主義各種條件的工作也受到阻礙。列寧在蘇聯正著手於建設社會主義前提的最困難時期過世（1924年）。因此列寧的「特殊過渡時期」理論是在極度不充分的資料之下構築的，也因此還是未完成的理論。列寧本身非常瞭解這種情形，因而才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第二屆大會上懇請同志們來發展「特殊過渡時期」理論。

雖然尚未完成，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理論是

- (1) 論證「特殊過渡階段」在從屬性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必然性。
- (2) 指出「特殊過渡階段」的長期性和階段性。
- (3) 指出「特殊過渡階段」的第一小階段是多種經濟成分 (Uklad) 制。
- (4) 指出「特殊過渡階段」的第一小階段的基本任務是，在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強化、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同時應慎重實施資本主義經濟成分，小商品生產經濟成分等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助成、利用、改造政策等。

此後，列寧「特殊過渡階段」理論被證明對所有「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而言是具有原則性的重要性——脫離列寧「特殊過渡階段」理論，使「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各種前提上，面對嚴重困難——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社會主義化」，而準備走向社會主義諸國家的社會生產力尚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既存」社會主義國家內的各種矛盾不可避免地被強化、被扭曲，甚至還會增加新的各種矛盾。例如在史達林時期，勞動聯盟的破壞，從無產階級專政變質為個人獨裁，給了國民經濟尤其是農業很大打擊，也助長了勞動人民的虛無主義、對政治、思想問題的冷漠 (apathy) 狀態。在中國，逾越「特殊過渡階段」後，使中國（包括共產黨內）變成「一言堂」國家，進而引發文化大革命。更在文革時期的「過渡時期」和「特殊過渡階段」理論的混淆，使經濟建設產生大混論，打擊了整個經濟，也助長了勞動人民對政治的不信任。因此文革後不得不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論中承認：經過30年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後，沒有實現其他國家在資本主義條

件下所實現的國家工業化和生產商品化、社會化和現代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還不完善、不成熟，建設高度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經濟文化條件還不充分，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和小生產習慣勢力還有廣泛影響力」。

「既存」社會主義國家誕生於20世紀，其在世界史上的地位，是處於科學社會主義經典上所說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社會）」的「前一個階段」。是社會生產力不甚高，尚未具備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前提條件的開發中國家，爲了轉型到社會主義而進行的有目的、有意識地建設其前提條件的歷史階段。「既存」社會主義是在世界資本主義條件下，被迫進行從屬性（依附性）發展的民族（國家），在「以社會主義爲目標的社會革命」勝利後，使用國家權力進行有目的、有意識性地創造社會主義各種物質與文化前提的「特殊」社會主義形式，也就是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

社會革命勝利後，有目的、有意識地創造社會主義的主觀、客觀條件這種顛倒的歷史過程，是由帝國主義世界體制的全面運動所準備並促進的。20世紀世界史的最重要特徵之一，就是在從屬（依附）性後進資本主義中產生「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這件事情。

就政治本質而言，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是國家社會主義。在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的整個階段中，國家扮演著積極性的角色。實行「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在本質上是勞工階段的權力，卻由於勞工階級在政治上尚處於於弱勢，而且民主主義在體質上仍然相當脆弱，國家權力是由勞工階級的「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所代行。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國家隨著帝國主義的衰退和本身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逐漸喪失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進而顯現並強化勞工階級權力的本質。

就經濟本質而言，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是，以創造出社會主義物質前提爲基本課題的「特殊社會主義」。「既存」社會主義國家由於「過早」跳過「特殊過渡時期」，因而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各種前提上面臨了嚴重的困難，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將「以社會主義爲目標的社會革命」誤以爲是「社會主義革命」所導致的。

就開發中國家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而言，其第一個階段開始於「以社會主義爲目標的社會革命」的勝利，而以「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改造、生產手段所有制改革的結束，爲終止的時期。

前蘇聯的「新經濟政策」時期、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屬於「特殊過渡階段」這個範疇。所以，中國的現狀（無論稱之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新民主主義」階段）並非是對資本主義的回歸，也不是已經變質爲資本主義社會，而是充分利用多種經濟成分社會的長處，來建設並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所需具備的基礎條件的階段。假如充分理解列寧的「特殊過渡階段理論」，中國就不會「過早」的執行社會主義改造，這也許也可能避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

（待續） ☆

編輯報告

8月27日，由勞工團體發動的反健保雙漲大遊行，號召了近二萬人參與遊行抗議，規模之大為近年來少見，也是民進黨執政之後最大規模的抗議遊行。姑不論民眾對蠻橫的政府所爭抗何事，只就人民百姓萬人上街陳情，再無能的政府，亦當戒慎恐懼。不料民進黨不僅相應不理，陳水扁竟然還在兩天後用調侃的語氣說抗議民眾對不起蛋農——這個讓失業率突破5%、十數萬學子繳不起學費而輟學的無能無恥的政府竟然如此糟蹋人民群眾、蔑視民情眾議。這在一個所謂「民主自由」制度下，確屬少見。而今天的台灣奇蹟竟生養出了這麼一個蠻橫囂張、肆無忌憚的民進黨，這透露了一個訊息：民進黨打根底看穿吃定你台灣社會運動者了。

一個人會遭人看扁，其根結往往只在於必須依附於人，無主體性。由於先前在反獨裁時期並肩作戰，台灣的社運界往往與民進黨關係密切，特別是民進黨執政後，通過政府取得運動資源更成為普遍的風氣。所謂「拿人手短，吃人嘴軟」，依存於人，則抗爭力道自然減低不少。之前同謀共事，如今仰仗吃飯，社運界被執政黨羞辱玩弄，也就不意外了。或有言「吃奶可不一定叫娘」，取它資源，倒不見得會受制於他——事實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種連右派都了解的道理，竟有左派人士說得出口，可真滑天下之大稽。

不僅如此，處此社會運動逐漸被收編之際，尚有人力主與民進黨合作，進入民進黨改造他，且不說當年在野時尚改不了，今天執掌了一個國家名器，難不成還叫他虛心承教嗎？真正的痴心妄想。如此之人，還不住口口聲聲左翼大聯合，無異空中畫餅、痴人說夢。

臧汝興的〈如何看健保費雙漲〉通過數據及各國實際狀況，揭破政府健保雙漲的說詞，凸顯了政府當局的蠻橫不義，捍衛財團利益的嘴臉。官土生的〈冷眼看「一邊一國論」〉就最近陳水扁所提的「一邊一國論」提出分析與批判，特別點出陳水扁政權親美路線確立的背景因素。汪立峽的〈後現代態度與後現代左派〉指出了目前瀰漫在台灣所謂「後現代」風的一些現象與怪象；呂正惠的〈台灣「少年仔」如何罵陳映真〉則針對游勝冠在《台灣日報》上兩篇批評陳映真的文章，做出他個人感想的回應；何六九的〈「理直氣壯」因何而生？〉乃是就《左翼》21號至23號上連載的張懷思的〈作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一文所提出的回應，其中的第一部份刊載在《左翼》第24號上，往後幾期也將持續刊載完。

左翼 第二十六號

出版日期：2002年8月31日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

第二十七號



〈失業〉 作者：(希臘)齊齊·馬克麗斯

【重見蘇新佚文】談台灣解放問題

台灣人民的歷史道路

如炬的目光——讀蘇新先生遺稿〈談台灣解放問題〉

重讀蘇新「談台灣解放問題」

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

「白髮丹心馬列魂」

【爭鳴與求是】又是以偏既全的論法

“理直氣壯”因何而生？(三)

【特稿】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三〉

蘇新 / 2

曾健民 / 5

陳映真 / 10

林書揚 / 14

官漢生 / 21

宇柔 / 29

何苦 / 31

何六九 / 33

黃志龍 / 42

談台灣解放問題

蘇 新

一九四七年二月事變後流亡上海的舊台共黨蘇新，在台灣警備司令部追緝之下，於同年七月轉往香港。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底奉命前往北京。近兩年香港期間，除了與謝雪紅等台籍進步人士共組「台灣民主自治明盟」之外，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編輯雜誌《新台灣》叢刊，以及寫些關於台灣問題的新聞、通訊、專論等等，其中費力最多的是反對「託管運動」的工作。這些文章大體已經收錄在〈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一書了。這篇〈談台灣解放問題〉原刊1949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光明報》第二卷第十二期，是曾健民醫師最近挖掘出來的史料；它不但體現了蘇新在彼時彼地對台灣前途的看法；也讓我們感受到了此時此地，談同樣問題的意義！

台灣問題是整個中國問題的一部分，因此，台灣解放問題是絕不能與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分開。必須站在中國革命的一邊，台灣才能解放。因為：（一）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台灣人民也是中國民族。（二）台灣的社會性質，雖然有某些程度之差，但基本上還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這點與中國其他任何省份都沒有差別。（三）因此台灣解放鬥爭也是與整個中國革命一樣，必須完成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這三項任務。尤其是在目前，由於反動派賣國政府的出賣，台灣殖民地化的危機日趨嚴重，三項任務之中，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是應該更加重視的。

我們對於台灣的歷史，台灣住民的民族成份、政治經濟的情況，以及目前的局勢，如果稍有正確的認識，對於上述「台灣解放問題」的這些基本觀點，是沒有懷疑和反對的餘地。

（一）在歷史上：公元前二一九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就有漢人到台灣的事實；公元前一三五年，漢武帝建元六年，大陸與台灣的交通，已經相當頻繁，這時代台灣只有極少數的先住民馬來族，還未歸屬任何國家的版圖，至隋朝大業元年（六〇五年），台灣住民已有了不少的漢民族，從此時起台灣就成了中國的土地。一六二四年以後，雖然為荷蘭和西班牙所侵佔，但至一六六一年，荷、西就被鄭成功趕走了。鄭氏三代統治台灣二十三年，這時期可以說是漢民族獨立的台灣，直到清朝康熙廿三

年（一六八三年），台灣即正式歸併清朝，為福建省的一部分，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改建行省，稱為「台灣省」。「甲午之役」，滿清割台灣給日本，這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日本侵佔台灣時，台灣官民反對割讓，建立「台灣民主國」，還是為了反抗日寇，並不是台灣人民要脫離中國，企圖獨立（看：「台灣民主國成立宣言」）。中國抗戰勝利，台灣歸還中國。這完全是「失土的收復」，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均有明文規定，國際上任何國家都已經承認，日本也確認這個條件而投降的，實際上，也已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正式收復了。歷史上，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很明白的。

（二）在民族上：台灣住民的絕大多數是從閩粵兩地移住來的，血統、言語、文化、風俗習慣都完全與閩粵相同，是百分之百的中國民族。據一九四四年的統計，台灣住民的民族分類如下：閩人四、九九六、九八一人（佔百分之七五·七），粵人九一三、〇九九人（佔百分之一三·八），其餘各省人（日治時代的所謂「華僑」），漢族統計：五、九一〇、三二八人（佔百分之八九·五）；日人四六五、〇〇〇人（佔百分之七），高山族二二四、〇八〇人（佔百分之三·四）；現在日人已經走了，所以除了二十多萬高山族和少數外國人之外，全部都是漢民族（應該佔百分之九七以上）。

在荷、西、滿、日等異民族統治台灣的期間中，台灣人民掀起了無數次的武裝暴動和政治鬥爭，這證明台灣人民民族意識的堅強。

日本統治了台灣半世紀，在這期間中，雖然有多少台人與日本人結婚，產生了少數「台日混血兒」，但其數目已不足道，未能左右台灣問題。

（三）在經濟方面：由於經過日本五十年的經營，在台灣資本主義確有某些程度的發展，但本質上是依靠日本本國的「殖民地經濟」，沒有獨立性，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不能因為在台灣資本主義有某些程度的發展，就以為台灣的基本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又台灣收復前，台灣的「土地所有權」確實已達到相當程度的集中，日本官有土地佔百分之七十三以上。但在「土地經營」方面，大部分仍然是小規模的舊式農業，封建剝削制度還是普遍在存在著。我們必須認清，「土地所有權的集中」與「土地經營的集中」的區別，否則，對於土地制度改革問題上，就會犯了嚴重的錯誤。例如：祇根據「土地所有權集中」的現象，就以為台灣可以馬上實行「土地國有」，來反對中共「土地法大綱」的原則。

台灣收復後，從前日本的資本主義企業和土地都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而表面上雖然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控制著台灣全體的經濟命脈，但這些官僚資本之中，美帝資本佔了一大部份。又由於賣國政府的出賣，美帝對台灣的經濟侵略，也已達到相

當程度。目前賣國「政府」離開了美帝資本，無論任何小事業都建設不來（如：鐵路、水利、水電、鋁業、水泥、礦業等都是依靠美帝資本）。

（四）在政治上：台灣目前是反動派賣國「政府」最安定地方，而最近反動派把大部分的各種軍事力量遷移台灣，加強反動統治機構，剝奪一切自由，想以台灣作為最後基地，反抗中國人民到底。美帝也正拼命的加緊軍事侵略，再加上了惡辣的政治陰謀，為的是要阻止台灣落入中共之手，確保太平洋的反蘇、反共、反中國人民的這條前哨線。

因為反動派的反革命戰爭，完全是依靠美帝，所以反動派在台灣，都不能反對美帝對台灣的侵略和陰謀，凡事都要順從美帝的安排。目前的台灣，決不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單獨統治，而是美蔣的聯合統治。

從上述各點，我們可以明白：台灣解放鬥爭是中國解放戰爭的一部分，所以離開「中國革命」而另找台灣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敵人的反革命力量在台灣佔絕對優勢，而且殖民地化的危機日趨嚴重的今天，台灣人民也祇有聯合全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中國革命的統一領導之下，才能打倒美蔣的反革命勢力，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當然，台灣的解放鬥爭，主要的還是靠台灣人民自己的主體努力，但是沒有全國人民尤其是人民解放軍的援助，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前年二二八民變的失敗是很好的證明。所以，不管他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反對或妨礙台灣人民與全國人民的聯合，主張分離、託管、獨立，而製造親美的幻想，挑撥反共反蘇的感情，特別是製造模糊的「反中國」思想，這些不但是錯誤而且是反動，這些人不但是台灣人民的敵人和台灣解放運動史上的罪人，對於中國革命也是犯了許多罪惡。

其次，從整個中國的立場來看，也必須解放台灣。台灣既然是中國的領土，台灣人民是中國民族，那麼，中國革命也必須進行到解放台灣，才能說是「全國勝利」。何況台灣在軍事地理上是佔著很重要的位置。假使台灣不能解放，而任反動派盤踞，使其作為捲土重來的基地！或為美帝所控制，作為反蘇、反共、反中國人民的堡壘；這對於新中國的建設和保衛也是極大的威脅。

台灣人民曾經受了二百多年的滿清封建統治，曾經受了半世紀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收復後又飽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踐踏，其犧牲和痛苦已經太多了！祇由這一點，國內的同胞也應該趕快起來幫助台灣同胞，從美帝的侵略和反動派賣國政府的黑暗統治解放出來！



台灣人民的歷史道路

曾健民

在帝國主義直接或間接的支配下，在全中國追求民族、民主解放的歷史浪潮中，近百年來的台灣，關於「台灣的解放問題」就一直是首要的課題；在每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前進的力量都會提出鮮明的主張。譬如，在中國國民革命軍興的一九二六年，以許乃昌和陳逢源為中心展開的「我的中國民改造論」論戰，在論戰同時成立的「台灣民眾黨」，它的綱領、政策、黨員大會宣言，以及它的領袖蔣渭水的〈我的主張〉等文；接著，還有台灣共產黨的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一年的兩政治綱領；進入了抗日戰爭時期，領導台灣義勇隊追求「保衛祖國光復台灣」目標的李友邦提出的〈台灣革命現階段之任務〉（一九四二年）等主張，以及在日本侵華戰爭擴大到太平洋戰爭的一九四二年，大陸各台灣人抗日團體共同發動的台灣復省運動中，如謝南光的〈收復台灣與保衛祖國〉等言論。可見得在黑暗的勢力壓迫最強，矛盾最深的歷史時刻，新生的力量必然會像曉雞啼出一條光明的道路。

同樣地，蘇新的這篇〈談台灣解放問題〉，可以說是台灣「二二八民變」後一直到一九四九年年底新中國成立、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前夕，在全中國的解放戰爭中，台灣的左翼民族、民主解放力量所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綱領性文件。

蘇新是日據期重要台共成員之一，這是大家所熟知的；然而，在台灣光復初期，他也是一進最活躍的進步文化人，這可能就比較少人注意了。由於他思考敏銳文筆練達，在「二二八民變」之前，他主編過當時有影響力，重要的進步報刊，如《政經報》、《人民導報》、《台灣評論》、《自由報》等；「二二八民變」後他逃往香港，與謝雪紅、楊克煌等共同組織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主編了機關刊物《新台灣叢刊》，並在《華商報》、《大公報》、《文匯報》、《光明報》…等香港的進步報刊上，寫了無數的通訊、報導、評論，主要揭露並批判美國和蔣政權在台灣的支配和壓迫真相；同時也寫作出版了《台灣二月革命》和《憤怒的台灣》二書；在全中國烈火似地進展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他在文化思想戰線上努力工作，影響並團結台灣島內各階層的反蔣、反美、反獨的力量，留下了豐富的戰鬥史料。其中絕大部分的史料，經藍博洲和葉芸芸的努力，都已在時報出版社結集出版（《未歸的台共鬥魂》、《永遠的望鄉》、《憤怒的台灣》），另外蘇新與楊克煌合著的《台灣二月革命》，也已由前衛出版社出版。完整地保留並呈現了一生奉獻於台灣與祖國的社

會主義解放事業的台灣左翼者的生平和思想，並側面紀錄了台灣左翼運動的歷史。

然而，就像藍博洲在一九九四年主編的蘇新文集《永遠的望鄉》，書中編後語所說的：「當然，我們所不知道的，蘇新自己也沒提到或忘了的佚文，應該會有的，這點，還得有心人繼續尋找…」。

而這篇〈台灣解放問題〉，便是他說的「佚文」之一。

筆者近年來投入台灣光復期歷史（一九四五～一九五〇）的研究和史料蒐集。這篇文章，便是跟我一齊工作的博士生提供給我的香港《光明報》部分影印材料中發現的（光明報為原「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刊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國民黨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後，翌年三月在香港第二次復刊）。

這篇文章，很可能是蘇新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亦即刊出這篇文章的翌月），依組織指示與數位同志離開香港前往北京前的最後一篇文章，並且在同月，《憤怒的台灣》也在香港智源出版社出版。它可說是國共內戰勝負起了質的變化，中國人民革命漸露曙光的一九四九年初，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中，台灣的左翼民族民主解放運動在這樣的關鍵歷史時刻指出的道路。它總結了蘇新一個人在這之前的許多政治觀點，並且強有力地闡明了那個時刻「台盟」的政治主張。

下面讓我們了解一下這篇文章的大歷史背景，也就是，從一九四七年初到一九四九年初，台灣左翼力量為什麼會集結在華南之濱的彈丸小島香港，從事運動呢？

一、香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臨時文化中心」

我們經常指出，把「二二八民變」侷限在台灣一島內的歷史觀點的謬誤。實際上，「二二八民變」是包括台灣在內的戰後全中國的動盪歷史的一部分。

這只要循著民變前後全中國的歷史進展可知。

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調停國共內戰的美國特使馬歇爾，宣布調停失敗，國民黨政府著手發動全面內戰，這使戰後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統一」的願望完全破滅。

同年一月九日，台北爆發了包括學生、工人、各界人士的反美大遊行，抗議美軍強暴北大女學生沈崇。二月十一日，上海、南京爆發搶購黃金風潮，物價暴漲，幣值狂跌，風潮迅速蔓延台灣，深刻打擊台灣原本就相當惡化的經濟。二月二十七日，亦即發生二二八民變的前一天，國民黨政府下令原駐上海、南京、重慶的中共代表處人員，限日離開國統區，關閉了國共和談大門，和談徹底破裂，國府準備內戰的殊死

鬥。同時，上海的國府特務機關，開始對上海的進步民主文化界進行白色恐怖的鎮壓，關禁了《民主報》、《文江報》、《群眾》等報刊。

正如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

「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鬥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條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

爲了展開這個中國人民革命的「第二條戰線」，也爲了避免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國新文化菁英遭到迫害，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來的部署下，曾數次大規模地，將在上海、南京、重慶等國統區的文化人士，南移到「既不像國統區那樣受蔣迫害，又不是解放區那麼動盪」的香港。在第三地帶展開對國統區、對海外華僑、對國際展開反蔣、反帝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鬥爭。因此，從戰後到一九四八年，在中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的協助和領導下，中國各地文化精英匯聚香港，與本地文化人一起，形成了一支包括新聞、出版、學術、文學、音樂、美術、電影、舞蹈的數以千計的文化大軍；香港成了新中國建立之前，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臨時文化中心」。包括郭沫若、茅盾、許廣平、胡風、葉聖陶、鄭振鐸…等重要三〇年代作家都到了香港。夏衍、馮乃超、邵荃麟等重要作家都是領導這個「臨時文化中心」的香港工委會的委員。

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

二二八民變後，蘇新於五月到了上海，由於國民黨特務的追緝，七月南下香港，投入了香港蓬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文化戰線。根據蘇新自傳，他在香港重新入黨後是作家夏衍領導的，而當時夏衍是香港工委的文化委員會的書記。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蘇新和謝雪紅、楊克煌等共同成立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該同盟的基本政治綱領是：「團結本省全體人民，爲爭取台灣省自治及影響全中國人民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之鬥爭爲宗旨」。蘇新在其所著《憤怒的台灣》書中表示，「台盟」是二二八民變後，爲了團結台灣及大陸各階層、各黨派的革命力量，而成立的「統一戰線」組織；依據「台盟」成立時的綱領和時局口號，它贊成和擁護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主張打倒國民黨獨裁專制，在台灣建立由各黨派組成的高度自治的人民民主政府，並制定省憲。而反蔣、反帝、反獨便成了它最鮮明的旗幟。

在中國人民革命的軍事戰線不斷進展中，蘇新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臨時文化中心香港的文化戰線上，以新聞的通訊、報導、評論和出版工作、著作等戰鬥方式，向台灣島內宣傳國內國外革命形勢，向大陸和海外揭露美蔣壓迫和剝削台灣人民的情況，

同時積極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反對台獨、托管運動。

一九四九年初，經過沈遼、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後，國民黨軍政四分五裂，走向全面崩潰之途，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在望，新中國即將誕生。在這樣的歷史時刻謝雪紅代表台盟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同時，在刊出蘇新的〈談台灣解放問題〉的《光明報》的次期（三卷一期），也刊出了台盟參加新政協提出的「關於處理台灣問題的意見」。該意見的前三條是：

一、台灣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即必須實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二、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未得到解放以前，不能稱為「全國勝利」，不得停止軍事進攻，同時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帝國主義干涉台灣問題。

三、台灣解放後，應立即建立各級人民代表會，實行民主自治。

其餘各條，都強調台灣解放後在政治上應採行「高度自治」，主張台灣的人民代表大會對官吏任免、幣制、經貿、公營事業有最終決定權；還有一條特別主張「本省之弱小種族（高山族）享有平等之權利，不受任何差別歧視，得在現住地域建立各『自治單位』」，可見得當時的「台盟」對台灣的原住民族有相當進步的主張。

可以說，蘇新的〈談台灣解放問題〉一文，正是「台盟」在參加「新政協」時所提出的「關於處理台灣問題意見」的進一步闡明。

三、台灣人民的道路

在這篇文章中，蘇新先從歷史、領土、民族三方面，說明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再進一步從經濟分析和政治特點去論證台灣的「社會性質」；認為雖然程度有差，但基本上台灣與中國任何省份一樣，都是一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因此，革命的對象是：「台灣解放鬥爭與中國革命一樣，必須完成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除了說明台灣與中國大陸的解放鬥爭共同的部分外，他又特別著重強調台灣的特殊問題，他認為：「目前的台灣，決不是國民黨的單獨統治，而是『美蔣』的聯合統治」，這使台灣的「殖民地化」的危機日趨嚴重，因此三項任務中，「反帝」的任務要「特別加重」；同時，他更強烈批評「製造親美幻想」、「挑撥反共反蘇感情」、「製造模糊的『反中國思想』」、「反對或妨礙台灣人民與全國人民的聯合」的台獨分離主義，是「反動」、是「台灣人民的敵人」。

蘇新特別突出了台灣革命中「反帝」、「反獨」任務的重要性。因此，他明白指出：「台灣解放鬥爭是中國解放戰爭的一部分」、「離開中國革命另找台灣解放的道

路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也特別強調：「從整個中國的立場來看」，「中國革命也必須進行到解放台灣，才能說是『全國勝利』」。

文中，他也預見了：台灣很可能成為蔣政權「捲土重來的基地」，而美帝正在拼命推動反蘇、反共、反中國人民的前哨線，要阻止「台灣落入中共之手」，「成為美帝所控制，作為反蘇、反共、反中國人民的堡壘」，「這對於新中國的建設和保衛也是極大的威脅」。歷史證明，果然正如蘇新所預見的，一年後韓戰爆發，美國用武力介入台海，全力支援敗逃台灣的蔣政權，把國民黨的內戰國家「冷戰化」；自此，數十年間，台灣成了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前哨，也成了『美蔣』反蘇、反共、反中國人民的「堡壘」。長期處在這樣格局下的台灣社會，當然就發展成了蘇新所指的，「親美、反中國、反共」、「反對、或妨礙台灣人民與全國人民的聯合」的台獨政治勢力的培養基。

四、多餘的話

由蘇新的這篇文章，筆者深深領會到：

一個有理論指導的，有科學的「社會性質論」和政治形勢分析作基礎的，明確的「政治綱領」和「時局口號」，是無比重要的；否則，就會像一隻無頭蒼蠅般「盲動」。

最近，有許多運動的朋友，一見面便說：「不要談統獨」；好像「談統獨」就不是左派，就是落伍的民族主義者一樣；也好像，只要「談統獨」，運動就無法展開，因此都避之猶恐不及。然而，只要稍深究就不難發現，所謂「不要談統獨」，實際上，都是針對「談統反獨」的朋友說的而不是對談獨或行獨的人說的，因此，它的真含義是「不要談統」，而「不要談統」與不要「反獨」、不要「批獨」，實際上是一物的兩面，沒有兩樣。換言之，所謂的「不要談統獨，就是指說「不要談統」不要反獨」。這種說法令人憂慮，除非這些朋友看不到這樣的事實：即，獨政權與蔣政權一樣，根本上都是美國干涉中國的民族民主解放事業的產物，它們的性質都是相同仇美、反共、反中國（反大陸）的，以致於，在這樣的格局下，必然具有的先天上的反動保守性格；否則，主張「不要談統獨」（等於在獨政權下「不要反獨」），就容易讓人理解成：「策略蓋過目的」的機會主義傾向；更會讓人誤解成，這些朋友已不像當年台灣左翼統派蘇新一樣地談歷史、民族、領土，也不再談「社會性質」，也不談台灣的「殖民地化危機」，更不再談「反帝」和民族、民主解放事業了！

如炬的目光

——讀蘇新先生遺稿〈談台灣解放問題〉

陳映真

(一)

感謝曾健民兄不懈地努力追尋 1945 年到 1950 年間台灣光復初期史料，使台灣著名革命者、思想家蘇新發表於 1949 年 3 月的時論稿〈談台灣解放問題〉得以出土了。

1947 年 2 月事發後，蘇新和謝雪紅等出亡香港，不久在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迨 1949 年 3 月發表此文，中國內戰總的形勢早已發生巨大變化：解放軍已在遼瀋、淮海及平津三大戰役取勝後進入北京。蔣於前一年 12 月「下野」。「代總統」李宗仁率團赴北平近郊西柏坡與中共進行和談。估計蘇新文章發表不久，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就要取海路北上入北平了。

這篇文章再次表現出蘇新對台灣前途問題的眼光之高遠敏銳。早在 53 年前，蘇新就洞燭美帝國主義及其僕從要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據以為反對中國革命、反對包括台灣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的反動奸計了。

蘇新在文章中花了不少篇幅論證台灣島在歷史上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而在台居民在民族上絕大部份屬於漢族。蘇新不惜辭費地把這不辯自明的史實概述一遍，對照文章後半部蘇新對美帝國主義及其島內的僕從必欲霸占和侵略台灣，以「阻止台灣落入中共之手，確保太平洋的反蘇、反共、反中國人民的這條前哨線」，呼籲警惕台灣內部少數反動派面對全國解放的壓力暗中蠢動的台灣「分離、託管、獨立」以及「反中國」陰謀的文字，就能理解蘇新以史實捍衛中國對台灣顛撲不破的法理主權的用心。當然，隨著中國革命勝利的發展，隨著國民黨腐敗、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的崩解，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武裝侵奪台灣的陰謀也在急速發展。遠的不說，1947 年 3 月美帝在港總領館就利用少數一批不肖台民，炮製了一個「台灣民主聯盟」以它的名義，向聯合國要求「台灣自治、聯合國監督」。同年 7 月在美國外交特務人員的引荐下，第一代台獨運動頭頭麥文毅在大陸面謁來華美國德邁將軍，齎呈〈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倡立台灣分離主義。

及 1949 年元月，美國眼見中國內戰已經急轉直下，國民黨敗亡、台灣解放成

指日間事，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緊急向白宮建議阻止中共解放台灣，以免成爲蘇聯在西太平洋據點，一定要設法將台澎與解放在即的大陸隔離起來。並且爲了方便美國的干預，首倡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詭稱戰後台灣僅由國府「實質占領」，否定國府對台灣的主權享有，而台灣最終的法律地位，則有待來日對日和約中決定！

同年2月，美「國安會」建議當局在台灣培養取代蔣介石的「非（反）共華民政權」，並與台籍親美反共領袖人物接觸，以使在「符合美國利益時」，策動並利用「台灣自主運動」，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3月，同國安會又建議「一旦台灣局勢告急」即進行「台灣獨立」，策動美國的「友邦」向聯合國提案由聯合國「託管」台灣，「實行公民投票」達成「台灣自決」。

隨著東西冷戰形勢的激化和中國內戰中民主勢力的節節破竹似的勝利，美帝國主義必欲侵佔台灣島的野心也變得更明目張膽，引起台灣革命者深切的警惕和明敏的戒心。1948年6月，楊遠首先在〈台灣文學問答〉一文中最早發出台灣有「拜美派」、親日派，有人搞台灣託管運動，公開嚴厲指斥爲美日帝國主義，爲台灣分離運動服務的文學是「奴才文學」！2·28事變後潛港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謝雪紅，也迭次向台灣人民呼籲「反蔣也要反美」。1949年一月，楊遠公開發表〈和平宣言〉，開宗明義，就呼籲台灣人民反對「台灣獨立」的圖謀，1940年代中後，台灣幾位革命先行者們，以如炬的目光，早就看穿了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無恥霸佔台灣的陰謀，從而不遺餘力地爲反美拒獨大聲疾呼。1949年三月蘇新的這篇文章，尤其鮮明地提出在解放台灣的鬥爭中，反對美帝國主義、遏止民族分離主義的任務之重要性。今日讀之，仍然具有強烈的、重大的現實意義，既令人感佩，也令人感慨無已。

（二）

在蘇新這篇文章中提出以反對美帝國主義爲台灣解放革命的重大任務，絕不是一般論，而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長期以來，沒有見過有關四〇年代中後台灣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文件，但蘇新此文雖然寫得簡約，卻足以窺見當年在中共台灣省工委領導下台灣解放運動的理論認識。

蘇新說：「台灣社會的性質，雖然有某些程度之異，但基本上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這點與中國其他任何省份都沒有差別」。鴉片戰爭使台灣在全國由封建社會淪落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總過程中也從封建社會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帝割台後，台灣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成爲日帝殖民地，社會性質又進一步淪爲「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直到1945年日帝敗走，台灣復歸於

由帝國主義、地主豪紳、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台灣人民和社會同被納入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同受其統治。中國共產黨在科學地規定了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明確了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及半封建的統治勢力：大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革命的主力是中國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及以之為核心和革命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組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革命的性質是最終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資產階級性質的新民主主義，而革命的任務，自然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因此，蘇新認為，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一部份的台灣社會的解放鬥爭，其性質和任務和全國的解放鬥爭「一樣」，只是在1949年2、3月間台灣所面對美帝國主義嚴峻威脅下，主張「尤其是在目前，由於反動派賣國政府的出賣，台灣殖民地化的危機日趨嚴重……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任務是應該更加重視的。」

蘇新在文章中特別討論了日據下台灣資本主義性質問題，認為殖民地台灣社會的性質斷不是資本主義。他認為殖民地「台灣的（本地）資本經濟雖確有某些程度的發展，但本質上是依靠（即依附…作者）日本本國（大資本）的『殖民地經濟』，沒有獨立性；也不是正常的資本主義發展，所以不能因為在（殖民地）台灣資本主義有某些程度的發展就以為台灣基本社會性質是資本主義」。

這一段話應該有針對性，看得出有人主張日據下台灣已經資本主義化，社會性質大不同於大陸者，從而欲「另找台灣解放的道路」。我們知道六〇年代的台獨運動中，就有人主張日本統治下的台灣社會資本主義化了、「現代化」了，並已形成資本主義現代城市，台灣人新興市民階級登台，產生了不同於傳統中國人意識的、現代化「台灣人意識」和文化，謂之「文化民族主義」、並以此為台灣分離運動的「理論」。另外蘇新也在文章中指出，半封建的、小農制的地主佃農關係，即「小規模的舊式農業」和「封建剝削制度」的土地經營普遍存在，來駁斥混淆「國有」土地所有權的集中與土地經營權集中的不同概念，似乎也在說明台灣社會並不是資本社會，同時批判某種經由「國有化」大量日產土地而不必經由新民主主義變革，「另找台灣解放的道路」的主張。

（三）

蘇新這篇短文也留下一些理論課題。一直到今日有一些人總是一般地說國民黨來台接受日帝時代公私產業為「國有」產業是舊中國「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蘇新也持同樣看法。這些產業與自清末官民資本以迄四〇年代大陸「四大家族」為核心的「官僚資本主義」是否相同，頗有疑問。先不說四九年後四大家

族中孔、宋兩家避寓外國，來台陳家政治、經濟上兩皆沒落，「四大家族」成昨日雲煙。今天看來，台灣資本主義的「公營」（在法律產權上的「公有」性）與私營的二重構造、以及近年中公營資本被李登輝時代的國民黨財閥逐步暗中暗裡侵蝕而私有化、以及綠色政權執政後爭先恐後侵奪公營企業的經營權而綠色化、以及公營企業在五〇年代以後長期將其剩餘為公共設施、巨型火車頭產業（如石化）投入龐大資金……都說明不能以傳統的官僚資本去看待。

其次，蘇新說到1949年3月當時美國帝國主義資本在台灣「鐵路、水利、水電、鋁業、水泥、礦業等」各廠礦的投資，似聞所未聞。美帝國主義資本對台灣的滲透和大規模、系統的支配，似是在50年韓戰爆後、美帝在對台政策上終於確定扶蔣、支台、反華圍堵之後。蘇新何所據而云然，值得研究。

（四）

蘇新文章最突出的先見，是他看到美國必欲對台灣進行殖民地統治，台灣受美帝國主義「殖民地化的危機日趨嚴重」。而美帝「拼命的加緊」對台「軍事侵略」的目的，在「阻止台灣落入中共之手，確保太平洋的反蘇、反共、反中國人民的這條前哨線」。

歷史證明了蘇新的先見之明。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帝國主義封斷海峽，致祖國自此長期分裂，使台灣成為從阿留申群島、日本、韓半島、台灣和菲律賓這一條圍堵中國的島鍊和「前哨線」之一環。而台灣也自此成為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自蔣氏政權迄今日陳水扁台獨政權，台灣新殖民地性只有變本加厲之一途。

當然，台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美帝新殖民地。首先，她不是一個自來獨立自主「國家」的新殖民地化，如菲律賓等。她在主權上於今日國際社會中鮮明昭著地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但由於冷戰歷史的遺留，雖然和中國訂定三個公報，但至今美國對台灣依然進行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文化的全面支配，並以「與台灣關係法」使台灣直如美國屬地。近年來，美台不斷升高軍事勾結，把台灣綁在美國圍堵和進攻中國可能引起戰爭的最前哨，成為民族自相殘害的犧牲品。五十多年來，「台灣不能解放，而任（蔣、李、陳）反動派盤踞」，作為反華、反民族基地，「為美帝所控制」…「這對於新中國的建設和保衛」造成「極大的威脅」。今天重讀蘇新這一段語重心長的傲語，對於這一位著名台灣人革命先行者如炬的目光感佩無己，更有一份沈痛的感慨。

我們感慨的是，五十餘年來，二二八民主自治鬥爭後，台灣反蔣反獨裁鬥爭運動的歷史，始終缺乏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意識，反對長期受到欺騙，誤將鼎力扶

持國府獨裁反動統治的美國看成台灣民主運動的朋友和依靠，在美蔣長期挑撥下，失去聯合大陸人民解放自己的眼界，甚而進一步「主張分離，託管、獨立，而製造親美的幻想」…製造「反中國」思想，至有今日「錯誤而且反動」的局面。

美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新殖民地統治，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兩岸分裂對峙，和台灣當前依附性獨占資本主義的統治，是當前台灣社會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矛盾，深刻認識這些矛盾，高舉反對美帝、要求國家自主統一、和以工人階級與進步市民為核心的反帝、民族自主化統一及反獨占的新的民主鬥爭，正是今後台灣變革運動迫切的理論與實踐的課題。重讀革命先行者蘇新佚而復出的文章，不能不深感到1947年二月事變後台灣反對美帝及其反動扈從的工作和理論的嚴重落後、空白和荒蕪，亟有待於今後急迫的建設與發展。

★

重讀蘇新「談台灣解放問題」

林書揚

前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短暫的台灣共產黨活動期間，著名的核心分子蘇新，在1947年二月民變後為了逃避台灣當局的追補而潛赴上海，再轉香港。而在那一段滯港時期，曾經是台共成員中公認的組織長才蘇新，扮演了思想戰線上一位尖兵的角色，主持了一家名叫「光明報」的政論刊物。在該刊物的第二卷第十二期上，蘇新以「莊嘉農」的筆名登一篇文章，題目是：「談台灣解放問題」。時間是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正是二·二八事變爆發兩周年的前夕。

該篇文章長度不過三千字。把「台灣解放」的當代歷史課題，從歷史事實、社會性質、政經焦點、外在因素等各方面加以明確的界說或定位，結論是：「台灣解放鬥爭是中國解放戰爭的一部分。所以離開「中國革命」而另找台灣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敵人的反革命力量在台灣佔絕對優勢，而且殖民地化的危機日趨嚴重的今天，台灣人民也只有聯合全國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中國革命的統一領導之下，才能打倒美蔣的反革命勢力，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放…」。

近日有機會重閱這份文件，除了情緒上有幾分今昔之感外，也難免一陣思潮

起伏。世紀甫改，兩岸情勢又見暗雲低垂。主政者高喊「一邊一國」、「台灣要走自己的路」，而民粹喝彩，過半數民眾表態支持。此時此刻，蘇新的這篇文章，不必否認，和當前台灣一般人的心理心情，顯然有相當的距離。

回顧 50 年時空背景的推移變遷下，台海兩岸關係的本質，即使在經歷漫長的內戰、冷戰、後冷戰，直到全球化總趨勢下的跨世紀年代，仍舊不脫離嚴苛的矛盾對抗狀態中。而在同一時段中，世界·亞洲的政治地圖一變再變，也有幾個國家地區社會，出現以生產領域的技術擴張為基礎的結構性演變，形成了 20 世紀後葉的重大的時代特色。

而兩岸當年在戰火中決裂分道，各自奔前。直到 1971 年，經過聯合國一場決議案，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被認定具有中國主權代表權。在國際社會中的長年懸案 ---- 中國代表權問題，於此獲得解決。邇後對岸屢次宣示，改軍事解放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但此岸則始終以維持非戰狀態中的冷分離為原則。除了民主化本土化的基本防線外，也以 80 年代的經濟起飛和 90 年代的代議民主制的初步確立為抗拒的社會條件，另以美國的「台灣關係法」為外支條件，堅持至今。在這期間，台灣的民心民情，在執政當局的民意經營政策的影響下，民粹高張，時而顯出嚴重的失衡失真現象。像蘇新的這篇文章，認為是「統派」的恫嚇手法者有之，認為是過了時的「共產黨八股」，毫無現代意義者有之。

其實，這是一份歷史文件。是國共內戰期中，針對一塊「未解放」地區台灣的住民同胞們，所發出的呼籲和警語…「台灣人民曾經受了二百多年的滿清封建統治，曾經受了半世紀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收復後又飽受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踐踏，其犧牲和痛苦已經太多了，祇由這一點，國內的同胞也應該趕快起來幫助台灣同胞，從美帝的侵略和反動派賣國政府的黑暗統治解放出來！」一位政治亡命者，對將要被捲進世紀大風暴的故鄉，那一刻所懷有的關切與焦慮，可以說溢於言表。

的確，面對著國民黨軍隊在大陸戰場上節節敗退，憂心終究保不住台灣島的反動派，和相信台灣一旦落入中共之手，將對美國在戰後亞太地區的戰略利益產生極大的不利影響的部分美國官員，相互勾結製造出「台灣託管」和「台灣獨立」的聲音，作為萬一的輿論準備，當時已成公開的祕密。這種情況，讓人在香港的蘇新受到衝擊和警惕，而有此文，也屬當然。

不過為了使當代年輕人跨越 50 年的時空遷移去瞭解 40~50 年代台灣的客觀處境和社會實態，特別是針對「蘇文是內戰時代共方慣用的『反帝反封建歷史任務

論』片面套用在台灣的宣傳品」的提法，有需要做幾點說明。而這一種說明和註腳，主要取之蘇新的另一本著作「憤怒的台灣」，筆者認為是適當的。此外，再參照其他有關的研究文件，做必要的補充或延伸或能產生一定的釋疑作用。

首先，就台灣戰後復歸為中華民國海外省的政治建制，及被導入中國東南經濟圈的特殊外圍部分的實際運營模式而言，台灣地方政權結構體，亦即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特質和形態，自始便呈顯出黨國體制的反動性格和高壓體質。如：行政長官兼省警備總司令官，集政·軍大權於一身。依「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大綱」規定，長官在「職權範圍內」可發佈並執行「署令」。如此情形極似日據時代的台灣總督以「府令」統治全台。警備總司令部設有「特務營」，為情治系統的全島性佈建中心。回復日據時期的民政基層為「鄰里組織」以便必要時實施連坐法。以省黨部為頂點的各級黨部的黨工系統，以及「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三青系統」，在主要的民眾組織，文化團體，傳播工作網，出版機構，藝文團體和設施，不論營利非營利，幾乎都在其直接間接的監控之下。有一數值，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本廳」人員一萬八千，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制人員則多達四萬三千。至於其內部人事結構，在二·二八事變前，編制人員中的台籍者仍然極少。而最能表示黨國體制的反人民性質的一件事，是行政長官公署成立後不出旬日，便針對所有人民自行成立的團體發出解散命令。而那些人民團體多數正是殖民地時代的反日社運團體 ---- 如：文化協會，農民組合，總工會，學生聯盟，等的重建籌備團體。

至於經濟方面，戰前的對日關係變為對大陸關係。陳儀政權藉口防止戰後大陸經濟的極端疲弊和通膨失控波及到台灣，維持台灣貨幣的獨立性，卻在比價上壓低台幣，使得兩岸貿易中台灣的米糖價偏低，來自大陸的工業製品或雜貨則價位偏高。日本的公·官營企業及其資產，由「台灣省接管委員會」接管，民間企業及私財則由「台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接收。其總額到1947年2月底為止，除了土地外，公機關二十九億三八五〇萬圓，民間企業七十一億六三六〇萬圓，民間私產八億八八八〇圓，總共五萬八五六件，一〇九億九〇九〇萬圓。如此巨大的「敵產」，亦即日帝50年的掠奪剝削的巨大積累，不曾歸還於飽受壓榨的人民，卻落入了陳儀政權手中。使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變成了擁有全省產業的80%，全省土地的70%的戰後台灣官僚特權集團的司令部。而這些企業、土地、資源，則主要委由江浙財閥分子組成的「資源委員會」管理和經營。而甫見戰爭結束，滿目戰災，急待復元的台灣社會卻因工農生產嚴重萎縮，惡性通膨似無止境，致使一般中產家庭貧民化，貧民飢民化，和「接收大員」、「光復新貴」、「投機業者」的

光鮮生活形成了強烈對比，其結果便是 47 年 2 月民變的爆發。

以上幾段，其實是陳年舊事眾所周知。之所以不憚煩冗加以簡述，用意在於針對蘇文中所指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惡政」作簡單的註腳，指明蘇新的抗訴並非國共相鬥時期的公式化論告，而是具有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和數百萬人民的痛苦集體經驗為基礎的。回顧才兩年前，台灣民眾迎接光復的那種興奮和解放感，難免令人興起歷史無情的感慨。

下面再提蘇文中的另一指控對象-----美國帝國主義對台灣的軍事政治野心，和祕密操控「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託管論」、「台灣獨立論」的事實經過。蘇新在他滯港時期出刊的「憤怒的台灣」中，曾做過比較系統的收證論述。該書十一節，取題為「美帝國主義在台灣」，再分三子題，美帝在台灣的軍事侵略；美帝在台灣的經濟侵略；美帝在台灣的政治陰謀。論述涉及的時間起自 1945 年到 1948 年。現在就其大致內容略作介紹。首先，日本投降後的台灣佔領任務，包括解除日軍武裝，遣送回國，是由「聯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委由「遠東戰區總帥」的蔣介石負責執行。麥帥乃依此授權身分，且乘當時中國國軍的多項裝備不足，一方面提供必要的海空軍力的支援作業，同時祕密佈置了陸軍部的情報系統，進行範圍廣泛的台灣兵要調查。46 年十月間，要求蔣介石及外交部長宋子文，聚首於台北草山，麥帥提出中國政府承認美軍在台灣的特殊地位，包括建構基地。蔣氏面臨內戰再起的壓力，先要求美國派遣軍事顧問團常駐南京，同時允諾美國把駐菲律賓的三軍基地部分延伸到台灣。47 年 3 月，蔣軍攻進延安。6 月，南京的美軍事代表團一行 20 人到台北，進行調查研究。8 月，魏德邁親自赴台策劃美國三軍基地的設置問題。為了掩蓋真相，魏德邁還對台灣省參議會發表談話表示「美國對台灣不具有任何領土野心」。不久，美國空軍由琉球基地和菲律賓基地抽出部分軍機駐進台北松山、台南、新竹三機場，隸屬美太平洋第十三航空隊。蔣軍因內戰失利，其空軍包括空軍官校也於 48 年底，在美軍協助下，悉數遷來台灣。

海軍方面，47 年 5 月間，國府同意美海軍使用基隆港口設備。49 年春，國府再度同意美海軍在青島、基隆兩港的自由碇泊權。此外，青島的美海軍設施遷來澎湖馬公軍港，國府海軍總部則同時遷來高雄左營。日本海軍曾經計劃在左營建設遠東第一大軍港而已著手施工，美蔣海軍單位聯合接手未完成部分。

陸軍分面，美國駐台單位主要是情報和訓練小組。美陸軍駐馬尼拉司令官於 47 年 10 月間，亦即大陸上國共內戰再度全面化(7 月間)後不久，祕密訪台，與蔣軍要員舉行軍事會議。以上，美國軍方在兩年內戰期間快速加強在台佈置，其用

意極爲明顯。不外藉此表示美國的反共聯蔣保台的決心。亦即，戰後資本帝國主義的基本態勢的必然展示。

談到經濟方面，南京國府著手接收台灣初期，美方除了提供軍事方面協助外，同時也許諾協助大型公營基幹產業的復興工作。相當量的美國技術幹部進入水泥、鋁業、煉油、軍機修復廠等部門。46年，麥帥和蔣宋的草山會議中，麥氏要求(1)美國私人在台投資應視同本國人投資，不加外國資本的限制條件，一如美國資本在菲律賓。(2)美軍方所雇用的日本人技術人員，中方應許其特別居住權。(3)基隆、高雄兩港闢爲國際自由港。(4)美方出資完成日人所擱置的東勢水力發電廠。美國資本家戰前長期投資在中國大陸，數額?大，卻因戰爭而一大部分遭到日本佔領軍的強奪破壞。乃有意在新收復地台灣，趁著南京國府在內戰中的困境尋找機會。至49年，台灣省資源委員會的經營資金絕大部分仰賴美國資金，以最大企業的台糖爲始，台泥、台鋁、台電、金銅礦、煤炭、交通郵電等，其一美元貸款已達數十億元。此外還有所謂「經濟合作署」的「援華計劃」部門。49年8月所謂「亞契遜白皮書」發表，國府準備遷台的前夕，「經合署」發言人猶表示「美國在其遠東計劃中並未計劃除去台灣」。

蘇著《憤怒的台灣》一書中，「美帝在台灣的政治陰謀」一節篇幅最長。詳述從光復到二月民變，內戰劇化，國府在大陸的統治地位行將結束的不及五年時間中，美國對台政策的基本立場和執行經過的明暗兩面，都有廣泛的收證和剖析。爲了節省篇幅，筆者只提幾個重點。(1)美軍方情報單位在光復初期便利用台灣民眾對接收人員的失望情緒，在民情調查中突出台灣人「反中親美」的結論。(2)二·二八民變中操作部分群眾提出「以台灣人民名義要求美國提供支援」。且由香港美國領事館的華籍情報員虛構「台灣民主聯盟」聲明台人有權自組政府並要求聯合國託管。(3)廖文毅帶頭的「台灣再解放聯盟」向魏德邁提出「處理台灣問題意見書」要求美國協助將台灣置於「聯合國託管理事會」管理之下兩年，然後舉行公民投票。美聯社、合眾社等美國報刊極力渲染「台灣分離運動」。(4)台北美國新聞處處長表示「對日和約尚未訂立前，台灣歸屬問題尙在未定狀態」。同時表示美國有意將大西洋憲章適用於台灣。南京政府一旦瓦解，美國將介入管理台灣，釋放二·二八事變及其他一切政治犯。(5)「託管運動」逐漸提高聲浪，48年初全國各大城市台灣同鄉會等旅外台胞團體齊聲發表宣言表示反對。指「台灣託管論」是「賣台主張」。南京國府也特派孫科來台主持調查，且召開記者會，指責美國新聞處及美國領事館進行干涉中國內政的不當活動。(6)然而當48年三月美政府不得不對新聞處長、副領事處以調職、撤職處分後，繼任的台北美國新聞處

長(原任漢口新聞處長)則到任三天後召開情報會議，檢討「託管運動」因不顧「台人排外性」而失敗，乃另提「三反一親」(反蔣、反中共、反蘇聯、親美國)的「台灣獨立運動」。不久，調離台北的前新聞處長再度在香港美國領事館召集廖文毅等人，再組名為「台灣民主聯盟」的分離運動團體。舉辦青年訓練班。(7)48年8月後，台獨運動中心逐漸移向日本。以住日二萬多名台胞為對象，主張台人參加對日和約，決定自己命運。以台、日、香港間的走私為經費來源，發行「台灣論壇報」。其海上走私受到美軍單位祕密包庇。

以上數段在《憤怒的台灣》一書中，蘇新以「總之，美國帝國主義者為了確保西太平洋這一條反蘇反共的前哨線，它當然不願放棄台灣，所以它想盡各種方法，利誘、威脅，雙管齊下，以防止台灣落入中共手裡」來做為小結。

最後，有關「談台灣解放問題」一文的今日意義，筆者想再提出幾點淺見。

以1949年當時的台灣問題的樣貌，以台灣人民左翼運動第二期的時空條件，蘇文具有極大的貼切性。當然以今天一般台灣青年的時代感覺，難免認知上、心理上的一定的距離感。特別是因為五十年來兩岸社會的分途發展，這種距離感恐怕不容易消除。不過，當年的內戰思維，冷戰觀念，是緣自革命與解放的史觀原則，是具有一定的時代妥當性的。

「談台灣解放問題」的立論基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定位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規定。台灣曾經是純殖民地，因而其封建性身分關係在族內有所淡化，卻在異族統治下定著在族外支配關係中。當一場世界戰爭過後，台灣復歸於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祖國，前此階段的些許差異性即時消失在壓倒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體制的社會現實中。這些都不應該被認為是僵化的第三國際的觀念公式。按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揭示，在1922年中國共產黨二全大會通過的《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中，最早定位下來。這個決議案被認為是黨的民主革命綱領，雖然以列寧的民族殖民地問題的理論為基礎，但在具體現實的背境方面，不能忽視1921年底到22年初在美京華盛頓召開的所謂華盛頓九國會議。該會議簽訂了「九國條約」，規定中國門戶開放，各國在華機會均等(以阻止日本獨佔在華利益)。該條約帶給中國的傷害極大，因為中國在實質上幾乎喪失了主權國家自主自衛的基本權利。為了理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規定的重要性急迫性，讓我們來看看門戶開放15年後的中國慘況(1936年「外資在中國大陸實況」)

一、外資在華資產43億美元。銹鐵佔全國80%，煤56%，發電量67%，棉布64%，捲煙57%，交通運輸69.5%，鐵路90%，銀行32家，分支店141家，資產19

億，獨佔金融。政府貸款以關稅、鹽稅做擔保，國家財政被其掌控。1894年~1937年，美國在華企業資本10億5千萬，匯回本國利潤達20億8百萬元。對政府貸款7億美元，送回本國利息14億3千萬。抗戰中，日本掠奪鐵礦4630萬噸，銑鐵957萬噸，原煤3億4600萬噸。重要的民族工業皆被併吞。抗戰後，美國取代日本，變成最大收奪者。美國與國府新訂不平等條約多種，以「中美通商條約」獨佔市場。1936年美資佔外資8%，到1948年佔80%。在華企業300，包括大發電廠，大銀行，石油公司。更嚴重的是，美國以投資或貸款方式收編了多種官僚資本企業打擊民族企業。以援助名義送進大量剩餘物資。47年，由美輸入佔總輸入50%。

二、在農業生產關係中的封建遺制方面，地主富農人口不足10%，佔全國耕地的70~80%。溫存著封建性土地關係，直接、間接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支柱之一。按封建地主的高田租，造成了貧佃農的離農人口增加，直接流進勞力市場，造成了第二產業的低工資，提高了帝國主義外資的利潤率。而高田租的肇因，除了封建遺習之外，中央政府的對外借款，常以關稅、鹽稅等為抵押，土地稅變成了國府最大的收入項之故。除此之外，地主階級為了維持特權，防止農村騷動，常與地方軍閥勾結，使得真正的政治統一難以達成，又使得帝國主義者不論在中央、在地方都能予取予求。（有關帝國主義與其支配地區內的封建遺制，一定的共生結構，在一九三四年前後的亞洲社會性質的爭論中，除了中國外，連印度、埃及社會的情況，也都被討論過）貧雇中農以90%的人口，佔有耕地20~30%，地主收奪產品值50~80%，農民還得承擔稅賦，無償勞役。地主操控農村金融，兼營高利貸，月息達7~10%（普通利息4%）。

以上的引用或能使今日的蘇文讀者由當年的客觀現實去領會一二。另外，蘇文強調「離開『中國革命』而另找台灣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其實有一種更有力的現實因素在背後。蘇文發表的時間是49年二月，而國共全面再戰起自47年7月間。由47年下半年到49年1月，人民解放軍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的壓倒性勝利，於49年1月31日開進北京城，正是「歷史性的人民勝利」的昂揚激盪時期。蘇新的那一份熱切期盼，隔海呼喚，是有現由的，今日讀來還是那麼動人。

50年前企以軍事解放達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標，50年後要達成和平統一的目標仍需以反帝反獨為途徑，可見歷史的大階段還未成過去。人們的統左努力還是要持續推動下去。

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

——怎樣看葉石濤最近在日本的發言

官漢生

最近，日本的《新潮》月刊九月號上，刊出了台灣年長作家葉石濤於今年六月十五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演講的全文－〈我的台灣文學六十年〉；同時，另外一份日本雜誌《找到了！》（Eureka 古希臘語）九月號，也刊出了同六月十五日由日本學者山口守訪問葉石濤的文章－〈訪問葉石濤〉。這兩篇文章的內容，再度呈現了近年葉石濤以「台灣主體」為名，實際上用選擇性的、機會主義的歷史回憶和搖擺不定的觀點的論述特點；葉石濤的這種特點是大家都已熟知的，本不足為奇。然而，這次發言卻有在性質上與他往常的言論極大變異的部分；對於這個部分，他自己也在文中得意地形容「將在台灣引起文化大革命」、「像地震一樣」；那個「將引起文化大革命」的觀點概括而言就是：他認為如果以「台灣主體」，去評斷台灣的前輩作家楊逵和龍瑛宗都「不合格」，因為他們都是「大中國主義者」，「必須重新檢討他們在台灣文學上的地位」。

一、 有良知的人怎麼可以不說話？

這個「大中國主義者」的意思，就像所有的「大××主義者」一樣，就是指對方有霸權、壓迫性、強迫性的意識形態，是一個基於對抗的心態具敵意的惡涉詞；它是所有的民族分離主義者或反華勢力慣用的政治宣傳語，這是很清楚的。楊逵一生站在台灣勞苦大眾立場，在日據期獻身反日反殖民的社會解放、民族解放事業，光復後，又力行省內外作家團結合作的文化事業，國共內戰中提出「和平宣言」而長期入國民黨黑牢；對於這樣的台灣前輩作家，葉石濤竟然指他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者」，這種作法與其說是文學的評論，倒不如說是政治的指控。有良知的人怎麼可以不說話？至於他據以評斷的所謂「台灣主體」又指的是什麼呢？其實九月五日的《中國時報》藝文版，也曾以極大的標題刊出了有關葉石濤這次發言的報導。報導寫道：「葉石濤說，如果「台灣獨立建國」，他相信楊逵的地位會被徹底改變，又譬如張我軍的成就也會被重新看待」；報導中，雖然沒有提及葉石濤說楊逵是「大中國主義者」這句話（實際上，至今台灣仍極少人知道他說過這句話）；但是，葉石濤又進一步把日據期台灣新文學的開創者張我軍也拉下了水。由此可知，葉石濤在日本人面前所說的「台灣主體」，其實，就是

指「台灣獨立建國」，這在文學上，簡單地說就是「台獨文學論」；它是以「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標準來評價文學價值的文學觀；葉石濤認為依據這種文學標準，楊逵、龍瑛宗以及他在台灣記者採訪中再加進去的張我軍，都是「不合格」的，因為他們都是「大中國主義者」。

可以說，葉石濤已經開始用「台獨」的政治標準來對台灣新文學的前輩作家進行思想檢查，清算、歸類和排除。然而，如果連楊逵、龍瑛宗、張我軍等也都要被歸類為「不合格」的「大中國主義」者的話，那麼，台灣新文學的前輩作家中，極少數不是「大中國主義」者的，甚至，恐怕連葉石濤自己的大半生都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大中國主義」者哩！（關於這個部分，後面將會舉證討論）；如果依照葉石濤這個標準去排除的話，所謂「台灣主體」的文學將會空無一物，而成爲空洞主體的文學論。

葉石濤的這番發言，果然如《中國時報》所形容的，「在文學界扔出一顆炸彈」；它雖比不上李登輝最近暴言：「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的「喪心」程度，但已差可比擬。雖然一則是文學上的發言，另一則是有關中國領土的發言，但兩者都是政治性的，都顯示了當今台灣的一個另人憂心的動向，那就是：台獨的政治勢力正「處心積慮」地在社會各領域推動去中國化的「一邊一國論」，而且是「得寸進尺」地推動。只不過，這兩人都是高齡長者，都在青少年期受了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深刻影響，因此，「皇民化意識」便成了他們的台獨論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感情基礎。

二、「皇民意識」的幽靈

從葉石濤這兩篇文章的內容來看，可以清楚知道，他以「台灣主體」爲名的「台獨文學論」，其底流實際上就是「皇民意識」。

雖然他的演講題目定爲〈我的台灣文學六十年〉，但絕大部分的內容都在細述他二十歲以前，也就是他在日據末的皇民化運動時期的文學經驗，好像這短短的四、五年的青少年的文學入門期，就是他六十年的文學活動的全部一樣；而關於台灣光復以後，他在台灣文壇上最活躍，創作和發表作品最多，成爲一個真正的作家的時期，卻隻字不提，避而不談。爲什麼避而不談呢？或許是因爲他在這期間，不論在評論、小說或生活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像他自己在這兩篇文章中指責楊逵的「大中國主義」者吧！（關於這一點後面會詳述），在日本人面前說這些，不但不光彩還有自打耳光的味道。也或許是，面對這麼多的日本人聽眾，而情不自己地回到了他自己曾說過的「日本是我心靈的故鄉」的心態，而忙著傾訴自己「二十歲以前也是日本人」的文學經驗吧！

在演講的起頭，他便忙著先說明：「二十歲以前我是作為一個日本人長大的；並非我想成為日本人，而是一出生便是日本人」。這句話，和李登輝在七、八年前跟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話時說「自己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如出一轍；這就像一個印度人說他在英國殖民時期是英國人，或一個印尼人說自己在荷蘭殖民時期是荷蘭人一樣，是令人臉紅又可笑的「表態」；更何況這話是出於一個開口閉口「台灣主體」的台灣領導人和台灣文學界的「大御所」（泰斗？）之口，更令全體台灣人尊嚴掃地。在日本人面前，怎麼所謂的「台灣主體」統統不見了，馬上轉化為「日本主體」去了呢？原來所謂的「台灣主體」只是對付自己兄弟的態度。這也顯示了台灣的後殖民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五十多年前的日本殖民者的意識型態居然仍深刻地支配著一些台灣人的心靈。

也許有人會認為筆者這種說法是「民族主義」作祟；實際上與民族感情完全無關，這種說法完全是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和世界史的常識出發的。誰都知道世界的殖民歷史中，從未有殖民宗主國把殖民地人當做自國國民的，否則它就不叫做「殖民」了！所謂的「殖民主義」，便是表現在宗主國國民與殖民地人民的在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上的絕對不平等，這已是普通的常識。譬如，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越南人只是「法國的殖民地人」，絕對不會是「法國人」；在英國殖民下的泰戈爾是印度的詩人，絕對不是英國詩人，如果說他是英國的詩人，那是莫大的羞辱。再回到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史實；如果從法政層次來看，當時，日本帝國憲法或法律所涵蓋的所保護的日本國民（日本人）和只適用殖民地異地法的日本殖民地人（台灣還有朝鮮人…等）的地位，是絕對不同和不平等；因此，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只可說是「日本的殖民地人」，而絕對不是什麼「日本人」。說自己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的說法和想法，不是在知識上對自己的歷史命運認識不清，便是在精神上，殖民者的意識型態已「內化」為自己的主體意識，而喪失了真正的主體，即成了後殖民主義常說的「移入主體」。

五十多年前，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殖民主義早已被世界歷史前進的力量所埋葬了，可悲的是，它的幽靈卻內化為一些台灣人的主體意識，仍在台灣的現實中作怪！

三、「三腳仔」再現

認同殖民者身份的另一面，當然就是否定自己的身份。自認為自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是「日本人」的葉石濤，至今仍站在日本殖民者的觀點，去看待當時絕大多數台灣人民過的傳統漢民族生活。在他的這兩篇文章中，就提到他出生中小地主家庭，父母親雖會說、寫日語，但在家中絕不說日語，堅持過著傳統漢民族的生活；對於這種生活態度，葉石濤批評道：「我認為父母親有民族的尊傲，然

而它卻是錯誤的尊傲」；顯然，他否定了一般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表面妥協內裡卻是抗拒日本殖民的傳統漢民族精神；而這種精神也正是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皇民化運動想消滅的對象。

事實上，葉石濤今天的說法完全背離了他二十年前的說法。他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文學回憶錄》，其中有一篇〈日據時期文壇瑣憶〉，文中曾提到他今天譏為「錯誤的尊傲」的台南老家庭，當時他以這樣的充滿民族意識的筆調寫道：

「為什麼在日本殖地的軍國主義教育下成長的我，尚能保有明銳的批判精神，這應該歸功於我的「民族意識」呢…我的台南老家一向過著我國傳統家族制度的生活…所以我很少被日本生活方式污染…我們這一群台南府城的老居民既不是四腳仔派，也不是三腳仔派，是道地的兩腳站立的頂天立地的傳統派」。

就像葉石濤在這篇文章所寫的：當時的台灣人民身受日本殖民的壓迫，對自己漢民族的身份認同是毫不含糊、清清楚楚的，因此自認為自己是兩腳站立的漢「人」，而蔑稱在台灣日本殖民者為「四腳仔」的「狗」，更卑稱受日本御用的台灣人或裝著是日本人的台灣人為「三腳仔」。而五十多年前，歷史正義的力量已經使在台灣的「四腳仔」倒台，「四腳仔」又回復到一般日本「人」的身份而在台灣絕跡了；然而，也許是歷史的嘲弄，從二十年起，本來隨著日本「四腳仔」絕跡的台灣「三腳仔」，卻在台灣再現，並逐漸群聚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四、沒血沒淚的「『皇民化』就是『現代化』」論

一個自認為「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完全站在日本殖民者觀點的人，當然也會為日本殖民者在侵華戰爭末期，也就是日據末期在台灣推動的「皇民化運動」辯護。

葉石濤在這次的演講中居然明言：「皇民化」就是想使台灣人「日本人化」；「皇民化」就是使台灣「現代化」、「近代化」。葉石濤還自信滿滿地說：「只要檢證一下台灣總督府發布的這個「皇民化」中的每個條項就知道！」

那麼就讓我們先拿出當年日本殖民者的台灣總督府的〈皇民奉公運動規約〉，檢證檢證「皇民化」到底是什麼東西吧！

它的第一條說：「本運動是台灣全島民的「臣道實踐」運動」。

第二條又說：「本運動是基於「國體本義」，全力貫徹「皇國精神」…以確立「國防國家」的態勢，朝向建設「東亞新秩序」為目標」

大家都知道所謂「臣道實踐運動」，就是要台灣的殖民地人臣服為日本天皇的「赤子」、奴才，為日本天皇國家犧牲；而所謂「國體本義」、「皇國精神」，就是要台灣殖民地人盲目地崇拜日本的天皇和信仰日本的神道，因而狂熱地為日

本帝國主義獻身，並以此（皇民化運動）來建設日本的「國防國家」（軍國主義國家）；而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其實就是以「大東亞共榮」為號召的，日本對亞洲的侵略主義的美稱。簡單地說，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就是當年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侵略主義的思想和國策在殖民地台灣的翻版。

當年，「皇民化」運動在台灣的具體措施包括：(1)改姓名（拋棄漢姓名改日本式姓名）。(2)廢止台灣人拜廟宇拜祖先的傳統信仰，改拜日本神道。(3)禁止漢語和台灣方語，改說日本話。(4)在台灣募徵兵源。其實，「皇民化」運動就是企圖禁絕台灣人傳統的漢姓名、宗教、習俗、價值，從根本消滅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改造台灣人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所要求的、具有狂熱「皇國精神」的「法西斯式日本人」，為日本的侵略戰爭交出財富、物資、人力，為日本帝國主義犧牲，為日本的大東亞「聖戰」殉死。事實上，在維持政治經濟的殖民統治的同時，要台灣人在精神上「皇民化」，亦即要台灣人在精神上更加效忠。台灣人在政治、經濟上仍舊處於殖民地人的地位沒有絲毫改變，只不過在精神上被改造為有「皇國精神」的日本人；也就是，身體仍是殖民地人而頭腦卻成了所謂的「日本人」，「身首異處」的狀況。

簡言之，「皇民化運動」的本質，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在殖民地台灣榨取更多的物力、人力供其侵略戰爭當砲灰，而實施的精神動員運動。是整個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的戰爭總動員體制（包括經濟、產業、金融、社會、軍事）的一環。

事實擺在眼前，這樣的「皇民化」，絕不是如葉石濤所讚美的「現代化」，而是要把台灣「戰場化」；不但是反現代化，摧毀「現代化」，更要使台灣人在精神上成為「法西斯式日本人」，為日本「皇國」「賣命」，絕不是如葉石濤所稱美的要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

歷史證明，這樣的「皇民化」，榨光了殖民地台灣人民的物資、財富、人力和人命，在日本的侵略戰場上化為煙硝；有二十多萬的台灣青年被送往戰場，其中三萬名成為日本侵略戰場上不歸的亡魂。日本戰敗後，留下一個經濟崩潰、資源枯竭和精神深層殘留皇民意識的台灣社會，復歸中國，跛躓地走上戰後的歷史。

請問！有血有淚的人會說這是「現代化」嗎？有自尊的台灣人會認為這是「日本人化」嗎？「皇民化」是企圖使台灣人「鬼畜化」呀！是要毀滅台灣人呀！開口閉口說「台灣主體」！「台灣主體」！原來它只是以日本殖民者的皇民意識為底流的「台灣主體」。

五、都是站在「當道者」那邊的文學論

文中，葉石濤把楊逵、龍瑛宗打為「大中國主義者」，並認定他們在台灣文

學的地位上「不合格」之後，卻把呂赫若、張文環評定為台灣文學的「代表作家」，因為他認為他們是「台灣主體主義者」。然而，葉石濤先生！您似乎忘了，或者不知您有沒有讀過呂赫若在台灣光復初用白話文寫的兩篇小說——《改姓名》和《月光光》，這兩篇小說正是痛切地批判了「皇民化」的小說。如果呂赫若是所謂的「台灣主體主義者」的話，也是「反皇民化」的，它與葉石濤讚美「皇民化」的「台灣主體」是剛好相反的，有天壤之別的。何況，二二八事件以後，呂赫若更投身台灣的地下黨，獻身於紅色祖國的民族民主解放事業，有鮮紅的中國意識，絕對不是如葉石濤一般滿腦子只有「去中國化」的「台灣主體主義者」。葉石濤先生！您也似乎忘了，在日據末的皇民文學時期，您為了護主曾寫了一篇〈給世外民的一封信〉，文中便曾責備過張文環、呂赫若，說他們沒有「皇民意識」（在「皇民化」時期指別人沒有「皇民意識」，是一種政治羅織——筆者按），如果你指責的是事實，那麼呂赫若就是沒有「皇民意識」的台灣作家囉！可是依據你今天讚美皇民化的台灣主體論的標準，怎麼又把呂赫若評為台灣文學的代表呢？

如此看來，在台獨文學論當道的今天，指責楊逵、龍瑛宗是「大中國主義者」，真像極了六十年前「皇民化」期指責呂赫若、張文環「沒有皇民意識」的作為，都有政治羅織的味道。然而，葉石濤的故事還在異變呢，也就在皇民化時期的當事人都已物故的六十年後的今年，葉石濤居然又出面否認說〈給世外民的一封信〉不是他寫的，他沒有指責呂赫若，而是「西川滿用葉石濤之名寫的」（參閱《文學台灣》第四十二期，2002年4月）。這使我們記起龍瑛宗在台灣光復初寫的一篇短文——《文學》，文中龍瑛宗自省自勵地說：「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力言謊言與文學不能並存。如此看來，今日的台灣是不是又變成「沒有文學」的地方了呢？特別是捧為台灣文學界泰斗的「葉老」，到底那一個葉石濤是真；那一個是假的呢？

六、與當年國府入罪楊逵有何不同？

葉石濤是在兩篇文中的「訪問記」，指責楊逵、龍瑛宗是「大中國主義者」的；指責的標準是什麼？依文脈可知他是以所謂的「台灣主體」為準；而所謂的「台灣主體」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也沒有說明；就像，所有站在「當道者」立場的「指責」都是不需要說明的一樣，只要是一頂「大帽子」，大家都知道。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從再溫習大家已熟知的楊逵的文學活動和文學精神的特點，來逆推論葉石濤據以指責楊逵是「大中國主義者」的「台灣主體」文學論是什麼的東西吧！

大家都知道，楊逵在日據期是反日、反殖、反壓迫的社會運動和民族運動的

實踐者，這反映在他隨創作上就是他的文學精神；這種實踐與精神，在當時的日本殖民者眼中，當然是「非皇民的」、在文學上也是「不合格」的、要排除的；同樣地，今天自稱「在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讚美「皇民化」就是「現代化」，可以說實質上就是以「皇民意識」為主體的所謂「台灣主體」文學論，當然會視楊逵在文學上是「不合格」的，因此把它冠上今天台灣當道者慣用的「大中國主義者」，是最方便的。

更何況，楊逵在台灣光復初期，在日漸深化的省籍矛盾中，曾大力呼籲並力行省內省外作家的交流、團結和合作，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也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並批判托管派、日本派、美國派的文學是「奴才文學」；在國共內戰日漸進展到台灣海峽的一九四九年，他勇敢地提出《和平宣言》，呼籲國共與兩岸的中國人和平相處、要求台灣自治，並言明反對台獨；直到他逝世的前二年，他仍然不斷主張「中國與台灣要『統一』，但不要『一統』（〈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前進廣場》雜誌第十五期，1983年11月）。像楊逵這樣的務實的、理性的看待兩岸關係的主張和精神，在今日分離主義基本教義派眼中，仍然是不夠「純血」的，在台灣文學上是「不合格」的「大中國主義者」。這和當年國民黨政府入罪楊逵的這種主張和精神，把他打入黑牢的作法有什麼不同？

由上可知，葉石濤在這兩篇文章中的「台灣主體」文學論，它的實質就是「皇民意識」和「民族分離意識」的混成物。他就是依據這種文學論來貶貶台灣作家的。

七、恰好指責了六十歲以前的他自己

然而，「葉老」似乎有嚴重的健忘毛病，因為他似乎都忘了，至少在他六十歲以前（當然要和扣除自稱為「日本人」的前二十年）所寫下的白紙黑字，大多是以今天他指責的大中國主義的「中國民族意識」為基調的。如果以他今天指責楊逵為「大中國主義」者的標準來看，這個評定的標準，恰好也適用於他自己吧！

讓我們抄錄幾段他六十歲以前的文章來「溫故而知新」！

在1977年10月22日到27日，由《聯合報》副刊所主辦的一次「光復前台灣座談會」上，葉石濤的書面發言是這麼寫的：

「光復前的新文學運動是屬於抗日民族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一環……那便是推翻日本人的殖民統治，獲得解放和自由，重歸祖國的懷抱。因此，台灣新文學運動始終是中國文學不可分離的一支流……」。

該文後面還有一句比他今天所指責的「大中國主義」還要「大中國主義」；他竟然說：「光復前的台灣新文學是實踐三民主義的文學」哩！這完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當道的、肉麻的「大中國主義」論。

也許葉石濤會不平的辯白說，那是國民黨政府正在恐嚇鄉土文學派的氣氛下不得已的「表態」。那麼請問，當時有那個鄉土文學派作家這樣表態了？當時，總還有保持「沈默」不說話的權利吧！

那麼，讓我們再看看他在1983年出版的一本叫《文學回憶錄》的書，其中有一篇文章《「文藝台灣」及其周圍》；這篇文章有一部分談到在「皇民文學」時期他寫了一篇〈給世外民的一封信〉，指責了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是「狗屎現實主義」的問題，文中他深深地自我反省道：

「這種見解的錯誤，來自我的意識型態的不明確，那時我還未確立堅定的世界觀，我的思想裡充滿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遺毒。一直要到台灣社會發生巨變，即台灣光復，回歸祖國懷抱，擺脫殖民地的枷鎖，接受來自大陸的各種思想形態，讀破了五四文學運動以後豐富的文學作品以後才扭轉過來」。

這段話正恰如其分地批判了今日的「葉老」。請問「葉老」！你說這段話時，沒有國民黨政府的恐嚇吧！應該不會不是「由衷」之言吧！

把時間拉大來看，這段話也似乎印證了葉石濤在回答前述《中國報報》記者採訪時，自圓其說的文學觀，他說：

「文學歷史的觀點，是隨政治環境的空間與時間改變的，我認為，我自己的文學定位也是需要檢討的」

原來葉石濤的文學觀是隨著政治「當道」的變化而變化的；換句話說，原來他的文學觀就是「政治正確」的文學觀。結果，所謂「台灣主體」文學論又有了另一個面貌，那就是，它只不過是「當道者主體」的文學觀。不知道他會不會擔心，這種文學論將淪落為一個沒有主體或虛假主體的文學論。

八、「哀矜勿喜」的真意

這是台灣百年來殖民歷史的「瘡疤」，也是中國百年來在列強欺凌下民族自求解放的掙扎歷史中遺留的「傷痕」；只不過，這個「瘡疤」和「傷痕」在當今新的歷史條件中，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再度發作，隱隱作痛，牽扯著全民族的健康發展。

然而我相信，不管它是瘡疤也好，是傷痕也好，都是我們身上的一塊肉，是我們身體上生病的肉，只要我們身體自立自強，它總會好起來的。我們只有用科學的方法去認識它，「辨症論治」，而且一定要用最大的愛心和寬容、最堅強的耐心去呵護它、調理它。同時，更要講究整個身心的健康發展，才是調理身上疾病的根本之方，這是「不可或忘」的道理。

有批評才有進步，但「哀矜勿喜」卻是筆者內心的真意。

★

「白髮丹心馬列魂」

宇柔

今年八月底，帶著孩子們去看望住在安養院的、因腦瘤開刀失敗導致癱瘓的父親時，他氣沖沖地拿著一張報紙對我說：「呂赫若怎麼不是社會主義者？」並且對我說：「去把文章作者請來，我要和她說清楚……」因為家父曾和蕭坤裕蕭老關在一起，家父的回憶錄中是如此記載的：「…（蕭老）和呂赫若有深厚的友情，講話裡都稱呼閩南語的『赫若』。呂赫若在北一女當音樂老師時，經常來往，當提到呂赫若在汐止山區鹿窟建立台灣的井崗山，每天都以五星紅旗升旗，上政治課，還有軍訓時，看蕭老的表情是異常興奮；當說到呂赫若在山區的草棚、聽短波收音機時、被毒蛇咬死時就悲傷不已。呂赫若死後，內部出了叛徒…」因此說「呂赫若不是社會主義者」才如此令家父氣憤不已。在家父回憶錄中提及了另一個令他懷念的人：「…有一天出去洗澡，有一位中年的陌生人靠在我的傍邊，眼睛好像發炎紅紅的。他用日語問我：你是不是台北師範的學生？我回答：是，以後他自我介紹，是簡國賢，我猛然想起在桃園有一位醫生叫簡國賢，會寫劇本，聽鐵路局的戰友說，他所寫的劇本題目叫做『壁』的，曾經由鐵路局文工團演過話劇。我就問他：您是不是那位簡先生，他回答：是，兩個人就小聲的聊起來。以後每碰到洗澡時間有機會見面時，他一定來找我聊天。他告訴我他跑路十幾年，牽連到四十幾個人，可是，沒有一個被判罪，他自己快要上馬場町了。態度是那樣鎮靜，說話是那樣心平氣和，我就覺得有幸結識了這樣的了不起的人物，很遺憾不久要永別了，傷心不已。…」

猶記得首次踏上那座浸潤透烈士們熱血的山丘時，心如被撕裂般痛楚、耳邊盡聽見一聲聲槍響，滿腔悲憤只能化成一道道淚泉。儘管無法言語，但大腦卻是異常清醒，默向烈士亡魂發誓：「您們的路我們會堅定地走下去。歷史會還給您們公道的」。當昨天我得知另有兩位作家選擇的也是和千千萬萬為爭取全人類自由、平等、幸福而犧牲的志士們同一條道路時，我為之雀躍不已！長久以來，我苦思不得其解的兩個問題：（1）鍾理和是否也入了黨？（2）朱點人是怎麼犧牲的？透過電話諮詢，終於從可敬的革命老前輩那兒得到了解答——儘管仍有待澄清點並非全無。筆者卻迫不及待地欲告知同志們這好消息。（1）鍾理和入黨之事

乃邱連和在獄中談起的，並言因理和有肺病，故大家均為其隱瞞。當時高雄地區黨人的上級領導者為葉紀東先生。令筆者悔恨不已者，證人皆已不在人世，未能進一步瞭解全貌。然而卻已證實了筆者對鍾理和的看法：親身體驗過倫陷區東北嚴酷生活、尖銳的階級對立的內戰；堅決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反託管等獨立運動；堅持走人民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路線，而不肯與反共文藝政策妥協、隱忍過貧苦、孤獨的自食其力生活，用心於採集民間文學的精華…最後仆倒於文學的戰場上。如此的文學作家，豈是位泛泛之輩？筆者終於能充分體會其痛失和鳴之情。筆者擬更詳盡地另著文論之。（2）無論是大陸或台灣的文學史、小說選、著作集，對於被張深切稱為「台灣新文學麒麟兒」的朱點人，其死因有的說死於二二八之後、有的說是一九四九年槍斃於台北車站…。經革命老前輩的判決書記載，實乃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入黨，預定槍決於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身分為支部書記。筆者擬進一步釐清其被捕經過等。朱點人判決書上名字為朱石峰。筆者將另著文比較朱點人與被日本警察虐殺的小林多喜二的文學創作。

記得某一年廣島的日本朋友到台灣調查「強制連行」的倖存者，某名作家載我們奔馳在返回台北的公路上時，我因慶幸工作進展順利，唱了幾首歌，包括周璇等的老歌，作家扭過身，很奇怪地問我：你又不是外省人，怎麼會唱這些歌？這個問題，事隔十多年，當讀到家父回憶錄裡記載哪一首歌是哪位已壯烈成仁的烈士所教，哪一本書是哪位已光榮犧牲的烈士所推薦，甚至將一首首烈士們教過的歌譜，於六十年後，仍清晰地記載下來…我才明白，原來家父在我六歲之前一一教我的歌，是隱藏著悲痛、哀悼之情在做「傳承」的工作。我常問自己：倘若我不是我父親的孩子，是否仍會認同我父親的路？答案是肯定的。朋友藍曾問我：你是怎麼從一名虔誠的基督信徒變成一名馬克思主義者的？這充分證明了我背叛過父親。今天所走的路是書籍，眼見的事實，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的鮮血教育我的。我不配稱為馬克思主義者或左翼等，因我太淺薄、待學習的事物太多了。但我追求真理的腳走絕不會停止。連已七十幾歲的家父都將其寫於十幾歲時的絕命詩：「生為馬列生，死為馬列死。頭落似吹帽，血酒黎明時」改成了「白髮丹心馬列魂」了呢？



又是以偏既全的論法

——駁何六九於《左翼》第26號之觀點

何 苦

(按：各編號後之頁碼行數請參照《左翼》26號)

(1) 第34頁，上11行。大概所有民族革命理論均會有階段性、多目標的追求吧！！打強除軍閥，不是有對外，也有對內？而且打倒列強也不必然全是排外。排「外的非」，納「外的是」，不是更好嗎？

(2) 第34頁，下半部。孫文向日、英示好，若屬實，可能是策略運用。此格局應比陳水扁一邊一國論發表後，見勢不妙，立刻派人向美國解釋更為廣大吧！既然「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台灣國」，為何吹舉美國到如此沒有國格的地步？

(3) 第34頁，下半部。何六九在此好像是在影射批評目前的陳水扁或台獨，不斷爭取美、日支持他們反對大陸，也完全沒見到他們批評、譴責帝國主義？孫文的「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難道不也是針對帝國主義，團結第三世界？人總不能以偏概全來論斷吧！

(4) 第36頁，下半部。列強要求劃割租界是爲了自己利益，並沒想到日後會提供給中國諸多進步人士從事活動的場所。但不能因此而美化租界。此如同日本建設台灣是爲了日本帝國，並非爲了台灣人民；以前被列強殖民或租界過的地方，日後比較發達進步，有不少是因爲該此地區原本就比較開放、富庶，人民素質也較高，企業家、工程師較多故條做捕僅。列強絕非爲了中國人民，而將該地方建設得較進步，反而是將剝削利益運回諸列強的帝國，不是嗎？

(5) 第36頁，倒數第3行。沒有上海，或許沒有北伐；沒有上海，或許也不會有延安。若依如此聰明的邏輯，則：沒有愛因斯坦，就沒有相對論；沒有孫文，清朝就不會被推翻了？請看百多年前之1898年，俄國人布雷哈諾夫所著之「歷史中國人的角色」中，曾論及的八章內容，特別是歷史的偶然與必然吧！可能使邏輯會較正確。

(6) 第 37 頁，下半部。文化思想運動為何不提日本？或將日本、德國、意大利的法西斯文化思想做一併探討？列強豐富中也存在著貧乏，中國在貧困中也有不少具月里程碑的著作，不要又以偏概全了！！

(7) 第 38 頁，第 9 行。這個民族主義少了一份理知的約束制約，多了一份浪漫的狂暴性。這是否又再影射曾提出：「中國豬滾回去」的台獨教義洛？這些人也繼承了舊中國文化中，少數錯誤的宗洛偏狹思想，觀念中仍流著這些「歧視」？唉！自己總該反省一下吧！

(8) 第 38 頁，第 17 行。爲了早日取得民族解放，可以不惜中止新文化思想運動？果如此，應帶來民族的「不可解放吧！應是中止新文化思想中被「誤認爲進步」的思想吧！導入新文化思想中「真正進步」，且有「積極性」、「可行性」的東西才是更能加速早日解放！！

(9) 第 38 頁，倒數第 13 行。所有文明長足進步所不可缺乏的容忍異見的寬宏精神卻日益萎縮。容忍「異見」若是不淪爲「泛道德論」，若是「沒有外國勢力介入」，若是「還有一定的「可行性」，是應該的，也是必要的。不必說，連三歲的小孩也可知是文明長足進步所不可缺乏的，中國唐代、宋代就有許多經驗可循。但此若對照，第 31 頁、第 32 頁承認自己是堂堂正正中國人的陳映真，對鍾理和之有條件的容忍，批判性的容忍，對人、對民族出自愛心與考慮具體社會條件制約下的容忍，是否在層次上要比何六九、游勝冠高貴許多？

(10) 第 39 頁，倒數第 10 行。不依賴高度激昂而盲目的煽情，就不能把民族活力匯聚成攻堅的光束。大陸的領導人應有一大半人並非如此。反而台灣的陳水扁，大家更可看到他更多更高亢的呼口號聲。大陸有不少領導人對激昂而盲目的煽情更爲警惕，所以要大力反對挾「偏頗」民族主義而行分裂之實的恐怖主義。七十年代台獨不是有過參與不少爆炸案嗎？但後來判斷形勢，不再採取了，唉！凡事都會變，不要太絕對化了！！

以上簡單十點僅供參考，不論左、右，不論上、下，不論統獨，不論老幼，不論男、女，以偏概全，醜化對方，誇大自己的長處，這種做法好像對人對己都不好！這種缺點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也都會犯。請何六九不妨參考一下，日本人從較負面的學術角度來批評中國人的書，「中村元著，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如此，思想比較能夠進步快一點！！唉！人生何苦，花不少時間寫這種文章反駁人家！！和氣生財嘛！！唉！又是論人也論己！！

"理直氣壯"因何而生？ (三)

——回應〈當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何六九

馬克思主義者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以自己的卓越表現取得各階級階層人民的真誠信賴，脫穎而出，成為運動中的主要力量，這是近代歷史上常有的事。經過民族解放運動的階段，馬克思主義者領導各種革命力量終於奪得政權，也是近代歷史上常有的事。這些都是富有進步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不是（也不應該是）民族主義者，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必須把民族解放運動當作自己責無旁貸的迫切任務看待。然而，在完成民族解放歷史任務之後，馬克思主義者若是進一步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者（特別是血緣論民族主義者）自居，無節制地宣揚這個理念，那不但是不光彩的倒退，而且是徹徹底底的墮落。在這時候，若是看到有人敢於出來批判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和負面性，就激昂得口不擇言¹，非置之死地不可，那其實不是理直氣壯，那是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被揭露真面目時的老羞成怒，流氓嘴臉。

三·民族主義的負面性

民族起源神話的迷信、昔日光輝的懷舊情愫、雪恥復仇的決心、種族優越感、民族自豪感等等，這些都是在理性思考範疇之外。不過，不能因此而加以全盤否定。

在民族危難時期，敵我之間比較易於分辨，社會動員的政治目標往往可以約略簡化為我類與他類之爭，非理性的激情吶喊在當時足以發揮重要功能，喚醒和動員那些處於“一盤散沙”境況、普遍缺乏凝聚向心力的的大眾，去為民族的獨立自主而奮鬥。在這時候，民族主義是有力的號召；惟其激情，所以特別有力。這是毫無疑問的。一旦民族得到解放，這場民族動員奮鬥的歷史經過，自然而然成為這個民族人民引以為傲的光榮傳統，可以在民族的文化、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領域發揮凝聚功能，幫助他們克服當前和未來的種種困難。這也是毫無疑問的。

只是，最可貴之處其實還不在於此，而在於這個非常的歷史環境促使眾多人民從胸中燃起了追求解放的理想之火，認真執著地去思索如何建立一個加倍

美好的社會。不僅要求民族的獨立自主，而且要求政治民主與人身自由，要求社會正義，要求文化思想生活更進一層樓。不僅要求自民族的解放，也會真誠關切其他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是以近百年來，凡是做得有聲有色的民族運動，大多都有極為濃厚的民主運動、社會運動和其他運動的成分。惟其如此，所以能夠使得民族運動蘊涵更豐富的內容，吸引更多雄厚的支持力量。這些大多是在民族的感性呼喚以外，但是都與民族解放運動的大環境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長遠說來，遭受群體性壓迫所引起的憤怒反應，其實遠不及追求社會新生命的動機，來得強烈而且持久。通過民族運動，各方人士點燃了追求理想的熱情，無比的民族活力當然得以釋放出來。應該說，是這些理想得到那些感性訴求之助，而有更好的發揮；而不是單純的民族感性訴求促成人們對於理想的追求。在民族主義旗幟下，更多的人們是爲了這個比激情呼喚更有具體內容的理想，以更大的決心，發揮更大的主觀能動性，前仆後繼地向前邁進。因此之故，最具理想性的左派，往往是民族解放運動中最爲傑出的一群。左派也因此能夠從民族解放運動中脫穎而出。不單是左派的社會主義理想而已，民主與自由的理想也能夠在左翼以外的人士當中發揮同樣重要的影響力。

不少學者和政治評論家常指出，民族運動在開端時都與民主訴求一起提揭出來。有人進一步指出，二者在哲學思想上有相同之處²。一般人也以爲民族運動與民主運動是二而一的，一旦民族國家得以建立，民主體制應該得以建立，個人自由也應該得以保障。

然而，事實並非全然如此，而且絕大多數均非如此。民族解放運動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這個高貴理想性，總是跟民族解放後的政治現實有相當大的落差。這是值得我們思索的。

反民主基因

十九世紀初期拉丁美洲各地的民族運動，在本質上是反民主的。那些早已落籍於該地的西班牙裔官僚軍官集團和地主階級認爲，當時西班牙殖民母國從事的民主改革，很可能對殖民地被統治人民帶來不良影響，促使後者奮起爭取民主權利。他們當然相當不滿。因爲，這個發展會嚴重危及他們過去數百年來在當地所建立起來的權益地位。所以他們公然反對殖民母國的民主改革，紛紛宣佈民族獨立以求維持現存體制於不變。一般將這種情況當做現代民族運動史上的異數看待，較少討論³。不過，此類情事的確發生過，而且曾經轟轟烈烈地席捲了整個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歷史，因此全部改觀。

爲了反對民主潮流而展開民族運動？乍看之下，這似乎令人意外。可是，這些反民主的民族主義者，其實並不反對統治階級內部的民主。當年法國大革命期

間，資產階級口頭上喊的是“自由、平等、博愛”，實際上拒絕無褲黨和無地農民加入民兵組織，連投票權也只限於自己階級內部享用。他們與拉丁美洲的民族運動先驅者之間，豈有根本上的差異？

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民族是舊貴族階級爲了從國王手中奪回封建特權而舉起的旗幟。後來，這個旗幟被資產階級所奪去，成爲法國大革命的有力象徵。德國大文豪哥德首次在戰場上聽到法國軍隊“民族萬歲”（而不是傳統的吾王萬歲，或者上帝保佑）呼聲之後的數十年間，法國社會經歷多次的革命與反革命。起源於大革命時期的馬賽曲，一直爲革命派人士和工人階級所喜愛，卻是保守派所深惡痛絕的，在十九世紀屢遭禁唱。其命運多舛適足以反映出這段期間不同階級力量的興起陵替，民主共和制的一波三折。到了十九世紀的八十年代，因爲資產階級統治的全盤鞏固，民主體制確定下來，馬賽曲才正式成爲法蘭西國歌⁴。

至於在普魯士王國手中統一的德國，也沒有很快成爲一個民主國家，而且有很長一段時期都是不民主的。從南北德统一到二次大戰結束的七十餘年之間，只有十餘年的共和國歲月。一般民族運動雖然在起源上與民主運動有密切關連，民族解放卻不一定會爲當地政治民主的實現奠定基石。可見，民族的獨立解放並不同於民主政治的落實。

如果說，個人的生存與思考，必須在民族架構之下才有意義；爲達成民族的神聖目標，得以逼迫個人或者少數人犧牲一己的利益考量，壓制他們的思想。這豈不是意味著，民族主義本身含有反自由、反民主的哲學基礎⁵？以近百多年來世界各地的民族運動實例來看，達成民族解放以後的國家，統治階級或者集團大多會犧牲人民的自由民主，以求成全民族的理想⁶。而這個民族理想，其實是他們在取得國家政權後，依據自己的政治需要和自己的世界觀所自行制訂，並且強加於大多數人民的。民族豐功偉績的宏圖遠景，恰好成爲他們逼迫多數人屈從的藉口。在這些國家裡，愈是把民族提到神聖無比的地位，人民的政治權利愈見萎縮。

一名流亡異國的海地學者在他的一本著作⁷中，追述海地黑人奴隸舉事革命，驅逐法國殖民政權，成爲拉丁美洲第一個取得殖民地解放的民族國家。海地的建國僅比美利堅合眾國的立國略晚數年。在當時，這個共和國的所有公民，不分階級，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其實比美利堅合眾國還要激進許多。革命之後，統治集團逐漸形成，開始建立和把持壟斷國家機器，而且二者進一步融合爲一體，獨裁殘暴地壓迫和剝削整個海地民族的人民。民族解放兩百餘年後的今日，海地仍然是一個暗無天日的哭泣島嶼。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是民族運動與民主理想互相背離的一個實例。本書以《國家敵對民族》爲名，頗饒意義。

在達成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國家的國家機器之後，民族主義的政治角色改變了。它不再需要員人民大眾來抵抗和驅逐外來侵略。它轉變成爲統治階級或者集團用來控制人民大眾以及鞏固政權的工具。其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解放前的功能是社會動員以對外，解放後則是對內進行統治。這就無可避免地使得民族主義思想內容，成爲特定政治集團或者特定階級階層的精神面貌的翻版。從此，民族主義不再是有助於提昇民族精神生活以更上一層樓的激素。相反的，它在國家機器無所不在之手的主導下，成爲統治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爲用以方便規範人民思想與行爲的尺寸。

自此，民族主義喪失了它原來的面貌。在取得民族獨立解放之後，至少在中短期內，只有在極少的實例上，非理性感情訴求會隨著歷史任務的完成而消失，或者減低其重要性。在大部分情況下，它反而開始排斥原來的理想性。

二十世紀以來的民族運動，大多在達成民族獨立的目標之後，換來獨裁政權橫行一時。獨裁集團用莊嚴華麗的民族主義外衣，掩飾自己的殘暴——有時候比以往異民族統治時期還更加令人髮指的殘暴。諷刺的是，這個獨裁政權已經從民族運動中取得了正統地位。這很可能使得反獨裁的民主力量比以往殖民地時代更加難以結集。

真正的民主運動者固然應該挺身而出。可是，這是何等困難的工作！他們所必須承受的非難與必須面臨的困難，恐怕要遠超過於他們當初爲了倡導民族解放事業所遭遇到的一切。許多在異民族統治下不屈不撓的民主運動者，卻在本民族解放後的新建獨裁政權統治之下，長期沉默或者永遠沉默。

社會內部不同階級與不同集團，從民族解放運動開始初期就縱橫捭闔，準備爭奪國家機器主導權，或者準備重新建立自己的國家機器。民族解放一旦達成，這個爭奪戰愈見慘烈。對於那些缺乏長遠政治展望的強勢階級或者政治集團而言，以血腥手段消滅對手，粗暴踐踏民主訴求和強力壓制異議聲音，大概是他們有限政治智慧所僅有的抉擇。可是，在此過程中遭受到損傷的，不僅是民主權利而已。因著一再被出賣且無力抗拒而產生的悲觀和灰心，使得民族解放運動期間難能可貴的思想朝氣和政治意志逐漸成爲過去。於是，思想貧乏的民族主義狂熱所動員起來的非理性力量，毫無節制地發揮那些過去普遍存在於傳統社會裡的無知偏見、貪婪殘暴的負面性，快速吞噬這個新興民族的高貴理想和精神活力。民族激情後的失落，竟然如此不堪。

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期間，范農的璀璨文采和深邃思考所代表的一切，都在獨立後喪失殆盡。在革命期間，運用民族激情便能撼動、喚醒如此眾多的人民群眾，何其便當。從事耗時費力而且不能立竿見影的文化耕耘和思想建設，豈不是多此一舉？回想起來，在建國之前，在絕大多數阿爾及利亞革命家和他們所

動員起來的群眾當中，除卻民族解放的熱情而外，較有深度的政治文化思想是不被重視的。五十年代在范農感召之下挺身出來聲援阿爾及利亞革命的各國出色思想家、文學家，眼睜睜地看著這個新國度成了血腥遍地的殺戮場，幾無生機可言的文化沙漠，以致於舊日殖民國法蘭西的文明澤惠，都要從這塊土地上消失。范農以其不世出的才華，雖足以折服如沙特等世界聞名的哲學家，仍然無法以一己之力填補阿爾及利亞革命的思想真空。如此說來，在起源上，民族主義有時候竟然不但無助於打破精神奴役的現況，而且還使之加深起來。

激昂的民族呼喚，愈是成功喚醒和動員社會力量，帶領人民克服重大困難，愈可能成為不可替代的神聖原則。愈是經過苦難奮鬥過程的民族，愈不能忘懷那曾經在最黑暗時刻有效鼓舞士氣的民族主義呼喚，愈執著要在民族主義裡尋找萬靈的妙方。即使統治集團裡的某些派系不急於排斥異己，不急於依照自己形象來重塑整個社會，或者強勢階級不急於壓制其他階級，基本困境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

除了從異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這一個要求之外，民族運動的政治目標，其實既不明確也不具體。因為民族運動是各階級階層、集團派系、族群地域間的暫時聯合陣線。若要十分仔細加以明確規範，這個聯合陣線極可能無法維持下去。政治目的不明確，反而使得聯合陣線成為可能。在此情況之下，民族運動的共同政治目標本身就帶有一定程度的蓄意模糊性。換言之，民族主義必須保留強烈的感性，才能夠保存生命力。只是，渡過解放運動的危難時期之後，現代社會內外交錯互動的種種複雜問題，馬上傾瀉而出，並且來得無比的急促而凶猛。這就不是那個哲學基礎因陋就簡、政治目標從未真正明確規範的民族主義，所能夠輕易概括的了。

民族主義思想內容愈是難以界定和不易捉摸，愈容易引起非理性的情緒反應，因而也愈容易成為神聖不可侵犯和不容置疑，愈方便當作政治工具。總是會有某些派系集團和政客人物，特別喜好挾民族主義以自重，依賴言語煽動激起狂熱，來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恰好提供給他們以訴諸情緒和原生本能的大好機會。貧乏的統治哲學，加上民族狂熱成分，仍然可以成為強有力的統治哲學，或者其替代品。

在較為成熟的文明社會裡，一般政治文化素養較為深厚，懂得在複雜情勢中顧及各種層面上的考量。在此情況下，狹隘的民族主義訴求，肯定會遭到其他較具豐富思想內容和嚴謹哲學基礎的政治理念的反制，不易在突然之間成為失控的脫韁之馬。當一方高舉民族主義大旗的時候，另一方可以如同英國的約翰生那樣反加譏嘲：愛國主義是惡棍們的最後避難所。

但是在政治文化上欠缺應有深度（這與文明之古老與否無關）的社會裡，民

族主義很容易成爲唯我獨尊的政治理念；像是善嫉神祇的基本教義派信徒一般，容不下其他不同的立場和見解。這樣的社會缺乏思想多元性和政治包容傳統，不足以支持理性的批判思考，去有效制衡感性成分極重的民族主義狂熱。試想，成群結隊的人們只要站到民族大義的旗幟之下，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四處橫行，濫施語言暴力，繼而拳頭暴力，掄起大刀砍人，而且還能夠公然招兵買馬。如果這個社會沒有足夠的反制力量，怎能不加速度墮落沉淪呢？

於是，“恢復古羅馬光榮”的口號，居然使得意大利舉國瘋狂；亞利安種族優越論，也在德國大批富有學養的知識分子、中小學教師與大學教授學者當中引起熱烈迴響。更不用說那些還沒有進入現代文明世紀的傳統社會了。野心政客煽情的民族主義呼喚，可以十分迅速地逼迫異議者沉默，甚至永遠沉默。這不但造就一個政治專橫的僵化社會，也造就了一個易於輕啓侵略戰端的危險國度。原來給人民帶來莫大主觀能動性的民族主義，如今反而給這個民族帶來一個莫大的危機。

不知節制地把“民族精神教育”當做最重要的教學內容的教育體制，不可能教育出勇於追求真理、思想豐富、善於分辨是非、具有寬宏胸襟的公民。從戰前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舉國公民充滿民族狂熱一事來看，我們應該有深切的體會。這種質料的公民是野心家煽動的大好對象，是簽署“請戰書”⁸、從事內外戰爭的優質炮灰。由如此素質的公民所結合而成的社會，沒有能力處理多元民族的現實問題，也沒有能力處理現代社會不同區域和區域間的複雜問題。如此的公民，是一個蠻橫無理的統治集團手中最大的資產，是所有民主運動者和批判思考異議分子最大的厄夢，也成爲統治集團內部派系彼此鬥爭、互相牽制的一個不易控制的因素。

在此意義上，民族主義與民主政治不是互相牴觸嗎？

民族激情一旦泛濫，必定會溢出本民族的範圍。一個民族可以解放自己，終於成爲國境內的強勢民族。可是，新的強勢民族一般都會開始效法過去外來統治強勢民族的霸道和傲氣⁹，以爲武力可以解決一切。他們同樣的自以爲本身優越無比，開始堅持依照自己（應該說是這個民族的統治集團）的意旨來安排弱勢民族的生活，從事粗暴的羞辱、歧視和同化政策。殊不知，大如大規模的屠殺、強制遷徙政策，小如強迫錯認祖宗、地名和姓氏的更改，都無可避免地要一再引起弱勢民族的強烈反感。

境內異民族或者少數民族的民族反抗運動一旦興起，即使是獨裁殘暴而且異常強大的國家機器，也是撲滅不了的。一個新興的獨立國家，常常因爲不能妥善處理境內多元民族問題，而處於分崩離析狀況。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通過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而成立的獨立國家，很多因此而內戰不休、互相屠殺，其中絕少有

圓滿成功解決糾紛的例子。

如果不能有效制約強勢民族的民族主義激情，多元民族不可能和平共處，民主政治也就不是可能達成的。不幸的是，偏激的民族主義者不可能有這個眼光。而純粹民族主義者終究能夠不變得狹隘激情的，畢竟是少之又少。

漢族民族主義者的歷史世界

以自己的民族傳統為榮，乃天經地義之事。不列顛民族至少有歷史悠久的大憲章、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法蘭西民族至少有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提綱和傲人的現代哲學思想、藝術文學；美利堅民族至少有他們的獨立戰爭，獨立宣言，拓荒創業精神，人身自由保障與民主政治傳統。所有這些傳統，也許並不是自己民族所獨有的，不過都是活生生的事物，仍然存在於他們民族當前日常的政治生活與文化生活之中，持續不斷地發揮影響力，產生民族凝聚力。

可是漢族民族主義者以何為榮？炎黃這兩個神話虛構的石器時代人物？象徵著威權暴戾的五爪金龍？象徵著數千年種族戰爭和閉關自守的萬里長城？自宋元以來，創造力逐漸枯竭的“五千年文化”？在異族強大軍事力量下達成的大一統和天國威儀？早已經陷於僵化境況，不足以因應現代世界現實的儒家倫常道統？除了這些之外，難道找不出較為晚近和較有鮮明生命力的東西嗎？比起若干富有朝氣的民族而言，百年來的漢族民族主義者所喜愛吹噓的，實在太欠缺想像力了¹⁰。

愚昧無知是傲慢自大之母。但是，我們不能說，五四運動以來的漢族知識分子不曾努力向愚昧無知挑戰。對於自己民族命運充滿迫切無比的關懷與憂慮，當然要以絕大的決心和緊迫心情擺脫舊傳統無比沉重的束縛。可是，對於民族未來的無限關懷，卻也促成他們對於民族過去歷史的盲目忠誠。殊不知，愈是求變，愈是回歸原狀。

儒家的倫常道統，足以影響人們的日常思考和行為，這固然是個事實。但是，歷史觀更足以規範人的政治思想。歷代知識分子以傳統世界觀為藍本所編著的浩瀚鉅大歷史著作，在世世代代的知識分子觀念裡鞏固這個世界觀。歷史（應該說是歷史的解釋）是傳統觀念最有力的防腐劑。他們堅持把兩千多年來的中國歷史，說成是一個以天下一統為依歸的發展過程¹¹。所有不能符合這個模式的歷史現象，都被他們當做是不足取的。例如，像宋代那樣在物質和精神文明都空前高度發達的時期，因為沒有能力在軍事上殲滅遼、金等異族強國，而不得不學習與異族強國共存共處之道。僅僅為了這個原因，這段歷史備受百年來漢族民族主義者的一再垢病。即使是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思潮前驅者，也絕少能夠避免這種偏見。在他們眼裏，物質和精神文明的造詣根本是次要的，多元性的族群和國家主權安排，即使能夠帶來數百年的和平和繁榮，也都是不足取的。

可是，這種大一統的歷史觀，跟過去與當代中國的政治現實相距何其遠。民族同化理論在基本上是不肯容忍異己的。天朝獨大，唯我獨尊觀念，豈能見容於現代文明國際社會的常規。而漢族民族主義者卻以為忠誠於這種思想模式，就是“向歷史負責”。

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民族的共同記憶體的內容與性質，也影響這個民族精神面貌的未來發展。在所有以文明成就自詡的現代國家裡，無論是單一民族或者是多元民族國家，對於自己民族近代史的研究，莫不是十分的豐富多彩，在應有盡有的領域和題目，從各個角度、以各種方法從事詮釋闡述。其中有著現代文明人對於真理的執著追求，也有著對於特定立場的頑強辯護和挑戰。這方面的爭端，幾乎是無休止的，而且有時候是相當激烈的。民間與官方，莫不多方贊助這些研究工作以及著作出版。從而，民族的共同記憶體包含了不斷新生和一再豐富化的思想內容，反映當前日新月異的文化生活以及其他所有層面的廣度和深度，多方面滋潤當前的民族精神生活與日常思考。

比起以前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近百年來有著更多的人在從事對真理的探索追求，對更多的課題進行探討，也一定會比以往最輝煌時期取得更加豐碩的文明成果。長期不斷地快速積累知識，不斷改變民族的精神生活內容，所有舊有的倫理道德體系、傳統文明的內容，以及一般公認為理所當然的共同歷史記憶，都必須不斷接受當代人重新思考的檢驗。這不是任何政治威權可以阻止得了。只有這樣的民族精神生活，才能夠配合凌亂而多變的民主政治¹²。在此情況下，歷史記憶體是文化酵素、思想養分。只有一個精神枯竭的社會，才會只知道從古老文明廢墟堆裡尋找進步的靈藥。只有在一個野蠻的社會裡，民族的記憶體才會僅僅充滿仇恨報復、征戰吞併意識，從根本上排斥新氣息、新思考。

在中國與台灣這兩個把漢族民族主義當成官方統治哲學體系最重要思想支柱的地區，在關於自己歷史（特別是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上如此的貧乏膚淺，刻板教條，缺乏創意，甚至遠不如專攻中國近代史的他國學者。如果說，歷史的詮釋是當代人長考省思的一個忠實反映，那麼我們只能說，這些地方的人們停止新的思索久矣。在此文化沙漠，民間社會所需要的文化思想新種子，即使幸而得以落地，殊難逃避枯死或者扭曲變種的命運。當一個民族迫切需要本著活潑創新、勇敢想像的精神，從新的角度從事思考，以面對新挑戰和解決諸多迄今都解決不了的重大難題的時候，病態扭曲、呆滯而了無生氣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觀，密不透風地緊緊地鎖住了人民的心靈。而這一切都是奉民族大義之名。

（待續）

☆

註釋

1. 魯迅當年曾經形容上海無賴打架時慣用的一種打法，叫做“糞帚戰術”：舉起一把糞帚，厲聲吆喝“你來你來”。若是真有誰上去了，無賴就揮舞糞帚，漫天洒去糞水。魯迅感慨說，此種戰法“能使勇士卻步”。看來，大量不堪入耳的穢語也可以用在“糞帚戰術”上，當糞水使用。
2. 這種說法以為，民族一詞其實等同於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WethePeople”。GhiaNodia,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L. Diamond, M. Platter, eds., Nationalism, Ethnic Conflict, and Democracy, 1994.
3. 也有人將之歸類為殖民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對立，不是單純的民族解放問題。不過，這些由地主官僚首開其端的民族運動，後來在二十世紀演變成為活力十足的民族運動，有些還曾經表現出反帝性質。無論如何，這說明民族運動起源與發展的多元、多變。
4. Eugene Weber, 'Who Sang the Marseillaise?', J. Beauroy, M. Bertrand, E. Gargan, eds., The Wolf and the Lamb: Popular Culture in France, 1977, pp161-173.
5. Isaiah Berlin, 'Nationalism: Past Neglect and Present Power' in Against the Current, 1980.
6. E. Kedourie, Nationalism, 1961.
7. Michel-Rolph Trouillot, Haiti, State against Nation: the Origins and Legacy of Duvalierism, 1990.
8. 在1995-96年間，中國準備對台灣發動空前的武力恐嚇，解放軍上層授意展開的士兵簽署上書運動。“請戰”風潮若是發生在民主國家，肯定會掀起軒然大波，被社會輿論認為是軍人干政，是對民主體制的空前威脅。只是，許多國家的軍官，常常宣稱為了他們的“民族”而走出軍營，推翻文人政府，實施軍人獨裁。在這裡，評估政變行為的標準，不應該是愛國的真誠程度。那些為中國解放軍的“請戰”運動而雀躍興奮的愛國主義者，很可能不了解，這種方式的愛國是很不文明的。
9. 事實上，很多都是青出于藍。取代滿清的漢人政權，在處理境內異族問題上，反而不如大清朝廷的睿智寬容。漢人政治領導人物的霸道，則遠超過於大多數滿人皇帝。參閱林濁水，'民族主義變奏曲'，《瓦解的華夏帝國》，1985，p117.
10. 若干學者甚至以為，中國漢族民族主義在思想內容上，遠比其他主要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還要空洞模糊。Lucian W. Pye, 'How China's Nationalism was Shanghaied',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January 1993, pp126-7.
11. 一部涉及多民族、朝代興亡、分合無常、疆域一變再變的歷史，不但是行政體制的歷史，至少也是族群的、社會的、階級的、科技的、國際交流的、哲學思想的、文學藝術的、自然力與人力互動的歷史。若要強硬說那是一部“中華民族統一”的歷史，所需要的不是歷史素養或者歷史研究，而是主觀願望和想像力。依照某些人的說法，數千年來漢人與他族間不斷的戰爭，好像都不是對抗性的，而是蘊涵著某種不可知的融和與統一的天意。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史學家，似乎大多跳不出這個俗不可耐的“醬缸”。
12. 一位當代美國評論家說，“誠實的歷史是自由的武器”。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1992, p52. 百年前(1882年)，法國學者Ernest Renan也曾說，歷史研究的進步終會促成民族主義瓦解。

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

〈三〉

黃志龍

〔三〕蘇聯的新經濟政策（NEP）

A. 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早期 NEP）

剛剛從俄羅斯革命中誕生的蘇聯社會，在經過短暫的「戰時共產主義」體制之後，宣布採取以市場經濟的利用為主要特色的「新經濟」政策（NEP）。新經濟政策就是革命後所成立的蘇維埃政權，為了迅速復興國民經濟，做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準備工作，所實施的市場經濟政策體系。

1921年7月，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屆大會上提出「新經濟政策」的期中報告，他強調：「採用NEP，主要是從實踐上的考量出發——是因應情勢的需要而改變的經濟政策……」。從此，大多數的研究者都是從「實踐上的因應」的觀點來研究NEP。例如，「蘇維埃俄羅斯史」的作者E.H.Carr就認為：「NEP並不是一開始就被全面的認識，而是慢慢成長的一連串措施……」，故而強調其「因應現實」的面向。這種傾向成為二次大戰後研究「NEP」的主流，將「新經濟政策」視為是蘇維埃政權對國家資本主義的階段性運用，認為「新經濟政策」的施行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和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為了掌握商品生產，展開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無產階級國家機器一方面廣泛地利用現存的商品、貨幣市場體系來發達社會主義經濟成分；一方面在日漸擴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基礎上，逐步地消滅商品、貨幣市場關係，為轉型至「計畫性生產／分配」體系做準備。

在這種看法中，商品、貨幣關係和計畫性生產／分配體系被視為是彼消我長的二元對立關係。因此，如何透過對前者的運用來轉型到計畫經濟體系就成為問題。

事實上，列寧的社會經濟認識並非是一成不變，其經濟理論和社會主義建設路線是隨著NEP實行，在實踐過程中逐步修正。列寧將「國民經濟和社會主義工業之間的商品交換」視為是在農民佔有人口中絕大多數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過程，因此，當我們在著手研究NEP的經濟理論時，就不得不涉及「市場」和社會主義的關係。以前蘇聯的經驗來說，從「戰時共產主義」轉移到「新經濟政策」體系的過程，就意味著從計畫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復歸。而NEP的推行，就是在展望在「市場」和「計畫」的「媒合」過程中，創造條件再度地由「市場經濟」轉型到「計畫」體系。

(1) 戰時共產主義到NEP

新經濟政策肇始於1921年三月的蘇共第10次黨代表大會。蘇聯共產黨在該屆大會中宣布取消「糧食分攤徵收」政策，改為依照農業產量來課徵「糧食稅」。列寧在大會的報告中，將這種政策轉變的本質規定為：蘇聯共產黨「與農民關係的正常化」。

這種政策轉變，導因於當時俄羅斯社會的具體情況。首先，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10月接收了崩潰中的俄羅斯社會，並著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但是在一切建設都尚未走上軌道的1918年，一方面由於西歐帝國主義列強的干預；一方面由於受到帝國主義鼓舞的白軍也趁機發動叛亂，導致蘇聯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

1918年3月，布爾什維克政權為了鞏固剛剛誕生的革命政府，宣布與德國締結屈辱性條約，致使原來在十月革命後才加入俄羅斯蘇維埃政權的「社會革命黨」左派，藉口退出蘇維埃政府，並在7月公開叛亂。農民的叛亂擴大了蘇聯內戰的情勢，為了打敗帝國主義列強和內戰，為了保證政治和軍事鬥爭的勝利，蘇維埃政府在1918年6月底宣布實施以：一、工業部門全面收歸國有；二、物資流通由中央集中管理，禁止私人經營商品買賣；三、農民的農業產品分攤徵收……等措施為主要架構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

戰時共產主義可以說是基於上述形勢的需要所採取的「非常措施」，其政策的形成有下列三個背景：

1. 當時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趨勢，是在金融資本的主導下發展以重化業工業為主的「重、厚、長、大」型生產構造。以德國為首的「後進」型資本主義國家，正是在這個趨勢下逐漸走向以金融寡頭、產業獨佔為特徵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俄羅斯在十月革命前也有這種傾向。這種傾向在革命後致力於恢復生產秩序的過程中得到鼓勵，並在戰時共產主義階段進一步強化。

2.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等參戰國在流通與分配領域採取戰時統制手段，排除一切商業經營。俄羅斯也在1916年在都市地區實施配給制度；1917年的臨時政府更進一步推行「糧食專賣制度」，要求農民以公訂價格繳交農村餘糧。

3. 由於國營工業的生產未上軌道，沒有足夠的工業產品來交換農村的農業產品。爲了籌措糧食，臨時政府不得不發動國家權力向農民徵收。這種「糧食分攤徵收」政策，是由中央政府依據工業生產（農產加工）、勞工消費和軍隊配給的需求總量來制定徵收指標，然後透過縣、郡、鄉、村等行政層級向農民強制徵收。

上述的經濟統制政策，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由於物資不足和國營流通機構的機能不全，無法徹底落實。因而導致黑市叢生和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活動更退回到「以物易物」和「自給自足」的前資本主義狀態。「糧食分攤徵收」政策也由於收購的價格偏低和通貨膨脹，實際上就等於是對農民的無償徵收。加上，由中央制訂的徵收指標又往往超過農村餘糧的總額，導致農戶所保留下來的自有糧食往往不足以供應其家庭消費和農業再生產（如種籽等）的最低需要量。更有甚者，一旦農民被認爲有隱藏剩餘糧食的行爲，立即被戴上「富農」（Kulak）的帽子，不但農產品要充公，連傢俱、牲畜、甚至房屋、衣服都要沒收，嚴重的打擊全體農民的生產意願。

因此，當內戰即將結束之際，如何收拾「糧食分攤徵收」這個爛攤子，就成爲標榜著「工農聯盟」的蘇維埃政權的首要任務。

所謂的「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體系（同時也就是NEP在現實上的開展過程），基本上就是以廢除糧食分攤徵收政策來復甦農業生產，並依據其生產復甦的程度來整備和擴充流通、分配機構，從而重建國營工業的一連串政策過程。

1920年初，白軍幾乎在所有的戰線上潰走，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也日漸平息，蘇維埃政權收復了舊俄羅斯絕大部分的領土，重新取得了以「工農聯盟」爲基礎著手建設國家的歷史條件。2月，托洛斯基在視察烏拉爾地區的駐軍時目睹了農村的慘狀，旋即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提出從根本上修正農業政策的提案。托洛斯基主張：在維持既定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構想（如，逐漸促進農業集體化）的同時，藉由廢除「糧食分攤徵收」政策，改爲按照農業產量徵收「貨物稅」，並允許繳稅後的農產品與國營企業的工業產品和農村小工業製品在市場上進行交換，用以刺激和恢復農民的生產意願。

1920年12月，全俄羅斯第八屆蘇維埃大會宣布內戰勝利。社會革命黨左派和

孟什維克也在大會上提案廢除「糧食分攤徵收」政策，其提案的內容與托洛斯基幾乎雷同。但是，托洛斯基的提案在大會上被指控為「走向商業自由化」，而社會革命黨左派和孟什維克的提案也被認為是布爾喬亞政策，皆遭到列寧以及大部分的政治局委員的否決。於是，內戰結束後仍然繼續執行分攤徵收。

但是，內戰後的經濟危機更加惡化，城市和農村都陷入了極度疲弊，而農民的不滿也達到了頂點。帶有無政府主義傾向的農民叛亂使得問題日漸尖銳化。

在這種情況下，列寧不得不改變他的想法，轉而主張應該調整工人與農民之間的關係。1921年2月4日，列寧坦率地承認：「今年冬天農民已陷入極度貧窮、無望的狀態，他們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4天後的2月8日，列寧進一步同意：農民透過市場，自主性地追求生產的擴大。也就是廢止分攤徵收制度，引進糧食稅，容許剩餘農作物在地區範圍內的進行自由交易。這就是說，在1921年2月28日發生「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叛亂之前，列寧已經提示了NEP的要點。

3月15日，第十屆黨大會承認了根據列寧的草案所作的提案，並在3月21日交由全俄羅斯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採用。此舉，揭開了以「引進糧食稅，容許剩餘農產品的自由交換」為基本內容的「新經濟政策」的歷史序幕。雖然，該項政策只容許在地區性範圍內開放市場，但無疑是根本性地改造了以農產品分攤徵收為基礎、由中央集權統制社會再生產過程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體系。

（2）工農聯盟的變遷

1917年4月4日，列寧在其「四月方針（these）」中宣布：革命要轉為由無產階級和「貧農」共同掌握國家權力的「革命的第二個階段」，展示其走向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的戰略方針。

當時列寧的經濟建設方向是「以社會基本生產手段的國有化為前提，由先進工人管理的大規模經營（包括工業和農業）」。當時的列寧認為，只要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繼續存在，「小商品生產」並無法解決大眾的窮困。農民所追求的小商品生產只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而已。

「四月方針」正式出爐的一個星期後，列寧察覺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機會將要到來，必須儘快建設「工農聯盟」以做為革命「主體」。當他看到農民開始自發地從地主的手中奪取土地時，立即發出：「依據農民代表的決議沒收地主土地」的呼籲。可見，革命實踐家列寧的靈敏的戰術轉變。

8月中旬，全俄羅斯農民大會收錄了242封代議員的要求書，以「模範要求書」的名義：宣布「土地為人民所有」，要求禁止土地買賣、土地均等分配、廢止僱傭勞動……等等。這個要求書，也就是所謂的「土地社會化綱領」，就是曾

經被列寧批判為小布爾喬亞的空想而排除的，以農民的小商品生產為前提成立「農村共同體」的願望。但是，基於「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實現社會主義」的戰略方針，雖然列寧於8月底仍然認為「土地社會化綱領」是「希望與資本家結盟而初步走向社會主義」的小商品生產者的不自覺地樸直願望，但卻對它採取容忍的態度並給予承認。不過，列寧並不隱瞞他的容忍和承認，是為實現將政治權力轉移給無產階級的權宜戰術。

1917年10月25日，震撼全世界的俄羅斯社會主義革命發生。隔日，第二屆全俄羅斯蘇維埃大會通過「有關土地問題的公告」，正式將土地收歸國有，廢止土地私有制。國有化後的土地在當地土地委員會和蘇維埃的監督下進行分配，使用權則歸農民所有。公告發佈時，列寧承認：「土地社會化綱領，是全俄羅斯絕大多數已自覺之農民的意志的無條件表示」。雖然，「土地社會化綱領」還附有一定的保留條件，卻被認為走向社會主義的一步措施。

1918年3月第七屆黨大會將黨名改為「俄羅斯共產黨」後，列寧說：「我們根據土地社會化法，主要是以小商品生產者的觀點來公平分配土地，那是根據都市勞動者和貧農的聯盟，逐漸走向土地的共同耕作和社會主義大規模農業的踏實的措施」。這個宣示，展示了在擁有廣大農民階層的國家，以無產階級為領導，以農民為其同盟者，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農聯盟」的戰略構想。也就是：由無產階級掌握大工業和銀行，一方面依照農民的要求公平分配土地，容許小農經營繼續存在；但在另一方面則推動集體農場的建設工作，促使農民提高自治共同體的意識，希望將來個別的小農會自主性地逐步走向大規模農業經營。

不過在這個構想中，工農聯盟的核心是工人和貧農，中農不過是「陪襯」而已。但就全俄羅斯的具體狀況而言，工人僅佔人口中的少數，而由於土地的均等分配，農村已經中農化。因此這個構想其實是非現實的。

1920年，農民對分攤徵收的憤怒已如星火般到處蔓延，終於在1921年2月，一向被譽為「革命的榮譽和光榮」的「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的駐軍，發生暴動。叛變的海軍士兵，要求：為了使蘇維埃俄羅斯能夠起死回生，應該授予農民處理全部土地的完整權利；為了不使用農業雇工就能夠維持並管理農地，農民應擁有飼養家畜的權利；准許個體勞動者的自由的小商品生產等等。

叛亂於3月17日被鎮壓。旋即在1921年3月的第十屆黨大會上，列寧將「喀琅施塔得」叛亂定位為「小布爾喬亞的叛亂」，認為由該次反革命行動中可以看到：懸掛著自由商業的口號，經常與無產階級專政相敵對的小布爾喬亞無政府主義的力量。但是問題並不是如此責難就可以解決。因此，列寧開始提出變更農民

政策的主張，認為：假如別的國家再不發生革命，那麼只有與農民的「協定」才能拯救俄羅斯的社會主義革命。

這個「協定」向來是以貧農為對象。但是列寧認為，由於土地的分配，農民都已成爲中農。這就是說，「協定」的對象在客觀上是中農。因此NEP在政治上從「無產階級國家與貧農的聯盟」轉變爲「與中農的協定」，且認爲當前的任務是首先要改善農民的狀況，而「課徵糧食稅，發展農業和工業的交易，發展大工業」就成爲它的手段。

如此，NEP的經濟內容被明示爲「與農民的協定」。課徵糧食稅，是由於國營工業在陷於潰滅狀態下，無法實現國營工業與小農的剩餘農產之間的「產品交換」，因而採取的「過渡性措施」。這是預期：國家以「稅」的名義來徵收最低需求量的農作物，令繳稅後的剩餘農產通過合作社和工業製品進行交換的方式達成。至於用來交換的工業製品則主要由外資企業（蘇聯從革命後一直希望引進外資企業卻沒有多少成果）或農村小工業來提供。

不過，從3月末的第十屆黨大會後，列寧不斷強調：地區性商品交換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資本主義。這個觀點意味著，徵收糧食稅的措施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倒退」，因此NEP就是對農民的讓步。

1921年6月到7月的第三國際第三屆大會上，列寧做了初期NEP的期中結論。列寧將NEP的本質規定爲：引進糧食稅以及容忍相應而生的商品交換。並聲明：這是爲了與農民締結鞏固的聯盟，以及爲了轉型至社會化、機械化的大規模農業的過渡性措施。

總之，列寧的NEP前半期（1921年10月中旬以前），被視爲是「與中農的協定」。在帝國主義列強包圍下的「後進」社會主義國家，要堅持到先進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這段期間內，由於長年的戰亂，國土已經荒廢，佔國民人口中壓倒性多數的農民，經由土地均等分配已經成爲「中農」，而作爲領導階級的工人本來就是少數且其半數已脫離階級等等的情況下，要復興國民經濟必須依靠中農，但在中農由於糧食的強制徵收而已疲勞困憊，其不滿已高到無法壓抑時，不能不向他們讓步。當然這種讓步只是在強化無產階級國家權力的限度內的讓步。在這種範圍內，容許以小商品生產者繳納糧食稅後的剩餘農產和工業製品進行地區性交易，藉以恢復農民對生產的意願，復興農業和工業。然後根據生產恢復的程度逐漸重建國營大工業，使工人再生爲領導階級。如此才可以強化無產階級專政，保障工人國家的存在。

（待續）

☆

編輯報告

台灣的革命前輩蘇新先生，在二二八事件後流亡大陸，並於1947年二月前往香港。在滯港期間，蘇新先生針對台灣問題發表了為數不少的政論文章，這些著作基本上都已收在「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的「蘇新全集」中（分別為《未歸的台共鬥魂》、《永遠的望鄉》、《憤怒的台灣》等三冊）。最近，長期作1945年到1950年間台灣光復初期史料研究的曾健民先生，在眾多史料中，發掘出未經收錄在全集中，長期不為人知的蘇新重要政論文〈談台灣解放問題〉，這是蘇新先生以「莊嘉農」筆名發表於1949年2月16日出刊的《光明報》。爲了這篇重要文獻的出土，本刊除全文刊載這篇〈談台灣解放問題〉外，也組織了由曾健民、陳映真、林書揚三位先生的文字，就該文當時的歷史背景與對今日的時代意義提出看法與評論。

曾健民的〈台灣人民的歷史道路〉主要敘述〈談台灣解放問題〉一文問世當時的時代背景，文章的最後，作者還提出了現階段糾纏在台灣社運圈中「左右統獨」問題的看法；陳映真的〈如炬的目光——讀蘇新先生遺稿「談台灣解放問題」〉特別突出了蘇新先生思想的深刻與對局勢精關的洞燭，其中美帝國主義的對台灣的宰制問題，從當時到現在是一直不曾更改的事實，反美課題也台灣左翼運動永遠的第一課。林書揚的〈重讀蘇新「談台灣解放問題」〉則透過當時的台灣政經情勢探測出蘇新論點的角度與思考的脈絡。

官漢生的〈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是針對葉石濤在日本《新潮》月刊和《找到了！》雜誌上的兩篇發言提出批判。作者嚴厲的反對個人爲當前的政治主張張目，進而扭曲歷史事實的行徑。不同的政治主張自當獲得尊重，但若企圖以歪曲的歷史甚至肯定帝國主義的殖民來彰顯個人的政治主張，則不僅個人人格破產，其政治主張亦不得不讓人質疑；宇柔的〈「白髮丹心馬列魂」〉藉由倖存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受難人的回憶，寫出了在那個時期幾個重要作家：呂赫若、鍾理和、簡國賢、朱點人諸人的小軼事掌故。

針對《左翼》27號上刊載的何六九的〈"理直氣壯"因何而生？(二)〉，何苦的〈又是以偏概全的論法〉提出十點批評看法。而何六九的〈"理直氣壯"因何而生？〉本期持續刊出第三部分；黃志龍的〈開發中國家的社會主義〉本期探討蘇聯的新經濟政策。

左翼 第二十七號

出版日期：2002年9月30日

E-Mail: twleft@sinamail.com

通訊地址：234 永和郵政 549 號信箱 （歡迎來信、來稿及來函索閱本刊）

THE LEFT

左翼特刊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反對「不准反美反戰」和「只准聊以反戰不准反美」！

戰爭與和平：二種對立的具體實踐

槍口下的民主——從包道格的一篇文章談起

美伊戰後世局管窺

石油的利益與文明的衝突

美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倫理

阿富汗戰爭犯罪國際審判法庭 ICTA 運動簡介

“學術”作“秀”之醜態

陳映真 / 2

汪立峽 / 9

唐 曙 / 14

林宗理 / 21

老 甘 / 23

呂正惠 / 29

林書揚 / 31

周良沛 / 38

反對「不准反美反戰」 和「只准聊以反戰不准反美」！

——此次反對美帝侵伊運動的反思

陳映真

今年三月，美國撇開聯合國安理會的異議，公開踐踏國際法，不顧全世界各族各國人民的反對，悍然打響了侵攻伊拉克的戰爭。戰爭爆發的前夕開始，全球各地人民反對美國侵略戰爭的示威行動和輿論鶻起，透過媒體傳播到台灣來。台灣精英知識界，以李遠哲爲首，發表了反戰聲明。在「勞權會」、「反帝學生組織」、「夏潮聯合會」等的發起下，台灣青年學生和一些社運團體組織起來，發動了幾次到台北市美國在台協會的反美反戰示威，人數一次比一次多，到三月二十二日達到了高潮。一九五〇年以後從來沒有反美意識與行動的台灣青年學生，這回才第一次張開了眼睛，以驚訝和憤怒的眼光注視著他們不曾認識過的美國——蠻橫傲慢的帝國主義美國。

主流政治的台獨派眼看反美反帝的星火在燒，大爲驚慌，開始在網路上寫文章滅火，流露出捍衛美國主子，爲美國侵略罪行辯護，高呼不准反美反戰，給反美反戰的人戴上親共「反台」（獨）的帽子，奇談怪論傾囊而出，生動曝露了「台獨」右派的、法西斯的、親美和反民族的反動本質。現在，我們大略整理了「台獨」派親美、反反戰論和「策略」性不反美論的幾條，逐一辯其謬誤。

■「適當、適量地使用暴力是正確的」。美國打伊拉克，使伊拉克人流血死亡，但卻得以從海珊的暴政下「解放」，獲得「民主」和「自由」。「相信」伊拉克「解放」後，伊拉克人民會過得更好，成爲中東世界中「民主」的樣板，就如美國打敗日本，卻締造了戰後「民主」的新日本。

□所謂「適當」、「適量」的暴力論，意思是「善良的暴力」。這是標準的美國強盜邏輯和修辭。美國把南非黑人、巴勒斯坦人對英美支持的白人恐怖統治和以色列法西斯擴張的、絕望的自殺性抵抗稱爲「恐怖主義」，但是對其所全力支持的反共法西斯獨裁政權，如解放前的南非、當下的以色列法西斯和韓國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政權、台灣蔣氏戒嚴體制、以及七〇年代瓜地馬拉、阿根廷、伊朗親美軍事政權等由國家機器發動、有組織的非法逮捕、拷訊、投獄、暗殺、槍決、集體濫殺（動輒百、千、萬人）說成是「維護民主體制」所必要的「善良的暴力」（benign violence）。

而在現實上，美國在世界各地操作的「善良的暴力」，其血腥、其人權蹂躪之慘烈，受害規模之眾，遠非巴勒斯坦、法帝宰制下阿爾及利亞、南非的小規模(諾·卓姆斯基稱為相對於美國操持下國家暴力的「大盤恐怖主義」[Whole Sale Terrorism]，弱小民族絕望的自殺攻擊是「零售的恐怖主義」[Retail Terrorism])絕望性自殺性抵抗所可比擬。然而所謂「適當」、「適量」的暴力之不道德、血腥與恐怖，今日卻被台獨派用來美化美帝國主義侵略伊拉克暴行的「修辭學」！

其次，美國對外侵略、搞政變、佔領，干涉內政、任意組成親美傀儡政權，果真就帶來「民主」、「自由」的好日子嗎？光是二次大戰後，美國以武力侵略、干涉他國內政，推翻外國合法政府，恣意更換改組他國政權，至此次明言打倒海珊出兵伊拉克，至少有十二次以上。而這些美國支配下的政權，莫不是嚴重蹂躪人權的獨裁法西斯政權，對美債臺高築，經濟破產……此外，美國在戰後亞非拉世界「援助」、「結盟」、支持了無數反共軍事獨裁政權，荼毒其人民，造成廣泛傷天害理的人權蹂躪事件。一九五〇～一九八七的台灣白色恐怖統治只是其中一小例而已。

一九四五年，美軍軍事干預分裂東西德、南北韓，在南韓長期支持獨裁政權。韓戰爆發後，美軍當局在日本施行「軟性」的白色恐怖，將日本左翼從各政府、學校、機關、團體中加以「追放」(驅逐去職)。在韓國，美國支持獨裁政權以「國家保安法」和反共條例施行軍事法西斯統治，製造濟洲島慘案(1948)、麗水良民屠殺(1951)、光州大屠殺(1980)。台灣的故事就不必說了。五〇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是在美國默許下槍斃了四、五千人，投獄萬餘人。從六〇年代到八〇年代。美國以中情局的滲透、顛覆、暗殺、武裝侵略、政治干預、經濟支配和禁運，干涉別國內政，篡奪各地民選的政府，製造對美國言聽計從的扈從國家(Client States)；先後炮製了二十多個第三世界親美獨裁軍事政權，到處嚴重蹂躪人權，摧毀民主……而一直到今天，在這歷歷罪證之前，美國仍大言不慚地宣傳它是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的傳播者和捍衛者。而相信這偽善的宣傳者，在台灣，不問是「綠」是「藍」，大有人在，至今還在以「適當」、「適量」的暴力論為美國侵略和戰爭罪行塗脂抹粉！

■有人竟說，「對野蠻人要用野蠻的方法」！

□這也是幾百年來西方殖民主義罄竹難書的強盜邏輯之一。西班牙人、美國人都曾以傳染病菌(例如天花)數十萬百萬計消滅殖民地抵抗的土著民(如印地安人)。正是「文明」的西方，最先發明實踐了最早的生化戰，使用了非人道「大量殺傷武器」，在北美、中南美進行滅族性濫殺，而其邏輯恰恰是「對野蠻的人要用野蠻的方

法論。連布希都不好意思說的這種大膽無恥的飾辭，台灣竟有人忙著用來為它的主子洗刷侵略戰爭的罪愆。

而所有的自以為「文明開化」的大國在戰爭中所為的人道主義犯罪，莫不以此「對野蠻的人可以使用野蠻的方法」這個邏輯為藉口和動力。南京大屠殺、七三一部隊暴行、慰安婦體制，莫不是「文明」日本對「野蠻」的「支那人」正當的暴行。美國三K黨對黑人的暴行，德國奧薛維許集中營的暴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的血腥鎮壓，舊南非白人統治階級對黑人的種族隔離殘酷體制，各親美軍事法西斯政權對左翼工農、教士、學生、教授、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社運人士的殘酷白色恐怖鎮壓，皆莫不如此！而不能忽視，今日少數台獨原教主義極端份子對外省人，對左翼民族統一派也在孕育著納粹式的仇恨，公開稱大陸中國為「支那共匪」，發散著納粹法西斯的濃重腐臭味道。

■海珊是個「野蠻」的人，他的政權是獨裁、「殺人無數」的「野蠻」政權，伊拉克民族「封閉、落後」，當然「野蠻」，所以「不配擁有現代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得而誅之，為伊拉克再造民主、文明的政治與生活，所以美國侵略伊拉克堪稱「替天行道」，不能反戰，更不准反美！

□一般說來，海珊獨裁，排除異己，生活「奢華腐敗」，是包括許多反美反戰的輿論都同意的。但也要考慮到美英間諜、殺手十幾二十年來公言要取其項上首級，推翻其政權。而海珊畢竟不是毛主席，有可以信賴的億萬擁戴他的人民群眾以為干城；畢竟擺脫不掉傳統回教統治政治的極限……

但是也不要忘記，八〇年代，美國和海珊的伊拉克有鎮壓蘇聯及中東左派革命在中東發展的長期同盟。一九八四年，美國為煽動伊朗和伊拉克自相殘殺，鼓動「兩伊戰爭」，伊拉克就對伊朗使用生化武器，美國視若無睹。但從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雷根和老布希總統卻仍然批准包括了炭疽菌在內的幾種生化殺傷菌種和化學材料給海珊。一九九四年美國國會文件證明，在明知海珊於一九八六年曾使用以美國生化材料製成的生化武器殺害伊拉克北境的庫德族的基礎上，大批對海珊的伊拉克輸出劇毒性生化武器材料菌種和化學物質！事實說明，今天被美國及其世界各地僕從指控坐擁大量殺傷性武器和生化武器的海珊曾是美帝國主義的親密盟友，在美國生化科技支持下坐大的反共獨裁者，而一旦其羽翼豐滿，不聽指揮，美國就能厚顏無恥地以海珊「獨裁」、「野蠻」地「擁有大量生化武器」為藉口侵略和屠殺伊拉克。

另外，美軍在打下伊拉克後，公稱其政治任務是「教育伊拉克人民不再愛海珊」(to learn not to love Husein)，這不是很耐人尋味嗎？

當然，說到文明，奧土曼大帝國土耳其世界阿拉伯文明的中心地巴格達古文明的璀璨，是美國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蠻子所遠不能比擬。此次美軍對巴格達古文明博物館的劫掠和放任伊拉克莠民破壞偷竊，使一切中國人回憶到八國聯軍侵略對中國古文物的劫難。人們哪，是誰，是什麼叫「文明」與「野蠻」？這問題召喚我們深沈的思考。

「野蠻者可以施之以野蠻」論者舉了實例，說孫中山倒滿的暴力，警察鎮壓匪徒的暴力，美國在二戰末期出兵參戰反法西斯戰爭的暴力的正當性。這當然可以進一步分析。

對待「暴力」，要辯證地看，也要唯物地看。則「暴力」從歷史唯物論上看，自然有革命的暴力(巴黎公社、孫中山反滿)和反革命的暴力(美中情局推翻阿燕德政權、親美獨裁政權對國內進步勢力的鎮壓)；有正義的暴力(抗日戰爭)有不正義的暴力(法西斯在全世界的侵略)……

警察是國家機關(State Apparatus)強制性暴力機制之一，其目的在維護階級統治的秩序。當打擊各階級公認的不法，警察的威暴可以代表正義。但在白色恐怖中，偵警特務迫害政治異己，踐踏人權，便代表統治階級的反革命暴力了。美國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戰爭末期才參加了反法西斯戰爭，之前則大賣軍火發財。但美國武裝介入反法西斯世界戰爭是有功的，但在戰爭中坐大的美國，卻在戰後冷戰體制中依恃其強大武力形成世界性新帝國主義而全面反動化。到了今天，它公開宣言「預防性、先制性攻擊」，如果回憶納粹德國的擴張、日本襲擊珍珠港事件也莫不是由「先制攻擊」出兵侵略開端，一個比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更強大、邪惡的帝國美國的登場，就不能不引起人民深刻的警戒！

■美國是台灣的盟國，是台灣安全所繫，要反對美國發動的侵伊戰爭很令人「為難」，對美國「不好意思」。要反戰，應該反中共對台灣的軍事威脅。可以反戰，不宜反美！

□韓戰後，美國以強權抹煞新中國，不予外交承認，強使國際社會以「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並令其安坐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直到一九七二年台灣才被逐出聯合國。一九七九年，美國承認中共，再也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在「台灣關係法」下，台灣充其量只是美國保護地區。在WTO中，台灣也只是一個與香港一樣的

「關稅區」。一九七九年前，台灣還勉強可以說是美國的一個虛擬化的「同盟國」，而今「國」已不「國」，連美國都公開說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的一些人還硬要貼上去說自己是美國的「同盟國」，叱止別人不准反對「盟國」美國和它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妾婦之情，令人難堪。

現在有很多人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一面又強調「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等於台獨不能不承認台灣「主權」上屬「中華民國」，她絕不會也不是自來獨立於中國的、獨立建過國的「國家」。否則，一八九五年割台時日本依據什麼以清王朝為對象訂馬關條約割台？一九四三年中美英（以及後來參加的蘇聯）又何所據而發表以「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為重要內容之「開羅宣言」及其後的「波茨坦宣言」？依據這兩個宣言，一九四五年公開以中華民國為對象在四川成都與台北受降書中，中國自日帝手中收回了台灣和東三省，正式將東北和台灣收回中國主權版圖。

韓戰爆發後，美國為佔用台灣為其遠東冷戰前沿基地，炮製了強盜式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從而與蔣氏政權訂立「協防」條約，派兵進駐台灣，並以大艦隊封斷海峽，公然非法佔領台灣，干涉中國內政，造成民族分裂的形勢。但從現實上，「中華民國」從此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和文化上徹底從屬於美國的政策與利益，成為美國的附屬政權，從此而後，每下逾況，既使「台灣人」李登輝執政，一直到「政權輪替」後的今天，台灣就從來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只是一個美國的跟班小子。七〇年代，日美等國先後撤銷對台灣外交承認，台灣在國際上因堅持其所沒有的身份，力主獨立於中國之外而在國際社會中喪失身份的合法性。

然而，有人一直堅持，既使為強權玩弄於先，又復摒棄於後，仍然要為強權的鷹犬，甘為別人的戰略利益分裂中國，卻在這個分裂對峙的結構上任人施加軍購的詭詐，耗竭公帑，置島內民生困疲於不顧，唾面自乾，緊跟早已不認自己身份的老主子，不但背負沉重的軍購負擔，這回還要出來背負主子背德的侵略責任。妾婦的悲涼，竟一至於此！

至於大陸東南沿岸的「四百枚」飛彈，瞄準的主要是國外必欲分裂中國、霸佔台灣的「新保守派」、「鷹派」帝國主義者和少數它們的僕從。如果台灣一定有人一定要貼上一向分割別人的民族與領土，遂其分割統治的帝國主義者（中東、非洲悲慘的現狀就是帝國主義為分割爭奪殖民地的歷史結果），就要不怕成為包括台灣人民在內

的中國反帝衛國戰爭的陪葬人，絲毫怪不得別人。把這次反美反戰的邏輯硬套上「中共威脅」，誰都可以看清擁美攻伊從而擁美反華才是他們的真心。

■有「政論家」阮銘說，這次國際媒體對美國攻伊戰爭的報導，鉅細不遺，使人能「零差距」目擊這場戰爭，使攻伊戰成為「透明的戰爭」，使反戰論說不攻自破。

□阮銘是原中共中央黨校高幹，六四前夕去美，從此墮落為先靠美國、後靠台灣的津貼度日的反共反華「政論家」，販賣反共擁美反華言論為生。這個轉向變節的共產黨員，根本不懂美國大眾傳播產業在文化和心理冷戰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吸取了六〇年美國媒體在越戰中炫耀美國大量屠殺越共和越南人民的報導引發了美國和全世界的反戰風潮的經驗教訓，十二年前海灣戰爭的報導，就開始受到中情局、軍方和新聞管理當局的嚴格限制，開戰中禁止記者現場採訪，待戰事結束，美國連夜以推土機將三分之二伊拉克軍民屍體「清理」後，才讓記者進入現場。這次侵伊報導也基本如此，看到不少電腦製作的畫面，和少數一些伊拉克莠民「歡天喜地」向美軍「歡迎」、拉倒海珊銅像的畫面，人數基本上也不滿百。美軍搶劫伊拉克歷史博物館、民眾婦孺在佔領軍不予理睬下的疾病、傷亡、和人道危機、放任暴民搶劫以示伊人之「野蠻」的畫面卻絕不見於CNN傳媒畫面……都說明所謂「零差距目擊」、「透明戰爭報導」云云，都不過是為美國侵伊美化與正當化的奴才之論。

■作為統一戰線「策略」的「反戰不反美」論的檢討。

□網路上對這次美國侵伊戰爭的言論中，最醒目的、最叫人嘖嘖稱奇者，莫過於「反戰不反美」論，其理由也有若干不同。

台獨派有兩說，一說老美保障台灣安全，是台灣的「盟國」不可以反，不准反，只能依「和平為普世價值」之義反一點兒戰，為伊拉克戰火中的「兒童」（父母百姓，衛國保種的伊拉克民眾士兵就該死了）「祈福」……另一種說辭更反動，既不准反美也不許反戰。不准反美反戰，因為美國是老大哥、主子，而攻伊是為了「解放」伊拉克……這些暴言，前此都經過我們揭發批判了。

另外有一種「反戰不反美」論者，據說是有「策略」思考的。這些人是高校校園比較進步，比較常涉入社運的老師。他們大約以為台灣民眾心目中美國太「美」了，不容易有反美認識，一旦喊出反美口號，群眾不來；有一些人考慮到五〇年代以降一

貫反美的是左翼統派，提反美口號，就怕被群眾戴上「統派」帽子，而「統派」據說是台灣社運的「票房毒藥」。有個當過官的「社運領袖」當面指責一個最早發動反美攻伊的組織：「中國打台灣時你們反不反？」，不准統派鬧反美鬥爭的傲慢氣勢和架子，叫人稱奇。

他們心裡想的是「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左統派絕對除外），打倒共同的敵人」。這叫統一戰線。統一戰線應該目標明確，原則正確。先說目標。一九三七年日本打響侵華戰爭，中共不久就推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抗擊日帝侵略為目標，拉起全民族抗日各黨派、個人、團體的共同戰線。如果有人在那時因為顧忌國民黨內有親日派，顧忌國民黨必欲「先安內（剿共）後攘外（抗日）」，不敢喊抗日，呼籲結成「反戰統一戰線」，中國抗日會是什麼一個結果？再舉一例。一九四五年底展開的新民主主義運動，是以反內戰、民主化、和平建國為目標而團結一切和平建國的力量組成反對內戰、和平建國的共同戰線。這個共同戰線雖然沒有提及打倒、推翻國民黨，卻達到了團結一切非共民主黨派人士、學生……的戰線，打擊國民黨堅持內戰、堅持獨裁的政策，取得勝利。

共同戰線要目標明確和正確，也要求有堅定正確的領導，否則戰線就會淪為群眾的尾巴。戰線的領導既要求從群眾中來，當群眾的學生。也要求在群眾和形勢要求上做好群眾的先生，教育群眾牢牢抓住正確的鬥爭方向。不能因為低估群眾在攻伊戰爭中對美帝的疑慮和反感，放棄教育群眾認識和反對美帝的方針，放棄了五十年來台灣民眾從來不知反美這個現狀的顛覆之機會。在反美又反戰問題上要旗幟鮮明，寸步不讓，認識清醒，在團結實踐上又要講活潑靈活。堅持原則卻不因而導致團結的破裂；堅持自由靈活甚至妥協卻不以犧牲、模糊原則為交易。這是唯物辯證法。

現在反思，那些咄咄逼人的「策略性反戰不反美」的精英，到底因犧牲或出賣原則而果真「擴大」了多大的戰線？他們為了爭取到一個獨派台灣美術史「學者」精英簽名反戰，不惜以放棄反美、不惜悍然排拒左統派 -- 他們為這次台灣反美侵伊運動付出了大量的勞動 -- 而為之沾沾自喜。這是目無民眾的、機會主義和唯精英主義。而歸根結底，這是島內左派怎樣看島內的結構矛盾 -- 階級矛盾大於民族矛盾還是其相反 -- 這個重大問題上的矛盾在此次反美反戰這個具體問題上的反映。

而關於這個問題的爭鋒，已經迫切地擺上島內左派的議事日程表上了。

戰爭與和平：二種對立的具體實踐

——論反戰運動中的抽象“和平主義”與“人道主義”

汪立峽

前一陣子的“反戰”熱潮似乎已隨著巴格達的被佔領和SARS的猛然來襲，轉瞬之間消逝的無影無蹤。

一場曾經席捲全球的空前大規模群眾“反戰”行動，難道就這樣彷彿從未發生過似地被遺忘的一乾二淨？

這個問題顯然會令許多人困惑不已，包括我自己。因此，在本文的起頭我就將反戰二字打上括號，表示“戰爭”這個概念並非我們想當然爾的那麼容易理解。

和平主義、人道主義與反戰

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就曾經相信人類戰爭必不可免，而且認為戰爭的正面作用大過負面。是不是正因為戰爭很難避免，所以人們不反對戰爭，嚮往和平呢？

和平這個概念又是怎麼回事？在一般人不經心的想法裡，“和平”彷彿先驗的、絕對的、永恆的在那兒擺著，因此，戰爭就是破壞和平。問題這麼一來，好像變成了剖析先有戰爭還是先有和平的無解難題。

但是，無論從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我們都不難發現戰爭現象與和平狀態其實是一組相對的現實存在。正如同沒有黑暗就無所謂光明，沒有戰爭也無所謂和平，反之亦然。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的錯覺就在於以為“和平”是形而上學的抽象存在，像上帝一樣，本來就在那裡。

戰爭與和平都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和現實世界的具體實踐，這一點首先需要承認和認清。否則，對許多圍繞著“反戰”議題的爭辯和詭論將無從找到索解的起點。

美國這個國家發動侵略戰爭早已不止一次（僅僅在上個世紀由美國直接間接或大或小發動的侵略性軍事行動就不下於38次之多了），為什麼這一次侵略伊拉克竟牽動了無數男女的心？原因當然不止一個，而且並不難一一指陳，但無疑地美國（姑且不討論英國等一些附和者）這次的種種作為特別展示了侵略性戰爭的原始性和蠻橫

性,逼使人們想閉上眼睛或關起心房豈是件異常困難的事。美國把這場戰爭史無前例地演繹成無可爭辯的"錯誤"——無視道德、法律和一切價值尺度,"老子就是要打!"。

那麼,究竟爲什麼要打,也就赤裸裸攤開在世人面前——for oil!(為了石油!)。"爲了石油"是一個再具體不過的物質理由,由於它抽離了一切抽象的價值標準,直搗人類的良知,於是一切回到了基本點——不是戰爭就是和平。結果,這一次戰爭打敗了和平,至少表面是如此。或者,回頭來看可以這麼說,具體的物質掠奪打敗了抽象的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

這樣說是不是略嫌悲觀了,剛好相反,這次全球反戰行動的受挫,正好揭示了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軟弱性與消極性,以及源自形而上認識論的悲觀主義行動思維。

從全球(整體)視野觀察這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戰"運動一般也是如此,縮小到台灣一地來觀察仍然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一些屬於本地的特殊現象。

是不是這項全球"反戰"行動者都是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當然不盡然,例如,阿拉伯世界的反戰行動可能民族因素和文化因素較多一點,西方世界的反佔份子中有一定比例的左翼反資本帝國主義戰爭者,等等。但無論如何秉持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群眾是這次反戰運動的主流和主體。在台灣大約也不例外。

從今年2月15日開始的以台北爲中心的台灣反戰聯合行動,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它是幾十年來破天荒頭一遭衝著美國而來的全社會性的反戰表態。說它是"全社會性",也許有點誇大,不過就這次運動所牽動的各種形式的關注和實際參與的人數來說,的確是破紀錄的。

然而,儘管如此,在前後長達二個多月的反戰活動期間,最耐人尋味和最值得探討的現象,莫過於"反戰也反中"和"反戰不反美"這兩個詭論了。這類論點同我們上面所說的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親緣關係是需要挖掘一番的。

反戰也反中?

先說"反戰也反中"。這個提法的悖論性質首先出在台灣的當權集團。例如,陳水扁以"總統"身份說的"飲水思源"論:"大家想一想,過去多年來是誰在幫忙我們?是誰在我們有困難時協助我們度過?"當然,答案是美國,而對台灣製造"麻煩"和"困難"的則非"中國"(大陸)莫屬。於是,面對島內外一片反戰聲浪,台灣當局明示給民眾的一個對策就是:"戰"不得不反,而且正因如此,所以同樣以飛彈"威脅"台灣的"中國"(大陸)也必須要反,至於美國則被在這種論述邏輯中憑空抽離掉了。

爲什麼"戰爭"不得不反呢？因爲根據抽象的、自在的"和平主義"，戰爭是和平的破壞者，理所當然要反，再者，反的是戰爭本身而不管戰爭的原因和發動者有理沒理。就這樣，美國在現實中變成了隱性的、不在場的元兇，而"中國"（大陸）則成爲明顯可見的在場者，儘管他只是站在那兒沒有任何動作。

對於另外一種政治狂熱的"知識人"而言，例如李喬和李筱峰，要他們"不反戰"，根本說不出口，因爲他們的教養告訴他們"和平主義"所指涉的"和平"是不容挑戰的，由此出發，似乎很難爲美國辯護，否則良心不安。不過，要他們此時不藉此說上"中國"（大陸）和中共兩句，更是辦不到的事。當他們這麼自認爲理直氣壯的左罵右批時，其實在意的已經不是"和平"，他們真正想要的是自我意願無障礙的，落實到政治現實就是指望對岸（大陸）在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上毫不加以干涉——這就是此類"知識人"對兩岸"和平"的定義。"和平"二字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爲了特定政治想像而猶待努力建構的"主宰思維的話語系統"，只要對岸不放棄干涉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就是威脅"和平"，不管有沒有實際動武；至於台灣當局依賴美國武力及不斷充實軍備，則都是爲了捍衛"和平"，儘管實際上準備戰爭。說到底，台灣當局及其附從"知識人"不是在爲和平而實踐，而是在爲戰爭而實踐，一步一步走向戰爭。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必須揭露的是：他們已經不再是抽象"和平主義"的膜拜者，而是具體的戰爭決定論實踐者。儘管和平也是可以實踐出來的，但他們卻以使人相互爲敵的傲慢，時刻都不放鬆的斬斷了兩岸任何和平實踐的可能性，最新的一個例子，就是李筱峰這類人將 SARS 風暴誤引到敵視和貶抑大陸的方向。同時，他們也沒有忘記利用常人的抽象"和平主義"和"人道主義"的迷思，把"和平"、"愛"、"人權"、"人道"等等掛在嘴邊念念有詞，肆無忌憚的"建構"他們支配性的話語系統，掩飾他們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錯置和擺弄，而這兩個問題卻活生生存在於庶眾的今天和明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抽離現實的某種"愛"和"和諧"之中。

反戰不反美？

和平是一種動態的實踐，而不是一種靜態的呼喚。當和平狀態被戰爭這種實踐威脅之際，對抗的方法仍然必須是某種具體的實踐——那某種是以制止戰爭發生或繼續的具體行動，而不可能是無效的、被動的、靜態的、和諧的、安穩的任何反應。這一切已經在這次美國侵伊戰爭之中再次驗證了。

注意，我說的是"足以制止戰爭發生或繼續"的和平行動，所以，已經排除了"先制戰爭"和"以戰止戰"這類非和平實踐。也就是說，是爲了和平這個目的而採取的非戰爭手段，它不必然沒有任何衝突和暴力，但絕不是戰爭，也不會是絕對的和平

——絕對的和平是缺發實踐力的。

以上不得不插上這麼一段話，是爲了便於討論下面我們就要論究的"反戰不反美"這個詭論。

對於大多數參與這次"反戰"行動的人來說，"反戰"可能壓根兒就不需要理由，當眾家媒體都在報導反戰新聞之時，"戰爭"這事兒就觸動了每個人內在的抽象"和平主義"："戰爭"當然是要反對，還用的著說嗎？至於爲什麼要"反美"，就有一點想不通了。對一般人來說（特別是在台灣），這次戰爭儘管是由美國發動的，而且沒有什麼道理，那就"反戰"嘛，幹麼還要"反美"？在他們看來，戰爭是戰爭、美國是美國，並不一定對的上號，他們反對的就是戰爭本身。如果一定要反美，就會連帶扯上海珊如何如何等問題，他們不習慣花腦筋去分辨這個是非，只認爲無論如何不該打仗，何況打仗會使無辜的老百姓尤其是老弱婦孺倒楣。就如同看見了二個人打架，人們先則勸和，勸不了則拉架，及到事後則忙著將傷者（通常是挨揍的一方）送醫或撫慰一番。"和平主義"加"人道主義"一樣不缺，至於爲什麼打架？是不是強凌弱？能不能積極阻止？則不在論究之列。

我們說和平是一種具體的動態實踐，那就意味著和平實踐有一個具體的對象，而不可能是抽象的、空洞的"戰爭"。因爲戰爭不是自己發生，而是人爲的，"反戰"也就不只是反對戰爭本身，而更是反對戰爭發動者。只有回到這個問題本身的源頭，我們才有可能回答反戰爲什麼要反美。

美國與戰爭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美國發動的大小戰爭不下 38 次之多，只不過這一次侵伊戰爭特別引人注目罷了。爲什麼美國這麼好戰？難道真的像美國自詡的爲了自由、民主和人權嗎？曾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布利津斯基（Z. Brzezinski）說過："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跟以前的帝國有許多方面是一樣的"，它所謂以前的"帝國"並不是泛指古代所有的帝國，而是特指古代雅典帝國、羅馬帝國、近代大英帝國等等，依靠軍隊四處擴張並建立殖民地的帝國。驅使這類帝國打仗的最大動能是經濟慾望而不是他們口頭宣稱的任何道德口號。依據布利津斯基的說法，美國就是這一類型的現代帝國。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Tom Friedman 曾這樣揭示美國軍隊和資本之間的關係："市場的無形之手沒有無形的拳頭是不會行的通的。麥當勞沒有 F-15 戰機在頭上飛，不可能會成功。而那保護矽谷高科技產業成功的無形拳頭就叫做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對。美由美軍的服務、美國生產就不會存在。"

美國國家防衛部長 Roger Cohen 對全美五百大企業的總裁更直截了當的說："生

意是跟著國旗走的.....我們提供安全，你們提供投資。"

那位在蘇聯瓦解之時，迫不及待慶祝資本主義勝利並宣稱"歷史終結"的前美國政府顧問福山(F. Fukuyama)老早就不無幾分得意的宣稱："微軟並不會派遣空軍前去轟炸賓拉登，這將留給美國的軍隊去做。"其實，將賓拉登換成阿富汗、伊拉克.....，或任何一個美國資本欲染指的國度、道理完全一樣。

反戰為什麼必須反美，還需要多說什麼嗎？

有人說，反美或許有理，但不反美國人。在一般的情況下，將"美國人"同"美國"區分開來，是有必要的，因為也有不少美國人民反戰。但是，在許多具體的場域，硬把"美國人"同"美國"分開，是很困難的，例如，在美國在台協會前高喊"美國人(老美)滾回去！"能說成"美國滾回去"嗎？更何況，美國每次發動侵略戰爭，基本上都是得到多數美國人支持的。

和平需要冒險

美國一向聲稱愛好和平，但不要忘記它是個頭號資本主義國家，它的總產值占全球總產值的37%，美國人的商品和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消耗全球二分之一的財富和資源之上，僅僅爲了維持他的經濟優勢地位以及資本的持續積累和擴張，美國就會言不由衷甚至是身不由己的在他認爲"必要"時發動威嚇性和侵略性的戰爭。

正因爲如此，人們如果還想要和平，就只有以實際的行動具體實踐和平，就如同美國爲了資本的擴張而以實際的行動具體實踐戰爭一樣。這是一種鬥爭，必須具有憤怒的勇氣和敢於承擔的情操，才能擊敗發動戰爭的意圖。

當美國布希總統最近針對發生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恐怖攻擊事件，再次高喊要以"美國式正義"對付向美國進攻的任何行動之時，我們就該知道侵略伊拉克不會是美國帝國主義的最後一場戰爭，全球反戰運動也不會因爲伊拉克被美軍佔領而從此無聲無息。緊要的是，要記住"和平"不能靠對著惡人作道德呼喚而憑空獲得，而要靠具體的和平實踐，這種"實踐"處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實踐的跨度與彈性雖然很大，策略與手段也可以因時因地制宜，但絕不是溫情脈脈及平靜無事的。

英國哲學家懷特海的哲學要旨之一是：要提高和保持人類文明，冒險是重要的。現在我們可以將這個命題引申爲：要提高和保持人類和平，冒險是很重要的。



槍口下的民主

——從包道格的一篇文章談起

唐曙

如果4月9日巴格達市區的海珊銅像被美軍拉倒那一天，算做是美軍佔領伊拉克的開始，那麼到5月9日，美軍已經佔領一個月了。但是如果我們把南部巴斯拉和北部摩蘇爾的領空被美軍劃為禁航區、伊拉克失去國土航權的那一天當作美軍佔領日的話，那伊拉克已經被佔領超過十年了。不同的只是，這次是全部佔領，英美聯軍佔領的不僅包括土地、石油、美索不達米亞的文明遺產以及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瓜分伊拉克的「重建計劃」，還包括了過去十二年 and 最近一個月伊拉克人民的飢餓、病痛、死亡，以及隨之而來的無奈和憤怒。布希信誓旦旦地說為伊拉克人民帶來了「解放」和「民主」，來代替海珊的「獨裁」，但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隊在過去的一箇月中又締造了什麼民主呢？

美國所出口的民主

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包道格先生在聯合報4月26日的民意論壇上寫了一篇名為「伊拉克自己建立自己的民主」的文章。這篇文章內容的要點有兩個，一個是強調美國在伊拉克進行重建和實施「民主」的正當性和歷史意義，另一個則是「對台灣公開支持以及願意對戰後重建提供具體捐助非常感謝」。不關心美英侵略伊拉克戰事的人一定會不明究理地對包道格的這篇文章充滿好感，因為文章中對於美國政府苦心孤詣地推廣「民主」以及對伊拉克人民的「尊重」多所著墨，但這篇冠冕堂皇、歌頌「民主」的文章背後，卻掩蓋著許多對伊拉克人民的殖民宰制和鎮壓。

文章一開始就說：「美國和聯盟對伊拉克的政策向來不是以破壞為目的」。這句話是實話。美國對伊拉克12年來一系列的政策向來是具有破壞性的，但破壞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12年前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後，美國除了向各國徵集軍費外，伊拉克作為戰敗國是要進行長期的軍費賠償的。當禁運加上賠償使伊拉克產生嚴重的人道處境危機時，聯合國為解決這個危機，在1995年所啟動的「石油換糧食計劃」（用每半年20億的石油出口來換取伊拉克所需要的基本民生物資）卻遭到英美主導的聯合國制裁委員會長

年來的杯葛，伊拉克所提出的進口物資清單有 40% 在美英兩國的聯合阻撓下無法實現，它的影響是 12 年來有 126 萬人因缺乏必要的藥品和基本物資而死亡，其中有六成（75 萬人）是兒童。美國甚至於以海珊藏有所謂的「大量毀滅性武器」為理由，要求聯合國對伊拉克進行武器檢查。這些費用還要用民窮財盡的伊拉克來支付。當伊拉克已經被銷毀了 95% 的武器，而美國仍然堅持還有未查出的武器時，伊拉克拒絕了這種消耗性的外交折磨，美國便在 1998 年採取「沙漠之狐」的軍事行動，以轟炸平民的方式來回敬這種拒絕。第一次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在南方邊境所使用的貧鈾彈造成了伊拉克人民的致癌率比起戰前高出了 420%！對於這樣一窮二白的國家，布希仍然在 2003 年 3 月 20 日發動了侵略戰爭，美軍所到之處幾乎無一倖免地遭到嚴重破壞！

12 年來美國以破壞作為手段，對殘破的伊拉克進行了侵略、騷擾、消耗和再侵略，它的目的決不是如包道格所講的：「是為提供伊拉克人民一個機會，建立一個重視它們需求的民主社會」，而是相反：是為提供美國和支持這場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和壟斷集團一個機會，建立一個符合它們需求的「民主」社會。

少數人的民主：烏爾會議與什葉教徒的抗議

講到「民主」，這可是包道格此篇文章中的主題。他寫到：「後代史學家可能寫到，伊拉克人民在法制及人民的同意下實行民主的這段歷程，是從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五日開始形成的。正是在那一天，近百位流亡領袖、部族族長、庫德族人和什葉派教士等人，齊聚在烏爾的一個帳棚裡，展開建立新民主的進程」。

後代持平的史家（不是為美國所御用的史家）一定會研究到這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至於這個事件是不是真如包道格所說，是「伊拉克人民在法制及人民的同意下實行民主的這段歷程」，但就和事實大大地有出入了。事實是：就在烏爾帳棚會議召開一個星期後的四月廿一日，兩百萬什葉派教徒（什葉派教徒人口數佔伊拉克總人口數的 60%）在巴格達的巴勒斯坦旅館前舉行反美示威，要求美國立即撤離伊拉克。這場示威讓同時在五角大廈召開戰後重建記者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非常尷尬。而美國當局對這項具有指標性民意訴求的反應，則是布希在三天後的四月廿五日發表演說宣佈，美國對伊拉克的佔領還要持續兩年！事後，支持戰爭的美國媒體還做了一項很特殊的民意調查，調查顯示有近七成的美國人反對「原教旨主義者」統治伊拉克。這項調查的重要意義不在於調查取樣的偏頗，而在於做這項民意調查的動機和它所代表的意義。這項民意調查向我們提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透過侵略戰爭佔領伊拉克的美國，它的人民可以對伊拉克的民主做出好惡的評斷，儘管這個國家從來在歷史上就不是美國的一部份。而當提克里特的伊拉克人民不畏壓力，還是在四月廿八日上街慶祝

海珊生日時，美軍竟然對這些人開火，並造成了13人的死亡！如果伊拉克人民自己不能透過多數來決定自己的「法制和民主」，那由美國遴選的烏爾帳棚會議的二百五十人又有什麼代表性？這個「烏爾代表團」充其量也不過就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代理人集團」罷了！所以，從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五日之後開始形成的並不是一個民主的歷程，而是一個再次被殖民的歷程，伊拉克只有擺脫了這個被殖民的歷程之後，才能在獨立自主地談民主。

由外力強行指定的民主

根據這些事實，包道格所謂：「這個（民主）進程必須由伊拉克人民自己來執行才會成功」簡直就一句空話！因為美國已經說一套作一套了，而更嚴重的是，現在已經沒有任何國家有能力指責並且制裁它的言行不一了。至於烏爾帳棚會議中所起草的十三個原則中「未來的政府將由伊拉克人民選出，不是『由外力強行指定』」的提法，其實是一種諷刺。一群由美國欽定的少數代表作成的政治原則，卻要全伊拉克人民無條件的接受，這算哪門子的民主？這些人為什麼能光評美國政府的授權，就決定伊拉克的國家體制（聯邦制）和政治體制？包道格先生並沒有為我們提供答案。但5月9日，英美兩國已經在聯合國發動提案，要聯合國承認它們作為「佔領勢力」（occupying powers）至少佔領伊拉克一年，這根本就是要聯合國承認美英及其同盟侵略和佔領伊拉克的合法性。這不是標準的『由外力強行指定』嗎？

強權指導下的國際民主

美國「國務卿鮑爾在烏爾會議前夕接受訪問時保證，與海珊時代的情況相反，伊拉克的石油、財富將為伊拉克人民所用」。包道格這樣的提法也不符事實。事實是：遠在伊拉克人民自主地對石油和財富做出處置之前，美國政府已經為伊拉克人民做了主。上述5月9日美英在聯合國的提案如果通過，聯合國對伊拉克石油存量進出口的監督體制將蕩然無存，美英兩國不必再接受國際監督就可以直接處置伊拉克的石油，至於原先透過聯合國「石油換糧食」計劃而取得許多石油合約的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將面臨被排擠的窘境。這將造成聯合國與美英聯盟圍繞著石油利益，在外交上的強烈對峙。聯合國面對這樣的對峙，充滿無力感。因為它無法阻止侵略戰爭在前，現在它又怎能阻止美英帝國主義直接的掠奪在後呢？它能爭的只是一個面子，一個假裝還能處理國際糾紛的面子。而這些國際外交上的縱橫捭闔，都是以伊拉克人民最重要的共同財富——石油作為代價。

當然，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既然美國能繞過聯合國片面侵略伊拉克，為何還要在意聯合國的意見呢？」。美英兩國的目的有兩個。一個是希望聯合國能承認它們

侵略和佔領伊拉克的合法性；另一個是希望調動聯合國的機制投入昂貴、龐大和複雜的重建工作，當然主導權是在美國手中。

美英兩國如此迫切想得到的侵略的合法性承認，主要是關切石油利益。1990年8月6日聯合國做出了對伊拉克實施全面制裁和禁運的661號決議。美英兩國想要掠奪石油利益，也需要聯合國在形式上解除661號決議的約束力。否則違反聯合國決議地任意賣油和用油，依國際法也是要受到制裁。當然，美國船堅砲利，不需要理會聯合國的制裁，因為美國在全球各地有廿五個軍事基地，沙烏地阿拉伯有五個，伊拉克還要建一個，光憑這些基地的武力，聯合國的維和部隊是沒法發揮作用的。但是對美英兩國而言，重點不在於它們的強大，而在於和它們做生意的對象，大多數的力量並沒有超過聯合國。這就像是有兩個流氓去搶劫，治安當局由於它們火力太大了，沒法制他們，但又不願意看到自己的權力被剝奪，所以凡是收受流氓贓物的人，一律依法嚴辦。所以美英兩國才需要解除制裁和禁運，儘管它們過去十二年來不停的反對。

強權的外交弔詭：解除制裁禁運與大量毀滅性武器

美英兩國過去十二年來反對解除對伊拉克制裁和禁運的唯一理由就是：伊拉克擁有大量毀滅性武器。海珊當時為了解決伊拉克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就說一旦證明伊拉克沒有大量毀滅性武器，聯合國就要立刻解除制裁禁運。結果從1991年到1997年，聯合國的派出150多個武檢小組對伊拉克進行了300多次的檢查，並且銷毀了95%的武器，但美國還是堅持說伊拉克有大量毀滅性武器。由於武檢小組的花費，必須由「石油換糧食」計劃中的經費支出，而經過七年的武檢，伊拉克的制裁和禁運在美國的刻意刁難下也無法解除，於是伊拉克拒絕了武檢，結果導致了1998年美國片面發動的「沙漠之狐」轟炸行動，平民遭到大量死傷。2002年11月，伊拉克的制裁禁運仍然沒解除，聯合國又通過的1441號決議，要再徹底檢查大量毀滅性武器。2003年3月20日，美英兩國以伊拉克「實質違反」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出兵侵略伊拉克。4月9日，美英的侵略聯軍佔領了伊拉克首都巴格達，5月1日布希宣佈侵伊戰爭勝利結束，但當初美英以「實質違反」聯合國第1441號決議因而出兵的「大量毀滅性武器」卻仍未找到！美國過去12年間，在外交上把「解除制裁禁運」和「銷毀大量毀滅性武器」結合在一起，作為一種策略長期的消耗伊拉克。現在美國佔領了伊拉克，想要解除制裁和禁運，它當然可以說（它也確實說了）：伊拉克已經沒有大量毀滅性武器了（如果有，為什麼海珊不用在保衛戰爭中！），但美英兩國不要忘了，它們當初出兵侵略伊拉克的理由，正是伊拉克沒有全面銷毀大量毀滅性武器啊！所以美國在國際的法律和正義面前，面對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困境：你美英兩國要想解除制裁禁運，就必須證明伊拉克沒有大量毀滅性武器，但你如果證明伊拉克沒有大量毀滅性

武器，那你侵略伊拉克的理由就完全不合法！

佔領後的全球反戰運動

當然，單極獨霸的帝國主義強權根本無須說道理（就像它不簽訂攸關環保的《京都議定書》和布魯塞爾的《國際戰爭犯罪協定》一樣），因為它就是道理。但當它的道理不能服人時，較弱的一方只有選擇接受或是反抗。絕大部份的地區和國家政府基於現實的利益，大都選擇了接受強權的道理，除了少數幾個政權還在負隅頑抗之外（有幾個還即將成為美國下一波的侵略目標），就剩下史無前例的全球反戰運動對抗的最徹底，鬥爭的最堅決。但我們也應認識到，自從侵略軍隊佔領伊拉克後，全球反戰運動進入了一個轉折時期：動員的規模縮小了，運動的策略目標變得更在地化和多元化（如各地的抗稅運動、反軍事基地運動、審判戰犯運動、港口機場的干擾運動、抵制侵略國家商品運動等），反戰團體在侵略軍隊佔領伊拉克以後，遭到各地政府的監控和打壓，對種族和宗教的壓迫加深了。所有這些新的發展當然對前所未有的全球反戰運動是一項考驗，而參與全球反戰的許多團體也利用二〇〇三年五月反戰運動的休整時期，不約而同地召開了反戰運動的階段性總結會議（英國的反戰聯盟在4月26日召開；美國的ANSWER在5月17-18日召開等），也針對佔領後的新形勢做出新的運動方向規劃。

侵略者應對其非法侵略行為負責

在這些重要的討論中，有關重建與解除禁運制裁的問題，也有深入的探討。由於美國利用外交策略，惡毒地將佔領重建和解除制裁禁運掛勾，在十三年長期反對解除制裁的壞記錄之後，竟大發慈悲，義正嚴辭地要求聯合國應立即解除制裁，以解決伊拉克“嚴峻的人道主義危機”。這樣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對於剛參與反戰運動的朋友們的確造成了思想上的困擾。這些困擾很典型地表現在美國校園的一些學生爭論上：

“美國現在不可以撤軍，這是不負責任的”

這種提法的背後反應了一種預設立場：美國是一個可以依靠的、“負責任”的勢力。

這種立場從某個角度來看並不算錯。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做為戰後的強權，以“反共”為己任，長年來也做了很多“負責任”的事。以中東地區為例，它長期以來“負責”武裝和資助以色列使得以色列成為該地區唯一擁有核武的強權；它“負責”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非法佔領長期化；它長年來“負責”支持過（有些現在還在支持）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伊朗和伊拉克等國家的封建政權，來維持阿拉伯世界分裂的局面。

從上述這些中東歷史，我們看到了美國長年以來"負責"的結果。所以在侵伊戰爭後，下令侵略出兵的美英國家元首並不該以佔領來表示"負責"，而是應該向布魯塞爾戰爭犯罪法庭自首，並接受公開審判。

"如果美國撤軍，伊拉克的情況將失控！"

伊拉克社會秩序的失控，正是美英發動侵略戰爭所引起的。美英侵略聯軍入侵近兩個月以來，對伊拉克造成大量毀滅性的破壞。伊拉克的水電供應設施至今都尚未全面恢復，由於相關的公共衛生與醫療體系遭到戰爭的嚴重破壞，加上聯軍草率的戰場清理工作，造成了伊拉克霍亂疫情和其他傳染病從巴斯拉開始迅速蔓延。截至5月18日為止，據估計已有4849-6457人因這場侵略戰爭而死亡(資料來源：www.iraqbodycount.net)。而美國先後指派的兩個伊拉克高級事務官員傑伊·加納和保羅·布雷默，一個是參與製造愛國者飛彈的軍火商(SY科勒曼公司總裁)，另一個則是白宮的首席反恐顧問，從這樣的人事安排上不難看出美國所謂初階段"重建"政策的走向，不外是軍事鎮壓和掠奪資源。這場侵略戰爭和這樣的人事與政策才是伊拉克社會秩序失控的根本原因。

"伊拉克人民正在挨餓，難道美國不應該做些什麼嗎?"

伊拉克的人民，特別是兒童，在制裁禁運的十三年中，飽受饑餓煎熬，這都是美英兩國長期以來利用聯合國制裁委員會杯葛伊拉克的進口清單所造成的，所以，伊拉克人民的飢餓是美英杯葛的結果，同時也是美英侵略的原因之一。現在大家都知道美英出兵侵略和佔領的根本原因是為了石油，但除此之外，伊拉克人民在美英長年的"饑餓"策略壓迫之下，竟然沒有"揭竿而起"推翻海珊，也使得這些強權失去耐性，決定自行侵略。所以，用饑餓逼伊拉克人民造反的帝國主義強權，絕對知道它做為壓迫策略的無效性，至於實際的饑餓感覺，隨之而來的營養不良以及居高不下的兒童死亡率，美英兩國向來就是冷漠以對。指望這樣的國家優先解決饑餓問題，根本就不可能。

許多的救援團體在這次侵略戰爭中，一直在第一線為解救伊拉克人民而奮鬥。它們最多的抱怨就是侵略軍隊只允許它們隨軍救援，不淮它們在軍隊的監控之外進行獨立救援的工作。但由於侵略軍隊粗魯的佔領行動以及具有爭議性的檢查活動，使得救援團體根本就不想和它們為伍，但救援團體如果想要前往侵略軍隊行動以外的地區，光是沿路的檢查哨所，就可以消耗掉它們所有的精力和救援的效率(詳細實況可以參

考www.electroniciraq.net www.stopusa.be和www.iacenter.org)。美英侵略聯軍用這樣方式控制佔領區，根本就不能解決伊拉克人民迫切的生存危機。

再來看看另一個佔領區 - 阿富汗的命運。布希在今年所提出的年度預算中，對於阿富汗的重建經費一毛也沒有編，經過一些國會議員力爭，才編出區區的二億三億美元，比起當初侵略阿富汗所花費的 45 億美元，真是天壤之別。三億元是無法讓阿富汗繁榮起來的，頂多只是維持殖民地的基本行政開銷，但那 45 億軍費卻可能造成三百萬平民餓死！（美國知名異議人士 Michael Albert 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所提供的研究數據）事實上，絕大多數住在難民營裏的阿富汗人的確正面對著餓死的危險！

美國政府總共花費了 120 億美元轟炸伊抗克，但佔領至今卻只提供了 6500 萬美元來維持伊拉克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這筆費用花不過六個月，但布希政府認為已經足夠了。顯而易見地，伊拉克人民的處境不會比阿富汗人民現在的情況好到那去。而美國的 " 饑餓 " 策略將繼續綏持下去，做為最 " 古典 "、同時也最殘暴原始的帝國主義殖民手段，無情地壓迫伊拉克人民。

以上這些問題，苦惱著許多雖熱心反戰，但也長期受到 " 霸權穩定說 " 洗腦的美國學生。面對美英侵略佔領勢力有關重建和解除制裁的外交策略，在 2003 年 5 月 22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1483 號決議之前，全球反戰運動界大致有幾種看法：

1. 做為違反日內瓦公約及聯合國相關決議而片面出兵伊拉克的美英兩國，應負侵略和戰爭賠償的責任。
2. 伊拉克應在聯合國的主導下，成立公正的國際機構，在排除侵略勢力的干擾下，積極並迅速地以侵略勢力的戰爭賠償以及國際援助，協助伊拉克人民進行重建以及解除禁運制裁。
3. 聯合國對於違法出兵的侵略勢力，應就其戰爭罪行進行公開的調查、逮捕與審判。

這樣的共識，在精神上仍然視聯合國為一個有效解決國際糾紛的機構。但 1483 號決議的出現，改變了這樣的看法。

聯合國 1483 號決議，是美英兩國以 " 解除伊拉克制裁禁運 " 的藉口，為取得侵略的完全合法性和佔領的絕對控制權，向聯合國所提出的。5 月 22 日提案表決結果，美英在聯合國安理會中以 14 比 0 的懸殊票數，贏得了一場外交勝利，也對國際情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美伊戰後世局管窺

林宗理

美、英這兩個帝國主義大盜聯手侵略伊拉克的醜劇終於落幕了。從表面上看，美、英摧毀了海珊政權，達到佔領伊拉克，控制中東油源與戰略要地的目的，戰果似乎頗為輝煌。但在道德上卻徹底破產，政治上則引發美、歐之間的裂痕擴大，阿拉伯與伊斯蘭世界更爲仇視美、英代表的西方文化，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的人民對美國霸權深惡痛絕等種種惡果，從而加劇了未來世界的動盪不安。

美國爲侵略伊拉克，提出了種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伊拉克擁有核子、生化等大規模殺傷武器對國際和平造成威脅，海珊的獨裁統治壓迫伊拉克人民，因而美國必須出動正義之師，征伐海珊政權，“解放”伊拉克人民於倒懸，以昭天討。然而在伊手克人民慘遭美英聯軍屠戮，死傷枕籍之後，戰爭結束至今，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武器，遍尋無著。海珊政權垮台後，美英先是放任伊拉克陷於暴民燒殺擄掠的無政府失序狀態，繼之派遣充當殖民總督的軍政長官接管伊拉克，伊拉克人民非但沒有箝食壺漿迎“王師”，歡迎鼓舞地迎接“自由”、“解放”，數以萬計的群眾發出要美國滾出伊拉克的怒吼，不時還有人進行自殺式攻擊。美軍在惱羞成怒之餘則報以濫殺無辜百姓。於是，美國侵略伊拉克的藉口一一被現實的情況揭破，在全世界面前徹底暴露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醜惡本質，再也無法戴著偽善的假面具，欺人耳目。

這次的美國侵伊戰爭值得重視的一點是，美國一意孤行發動侵略，不僅悍然視聯合國如無物，也開罪了法、德、俄等歐洲大國，使北約內部前所未有的出現重大分歧，歐盟的主要國家甚至與另起爐灶，自組聯盟軍隊，以與美國分庭抗禮之意。二戰後，國際鑒於世界大戰造成全球生靈塗炭，爲免重蹈覆轍，乃成立聯合國，期望通過國際協商，盡力制止侵略，避免戰爭以維持國際和平。但事實上，只要人類社會的階級統治關係一日不破除，不論是一國之內或國家之間，弱肉強食，強凌弱，眾暴寡的不合理現象就無法消弭，所謂平等、和平的國際關係就不可能存在，聯合國的宗旨所標舉的理想自然也不可能落實。尤其自聯合國成立以來，美國不過是拿聯合國作爲控制世界的工具。翻開聯合國的歷史，美國一貫的態度是，極力主導聯合國的議程與決議，合於己利則用之，不合己意則棄之如敝屣。在冷戰年代，西歐由於有社會主義勢力的威脅，加以戰後重建多賴美國之力，不能不唯美國馬首是瞻，任令美國在國際事

務上予取予求。但自蘇聯崩潰，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對抗已不復為世界的主要矛盾。外在威脅既除，法、德等西歐主要國家的經濟亦已日漸榮盛，便不再甘於雌伏在美國淫威下，亟思整合歐洲力量，在政治、經濟乃至軍事上獨立自主，與美國抗衡。俄國則是在美國運用和平演變的戰略搞垮蘇聯後，日益感到美國本意在削弱俄國實力，絕無協助俄國成為資本主義大國之心。故普京上台後，在俄國民族主義支持下，調整了葉利欽時代的親美政策，力求表現俄國的自主性。

這次法、德、俄三國帶頭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當然不是單純秉諸所謂的正義、良知，而是出諸政治、經濟利益的考量。法、德是歐盟的主導力量，固不願美國繼續恃強獨霸天下。法國多年來與伊拉克關係良好，既售予武器，又在伊拉克油田投下數以百億美元計的資金。俄國在伊拉克也有龐大的經濟利益，除了三百億美元的石油投資外，還有出售武器的八十億美元債款未收回。如果任由美國獨佔伊拉克這塊戰略要地與其豐沛的油源，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於法、德、俄三國不利。事實上，為了確保在伊拉克既有的經濟利益並分潤伊拉克戰後重建的數百億美元大餅，法、德、俄等國自戰前、戰爭中與戰後都不斷在與美國進行秘密會談，磋商戰後的經濟利益分配。故而，歐洲列強的反對美國侵略伊拉克本質上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在分割世界市場上的齟齬，並不代表所謂和平、正義的力量與邪惡勢力之間的對抗。美國這次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執意侵略伊拉克，徹底展露了傲慢自大的世界霸主心態，令歐洲列強更生疑懼與不滿。在資本全球化下，各國爭奪世界資源與市場的衝突勢必增加，帝國主義之間、帝國主義和不發達國家之間的矛盾也必日益加深，這是美伊戰後值得關注之處。

就美國與阿拉伯人民、伊斯蘭教徒的關係來看，美國雖在軍事上打倒了海珊政權，征服了伊拉克，卻埋下了中東更不安定的火種。這次的美伊戰爭包含著濃厚的宗教與民族因素。中東地區近百年來，飽受西方帝國主義殖民的茶毒，不但政治上被宰制，經濟上遭到掠奪、剝削，傳統的宗教、文化也因西方文明的入侵而大受衝擊。中東的阿拉伯人與波斯人曾經創造輝煌的文明，具有偉大而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他們所信奉的伊斯蘭教亦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對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自然有強烈的抗拒心理。尤其二戰後，猶太人奪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世居之地，佔據宗教聖地，強自建立以色列國，更憑恃美國的支持，不斷攻城掠地，擴張國土，壓縮了阿拉伯人的生存空間，令阿拉伯人憤恨不已。因此，阿拉伯民族主義與伊斯蘭教在中東地區有廣泛的影響。海珊多年來不遺餘力地鼓吹阿拉伯民族主義，力圖把中東的阿拉伯人團結成統一的民族國家，領導阿拉伯人擺脫帝國主義的控制，重振阿拉伯民族。由於海珊強硬的反帝、反以色列立場，在不少阿拉伯民眾心中，海珊已成為阿拉伯反帝的英雄，但也因此成了美國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心頭大患。911事件後，美國總統小布希把反伊

斯蘭激進派的恐怖主義與征伐伊拉克當成再一次的十字軍東征，這自然普遍激起阿拉伯人與伊斯蘭教徒的憤慨，英國本為殖民伊拉克的帝國，這次美英聯軍毫無正當理由即藉故發動侵伊戰爭，濫殺無辜的伊拉克人民，正坐實了美、英這兩個新老帝國主義霸主想再度殖民、掠奪伊拉克的卑劣野心，此舉必然會勾起阿拉伯人的新仇舊恨齊上心頭。

此後中東地區，乃至美、英本土必將恐怖攻擊不斷，難有寧日，是勢所必然的。美國的如意算盤原是想藉打垮海珊鎮攝伊朗、敘利亞、北韓等反美立場鮮明的國家，並牢牢掌控中東地區及其油源，進行制約歐盟、中國、日本等高度依賴進口石油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照上述分析看來恐難如其所願。



石油的利益與文明的衝突

老 甘

打從美國準備侵略伊拉克開始，我們便不斷的聽聞這麼一種說法：『美國對石油的需求完全可以通過世界石油市場獲得，因此美國不是爲了寡佔石油資源而侵略伊拉克』，這樣的說法來自美國、來自台灣，甚至來自中國大陸，最近一次的見諸文字，則是上海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王義桅博士的大作：『被神話的美國』。這種一致的理論，幾乎同樣的用詞遣字，不存在瓢竊問題的來自四面八方，把老百姓當成三歲小孩來哄騙，企圖掩飾美國爲石油而戰的真相，其背後到底隱藏著那一隻看不見的手？

『我家附近有一個菜市場，我完全可以通過菜市場來獲得我需要的青菜，所以我沒有必要使用武力去趕走一個曾經欺負過其他小菜販並且意圖控制菜市場的一名大菜販，我使用武力的目的只是想維持菜市場的秩序，在趕走大菜販後我再指定另一名菜販來頂替他的位子。』這裡所指的我，顯然是指代表政府公權力的警察，因爲只有公權力才會幹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如果我不是公權力，那麼我的背後就必然隱藏著經濟利益的動機，也就是說，當我使用武力進入菜市場，我就成爲菜市場的董事會，由我來任免菜販，制訂菜價，控制來源，從而獲得我所需要的經濟利益。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是公權力嗎？

我家附近派出所裡的警察，因為政府公權力賦予他們警察的職責，所以他們不需要強調自己是警察，我就知道他們是警察，而成日自我推銷則往往是騙財騙色的假警察才需要幹的把戲。現今的美國透過各種方式、極力塑造並推銷『世界警察』的自我形象，可是美國並未獲得世界人民的授權來擔任這個職務，換句話說，美國的行爲和一般市井無賴假冒警察騙財騙色一樣，所謂的世界警察的招牌只是掩飾背後動機的遮羞布，是前述的菜市場中那個不是公權力的我。

『假警察進入菜市場，以藉口維護秩序的名義，取得菜市場的主導權以獲取經濟利益，這是一種商業行爲，商業行爲是企業才會做的事，美國既然不是一家企業，所以美國不是在搞經濟利益而是真正在維持秩序，你們都冤枉美國了。』這是另一種替美國開脫的說法，乍聽之下不無道理，然而政府是由人所組成的，現在我們不妨來看看目前美國政府的組成人選，把這些人的經歷攤開來看看。

總統：小布希 (George.Bush)

布希家族發跡自他的祖父普里斯考特.布希，這位祖父布希於1917年加入德克薩斯州的漢貝爾石油公司 (Humble Oil Company)，該公司的創始者是威廉.法立奇，1919年新澤西美孚 Standard 石油公司 (埃克森 Exxon 石油公司的前身) 購買漢貝爾一半的股權，漢貝爾成爲新澤西美孚的子公司，威廉.法立奇其後曾擔任美孚石油集團的主席，威廉.法立奇的孫子小威廉.法立奇和老喬治.布希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老布希於1964年競選華盛頓特區參議員時，小法立奇是他最大的金主。2001年，小布希當選總統後，酬謝這位父執輩的金主，請小法立奇擔任美國駐英國大使。

副總統：錢尼 (Colin.Cheney)

錢尼原任世界第二大煉油設備生產商，美國哈利伯頓石油公司 (Halliburton) 的總裁兼執行長，他的大客戶便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德士古等大石油公司。

國務卿：鮑威爾 (Colin Powell)

無商業背景

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女士 (Condoleeza Rice)

原任美國雪佛龍 (Chevron) 石油公司 (原加州美孚石油) 的常務董事，雪佛龍公司在前蘇聯中亞的裏海油田區擁有最多的利益。

國防部長：倫斯斐德 (Donald Rumsfeld)

曾任通用儀器公司(General Instrument)總裁，蘭德智庫公司理事會主席，蘭德智庫公司的幕後金主就是美國及世界第一大軍火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註：愛國者飛彈製造商)。

副國務卿：阿米蒂奇 (Richard Armitage)

原任美國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ocal)顧問，此公司即是負責建造阿富汗石油管線的公司，現任阿富汗總統卡札也曾是該公司顧問。

商務部長：埃文斯 (Don Evans)

德克薩斯州湯姆布朗石油天然氣公司 (Tom Brown) 的執行長，曾為小布希籌集一億美元的競選經費。

能源部長：亞伯拉罕 (Spencer Abraham)

德克薩斯州湯姆布朗石油天然氣公司 (Tom Brown) 的高級主管。

財政部長：史諾 (John.Snow)

CSX 鐵路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兼執行長。

陸軍部長 (原任空軍部長)：羅奇 (James Roche)

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註：F14戰鬥機的製造商)電子傳感器和系統部的總裁。

攤開來才知道，美國政府不僅僅是一群商人的組合，而是一群石油大亨與軍火販子的分公司。根據統計，小布希政府連同小布希本人在內，總共有 21 人來自石油集團，32 人來自軍火集團。

看完以上這些背景資料，你還相信美國攻打石油蘊藏量世界第二的伊拉克是爲了世界和平嗎？

在這些背景資料裡，我們看到一些耳熟能詳的名字，譬如埃克森石油、美孚石油、雪佛龍石油，這些富可敵國的石油公司和美國政府高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美國政府的政策無不以這些大公司的利益爲最高指導原則，然而有一點恐怕大家不是很清楚，就是剛才提及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龍，他們看似不同的公司，其實都是一家人，因爲他們都是洛克斐勒石油帝國的成員。

洛克斐勒石油帝國簡介：

1866年，約翰·洛克斐勒於美國克利夫蘭成立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在大中國地區則是以『美孚』石油做為商標。

1911年，美孚拆解為38家公司，其中最著名的有以下5家。分別是：

紐約美孚：1966年改稱莫比爾 Mobil，中文仍稱美孚

新澤西美孚：1973年改稱Exxon埃克森，1999年合併美孚，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油公司，2001年財富雜誌評比為全世界第一大企業（同年微軟的美國排名為79）

加州美孚：1984改稱Chevron雪佛龍，同年併購海灣Gulf石油公司，2001年合併德士古Texaco石油公司，成立雪佛龍德士古Chevron Texaco公司

印第安那美孚：後來的阿莫科（Amoco）石油公司，1998年與英國石油公司BP合併，成立BP-Amoco公司

俄亥俄美孚：後來的馬拉松（Marathon）石油公司

從50年代以後，石油界流傳著七姊妹的說法，七姊妹是指控制全世界石油能源的七大西方世界的石油公司。其中五家是美國公司、一家英國公司、一家荷蘭英國合資。如下：

紐約美孚（Mobil 莫比爾）、新澤西美孚（Exxon 埃克森）、加州美孚（Chevron 雪佛龍）、海灣（Gulf）、德士古（Texaco）、皇家荷蘭—殼牌（Shell）、英國石油（BP）

其中的五家美國公司已經合併為兩家（埃克森美孚、雪佛龍德士古），全部納入洛克斐勒石油帝國的版圖。

工業革命是一場能源使用的革命，誰控制能源誰就控制工業生產，洛克斐勒石油帝國對美國及對世界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從二次大戰後，美國政府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就是美國政府的三大要職（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必有一人出自洛克斐勒財團，通常都是國務卿。譬如艾森豪時代的前後兩任國務卿杜勒斯及拉斯克，前者曾擔任洛克斐勒基金會董事會主席；後者則曾擔任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總經理。最值得一提的則是大名鼎鼎的季辛吉，季辛吉1946年進入哈佛大學攻讀政治學，領取的是洛克斐勒基金會的獎學金，1969季辛吉在尼爾森洛克斐勒（老洛克斐勒之孫，曾任紐約州長及艾森豪總統的國際事務顧問，在1968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共和黨內初選敗給尼克森）的推薦下擔任尼克森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在此之前，季辛吉是洛克斐勒家族經營的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為老洛克斐勒之孫、尼爾森洛克斐勒的弟弟大衛洛克斐勒）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1973年，季辛吉更上一層樓擔任尼克森政府的國務卿。尼克森因為水門案黯然下台後，副總統福特接任，尼克森及福特原本的後台就是大軍火商，1968年的共和黨黨內初選，尼克森得到軍火集團的

支持從而打敗了尼爾森洛克斐勒，福特上任後，尼爾森洛克斐勒接任有名無實的副總統，福特召回駐北約大使倫斯斐德（就是現在小布希政府的國防部長）擔任國防部長，倫斯斐德具有大軍火商的強硬背景，對國務卿季辛吉不買帳，經常越權干涉季辛吉，此舉得罪了洛克斐勒家族，種下福特在1976年總統大選中落敗的因子。

1973年，大衛洛克斐勒主持成立了『三邊委員會』，三邊即為美國、西歐及日本，在紐約、巴黎、東京設有三個總部，初期成員有190人，分別來自美國、加拿大、西歐及日本，此委員會的目的是強化資本主義陣營的合作，研究重大國際議題，向各成員所在的國家提供建議，並且『敦促』政府採納。其資金大多來自洛克斐勒基金會及福特基金會。（註：三邊委員會號稱美國的影子政府而座落於紐約的洛克斐勒石油帝國總部則號稱美國的地下國務院）三邊委員會成立後，名不見經傳的民主黨花生州長吉米卡特，在委員會主任布里辛斯基的推薦下加入，從此聲名大噪，1976年卡特在洛克斐勒家族及三邊委員會的支持下（競選班底有16人來自三邊委員會），擊敗福特入主白宮。卡特上任後其政府的三大要職：

國務卿：范錫，原任洛克斐勒基金會董事長。

國防部長：布朗，三邊委員會執行委員。

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三邊委員會執行主任。

事實上，卡特政府內總共有26名三邊委員會成員，1980年上台的共和黨雷根政府則只有七位閣員來自三邊委員會，不過這並不表示雷根有多乾淨，只能說他與各大財團保持相等距離，誰都不得罪。

現在小布希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萊斯女士，無疑是小布希政府中與洛克斐勒石油帝國關係最密切的一位，她曾任雪佛龍石油公司的常務董事10年，雪佛龍公司甚至曾以萊斯女士名字（Condoleeza）的縮寫（Condi）來命名一艘萬噸級油輪，於此我們實在很難想像萊斯女士在位居要津之後，如何能夠不為她老東家的利益打拼？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石油與軍火集團操控美國政府是不需要辯論的事實，其中又以洛克斐勒的石油帝國的影響力最為龐大。

洛克斐勒家族經營的大通曼哈頓銀行於2000年與JP摩根銀行合併，成立摩根大通銀行，在2001年美國財富雜誌評比為全美第11大企業。近日，這家銀行悄悄與台灣扯上了關係，在台灣中華電信的民營釋股一案，摩根大通銀行展露了無比的雄心，倘若哪天台灣中油公司也要搞民營化，能輕易吃下中油也只有洛克斐勒集團旗下的大石油公司而已，屆時台灣最大的生產事業均成為洛克斐勒集團的私有財產，台灣不需

要成爲美國的第 51 州，就保證能夠得美國軍隊百分之百的保護。

美國學者杭亭頓在『文明的衝突』中提到：『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是現代世界中衝突演化的最後階段』。於是當我們看到俄羅斯（東正教）與車臣（伊斯蘭教）之間的衝突，前蘇聯轄下的亞美尼亞（基督教）與阿塞拜疆（伊斯蘭教）的世仇關係，911 自殺攻擊事件，彷彿杭亭頓的預言成真，但是當我們仔細審視一些背後的因素之後，會發覺杭亭頓的理論根本不通。

一．911 事件：

塔利班於在 1996 年取得阿富汗政權之後，美國政府立即與其交好，美國加州聯合石油公司（Unocal）預備在阿富汗境內鋪設一條 1000 英里的輸油管路，計畫將土庫曼的石油從產地經過阿富汗在經過巴基斯坦的海港運送出海，條件是 Unocal 取得 43% 股權，土、阿、巴三國佔有 57%，四方面均無異議，塔利班政權也欣然接受美國政府的財政補助，不料突然殺出一個阿根廷 Bidas 石油公司，告訴塔利班如果由 Bidas 來鋪設油管，他們只要 22%，塔利班立即接受並想踢掉 Unocal。次日，美國 CNN 就開始大規模報導塔利班違反人權，此時塔利班已經執政超過 2 年，就算真的違反人權也已經超過 2 年了，爲何 CNN 才開始報導？2001 年爆發 911 自殺攻擊事件，美國取得藉口出兵阿富汗，扳倒塔利班政權，扶植一位曾任 Unocal 的顧問也曾在老布希政府任職，移居美國近 20 年的阿富汗人卡札爲總統。阿富汗境內的油管自然仍由 Unocal 鋪設，只是股份的分配是否改變就不得而知了。

從塔利班上台到 911 事件到塔利班垮台，看不到任何文明的衝突，只看到石油利益在漫天飛舞。

二．車臣與俄羅斯

車臣是俄羅斯國內的小共和國，近年來鬧獨立，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車臣人篤信伊斯蘭教，俄羅斯人信奉東正教，根據杭亭頓的理論，這顯然是一場文明的衝突。可是當得知有一條切切那亞油管將經過車臣境內以便把裏海石油運送到黑海的時候，才讓人恍然大悟，原來車臣分離主義者在打這個主意。如果車臣仍屬俄羅斯的一部份，那麼經過車臣的這條油管的經濟利益就得歸莫斯科中央所有，車臣首腦得不到任何好處，一旦獨立成功，車臣的獨立領導者就可以和過去的塔利班一樣，與美國的石油公司分食大餅。

怎麼又是石油利益作祟？文明的衝突到哪去了？

三．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

亞塞拜然篤信伊斯蘭教，亞美尼亞信奉基督教，二者是百年世仇，應該稱得上是文明的衝突吧？但是信奉基督教的美國卻與信奉伊斯蘭教的亞塞拜然結盟，等於協助亞塞拜然對抗基督教的亞美尼亞，美國的作為不啻又打了杭亭頓一記耳光。

美國為什麼這麼做？為何拋棄同為耶穌子民的亞美尼亞，反而去擁抱穆罕默德的信徒亞塞拜然？原因無他，亞塞拜然盛產石油而已。我們不妨翻開兩次世界的歷史，亞塞拜然的巴庫油田在兩次大戰中都是缺油的德國的重點佔領目標。現在的亞塞拜然國際鑽探公司（AIOC），洛克斐勒石油帝國之一的雪佛龍石油公司（Chevron）即控制其 30% 的股份。

文明再度沒有衝突，反倒是利益讓文明選邊站好

杭亭頓的大作『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最重要的第四個段落『文明的衝突』，長達 12 萬個以上的文字裡面，僅在八個小段落提到石油，其中二次是中國與南海石油，一次是中國與中亞石油，三次是俄羅斯和中亞石油，對於美國大石油公司對波斯灣與中亞石油的覬覦卻隻字不提，這似乎不是一個大學者應有的作為，但是當我們得知杭亭頓和洛克斐勒集團也有說不清楚的關係時，一切都不足為奇了。像杭亭頓這樣的知名學者，尚且著書立作替日後美國出兵中亞及波斯灣地區霸佔石油的行徑先上解藥，對於其他一些大陸或台灣的癩三學者說的『美國對石油的需求完全可以通過世界石油市場獲得，因此美國不是為了寡佔石油資源而侵略伊拉克』的鬼話，我們也就姑且聽之吧！

★

美國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倫理

呂正惠

二十一世紀才剛開始，就發生美國不顧國際輿論的反對，悍然出兵攻打伊拉克的事件。就只因爲伊拉克不肯聽美國的命令，美國不能隨心所欲的支配伊拉克豐富的油藏。因爲我有強大的力量，你有我需要的東西，我就用最赤裸裸的暴力，逼使你不屈服也得屈服。這種公然的「搶劫」，竟然由號稱是人類至今最文明、最民主、最尊重人權的美國一手演出，還透過電視公然在全世界報導、並自以爲是「正義」之戰。這樣的事件，只能用令人「目瞪口呆」來形容。

這一事件真是深深地震撼了我，讓我好些天心神不寧。一直在思考，人類到底什麼地方出了毛病，或者人類從來就沒有「文明」過？「文明」只是我們人類自我誇耀的無恥的粉飾。

我想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西班牙、葡萄牙大舉掠奪中、南美洲，英國大舉掠奪了北美與印度，然後歐洲列強瓜分非洲，強占中東，並侵奪遠東。西方國家科學發達，進行機器生產，發展能源，使得生產大為增加，這當然是他們的大貢獻，然而，在這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他們強占人家的土地，掠奪人家的物資，並強制的把工業成品傾銷到人家的家裡。機器生產和暴力掠奪兩者相加，才形成完整的資本主義生產形態，難道不是這樣嗎？

西方資本主義在東方的「大弟子」日本，不是也有樣學樣嗎？才剛完成初步的國家統一和近代化，就侵略朝鮮，並進一步把中國東北、台灣都視為該他所有的囊中物，然後就企圖攻占全中國與東南亞，建立這樣的大帝國的企圖雖然以慘敗而告終，然而，至今還有多少日本人仍然認為，日本理所當然該這麼辦，一點錯也沒有。

近代西方與日本的帝國主義者都忘記了，他們的「財富」，並不全部靠他們的「智慧」與努力生產出來的，多半還跟大舉「搶劫」配合，形成生產－搶劫－再生產－再搶劫這樣的循環模式而「累積」出來的。

說到底，個人可以靠搶劫、做強盜為生，而一些人群也可以組成國家這種暴力團體，以國家的力量去搶劫別人，以充實自己的府庫。這樣的行為，人們以為人類早已因自己的文明進步而絕跡了。其實一點也沒有。

號稱人類最進步的資本主義時代其實才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搶劫時代。

美國在全世界的電視上公然無恥、大言不慚的表演進攻伊拉克的「壯舉」，而且還獲得不少的掌聲（特別是我們「了不起」的台灣人），這是怎麼樣的文明道德呢？

結論只能是：資本主義所提倡的自由競爭的必然結論，就是：只要你有力量，搶劫就是對的。

我們為什麼還要接受這樣的價值觀呢？



阿富汗戰爭犯罪國際審判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Afganistan”

ICTA 運動簡介

譯錄自《世界》雜誌03年4月號

林書揚

前言：

以反戰人民的名義結合民間和平運動團體，組織跨國界民眾法庭，針對特定的國政掌權者進行戰爭犯罪的罪行論告。這種「人民法庭運動」最早由曾任美國司法部長的拉姆基·庫拉克所提倡。是前世紀歐美市民反戰運動的方式之一。第一次活動1992年在紐約開庭審判布希(老)1991年發動灣岸戰爭的罪行。

做為 ICTA 運動的第一場，是2002年12月15日在日本東京·新宿召開的「阿富汗事件國際戰犯第一次人民法庭公聽會」。會中播放庫拉克氏的致辭錄音帶。

爲了這第一次法庭的召開，先在2001年10月正式成立ICTA實行委員會。在準備期間進行各種調查(戰場現地狀況，各種戰災統計等)、法規、起訴書等的製作。

正式的審判庭預定在03年12月在東京召開。在這一年期間，一方面在世界各地舉辦系列公聽會，一方面在蒐證、分析及論證理論的探究，有關法庭體制和委員會體制的研究和決定等，完成人民法庭的結構性規定。

至今爲止，該實行委員會所準備的起訴書(草案)，以喬治·布希現任美國總統爲被告。內容大致如下：

美國布希總統，在起自01年10月7日的阿富汗轟炸事件中，對美國軍隊負有指揮及命令的最高責任。同時向英國首相和日本首相要求提供軍力協助，執行空襲轟炸。這種行爲，可指爲下列犯罪的共同實行。

第一、 侵略罪

布希總統針對「9.11」事件，首先提出「報復戰爭」論。因為反對聲浪的出現，繼而提出「自衛戰爭論」。但此種論理，不符合聯合國憲章

第五一條的「自衛權」應具之條件。乃最後提出「恐怖主義者的庇護國等同恐怖主義者」的暴論，開始對阿國施行空中攻擊。這是不具有國際法上的正當理由的轟炸，應被認為國際刑事法庭規章中的侵略罪。

第二、人道罪

自2001年11月至02年2月間，美英的空中襲擊造成了阿富汗國內的大量難民。難民的大量出現，應被認為攻擊者犯了「大量迫害」甚至「大量屠殺」的人道罪。

第三、平民及民間設施攻擊罪

美英軍隊以攻擊「塔里班」政權為名，在阿富汗的都市和農村，攻擊平民及民間設施。所謂「誤擊」的藉口應不成立。有關民間住宅、學校、教會(莫斯科)遭受轟炸的證據現已大量出現。這是一種典型的戰爭犯罪。直到03年2月12日，美軍仍然在阿富汗南部黑爾曼托州，繼續進行平民殺戮。

美軍機投下多種特制高破壞力炸彈，攻擊民屋密集區。另外，至2002年12月底才被揭發的「劣化鈾彈」(另稱「貧鈾彈」，具放射能炸彈)的大量使用，也應屬戰爭犯罪行為。

第四、俘虜虐殺與虐待罪

在馬熱里夏利夫近郊發生的塔里班俘虜虐殺現場被收錄在影帶中。曾在EU會議中放映。在古巴關塔那摩基地發生的俘虜虐待實況，也被收錄在映像中。布希總統針對國際批評，竟然再三強調「我方不把他們認定為日內瓦條約規定下的俘虜」。

ICTA，是收集這些戰爭犯罪的證據，依照現代國際法，舉發其戰爭犯罪行為的人民運動。

為甚麼要有人民法庭？

有下面數點理由：

一、美國攻擊阿富汗的違法性，必須加以論證並予確認。繼阿富汗轟炸之後，布希總統等人又強行侵伊拉克戰爭。對此，出現了全球性的和平運動、反戰運動的遊行或集會。但，如果侵阿戰爭受到了國際輿論的暗默追認，則對侵伊戰爭的反對運動將失去法理上的說服力。因此，必須把同時反對兩個戰爭的國際法論據及國際法基礎上

的和平原則，在全球人民之間再度予以確立。

二、在國際政治現實中，能審判布希總統的國際法庭是不存在的。在過去審判個人的戰爭罪的國際法庭，曾經有紐倫堡裁判，東京裁判(別稱「遠東國際軍事裁判」)，舊南斯拉夫國際法庭，盧安達國際法庭等，但這只能受理特定時期，特定地點發生過的戰犯罪行。且是勝者審判敗者。另外，2003年3月，「國際刑事法庭」(ICC)成立了。但規程生效的時間定為02年7月。對之前的戰犯行為沒有追訴權。且因為美國政府至今仍不願批准該規約，即使有人舉發，該法庭也不具有對布希的起訴條件。既然既有的國際法庭無法審判，日子一久，定會變成既成事實而被國際社會所默認。至此，唯有經過人民大眾的自發救濟，來挽救事關戰爭與和平的文明規範。透過人民的團結、研究，成立新創意下的民眾法庭。

三、人民法庭的構想，是針對國際法本身的一種新的問題提起。近代國際法，是由國家執行的，以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調整為目的的行為體系。因而國際法的主體，以主權國家為原則。如此則，國家所建構的國際法，如果國家本身不遵守，會如何?即只有依靠「國家群」的政治壓力或國際機關的監視，能使主權國家遵守國際法。

但即使是國際機關，也不一定會遵守國際法。萬一，國家也好，國際機關也好，都不遵守國際法，即還會有甚麼對應方法呢。

針對這樣的設問，不容易提出回答。但意圖提示一種可能性的努力，便是國際人權法分野中的NGO活動。我們不能說，只有國家或國際機關才是國際法的主體。而人民大眾也可以在人權、福利、人道、民主化運動、和平運動等方面，通過NGO活動，包括有關的事實調查，解決方法，甚至遊說宣傳等，提供國際法執行方面的大量的資訊。而在此意義上，也可以扮演國際法主體的角色。

人民法庭的構造：

人民法庭並沒有特定的結構模式。不過像越戰時期的拉塞爾法庭，灣岸戰爭的庫拉克法庭，控訴日本戰爭犯罪的亞細亞民眾法庭，控訴日本軍性奴隸的女性國際戰犯法庭，控訴韓戰中的美軍犯罪的高麗亞戰犯法庭等，都具有實際運作的模式，可以做參考。

拉塞爾法庭是巴特蘭·拉塞爾在1965年開始準備，66年6月發表法庭組織計劃

案開始。受到拉塞爾的通知，南·北越調查委員會的活動也開始正規化，到了66年11月，在倫敦召開了國際法庭設立會議，成立了拉塞爾榮譽庭長，姜·保羅·撒托爾執行法官等總共20名成員的審判庭。

該人民法庭的第一次開庭，67年5月間在瑞典首都斯托克荷慕。法庭的判決，是由全體法官一致同意，指出美國政府違反國際法，對越南發動侵略行爲，且犯下了轟炸民間各種設施、學校、水壩、醫院的戰爭罪行。

當然，美國的侵略行爲一直激化下去。在第二次開庭時，召喚了三位美軍士兵上證人台。他們的證言，帶給國際很大的衝擊。拉塞爾法庭是由知識分子所主導的法庭，變成了日後人民法庭的一種模式。

其次，談到人民法庭的存立基礎是甚麼？

國家的法庭，之所以有能力進行審判，是因為在主權憲法的基礎上有刑法、刑事訴訟法或法庭組織法等有關法律體系的存在。而人民法庭卻不具有這種必需的根據，因此只有以人民的名義執行各個環節。ICTA的章程第一條，是本法庭進行審判的宣言。是人民本身創設了「國際法庭的權限」的宣言。

同時，這個法庭不能任意代辯阿富汗的受害者，不能自任爲阿富汗受害者的代理人。ICTA必須自行負責，自我規定任務，來完成法庭的目標。

例如：日本政府曾經對美英空軍的轟炸提供了「給油」的後勤支援，承擔了阿富汗轟炸所需的燃料的40%。利用日本社會成員所納的稅金，美英執行了阿富汗轟炸、屠殺了大量的人命。也就是，日本人被迫違背自己的意志，站在「加害者」的一方。這樣的自我糾彈，只有在人民法庭上才能受揭發。

審判的進行方式：

ICTA章程第18條，指明NGO對法庭的協助。

ICTA的管轄範圍，亦即，本法庭能處理的罪行是侵略罪、戰爭犯罪、違反人道罪三項(ICTA章程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

法庭的構成，需有檢察官和裁判官(ICTA章程第八條)。

人民法庭，極需知識人的協助。判決的內容，必需根據現行國際法的一定水準的「法理論」，特別需要法律專家的協助(ICTA章程第10條)。

審判採行公開方式。上提的 ICTA 審判，預定在 2003 年 12 月在日本東京舉行。

ICTA 連續召開公聽會。這種方式學自美國的庫拉克法庭在美國各大城市召開的經驗。日本也將以同樣的公聽會活動持續下去。每一次的公聽會並非單純的報告會而是各項證據的收集，分析和記錄的場面。也就是，系統化的證據收集為主。我們的團體，已經派出了五個戰爭被害調查團到阿富汗的現場，今後也將持續下去。

2002 年 3 月，第一次調查團訪問了巴基斯坦的伊士拉馬巴特及比夏華爾的難民營，向阿富汗難民直接取材。他們得到了幾種新型大量破壞炸彈的目擊報告。

到了同年 9 月，調查團訪問阿富汗的卡布爾和卡拉巴兩地，進行另一次戰爭被害調查。找到了所謂「誤炸」受害戶的遺族及新型炸彈下受重傷的少年。03 年 1 月間，再度在卡布爾及卡利卡那二市進行調查訪問，特別注重平民住宅區的被炸情況。至今為止，美軍從未對「誤炸」事件的受害民眾提出賠償。

有關戰爭犯罪的證據，除了一般媒體所報導的資料外，我們也掌握了相當多量的，來自 NGO 方面的情報。

當前的阿富汗，對戰爭受害情況的調查，條件極差。因為卡爾才政權事實上是美國的「傀儡政權」，完全沒有進行戰災調查。即使發生了平民被美軍殺戮一類事件，也不會抗議，不會調查，更不會求償。甚至對非政府團體的調查活動，會做一些妨礙。

首府卡布爾，處在美軍和聯合國維和部隊的佔領下。即使是實際的戰爭受害人，也不能發出反美國或反聯合國的言論。因為，有可能受到抹殺(暗殺)。

如此則，在現地調查方面也有困難。不過即便是片斷性的資料，也有可能經過累積集中，最後達到一定的，平民虐殺事件的實相。例如：在美國方面，紐罕布夏大學的馬克·黑洛特教授，提出了受害平民大約三千七百人的推定數值。黑洛特教授並沒有親自到阿富汗，卻系統地收集報導，加以對照求證，達到一定的實態掌握。

也可以把受害人或遺族邀請出庭，作證。前提是，法庭能不能保護他們的地位或安全(ICTA 章程第 15 條)。

人民法庭的判決和一般的法庭同樣，由事實認定和法律論告兩個部分構成(ICTA章程第16條)。事實認定，是經過確認證據，整理成文。法律論告則以此為基礎，由法律專家建構。

判決是對被告的有罪或無罪加以斷定。當然，人民法庭不能以此為足。因為，現實上它只能判決，卻不具有執行權力。ICTA 是因為國家或國際機關不遵守國際法，才由民眾自動成立 NGO 來監視國家(國際)行為的法庭運動。

因其不擁有執行權，除了「判罪」之外，必須向國家或國際機構等具有執法能力者提出「執行」要求，以「勸告」名義由法庭發出(ICTA章程第17條)。

為了改變這個世界：

在第一次的公聽會上，賈利·威爾遜(IAC代表)介紹了90年代的美國反戰和平運動。綜結說：「庫拉克法庭不是追求正義的運動的終止，而是該運動的開端」。日本的伊藤成彥(日本中央大學名譽教授)說：「不是9.11事件改變了世界，而是被稱為全球化的現代史催生了9.11」。安藤泰子(茨城大學講師)則重新追溯國際刑事法庭章程的制定過程中的國際議論，努力闡明「侵略」罪的概念內容。另外，會中也出現了廣河隆一(記者)現地取材的照片展和綿井健陽(亞細亞出版社)的錄影帶報告。

第二次公聽會(1月22日，東京澀谷)中，律師內田雅敏指出日本對阿富汗戰爭所提供的協助，糾彈小泉內閣違憲。清水雅彥(和光大學講師)指責「有事立法」的目的不在於保護市民不受戰爭災禍，而是帶給日本人民軍事化體制和戰爭伏筆，甚至有強迫市民再度走上侵害亞洲人民的老路的危險性。來自韓國的一位MBC記者以他在阿富汗現地取材的影像作品，對那一場戰爭的實態提出了證言。另外一位，「駐韓美軍犯罪根絕運動本部」的幹事，以美軍車輛輾死女學生事件為例，揭發了美軍犯罪的實態，介紹了韓國民眾的鬥爭現況。

第四次(2月23日，神戶)、第五次(3月22日，八王子)、第六次(4月6日，京都)，然後預定在巴基斯坦的伊士拉馬巴特(4月30日)舉辦第七次。此外，準備中的城市還有神奈川、廣島、千葉、名古屋、沖瀨等。

最後，同人們雖然覺得，在苛酷的政治現實下處處有障礙，但還是堅定地相信著 ICTA 法庭運動是「改變世界」的起步。

我們吸收了至今為止的，所有和平反戰運動的成果和積累，向全世界發出，人民通過 ICTA 追究戰爭犯罪者布希的刑事責任的聲音。阿富汗戰爭犯罪的追究，連結上伊拉克侵略戰的責任追究，這是運動的必然發展。在這種努力的過程中，每一位參與者改變著自己，也改變著朋友，進而改變世界 ---- 把二十一世紀變成和平的世紀。讓我們的嘗試帶上這樣的劃時代起步的意義吧！

譯後語：

後冷戰時期，美·歐·日等既開發社會的反戰運動中，有一種所謂的「民眾法庭運動」。構成員主要以高級知識分子為核心。其理念基礎，還是近代資本主義法制觀念中的“個人等價”的平等思想。因為資本主義的進路，是沿著個體角逐場躋向獨佔高地，然後少數勝出者，以其剝削權為基礎的巨大的社會權(霸權)，吞噬劣勢多數對“平等生存”和“自主生活”的願望，以各種政策追求其衛權或擴權的自私目的。而當其壟斷勢力越境外征，形成了“全球化”大趨勢時，這種“全球化”便以“全球殖民地化”為其必然的構造內涵。霸權的越境外征必定是高收穫，必定高到足可：(1)消化境內階級對抗的緊張衝突；(2)最大限吸取境外廣義的生產要素。而為了達成內外雙重目的，獨佔體必須重返世紀前起步階段的軍事帝國主義。亦即，以戰爭手段排除境內外的障礙，實現最大限的“佔有”。唯有戰爭在“民主政體”下的制度化，戰爭手段軟硬體的加速發展，能維繫獨佔體的“優存”於不墜。只有戰爭立法的至高強制權，能使勝利者擺脫社會結構性的，總循環中的傳統的難題 ---- 分配問題。

獨一強者的戰爭政策，內而操控劣勢的階級階層，外而征服弱體的主權國家，製造出植民地支配的雙重敵對構造。前述美·歐·日社會的部分知識菁英，因而對政府的侵外戰爭極力反對，與受侵國家的人民大眾連動，共同推出戰爭犯罪審判庭運動，理由和意義在此。

當然，既開發國家政權組織的緻密度和人民生活的平均水平，使得階級對抗總可避免昇高到階級內戰的爆發性局面。但跨世紀美利堅「民主帝國」的有形戰力現已登峰造極，加上當權者一再放言“先制攻擊”和“核武使用”的戰略方針，使得市民社會中的進步分子，對現代文明野蠻化的可慮惡果，憂心不已。在尚能維繫選舉機制的美國社會的現實條件下，上述民間法庭運動的興起，還是有它的背景因素。縱令一時間無法撼動「帝國」的常備軍武系統，這種訴於庶民大眾的“說理運動”或者還能在舉發牽制美國戰爭手段的進一步極端化上面，逐漸喚起公民選民的內省和警惕，進而影響各屆政權的具體走向或政策變化。鑑乎此，戰犯民間審判庭的推動情況，還是值得觀察的。



“學術”作“秀”之醜態

周良沛

世事莫測，確實難料，真有“一天等於二十年”之變。一些不久前彷彿說了“階級”二字就有沾上“政治”之嫌，不說別的，起碼是回避、膩畏它的年輕人，不知怎麼回事，突然在他們的口語中，流行、新潮、使用頻率很高的，竟是“小資”二字。它是“小資產階級”的簡縮。這是“存在決定意識”，社會生活反映於他等的意識，還是玩世的遊戲？咱難弄清。用於貶抑時，它是與“文痞”相搭配的一個詞，用於自我陶醉，則是講“小資情調”了，說得很溫馨。

然而，我們這些不明內情的人，在這“階級”二字上，簡直被某些名家鬧糊塗了。本來，學者之名，是為他的學術之卓見，著作之等身而來。上世三四十年代，一本《大眾哲學》，對於那怕是初識文字的，都不會陌生其作者艾思奇之名。而現在這些“名”家，則多是先從他們的頭銜，什麼教授、博導、會長、院長、校長等等而知其“名”的，但，在一般人的眼裡，他們頭銜的金字招牌，已是很大的“名”了，習實從政治看問題的，也自然把他們有這些言論看作“有來頭”的政治訊息。為此，也不需要著作等身，有時就得琢磨他等言論的分量。

正因為如此，他們不是單個，而是一個一個分別在不同場合立說、演講，都在一個英文單詞“class”的翻譯上作文章，說它不應譯為“階級”，而該譯成“階層”。

我查了下英國的《Longman》、《Oxford》字典，全是作為“階級”。如“Class differences（階級區分）”、“Class distinction”（階級界限）、“Ruling class”（統治階級）、“The upper class”（上層階級），differences 還可作“不和”“對立”的意思，它在此連著 class，就更該譯成“階級”。其它如學校年級，產品的等級，若譯為“年層”、“等層”，那麼，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發展而發展，為人類思維和表達思想之手段的語言，本來就是人民長期交流中所形成表達某一概念所公眾化的，借助和保存基本信息的載體，因此，作為語言物質外殼的語音一旦被如此混亂了，就全亂了，人們自然不知它之所云了。何況，“階級”、“階層”本來就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而且，沒有階級，何來階層？

雖然社會不同集群或階級、階層因各自存在的差異也會影響到語言使用上的不同特點，但在“大同”之日未到之前，世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像他這樣的，其目的就在消除階級和自身的政黨，又極爲重視以其階級分析爲其重要內容的馬列主義，而且，恰恰是他認爲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少年時，在解放戰爭和社會改造的大環境中，耳熟的語匯裡自然少不了“階級”二字。痴長幾歲，學了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看到語言無階級性之說，一時還懷疑是否有印、校之錯。再痴長幾歲，再讀點書，才明白過來；可不是麼，無論殺人犯還是再世觀音，是文盲還是“博導”，“吃飯”、“睡覺”不同樣都說“吃飯”、“睡覺”麼？若怕“階級”二字，會使人聯想到“以階級鬥爭爲綱”的“階級”二字，那麼，說階級“友愛”、階級“調和”和“投降”呢？雖然前者是個溫馨的詞匯，後者是“階級鬥爭”的反面，還是“階級”所以要“鬥爭”的因果，但都可以說明，這兩個字，在語言中恰恰是沒有階級性的。二戰後，西方總是驕傲他們壯大了“中產階級”而提“階級”，英國的“保守黨”的“保守”二字作他們的旗號，並不像我們作爲一個貶義詞。原想一切事物無不打上階級烙印的道理，豈不知“語言”並不在內，只強在一頭，反而反了馬克思主義、反了科學，自以爲堅守的立場反而也會喪失立場。

然而，那些有來頭的名人，何以喋喋不休地在“class”這一英文單詞的翻譯上大作文章呢？按他們的年紀，在這個年月，在那個位置上，都該是懂外語的。何以會如此，要如此呢？

像所有的語言一樣，“階級”這一語言在其中恰恰也是沒有階級性的，若用以表達某種理念，它自然也成了表達它的階級性的載體。若像那些“名家”所說，不同“階級”二字，是爲了“更好地協調各階層之間利益關係，充分調動各種社會力量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經濟進一步穩定發展”。意思就是說，若說了“階級”，就會破壞各方的積極性和穩定、發展了。此話不僅有“階級”性，還有階級鬥爭的“戰鬥性”了。然而，“階級”的有無，又能以個人意志爲轉移的麼？這不用講什麼“主義”，稍有唯物觀的人都不難明白。《參考消息》譯載的《若國白領喜稱自己爲無產階級》，白領爲何有此心態？對英國的社會生活毫無所知，但也可以看清，它出於一種很強烈的階級意識。二〇〇〇年七月十八日，俄國當局建議俄共改名爲“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被拒絕，二〇〇二年十月革命節還組織了五十萬人遊行，顯示她的階級基礎和力量。號稱“發達國家”的美國，西部萬多碼頭工人使之遭受日以多少億計的慘重經濟損失，長達幾十日，也是多年不見的，規模空前的罷工，也暴露他國家的“發達”，還是階級所以要“鬥爭”的因果並未使他們的勞工在他現有的機制結構下，可以幹得無憂無慮，無怨無悔。

以幹得無憂無慮，無怨無悔。

然而，我國的穩定、發展，是否功在遵照了這些“名家”的提法呢？不！請看最新公布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伍。由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但已經不是主要矛盾。”其它如“抵禦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腐朽思想侵蝕”之綱領，其中雖無“階級”二字，也是很強烈的階級內容。

爲此，那麼多絕不會全是外文盲的“名家”，是否會改變主意，認爲“class”應譯爲“階級”呢？但願吧，但這樣的可能性實在太小，因爲真正作學問的人，絕不會在這個不是什麼觀點、認識上的分歧和失誤，而完全是在普通常識上這樣作他有其私心的折騰。很明顯，他等這套“理論”的“學術”，起碼是他等自欺欺人，“此地無銀三百兩”地自以爲完全可以作爲一種政治信息在公開傳播，爲某種新的政策、爲他所謂的“開放”之“突破”作他“先知”的“預言”，乃至看到“私營企業主尋求社會榮譽和政治待遇的願望得到國家進一步承認”，就以爲該易旗換口號，爲應對“改換門庭”的突變，作他某種輿論的開路，盡管這樣顛覆了政黨原有的價值觀後，只會對原來對她有堅定信仰者產生排斥力，後果嚴重，但他等也迫不及待。我們許多問題，也常常就壞在這樣的輿論上。就是蔣介石，他實在不願在他的專制下實行會毀了他統治的階級基礎之“平均地權”，也是我們所說的“土地改革”，但他也是照樣念他“三民主義”的經，以取信那真正對三民主義的忠誠者。可是，我信這等絕非外文盲的“名家”，還不是以對立、異己之情，而是以機會主義的心態，自信是瞅准了某一時機，作他的政治賭博。聰明過頭，還是要承認有他的聰明。判斷的失誤，還是爲了去捕捉促使他如此行動的信息，想以此作出他主動配合的姿態，待宣稱爲“全民的黨”在修憲與改名“社會民主黨”同步時，撈到他的好處。偏偏事情最後不是這樣，其中的過程，是非、內情、我等百姓也無需清楚。但我卻清楚地看到這些機會主義理論者，沒抓到他想逮的機會。卻暴露了他折騰其中作“秀”的醜態。而“作秀”之“秀”，也是從港台直接時髦到大陸的口語，其實，這“秀”字，也是英語“show”的音譯，是表演、賣弄、炫耀之意。在此，是否也可以學學那些先生、作番“學術”性的說明，將它譯爲裝神弄鬼之“鬼”或“神”呢？

★

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